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第五卷

（约1870—19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组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总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cia

Volume V: c. 1870—1930

Edited by Leslie Beth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5卷

（约1870—1930）

胡毓鼎　高晋元　涂光楠　戴声浦　等译

徐壮飞　高　铦　张森根　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32.625印张　847千字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800

定价：19.60元

ISBN 7-80050-276-7/K·10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5卷

（约1870—1930）

胡毓鼎　高晋元　涂光楠　戴声沸　等译
徐壮飞　高　铦　张森根　校订

出版说明

由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尔教授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是七十年代中期着手编撰的一部史学巨著。参加撰稿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1984年以来，该书已陆续上市，预计将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出齐。

为推动我国的拉美学研究和繁荣学术文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院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自1988年起组织所内外几十位学者着手将这一巨著译成中文出版。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新华通迅社、广播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中文版先出第四卷和第五卷，接着再出其他几卷，每年推出一至二卷，九十年代内出齐。全书约合中文800万字。

我国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同志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已征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的同意，我们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边码系原文页码。索引附于书后，注明原文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1991年12月

本 卷 作 者:

弗里德里克·卡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章）
小约翰．沃马克，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第2章）
让·梅耶，佩皮尼昂大学现代史教授，（第3章）
西罗·F·S·卡多索，巴西尼泰罗伊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第4章）
路易斯·E·阿吉拉尔，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第5章）
安赫尔．金特罗—里韦拉，波多黎各现状研究中心和波多黎各大学，（第6章）
H·赫廷克，乌得勒支大学人类学教授，（第7章）
戴维·尼科尔斯，牛津，（第8章）
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研究所经济调研中心，（第9章）
埃塞基耶尔·加略，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研究所社会调研中心，（第10章）
戴维·罗克，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1、12章）
胡安·A·奥多内，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第13章）
保罗·H·刘易斯，图兰大学纽科姆学院政治学教授，（第14章）
哈罗德·布莱克默，伦敦大学拉美史讲师拉丁美洲研究所秘书，（第15章）
赫伯特·S·克莱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6章）
彼得·F·克莱因，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7章）
马尔科姆·迪斯，圣安东尼学院（牛津）研究员，（第18章）
沃伦·迪安，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9章）
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20章）
鲍里斯·福斯托，圣保罗大学，（第21章）

附：《剑桥拉丁美洲史》各卷内容

第一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征服前夕的美洲、欧洲与美洲以及美洲的教会

第二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人口、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精神与文化生活

第三卷　从独立至1870年左右——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的独立、加勒比地区以及独立后的西语美洲和巴西

第四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拉丁美洲与美国和欧洲列强、人口、农村社会、城市、工业、劳工、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学、音乐和艺术以及教会

第五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普拉塔河地区国家、安第斯山脉地区国家以及巴西

第六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国家与政策以及教会

第七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巴拿马

第八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第九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巴西、思想观念、文化和社会以及国际关系

本卷中文版分工如下：

译者：

朱云瑞、徐杰（序言、索引和地图）

胡毓鼎、方国平（第1—4章；书目评论第1—4节）

徐建国（第5章；书目评论第5节）

陈绂、施兰卿（第6—8章；书目评论第6—8节）

戴声浦、戴宁（第9—11章；书目评论第9—18节）

高晋元、吴绳卿（第12—18章）

涂光楠（第19—21章；书目评论第19—21节）

校订者：

徐壮飞

高　铦

张森根

责任编辑

张森根

本卷第9—11章中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翻译，曾得到 邓 兰 珍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前言

李慎之

被誉为世界史学集大成之作的剑桥世界史系列之一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拉美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剑桥世界史系列开创于世纪之初，在积累经验并且饮誉士林70年之后，又推出总共9大卷约800万字（中文）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著作。用本书总序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作一高水平的综合，使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今后的工作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但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而且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益。"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也就是"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了，得不谓之为盛事乎！

中国必须了解拉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叫中国是这么一个大国，而拉丁美洲又甚至比一个大洲还大呢？事实是，拉丁美洲这个名词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拉美研究这门学问确立于本世纪30年代，而中国之正式搜罗人才、组织机构，专门从事拉美学的研究，到60年代也已开始了。中国对拉美的兴趣是浓厚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对拉美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很难使自己满意，就算不提过去那段以幻想代替现实的狂热岁月，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做过研究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个中甘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用说对一个大洲了。认识需要长时期、多方面的积累。在一时还来不及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有意识地想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吸收新知“翻译为先”的话。30年代，鲁迅又说过一时创作不出来，不如多些译作为好的话。这就是所以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还不惜动员所内外几十人的力量，化几年的光阴来翻译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原因。

从地理上说，拉美之于中国可说是距离最遥远的地方了。虽说是“小小环球”，但是东北西南，正好相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真可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从历史上说，除非将来真能证明慧深所到的扶桑确是今日的墨西哥，即使从15世纪算起，500年来双方也极少交通。虽然如此，中国和拉美也并不是没有可比性。首先，两者都是由多种文明交融而成的庞大的文明体。中国由于历史悠久而早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拉美虽然还是多国林立，但是文化上的共同性远大于殊异性。这个由相异相敌到共存共荣的过程，看来是全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家都会感兴趣而且应该从其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对中国和拉美进行比较研究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双方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课题。虽然双方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任务是一样的。拉美人常说“不能戴着19世纪的镣铐进入21世纪”，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任务吗？

大概自古以来，分居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对异域外界同属圆颅方趾的血气之伦有观察、研究、记述的兴趣，但是直到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后，对外国问题或者国际问题的研究才渐渐成为一门学问。不过，从学科的划分上说，这种研究大抵还是隶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此同时，却也渐渐地出现一种倾向，形成了

以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汉学、埃及学、东方学，等等。这种趋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本世纪的下半期得到了特别强烈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可与传统的学科分庭抗礼的地位。拉美学的确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一经确立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然要凭借过去的基础）。这部《剑桥拉丁美洲史》就是其重大的成果之一。它当然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但是更应该说是一部拉美学的著作。地区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世界学术的一个重大趋势。理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了。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需要不断加深对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了解，而且要把对象国、对象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

我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趋势在我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学术界还不是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去顺应这个趋势，推进地区研究的发展。地区研究在其初始阶段往往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因为研究主体通常是由于外交、外贸的现实需要的推动，只求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去认识对象地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学者必然会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地区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不能不深入到它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这样，地区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越来越转向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文学。地区研究的综合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超出于传统学科的单一性之上。国际上的地区研究已经进展到这一地步了。对比起来，我们的地区研究还没有脱出初始阶段。我们必须认识世界学术的这种趋势而急起直追。《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出版至少可以帮助我国的拉美研究的深化。我希望它也能促进我国所有的地区研究的发展。

《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英文版第1卷是1984年出版的，全书9卷将在90年代初出齐。中文版第4卷能在1990年就译好付印出版，效率是很高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

同志们。我个人既不研究拉丁美洲，又没有对此贡献任何力量，唯一所做的就是在当初决定进行这一大工程时起了一点促成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作用也使我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对中国有价值，对拉丁美洲也有价值，能被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所了解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乐于向中国读者推荐这部书。它不但对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对一切有志于了解世界，有志于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人都是有用的。

谨序

1990年9月

英文版总序言

由已有定评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计划和主编并由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分章撰写的多卷集剑桥历史，自本世纪初以来在英语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的最高范例。由阿克顿勋爵计划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共16卷，已在1902年至1912年先后问世。随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等也相继出版。上述近代史现已由14卷集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最近已脱稿。剑桥伊斯兰史、剑桥伊朗史和剑桥非洲史或已出版或已将近完稿；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中国史和犹太史，而日本史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7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着手出版一部剑桥拉丁美洲史的时机已经成熟。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自1960年以来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在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这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但也有居住在美国的英国、欧洲和拉美的历史学家），出现在欧洲（特别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也日益明显地出现在拉丁美洲本身（新的一代年轻专业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人曾在美国、英国或欧洲得到培养，已开始脱颖而出）。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拉丁美洲在世界中的作用——已经起了变化，看法也随之改变。来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和新的概念模式，正在被拉美历史学家们不断采纳。剑桥出版社已按步就班地出版了一系列拉美研究的专论并创办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而且也开始将这种历史思想和研究的新成果公之于众。

1974年，伦敦大学学院西语美洲和巴西史主讲人莱斯利·贝

瑟尔博士应邀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并在两年后为这个项目开始工作，他是第一位受权单独负责计划、协调、组织和编纂一整部历史的主编人。

《剑桥拉丁美洲史》是第一部研究拉丁美洲独特历史过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预计共分8卷*，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居民首次接触欧洲人之时（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初期）开始，直到今天的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剑桥出版社将另行出版一部剑桥美洲——北美、中美和南美——土著民族史，其中将对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达数千年之久的这个地区之民族、社会和文明演变作出应有的研究，正如本书将对欧洲殖民地统治时期和独立时期直到现在的拉美土著民族的历史进行较为详尽的阐述一样。）拉丁美洲主要由美国以南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大陆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与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通常还包括海地，共同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包括19世纪前半叶期间西班牙和墨西哥先后通过条约和战争割让给美国的大片位于北美洲的领土。也不包括英、法、荷属加勒比岛屿，或圭亚那在内，尽管，例如，牙买加和特立尼达曾有过西班牙渊源的先例，现在又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本书的目的在于将现有的知识加以高度的综合，以便为拉丁美洲历史学家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套坚实的基础，将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们有所帮助，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们也会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也希望，这部历史能为美国和欧洲通过拉丁美洲的历史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作出贡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也希望能为促进拉丁美洲本身更加重视自己的历史作出贡献。

编写本书的有美国和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撰稿人。

---

* 按目前计划已增为9卷。——译者

本书将按历史年序出版，这在剑桥历史的出版上尚属首次：第1卷和第2卷（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内有介绍欧洲人入侵前夕美洲土著民族和文明的部分）于1984年出版；第3卷（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于1985年出版；第4卷和第5卷（约1870年到1930年）于1986年出版；第6卷至第8卷（1930年至今）将于1988年或此后尽快出版。每一卷或组成一套的几卷分别考察了拉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尽管承认拉美在当今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发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并承认拉美首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与英国和法国以至整个西欧、最后与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历史书将侧重阐述内部结构的发展方面。而且，明显地把重点放在自19世纪初除古巴外所有拉美国家取得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上，同殖民地时期和独立运动时期相比，拉美史史学家们相对忽视了这段时期，自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是8卷中两卷的主题。有6卷则集中阐述19世纪和20世纪，并与总体组合在一起，其中有围绕拉美史重大主题的章节，也有20个拉美独立国（外加波多黎各）的分国历史章节，特别是三个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巴西面积的大小、人口和独特的历史来看，在拉美通史中往往被忽略了，就大部分由西班牙语美洲人或西语美洲的专家们撰写的通史来说，对此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章将附有一篇书目评论*。这些书目评论将特别侧重于过去15—2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也就是说侧重于自查尔斯·C·格里芬主编的《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此书是为1971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拉美史会议而出版的）出版以来的这段期间。格里芬主编的这本书志是在1966—1969年期间准备的，其中很少涉及196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著作。

---

* 书目评论集中放在各卷的正文后面，每一节的标题与各章相同，按顺序排列便于查阅。——译者

英文版第4卷和第5卷序言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2卷于1984年出版，该两卷广泛地阐述了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自欧洲人“发现”、征服和移居这个“新大陆”，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前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西）殖民统治三百年期间的拉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第3卷于1985年出版，该卷考察了19世纪前2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殖民统治的崩溃和瓦解，并着重阐述了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的半个世纪期间西班牙语美洲各独立共和国和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而《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5卷则将转到1870年前后至1930年这段期间。

拉丁美洲独立后最初的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冲突，政局相当动荡，其经济增长率至多也只有十分微小的进展，至少在西班牙语美洲是这样。除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战争（1846—1848年）和外国（特别是英国）屡次对拉美的干涉以外，在这段期间的末期拉美国家之间也有两次重大的战争：巴拉圭战争（1865—1870年）和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与此相反，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期间，大多数拉美国家处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物质繁荣（至少就统治阶级和城市中等阶级而言是这样），思想趋同与政治稳定，但是像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20年）这类情况则是突出的例外。此外，尽管拉美在这整个时期不断有外来的干涉——主要是美国对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干涉——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1883年）之后和查科战争爆发（1932年）之前的整个这段时期，拉丁美洲国家间并没有重大的国际冲突。

第4卷分12章，是阐述从1870年前后到1930年期间的这两卷的前一卷，综述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

史。其中两章考察拉美的经济增长，第1章阐述1870—1914年期间的状况，第2章阐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30年代世界大萧条前夕的状况。拉丁美洲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与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大大加速，以及外国资本，其中特别是英国资本和20世纪的美国资本，大量流入，是这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也未忽视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的积累。关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首先是中美洲和加勒比与日益扩张的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分别加以阐述。另有一章分析了拉美的人口增长（从1850年的3000万到1930年的1.05亿），部分原因是欧洲移民大批迁入的结果，特别在阿根廷和巴西。有两章的主题是关于资本主义渗透到农村的深远影响，其中一章集中论述墨西哥、中美洲和安第斯等传统高原地区，另一章则集中论述西语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首先是，在1870—1930年期间，农村经济和社会经历的变化之大，超过以前除征服时期以外的任何时期，同时也试图阐明，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在安第斯山地区，变革的力量遭到阻挠，前资本主义的结构仍然残存。城市社会在这段期间也经历了迅速变化，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等主要城市到1930年时居民都在一百万到二百万之间，可与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匹敌。关于拉美城市的发展、关于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早期工业的状况，以及关于城市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许多国家的兴起和拉美早期的劳工运动史，均有单独的章节分别阐述。另有两章分别阐述拉美在这段期间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与不发达经济和独裁政治传统的多层次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自由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对统治阶层和知识界的精英造成的影响），以及拉美文学、音乐和艺术（以至拉美电影的早期状况）的重大运动和突出的个人成就。最后，以探讨拉美天主教在世俗时代其力量和特权下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调整并保持着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人信仰辟为一章，做为该卷的结束。

第5卷共21章，分别阐述从1870年前后到1930年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以后者为主。第一部分阐述了墨西哥在这段期间的某些历史细节。分章论述波菲利奥时期（1876—1911年波菲利奥·迪亚斯三十五年的独裁统治），墨西哥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期间在“索诺拉集团”*统治下的重建。第二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其中，有一章单独阐述中美洲五国，另外几章则分别论述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第三部分《拉普拉塔国家》，其中，有四章阐述关于阿根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阿根廷到1930年时许多方面已成为拉美最先进的国家；另有两章分别论述乌拉圭和巴拉圭。第四部分《安第斯国家》，其中有几章分别论述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半个世纪的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另有一章论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最后，第五部分专门研究巴西。其中有几章分别论述巴西在这段期间以咖啡为主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巴西帝国后期（1870—1889年）的政治改革以及第一共和国（1889—1930年）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许多历史学家为这两卷各章做出贡献——北美的12位，拉美的8位（巴西的3位，阿根廷和古巴的各2位以及乌拉圭的1位），英国的8位，欧洲大陆的4位和波多黎各的1位——他们还对自己撰写的以外的各章进行了检读和评论。在这方面我特别感谢马尔科姆·迪斯、埃塞基耶尔·盖洛和科林·刘易斯。此外，克里斯托夫·艾贝尔、艾伦·奈特和科里·米勒为一章或几章作了评论。许多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拉美的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为本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给予鼓励。我还要在此特别向约翰·林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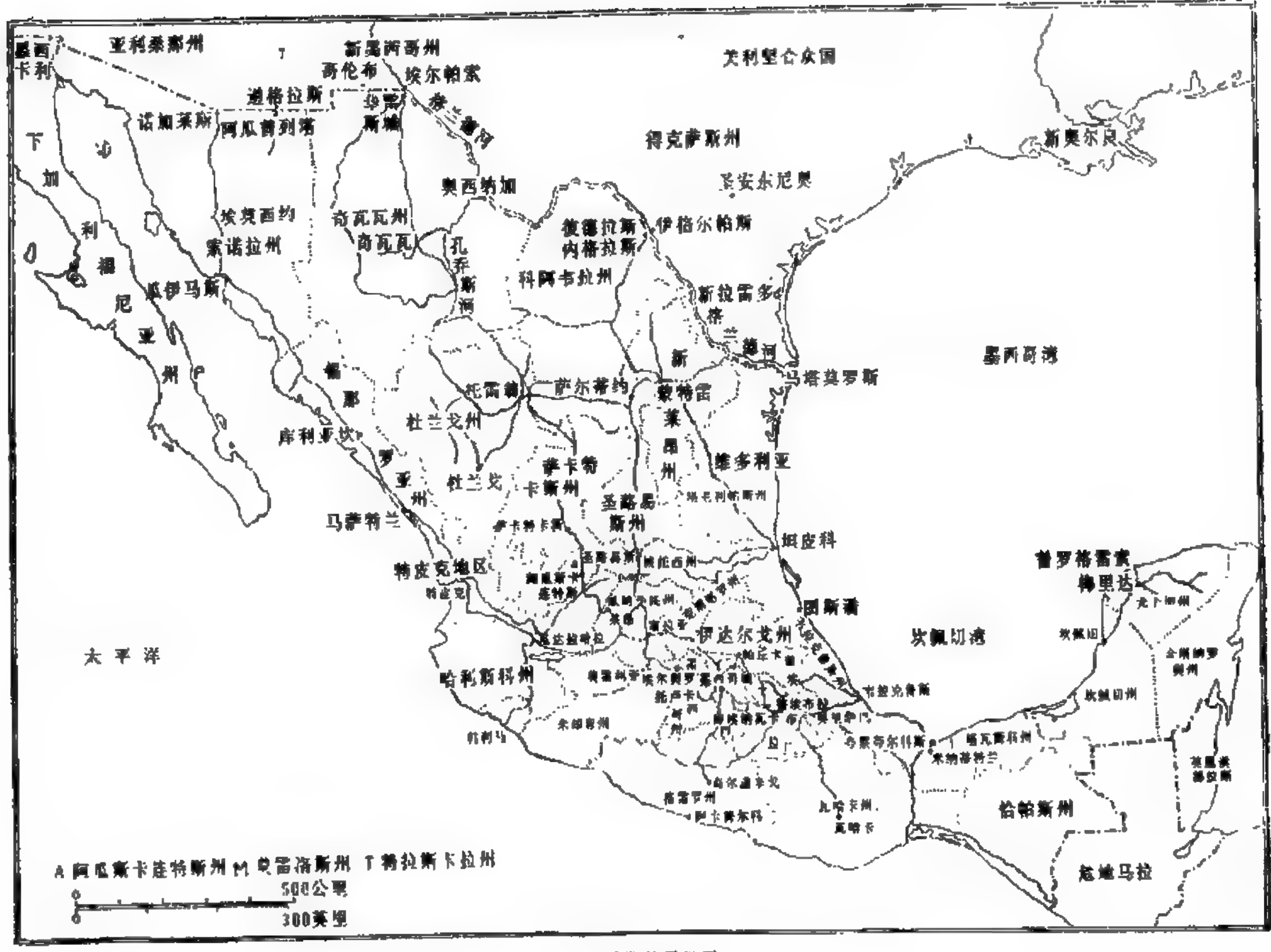
---

* 索诺拉集团（Sonoran dynasty），一译“索诺拉朝代”。主要指奥夫雷贡、卡列斯和阿道弗·德拉·韦尔塔，他们是制宪运动中“索诺拉州派”的领导人。前两人在1920—1928年先后担任总统，后者在1920年曾任临时总统。在奥夫雷贡执政期间（1920—1924）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曾被称为“索诺拉三巨头”。——译者

理查德·莫尔斯和约翰·沃马克致以谢意。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韦顿负责《剑桥拉丁美洲史》的编辑工作。辛西娅·波斯坦和伊丽莎白·奥贝恩—拉内拉分别担任第4卷和第5卷的副编辑。希尔达·皮尔逊和安·赫德森分别为第4卷和第5卷编了索引。伦敦大学学院的纳兹宁·拉兹维为已出版的三卷和现在两卷的出版，都作出了十分宝贵的秘书工作。

目　录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美利坚合众国
墨西卡利
诺加莱斯
阿瓜普列塔
道格拉斯
哥伦布
埃尔帕索
得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奥
新奥尔良
奇瓦瓦州
奇瓦瓦
埃莫西约
索诺拉州
瓜伊马斯
下加利福尼亚州
科阿韦拉州
新拉雷多
蒙特雷
马塔莫罗斯
墨西哥湾
托雷翁
萨尔蒂约
杜兰戈州
杜兰戈
库利亚坎
马萨特兰
萨卡特卡斯州
圣路易斯波托西州
维多利亚
坦皮科
特皮克地区
哈利斯科州
伊达尔戈州
图斯潘
坎佩切湾
普罗格雷索
梅里达
恰帕斯州
危地马拉
太平洋
A 阿瓜斯卡连特斯州 M 莫雷洛斯州 T 特拉斯卡拉州
500公里
300英里

革命时期的墨西哥

第 1 章

墨西哥——重建的共和国和波菲里奥时代(1867—1910)

重建的共和国(1867—1876年)

战争的结果

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以后30年，于1855年赢得政权的自由党人曾经希望让墨西哥拥有像其北方邻邦美国那样的生产能力和稳定局势。由于看到他们的国家在最近的墨美战争中(1846—1848年)几乎把全国领土的一半割让给美国，他们担心要是不采取某种使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措施，墨西哥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存在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他们的计划设想把他们认为旧秩序的不安定柱石——教会、军队、地方上的政治寡头，公社村落等都以"新的基础"来取而代之。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首先进行了一系列法律改革，然后制定了1857年的宪法，以削弱教会的地位。天主教已不再成为该国的法定宗教，教士法庭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权限，婚姻经由世俗仪式便可生效；这时在平民法庭就可审判教士；教会的土地被拿来拍卖，军队也被剥夺了过去享有的许多特权，像教会一样，失去了它的司法特权；还可在平民法庭上审判军官。主要由普通老百姓来担任国家和内阁的首脑，这在墨西哥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外，许多以往很有势力的地方政治寡头(被推翻了的保守党政权的骨干)，他们过去长期都实际上为所欲为地统治着自己的地盘，也不得不把权力拱手让给新上任的自

由党官员。随着1856年莱多法（Ley Lerdo）被正式通过，自由党人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出击，既打击了教会，也打击了公社村落。新法令除禁止教会拥有或管理非直接用于宗教目的的产业之外，又进一步禁止把团体产业让给民间机构，这样便有效地废除了公共土地的占有权。占有的公共土地必须出售。从此只有个体农民或私人合伙经营的企业和公司才能拥有土地。

自由党人通过宣布天主教不再是墨西哥法定的宗教，缩小教会的政治地位并摧毁其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之后，希望墨西哥能像美国那样，把各种宗教信仰的欧洲移民都吸引过来。因为在美国，这些移民可以构成农业中产阶级，从而使经济迅速发展，使政治稳定，使各种民主体制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自由党人还指望禁止教会和印第安人村社占有土地的宪法条款能有同样的效果。一些自由党领导人希望，该两种机构由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阶级代替之后，他们就会像移民那样成为墨西哥现代化、稳定和民主的主要支柱。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进展都做不到，许多自由党人希望，只要使这些土地从教会手里的“死资产”变成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地主手里的“活资产”，最终就会使经济蓬勃发展，局势日益稳定。这样的地主对政治上的民主也许未必有多大兴趣，但像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地主那样，他们都要求政治上的稳定，以确保他们刚刚在商业上发展起来的事业的胜利。与此同时，把保守党军官统治的旧军队彻底摧毁，就可以平息军事暴乱和政变。由自由党人组织起来的新军队将以根本不同的结构组成。①

当自由党政府总统贝尼托·华雷斯于1867年7月反法战争（这场战争是在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进行内战三年之后接着发生的）以后回到墨西哥城时，军事上胜利的喜悦只能暂时掩盖自由党人

① 对1855—1867年墨西哥政治的详细论述，请看《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0章巴赞特文。

直到那时还没有实现12年前他们自行确定的许多目标这一事实。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被处决，以及拿破仑三世的溃败，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摆脱了欧洲人入侵的威胁，从而使墨西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似乎得到了保障。教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教会要煽动政变已成为往事。纪律很差、动不动就叛乱的保守党旧军队，已被彻底解散。地方政府被牢固地控制在自由党人手里。公共土地产业数量大为减少。但所有这些进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没收教会土地之后，并未因此产生小农场主阶级——因为这些土地都拍卖给了愿意出最高价的人，绝大部分土地从而被当地富裕地主所占有。因此这只是使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富裕大庄园主阶级增加更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内聚力，使自由党人中更为激进的分子感到十分懊丧。新的自由党政府的军队并不比旧的保守党政府军队更能保证国家的稳定。这是一支松散的军队混合体——由正规军团和游击队组成——各部队由不同程度上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司令官领导。就和平时期的需要来说，军队人数远远太多。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两次战争的老兵遣送回家而不对他们在军队中长期服役给予充分的报酬，就会触发新的叛乱的危险。尽管反法战争的胜利唤起了民族主义的新觉醒，而且出现了华雷斯这样真正受人民爱戴的民族领袖，但这个国家却比过去更加远离团结统一。在战争年代，各省几乎已经独立自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各省彼此毫无联系。公共土地的划分和分配只是使中产阶级的队伍略为壮大了些。一些最肥沃的土地落入富裕的大庄园主手里。少数获得小块土地的农民，被不如他们走运的同胞们称为富农（Los riquitos）；他们逐渐形成很像俄国或法国的富农集团。

这些结构性问题，由于国内战争和反法战争造成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战争进行了10年，使墨西哥经济混乱不堪。自由党人本来指望靠教会的财产来支付他们某些较大的计划，也由于进行战争而被消耗殆尽。矿山和田地变为废墟。联邦政府的赋税基

数趋于零点。在华雷斯总统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如华雷斯政府最后一位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梅希亚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国库里真的分文莫名。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以后，冻结了与欧洲的关系，同时华雷斯政府拒绝偿还马克西米利安所欠的债务，都无济于事。结果，墨西哥只好日益依赖美国，但也无法弥补欧洲市场和投资资本的丧失。

墨西哥政府一方面拥有过份庞大的军队，中央政府对绝大多数部队的控制力很松；另一方面，则是大为削弱的其他政府部门。1863年自由党人初次失败以后，大多数官员都脱离了华雷斯政府，投奔了马克西米利安当局。即使官员们仍然忠于华雷斯，他们多年中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自由党政府只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很小部分。如果它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团结一致的话，那么国家的虚弱和政府无力控制军队的情况不致太严重，它的选民力量是自由党运动，而自由党运动却严重分裂了。从名称、纲领和词句上来看，墨西哥的自由党与欧洲的自由党很相似，但从社会成分上看则并不一样。它的支持者中只有一部分人来自墨西哥资产阶级。最初，该集团人数较少，主要是纺织制造商和所谓的高利贷者，他们是向政府放债从事投机的商人。其余的资产阶级成员基本上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国来的。墨西哥赢得独立后，英国商人取代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西班牙人。到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德国人又开始从他们那里接手。接着，德国人又被法国商人（人称巴塞罗那人，因为他们多数来自法国南部的这个城镇）从许多商行中排挤出来。

自由党运动得到大地主的更大支持。有些人参加自由党，像15和16世纪的德国贵族，因为他们想继承教会的大量地产。其它一些人则反对保守党人试图对他们进行集中控制。路易斯·特拉萨斯是这一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实际上他并非生来就富有，但是他开始经营屠宰业后，便通过婚姻关系而富裕起来了。特拉萨斯对保守党政权在许多方面都很不满意。他看不起政府无

法保护他的家乡奇瓦瓦州免遭印第安人的抢劫。他怀恨政府拒绝让他进入严密的寡头统治集团。而且他还想占有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共土地。当他成为他家乡的自由党州长时，他利用权力既夺取了大片公共土地（和一些教会的财产），使自己发财致富；同时也以远比他的前任更大的精力来推行得到人民欢迎的抵抗政策，以对付阿帕切人*抢劫者对奇瓦瓦州人民日益猖獗的进攻。

像特拉萨斯这样的地主们对支持自由党人的另一个集团，如当地的商人、小企业主、村民、政府的低级雇员等中产阶级，以及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猜疑情绪。中产阶级把地主掌握的权力看成是他们本身发展的主要障碍。他们鼓励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加紧控制，例如，向大庄园主强制征收相当大一部分税收。

在战争期间，自由党的两派都设法保持不稳固的休战和合作。可是一俟战争平息下来，他们之间深刻的争吵和冲突便爆发了。然而，地主和中产阶级在反对第三个集团“人民力量”提出的要求时，则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人民力量”的成分很复杂，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它包括一些农民、初期的纺织工人无产者、铁匠、店员，诸如此类的一些人。它的宗旨是大规模地进行彻底的财产再分配。在国内战争期间，自由党人十分不愿意把这一集团动员起来。他们清楚地记得，当1810年伊达尔戈神父领导起义时，农民是一支无法控制的力量；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末，尤卡坦州发生种姓战争期间，国家权贵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中的一个集团曾号召他们参加部队。在反法战争时，虽然华雷斯对他们很警惕，并颁布了全面反击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号令，但一旦他们组织起来，人民运动并不是可以很快平息下来的。

华雷斯的政治战略

面临以上所说的深刻分歧，首先似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华

*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注

雷斯竟得以保持他对墨西哥自由党运动的领导达5年多。但实际上正是自由党运动的分歧帮助了华雷斯存在下来。这一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庄园主和中产阶级——轮流攻击华雷斯没有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但却不想把他赶下台，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华雷斯掌权，另一派就不可能得逞。人民力量也不想推翻华雷斯，虽然对他继续推行莱多法极为不满，但他们尊敬他，把他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人；华雷斯过去是一名贫穷的印第安人，终于发展到能治理自己的国家，而且始终很自豪地说明自己的出身。

华雷斯对法国和保守党人的战争胜利以后不久，便试图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应付自由党运动的日益分裂和衰败无力。这样就可以从他的日益分裂的社会和政治支持者中摆脱出来，大大加强他的独立地位。当时他的威望达到顶点，他号召举行新的选举，同时表示要对一系列已经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公民投票复决。首先对已有的众议院以外再增加一个参议院，力图分散并减弱议会的权力；其次授权总统可以对议会2/3多数通过的任何法案予以否决，宣布无效；第三，允许他的阁员以书面而不必亲自到场回答议会质询；第四，取消议会永久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继续处理日常工作的一个机构）在任何时候提出召开全体议员大会的权力。严格说来，公民投票并不是对采纳提出的修正案进行复决，而是对议会仅以简单多数予以通过而不把它们提交每个国家立法机构加以专门审批的权力进行复决。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自由党的两大主要敌对派别联合一起，反对华雷斯的措施，随着反对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位墨西哥总统不得不撤回已经提出的修正案。

华雷斯为了保持执政，当时不得不对反对他的两大社会集团作出较大的让步。他使自由党大庄园主实际上毫无约束地行使对他们管辖地区的权力；为了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华雷斯增加了政府官员的人数，这是中产阶级就业的一种最好途径；而且把联邦政府开支拨给特别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地方，诸如改善公共教

育，尤其是城市里的公共教育。1857年，墨西哥有2,424所公立小学和中学，到1874年，华雷斯去世以后两年，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已经增加到8,103所。对中产阶级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华雷斯维护了某些民主制度（实际上可能他也别无其他选择）。虽然政府干预了选举，但这些选举比以往的选举都更诚实可靠。议会已不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机构，可以畅所欲言，发表反对意见。报刊几乎完全有批评的自由。全国最著名的一些知识份子——曼努埃尔·德萨马科纳、伊格纳西奥·阿尔塔米拉诺、弗朗西斯科·萨尔科——越来越敢于公开抨击华雷斯政府犯的一些错误。

华雷斯总统任职后期，自由党中产阶级中有一派的影响不断增长。他们都是继续服役的自由党军官。自从华雷斯和自由党的主要理论家把黩武主义看作是墨西哥的主要祸害之一以来，军官中便产生某种抵触情绪。在1857年的宪法里，他们已经废除了军方的司法特权，而在战胜马克西米利安以后，墨西哥大部分军队都被复员。然而，由于墨西哥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上升，以及叛乱正在增加，政府愈来愈多地要依靠军队，于是军官们在墨西哥农村又再次得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

华雷斯为了扩大对其政权的支持，同样也力图与他过去的一些宿敌求得妥协。在1857和1867年间使墨西哥经受重大折磨的10年战争期间的表面失败者的境况比他们或许多同代人所预料的要好得多。保守党的政客、地主和官僚尤其感到如此。华雷斯赢得胜利3年之后，于1870年就颁布命令对所有曾经与马克西米利安王朝合作过的人实行大赦；把土地归还地主；并让保守党官员可以重新申请在政府任职。总的来说，教会比它的同盟者的遭遇要差一些。它失去的土地和产业再也收不回来；教会作为对墨西哥最重要的贷款来源的经济霸权已不复存在，教会也不能再对人民依法征税；神甫在法律上的特权、天主教至高无上的法定权力，以及教会对教育事业产生的影响，都已无法恢复到1857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改革的法律仍旧叫做土地法。虽然如此，实际上教会

很快便开始从其损失中恢复过来。富裕教友的慷慨捐献源源不断地流入教会的财库，从而使它偷偷地再次对城市产业进行投资。华雷斯已不再剥夺神父的这种新的财富积累，而神父也放弃了他们过去对自由党人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之所以抱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多年内战以后自由党人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但也是因为一些教会的领导人已认识到，土地的丧失实际上减少了教会和大部分农民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从而加强了教会在农村的地位。许多农民现在把自由党地主而不是教会看作是他们的敌人。农民的这种态度由于教会的神职人员比前些年更多地关心农民的疾苦和要求而更加坚决了。

华雷斯曾经希望采取这些对墨西哥上层和中产阶级以及对军队一些部分的安抚措施可以使他不致于被政变所推翻，同时使他可以把这个国家安定下来。就第一点来说，这位墨西哥总统的希望是达到了。华雷斯一直任职到1872年他病逝为止。但是，他的第二点希望却成为泡影。为了博得国内上层人物的好感，华雷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结果，农村里的社会动乱在共和国重建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无力把这种动乱压制下去，于是动乱进一步削弱了华雷斯政府。这就鼓动了其它力量：从边境游牧部落到反政府的中上阶级敌对份子拿起武器反对政府。结果，政府更加无力镇压农村的动乱。形成了恶性循环。

农民发生动乱是由于改善生活的期望落空和生活状况实际恶化等各种原因。自由党政府对于满足农民的期望不予置理。也不设法保护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免遭进一步损害。战争结束后使一批批无地的人和失业的退伍军人都流向墨西哥农村，从而更增加了无地和失业者人满为患的压力。莱多法把曾在公共土地上耕种的许多人都撵出来再不均匀地分配给他们，如果这些土地没有被庄园主或投机商全部占有的话。

自由党政府无法阻止（即使它想阻止）教会的土地从神甫手里转到大地主手里而不是转到农民手里。在漫长的反对保守党和

法国人的战争岁月里，自由党政府仅仅控制了墨西哥一小部分地方，政府军必须靠出售教会土地所得的收入来维持这场战争。自由党赢得胜利后本可以利用被打败的保守党人的产业和经常荒废的大片公共土地来制定一项土地分配计划，从而产生墨西哥的农民阶级。但是，华雷斯政府除了把一些公共土地赠给少数退伍军人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实行这样一种选择。保守党庄园主的土地要么还给了过去的主人，要么至多送给或卖给自由党的地主。墨西哥政府从来不想做美国政府在内战后所做的事情：通过宅地法把公共土地分给定居者，以缓解国内战争引起的社会紧张状态。政府的一些土地开始被送给或卖给了墨西哥的庄园主，其它一些土地则保留着期待大批外国农业移民的到来（结果却没有来）。

华雷斯也没有解决不平等的纳税负担，这是引起农民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贸易税、国内关税和个人摊派税——相当于庄园农业工人 6 天到12天的工资——迫使穷人支付的捐税在比例上比富人要高得多。一位拥有土地价值 2 万比索的庄园主缴给政府的税款与他雇用的职员缴付的一样多，而职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资产。自由党人最初主张取消贸易税，这倒不是因为它对穷人影响太大，而是因为它妨碍了自由贸易。但财库空虚使他们照旧实行下去。庄园主们当然不会同意调整税负。最后缓解纳税人中最沉重负担的唯一办法便是规定一天收入不足26分的人可免交个人摊派税。

华雷斯也没有努力去缓解劳役偿债的大肆发展，以及与这一情况有关的庄园主对偿债劳役工的任意处置权。1868年有一位自由党议员名叫胡利奥·萨拉特的，曾要求禁止地主私设监狱、实行肉刑或把父母的欠债转嫁到他们的孩子头上。议会否决了这项建议，声称对这种事没有裁决权，说这完全是地方上的司法权限。华雷斯赞同萨拉特的提议，并且试图进行干预，但是他颁布的阻止劳役偿债的各种有限措施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在殖民地时代，农村里的武装冲突有三种形式，各分属于特定地区。第一种，是地方性叛乱，一般来说只局限于某一村庄，其目的主要是解决他们对殖民政府的特定的不满意见，而不是要推翻整个殖民制度。这种动乱主要集中发生在墨西哥中部的核心地区。第二种是反对整个殖民制度的大规模暴动，暴动者是表面上接受西班牙文明和基督教的各种集团，它们想恢复西班牙占领前的当地社会、经济和宗教秩序。这些暴动往往主要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最后一种，便是到当时为止不愿意被西班牙殖民统治征服的各族人民进行的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几乎均发生在北部边境地区。

在重建的共和国统治时期，上述三个地区都发生了叛乱，但这些叛乱往往在性质上更为激烈，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其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斗争更暴烈。墨西哥中部的一些非常激烈的暴乱中有一次发生在1868年靠近首都的地方。墨西哥城报纸把这些叛乱分子称做“狂热的社会主义者”，而他们似乎也是这样看自己的。他们受社会主义者普洛蒂诺·罗达卡纳蒂的影响很深，此人把耶稣基督视为“人类神圣的社会主义者”和“世界自由的救世主”。他在查尔科建立了一所学校，由他的两名弟子传授他的理论。他们的讲授接着又激励了他们的一个学生，一位名叫胡利奥·洛佩斯的农民，他发表声明号召查尔科·特斯科科和其它邻近城镇的农民起来反对当地的地主。他写道：“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摧毁当前可恶的剥削状况，……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平和地进行耕作”。② 洛佩斯的人事实上在查尔科和特斯科科城镇周围地区侵占了一些土地并立即自行瓜分。五个月以后联邦政府的军队打败了这些叛乱分子，洛佩斯被逮捕枪决。

② 引自加斯东·加西亚·坎图：《墨西哥的社会主义》（墨西哥，1969）第173页。

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还波及离首都较远的一些州，像伊达尔戈州。有两个名叫弗朗西斯科·伊斯拉斯和曼努埃尔·多明格斯的农民领导了一支数千人组成的队伍设法占领了特松特佩克镇和米内拉尔—德尔蒙特矿业中心。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收复他们认为被当地庄园主非法占有的土地。弗朗西斯科·伊斯拉斯在给《解放报》的一封信中写道，“暴力是我们拨乱反正的手段。政府支持庄园主，‘社会’也支持他们，而恬不知耻地待价而沽的记者们也这样干。我们除了战斗别无出路。”③反叛者坚持了两个月，从1869年12月到1870年1月。当联邦政府的军队最终夺回这些城市时，他们当中许多人，包括伊斯拉斯和多明格斯都逃到了伊达尔戈的山中，并得以幸存下来，在几年后再次领导反政府的造反。

13

墨西哥南部的农民运动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持续下来，他们以救世为己任，把社会和宗教思想交织在太平盛世的幻想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一个农民女孩的故事。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普原来住在查穆拉印第安人中间的察哈尔埃梅尔村，她成了一个新的教派的教主，不久这个教派成为传达社会不满的途径——反对白人统治。查穆拉人的暴动（1869年6月12日—1870年10月20日）最终以少量流血被联邦政府军队平息下去。

马雅人的结果较好。随着1847—1855年的几次种姓战争之后，他们设法在南尤卡坦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在1901年之前一直抗拒联邦政府军队的无数次进攻，试图在该地重建墨西哥的主权。此外，他们向邻近的英属洪都拉斯购买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经常冒险袭击毗邻的墨西哥领土而未曾遭受多大损失。

墨西哥北部边境继续像在殖民地时代那样始终不受联邦政府的控制。1831年以来持续不断的阿帕切战争达到了新的顶点。由于美国开拓者的袭击，把印第安人越来越向西推，使他们在更容易受到攻击的墨西哥边境上日益频繁地受到迫害。有一段时期，

③ 同上，第60，76页。

在传奇式人物科奇斯及其继任人维多利奥和胡的领导下，印第安人曾经使边境地区生活陷于瘫痪。1879年末索诺拉一份报纸的一篇社论曾这样写道："土地无法进行耕作，因为任何人去耕作都会遭到阿帕切人的杀害。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里空空荡荡，凡事都不景气，没有人敢进行投资。"④在几年里，科奇斯的这支队伍使15,000人丧生，派到北部边境进行作战的士兵，体力衰弱，工资微薄，他们都不是阿帕切人的对手。

只是渐渐到了华雷斯总统领导的后期，墨西哥才真正地鼓起勇气，拿出力量反击了入侵者。庄园主们开始武装和训练他们的雇农，并把他们组成私人警卫队。政府开始拿出肥沃的土地赠送给任何愿意以生命捍卫产业的人。结果，原有的军事驻防地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军事驻防地。因而，虽然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大批独立的农民遭到杀害，在北部的农民力量却壮大起来。北部庄园主和农民间旨在反对阿帕切人的新的联盟正在发展起来；在农民看来，庄园主要通过组织反对入侵者的战争来获得合法地位。在奇瓦瓦州，与阿帕切人作战的警卫队领袖是华金·特拉萨斯，他是亲自帮助组织和资助过几次印第安人战争的路易斯·特拉萨斯总督的堂兄弟。可是，尽管有了农民警卫队，重建的共和国政府，正如它们无法控制其它形式的叛乱那样，也无法控制住北部边境。

有组织的社会抗议只是华雷斯统治末期特有的社会动乱的一部分。当时盗匪活动猖獗；逃亡的雇工、不满的农民、被遣散的士兵，拦劫马车，袭击大庄园和掠夺来自矿区满载金银的护送队，遍布农村各地。到1868年末，在哈利斯科州，仅瓜达拉哈拉一个城市的郊区，盗匪活动人数据说就达上千人左右，华雷斯政府新建立起来的乡村警察部队（Rurales）在清剿墨西哥农村最普遍的这种祸害时，只取得极小的进展。

---

④ 引自路易斯·冈萨雷斯和冈萨雷斯的文章：《农民》，载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编《墨西哥现代史：共和国的重建，社会生活》（墨西哥，1956）第186页。

第一次迪亚斯起义

人民对华雷斯支持的日益下降不断招致他的对手想把他拉下马。这些对手中有些人便是前保守党的麦迪略，华雷斯已把他们赶出州政府，由他自己的人取而代之。有些人是前自由党将领，认为华雷斯没有给他们应得的权益。他们在其控制的地方报刊上发表宣言，许诺要“提高工资，”“实行更公正的法律”和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他们把庄园的雇工和各种对政府不满的人聚集起来，组成一支杂牌军，控制附近的小城市。在联邦政府军队把他们驱散以前，他们没有获得多大进展。

只有一人例外。这就是华雷斯过去的部下，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他是从反法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最有名人物。迪亚斯于1830年出生在瓦哈卡州。该地也是华雷斯的出生地。与华雷斯一样，他也在同一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17岁他参军，与入侵的美国军队打仗，虽赶不上经历大量的战斗，但在反抗法国的战争中得以补偿。他很快便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于1862年作为墨西哥指挥官之一率领军队在普埃布拉首次战役中大败法军而首次赢得了声望。此后不久，他被法国人俘虏，但他设法逃脱，后来他负责指挥拉卡沃内拉战役时又一次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战争结束时，他仅37岁，自认为堪与华雷斯平起平坐。1867年他是与华雷斯竞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1871年他再次竞选总统，又遭失败。1871年在以迪亚斯庄园命名的拉诺里亚计划中，他宣称选举有舞弊，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虽然这个计划也在某些地方含含糊糊地提到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但实际上只是一点内容，即主张限制总统的任期为一任。为了使该项计划看上去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野心，迪亚斯保证不参加下一次总统竞选。

迪亚斯的战斗号令多少有些成效。发生的暴乱超越了地区性质。迪亚斯的弟弟费利克斯在他家乡瓦哈卡州动员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攻击力量，其中有州警卫队，甚至有驻扎在附近的某些联邦

军队组成，从而占据了该州首府。许多北方将领，其中首要的包括新莱昂州州长赫罗尼莫·特雷维尼奥，调集了数千人组成的一支军队，占领了新莱昂、杜兰戈、锡那罗亚和萨卡特卡斯州的大部分地区。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领导了一支一千人的先遣队，企图控制墨西哥城。他抵达该城郊区查尔科和特斯科科，再次号召举行总暴动，但没有得到响应。华雷斯派了他的嫡系部队去对付叛军，于是迪亚斯只好仓惶撤退。这期间，费利克斯·迪亚斯被一个匿名刺客暗杀，他在瓦哈卡的军队乱成一片，很快就被联邦政府军队击溃。特雷维尼奥的军队也没有坚持更久。华雷斯经受了自打败马克西米利安以来面临的最严重暴乱，但他没有活到赢得胜利便去世了。

华雷斯的继承者

1872年7月17日华雷斯心脏病突发，第二天便离开人世。按照宪法规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塞瓦斯蒂安·莱多·德·特哈达为他的继承人。跟华雷斯不一样，莱多不是印第安人后裔，而是克里奥尔人。他的父亲是西班牙商人。跟华雷斯一样，他从小也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他为了实现幼年时许下的诺言而想当一名传教士，但后来又放弃了当教士开始攻读法律。当他还是一名法律系学生的时候，他便参加自由党的政治活动，并引起自由党运动领导人之一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的注意。经由科蒙福特的提携，他被指派在最高法院任职。这时他年仅27岁。当科蒙福特被免职时，莱多辞去了最高法院的职务，成为他母校——墨西哥城圣伊尔德方索学院的院长。科蒙福特的继承人华雷斯，把莱多召回参加他的内阁，最初担任司法部长，后来任国务大臣。在法国人侵时期，莱多是独立的墨西哥主要发言人之一。战争结束后，莱多回到最高法院担任首席法官。1871年他与华雷斯一起竞选总统，但遭失败。与迪亚斯不同，他并不反叛，只是重新回到最高法院任职。虽然华雷斯逝世后，凭莱多的地位完全有资格担

任总统，但他立刻要求于1872年10月举行新的大选。这一次他旗开得胜。

在华雷斯衰落的几年中，他进行统治的主要基础是自由党知识分子的联盟，他们的社会自由主义正日益被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而自由党的地主们对政治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唯一要求——反对教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教会失去优越地位和军队影响日益巩固时也就烟消云散了。于是他们转而支持莱多。在他们看来，莱多似乎具有华雷斯的长处，而没有华雷斯的短处。在莱多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像华雷斯一样，对社会问题十分保守。但是，跟华雷斯不一样，他出生于克里奥尔人上层阶级，缺少他的前任那种偶尔迸发出对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困境的同情心。

莱多在许多方面实行类似的政策，但远比华雷斯统治后期成功得多。他大大加强了政府的作用。在他担任总统的初期，国民议会比华雷斯统治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积极地响应他提出的要求。而且，莱多还被允许成立参议院，这样便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国民议会的权力，而相应地提高了政府的中枢作用。

起先，莱多在平定国家方面比他的前任取得更大的成就。平定的基础是在华雷斯统治时期就奠定下来的。莱多从他的前任最近取得的对波菲利奥·迪亚斯的军事胜利中获得了好处。迪亚斯被打垮了，莱多通过对迪亚斯及其部下的赦免而令人产生印象感到他宽宏大量。虽然迪亚斯觉得接受赦免的条件令人难堪，但他无法拒绝。他被剥夺了军权，并长期流放在他的庄园——拉诺里亚。迪亚斯的失败在一段时期里使可能出现的革命分子失去勇气，因此在莱多统治的头三年时间里，较之华雷斯总统任内显然要太平得多。

莱多成功地把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到华雷斯控制不到的地区。他除掉了曾建立墨西哥农民共和国之类的一名地区考迪略：特皮克地区的曼努埃尔·洛萨达。墨西哥报纸称洛萨达是“阿里卡之虎”(阿里卡是山名，洛萨达的指挥部经常设在那里)，他在某

些方面代表19世纪墨西哥以铁腕手段统治所属地区的许多考迪略。称他为虎，是指他在打击对手时十分凶猛。他愿意跟任何承认他的权力并支持马克西米利安和华雷斯的人结成同盟。有一段时间，他和巴伦和福布斯的贸易行保持密切联系，作为他们支持洛萨达的回报，他们需要在特皮克获得大片租地。然而，在其它方面，洛萨达与多数其它考迪略相比并不典型。他的政权的基础是印第安人村落，他把大庄园从印第安人村落夺去的土地还给了他们。在他领导的运动中，村落代表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结果，使特皮克和附近一些州的庄园主都愈益感到害怕和不满。华雷斯为了换得对他的政府在名义上的从属关系，曾允许洛萨达扩大对其领地的控制。但莱多却派联邦军队进行征剿。1873年洛萨达被抓获并枪决，他的印第安臣民被击败，他们的许多土地被分送给了庄园主。

19

跟前几年相比，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要快得多，因此莱多的声望日益提高。这是由于国家局势比较太平，而实际上也是因为莱多能够很好地利用他的前任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所得到的成果。特别是在1873年建成了连接墨西哥城通往韦拉克鲁斯港口城镇的墨西哥第一条重要的铁路线，这大大地加速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

考虑到上面所说的一些成就，似乎首先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莱多不能像他的前任那样连任第二届总统。1876年迪亚斯试图颠覆莱多的行动远比他以前试图颠覆华雷斯要成功。这部分是由于莱多缺少华雷斯在领导反法战争年代的那种威望；他也未能使上层阶级像他开始就任总统时那样地一致对他支持。由于莱多以远比华雷斯在重建共和国时期更大的力量来推行反教会的政策，他已不受这些势力的青睐。华雷斯在战胜墨西哥的教会势力、没收教会的财产，并实行改革法之后，就设法避免与教会发生任何对抗，同时对教士违反某些改革法的行为（诸如积累新的财富）故作无知。而莱多却不是这样，他没收教会的财产，把外

国出生的耶稣会教士赶出墨西哥，并象征性地把改革法列入宪法，

莱多在墨西哥上层阶级中得到的支持，还因他对铁路建设采取矛盾的政策而受到损害。虽然这位墨西哥总统热情地支持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铁路建设，而且同样热心地主张把墨西哥东西海岸之间连接起来，但对建设一条把墨西哥和美国连接在一起的铁路线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据说他曾说过："这是弱国和强国之间的荒芜之地。"当这方面的压力日益迫使他不得不答应建筑一条南北铁路的时候，他试图找一家墨西哥公司来承担大部分建设任务。当这家公司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时，莱多最后同意把建筑这条通往美国干线的主要部分租让给一位美国的铁路开发商爱德华·李·普卢姆去操办。由于实行上述政策的结果，莱多既脱离了墨——美铁路建设的支持者，也脱离了反对者。支持者觉得他颁发这条铁路建设的租让权拖得太久了；而他的反对者则担心，由于同美国在经济上和交通上的联系更加密切，美国会控制和吞并墨西哥。这些反对者参加了传统"在野党"，认为推翻现政权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权力和政府职位。1876年他们联合了莱多最强大的反对者波菲里奥·迪亚斯。

首届迪亚斯政府（1876—1880年）

土斯特佩克起义

迪亚斯被迫退休到拉诺里亚以后，似乎已偃旗息鼓。他的日常活动表面上仅限于种种庄稼和修修桌椅，实际上他仍在积极活动，争取过去军队里的旧友给予支持以再次夺取总统的宝座。莱多的政治命运也够倒霉的了。1876年1月迪亚斯发难。在迪亚斯的要求下，瓦哈卡军事司令发布了一项声明，即土斯特佩克计划，号召武装起来推翻莱多，推选迪亚斯出任总统。如同拉诺里亚计划一样，该计划也提出不连选连任的原则。但与拉诺里亚计划不同的是，这个计划把该原则扩大到市一级，坚持实行市政民

主。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要求。尤其对社会上的中、低层阶级，以及权力不断受地方长官势力扩张所侵蚀的某些庄园主。地方长官通常也是国内最显赫的地主。该计划对于中产阶级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中产阶级不仅在握有代表权的城镇里，而且在许多村庄里，都有很大程度的控制力；这些地方经常挑选能读会写的、在经济上比大多数农民优裕的人担任市长和村长。提出要求市政自治似乎已导致农民中有些人去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然而并无明显的迹象说明迪亚斯对争取农民的拥护表示任何强烈的兴趣。

起先，迪亚斯的第二次造反似乎比第一次造反更快地被平息下来。莱多的军队利索地击败了瓦哈卡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在伊卡莫莱，莱多的军队打败了迪亚斯亲自率领的军队。这时莱多觉得他已拥有足够强大的地位来举行新的大选，他再次当选。可是迪亚斯的异议产生了感染性。最高法院的新首席法官何塞·马里亚·伊格莱西亚斯（根据宪法他应担任下一轮的总统）指控莱多在选举中弄虚作假，因此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他试图自己出任总统。他得到几位感到自己已被莱多政府排斥了的地方长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支持。政府内部的这种分裂对迪亚斯的造反注入了新的活力。迪亚斯的军队在特科阿克跟莱多的军队交战时使后者惨遭失败。莱多在伊格莱西亚斯和迪亚斯的双重压力下，只好退位并逃往国外。迪亚斯提出，只要伊格莱西亚斯承认他为新革命军的首领并答应很快举行新的一轮大选，那么作为交换条件，他就承认伊格莱西亚斯为临时总统。可是伊格莱西亚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拒绝了迪亚斯的意见。当迪亚斯出兵向伊格莱西亚斯进军的时候，伊格莱西亚斯的军队很快瓦解。1877年春举行了大选，迪亚斯便成为新的总统。

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与通常执政的政权相比，在开始时同他的前任有更少的间断性。他把更大部分的预算分配给军方，这个政权是一个比华雷斯或莱多政府更加重视军事的政权。为了保持军队对他的忠诚，迪亚斯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曾同莱多和伊格

莱西亚斯作战的部队列入给予饷金。但是，迪亚斯显然感到，这支军队要成为他政权的唯一或主要的权力基础，力量还太薄弱、太分散、太不可靠。他企图恢复和加强上层和中层阶级联盟，因为这个联盟曾经是他前任政权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对于上层阶级，迪亚斯实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他解除了忠于他的前任的地方头目（诸如奇瓦瓦长官路易斯·特拉萨斯）的权力，由一些社会出身类似的对手取代他们。然而，只要他们不同他对 21 抗，他允许被他撤职的人保留财产，扩大经济影响。对许多庄园主来说，丧失的政治权力已被迪亚斯的出售公共土地政策补偿过来，因为这种政策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发财致富的机会。

一眼就可以看出，迪亚斯要得到中层阶级的支持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迪亚斯支配的财源已经由于他把大量的钱倾注于重建军队而枯竭殆尽。由于在这一阶段他无法给中层阶级提供大笔经济报酬，迪亚斯最重大的选择便是在政治上作些让步。他要新当选的议会宣布一项原则，不仅总统不能连选连任，而且地方长官也不能连选连任。这就意味着，中层阶级中许多“在野派”在一旦现政府官员任期届满以后，就可以有获得权力的较好机会。通过加强市政自治的方法，迪亚斯在过去被华雷斯和莱多忽视的地方中层阶级中得到了一些支持。

迪亚斯对他的敌人不采取大规模的镇压、关押、或处决的手段。对国内原有的政治团体都不取缔，允许继续存在并参予政治生活。全国、区域和地方上的选举照常进行，这些选举并不比他的前任所组织的选举更为诚实可靠。报刊仍然有很大的自由余地。迪亚斯的反对派不利用他们合法的机会像华雷斯和莱多的对手那样反对迪亚斯，主要是因为出现了马克西米利安失败以来对墨西哥主权的第一次外来威胁。

从1867到1877年的十年里，墨西哥经历了暂时没有外部干涉的喘息时间，这在以前是很少遇到的，而且很少再有这种机会。致命的法国统治的经历已经扼杀了对欧州曾经在墨西哥培植的殖

民地发展的希望。同过去的侵略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没有恢复，但这些国家也都没有想再次冒险直接干涉墨西哥。跟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德国商人在墨西哥的对外贸易中享有某种主要地位，但德国人当时对墨西哥并没有政治野心。

在法国干涉时期，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是友好的。1867到1877年之间它们开始大大冷淡起来，接着两国处于对抗阶段。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美国开拓者继续向西推进，印第安部落和盗牛贼经常利用居民不太稠密的和防卫不太严密的墨西哥边境作为庇护处，由那里向美国发动袭击；结果，边境双方的行政当局不断地相互指责对方没有拿出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抢劫者。墨西哥政府为了吸引开拓者来到这块危险和贫困的地区，因此沿着美国边境建立一条十英里的免税地带，在这一地区出售的商品比墨西哥毗邻地区或美国境内的商品要便宜，这就导致广泛的走私活动，从而引起美国商人极大的不满。最后一点便是，迪亚斯不赞成莱多最后对美国铁路修建商给予慷慨的让步。迪亚斯公开反映了墨西哥民族主义分子的担心（迪亚斯也许实际上并不担心），认为美国铁路深入墨西哥将只能是这个国家大规模地被吞并的前奏。

一般来说，在19世纪，一旦拉美国家的“革命”政府证明自己已经控制局势并能够遵守它们的国际义务，美国和欧洲国家便加以承认。就墨西哥来说，美国没有遵守这一原则。当迪亚斯获得胜利时，当时当权的美国格兰特政府认为，如果迪亚斯不同意解决两国之间争端的一些问题，美国就不承认迪亚斯，迪亚斯表示自己非常通情达理。当他进入墨西哥城之后，首先采取的行政措施之一，便是把首都的许多银行家和商人召集在一起，为莱多政府曾答应赔偿美国人在墨西哥蒙受的损失筹措第一批分期赔款。继格兰特之后的海斯政府接受了300,000美元赔款，迪亚斯想据此取得美国的承认。可是他失算了，海斯并不打算承认迪亚斯。海斯要的较之这些零星的让步要多得多。他要取得墨西哥的

一块领土。

海斯总统执政时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是授与墨西哥边境军区司令C·奥尔德将军不必事先征求墨西哥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越过墨西哥边境去追捕抢劫者、印第安人入侵者、盗牛贼和任何被认为违反美国法律的人。迪亚斯如容忍这一措施，就会严重损害墨西哥的主权，并使自己受到“出卖”给美国人的指责。迪亚斯 23 得知奥尔德指令后马上在边境上布置了大量军队，由赫罗尼莫·特雷维尼奥率领，并下令尽自己一切力量击退美国人向墨西哥的进犯。两国的战争看来已不可避免，这时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却突然显得特别慎重起来。美国军队只是当他们的确知道墨西哥军队不在附近地方的时候，才进入墨西哥；反之，墨西哥军队也力图避免碰上会迫使他们发生冲突的美国军队。战争没有发生，而只是一种双方对峙的局面。

迪亚斯坚持向美国投资人修好，最终免除了这场危机。迪亚斯派出他最能干和最信赖的顾问之一，曼努埃尔·德·萨马科纳去美国游说美国生意人到墨西哥投资。萨马科纳谋求马蒂亚斯·罗梅罗的支持。多年来他担任华雷斯政府驻美国大使，编写过一套叙述墨西哥向美国投资人提供大量机会的书籍和小册子。与此同时，迪亚斯迎来了美国一批有声望和有影响的开发商，诸如前任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到墨西哥访问，授与他们可贵的铁路租让权，并答应更多的补贴。结果，美国投资人在大肆叫嚷要进行干涉之后不久，很快便成为迪亚斯政权的热心支持者，并开始对海斯政府施加压力要他承认迪亚斯政府。而且，由于眼看另一场战争在上次战争结束尚不到十年而确可能爆发时，国内反对海斯的政策达到了高潮。最后，海斯于1878年不得不让步，宣布承认迪亚斯政府，并于1880年撤消了奥尔德指令。

波菲里奥战略的详细内容

1877和1878年迪亚斯跟美国人的冲突对其政权的发展究竟有

何影响，很难评估。这些冲突似乎坚定地使1878年后的迪亚斯、迪亚斯的临时继承人曼努埃尔·冈萨雷斯（1880—1884）以及1884年后重新上台的迪亚斯执行以下三项重要政策。第一，以极其优惠的条件授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的投资人和开发商得到各种特许权；第二，墨西哥政府还试图尽一切努力恢复并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以平衡美国的影响；第三，以一切代价保持政治稳定。直到1900年，由于执行上述政策使墨西哥的力量不断得到加强，从1900到1910年，它们奠定了20世纪拉丁美洲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剧变之一——墨西哥革命——的基础。

在迪亚斯最初执政的其余时间，国内稳定是他的首要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迪亚斯实行了让步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除了保留许多华雷斯时期原有的政治自由以外，在政治上他还作出了另一项重大让步：决定履行诺言，不参加第二次竞选。这就使权贵阶层和中产阶级内部的“在野派”感到满意，当时他们觉得有机会参加下一届政府，因此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传统的”革命。必要时，迪亚斯当然随时准备使用暴力去制止持不同政见者。当韦拉克鲁斯州长米耶尔-特兰报告称许多知名人物正在策划反叛时，迪亚斯拍了一封简要的电报说：格杀勿论。他对伊达尔戈、普埃布拉和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农民也是十分冷酷无情的；这些农民占据了邻近一些农庄，满以为迪亚斯会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迪亚斯实际上曾经同这样一些集团谈判，并答应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解决他们的疾苦。可是一旦解除了武装之后，他就下令枪杀他们。

迪亚斯坚持国内稳定的国内政策以及实行非常宽宏的政策补贴的诺言，使美国的开发商签订了建设两条连接美国到墨西哥主要铁路的合同。墨西哥的政治上层人物认为，铁路建设是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免遭美国可能发动军事入侵的唯一手段。迪亚斯显然希望美国的开发商以及资助人和政治家们会感到另一场墨美战争可能最终会摧毁墨西哥而这会危及他们自己的许多利益。迪亚

斯的对手则坚持认为，大量的外国投资从长远发展来看，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外国干涉的危险。如果墨西哥政府证明无法维持这些投资人所需要的那种稳定的话，他们就会组织一个非常有力的院外集团，主张对墨西哥进行干涉。

迪亚斯在他第一次任期的最后几年里，还成功地同法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拿破仑对墨西哥的干涉来看，这一步决不是容易走的。在墨西哥有很大的压力，主张：要恢复两国关系，法国不但应放弃所有对墨西哥的要求，而且应支付大笔赔款。这期间，墨西哥政府一再声明，同法国重新建立关系，只有法国先提出来。1870年拿破仑的垮台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宣言开创了一种新的非常有利的局面，虽然如此，还是花了十年时间，两国才正式交换大使。1880年法国最终放弃了对墨西哥的一切要求，而墨西哥政府也不再要求法国赔偿。同法国重建外交关系，是迪亚斯力图在经济上取得对美国和对其它欧洲强国的一种平衡力。法国资本和法国的银行家在建立墨西哥国家银行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以后的年代里，法国成为向墨西哥贷款的主要国家之一。

在波菲里奥时代，及其以后的岁月里，在墨西哥上层人物眼中，法国已经成为凌驾于其它欧洲国家之上的重要国家。法国的时装、文化和建筑都是他们摹仿的榜样。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对该政权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它结合了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并很快被后者所压倒。外在地主的部分时间在巴黎渡过，上层集团的成员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法国学校去读书。墨西哥的军队用法国大炮装备，一些最杰出的军官学习了法国军事技术。当迪亚斯于1911年最终被赶下台的时候，他就到法国去隐居了。

冈萨雷斯过渡时期（1880—1884年）

迪亚斯信守诺言，在1880年的总统大选中没有参加候选，而

提出由他一手挑选的继承人，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将军参加竞选。在迪亚斯挑选的人物中有许多玩世不恭的人。冈萨雷斯公认是最腐化，最无能的迪亚斯门徒，要是迪亚斯于1884年决定参加再一轮竞选，冈萨雷斯很可能是一名软弱的对手。

冈萨雷斯一向以他的腐败著称，虽然谣传他在离任时把所有的家具都从国民宫搬走，那是夸大了的。冈萨雷斯远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无能，他任命了一个由波菲里奥分子组成的有才干的内阁，但是他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无法相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试图实施他前任的三项主要政策：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给予优惠；同欧洲和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内稳定。显然，他努力同时实施了以上三项战略，但总的说来，他远不如迪亚斯那样得以制止深刻矛盾的发生。

为了维护和提高外国投资人的利益，尤其是在墨西哥的美国铁路公司的利益，冈萨雷斯又采取了某些新措施来支持迪亚斯给它们的特殊优惠。在冈萨雷斯的指示下，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令，进一步鼓励把公共土地转让给私人经营。该项法令允许冈萨雷斯把测量公共土地的任务交给私人公司，并以它们确定的公共土地的1/3作为报酬。这些公司对小地主的权力进行欺凌压榨，是不足为奇的。许多小地主祖祖辈辈都在这些土地上耕作，但是他们都拿不出正式的地契。外国和本国投标人的利益各不相同。大量的公共土地在以前都不予出售，而现在就可以买到。大量的私人土地重新被划定为“公共土地”之后，现在就可以用一次巨额投标买到，不必再通过与众多的小块土地所有者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协商。

对外国投资者更大的让步是墨西哥政府决定废除的西班牙矿业法。该矿业法规定地主并不拥有自己产业地下的矿藏；这就意味着采矿权必须与地面权分别获得，因此政府便占了多得多的国家财富。1884年的新法令提出终止这项原则，从而使墨西哥地主和外国投资者都得到了发财的机会。

可是墨西哥最有势力的外国投资集团——美国公司的胃口要大得多。冈萨雷斯的苦恼是，如果迎合美国人的要求，就意味着要冒风险使同欧洲刚刚恢复的关系恶化。美国政府于1882年向墨西哥建议签订一项特别互惠协定，取消两国各自的某些商品进口税。美国暗示，要是不签订这样的协定，日后在墨西哥进行铁路建设就会无利可图，而要停顿下来。冈萨雷斯并不热情。在力求同欧洲修好的时候，这项条约不仅会大唱反调而且还会使已经枯竭的财库失去非常迫切需要的税款收入。由于对美国的压力让步，墨西哥国会于1883年还是批准了这个条约。但数月以后国会就改变了立场，批准了给予德国最惠国地位的另一项条约，实际上就是对德国也实行降低关税，使美国通过条约得到的许多单方面的利益成为无效。美国大使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德国驻墨西哥的公使则直截了当地警告冈萨雷斯说，如果不遵守同德国签订的条约，就会危及墨西哥同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冈萨雷斯最终勉强地逃过了一次最后摊牌，因为美国农民害怕在农产品上与墨西哥人发生竞争，向美国参议院施加压力否决了这项条约。

有时，同欧洲寻求较好的关系同国内稳定的需要发生抵触。在长久和复杂的谈判之后，冈萨雷斯得以说服英国重新同墨西哥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回报，冈萨雷斯向英国的债券持有人认可了由前保守党政府欠下的1,540万英镑的债务。这一协议在1884年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期间宣布，受到国会的严厉指责。暴动者走上街头，只是在进行武力威胁以及向稠密的群众开枪射击之后局势才平静下来。

在历史上冈萨雷斯政府被说成是墨西哥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这一名声对它也许是相称的，虽然在公众看来冈萨雷斯的消极形象部分是由于墨西哥在1884年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部分也是由于波菲里奥·迪亚斯故意力图贬低他的继承人。鉴于这种不好的形象，墨西哥在1880和1884年间发生的深刻变化就被歪曲了。上面概述的法律变化只是总貌的一部分。墨西哥与美国之间

的第一条铁路是于1884年通车的；当时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自从马克西米利安失败以来，墨西哥首次与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铁路建设以及1880年至1884年间发生的阿帕切人的失败，打开了墨西哥北部边境新的广阔领土，其中有许多地方在那时以前一直是人迹罕至的。1884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再次当选总统，并继续执政到1911年，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墨西哥经历了自1821年独立以来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时期。

迪亚斯政权(1884—1900年)

1877年至1900年期间，墨西哥的人口约从1,000万人增加到1,500多万人。近期发生的战争没有制止人口的增长，生活水平的稍加改善帮助了它的发展。周期性的干旱和饥荒曾经波及许多地区的经济生活，现在却不再具有破坏性影响了：现在铁路可以把粮食运送给挨饿的村民，并把剩余的劳动力送到急需的地区。相比之下，医疗保健的改善却十分有限。虽然医生人数已从1895年的2,282人增加到1900年的3,021人，但他们都集中在城市。墨西哥的平均寿命仍大大落后于西欧和美国。

墨西哥的人口增加十分不均。以前人口稀少的边缘省份和城市地区，增长最多。在1877年到1910年间，索诺拉、奇瓦瓦、夸乌伊拉、新莱昂和塔毛利帕斯州等边区各州的人口增长227%，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托雷翁的人口增长甚至更加显著。上述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本地人口的增长。不管迪亚斯政府的努力和期望，移民仍然十分有限，而且主要是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商人、投资者和技术人员。工厂的薪金太低，远不能吸引欧洲工人，只有一些技艺高超的机械工才可以拿很高的工资。欧洲的农业工人都不接受墨西哥庄园主支付的低工资，只要美国仍旧向移民开放，他们就没有理由到美国以南的国家去。

迪亚斯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1884年到1900年间，墨西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大约12亿美元——使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在墨西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上，这一增长率是前所未有的； 29 可是也造成了空前的收入悬殊：这主要表现在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企业与其它以最原始方法进行劳动的企业之间；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之间；在外国和本国的经济管理之间；以及在各个地区的发展之间。

面向出口的经济部门其经济发展最为明显。采矿业得到了最快的增长。在铁路建成以前，墨西哥的采矿业一直仅限于贵金属，主要是白银和一些黄金。靠骡驮运输对任何别的矿产未免太昂贵。在迪亚斯第一次执政时，实际上还没有铁路，到19世纪末，共铺设了铁轨1.4万公里，从而使对铜、锌、铅和白银的开采才变得有利可图。1877—1878年生产白银607,037公斤，1900—1901年已上升到1,816,605公斤（1910—1911年为2,305,094公斤）。1891—1892年生产铅38,860吨，到1900—1901年开始上升到79,011吨（1910—1911年为120,525吨）。1891—1892年生产铜6,483吨，1900—1901年已增加到28,208吨（1910—1911年为52,116吨）。农业经济作物也飞速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龙舌兰纤维（西沙尔麻）。1877年该作物产量11,383吨，到1900年已上升到78,787吨（到1910年达128,849吨）。橡胶、银胶菊（橡胶的代用品）、咖啡和胭脂红的产量都大量增加。一些面向出口的工业也开始在墨西哥站稳了脚跟。1891年美国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对进口未加工的矿石征收高额的关税附加税；对加工的矿石征收的关税很低。结果，一些最大的美国公司，首先是古根海姆控制的美国冶炼公司就在墨西哥开设了矿石熔炼厂。

面向国内的轻工业经济是到19世纪末才迅速发展的。纺织制造业欣欣向荣。19世纪80年代当作为墨西哥货币基础的白银价值

开始下跌时，进口的纺织品价格就太昂贵，于是从事这项贸易的法国商人们便转向在墨西哥本地生产纺织品。他们在奥里萨巴和普埃布拉地区新建立了像里奥布朗库那样的大工厂。这时生产纸张，玻璃、皮鞋、啤酒和食品加工的轻工业工厂也纷纷建立起来。重工业远远落在后面，只是到19世纪末以后才陆续抬头。1902年，钢铁冶炼公司在蒙特雷建立了一座钢厂，到1910年产7.2万吨。

1900年以后工业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部分是由于19世纪末以后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工业品市场的发展较之以前受到很大的限制。工业发展受到限制也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迪亚斯政府没有向挣扎中的国内生产者给予特殊的帮助。1881年的新工业法曾给尚在萌芽中的本国工业提供了某些慷慨的免税办法，同时对诸如纺织业那样的某些本国工业给予有选择的关税保护；但是从来没有向重工业提供过欧洲国家通常实行的那种特殊保护，诸如强使美国铁路开发商向墨西哥制造厂家购买其使用的材料；也没有向重工业提供优先得到贷款的机会。

与铁路的情况不同，工业从来没有得到过补贴。迪亚斯政府没有开发特定工业的计划，没有促进技术进口的纲领，也没有保护新兴工业的政策。首先，所谓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极其有限的。虽然在波菲里奥时期教育经费的确有所增加，但范围十分有限。1895至1910年期间，能读能写的人口比例从14.39%增加到19.79%。培训技术工人的公共职业教育很不发达。从1900到1907年，职业学校入学人数由720人增加到1,062人。

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农业部门出现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不是在商品生产方面（出口作物和粮食产品均有增加，虽然增长速度不一），而是在技术现代化水平方面，在生产象龙舌兰纤维和蔗糖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园里发生某种技术革命的时候，生产小麦和玉米的庄园里都仍然在使用老式的和非常传统的技术。这些地主不实行现代化，通常是因为心理上的原因，而不是经济上的

原因。可以肯定，地主基本上都充满封建思想，把土地珍视为他们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经济资源。他们一心想着要同巴黎的时髦女郎交往，游览格斯塔德和加米施——帕滕基兴休养胜地，在蒙特卡洛赌博，而不去认真关注他们的庄园事务。可是这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托管庄园的人员不去尽可能捞回点利润。

导致美国农业生产现代化和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在墨西哥那样劳动力供应十分便宜的国家里，显得并不重要。墨西哥有位著名的农业专家劳罗·比亚达斯于1911年对使用现代农业工具的美国农民所花的成本跟使用原始技术而雇用廉价劳动力耕作的墨西哥庄园主所花的成本进行了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产量，美国农民花4.95比索，而墨西哥庄园主仅花4.50比索。

除了面向出口的生产和以面向国内的生产之间的不平衡之外，由于墨西哥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另外一种重大的不平衡：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墨西哥经济的最重要部门除农业之外均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直到19世纪末，迪亚斯政府都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鼓励墨西哥人掌握某些经济部门，或提高墨西哥人的参与股份。

虽然迪亚斯政府对于墨西哥人的产权和参与该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企业，很漫不经心，但对美国人与欧洲人控制的重要经济部门却不是这样。迪亚斯政府尽一切努力帮助推动欧洲人的投资，而不象对美国人那样予以种种限制。直到19世纪末，只给欧洲贷款，并对欧洲银行家专门给以银行业优惠。公共工程项目，诸如韦拉克鲁斯的港口设施，或墨西哥山谷的排水系统工程都交给英国企业承办，首先是威特曼·皮尔逊爵士开办和经营的企业。皮尔逊爵士是一名年轻而富有经验的英国开发商和政客。

然而，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使欧洲经济大量渗入墨西哥，但是直到19世纪末以前并没有引起欧洲人和美国发生任何重大的竞争或冲突。美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同时最大的那些美国银行仍旧首先对美国国内投资发生

31

兴趣，所以它们对欧洲在墨西哥的投资或欧洲人渗入墨西哥的金融系统并没有感到不满。即使在这些方面，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和美国人都享有同等的利益（铁路和采矿），他们之间已经有某种分工，英国人基本上集中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美国的投资者则首先向该国的北部发展。

到19世纪末期，争夺对墨西哥经济影响的最尖锐、最剧烈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和英国，而是其它两个强国，法国和德国，它们在墨西哥的利益总的来说要小得多。它们之间争夺的主要部门是墨西哥的对外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该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的汉萨同盟城市的商人所控制的。到19世纪70年代，来自巴塞罗那（今天该城市的主要街道仍叫波菲里奥·迪亚斯路）的法国商人取代了他们的德国对手。这仅仅是法国和德国在墨西哥进行长期和剧烈争夺的第一次战役。几年以后，法国和德国的竞争达到了更高的程度。1888年墨西哥政府与一家外国银行签订了自马克西米利安政府垮台以来第一份重要的贷款协定。这是与布莱希勒德尔承兑所的一家德国银行谈判的，它也经管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个人财务。德国人不仅获得了极其优厚的利率，而且还迫使墨西哥政府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实际上让这家承兑所把墨西哥的对外资金全部垄断起来。事先没有取得布莱希勒德尔公司的同意，墨西哥政府就无权支取任何贷款。墨西哥接受了德国人苛刻的条件，但6年以后，在法国的帮助下，设法撕毁了布莱希勒德尔的合同，并中止了它对墨西哥金融的控制。

在另外一个领域里，法国赢得了对它德国对手的更大胜利。在整个拉丁美洲，德国和法国的武器制造商都一直在为有利可图的拉丁美洲武器市场进行竞争。克虏伯公司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德国公司。虽然在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里克虏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大力把大炮卖给墨西哥军队，但是他还是败给了从圣沙蒙来的法国对手。

在19世纪末以前，这些冲突对墨西哥政府来说并不紧要。只是在20世纪，出现了另一种涉及两个主要强国——美国和英国 33 ——在墨西哥有利害关系的冲突，这跟法国和德国的竞争不一样，对墨西哥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后果。

墨西哥发展中的地区差别

波菲里奥时期的发展所造成的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差异是日益扩大的墨西哥中部、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地区差别。这种差别不是新发生的，实际上这可追溯到本地区的文明起源。早在欧洲人征服以前，在现今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就已经出现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城市、等级森严的社会和复杂的文化，而那时的北部地区尚居住着游猎者和采集者以及一些原始的农业生产者。西班牙人的到来使这些地区产生了新的差别。东南部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新西班牙殖民经济的边缘地区，因为那里找不到矿藏。另一方面，北部却成了新西班牙殖民地必不可少的部分。正是在那里，在征服墨西哥之后，发现了某些最富的矿藏。对西班牙人来说，最不幸的是他们无法在这一地区移民，经久不息地受到流窜的印第安人的袭击，首先是阿帕切人的袭击；从18世纪持续到独立时期，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无论是墨西哥北部还是东南部都经历了经济的巨大繁荣，而且都被吸收进世界市场。

墨西哥的东南部开始呈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多数国家特有的性质。东南部绝大多数州的经济都是为了适应一种或两种出口农作物，很少从事农业多种经营，更少从事工业。尤卡坦半岛的情况也许是说明这类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西沙尔麻在墨西哥叫龙舌兰，始终是尤卡坦半岛的重要作物。只要它主要被用于制作绳索的时候，它的用途及市场销路是有限的。当19世纪80年代被麦考密克收割机开始使用后，对龙舌兰的需求便急剧增加起来，从而在尤卡坦掀起了出口的高潮。生产龙舌兰的大庄园，以及把龙

舌兰从尤卡坦半岛内地运经沿海的铁路系统，都掌握在墨西哥人
34 手里。龙舌兰纤维的买主和使用者竞相争购，其中最大的是美国皮博迪公司，但在19世纪末，绝大多数公司都已合并入一家联合企业——设在芝加哥的国际收割机公司。它不久便控制了市场，并与当地的商行合作试图操纵龙舌兰的价格从中获利。

在尤卡坦半岛，实际上所有的地产都被墨西哥人占有。与尤卡坦的情况相比，在东南部其它州，特别是在帕斯和塔瓦斯科，情况多少有点不一样。像橡胶以及较小程度上还有咖啡等主要产品都直接由外国投资者生产。这些州与尤卡坦半岛共同之点是它们都是单一或两种作物经济，它们都完全依靠世界市场。

如同东南边区那样，墨西哥北部边区同样经历了极其迅速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主要面向世界市场。然而这两个区域的相似之处仅此一点。与东南部相比，北部的经济较为多样化。那里出口各种不同的矿石，有铜、锡、银和诸如鹰咀豆、牲口以及木材等商品。与东南部相比，北部经济中很重要的部门都与为国内市场的生产有关。这首先是在科阿韦拉和杜兰戈州的拉古纳地区大量高产的水浇棉田。关于其余的经济部门，工业发展在北部比墨西哥其它大部分地区更为重要。蒙特雷城的钢铁工业很发达，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拥有的冶炼厂均设在北部。在许多大庄园附近，纷纷建立了食品加工工业，因此从许多方面看，北部经济在墨西哥是最均衡的。可是，那里的外国投资力量远比东南部重要和雄厚。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是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资本在新兴工业（采矿业除外）和经济作物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地区之一，虽然总的来说是次要的。

墨西哥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没有多大变化。这
35 主要是因为那里大部分是种植玉米和小麦的大庄园。这种非常缓慢的发展与墨西哥山谷和它的周围地区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州的新工业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波菲里奥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经济上的这些深刻

变化，为墨西哥演变成一个类似西欧或美国那样的现代化独立国家打下了基础。可是，实际上出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地在极大程度上依附外国资本的国家。这种依附采取两种不同的、但是相互补充的形态。一方面，最明显地表现在外国资本控制或占有了墨西哥经济中重要的非农业部门：银行业、采矿业、工业和运输业；另一方面，墨西哥从此成为一个生产原料的、依赖工业化北大西洋市场的不发达国家的典型范例。

墨西哥的政治变革

在1884年以后的年代里，迪亚斯政权成为独立以来墨西哥第一个最有影响的任期最长的独裁政权。在他第二次执政期间，迪亚斯有效地阻止了他的任何政敌被选入墨西哥国会。到1888年国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盖橡皮图章的机构。每一个候选人是当选还是重新当选都必须事先得到迪亚斯的批准。当时驯顺的国会批准了宪法修改条例，使迪亚斯能“顺应”民意使自己在1888、1892、1898、1904和1910年重新当选（1892年修改了宪法，总统任期延长为一届 6 年）。墨西哥过去富有斗争性的反对派报纸对政府的批评通常富有文采，这时却大部分噤若寒蝉，而且受严密控制，虽然在一些小报刊上有时也冒出些反对意见。

专制统治的巩固紧紧依靠两点：实现国内稳定（波菲里奥统治下的和平）以及建立一个有效和强大的墨西哥政府。这些工作反过来不可避免地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国家的“安定”经过多方面的复杂过程，直到1900年才基本（虽然并非全部）取得成功，并成为波菲里奥的思想智囊们认为最自豪的成就。在迪亚斯时期之前墨西哥经常发生的冲突具有许多层面：有军事政变、考迪略暴动、农村的盗匪活动、游牧印第安人的袭击，以及农民和边境印第安部落的暴乱。到19世纪末，墨西哥只剩下以下两种暴力事件仍未平息：边境上大批印第安人的叛乱和主要发生在北部的分散的农民叛乱。所有其它形式

的暴力事件不是完全消失就是基本已被平息。

暴乱的减少跟墨西哥政府的构成有密切联系。波菲里奥政府得以发展的前提是政府收入不断增加。迪亚斯不想使用前任政府使用过的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强制贷款或提高税款），因为这些办法把外国投资者统统赶跑并引起本国寡头势力的反对。在迪亚斯统治期间，墨西哥的收益主要来自外国企业支付的有限税款，对输入该国商品征收的较大量的关税，以及对贵金属征收的税。所有这些收益都取决于增加外国投资的水平和改善墨西哥的国际信用地位，使它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更多的贷款。除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到墨西哥来，迪亚斯增加收益的主要手段是精简国家金融机构，使之更加现代化。这项工作在华雷斯领导时期就已开始，但是最有影响的现代化设计者是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他是墨西哥最能干的金融家之一，于1893年5月被迪亚斯任命为财政部长。到1896年利曼图尔使预算达到平衡，这在墨西哥历史上尚属第一次。接着墨西哥的信用地位便极大地提高。因此迪亚斯政权不仅可以轻易地得到国际贷款，而且利率可以比过去更有利。

由于有了如此坚强的财政支持，迪亚斯便能够在国内加紧对更富叛逆性和独立性的集团进行控制。一个集团就是地方上的政治头目，他们像封建领主那样统治着自己的省分。迪亚斯采取的行动首先是用忠于他自己的人替换那些从其它时期留下来的许多最有权势的人物，如奇瓦瓦州的路易斯·特拉萨斯和索诺拉州的

37 伊格纳西奥·佩斯凯拉。这种计谋并非是新鲜事。实际上迪亚斯的所有前任在他们能做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不幸的是，这种做法过去往往是政府的一种临时性补救措施。一旦权力巩固之后，新上任的政治头目往往便为自己谋求他们前任所享有的同样的自治。而且，被他们降职的前任通常在幕后苟延残喘，等待机会推翻剥夺他们职位的这个政权。结果是政治稳定仍然没有保障，对立的地方头目之间的争夺或者新任命的考迪略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在迪亚斯统治下，这种补救措施则更为

有效。新建的铁路使迪亚斯的军队很快便可以进入各个省份，帮助制止可能发生的叛乱。

也许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迪亚斯鼓励或者至少允许在职的政治头目和已被从原职位撤换下来的人，可以通过充当希望在这些地区定居或置产的外国投资者的中间人来发财致富。这样，迪亚斯便使地方上的寡头势力，无论是“在职的”还是“在野的”对于本地区的稳定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任何暴动、任何地方上的骚乱，都会很快吓跑可能的投资者，从而堵住地方寡头势力收益的重要渠道。

迪亚斯还有两种办法来试图制止地方上铁腕人物可能发动的暴乱。一种办法是，任命在该地区没有任何根子的军事指挥官来监督当地的文职官员。另一种办法是，提升政治首脑（地区行政长官）的职权，他们在迪亚斯统治之前，职权都不大。现在他们指挥他们地区的警察和辅助武装部队，任命区、市官员，为外国投资者铺平道路，因此他们不仅向直接领导他们的州长效忠，还对中央政府效忠。

迪亚斯对长期以来反对强大中央政府的另一个集团使用软硬兼施的类似策略。这指的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反对派。它主要在墨西哥的首都活动。传统上，这类集团在墨西哥议会起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编辑出版很重要的反对派报纸。迪亚斯不让他的政敌选入墨西哥议会，同时继续推行冈萨雷斯政府期间取缔所有反对派 38 报纸的政策。然而，中产阶级对这些镇压措施的反对无声无息了，因为，在这期间迪亚斯向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份子在经济和社会上提供了新的提升发展机会。1884到1900年期间，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大大增加。同时在迪亚斯解雇了的地方政治头目的那些州里，许多新的职务为有干劲的人敞开大门。解雇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失去了政治地位。奇瓦瓦州的强人，路易斯·特拉萨斯在当地仍有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反对该州现有的政权结构。对此迪亚斯不得不容

忍下来。结果，当墨西哥城残存的民主日益走下坡路时，在奇瓦瓦州和其它一些州却出现了某种两党制。这种制度反过来又使地方上的中产阶级增强了它们的政治手段，因为两党都争相得到它们的支持。

这些“党”实际上只是地区性的，而且非常类似大家族或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的联盟，而不像这期间欧洲正在发展的政党。迪亚斯不仅决不允许成立真正的反对党，而且也反对成立政府政党。1891年，他的一些主要知识份子和上层阶级支持者试图通过号召成立一个以实证主义“科学”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党来巩固波菲里奥的统治（这些人在墨西哥被称为“科学派*）。这项建议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扩大政权的基础，以便加强政权的力量，并对迪亚斯本人予以某种约束。与此同时，成立一个党可以保证有秩序的接班，防止发生大部分墨西哥上层集团最担心的事：一旦迪亚斯去世或无法完成他的任期，国内就会发生骚乱和冲突。

可是，迪亚斯反对建立政党。他宁愿继续使用1876年就职后一开始就很有效的策略。这就是在墨西哥上层集团里对各个不同派等进行挑拨离间。其中有一个派系就是由来多政府时担任过部长的曼努埃尔·罗梅洛·鲁维奥领导的，后来他加入了迪亚斯政府，并于1884年出任内政部长。鲁维奥在许多方面都是波菲里奥政府的设计师。正是他改变了政治首脑制，也是他控制和操纵了全国的地方长官。他的派系成员主要是文职人员：金融家、地主、技术官员，以及官僚等。1895年鲁维奥去世以后，他的一位最有成就和最聪明的学生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从1893年起担任财政部长）成为这一派最知名的领导人。这一派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由军人领导的另外一派。在迪亚斯重新执政后的最初几年里，该派主要发言人是前任总统曼努埃尔·冈萨雷斯，以后几年由迪亚斯的一位可靠亲信贝尔纳多·雷耶斯担任这个职务。这一派由迪亚

39

* Cientificos，一译“科学家派”——译者

斯军界的老朋友、传统的地方强人，以及某些官僚组成。他们严厉批评“科学派”日益扩大的权力和影响。

迪亚斯使用他安抚地方强人类似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对付第三种力量——军队。在整个19世纪，第三种力量对墨西哥的任何一届中央政府经常是一种威胁。一方面，迪亚斯增加军事预算（绝对数，不是相对数），购买欧洲的新式武器，在重要政治岗位上安插许多军事领导人，并允许他们虚报军饷；他还成立了一所现代军事学院，试图形成一支精粹军官队伍；与此同时，迪亚斯又通过建立其它准军事部队，经常给他们配备比军队还要精良的武器来削弱军队的影响。国内许多镇压行动都是由不直接隶属于军队的辅助部队执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部队就是全国各地的乡村骑警队（在迪亚斯执政之前就存在的一支职业警察队伍），而迪亚斯大力加强了这支队伍的作用和规模。军队中的士兵都是强征入伍的，薪饷很低，所以他们通常对军队的忠诚感很有限。但是，乡村骑警队薪饷较高，待遇较好。对各州乡村骑警队同样的情况是：（虽然程度上松一些）队伍直接属各州政府管辖，但联邦政府对他们拥有最高权力。与此同时，迪亚斯把一些最显赫的盗匪编入警察部队，就把他们的力量和才能变为对他有利。但对消灭盗匪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只是迪亚斯和中央政府。经常与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的地方强人，只要他们本身的财产不受影响，对歹徒的破坏行为至少一直视而不见，现在他们感到，这些盗匪可能阻碍外国人对他们地区的投资而造成自绝生财之道。他们积极对政府的帮助，经常是非常重要的。

迪亚斯对所有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力量的镇压、妥协和收买政策（这些阶级在19世纪初曾经是造反和不稳定的根源）扩大到另一股力量——天主教教会。在一段时间里，天主教会已成为每届自由党政府的主要威胁之一。迪亚斯并不奉行莱多政府的反教士政策。虽然迪亚斯政府从来没有取消改革法对教会提出的法律限制，也没有交还它过去的财产，实际上正实行一种相反的政策。

通过许多隐蔽的方式（其实这也不难看出），教会从投资以及从徒的捐赠中积累着新的财富。政府并不打算对此给予限制。它批准了与教会有密切联系的23家以上的报纸出版，整个墨西哥到处都出现教会支持和倡办的学校。迪亚斯同一位与教会上层集团保持极好关系的虔诚天主教徒卡门·罗梅罗·鲁维奥的婚姻，进一步突出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和解。正像瓦哈卡的希略主教同高级行政官员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在这期间，对天主教会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以及来自农村的不满运动。因为美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和移民增加，所以美国的传教士也不断增加，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异常活跃。在奇瓦瓦州，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甚至深入偏僻的村落，对农民产生了很大影响。结果，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变得越来越有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越来越反美。

也许对天主教会更危险的是农民中产生的不满运动。这些运动经常出现，但只要天主教是这个国家的法定宗教，教会总有办法对这些活动加以镇压。现在击退这些活动已大为困难，因为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强烈反对教会的"圣徒"和"圣男圣女"。在索诺拉州成千上万的人崇拜一名16岁的小姑娘特雷西塔，把她叫做卡沃拉圣徒。她能治百病，据说还创造了许多奇迹。在科维林波，印第安村民认为他们中一名叫做圣·胡安的人是圣徒。在墨西哥中部地区的山洞里到处都供奉着哥伦布以前的神像，有许多人前去朝拜。

41 政府只镇压那些主张社会或政治变革的教派。美国支持的基督教传教士得到宽容，有时甚至受到波菲里奥当局的支持。失去政府的邦助后，天主教教会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以对付它宗教上的敌人。对牧师来说，光是讲道反对偶像崇拜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圣徒和叛逆者，大多数不仅是宗教不满份子，而且还是社会不满份子，必须先赢得对这些社会运动的控制权。教皇莱奥十三世的第13号通谕《新通谕》，号召教会干预社会问题，导致了天主教

会各部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种新趋向的主要支持者是图兰辛戈主教。由于他的帮助，在波菲里奥时代最后几年中，几次天主教代表大会讨论了农民问题。1903年在图兰辛戈城举行的一次天主教会议上天主教俗人要求庄园废除劳役偿债，给农民更多的指导和教育。与此同时，他们呼吁农民接受万事由上帝安排、不要群起反对上级。受教会影响的报纸，经常对没收村庄土地表示抗议。教会的新政策无疑是由于教会自己也丧失了土地，教会在偿债劳役以及其它的农民劳役方式中的卷入程度已经不同于19世纪初期。

虽然天主教教会在农村的地位最终没有得到巩固，但在其它方面显然取得极大的成功。由于迪亚斯的支持，教会在政治和经济上恢复了地位，同时在农民中得到的拥护增加了。这种拥护最明显地表现在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农民革命党人（首先是莫雷洛斯州的萨帕特派份子）没有实行反教士的政策。

总的来说，波菲里奥政府的巩固，使大部分传统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失去了许多他们一直行使的政治权力。反过来，他们也消耗了墨西哥经济迅速发展的果实。农民的情况则不一样，在迪亚斯时期农民失去了他们传统的政治权利，同时，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通常的看法是，迪亚斯废除墨西哥原有的民主结构，对农民没有多大影响。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甚至当反对派报纸难得到达偏僻的农村时，农民也看不懂。农民对全国选举既不感兴趣，也不会参加。

这种情况可能是真的。但在墨西哥有一种民主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地方自治。绝大多数村民传统上都选举他们的地方议会和市长。市长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而且还有经济权力。这些官员给大家分配公共土地、水和牧草；常常调解村中的纠纷，有时决定谁可以参加军队，谁可以免服兵役。这种乡村自治的由来，通常可追溯到哥伦布以前的时期。那时，墨西哥南部和中部的村庄大部分都自给自足，并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并不因为西班牙的征服而从此结束。西班牙允许许多印第安人社

区保留土地和公社制度，给他们一定程度的自治，虽然这都是在政府和教会公职人员的严密监护下进行的。对在北部边境地区的许多社区，实行一种对政府控制有新的和更大程度的自由；以鼓励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定居和打击印第安人抢劫者。总的看来，独立以后村社的权力和自治是逐步增加的。联邦政府力量薄弱，远不能冲击它们的传统权利。地区的首领和地方的政治头目是足以对村议会和市长提出严重挑战的唯一权威。他们中许多人利用他们新发觉的权力（与殖民政府不同，19世纪软弱的全国政府对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强制对村庄实行统治。然而，其它许多人，不太敢侵犯农民的既有权利。地方上的政治头目经常介入墨西哥没完没了的内战，在关键时刻，他们便与各村落结成联盟，以保持他们反对敌手或反对联邦政府的力量。因此他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把镇压和控制结合起来，试图获得他们所控制的许多村落的忠诚和支持。在波菲里奥时代的最后年代里，这种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北部边境的归化

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墨西哥政府开始确认它对墨西哥北部边境的统治——索诺拉、奇瓦瓦、新莱昂和杜兰戈。阿帕切人的被征服，以及铁路的建成，为美国和墨西哥南部大批移居创造了一个新的时期。有1.5万余名美国人到这里定居。他们与这一时期涌到墨西哥其它地方的美国人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同南部和中部墨西哥的美国移民一样，许多人都是富有的投资者或大公司的董事。北墨西哥最大的采矿和冶炼厂业主美国冶炼公司，以及其它类似的公司把许多技术人员带进来。象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样的人把许多管理人员带进来，为的是需要他们去监管他在这一地区的大量地产；而象威廉·C·格林这样的人，则需要他们管理牲畜和木材企业。但是，为数众多的来到北部的其它美国人，则属于在墨西哥其它地方少有的社会集团。美国铁路员工不仅在

行政管理上，而且在多数墨西哥铁路业务分局，首先是北方铁路局，占有一切较高的职位。当时，美国矿工在采矿业，尤其是墨西哥最大的采矿中心之一，索诺拉州的卡纳内阿，组成了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在美国，矿工的地位本来与其它工人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墨西哥，他们成为少数有特权的工人，比墨西哥矿工拿的工资多，待遇好。

于1877和1910年间居住在墨西哥北部的30万左右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有些不同。大量的移民都是背井离乡的农民，破产的手艺人或希望得到更好机遇的冒险家。他们对地区人口构成的影响十分巨大：使蒙特雷的人口从1877年的1.4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78,528人；同时使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几百人的偏僻小村庄托雷翁，变成了墨西哥最现代化和发展最快的城市，1900年全市人口2.3万人，到1910年已增加到4.3万人。

刚到北方的移民并未取代地方上的上层权贵。北方的大家族确实让出了一些政治权力以支持中央政府，并同外国企业家分享经济权力，但总的看来，由于边区发生的变化不断加剧，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奇瓦瓦州的特拉萨斯——克里尔家族、科阿韦拉州的马德罗家族、蒙特雷的钢铁厂老板都是墨西哥的大财主，相当于美国的洛克菲勒和古根海姆家族。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说，北部是19世纪末墨西哥最“现代化”的地区之一。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在墨西哥是最多样化的，农村人口百分比与墨西哥其它地区相比也比较低。在墨西哥北部，识字的人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基本取代农村中传统的社会关系方式。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对大庄园的雇工通常不是现金支付而是付给他们只能在庄园商店里使用的票券。许多雇工因欠了大庄园的债务而受到控制，即使不是这样，由于农村的不安全、交通不便和阿巴契人的袭击，他们想要离开住处，也是极其困难和危险的。

阿巴契人的战争结束之后，墨西哥同美国重新建立了联系。

许多墨西哥农业工人，尤其是牛仔有可能越境到美国找到工作；而且无论是美国当局、美国企业家、还是墨西哥工业家都不愿意把逃亡出来的雇工还给原来的庄园，这就使得劳役偿债制越来越花钱和无利可图。结果，墨西哥庄园主不得不寻求别的办法，使牛仔和农业工人留在他们的庄园里。有些人像拉古纳新辟水浇棉花田的棉花种植者，给他们支付的农业工资在墨西哥是最高的。其它人则以远比墨西哥其它地方优越的条件实行分成制和租佃制。在墨西哥中部，用得最多的办法是：佃农或分成农最高可以获得收成的一半，而在北部通常能得到2/3。许多北方的牛仔可以自己养牛，并在庄园的土地上放牧。如果这项工作他们干长了，很可能成为工头，可以比以前多挣一倍的钱。有些特别开明的地主，诸如科阿韦拉州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在他们庄园里办起了学校和诊所，在饥荒和收成不佳时接济周围村落的居民。

在19世纪末期，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吸收了墨西哥北部，墨西哥中部和美国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不仅使社会上层，而且还使中、下阶级的重要部分发生巨大的改善。可是，北部在波菲里奥时期也是社会和政治暴力最激烈的地区。在某些方面，直到19世纪末期，可以说以社会上现代部门为一方以及以北方社会的“传统”分子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发生了。北部社会中完全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各种特征的唯一集团是奇瓦瓦州5万左右的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他们多数居住在马德雷山脉的丛山密林中，很少卷入波菲里奥统治期间和1910—1920年革命期间波及墨西哥北部的各种社会冲突。

索诺拉州的亚基印第安人和奇瓦瓦州前军事殖民地居民，对波菲里奥的现代化进行强烈抵制，一再发动武装暴乱反对政府当局；由于他们坚持已经确定的权利和土地，所以他们已构成一种传统部门。如果这指的是反对现代技术、工业部门或市场生产，那么他们就不是“传统派”。在殖民地时期，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支持下，亚基人已经吸收了集约型农业的复杂技术，并把它们成功

地应用于耕作亚基河山谷的肥沃土地。许多农产品都在矿区的市场上出售；与此同时，许多亚基印第安人跑到远离家乡的矿山或庄园去工作，他们的雇主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和最熟练的工人。

在殖民地时期和19世纪，主要定居在奇瓦瓦州的前军事殖民地居民，已成为农业中产阶级的骨干之一。他们不仅拥有远比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一般农民多得多的土地，而且他们在经济上也是完全独立的。他们不仅有足够的土地和牲畜以维持自己的生计，而且即使他们想要去为邻近的庄园工作，在阿巴契战争期间交通非常危险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也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墨西哥南部和中部，1856年改革法颁布以前土地一直归公共所有，不允许出售；北部农村不同，土地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亚基印第安人以及在北部的许多前军事殖民地居民都连续发生反迪亚斯政权的暴动，其原因不是他们反对"现代"资本主义 46 经济，而是憎恨这种经济的发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亚基印第安人的几次反墨西哥政府的流血暴动，都是在墨西哥当局为了美国理查森公司的利益而试图没收他们大量肥沃土地的时候发生的。奇瓦瓦的军事殖民地居民在1891—1893年举行武装起义，既反对州政府也反对迪亚斯政权，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与市政自治的传统紧密相联的。由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市政当局，一直是他们抵御各种外来攻击（无论是对他们土地还是对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攻击）的主要工具。1891年州政府草拟了一项新法令，允许政治头领任命大城镇的市长。奇瓦瓦州的许多村庄为了阻止当局执行这项法令，纷纷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这些村民与亚基人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那就是经过一个半世纪与阿帕切人战斗的培养，具有不平凡的作战能力，而且拥有武器。可是，两者之间也有一种明显的不同。索诺拉州的亚基人处于孤立状态，他们同这个州的其它人口在种族和社会上有差异。另一方面，军事殖民地居民则拥有强大的、秘密的盟友：这个州的一些大地主，以及诸如路易斯·特拉萨斯等前考迪略；他们试图利用这些农民来对政府施

加压力。

由于上述差别，使迪亚斯政府可以根据两种情况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经过多年工作无法使亚基人同意割让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也无法通过日益加紧的军事战役来使他们就范，政府便采取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镇压方法。1903和1907年间发动了全面围剿亚基印第安人的战役，并把大批亚基人（不论是对抗政府的还是不对抗政府的）统统放逐到尤卡坦半岛上的龙舌兰种植园去。这种策略不但把亚基人大批杀死，还可以从中获利。弗朗西斯科·B·克鲁斯上校在3年内共把15,700名亚基人放逐到尤卡坦，从庄园主那里获得每人（男人、女人或小孩）65比索，其中10比索归其个人，55比索给作战部。

可是，政府显得更倾向于实行一项同奇瓦瓦州叛乱的军事殖民地居民和解的政策，虽然这只是同上层权势人物而不是同农民本身妥协。从1891到1893年，在特拉萨斯的支持下，奇瓦瓦州发生的一连串农村暴动终于使特拉萨斯的对手劳罗·卡里略被撤掉了奇瓦瓦州州长的职务，一名与特拉萨斯关系密切的人掌管了州政府。而农民本身，除了得到赦免不予追究外，政府对他们的让步很少：放慢征收土地，保留市政自治的某些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战略是成功的，但在一种情况下，它最著名但却并不成功。这与奇瓦瓦州西部山区一座偏僻小村托莫奇有关。1891年11月托莫奇的叛乱在刚开始时与北部其它许多村庄没有什么两样。最初，这是一场反对担任新任市长的该区政治首领的侄子的叛乱。因为他让他的羊群在村民的牧场上吃草，还以低工资强迫村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或在村庄附近财政部长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的庄园里劳动。当有些托莫奇居民抗议这种强征勒索时，该市长便命令他们服兵役，这是人们非常害怕的。托莫奇居民反对市长以救世主自居的勒索。村庄的领袖克鲁斯和曼努埃尔·查韦斯，都是卡沃拉圣徒——一位16岁的年轻姑娘特雷西塔的狂热信徒。托莫奇的居民认为，上帝在他们一边，他们不必害怕同政

府军进行正面冲突。在这个村庄80几名男人两次击败了派来同他们作战的500多名士兵之后，一次以1200名士兵的集中进攻最终把这个村庄夷为平地。起义领袖克鲁斯·查韦斯连同托莫奇村里所有还活着的男性居民，都被枪杀。政府方面死伤近500人。在整个奇瓦瓦州不久便普遍流传着关于托莫奇暴动的民间传说。

从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来看，这是一个具有更多失败标志的胜利。政府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通过进一步放慢土地征收的速度和对农村自治的攻击，暗暗地从过去政策上退却。结果，奇瓦瓦州的农民暴动开始平息下来。到19世纪末，迪亚斯政府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北方的局势。除了亚基人地区外，暴乱的程度已经下降，考迪略们似乎已经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然而，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20世纪初期，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冲突再次发生。这时，由于现代部门内部出现了新的深刻紧张关系而变得复杂化。来自双方集团的叛乱分子最终是要推翻迪亚斯政权并在1910至1920年间扩展到整个墨西哥。

侵占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农民的土地

即使在华雷斯时代，农村社区的土地也受到严重的侵害。但在迪亚斯时代，曾经不过是蚕食的作法已转为十足的进攻。当墨西哥在19世纪初期脱离西班牙取得独立时，估计在该国中部和南部适合农业的土地约有40％属于农村社区所有。到1911年迪亚斯垮台时，只有5％的土地还留在它们手里。90％以上的墨西哥农民没有土地。虽然对这种发展过程没有确切的年代统计数字，但大致可以认为，在迪亚斯统治时期，侵占土地的浪潮已达到极点。

那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鼓励这种剥夺，由于墨西哥农产品出现了新的国外和国内市场，庄园主们都设法扩大他们的土地，以便尽量提高产量。其中最明显的事例便是，随着市场产品的大量增加，农村社区被莫雷洛斯蔗糖种植园和尤卡坦龙舌兰庄园从经济上挤垮。

可是，新市场的出现，并不是造成侵占土地的唯一因素。投机买卖同样是一种强烈的因素。每当铁路建起来，甚至这条铁路线只是在设计阶段，沿铁路线的地价便会猛涨，各类投机商都会扑向土地抓住不放。不需要付钱就可以获得新的土地，同样也是不必进行大量投资就可以增加产量的一种途径，对多数庄园主来说，这可能是不必多花钱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的最简便方法。

一种争论较多的说法是，庄园主破坏农村，以便使农村经济难以独立，从而迫使村民不得不到庄园土地上去干活。虽然这一因素确是引起侵占土地的主要动机，但它的重要性却被过分夸大[49]了。在纳兰哈村，土地被坎塔勃里亚庄园从村民手中侵占，那里的塔拉斯科印第安人中，只有三户在庄园干活。其余的人都被与侵占土地毫无关系的别的庄园所雇用。有可靠的证据说明，绝大多数庄园不必破坏周围农村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找到足够的劳工。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是自由农村中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势必要去庄园找一份辅助工作。还有一些证据说明，当庄园侵占附近农村的土地时，在农民中间引起的痛苦和不满非常之大，以致他们中大多数人宁可在其他庄园而不愿到他们社区的那个庄园去干活。

不仅是由于侵占农村社区土地的刺激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而且在迪亚斯统治时期，还找到了新的合法依据。就莱多法（见上文）来说，在重建的共和国时期，就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合法根据。在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政府期间，又增加了新的法令，准许私人公司勘测公共土地，并可以把他们找到的土地的1/3占为己有。比这些新的合法依据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只有在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政府才有足够的强大力量对农村社区实行大规模的进攻。新建成的铁路使军队和刚刚壮大起来的乡村骑警队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可能性来镇压农民的反抗。

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什么时候发生了

土地侵占的情况，以及什么时候达到了高峰。也没有充分的解释为何经常和有时在地区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在尤卡坦有这么多的印第安农村被剥夺了土地，而在瓦哈卡（它大概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百分比最高的地方）农村却保留它们大部分的土地和许多传统的权利呢？这是否由于实际上尤卡坦的出口生产远比瓦哈卡重要？其它因素：诸如瓦哈卡的社区有较大的内聚力、这个州的庄园在传统上力量薄弱、存在一个印第安中产阶级、以及迪亚斯个人与奥萨卡的联系，到底起什么作用呢？以上都是至今还没有明确答案的一些问题。

甚至还要复杂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这种土地侵占的受益者。 50
长期以来，把侵占土地的结局描绘得太简单了。认为波菲里奥变革的结果是最终在农村只存在两个社会阶级：越来越富裕的庄园主集团和贫困无地的雇工集团。

可是实际上日益壮大的农村中产阶级（对它的存在通常很难找到文字记录），似乎在农村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许多农村里，富裕的农民集团，农村的高利贷者，以及不属于庄园主的地方强人，从侵占农民土地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少于庄园主，甚至有时还要多一些。他们中许多人以前就出现。随着墨西哥人口的增长，在农村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富裕的居民在侵占农村土地时已成为地主和波菲里奥当局的同伙。他们中有些人获得了中等规模的产业（畜牧场），因此被列入1895年和1900年的调查数字中，其中统计了3.2万个畜牧场（由于有些畜牧场是庄园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畜牧场都是独立单位）。可是，另外一些人，把他们的财产在其它方面进行投资，更难用统计数字加以记录。有些人成为富裕的租佃人，另一些人把牲畜出租给分成农和较贫困的佃农。1900年的人口调查说明大约有40万农民，然而这一类目的基础并不明确，它可能包括在墨西哥农村人口中占很大部分的大多数农村中产阶级中。他们与村民的关系非常不同。其中有些人是高利贷者，州或庄园主的

代理人，而另外一些人成了人民领袖。许多人有时从这一类转为另一类。

在莫雷洛斯州的阿内内奎尔科村，村民们于1909年夏末选举了一名较富裕的农民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为他们的代表，试图把附近的奥斯皮塔尔庄园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土地收回来。距离北部数百英里的库奇约普拉多边境小村里，村民们也推选了一位领袖埃塞基耶尔·蒙特斯，帮助他们避免奇瓦瓦州最富裕的庄园主之一穆尼奥斯试图掠夺他们的土地。萨帕塔和蒙特斯，都比大多数其他村民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萨帕塔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由于他拥有土地、马匹和骡子，所以生活比较富裕。埃塞基耶尔、蒙特斯则没有这样的家庭声望。在19世纪80年代他是作为一名无地劳工来到库奇约普拉多的，身无长物只有一把吉他，这是一名村史编纂员的记载。但是蒙特斯的才能显然比唱歌的能力要多。他很有口才，能读能写，了解周围世界的大事，所以不久便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1903年村民们推选他为库奇约普拉多的村民委员会领导人员，与穆尼奥斯斗争。蒙特斯刚开始的时候远比萨帕塔成功，当奥斯皮塔尔庄园还没有把强占的土地交出来时，穆尼奥斯便放弃了他对库奇约普拉多的进攻。

这两位领导人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以完全不同的方法领导他们的村民试图夺回他们的权利。萨帕塔带领阿内内奎尔科的人，最终带领所有莫雷洛斯州的人参加了墨西哥革命。蒙特斯被州政府任命为库奇约普拉多的市长，成为村子里的高利贷者，最终在墨西哥革命爆发时被赶走。

农村中产阶级的兴起，可能正好说明（虽然不是唯一的说明）长期以来使历史学家迷惑不解的事：即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农民对他们土地被普遍侵占时较少抵抗。毋庸置疑，同1876至和1880年间这段时间相比，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民抵抗力量的不断削弱，也与政府力量的日益加强、军队的不断壮大、以及铁路使军队更加机动、和新的警察部队的建立有很大关系。可是，

只靠镇压，不足以说明问题。除了政府在刚出现的中产阶级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以外，大概还有其它两种现象使农民抵抗力量分散。其一便是撤销了农民抵抗力量的主要机构：乡村社区政府。随着农村自治的结束，农民已无法再依靠曾经在过去领导他们抵制地主或政府侵犯的这个传统机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便是传统的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墨西哥的农村生活。在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政府是保护人，为了不让地主的力量过份强大，它经常设法保护农民免遭地主的侵犯，19世纪初，地区考迪略就具有这种作用， 52 他们依靠农民的支持来发动他们与其它地区对手们经常进行的内战。当格雷罗州的一些庄园主企图侵占属于自由村的土地时，农民们请求当地最富裕的庄园主和最有权势的开明考迪略胡安·阿尔瓦雷斯给予纠正。阿尔瓦雷斯同意，而且确实帮助了他们。作为报答，在1855年当他推翻保守的圣安纳政府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了他的军队。不只是阿尔瓦雷斯一人，其他的考迪略，蒙特皮克的保守党人曼努埃尔·洛萨达对农民的求援也很支持。许多传统的保护人都被波菲里奥政府吸收去了，尔后转过来反对他们以前的被保护人。因为失去了他们传统上的保护人，许多农民觉得没有人领导了，所以有被抛弃感。波菲里奥·迪亚斯个人的威望，以及采取有限措施帮助少数村庄，可能也避免了农民的抵抗。有迹象表明，迪亚斯曾多次试图把西班牙殖民地国家的传统衣钵作为印第安村庄的保护者和庇护人。迪亚斯一再写信给州长和地方长官，要求他们在印第安人可以出示地契时就应尊重印第安人的产权，甚至尊重他们的实际产权。因此，在1897年，塔马孙查莱的村民们就向他求援，要求不要侵占他们的土地。迪亚斯把村民们送去仔细查阅了关于他们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档案，然后给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的州长写了一封信：

关于圣弗朗西斯科、马塔拉帕和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无疑他们在很早以前便是总督封赐的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的地契多

少有点残缺不全；但尽管假设他们的地契是不全的或无效的，他们也一直被认为是土地的所有者，目前外来人想购买，因为印第安人无钱支付。其实际结果是，印第安人的那些村落将被想来这些地方定居的外来人侵占或取代，这也许要经过多次的流血场面，因为印第安人根据自己肯定的或错误的认识，狂热地相信自身的权利，所以认为这种流血是他们正义的复仇行动。③

53 然而上述原则与波菲里奥政府其它深刻的宗旨——希望吸引外国资本以及安抚庄园主——发生抵触。在某些事例中，迪亚斯不愿也无法在不干涉的情况下实行这些约束政策。直到他执政的最后几年，迪亚斯拿不出能有效地限制村民丧失土地或自治的措施。

在1910年，迪亚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项措施，如果在几年前实行，可能会有效地限制对农村的土地侵占。他颁布命令说，不应再发生出售公共土地。但那时，一些最好的公共土地早已被判决和售出了，因此这一措施没有多大实际结果。只是到了20世纪，因下面所说的原因，出现了号召农民起来反抗的新保护人，他们得到农民的响应，最终在1910年以后墨西哥爆发的革命风暴中形成了决定性力量。

从雇工制演变到奴隶制或自由买卖

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大庄园里，农工（一般称为雇工）的地位经受的剧烈变化不亚于被剥夺土地的自由村里的农工。随着经济作物的生产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许多庄园主开始减少租佃合同而宁愿去雇用农工在地主的庄园土地上耕作。租佃制并没有取消，但佃农越来越多地被挤去耕种一些薄瘠的土地，在那里他们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对农民更不利的分成合同代替了原有的佃农制。大庄园在这方面的成功，最明显的可以用

③ 引自唐纳德·菲西恩·斯蒂芬斯：《墨西哥波菲里奥时代的农业政策和不稳定》载《美洲》39期（1982年10月），161页。

瓜纳华托州塞拉亚附近的一家大庄园分成制的发展来加以说明。直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个大庄园有两类分成农：自备农具和耕牛的分成农，他们分收成的一半。向大庄园租借农机和牲畜的分成农，他们除把收成一半交给庄园以外，还要支付其余收成中的1/5作为使用机器和牲畜的租金。这样，他们就至多留下40％的收成。到19世纪末期，该大庄园禁止佃农使用大庄园的牧场喂养牲口，从而缩减自备农具和耕牛的分成农的人数。到20世纪初期就只有 54 少数特许留下来的人仍以对半分成的方法耕作他们的土地了。所有其它佃农都成为租用农具和牲畜的分成农。

大庄园主雇用的农工的类型进一步产生了分化。在墨西哥南部和北部边缘地区，居住的人都比中部要少得多，大庄园主经常都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出现了很不同的反应。当在北方，债役制逐渐消失的时候，在墨西哥南部，特别是尤卡坦的龙舌兰种植园，瓦哈卡州生产烟草的巴耶纳雄耐尔，恰帕斯的咖啡种植园，农工们还不得不受同奴隶制类似的债役制的束缚。在他们的债务没有偿清以前，是不准离开庄园的。而大庄园主总是以欺诈的手段，通过在庄园商店里高价勒索，通过强迫农民接受他们通常并不需要的贷款，使他们的债务无法还清。尤卡坦的债役制已经体制化，远比墨西哥其他部分厉害得多。1901年有位目击者报道说：

使仆役受大庄园束缚的法律手段是预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对逃跑的工人可以通过警察强制送回大庄园。这些预付工资通常是在该大庄园出生的年轻人年满18或20岁和结婚时付给。他的主人当时付给他100到150比索，有时给200比索，建立一个家庭，而且双方默契，这类金额以及如果后来发生意外或生病而预付的其它金额是永难偿还的。这就是年轻的尤卡坦人出卖他自由的代价。⑥

---

⑥ 卡尔·凯杰：《土地经营和殖民化》载《西属南美洲》第二卷，第937页，莱比锡1901—1902年版。

在这种体制脆弱的时候，就使用残酷的暴力。

1914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墨西哥的特别代表约翰·林德和驻韦拉克鲁斯的美国舰队司令弗莱彻海军上将一起被邀参观美国人斯隆·埃默里拥有的韦拉克鲁斯蔗糖种植园，这个种植园完全依靠合同工。“他们都是契约劳工”，约翰·林德后来在报告中说：

他们是真正的囚犯，都是被政府遣送来的。弗莱彻海军上将和我看到了20世纪的这种奇怪的场面。人们被分散在玉米田里，8人或10人一组，由一名监工、一名头目、一名来自沿海的印第安人、一名腰带上系着两支手枪的彪形大汉陪同着；而一条长约8或10英尺的黑蛇紧跟着正在挖土的这组人后面；在公路尽头处站着一名手持短筒滑膛枪的人。这些人在清晨被放出来，在监工们的监视下这样干活，而在晚上实际上是被锁在大棚里。弗莱彻海军上将和我对于这种情况居然存在深感惊奇，可是这实际上确实存在。②

许多南方地区与外界隔绝，缺少可与庄园主争夺为数不多的劳工的工业，庄园警察力量和政府机构的加强，这一切都使雇工们要取胜他们的主人变得极其困难。这些镇压措施都是根据分而治之的办法加强起来的：索诺拉州反叛的亚基人、墨西哥中部的游民、中国和朝鲜的苦力都被送到南部地区来，大庄园主们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对抗以及对该地区土著马雅人的不睦，以此防止任何反抗的出现。总的来说，地主在经济以及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生产蒸蒸日上，反抗极少发生，局势的稳定吸引了新的资金和投资。

在墨西哥北部和南部边区，还有墨西哥中部，农村里出现了各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较大的经济刺激和自由，另一方面是镇压和半奴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因素和引起劳动力过剩的其它因素，同时影响了墨西哥中部，尽管显

② 美国参议院文件，对外关系委员会，墨西哥事务调查，第66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报告和听证，参议院文件第285号，第11，232页（2卷集，华盛顿，1920年。）

然并不总是发生在同一地区。侵占农村土地以及人口增长，产生了大量失业劳动力；在许多地区劳动力远比满足大庄园的需求要多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大庄园主便觉得解除奴隶劳动对他们有好处。

1906年托查特拉科大庄园的管理人曼努埃尔·布拉瑟梯曾经写道：

在这个庄园，主要的劳动制度以支付年薪的雇工为基础（这就是说，雇工可以得到一小笔预付款，并在庄园小店里赊购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每年结一次帐）。他们都欠了庄园大笔债，懒惰，酗酒，基本上都是顽劣不驯的工人；经过对这个问题仔细研究之后，我决定放弃他们欠我的3,00比索，两年来我按周付给他们工资，……当他们欠债的时候，他们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不干活，他们在复活节前一周整个星期都狂饮，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二也很难把他们叫去干活。自从按周发工资以来，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便工作，甚至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也工作。[31]

曼努埃尔·布拉瑟蒂认为，这些雇工现在远比过去快乐，他们同其他庄园的欠债雇工说，“你们仍被奴役，我们自由了”。可是，在墨西哥中部其他地区，新兴工业的竞争，铁路的建设，以及大庄园主需要更多的农工耕种他们的经济作物，则产生了相反的结果，造成劳动力短缺。这些真正的劳动力不足，或者有时想像的劳动力不足现象，使许多大庄园主保持债役制，即使这样做有时在经济上不合算，而且可能并无必要。

全国性统治阶级的出现

在迪亚斯时期，社会等级的另一端同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

---

[31] 墨西哥农业社报刊图书馆：《图兰辛戈第二次农业会议》第144—145页，墨西哥1906年版。

化：产生了可以称之为全国性的统治阶级。除了教会总是全国性之外，19世纪初期，墨西哥的经济界上层人物主要是地方或地区性的。这些人中有些人是地主，他们的财富一般集中在一个或两个州；住在墨西哥城的上层人物主要是商人，高利贷者，投资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向政府放债以及在政府金融上作投机。实业家很少，而且谁也不控制主要工业；而多数的矿主和商人都是外国人。

波菲里奥时期，刚出现的全国性统治阶级中，有些人是地区性的地主，但他们都已开始把经营活动扩大到其他经济部门和国内其他地区。波菲里奥统治下墨西哥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大概是特拉萨斯—克里尔财团，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路易斯·特拉萨斯是奇瓦瓦州最著名的大庄园主之一，他的女婿恩里克·克里尔是该州富有的地主和中型金融家。到19世纪末，这两个人已把他们的活动联合起来，并且大大地扩大了他们的业务范围。57 他们拥有奇瓦瓦州的所有食品加工厂，控制了奇瓦瓦州最大的银行。他们还在新开发的科阿韦拉州拉古纳地区开设了一家银行。克里尔是墨西哥城两家最大的银行——伦敦与墨西哥银行和墨西哥国民银行——董事会的董事。这两个人都为许多愿意在墨西哥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充当中介人，而克里尔还是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外国公司之一——威特曼·皮尔逊爵士（后来是考德雷勋爵）拥有的墨西哥鹰牌石油公司董事长。同样，财政部长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他是一位很富有的法国商人的儿子）也在许多州的企业里发展业务。他买下奇瓦瓦州的大片土地，同克里尔和特拉萨斯一样，是许多家在墨西哥做生意的外国和大公司的董事。

墨西哥新统治阶级的财富，除了土地之外，首先便是充当外国公司中介人所起的作用。任何愿意在墨西哥做生意的大公司很快就知道，用这些人充当律师，或者最好是让他们当董事会的董事，是摆脱繁琐程序，越过任何经济或政治障碍，使他们渗入墨西哥经济的最好办法。在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力和有发

言权的部分便是被称为“科学派”的那批人。包括金融家、技术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内的这个集团是由迪亚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也是迪亚斯的岳父）曼努埃尔·罗梅罗·鲁维奥集合起来的，在罗梅罗·鲁维奥于1895年去世后由财政部长利曼图尔领导（见上）。

墨西哥统治阶级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他们的亲欧洲倾向。德国驻墨西哥的公使对此作了很清楚的说明，他写道：

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帮助。墨西哥因此越来越注定要成为所有国家各种资本主义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地区。可是，世界主义者认为（听来也许自相矛盾），经济依附性正是政治独立性的保证；他们设想在墨西哥投资的大量欧洲企业可以构成一种对付美国吞并主义者贪欲的平衡力量，设想这将为墨西哥的完全国际化和中立化铺平道路。在幕后，作为这个世界主义集团的头头，就是财政部长利曼图尔先生。他的盟友有大财主，以及在本国和外国公司中有股份的高级公务员、参议员和众议员。所以，结果，欧洲资本的本国代表在墨西哥进行了投资。[1]

58

上述观点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派”说成是代表欧洲利益，而把墨西哥的其它寡头势力说成是代表美国利益。“科学派”实际上既是欧洲公司也是美国公司的中介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欧洲人而不喜欢美国人，恰恰是由于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他们的观点已超越了地区局限性而从全国情况来考虑。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支持对维护墨西哥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他们为欧洲利益所起的中介作用与他们对美国人所起的作用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欧洲人在墨西哥的势力相对薄弱，他们远比美国人更愿意对他们的墨西哥中介人作出实际的让步。

① 德国外交部文件、德国外交部在波恩的档案，墨西哥，第17卷，方根海姆致布洛的信。1907年1月7日。

例如，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墨西哥最大的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鹰牌石油公司，接受墨西哥的上层集团人物为合伙人（虽然股份比例较小）。在墨西哥最大的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多希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沃特斯·皮尔斯石油公司（后者与标准石油公司有联系），就从来不同墨西哥寡头势力的成员结成这类合伙关系。

墨西哥统治阶级对欧洲人的好感，由于同欧洲另一个集团的联盟而得到加强；在19世纪末以前，这个集团很少与墨西哥人结成合伙经营关系。这就是欧洲裔商人，主要是法国人，有些是德国人；因为白银价格下跌，从欧洲进口货物价格太贵，于是他们便着手在墨西哥兴办工业。他们要求并得到墨西哥上层人物，首先是“科学派”，对他们工厂的大量资本投资。

由于上述多方面活动的结果，新统治阶级的态度在许多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对有些问题，他们可以完全屈从于外国利益；而对另外一些问题，他们却出乎意外地表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这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和“科学派”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使墨西哥上层人物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地区上层人物对“科学派”的主导地位常常表示反对，他们的态度受到另外一个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全国性”的集团——军队——的支持。凑巧，这时领导上层阶级反对“科学派”的贝尔纳多·雷耶斯是一名陆军上将，他是墨西哥最有势力的军人之一。

总的来说，迪亚斯政权在墨西哥上层阶级引起的变化和变革可能已经加剧了他们中间的紧张和冲突。可是，直到19世纪末，迪亚斯政权仍成功地阻止这些集团中任何一个试图依靠武装叛乱来推进自身的利益。他的政权使他们有如此多的机会去积累财富，而武装暴乱使他们的损失太大。

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

波菲里奥的现代化大量增加了墨西哥工人阶级的人数，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以及使他们的觉悟发生了深刻的变

花。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产业工人人数增加。在1895至1900年间，从692,697人增加到803,294人（不包括运输部门和公共部门雇用的工人）。他们主要集中在首都和墨西哥、普埃布拉、哈利斯科、瓜纳华托、韦拉克鲁斯州，以及北部边境各州。

产业工人的生活条件有很大差异。在石油产区，公司提供住房，修建一些学校，甚至设立一些初级的医疗服务。作为回报，他们要求工人绝对服从。石油公司城镇的市长受公司的支配，他们也委派和控制警察。不准建立工会，也不准罢工。纺织厂的条件可能更严厉。在首都的圣待雷莎—孔特雷拉斯纺织厂的工人工资不发现金，发给只能在公司商店里使用的代价券。工人们对商店里出售的所有产品强制征收18%的额外费用都怨声载道。在克雷塔罗州的大力神纺织厂里，工人们提出了类似的抱怨，但首先是抱怨该公司制定的任意处罚制度——任何人在早上5时开工后到厂的，即使迟到一分钟都要被马上解雇。这个工厂对医疗、意外事故或伤残保险都没有作出规定。

虽然如此，直到19世纪末，产业工人的罢工和其它抗议运动仍然很少。这不仅是因为生活水准在逐渐上升，而且也因为，条件尽管很艰苦，都仍比许多工人原来工作的大庄园或许多自耕农丧失土地的村庄的条件要好。除此以外，迪亚斯政权还力图通过鼓励劳工组织来控制产业工人，象工人代表大会和激进主义者大会都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组织散布支持迪亚斯和反对激进思想的宣传。它们出版了两份报纸，鼓吹“一个人对警察的尊重，标志他的文明程度。”[18]1891年工人代表大会不让工人们庆祝五一节。

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试图调解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某些纠纷，并帮助建立互助社会。这种互助社会是工人自助的组织，完全由

---

[18] 威维·沃克《波菲里奥的劳工政治：墨西哥城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波菲里奥·迪亚斯，1876—1902年》见《美洲》第37期第268、272页，1981年1月。

工人出资，在发生意外事故，伤残或死亡时，提供有限的抚恤。

19世纪末期，新兴的墨西哥工人阶级对政府和对雇主的态度逐渐开始变化。形成和影响他们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同外国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多数工人，特别是大工厂，都是外国人开设的，即使是在墨西哥人开办的企业里，也经常聘用外国人担任经理。在墨西哥工人中间，民族主义情绪便逐渐发展起来，当他们在同一企业里与工资比他们多几倍的外国工人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便变得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铁路上尤为严重，那里美国的职工无论在就业还是工资方面来说，都享有优惠地位。

当时墨西哥工人与外国人交往还有另一种方式。这就是通过向美国移居，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劳工，特别是北方各州的，开始跨越边境去美国工矿企业和牧场永久或长期工作。他们经常受到的歧视，在许多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可是，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与初生的阶级意识有联系，因为他们同美国工会，特别是同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开始有了接触。

61

墨西哥产业工人阶级与较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同行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便是熟练工人中享有特权的上层阶层力量较弱。这一方面是由于墨西哥采掘提炼工业和轻工业占优势，这些工业需要熟练工人的人数比其它工业少，此外，也是由于熟练工人中很大数量是外国人。

中产阶级的驯顺

波菲里奥·迪亚斯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他的政权使墨西哥传统上桀骜不驯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中产阶级，包括政府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白领职工、工匠等人都趋于驯顺。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还伴随着有限程度的暴乱和镇压。

1884年迪亚斯重新执政以后，便逐渐压制在他第一次任期内

曾经允许中产阶级保留的各种权利。独立自主的政党几乎都消失了，议会的选举甚少举行，而国会实际上已变得无权。曾经一度是自由知识分子阵地的报刊越来越多地被政府控制。中产阶级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对他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而没有表示对该政权的巨大反抗。波菲里奥政府在经济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州里，迪亚斯以效忠于他的政权的官员取代了他不信任的考迪略，对中产阶级中的许多“在野派”提供了分享地方和地区权力的新机会。

墨西哥中产阶级中许多人是甘心情愿地为波菲里奥的和平和经济发展付出代价的。其它一些人只不过是被这个政权收买过来的。不担任政府公职的那些人从经济的普遍高涨中都得到了好处。然而，反对这个政权的人数逐渐开始增加。与迪亚斯政权的受益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产阶级中很大部分人在19世纪末或是没有捞到好处，或是开始蒙受经济损失。

损失最大的人是被新建铁路取而代之的骡夫和地方上的运输商，还有无法跟新兴的纺织工业竞争的手工业工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中反对这个政权的主要反对派。有些人是独 62
立的报人，诸如墨西哥城的菲洛梅诺·马塔或奇瓦瓦的西尔韦斯特雷·特拉萨斯。即使对这个政权进行温和的批评，也会导致报纸被查封和持异见的编辑坐牢（菲洛梅诺·马塔就受过34次关押）。

教师人数已由1895年的12,748人上升到1910年的21,017人，他们反对这个政权尤其无所顾忌。虽然教师人数的增加证明墨西哥在迪亚斯时代教育事业有些发展，大多数教师认为，政府对人民的教育做得远远太少。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尽管兴建了新学校，但文盲的比例几乎没有减少。高等教育仍旧很不发达，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几乎没有增加。然而波菲里奥时期的教育政策以及许多教师工资待遇很低，并不是他们反对这个政权的唯一原因；许多教师同农村居民保持密切联系，他

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及他们对偏爱外国文化的不满情绪，同样是重要的原因。

虽然知识分子反对独裁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大批商人反对迪亚斯政权却不能这样解释。商人通常并不是社会上的激进阶层。然而波菲里奥统治时期主要家族之一的后裔巴勃罗·克丁内斯·德尔·里奥在评述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起因时，把革命动荡主要归咎于不满的商人。这种不满的根子在于以下事实：在许多城镇里墨西哥商人或者必须同外国人竞争，或者同寡头势力所庇护的、得到外国公司租让、经营公司商店的人竞争。要想开办工厂或做小买卖的小企业家取决于银行的贷款，而银行如果不是属于外国人的，就是属于寡头势力成员的。即使其他条件相等，这些银行首先照顾的是有关系的贷款人。

波菲里奥统治的危机（1900－1910年）

尽管迪亚斯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并引起了对抗，这位墨西哥总统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非常成功地制止反对其政权的[63]强大力量出现。暴动主要局限于这个国家的外围地区，而且只影响印第安人部落或者有限数量的村落。产业工人总的说来是容易管教的，没有发生重大的罢工。就全国范围或者甚至就地区范围来说，没有出现反对派政治团体。因此，不仅墨西哥的上层人物，而且外国的政治家，都对迪亚斯吹捧赞扬。从1900到1910年，在短短的十年里，这种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地区性的反对运动发展起来了，波及成千上万工人的罢工发生了。出现了三个全国性反对派运动，其中两个号召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

波菲里奥统治下的和平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那就是：迪亚斯把墨西哥传统上领导革命和武装运动的集团和阶级——军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争取过来，或者使之处于中立。没有了他们，那些不顾迪亚斯政府镇压机器而爆发的下层阶级的叛乱，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而且决不会超出本地的范围。当迪亚斯

政权证明越来越不能保持上层和中产阶级的一致意见时，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情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下层阶级日益不满，以及美国对这个政权也不满的时候，上述两个阶级内部就发生了重大分裂。当所有这些不同的集团和阶级成员联合起来时，墨西哥革命就爆发了，迪亚斯政权垮台。

这种重大事态的显著转折，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经济衰退，地区和全国性的政治变化，日益加强和愈益明显的政府镇压，对这位年迈总统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民族主义的新高涨，以及墨西哥成为欧洲和美国竞争的中心，都是摧毁波菲里奥统治下的和平和这个政权的各种重大因素。

1900至1910年间流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急剧增加，总计将近30亿美元，相当于波菲里奥统治最初24年的三倍。这种新的投资浪潮导致价格急剧上涨，而且由于墨西哥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采用金本位而更趋严重。结果是墨西哥大部分地区实际工资大大下降。当波菲里奥统治下墨西哥的空前经济危机取代了繁荣的时候，这种趋势便更为突出。1907到1908年，美国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波及墨西哥，导致大量解雇和削减工资。由于成千上万去美国的移民工人回国，墨西哥国内的失业加剧了；当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这些移民工人是首先被解雇的。经济下降由于同时发生农业危机而更为严重。因旱涝灾害造成的歉收损害了墨西哥的粮食生产并导致物价飞涨，这正当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下降的时候。

在这时候，波菲里奥的现代化道路的后果便清楚了。波菲里奥政权既不愿意，也无法对上层阶级中重要部分，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最贫穷阶层给予帮助。对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中型企业也不减免税收。相反，在政府充分同意下，寡头势力设法把经济危机的负担不仅转嫁给社会上的最贫穷阶层，而且还转嫁给中产阶级以及与“科学派”没有密切联系的上层阶级成员。在经济繁荣时期，外国企业家和墨西哥新的民族统治阶级成员都享有重

大的免税权利。当经济活动减少而政府收益开始急剧下降时，“科学派”试图提高墨西哥中产阶级支付的各种税款。与此同时，外国人和寡头势力控制的银行都不仅减少他们提供的信贷总额，而且提高放款利率；它们还开始加紧收回未偿债务。

政府并不设法采取任何办法来缓解信贷紧缩。尽管迪亚斯政府降低了某些关税以促使基本食品的进口，可是别的什么也没有做。结果是使许多墨西哥中产阶级企业家破产或至少在经济上遭受很大困难，并使全国人民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一政策部分由于波菲里奥寡头势力的自由放任思想，但即使迪亚斯政府愿意采取更多措施来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它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政府各级收入，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

65

和市政府，总计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10]这次经济危机虽然严重，但不是1910—1920年墨西哥社会大动荡发生的直接原因。最终造成墨西哥革命的国内矛盾远比1907年经济危机造成的混乱局面要深刻和复杂得多，虽然这个危机加剧了墨西哥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的各种矛盾。

使迪亚斯政权在执政的最后几年变得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反对派。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从而引起官方的镇压，于是出现了具有强烈的无政府工联主义倾向的全国性反对派政党。该工人阶级反对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新一代的工人已经出现，他们不是过去的农民，他们不把当前的状况与大庄园或农村更坏的条件相比。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时地跑到北部边境去美国工作。在那里他们既受到较高生活水平和较多工会权利的影响，也受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无政府工联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觉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与外国投资人和经济对立，而且也

[10] 约翰·科茨沃思：《1800—1900年墨西哥政府和对外经济部门》（未发表的论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根据莱奥波尔多·索利斯：《1910年革命以来的墨西哥经济变化》，载《人口统计和经济》1969年1月3日第4页。

与外国工人对立。

引起工人不满最直接的原因是1900至1910年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直到1907年，实际工资也由于通货膨胀而下降。1907至1910年间，情况大大恶化，墨西哥北部尤为严重。在奇瓦瓦州，德国领事于1909年估计，基本食品和产品的价格上涨80%，而名义工资却下降20%。结果是在职的人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在经济衰退时期被解雇的其它许许多多人，他们的情况显然更糟。可是，有意思的是，1900至1910年间发生的墨西哥工人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不是发生在经济下降时期，而是发生在在此以前的繁荣时期。那些年里受到全国注目的三次重大劳工纠纷——1906年6月韦拉克鲁斯州里奥布兰科纺织厂的罢工；1907 66 年1月索诺拉州卡纳内阿矿工的罢工，以及1908年奇瓦瓦州的铁路工人运动——只有里奥布兰科的罢工才纯粹是以经济问题为主。即使在那里，劳动条件至少也是个重要问题。在其它两次罢工中，与工人要求有内在联系的是民族主义。卡纳内阿的墨西哥矿工对边境那边过来的美国矿工跟他们做完全一样的工作而拿比他们多一倍的工资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在奇瓦瓦州墨西哥铁路员工发动的一次罢工的核心问题也是同样的不满，他们抱怨墨西哥铁路系统所有最好的职位都留给美国的工人和职员。在这次铁路罢工中达成了一项有限的妥协，但其它两次罢工则受到镇压，其野蛮残酷的程度超过迪亚斯政权早期发生的任何事件。据说迪亚斯曾惊叹说："谢天谢地我还能杀人"，并下令把前来向墨西哥总统呼吁要他充当他们与公司争议的仲裁人的几十名里奥布兰科纺织工人都无情地处死。就在这时，在卡纳内阿发生了另一场大屠杀，不过规模较小；这次不满之火是由于几百名美国武装人员越境前来镇压矿工运动而引起来的。

这种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镇压，在这个政权的前几年里只是一些例外情况而不是惯例。迪亚斯宁愿搞交易而不采用镇压，当他确实使用镇压手段的时候，也设法尽可能地秘而不宣。大屠杀

空前未有的规模及其残酷性，以及存在一个面向劳工的全国性反对党，使里奥布兰科和卡纳内阿被千千万万墨西哥人家喻户晓。从而引起许许多多人同情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出现的这第一个也是最激进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派运动。这就是墨西哥自由党（PLM），它于20世纪初由各省的若干知识分子组成。该党号召回复到华雷斯领导下的自由运动激进派原则上来。政府日益加强的镇压使它迅速向左转，不久该党便具有了无政府工联主义性质并发表声明。该党最杰出的领导人是两兄弟：恩里克·弗洛雷斯·马贡和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在圣路易流亡时起，他们就67 领导了这个党。他们发行的报纸《复兴》报在墨西哥禁止出版，因此不得不从美国非法地偷偷带进来。不过，每期仍在墨西哥销售达2.5万份以上，对鼓动这个国家举行大罢工起了作用。

墨西哥自由党不仅在产业工人中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一部分墨西哥中产阶级中也有影响。对他们来说，同迪亚斯政府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迪亚斯政权是一个屈从于外国、首先是屈从于美国利益的、闭关自守的专制社会。许多年轻人觉得美国利益使墨西哥的完整和独立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升迁机会远比他们父辈们要少得多。老一代人仍旧占着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位、而迪亚斯丝毫也没有表示他打算采取任何方式来予以更替。有位深感忧虑的法国部长于1900年给他的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说：

尽管这个国家现在非常平静，但实际上充满不满情绪……这种不满的根本原因是，年轻人组成的一个党在伪装信奉原则的情况下，暗中追求权力，并要参与分享特权和额外的好处。律师、法官、工程师、作家和记者是这个党的主要成员。它借口代表整个平民社会说话，宣称当前的军事政权应该由议会制和自由讨论的政权所取代。⑫

---

⑫ 法国外交部档案（巴黎）：墨西哥，1900年12月8日。

进入墨西哥的大量外国企业对于不可能进入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的墨西哥知识青年没有提供出路，没有提供新的机会。外国人宁愿从他们自己企业中挑选中级和高级经理。他们的墨西哥高级雇员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家族成员或者就是他们墨西哥合伙人的客户，一般都是寡头集团成员。

墨西哥中产阶级知识青年受到的挫折不仅仅是来之于经济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不满波菲里奥上层人物盲目接受外国的价值观和外国文化。“金元外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移居墨西哥北部，以及该地区日益增加的美国投资，使许多人重新担心美国进行一次新的吞并。这种恐惧心理由于美国报纸一再扬言要吞并墨西哥而加剧了。

68

墨西哥自由党在鼓动或加强大规模反对迪亚斯政权方面，是成功的。它号召一场全国性的革命，可是，没有受到重视。地方上的一连串起义，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墨西哥北部，这些起义都由回国的流亡分子领导，他们带来了武器和宣传品。这些起义之失败，不只是因为经常配合得不好，而是因为领导起义的团体里常常混进了政府的暗探。从怀有不满的大庄园主到武装农民，各种不同类型的反对派都要迫使波菲里奥·迪亚斯下台。这些反对派的出现既同全国范围，也同索诺拉、科阿韦拉和奇瓦瓦等北部边境各州以及中部莫雷洛斯州地区范围出现的政治、社会变革有密切联系。

19世纪末，墨西哥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化。在迪亚斯政权的最后10年，他的基本政策之一——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受到极大的削弱。这种策略在其最初几年里大大地加强了他的统治。一直到19世纪末，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范围内，迪亚斯已建立了一套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复杂体制，从而使任何一个集团或派系都无法得到太大的权力。在全国范围方面，迪亚斯同意并不时地鼓励同“科学派”对峙的派别发展起来。他们最有影响的对手组成了北方地主和商人，以及军人的松散联盟，它的领导人贝尔纳多·雷

耶斯，是迪亚斯手下最有权力的将军之一，多年来他一直是军事指挥官，后来又担任新莱昂州州长，从1900至1904年担任国防部长。在地方范围来说，通常握有政治和经济实权的传统考迪略都被对波非利奥·迪亚斯的提携深表感激的一些人所取代。他们中有些人是从国内其他地方派来的官员，没有当地的根基；其它一些人是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中权力较少的人。他们经常不得不与他们的前任竞争，因此在上层统治集团派系和集团之间常常发生磨擦。迪亚斯是最高仲裁者，他在他们之间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19世纪末，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迪亚斯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没办法以上任初期的那种势头来推行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策略了。

就全国范围来说，"科学派"向迪亚斯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给他们更大的权力，但首先他们要求这位现年70多岁高龄的墨西哥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他去世的话，他们集团中的某个人将继承他的职位。这个集团日益增大的经济力量，以及通过增加墨西哥的收入和提高国外信用地位而在管理墨西哥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肯定对于影响迪亚斯起到了重大作用。至少以下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在墨西哥投资越来越多的外国利益要求墨西哥总统作出某种保证：如果他一旦去世，他推行的政策要继续下去。在他们看来，最好的保证就是迪亚斯能向他们表明，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科学派"将继续执政。1903年，迪亚斯觉得作出决定性的表态使"科学派"和外国投资人及金融家消除疑虑感到放心的时候已经到来；他同意拉蒙·科拉尔，这位来自西北部索诺拉州的"科学派"成员，充当他的副总统，从而表明如果他在任期内去世的话，科拉尔将继承他的职位。1904年科拉尔被选为副总统。对"科学派"来说，迪亚斯撤除他们最强大的敌手贝尔纳多·雷耶斯的国防部长职务，是他们的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科学派"便开始削弱反对他们的上层集团成员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索诺拉州，与科拉尔有密切联系的州政府就粗暴地对待许多反对他们的地主，其中包括该州最富裕的大庄园主何塞·马里亚·迈

托雷纳。在科阿韦拉州，迪亚斯迫使许多大庄园主支持的米格尔·卡德纳斯州长辞职，并且不让另一名得到州里大多数上层阶级支持的地主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当选。迪亚斯反对东北部上层集团的重要部分，而后者对迪亚斯也日益憎恨，这可能还结合着他们同外国利益越来越多的冲突。最著名的、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这种冲突，与马德罗家族有关。该家族不是科阿韦拉州也是拉古纳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它从来不支持雷耶斯，尽管该家族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多年来一直试图成立一个对迪亚斯政府的政治反对派。与托雷斯和特拉萨斯家族不同的是，马德罗家族从来没有融洽地同美国公司合作过，而且由于他们未加掩饰的对抗手段，在美国公司中的名声很坏。20世纪初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组织并领导了拉古纳地区的大庄园主联盟，反对英裔美国人开设的特拉瓦利洛公司试图垄断依靠灌溉的地区的供水权。当马德罗家族培植橡胶替代品银胶菊的时候，他们同大陆橡胶公司发生矛盾。发生的另一起冲突是因为1910年前马德罗家族在墨西哥北部拥有唯一的、不依靠美国冶炼公司的炼焦炉。

70

在奇瓦瓦州，"科学派"的攻势并不是针对人数不多持不同意见的大庄园主，而是针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的。正是在这里，"科学派"通过为他们最强大的伙伴之一路易斯·特拉萨斯及其家族取得对政府的全面控制而赢得一次最大的成功。1903年他们使奇瓦瓦州的考迪略和迪亚斯之间达成和解；在1871年到1876年迪亚斯造反时，他们在斗争中是互相对立的。由于迪亚斯的支持，特拉萨斯于1903年再次成为他故乡的州长。奇瓦瓦州现在变成了某个家族经营的省份。由路易斯·特拉萨斯，他的女婿恩里克·克里尔，儿子阿尔贝托轮流统治，其间再加上他们所指定的候选人。他们的权力之大远远超过迪亚斯时代以前老一辈统治者所梦寐以求的权力。任何人要想得到一个政府职位，不管是地方一级还是州一级，都必须通过新的政权掮客。任何人打官司

都必须请求他们所任命的法官；任何人需要信贷，必须去找他们所控制的银行；任何人想在外国公司谋职，大概还必须依靠他们去居间说情。任何人被测量队或大庄园主夺去土地的人都可以归咎于他们。地方上新的寡头势力不仅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还摆脱了他们前任原有的约束和义务。它不遵守地方自治，也不必对阿帕切人或联邦政府的袭击提供保护。结果是各种势力的两极化发展日益严重，中产阶级的苦难不断加深。

由于特拉萨斯重新执政，州里的自由农，尤其是以前的军事殖民地居民受害更大。经过奇瓦瓦州西部山区修建的一条新铁路线：堪萨斯太平洋铁路，那里座落着很大一部分前军事殖民地。地价相应上涨。由于政府已不再需要这些殖民地居民的战斗力，恩里克·克里尔便大举进攻剥夺他们的土地。州里起草了一项新 71 的土地法，规定可以把市属土地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结果军事殖民地的最后一批土地开始被侵占了。该州的军事殖民地纳米基帕最年长和最有名的居民写信给波菲里奥·迪亚斯说："如果你不保护我们，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土地，为了这些土地，我们的祖辈曾经跟野蛮人进行了斗争"。⑬该州几十个村镇，诸如圣安德烈斯、库奇约普拉多和博科伊纳的村民们向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反对侵占他们的土地，都无济于事。过去对土地的侵占已经使农民们贫穷不堪，而克里尔的新土地法更对农民的生存带来了威胁。

"科学派"的进攻，以及1907年的经济危机在索诺拉、奇瓦瓦和科阿韦拉北部三角地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独特形势。所谓这个地区的独特形势，指的是从大庄园主和中产阶级到产业工人，到被剥夺土地的前军事殖民地居民，所有社会各阶级的主要部分都联合起来反对迪亚斯政权。

中产阶级感到不满的是，它被排除于政权之外，似乎只是从

---

⑬ 纳米基帕居民给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的一封信，1908年7月20日，奇瓦瓦州农业部文件第178页。

墨西哥的经济繁荣中得些残羹；而外国人在墨西哥大部分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都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北方发展得那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受这么大的损失。1907年的经济危机给墨西哥北部的打击远比其它地方厉害，北方的中产阶级不仅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而且由于迪亚斯把政治上控制北方各州的权力交给了寡头势力并结束了两党制，北方的中产阶级因而也受到较大的政治损失。

这一危机对北方产业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之大，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是在墨西哥其它地区没有过的。墨西哥北部的墨西哥城可能例外，因为那里在革命前夕还有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墨西哥许多地方还可以发现大庄园主对迪亚斯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不满（尤其是“科学派”试图把1907年经济危机的负担转嫁给社会其它阶层）。他们多数人都非常担心农民反对迪亚斯政权，因为对农民的剥夺使他们许多人也得到好处。可是，墨西哥北部，特别是索诺拉和科阿韦拉的一些不满的大庄园主，并不如此担 72 心。在科阿韦拉州，大多数不满的大庄园居住在拉古纳地区。拉古纳在大庄园主开垦以前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他们并不面临被他们剥夺土地的广大农民的对抗。由于他们的庄园的雇工享有墨西哥农村最高的工资和最大的自由，因此这些地主和雇工之间已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家长式统治关系。大庄园主想通过给农工们提供学校和医疗来加强这种关系。有些开明的地主象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甚至还给不住在庄园的雇工们提供这方面的许多服务，以此赢得他们的忠诚。在索诺拉州，何塞·马里亚·迈托雷纳保护了他的亚基族农工们免遭联邦政府当局的流放，农工们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大恩人。曾经是“科学派”进攻的主要目标的北方三州，组成了1907和1910年间墨西哥发生的反对派运动最强大的基本队伍。

在莫雷洛斯州，“科学派”的进攻有同样深刻的影响，但它主要波及社会上一个阶级：农民。州长曼努埃尔·阿拉尔孔是个传

统的考迪略，跟种植园主相处不坏，但这个州的许多老百姓仍然把他看作是有主见的人，在经济危机期间至少还能跟他打交道，而且他不是当地寡头势力中的人，他在1908年去世了。死后，由巴勃罗·埃斯坎东接任，他属于这个州的地主寡头势力，曾与“科学派”有密切联系。因此奇瓦瓦州的权力便完全落入当地寡头势力之手。对该州的自由村来说，埃斯坎东的统治完全是一场灾难。随着对食糖的需求增加，蔗糖种植园主开始把分布在莫雷洛斯州的一百来个自由村里的其余土地都侵占过来。农民们感到已被墨西哥政府完全抛弃了。长期以来他们许多人都认为中央政府是某种中立的的政权，可以向它求助。可是现在，墨西哥城仁政的神话——只要它知道实情，就会对农民办好事——已完全破灭，它任命了一名种植园主充当州长。因此农民们造反情绪不断增长。跟索诺拉、奇瓦瓦和科阿韦拉三个北方州一样，莫雷洛斯后来成为1910年革命的主要中心之一。

当1910年新的一届总统选举来临时，一场新的接班斗争发生了。墨西哥上层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分子再次试图限制“科学派”的影响，规劝迪亚斯挑选一名非科学派充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候选人是贝尔纳多·雷耶斯，他们的政治组织称为民主党。由于迪亚斯于1908年一次策略上的严重失误，该党的影响和声势大大提高了。迪亚斯在某次接见美国新闻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时，似乎邀请候选人在投票时亲自到场。在这次会见时，这位墨西哥独裁者宣布，他觉得墨西哥争取民主现已成熟，所以他在下届总统选举时不会再当候选人，还说他欢迎成立反对派政治组织。现在还不清楚，当时迪亚斯为什么要作出他并不真心实意的口头承诺，而后果却是非常明确的。

73

反对这个政权的人认为，迪亚斯已经公开允许反对党存在，如果他们加入这样的组织，不会遭到报复。政府当局也都变得方向混乱，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准许这类运动享有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当成千成万的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开始集

合在一起支持雷耶斯的时候，迪亚斯公开跟雷耶斯说，他决不会同意雷耶斯充当副总统候选人，并以军事任务派他去欧洲。面对要么拒绝要么接受总统的决定这个选择，雷耶斯表示同意退出总统竞选。

由于雷耶斯的出走，他的上层阶级支持者面临非常困难的决策。他们本来想借助于类似30多年以前把迪亚斯扶上台的那种联盟（上层和中产阶级不满分子同军队内部的潜在叛逆者结成的联盟）那样，向迪亚斯施加压力，或者甚至把他赶下台。而雷耶斯就是同军队内部存在的这类不满分子的联系人。一旦他服从了迪亚斯，这种联系就被切断，军队这步棋就走不了了。当真想向迪亚斯施加压力或推翻他，就必须立足于完全不同的战略：同社会上下层阶级，包括农民，结成联盟。对雷耶斯的许多支持者来说，特别是在墨西哥中部，这种战略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农民被发动起来，就会打倒他们，并且成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再参与任何反对迪亚斯的积极活动。

墨西哥北部，尤其是索诺拉和科阿韦拉州抱有不满情绪的大庄园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农民没有这样的恐惧心理。在那里，雷耶斯的以往支持者支持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党：反对连选连任党。该党由弗朗西斯科·马·马德罗领导，他是一名来自科阿韦拉州的富裕的大庄园主。马德罗于1908年出版了一本谈论总统继承人的书，便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书中，他说墨西哥的基本问题的特点是专制主义和一人无限权力；只有采用议会制民主，自由选举制度，以及报刊和法庭独立，才能使墨西哥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这本书写得非常谨慎。虽然严厉地批评了迪亚斯体制，但赞扬了这位独裁者的个人品质。不过结论是反对向外国人过份让步，并指责迪亚斯对美国太软弱。书中很少提到社会问题。

革命后的有些历史学家以及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认为马德罗是一位天真的空想家，把迪亚斯答应在墨西哥实行民主选举

看得太认真了。马德罗对他本人多少不是这样看的。在1911年的某次会见中，他说：

“在政治竞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大多数居民相信，公众投票作为反对迪亚斯将军的一种斗争手段是绝对有效的。然而，我明白只有军队才能推翻迪亚斯将军。但是为了进行革命。民主的竞选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制造舆论，并使武装起义合理合法。我们进行民主选举运动，仿佛我们无意诉诸武装起义。我们使用一切合法手段，而当大家明白了迪亚斯将军不会尊重全国的民意时……我们便举行武装起义……（迪亚斯）尊重我，因为自从我不是一名军人后，他决不相信我能拿起武器反对他。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防卫办法而不去求助于伪装，使他在头脑里加强这种看法。”⑭

当马德里组织他的政党时，迪亚斯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而且，他觉得这样可以分散和削弱他真正害怕的另一个反对派组织：雷耶斯的民主党的力量。结果，在1908年和1909年的一部分时间里，马德罗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是比较自由的。这位好心肠的大庄园主成功地完成了墨西哥自由党显然没有做到的事。他把墨西哥农民的重要阶层都发动和动员起来，虽然他的土地纲领十分噜嗦，根本不号召自由党人主张的那种土地改革。当幻想破灭的雷耶斯的支持者参加了这个党后，反对连选连任党便成为墨西哥拥有社会各阶级成员——从富裕的大庄园主到地位低下的大庄园雇工——在内的唯一组织了。这个未曾意料到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联盟由一位没有军事经验的人领导，在1910—1911年却成功地推翻了迪亚斯的统治。

虽然没有绝对的证据，但有迹象表明，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有些美国公司（首先是石油公司）就积极给予支持，塔夫脱政府

⑭ 1911年马德罗接见赫斯特报系采访时的部分谈话。引自杰里·W·克努德森《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何时决定革命？》载《美洲》30期第532—534页，1974年4月。

对马德罗严重干扰迪亚斯政府的各种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宽容”。虽然美国同1910—1911年革命者的联系仍然是争论颇多的问题，但毋庸置疑，在1900年和1910年间，迪亚斯政府同美国政府和某些美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墨西哥政府和“科学派”都对美—西战争后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日益增加的干涉主义严重不满。他们非常担心的是，大约在19世纪末，更大和更有势力的美国公司已在取代波菲里奥时代初期美国投资者中占主要地位的中型美国公司。早在1902年，奥地利驻墨西哥公使就写报告说：“墨西哥政府目前已经正式采取反对美国资本托拉斯的立场，”“在半官方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指出，越来越大的危险是出现在墨西哥生产商面前的托拉斯的频繁活动。墨西哥生产商很快就将成为北美金融市场的奴隶”。[15]迪亚斯对首先由墨西哥中产阶级提出的加强民族主义政策的呼吁，拒绝予以考虑，但是他通过鼓励加强欧洲人在墨西哥的势力，确实想以此抵销美国的影响。

墨西哥总统和“科学派”的这些努力，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家之一威特曼·皮尔逊爵士（考德雷子爵），多年来一直积极从事墨西哥的公共工程项目，在20世纪初期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石油生产者，向以前一直在墨西哥称霸的美国石油商提出了挑战。英国政府对墨西哥石油表示浓厚的兴趣，因为墨西哥石油对于英国海军用油代替煤作燃料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就这方面来说，墨西哥政府对英国石油利益给予特殊帮助，给予他们对政府土地的租借权，签订专营合同以供应国营铁路（在这过程中，取消了前届政府同美国拥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签订的另一项石油供应合同）。 76

这是墨西哥政府采取的最强烈的反美措施，但这并不是唯一

---

[15] 维也纳国家档案馆，政治档案《1902年墨西哥报告》；奥尔斯塔尔致戈卢乔夫斯基的信，1902年11月24日。

的措施。美国政府对迪亚斯支持尼加拉瓜总统塞拉亚*极为不满，因为美国人正想把他推翻；对墨西哥废除以前租让给美国海军的下加利福尼亚加煤站合同，也深为不满。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墨西哥把这个合同废除，是想竭力讨好日本。总的来说，迪亚斯政府的反美姿态，在范围上来说仍很有限，而且迪亚斯尽量不使它公开化。因此，1910年迪亚斯政府的处境很矛盾。虽然墨西哥总统的政策当时使美国一些公司和华盛顿当局越来越感到不满，墨西哥的反对派仍认为他是美国的仆从。从结果来说，这种矛盾导致他彻底垮台。

波菲里奥时代的结束

1910年9月16日迪亚斯政权似乎已达到了它权力的顶点。在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特使参加了纪念墨西哥国庆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这天，国父米格尔·伊达尔戈在多洛雷斯小村庄里宣告了墨西哥独立。迪亚斯好象已经解决了前两年干扰他的许多困难。不仅仅是雷耶斯已经流放在外，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至少在波菲里奥当局看来，也已经不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了；1910年6月5日在大选前夕不久，他已经因被指控叛乱而遭逮捕。6月21日在反对连选连任党大规模指责欺诈舞弊声中，举行了大选。政府宣布：迪亚斯和科拉尔再次当选，反对派候选人没有一个获得足够的选票当选为新国会的议员。在尤卡坦半岛巴亚多利德和韦拉克鲁斯州，一些零星的地方性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因此政府认为当时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觉得在7月22日同意保释马德罗很有把握。德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卡尔·邦茨于1910年12月4日写给他政府的信中曾乐观地表示“我认为全国的革命正如公众舆论和报纸上所说的，已经不可能发生”。[16]

77

10月6日马德罗从他被保释等待审讯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城逃

* 指何塞·桑托斯·塞拉亚，尼加拉瓜总统（1893—1909）——译者

[16] 1910年12月4日邦茨给贝特曼—赫尔维格的信，见《墨西哥—1》第25卷，洛恩。

脱。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他发表了他的纲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在指控迪亚斯进行贿选后，马德罗出任了临时总统，并呼吁人民于1910年11月20日举行起义。虽然这个计划纯粹是政治性的，马德罗在计划中还是提到了答应把从乡村社区不公正地侵占的土地还给其合法的主人。

革命的总统所希望的马德罗故乡科阿韦拉州的起义并没有实现。普埃布拉州反对连选连任党领袖阿基莱斯·塞尔丹试图发动的起义被波菲里奥当局打垮了。但是令12月1日就职的迪亚斯以及马德罗都感到吃惊的是，奇瓦瓦州西部山区的一次人民起义却爆发了。由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革命派很快便控制了这个州的大部分地区。

1911年2月14日马德罗从美国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担任奇瓦瓦州革命派的领导。到2月和3月，各地起义开始燃遍整个墨西哥。当赫苏斯·阿古斯丁·卡斯特罗、奥雷斯特斯·佩雷拉和卡利斯托·孔特雷拉斯在科阿韦拉州的拉古纳地区举行起义时，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率领了莫雷洛斯州的农民揭竿起义。国内其它地区也发生了较小规模的起义，到1911年4月墨西哥大部分农村已都被革命派控制。5月起义军占领了第一个大城市，边境城镇华雷斯市。3月当美国总统塔夫脱沿美墨边境调动2万名士兵，并把美国军舰开进墨西哥港口后，迪亚斯政府的威信已受到重大打击。虽然美国政府正式声称调动军队是为了使中立条约得到严格实施，但这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行动。这在墨西哥引起恐惧，认为美国准备进行干涉，从而加强对迪亚斯施加压力（甚至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也对他这样做），要他退位，并同革命派达成妥协。1911年5月21日马德罗和联邦政府之间签订了华雷斯城条约，规定5月底迪亚斯和科拉尔退位，由没有参加这次革命的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替代，担任临时总统；临时政府应于1911年10月举行大选；与此同时，革命军队解散。马德罗的大部分支持者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因为他们觉得即将到手的胜利已经

78

从他们手里夺走了。但马德罗仍然接受了各项条款，并于随后几个月里同临时政府合作力图实行这个条约，首先是尽其所能帮助解散为他赢得胜利的革命军队。在有所犹豫之后，他甚至支持临时政府强迫埃米利奥·萨帕塔领导的莫雷洛斯州革命派放下武器。墨西哥许多地方的革命派的确平静地交出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深信一旦马德罗当选，他们许多人曾经为之奋斗的社会变革最终一定会实现。1911年10月15日，马德罗以压倒多数当选总统。这一次大概是墨西哥有史以来最诚实的选举。1911年11月6日他宣誓就职，他坚决相信墨西哥的革命已经结束，革命的目标，正如他看到的，正在实现。

第 2 章

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

自由主义社会学有三种理论假设长期支配着墨西哥革命的历史研究。这就是：①群众行动是一致同意的、有意识的和再分配性质的；②集体暴力测定结构变革；③民族主义可以把有限分工中的利益汇集起来。通俗地说，就是①“人民”运动“人民”搞，“人民”运动为“人民”；②斗争中流血越多，斗争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就越深刻；③熟悉产生团结。研究这个问题的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也特别为墨西哥提出了两种重大的假设。第一，1910年墨西哥最重大的事件是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第二，这种冲突快要爆发。在上述前提下，一些重要的研究和分析构想出关于被压迫者揭竿而起这样一个支持革命的故事，其内容是：革命是从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接班人这一政治问题开始的，但各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快便卷入一场超越政治的斗争，要求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整个国家物质上的重大破坏，商业的瘫痪，以及完全不怕美国，对于人民斗争的胜利是必要的，斗争确实胜利了。经过这场斗争，“人民”中的优秀者成为革命领袖。经济和社会状况根据革命的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在正式的革命体制的框架内形成了新的社会。1917年制订了革命的宪法，斗争宣告结束。新的革命政府，正如它的发言人所说的，具有充分的合法地位和力量。

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判断普遍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把从1910年到1917年的运

动看成是一场大规模的，非常激烈紧张的民族主义起义。在这场起义中“人民”摧毁了旧政权，农民收回了土地，工人组织了工会，而革命政府开始为国家福利开发全国的资源，开创了墨西哥历史的新时期。有些人认为，墨西哥革命似乎是“20世纪的第一个社会革命”，不管怎么说，它可同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相比。

这种说法有不少问题。从一开始，批评者坚持认为，“人民”被骗人的领袖们利用来进行一场错误的事业，并把他们拖进了更坏的处境。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它是反革命宣传。更讨厌的一种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徒的叛乱中成千成万“人民”对革命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专业的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1940年后普遍的感觉认为，墨西哥正在更多地沿着旧政权而不是所设想的革命路线发展。虽然革命体制形式上照样完整无缺，革命的言辞继续滔滔不绝，而农民和工人们得到的实惠比以前却少了，同时，企业界，首先是美国公司，成倍地增长和发展，并使它们的利润代表国家福祉。如果说墨西哥在1910年后的十年里已经发生了一次社会革命，那么30年后的新型模式里又重新出现老的做法，该怎样解释呢？承认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作了各种不同的答复：革命已经消失，已被出卖，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是哪一种都说服不了人。1968年墨西哥政府血腥地镇压了争取公民权利的一场人民运动。根据对墨西哥革命的标准解释，人民的愿望应该已经溶合于政府体制之中，那么对这次镇压进行历史性说明是不可能的。对一些年轻的学者来说，最最吸引人的解释，正如批评者常常说的，应该是，这场革命对“人民”是一种骗局。

对这次革命学术上的争论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大增加了。最有见地的一些新的研究文章都包含着对过去的设想抱有无成见的不信任态度，使用过去的批评意见也很老练谨慎。“人民”也许会自行行动或者被别人鼓动而自相残杀，所以，自动的行运还是受操纵的行动，其间的差别对最终结果没有什么不同。

流血斗争也许可以大大地改变一个社会，但不一定是最初设想的状况，或者也许只在表面上发生了变化。而熟悉了情况之后常常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比过去更加客观的概念指导下，新的研究和分析大大地修改了旧的说法，有理由地作出了新的解释。1910年开始的斗争特征，与其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内的一些失意分子对该两个阶级内的得意分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被卷进去了，但是是断断续续的，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尽相同，而且主要受中产阶级指挥，说是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内战。有些地方破坏非常厉害，别的地方缺少东西，破坏不严重，或者是暂时性的或根本没有受到破坏。总的说来，商业进行了调整并继续应市，长远来说商业还有所增长。在墨西哥革命过程中，外国的活动始终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对抗，而且还有情况复杂的欧一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为复杂。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同的革命派系不仅对旧的政权和外国企业作斗争，而且更多地是相互间作斗争，大至阶级问题，小至妒忌猜疑；胜利的一派设法控制农民运动和工会，使它所选中的美国和本国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和社会情况很少因政策而变化，而主要根据国际市场波动、战争意外、和一时飞黄腾达的地方领导人的派系和个人利益而变化，所以各级的关系比官方机构所说的情况要复杂和不稳定得多。1917年组成的政府没有广泛和深人的群众基础，在美国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直到支持该政府的派系发生分裂，产生了一个新派，差堪维持它的地位。因此出现过几次新的时期，从1910到1920年的十年似乎是最可信的，那是宗派造反取得成功的最后时期。

有几个旧论点并未引起争论。在革命期间，墨西哥社会的确经历了特大的危机和重大的变化。农民运动和工会成为重要的力

量。而宪法反映了对平均主义和友爱公正的要求给予新的尊重。但是从修改的条文中现在可以看清，1910到1920年间墨西哥基本上是延续下来的。危机并没有严重到足以破坏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的统治优势。重大的问题是政府问题。最重要的发展是新资产阶级力量凑合起来的组织能同美国打交道，处理同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并建立一个新政权使之运转。其实，经济和社会改革同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完成的改革没有多大区别。就所有的暴动来说，墨西哥革命的主要历史意义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坚固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改革，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经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斗争还能这样稳定，以及1940年后这个国家繁荣而不调和的增长。

这个主题因此不再是社会革命问题，而是政治管理问题了。这里要说明的首先是政治历史。关于社会运动谈得很少，因为虽然社会运动的出现是重要的，而影响更大的是运动的失败或屈从。关于建立这个新国家的政治问题谈得很多，因为不管把命运和美德谈得如何天花乱坠，只有说明细节才能揭示事物结果的原因。

1910年10月至1913年2月

1910年在墨西哥游荡的幽灵是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的政治必须很快改变，因为它的中央政治体制、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已届八十垂暮之年。而且这种变化将会是深入的，因为经过30年的资本主义大力发展和严厉的个人独裁之后，政治意味着交易；在政客与商人行贿受贿、相互勾结的混乱环境中，改革意味着大量肮脏交易的再谈判。

这个国家几种重要冲突中，最最紧迫的两种冲突都与商业有关。一是20家左右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同墨西哥大银行和大公司之间，为了债券、租让、和本国市场发生的争执。这由金融界和政治界中最高层和最严密的圈子处理，所以仍然保持得较有秩序。另外一种是大公司和许许多多

墨西哥小企业之间在寻求赢利机会上发生的冲突。这些斗争则几乎经常引起麻烦，因为它们损害了已有的交易。如果大小企业家从事一项新业务，他们会冒推翻本地有势力统治集团和权力机关的风险。反过来，颠复也可以开辟交易的新领域。自从1907年危机以来，政治和商业上的挫折使一些企业家感到如此恼火，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来推动他们事业的发展。在1910年夏季大选骗局和进行镇压之后，许多“反对连选连任派分子”都以革命为己任。

波菲里奥是很难推翻的政权。它统治的国家有1500万人口，它显著的实力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国际上价值4.3亿比索的贷款，国库拥有1千万比索的节余，有3万人的联邦军队，另外至少还有3万人的联邦辅助部队、非正规军队和国民警卫队、1、2万英里输送部队的铁路、以及2500名乡村骑警队。但对新的反叛分子来说，整个政权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认为，一旦把年迈的独裁者及其亲密助手除掉，就可以充分按他们的意图开展国家的事务。

1910年10月这次革命的计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准备就绪。在那里从墨西哥逃出来的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同“反对连选连任派”的领导人以及他重要和富裕的家族中一些最有胆略的成员进行了磋商。11月初他发表了他的纲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在谴责了最近的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司法选举是欺骗舞弊后，他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声称于11月20日举行全国起义，并答应“民主”选举产生新政府。是否真是实行“民主”，新政府的前景引起了北方各州财政上拮据、政治上愤慨的地主们的兴趣，同时也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小农场主和商人。圣路易斯计划中的一项次要条款答应要重新审议农村对失去土地提出的意见，引起了农民们的注意，这在奇瓦瓦州和莫雷洛斯州尤为突出。①

① 伊西多罗和何塞菲娜·E·德法卡拉合编：《墨西哥革命历史文献》第5卷第69—76页（墨西哥1960—1976年27卷本）。

马德罗个人的革命战略则更有条理。他的兄弟古斯塔沃是一名德国外交官（后来称他是家里主要的“搞交易者”），雇用了一名华盛顿律师舍伯恩·G·霍普金斯，充当这一运动在美国的律师。霍普金斯同标准石油公司有密切联系，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拉丁美洲革命策划人，他要鼓动美国人对“墨西哥人民”短暂的起义给予同情：他说11月20日弗朗西斯科将指挥占领科阿韦拉的一个边境城镇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当时叫波菲里奥·迪亚斯城），他将在那里成立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反对连选连任派”的一些力量将在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城，帕丘卡，以及奇瓦瓦和格雷罗州的农村地区举行起义。宣传机构将集中于迪亚斯同“科学派”的关系，以使军队中的为首者雷耶斯分子感到满意。用不了多久，迪亚斯将在几个月里下台，然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就会在“民主”选举中获胜。

这个战略的有些部分证明是成功的。标准石油公司同古斯塔沃·马德罗进行了积极协商。美国的官员们使中立法有利于革命派。而本来可以采取主动摆脱马德罗家族的雷耶斯将军，仍在欧洲流亡。不过这场革命进行得乱七八糟。

政府粉碎了11月20日的重大阴谋。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被迫退回到得克萨斯，于是12月1日迪亚斯重新就任总统。但是到1911年1月，马德罗派在奇瓦瓦山区已经招募了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上重新露面的马贡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占领了墨西卡利边境小镇。同年2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同奇瓦瓦州的马德罗分子联合起来，在那里他没有找到可靠的“反对连选连任派”分子，而发现一些不熟悉的、很难驾驭的首领，最重要的有一名当地的运输工帕斯夸尔·奥罗斯科。他依仗手下校官中一名有名的土匪弗朗西斯科·比利亚。游击队员也不是驯顺的卒子，而是来自旧军事殖民地的农民，他们指望收回失去的土地。

军队和乡村骑警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城镇和铁路沿线维持正

常秩序。但在3月6日美国采取了重大行动：塔夫脱总统下令美国部队调动到边界，实际上这是对墨西哥政治的干涉，而对墨西哥人来说，这意味着美国惩罚了迪亚斯。在纽约，财政部长利曼图尔同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兄弟古斯塔沃，以及“反对连选连任派”副总统候选人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戈麦斯进行了磋商。在墨西哥，商人们和政客们急急忙忙地重新安排他们的交易。迪亚斯把副总统雷蒙·科拉尔流放欧洲，以表明可以商量把他替换下来。

但是北方各州的革命党人成倍增加。在4月中旬索诺拉州的马德罗分子占领了阿瓜普列塔边境城镇。墨西哥城南部一些新的团伙起来叛乱，主要是莫雷洛斯州的乡村农民，他们决心从各大庄园收回他们祖先耕作的土地。马德罗家族当时试图以新的谈判使造反平息下去，但是帕斯夸尔·奥罗斯科不听从命令，于5月10日占领了北部边境最重要的城镇华雷斯。新马德罗团伙在各州到处出现。在战场上总共也许有2.5万名革命党人，他们占领了较大的城镇，进逼各州首府，为官职，待遇、赃物、报仇而争夺，而最使人惊恐的是争夺土地。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号召的但没有提出具体办法的这种全国性暴动已经出现，显然具有农民运动无法控制的危险性。

马德罗家族趁奥罗斯科一仗的胜利再次进行谈判。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在华雷斯成立了他的临时政府，并于5月21日同迪亚斯派来的使者签订了结束敌对行动的条约。实际上他背弃了圣路易斯计划以便同“科学派”建立联系。根据这项条约，迪亚斯于5月25日辞去总统职务，一周以后搭船去法国。按照宪法由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代替总统职务，直到10月举行特别大选。所有的波菲里奥政府的州长都辞职，其中有几位以及迪亚斯最亲密的助手（包括利曼图尔在内）也都流亡国外。不过取代利曼图尔的是一位银行家和商人、弗朗西斯科的舅父埃内斯托·马德罗，“科学派”实际上把他当作是自己人。几乎所有的国

会议员、法官和联邦官员都保留原职，这样就保证了整个联邦政府军队和乡村骑警队也维持原状，从而保证了稳定。革命党人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并实行遣散。

莱昂·德拉巴拉就任总统后，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相继予以承认。他利用这个政权所有雄厚的资源，在四个月内便平定了这场革命，并顺利地过渡到马德罗—“科学派”政府。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于6月7日抵达墨西哥城，他已成为人民崇拜的偶象，“民主的热心倡导者”。他和他的兄弟古斯塔沃利用4个月的时间把民意变成了选票。

他们的竞选活动没有遭到美国的对抗，同联邦政府军队合作驱散了下加利福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在经济上也没有遭受特大的困难。近期的战斗对生产中心和铁路只造成轻微的损失。美国拥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考德雷勋爵的阿吉拉石油公司刚在海湾油田获得重大发现。蒙特雷的钢铁冶炼公司在产量和销售方面正顺利地走向辉煌的年代（某些重要生产部门的统计资料，见表1）。同时夏天雨水很好，可望在秋季得到丰收。

虽然如此，马德罗主义失去了政治基础，它得不到支持“科学派”的银行和大公司的直接赞助。“科学派”接受“倡导者”只 86 是为了挫败雷耶斯以防他一旦回国。他们许多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很快壮大起来的天主教国民党，该党主张提名马德罗—莱昂·德拉巴拉合作竞选。后来雷耶斯将军果真回国并接受了总统候选人的资格，马德罗派自身发生了分裂。在索诺拉和科阿韦拉州受马 87 德罗家族信任的当地“反对连选连任派”（他们都自认是地主）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但在奇瓦瓦州，该家族提名“反对连选连任派”分子阿夫拉姆·冈萨雷斯为州长，这使革命英雄奥罗斯科大为失望；他对于担任老部队的指挥官以免退役而转为州民兵感到不满。在莫雷洛斯州，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由于告诫革命派领袖对农村反对庄园的要求必须等到对“土地问题”“研究”之后才能考虑，激起了他们的反感。为了制造一起有利于雷耶斯的丑行，

表1　1910—1920年墨西哥主要商品生产情况

单位：公吨（石油为桶）

年份	大麦	玉米	棉花	龙舌兰	糖	小麦	铜	黄金	蒙特雷铁/钢	石油（桶）	白银
1910	131,700	—	42,776	94,790	150,049	323,785	48,160	41,420	165,373	3,634,080	2,416,669
1911	139,264	—	34,203	116,547	152,551	320,540	56,072	37,120	217,999	12,552,798	2,518,202
1912	120,128	2,062,971	51,222	139,902	143,323	320,849	57,245	32,431	155,247	16,558,215	2,526,715
1913	211,308	—	43,830	145,280	125,922	286,549[a]	52,592	25,810	46,321	25,692,291	1,725,861
1914	232,271	1,961,073	—	109,280	108,262	214,288	26,621	8,635	5	26,235,403	810,647
1915	214,260	—	20,336	162,744	88,480	207,144	206	7,358	8,741	32,910,508	712,599
1916	211,308	—	18,109	201,990	49,210	286,549[a]	28,411	11,748	37,513	40,545,712	925,993
1917	—	—	13,582	127,092	65,396	—	50,946	23,542	49,536	55,292,770	1,306,958
1918	379,525	1,899,625	78,040	140,001	68,894	280,441	70,200	25,313	68,710	63,828,326	1,944,512
1919	—	—	-	118,870	99,546	381,399	52,272	23,586	90,020	87,072,954	2,049,898
1920	—	—	—	160,759	113,183	400,469	49,192	22,864	76,000	157,068,678	2,068,938

a. 不完整的数字

资料来源：国际农业研究所综合统计处《国际农业统计年鉴（1909—1921年）》表7,13,19,33,56，1922年罗马版；
恩里克·阿斯内尔·门多萨"从1919年至今的龙舌兰工业史"，载《尤卡坦百科全书》第111，779页，1947年墨西哥版，共8卷；弗雷德里克·毛罗：《蒙德雷1890—1960年的经济发展》，载1964年2期《卡拉书雷》，表第21,22,24；
洛伦佐·梅耶：《墨西哥与美国在石油问题上的冲突（1917—1942年）》表1，1968年墨西哥版；
G·A·劳什和阿利森·巴茨编《1921年采矿业统计资料，技术和贸易情况》第845页，1922年纽约版；
1906—1910年，玉米年平均产量为3,219,624公吨。
罗勃特·G·克莱兰编：《墨西哥年鉴》第240页，洛杉矶1924年版。

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领导下的联邦军队占领了莫雷洛斯。马德罗试图进行调解失败后，被激怒了的村民们在来自夸特拉附近一个村子的首领埃米利亚诺的率领下打了回去。由于对马德罗和“科学派”的联盟不满，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戈麦斯及其兄弟埃米利奥同其它的地方首领联合起来，决心作为地方民兵保留自己的武装。古斯塔沃·马德罗的对策是把“反对连选连任党”改组成进步立宪党，它提名一位尤卡坦律师何塞·马里亚·皮诺·苏亚雷斯作为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这就在6个重要州里引起了严重的政治斗争。

1911年10月1日，在墨西哥历史上也许最自由的一次选举里，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个人名望以及古斯塔沃的进步党机器大获全胜。马德罗—皮诺·苏亚雷斯的候选名单赢得了53%的选票，其余的选票归其它4组候选人。同年11月6日得到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的承认，马德罗上任，任期5年。埃内托斯·马德罗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马德罗总统首先主张政治自由。他无疑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没有选择余地。他只能对他的内阁行使实际权力。而与迪亚斯的专制形成难忘对照的是，生动活泼的公众政治真的开展起来了，使许多重要政党都感到非常惊奇。进步立宪党和天主教党为1912年中期的国会选举进行了紧张和广泛的组织工作。

在马德罗政府执政的时候，经济日益繁荣。由于世界矿物价格上涨，采矿业生产增加。庞大的美国冶炼公司报道冶炼业获得了空前的最大利润；石油生产迅速发展；1912年充足的雨水使农业得到了更大丰收，供应国内消费和出口（关于出口和进口的统计资料，见表2）。

但是较好的商业并没有恢复旧有的秩序。由于政治上的控制放松了，经济的发展使大公司之间的倾轧变得更加厉害，大大动摇了新政府。最使人伤脑筋的倾轧是在石油方面，标准石油公司和墨西哥石油公司都要求象阿吉拉石油公司得到的优惠，而阿吉

88

拉石油公司则维护它的特权。美国冶炼公司同它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墨西哥对手及客户不断进行游说，同样激烈地彼此斗争。

在没有严密的政治控制情况下，经济发展还使工人中间产生了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墨西哥机械工人工会（UMM，1910年成

表2　1910—1920年墨西哥的出口值和进口值

单位：美元

份　出	出口总值	对美出口	进口总值	从美进口
1910	138,006,937	61,092,502	99,864,442	63,858,939
1911	147,462,298	57,311,622	96,823,317	53,454,407
1912	149,119,955	76,767,931	93,438,730	56,079,150
1913	154,392,312	81,735,434	90,610,659	48,052,137
1914	92,285,415	86,280,966	52,391,919	33,215,561
1915	125,199,568	83,551,993	26,331,123[a]	41,066,775
1916	242,688,153	105,065,780	42,214,449[a]	54,270,283
1917	152,872,380	130,370,565	94,915,092[a]	111,124,355
1918	182,199,284	158,643,427	137,666,784	97,788,736
1919	196,264,936	148,926,376	118,139,912[a]	131,455,101
1920	426,178,872	179,331,755	197,706,190[a]	207,858,497

a. 不完整数字

资料来源：第1栏和第3栏引自国家外贸银行《墨西哥出口业》第11—12页，1939年墨西哥版；各栏中的头5行数字已从原来截止于6月30日的会计年重新按日历年计算。第2栏和第4栏引自美国商业部《1919至1920年美国统计资料摘编》表283和288，分别见第399和407页。

立），墨西哥铁路联盟（AFM，1907年成立），发报员和电报员互助会（SMDT，1909年成立），以及最强大的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UCMGF，1910年成立）在各铁路公司建立了很大的权威。受到罢工的激励，新的墨西哥采矿业工会在东北部的分会成倍增加，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港口工人也成立了工会。罢工也席卷了纺织厂和城市商业。虽然纺织工会没有成

89

立起来，印刷工人和其它行业工人几乎都宗教般热衷地成立了工会，有些工会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

此外，马德罗面临强烈的反对。11月25日，在萨帕塔领导下的莫雷洛斯州农民首领们，由于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学究式的态度严重不满，正式谴责了马德罗，在他们的阿亚拉计划中宣布要发动一场从庄园手里收回土地还给各村庄的全国性运动。这是一场极其激荡的运动，是一场社会革命的严重威胁，至少是在南方。联邦政府军队在整个旱季焚烧莫雷洛斯的村庄，但无法阻止萨帕塔分子的游击战，也无法阻止以后9年的其他武装力量。12月，一位不同寻常的复仇者，雷邦斯将军，在东北部举行了起义。埃米利奥·瓦兹奎斯·戈麦斯从埃尔帕索号召奇瓦瓦州发动起义。

几个月里，政府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最最重要的是，设法处理了标准石油公司和墨西哥石油公司对阿吉拉石油公司的争吵，因此维护了马德罗取得"科学派"支持的措施。雷耶斯的叛乱终于失败，这位墨西哥最有声望的军人最终被关进墨西哥城的军事监狱，而三名反雷耶斯派的将军被晋升为军分区司令；这是陆军的最高军衔。在皮诺·苏亚雷斯的鼓励下，尤卡坦成立了龙舌兰纤维销售管理委员会，它是政府维持价格的机构，反对国际收割机公司，取得龙舌兰种植者的效忠。1912年1月，公共工程部开设了一个劳动局。但它几乎不干预铁路或港口工人工会，因为它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在解决4月份发生的国家铁路纠纷事件中，政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美国员工举行罢工引起整个铁路系统瘫痪，由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UCMCF)代替了他们。但政府使矿区恢复了正常秩序，说服国会通过了新的矿工安全法。政府还通过建立工人意见委员会以及使各公司协调价格和工资的会议使纺织工业趋于平静。

政府于1912年春季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奇瓦瓦州的叛乱。2月4日，华雷斯发生巴斯克斯分子的暴乱之后，美国塔夫脱总

统便命令美国军队在边境准备战地服役。虽然在美国总统大选年，他本想制止墨西哥再次发生革命，但对墨西哥人来说，这个命令意味着美国对马德罗的谴责。奇瓦瓦州的美国大矿业公司，以及特拉萨斯家族（阿夫拉姆·冈萨雷斯州长征收了他们的税款）偷偷地同积怨很深的奥罗斯科取得联系。3月3日奥罗斯科及其民兵举行叛变，他的许多士兵都希望在赢得胜利后能获得土地。3月23日，8,000名奥罗斯科分子在奇瓦瓦州南部消灭了沿铁路的一支联邦讨伐部队，在这里他们形成了对华雷斯城和低洼地区之间战略要点托雷翁的重大威胁。奥罗斯科分子不仅控制了奇瓦瓦州，而且不久在索诺拉州和科阿韦拉州也进行活动。可是，塔夫脱总统已经纠正了他的失误，于3月14日对于从美国运往墨西哥的武器弹药，除运给政府的外，一律实行禁运。4月1日，马德罗委托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率领联邦政府军队向北方进行一次新的讨伐。5月23日，韦尔塔击败了奇瓦瓦州南部的奥罗斯科分子。在这期间，索诺拉州和科阿韦拉州为了当地的防护和执行战争地区的任务征募了州民兵。而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墨西哥机械工人联合会，采矿业工会都成立了志愿团。7月7日韦尔塔进驻奇瓦瓦城。

但是这种特殊的胜利来之不易。花了许多钱，以致使政府无法偿还外债的利息。6月7日马德罗同“科学派”最喜爱的纽约银行詹姆斯—斯派尔合伙公司签订了一个为期一年的一千万美元贷款合同，以偿付立即到期的款项。但是要恢复财政上的体面地位，他在一年内还需要更多更长期的贷款，而这要国会批准才行。这次镇压行动还使马德罗在政治上对军队欠了一笔很重的债。军队占财政预算的开支从20%增加到25%，人数增加一倍达6万，并配备5个以上军分区司令，其中最杰出的便是韦尔塔。

1912年夏季，使墨西哥政府稳定的国外形势开始消失。最重要的是，墨西哥的石油成为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争论问题。6月3日，为了增加收益以保证下一年的大笔贷款，马德罗

下令对石油生产实行首次征税，每吨20分*，大约每桶0.015美元。美国的石油公司指责这种税收是“没收”，[②]而它们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里都有很大的影响，前者于6月22日提名塔夫脱，后者于7月2日提名伍德罗·威尔逊为总统候选人。(8月份进步党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他是有名的侵略主义者)。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去调查塔夫脱对墨西哥的政策。塔夫脱派军舰巡视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美国国务院于9月要求墨西哥政府在其境内保证法律与秩序，否则美国就要“考虑采取适应局势需要的措施”。[③]

在这期间，古斯塔沃·马德罗大胆地准备使政府摆脱对“科学派”的依赖。他只有一部分他们需要的基础，因为在6月30日的议会选举中，当他的立宪进步党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并在可竞争的一半参议院席位中赢得多数的时候，天主教国民党已赢得众议院的大部分少数票，并在参议院赢得足够席位（其中包括莱昂·德拉巴拉的一席），连同参院其余的“科学派”和雷耶斯派就能成为多数了。但古斯塔沃·马德罗不愿意等待以后更好的时机。7月，财政部长埃内斯托·马德罗开始在法国跟除了“科学派”外的银行界人士进行秘密协商以借款2,000万英磅（将近2亿比索)。如果马德罗家族在这次财政突击中取得成功的话，清一色的马德派政府就可以在1916年古斯塔沃本人可能当选总统之前就轻易地掌权了。

随着9月14日举行的第26届国会，打开了直接使马德罗派倒台的途径。当政府继续进行秘密的财政谈判时，古斯塔沃已经让他的立宪进步党人（由路易斯·卡夫雷拉议员领导）慷慨激昂地

---

* 1分等于1/100比索——译者

② 洛伦索·梅耶：《1917—1942年墨西哥与美国的石油战》第31页，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版。

③ P·爱德华·黑利：《革命与干涉，塔夫脱和威尔逊同墨西哥的外交，1910—1917年》剑桥，1970，第48页。

像雅各宾党人了。他们自命为革新派，敦促国家进行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在内的“革新整顿”，甚至超出圣路易斯计划的“民主”诺言[4]。天主教党人和“科学派”在莱昂·德拉巴拉的领导下，使参议院变成了反对派的堡垒。那时，在巴黎的“科学派”流亡分子已对政府的财政阴谋听到了风声，于是他们建议他们在墨西哥的朋友们起来挫败它，甚至同雷耶斯派合谋。

依靠军事政变废黜马德罗的首次企图失败了。在10月中旬，因为赶着要在11月份美国大选前进行，“科学派”一帮人以波菲里奥·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将军为中心，组织了一次叛乱。美国军舰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迪亚斯占领了韦拉克鲁斯港，并呼吁军队掌握全国的指挥权，可是没有一个将军作出响应。就在这个星期内，军队重新占领了这个港口，军事法庭不久便把迪亚斯关进韦拉克鲁斯的土牢。但是马德罗又多欠了军队一笔债。

11月5日威尔逊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他的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也获胜。马德罗派的高级官员再次同舍伯恩·霍普金斯进行联系，恢复了同标准石油公司的友好关系。墨西哥的政客们推断，在民主党人的领导下，美国对马德罗政府施加的压力会轻一些。但是塔夫脱的总统任期要到1913年3月，还有4个多月，而且因为他对威尔逊和马德罗的极端不信任，显然决定，在他离任前应该由一位对美国感恩的总统和共和党来统治墨西哥。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并不隐瞒他的新使命。这就使天主教党人—“科学派”—雷耶斯份子反对派有了新的勇气和最后期限。12月，墨西哥政府正式要求国会授权“在欧洲”借2000万英镑。这使反对派掌握了一个重大的公众问题。1月13日，议院通过了授权，但参议院里的反对派把它攻击得体无完肤。

有组织的工人也都发生闹事。12月26日，因为要求实行一天

④ 路易斯·卡夫雷拉：《革命就是革命》文件集，瓜纳华托，墨西哥，1977，第137—145页。

8小时工作制，墨西哥机械工人联合会号召国民铁路公司举行罢工，从而使全国交通运输处于混乱。劳工部试图进行调解，但无济于事。直到1月11日，由于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的干预，机械工人联合会才接受了一天10小时工作制，和增加10%工资。后来，独立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心“工人之家”于9月份在墨西哥城成立了工会，号召那里进行罢工，争取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在韦拉克鲁斯号召工人阶级各组织于5月1日在该港集合举行大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为争取一天8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

第二个军事政变的企图也失败了。这一次政变组织得比第一次好一些，活动主要以曼努埃尔·蒙德拉贡将军为中心。蒙德拉贡将军是“科学派”的亲信，他受命去唆使墨西哥城的精锐部队，把国家宫夺下来，释放雷耶斯和迪亚斯（后者刚转移到首都），安排雷耶斯担任临时总统，相隔一段时间后选举迪亚斯任总统。2月9日蒙德拉贡的部队释放了雷耶斯和迪亚斯。但在攻打国家宫的战斗中，雷耶斯被打死了。蒙德拉贡、迪亚斯以及幸存下来的一些叛乱分子好不容易穿过休达德拉小镇逃到一个军械库。同一天，马德罗任命曾经打垮奥罗斯科分子的韦尔塔去平定这场新的叛乱。2月11日韦尔塔据说开始进攻休达德拉。可是，战役很快便扩大，波及面愈来愈大，大炮每天打死许多平民百姓，毁坏了许多财产。蒙德拉贡和迪亚斯仍坚持要求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辞职，并敦促其他将领推翻政府。私底下美国大使 93 和领导天主教党人—“科学派”—雷耶斯分子联盟的莱昂·德拉巴拉则在阴谋策划同样的事件。叛乱分子和同谋者非常坚苦地设法战胜韦尔塔，可是没有成功。100名左右的陆军将领中，除了休达德拉镇的两名以外都始终忠贞不渝，此刻，马德罗已完全依靠他的将军们了。

第三次军事叛乱的企图终于成功了。2月18日，为提防当时挺而走险的叛乱分子试图在休达德拉镇突围，韦尔塔下令停火，

并设法把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古斯塔沃·马德罗，以及同马德罗家族关系密切的费利佩·安赫莱斯将军逮捕起来，宣布他本人掌管这个国家。其他一些将军立刻承认了他的权威。经美国大使的邀请，那天傍晚韦尔塔与迪亚斯在大使馆会谈并签订一份条约：韦尔塔将担任临时总统，任命一个由天主教党人、“科学派”和雷耶斯分子参加的内阁，而对美国大使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在即将到来的正常总统选举中要承认迪亚斯的竞选。⑤那天夜晚，古斯塔沃·马德罗遭暗杀。2月19日，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提出辞呈，由立宪进步党人控制的议院以压倒多数票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外交部长，即当时的临时总统，立即任命韦尔塔为内政部长，同时辞去自己的职务，于是韦尔塔便成了临时总统。新的内阁包括由莱昂·德拉巴拉任对外关系部长，蒙德拉贡任军事部长，而雷耶斯的儿子鲁道夫担任司法部长。几乎所有尚未承认韦尔塔权威的将军们现在都表示承认了，有几个人引退了，没有一个人进行反抗。2月21日，最高法院向新总统表示祝贺。韦尔塔私下表示，他会让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流亡国外，但于2月22日深夜，在军警守卫下，这两个犯人都被枪杀了。

1913年2月至1914年8月

新政府得不到重要方面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未能使美国满意。191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在墨西哥的对立主要因为石油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而华盛顿新政府觉得这场政变好像是“科学派”为讨好英国势力——即阿吉拉石油公司——的一场反革命。外事局推测说，当威尔逊就任总统职务时，他为了重新维护美国对韦尔塔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会承认韦尔塔政府的。所以预先就料到，英国拖到1913年3月31日才承认，然后其它欧洲国家政府 94

⑤ 路易斯·利卡加：《费利克斯·迪亚斯》墨西哥1958，第216页。

便纷纷效仿。威尔逊后来不愿意承认，是以为他很快便可以搞起一个使美国人更加放心的政府。这种混乱状态使银行家和巨贾富商们感到忧虑，怀疑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新政府是否能清偿6月初到期的外债。

除此之外，不久在经济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虽然石油公司兴旺起来了，但世界白银价格在1913年春天下跌增加了贵金属向国外的流出，使采矿工业很不景气，而采矿业影响最大的北部边境各州，商业上更发生普遍萧条。有组织劳工仍旧非常好斗。韦拉克鲁斯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并不召开为成立全国性工会联合会的大会，但墨西哥城的“工人之家”，在一场新的组织浪潮中，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公开的五一节庆祝会。主要铁路和港口工会联合成立了墨西哥同业公会联合会（CGM）。因为它代表全国绝大多数运输工人，墨西哥同业公会联合会立即就成为一支重要的全国力量。

而且，新政府不久面临广泛的武装抵抗。象军队、议会和最高法院一样、除少数几个州长外全都接受了韦尔塔政府的权威。但是“科学派”的重新活动加剧了旧的和新的冲突。反对“篡位”的起义很快便在几个州里发生，在索诺拉、奇瓦瓦和科阿韦拉州北部边境一带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在那里，尽管美国禁止给叛乱分子输出武器和弹药，当地的领袖们不仅调动了仍然不参与反对奥罗斯科竞选的州民兵队，而且还从日益增加的失业人员中招募新兵。索诺拉州的州长于2月末逃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但是他的民兵队官员使立法议会任命了一位代理州长，宣布该州脱离联邦政府而独立，同时征收联邦关税和捐税。在年轻的农民政治家阿尔瓦罗·奥夫雷贡的指挥下形成了一支州的正规军队。到3月末这支军队已达8,000人，并使瓜伊马斯地区的联邦部队主力处于孤立的境地。在奇瓦瓦州，冈萨雷斯州长于3月初遭到谋杀，叛乱断续开始。但三月末希望重新提出土地要求的几支民兵队和许多新的起义者在弗朗西斯科·比利亚的领导下则联合起来。他

们的起义鼓舞了杜兰戈和萨卡特卡斯州的其他叛乱分子。

95

在科阿韦拉，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州长率领了这次抵抗运动。他年龄53岁，是波菲里奥时期地方政治的老手、地主，与东北部几个大家族（不是马德罗家族）有血缘和姻亲关系。他首先想无视韦尔塔的政变而把其他州长团结起来，但是没有成功。1913年3月26日，他让他当地的部下公布了瓜达卢佩计划。在谴责韦尔塔、议会和最高法院叛国，并宣布组成护宪派军队的同时，科阿韦拉州人任命了卡兰萨为最高领袖，最终担任临时全国执行领袖，并为恢复宪治举行选举。瓜达卢佩计划没有一个字谈到经济或社会改革。而护宪派军队的人数不多，这支军队的最高级军官是一名从韦拉克鲁斯州逃出来的民兵队将军坎迪多·阿吉拉尔，这支部队的主要力量只是卡兰萨的弟弟赫苏斯及其表弟巴勃罗·冈萨雷斯领导下的少数地方民兵。但是4月1日护宪派代表在华盛顿雇用了霍普金斯作为律师。4月18日来自索诺拉和奇瓦瓦的革命代表签署了瓜达卢佩计划，为了避免强制性内债或对外国债权人的依附，卡兰萨于4月26日批准印制5百万比索的纸币来支付护宪派的竞选运动。

在别的地方，主要的抵抗来自莫雷洛斯州的萨帕塔分子。少数几个认为马德罗是最凶恶敌人的首领放弃了战斗。但在阿亚拉计划指导下，其他的首领跟随萨帕塔在一次独立的游击战中为他们的村庄夺回了土地。他们对仅仅是政治范围的变革不屑一顾，这加强了他们对全国农民事业的支持，从而扩大了他们战略的视野。萨帕塔找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行政秘书来管理他的司令部，他叫曼努埃尔·帕拉福克斯，一度曾攻读工程学，以前当过会计师。1913年4月中旬，萨帕塔在莫雷洛斯东部发动了一次重大的进攻。到5月，萨帕塔派运动已下定决心并组织好力量，至少要赢得一场地区性社会革命的胜利。

但是新政府在第一回合中幸存了下来。随着它日益成形，可以看出它与前政府的不同只是派系分歧和个人分歧而已：新政府

的各位部长在商业、劳工和“土地问题”方面实际上仍实行和以前同样的政策。最最令人惊奇和重要的是，不是费利克斯·迪亚斯而是韦尔塔掌握了主宰力量。1913年3月和4月，费利克斯派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宣传迪亚斯一莱昂·德拉巴拉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作为联合候选人。但是这位临时总统提高了军饷，使96用操纵手段任命几名对他效忠的将军为临时州长，并同奥罗斯科媾和结成政治同盟。4月23日韦尔塔得到议院里进步立宪党人的多数票支持，确定6个月后于10月26日为总统大选日子。迪亚斯和莱昂·德拉巴拉辞去了他们候选人的身份以使韦尔塔难堪，他们的部下有一些人还密谋要杀死他。但是韦尔塔既没有难倒，也不害怕，他迫使“科学派”进行新的谈判以筹措2,000万英磅贷款。5月30日议会批准了这笔债务，并于6月8日及时清偿了到期的付款，由巴黎与佩伊一巴斯银行牵头的一个国际财团作保承借了一笔为期10年600万英磅的贷款，以及在6个月内有权承借另一笔1,000万英磅的贷款。

贷款对经济无济于事。在年中美国冶炼公司和其它大的矿业公司报告称收益明显减少，有些公司的生产也急剧收缩。北方的小企业破产得如此之快，以致州立银行使它们的墨西哥城票据交换所出现赤字。那年夏天的雨水很少，造成谷物价格上涨，萧条局面扩大。从6月到9月一比索从0.48美元跌到0.36美元（这个时期的比索价值请看表3）。

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新的贷款等于是韦尔塔份子的一场政变。韦尔塔并不重视同迪亚斯签订的盟约，把他内阁里的费利克斯分子统统清洗，而最重要的是清除了军事部长蒙德拉贡（他因而流亡国外），接下去清洗了莱昂·德拉巴拉。关于商业政策、97劳工政策和“土地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不过韦尔塔现在已让他自己的心腹掌管这些事情。7月中旬，他把迪亚斯以“特使”名义派去日本，实则是流放，同时释放了安赫莱斯，让他流亡法

表3　1913—1916年比索纸币的美元价值

月＼年	1913	1914	1915	1916
一月	0.4955	0.3699	0.1431	0.0440
二月	0.4873	0.3478	0.1314	0.0407
三月	0.4830	0.3138	0.1190	0.0285
四月	0.4592	0.3001	0.0923	0.0343
五月	0.4702	0.3360	0.0863	0.0229
六月	0.4761	0.3313	0.0926	0.0370
七月	0.4306	0.3146	0.0739	0.0370
八月	0.3936	0.2629	0.0676	0.0380
九月	0.3649	0.2108	0.0659	0.0311
十月	0.3607	0.2055	0.0714	0.0232
十一月	0.3580	0.1986	0.0716	0.0099
十二月	0.3594	0.1870	0.0590	0.0046

资料来源：埃德温·W·凯默勒：《通货膨胀和革命：1912—1917年墨西哥的经验》第14,45,46,101页，普林斯顿，1940。

国。[8] 英国对这些变化表示满意，宣布任命驻墨西哥的一位新公使，此人自夸同阿吉拉石油公司老板考德雷勋爵有深厚的友谊。

在完全控制了军队之后，韦尔塔把预算中的军费比重增加到30%，军队增加到8.5万人，重新组织了军队指挥机构，把50名左右军官提升为将军，任命了几位新的军区司令，扩大了兵工厂，并把乡村骑警队扩充到一万人。整个夏季他把他的军队投入对付革命党人。在联邦军队的重大进攻下，护宪派军队土崩瓦解。在仍旧是护宪派人权力中心的索诺拉州，联邦军队仍旧无法从瓜伊马斯突围；但在北部，得到奥罗斯科及其民兵的支援，他们重新控制了主要城镇和铁路。7月末联邦军队彻底击溃了护宪派军队对托雷翁的一次进攻，以致使卡兰萨差一点丢掉他第一首领的地位。在东北部，他们于8月击溃了冈萨雷斯的部队，并且

⑧ 同上，第302—303页

除了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和马塔莫罗斯之外收复了对别的地方的控制。在已经把村民们赶到集中营里去的莫雷洛斯州，他们把萨帕塔派游击队员驱散到周围各州。

由于韦尔塔的力量壮大起来，美国对他越来越讨厌。美国的石油公司和威尔逊总统看到在墨西哥不只是军人，而且还是英国资本在扩充势力。7月，美国召回了它驻墨西哥的大使。多亏霍普金斯的帮忙，美国边境官员故意对护宪派分子把军用物资偷运到索诺拉和塔毛利帕斯装作看不见。8月，在新的英国公使前往墨西哥之前，威尔逊派了一名特别代表要求韦尔塔宣布立即停火，并且“尽早举行自由选择。”⑦美国将帮助强行促使停火，承认新政府，并资助一笔新的贷款。如果韦尔塔不答应，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⑧，韦尔塔拒绝了。8月27日，威尔逊宣布了他的“警觉等待”的政策，并毫无例外地禁止所有武器弹药运往墨西哥。但韦尔塔不久在欧洲和日本订购了新的武器。

1913年9月，韦尔塔已经巩固了他的政权。他不仅可以依靠军队，而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可以依靠军火供应承包商，这些厂商已经成为他坚强的忠实支持者。他利用仇美情绪，提出了对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计划，受到爱国官员和职员们的广泛赞助。当国会再次召开时，进步党人、天主教党人、“科学派”和雷耶斯派之间意见混乱，韦尔塔就更加放手干。他给天主教党指定了10月26日大选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并于9月30日从墨西哥城银行获得了为期3个月的1,800万比索贷款。

韦尔塔派政府当时面临三方面的严重考验。首先来自各个反对派阵营——试图把10月26日选举抹黑。在奇瓦瓦、杜兰戈和萨卡特卡斯州的护宪派各团伙，于9月在比利亚的领导下联合组成北方师。10月1日，在护宪派人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中，他们

⑦ 黑利，《革命与干涉》第98页。

⑧ 阿瑟·S·林克：《威尔逊：新的自由权》普林斯顿，1956，第357—358页，361页。

俘获了托雷翁和大量的军事战利品。索诺拉州的护宪派分子也在9月把卡兰萨迎接到他们的州里。就在那里这位首席长官获得了新的政治地位。他宣布宪法恢复以后“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必定声势浩大地开始”。[⑨]他改组了护宪派军队，任命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为西北军团司令，巴勃罗·冈萨雷斯为东北军团司令。10月17日他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的内阁成员中有刚从法国回来的费利佩·安赫莱斯将军，出任军事部副部长。10月21日，他肯定地说，护宪派取得胜利时，他就要解散联邦军队。10月23日，冈萨雷斯率领的东部军团向蒙特雷进攻，与此同时，萨帕塔分子与之配合，围绕墨西哥城发动进攻。而费利克斯·迪亚斯在韦拉克鲁斯登陆参加这次大选。

韦尔塔机灵和勇敢地进行了反击。10月10日，等待新的英国公使抵达墨西哥城时，他解散了议会，并配合总统大选，开始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第二天，英国公使向临时政府总统呈递国书时，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最近发动的这次政变。护宪派向蒙特雷发动的进攻失败了。10月24日，韦尔塔下令把军队扩充到15万人。在10月26日选举投票时，以军事手段操纵的多数使韦尔塔当上了总统，他的军事部长担任副总统，天主教党人则在议会中占绝大多数。但是由于韦尔塔和他的军事部长都不够资格出任选举的职务，这次选举宣告无效，韦尔塔仍旧担任临时总统。10月 99
27日迪亚斯从韦拉克鲁斯逃往美国的一艘军舰上。

另一次护宪派的进攻是第二次考验。从索诺拉出发，奥夫雷贡联合了锡那罗亚州的军队，于11月14日占领了库利亚坎。冈萨雷斯于11月18日攻占了维多利亚，任命他在塔毛利帕斯州的主要部下路易斯·卡瓦列罗为临时州长，并继续向坦皮科挺进。由比利亚率领的北方师，现在拥有一万士兵及大炮和辎重，制服了奇

⑨ 赫苏斯·卡兰萨·卡斯特罗：《卡兰萨的出身、命运和遗训》墨西哥，1977，第139页。

瓦瓦城的卫戍部队，于11月15日占领了华雷斯城并缴获许多军事给养，打垮了奥罗斯科的民兵，迫使州府疏散后于12月7日占领该城。这支军队起了应有的作用。在西北部的联邦炮兵部队，以及在瓜伊马斯和马萨特兰的炮艇以附近通过的铁路为目标，封锁了奥夫雷贡从南部调动大批军队或给养。冈萨雷斯的部队向坦皮科推进，在联邦军队防线前被击溃。联邦部队的将军们在中部各州安排了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于12月9日一支新组成的联邦军重新占领了托雷翁，使比利亚向后退到奇瓦瓦。比利亚为了巩固他在那里的基地，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于12月21日颁布命令，把该州大批庄园无偿地没收，作为当时的收入，并在战争结束时分配给他的部队。但是卡兰萨对比利亚过早开展"社会斗争"感到非常恼火，但他实际上还是认为政府占有战略优势。因此于12月28日批准他的财政部增发1500多万比索的纸币以支付将到来的长期战役。

来自美国的进一步对抗是第三个考验。当韦尔塔得到英国公使的赞同解散议会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反对变得更加强烈了。10月13日，他提出警告说，美国不会承认10月26日的大选结果。11月1日威尔逊威胁韦尔塔，要他辞职，不然美国将首次支持护宪派分子。11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威尔逊"要求韦尔塔引退"；美国然后就进行调解，成立新的临时政府，实行"自由选举"以恢复宪法秩序。⑩ 11月12日一位美国特使在诺加莱斯会见 100 了卡兰萨。在这一压力下，英国指示它的公使放弃韦尔塔，法国财政部也通知墨西哥政府称，法国政府不再承保1000万英镑的借款。

可是，政府顽强和机智地作出了反应。天主教党派控制的议会于11月15日开幕。12月15日议会确认韦尔塔为临时总统，并安排于7月5日举行另一次总统选举。作为回报，韦尔塔净化了天

⑩ 肯尼思·J·格里布：《美国与韦尔塔》林肯，1969，第115页—116页。

主教党的领导，让教会把墨西哥奉献给耶稣圣心会，并于1914年1月11日为纪念圣主基督，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瓜达拉哈拉的典礼。他还容忍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公民事务的一个新的教会组织——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ACJM)。为了弥补国外贷款的缺乏，他把石油税增加了两倍多，使议会批准了一笔一亿比索的新内债，对企业界强行摊派大量公债，颁布法令征收银行存款税，把纸币确定为法定货币。12月23日在白银价格再次下跌触发了伦敦银行发生挤兑以后，他宣布银行业暂停营业。1月7日他把储备金从50%降低到$33\frac{1}{3}$%，然后中止对国债的利息支付，直至银行向政府提供新增贷款。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都表示抗议，但是韦尔塔知道，他可以指望英国公使和考德雷勋爵个人会给以支持。而且他的公民军训计划招募了许多新的爱国者。

总之，1914年初，韦尔塔政府已证明它拥有墨西哥的最高权力。虽然它已经丧失了有价值的地盘，但它统治了全国大约有4/5人口居住的2/3的土地。它仍控制着全国所有的海港，它有主教、商人和银行家的资产作为抵押。在一些中心城市，由于反美主义和亲教权主义，它赢得很大程度的人民效忠。这就促使美国彻底支持护宪派。1914年1月29日，威尔逊通知英国说，他现在认为墨西哥的和平不会来自调解，而是来自强者的军事胜利。2月3日，他取消了武器禁运，允许美国军用物资无区别地向墨西哥出口。武器和弹药不断涌进索诺拉、奇瓦瓦和塔毛利帕斯州。英国公使不久便被召回伦敦。

在这有利情况下，2月12日卡兰萨批准了再印发1000万比索纸币，并于3月3日给护宪派发出了进军的命令。冈萨雷斯的东北军团，那时它自恃有若干著名的将领——路易斯·卡瓦列罗、赫苏斯·卡兰萨、塞萨雷奥·卡斯特罗、弗朗西斯科·科斯、弗朗西斯科·穆尔吉亚和安东尼奥·I·比利亚雷亚尔——任务是

101

去夺取蒙特雷、坦皮科和萨尔蒂约。奥夫雷贡的西北军团，它拥有萨尔瓦多·阿尔瓦拉多、卢西奥·布兰科、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曼努埃尔·迭格斯和本哈明·伊尔等主要将领，任务是去攻占西海岸和夺取瓜达拉哈拉。比利亚的北方师，由安赫莱斯参加指挥炮兵部队，任务是去重新夺取托雷翁，以便从战略上展开对通向全国中心的铁路的战役。卡兰萨把政府迁往奇瓦瓦以监视比利亚和南方的动向。

韦尔塔再次扩充军队，通过在中部各州另一次大规模的征兵，从2月份的20万人发展到3月份的25万人。他提升了大约250名军官为将军，委任了几名新的军区司令，并任命奥罗斯科去指挥北部的一次新的进攻。他还委任了根据天主教党提名的利曼图尔的姻亲爱德华多·伊图尔维德为联邦区长官。3月31日，由于考德雷勋爵的帮助强使墨西哥的银行发放4,500万比索贷款，他宣布于4月15日恢复支付国内债务。

但是护宪派发动的战斗攻势猛烈。3月26日冈萨雷斯让卡瓦列罗围攻坦皮科，而4月8日，当赫苏斯·卡兰萨、科斯·穆尔吉亚在东北部别的地方骚扰联邦军队的时候，冈萨雷斯本人，卡斯特罗和比利亚雷亚尔便向蒙特雷发起进攻。因为已让卡列斯在索诺拉指挥，并由阿尔瓦拉多包围瓜伊马斯，奥夫雷贡便夺取了布朗科，而迭格斯和伊尔便在南锡那罗亚和特皮克训练部队以便向哈利斯科挺进。3月23日比利亚和安赫莱斯率领1.5万名士兵在托雷翁阻击了1万名联邦军队，于4月2日夺取了该城，并于4月14日歼灭了1.2万名联邦军支援部队。当护宪派将军们占领了新的地区后，他们便设立了一个新的有特点的机构——没收办事处，来经管扣押的私人财产作为军队住宅和物资供应之用。与此同时，萨帕塔分子已经把他们的游击队员编人南方的正规军队，并在格雷罗发起进攻。4月初，他们控制了这个州的很大部分地区和当地的银矿。

以上进展使美国又想进行调整，但这次是使用武力。4月10

日，威尔逊总统利用美国水兵在坦皮科被捕的事件要求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国旗致敬，否则就面对“严重后果”[1]。韦尔塔拒绝。4月14日威尔逊下令大西洋舰队开往坦皮科和韦拉克鲁斯。4天以后，国务院得到消息说，一艘为联邦军队载运武器弹药的德国军舰于4月21日要在韦拉克鲁斯靠岸。4月20日确信联邦政府在港口的警卫部队不会对美国登陆进行抵抗后，威尔逊便决定占领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如果韦尔塔仍旧不辞职，威尔逊便计划派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经由铁路把他们从韦拉克鲁斯运往墨西哥城去推翻他。那时美国便可以监督韦尔塔的替身与护宪派之间进行的谈判，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进行“自由选举”和恢复宪法的实施。4月21日，1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在韦拉克鲁斯登陆。 102

这次武装干涉失败了。韦拉克鲁斯的警卫部队进行了抵抗，在坦皮科的登陆也没有开始，因为那里的军队必须转移到韦拉克鲁斯去增援。到4月22日6000名美国军队仍占领着港口。韦尔塔不但没有辞职，反而得到议会授予的对军事、财物和交通的独裁权力；他任命铁路工会领导人管理国家铁路，动员爱国示威纳入他的公民军事化计划，并敦促所有的叛乱者参加联邦军队共同反对美国佬的入侵。天主教党、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以及主教们公开支持他提出的国家统一、反对新教徒败坏祖国的呼吁。4月22日，卡兰萨谴责美国干涉是侵犯主权。按照华盛顿私人律师的意见，为了避免在边界上发生重大的敌对行动，他并没有把这称为战争行动，但他的确要求美国立即撤军，发誓要同美国人侵护宪派地区的行动，包括对坦皮科周围地区的入侵，进行斗争。萨帕塔也发誓要同侵入他的地区的美国军队进行战斗。欧洲人耻笑这一干涉。南美洲人痛恨这一干涉，甚至连美国公众都表示反对。

---

[1] 林克·《威尔逊：新的自由》第396页。

因此威尔逊仅限于在韦拉克鲁斯采取行动。4月25日，为了使他调停的计划不致于破产，他接受了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建议，举行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调解会议。[12] 4月27日，他再次下令武器全面禁运，但不阻止护宪派人在边境上的走私活动。

103 韦尔塔接受了“ABC”国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调解建议，打算利用这次调停反对护宪派。但是由于失去了韦拉克鲁斯的关税收益和军用物资的供应，政府的地位摇摇欲坠。政府无法再清偿外债的利息，比索与美元的比价跌到1比索相等于0.30美元（见表3）。军队强行征兵和全民军事化的做法进行得太过份，涉及到有组织的劳工阶层，于是墨西哥城的无政府主义者起来抵制了。5月27日政府封闭了“工人之家”。

表面上，护宪主义增加了力量。这位首席长官接受“ABC”三国的调解只是“原则上”的，表示这仅适用于坦皮科事件和韦拉克鲁斯的军事干涉，并且以轻蔑的姿态宣布，他的政府将继续战斗以恢复宪法。[13] 但在表面背后，由于他炫耀自己不依靠美国的力量，他的军队开始分裂了。东北部的将军们，因为他们管辖的地区主要收入来自美国人开设的矿山和石油公司，都欢迎他们首席长官对国家权力的宣言，认为这样做会促使美国公司向护宪派交税。北部的将军们，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奇瓦瓦州的墨西哥牧场和托雷翁周围英国人经营的棉花种植园，但必须把牲口和棉花出售给美国人，对卡兰萨与华盛顿的对抗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可能引起美国埃尔帕索的海关采取报复措施。最气愤的是比利亚，他公开表示要维护同美国的友谊。

这种分裂暴露了过去的猜忌。3个月来，自从威尔逊支持护宪主义之后，流亡在美国的马德罗家族年长分子便设法把恢复宪法狭义地说成是恢复马德罗派。他们在索诺拉州和奇瓦瓦州都有

[12] 林克：《威尔逊：新的自由》第407页。

[13] 同上，第408—409页。

大量的同盟者，在索诺拉州，1913年逃亡在外的马德罗派州长设法使自己重新复职；而在奇瓦瓦州，马德罗家族的世交安赫莱斯对比利亚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到5月，比利亚认识到卡兰萨试图对他进行破坏。急于希望马德罗派东山再起的护宪派领袖们就促使卡兰萨对比利亚进行种种限制。

护宪派在军事上继续挺进。在韦拉克鲁斯危急期间，冈萨雷斯、卡斯特罗和比利亚雷亚尔早已攻占了蒙特雷，在那里，比利亚雷亚尔当上了新莱昂州的临时州长。冈萨雷斯、卡瓦列罗和卡斯特罗于5月14日攻占了坦皮科，同时开始征收石油税。5月18日坎迪多·阿吉拉尔攻占图斯潘，他在那里开始就任韦拉克鲁斯的临时州长。5月21日，比利亚攻占了萨尔蒂约并把它移交给冈萨雷斯后，回到了托雷翁。在西部，奥夫雷贡、布兰科、迭格斯和伊尔于5月16日攻占了特皮克，并开始向瓜达拉哈拉进军。护宪派的境内到处都开设了没收办事处，有些将领们在其中发现进行私人交易的绝好机会。胜利的军队也为报仇找到了发泄情绪的地方。对教会进行报仇时，由于天主教党分子，主教和墨西哥天主教青年会同韦尔塔勾结，激起了北部老自由派反教权主义的怒火；一些将领们对教会和神父更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来自格雷罗州的南方萨帕塔独立军恢复了除库埃纳瓦卡以外的整个莫雷洛斯州。同时大举进入墨西哥州和普埃布拉。在它现在控制的地区内，村民们都已在播种季节收回了土地。

但是分裂的压力增加了。美国通过1914年5月20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城召开的“ABC”三国会议上故意把这些压力推出来。在以后的几周内，美国国务院承认了现存的英国石油和矿产特许权，从而消灭了韦尔塔的最后一项英国的私人支持。此外，在美国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并非只限于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斡旋解决坦皮科事件和韦拉克鲁斯的军事干预，还不断提出要在美国、韦尔塔和护宪派之间斡旋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重新提出的计划设想由安赫莱斯担任总统。

104

6月初，护宪主义开始遇到危机。卡兰萨把他的政府从奇瓦瓦迁到了萨尔蒂约，发布命令把被比利亚没收的庄园重新定为只是扣押（最终要归还给它的主人）。停止把科阿韦拉的煤装运到比利亚的铁路线上，而且让当地的萨卡特卡斯—杜兰戈部队于6月11日向萨卡特卡斯城进攻，试图建立一支中央师，以阻止北方军调往南方。6月13日比利亚辞去了他的统帅地位，但6月14日他的将领们又把他扶上了台，并违背卡兰萨命令，沿铁路线前进，袭击萨卡特卡斯。卡兰萨于6月19日解除了安赫莱斯的军事部长职务。6月23日北方军在萨卡特卡斯歼灭了联邦政府军队1、2万人，并把该城交给了当地的首领，随后返回托雷翁。6月29日，卡兰萨任命冈萨雷斯和奥夫雷贡为护宪派军队的第一批军区将领，在军事上把比利亚扔在脑后。

在这次危机中，护宪派保持了团结。7月4日冈萨雷斯让卡瓦列罗、卡斯特罗和比利亚雷亚尔跟比利亚的代表在托雷翁举行会谈，讨论重新统一的问题。代表们全部同意卡兰萨仍担任首席长官，而比利亚为北方军区司令。不过他们还赞成根本改变瓜达卢佩计划，重新建立一个正规的政府。在革命成功时，护宪派军队将把联邦军队解散，并取而代之，同时安排卡兰萨为临时总统，从而使他无法参加正规职务的竞选。卡兰萨唯一的作用将是召开护宪派领导人的联合会议，以提出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这次代表大会将制定一项改革计划——对教会同韦尔塔的勾结进行惩罚；为“工人们的福利”提供条件；并“在经济上解放农民”——然后监督正规政府的选举以贯彻各项改革。⑭7月8日托雷翁协定签署，它没有得到卡兰萨的批准，但也没有反对。

7月13日“ABC”三国会议闭幕，答应美国仍留在韦拉克鲁斯并保证承认韦尔塔与护宪派协议成立的临时政府。但是在7月

⑭ 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墨西哥革命简史》第2卷144—160页，墨西哥，1960年版二卷本。

7日西北军团首次重大战役中，奥夫雷贡、布兰科、迭格斯、伊尔率领1.5万名士兵在瓜达拉哈拉铁路终点以西歼灭了1.2万名联邦军队，并于7月8日占领了这个城市。在那里，奥夫雷贡立即对教会进行了反教权主义的残酷惩罚。

瓜达拉哈拉陷落的那一天，韦尔塔任命弗朗西斯科·C·卡瓦哈尔为外交部长。卡瓦哈尔于1911年曾代表迪亚斯政府进行谈判签订了华雷斯条约，很可能再次维护联邦政府军队及官僚机构。7月15日韦尔塔辞职，卡瓦哈尔成了临时总统。韦尔塔于7月20登上一艘德国轮船，离开考察夸尔科斯(当时叫墨西哥港)，流亡国外。

赫苏斯·卡兰萨占领了圣路易斯波托西，从而打开东北军团直奔巴依奥的通道。卡瓦哈尔请求停火进行谈判。这位首席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7月23日，威尔逊总统警告卡兰萨说，如果不顾外国利益或向其对手进行报复的话，美国就可能不承认他的政府；并于7月31日提醒卡兰萨，要是没有美国的承认，护宪派政府“便无法获得贷款，这样便势必很快垮台”。[15]卡兰萨回答说，护宪派人将根据“我们墨西哥人的民族利益”，一如既往对外国人一视同仁地提供保证和公平的待遇。[16]

106

至于最后一仗，为了把墨西哥城攻下来，这位首席长官修改了他的战略。虽然北方师是护宪派的主力，当时有三万人，但他不想冒险让比利亚和安赫莱斯参加夺取最后的胜利。为了把他们控制在托雷翁，他让冈萨雷斯和穆尔吉亚率领2.2万名东北军经由圣路易斯波托西进入低洼地区。他命令奥夫雷贡从西部推进，迫使联邦政府军队无条件投降。7月26日，奥夫雷贡把迭格斯留在瓜达拉哈拉担任哈利斯科州临时州长，然后带领布兰科、伊尔

---

[15] 哈雷：《革命与干涉》第149—150页。

[16] 美国国务院，《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914年第575页，首都华盛顿，1922年版。

和1.8万名军队进入低洼地区。在8月9日，当他正守候在墨西哥城以北20英哩的地方时，接到消息说，联邦军队司令官们要投降。

8月12日，卡瓦哈尔和他内阁中绝大多数人都撤向韦拉克鲁斯，然后流亡国外。联邦区长官伊图尔维德和卡兰萨最新任命的在墨西哥城的代理人阿尔弗雷多·罗夫莱斯·多明格斯负责首都过渡时期的秩序。8月13日奥夫雷贡和布兰科在没有冈萨雷斯参加的情况下（出于对他的不满），同联邦政府陆军和海军的代表签订了正式结束战争的条约。联邦部队和在首都的乡村骑警队沿铁路线撤离到普埃布拉，在那里由卡斯特罗和科斯把他们解除武装并予遣散。卡兰萨命令他的临时州长们和各州司令员让击败的军队到别的地方去退伍。尤其是他任命他的兄弟赫苏斯开始担任从瓦哈卡到尤卡坦全国1/4地区的指挥，瓦哈卡西部和南部的所有联邦军队都集中起来等待遣散；尤卡坦没有当地的革命党人。最受人痛恨的联邦军队军官都逃亡国外，他们当中有奥罗斯科；少数顽固分子跑到普埃布拉一瓦哈卡山区躲藏起来。

8月15日，奥夫雷贡率领6000名西北军团士兵进入首都，并派布兰科带一万多士兵驻在南郊以阻击萨帕塔分子也同时进入。8月20日卡兰萨的部队开进这个城市。第二天他在国家宫成立了政府，并开始对官僚机构进行清洗。尽管战争结束了，但更多的没收财产办事处开设了起来，旧的和新的机关越来越多地为私人利益效劳。

1914年8月至1915年10月

墨西哥政权内部恢复立宪的斗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所有错综复杂的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政策和商业交易统统垮台；所有国际信贷能力全部丧失；富足有余的国库濒于枯竭；联邦政府的军队和乡村骑警队全被解散。更糟糕的是，破坏还使新政权的建设增加了负担。外债已积累到6.75亿比

索，在美国占领韦拉克鲁斯的情况下无法予以偿还；外国强烈要求对死亡和破坏财产的赔偿也越积越多。金融体系濒于崩溃。贵金属储备仅 9 万比索，钞票和其它债务达 3.4 亿 比 索，而 单 是流通在市面上的各种不兑换的护宪派货币就达6000多万 比 索，1比索汇兑值仅0.25美元。铁路的毁坏以及矿山、作坊和工厂的破坏状况更是加重了这个国家经济的肖条。蒙特雷的钢铁冶炼公司几乎停止了工作。而似乎战争也毁灭了气候似的，接着两个夏天干旱缺雨，意味着在1915年不是发生饥荒，就是进口粮食。

此外，得胜的军队对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权意见分歧。他们的矛盾比个人之间的争夺还厉害。因为大量的革命军队已经在物质和社会条件不同的地区发展起来，东北部、西北部、北部和南部均各自代表了它们特殊的社会力量。4 支军队中有 3 支军队已 经发展得如此不同，以致建立新政权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的斗争，虽然这很隐蔽。而且因为各自分别发展，不同的力量之间没有一个居中的调解人。

东北军团和西北军团很相似。他们均围绕科阿韦拉和索诺拉民兵建立起来，并已发展成职业军队。这支军队为挣 工 资 而 打仗，现在共有 6 万兵力。实际上这两支军队都是由几支职业部队组成，隶属于曾经提拔过他们的将军们，部队保证他们的工资，并服从首席长官（赫苏斯·卡兰萨和其他几个人除外），而且彼此合作只是为了马基雅维里式的缘故*。无论是在东北部还是西北部，这些革命首领们都曾经是20世纪初左右各省有事业心的典型商人、农场主和牧场主。他们在成长中受到挫折——其中有些人是1906年的马贡派，多数是1910年的反对连选连任派，几乎全都是1911年的马德罗派，并且全是1912年市政府或州政府官员以及

108

* 马基雅维里是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他的名言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为了挽救他们前程的1913年护宪派分子——他们把旧事业的崩溃看作是使他们结交新伙伴东山再起的机会。在他们统治的地盘，里里外外到处都设立没收财产办公室；他们安插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工作人员。同时他们声称保护有组织的工人。占领墨西哥城后，他们便立刻改革国家铁路的管理，用对韦尔塔主义进行惩罚来威胁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和墨西哥机械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并废除了港口工人工会的合同，解散了墨西哥同业公会联合会。他们宣称自己是已经败落的采矿业工会和纺织厂委员会的监护人。8月21日，在得到奥夫雷贡总部津贴后，他们重开了墨西哥城的“工人之家”。对于“土地问题”，他们只看到了雇农及其苦难（过去的债务），因此他们下令予以取消，并表示应该提高雇农的低工资。除了两三件事上他们有点侠义精神之外，他们对于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都不感兴趣。

北部潘乔·比利亚率领的师，也是一支职业军队，经常领取工资的士兵共有三万人，是墨西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但是这支军队的形成，经历了一段远比东北军团或西北军团更为复杂的历史，这支军队的成分参差不齐。最初这支部队包括了民兵以及为争取土地而战斗的农民小分队。但是随着这支军队的成长，吸收了许多新的成员，有失业的矿工、牛仔、铁道护路员和盗匪，他们都是为了挣钱、为了提拔以及为了寻找发财的机会才来打仗的。这支军队的首领也来自各式各样的。有些人曾经是20世纪前后年轻分益农的代言人，他们在成长中受过欺侮，而且还常常与乡村骑警队、1910年的马德罗派，1912年反奥鲁斯科的民兵队队长，以及1913年搭救他们生命和人员的护宪派发生麻烦。更多的人实际上不知来自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出名，只是1913年以来因为他们胆大、好杀和时来运转，使他们升到高级统帅地位。在他们统治的地区里，他们掠夺一切，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北方 109 军队中的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没收的庄园进行处理的问题上。比利亚打算满足曾经在他领导下打过仗农民关于夺回土地的要

求，并把"殖民地"赐给他的其他士兵。[17]但当他可能需要派一支军队到他的地区以外作战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因为一旦他的士兵有了农场，他们就不会轻易到远处去打仗。他的没收财产机构象信托公司一样经营农场，把农场租给佃农，所得收益用于军队给养和工资，用于给军队的寡妇和孤儿发抚恤金，以及州政府的开支；同时在军队还没有把握遣散之前，暂时不重新分配土地。但军队的有些长官拥有大庄园，象贵族那样经营。

由于这些复杂问题，比利亚使自己同索诺拉和奇瓦瓦州重新活动的马德罗派政客们拴在一起。这些革命领导人中只有东北部或西北部的将领们才真的采用把土地分配给部队的计划。他们的目的是使北方师让安赫莱斯成为总统，以便收拾1913年2月事件的残局，重新组成一个符合有事业心的地主所需要的新政权。

所有的革命军队中，南方萨帕塔派军队是最单纯的。这支军队并非职业军队，现有正规军1.5万人，游击队员1万人，都不领工资。南方军队不是属于萨帕塔或他和所有首领的，而是属于曾经抚养培育他们和他们的军队、为土地战争提供必要的援助的村庄的。南方军的首领们来自他们的村庄、得到它们的信任和信任这些村庄，所以在所有革命党人中最坚决地认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他们在20世纪初都是当地社区的好汉，在要求收回对田野、森林和河流的自古以来的权利的当地斗争中成长起来，经常遭受警察的麻烦；1910年时都成了村庄领袖，在1911年几乎都是马德罗派，到1912年全是萨帕塔派，而成为萨帕塔派以来，他们曾经长期反对旧政策，现在他们转向建立农业无政府—"共产主义"，他们虽然不懂理论却很信从。因为他们拥有格雷罗州的白银：墨西哥最可靠的货币，这大大有助于他们的事业。这也同样有助于总部机关保留在曼努埃尔·帕拉福克斯的手里，他已证明

---

[17] 弗里德里希·卡茨：《在比利亚分子统治期间（1913—1915年）墨西哥北部的土地变化》载《当代墨西哥，墨西哥历史第4次国际会议文件》洛杉矶，1976，第261、272页。

110 是一位诚实、负责、精明、有决断、大胆和富于想象的土改执行者。在他们的地区里，粉碎了旧的当地垄断者之后，南方的首领们就重新安排贸易以供应当地的需要。而且在没收了庄园之后，他们让帕拉福克斯批准各村庄重新占有它们过去的土地，把其余的土地作为军队收益、抚恤金和当地补贴，并准备把农庄赠给从未有过农庄的新拓居者。南方军的另一特点便是司令部收容了来自"工人之家"的许多避难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萨帕塔战略或政策的决策考虑之列，但他们当真宣传萨帕塔主义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源泉。

上述这些情况招来了外国的仲裁。尤为重要的是，大战恰恰已在欧洲爆发，这使在战争中中立的美国得以扩大它的帝国主义任务，特别重申门罗主义是美国对西半球霸权的职责。因为战争使世界航运趋于混乱，使墨西哥的出口商品生产（特别是石油）放慢，阻碍了这个国家维持秩序的物质能力，所以实际上就是指明美国企图操纵墨西哥的事务。自从卡兰萨在不受美国调停的情况下在国家宫就职以后，威尔逊总统一直坚持不承认他的政府。美国因此直接同墨西哥的主要社会力量打交道，华盛顿的目标是：同旧政权的残余分子保持和好，至少是新政权里那些名为人民而实为保守的恢复宪法的鼓吹者；提供一笔美国贷款以改进外债并资助索赔委员会；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由美国进行财政监督——使之充分符合20家左右外国和本国大公司的利益。由于欧洲的浩劫，在那里进行贸易的许多公司现在不得不更多地在美国市场上进行贸易了。可是大企业没有得到党派或军队的支持。

众害相权取其轻，美国把金钱押在比利亚身上，去建立新政权。显然，比利亚是护宪派将领中最亲美的人，受东山再起的马德罗派保守主义者的支配，他握有全国最强大的战斗机构指挥权。如果华盛顿支持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一定会成群结 111 队地来到他的阵营，迫使其他许多人也不得不投奔他。统一的方式早写在护宪派代表大会商订的托雷翁协定里。到1914年8月

底，在北方军指挥部的师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让比利亚和奥夫雷贡商议准备召开大会。霍普金斯因为探听到了商议的意向，于9月1日辞去了作为卡兰萨律师的职务。

这位首席长官遭受如此冷落后，变得更加灵活了，于9月5日他宣布定于10月1日在墨西哥城召开大会。为了保持使他自己的阵营对这个前景感兴趣，他命令用新发行的1.3亿比索纸币替换过去发行的护宪派货币。同时他设法使他的反对派分裂。当大会召开时，会议主席是一位律师路易斯·卡夫雷拉，他曾经是卡兰萨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古斯塔沃·马德罗的议会首领，以及第26届议会的主要革新者。会议没有北方和南方的代表参加。

不过转向比利亚的局面还是发生了。10月5日在奥夫雷贡的申辩之后，大会投票决定迁往北部阿瓜斯卡连特斯召开，该地位于中立地区，但靠近比利亚在托雷翁的基地；同时排除平民，尤其是卡夫雷拉。10月15日在阿瓜斯卡连特斯，大会邀请萨帕塔派代表参加，当代表到达后，就“原则上”通过了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阿亚拉计划。[18] 10月30日，大会表决罢免首席长官，并于11月1日选举了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将军欧拉利奥·古铁雷斯为临时总统。次日大会同意比利亚占领阿瓜斯卡连特斯。11月6日古铁雷斯宣誓就职。11月10日，因为卡兰萨拒绝退职，大会宣布他反叛，然后由古铁雷斯任命比利亚为大会军队的司令官。当时首席长官早已把他的政府由墨西哥城迁往奥里萨巴。那时他发行的比索价值已跌至0.20美元（见表3）。华盛顿对这一局势十分满意，于11月13日，威尔逊下令在10日内撤离韦拉克鲁斯港的驻军。

但卡兰萨已经准备了出人意外的全面抵抗。从一开始，他就得到阿吉拉尔、冈萨雷斯和赫苏斯·卡兰萨的效忠；阿吉拉尔在韦拉克鲁斯州，冈萨雷斯已回师东北，赫苏斯·卡兰萨为了征收米纳蒂特兰油田的税收而仍留在夸察夸尔科尔科斯。一旦北方控

---

[18] 约翰·小沃马克：《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纽约，1968，第217—218页。

制大会的力量突然膨胀，使其它东北和西北的将领们感到震惊，112 他就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妒忌。大会宣布首席长官反叛后的一周内，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几乎所有重要部属：阿尔瓦拉多、卡瓦列罗、卡列斯、卡斯特罗、科斯、迭格斯、伊尔、穆尔吉亚、比利亚雷亚尔，都宣布自己是卡兰萨派。奥夫雷贡后来也在奥里萨巴加入了首席长官的队伍。在所有重要的部属中，只有布兰科仍然站在大会一边。当11月23日美国从韦拉克鲁斯撤军时，阿吉拉尔占领了该城。11月26日卡兰萨在韦拉克鲁斯成立了他的政府，在这个港口他从海关得到收益，并销售出口商品赚取美元，用以进口走私的武器弹药。

并非所有的革命党人都是不支持这一边就是支持那一边的。在许多孤僻的地区，当地的首领自居为小军阀。最著名的是韦拉克鲁斯山脉北部的曼努埃尔·佩莱斯，11月，他开始向石油公司出售许可证，允许在坦皮科和图斯潘附近的一些低地从事经营活动。

1914年11月底，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的军队共同占领了墨西哥城。12月初，古铁雷斯宣布了他的内阁名单，其中包括比利亚的一名部下担任军事部副部长，曼努埃尔·帕拉福克斯出任农业部长。这个城市里的一些大企业接受了新政府，并未出现严重的抗议。各个工会也这样。墨西哥电力和电灯公司工人组成了墨西哥电工工会（SME），保证不仅要为该城的工厂、电车，而且还要为伊达尔戈州和墨西哥州的各大矿山友好地管理能源供应，这几乎是对新政府明确的支持。

比利亚派的将领们从奇瓦瓦到低洼地区召募了成千上万的新兵立即行动起来。在12月中旬，他们的部队已攻克了瓜达拉哈拉，并从索诺拉到塔毛利帕斯向卡兰萨派的驻军进攻；这时，萨帕塔派已攻占了普埃布拉城。1月4日在墨西哥城，比利亚收编了大约1500名前联邦政府军官（包括7名军区将领），任命他们为扩编部队的指挥员和参谋。

不过卡兰萨派的军队同样也壮大起来了。12月4日卡兰萨预见到要转入进攻，下令控制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而且在卡兰萨派的将领们控制的地方，他们都开设了具有卡兰萨特色的机构：当地的商业整顿委员会，控制对当地物资供应的分配，并鼓励参加他们的军队。赫苏斯·卡兰萨从科特萨科尔科斯乘船越过特万特佩克地峡到西海岸，把直至锡那罗亚州的忠诚的首领们集合起来，回来后在瓦哈卡为西南部战役建立了一支军队。在哈科斯科，迭格斯同米却肯州的穆尔吉亚建立了联系，比利亚分子占领了墨西哥城使穆尔吉亚受到意想不到的制约，因此他们一起通过低洼地区干扰比利亚派的交通往来。到12月底，比利亚雷亚尔占领了蒙特雷，冈萨雷斯占领了坦皮科并控制了那里的收益。当比利亚派走遍萧条的北方搜索硬通货来进口武器弹药以保持他们广泛的攻势时，以及当萨帕塔派贮藏他们的白银和重新分配土地时，卡兰萨派已从海湾最富裕的公司那里获得税收和贷款建立了一支新的作战部队。在奥夫雷贡的率领下，以卡斯特罗和科斯作为左右手，这支新的军团很快便成为一支拥有12,000人而且技术精良，给养充足的部队。1915年1月15日这支军队顺利地重新攻克了普埃布拉，并准备向墨西哥城进军。 113

卡兰萨派在政治上也进行了整顿。为了说明他们抵制大会是正当的，将领们劝说首席长官把改革计划公诸于众。1914年12月12日卡兰萨宣布，不仅他的护宪派运动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考虑到国家的迫切需要，他要颁布临时法令以保证政治自由，把土地还给被剥夺者，向有钱人抽税，改善“无产阶级”的境况，纯洁司法机关，把教会重新逐出政界，重新维护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利益，并且容许离婚。[19] 他于12月14日改组了内阁，由路易斯·卡夫雷拉担任财政部长，其它各部多数也都由革命者担任。1月6日他授权土地委员会听取剥夺财产的申诉，并认为应把没收的

---

⑲ 法韦拉与法韦拉：《历史文件》第4卷，第107—112页。

土地交给无地的村庄。1915年1月7日他命令石油公司必须领取他的政府颁发的新执照才能经营各种业务。

美国把赌注押在比利亚身上。1月8日到9日，驻北部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和国务院代表在华雷斯和埃尔帕索同比利亚公开会晤。在东北部，安赫莱斯打败了比利亚雷亚尔，于1月10日攻占了蒙特雷。在瓦哈卡，因为当地的原因（但却有全国性的重大影响），一位本地的首领谋杀了赫苏斯·卡兰萨。

大会的瓦解使华盛顿感到沮丧。1月16日，临时总统古铁雷斯与卡兰萨派交往的情况暴露后，离开了墨西哥城逃到圣路易斯波托西隐居起来。他的接替人，比利亚派的罗克·冈萨雷斯·加尔萨只能负责处理该城积累起来的烦恼事情，其中包括粮食短缺以及伤寒病的传播。迭格斯和穆尔吉亚重新攻占了瓜达拉哈拉。而且当奥夫雷贡的作战部队向墨西哥城靠近时，比利亚—萨帕塔派的卫戍部队撤出了这个城市，于是大会撤到莫雷洛斯。1月28日奥夫雷贡占领了墨西哥城。

114

比利亚在北部组织了他自己的政府，并于2月中旬重新占领瓜达拉哈拉。当时他想摧毁迭格斯和穆尔吉亚，清扫他的右侧以便向奥夫雷贡发起进攻。但安赫莱斯坚持大量增援蒙特雷开展坦皮科战役。比利亚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大部分军队经托雷翁调回东北部。这一调动使比利亚雷亚尔大为沮丧，因此他退职流亡得克萨斯。而比利亚在尤卡坦得到了新的支持，在那里过去的联邦部队以他的名义举行了起义。

与此同时，为使世界航运业适应欧州的战争，墨西哥的各石油公司迅速恢复了大量生产向美国出口。石油公司虽没有按照卡兰萨曾经命令的那样重新申请准许它们开业，但卡兰萨派的石油收入急剧增加。由于这个原因以及韦拉克鲁斯的关税，卡兰萨便派阿尔瓦拉多出征尤卡坦，去夺取当地的龙舌兰委员会和更多的收益。在墨西哥城，在雅各宾反教权主义和反重商主义的高潮中，奥夫雷贡迫使教会提供贷款，向大商号征收特别税，把不服从的

教士和商人关押起来，收买“工人之家”的支持，并通过它再次征召大约5,000名工人，组成“红色营”。

卡兰萨派抵抗了3个月之后，威尔逊总统设法采取更严重的威胁行动。3月6日，美国通知奥夫雷贡和卡兰萨，认为他们“个人要对美国人在墨西哥城遭受生命和财产损害负有全部责任”。[20] 为了作出反应，卡兰萨从他在美国的新法律顾问查尔斯·A·道格拉斯那里得到了指点。道格拉斯是华盛顿的律师，长期受国务院信任，而且还是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政府在美国的合法代理人，他当时正好在韦拉克鲁斯。首席长官同道格拉斯商量后，宣告引退。3月10日他让奥夫雷贡撤离了忍饥挨饿、伤寒病流行的首都，并由萨帕塔派和大会派重新进驻。但是当3月19日阿尔瓦拉多占领梅里达以及次日又占领普罗格雷索后，卡兰萨派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地盘。

到1915年3月，这场战争大约卷入了16万人。其中8万人是卡兰萨派，5万人是比利亚派，2万人是萨帕塔派，还有1万人属其它。在4月间，就看出了这场战争结束的苗头。3月底，比利亚发起了向坦皮科进军的战役。他本可能摧毁卡兰萨部下一位新的著名将领哈辛托·特雷维尼奥设置的防线（当时冈萨雷斯本人已在韦拉克鲁斯重新加入了卡兰萨的队伍）。可是迭格斯和穆尔吉亚再次使瓜达拉哈拉受到威胁。而已经离开墨西哥城的奥夫雷贡跟卡斯特罗和希尔向北部转移到低洼地区，依靠在伊达尔戈和普埃布拉的卡兰萨派首领们守住铁路线，保持他从韦拉克鲁斯得到的给养。4月4日他派1.1万名士兵、大炮和机关枪在低洼地区的主要枢纽塞拉亚加强了防御。比利亚赶忙调动1.2万士兵和大炮向该城进攻。4月6日到7日，比利亚派军队几乎已经打赢，但奥夫雷贡的部队还是坚守阵地。双方这时都加强了力量，奥夫雷贡的部队增加到1.5万人，并从韦拉克鲁斯运来了大量的弹药；

115

[20] 哈雷：《革命和干涉》第155页。

比利亚的部队增加到2万人。在塞拉亚的第二仗于4月13日开始，4月15日以比利亚派军队往北撤退而告终。4月18日，迭格斯和穆尔吉亚攻占了瓜达拉哈拉。

在华盛顿，1915年春天关于在北大西洋航道出现德国潜艇的重要新闻掩没了来自塞拉亚的新闻。但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已经开始限制美国在海外行动的自由，华盛顿急需墨西哥政府很快恢复政治秩序。美国已经碰到了新的麻烦，1月以来，奥罗斯科、费利克斯派分子以及在美国的韦尔塔派分子同在南得克萨斯的墨裔美国人叛乱者、美国的天主教主教和华尔街的一些律师们已经进行过联系，于4月12日由韦尔塔本人带着德国支持发动一场反革命的经费抵达纽约。4月23日，卡兰萨提供了帮助：道格拉斯私下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草案，说明如美国承认卡兰萨政府，这位首席长官可以作出的承诺，包括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予以特殊保护，赔偿外国的损失，解决“土地问题”时不没收财产，实行大赦，和尊重宗教。5月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和内政部长提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反革命计划，到处活动想让爱德华多·伊图尔维德担任总统。这样产生的政府如果得到美国的承认，就可以通过斯派尔公司得到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威尔逊总统那时由于一心想着卢西塔尼亚危机，决定迫使革命派和解。6月2日，他提出支持“不介入该国交战各派的人或团体（即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并在墨西哥建立政府……革命计划对他们就将是一项业务而不仅仅是政纲”。[21]

116

威尔逊的提议正好在胜利机会无望的时候到来；在5月间，比利亚已经重新组织了军队，并再次使奥夫雷贡——现已得到迭格斯和穆尔吉亚的增援——卷入莱昂周围一次长期复杂的战役。比利亚从东北部召回了安赫莱斯，把蒙特雷让给了当地的卡兰萨

---

[21] 阿瑟·S·林克：《威尔逊：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普林斯顿，1960，第476—477页。

派，并大大减少了对坦皮科的包围军力，以至在特雷维尼奥防卫面前就崩溃了。比利亚集中了3.5万名士兵对付奥夫雷贡的3万名军队。这场决战于6月1日开始，到6月3日比利亚派几乎再次获得胜利；奥夫雷贡受伤，而他的接替人伊尔只能在名义上统帅卡斯特罗、迭格斯和穆尔吉亚。因为没有弹药，比利亚派在战术上失利，在6月5日再次撤回到北部。

6月9日比利亚接受了威尔逊争取和解的要求，并建议立即跟卡兰萨谈判。但卡兰萨派现在较之以往有更多的理由要把仗打下去，他们拥有大约10万名武装部队，对付4万名比利亚派和2万名萨帕塔派士兵。地方上的没收财产办事处和整顿委员会都支持他们的驻军。冈萨雷斯和科斯正在普埃布拉建立一支新的东方军团，以便重新夺取墨西哥城。又有4名首领成为军区将领——卡斯特罗、迭格斯、伊尔和穆尔吉亚。用以军事进攻的费用不仅大量来自石油区和韦拉克鲁斯，而且还来自龙舌兰委员会，阿尔瓦拉多已经把该委员会变成积聚美元的正常渠道。在一个月内阿尔瓦拉多成为第7名军区将领。6月11日，卡兰萨为了敦促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在他的权威下重新联合起来，以他的政府纲领形式发表声明，表示他已于4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并宣布他希望得到承认。

6月18日威尔逊警告卡兰萨，美国可能立即就要进行干涉以拯救墨西哥，但他答应如果卡兰萨"真的致力于把所有党派和集团联合起来的话"，那么美国会"认真地考虑"承认他的政府。[22] 6月21日卡兰萨答复说，如果美国保持中立，"护宪派的事业会把反对派压下去。"[23] 6月27日美国司法部镇压了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主要反对派，把奥罗斯科和韦尔塔关押在塔尔帕索，这一消息必

---

[22] 哈利：《革命与干涉》第164页。

[23] 林克：《威尔逊：为中立而斗争》第480页。

117然促使唐·波菲里奥的晚年更加感到痛苦：7月2日他在巴黎去世（奥罗斯科越狱逃跑，于8月30日被得克萨斯的警察击毙。韦尔塔从监狱释放后，被软禁在埃尔帕索，于1916年1月13日因肝硬化去世）。

在这期间，瓦哈卡州出现了主张制服卡兰萨派的新反对派。6月3日在当地保守派的影响下，州政府宣布独立。可是在7月初卡兰萨颇有信心地任命他兄弟的一名老部下赫苏斯·A·卡斯特罗在该州重振卡兰萨派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比利亚主义作为一种潜在的统治势力垮台了。他的政府的货币在北方已无法流通。征收特殊税的做法已蜕变成为掠夺。无数官员和大批士兵开小差逃跑。剩下来的那些军队只能守住蒙特雷州的特雷维尼奥，无法阻止从韦拉克鲁斯得到新的军火给养和新的增援的奥夫雷贡把塞萨雷奥·卡斯特罗、穆尔吉亚率领的2万名军队从北部转向阿瓜斯卡连特斯。在那里1万名比利亚派军队进行了抵抗。7月6日战争开始。7月10日奥夫雷贡的部队已突破了比利亚派的防线，比利亚派军队再一次撤向北部。安赫雷斯离开墨西哥去华盛顿进行游说。这时，冈萨雷斯已经让他的1万名东部军向墨西哥城挺进，大会派只好于7月9日逃离该城，于是冈萨雷斯军队于7月11日占领了首都。局部的卡兰萨派军队攻占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而穆尔吉亚的军队攻占了萨卡特卡斯。还在西部的比利亚派军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在一次大胆的尝试中，突破低洼地区，进攻与韦拉克鲁斯连接的奥夫雷贡供应线。可是7月17日冈萨雷斯军队为了保卫这条供应线撤离了墨西哥城，当科斯和他的军队于8月2日击退了比利亚派的军队后，最终又重新攻占了这座首都城市。从而科斯成为第8位军区将领。

当卡兰萨主义在军事上扩张后，它引起了大公司更大的兴趣。因为卡兰萨派现在已从出口贸易获得经常的收益，不再需要征收特别税；他也确实解除了比利亚的苛捐杂税。他们的纸币比索增加了通货膨胀：从1914年11月到1915年5月，卡兰萨派发行

的比索价值从 1 比索相等于0.20美元下跌到0.09美元（见表3）。但因为欧洲的战争以及国内战争失去了生产投资，通货膨胀对商品投机提供了极好的选择机会。6月，墨西哥财政部决定再增发货币，使供应量达到2.15亿比索，然后于 7 月份宣布，由于在市面上流通的比索很多是假钞票，不久就要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共计2.5亿比索——这实际上就是引诱人们进行投机。

有一些政治联系同小公司发展了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当地军队的控制。特别是因为卡兰萨派军官们拥有对铁路、没收财产办事处和整顿委员会的指挥权，他们积极促使本区的种植园主、牧场主、制造商和商人同他们或他们的亲属、朋友和职员做交易。在通货膨胀和两年欠收的情况下，利润很高的谷物贸易成为上述大部分合伙关系的基础。那年夏季雨水再一次很少，看来又会遇到一次欠收，可从中获得高利润和巩固新交易。 118

卡兰萨派对有组织劳工的保护和控制也加紧了。这里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地的军事控制。战争本身经常改变对铁路的指挥权，使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和机械工人联合会关系破裂。现在军队主张忠诚服务并主张对比利亚主义给予惩罚，使它们陷于瘫痪。在军队的戒备下，东北部的采矿业工会分会还勉强存在。军队执行过去的协议，使港口工人工会继续装卸货物。同样，由于发布了增加工资的几个命令，阿吉拉尔使奥里萨巴纺织厂工人都留厂工作。卡兰萨政府向大约30多个省城和其它城镇的“工人之家”(大多数是很听话的）发给补助金。可是在墨西哥城，在大会派领导下工会可以自由发展，冈萨雷斯无法继续控制。电气工人的“墨西哥电工工会”推选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并不断扩大力量，并在 5 月份赢得了第一次罢工的胜利。8月12日，不顾冈萨雷斯的反对，罢工再次发生，并在坦皮科、帕丘卡和墨西哥州埃尔奥罗矿区的帮助支持下，罢工持续了 8 天，最终赢得了胜利。

威尔逊试图在争斗的几派军队之间再次进行调解。美国、阿

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乌拉圭参加泛美会议的代表于8月11日在华盛顿发出号召，要求“墨西哥国内所有重要的文职和军事当局”安排另一次革命代表大会以建立临时政府。[24]比利亚派的将领们和比利亚立即表示同意，萨帕塔派也同意。但卡兰萨派的将领们谁都不谈邀请的事，都让泛美会议去问首席长官。9月10日卡兰萨正式答复说，除了讨论承认他的政府的问题以外任何事情都不予讨论。

9月4日，比利亚派失去了他们在东北部的最后据点——萨尔蒂约。9月19日他们开始撤出托雷翁，退到他们在奇瓦瓦州的老根据地。9月26日最后一批人离开了这个城镇，接着9月28日穆尔吉亚便占领该城。就在这几个星期里，从阿卡普尔科调来的卡兰萨派军队把萨帕塔派军队赶回到他们在莫雷洛斯州的老根据地。

各革命党派之间经常的战争进行了将近一年，最终以卡兰萨派的胜利而结束。因此，10月9日泛美会议作出结论说：“卡兰萨的党是唯一掌握作为墨西哥事实上的政府所具备的实质条件的党……”[25]10月19日美国承认了事实上的卡兰萨政府，把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贬称为仅是叛乱分子。

1915年10月至1917年5月

在胜利声中，首席长官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把卡兰萨主义的新任务规定为“重建祖国”。他的意图不仅仅是恢复铁路的正常运输和比索的价值。当时他把他的国家的历史说成是经历了“400年的经济不稳定，300年的压迫和100年的国内争斗……30年的暴政，……革命……以及可怕的混乱……兵变和暗杀……”。他表示要审慎地建设墨西哥。[26]3年内战以后，他对这个国家应

[24] 林克：《威尔逊：为中立而斗争》第493页。

[25] 林克：《威尔逊：为中立而斗争》第639页。

[26] 法韦拉和法韦拉：《历史文件》第4卷153—156页。

该是什么样的体制胸中已有了坚定的想法。他并不谈关于建设国家的理论，但他在不久实行的政策中很明确地说明了它的内容——不理门罗主义；提高对外国公司的征税；建立中央银行以管理墨西哥的金融和发展墨西哥的商业；把扣押的庄园归还给原来的地主；把调解商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调解企业与劳工之间的冲突加以体制化；压制不服从的农民和工人。如果这些政策取得成功，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便能保持国家市场免受特权的控制，使所有的墨西哥人得到更多的好处，在随后的繁荣中，过去梦寐以求的平衡和正常的秩序便会真的到来。

卡兰萨派“重建祖国”的任务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最严重的障碍就是支持门罗主义的势力。美国不仅于10月19日承认了卡兰萨政府，而且私下还详细说明了要该政府承担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外国财产，阻止过度征税……发行货币要实际保证”，以及“尽早公平解决”外国的债权。[37]国内的障碍来自以下几方面： 120
10万名军队占用大量的国家收益，政府没有把握立即把人数裁减下来；几家墨西哥大公司进行了紧缩，而对当地卡兰萨派司令官十分怀疑的各省商人们几乎仍在暗中经营他们的业务；仍然拥有红色武装营的墨西哥城“工人之家”刚刚发表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计划而宣布独立后，便同“工会国际”建立了联系；此外，比利亚派，萨帕塔派和许多流亡分子仍都是危险的威胁。

但卡兰萨政权颇有前途。至少它已得到美国的承认，而且再次可以合法地进口美国武器和弹药以加强它的部队。11月10日卡兰萨政府还得到德国的承认，12月英国也正式承认。此外，经过财政部的努力，开辟了国家主要收入的来源——几乎来自各重要

㊲ 卡诺瓦给蓝辛的信（1915年10月13日），美国国家档案，记录59，812.00/16546—1/2；卡诺瓦给蓝辛的信（1915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59，812.00/16547—1/2；兰辛，给阿雷东多的备忘录，1916年10月19日，美国国家档案59，812,00/16548—1/2。

港口的关税，矿业税和石油税，以及销售龙舌兰所得款项。利用精心安排的相互抗衡办法，卡兰萨统帅掌管军队的8名军区将领。他把各种查封财产的办事处都置于中央没收财产管理处的领导之下，政府还聘请了许多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包括在华盛顿的道格拉斯，以及数位世界闻名和知识渊博的墨西哥助手：财政部长卡夫雷拉，他不是财政家，但是墨西哥最机敏的政治分析家和最厉害的辩论家；阿尔韦托·J·帕尼，他是一位与墨西哥城承包商有长期联系的工程师，得到标准石油公司的信任，自1914年以来是护宪派政府的铁道总长，不久便被推选为全国铁路总局主席；伊格纳西奥·博尼利亚斯，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同索诺拉矿业和承包公司有长期联系，得到南太平洋公司的信任，1913年以来曾任护宪派政府的交通（铁道）部长；其它重要顾问有：费尔南多·冈萨雷斯·罗亚，他是韦尔斯·法戈公司、全国铁路总局、尤卡坦铁路局、龙舌兰委员会和农业部的律师，并且在处理外国对墨西哥债务要求的法律事务所里担任主要合伙人，他曾经是一位革新者，组织支持最后几次大选，并连续在几届政府任职。

卡兰萨的战略也是相当稳健的：同美国讨论美国在墨西哥的利害关系，但一直拖到欧洲战争结束后才解决，因为在那时，他就可以呼吁旧世界（指欧洲——译注）在新世界（指美国——译注）调整平衡；把庄园还给跟他妥协的地主；对工会坚决控制，使商人消除疑虑。最重要的策略是召开代表大会制定新宪法，使纽约提供的一项短期贷款合法化，追使地主和商人们承认他们与新政府的利害关系，从而使卡兰萨派在正规政府中拥有支配地位。

121

“重建祖国”的工作大力开始。在首席长官的指导下，道格拉斯准备讨论外国的债权和一笔贷款。11月和12月，一个新的信贷管理委员会检查了墨西哥24家特许银行，封闭了其中的14家，为成立中央银行作了准备。不幸的是这时比索的比价已跌至0.04美元（见表3）。1月份，卡夫雷拉去华盛顿同道格拉斯商议，然

后去纽约找摩根承兑所帮忙。

卡兰萨派解除比利亚派的威胁似乎已成定局。11月1日比利亚军队进击阿瓜普列塔，希望在索诺拉挑起一场新的战争，从而使刚刚被承认的政府丧失信誉。但是由于得到美国的同意，首席长官从托雷翁经由得克萨斯州的伊格尔帕斯和亚利桑纳州的道格拉斯调来了增援部队，及时地解救了这个城镇。11月5日比利亚公开谴责卡兰萨为了求得承认而把墨西哥出卖给美国，并继续向南袭击埃莫西约。但卡兰萨把迭格斯部队从哈利斯科调到索诺拉，击退了比利亚派军队，同时从蒙特雷调回特雷维尼奥部队，同穆尔吉亚的部队一起参加进攻奇瓦瓦的战斗。12月23日特雷维尼奥占领了奇瓦瓦城，从而成为第九个军区将领。1月1日，比利亚退回到奇瓦瓦山脉后把他部队中剩下来的一些人解散，组成游击队。1月14日卡兰萨宣布比利亚是逃犯，要格杀勿论。

首席长官并不否定比利亚和萨帕塔仍然主张的"土地问题"。1916年1月19日，他下令成立全国土地委员会。然而，这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检查和确定当地对农村要求所作的一些决策（卡兰萨政府土地分配统计资料，请见表4）。

122

表4　根据1915年1月6日和1917年，1915—1920年宪法第27条给农村分配土地的情况

年　份	村　庄	家庭人口	公　顷
1915	0	0	0
1916	1	182	1,246
1917	8	2,615	5,635
1918	57	15,071	68,309
1919	60	14,948	40,276
1920	64	15,566	64,333
共计	190	48,382	179,799

注：墨西哥土地总面积为198,720,100公顷。

资料来源：艾尔勒·N·辛普森：《公有土地，墨西哥的出路》表17，查普尔·希尔，1937。

在这期间，政府制止了因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有组织劳工的一次突发性挑战。11月16日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和各车间工会在墨西哥铁道系统组织了一次罢工。11月30日卡兰萨把所有铁路员工都征召入伍。在11月和12月，纺织工人，面包师、排印工人和墨西哥电工工会在墨西哥城举行罢工，附近埃尔奥罗的矿工也进行了罢工；次年1月2日该城的"工人之家"和墨西哥电工工会带头组成一个新的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FSODE)，它宣布要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进行一场"阶级斗争"。㉒1月13日卡兰萨命令"工人之家"的红色营全部退伍。冈萨雷斯于1月18日警告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说"政府不能同意无产阶级专制"，并于2月5日停止了给"工人之家"的津贴。㉓

卡兰萨遇到十分失望的事情。摩根拒绝了卡夫雷拉的建议。而且当标准石油公司子公司因没有根据1915年1月7日颁布的石油法令进行登记而被墨西哥政府取消了它的特许权后，各石油公司和美国国务院便指责墨西哥试图对石油实行国有化。2月份，各石油公司开始照例每月对曼努埃尔·佩莱斯交纳贡金以感谢他派兵维持坦皮科—图斯潘油田的治安。而同流亡在美国的人们有联系的一些人，由于从美国国务院内部得到私人帮助，在费利克斯·迪亚斯周围集合起来把他秘密偷渡到韦拉克鲁斯。去发动一场反革命。

但是国外新的形势给巩固中央集权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由于调整了生产以适应欧洲战争的需要，美国的经济于1915年便开始繁荣起来。受到美国的鼓励，墨西哥的采矿业和制造业于1916年初开始复兴，提供了新的收益，因此使卡兰萨派政府维持了它

㉒ 路易斯·阿拉萨：《墨西哥工人运动史》第3卷第115（4卷集，墨西哥1964—1965年版）。

㉓ 同上第3卷第124页。

已有的权力和效能。2月1日该政府宣布，冈萨雷斯将率领3万名士兵在莫雷洛斯攻打萨帕塔派。2月13日，它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新宪法。[123] 2月26日，预见到费利克斯派[illegible]的困境。卡兰萨把韦拉克鲁斯州长阿吉拉尔提升为第10名军区将领。同日，他命令卡夫雷拉准备好以无法伪造的5亿新发行的纸币兑回当时流通的各种比索。财政部指令各州长把各州的财产没收办事处交给财政部的代表。3月5日经过8个月的战斗，赫苏斯·卡斯特罗的部队终于重新占领了瓦哈卡城。这种进展使美国产生了好感，于是在3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任命了一位驻墨西哥大使。

然而，由于卡兰萨派低估了比利亚的残余力量及冒险性，卡兰萨的计划失败了。1916年3月9日，比利亚率领500名游击队员越过边境向哥伦布、新墨西哥进攻，杀死了17名美国人后撤回到奇瓦瓦丛山峻岭之中。他试图破坏美国——卡兰萨的关系，迫使卡兰萨的将领们把卡兰萨推翻，然后同他们磋商成立一个新的革命联盟。这个目的他没有达到。但是他发起的进攻，在美国总统选举年激起了美国公众的愤怒，的确严重地引起了美墨关系危机，以致改变了“重建祖国”计划的形式。

1916年3月15日美国讨伐军开进了奇瓦瓦。威尔逊并不打算跟墨西哥打仗，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劝告国会加强美国武装力量，以对付共和党人不断要求加强欧洲作战的行动。3月24日苏塞克斯号轮船的沉没，使美国所有有理智的政治家都对欧洲的战争表示关切。美国远征军人数只有6,000名士兵(后来增加到1万人)，而且只是命令他们到边境附近把比利亚派一帮人驱散。但是美国用了4个月，直到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名大会以后，才完全平静下来开始考虑撤退军队的事。

通过这场危机，卡兰萨在外交上对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持和平掌握了高明的外交手段。最初他就得到了道格拉斯关于华盛顿有限目的的报告。为了使军队同政府紧密结合，他于3月13日任命阿吉拉尔为外交部长，奥夫雷贡为军事部长。他使奇瓦瓦的远征军基

地碰不上军事对抗，直到4月12日，由于在一个重要的奇瓦瓦集镇上发生了亲比利亚的流血骚乱，他才要求美国远征军从墨西哥撤离。4月28日威尔逊的使节同他的使节，由奥夫雷贡率领，在华雷斯城开始了谈判。美国人企图得到卡兰萨派的保证阻止另一次墨西哥“侵犯美国领土”的事件，而且，如果卡兰萨派的军队维持不了边境治安的话，就应该容许美国军队代他们执行这一任务。[30]为了表示决心，威尔逊禁止向墨西哥政府运送武器弹药。奥夫雷贡则力图使远征军无条件地迅速撤退。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粉碎叛乱的决心，卡兰萨叫冈萨雷斯强行攻占莫雷洛斯。边境上的匪帮侵入得克萨斯后，威尔逊便下令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阿利桑那的国民自卫队员都召集起来。两国使者于5月11日中止谈判。5月20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中赢得了支持：通过了国防法，允许适当增加军队和国民自卫队员。在这期间，卡兰萨把在克雷塔罗的道格拉斯叫来进行磋商，并于5月22日叫阿吉拉尔发表了一份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说明如果美国要墨西哥恢复正常秩序，就应该使军队撤离墨西哥，并重新允许给墨西哥政府运送武器弹药。阿吉拉还暗示说，墨西哥政府将对边境上的抢劫进行赔偿。

6月10日美国共和党提名由一位稳健派人物竞选总统。6月12日卡兰萨为了表示卡兰萨派决心要恢复宪法秩序，宣布于9月举行全国性的市政选举。6月16日美国民主党提名伍德罗·威尔逊。墨美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美籍墨西哥人叛乱者从墨西哥窜入得克萨斯，于是威尔逊于6月18日动员美国所有国民自卫队员在边境值勤。6月21日在奇瓦瓦的一名远征军巡逻兵激起了一场同卡兰萨派士兵的严重冲突，结果其中一半人被杀或被抓。威尔逊于6月24日恐吓说要对墨西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卡

[30] 阿瑟·S·林克：《威尔逊：混乱和危机（1915—1916年）》普林斯顿，1960，第290页。

兰萨下令释放被抓获的美国远征军。到6月底威尔逊才作了一点让步。他和卡兰萨于7月初都同意在美国恢复举行美墨联合委员会的谈判；但卡兰萨因为知道在11月份美国大选以前谈判不会有什么重大结果，所以没有延长任命他的特派员。然后他任命的一些特派员都是卡兰萨派，很有可能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并有利于墨西哥政府的卡兰萨派分子：路易斯·卡夫雷拉、阿尔韦托·帕尼和伊格纳西奥·博尼利亚斯。

125

但在国内，首席长官失去了许多权力。最主要的是把军事部交给奥夫雷贡；3月15日奥夫雷贡还得到卡兰萨的授权，可以直接从国库领款。不久整个军队贪污盛行。军队编制扩大到12.5万人。各个将领，有的得到奥夫雷贡的同意，有的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实际上都在挪用铁路、财产没收办事处和调节委员会的钱。奇瓦瓦州的特雷维尼奥司令部成为贪污的典型，而冈萨雷斯在莫雷洛斯州的战役则是掠夺的一次大暴露。

政府金融政策的明显失败也是衰弱的原因。4月4日卡兰萨设立了货币委员会（一家初步的中央银行）并准备于6月发行5亿无法作假的货币。这一消息传出以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实际工资再次下降，使有组织劳工的斗争变得更具进攻性。早在3月5日和17日之间，代表联邦区和7个州的100个左右工会的代表大会，由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和韦拉克鲁斯港的无政府主义者主持，成立了墨西哥地方工人联合会(CTRM)，它们要以"直接行动"进行"阶级斗争"，争取"生产资料社会化"[30]。5月份比索跌至0.02美元。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及主要的铁路车间工会根本无视军事部的管制条例，在护宪派铁路上组织了一次要求以金本位支付工资的罢工。政府镇压了这次运动，然后同意这些工会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在墨西哥各工厂企业里

[30] 罗森多、萨拉萨尔和何塞·G·埃斯科韦多：《农夫的战斗，1907—1922年》第1卷第179页，墨西哥，1923（二卷集）。

是最早的。就在这时，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一次要求以金本位支付工资的总罢工，最后至少在书面上赢得了这一要求。6月份无法作假的比索比价为0.10美元，但是货币投机买卖仍继续不断，使小债户和工人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于7月31日再次号召总罢工，使这个城市在几天里完全瘫痪。政府进行了镇压，罢工的许多领导人都被军事法庭逮捕下狱。罢工也冲击了矿区和图斯潘，以及米纳蒂特兰的石油设施。

在一切希望都落空的情况下，卡兰萨在国内取得的唯一突出成功是反对费利克斯·迪亚斯，使迪亚斯在7月份之前同韦拉克鲁斯、瓦哈卡和恰帕斯的前联邦军队逃兵混在一起，加上赫苏斯·卡斯特罗在本区的统治，使他无法发动进攻。由于卡斯特罗作出了这一贡献，最后被授衔为第十一位军区将领。

126 危机过后，卡兰萨派重新开始进行"重建"。8月15日政府要求经营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放弃他们本国的权利。9月3日墨西哥举行市政选举，向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地方首领合作制迈开了第一步。虽然联合委员会于9月6日开始工作，但美国人提出，在墨西哥对外国人生命财产提供"正式保证"之前，暂时不讨论讨伐军撤退的问题，9月14日卡兰萨命令矿业公司必须恢复正常生产，否则就将剥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32]同一天，他宣布于10月22日举行立宪大会，次日他查封了所有的银行以及它们的金银储备，大约有价值2,500万美元的黄金，作为中央银行的资金。

但是由于这场危机，"重建"实际上是地方化了。当时政府与大约20名重要将领之间的矛盾是墨西哥最重大的冲突，政府具有一个全国计划，但力量不大，将领们因妒忌而相互分裂——有几个人，主要是阿吉拉尔和塞萨雷奥·卡斯特罗拥护卡兰萨；有

---

[32] 罗伯特·F·史密斯：《美国和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1916—1932年》芝加哥，1972，第57页。

一些人，主要是奥夫雷贡和冈萨雷斯则随波逐流；其他一些人则控制了地方据点，象索诺拉州的卡列斯、塔毛利帕斯州的卡瓦列罗、哈利斯科州的迭格斯、瓦哈卡州的赫苏斯·卡斯特罗、或尤卡坦半岛的阿尔瓦拉多，他已经组织了一个政治机器——社会主义党。那年夏季再次干旱，使将领们对地方事务加紧控制。困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叛乱者重新活跃起来。9月15日—16日，比利亚袭击奇瓦瓦城夺取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两周以后萨帕塔派也开始侵入联邦区。

10月份，首席长官和将领们对新的冲突确定了他们的战略。卡兰萨的战略是为短期考虑的，利用他行政长官的职务在他恢复正规政府以前尽量消除使他衰落的各种原因。在他首次直接同德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就向柏林提出建议说，如果德国帮助促使华盛顿撤回讨伐的远征军，他就向德国提供潜艇在墨西哥设施。他放弃了征收粮食进口税。同时，由于无法作假的货币已下跌至1比索等于0.03美元，他下令以金本位支付税款和工资。而将领们的战略则是从长期考虑的，不直接向卡兰萨挑战，但也不让他有效地统治下去，而最终在他们的将领中确定继承人。10月22日卡兰萨和各将领的官吏们被选入立宪大会。第二天冈萨雷斯、奥夫雷贡和其他将领们在墨西哥城会晤，正式组成了立宪自由党，这是他们个人政治活动的一个掩护。他们宣布，立宪自由党将支持卡兰萨竞选总统。还将为他提供虚弱的反对派。 127

1916年11月的国际形势促进了墨西哥政治上的非集中化。由于索默和威尔逊重新当选问题上的僵持，使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发生冲突，无论是华盛顿还是柏林对待卡兰萨政权都更加谨慎小心。现在两国都不支持一个中央集权的墨西哥政府，因为它们都认为另一方可能最终会赢得墨政府的忠诚。为了彼此不让对方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和德国都力图促使卡兰萨、将领们和叛军之间的冲突。

11月份，首席长官再次向柏林作出姿态。他并不破坏中立，

但改变态度，提供德国密切的商业和军事合作。可是德国外交部拒绝了这一“建议”，德国大使反而在重要的将领中间收买了一批亲德分子，德国的特工人员策划支持比利亚，并在坦皮科安插阴谋破坏者。当德国政府于1月9日批准决定恢复没有约束的潜艇战后，外交部长齐默尔曼便给大使打电报发去了1月19日的新指令。潜艇将于2月1日采取不予约束的行动。美国如果像预计的那样向德国宣战的话，德国大使就会向卡兰萨建议建立德墨联盟："共同作战，共同缔造和平，提供大量财政资助，并在我们方面同意墨西哥夺回它以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领土”。[33]但是这是一个使墨西哥遭受毁灭的方案。

11月24日美国和墨西哥政府联合特派员签署了要求讨伐军无条件撤退的议定书。但是，最初的讨论仍然暗示，如果墨西哥政府无法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美国军队可以再回到墨西哥。为了报答美国撤销再次干涉的权利（即使含蓄地表示撤消），卡兰萨废除了声名狼籍的无法作假的货币（已跌至1比索等于0.005美元），下令恢复使用金币和银币，并把外国公司放弃它们本国权利的要求延迟4个月。接着他的特派员报告他拒绝该议定书。1月3日美国特派员建议威尔逊简单的撤军，于是威尔逊才下令把远征军调回。但是卡兰萨并没有赢得权力。他让驻纽约的一名使者于1月份向摩根要求借贷1,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提示，摩根对这一要求不予考虑。2月5日，也就是最后一批远征军返回美国本土的那一天，墨西哥政府要求允许进口禁运的弹药。国务院没有把这一要求转告给威尔逊。于此同时，美国新任武官在墨西哥城热情地接待了军事部长奥夫雷贡。美国代表们私下开始企图恢复同比利亚的接触，并继续不断地向佩莱斯献殷勤。

128

---

[33] 弗里德里希·卡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欧洲、美国和墨西哥革命》芝加哥，1981，第354页。

与此同时，将领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军事部长奥夫雷贡的态度就像反对派头头，公开谩骂首席长官的革新派部长和助手们。叛军们加紧战斗：11月27日比利亚军队再次侵入奇瓦瓦城，夺取更多的军事物资；12月底比利亚派军队占领了托雷翁达一周，强迫借给大量的钱和夺取更多的战利品。当卡兰萨把特雷维尼奥派回蒙特雷并派穆尔吉亚去奇瓦瓦的时候，比利亚很快便遇到了对手。1月初比利亚被穆尔吉亚击败以后，便把他的部队撤回到马德雷山脉，但他们拥有可以进行长期游击战的大量资源。1月中旬佩莱斯在坦皮科一图斯潘油田展开了全面进攻。萨帕塔派也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把剩下的最后一批白银在卡兰萨派的黑市交易市场上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经过莫雷洛斯随后进入普埃布拉开展了一场攻势。到1月中旬，他们已经把冈萨雷斯的部队赶出根据地，并把干部和民政机关组织起来。2月初他们让帕拉福克斯开始组织地方土地委员会和一支新的正规部队。

似乎是在台风眼里，1916年11月20日在克雷塔罗召开了立宪大会。200名左右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人名义上代表了墨西哥中部从哈利斯科到韦拉克鲁斯的人口众多的各州，那里的各个将领都使自己当了选。其中至少80%是资产阶级，75%是这些省里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多数代表都有相当多的经验：31人曾担任26届议会的代表，另外150人曾在1914—1915年马德罗的护宪派政府中担任过公职，并是护宪派军事参谋部的成员。在思想上他们大部分人公开主张反对教权自由主义。大多数书生气十足的人中，少数人表示信奉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自由改良主义。有一人是虔诚的工联主义者。 129

首席长官于1916年12月1日为大会揭幕，提出了他的新宪法草案，并向代表们指示在1917年1月31日结束大会议程。他对1857年宪法提出的唯一重大变动是加强总统的地位，削弱议会和州政府的权力，并授权成立一个中央银行。作为交换，他建议实行4年为期、不得连任的总统制（副总统也不能连任），成立独立

司法制度，并保证地方自治。

得到信任的卡兰萨派分子经管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工作，但在一个星期内就把领导地位输给了经常与奥夫雷贡商量并要求把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写进宪法里去的代表们组成的一个委员会。12月11日该委员会开始报告对卡兰萨草案的修改情况。执行委员会对忠诚的"卡兰萨自由派"和暴发的"奥夫雷贡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感到不满，[34]而他的对手则对老的卡兰萨派文职人员中的右翼少数派和年轻的人民战士中左翼多数派之间的分歧大加指责。这主要是讲演的内容。一旦投票开始时，代表都一条又一条地以多数票通过，有些条是一致通过。卡兰萨赢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职位，并可以授权成立中央银行。委员会在宪法的社会和经济部分获得了胜利：第3条取消了宗教教育；第27条国家的自然资源归墨西哥国家所有，具体说明土地和水域归墨西哥所有，并授权没收大庄园及其分支归属小农场和公共土地；第123条限定每天8小时工作，保证有权成立工会和罢工，并建立强制仲裁制；第130条规定宗教礼拜仪式，不许教士批评宪法或政府。

1917年1月31日代表们签署了新宪法，卡兰萨于2月5日就加以颁布。新总统将享有很正式的权力。但是由于他不能有效地实施其权力，他的反对者可以有大量机会进行抗议、批驳和鼓动。

130 这时国际危机已经加剧。威尔逊总统为了对德国于2月1日宣布其新的潜艇政策作出反应，于2月3日跟柏林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和德国都竭力削弱对方在墨西哥的影响。美国矿业和石油公司提出强烈抗议，反对新宪法，特别反对"没收产业"的第27条。[35]2月8日德国外交部长齐默尔曼通知驻墨西哥大使，让他

---

[34] 《1916—1917年宪法会议讨论情况日报》第一卷第641—682页（二卷集，1960年墨西哥版）；E·维克多·小尼迈耶：《克雷塔罗的革命：1916—1917年墨西哥立宪大会》第60—61，220—222页（1974年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版）。

[35] 黑利：《革命和干涉》第245页；史密斯《美国和革命民族主义》第89，91页。

“毫不拖延地”去建议建立德墨联盟。[39]2月20日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向墨西哥外交部长阿吉拉尔提出了这一建议。在这期间德国的特工人员向将领们提供了大量资金，并精心安排了坦皮科周围的破坏活动网络。3月1日威尔逊公布了齐默尔曼关于建立德墨联盟建议的电报，从而激起了美国人意料中的大哗。3月3日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向卡兰萨递交国书，但没有多久，国务院便把一家纽约银行拟借给这个事实上的墨西哥政府2000万美元的建议书禁止了；而且还秘密地批准给佩莱斯运送弹药。3月中旬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击沉了3艘美国船。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

在双方这么大的压力下，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及其将领们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态度完全一致。第一，为了避免美国再次进行干涉，他们一致赞成在欧洲战争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对美国和德国都讨好的策略。2月12日卡兰萨任命亲美的博尼利亚斯为驻华盛顿大使，但第二天他公开强调墨西哥严守中立。在随后几星期的紧张日子里，卡兰萨暂时不再要求矿业公司恢复正常作业，宣称将来的正式政府会恢复偿还外债，任命亲美的帕尼为工业和商业部长（主管石油）；并且向美国表示说甚至连他对德墨联盟的建议都不知道。美国宣战以后，卡兰萨私下拒绝了齐默尔曼的提议。4月24日他再次推迟了要求外国公司放弃本国的权利。但是他给德国间谍和宣传人员提供了掩护，故意让一名为德国做事的墨西哥代理人担任交通部长。

其次，卡兰萨和将军们共同拼凑组成一个立宪政府。3月11日在军队监督下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在213,000张总统选票中，卡兰萨获得197,000张（冈萨雷斯和奥夫雷贡得了其余的选票）。议会的所有席位都归立宪自由党。4月1日，卡兰萨授权临时州长们举行选举正式的州政府。4月15日几乎紧接着新的议会召开以后，200名左右的代表们便分裂成绝对追随卡兰萨的20人，奥夫雷贡派80人，以及“无党派分子”100多人。 131

[39] 卡茨：《秘密战争》，第363页。

1917年5月1日新的墨西哥政府正式组成。首席长官在墨西哥城宣誓就任新总统，任期到1921年11月30日。于是新宪法开始生效。与此同时，真正的“重建”工作——使外国和本国企业再次同全国和地区政治建立持久的联系——继续进行。

1917年 5 月至1918年10月

在整个1917年，墨西哥的经济得到恢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对墨西哥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了。标准石油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以及阿吉拉石油公司使石油生产空前地迅速增长。矿业公司也同样繁荣，金、银和铜的产量达到了接近正常的水平。虽然那年夏季的雨水又一次很少，但西北部水浇地农业重新获得了丰收机会，那里墨西卡利的棉花种植者，索诺拉的鹰嘴豆农民和锡那罗亚的蔗糖种植者成为出口巨头。在尤卡坦半岛，龙舌兰委员会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把价格提高了一倍多，获得了空前利润。同时由于出口和国内市场重新恢复，蒙特雷的钢铁冶炼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生产。谷物商以它们不多的库存赚了很多钱。

经济复苏使各种政治权力——课税、贪污、贿赂——不断增加。但是只有税收这一项进入财库，而这又不足以使卡兰萨把其它权力都集中起来。新组成的政府每月收入平均达1，100万比索，比以往政府的收入都要高得多。但是当时的支出每月达1，650万比索，其中1，000万比索用于军队开支。5，500万比索的赤字是用查封的银行储备来补偿的，可是按照这种数额，是支持不了一年的。政府需要一笔贷款，也许只是为了维持下去，当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否则大部分贪污贿赂所得的不义之财就会继续被控制这些财物的那些将军们中饱私囊，从而加剧权力的分散。

132

卡兰萨总统设法立即获得对政治和财政的控制权力。5月1日他叫军事部长奥夫雷贡辞职，并让他的接班人赫苏斯·卡斯特罗担任副部长。5月8日他要求议会审议成立中央银行。5月中

旬，在纽约的一个墨西哥银行家私下传出摩根要给予支持的消息。摩根随和地指使卡兰萨去了华盛顿。5月底，在卡兰萨的邀请下，一个美国私人顾问小组抵达墨西哥城，建议政府进行财政和金融改革。由于美国打乱了德国的计划，齐默尔曼再次暗中建议同卡兰萨联盟；但卡兰萨没有理睬。

卡兰萨继续把更多的庄园归还给其主人以博得老地主们的欢心。正如墨西哥考德雷公司的一位经理所说的："目前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说明，政府并不是完全依靠激进的军人；无疑卡兰萨正在尽量摆脱极端分子……你们也许知道，他们已经归还了唐·何塞·利曼图尔的财产……"。㊲

6月，财政部长卡夫雷拉声称，墨西哥准备向美国银行借一笔贷款。他然后让该部出席众议院，并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从7月12日到8月4日，工商部长帕尼率领全国疑心最大的商人们从头到尾参加了一次全国大会；会议宣布热烈拥护政府，赞成计划召开全国商会代表大会。7月23日，议会授权政府向国外借款2.5亿比索，其中1亿比索用于建设中央银行。墨西哥在纽约的使者私下说服了摩根考虑给予5或10年为期的贷款，以偿还拖欠的债务并最终全部清偿外债。在8月初，当美国大使报告说石油公司对宪法第27条非常担心时，卡兰萨向他保证，新宪法并没有规定"没收"这一项。㊳齐默尔曼又一次秘密提议建立德墨联盟，卡兰萨再次不予理睬。8月20日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国务院道义上会批准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并于8月31日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卡兰萨政府。卡兰萨于9月1日派卡夫雷拉去纽约着手正式谈判借款的事，并把道格拉斯召唤到墨西哥住了一个月跟他进行磋商。二周以后美国海关向墨西哥放行了长期在边境禁运的军火弹药。

133

㊲ 卡茨：《秘密战争》第293页。

㊳ 美国国务院：《1947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华盛顿特区，1926，第1072页。

但是所有的谈判和活动没有捞到一分钱。在纽约，卡夫雷拉发觉摩根如果没有华盛顿作担保什么都不愿意借给；而在战争期间，除非墨西哥承担反抗德国的义务，否则华盛顿就什么也不会担保。国务院建议墨西哥向美国政府借钱。卡兰萨拒绝了。当国务院知道卡兰萨政府需要进口金锭、银锭和谷物时，就加紧限制美国黄金、工业设备和粮食向墨西哥出口。10月中旬，卡夫雷拉抨击美国的石油公司游说阻止向墨西哥贷款，并于11月 1 日终止纽约的谈判。

在这期间，将领们着手加强他们自己到1920年的长远政治地位。现在卡兰萨的女婿阿吉拉尔离开了外交部，去韦拉克鲁斯担任州长。奥夫雷贡离开军队后很快便在经营索诺拉鹰嘴豆交易中发了财，于9月中旬从洛杉矶到华盛顿横跨美国，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强使博尼利亚斯把他介绍给美国国务卿。从经营墨西哥城谷物交易中发了财的冈萨雷斯，负责 9 月份军火弹药的装运，俨然以墨西哥主要军事人物的身份出现。伊尔和特里维尼奥依仗他们在墨西哥城的官方职务，在首都培植一些关系。卡列斯在索诺拉州建立了他的据点，而当选为哈利斯科州长的迭格斯则把他的影响扩大到周围各州。穆尔吉亚成为奇瓦瓦州的首脑。科斯准备在科阿韦拉州长的竞选中获胜。卡瓦列罗也想竞选塔毛利帕斯州州长，而阿尔瓦拉多则一心想统治整个东南部。

而且，经济复苏和政治分裂加强了工人运动。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以及墨西哥机械工人联合会把它们的老分支机构尽量独立地重新组织起来。由于得到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工联主义浪潮的鼓舞，工联主义者组织也在各个矿区，如托雷翁、坦皮科等地出现。早在 4 月，坦皮科所有油田的石油 134 工人便举行了罢工。5 月份石油工人在米纳蒂特兰再次举行罢工，6 月份在坦皮科举行总罢工，接着于10月份又一次总罢工。从 9 月初到10月中旬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的纺织工人使几家大工厂全部停工。使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坦皮科于10月中旬举行了

另一次劳工大会。代表联邦区和11个州29个组织的代表们把墨西哥地方工人联合会（CTRM）改组为总工会(CGO)，宣称“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直接行动进行阶级斗争”，并同意在战略上把新的总工会的基地设在托雷翁。[60]

在这期间，叛乱分子至少守住了他们的阵地。5月份，比利亚派袭击了奥希纳加。7月份他们又袭击了奇瓦瓦州南部。佩莱斯坚持控制坦皮科—图斯潘油田。在莫雷洛斯的萨帕塔派开始同其它叛乱运动协商进行合作。经过挣扎了一年之后，从6月份起费利克斯派才侵入米纳蒂特兰油田。

由于英国军队于1917年10月份在比利时战场上已精疲力尽，以及同年11月份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略上转入西线美军与德军增援部队之间的争斗。与此同时，美国与德国在墨西哥的斗争条件也再次发生了变化：然而美国却继续反对卡兰萨派的权力集中，柏林则同意墨西哥保持中立。卡夫雷拉在纽约失败以后，于11月份跑到华盛顿，请求美国放宽对墨西哥的出口贸易。卡兰萨想按照他的美国顾问所谋划的那样成立债权委员会来设法缓和协议。但是国务院明显地拖延不办以致卡夫雷拉只好于12月中旬离开华盛顿。由标准石油公司，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和盘踞在伊图尔维德周围的流亡分子参加的另一个阴谋集团组成以后，它们试图推翻墨西哥政府。而德国驻墨西哥的官员却不同，当时他们为了让墨西哥在大战期间继续保持中立，并在日后有利于德国贸易和投资，他们向卡兰萨政府提供了一笔7000万比索的贷款，但是无法得到柏林的确认。

得不到美国或德国的支持，卡兰萨必须到别的地方去举债筹措新的资金，否则卡兰萨政府很快就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设法在国内借债，他嘱咐帕尼准备召开全国制造商大会。在这期间，他让冈萨雷斯策划发动一次进攻，夺取莫雷洛斯州以及当

[60] 萨拉扎尔和埃斯科韦多，《田野的战斗》第1卷第243页。

135 地的种植园，并把迭格斯从哈利斯科州召回，把穆尔吉亚从奇瓦瓦州召回，准备发动一场夺取坦皮科—图斯潘油田的重大战役。据猜测他还设法会见考德雷，因为美国军队在欧洲被打垮后使阿吉拉在墨西哥很容易受到美国的挑战。

所有这些冒险行动除了一桩以外，证明都是使人失望的。从1917年11月17日到25日，制造商聚集在一起开了会。但是与商人们不同，他们对新宪法提出抗议，并强烈重申他们有权保护企业的秘密并将在新的全国产业公会联合会上作辩护。冈萨雷斯的部队只夺得了莫雷洛斯州东部1/3，而迭格斯—穆尔吉亚战役实际上失去了大批土地。迭格斯转移到油田；但比利亚派再次侵入奥希纳加，穆尔吉亚就无法离开奇瓦瓦州，因此他不得不退到已经削弱了的根据地。经过12月份围绕东北部多次的打击，迭格斯终于破坏了科斯对科阿韦拉州选举的控制，并挑起科斯进行造反。在塔毛利帕斯，由于迭格斯破坏了卡瓦列罗在2月份举行选举的计划，一帮新的费利克斯派开始进行叛乱，佩莱斯派也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只有同考德雷的会见才是成功的——在12月中旬在特万特佩克铁路公司（这是考德雷和墨西哥政府合营的公司）问题上达成的交易，免除了300万美元现金和450万美元证券。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严重麻烦的征兆。1918年1月1日，立宪自由党中的奥夫雷贡派首次公开指责总统干预各州的选举。1月12日，由于沿得克萨斯边界上发生新的骚乱，美国下令军队追击嫌疑犯到墨西哥境内。1月14日一起阴谋推翻卡兰萨的军事政变被破获，参加这次政变的人员有墨西哥城、韦拉克鲁斯和其它重要城镇的卫戍部队。

卡兰萨的寻求支持已变得越来越不会有多大希望；为了抵制立宪自由党的力量，他鼓励组成新的全国合作党，首先在萨尔蒂约召开一次全国劳工大会，以便把各个工会从总工会里拉出来。为了引起各村庄对他的政府关心，当他继续把扣押的财产归还给地主并鼓励他们把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地方民兵的时候，他至少使

全国土地委员会首次站稳了脚跟。暗中他让迭格斯跟佩莱斯进行谈判，同时，他还派财政部副部长去华盛顿再次试图要求美国放宽对出口的限制规定。这最后两桩事很快便告失败。

卡兰萨于是采取了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根据宪法第27条，于2月18日，他下令对石油工业征收新税。首先要求在5月20日前对所有的油田所有权进行登记注册，鼓励人们揭发没有登记的土地；同时不仅对土地征税，还要对租金、矿藏使用费以及在新宪法生效前后按照合同生产的产品征税。数天以后，仿佛是报答，柏林批准了一笔贷款，可是只有5百万比索，而且是存在马德里银行帐户上的西班牙货币比塞塔。美国石油公司不仅对税法提出抗议，它们于3月份还把国际收割机公司和一些其它大公司拉在一起组成一种广泛的与众不同的联盟，阴谋策划推翻卡兰萨。这次它们选择了曾经当过卡兰萨代理人的阿尔弗雷多·罗夫莱斯·多明格斯为取代卡兰萨的候选人；多明格斯积极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这期间，另一次总罢工使坦皮科城处于瘫痪状态。在得克萨斯—奇瓦瓦边境上美国和墨西哥的冲突不断加剧；4月2日，美国国务院指责说，税法试图侵犯美国在墨西哥的既得权利，并提出警告说，美国可能不得不"保护其公民们被剥夺的或者受破坏的"财产……"。[40]罗夫莱斯·多明格斯几乎每天都去拜访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公使馆。

136

卡兰萨为了谋求国外帮助的最后机会，派了一名使者去马德里同德国人进行谈判。而在国内他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军队要求65%的预算资金。制造商们再次要求尊重私人产业，包括美国人的产业。到4月中旬，得克萨斯和奇瓦瓦边境上的美墨争吵似乎已经发展到处于战争的前奏，而比利亚的军队这时又侵入奇瓦瓦州南部。在塔毛利帕斯，卡瓦列罗在州长的选举中最终失利以后，发动了叛乱。在格雷罗州、普埃布拉州、特拉斯卡拉州的地

[40] 史密斯：《美国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第118页。

方倾轧发展到了叛乱。军事部副部长本人只能控制普埃布拉州。

那时卡兰萨拢络工人的意图也发生了副作用。5月1日代表联邦区和16个州的115个工人阶级组织于萨尔蒂约举行大会。由于卡兰萨派分子事先的准备，1/3以上的组织都是比较听话的科阿韦拉的各个工会。但是科阿韦拉的工会会员无法控制墨西哥电工工会和坦皮科的“工人之家”。代表大会于5月12日闭幕，成立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这个联合会虽不稳固，但在政治上是工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独立的联盟组织。

137 卡兰萨于5月20日把石油税法规定的所有权最后登记期限延长到7月31日，同时，帕尼着手同美国石油公司的律师们讨论关于修改石油税法的事情。这时美国的态度也稍微有点缓和下来。威尔逊于6月7日再次表示，美国希望同墨西哥保持友好的关系。将近6月底，国务院决定实行一项“十分宽宏的禁运政策”。[41]不久便批准几种商品大批运往墨西哥，其中主要是谷物。

但是到6月底，墨西哥政府当前的收益花费殆尽。卡兰萨在马德里的代表跟德国人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位总统即使多方恳求也无法再从商人和制造商们那里得到支援。他与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机械工人联合会或新成立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关系也并不良好。比利亚派在奇瓦瓦州仍对姆尔吉亚造成威胁。尽管在蒙特雷有迭格斯的指挥部，在科阿韦拉和塔毛利帕斯还是发生了三或四次叛乱，佩莱斯派始终出没在坦皮科—图斯潘油田。虽然没有帕拉福克斯（在对谈判重新调整战略方针时他被解职），萨帕塔派仍然控制着莫雷洛斯州大部分地区。至少有十几个其它叛乱部队在墨西哥整个中部已经重新恢复活动或发展起来。在普埃布拉、瓦哈卡和韦拉克鲁斯州，费利克斯派分子成倍增加，他们在米纳蒂特兰油田不断加强活动。

1918年7月15日，德国军队越过法国马恩河发动进攻。这次

[41] 出处同上，第122页。

大规模的进攻不仅使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结束，而且也可以使墨西哥仍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7月28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使立宪自由党中的卡兰萨派获得了多数。同时那年夏季的雨水在5年里第一次十分充足。但是在德国的进攻没有肯定成败以前，墨西哥的政客们仍然犹豫不决。7月31日卡兰萨又把实行征收石油税的最后期限延长了两个星期。

8月初，德国人的失败终成定局。8月14日，卡兰萨放弃了税法的头条原则，取消对所有权登记的要求，并指令帕尼着手同美国石油公司律师们谈判，把宪法第27条列入双方可以接受的基本法中。但政治上有见识的任何人都懂得，这位总统已无法再有机会从对手那里夺回权力了。9月中旬，奥夫雷贡开始把他的产业变卖成现金，以便认真参与政治，比两年前实力更强的比利亚，再次侵占了奇瓦瓦州南部。迪亚斯于10月1日发表谈话赞扬“联盟”，号召所有“爱国者”联合起来推翻卡兰萨。[42]10月20日他的部队开始发动对韦拉克鲁斯、普埃布拉和瓦哈卡州的首次大规模进攻。 138

1918年11月至1920年6月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胜利者，在世界各地享有新的自由权利。特别在墨西哥，只有它才享有权力可以任意施加压力。它不用冒别的强国进行干涉的风险，如果卡兰萨不同意谈判宪法第27条，美国甚至可以撤消对卡兰萨政府的承认。这就使墨西哥失去中央集权政府的可能性。

大战以后的经济状况，使墨西哥按地区进行的“重建工作”得到肯定。虽然美国的繁荣又持续了两年多，美国对墨西哥产品的需求却情况不一。对贵金属和石油的需求量始终很高，但对铜的需求量很快下降，而对龙舌兰的需求量则一蹶不振。西班牙的流

[42] 利奇加：《费利克斯·迪亚斯》第489—504页。

行性感冒，给墨西哥人的生命带来的灾难性打击也许是350年来最严重的，它使生产和贸易大量下降。第一次冲击于1918年10月初发生在东北部，而第二次可怕的流行性感冒浪潮则遍及全国各地，一直延续至一月中旬。在全部12.5万名士兵中有25,270人因受流行性感冒的传染而病倒，1,862人死亡。总共受西班牙流感而躺倒的墨西哥人约有5百万之多。就死亡人数较低的估计来看大约占全国人口2.5%到3%，共40万人左右。死亡人数中可能有一半的人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所以说，在四个月内墨西哥死了4%最强壮的人。从经济趋势到传染病流行，墨西哥湾的遭遇最好，东北部和西北部其次，比北部和西部要好得多。后面这两个地区不管损失有多大，还比中部和南部的遭遇要好一些，比东南部更好得多，东南部已陷入长期萧条的境况。

国家政策开始按新的方针转变。从1918年11月起，对1920年7月总统大选作决定的斗争已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争论。虽然这已不再是为中央集权的斗争，但却远超出地方夺取中央公职的斗争。它提出了重大的历史问题——存在严重争执的墨西哥社会上是否任何一个地方集团能在墨西哥城建立统治权力，如果可以的话，那是哪种集团？是什么样的统治？同时，这也引起了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的危险。由于卡兰萨和他的任何对手都没有力量控制接班问题，由于立宪自由党只不过是徒有雄心壮志的民族派别的空名，这场斗争势必无法导致联盟，而最终只能形成实力的较量，各个强手都力争要把别的派别压倒。

就政治压力来说只有两个战略基地：西北部和东北部。战争一结束，奥夫雷贡便开始组织他的总统竞选运动。虽然他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受到尊敬，而且是西北部最富裕的人之一，作为墨西哥公民，他保持墨西哥最高军事英雄的国内威望，到1919年1月，卡列斯已把索诺拉州交给了他，而伊尔在墨西哥城已经建立了立宪自由党内部和外部对奥夫雷贡的支持力量。在这期间，冈萨雷斯开始组织他的竞选运动。他与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东北部

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或许是墨西哥最富裕的将军，对墨西哥州，莫雷洛斯州以及格雷罗州握有实际的指挥权。他于12月份再次把莫雷洛斯州的残余部队俘获作为他的部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了1919年收成而租借该州种植园的东北部人。在东北部，他的几位亲戚和一些老同事、老部下都拥护冈萨雷斯的事业。墨西哥城的特里维尼奥同样也是如此。当时哪一派都不要求有组织劳工的支持——这个领域太难对付而且太分裂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由于发展到铁路车间而遭到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反对；11月，由于不赞成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同美国劳联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FSODF）退出并在墨西哥城建立了工联主义的中央工人大队。

其他 6 个重要将领中，有 4 个保持中立。他们是蒙特雷州的迭格斯；辞去奇瓦瓦州司令、退休住在墨西哥城的穆尔吉亚；接替穆尔吉亚的军事部副部长卡斯特罗；以及离开衰落的尤卡坦半岛去出版墨西哥城一份热衷于总统竞选问题的报纸的阿尔瓦拉多。

卡兰萨并不指定他的候选人。由于考虑到在韦拉克鲁斯和普埃布拉州肯定只能是阿吉拉尔和塞萨雷奥·卡斯特罗，他没有理由太早地作出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引起奥夫雷贡和他的同盟者或冈萨雷斯和他的同盟者的对抗，甚至也许这两个阵营的对抗，也有可能4个中立的将领都跟他对抗。由于石油和白银的生产稳步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他可以使冲突推迟。1919年 1 月 1 日，他下令大量增加军官的薪金，并着手缓慢的、不加声张地减少军队编制。1 月15日他公开责备总统竞选运动为时过早，并坚持应推迟到该年年底。 140

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联盟以加强他自己这派的力量。11月中旬，他派帕尼担任驻法国公使，希望劝说巴黎和会宣告门罗主义无效，或者至少应恢复英国和法国银行家在墨西哥的利益。他屈服于美国石油公司的威胁。11月14日他延长了宣告免税到年底的日期。11月23日石油公司的律师们和帕尼起草协议，

使宪法第27条具有建制形式而作为总统向议会的提案出现。最明显的是免除了石油公司于1917年5月1日以前投资生产的土地税。12月27日卡兰萨延长免税的日期一直到议会投票通过提案为止（亲美的趋势使考德雷受到很大影响，3个月后他把阿吉拉石油公司卖给了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国内，卡兰萨向天主教的上层主教多方讨好，提议改动宪法第3条和第130条，限制地方上反教权活动，邀请并接受来自罗马的传道者承认墨西哥教会。他继续把没收的财产发还给地主——1919年3月受益者中有特拉萨斯家族——并匆忙地发布命令和通告保护他们的产业。此外，他为4月27日在索诺拉州即将举行的州长选举配备了当地卡兰萨派的候选人。

至关重要的是，卡兰萨还试图在纽约建立联盟。10月份以来，摩根已经同对墨西哥债务有兴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银行进行了协调。1月份，卡兰萨的财政部副部长参加了他们的谈判。2月23日，摩根宣布成立墨西哥国际银行家委员会（ICBM），一个月后，卡兰萨为了再次使该委员会感到放心，允许利曼图尔从法国回来访问墨西哥。3月29日卡兰萨的财政部副部长带回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为债务再筹款，同时在“国际管理”下以海关税收作担保发行新的“国内发展”债券。[43]卡兰萨于4月9日再次任命卡夫雷拉为财政部长，以便设法使宪法第27条提案和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的建议在5月1日召开的议会特别会议上得到通过。他还活动使冈萨雷斯派的竞选运动产生分歧，派遣特雷维尼奥去欧洲进行有利可图的参观武器弹药工厂的旅行。

141

但是尽管作了种种承诺，卡兰萨派不久便处于严重的失望之中。4月份在巴黎召开的4强协商会议承认了门罗主义。卡兰萨对邀请墨西哥参加国联表示拒绝。在奇瓦瓦州，比利亚发动了一场全面进攻。当冈萨雷斯的军队在莫雷洛斯伏击并于4月10日击毙萨帕塔后，他得到了地主们给的坚定信任。在索诺拉州州长选举

[43] 埃德加·特林顿：《墨西哥及其外国债权人》纽约，1930，第275页。

中，卡兰萨的候选人统统落选，而卡列斯的候选人阿道弗、德拉韦尔塔获胜了。议会特别会议不批准宪法第27条提案或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的建议。

卡兰萨把迭格斯从东北部召回，把塞萨雷奥·卡斯特罗从普埃布拉召回，以便帮助赫苏斯·卡斯特罗重新打倒比利亚。5月中旬，他派军队对没有登记的油田新钻井施加威胁。为了分裂奥夫雷贡派，他任命卡列斯为工商部长(负责石油)。为了吸引住贡萨雷斯，他把他的防御区扩大到包括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和瓦哈卡在内的一些地方。

但是卡兰萨的失意使他的对手十分鼓舞。奥夫雷贡于6月1日正式宣布他的总统候选人身份。6月27日他从尤卡坦的社会主义党那里首先得到正式支持。军事部副部长卡斯特罗从奇瓦瓦州回到墨西哥城，并通过军事部向他提供私下支持。尽管冈萨雷斯有新的职务，他也变得更加大胆，公开与奥夫雷贡辩论如何适当地宣布候选人的身份；他的东北部代理人却较难组织起来。在奇瓦瓦州，6月15日，当比利亚派袭击华雷斯城从而激起一场24小时的美国干涉时，迭格斯几乎还没有打开通往该州首府的道路。新莱昂州的州长选举于6月8日被卡兰萨不同意的一个人获胜，此人是比利亚雷亚尔的一位老朋友。卡兰萨停止了该选区结果的汇报，同时该州立即为选举奥夫雷贡和冈萨雷斯进行鼓动。在坦皮科，工联主义者领导了另一次总罢工。在东北部各个地方，因为迭格斯的去职减少了卫戍部队，各派叛乱分子重新开始频繁的袭击。6月6日穆尔吉亚成为蒙特雷的司令官，但是很快便同当地的首领们发生摩擦。6月25日叛乱分子袭击了维多利亚。在油区的佩莱斯军队向坦皮科靠近。

夏季，卡兰萨得到了一些收获。迭格斯粉碎了比利亚派军队的进攻，并在奇瓦瓦州建立了指挥部。塞萨雷奥·卡斯特罗控制了托雷翁。冈萨雷斯开始认为，他不必正式竞选总统职位，因为在多次虚张声势和回避以后，政府和军队都会把继承权让给他。 142

同时第二次多雨季节使在选举前的粮食短缺和输入得到缓解。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未登记的油井的威胁引起同美国发生再次对峙。6月末，石油公司指控墨西哥政府“公然采取行动”没收它们的财产[44]，美国国务院于7月22日警告卡兰萨说，华盛顿可以撤回对他的政府的承认。参议院于8月8日设立了由坚持主张进行干涉的艾伯特·B·福尔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对墨西哥事件进行调查”。[45]8月19日由6万人组成的美国军队驻扎在边界上，第二次惩罚性的远征部队又开进了墨西哥奥希纳加达一星期之久。

在这期间，奥夫雷贡本人得到了不少收获。由于伊尔的主张，立宪自由党于7月17日正式支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军事部副部长卡斯特罗在北部边境城镇的战略指挥部安插了持同情态度的将领。奥夫雷贡派的将领们开始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私下进行谈判。奥夫雷贡派要区域工人联合会局部地遏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索诺拉矿工中间进行的鼓动，主要是跟美国劳工联合会一起在别的地方，不仅是在墨西哥，而且还在美国，推动奥夫雷贡的竞选运动。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要求同工商部长卡列斯联系，以便恢复他们曾经输给工联主义者的组织权力。后来不久联邦区工人工会联合会便脱离了工联主义者的中央工人大队，并加入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就在这几个星期里，索诺拉州的德拉韦尔塔州长帮助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把索诺拉州的南太平洋铁路工人组织了起来。

福尔委员会于9月8日开始进行“调查”。它的主要证人，墨西哥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于9月10日至11日出庭作证8个小时诉说了关于卡兰萨派推行的暴政。

在这种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下，卡兰萨私下就他那一派的候选

---

[44] 史密斯：《美国和革命民族主义》第154页；

[45]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墨西哥事件调查：初步报告与听证》66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两卷集（华盛顿特区），1920，第1、3页。

人作出了决定。因为断定跟华盛顿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挑选了道格拉斯的政治门徒伊格纳西奥·博尼利亚斯担任他的驻美大使。9月末卡兰萨在科阿韦拉会见了迭格斯，并说服了他对这一选择的支持。10月2日博尼利亚斯加入了他们持续一星期的会谈。

再次同美国的对抗使华盛顿对墨西哥的政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10月19日，美国驻普埃布拉的副领事失踪了，据说是被佩莱斯派的叛乱分子绑架的。华盛顿吵着要对墨西哥进行干涉。副领事于10月26日平安出现，于是华盛顿的叫嚣才平息下来。卡兰萨于11月1日宣布，此时可以开始进行总统竞选运动，并表示支持博尼利亚斯。

但在以后的六个星期内，奥夫雷贡提出他对总统职位的要求是不能改变的。他于10月27日乘火车开始到西海岸去巡视。到12月中旬，他已经到过索诺拉、锡那罗亚、纳亚里特、科利马、哈利斯科、米却肯、瓜纳华托、墨西哥州和伊达尔戈进行政治活动，而且在墨西哥城逗留了十天。12月21日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中他的伙伴宣布成立墨西哥工人党。

在这期间，冈萨雷斯也再次肯定要竞选总统。他于11月5日声称，他不久就会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在他指挥下的普埃布拉部队再次挑起同美国的对抗，在11月14日逮捕了美国副领事，他们指控美国副领事串通他的绑架人员，以使美国有借口对墨西哥事务进行干预。华盛顿再次叫嚷要进行干涉。当道格拉斯和博尼利亚斯在华盛顿竭力为停止争吵进行商议的时候，冈萨雷斯则诱使萨帕塔派和费利克斯派的首领们同意实行“爱国的大赦”，与他休战。[46]冈萨雷斯派于11月27日在墨西哥城宣布成立冈萨雷斯党“民主同盟”。美国国务卿于11月28日通知博尼利亚斯说，如果他的政府不“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态度”的话，美国人民要责成

[46] 《环球日报》1919年11月21，30日，12月5，6，16，24，25日。

他们的政府同墨西哥断绝关系，那这“几乎意味着必然要发生战争”。[47]特雷维尼奥从欧洲回国以后，在蒙特雷为冈萨雷斯竭力进行政治游说。12月3日，福尔在参议院提出一项要求威尔逊下令144 同卡兰萨“伪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决议案。[48]12月4日美国副领事被释放。威尔逊于12月8日否决了福尔提出的决议案，于是双方冲突才告结束。12月10日，冈萨雷斯正式接受了“民主同盟”的总统提名。

比利亚也发动了一场新的竞选运动。他于11月2日袭击了萨尔蒂约，使东北部更深地发生分裂并把那里煽动起来。12月中旬，他在往彼德拉斯内格拉斯的进军途中袭击了煤矿区。穆尔吉亚因为始终跟地方首领们不和，不仅没有把比利亚派分子赶出科阿韦拉，而且甚至也没有保卫住新莱昂和塔毛利帕斯铁路线免遭当地叛乱分子的袭击。

华盛顿和墨西哥当时都很清楚，在总统选举之前会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问题是谁会首先采取行动——是卡兰萨搞垮奥夫雷贡，还是奥夫雷贡起来造反。不论发生哪一种情况，一旦卡兰萨派和奥夫雷贡派开始交战，冈萨雷斯便可以利用他在首都周围的军队发动政变。但奥夫雷贡派和冈萨雷斯派都不会对支持叛乱或政变的强有力机构——美国的石油公司、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参议院——构成威胁。

12月底，卡兰萨同阿吉拉尔、迭格斯、穆尔吉亚和其它一些人商量准备镇压。他还为博尼利亚斯的竞选活动作了准备。1920年1月13日，在道格拉斯和博尼利亚斯的怂恿下，石油公司要求允许进行临时性的钻探。卡兰萨于1月17日同意了它们的要求。次日，由卡兰萨派的议员、州长和将领们组成的全国民主党提名博尼利亚斯为总统。2月初外交部为协商建立一个各种要求的委员会开始了初步工作。而精简军队的工作仍继续在进行。

---

[47] 史密斯：《美国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第162页。

[48] 《国会纪录》66届国会第2次会议LIX第1部分（1919—20年）第73页。

奥夫雷贡为了准备进行叛乱扩充了他的组织，当他再次巡视巴杰奥和米却肯的时候，工人党正式向他保证作出支持。有几位北方的重要政客象阿尔瓦拉多一样，表示他们同情奥夫雷贡派。奥夫雷贡派的代表们私下联络了在得克萨斯的比利亚雷亚尔在科阿韦拉继续进行叛乱的科斯、以及在韦拉克鲁斯的费利西亚派主要首领，他们都同意接受“大赦”并等待奥夫雷贡任命他们就任新的职务。2月1日，卡列斯辞去了工商部长的职务，以便全心全意参加竞选。2月2日，奥夫雷贡派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全国大会。2月4日，奥夫雷贡本人到北方去访问了阿瓜斯卡连特斯和萨卡特卡斯，然后去东部访问了圣路易斯波托西。他于2月15日抵达萨尔蒂约进行了两周的政治活动。

在这期间，冈萨雷斯发展了他在墨西哥城的势力，于12月31日在宣布南方全部平定的同时，脱离了军队。他利用向首都最富有的绅士们进行谈话的时机，于1月13日开始正式呼吁同盟者。他在东北部的力量因此成倍增长。

145

2月10日卡兰萨解除了卡斯特罗的军事副部长职务，并任命他自己的参谋长去管理当时拥有85,000名士兵的那支军队。2月中旬，迭格斯结束了对奇瓦瓦军区长达一个月的视察。根据总统的特殊命令，他于2月27日出现在索诺拉，对那里的军队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视察，这是他巡视锡那罗亚、纳亚里特、哈利斯科和米却肯的继续。比利亚派再次侵入奇瓦瓦州的南部。穆尔吉亚同卡兰萨在墨西城商议后，便回到蒙特雷公开反对奥夫雷贡。奥夫雷贡在萨尔蒂约跟卡列斯商议后，于3月3日开始对科阿韦拉·新莱昂和塔毛利帕斯州进行了视察。佩莱斯派则在坦皮科—图斯潘油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所有这些运动甚至连当地的雇工都感到恐慌；美国于2月1日取消了对来自墨西哥移民的限制，因此在三月中旬大约有10万名墨西哥“盲流”跨越边境以逃避即将来临的暴乱。[49]

[49] J·T·迪克曼：《墨西哥边境概况》每周报告第362期，1920年3月20日。

在莫雷洛斯州，上述运动具有不同的意义——使萨帕塔派得到了东山再起，夺取失地的机会。3月份奥夫雷贡派同幸存的一些首领们秘密进行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许诺，在关心他们村落的情况下给予通力合作。

博尼利亚斯于3月17日抵达新拉雷多，正式接受了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3月21日他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他的欢迎队伍跟奥夫雷贡派的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3月25日迭格斯也抵达首都。萨帕塔派几乎经过一年的沉默以后，于3月28日重新在莫雷洛斯州和联邦区恢复了他们的骚扰活动。

在华盛顿公众舆论似乎支持卡兰萨。1月份在城里帮助福尔委员会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宣布辞职。2月中旬威尔逊解除了曾以撤销承认墨西哥政府来进行威胁的国务卿的职务，同时参议院于3月22日批准了威尔逊提出的取代该国务卿的人选。次日威尔逊任命了一位“进步”的驻墨西哥新大使。但实际上美国总统采取的进攻性政策已预示卡兰萨计划的恶耗。3月，民主党人和共146 和党人开始认真地为6月举行的全国候选人提名大会和11月份举行的大选进行紧张的准备。两党都会从墨西哥新政府上台时的暴乱形势中得到好处，倘若墨西哥政府尊重美国对墨西哥宪法第27条的要求并恢复美国的权利尤其是石油公司的权利的话，那么它们就会主张承认新政府。

3月30日卡兰萨突然采取镇压措施，同时把迭格斯领导下的奇瓦瓦军区扩大到包括索诺拉、锡那罗亚、纳亚里特、哈利斯科和科利马一些地区，指令迭格斯立即向索诺拉大量增援，并命令逮捕奥夫雷贡以及被赦免的因策划叛乱而受军事法庭指控的费利克斯派的首领。这一措施很快就失败了。在索诺拉州，德拉韦尔塔和卡列斯都谴责迭格斯的任命，并于4月3日以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反对南太平洋公司而举行罢工为借口，抢占了该州的铁路线，堵住了沿海岸的交通。迭格斯到达瓜达拉哈拉之后，便无法继续推进了。在蒙特雷，奥夫雷贡于4月4日私下

会见了就要去诺加利斯的阿尔瓦拉多。两天以后，奥夫雷贡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军事法庭上，否认对他的控诉。4月9日，索诺拉州立法议会宣布索诺拉独立，脱离联邦政府。4月10日，卡列斯掌握了该州所有军队的指挥权。4月12日，当奥夫雷贡接到通知叫他在次日再次出庭时，便逃离了墨西哥城，伊尔也同时失踪。

卡列斯于4月15日突然反叛，派了一支索诺拉军队攻占了锡那罗亚北部的主要铁路城镇。这次行动发展很快。阿尔瓦拉多从诺加利斯迅速赶到华盛顿，跟舍伯恩·霍普金斯商讨立宪自由派革命”。在锡那罗亚的奥夫雷贡派分子则占领了库利亚坎，并包围了马萨特兰。米却肯和萨卡特卡斯州的州长也起义了。从蒙特雷到马塔莫罗斯和坦皮科铁路线一带，以及坦皮科—图斯潘油田，指挥官们也纷纷起来造反。隐居在莫雷洛斯州的希尔，同该地的冈萨雷斯派将领们说，奥夫雷贡和冈萨雷斯私底下是进行合作的。奥夫雷贡不久便在格雷罗州再次出现，并受到州长和该州的指挥官们的欢迎。4月20日，当奇尔潘辛戈的立法议会批准了索诺拉州的独立宣言后，奥夫雷贡发表了致全国的一份宣言书以及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宣布招募索诺拉州为争取“选举自由”而斗争的新兵，同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也号召墨西哥工人阶级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起来造反。[50]

卡兰萨在作出反应时，试图私下同冈萨雷斯结成联盟。他建议，只要冈萨雷斯停止总统竞选活动，并在军事上为政府效劳，博尼利亚斯便也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那时卡兰萨和冈萨雷斯就可以商议选择另外的文职候选人。但是冈萨雷斯的要求更高——如果博尼利亚斯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同时卡兰萨要求冈萨雷斯在军事上效劳，冈萨雷斯便停止他的总统竞选运动，并帮助镇压叛乱，但将“在适当时刻”恢复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51]这个要

147

[50] 加莫致国务院的信，1920年5月9日。

[51] 汉娜致国务院的信，1920年4月30日。

求遭到卡兰萨的拒绝。

4月22日在索诺拉州的奥夫雷贡派用英文发表了阿瓜普列塔计划。[52]第二天又用西班牙文发表了该计划。在谴责卡兰萨违反宪法的同时，卡列斯和其它地方军官和官员给叛乱的军队起名为自由立宪军，任命德拉韦尔塔为临时最高长官，并许诺一俟立宪自由党人占领墨西哥城，现在的议会就推选一位临时总统，号召举行普选，并发誓保证“对公民和外国人的合法权利，特别对有利于工业、贸易和一切商业发展者给予法律保护和认真实施”。[53]4月26日奇瓦瓦城和奥希纳加的指挥官起义支持阿瓜普列塔计划，而西部的墨西哥州和莫雷洛斯州的冈萨雷斯派指挥官们同奥夫雷贡的代表进行了公开的协商。

4月27日卡兰萨和冈萨雷斯再次进行会谈。冈萨雷斯同意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并帮助卡兰萨，只要卡兰萨让冈萨雷斯提出的候选人代替博尼利亚斯。但是卡兰萨于4月28日拒绝了冈萨雷斯指定的候选人，并传令穆尔吉亚控制墨西哥城周围地区。

在华盛顿，共和党人全面控制了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参议院不想批准威尔逊对新大使的任命。福尔委员会很快便改为反对卡兰萨：4月29日该委员会听取了霍普金斯的证词，认为卡兰萨政府已经“彻底失败”，奥夫雷贡肯定会把政府推翻，然后新政府就会建立正常的商业秩序。[54]

冈萨雷斯于4月30日发动了政变，那时他和特雷维尼奥逃离首都，正式谴责卡兰萨，但没有提到阿瓜普列塔计划，仅号召军队起来为“革命原则”而战斗。[55]5月3日，这两位将领占领了普

148

---

[52] 克洛多韦奥·巴伦苏埃拉和阿马多、查韦思·马塔莫罗斯：《索诺拉和卡兰萨》墨西哥，1921，第274—275页。

[53] 同上，第362页。

[54] 《纽约时报》1920年4月30日。

[55] 全国再建党：《文件与重要声明汇编》蒙特雷，1923，第66—78页。

埃布拉城，并建立了自由革命军的总部，实际上在东部的墨西哥州、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冈萨雷斯派军队大约有12,000人。这次政变摧毁了政府。5月5日，卡兰萨推迟了总统选举，他预计奥夫雷贡派与冈萨雷斯派之间会发生对抗，因此号召军队和人民支持他，直到他把总统职位过渡给一位正式选举上台的接班人。他命令穆尔吉亚掩护他们逃到东部，5月7日，他和他的内阁成员，博尼利亚斯，最高法院和许多议员、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搭火车去韦拉克鲁斯，在那里，他们希望在阿吉拉尔保护下重组政府。

虽然政变成功了，但叛乱再次扩大。比利亚、佩莱斯以及费利克斯派的各个首领（虽然不是迪亚斯本人）表示支持。奥夫雷贡、驻莫雷洛斯州的冈萨雷斯派前任指挥官们，以及萨帕塔派的首领们——现在他们都是立宪自由党人——于5月2日占领了库埃纳瓦卡。华雷斯城的指挥官于5月3日起义支持阿瓜普列塔计划，萨尔蒂约和韦拉克鲁斯的指挥官们于5月6日也同样起义表示支持。5月7日，塞萨雷奥·卡斯特罗把对托雷翁的指挥权交给了立宪自由党人。

当卡兰萨一离开墨西哥城，起义和政变之间的对抗便变得明显起来了。特雷维尼奥于5月7日占领了首都，接着冈萨雷斯授予他权力。次日便正式发生对抗。在埃莫西约，德拉韦尔塔宣布自组内阁，任命卡列斯为军事部长，阿尔瓦拉多为财政部长。在墨西哥城，冈萨雷斯也任命他的内阁成员，由他本人担任军事部长。5月9日，当立宪自由党人攻占新拉雷多时，奥夫雷贡便率领8000名军队进驻首都。同一天，冈萨雷斯要求议会“解决当前的局势”，但再次没有提到阿瓜普列塔计划。[58]

叛乱继续扩大。5月10日，立宪自由党人攻占了马萨特兰。

[58] L·N鲁瓦卡瓦编：《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政治运动，共和国总统候选人，1920—1924年》第4卷第151页，墨西哥，1923，5卷集。

5月11日，在瓜达拉哈拉的迭格斯部队发生兵变，并逮捕了迭格斯，这时科阿韦拉、新莱昂和塔毛利帕斯的州长逃往边境；在卡列斯的命令下，比利亚雷亚尔离开埃尔帕索，开始在蒙特雷进行指挥。第二天科斯攻占了彼德拉斯内格拉斯，而坦皮科—图斯潘的立宪自由党指挥官和佩莱斯联合占领了坦皮科。两天以后，立宪自由党人攻占了最后一个边境城镇克塔莫罗斯。

149

5月12日奥夫雷贡和冈萨雷斯在军事部交换了意见。他们都完全同意彼此互相不交战。冈萨雷斯承认德拉韦尔塔有权召开议会以便推选临时总统。但在临时总统就职以前，他不会签署阿瓜普列塔计划或解散他的自由革命军。同时特雷维尼奥既指挥奥夫雷贡派的军队也指挥冈萨雷斯派军队追击卡兰萨。5月13日，还在埃莫西约的德拉韦尔塔召开议会特别会议定于5月24日推选临时总统。5月15日冈萨雷斯又一次要弄花招，放弃作为正式总统选举候选人的资格，这样他就可以担任临时总统。

卡兰萨从来也不知道相互对抗的消息。各类敌对的军队都在普埃布拉前后方挡住了他的护送队。5月14日，卡兰萨和一些贴身的助手以及穆尔吉亚手下的卫队骑马去普埃布拉北部山区，就在那里，卡兰萨于5月21日被当地的一批已经赦免的佩莱斯分子所枪杀。奥夫雷贡和冈萨雷斯立即对此表示谴责，并任命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特雷维尼奥把俘获的卡兰萨分子——博尼利亚斯、穆尔吉亚和其它几个人——转移到墨西哥城军事监狱。5月22日，德拉韦尔塔决定于8月1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9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

当时起义的声势已经淹没了政变。在动乱期间暂不交税的石油公司这时同意把税金交给立宪自由党人。5月24日，议会选举中德拉韦尔塔以224票对28票战胜了冈萨雷斯。5月26日，卡列斯调任军事部长。德拉韦尔塔于5月30日抵达首都，6月1日他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一直担任到11月30日。6月2日，奥夫雷贡在率领一支庞大的军事游行队伍通过城市之后，便辞去了指挥官的职

务，几天之后又重新作为候选人参加正式的总统选举。6月5日，冈萨雷斯辞去指挥官的务职，回到自己蒙特雷的家乡。

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

在最后的较量中，西北部的联合部队击败了分裂的东北军，并赢得了担当“复兴”国家的重任。但因为他们不象东北军那样跟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本国大企业有密切联系，他们并没有得到政治权力机构所需要的那种尊重和信任。他们无法像已经拥有权力的伙伴合法地领导他的合作者那样进行统治，只能像征服者那样警惕地处理与各种势力的关系，他们需要这些势力的合作主要是为了他们政权的安全。 150

所以他们最最关心的是尽可能及早得到美国的承认。但是福尔委员会恰恰提交了一份不同意承认的报告，并得到国务院的同意。该报告建议，在两国没有签订条约免除对美国人实行墨西哥宪法某些条款（主要是第27条）的情况下，美国不承认墨西哥政府。该委员会建议，签订了这样的条约，美国便提供大笔贷款以偿还墨西哥的旧债，并整修墨西哥的铁路。福尔委员会建议，如果墨西哥当局拒绝这个条约，像对别国一样对美国人也实施宪法条款，美国便派军队去墨西哥，把从墨西哥城到该国边境和各海港的所有交通线都控制起来。6月12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哈定为美国总统。由福尔起草的该党关于墨西哥的政纲，许诺一旦在墨西哥的美国人得到对他们生命、财产尊重的“充分保证”，美国便承认墨西哥政府。[57]7月6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考克斯为美国总统，该党对墨西哥的政纲答应只要美国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墨西哥尊重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便承认墨西哥政府。[58]

在夏季，西北部人搞起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临时政府。德拉韦

[57] 《纽约时报》1920年6月11日。

[58] 同上，1920年7月3日。

尔塔向华盛顿派了一名“特使”。由于石油生产继续繁荣，在固定收入日益增加的诱惑下，德拉韦尔塔让阿尔拉多发表了一份准备偿还外债的财政计划，然后跑到纽约跟摩根私下进行协商。他让21位新的军区将领和1.3万名新兵加入了军队。他任命特雷维尼奥为工商部长，对石油公司表示了容忍；任命一位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为联邦区州长，以制止首都的工联主义者，一个新的共产党已把他们组成墨西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联盟；任命比利亚雷亚尔为农业部长，致力于进行土地改革以安抚萨帕塔分子。151 他把迭格斯和穆尔吉亚关进了监狱，但把博尼利亚斯以及其它许多卡兰萨派的平民，同阿吉拉尔和塞萨雷奥、卡斯特罗一起，流放国外。他解决了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和机械工人工会领导的在墨西哥铁路系统的罢工，以及坦皮科和韦拉克鲁斯发生的总罢工。他使迪亚斯参加正式谈判以结束叛乱，甚至还同比利亚达成了和解。比利亚于7月28日接受政府的建议，和他的手下士兵一起隐退，安置在杜兰戈大牧场。

在这期间，奥夫雷贡、伊尔和卡列斯对全国强制实行西北人政治控制。他们让几位率领叛乱的人充当临时和正式的州长，另一些人担任州的军事指挥官。他们还找到机会让冈萨雷斯无限期退休。在7月初，他过去的部下，因为对他要求职位和做交易置之不理感到气愤，就试图在科阿韦拉和新莱昂进行叛乱，结果完全失败。7月15日冈萨雷斯被逮捕。军事部对他进行军事法庭审判，以卡兰萨曾指控奥夫雷贡的同样罪名指控他。军事法庭审判以后，于7月20日把被告转送民事法庭。卡列斯下令把他释放；冈萨雷斯精明地隐退，流亡国外。8月1日议会举行选举，从立宪自由党、全国合作党、墨西哥工人党以及新成立的全国平均地权党（以前的萨帕塔派）中产生了代表和议员。他们都一致拥护奥夫雷贡。唯一表示坚决反对的是过去的老天主教党人，他们组成了全国共和党，提名罗夫莱斯·多明格斯为总统。

8月中旬，德拉韦尔塔叫阿尔瓦拉多在纽约公开发动一场争

取承认和贷款的运动。8月26日在银行家俱乐部听阿尔瓦拉多讲话的金融、商业和其他专业人士对阿尔瓦拉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59]在墨西哥城，军事部宣布，它将彻底摧毁最近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德拉维尔塔本人向《纽约时报》保证，"指望国家福利的墨西哥人希望外国人在墨西哥投资……"。[60]

9月5日的总统选举按计划进行，奥夫雷贡以压倒的多数获得了胜利。争取承认的运动加紧进行。德拉韦尔塔称颂威尔逊是"当今最最杰出的公众人物"；谴责哈定有"帝国主义倾向"；把几名外国共产党人驱逐出境；解决了另一次列车员、司机、司闸员和司炉工工会领导的罢工；同时派遣格拉斯的另一名学生作为机密代表去纽约替代阿尔瓦拉多。[61]奥夫雷贡声称："我们的希望……是在经济上和工业上；并对我们的邻邦和外国资本家保持友好……首先，我们将照顾墨西哥的对外义务"。[62]奥夫雷贡尊重美国的利益使墨西哥石油公司留下很好的印象，因此它租用了80万英亩塔毛利帕斯油田。9月底威尔逊派了一名私人使者跟墨西哥的机密代表谈判承认的问题。10月15日，同代表磋商以后，威尔逊的使者，奥夫雷贡和卡列斯，以及德拉韦尔塔发表声明说，墨西哥不会接受要求承认的各项条件，但将"合理地全部偿还符合国际法的债款……"。[63]10月26日墨西哥代表正式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承认，在这之后美国和墨西哥将交换议定书，其中记录了墨西哥对债权要求和仲裁委员会的承诺，以及对宪法第27条无追溯效力。同一天，墨西哥议会正式宣布了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奥夫雷贡以113.2万票对4.7万票战胜罗夫莱斯·多明各斯。10月 152

---

[59] 《纽约时报》1920年8月27日。

[60] 《纽约时报》1920年8月28日。

[61] 《纽约时报》1920年9月9日。

[62] 《纽约时报》1920年9月10日。

[63] 《纽约时报》1920年10月16日。

29日，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近期交换议定书，接着威尔逊将承认墨西哥政府。

11月2日，哈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战胜考克斯。这样就完全失去了美国对坚持墨西哥宪法的任何墨西哥政府很快承认的机会。而美国国务院仍然表示希望看到奥夫雷贡顺利举行就职典礼”，同时斯派尔银行请求握有墨西哥未偿债券的当事人把债券存入银行，等待墨西哥恢复偿付外债。[64]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建议墨西哥任命几位专员谈判最终保证美国承认奥夫雷贡政府的条约。司法部破获了边境上新流亡分子策划的对总统就职前的阴谋。

德拉韦尔塔根据正常程序结束了临时任期。他通过政府暂时接收矿山，提高工资召回工人，把利润移交给公司等办法，终止了科阿韦拉煤矿工人的罢工。他消除了共产党人准备发起的全国性大罢工。11月20日，他正式举行了10年前马德罗领导起义的纪念活动，这次起义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胜利。[65]

153

“革命”掌握了支配权。对这场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成果，历史上没有确切的定论：原来的大公司照旧存在，再加上一些新的公司，较之以前更加依赖美国市场和银行；由于战争、移居和流行性疾病，人口从1500万减少到大约1470万；外债在10亿比索左右，加上过期未偿还的利息3亿多比索；该年收入盈余共达300万比索；军队几乎拥有10万士兵，占预算支出的62%；成立了全国商人和制造商公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同各铁路工会和新的工联主义运动有严重分歧；同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他们不断要求获得自己的土地。

1920年12月1日，在没有得到美国、英国或法国的承认下，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宣誓就任总统。他的内阁由伊尔出任军事部

[64] 《纽约时报》1920年11月18日。

[65] 贝尔纳多·J·加斯特卢姆：《墨西哥革命——墨西哥精神的说明》墨西哥，1966，第401页。

长，卡列斯为内务部长，德拉韦尔塔为财政部长，比利亚雷亚尔为农业部长。奥夫雷贡还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给予了报答，让该联合会的前任领导人负责掌管联邦区，由它的秘书长担任联邦兵工厂的董事。

这样，1914年胜利者之间的争斗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权。这个中央政治机构不是全国的领袖或全国的党，而是一个地区性的集团，由西北部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在国际上没有多大的贡献，但是在这个国家的最高阶层中占有巩固的地位。它通过同其它阶级各个派别的交往，准备实行灵活的、地区性的"复兴"。这个新政府本身因此就成为全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作用预示了它的纲领：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以便回避、分裂、缩小和限制来自国外和下层对墨西哥主权和资本主义的威胁。

第 3 章

墨西哥：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建

墨西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波菲里奥时期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发起和领导的。可是，在墨西哥革命内部也发生过几次革命。革命阵线多次变动，革命团体由多种成分组成，它们意见分歧，目标不一，甚至矛盾重重。1870—1910年时期国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对人民群众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他们并不充分意识到政治权力斗争中处于危机的是什么。从1913年起，卡兰萨派或护宪派运动内部的西北派索诺拉人就谋求得到全国政权，而且终于在1920年夺得。索诺拉人的统治相当彻底，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实际上这是来自北方的“侵略”。世俗习惯、粗鲁的实用主义，以及为保持西北部边界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一般来说对墨西哥民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①]

这个时期的一名前任部长路易斯·L·莱昂，对这些西北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看待墨西哥，以及他们要对这个国家实行什么纲领，给我们作了清楚的描述。[②]他说，在1913到1920年间，索诺拉州对索诺拉人来说，是他们的学校和实验室，既培训政治家，也培训企业家。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人，他们要把他们的国家变成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一旦他们承担管理全国

① 请看赫克托·阿吉拉尔编写的《边境上的游牧民：索诺拉和墨西哥革命》一书，墨西哥1977年版。

② 让·迈耶同路易斯·L·莱昂的谈话，1968和1973—1974年，墨西哥。

河流和土地资源的巨大任务，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南部同他们自己遥远的西北部很不相同。莱昂又进一步说，当他们了解到传统的墨西哥农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时，他们判定从人的真正意义来说，墨西哥农民不是人，他们吻大地主和神父们的手，但并不懂得市场的逻辑，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浪费在饮酒和放爆竹上。索诺拉人在他们自己州里的亚基印第安身上有过相同的经验，只是这个勇士部落人数很少（该部落最终于1926年被征服）；而在中南部，大多数人属于索诺拉人根本不理解的另一个世界，所以受到谴责。无论是政府和教会之间冲突引起的暴乱，还是随后农民的起义（1926—1929年的克里斯特罗造反），都和要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行政官员同构成传统墨西哥的人们（1920年时大概占全州人口的2/3）之间的深刻分歧有联系。 156

十年（1910—1920年）内战以后，于1920年至1930年间墨西哥出现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政府。在这方面，它同外国石油公司和教会发生冲突，以及同有组织劳工，特别是墨西哥地区工人联合会的谈判，较之1923年，1927年和1929年传统的军事叛乱和1928—1929年的选举危机尤为重要。经济上的改革比政治上的改革更加明显，特别是制度上和管理上的改革。墨西哥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能不提到主要的政治改革：1929年成立国民革命党（PNR）。

按照阶级的定义来说，政府就是由一批人邀请其它一些人为了实现共同的事业一起进行合作。假使是这样的话，大多数墨西哥人并不理解这一点。如此之多的乌合之众如何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呢？政府掌握着统一，即一小批人的最高统治权。两个世界的分裂深渊使得统治者焦躁不安，使得被统治者怨恨不满。急躁造成暴力，而不满常常引起叛乱。

国家声称要解决全国所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缺点；联邦政府尽管力量薄弱，却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可是国家虽然处于攻势，在组织上仍然是软弱的，因为它必须认真对付各地区的一些

强人，地方上的政治头目，有了他们的合作才能巩固稳定的基础。这些人包括尤卡坦半岛的费利佩·卡里略·普埃尔托、1920年到1936年期间塔瓦斯科州的领主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1937年以前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的保护人萨图民诺·塞迪略、1920年到1935年韦拉克鲁斯州的强人阿达尔韦托·特赫达，以及漠视中央在别的地方统治并不太久的其它许多人。以地区工人联合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企图接管国家，先从该联合会的总书记所领导的工商部开始，但因遭到军队和其它集团的反对，结果失败了。

157

当时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开明专制主义，那是一种统治思想，认为国家知道该做什么，认为国家需要全部权力来完成它的使命；墨西哥人必须服从。国家反对把社会分成阶级，它想统率一个各种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和谐的联盟。国家必须以所有人的名义完成一切事情。它不容许任何批评，任何抗议，任何分权。因此它必须彻底粉碎如亚基印第安人、“非法”罢工的铁路工人、反对“好”工会的“赤色”工人、于1929年不再进行合作的共产党、以及诉诸武力的天主教农民等活动。在使用暴力的同时，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也玩弄集会和选举与政治游戏，但只有少数人对此关心。然而，政治制度的发展，首先是1929年国民革命党的建立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政治控制也必须加以现代化。1926年卡列斯总统对他的政策解释为“旨在使我们民族一劳永逸地得到稳固基础的政策”③，具体说来就是认为建国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建设。

1920至1924年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担任总统期间，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包括与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联邦政府凌驾地方主义的权力（由于10年的革命危机地方主义得到加强）；以及1924

---

③ 卡列斯：《当前墨西哥的政策》，载《外交事务》1926年10月号。

年总统职位的继承问题。在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总统领导下（1924—1928年)以及最高权力机构期间（1928—1934 年，这时卡列斯作为最高长官，虽不担任总统但继续行使实际权力），尽管发生了重新进行大选和后来又发生1928年谋杀奥夫雷贡的重大事件，优先考虑的已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全面的经济计划，石油问题，以及基督派战争和世界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影响。 158

在1920年，“革命”和”重建”两个词是同义语。重建的愿望不是新的，而是在1920年以前从来没有和平的日子，所以没有和平就一事无成。1920年以后有某种和平。1923年12月的军事暴动虽然把和平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在几星期内便通过残忍的手段恢复了和平。从1920到1924年，政府专心致志于两件事：第一，避免美国的干涉，为了这个目的，就要获得长期以来想望的美国的外交承认；第二，恢复偿还国外债务以便重新获得国际贷款。这些目的处理得很谨慎也很节制。何塞·巴斯北塞洛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还是能够使他的教育政策光耀于世。巴斯北塞洛斯于1924年流亡国外，他主持的部也被解散。当时的积极性就转向金融、工业和商业方面。上一年，美国已承认了奥夫雷贡政权；国际贷款已经恢复，因此对实现1920年至1924年间计划的伟大事业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发生了经济危机，最初只是在墨西哥本国（1926年），后来扩展到全世界，这使得一切都停顿下来。现在是后退并制订新的解决办法的时候，这就在拉萨罗·卡德纳斯就任总统期间（1934—1940年)来付诸实施。

奥夫雷贡总统时期（1920—1924年）

饱经抵抗大自然和印第安人斗争风霜的索诺拉州一位富裕农民的儿子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是历次革命战争的老战士，当他1920年12月1日上台执政时是40岁。由于得到军队的支持，他本人又是一名天才的战士，潘乔·比利亚的征服者，他也是一位出

色的政治家，善于使自己同工会结成联盟，把萨帕塔派的农民集团拉到他的一边。他是一名社会主义分子、资本主义分子、雅各宾派、唯灵论者、民族主义分子和亲美分子，但他并不因为考虑主义而感到为难，即使他确实负责建立一种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他的主要目标是民族团结和国家重建，他要象经营大企业那样去管理这个国家。

159 尽管战后世界的经济萧条，从而造成多数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以及从美国被驱逐出来的墨西哥工人大量拥回国内，20世纪20年代初期总的经济形势仍有利于奥夫雷贡。那时墨西哥的石油生产占世界产量的1/4，石油连同其他出口产品，主要是矿石，保证了国家的繁荣，并给代表这个时期的重要社会项目和经济项目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在何塞·巴斯孔塞洛斯领导下的教育部的各项成就。

曾经确定1913年以来政治生涯方向的一些将军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得胜的革命者和投笔从戎的政治家，他们乐于诉诸武力。而革命将领的典范奥卡雷贡，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应该如何去使用军队（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去对付1923年由他过去的同事们发动的一次巨大的叛乱）。新制度的社会基础由有组织的城市劳工构成，自从1919年8月奥尔雷贡跟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缔结了条约之后，城市劳工便同政府联结在一起。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在这种联盟的支持下，力争控制整个工人运动，并于1919年12月组成了一个政治机构：墨西哥工人党。新政权的第二个重要支柱是主张平均地权派，其中包括农民联合会和安东尼奥·迪亚斯·索托和伽马（萨帕塔的一位秘书）领导的全国平均地权党。这个三边体系（军队、工会和平均地权派）的共同点是民族主义。总统通过呼吁工会和乡村民兵反对军队，呼吁军队粉碎罢工或对付乡村民兵这种错纵复杂的手段来控制。这个三边体系，使将领们，工会头头和政客等新统治阶级发财致富，是这个制度的特征，它同样也吸引了波非里奥时代的经济精英，但不给他们任

何政治权力。奥夫雷贡和他的继承者都不容许其它任何政党的存在，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对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疑问。迫于当时的形势，罗马天主教会填补了政治空缺，起到了代替反对派的作用，最终导致1926—1929年的激烈冲突。

奥夫雷贡最关心的是得到美国的承认。可是美国国务院为了捍卫石油公司和美国公民的利益，要求墨西哥政府首先必须承接迪亚斯政权的债务；必须不对石油公司实行1917年宪法第27条所规定的国家拥有土地和地下矿藏主权的条款；以及必须给美国人 160 赔偿由于革命造成的利益损失。没有一个墨西哥政府会同意这样的投降条件。在对债务和赔偿缺乏充分的善意或适当的让步的情况下，奥夫雷贡不久便放弃了恢复同美国和解的意图，直到1923年，那时他迫切需要美国人的帮助来对付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1923年前，有些革命者去世了，他们中有的死得很离奇，例如军事部长本哈明·伊尔被毒死；有的则是暴死，例如卢西奥·布共科在流亡美国时被劫持杀害。尽管如此，奥夫雷贡政府还是取得了成功，革命的前途似乎有了把握。"索诺拉三巨头"：奥夫雷贡、阿道弗·德拉·韦尔塔（1920年他曾出任临时总统，现在是财政部长）和卡列斯（内务部长），仍归团结一致；该制度运作正常。奥夫雷贡于1923年宣布，卡列斯将作为他的继承者，虽然此人在国内没有名气，许多将领也不喜欢他，但他得到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和平均地权派的支持。不满分子机智地懂得如何使德拉·韦尔塔疏远奥夫雷贡和卡列斯，以便使他成为他们的候选人；可是不久便很清楚，解决这件事只有诉诸武力。奥夫雷贡确信他的许多并肩斗争过的同事成了反对派，他便向美国提出要求在这场危机中得到支持。布卡雷利街协议于 1923 年 8 月签订，确定美国与墨西哥和好，其代价则是向美国利益作出重大让步。而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潘乔·比利亚惨遭暗杀。这场革命又吞没了另一个革命儿女。

1923年12月爆发的这场军事叛乱，出乎意外地十分严重，因

为军队中2/3的军人对这场运动表示积极同情。但整个12月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而叛乱的命运正被华盛顿扼杀，问题在于国务院将支持奥夫雷贡呢，还是支持叛军。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奥夫雷贡必须使他的参议院批准布卡雷利协议。正如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在他的小说《考迪略的阴影》（1929年）一书中所描述的，奥夫雷贡通过买通受贿的参议员并以谋杀最直言不讳的参议员菲尔德·胡拉多来恐吓其他参议员的办法，达到了目的。美国总统柯立芝立即派遣舰队封锁海湾，对付叛军，并提供奥夫雷贡的军队所需要的武器。第二天战争爆发了，叛军中间四分五裂，士兵反对平民，将军反对将军。奥夫雷贡乘形势对他有利的机会，在15天内打了三仗，这是他最出色的战役之一。余下来只不过是搜捕人犯了：所有叛军的首领，14名前奥夫雷贡派分子、义结终生的同志，统统被处决。这次大清洗在1927年和1929年又再次进行，最后征服了这支丧失许多最重要领导人的尚未职业化的军队。

1923年至1924年的总统继承危机显示了美国仍然在墨西哥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危机最终结束了墨西哥残留的一点点政治自由主义。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统统就范，卡列斯在全国毫不关心的情况下赢得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统选举。奥夫雷贡的"政变"获得了成功，而他本人也可盼望于1928年重新执政。但是付出的代价很高，这包括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离开教育部。

在奥夫雷贡政府期间，巴斯孔塞洛斯实际上完全可以放手办理国家教育。他是地方上的中产阶级成员，这个阶级曾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垮台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一开始就是马德罗派。他一直长期流亡美国，1920年，取得胜利的索诺拉人把他召回来负责墨西哥大学的工作，后来负责国家的教育事业。

像所有的热心人一样，巴斯孔塞洛斯是一位伟大的政府公仆，既被人赞美也被人咒骂；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巴斯孔塞洛斯同样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根

据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看法，他的一生经历是描述墨西哥革命的一部最好的小说。他作为作家的品质，他后来跟法西斯主义的勾结（出于同埃兹拉·庞德同样的原因），以及对他革命的过去明白地表示认错，已使他作为一名活动家的重要意义完全被人忘却。他被认为是一位文化人，而他作为一名墨西哥政府直到今天始终依靠的意识形态纲领的组织者，则被忽视了。

巴斯孔塞洛斯受的是律师教育，在文化方面是自学的。从普罗蒂诺到卢那察尔斯基，从圣奥古斯丁到泰戈尔，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许读得太多了点）。他突然便成为墨西哥知识分子的"教授"。在担任校长的时候，他并不太关心大学的事，虽然他关注被卡兰萨压制的教育部能得到重建。接着，他当部长以后，骑马到国内最边远的地区去视察；在议会里进行辩论；为报刊撰写文章；到南美洲各处周游；这一切为的是把他的牌号的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发展成西班牙一美洲团结的美梦，发展成美洲各民族熔于一炉"宏大民族"的美梦 162

他努力创造一种新人，20世纪的墨西哥人，尚未形成一个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奥夫雷贡总统支持这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曾帮助他的政府取得合法地位的超凡人物的原因。奥夫雷贡为巴斯孔塞洛斯提供各种财政手段去从事他的工作，向教师提供较好的报酬，修建学校，开办图书馆和出版报纸与书藉。巴斯孔塞洛斯在儿童和成人中间着手从事一项庞大的扫盲计划；使印第安人结合进这个雏形的国家；让体力劳动合法化；并使这个国家拥有各种技术训练设施。他遗留的事业即使今天的墨西哥还在受惠。

巴斯孔塞洛斯始终一贯地坚持他的抱负，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夜校到农业学校，纵向和横向都需要关注的全面教育。他对大学的兴趣最小，因为大学教育影响的人较少。他的乌托邦教育思想可以最好解释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要求以宗教运动的精神，对所有的墨西哥人，老老小小，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

教育（1921年文盲占72%；1934年仍占62%）。教师们被视为“传教士”，比作像16世纪的方济各会教徒。书籍和图书馆成为这次战斗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人民经典”被大量翻印出来，构成每个学校和每座村落的基本藏书。巴斯孔塞洛斯由于得到奥夫雷贡总统的支持而十分幸运，教育部的预算从1921年的1,500万比索增加到1923年的3,500万比索。

巴斯孔塞洛斯的教育计划内容包罗万象：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动员起来建设国家，防止它演变为另一个得克萨斯或另一个波多黎各。当发展同西班牙美洲其它地方的文化交往时，艺术部承担了激发绘画、音乐和歌曲创作热情的责任。墨西哥壁画学校就是从这次运动中产生的。巴斯孔塞洛斯为画家们提供绘画材料，分163 配给他们公共建筑的墙壁去作画以及描述的主题（都有关文化民族主义）；同时还挑战性地向他们提出要求说：“我希望在尽量多的地方尽快把壁画画出来；让它成为不朽的有教育意义的艺术，与画室绘画相对立”。1923年由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迭戈·里韦拉、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卡洛斯·梅里达和其它一些人签署的工人、技师、画家与雕塑家联合会宣言中提出了以下平民主义乐观主义的声明：

墨西哥人门艺术是最重要和最健康的精神表现形式，它的乡土传统是所有传统中最佳的一种传统……我们摒弃所谓的画室艺术以及所有为贵族分子创作的超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艺术形式，同时我们颂扬作为大众娱乐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宣布所有与人民感情格格不入或对抗的美学表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被消灭，因为它们造成我们民族情趣的颓废，这在城镇里早已几乎完全堕落了。④

1924年巴斯孔塞洛斯的离职，标志着这个短暂可是光辉的时期的结束，在这期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都在教育部的领导下

④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自传》墨西哥，1970，第57—63页。

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从此以后出现了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方面由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文化所表达的对现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随着隐退、脱离或国外流亡而出现拒绝合作的文化表现。因此，卡列斯总统本人在对待“忠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分。

墨西哥的教育经常反映执政部长的观点：假如说巴斯孔塞洛斯始终与以上所说的精神观点有联系的话，那么莫伊塞斯·萨恩斯则是卡列斯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卡列斯教育政策十分重视乡村学校，认为乡村学校是社区的中枢，可作为教会的社会替代机构，它把重点放在实践指导上，以有别于学究式教育。按萨恩斯的话来说：“孵化小鸡是和吟诵诗歌一样重要的”。

萨恩斯跟他的继承人纳西索·巴索尔斯发生分歧后，于20世纪30年代初离开了墨西哥。他曾在卡拉潘村庄居住了七个月，观察他的乡村学校实际成果。在他出版的《正直的墨西哥》一书中，他得出结论表示失望，宣布他的教育政策已经失败。应该承认，在巴斯孔塞洛斯之后，分配给教育事业的国家预算从15%下降到7%，所以说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至少已经相对减退。在30年代期间还出现其它的乌托邦教育思想，诸如着重强调性教育和社会主义学校；它们都引起相当大的争论，但在慷慨和方向方面，其中没有一种思想比得上巴斯孔塞洛斯的乌托邦。

164

曾经跟随过巴斯孔塞洛斯的知识份子和艺术家们已不再有他们的指定职位。有些作家如豪尔赫·奎斯塔、何塞·戈罗斯蒂萨、萨尔瓦多·诺沃、卡洛斯·佩利塞尔、贝尔纳多·奥尔蒂斯·德·蒙特利亚诺、海梅·托雷斯·博德特和哈维尔·比利亚鲁蒂亚，和作曲家卡洛斯·查韦斯、画家阿古斯丁·拉索、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洛萨诺以及鲁菲诺·塔马约，他们的创作在20年代非常流行，他们一起以《当代》杂志（1928—1931年）⑤为中

⑤ 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影印版，1981年。

心组成了一个团体。所有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多少都带有巴斯孔塞洛斯的特征，而且所有这些人物被粗鲁地指责为“不忠诚的知识分子”，“国家的叛逆份子”“忘恩负义之徒”；而实际上他们都反对丑化巴斯孔塞洛斯思想的卡列斯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要求思想绝对自由，主张墨西哥应该对各种文化开放，特别是对欧洲文化开放。他们把大部分时间以相当高超的专门知识致力于翻译20世纪最重要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比不上今天的影响那么大。其实这种情况可说是身后殊荣。

卡列斯总统时期(1924—1928年)

1923—1924年出现的德拉韦尔塔派的镇压表明，当政府内部最深层的会议作出决定时必须得到整个“革命家族”的认可，拒绝遵守这个原则严格要求的人都要垮台。47岁就担任总统的卡列斯，是一位暧昧人物。他是有权势的索诺拉地主家庭的私生子，在革命爆发改变了他的生活以前，他是一个穷教书匠。通过革命军队，他青云直上，于1917年成为索诺拉州的临时州长，然后又在奥夫雷贡手下担任内务部长。尽管他以激进派著称，而且与社会主义者有联系，卡列斯与奥夫雷贡一样，决定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要起重大的作用，而且根本不反对地主制和国内外资本，只要它们为本国的利益服务。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不仅导致跟美国石油公司的关系破裂，而且还引起当铁路工会反对重新组织铁路网时也导致和铁路工会决裂。民族主义是跟教会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卡列斯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铁腕人物，但他也是现实主义者，懂得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改变方针；这不仅表现在当他面临对付美国的时候，他总是悬崖勒马，适可而止；而且表现在他跟教会的关系方面，一旦他明显看到征服反叛的基督派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就改弦更张；也表现在对待忠实的同盟者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关系方面，当认为对他有利时，便把它赶到他的奥夫雷贡派敌人那边。

165

华金·阿马罗将军和工人领袖路易斯·N·莫罗内斯都是卡列斯最亲密的政治同盟者。通过军事部长阿马罗，卡列斯着手进行一项使旧禁卫军归顺，并把他们的军官转为职业军官的艰巨工作。这项工作由于对付基督派的战争（1926—1929年）以及抵抗奥夫雷贡派叛乱者而被迫停顿下来；奥夫雷贡派叛乱分子直至1929年3月才最后被征服，那是在奥夫雷贡本人遭杀害的8个月之后。在商业、工业和劳工部长莫罗内斯的领导下，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对军队和对奥夫雷贡将军来说起到一种平衡作用。过去玩弄奥夫雷贡牌的莫罗内斯已成为卡列斯的得力助手，对他的社会经济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

由奥夫雷贡安插在总统位置上的卡列斯力量不足以摆脱受提携的负担。前任总统奥夫雷贡作为军队的高级首领和实际领导人，把他的势力深入到政治系统的心脏部门。卡列斯不得不同意修改宪法，使奥夫雷贡有可能在1928年7月重新当选任期6年的总统，这违反了一切革命传统而且冒发生叛乱的风险（事实上，1927年10月已有一次叛乱在初起时即被制止，这为清洗除奥夫雷贡以外的许多其它将领提供了机会）。卡列斯利用莫罗内斯反对奥夫雷贡，但必须避免公开决裂。如果在这个时候，卡列斯还没有摆脱他的两位有势力的同事的话，不知道这场微妙的政治游戏该将如果结束呢！1928年7月17日，奥夫雷贡在当选总统后的那天，被一名天主教神秘主义者何塞·德·莱昂·托拉尔暗杀了；从而使卡列斯解除了莫罗内斯的职务。奥夫雷贡派分子怀疑莫罗内斯跟谋杀案有牵连。 166

影响卡列斯政府政治的，首先是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因石油问题引起的严重危机；其次是重新进行选举的危机；第三是政教关系的危机。墨西哥跟美国的决裂以及日益加剧的国内政治困难恰恰与经济恶化同时发生。那时每件事情和每个人似乎都在图谋反对卡列斯；这大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卡列斯对手无寸铁的对手天主教农民的反应采取如此残暴的态度。虽然至今还被人错误地认

为这并不构成什么危险。

当卡列斯拒绝履行奥夫雷贡议定的协议后，从此，不可避免地便发生了他跟美国的冲突。1925年，墨西哥政府以重新支付外债利息而获得美国银行家和商会的支持后，便开始向石油公司发动攻势。1925年12月莫罗内斯草拟的石油法无视1923年布卡雷利协议，而是僅小慎微地坚持执行宪法。这本可能导致卡德纳斯于1938年才达成的对石油公司的征收。美国的石油公司在美国大使罗克韦尔·谢菲尔德的支持下，反应十分强烈，这时莫罗内斯和卡列斯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1926年墨西哥向尼加拉瓜反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暴动份子提供了物质帮助，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还收到一位墨西哥将军送给的星形将军勋章。从而墨西哥便成为反帝斗争的先锋。这时美国反对墨西哥的院外活动集团来墨西哥教会跟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而在感情上十分激动的时候，施加压力要求进行军事干涉。然而，由于墨美两国银行家从中斡旋通过一位新大使德怀特·莫罗（他本人是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巧妙地谈判得到了妥协，这场危机才于1927—1928年获得解决。卡列斯在没有丢面子的情况下作出了合意的让步：不再重提石油法。从此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出现乌云。结果无论是基督派叛乱分子还是密谋反对奥夫雷贡重新进行大选的人，或奥夫雷贡派叛乱份子都不能指望得到美国的同情。

167 墨西哥跟美国的争吵是由于奥夫雷贡引起的国内危机才变得复杂起来的。没有证据表明奥夫雷贡和卡列斯之间有一个协议规定他们轮流担任总统。然而，从1924年起奥夫雷贡派便积极进行活动，为重新进行选举消除宪法上的障碍。他们需要两年实现他们的目标以及获得奥夫雷贡对1926年的议会选举进行个人干预。从此以后，奥夫雷贡对政治的干预持续不断，同跟卡列斯的斗争虽然不公开却持续出现。奥夫雷贡既不同意卡列斯的石油政策，也不同意他的宗教政策。到1926年底各种问题：如宪法改革和总统职位的继承、基督派战争的爆发，重大的铁路罢工，索

诺拉州亚基印第安人的暴动，以及美国军事干涉的威胁，都相互发生影响。卡列斯地位的全面衰落使奥夫雷贡大为有利。不久三位将军便当上了继承卡列斯总统职位的可能候选人，但正象莎士比亚小说里的悲剧那样，他们三个人都死了：阿努尔福·戈麦斯和弗朗西斯科·塞拉诺于1927年在一次流产的暴动中丧生，而奥夫雷贡作为当选的总统于1928年7月，正好去会见莫罗大使试图商讨平定宗教之乱的那天被谋杀了。

卡列斯对于政教关系采取极端反教权路线。人民以暴动作出回答，同时基督派战争爆发了。这是一场普通老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和军队的极其可怕的战争，包括革命战争和反殖民战争的一切因素，虽然政府一直把它说成是代表"左翼"的、说造反者是"反革命"。

统治集团的反教权主义是18世纪理性主义和19世纪自由主义留下来的遗产，被印第安人、印欧混血以及基监教人组成的旧墨西哥在政治上的无知所歪曲。1917年的宪法授权国家管理"教士的职业"，但是卡兰萨和奥夫雷贡都谨慎小心地没有行使这一权力。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教权分子在1923—1924年危机期间重新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试图另立教会，1925年2月天主教行动运动里的激进份子被触怒了。天主教徒们自己组成了战斗团体——"联盟"，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墨西哥政府在跟美国争吵最激烈的时候，由于受到国内战线作战威胁的困扰，实际上产生了一种让预言自行应验的思想。1926年通过的立法把宗教问题上犯罪视为触犯刑法；主教们的反应是从7月31日起停止做礼拜。8月份，卡列斯对被邀来进行十一小时会谈的主教们严厉指责说："要是你们不愿意服从，留给你们的只有通过议会或诉诸武力来解决"。议会对主教们的请愿以及由大批天主教徒签名提出改革的要求拒绝受理。于是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交锋，罗马和华盛顿、奥夫雷贡和各州的银行家们，最终还有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莫罗都介入了。谈判进行了3年，

168

掀起了一场战争，它使教会和政府都大吃一惊。

最初发生的骚乱是在教堂停止做礼拜以后自发发生的。镇压反而引起运动不断扩大；因为农民(在墨西哥，农村人口占75%)已没有任何其他的抗议办法。已经转入地下活动的“联盟”当时认识到采取合法斗争的行动是没有用，因此主张依靠武力解决，1927年1月号召举行总暴动。在中西部5个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但是赤手空拳的群众遭到军队机枪的扫射。因为群众的目的基本上出于宗教信仰，所以始终具有影响力，当士兵撤离以后暴乱又重新恢复。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家45%的预算。残酷的镇压措施、焦土政策、迁移一部分人口，所有这一切都使叛乱进一步加剧。尽管军队始终控制着城镇和铁路，但无法对付这个麻烦问题。

基督派的名称是政府起的，因为他们在作战时呐喊“基督上万岁！瓜达卢佩圣母万岁！”。他们的总人数从1927年7月的2万人增长到1928年3月的3.5万人，而且分布在13个州。1928—1929年政府向他们发动了一次强大的进攻，结果失败了。到1929年6月这场运动发展到顶点，拥有2.5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和2.5万名非正规的游击队员。正是在这个时候，国家为了解救迅速恶化的局势，以及正如我们将谈到的，为了避免在秋季基督派跟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巴斯孔塞洛斯结盟的威胁，决定同教会达成妥协。

169 6月12日至21日期间，根据莫罗大使草拟的计划，有组织的冲突得到了解决。1926年的法律仍然有效，但不付诸实施。教会恢复了礼拜。当宣布这些解决措施时，华尔街的墨西哥股票立即上涨，教堂的钟声大鸣，基督派分子纷纷回到了家里。可是，这只是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的暂时停火。

最高首领统治时期

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在他当选后的下一天，1928年7月17日

被谋杀了。他的30名将领和他的议会集团本来是能够推翻卡列斯的；卡列斯和莫罗内斯都被怀疑犯有煽动谋杀罪。不过，卡列斯懂得如何去顺应时势。他利用对手的分歧，把一年过渡时期的总统职位交给了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但是来自塔毛利帕斯州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在奥夫雷贡和卡列斯时期都是一个妥协者和追随者。1928年9月1日卡列斯宣布了他的著名的“政治遗嘱”：从此，考迪略时代宣告结束，开辟了制度化国家的时代，首先是立即建立国民革命党（PNR），即革命制度党(PRI)的前身。这一高明策略使奥夫雷贡派难以决定到底要立即举行暴动呢还是象卡列斯所建议的那样于1929年参加竞选。在他们于1929年最终举行叛乱之前犹豫不决地磋砣了几个月，当时为时已晚。1928年7月在政治舞台上拥有很大权力的两位禁卫军军官埃利瓦尔和曼索，当时也无法把1/3以上的军队搜罗到他们一边来。美国向当时的军事部长卡列斯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物质支援来反对叛乱，几星期内就把叛乱平息了。

1929年的选举并非只拘于形式，由于没有奥夫雷贡参加，使反对重新选举的人和所有不在职的人受到鼓舞。面对一位难以信服的正式候选人：刚从里约热内卢召回来的大使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当时仍享有威望的巴斯孔塞洛斯试图捡起马德罗的衣钵。他的成功的竞选旅行为公民投票大为增色，而且他的成功使当局进行各种手段来加以反对。美国的特务机关，它的特工人员正在为奥尔蒂斯·鲁维奥的当选进行活动，报告称：“巴斯孔塞洛斯也许拥有最大数量的追随者，但看来他将被清除掉。他招致政府机构的反对，而且也引起守法的老百姓和生意人的担心，他们喜欢的是支持劳资合作和教会合作的政府。”⑥

170

政府感到真正恐惧的是，基督派农村武装同巴斯孔塞洛斯的

⑥ 华盛顿州军事情报局国家档案，2657—G—605/210，1920年9月5日。

城镇声望可能会结合起来。1929年1月这两种力量取得了联系。莫罗大使、波特斯·希尔和卡列斯急急忙忙地同教会媾和；于是巴斯孔塞洛斯无计可施，只能发表评论说："迫使基督派投降的消息使我凉了半截。我看得出莫罗在这件事上插了手。他用这种手段使我们丧失了造反的一切基础。因为操纵选举必然会激起造反"⑦。11月份的大选显然是一场骗局，无名小卒奥尔蒂斯·鲁维奥以20比1获得胜利。巴斯孔塞洛斯逃亡国外，而恐怖笼罩了他的追随者们。

卡列斯策划了波特斯·希尔扒任总统之后，已完全懂得如何去保持他的操纵地位。他化费了6年时间，像奥夫雷贡担任总统那样，在他的岗位上发挥了完全同样的作用，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但他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因为他注意到6年里有了位总统沦为走卒。他自己没有重新担任总统，但却扶植和排挤了其它一些人，并牢牢地控制了各个部。他被准确地称之为"最高首领"——因此大家把他统治的时期称之为"最高首领统治时期"。

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这位过渡时期的总统，实际上却比原先想象的还要难对付。他采取了一种适合于他担任短期总统的方式，首先在镇压上作出让步，并跟暴力分子进行协商。他在历史上被认为负责作出了三项积极的决定：完成了1929年6月的解决措施，从而恢复了宗教界的和平；在1929年让墨西哥大学获得了自治权；重新开始进行土地分配，从而使他同卡列斯处于对立面。奥尔蒂斯·鲁维奥总统受卡列斯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所控制，

171 因此被公众舆论挖苦嘲弄。将军们控制了政府各主要部并毫无顾忌地从前任总统那里接受命令。奥尔蒂斯·鲁维奥在一开始担任总统以来就有人试图夺取他的生命，并受尽了各种凌辱，他虽然胆怯，但开始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担任了多年军事部长的阿马罗将军鼓励他（"干吧，你是总统！"）。当卡列斯听到风声可能发生

⑦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墨西哥，1957—1961，四卷集。

变政时，便采取主动，迫使奥尔蒂斯·鲁维奥于1932年9月3日辞职，并立即由议会通过选举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将军来接替他。罗德里格斯将军是墨西哥第一位百万富翁总统，在加利福尼亚湾掌管海关时发了财；他的处境并不比奥尔蒂斯·鲁维奥好多少。他也由于总统职务的激烈而试图摆脱他的庇护人的束缚，但是他无法阻止他的部长们在出席会议以前就接受卡列斯给他们的命令。然而，至少他担任总统到任期届满（1934年）。

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原因，自从采矿业生产混乱和1900年以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之后，奥尔蒂斯·鲁维奥和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都承受了经济形势恶化的负担；况且在1929年后，向美国移民的安全阀已不再有效。甚至更为严重的是，1930年至1934年间，美国把40万墨西哥人遣送回格兰德河以南。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引起的金融崩溃使货币贬值50%，因此只好以贵金属硬币取代纸币。但是尽管铸币已经停止，公众却不愿意接受纸币。正是在这个时候，人民群众对当局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卡列斯将军的政治才华为当代的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为了使他的事业能维持下去，这时也不得不隐退。在他1928年发表的“政治遗嘱”讲话中，他发誓说，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他已不再渴望担任总统。他没有撒谎，后来他再也没有担任总统，但他属于比总统更高的地位，在没有破坏不进行重新选举的神圣原则下，他又统治这个国家达6年之久。这位北方革命英雄中的唯一幸存者，象一位命运处于危险孤独的人那样进行着统治。但是，经过两年的竞选在拉萨罗·卡德纳斯于1934年7月当选总统的两年内，这位泥足巨人便突然损落了，没有引起重大的暴乱，人们普遍感到惊讶。卡列斯已经开始使革命制度化，而完成制度化进程的则是卡德纳斯。

172

卡列斯统治下的经济政策

像波菲里奥·迪亚斯一样，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主张“多重

视行政管理，少谈些政治”；普卢塔科·卡列斯应该说“多重视经济政策，少谈些政治”。卡列斯总统和他的技术专家的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可以说是使这个国家从外国经济统治中摆脱出来。这项规划是辉煌的民族主义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系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而国家结构则通过联邦政府“事务式地”改组而进行了调整。⑧正如这一时期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所说的：这个国家已被改造成为一个经济机构了。⑨

在最近几年里，政府是提供资金的唯一来源。老的银行都求助于这方面的资金来源以进行重建。墨西哥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任何筹建中的企业，必然倾向就是从国家获得足够的资金。银行由于缺少资金或者经营手段太原始，无法使它们成为提供资金的直接来源……外国银行和外国公司只是发展对它们自己有利的业务。当对它们有利的时候，就采用对它们适合的任何方式，但是并不总能符合墨西哥的最高利益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如果要振兴经济的话，就不得不在最紧急的时期承受巨大的紧张来资助大批企业：当时自然资源的开发仍旧没有掌握在墨西哥经济控制的范围之内；许多有用和必要的企业还没有开张，或即使开张了也永不能令人满意……，没有一家墨西哥公司可以当真开发我国的矿藏资源，也没有一家墨西哥公司可以发挥技术力量去开采我国的森林资源。总之，没有一家墨西哥公司能把我国的自然财富利用起来。由于我国目前的银行资金，由于目前的信贷程序，要想在主动有效的情况下开发我国的资源，是不可能的。没有资金用来开设新的企业，或推动已有企业……尽管我国法律主张民族主义，我们正一天天地在丧

173

⑧ 引自1922年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的讲话。

⑨ 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的备忘录，引自琼·迈耶：《墨西哥革命史》(墨西哥，1977) 第11卷286页。

失对我国经济的控制，而对此，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如果墨西哥想要建立民族经济，第一步必须找到实行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要获得经济开发所需要的资金。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再犯上一代同样的错误。问题不是让墨西哥到市场上去待价而沽。也不是无区别地把资本吸收到墨西哥来。我们必须获得资本，但要按照先前的计划，要为我国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让自己被人剥削；总之，获得资金要受我国控制，并用于我国的需要。前来墨西哥经营的外国公司；时间、地点、方式都要对它们方便，除了政治和行政法令之外不再承担其它义务，而那些法令都是软弱、无效和不利的；我们不能这么办，我们应该在合理和可靠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计划和目的，设法创办我国自己的企业；然后在国外或国内设法使它们获得资本。这样，我们可能得到的资本在财政上将会符合墨西哥的意愿和政策，为墨西哥经济服务，而不是主宰墨西哥经济。要重新使墨西哥外国投资者建立信心，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不是不可能做到的。自然，实现这一点需要国内和平和安全，但首先需要谨慎和技术，……谁都无法谈国内的资本市场，因为这样的市场从未有过……但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是有的……而且经过齐心一致的共同努力，在短时期内鼓励新的习惯，使总数达 3 亿至 5 亿比索的国内资金活跃起来，这笔资金不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局势、而是因为缺乏有效运用的财政方法而处于呆滞和隐匿的；这种看法并不荒谬。

平衡预算，使外国对墨西哥的清偿能力恢复信心，以及货币稳定，这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施政纲要。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统治时期（1923—1927年）的财政部长阿尔韦托·帕尼减少了公务员的薪金，取消了各部的司局，强制推行其它各种厉行节约的措施。他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提出了其它财政计划，所取得的效果延续了好几代。结果是，到1925年，预算收入大大超过支出。到1925年底，帕尼在跟外国重新谈判债务时以较好的条件获得了成功。

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把国有化铁路（墨西哥铁路）归还给私营部门。主要由于石油的出口，20世纪20年代初在经济空前繁荣的情况下，恢复了支付债务利息。同一年，帕尼得以像独立的墨西哥那样实行一项古老的计划，用5000万比索创业资本建立中央银行174——墨西哥银行。还开办了其他金融机构，如国家银行委员会，并通过了新的金融法。1926年建立了农业信贷银行，但由于经济衰退，建立人民信贷银行、社会保险银行和工人银行的计划都停了下来。

金融和银行活动跟开展重要的公共工程联系在一起。1925年，全国公路委员会有希望得到必需的信贷之后，便开始实行修建1万公里公路的4年计划。与此同时，还计划了现代化公路网。随着特皮克到瓜达拉哈拉一段铁路的修建，1927年完成了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到瓜达拉哈拉的南太平洋铁路。

为了开发新的土地实行新的农业耕作方法，开始了重要的灌溉工程。修建水坝和运河的费用占去了1925至1928年国家预算的6.5%。投资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

在采矿、石油和电力部门，问题不在于由国内投资取代外国公司的投资，而在于对外国公司施加压力，使其行动符合墨西哥的利益。1923年12月的基本法，以及1926年3月的修正条例，对未来恢复国家对石油的主权和开发石油化工工业，都有明文规定。可是，这种积极性引起了跟美国的严重争吵，于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匆忙让步。

波菲里奥时代和革命的最初十年主要留下了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属于领先地位的是西北部、东北部、联邦区和墨西哥湾。墨西哥城、蒙特雷，以及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的走廊地带是工业集中区，这些地区相对来说受革命暴力的影响较小。1922年石油工业繁荣达到了最高峰，此后产量逐步下降。在主要的中心地区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恢复到1910年的水平。总之，从1910年至1920年期间，既不能说生产垮台也不能说经济瘫

殃。⑩生产很快便恢复过来，但是仍然具有地区和部门不平衡的经济特征，这由于革命以及与美国经济的联系而更形严重。尽管各个经济部门都出现衰退，从全局来看，显然从1920至1940年这段时间是第二次经济扩展时期（第一次发生在1880至1910年间），1925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一次小衰退的开始，接着发生了经济肖条。墨西哥的国际处境并无改变，相反，外国的渗透却显得更加厉害。1910至1929年间英国和美国的投资增长了。1929年外国资本对墨西哥的投资为46亿比索，其中美国占30亿，美国占9亿。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外国股权的绝对值减少了，但美国的比重增加了。对外贸易继续朝加强同美国的联系方面发展。像1900年一样，1930年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但在1920到1930年间，从美国的进口占墨西哥总进口的比重由50%上升到70%，而向美国的出口仍保持在占总出口的70%—80%之间。

175

尽管大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大部分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但对墨西哥来说，因石油和其它矿物的出口，1920年至1925年是它的黄金时代。然而，连续几年顺利年代过去之后，于1926至1927年出口开始下降，在不同程度上，所有经济部门或几乎全部经济部门都受到了影响。墨西哥银行也不得不满足于使自己维持下去，当经济衰退进一步扩大时，它束手无策。公共工程计划不得不取消，2万公里的公路计划中完成了不到5,000公里。铁路宣告破产，国家已经把铁路还给私人经营，这时只好把它收回来自行管理。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是财政和金融危机，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都出现赤字；政府为支付国际债务尽了一切最大的努力，但在1928年8月还是不得不再次延迟对外债利息的支付。国家财库枯竭，对政府公务员和军队的薪饷只好拖欠，那时只有用来自

⑩ 请看约翰·小沃马克：《1910—1920年革命时期的墨西哥经济：编年史和分析》，载《马克思主义展望》第80—123页，1/4 1978年。

美国和美国银行的预付资金来支付。[11]墨西哥的黄金储备大量下降。跟1925年1.35亿比索相比，1926年5月的银行储备仅有1.10亿比索。到1926年底银行储备减少到8,800万比索，而一年之后减到7300万比索。[12]

财政危机和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不利环境对墨西哥经济结构的综合影响所造成的。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外贸易筹措其国内发展资金。当外贸收支不再获得盈余时，也就是说，当出口无法支付进口时——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需要的消费品，机器，矿物、金属、车辆、化工产品，以及因国内主要粮食生产下降而从美国进口的谷物——整个经济便都受到影响。

革命没有改变墨西哥的对外贸易结构。相反它的传统特征都变得更加固定了。墨西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成为一个生产和出口原料的国家（见表1和表2）。1910年矿物和碳氢化合物占出口的60%，到1926年已上升到76%。虽然农产品的出口无可否认地增加了，但石油和矿物出口的增加超过了农产品。牲畜出口数字的下降，反映了1913到1920年把牲畜出租给农民饲养的体制废除的结果。制成品出口就更少了。1922年从美国的进口占64%，而1926年已上升到70%。另一方面，1922年高达80%的墨西哥出口产品都输往美国，而在1926年由于墨西哥的锌向比利时和德国出口，输往美国的出口产品只占71%[13]。总的趋势它仍然是严重依赖美国的国家；严重依赖采矿业；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墨西哥的经济带有某种脆弱性。这种趋势在1926年之后变得十分明显，1929年的经济大肖条证实了这一点。

179

石油这个产品首先引起了麻烦。1921年墨西哥的石油产量占

-----

[11] 请看G·巴特勒·舍韦尔：《墨西哥的支付能力：对当前墨西哥国际经济地位的一般分析》华盛顿，1926，第70：页J·E·斯特雷特和J·S·戴维斯：《墨西哥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呈交给国际银行家对墨委员会的报告（1928年）第134页。

[12] 全国统计，1928年1月。

[13] 《全国统计》第5页，1927年6月15日。

176

表1　1903—1927年墨西哥的出口额

单位：百万比索

年　份	黄金和白　银	石油及其产品	其它矿产　品	其他出口商品				总出口额
				小　计	农产品	畜产品	制成品及其它	
1903—4	103.4	—	29.4	77.5	60.5	10.9	6.1	210.3
1904—5	93.9	—	36.4	78.2	59.1	10.5	8.6	208.5
1905—6	157.1	—	35.6	78.4	62.9	11.7	3.8	271.1
1906—7	123.7	—	36.5	87.8	71.8	11.2	4.8	248.0
1907—8	124.9	—	33.5	84.3	70.2	9.6	4.5	242.7
1908—9	113.1	—	31.2	86.8	67.9	13.9	5.0	231.1
1909—10	119.0	—	37.5	103.5	77.7	20.1	5.7	260.0
1910—11	143.0	—	37.0	113.8	91.3	16.8	5.7	293.8
1911—12	139.5	—	46.7	111.8	83.6	19.9	8.3	298.0
1912—13	130.9	—	58.8	110.7	85.9	19.8	5.0	300.4
1920	134.0	516.8	77.2	127.1	105.4	6.5	15.2	855.1
1921	89.8	576.3	22.9	67.8	60.7	2.3	4.8	756.8
1922	109.9	412.0	46.1	75.6	67.1	4.4	4.1	643.6
1923	116.7	270.2	98.1	83.5	74.3	4.4	4.8	568.5
1924	122.2	293.3	94.8	104.4	96.1	5.0	3.3	614.7
1925	135.7	292.1	119.9	134.8	120.9	9.8	4.1	682.5
1926	137.5	227.6	159.7	167.0	147.6	14.2	5.2	691.8
1927	87.0	133.4	218.7	188.3	161.4	19.4	7.5	627.4

资料来源：约瑟夫·E·斯特雷纳和约瑟夫·S·戴维斯：《墨西哥财政和经济情况》，1928年提交给国际银行家对墨委员会的报告，第110页。

表2　1909—1910年及1926年出口值

单位：百万比索

177

品　名	1909—10	1926	增减%
矿物和石油	156.5	524.8	+336
农　产　品	77.7	147.6	+190
牲畜和畜产品	20.1	14.2	-30
制成品和其它	5.7	5.2	-8
总　　计	260.0	691.8	+265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1911—1927年墨西哥石油工业

年 份	原油生产（百万桶）	原油及其产品出口（百万桶）	产品单价（每桶比索）	产品值（百万比索）	产品及销售税（百万比索）
1911	12.6	0.9	0.20	2.5	—
1912	16.6	7.7	0.25	4.1	0.5
1913	25.7	21.3	0.30	7.7	0.8
1914	26.2	23.4	0.30	7.9	1.2
1915	32.9	24.8	0.40	13.2	2.0
1916	40.5	27.3	0.55	22.3	3.1
1917	55.3	46.0	0.85	47.0	7.1
1918	63.8	51.8	1.40	89.7	11.5
1919	87.1	75.6	1.83	159.0	16.7
1920	157.1	145.5	2.00	314.1	45.5
1921	193.4	172.3	1.89	365.9	62.7
1922	182.3	180.9	1.93	351.7	86.0
1923	149.6	135.6	1.91	285.9	60.5
1924	139.7	129.7	1.95	272.1	54.6
1925	115.5	96.5	2.59	299.3	42.1
1926	90.4	80.7	2.49	225.1	34.8
1927	64.1	46.3	2.46	157.5	19.0

资料来源：斯特雷特和戴维斯：《墨西哥财政和经济情况》第197页。

世界第二位，石油占其出口的76%。从1921到1927年，石油产量和出口下降72%，其中1926—1927年一年里就下降42%。这种收缩有技术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还继续加速。外国公司对油井满负荷地大肆开采，有时实际上常用海水灌注而使它们受到破坏⑭。新的钻井利润较小，加上对莫罗内斯政策的不满，外国石油公司便把投资转向委内瑞拉；到1927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实际上已超过墨西哥（见表3和4）。

1924年底，对石油工业的投资大约为8亿比索，其中57.5%属于美国，26.2%属于英国，11.4%属于荷兰，墨西哥的投资只

⑭ 斯特雷特和戴维斯：《墨西哥的财政和经济情况》第200页。

表4 1910—1927年世界石油产量

单位：百万桶

年 份	美 国	墨西哥	俄 国	波 斯	荷属殖民地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1910	209.6	3.6	70.3	—	11.0	—	—
1911	220.4	12.6	66.2	—	12.2	—	—
1912	222.9	16.6	68.0	—	10.8	—	—
1913	248.4	25.7	62.8	1.9	11.2	—	—
1914	265.8	26.2	67.0	2.9	11.4	—	—
1915	281.1	32.9	68.5	3.6	11.9	—	—
1916	300.8	40.5	65.8	4.5	12.5	—	—
1917	335.3	55.3	63.1	7.1	13.2	0.1	—
1918	355.9	63.8	27.2	8.6	12.8	0.3	—
1919	378.4	87.1	31.8	10.1	15.5	0.4	—
1920	442.9	157.1	25.4	12.2	17.5	0.5	—
1921	472.2	193.4	29.0	16.7	17.0	1.4	—
1922	557.5	182.3	35.7	22.2	17.1	2.2	0.3
1923	732.4	149.6	39.1	25.2	19.9	4.2	0.4
1924	713.9	139.7	45.4	32.4	20.5	9.0	0.4
1925	763.7	115.5	52.4	35.0	21.4	19.7	1.0
1926	770.9	90.4	64.3	35.8	21.2	37.2	6.4
1927	903.8	64.1	72.4	36.8	21.4	64.4	14.6

资料来源：斯特雷特和戴维斯：《墨西哥财政和经济情况》第198页。

占3%。1926年某些公司在出售原油方面仍可获110%的净利。1924年墨西哥共有6家炼油厂，每日炼油能力为80万桶，但在1927年产量下降了40%；到1928年3月，只有两家炼油厂开工，而在1927年，几乎所有的轻油都不是出口，而是被送往炼油厂。石油税在1921年占国家岁入的1/3，大约8,500万比索，到1927年已降到占1/8，大约1,900万比索。同年石油公司提取它们的银行存款，因而造成比索事实上贬值⑮。

⑮ 梅里尔·里庇：《石油和墨西哥革命》美国印第安纳州曼西，1972，第166—167页；同上书第200—201页。

180　有色金属（锌、铜和铅）的出口，一度在1921到1927年间增加上倍；连同农产品的出口，使墨西哥顶住了紧张时期。可是在1926年，由于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下跌，白银的出口一蹶不振，主要购买者中国和印度暂时停止交易。锌、铅和铜以及农产品的出口不足以扭转财政困难。资本外逃到美国，外国投资下降，1926年国际收支逆差达到5,000万比索。⑯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出现的是失业，严重的罢工，以及向美国移民。在这期间农村受基督派战争的蹂躏，政府消耗大量预算；在1927年，33%的预算要化费在军队上。曼努埃尔·戈曼斯·莫林和阿尔韦托·帕尼辞职对政治和战

141　争的考虑再次压倒了经济政策。最终，在1929年，以前未受影响的锌、铜和农业受到世界经济肖条的全面冲击。农产品的出口于1921至1927年间曾从6,000万比索增加到16,100万比索，1928年下降到9,200万比索，1930年降为5,200万比索。⑰采矿部门的生产在1929至1932年间产值损失1/2。

有组织劳工和卡列斯统治下的国家

卡列斯政府时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试图通过政府的调解使阶级利益协调一致。主要的工人组织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路易斯·N·莫罗内斯完全赞同这种主张；他最初是奥夫雷贡的同事，1923—1924年双方关系破裂之后，他就成为奥夫雷贡的政敌。莫内斯成了卡列斯的得力助手，也是他手下权力很大的工商劳工部长（1924—1928年），譬如说，比内政部长的权力要大。为了在政府的领导下协调劳资两方，莫罗内斯从事一项重大的立法和行政工作，在执行过程中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工人运动中的“不可靠分子”和“内奸”。正如1927年一位美国观

⑯ 《全国统计》第74—76页，1929年2月；梅里尔·里庇：《石油和墨西哥革命》第142—125页。

⑰ 国家档案（1932月5年24日）2525—G—11/9，华特盛顿区，军事情报处。

察者所写的：

已经得到一些大的雇主组织合作的工会，它的首要目标是，使墨西哥工业产生一种结构，它能增加工人阶级人数，对工人提供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生活水平，最终使这个国家取得经济独立。[18]

莫罗内斯原则上一开始便认为，只要雇主和工人双方都表现“负责”和“谦让”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事情。在讲话中，他经常使用“和解”、“合作”、“协调”这类字眼。他认为，每次罢工都应该得到工会的同意，是正式的，而工会应该征求它的全国执行委员的意见。部长决定罢工的合法性，非法的罢工注定会失败。这对雇主有利，从理论上讲，只要雇主尊重支持工人的法律，他们就不会遇到未经工会同意而发生的罢工。这一法规特别注意事故和疾病引起的问题；厉行安全标准，以及退休和最低工资等条款。 182

1926—1927年莫罗内斯的改革以杰出的成绩通过了一次重要考验。纺织工业多年来一直处于肖条。尽管它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工业，但在工艺上很落后，而且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执而处于瘫痪。1922年纺织业的罢工占罢工总数的71%。莫罗内斯抓住这个问题，他把雇主和工人代表召集在一起，以便解决劳工问题，并使纺织工业实行现代化。这次会议结果签订了整个纺织业的集体合同，实行一套工资级别标准，在各级依靠混合委员会进行仲裁。

为鼓励创办民族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制度是这项战略的补充，它使工业家可以得到双倍的财政收益。开展宣传运动敦促墨西哥人“使用国货”。律师们草拟了电力工业和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法规，并准备修改宪法以便把采矿、商业、信贷、交通和能源收归国有。可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了经济和政治危机，

[18] W·艾格利希·沃林：《墨西哥问题》纽约，1927，引自恩里克·克劳茨：《墨西哥革命史》（墨西哥，1977）第10卷第25页。

这些措施在多年中仍然形同虚设，实现不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政策引起了跟石油生产厂商和美国国务院的争吵，但同外国（主要是美国）银行家和制造商的关系是好的。1924至1928年之间，福特汽车公司、西门子电器公司、高露洁棕榄香皂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以及国际火柴公司，都在墨西哥开设了自己的分号。因为国际和国内情况都不太有利，工业化的程度当然仍旧较低；何况大多数经理、技术人员、理论家都认为，农业和矿产品才是墨西哥的真正财富。就这方面来说，莫罗内斯是唯一富有想象的人，他预示20世纪40年代会取得进展。要是认为莫罗内斯背叛了工人阶级，把他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利益，未免想得太简单了；象卡列斯一样，莫罗内斯是墨西哥国家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工人运动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谈到工人的问题，必然应该着重谈一下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因素，而工会也只代表工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从1910到1918年，工人和国家的关系相继经历了敌对、不关心或合作的阶段，根据关系的变化，工人们的希望也随之起伏。莫罗内斯过去是一位电机师，1918年，在国家保护下成立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时候，他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从那时起的十年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始终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化身，并和政府分担责任。用一位工会老积极分子罗森多·萨拉萨尔的话来说：

183

作为调解人的国家是墨西哥革命的缔造者，也就是说，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专政。它从自身领域内摒弃一切外国思想，并促进雇主，工人和政府之间的互相谅解。工人根据法律调整自身的要求，而政府则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虐待。[19]

因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就成为政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 引自让·梅耶：《墨西哥革命》巴黎，1973第102页。

这种情况产生机会主义和腐败现象，但它也产生比它人数更大的影响。工人和手艺人总数不到61万，他们的影响比400万农民的影响还要大，10万名工会会员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成为受到尊敬的伙伴，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通过它的工人党，它给国会派去众议员和参议员，甚至成功地控制了好几个州政府。

很难提供准确的人数，因为能得到的数字都不可靠。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声称1928年有200万会员，但承认实际会员人数远低于这个数字，而且其中一半是农民。唯一可靠的人数，也就是交会费的会员，共计1.5万人。在缺乏较好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共拥有工人、手艺人、职员、小商人10万名，以及在理论上说，有5万名农业工人。天主教工会自称有会员4万人，其中3万多人是铁路工人，由于成立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它内部分裂而力量削弱。劳工总联合会（CGT）有会员2万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人当然就无法获得“广大工人和半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信任”了。⑳

184

在1924至1928年间，当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莫罗内斯在卡列斯内阁中担任最重要的部长时，它的影响达到顶峰。它利用当时的地位，一方面改善工人们的处境，另一方面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其它工会作斗争。为了消灭天主教工会，它利用了宗教冲突；还使用罢工来搞垮对手，诸如石油工人工会，电气工会、铁路员工工会和纺织工人工会等，所有这些工会加在一起的会员要比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多。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要求工人们团结在一个联合会中，并尊重新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他们有利）。不隶属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工会的罢工，几乎一律被指为非法。1926年的经济危机使各个部门罢工成倍增加，而莫罗内斯常常从调解变为镇压，以致时常引起更多的罢工。

⑳ 请看《国际通讯》第25期327页，1927年2月20日。

10年来，无论是发起罢工还是结束罢工方面，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态度都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为了赢得新的地位，破坏它的敌人或树立工会的垄断权，它发动和支持罢工运动或者使罢工运动再次发生。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取得的进展同卡列斯政府取得的进展是相辅相成的。当卡列斯政府改组铁路时，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便抓住机会试图取代独立工会。在石油纠纷中，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投入了反对石油公司的斗争。所有这些说明斗争往往是流血的，常常把工人引向相互冲突。

斗争是流血的。因为这些独立的力量，不管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力量都不弱。它们都是纺织工业、铁路、矿山和面包房的工会。1928年当奥夫雷贡遇刺以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权力很快便衰落下来，各独立会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力量大大削弱，尽管它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抵抗力量。在1928至1937年期间，工会运动较之以往更加分裂。在卡德纳斯政府之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便成立起来并获得了统治地位。

所有的罢工从性质上讲都是政治斗争，并且跟党派之间的斗争和议会斗争分不开；也跟总统职位的继承权斗争，以及地方性和全国性纠纷分不开。尤其是铁路工人，早在波菲里奥时代，他们就有工会独立和富有战斗精神的老传统；在内战年代里，迫于形势的需要，他们都在前线，这种精神得到了巩固。发生战185争，首先是在铁路问题上。1920年临时总统阿道福·德拉韦尔塔曾力促成立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当时是墨西哥最大的工会。1921年因该工会反对奥夫雷贡政府，所以很难获得承认。同年，当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发动罢工时，政府把它说成是公开叛乱，奥夫雷贡便派军队去占领车间、车站和火车。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不介入这次纠纷。德拉韦尔塔由于扮演了全面调停者的角色，因此加强了他在铁路工人中的地位。所以，在1923年12月，德拉韦尔塔份子的叛乱得到了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内部的一些支

持（也得到其它工会，例如反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和政府的劳工总联合会一些分会的支持）。

德拉韦尔塔失败之后，其结果必然是清洗铁路工人。由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主持的清洗便乘机设法控制在此以前它不得其门而入的这个部门。这一行动，加上改组铁路，裁减人员，引起1926年一系列的纠纷，从而导致1926—1927年的铁路大罢工。卡列斯总统在1921年担任内政部长时，也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他把100名士兵派到各个车间，非支持莫罗内斯，承认许多新工会，把它们作为反对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斗争中的武器。1926年12月，当罢工扩展到各个地区的时候，铁路员工大概还没有认识到政府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在石油以及外交问题上政府跟美国的争吵已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而且传说"美国要派海军陆战队"和烧毁油井。此外，亚基人战争正席卷而起；而且在几天内基督派也会起来造反。

铁路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情况十分严重。士兵们乘上了由罢工破坏者驾驶的机车；根本无法知道有多少辆火车出了轨，或多少名铁路工人和怠工者被枪杀。1927年4月和5月，这次风潮渐渐地失去势头，到了夏天告一结束。政府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赢得的这次胜利，对工人和铁路部门来说，同样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另外的罢工，尽管次数很多，而且也很激烈，但跟1926—1927年的这次铁路罢工来比，相形见绌。从1920到1926年，纺织工业不断处于不稳状态，而且由于工会之间相互争吵而更形严重。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影响再一次属于压倒的优势。为了把全国工人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凭借它的政治影响力，它有责任去摧毁不愿意就范的那些工会。而且每次一有机会，它就这么做。在纺织部门，它在首都、墨西哥州、普埃布拉州和韦拉克鲁斯州参加了跟"赤色"和"自由"工会进行的武装战斗。在纺织会议以后，由于雇员、工会和国家之间签订了协议，罢工次数大 186

大减少。然后出现了经济危机，工人地位由于受到存货积压和生产下降的威胁而不断衰退。

在所有经济部门都出现同样的趋势：1921年举行罢工，接着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1924至1926年之间的罢工具有工会内部发生分裂的特点；随后几年，在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下工厂和矿山倒闭，出现了为数不多而孤注一掷的罢工。那么大的吵闹和愤怒，其结果是怎样呢？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得来不易的胜利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前途，因为在1928—1929年，它脱离了政府权力范围，从此它再也未能如它想望的那样成为墨西哥工人的唯一组织机构。

20世纪20年代最明显的特征是，对原有工业进行改组和使之现代化。可是，这一进程通常随之而来的是裁减工人，特别是在采矿、铁路和纺织工业中进行裁员，这个事实说明工人往往拼命反抗。从1925年起，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配合进行了现代化的任务，让它的政敌“赤色分子”去搞抵制。这些工人幸运地保住了工作或找到了其他职业，他们以为制定了新的立法和推行了莫罗内斯的政策以后，命运会有改善。但墨西哥的不景气和世界经济大萧条造成许多工厂倒闭。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和政府力图把失业工人安置或重新安置到农村去，但是没有取得很大成绩。难以使人理解的意图是，在远未解决自己农业问题的国家里，把刚刚由农民中转换过来的工人再回复为农民，这是很古怪的做法。这说明在1930年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农业国。

土地改革、农业和农民

土地使波菲里奥的统治垮台，这话说得或许有些夸大；类似的情况是，在墨西哥革命历史中，把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也许也估计太高了。正如1915年1月的法令和1917年宪法第27条所说明的那样，在国内战争期间，以临时凑合的方式和迫于需要，采取了果断的法律措施来大规模地反对私人土地所有制。可是，1915年

187

法令和宪法第27条中各项原则的修改本，只是在1934年才实施的，而且很缓慢和混乱地发表了土地法规。根据宪法和有效的法规，土地属于国家，通过政府，可以承认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可以征用、转让给村社或小农。转让的土地不能剥夺，转租、出售或继承。在奥夫雷贡批准把国内战争期间夺取的土地（尤其在萨帕塔份子占领的地区，还有莫雷洛斯和格雷罗占领的地区）分偿给萨帕塔分子和其它游击队坚定分子、以及他自己的士兵之前，卡兰萨已经有所胆怯和半心半意地分掉了20万公顷土地。在四年期间，奥夫雷贡出于赢得和平的政治目的，分掉了100多万公顷土地。卡列斯总统最初也仿效这种做法，后来放慢了这个进程。他跟奥夫雷贡一样，本想把土地改革控制在某种政治结构的范围内，同时很快地把它进行完毕，以便接下去实行现代化和提高生产力——拓殖、灌溉和实行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农业——他对这些工作比分配土地更感兴趣。

由于发生革命、在波菲里奥时代开始的拓殖运动：首先开拓索诺拉州干旱的、可浇地，以及韦拉克鲁斯、塔瓦斯科和坎佩切等州的热带森林区，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根据1926年4月5日颁布的拓殖法，在国家的支持下，奥夫雷贡和卡列斯重新开始发动了拓殖运动。可是，世界经济萧条妨碍了这项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的实施。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农业出口完全瘫痪；40万墨西哥人从美国返回；政府不得不修改经济战略，从而使农业游说集团得利。尽管1929年卡列斯的声明说，“我们所知道的和实行的平均地权论是一场失败”[21]，但他还是不得不同意恢复分配土地，在1929—1930年波特斯·希尔的领导下，分配了170万公顷土地，从1915到1933年间，总共分配了760万公顷。不到两年时间（1933—1934年）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又分掉了250万公顷。 188

在卡德纳斯把1800万公顷土地大规模分配的前夕，1934年土

[21] 梅耶：《墨西哥革命》第244—245页。

地改革的损益表显示出三个特点：第一，让步是有限的，1000 万公顷土地，占耕地的10%，已分给10%的农民（庄园农工在1934年以前没有从土改中得到什么好处）。土地改革在体制结构上的成果是产生了总共约4000个村社；第二，让步集中在少数地区；第三，这些地区都在中央高原旧墨西哥范围内，或局限于南部和东南部热带悬崖地区（莫雷洛斯、韦拉克鲁斯、伊达尔戈州）。在多数情况下，庄园的中心地都受到尊重，而小块村社土地则分别分配出去，每块土地为 4 到10公顷。按照各个州的当地情况来看，由政府当局实行的土地改革，都一直是有时很有气势，有时疲沓敷衍，有时则拖延下去。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局面，以及某些执行失控的情况。这造成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农民（其中包括从土地分配中得益的农民）的恶果。

地方政治使土地问题变得复杂，因为它使地方政治头目能控制大批追随者和操纵地主。在村社里，管理委员会把小块土地进行分配和重新分配而从中得利，这个事实说明在村社里为何出现争夺权力的暴力行为和许多谋杀事件。保罗·弗里德里希对米却肯州纳兰哈地区持续25年多的大屠杀进行了观察研究；路易斯·冈萨雷斯写下了圣何塞—德拉格拉西亚发生的他称之为“杀人狂”的事件。[22] 奥琴的村社甚至得名“寡妇村社”，因为在那里除了剥削整个村社而成为主人的人以外，所有的男人都被杀光了。

土地改革不仅使村社社员之间发生分裂，也把农民分为分得

189

土地的10%农民和分不到土地的农民。把农民分成抱有敌意、势不两立的派别，这种手法保证了政府得以控制土地，以及使土地所有者在选举时效忠于政府。从一开始，土地政策就成为对地主挥舞的利刃，他们面临土地被剥夺的威胁；它同样也是对土改受益者挥舞的利刃，因为他们害怕被逐出村社。抢支被分发给了村社民

[22] 保罗·弗里德里希：《墨西哥农村的土地抗争》，新泽西，1970；路易斯·冈萨雷斯：《人民的不安：圣何塞—德拉格拉西亚简史》墨西哥，（1979第三版）第186、195页。

兵以组织所谓“社防团”(例如1932年在韦拉克鲁斯),尽管有难以收回武器的风险。这支武装就成为镇压其它农民的工具和勒索大小地主的手段。

由于1913—1917年和1926—1929年的战争，1929年以后的经济危机，以及土地改革这三重折磨，传统的大庄园主受到了严重打击。从此以后，农村的冲突便成为无地农民反对有地邻居（不论是传统的小私有土地者，还是村社社员)；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或印第安公社社员反对村社社员。土地纲领目光短浅，因为在传统社会瓦解和土地改革之后，相互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其中还涉及其它社会成员，例如佃农、分成农、农业工人、游牧民。阶级、民族和文化的斗争纷起，而宗教纠纷肯定也无助于安定人民的情绪。

各省反对首都、边缘地区反对中心地区，以及北方反对南方的各种地区集团都利用农民，因为农民帮助推翻了唐·波菲里奥；而且在有些地区农民稍为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就从大庄园那里收回他们部分的土地。掌权的革命党人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地纲领，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农业计划，但这不是同一回事。他们从来不抨击庄园原则，仅仅是赞成拥有中小规模的地产。在1915至1928年间，只占用了10%的庄园，而且可笑的是，其中一半是小庄园。其实，被农民侵占的地区都是重要得多的。农民们被准许暂时获得和加强他们的权力，然后农民被利用来废除私人大庄园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农民既是墨西哥式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具，也是它的牺牲品。

190

农民所得到的多于革命纲领中包括的内容，但他们的成功是有限的。政客代替了庄园主的地位，农民跟政府的关系，跟过去同雇主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害怕政府的方式有所不同。马乔里·克拉克在她撰写的《墨西哥有组织的劳工》（1934年版）一书中认为“根本没有把农民从政客手里解放出来”。她说：

如果农民要想避免压迫，他必须小心地投奔本地区内最强有

力的人。如果他听话的话，他就可以被许诺得到土地，金钱和农具。如果他不遵照权势集团的要求办事，他就会面临丧失已获得的土地、眼看庄稼被毁和牲畜被杀等威胁。相当于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地方政治头目那样的暴政业已建立㉓。

要弄明白为什么土地改革无法激起农民的热情，这并不难。土地机构都受官僚主义统治。它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农民机构。有些农民宁可不参加，不接受分给他们的小块土地。他们不接受土地是由于他们害怕，害怕大地主和他的"白卫兵"，害怕反对土改计划和有时反对主教命令的神父，这些神父宣称：凡是接受村社小块土地的人都是犯了不可宽恕的罪行。害怕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也有农民自身的财产观念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关于获得财产的正当手段的观念。谁都梦想拥有土地，但不是不择手段。路易斯·冈萨雷斯曾经说过，只有两种成为地主的正当途径：购买或继承。20世纪20年代成千上万个农民离乡背井跑到美国，为了有朝一日在老家能买到一小块土地，辛辛苦苦地工作，每赚10美元就要把8美元储存起来。送礼往往要使受礼者让步，当一个传统上不受信任的政府提供馈赠的时候，就难以接受了。在1926至1929年期间，当政府与教会发生战争的时候，肯定就无法接受政府赠地。在这些恐怖的年代里，基督派分子经常使平均地权主义者（至少得到了小块土地的那些人）用鲜血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同政府有联系。

奥夫雷贡和卡列斯渴望按照加利福尼亚"农场主"的模式产生一个充满生气的小自耕农和中型庄园主组成的富裕阶级。类似这样的阶级在本国西北部早已存在，奥夫雷贡本人就是一个完备

191 的代表。该阶级从政府的一些经济活动中受益，诸如农业信贷，灌溉工程和新道路等等。看来当时的政府把高原和东南部的土地划分成小块后进行分配，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西北部。在广大的

㉓ 马乔里·克拉克：《墨西哥有组织的劳工》（北卡罗来纳州，1934）第161—162页。

表5 人均农业生产

(1900年为100)

地　　区	1907年	1929年
中　　央	112	69
南　　部	145	98
北　　部	60	318

资料来源：克拉克·雷诺兹：《墨西哥经济：20世纪的结构和增长》（纽黑文，1970）第105页。

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旧墨西哥的梅斯蒂索人中间实行的是土地分配，而对其它地区中型和大型庄园主则实行资本投资。得到索诺拉州人支持的北部地区，在1934年时村社很少，但有公路，在1925到1935年间灌溉计划占公共投资的1/4。用奥夫雷贡的话来说："把土地公开地分配给无产者是革命纲领的首要任务，但不应该损害国家农业生活的基础"。㉔

从1907到1929年，玉米、黑豆和人民的主要粮食产量分别下降40%到31%，而这期间人口则增加了9%（虽然由于战争、饥荒、流行病、和移居，1920年墨西哥居民并不比1910年多；在1920年至1930年间人口从不足1,500万增长到1,600万，后来于1934年又增到1,700万或1,800万——数字不太确切）。有些地区远比总的数字说明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中央地区在1930年占农村人口的45%的地区，从1913到1929年其农业总产量下降31%。表5说明1907至1929年间人均农业生产的差距。1910年玉米总产量为350万吨，1920年为290万吨，由于消灭了种植玉米的庄园，增加了贫穷的小生产者，1926年产量下降到220万吨，而1929年只有150万吨㉕。黑豆的产量于1926年曾经稳步增长到20万吨以上，

192

㉔ 路易斯·贡萨雷斯：《面对全国的墨西哥总统》第3卷，墨西哥，1966，第423页。

㉕ E·N·辛普森：《村社，墨西哥的出路》，北卡罗来纳州，1917，第175页。

但到1929年就下降到10万吨以下[26]。相比之下，食品的出口在1920到1927年整个时期都不断扩大。例如咖啡的出口从1920年的10,500吨（930万比索）增加到1927年的26,100吨（2,890万比索），香蕉的出口从700吨（30万比索）增加到5,700吨（800万比索）；番茄的出口从9,200吨（70万比索）增加到57,400吨（1,960万比索）；其它新鲜蔬菜的出口从800吨（20万比索）增加到14,800吨（550万比索）[27]。

根据国家农业信贷银行（1925年）创办人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和卡列斯总统的说法，农民信贷是把农民带进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按照销售进行生产。不幸的是，创业资本不足，而银行无法坚持实行"优惠放款"的做法使只有重要人物、将军或政客、新的大地主才能得到贷款。1926年银行"优惠"贷款的主要受款人就是奥夫雷贡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用钱的人手里，银行竟然还能维持到1930年实在是奇迹；由于政客们的掠夺，1930年财政濒于崩溃。

索诺拉人的乌托邦是建立一个以勤奋劳作的农民为基础，依靠灌溉、公路，技术和银行贷款等健全的基础结构的农业繁荣的墨西哥。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使国家工业化——卡列斯曾说"我国的重工业就是农业"——只是对出口农业产品进行最后的工业加工。墨西哥要成为一个农业化美国：这个原则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奥夫雷贡将军，接着是卡列斯将军，参与该国西北部的大规模农业建设，这是十分重要的。北部地区确实因此增加了产量，并获得卓越的成果；尽管受到种种阻碍，例如美国的竞争和抵制，缺乏经验和贷款等等，北部地区在全国出口中的份额仍然迅速增长。

---

[26] 《国家统计资料》1929年3月第95页；1929年5月第76页；辛普森：《村社，墨西哥的出路》第175，214页。

[27] 斯特雷特和戴维斯：《墨西哥的财政和经济情况》第152页。

结　　论

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和内战以后，1920年从墨西哥西北部来的一批人，从事了一项历史性的事业：要精雕细刻地把墨西哥改造成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各个敌对争斗的集团被剑与火所消灭。不仅是军队受到了控制，而且主要的革命将军和考迪略也都消失了，地方上的军事政治头目都俯首就范，某种中央集权制取得了胜利。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萨图尼奥·塞迪略是30年代唯一活下来的旧政治头目。在这期间，工人们被允许得到法人资格，教会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并在全国实施教育。在议会民主不起作用，多少有点支离破碎的社会里，政权问题及其正常的交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1929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党解决的。50年以后，它的继承者革命制度党仍在掌权，给拉丁美洲树立了政治稳定的独特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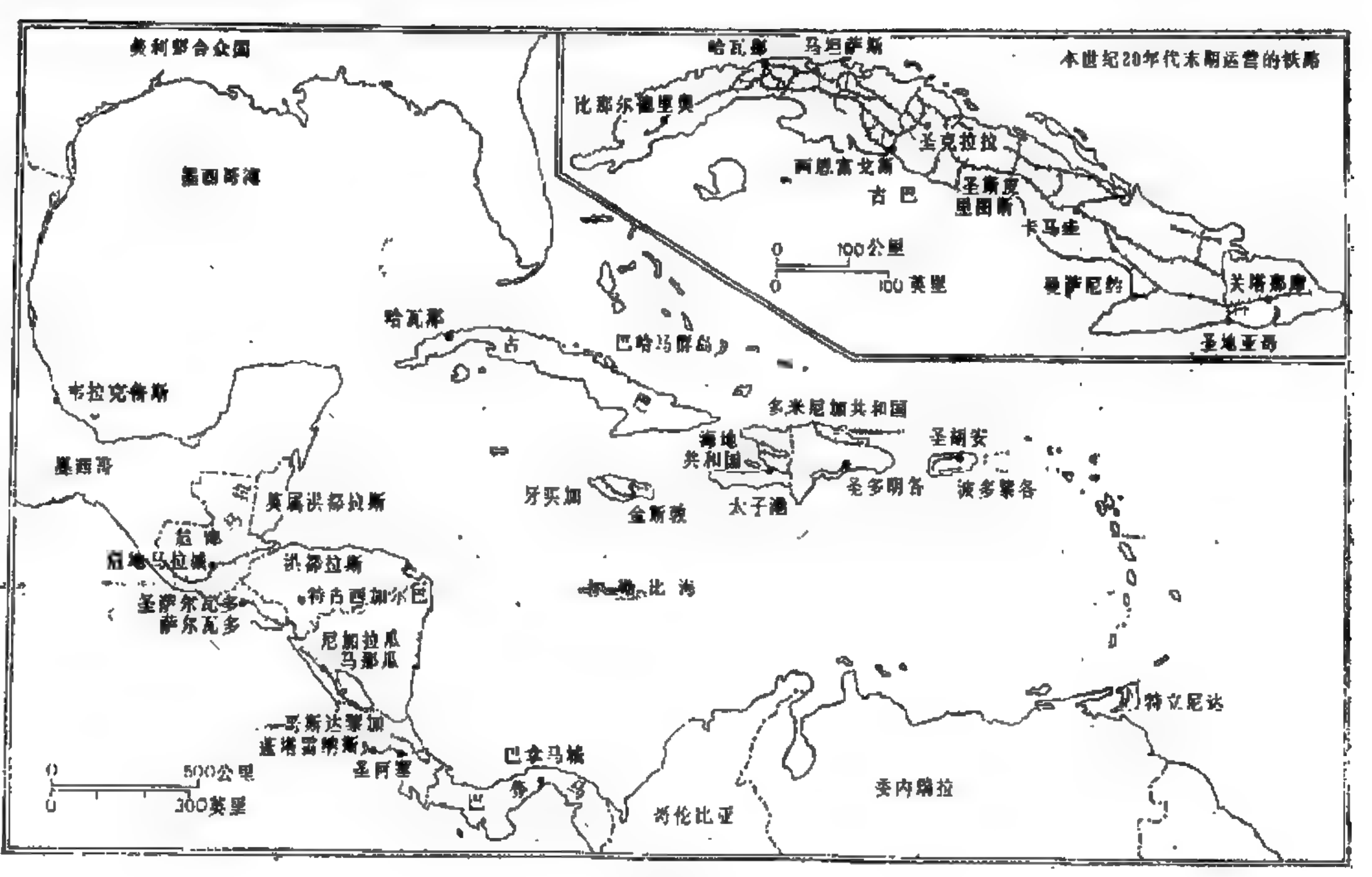
在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领导下，经济和政治权力再次集中在总统及其部长和技术顾问的手里。绝对优先的抉择就是建立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国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负责建立财政机构和墨西哥私人企业力不胜任的基础结构设施。国家和私人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国家建设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革命大家庭”内：工业家、银行家、商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农村资本主义行业，甚至外国资本家之间，有一个基本的谅解。石油公司、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是唯一几个不愿意合作的集团。

然而，索诺拉州好汉们的雄心壮志是在经济依附和经济衰退这两大巨石下压垮的。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是靠外国投资，而首先是靠出口来筹措资金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矿物和农产品的出口，墨西哥经济已成功地结合进国际经济。革命并没有改变墨西哥经济的基本结构。直到1926年还靠出口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但接着而来的是7年歉收，由于对墨西哥出口品的

194 购买力衰退，墨西哥经济的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1917年以来所坚持的经济民族主义已达到了极限。奥夫雷贡、卡列斯、戈曼斯·莫林、帕尼和莫罗内斯最终也无法实现增长和独立的民族主义奇迹。

第　二　编

中美洲和加勒比


美利坚合众国
墨西哥湾
韦拉克鲁斯
墨西哥
哈瓦那
古巴
巴哈马群岛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地共和国
圣胡安
圣多明各
波多黎各
太子港
牙买加
金斯敦
加勒比海
英属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城
洪都拉斯
特古西加尔巴
圣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马那瓜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巴拿马城
巴拿马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特立尼达
0 500公里
0 300英里
本世纪20年代末期运营的铁路
哈瓦那
马坦萨斯
比那尔德里奥
圣克拉拉
西恩富戈斯
古巴
圣斯皮里图斯
卡马圭
曼萨尼约
关塔那摩
圣地亚哥
0 100公里
0 100英里
中美洲和加勒比

第 4 章

中美洲：自由派时代

（约1870—1930年）

1870至1930年这60年期间，中美洲通过出口经济的扩大，较晚地全部结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这60年期间还形成了几个较有生气的国家，因而，在5个共和国独立以后建立起来的中美洲联合省的分裂加剧了，虽然当时还想把逝去的联邦恢复起来。中美洲学者过去是，现在仍然还是倾向于把巴拿马地峡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但不包括巴拿马本身，它一直到1903年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始终多少有点模糊地、甚至浪漫地渴望这5个小国最终应该再合并成一个大国（即，联合的中美洲）。就一定程度说，这样的抱负是有基础的。譬如说，在这段时期，经济生活中某些主要特征，例如咖啡和香蕉的生产和出口，是多数中美洲国家都具有的；又如在政治上，这些国家都出现自由主义改革的动荡，尔后是自由主义专政的困难时期，而且都普遍严重依赖于美国。但是这样一块狭小地区中最最突出的是：在5个共和国之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情况。在本章里，我们将经常把哥斯达黎加的变化情况跟地峡上其它一些国家的情况加以对比。从1870至1930年，也许可以说，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要比洪多拉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比尼加拉瓜更发达一些。由于过去非常不同的经济结构，在中美洲共和国里咖啡

生产的扩大和香蕉种植园的发展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经济结构或取得同样的效果。所以虽然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其某些最重要的历史差异须要加以说明。

198

经　　济

人　　口

表1 显示了1870—1930年期间中美洲各国以及中美洲整个地区的人口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从人口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来说，5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早在19世纪60年代，哥斯达黎加显然就进行了所谓的“人口革命”，而在危地马拉，这一革命大约在1920年左右才开始。萨尔瓦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人口密度比拉丁美洲其它地方都高得多。

199

表1　1870—1930年中美洲的人口情况

	人口（万）	年平均增长率（%）	密度（每平方哩）
危地马拉			
1880年	122.5	—	29.2
1893年	136.5	0.8	32.5
1921年	200.5	1.4	47.7
萨尔瓦多			
1878年	55.4	—	68.4
1892年	70.3	1.7	86.8
1899年	75.8	1.1	93.6
1930年	145.9	2.1	180.1
洪都拉斯			
1881年	30.7	—	7.1
1895年	39.9	1.9	9.2
1910年	55.3	2.2	12.8
1930年	94.8	2.7	21.9

	人口（万）	年平均增长率（%）	密度（每平方哩）
尼加拉瓜			
1875年	37.3	—	6.8
1906年	50.5	1.0	9.2
1920年	63.8	1.7	11.6
1930年	74.2	1.5	13.5
哥斯达黎加			
1864年	12.0	—	6.1
1883年	18.2	2.2	9.3
1892年	24.3	3.3	12.4
1927年	48.9	2.0	24.9
中美洲（不包括伯利兹）			
1870年	257.0	--	14.1
1900年	353.3	1.3	21.0
1915年	491.5	2.2	29.2
1930年	601.9	1.4	35.8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1880、1893、1921年数字见人口普查；萨尔瓦多——1878、1892、1899年数字见鲁道夫·巴龙·卡斯特罗：《萨尔瓦多的人口》，1942年马德里版；1930年数字见《统计年鉴》；洪都拉斯——赫克托·佩雷斯·布里格诺里：《19世纪洪都拉斯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人口结构》；1881年、1895年和1910年的数字，见《中美洲社会研究》2/6第51—82页，1973年版，1930年的数字，见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拉丁美洲的人口》，1973年马德里版；尼加拉瓜——1875年的数字见阿尔韦托·拉努尔·马塔莫罗斯：《尼加拉瓜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权和国家（1821—1875）》，未发表的论文，1976年圣何塞；1906，1920年的数字见《全国人口普查》1950年马那瓜版；1930年数字见阿尔沃诺斯：《拉丁美洲的人口》，哥斯达黎加——1864、1883、1892、1927年数字见人口普查；中美洲——1870年的数字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1章伍德沃德文；1900年数字见阿尔沃诺斯：《拉丁美洲的人口》；1915，1930年数字见拉尔夫·L·小伍德沃德：《中美洲，分裂的国家》，1976年纽约版。

198　这5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无论保守派政府还是自由派政府，为了在中美洲确立白人农民的基础而竭力支持欧洲人或北美人的农村拓殖化计划，都没有取得成功。从欧洲和美国确实迁来了人数有限的移民，但是，他们大多人都已拥有一些资本，所以他们成了当地上层阶级中有影响的人物。直到19世纪末，西印度和中国的移民为了参加修筑铁路以及后来在香蕉种植园劳动，来到该地峡几乎荒芜的加勒比低洼地区。但是中美洲人口演变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内部的人口移动，而不是由于移民。

在中美洲内部，咖啡和香蕉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内部大量的移居。例如，在危地马拉，咖啡生产在过去人口稀少的地区——太平洋沿岸和毗邻的内地——得到发展，人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危地马拉每年的咖啡收获季节里，从西部高原的印第安公社招来了大量的季节工流入咖啡区，然后再回去。由于香蕉种植园支付的工资高于中美洲的平均工资，从一开始这些种植园便把一大批人逐步地从中央高原吸引到加勒比低洼地并从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吸引到洪都拉斯与哥斯达黎加。

咖啡生产的扩大

200　在中美洲，主要是中央火山高原，显然具有生产高质量的"温和型"咖啡的良好自然条件。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咖啡的生产和出口，达到完全结合进世界市场。本文仅就三个国家的情况，探讨咖啡经济的扩展。这三个国家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试图生产咖啡，但是失败了；而尼加拉瓜，尽管在1780年之后，咖啡出口占重要地位，但并不象以上三个国家那样咖啡在出口总值中经常占有较高的比例，因为在尼加拉瓜经济中，咖啡这种新的作物跟尼加拉瓜占主要地位的传统经济活动畜牧业发生竞争。

首先一面把哥斯达黎加、另一面把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咖啡扩展过程的明显差别指出来，也许是可取的。哥斯达黎加由于

不存在强大的殖民地机构，所以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10年多一点就在内部没有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便直接进入咖啡生产时代，这比地峡上其它国家早得多。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独立的时候，已经存在势力强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咖啡种植的扩大所要求的自由派改革直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世界染料市场发生衰退以后（染料到目前都一直是中美洲的主要商品），才得以实行，而且是在各竞争集团之间经过一番激烈斗争以后。我们还将看到，咖啡经济在哥斯达黎加形成的社会结构是非常独特的，而中美洲种植咖啡的其它国家则具有另一种相互类似的社会特征。

从19世纪30年代起，咖啡成为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经济作物。咖啡种植在该国三个地区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发展时期。在19世纪40年代末以前，咖啡种植仅局限于圣何塞周围中央高原一带；19世纪50到90年代之间，随着通往太平洋沿岸蓬塔雷纳斯港口公路的建成，咖啡种植向阿拉胡埃拉省中央高原从林密集的西部边沿地带伸展；而从1890年起，与当时发展铁路密切相关，又扩展到圣何塞的东部，雷文塔松和图里亚尔瓦河谷。尽管咖啡种植不断扩大，中央梅塞塔高原（圣何塞）仍然是哥斯达黎加最最重要的咖啡种植地区。1890年，该地区17,940公顷土地中有13,8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77%；而1935年，46,920公顷土地中，有27,6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59%。

在危地马拉，有一种叫胭脂红的作物，生产所需资金和劳动力较少，而产品单位价值很高，但在国民经济方面没有发挥强大的乘数效应。危地马拉没有公路网，没有提供农业信贷的现代化系统，也没有可以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制度。因此几十年来印第安人对劳动力几乎没有很大的需求。但是，从19世纪中期起，由于胭脂红成为国民经济越来越薄弱的基础，政府便开始鼓励生产咖啡和其它经济作物，如糖和棉花，虽然最初缺乏自信，但后来提供免税，尝试推广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进口机器。可是，依靠印第安

201

人支持的保守党人不想实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进行改革，咖啡生产就无法充分发挥潜力。咖啡是一种需要高效率和廉价运输系统的产品（每单位价格较低），还需要发展信用机构（新咖啡种植者在获利以前，必须等待若干年），和供应充裕的土地与劳动力。自由派革命是在1871年发生的，从而导致咖啡行业所需要进行的激进改革，就在这一年，咖啡首次成为危地马拉的主要出口作物。

萨尔瓦多的咖啡种植发展过程与此十分相似。约在1850年左右，靛蓝出口突然减少后，政府便大力鼓励咖啡、可可、龙舌兰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1864和1880年间咖啡种植的扩展，使它成为解救国民经济危险的可行办法。1881年，咖啡首次成为萨尔瓦多的主要作物，从那时开始，为了有利于咖啡种植者的利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结构。

在哥斯达黎加，以下三个发展过程表明已为扩展咖啡种植建立了地域基础：占用公共土地，私人土地交易，以及解散公社所有制形式。最后一个发展过程没有多大效果，因为公社土地属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城镇（这种所有制形式已从1841年到1851年废除），它们在哥斯达黎加农村不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在独立时，哥斯达黎加大约只有6万居民，闲置的公共土地很多，即使在中央梅塞塔高原，该国为数不多的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那里。由于在19世纪90年代前，取得公共土地的机会仍旧很容易，咖啡生产的
202 扩展往往就加强和扩大了从殖民时期传下来的分散的小地产结构。至于私人土地交易，随着19世纪30年代咖啡出口的发展，土地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尤其是中央梅塞塔高原适合种植咖啡树的土地。从1800到1850年，中央山谷的土地平均价格上涨1773%。哥斯达黎加土地集中程度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可是，最近的研究无疑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很集中。在哥斯达黎加主要咖啡区，出现当地特有的土地占有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缺乏劳动力，地价过高，以及主要咖啡种植者的财力有限。

在危地马拉，也经历三个发展过程。三个过程合起来，形成所谓的自由派土地改革。但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哥斯达黎加的发展过程。第一，自由党政府已于1873年夺取了教会大量的地产，尔后，被卖掉或甚至被无偿地送掉，有的时候具体说，这样得到的土地也必须种植咖啡或其它经济作物。接着，1877年的法令取消了一种租地形式（censo enfitéutico）。该法令涉及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公共土地，由于许多占用土地的人无法在法令规定的6个月内拿出足够的钱购买他们耕种的小块土地，因此按法令把土地没收。这些小块土地共计74,250公顷，均被政府依法充公并当众拍卖。第三次改革便是自由党政府决定以非常宽容的条件把公共土地出售给咖啡种植者，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者。在1871到1883年之间，共出售了闲置地397,755公顷。由自由党人进行的土地改革，是说明咖啡生产在阿马蒂特兰、苏奇特佩克斯、索洛拉和克萨尔特南戈各省得到发展的因素之一。正如在墨西哥；第一批自由党政府希望鼓励扶植中小规模的地产，而避免形成太大的庄园。但是在这方面，即使墨西哥于1888年和1894年再次颁布土地法，它们却失败了。

在危地马拉，绝大部分公共土地经过自由党的改革后仍保留下来。而萨尔瓦多却不是这样。从1864年起，当咖啡种植开始大规模扩展时，就出现侵占公共土地的一些迹象。然而，在1879年村社和公共小块土地仍占这个小国土地总面积的25%；此外，这些土地都正好位于中央火山高原，那里的土壤十分有利于咖啡种植。1879年扎迪瓦尔总统（1876—1885）决定对种植咖啡、可可、龙舌兰或其它经济作物的人赐与充分的土地使用权。印第安人或欧印混血者社区屈服于这一压力，并尝试生产咖啡，但是他们没有必要的技术，也没有资本或无法得到贷款。在1881年，政府颁布法令废除了公共土地制度，下一年该法令被扩大到适用于村社。这些土地必须由占用者在限期内几经延期买下来，但结果大部分土地共有者失去了地产而被咖啡种植者买去了。 203

在哥斯达黎加，整个19世纪劳动力都很缺乏，因此，工资趋向上升。这方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即使人口增长并不太慢，在1900年它的人口仍然很少，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里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但无疑，最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前面已经提到，从殖民时代便承袭下来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小土地产的结构，在独立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不断得到扩大。实际上占有了小块土地并不能阻止农民不去当农工或当赶车人；不过，到底分布着小地产，确实限制了劳动力供应，这倒是事实。此外，从1899年起，建立在大西洋低地上的美国果品公司以支付较高的工资为诱饵，造成了国内向香蕉种植园的移居，从而使咖啡区失去了许多劳动力。上述因素说明，为什么哥斯达黎加的农业工人基本上是雇员、雇佣劳动者，而不是“农奴”，虽然个人的依赖性并非完全没有。

在危地马拉，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居住在提供土地的社区。咖啡庄园坐落在太平洋海岸附近人口稀少的地区。1877年，自由党政府颁布了日工条例。该条例允许咖啡种植者在有限的时期内从高原的居民区招募一定数目的印第安人当工人（即使违背这些社员们的意愿)。这一制度在整个时期经过考虑被保留了下来，虽然有些措施被采用来改善强制劳动的农业工人的境况，例如，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法律保证的最低工资标准。

虽然萨尔瓦多领土狭小但人口众多，在自由党实行改革以前，大部分人住在印第安人社区。咖啡种植者不得不寻求各种途径获得工人；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实行了萨尔迪瓦总统的土地政策，这个问题便不存在了。成千上万个农民被剥夺了他们共有的土地，而却得不到一小块新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到庄园去当佃农；要不然他们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当占耕者谋生，在咖啡收获季节作为雇用劳动者跟他们的家属一起干活。社会不安定是改革后萨尔瓦多农村的常见特征，尤其是西部地区印第安人口较多的地方；1889年成立的农村警卫队受命对农民运动进行了

镇压。

在哥斯达黎加，咖啡最初扩展的时候，筹措的资金数目很小，那是在殖民地时期以及独立后的最初10年内，从种植可可和烟草，从出口一种染料木（巴西木），以及从蒙特一德尔阿瓜卡特矿藏中提炼贵金属，积累起来的。蒙特一德尔阿瓜卡特矿区是在1815年发现的，然后，特别是在1820年之后进行了开采。当1843年开始对英国实行咖啡经常出口时，伦敦和利物浦的商行就通过主要由最富裕的咖啡种植者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哥斯达黎加开设起来的商行为将来的咖啡收获预付贷款。这些哥斯达黎加商行接着便向小生产者提供贷款，使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大的咖啡生产者和咖啡商人。这就使富裕的咖啡种植者可以对小农场主施加高度压力和社会控制，以使他们在收获咖啡时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得到保证，甚至使更多的劳动力在他们的大加工厂干活。1857年胡安·拉斐尔·莫拉总统（1849—1859）领导下的政府同商人克里桑托·梅迪纳签订合同，成立哥斯达黎加国民银行，该银行接受存款，提供信贷，并发行钞票。这家银行于1858年1月1日开业。它的成立似乎对发放高利贷并利用高利贷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咖啡种植者是一种危险的威胁。他们因此制造了一次政变推翻了莫拉。这家银行停业，不仅是因为咖啡种植者的反对，而且还因为与这家银行有联系的一家利物浦公司的倒闭所导致的亏损。从19世纪60年代起，提供信贷的机构在数量上成倍增加，但许多并未维持多久。最重要的是：1863年成立的英一哥银行和1877年成立的联合银行，联合银行后来成为哥斯达黎加银行。 205

在1871年前，危地马拉很长一段时期由保守党统治。在这期间，信贷结构和财政结构都非常原始。在农村实际上人们都不懂得抵押借款，因为那里对放债的人几乎没有合法的保障。利率可以高达50%，即使每年的合法利率仅为6%。高利贷者有办法阻止了几家银行的成立。随着自由党的革命，有人试图建立新的财

政制度。1873年被没收的教会产业被政府用来支持国民银行。它于1874年开设，仅为一家接受存款、发行钞票和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但是这家银行抵挡不住1876年因对萨尔瓦多战争而引起的金融大恐慌，于是在第二年便倒闭了。从而为几家私营商业银行的成立开辟了途径。根据1877年的商业法规，所有这些商业银行都有权发行钞票。这条法规还管理抵押制度，建立了对地产和抵押品强制公开登记的规定。危地马拉的几家主要银行是：1877年成立的国际银行；187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银行；1881年成立的克萨尔特南戈西方银行；1892年成立的美洲银行；1893年成立的希波特卡里奥农业银行和1894年成立的危地马拉银行。然而，贷款仍然不容易得到，因此咖啡种植者都要靠利息高的个人和商业信贷(年利12%)。银行和其它的放款人从欧洲获得低息信贷，然后在危地马拉以高利放债。采用这些方法，同不来梅和汉堡保持联系的德国咖啡生产者从19世纪末长时期的咖啡危机中获得了很大利润。把欠他们钱而又无法还债的危地马拉咖啡种植者的庄园占为己有。

在萨尔瓦多，咖啡扩展的第一阶段是靠抵押生产靛青的土地来筹措资金的（至少有一部分资金）。为了种植咖啡，许多种植靛青的人卖掉了他们的土地和设备。地主和城市居民（商人、军人、教士、公务员等）得到了足够的贷款从事咖啡经济。象在哥斯达黎加那样，英国资本资助了未来的咖啡收成。1880年以后，出现了第一批银行，所有这些银行都发行钞票。它们是：西方银行、萨尔瓦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这些银行都把贷款借给大地主，大地主接着便向较小的生产者放债。只是从1920年左右开始，银行贷款才特别指定用于资助咖啡生产。

206

在我们研讨的整个时期里，除了萨尔瓦多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外，咖啡种植仍旧是粗放和十分原始的。20世纪的资料证明，早在1881年，哥斯达黎加中央高原最好的土地每公顷平均产量就已

明显下降。从1909年到1956年，平均产量下降52.5。[①]获得增产是由于扩大了种植面积。中美洲的咖啡林是作为永久性的种植业建立起来的，不象在巴西那样，把它作为边界地区或流动性的作物，但施肥实在太少。在19世纪下半期，已习惯于种植遮阳树来保护咖啡灌木丛免遭大风和暴雨的袭击，同时也防止土壤流失。危地马拉的耕种技术跟哥斯达黎加使用的方法类似。但是在萨尔瓦多，完全没有合适的土壤，因此，实际上咖啡树经常种在陡峭的山坡上，从而需要更好的农业栽培技术；结果，在一些最大的咖啡农场里，咖啡产量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②]。

与耕作相比，加工技术已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和专门化。哥斯达黎加在这些技术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并把它们传授给中美洲其它国家和哥伦比亚。早在1838年，哥斯达黎加便开始实行"湿加工"。把咖啡果实堆成堆以软化肉质层，然后放入水流通过的罐子，咖啡果实不断被搅动使咖啡豆与肉质层分离。然后把咖啡豆铺在平台上在阳光下晒干，尔后经水磨机把内壳去掉。用湿加工的蒸气机械是从英国引进的，后来又从美国引进，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推广。在新加工技术中越来越高的成本和技术上的复杂性，使这一生产阶段在若干咖啡工厂里集中起来。1888年左右，哥斯达黎加大约只有256家使用湿加工管理法的工场，而在4年前有7490家咖啡农场[③]。哥斯达黎加把加工技术知识传授给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这些国家里，咖啡加工阶段也逐渐地在一些大庭园或咖啡工厂被集中起来。在危地马拉，德国的咖啡种植者使用的技术较好，因而他们获得了较高的产量。1913年德国人经营了10%的危地马拉咖啡农场，而生产的加工咖啡豆 207

---

① 请看卡门·S·德马拉瓦西和贝伦·安德列斯S·：《哥斯达黎加咖啡史》第35—36页（未发表的论文，1958年圣何塞）。

② 戴维·布朗宁：《萨尔瓦多：风景和社会》第224页，牛津1971年版。

③ 华金·贝尔纳多·卡尔沃：《地理、统计和历史笔记》第47页，圣何塞1887年版。

占40%。

在研讨的这三个国家里，咖啡种植的发展对促使运输系统现代化起了主导作用，同时对公路和铁路网络的形成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哥斯达黎加，需要有可以行驶二轮牛车的公路以便把啡咖运往蓬塔雷纳斯的太平洋港口。这个港口是靠征收咖啡出口税筹措的资金于1844至1846年间建起来的。把咖啡运往欧洲和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船只走合恩角的路线，因此延长了航程并提高了运费。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铁路于1851—1855年建成，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就在这同一时期，胡安·拉斐尔·莫拉领导的哥斯达黎加政府同太平洋邮政与轮船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保证该公司的船只停靠蓬塔雷纳斯；这项合同对该公司非常有利。然而，仍旧认为有必要开辟一条通往大西洋的公路或铁路，并在加勒比海沿岸建立一座新港。1870年修建了利蒙港，但大西洋铁路直到1890年才完成，从而把圣何塞同这个新出口连接了起来。从此，哥斯达黎加便享有较低的运费，这也是由于扩大了大西洋的轮船航线，并可以直接进入它的主要市场。这时，太平洋铁路也正在修筑中，但直到1910年才完成。

从1873年起，危地马拉的自由党政府为了把首都同克萨尔特南戈、韦韦特南戈、太平洋各港口以及后来的圣托马斯大西洋港口连接起来，努力修筑了更多更好的公路。这些工程项目都是靠发行国库券和征收农村土地税筹集资金的。所有成年男子都被迫每年为修建和维护公路劳动 3 天，否则就要支付一定的金额才能给予免除。第一个生效的铁路合同是于1877—1880年跟威廉·南内签订的。这条铁路由本国资本修筑，它把圣何塞港同埃斯昆特拉（1880年）以及危地马拉城（1884年）连接起来。为了修筑从雷塔卢莱乌到钱佩里科港的铁路，以保证把那里生产的咖啡运输出去，于1881年签订了一项新的合同。这条铁路于1883年建成。1884年在加勒比海沿岸兴建了一个港口（后来叫巴里奥斯港），并开始用本国资金建造一条通往那里的铁路。但是这项工程被干

208

扰中断下来，只是在1900年同中美洲进步公司签订合同后，才于1908年建成。这项合同同意这家公司租借使用巴里奥斯港及铁路两旁的土地，为期99年，免除一切税收。这标志美国控制危地马拉铁路的开始。到1912年，所有的危地马拉铁路网络通过危地马拉中央铁路公司被控制在美国人手里；该公司已被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兼并。在1881至1884年间，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政府同10家外国轮船公司签订了合同；这些合同的内容包括：每年为各公司提供政府津贴，租让土地和实行免税。

在萨尔瓦多，通过国家和地方对咖啡生产和贸易征税，把筹措的资金于19世纪末修建了保证咖啡运输所必须的公路。正如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那样，萨尔瓦多政府以非常慷慨的合同吸引了许多外国轮船公司来到萨尔瓦多的港口（阿卡胡特拉港、拉利伯塔德港）。铁路建设部分地依靠政府和民族资本（杉索纳特—阿卡胡特拉；拉乌尼翁—圣米戈尔）。1885年英国开设的萨尔瓦多铁路公司被准许修筑连接咖啡主要产区通往阿卡胡特拉港口的一条铁路。尔后，以美国资本修筑了另一条连接危地马拉铁路网络的铁路，从而使萨尔瓦多的咖啡通过巴里奥斯港可以出口。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以前，萨尔瓦多由于没有大西洋海岸，跟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相比，隔绝于比较重要的世界咖啡市场之外。

在19世纪期间，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是哥斯达黎加的主要买主。同英国的商业与金融联系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减弱，而同美国的联系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开始，危地马拉把咖啡主要销售给英国。英国仍旧是危地马拉的最重要供应国；但先是美国，后来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危地马拉咖啡的主要进口国。20世纪初期，萨尔瓦多把咖啡依次主要卖给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咖啡之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最早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哥斯达黎加，然后是危地马拉于1870年咖啡的出口取代了胭脂红；最后是萨尔瓦多在1880年咖啡取代了靛青的出口。在19世

纪末，咖啡出口1880年在危地马拉出口总值中占92%，1890年在哥斯达黎加占91%，达到最大限度。在20世纪以前，咖啡并未彻底主宰萨尔瓦多的出口贸易，但从20世纪起萨尔瓦多的经济开始最依赖咖啡出口。

所以说，由于生产过剩或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引起的世界咖啡市场危机，对中美洲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是不难理解的。这些危机中最为严重的是发生在1897—1907年期间的危机（由于世界性的咖啡生产过剩），以及1929年经济崩溃后的30年代大危机。直到1946年，咖啡价格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在这期间，咖啡生产扩大所产生的主要影响类似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所产生的影响。在某些地区种植咖啡已稳步取代了口粮生产的农业活动。单一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农村发生了变化，而且对全国的粮食供应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有时粮食短缺使政府不得不批准禁止谷物和牲畜出口，鼓励其进口，并规定基本粮食的最高价等法令；但所有这些措施统统都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在哥斯达黎加，由于中央山谷最好的土地逐渐种满咖啡，把玉米、菜豆、甘蔗（为国内消费）的生产，和为供应肉、奶而饲养的牲畜，都被赶到咖啡区周围的未开垦土地上去进行。正如大量资料所表明的，经常发生口粮危机，在独立时期非常便宜的食品，变得十分昂贵。1902年来自农业部（发展部的一个处）的一份报告说，在危地马拉，供大众消费的主要产品供应，在咖啡生产扩大前是很充分的，价钱也很低，但咖啡生产把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食品通常都要进口而且很贵。后来便采取措施鼓励生产玉米、土豆、菜豆、大米和小麦，可是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在萨尔瓦多中部和人口最密集地区，虽然跟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相比要晚一些，咖啡种植也挤掉了玉米和其它主要粮食，人们不得不开始把这些粮食作物种在比较贫瘠的土壤上，而有时是在咖啡收获后到下一次播种的几个月空隙时间里把粮食作物种在占耕农民的土地上。

无庸置疑，咖啡种植者上层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哥斯达黎加）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外国借款之外，咖啡出口税是筹措建设重要项目：诸如公路、铁路和公共建筑物资金的唯一重要来源。咖啡生产的扩大渐渐地在哥斯达黎加，而更快地是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引起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新改组，并伴随着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结果，它已促使这些国家全面结合进世界市场。

飞地式经济[4]

香蕉种植园以及金矿和银矿已构成中美洲的飞地经济。从历史上来说，香蕉种植园比采矿事业更为重要，它最初只是承包修建铁路的某种规划或结果，但它却由于其自身的发展而成为中美洲经济的主要特征。

1870年，香蕉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商品，那时通过新奥尔良湾岛果品公司建立了从洪都拉斯运往新奥尔良的正常出口。不久便出现了与之进行竞争的各个公司。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市场的扩大终于为在中美洲建立香蕉种植园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因素。

香蕉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以生产和贸易两方面出现激烈的竞争为特征。香蕉是由独立劳动者种植的，投资很小，获利的可能性很大。把这种水果运往美国的美国商人，虽然向中美洲的生产者施加压力要他们维持低价出售（因为香蕉很容易腐烂，农民急于出售），但也不得不面临在航运方面冒严重损失的风险以及在新奥尔良的激烈竞争。结果在出口行业中开始实行专业化。用有冷藏设备的较大船只进行运输，以及在一些中美洲国家港口修建合适的仓库和装载设备。这就需要支出大量资金。此外，香蕉种植不断扩大，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就需要靠铁路网络提供通往港口

211

④ 飞地式经济的定义，请看费尔南多·H·卡多佐和恩佐·法莱多合著：《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一书第48—53页，墨西哥1973年版；西罗·卡多索和埃克托尔·佩雷斯·布里戈诺里：《中美洲和西方经济（1520—1930年）》第9章，圣何塞1977年版。

的合适运输系统。

香蕉大公司的地位得以巩固下来，是一场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中美洲国家租让土地；修建铁路和港口；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某些企业家的聪明智慧及手腕；公司之间的冲突和合并；没收当地独立自耕农占有的土地，甚至邻国之间发生边境冲突。

联合果品公司于1899年成立，根据同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签订的合同，它在危地马拉开始经营。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在那里获得了大片租让的荒地。从1906年起，联合果品公司通过购买和新的租让，在莫塔瓜河谷扩大了它所占有的土地。1928年，联合果品公司利用一家子公司开始买下了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土地，从1936年起，在这一地区发展香蕉种植园。

在洪都拉斯，1913年前香蕉生产掌握在本地农民手里。几家公司如巴卡罗兄弟公司、哈伯德一塞穆赖公司、奥特里轮船公司和联合果品公司分享运输和销售。在1913年左右，香蕉价格下跌和严重的干旱使种植园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引起危机，在这期间有几家公司撤离。就在这个时候，实力雄厚的联合果品公司利用时机在洪都拉斯进行大规模渗透。其实，从1912年以来，它的两家子公司——特拉铁路公司和特鲁希略铁路公司——已同洪都拉斯政府签订了大量的铁路合同，因此获得了大片租让地。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洪都拉斯生产的香蕉大部分都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巴卡罗兄弟公司在拉塞瓦地区和阿关河谷经营。1924和1926年，改组为标准果品和轮船公司。塞缪尔·塞穆赖也开始经营买卖香蕉，但在1902年他在莫塔瓜河洪都拉斯一边获得了租让的公共土地。1911年，一场危机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他经营的企业变成库亚梅尔果品公司。洪都拉斯政府又把靠近危地马拉边界上的土地租让给了这家公司，但是因为两国的边界没有明确划 212 定，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之间于1913年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上不过是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和联合果品公司之间相互抗争造成的结果。1929年两家公司合并后，冲突停止。从

1920年起，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的主要种植园座落在乌卢阿河谷。

在尼加拉瓜，香蕉生产并不占很重要地位。从19世纪90年代起，联合果品公司在大西洋沿岸经营，但是出口很小。20世纪20年代，库亚梅尔果品公司设在那里，因此种植园有一定的扩展。可是绝大部分种植园都座落在不太适宜的土壤上。1930年，联合果品公司出售了它在尼加拉瓜的产业，从此以后，它通过子公司库克拉开发公司专门从事商业活动。

在哥斯达黎加，香蕉贸易的开始跟迈纳·基思的活动，以及大西洋铁路公司复杂的历史有密切联系。在1899年，联合果品公司获得了早期租让给基思的土地的使用权。联合果品公司撵走了两家对手企业（美国香蕉公司和大西洋果品、轮船公司）之后，便设法操纵这个国家的全部香蕉生意。1927年在太平洋沿岸的两家新开设的公司开始出口香蕉，但是联合果品公司不久便于30年代把它们的种植园买了下来，进行扩充。到1930年，在整个中美洲，联合果品公司已经战胜了它的所有对手。它在1亿300万串出口香蕉中占有63%。

目睹香蕉生产首先发展起来的中美洲加勒比海沿海一带，是人口稀少的地方。修筑铁路以及后来的香蕉种植园引起了几次移民浪潮，从中部高原移民到沿海，以及从西印度群岛和从中国移民到中美洲。洪都拉斯还接受了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工人。同时香蕉种植园的扩大使农村产生了重要的无产阶级。尽管果品公司支付的工资一般说来均高于中美洲其他的工资，但种植园工人的处境却由于一些工资支付方法而受到损害。例如，在洪都拉斯，支付给工人的通常都是只有果品公司商店（所谓“委员会”）才接受的代价券，要不然就是按美元确定工资，然后以低于法定汇率的比率支付洪都拉斯货币。此外，洪都拉斯工人习惯于周工资，而有时候公司却40天才支付一次工资。

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出口于1880年后迅速扩大。尽管从1904年开始种植园遭受一种叫做巴拿马瘟疫的祸害，于1913年还是达到

1,100万串香蕉出口的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香蕉出口逐渐下降，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每年约出口700万串左右。在这个时候，联合果品公司放弃了它的大西洋沿岸种植园，而在太平洋沿岸设立了种植园。在加勒比海地区，当时由哥斯达黎加农民经营香蕉生产，把它出售给联合果品公司。在1927—1928年，他们成立了哥斯达黎加香蕉合作社。

在19世纪90年代，洪都拉斯香蕉出口每年共计150万串左右。随着果品公司的渗入，香蕉出口迅速上升：1920年为980万串，1925年1,630万串，1929年2,900万串。在20世纪20年代，洪都拉斯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香蕉生产国。1924年出现了巴拿马瘟疫，主要发生在特鲁希略铁路公司的种植园里，使卡斯蒂利亚港在1935年完全报废，接着它又使该地区125公里的铁路无法使用。

危地马拉进入香蕉市场的时间稍后，1913年它的香蕉出口共计300万串，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每年出口达600万串。在尼加拉瓜，从1900到1920年，香蕉出口每年略多于150万串。在1920到1930年间，增加到300万串，但在1935年后，香蕉出口迅速下降。

1864年以来，在洪都拉斯，许多矿山被租让出去。19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鼓励采矿生产，从而从长期肖条中得以恢复。在1876到1883年自由党总统马科·奥雷利奥·索托任职期间，宣布矿藏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而在过去，他声称农业是洪都拉斯发展的基础。他的有利于采矿业和外国企业的政策，由他的继承人，特别是路易斯·博格兰（1883—1891）继续推行下去。他给外国公司提供了许多优惠特权，尽管只有一家外国公司——纽约和洪都拉斯罗萨里奥矿业公司，控制了采矿业。在1921至1937年间，这家企业获得36%的纯利，支付了共计大约800万美元的股息。白银是洪都拉斯的主要矿采品，绝大部分重要采矿区都座落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周围。1887年矿产品大约占洪都拉斯出口值的50%，但随着香蕉贸易的上升，矿产品出口的重要性逐

214

步缩小，在1928年仅占出口值的6%。

在尼加拉瓜，开采黄金保证一些外国公司获得很高的利润。它在1912年占尼加拉瓜出口总额的23%。但在洪都拉斯，开采黄金却变得不太重要，尤其是在1923年之后。金矿分布在尼加拉瓜的新塞哥维亚省(圣·阿尔维诺金矿公司、尼加拉瓜发展公司)、琼塔莱斯省、马塔加尔帕省和大西洋地区。

另一方面，在哥斯达黎加，位于这个国家西北地区的黄金和白银开采于1920年后发展得比较重要，并于1928年达到了最高峰。但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采矿业并不十分重要，提供的出口从未达到这个国家出口总额的3%。

中美洲的飞地经济，总的说来，对国民经济起不到多大推动作用。飞地经济引起的经济扩张往往局限于矿山或种植园地带。

最初批准给外国公司的一些特权，使它们得到很大的好处。就拿香蕉业来说，这些特权包括土地、其它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赋税豁免、许多产品的免税进口（由于进入这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免税，并在公司商店出售给种植园工人，这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签订的铁路合同使香蕉公司掌握所有国内运输的控制权。公司商店把小商业从种植园地区排挤出去。免税——首先是免除关税——使各国财源枯竭，国力衰弱。洪都拉斯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那里香蕉种植园和出口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到1917—1918年，给予果品公司的免税额已超过洪都拉斯政府的全年收入。

高度集中的香蕉生意和它开辟的工业化的可能性，被果品公司充分利用起来，作为逐渐实行农业多种经营活动的一种补充。因此，在洪都拉斯，标准果品公司从20世纪20年代起已拥有炼糖厂、酿酒厂、以及从棉籽、椰子和这些土地上种植的其它作物中或从当地农民那里购买的作物中生产菜油、肥皂和肥料的工厂。

飞地经济的多数有害结果可能是由于欺诈行为，以及中美洲

弱小国家政府提供特许权的条件始终没有得到履行（私下装货、偷税漏税、在洪都拉斯秘密修建铁路），各公司时常不根据提供权所具体规定的修建铁路线（这些铁路线符合当地国家利益，却不符合出口利益），各公司还对火车实行不同运费，以使公司有利于对付当地的生产者，等等。

这一问题的另一不同方面，是外国公司完全没有尊重中美洲各国的主权，经常对当地政府公开施加压力，以及干涉国家事务。美国代表这些公司利益所进行的军事干涉经常发生，尽管一般来说，干涉都是短命的；任何时候只要北美的财产和公民觉得或宣布他们受到威胁，就会发生海军陆战队或军舰开抵中美洲港口登陆的情况。

社　　会

社会结构

考查这段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对中美洲社会结构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首先应该指出，社会的上层统治集团成分并没有由于咖啡生产的扩展和自由党的改革而发生重大变化。自由党革命以后，许多保守党人确实由于没收而失去他们个人的财富和地位，或甚至被迫流亡国外，而自由党人则利用他们刚获得的政治权力谋求经济利益（例如通过授予公共土地或过去的公共土地）。不过，通过把旧的寡头集团中许多成员网罗进新的统治集团，无疑使自由党政府秩序得到了更广泛的权力基础。即使如此，这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免不了激烈的斗争。以往的寡头集团被吸收的程度因国而异。在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大概程度最小，而在哥斯达黎加，从殖民时期以来就已表明有明显的延续性。[13] 重大的变化是天主教会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减少以及国家军队的专业化。国

[13] 塞缪尔·斯通：《征服者的朝代》，圣何塞1975年版。

家军队的专业化是社会升迁的可能途径之一。

在社会统治集团内部明显存在外国人，值得引起注意。在咖啡行业中，生产主要受中美洲的种植园主控制。但就香蕉种植园来说，当地的生产者几乎到处都被北美人取代。外国的经济影响在贸易、运输和财政中起决定性作用。长住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人、德国人、北美人、法国人和中东人——在20世纪更加为数众多，加入了成为咖啡加工者和咖啡商人的早期移民。外国居民结合进中美洲社会，一般来说是不彻底的，尽管在哥斯达黎加外国居民往往是入籍的。

就一般平民来说，主要是农村平民，中美洲自由主义最大的矛盾是：一方面宣布对所有公民实行平等；另一方面是实际的社会状况，其中包括强制劳动（在危地马拉强制劳动甚至是合法的）。哥斯达黎加由于其稳固的小地产结构，完全是另一类国家，但是中美洲其它国家里还存在的印第安人公社（主要在危地马拉）以及农业劳工（不论是永久定居在农场的佃农或雇工，还是雇用的短工），都遭受强制劳动制度的折磨。这种重新实行的和扩大的殖民措施跟指令（预付报酬而使农民负债，并常把农民拴在农场）和不准流浪的法令一样。任何时候只要农民想组织起来反抗他们的处境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地主和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中美洲典型的农场有长住的劳工，他们依靠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农场内部拨给的小块土地，作为对工资的补充）生男育女提供新的劳动力；而短工仅在收获季节雇用，在当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只能象占耕农或租佃农那样从事仅足糊口的农作。这种制度使农民的开支得到大量的节余，因此对真正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和适当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217

可是，更典型的无产阶级，的确产生于外国飞地，无论是矿山也好，种植园也好。香蕉种植园的扩展，使加勒比低洼地带出现了拓居的人群和经济开发。联合果品公司为了使人们在这个地区可以定居下来，开始对黄热病、疟疾和其它热带病进行斗争，

其它果品公司也随之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移民浪潮带来了劳动力，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高原地带。至今还没有完全同化的西印度群岛人，仍使用他们自己的土语，他们的到来，产生了某种新的社会和种族问题。例如在哥斯达黎加，中国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数十年来都不是真正的本国公民，同时他们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得随意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在铁路和码头建成以前，以及种植园制度初期，实际上就开始了中美洲的种族问题，主要是危地马拉印第安人（那里印第安人显然占人口的多数）和西部萨尔瓦多的印第安人受到社会歧视。在萨尔瓦多其它地区和整个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印欧混血商人占多数，而在哥斯达黎加绝大多数是欧洲血统人（1925年约占总人口的80%）。

出口经济全盛时期带来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它对中美洲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世纪末期，主要城市开始稳步发展。出口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服务行业，以及民族国家地位巩固而使政府机构强大完备，吸引了许多农村居民迁往城市。这就使主要城市里开始出现城市中产阶级。这对该地区的政治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随着在圣萨瓦尔多，危地马拉和圣何瑟一些小工厂（纺织、食品和饮料）的建立，也首次出现了城市无产阶级的迹象。可是，必须强调指出，工匠仍占绝大多数，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才出现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同样也意味着 218 实现了诸如铺路、装路灯、推广现代交通运输、兴建大建筑物和公园等公共工程，以及增加每天的新闻报纸，医疗事业取得某些进展和教育有所发展；尽管教育几乎仍专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服务（除哥斯达黎加外）。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学生已上升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毋需多说，社会情况仍一如既往，城市化还扩大了一些赤贫区，包括贫民窟。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哥斯达黎加的经济结构特殊，它的社会组织也可以说同样如此，它的特征是：较多的人接受教育甚至

参予政治；政府在卫生、教育和劳工立法的问题上对工人的帮助要比该地峡其它国家发展得更快些。

社会斗争

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可以说得上是社会运动的，只有被乔治·吕德称之为“前工业化时期的群氓”。譬如说，在19世纪80年代，公共土地被自由党政府没收以后，在西部萨尔瓦多发生了农民暴动。19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一批劳工组织都是互助团体，显然这是仿照传统工匠行会的格局。在20世纪20年代，5个国家里工人组织工人行动都得到很大发展，工人自觉的政治运动也发展了，虽然程度小一些。这反映在第一批工会的成立，以及1926年成立了中美洲劳工理事会，它的宗旨是统一整个中美洲的工人运动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直到1930年。在1920至1931年间，还成立了第一批共产主义政党。

可以看出，有些因素说明，或有助于说明人民运动和人民组织发生以后的情况。首先，开始形成了城市下层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例如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他出身于农村，但在圣萨尔瓦多的中学受教育，后来又在那里开始他的大学学习）或米格尔·马莫尔（一位皮匠）。其次，尽管受到严重的镇压，大量无产阶级在外国公司拥有的矿山和种植园里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发生“现代”罢工的环境，主要是1920年以后，更是如此。发动桑地诺暴动的政治文件就是在圣阿尔维诺（尼加拉瓜采矿中心）于1927年写成的。最后，还有一些因素的明显影响，例如：20世纪20年代期间一些中美洲国家减少了镇压，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的成立。

219

然而，工会和人民意识及人民斗争的发展，在中美洲要比拉丁美洲其它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或智利慢得多，也不那么深入。甚至1930年以前的种植园和矿山发生的“现代”罢工，也严格限于经济性质，并无政治色采；而且由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

的运动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性质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出现的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使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发展加快，大大促进了尼加拉瓜的游击战争，并为萨尔瓦多1932年的农民大暴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知识分子的发展

在这些穷国的小城市里，只限于极少数人才能受到教育（哥斯达黎加部分地方除外），所以在文化生活方面无法堪与较大的拉丁美洲其它邻国相比。虽然如此，在这个时期显然还有十分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出生在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尽管他主要在中美洲以外的地方生活，却被认为是所有西班牙美洲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下，中美洲现代主义繁荣起来。享有这一盛名的还有阿方索·科尔特斯和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尼加拉瓜）、何塞·巴尔德斯和比森特·罗萨莱斯（萨尔瓦多）、恩里克·戈曼斯·卡里略和马克西莫·索托·霍尔（危地马拉）、胡安·拉蒙·莫利纳和弗罗伊兰·图西奥斯（洪都拉斯）、拉斐尔·卡多纳和胡利安·马切纳（哥斯达黎加）。除了现代派外，至少还有其它两种文学倾向值得注意。即哥斯达黎加的民俗派，该派试图在诗篇中传播乡村生活（阿基莱奥·埃切韦里亚、华金·加西亚·蒙赫），或以散文传播（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塞莱东）；此外，在哥斯达黎加，还有非常引人感兴趣的罗伯托·布雷内斯·梅森的神秘派诗歌。

220 虽然在其它西班牙美洲国家都熟悉和阅读中美洲的某些作品，但在其它领域却找不到可以相比的例子。譬如说，危地马拉的作曲家赫苏斯·卡斯蒂略，或哥斯达黎加的雕塑家和画家马克斯·希门尼斯当今在本国以外几乎已完全被遗忘。

政　　治

自由派改革和自由派专政

当完全从体制观点来比较的话，中美洲的自由派改革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中美洲 5 个国家里，因为它们都一致受到欧洲和北美模式的感染，它们的宪法、法规、关于把教育世俗化的法令，以及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都有肯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对这些改革的实际意义和结果进行研究时，可以发现有很明显的差别（尽管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关于自由派改革的社会和政治结果，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是唯一可以用法令跟现实相比较而看出在涉及自由、平等和公民权利方面的言行一致程度的。

危地马拉是经受真正自由派改革的第一个国家。在1869年的运动失败以后，自由派革命于1871年推翻了比森特·塞尔纳的保守党政权。这场革命是在墨西哥境内策划的，得到了华雷斯自由党政府的支持。革命领导人是米格尔·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他从1871年至1873年担任总统；还有一位领导人是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从1873年担任总统直至1889年去世，他实际上是一位独裁者。自由党新政权的主要经济措施，早已谈过。在政治领域方面，1879年的自由党宪法确定了总统管辖的中央集权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同时设有一院制立法议会，还使政教完全分离，因此从1871年以来采取了几次反教士和世俗化的措施。可是，危地马拉自由党政权的实际情况，正如地峡上其它国家的情况一样，实现了有利于本国寡头集团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严厉专政，同时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防范，并有计划地阻挠宪法的实施。在 221 这期间，巴里奥斯之后最重要的独裁者便是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1898—1920）。

在萨尔瓦多，经过早期的失败之后，在危地马拉的重大影响

下，圣地亚哥·冈萨雷斯（1871—1876）和拉斐尔·萨尔迪瓦（1876—1885）两位自由党领导人着手进行自由派改革。萨尔迪瓦被弗朗西斯科·梅嫩德斯将军（1885—1890）推翻，在他的领导下自由派改革过程以制订1886年的宪法宣告完成。这是所有中美洲自由党政权中最稳定的一个政权，从1898到1931年从未发生过国内争斗。1913年到1927年，萨尔瓦多由所谓梅伦德斯—基诺埃斯王朝统治，在这期间有三位总统：卡洛斯·梅伦德斯（1913—1918）、豪尔赫·梅伦德斯（1919—1923），以及阿方索·基诺埃斯·莫利纳（1923—1927）。正如危地马拉一样，尽管制订了宪法和颁布了其它自由派文件，对萨尔瓦多的自由党政权来说，把它称做寡头独裁政权比代议制共和国更为合适。

在哥斯达黎加，温和的保守党政府，诸如布劳略·卡里略（1835—1842）和胡安·拉斐尔·莫拉（1849—1859）政府早就采取了自由派措施。1844年的宪法早已明确地带有自由派色彩。所以由托马斯·瓜尔迪亚（他于1870—1882年担任总统）领导的1870年政变和1871年的自由党宪法，只是非常缓慢的逐步改革过程的一部分，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发生的情况相比，哥斯达黎加的改革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动乱。可是，哥斯达黎加的自由党政府，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没有象中美洲其它国家政府那样荒唐可笑。早在1889年，自由党人便遭受选举上的失败，并接受了失败教训；1917年，宪法进程受到费德里科·蒂诺科·格拉纳多斯专政的阻挠，这是事实，但时间很短。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参予政治，以及大多数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较少采取压制而更多倾向于社会改革，这种态度使哥斯达黎加政权得以比较稳定。这就说明为什么哥斯达黎加的香蕉种植园主地位比较牢固。从1909年起对他们征税，这是在其它中美洲国家得以实施征税以前，而且还要迫使种植园主履行他们修筑铁路的义务。

洪都拉斯就是自由派改革失败的明显例子。换句话说，尽管实行了改革，而且建立了自由党国家的体制框架，由于在全国一

级缺少一个坚强的治统阶级，最终证明它的改革进程一无所获。在19世纪，洪都拉斯的经济和社会有许许多多不重要的地方活 222 动，在整个经济框架内彼此并无真正的联系。例如特古西加尔巴的锡矿、大西洋沿岸的木材、奥兰乔和南部地区的畜牧业、科潘的烟草，等等。国内的地理形势使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内战和独立以后的“平定”时期发生的破怀和屠杀更增加了交通困难造成的影响。在1876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间，在危地马拉自由党和诸如马科·奥雷利奥·索托和拉蒙·罗萨这些领导人的影响下，进行了自由派改革的真正尝试，实行了政府和社会的非宗教化，颁布新的法规，建立新的税收机构，推行铁路政策，对矿山和咖啡种植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等等。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能对政府及其全部改革政策提出方向、并能把国家同地方寡头统治势力结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因此这次改革尝试遭到失败，政府也变得非常不稳定和软弱无力。这样便轻易地成为香蕉公司的猎物。同该地峡的其余国家一样，洪都拉斯也在这个时期经受专制统治：马科·奥雷利奥·索托（1876—1883），路易斯·博格兰（1883—1891），以及波利卡波·博尼利亚（1893—1899）。

在尼加拉瓜，何塞·桑托斯·塞拉亚（1893—1909）的统治下，自由派改革进行较晚，但很有代表性，他实行了诸如1902年土地法这样的措施，对劳动力确立了坚强的控制。但是塞拉亚在经济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尽管十分温和）使多数外国居民寻求同尼加拉瓜保守党人的联盟，尽管进行了自由派改革，保守党人始终是一股必须认真对付的力量。在美国的支持下，1909年发生了推翻自由党领导人、恢复保守党统治的叛乱。是年之后，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并在以后的20年里操纵了尼加拉瓜（以下详述）。

中美洲自由党领导人都具有实证主义的思想。他们跟独立时期的老自由党人不同，即使他们没有正式放弃民主政治的理想，他们认为地峡的民族经济社会在民主真正实现之前，必须依靠严格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发展起来。他们还深深地蔑视印第安人和农

民群众，对这些人不信任，并进行严厉的压制。可是，应该明白，具有强烈自由派色彩的引进的体制同露骨的社会压迫之间，223 必然会产生矛盾。中美洲国家所经历的依附性经济发展，不需要享有充分劳动权和公民权的工人。相反，它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以及低工资。哥斯达黎加是个例外，但只是局部的例外。

联合的梦想成为外国干涉的依据

19世纪末，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尚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使它们的联合恢复成为一个联邦。何况，这种计划从来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也缺乏群众基础或经济基础。它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美梦，有时也是富有野心的政治家或者甚至是墨西哥和美国这样一些外国手中的工具或利用的借口。

例如，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新的中美洲联盟，于1876年在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之间挑起了战争。1885年巴里奥斯被打败并被杀于萨尔瓦多境内。第二次联盟计划是美国最后一次于1894—1895年在中美洲试图推行炮舰外交的结果。因为发生了一次外交事件，英国军舰封锁了尼加拉瓜的科林托港，但是美国的干预使事件得到解决，英国承认尼加拉瓜对莫斯基托海岸的主权，而尼加拉瓜则偿付赔款作为交换。此后，英国撤出地峡，而美国在地峡取得主宰地位，这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已成为公认的趋势。洪都拉斯总统波利卡波·博尼利亚抓住英国最后一次进行威胁的时机，邀请他的中美洲同僚到阿马帕拉，由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三国共同签订一份条约，联合起来在1895年6月20日组成中美洲大共和国。美国开始好象承认这一措施，但在1896年美国政府却不承认由该新联合共和国派往华盛顿的大使。事实上整个计划都是十分脆弱的，没有多久共和国就垮台了，那是在1898年宪法草案签署后不久。

在20世纪初，美国和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决定联合起来干涉中美洲事务。美国早已支持1902年的科林托协定，除

了危地马拉之外，所有中美洲共和国都在协定上签了字，它们同意把它们间出现的任何争端都提交地区仲裁法庭。当1906年危地 224 马拉的革命党人在萨尔瓦多政府的帮助下，试图推翻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独裁者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一场战争，最终把洪都拉斯卷了进去。美国和墨西哥采取一致行动，跟哥斯达黎加在北美轮船马布尔黑德号上举行了一次会议，于1906年7月在船上签订了一项条约，结束了当时的战争，并计划在圣何塞再举行一次会议。但尼加拉瓜拒绝承认美国对中美洲的干预，因此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圣何塞，其它四个国家决定由墨西哥和美国的两国总统对最近这次战争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裁决，而中美洲法庭则解决地区内今后的问题。几个月以后，第一次法庭审判没有解决首先涉及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后来又涉及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复杂事务。波菲里奥·迪亚斯和西奥多·罗斯福然后说服中美洲各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

1907年的华盛顿会议决定推动中美洲各国之间签订一项重要的合作计划。该计划要建立一个促使各国重新联合起来的中美洲局，以及解决未来的纠纷的中美洲法庭。这次会议以后不久，于1908年，法庭成功地处理了涉及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反对洪都拉斯的问题。这个法庭一直工作到1917年，那时由于它无法谴责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而告终止。又一次中美洲联盟的尝试，发生在1921和1923年，但是都没有成功。

洋际运河问题：巴拿马的非法诞生和对尼加拉瓜的干涉

最终建造洋际运河的计划，在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之后经历了多次变化。哥伦比亚把在巴拿马的权利让给了一家法国公司—世界洋际运河公司，它在费迪南·德·莱塞普斯的指导下，于1882年开始建设这条运河。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完成这项工程，便于1889年破产倒闭了。总工程师比诺—瓦里拉把在巴拿马

225 的法国租让地出售给了美国。可是美国由于巨大困难和费用昂贵，以及发生了跟当时世界经济肖条有联系的许多财政问题，在1895年前后试图在尼加拉瓜修建它自己的运河失败之后，才对巴拿马运河线感到兴趣。

当美国人重新开始对洋际运河感到兴趣的时候，发生了新的变化。1901年同英国签订了第二次海一庞斯福特条约之后，打开了由美国完全控制一条设防运河的可能性。从战略观点来看，由于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利益正在增长，这条运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尼加拉瓜总统塞拉亚坚持他的决定，不让外国控制他的国家领土的任何部分。因此，1902年开始跟哥伦比亚就美国在在巴拿马建设运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还包括北美对运河区的主权问题。但是在1903年，由于美国军事干涉巴拿马既没有征得哥伦比亚又没有得到地方当局（1902年 9 月）的同意，哥伦比亚议会拒绝批准海一埃兰条约。美国于是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煽动曼努埃尔·阿马多尔医生领导的巴拿马运动。美国立即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并很快于1903年谈妥了允许建设运河的条约，确定美国对这条10英里宽的运河区控制100年。1914年运河开通，巴拿马成了拉丁美洲最典型的飞地经济社会。它完全依赖这条新建的洋际航道，以及这条航道所需的服务。此外，它在政治上是美国的某种保护国，跟古巴的地位十分相似。

与此同时，出现了塞拉亚同欧洲的资本家谈判建设另外一条沟通两洋的尼加拉瓜运河的可能性。这是违背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加上其它因素，使两国于1908年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于1909年推翻了塞拉亚的统治。美国于是利用尼加拉瓜财政金融混乱的情况乘机进行了干涉，1912年派海军陆战队登陆，确认了1911年建立起来的保守党傀儡政府，控制了尼加拉瓜的海关、铁路和国家银行，同时还建立了一支由美国军官指挥的国民警卫队。1916年签订的布莱恩一查莫罗条约最好地概括了这一形势。
226 该条约赋予美国永久拥有在尼加拉瓜开凿和经营洋际运河的独占

权，并巩固了美国对尼加拉瓜事实上的保护关系，虽然为了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建立正式保护国的条款不得不从条约里抹掉了。

由于得到墨西哥的支持，1925—1926年自由党的反抗成为一次真正的革命。那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实行撤离。但是自由党军队领袖何塞·马里亚·蒙卡达为了在下一年的尼加拉瓜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做到了），于1927年跟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的副官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拒绝这一协议，后来便成为全国游击斗争的领袖。他谴责布赖恩—查莫罗条约和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各种干涉，而且摧毁了美国的财产。大约在6年里他跟他的小团体得到民众普遍的支持，不仅成功地打击了由美国培养和训练的国民警卫队，而且还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后来，由于弗兰克林·罗斯福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尼加拉瓜，罗伯托·萨卡萨当选尼加拉瓜总统。桑地诺于1933年1月停止了战斗，并投靠萨卡萨总统，可是在第二年却被国民警卫队在其领导人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命令下阴谋暗杀了。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当时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尼加拉瓜的政府。

结　　论

五、六十年前中美洲自由派寡头集团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控制和政治组织，由于受到中产阶级和20世纪20年代人民运动的攻击，以及面临1929年的经济危机，到1930年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和注定失败了。但是由于看不到别的模式可以取代出口经济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模式，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一个非常漫长和困难的过程。

中美洲最后完全结合进世界市场，这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也造成了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结构所带来的困境，甚至到今天这些困境还没有完全解决。自由派秩序（除了在哥斯达黎加）使

227 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失去了来自经济增长的各种利益，而且也失去了任何政治参予。农民群众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因此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经济与社会隔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国家或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很困难的。

第 5 章

古巴（约1860—1934年）

19世纪60年代，西班牙在美洲仅存的两个殖民地中，古巴最富有，人口最多，但它却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自18世纪末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已使这个岛转变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糖生产地。但在19世纪50年代里这种经济增长已开始减慢了。尽管这个殖民地的主要产品蔗糖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扩大，但来自欧洲和美国甜菜的日益强大的竞争，以及新的甘蔗种植区的开发使古巴蔗糖前景面临着威胁。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很多精明的大庄园主（糖厂主）就已意识到这种威胁。他们开始努力将糖业现代化（主要是机械化），同时加倍要求改革陈旧的殖民地商业体制。西班牙经济的弱点，特别是由于缺乏制糖精炼设备和无法容纳古巴蔗糖的产量，使得古巴所处于的殖民地困境日益明显：对市场和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而这些条件宗主国却无法提供。

此外，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糖业生产基本要素的奴隶制度，其前景也变得暗淡了。1817年西班牙与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宣告向古巴贩卖奴隶的交易为非法，但这种交易仍在继续。1835年两国又达成了一协议，西班牙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后，这种交易才被迫一年一年地减少了。直到1860年这一臭名昭著的

贸易才最终消失①。在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一些大庄园主把继续奴隶交易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对古巴并吞上。他们甚至帮助组织到古巴去的美国武装远征队，只是由于在美国内战中，北方取得了胜利，才打消了这种并入美国的奇特想法。1865年以后，大庄园主们为了维护旧体制进行了挣扎，企图拖延奴隶制的废除和索取因失去奴隶而受损失的赔偿。

因而，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大部分经济精英分子都集中力量争取西班牙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保证他们能进行自由贸易，在他们的损失能得到补偿的条件下逐渐取消奴隶制以及更多地参与殖民地的管理。而掌握着贸易和殖民地管理大权但又最不愿意妥协的半岛人（西班牙人）则表示反对，指责每一项改革就是向独立迈出一步。其中半岛人最常引用的一个论点就是，任何对西班牙的反叛都会导致海地命运在古巴重现。18世纪90年代海地白人之间发生的内讧导致黑人举行的破坏性起义取得成功。

有少数认为西班牙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实行改革的古巴人，确实赞同独立。他们当中一些人受到19世纪初由哲学家费利克斯·巴雷拉和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等诗人播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憧憬着一个享有主权自由，并在经济上与美国密切联系的古巴。其他一些人则想结束西班牙对古巴的统治，然后象得克萨斯在18世纪40年代那样并入美国。在他们眼里，美国是经济进步和民主的象征。

在19世纪50年代里，对西班牙的反抗不但明显地增加了，而且波及到人口中各阶层。沉重和不公正的赋税（此外，古巴还被迫为西班牙1862年对墨西哥的远征，为西班牙在非洲的军事行

---

① 那时，奴隶人数已从1841年约50万人（占人口44%）的顶峰下降到1860年的367，350人(在140万的人口中不到30%)。拉蒙·德拉·萨格拉著《1860年的古巴：人口、农业、商业和公共收益的发展统计》（巴黎，1863，第一次发表时收入他写的12卷《古巴岛的政治和自由史》的附录）第9页。

动、为西班牙1866年与秘鲁和智利的海战以及为西班牙在整个拉美的外交使团提供经费或出力)，日益庞大的西班牙官僚集团的统治，以及那些自认为比本地人高人一等的半岛人的歧视，使很多古巴人包括占人口16%的获得自由的黑人开始显露出他们的不满。整个岛分为敌对的两个阵营：古巴人对西班牙人。在西部省份古巴人以12:1的比例超出了西班牙人，而在东部省份，这一比例更高达23:1。

1865年，要求改革的运动势头增长。西班牙国内政治变化使自由主义分子掌了权。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选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准备在马德里开会，讨论宪法改革和奴隶制问题。然而，这个委员会却在1867年被出其不意地解散了。西班牙政府完全不理睬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同时，一场国际经济危机打击了古巴，迫使它减少甘蔗收成。其结果是，普遍的反西班牙怨恨情绪达到顶峰，亲独立的组织认为他们的机会已到。“西班牙是说服不了的，只有击败它”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

231

西部地区（比那尔德里奥省、哈瓦那省、马坦萨斯省和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部分地区）集中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和糖业财富的百分之九十。那里的大部分大庄园主们不愿冒与西班牙打仗的风险，而是赞同改革。然而在糖厂和奴隶都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东部地区（奥连特省、卡马圭省以及拉斯维利亚斯的其余部分）大庄园主们如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弗朗西斯科·比森特·阿吉莱拉和卡洛斯·曼努埃拉·德·塞斯佩德斯却深信有必要也有可能打败西班牙。此外，由于公路和铁路是根据糖业的需要而修建的，该岛东部地区面积较大但比较落后缺少良好的交通，有助于阻碍西班牙军队的部署，增加亲独立组织的勇气。在反抗西班牙的奥连特省，巴亚莫镇成了策划中心。那里的大部分教士是西班牙人，因而革命的领袖可利用共济会的秘密场所来进行组织和

协调他们的行动②。

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那些为独立而战的人也是一种鼓舞。西班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得手，它在1861年占领该国，而于1865年又放弃了，而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的失败造成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世被处决，使得很多古巴人相信欧洲强国，特别是正在衰落的西班牙，能够被决心抵抗的民族所打败。多米尼加事件对古巴来讲还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很多移居古巴东部地区的具有军事经验的多米尼加人为后来的古巴起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868年夏，策划者们加紧了行动，抗税活动蔓延开来，鼓动的调子也变得更好战了，并派人到哈瓦那劝说改革派参加起义，但没有成功。与塞斯佩德斯等领导人急不可待的愿望相反的是，策划者们在7月份决定将起义的日子定在12月。

危机爆发前夕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9月18日那天，西班牙皇室的日益动荡导致了一场军事叛乱，结束了伊萨伯拉二世的统治。古巴殖民当局对这种政治动乱的结果感到厌烦，而采取了消极和谨慎的态度。波多黎各的拉雷斯镇爆发的一次小叛乱（1868年9月22日）被西班牙军队轻易地粉碎了，然而，没有根据的传闻却传遍了古巴，据说众多的波多黎各组织准备继续战斗。最后，奥连特省出现了谣传，说西班牙当局已得知起义密谋并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塞斯佩德斯相信再等下去将意味着灾难，便断然决定起义。10月10日，在没有与其他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他召集了一部分随从在他的拉德马哈瓜庄园打起了起义的旗帜，宣告古巴独立。

对此，殖民政府无法作出果断的反应。由于不了解奥连特的

---

② 与拉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不同的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古巴的教士们几乎全都忠于西班牙。这主要是因为1826至1841年的西班牙自由改革，使教士们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财源，而1851年的宗教协定实际上使教会变成了政府的工具。独立以后，对这种反古巴态度的记忆相当大地削弱了古巴天主教会的影响。

事件以及被西班牙的政治动乱所困扰，古巴都督莱松迪对起义的消息并不重视。尽管在亚拉镇出师不利，塞斯佩德斯还是有时间征召心怀不满的古巴人和具有战斗经验的多米尼加人以扩大他混杂的队伍。10月18日，他进攻并夺取了巴亚莫镇，暂时平息了关于他有个人野心的指责，并确定自任起义领袖。

巴亚莫的陷落震动全岛，唤起了古巴民众。在奥连特和卡马圭，一些组织效仿塞斯佩德斯揭竿而起。拉斯维利亚斯中部省份也出现了起义队伍。甚至连一些年青的哈瓦那改革派也急忙加入起义队伍。1869年初，仍把这场起义看成局部事件的殖民地政府已面临着迅速扩大的起义活动。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开始了。

虽然战争只局限在该岛东部地区，但坚持了10年之久，迫使西班牙向"一贯忠诚的古巴"派出了十多万大军。起义者的勇气和耐力因一些其他基本因素而得到加强。农民的支持和对地形的熟悉使他们拥有优越的灵活机动性。他们对西班牙军队的动向了如指掌，因而可以挑选进行战斗和隐蔽的最佳场所。古巴的气候也帮了大忙，使他们成了游击战的专家。西班牙士兵则不适应热带环境，因患黄热病和疟疾而纷纷病倒。西班牙军队常因疲于奔命而使行动陷于混乱。

233

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变得对古巴人有利。在战争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伊萨伯拉二世退位；军人摄政；萨伏依的阿马德奥一世的统治（1871—1873）；共和国宣告成立；阿方索十二世复位；以及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72—1876）。因此，在古巴作战的西班牙军队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物质供应。传统官僚政治的腐败加上政治上的任人唯亲也损害了重要的军事行动的进行。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战争的头8年里就有11名军官先后担任古巴都督。

然而古巴人也有自己的问题。小地区主义，不同的阶级背景

* 指支持唐·卡洛斯后嗣争夺王位继承权的西班牙内战。——译者

和对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使其内部分化，缺少夺取胜利所必需的纪律和团结。1869年在奥连特省的圭马罗镇举行立宪会议，正式宣告共和国成立，颁布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名义上废除了奴隶制并且通过同意并入美国的议案。不幸的是它还建立了分权制，这使独立战争受到阻挠而最终失败。塞斯佩德斯等人所表现出来的独裁倾向使受到卡马圭省领导人，具有浪漫色彩的青年律师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影响的一些代表感到惊恐。他们建立了墨守法规的共和国，规定军事领导人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能随便采取行动。文人和军人之间继而发生了不间断的冲突。起义军的大部分军事领导人不是被巡回政府（巴亚莫镇最后又被西班牙人夺回）撤换就是受到指责，他们虽然不愿屈服但却无法再行使其全部权力。

1874年，发动了这场战争的许多精英——阿吉莱拉、阿格拉蒙特、塞斯佩德斯等不是身亡就是流亡国外。出身贫贱但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新领导人则将斗争激化了。多米尼加人马克西莫·戈麦斯和古巴的黑白混血儿安东尼奥·马塞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那时美国严守中立，对古巴要求承认的请求置之不理③，已使人们对美国提供援助的幻想烟消云散，实事上也打消了起义者中要求并人美国的倾向。

流亡国外的古巴的人所提供的资金日益枯竭，而西班牙卡洛斯战争的结束使马德里得以将其注意力集中转向古巴。古巴军事领导人因而认为他们取胜的唯一希望在于进攻岛上富饶的西部省份。对那里众多糖厂的破坏可以使西班牙丧失重要的收入，使成千获得自由的奴隶和农民加入起义队伍。在国库空虚和没完没了

③ 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倾向于承认古巴的交战状态？但他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仍坚持传统的美国政策，将古巴置于一个较弱的国家如西班牙的控制之下，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吞并它。菲什总是设法阻挠了总统的意图。参考菲利浦·S·方纳著《古巴史以及古巴与美国的关系》（2卷集，纽约，1962—1963）第2卷第204—220页。

的战争的处境下，西班牙势必将被迫接受古巴的独立。1875年初当戈麦斯在拉斯维利亚斯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并准备实施这一计划时，另一场内部冲突使这个计划告吹。他返回奥连特以整顿内部秩序，然而却被迫交出了指挥权。革命的势头开始转向。

新上任的古巴都督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采用了军事压力和宽宏大量的赦免以及许诺改革的两面手段，进一步分化了士气低落的起义军。1877年底，古巴总统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被俘。1878年2月，一个古巴专门委员会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停战的条件。经西班牙当局批准，在一个叫桑洪的村庄里鉴署了和平条约。根据该协议，古巴也将象刚获得自治的波多黎各那样享有自治权(实际上，波多黎各的自治权在这一年后期被收回了)。然而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在巴拉瓜拒绝了这一条约，要求独立和立即废除奴隶制并宣称要将战争继续下去。这是令人吃惊但却无用的姿态。5月份，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接受了《桑洪条约》。戈麦斯，马塞奥等其他一些古巴领导人则流亡国外。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就此结束。

这次整个战事在古巴被称为十年战争。它使民族意识成长和成熟了。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整体一致性的模糊感觉变成了一种深沉和强烈的情绪。虽然种族主义仍存在，但西班牙的警告，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可能会触发一场类似海地那样的种族战争却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为黑人已和白人一起参加了反西班牙的斗争。古巴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胜利以及西班牙所犯的暴行（如1871年处决7名大学生）仍留在人们记忆中，并燃起了爱国主义情绪，使完全和解变得极为困难。对西班牙来讲，战争增加了最顽固的半岛人对古巴的仇恨和不信任感。 235

东部地区几百家糖厂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这为新掘起的现代化糖业部门中的扩张势力打开了这些省份的大门。甚至在没有受到破坏的西部地区，战争也加速了类似的进程。很多有钱的大庄园主开始建造更大，更有效益的糖厂，而那些蒙受了严重损

失或者无力建造大糖厂的庄园主们则成了垦殖者（向糖厂出售甘蔗的种植者），减慢了岛上向大庄园制的发展趋势。最后，战争标志着古巴地主贵族的衰落。他们因长期的战争而被摧毁，要不就在西班牙当局的强制下被迫出售土地和糖厂。而美国资本家则趁机常常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土地和糖厂，标志着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渗透。

在桑洪媾和（1878年）与1895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之间发生的三件最重要的事件是：自治党的兴起和衰落；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古巴的经济宗主国；何塞·马蒂的古巴革命党的形成及其影响的不断增长。

在哈瓦那，十年战争结束后几个月，过去的改革派组织的主要成员和很多急于争取复兴和繁荣的古巴人成立了一个自由派别即自治党。这个强大的民族组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和平途经实行古巴自治。当1880年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和其他反叛领导人企图举行起义时，该党立即谴责了他们的行动并宣布其对西班牙的忠诚。在遭到亲独立组织和传统的顽固的半岛人同时反对的情况下，自治派分子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然而，人们对改革的响望以及主战派老战士内部的分裂使自治派分子暂时得到了很多古巴人的支持。尽管进行了组织工作和出色的政治鼓动，但他们的胜利却微不足道，《桑洪条约》签订10年之后，虽然西班牙最后终于废除了奴隶制（1880—1886年），使古巴人享有了一些政治权力，但不平等现象仍司空见惯。例如，1890年，令自治党人大失所望的是，西班牙颁布了普选制但却将古巴排除在外。三年以后，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毛拉鉴于古巴民愤日增，建议进行使古巴获得自治的新改革。他的建议照例遭到西班牙和哈瓦那保守派的反对，而大部分古巴人对此也持怀疑态度。1894年毛拉辞职时，自治党人已丧失了大多数人的信任，而马蒂的新成立的古巴革命党成功地团结了大部分要求独立的组织。一场新的经济危机使自治派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1894年，一场新的独立战争即将爆发。

古巴出口品，主要是蔗糖销往美国市场的数量日益增大。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1850年古巴向西班牙出口了价值700万比索的农产品，向美国出口为2800万比索。1860年，向两国的出口分别为2100比索和4000万比索。到1890年 西班牙从古巴进口了700万比索农产品，而美国则进口6100万比索。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古巴极易受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1894年美国政府通过了针对蔗糖进口的“威尔逊关税法”。这对古巴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古巴蔗糖向美国的出口由1895年的800,000吨减少到1896年的225,231吨。而价格下跌和日益严重的国际竞争引起的古巴糖业危机则进一步尖锐化了，为另一次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气氛。

何塞·马蒂是第二次独立战争的中心人物。他组织了古巴爱国同盟并创建立了古巴革命党。马蒂出生于1853年1月28日，父母是西班牙人，他天资聪明，酷爱读书，性格孤独，年青时就萌发了对古巴的满腔热爱之情。1870年他天真地写了一封信，批评一位参加西班牙军队的同事，因而被殖民当局判了6年苦役。他被放逐到西班牙，在狱中度过几个月后，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古巴的政治流放者》表达了他的愤怒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他在序言中写下了他生活的座佑铭：“只有热爱才会有创造”。他后来在萨拉戈萨大学学习，然后周游欧洲，并作为记者在墨西哥工 237 作，还在危地马拉教过书。1878年他回到古巴，但在西班牙当局的逼迫下，他又离开，移居委内瑞拉。1881年，他在纽约定居下来。他拥有作家的名声得以向靠拉美一些杂志撰写文章为生。马蒂的散文和诗歌以异常热情奔放和别出心裁的风格使他在拉美文学界声名大震。最后他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争取古巴独立的斗争。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争吵不休的古巴各流亡组织团结起来，但由于他缺乏军事经历，这一任务就显得更为困难。他到处游说、演讲、写文章，消除了人们的批评和怀疑，再次点燃了古巴人的热情，为团结打下了基础。1892年，他建立了古巴革命党。以他惯有的热情，马蒂为进行“正义和必须的战争”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

美国国内日益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则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急迫感。

马蒂是一位坚信民主的人，他向古巴各阶层，各种族呼吁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的共和国而战斗——这个共和国不光向全体古巴人甚至也向愿留在古巴的西班牙人提供公正和平等的保证。为了避免长期战争可能导致军事考迪略的出现、对古巴财富的破坏以及美国的干涉，马蒂策划了不同于十年战争的斗争方式，即岛上的每个地区同时进行群众性的起义，用足够的力量争取速胜。马蒂在一些富有的古巴人和在佛罗里达干活的大部分古巴烟草工人的支持下，勤奋地尽可能地收集资金和物资装备为初步打击作准备。1895年1月用于三次远征的军事装备已聚集在佛罗里达的费尔南迪纳港。然而，1月14日，美国当局突然没收了去那里的船只和船上货物。这个不幸事件大大地改变了马蒂的计划，也使西班牙当局了解到这一密谋的规模。如果推迟暴动时间就可能使在古巴准备起义的人陷人危险。在经过孤往一掷的最后一次争取新的物资供应的努力之后，马蒂决定了起义时间并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马克西莫·戈麦斯会合。

根据计划，2月24日在奥连特、卡马圭、拉斯维利亚斯，马坦萨斯和哈瓦那的小组举行武装起义。西班牙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后两个（较小）的地区，因此那里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东部地区再次在斗争中首当其冲。4月1日马塞奥在奥连特省登陆。当阐明这次战争目的《蒙特克里斯蒂宣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表之后，马蒂和戈麦斯于4月15日也向奥连特省进发。在以后的一个月里，马蒂与马塞奥将军发生了争执，原因是，他认为建立一个能平衡将军们的权力的文人政府是必要的并为此进行了辩护。马蒂不久在多斯里奥斯与西班牙军队的一次战斗中阵亡。

238

马蒂的牺牲使起义队伍失去了最杰出，最受尊重的文人领袖。由于马蒂的去世，戈麦斯将军和马塞奥将军得以不受拘束地着手组织一个符合他们思想的革命政府。俩人都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政治组织以得到国际承认和军事援助。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曾使

十年战争失败的那场破坏性争论。这次再也没有文人领袖会干扰他们的军事计划了。1895年9月在希马瓜尤镇匆忙举行的制宪会议通过了一部宪法，其中第四章写道“政府委员会”只能在它认为为达到另一政治目的而绝对必须的情况下才能对军事行动进行干与”。④萨尔瓦多·西斯内罗斯·贝当古，一个曾经参加过以前战争的，富有的，出身贵族的卡马圭人被选为总统。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这位1878年的最后一任武装起义时的总统被确认为共和国的特派员和外交代表。马克西莫·戈麦斯被任命为总司令、安东尼奥·马塞奥为副总司令。俩人都得到了足够的权威，几乎可以独立于文人控制之外。

希马瓜尤制宪会议标志着战争特点向其他方向的一些变化。属于贵族阶层的代表极少，意见不一的奴隶制问题也消失了，〔与美国〕合并的问题不再被提及。绝大部分代表都是没有经验的年青人。一位十年战争时期的杰出老战士，以后成为这一段历史的专家的恩里克·科拉亚索评论道“这是一场穷人和青年人的革命”。⑤然而与马蒂想象所相反的是，这也是一场将军们的革命。

随着革命政府的合法成立，戈麦斯和马塞奥可以放手执行进攻西部地区的计划了。西班牙军的基本战略与十年战争时代类似。在上次战争中击败古巴人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再次统率西班牙军。西班牙军修筑了一系列防御线来保卫每个省份以阻止起义军行动。而这种战术却使古巴人得以采取进攻行动。1895年10月22日，马塞奥从巴拉瓜开始了向西部的进发。戈麦斯带着一支小部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等他。向部队下达的通令是“烧毁和破坏掉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1896年初，古巴军队在一次出色的

239

④ 莱昂内尔·安东尼奥·德拉奎斯塔和罗兰多·阿尔瓦雷斯·利内拉编《古巴宪法》（纽约，1974）第127页。

⑤ 恩里克·科利亚索《独立的古巴》（哈瓦那，1912），第195页。

战役中横贯岛屿，来到哈瓦那附近进行战斗。一些古巴富饶的地区在战斗结束后成了废墟。

为了迷惑西班牙人和扩大战斗行动，两位将军到哈瓦那后兵分两路。戈麦斯返回拉斯维利亚斯。马塞奥则继续进攻比那尔德里奥——西部最后一个省份。进攻获得成功，但西班牙人还没有被打败。巴莱里亚诺·魏勒取代了马丁内斯·坎波斯。他带来了大量援兵。在马德里，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宣布了他的政府的决定：“西班牙将战斗到最后一兵，最后一个比塞塔”。战争继续进行。

魏勒上任后，战斗更加激烈。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平定古巴人的起义，采取了攻势并把军事区域内的农民赶进了“保护营地”。食品的缺乏和组织工作的混乱，使这一严厉但军事上可行的措施变成了非人道的冒险。它激起了起义者的愤怒和国际上的抗议。魏勒的灭绝战争进行了 9 个月之后，只有两个省被平定了，然而到1896年12月，魏勒取得了最出色的成功。以“青铜巨人”著称的安东尼奥·马塞奥在哈瓦那省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被打死。

马塞奥的死亡对古巴人来讲是个沉重打击。而且也是在这时，戈麦斯将军与古巴革命政府之间的对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方面企图约束一下戈麦斯的个人权力以维护本身的某些权威措施。戈麦斯的反应则近乎造反。而“青铜巨人”的死亡使双方都感到震动。戈麦斯的儿子随同马塞奥英勇牺牲的消息则给戈麦斯的声望增添了悲惨色彩。美国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声明，即一个文人的古巴政府只是一种“假象”，清楚地表明了有妥协的必要。⑧政府没有触动戈麦斯的权力，而将军也公开向美国人保证，自由选举出的“武装”政府是所有古巴起义者的最高权力机构。

240

---

⑧ 克利夫兰声明以后，国务卿理查德B·奥尔尼又作了一个更明确的声明，参考《美国的外交关系》（华盛顿特区，1897）第29—30页。

随着马塞奥的死，西班牙对胜利的希望也日增。魏勒将4万军队集中在戈麦斯军队总部所在的拉斯维利亚斯，并自信地宣称这个省将在几周内被平定。戈麦斯带着4000人的部队进行了出色的战役。这位老将军采取了避开敌人，骚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但保存了自己，而且给敌人以重创。到1897年5月，西班牙人的攻势失去了势头。同时在奥连特省，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趁西班牙军队集中进攻戈麦斯之机进攻并夺取了吉瓜尼镇和战略路口维多利亚德拉斯图纳斯。两个月后魏勒被调回西班牙。古巴的胜利、魏勒的保护人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首相在西班牙被刺杀（杀手是一个与波多黎各和古巴在欧洲的流亡者有联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和美国对古巴形势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关切使马德里相信已到了让步的时候了。新上任的立场温和的普拉克塞德斯·萨加斯塔将拉蒙·布兰科将军派往古巴，提升为都督。布兰科将军到达哈瓦那后，宣布古巴实行自治，并任命了一些自治党人为新政府成员。

这时古巴形势已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克利夫兰总统相信西班牙可以最好地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利益，因为西班牙向美国人在古巴的财产损失作出了赔偿，同时又摒弃了“古巴恶棍”，因此他保持了对西班牙极有利的“中立”态度。然而国会，特别是新闻界猛烈抨击西班牙的政策，并要求承认古巴。威廉·麦金莱出任总统后，反西班牙运动达到了群情激昂的程度。古巴人被视为是魏勒这类刽子手屠杀的无辜牺牲者。同时，头脑清醒，有势力的分子也为这一运动增添了力量。在艾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洋大国思想的鼓舞下，扩张主义分子如西奥多·罗斯福表示欢迎美国国旗在加勒比海出现。一些美国商人再也不相信西班牙能保护他们在古巴的利益，越来越赞同美国的干涉。

211

在这种情况下，麦金莱总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1897年12月6日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他拒绝承认古巴为交战一方或是古巴独立，建议等着看看新宣布的自治的结果如何再说。等的时间

是短暂的。起义者拒绝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1898年初，哈瓦那的亲西班牙分子举行了反对布兰科将军和古巴自治的示威。美国领事菲茨休·李异常紧张，要求"缅因"号军舰舰长从12月开始在基韦斯特处于戒备状态，为开往哈瓦那作好准备。1月24日美国政府得到允许，派该舰到古巴进行"友好"访问。第二天，在哈瓦那港的一群默默无声的人目睹了"缅因"号的到来。舰长西格斯比一直等到中午，以便让西班牙人有足够时间来瞧瞧美国海军力量的象征。

当"缅因"号延长访问时间使西班牙当局不满的时候，一起外交事件则进一步使形势紧张起来。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写的一封贬损麦金利总统和古巴自治党人的秘密信件被古巴革命者截获并向新闻界公布。西班牙公使的辞职以及西班牙的道歉都无助于平息这场风波。新闻界在西班牙对古巴改革缺乏诚意以及对美国怀有敌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然而这场风波还未平息，2月15日"缅因"号又发生爆炸，造成260名官兵死亡。西班牙当局尽力挽救幸存者并断言这场灾难是由内部事故引起的。美国任命了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但是那些对战争感兴趣的人表示要复仇，并提出了流行的口号"记住缅因号，'西班牙见鬼去'。"2月25日，助理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擅自作主发布命令使海军处于全面警戒状态。

随着战争可能性的增加，古巴的前途引起了争论。美国人的意见从支持独立到并吞都有。很多美国人的看法里渗透着对劣等 242 种族的蔑视。然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却没有改变：绝不能承认一个由反叛分子组成的政府。4月9日，西班牙政府再次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向起义者提出无条件立即停火，然而却遭到拒绝。西班牙不能为避免战争而做更多的事了。4月11日，总统麦金莱向国会提出一咨文，称"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及代表受到威胁的美国利益"，他要求得到强行干涉古巴事务的权利。五天以后，经过激烈的辩论，国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其中第一条宣称"古巴人

民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且应当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最后一条称"美国绝无在该岛行使主权、管辖权或进行控制的任何倾向或意图……并声明它决心……把治理和控制该岛的权利交给该岛人民"。四天以后，战争爆发了。而古巴起义者政府的存在却被完全置之不顾。

古巴起义者对华盛顿政策的复杂性了解甚少。总的来讲，他们欢迎美国介入战争。对此表示担心的马蒂和表示反对的马塞奥都已死去了。经过三年的残酷战争，起义者们准备同许诺让他们独立和取得胜利的伙伴合作。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1897年曾写道"美国没有理由干涉我们的政治事务。另外，我们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美国佬的工厂"。⑦他现在却也相信美国会尊重古巴的主权；而马克西莫·戈麦斯曾拒绝过西班牙将军布兰科的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的最后请求，他回答说："我只知道只有一个民族——人类……到现在为止，我对美国只有崇拜……我没有感到那种你所指的美国要灭绝我们的危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历史会做出审判……你我之间要达成谅解已为时太晚了"。⑧

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触发了一股民族热情。令人惊奇的是，在西班牙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西班牙人民被欺骗了。他们不了解美国海军的真正实力和本国海军的糟糕状况。自1880年以来，美国将自己的军事战略建立在美国是个"大陆岛"，其地理屏障可免受来自任何国家进攻这一概念上。因此，海军作为"国家的进攻兵种"受到全面重视，而陆军则微不足道。直到1897年，斯科菲尔德将军还断言说陆军行动只应局限于"支持海军作战"。 243

⑦ 1897年8月31日加西亚写给埃斯特拉达·帕尔马的信，载《国家档案公报》（古巴），26（1月—12月，1936），第108—112页。

⑧ 信的全文，见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编《马克西莫·戈麦斯的一些政治文件》（哈瓦那，1962），12—13。

因此美国的初期战略是以海军为基础的。通过击败西班牙海军，封锁古巴全岛，向起义者提供补给，美国可以迫使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投降。

遵照华盛顿制定的政策，美军避免采取可能被认为是承认任何古巴政治当局的行动，但可以支援起义部队或利用他们，不过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并且严格限制在军事方面，威廉·R·沙夫特少校在他的部队到达奥连特之前得到的指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你可以向该地区附近的任何起义部队提供援助并且在你认为他们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利用他们，特别是作为侦察员和向导等……但你得注意不要过分相信你部队之外的任何人"。[9]

5月，当华盛顿开始实施其初步军事计划，动员海军向古巴起义者运送补给的时候，西班牙海军舰队在塞韦拉海军上将指挥下进入了古巴的圣地亚哥。虽然桑普森海军上将的舰队立即进行封锁，但西班牙舰队的出现还是使美国改变了作战计划。派军队登陆进攻古巴的圣地亚哥势在必行。开始由于缺乏后勤装备和惧怕黄热病，[10]美军只准备了一支"侦察部队"。但到了5月底，美国政府决定派一支能够打败圣地亚哥的西班牙部队的远征军。这个决定使岛上其他地区进行战斗的古巴部队的战略重要性下降了。只有控制了奥连特大部分地区的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的部队才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与其他古巴领导人的联系，包括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实际都已中断。[11]

---

⑨ R·A·阿尔杰（美国陆军部长）著《西班牙——美国战争》（纽约，190.），第64页。

⑩ 美国人通过惊人的数字知道了黄热病给西班牙军队造成的重大损失　根据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德·拉腊著《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巴塞罗那，1975）第92页，到1897年，西班牙军队在战斗中死亡2129人，受伤8627人，另外由于黄热病53,000死亡或得重病，还可参考佩德罗·罗伊格著《马蒂的战争》（迈阿密，1984），第65—66页。

⑪ 直到7月，戈麦斯将军才得到来自美国的供应。经过三年战斗后，很多古巴士兵生病，其中一些人由于暴食美国配给的食品后死亡，古巴军队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华盘顿的不承认政策由于古巴革命政府的政治弱点而放宽 [244]
了。自从战争开始，起义部队的将军们阻碍了所有旨在增加政府权威的努力。其结果是马蒂极力维护的“武装的共和国”的文人部门下降为没有多少实权的传声筒。甚至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政府极力争取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的时候，将军们也没有给予支持。马克西莫·戈麦斯认为麦金莱总统只有在一个真正的古巴政府成立的时候才会给予外交承认：“这个政府”他写道“不是议会的产物，而是军队的产物”。[12] 美国军队不理采古巴起义者的政府，却和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建立直接联系。而将军所做所为就好像自己的政府根本不存在似的。

进攻圣地亚哥的美国远征部队得到了加西亚部队的全力支持。除了提供侦察员和与美军并肩作战外，加西亚的部队还使该省其他地区的西班牙驻军无法行动。到7月，尽管西班牙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城里的形势已完全令人绝望。希兰科都督不听塞韦拉上将的意见，命令舰队冲破封锁线。1898年7月3日，整个西班牙舰队被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舰队歼灭了。几天以后美国军队占领了圣地亚哥并不让古巴起义者进入这一城市。在马尼拉和圣地亚哥遭到失败以及波多黎各已被美国控制的局面下，西班牙要求媾和。当双方在巴黎讨论条件时，美国军队开始占领古巴。12月10日，在没有古巴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双方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西班牙对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统治。

驻古巴的美军政府（1899—1902年）面临着严重的和急迫的问题。经过三年的战争之后，岛屿受到严重破坏。人口从1894年的1,850,000人下降到1898年的1,689,000人。饥饿和疾病曼延，

⑫ 戈麦斯给门德斯准将的信见阿玛莉亚·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的《政治文件》第31页。严格地讲，将军是对的，他非常了解卡马圭的立宪会议是怎样组成的，但他在这关键时刻没有认识到建立一个得到古巴军队支持，能对付美国的文人政府是多么重要。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五分之四的蔗糖种植园被毁；1898年的蔗 245 糖生产比1895年减少约三分之二。岛上百分之九十的牲口死亡，而烟草业几乎不复存在。交通瘫痪。饥饿的古巴起义部队零零散散，装备落后，但他们仍疲倦地注视着美国当局的行动。在过去的“伙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使华盛顿感到不安。

军政府对问题的处置是有效的。在两年时间内，古巴军队被和平遣散，公共卫生得到改善（古巴医生卡洛斯·J·芬利和沃尔特·里德医生终于发现治黄热病的方法），交通发展了。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同时经济复兴也开始了。烟草业由于不需要象蔗糖那样多的土地和资金而迅速复兴。因国际价格低和美国关税壁垒的歧视（从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进口的糖却不受歧视）古巴蔗糖业回升缓慢。1902年，尽管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资金，整个甘蔗产值为34,850,618美元，远远低于1894年。

由于美国控制古巴的有利条件，以及当地资金的削弱，美国资本家扩大了对蔗糖业的渗入，并开始控制铁路，公共设施，烟草和矿业部门。这种日益增长的控制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强大的华盛顿游说集团，要求改善与古巴的经济联系。早在1902年，罗斯福总统建议与古巴签订一互惠条约，声称“控制古巴市场肯定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的”。

战争之后，古巴政治前途看来是暗淡的。在“杰出的小规模战争”中取得的胜利鼓舞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它认为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之间无任何区别。因此，很多美国报刊认为古巴人不再是英勇的独立战士，而成了没有文化、种族不纯的乌合之众，不会管理自己。然而《特勒修正案》（“联合决议”的第四条）则正式否认美国在其占领中有永久利益。很多政治家对公开违反这协议的想法感到不安。1899年菲律宾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一个反西班牙的英雄，起来反对美国军队的时候，这 246 种不安情绪更明显了。哈佛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写道，“在哈瓦那出现另一个马尼拉的想法，甚至使军需品承包商都感到忧郁

了"。[13]

事实也证明古巴民族主义十分强烈，难以压制。解散古巴军队的最低代价为300万美元。这笔数目是加西亚将军提出，戈麦斯将军所同意的。对美国人意图的不信任感继续存在。1899年，加西亚逝世。马克西莫·戈麦斯，古巴革命最得人心的象征，拒绝去哈瓦那参加在莫罗城堡的美国国旗升旗议式。"我们的旗，"他说，"是古巴国旗，是用多少血泪所换来的古巴国旗……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束这不公正的军事占领。"[14]第二年，古巴举行了市政选举。令美国人大失所望的是，民族主义的候选人几乎在所有城市获胜。选举一结束，亚历杭德罗·罗德里格斯给麦金莱总统发了一电报："在选举中获胜的古巴民族党向北美民族可敬的代表致意并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联合决议的早日执行"。[15]

在美国，反帝组织和民主党人一起攻击麦金莱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1900年5月，哈瓦那邮局的一桩大规模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后，使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得到机会，要求美国从古撤回。迫于这一压力以及总统选举临近，麦金莱决定在古巴建立一个政府。看来，一个友好顺从的政府要比为并吞而打仗要好。1900年7月25日，美国驻军司令里昂纳德·伍德将军公布了一条关于选举参加古巴立宪会议的代表的公民法令。

根据美国当局制定的选举法，只有根据和平条约的条件具备古巴公民资格的，年龄21岁以上的男子并达到三项要求（能读写，拥有价值250元美国金币的财产或是参加过古巴起义部队）中至少一项的人，才能有选举权。尽管这些规定剥夺了很多人的权利，但并没有减少对预示着独立的选举的热情。1900年11月5

---

[13] 转引自戴维F·希利的《美国在古巴，1898—1902》（麦迪逊，1963）第72页。

[14] 费尔南多·弗莱雷·德·安德拉德，1899年1月18日，见阿玛莉亚·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编《政治文件》第48页。

[15] 转引自希利的《美国在古巴》第143页。

247 日，在哈瓦那的马蒂剧院，代表着6个古巴省的31名代表召开了古巴立宪会议。根据伍德的开幕词，代表们的职责首先是起草宪法，然后再规定他们所认为的“古巴与美国之间应存在的”关系。

1901年1月底，代表们制订一部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宪法后，便开始讨论微妙的古美关系的题目。伍德将军当时向会议提出了美国的要求。其中有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和在关塔那摩建立海军基地。代表们对此感到吃惊和震怒，提出了一些反建议以维护古巴的主权。古巴上下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然而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个由参议员奥维尔·H·普拉特提出的决议（以后被称为《普拉特修正案》）。该修正案体现了美国的愿望，将被列入古巴宪法。修正案的条件特别是第三条赋予美国干涉古巴之权以“维护一个能充分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它在古巴引起了一阵抗议浪潮。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向来到华盛顿的一个古巴代表团保证“干涉并不是插手或干预古巴事务的同义语”*⑱ 但并没有解释美国的要求。正如古巴最有名的雄辩家和爱国者之一曼努埃尔·桑吉利所表示的，古巴困境很清楚：受到保护的共和国或根本没有共和国。1901年5月28日，投票以15比14，使立宪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作为宪法的附录。

宪法一公布，一般都是从总统选举开始执行。当受到尊重的独立领袖马克西莫·戈麦斯拒绝接受提名后，另外两个候选人出现了：一位是有威望但才干平庸的军事领导人巴托洛梅·马索将军，另一位是曾在十年战争“武装共和国”时当过总统并取代马蒂当过流亡的古巴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

* 原文是：“intervention was not synoymous with intermeddling, or interference with Cuban affairs”——译者。

⑱ 伊莱休·鲁特向古巴人重复了他给古巴军事指挥官伦纳德·伍德的声明，鲁特给伍德的信，1901年4月1日，伊莱休·鲁特文件，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248

尔马。前者最受人欢迎，后者则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在古巴几乎已不为人知，但却得到马克西莫·戈麦斯的决定性支持（戈麦斯在战争期间曾与马索有过多次摩擦）以及伍德将军的支持。当伍德任命了五位支持埃斯特拉达·帕尔马的人进入选举委员会后，马索将军退出了大选以示抗议。1902年5月20日，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正式当选的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就任为古巴第一任总统。这一天，美国军队也从岛上撤离。当看到古巴国旗在莫罗城堡上升起时，年迈的马克西莫·戈麦斯表达了很多古巴人的感情："我们终于到达了！"

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执政时期（1902—1906年）的特征是经济复兴和公共事务中风气廉洁。1903年与美国达成的互惠条约使古巴蔗糖在美市场上享有优惠，对美国进口商品减税，鼓励美国进一步对古投资，使古巴经济更紧密地与美国市场联系在一起。蔗糖产量从1900年的283,651吨上升到1905年的1,183,347吨，畜牧业、烟草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也继续从战争的破坏中得以迅速恢复。

但政治形势却不怎么令人鼓舞。由于缺乏自主治理的传统和政治纪律，加上公共教育水平低下以及战争的破坏，古巴的土地和蔗糖业受到美国人日益严厉的控制，而商业实际上由于美国与西班牙间达成的和平条约的保证，则被西班牙把持着，古巴人发现自己却在两者之间处于困境。因而政治就成了实现经济改善的主要渠道，也是获取国家资源的一个途径。其结果就象一著名大学教授冈萨雷斯·拉努萨所称的，政治党派很快地就成了"为官僚消费而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为获得眼前政治利益，他们牺牲了长远计划和对原则的忠诚。美国控制的不断增长和长期存在下去的阴影以及对古巴民族主义一般持鄙视态度的西班牙居民的日益增多（1934年前每年有几千西班牙移民涌入古巴）则进一步阻碍了负责和成熟的政治制度在岛上的发展。老殖民主义的罪恶、政治腐败、地方考迪略主义和违法现象很快地又出现了。在独立战争

的老战士们“领取”补偿的问题上反映了令人悲叹的病兆。一些爱国领导人包括桑吉利都建议过向他们提供土地，但是议会却决定支付现金。为此，古巴得到一笔外国贷款。然而由于肆无忌惮的克扣，很多老战士只得到少得可怜的钱，而一些政客们却发了大财。

249

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是一位诚实、固执和谨慎含蓄的人，他对这倾向感到震惊，决定接受助手们的劝告，重新举行大选。很明显，华盛顿赞同他的决定，[17] 但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不仅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也与很多原来的一些支持者疏远了，其中就包括马克西莫·戈麦斯。戈麦斯在1905年逝世，对共和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埃斯特拉达·帕尔马的决定促使了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和阿尔弗雷多·萨亚斯，联合起来组成了强大的自由党，并分别成为该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埃斯特拉达·帕尔马的温和党领导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夺取大选胜利。他们依靠政府的资金和力量以打垮反对派。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对抗导致著名自由党人士恩里克·比柳恩达斯的死亡，迫使自由党人退出了总统选举。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埃斯特拉达·帕尔马重新当选为总统。他也许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骗局。

“胜利”之后，政府并不想和解。自由党人继续受到困扰并被排除在政府要职之外。到1906年夏，反对派已公然准备武装暴动。由于共和国没有军队，只有一支“农村警卫队”分散在内地，因此政府面临着危险。8月，发生了暴动。完全信赖美国支持的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别无他择，只好以他的名义要求美国干涉。由于美国当时深深卷入巴拿马运河事务，西奥多·罗斯福总

---

[17] 见美国驻古巴公使斯奎尔斯纳的赞同报告（1905年1月21日），引自埃米尼奥·波特利·比拉著《古巴与美国和西班牙关系史》（4卷集，哈瓦那，1939）第4卷第423页。

统则想避免进一步采取任何被解释为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为了努力避免干涉，他向哈瓦那派出了两名密使以争取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达成妥协。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把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视为对其政府投的不信任票，从而辞去了总统职务并令其内阁全体辞职，听任共和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迫使美国对该岛实行控制。罗斯福立即宣布，美国是被迫干涉古巴的，其唯一目的是创造和平选举的必要条件。他指出，“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和平和秩序……建立新政府，然后就离开该岛”。[18]

250

执行这一有限的计划的人选是曾任运河区总督和驻巴拿马公使的查尔斯·E·马贡律师。马贡工作勤奋、和气而且“毫无架子”。他没有给古巴人留下什么印象，但作为临时总督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发现影响迅速讲和的最大障碍是一帮商人，其中有古巴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想利用挑起动乱和散布存在着反对美国的阴谋等谣言来使占领永久化。马贡对他们的威胁不加理采。他报告说大部分古巴人想结束干涉。他知道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但由于受到上面指示的约束，只好推行一项公共事业计划，企图通过提供就业和官职（这对古巴人是起作用的）来平息政治组织间的争执。他还鼓励成立保守党以取代已丧失信誉的温和派以及修改选举法以保证公正选举。政治方面的改组由于有产阶级不愿参与政治而受阻。他认为这种态度令人恼怒和不负责任。根据罗斯福的指示，马贡还着手建立一支小型的有能力粉碎叛乱的职业部队。尽管很多古巴人和一些美国顾问认为一支职业部队会很快成为镇压合法的反对派的工具，因而反对建立这样的部队，但它仍于1908年4月成立了。

在秩序完全恢复后，1908年8月1日，市和省级政府举行了选举，保守党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击败了内部分裂的自由党。

⑱ 转引自阿伦·里德·米利特著《干涉的政治：对古巴的军事占领，1906—1909》（哥伦布，俄亥俄，1968）第146页。

认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如继续分裂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和阿尔弗雷多·萨亚斯俩人像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再次联合起来参加总统选举。保守党人提名马里奥·G·梅诺卡尔将军和著名的前自治派雄辩家拉斐尔·蒙托罗为候选人。11月，经过有秩序的带有反美味道的竞选运动后，自由党轻易地获胜。一个由黑人建立的小党“有色人独 251 立党”在选举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该党以后却有所发展。1909年1月28日，何塞·马蒂生日这一天，马贡正式向何塞·米格尔·戈麦斯总统移交了权力。美国军队多呆了一段时间以保证权力和平过渡的顺利进行。3月31日美军撤离古巴。戈麦斯总统极为乐观地宣称，“古巴人再次掌握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美国的第二次干涉（1906—1909年）尽管短暂，但对古巴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次由古巴人要求的干涉看来使古巴人对自己自主治理的能力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它削弱了古巴的民族主义，使那种由华盛顿来作最后决策的“顺从普拉特条款的意识”得到加强。曾使马贡恼火的许多强大经济集团唯命是从的态度，进一步扩大了控制着古巴经济的上层社会与普通人民之间的鸿沟。很多人如恩里克·何塞·巴罗纳和曼努埃尔·桑吉利等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衰落和政治上的玩世不恭现象感到惊恐不安，企图重新燃起马蒂的理想。

何塞·米格尔·戈麦斯接过来的是一个拥有200多万人口（70%是白人），经济较繁荣和由马贡政府欠下的1200万美元债务的共和国。戈麦斯是一位意气相投、受欢迎的人物，他对民主制度表示尊重，反对美国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干涉，并通过致富树立供他人学习自己的榜样以表明从事政治是有利可图的。他（绰号“鲨鱼”）开创了一个公开腐化的时代。在他执政时期，斗鸡和国家彩票以原先被视为“殖民地罪恶”的现像又出现了。彩票抽奖演变成了导致政治堕落的有效机器。

在这一时期，有两个问题威胁着共和国的和平和主权。一是

所谓的“老兵问题”。这是因为西班牙人或亲西班牙分子长期占据公职而引起的。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们认为这些职务应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将这些古巴的“敌人”赶走的煽动日益具有威胁性，以致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警告戈麦斯总统，美国对此“严重关切”。由于很多古巴团体反对和担心美国再次干涉以及政府作了一些让步，才使老兵们的不满平息下来。第二个问题则更具危险性。黑人极端分子1907年建立的“有色人种独立党”以有力的论点指责共和国背叛了黑人居民。该党发现其政治发展由于“莫鲁亚法”而受到阻碍。该法是由温和的黑人领袖，参议院主席马丁·莫鲁亚·德尔加多于1909年起草的，旨在禁止那些以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的政党。独立党分子通过有非洲血统的人的秘密社团，如“纳尼戈斯”（Nanigos）以及公开的竞选活动以争取废除这项法律。1912年5月，他们因失败而感到恼怒，另外也许是由于得到戈麦斯总统的鼓励（后者可以利用制造小危机来作为重新当选的一个步骤），独立党分子造反了。尽管组织混乱，以及只局限在奥连特省，然而这一叛乱事件却也在岛上引起了一阵恐慌。美国政府也感到同样惊慌，派海军陆战队在代基里登陆，并宣称如古巴政府不能“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戈麦斯总统对这种干涉表示抗议，并命令军队粉碎叛乱。到6月份叛乱领导人都遭到杀害。他们的追随者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解散。这个事件所造成的恐惧和仇恨使黑人多年来没有参与古巴的政治。

252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戈麦斯宣布他不再竞选连任。保守党再次选择马里奥·G·梅诺卡尔将军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当时也许是古巴最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恩里克·何塞·巴罗纳则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具有代表性的是，竞选运动的口号是“诚实、和平和工作”。阿尔弗雷多·萨亚斯则成了据说是团结起来的自由党的候选人。但是大选前夕，米格尔派（戈麦斯总统的支持者）与萨亚斯派之间的旧怨又爆发了，使自由党又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

派。后来米格尔派与保守党的联合使萨亚斯派遭到失败。梅诺卡尔在6个省中的5个省获胜。1913年5月20日，戈麦斯下台，一位保守党总统宣誓就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给梅诺卡尔的信中写道，"这次权力有秩序的过渡令人极为满意，看来这表明古巴人民已经成功地经受了共和政府最严峻的考验之一。"⑲

新总统早年学习工程学毕业于科内尔大学，曾经是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和古巴最大的查帕拉糖厂一位卓有成效的管理人。该253 厂属于强大的古—美制糖公司，而梅诺卡尔与该公司有联系长期受益于该公司。梅诺卡尔有贵族作风，谨慎含蓄，装出一付蔑视政治的姿态，而且对"下等劳动大众"表露出一种家长式的保守主义，他担任了两届总统。

他在第一届任期内（1913—1917年），实现了他在竞选中作出的部分许诺：官员腐败多少得到了遏制，另外，尽管议会存在着传统的宗派主义，还是通过了一些急需的立法，使军队得以统一，调整烟草出口和建立古巴货币的"经济保护法"，以及"劳动事故法"（对工人的赔偿）便是两个与此有关的例子。1915年，哈瓦那召开了第一次劳工代表大会。会议反映了工人阶级正在展现出来的力量和十九世纪通过烟草工人组织首先传播到岛上的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影响，以及在组织一个全国性——正如一位发言人所说的——"农业无产阶级"的糖业工人组织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经济改善和个人威望的提高，梅诺卡尔决定争取连任。和以往一样，这消息一公布便引起全国反对。自由党人士组成了统一阵线，支持候选人阿尔弗雷多·萨亚斯和卡洛斯-门选塔上校。到1916年夏，政治紧张局势几乎达到暴力冲突的程度，以致对此感到关切的威尔逊总统发出了警告，"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古巴的法律和秩序"。然而与德国交战

⑲ 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13》（华盛顿特区，1920）第337页。

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使华盛顿急于避免一场古巴危机。结果，作为法律和秩序代表的梅诺卡尔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

1916年11月2日，大选开始了，尽管有争吵但总的来讲还算是平静的。最初的报道表明萨亚斯大大领先，但由于政府控制着新闻发布，亲梅诺卡尔的选票开始上升。自由党人士的抗议如此强烈，只是在双方同意由最高法庭裁决后，才避免了一场公开的冲突。经过一短暂的考虑后，最高法庭公布，自由党在卡马圭省和哈瓦那省获胜，保守党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和马坦萨斯省获胜。奥连特省将举行新选举，两派在那里力量旗鼓相当。新选举也将在拉斯维利亚斯省举行，而该省却是自由党的传统据点。 254

因此，萨亚斯获胜的机会是相当大的。但是自由党却决定不等新选举的举行。1917年 2 月，在前总统何塞·米格尔·戈麦斯的领导下，自由党人指责政府在不断进行压制，并在几个省举行起义，他们很快地夺取了圣地亚哥、卡马圭和几个重要的内地城镇。类似1906年局面——起义由各省向哈瓦那胜利地蔓延——看来又要重演了。但与埃斯特拉达·帕尔马不同的是，梅诺卡尔是位有能力的军事领导者，手下有支军队并且还可以依靠美国的支持。起义分子因在拉斯维利斯遇到军队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另外，由于美国务院给美驻古巴公使威廉·冈萨雷斯的外交照会的发表也使起义分子士气受挫。照会强调美国只支持“合法建立起来的政府”。随着照会的发表，美国也在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显示其军事力量。形势变得对反对派不利了。1917年3月7日，在遭到美军包围的情况下，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只好在拉斯维利亚斯投降。到 5 月，起义以失败告终。对很多古巴人来讲“冈萨雷斯先生的照会”成了美国控制他们内政的强大象征。美国向德国宣战后，梅诺卡尔也马上跟着向德宣战以偿还欠美国的情。

在这些不吉利的情况下开始的梅诺卡尔第二届任期（1917—1921年）要比他的前一届任期远为逊色。腐败现象猖獗。在各地选举中都有舞弊行为。尽管经济繁荣起来了，但总统的威信却在下

降。更糟的是，在梅诺卡尔执政最后一年，糖价突然下跌，使古巴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给1920年的总统大选添加了戏剧性的新内容。阿尔弗雷多·萨亚斯成为古巴人民党（由原自由党的一个小派别改组而成）的候选人。而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则是自由党的候选人。在梅诺卡尔决定利用其权力全力支持萨亚斯之前，萨要取胜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在大选过程中，暴力行为和舞弊激起公愤以致于另一场自由党起义迫在眉睫。美国又一次进行干涉。12月31日，威尔逊总统命令对处理古巴事务有经验的伊诺克·克劳德将军以他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古巴。事前没有同古巴政府磋商。梅诺卡尔总统对这一单方面的行动表示抗议，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在美国总统派遣特别代表同古巴总统进行磋商问题上，既无惯例，也无必要事先征得古巴总统同意"。[20] 1921年1月6日，克劳德将军乘"明尼苏达"号战舰进入哈瓦那。

在对付经济危机前，克劳德企图先解决政治问题。在核实了选举舞弊的情况后，他制定了新的规定以防止出现类似问题，并决定3月15日为新选举日。在选举日到来前几天，自由党声称，鉴于缺乏自由公正选举的保证而决定退出。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阿尔弗雷多·萨亚斯当选为总统。5月20日，在群情愤懑声中和经济混乱的局面下，梅诺卡尔放弃了总统职务。一个月后，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在纽约逝世。

在梅诺卡尔执政8年期间，更多地是由于与糖业有关而并非与政治有关的原因，古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912年糖价为每磅1.95美分，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甜菜生产的崩溃改变了形势，开创了一个令人眼花瞭乱的繁荣时期。1914年以后糖价稳步上升，1920年达到每磅23美分惊人的价格。但自那以后价格又下降到每磅3.5美分。"大众手

⑳ 转引自路易丝A·佩雷斯著《干涉、革命和古巴的政治，1913—1921》（匹兹堡，1978）第127页。

舞足蹈”的场面却又突然以破产和苦难为结局。

对这次蔗糖业繁荣的一些后果加以说明是很必要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3年里，古巴只建立了15座糖厂，而从1914年到1920年的期间，新建38座糖厂，大部分在西部地区，使卡马圭和奥连特变成了岛上产蔗糖最多的地方（它们在古巴整个生产中的比例由1902年的15%增长到1922年的55%）。由于古巴的甘蔗种植方式是以广种为基础而不是精耕细作，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促使糖厂主们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削弱了垦殖农（colonos），使大庄园制演变成了可怕的经济问题。另外，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庄园主们拒绝增加工资的所有要求，并从海地和牙买加引进廉价劳工，从而使农民和工人中间的社会和种族紧张关系加剧了。由于糖业生产兴旺以及欧洲丧失了竞争力，美国对古巴经济渗透也加强了（美国对古巴投资从1911年的2.05亿美元增加到1924年的12亿美元），而古巴在进口和蔗糖出口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加深（1914年古进口的51%来自美国，1915年又上升到83%）并且进一步加速了古巴单一经济的发展趋势。 256

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1920年的崩溃竟会达到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几乎所有古巴银行资金枯竭，很多古巴人的糖厂不得不被迫出售给外国人，居民中的每个阶层都受到了经济灾难的影响。垦殖农制度曾于19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涌现出了一批被称之为农村的中等阶层。而现在这一制度遭到了严重挫折。据估计，在1921年危机以后的9年时间里，在所有50,000户垦殖农中约有18,000户失去了土地。而其余的大部分人也都几乎不得不依赖糖厂主的恩赐。[21]

然而，危机也有其积极的后果。很多古巴人开始知道他们国家经济受制于外部经济力量的脆弱性，特别是美国的控制的程度。到1921年，萨亚斯就任总统时，经济的冲击再次燃起了古巴

[21] 阿尔维托·阿雷东多著《古巴：无法防御的土地》（哈瓦那，1945）第333页。

的民族主义和要求改革的呼声。公共部门的廉洁，制定维护古巴利益的立法，农业多样化和对美国采取坚决立场成了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1922年，曼努埃拉·桑吉利又提出了谴责将古巴土地出售给外国人的呼声。[22] 这一年一些古巴知名人士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的建议。1927年拉米罗·格拉一桑切斯著《安的列斯群岛的糖业与人口》在古巴出版，是对大庄园制的最严厉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年轻一代政治家的出现加强了激进的、不耐烦的抗议呼声。

在危机期间1921年"当选"的新总统阿尔弗雷多·萨亚斯是一位有修养和看风使舵的律师，几乎毫无道德上的顾忌。当"革新"日益成为一种热烈的要求时，他设法把古巴的政治活动降到了最低水平。最初由于政府摇摇欲堕，濒临破产、无其他选择，他只好屈从于克劳德要求改革的压力。1922年6月，在克劳德的监督下，别号为"廉洁内阁"的新内阁组成了。这个内阁取得了一些成绩：将国家预算从1.3亿美元缩减到5500万美元；使彩票体制的管理变得廉洁了，并对公共部门的腐败进行了认真的控制。然而，克劳德的行动在古巴引起强烈反对。1922年6月甚至连一惯"温顺"的国会也通过了谴责克劳德干涉古内政的决议，并提醒他在伊莱休·鲁特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解释中反对进行这样的干涉。1923年萨亚斯政府从摩根承兑所得到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萨亚斯感到已可以自由地施展他的权威了。他适当地顺应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视克劳德的存在，解散了"廉洁内阁"。到年中贪污受贿的旧一套又出现了。对萨亚斯来讲，有幸的是克劳德对此无可奈何。克劳德被晋升为驻古大使后，他不得不奉行华盛顿更为谨慎的新政策，避免直接干涉，甚至避免公开施加压力促使古巴政府进行改革。正如一位商人和外交官德怀特·莫罗

257

[22] 他的最后一篇讲话见《保卫古巴》（哈瓦那，1948）第146—149页，早在1907年桑吉利就建议制定一法律，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古巴土地，但从未被国会通会。

向克劳德指出的"好政府不能替代自治。"[23]因此，克劳德被迫在外交上保持沉默。

然而，遍及古巴的民族主义再也不是消极的了。自1922年以来，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学生发表的宣言（1918年）的鼓动下，以及大部分拉美知识分子（如墨西哥的何塞·巴斯孔塞略斯和阿根廷的曼努埃尔·乌加特）的"反美国佬"情绪以及墨西哥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哈瓦那大学学生开始要求建立一个没有腐败和脱离美国佬监护的"新古巴"。马蒂没有实现的建立一个"拥有一切和为了所有人幸福"的共和国梦想变成了他们公开宣布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新涌现出的对古巴无限热爱和对古现状的不满通过歌剧、小说、诗歌及流行乐曲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年青的专业人员和组织得更好的劳工团体的领导人加入到要求改革的行列中，甚至垦殖农和庄园主们也对古巴的现状表示不满。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23年这些团体的松散联合形成了一个叫"老兵和爱国者协会"的组织，发表了一"民族复兴的的纲领，其中包括取消"普拉特修正案"，要求妇女选举权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几乎同时，一群年青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十三人抗议书"，不仅指责萨亚斯政府的腐败，而且也指责整个古巴的政治制度。他们得到的支持，甚至令冷漠的萨亚斯都感到吃惊。他曾私下向参议员维尔弗雷多·费尔南德斯说，"时代变了"但总统本人却并没有变。 258

1925年，原先的劳工组织者如卡洛斯·巴利尼奥、学生领袖如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和一些幻想破灭了的前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古巴共产党。该党建立的直接影响极小，但很快，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许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就出现在新一代的刊物

罗伯特F·史密斯著《美国和古巴：商业和外交，1917—1960》(纽黑文，1960)第100页。作者指出"国务院实际上没有改变政策……美国的商业利益得到满足，因此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理由"，同书第101页。

上。正如一位律师，后来的革命家华金·马丁内斯·萨恩斯（他是反对马查多的秘密组织ABC的主要组织者）所表达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明显的简单透彻而感到眼花瞭乱……所有古巴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来加以解释"。[24]

新的政治气氛使后来的总统大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重新获得活力的自由党提出赫拉尔多·马查多为其候选人，反对再次被提名为保守党候选人的前总统梅诺卡尔。自由党号召"革新"的竞选运动和马查多的"忠诚、道路和学校"口号燃起了全国的热情。也许是得到马查多的贿赂，萨亚斯保持中立，保证举行诚实的大选，但他的党是站在自由党一边的。马查多赢得6个省中的5个。1925年5月20日，他就任了古巴第五届总统。

马查多是一位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他长期从政，但政绩平平。他为人坦率，有干劲而且强硬。他相信只有铁腕手段才能将古巴从腐败的政客手中拯救出来，并且在对付妨碍他的反对派方面毫不犹豫地使用强制办法。政府廉洁；制订了保护古巴产品、使农业多样化和管理制糖业的法律，在他任期的头两年，古巴的许多希望得到了实现。同时，进行了一项公共工程和公路建设（包括从哈瓦那到圣地亚哥的中央公路）的庞大计划使成千的古巴人得以就业。传统的政党奉行了合作政策，站在总统一边。因此国会也变得俯首贴耳。在没有一个真正反对派的情况下以及在众口一致的赞扬声中，马查多的统治使他所有的前任都显得大为逊色。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和一些劳工领袖批评政府通过新贷款增加了公共债务以及用残酷手段对付罢工者。由卡洛斯·门迭塔上校建立的民族主义联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刚建不久的共产党（1925年），使政府感到关切。但这两个组织在1927年的时候影响都不大。民族主义联盟只是古巴老的传统政党的变种，而由

259

[24] 1968年1月18日给本文作者的信。极为典型的是，到1934年，马丁内斯·萨恩斯及以他的大部分同代人已拒绝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同共产党发生了冲突。

知识分子和诗人如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工人中没有什么影响。

在他自己的政治机器和个人野心的驱使下，马查多在1927年朝独裁方向迈出了明确的一步。在借口取消总统连选连任权利的名义下，选出了一个亲马查多的制宪会议，将总统任期延长至6年，并邀请马查多接受一轮新任期。1928年议会又通过了一个"紧急法"，除了三个原来提名马查多的政党——自由党、保守党和人民党——以外，禁止其他政党提总统候选人。马查多访问了美国得到华盛顿支持，并于1928年11月1日在哈瓦那以古巴东道国身份主持召开了第六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此后，马查多在未遭反对的情况下顺利当选，接受新的6年任期。

整个过程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宪法，加上马查多的独裁手段，招致了反对。已退休的梅诺卡尔和门选塔一起谴责马查多的行为。一些著名的政界和知识界人物如恩里克·何塞·巴罗纳表示强烈抗议。大学学生在新成立的学生会的动员下，向人民呼吁反对"法西斯"专政。马查多并不在意。他对此实行了审查制度，有时甚至采用残暴的手段。1929年夏，他吹嘘自己得到人民支持，嘲弄反对派是由"一群腐败的政客和一帮误入歧途的孩子"凑成的。

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猝然改变了古巴力量的平衡。1920年至1921年糖价的下跌曾导致了深刻的古巴经济危机，但是美国贷款和投资帮助古巴缓和了形势。这一次是美国市场垮台，将古巴拖入一个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蔗糖生产和出口急剧下降。从1928年到1932年，糖价从每磅2.18美分下降到每磅0.57美分最低点。1929年烟草出口为4306.7万美元而1933年，只达到1386.1万美元。工资收入下降，失业上升。这一次是没有缓解办法了。 260

经济危机损害了马查多的威信，鼓励了反对派公开向政府挑战。1930年，在阿特米萨召开的一次政治集会以流血冲突而结束后，暴力活动增加了。到11月，一位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被杀害的

学生拉斐尔·特雷霍成了学生眼中的烈士。学生受到全国的敬佩。学生们勇敢地反对暴政的斗争受到各阶层的赞扬。同时，与门迭塔和梅诺卡尔联合反对马查多的传统政客们一直和美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企图获得美国公开支持。这使年青一代感到愤怒。他们对华盛顿谨慎的新政策感到迷惑不解。那种直接干涉，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和国务院发出直言不讳的“照会”的时代已过去了。华盛顿喜欢用神秘的辞令来掩饰其意图。1930年10月，当美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被问及美国是否会派军队去古巴时，他以令人难解的句子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每件事将根据其是非曲直来判断，也许会出现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局势。”[25]

同时，另一种不同的政治斗争震动了古巴。过去，暴力只局限于政治集团之间出现零星冲突，而现在古巴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工人到律师都参加了斗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分子开始使用可怕的新武器：城市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镇压，更多的恐怖主义，更大的镇压；这种人所共知的独裁的恶性循环随之也在古巴出现了。1931年8月，门迭塔和梅诺卡尔仍采用了传统战术，企图在内地举行起义，据说已与马查多军队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接洽。然而出师不利，两位领导人在比那尔德里奥的一个叫奥维尔德的地区很快被抓获了。这一地区因此也出了名。

但是，马查多的好景不长。老一代领导人的失败将年青一代推到了第一线并使斗争激进化了。最初由中层阶级的职业人员组成的新的秘密的革命组织ABC发表了其对古巴危机原因进行的深刻和认真的分析，[26]并用炸弹和恐怖主义袭击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恐慌。另外，在古巴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失业增加，人民

261

㉕ 《美国的外交政策，1930》（华盛顿特区）第二卷第663—665页。

㉖ 关于ABC纲领和宣言可参考《ABC的学说》（哈瓦那，1942）。那个时期，一些最杰出的年青知识分子如豪尔赫·马尼亚奇和胡安·马里内略·桑托韦尼亚参与了纲领的制定。

生活愈加困苦。面对着日益增多的敌人，军费拮据，政府处境极端困难，但马查多还远没有被打败。1933年初，古巴政局可说是一种僵持局面：官方的残暴手段不能使反对派屈服，反对派也没有指望真能推翻马查多。因此，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当选，以及他宣布对拉美采取"睦邻政策"使古巴充满了急切的希望。华盛顿的行动再一次成了决定性因素。

奉进对拉美事务不干涉的政策，罗斯福总统决定派一名特使前往解决古巴问题。1933年5月，一位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过的外交官本杰明·萨姆纳·韦尔斯到达哈瓦那出任特命全权大使。他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合法解决问题，避免在古巴出现危及罗斯福新政的革命。他到古不久就向在政府和反对派提出进行调解。除了称萨姆纳·韦尔斯是"另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督"的学生会和共产党人（他们自然没有被邀请）外，所有反对派包括ABC都接受了韦尔斯的调解。韦尔斯越来越认为马查多必须下台。他开始偏向反对派，坚持那些会削弱总统权力的要求并向古巴人表明马查多已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7月27日，马查多终于了解了韦尔斯的意图，但仍认为美国大使已越过了上级的指示。他向国会保证他将保卫古巴的主权并要求国会支持他反对"外国干涉"。当调解已导致了韦尔斯与马查多的正面冲突时，一个不测事件改变了形势。8月4日，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的小罢工引起了全面的总罢工，致使哈瓦那瘫痪。马查多与共产党领导人达成了妥协，帮他平息工潮，但还未采取任何行动，一个秘密电台宣布马查多辞职的消息使人们涌上街头，欢欣鼓舞。警察与群众之间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决定了政府的末日。第二天，几乎全岛的活动都停顿了。8月12日，在一些军官起义后，马查多向必然的结局屈服了。他提出辞职，离开古巴。卡洛斯·M·塞斯佩德斯（十年战争英雄的儿子）立即就任共和国临时总统。 262

尽管有韦尔斯的支持和ABC的参与，塞斯佩德斯的政府在

经济危机和革命紧张气氛中显得过于犹豫和拘束。9月4日，军队的军士们利用军官队伍陷于混乱之机举行了起义，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指责塞斯佩德斯是美国大使的工具的学生会领袖们加入起义并说服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为首的军士们向总统府进军，废黜塞斯佩德斯。正如一位参加者所描写的，他们把“一个军事起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23]

学生们在试图建立一个五人执政委员会之后，宣布一位大学教授拉蒙·格劳·圣马丁为共和国总统。尽管这个革命政府只存在4个月，但它大大反映了自二十年代以来在古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和愿望。年青的安东尼奥·吉特拉斯是这个政府精力最充沛的领导人。政府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宣布了土地改革，鼓励成立工会，赋予妇女以投票权，限制了美国公司的权利，并规定所有行业中古巴职工必须占50%。但它缺乏一个政党来争取群众的支持，而且面对的敌人又太多。当共产党人根据第三国际的策略，攻击该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时，萨姆纳·韦尔斯则利用他在华盛顿的所有影响说服罗斯福总统不要承认这个革命政府，因为它太左而且不能保证公共秩序。

革命政府可以粉碎前军队军官重新夺取权力的企图和ABC的叛乱，但它却不能够恢复秩序或平息古巴很多阶层（商人和劳工）害怕美国拒绝购买蔗糖而引起经济灾难的担心。随着政府变得激进化，其追随者队伍减少了。学生会因内部矛盾而解散。那些已成为校官的军士们日益惊慌不安。到12月，和萨姆纳·韦尔斯有密切联系的巴斯蒂塔公开策划反政府活动。尽管吉特拉斯力图建立一支准军事部队，巴斯蒂塔仍争取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于1934年1月15日要求格劳辞职。1月17日，随着格劳、吉特拉斯以及很多学生领导人的逃亡，卡洛斯·门迭塔，一位忠诚，但非常

263

---

[23]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著《9月4日的起因》（哈瓦那，1950），第40页。六年以后，参加这事件的主要人物组织了真正党，并在1944年至1952年期间在古巴执政。

天真的政治家被宣布为总统。5天以后，在1933年12月代替萨姆纳·韦尔斯就任美驻古大使的杰斐逊杰斐逊·卡弗里向古巴政府转达美国对它的正式外交承认。同一年，古巴与美国缔结条约，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

然而1930年至1934年间发生的动乱，表明它比古巴另一时期的政府暴乱要深刻得多。在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力量改变了整个岛屿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33年涌现出来的领导人、政党和思想在今后的25年里统治和控制了古巴的命运。如果不考虑1933年遭受挫折的革命对古巴历史所造成的深刻影响，那么就不能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所面对着的古巴社会以至卡斯特罗的崛起。

265

第 6 章

波多黎各（约1870—1940年）

在西班牙殖民开拓最初三百年期间，波多黎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很慢。到16世纪中叶，该岛的贵金属矿藏已经枯竭，它对于殖民者不大有吸引力了。它主要被用来作为军事保垒保卫自西班牙驶往西属美洲大陆的西班牙船只，也用来作为供应上述一些船只储备淡水的港口。除圣胡安一地有西班牙官兵以外，岛上居民主要是一些逃亡者和从邻近各岛的种植园设法逃出来的逃亡奴隶。还有一些是服满兵役的士兵，决定在那里安家落户作个独立的农民。当地生产基本上是满足家庭的需要的自给自足生产。

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才开始关心使波多黎各成为生产性的殖民地而不是依靠外来财政支援的殖民地。随着西班牙帝国在19世纪初叶的瓦解，这种关心成为事关生死存亡的需要。来自新独立的大陆各殖民地的大批西班牙人家庭，以及来自路易斯安那和海地的法国人家庭，开始来到该岛。西班牙政府给予他们土地和工具以开始种植出口作物，并且消除了过去在岛上施行的偏袒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商人的一些贸易障碍。

鉴于18世纪的波多黎各人口稀少，最缺乏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而最容易得到的资源就是土地。没有更早的数字，但是迟至1830年，耕种的土地只有5.8%。在整个19世纪中，耕种的土地虽有大量增长，但比例仍然非常小，到1897年只达到14.3%。这并不是那种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司空见惯的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所造成的。在18、19两个世纪，波多黎各的人口在全岛分布都很

266

均匀。正如英国旅行家乔治·弗林特在1834年所指出的，“推广耕种的手段人人可得，即使是最低层的人”。① 因此，在19世纪初，实际上除了奴隶，几乎所有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都是独立的生产者。

对于19世纪初兴起的蔗糖庄园和咖啡庄园来说，土地也是比资金更为容易得到的生产要素，而后者则是输入奴隶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国际上，总而言之，奴隶贸易可是在面临灭亡。况且，海地革命引起人们对黑人人口无限制扩大的巨大恐惧。因此，虽然19世纪前半叶奴隶仍被输入，波多黎各的经济却从来不是奴隶经济占有优势，奴隶人口在最高峰时(1846年)只占总人口的11,5%。

因此，发展商品化农业所面临的劳动力问题是如何鼓励白人劳工移民或是驱使现有农民去种植园做工（这些农民当时是在为自己家庭的生计独立进行生产的农民)。这种目的在19世纪逐渐达到，不是通过雇佣和出售劳动，而是通过对土地和对人的权利进行控制——利用与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手段。土地、劳力和资本的上述关系促进了以奴隶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制度：主要有叫做“阿格雷加多”(agregado)的佃农制——允许常驻的农业劳工使用一小块土地从事维持生计的生产，其义务是必须以一定数量的时间从事庄园主的商品化种植；叫做“梅迪阿内奥”(medianeo) 的分成制——直接生产者必须同地主分享产品；和叫做“恩德乌达米恩托”(endeudamiento)的债役制——劳动报酬系以实物，即以庄园店铺中的单据付给，并且使劳工陷入负债的状况，从而依附于特定的地主。

因此，19世纪时期，波多黎各社会经历一场非常重要的转变：从一个基本是生产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转变成生产出口经济

① 乔治·D弗林特著《波多黎各岛现状记述》伦敦，(1834)，第17页。

267 作物的中等规模庄园封建领主为主的经济。重商主义的殖民地宗主国扶植这种情况，它感兴趣的是发展它能通过贸易控制而获取利润的生产。于是宗主国的支配地位种下了它自身灭亡的种子，因为在它哺育之下出现了一个追求权力的居民阶层。随着生产开始集中在庄园，由于庄园主控制着生产过程，他们也获得了社会的支配地位。于是，按葛兰西的说法，他们在民间社会的霸权地位促进他们将霸权抱负转向政治社会。宗主国对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控制，在庄园主看来不但是他们强化商品生产（宗主国通过贸易控制权实行限制）的主要障碍，而且也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观念或世界观全面组织社会的主要障碍。

庄园主通过出口生产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面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为他们的自我肯定提供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原则和由之产生的自由被用来对付专制主义；便对"依靠特权进行统治"（以便保卫西班牙商业利益）的当局，克里奥尔人提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1870年庄园主加入政治斗争，这时他们的组织叫做自由改革党。

自由主义赋予庄园主的政治组织以阵线广泛的性质；它包括了其他一些社会集团，如新兴的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的一些核心团体，他们赞成使殖民地体制自由化。自由改革党（后改名自治党）要求对殖民地体制进行根本变革；面对宗主国的反对态度，它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性质。当时有一位西班牙观察家曾对该党的政策作如下阐述："它把地方主义〔波多黎各〕作为高于一切的事业，往往有害于国家事业〔西班牙〕。"②

这样，自由党的政策有助于波多黎各民族情绪的高涨，这种民族情绪随着庄园主获得社会支配地位而增长，也随着环绕庄园268 具体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开始渗进并统一整个社会结构

② 安东尼奥·阿尔福和巴拉尔特，《安的列斯群岛的政党—政策研究》（圣胡安1886），第11页。

而增长。自由主义赋予庄园主政治的广泛阵线性质加强了新兴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被看作是波多黎各人同半岛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各社会阶层的波多黎各人被称为“波多黎各大家庭”(包括一切的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成员。

另一方面，庄园主是一个着重出口农业的封建领主阶级，这种情况限制了民族斗争。由于商品生产以出口为目的，国内市场的发展不是十分重要，不象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时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这种情形阻碍了国内交通的发展，也阻碍了统一货币体系的发展，而这些对于经济，因而对于国家的一体化极其重要。这种一体化也受庄园主商品生产的劳动体制的牵掣。各种奴役关系把劳工束缚在特定的庄园，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发展。地方的闭关自守、孤立偏狭使得民族斗争完全失去意义。1891年，穆尼奥斯·里韦拉(庄园主的最重要政治领袖)说，“我们还不曾成功地动员起这些群众，消融他们冷漠的冰霜，在他们心中燃起爱国主义的圣火”。③

与自由党的政治对抗来自保守党（后来成为西班牙化无保留党），它代表了社会组织中特权地位依赖于殖民体制的那些集团殖民地政府的官僚政治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商人。④商人们控制着庄园主进行商品生产所需要的信贷，而且也掌握着产品的销售。他们尽量利用庄园主处于依赖地位的弱点。这种依赖地位本身是矛盾的源泉。庄园主在意识形态方面向资产阶级世界的开放使他们对控制与生产有关商业方面的斗争强化起来。另一方面，庄园主与商人之间的信贷关系不但促使庄园主对贸易活动感兴趣，而且也促使商人卷入生产。如果庄园主收成不好，他只得以 269

③ 报纸文章《弊端的原因》(1891)，重印于他的《政治生涯》(两卷集，马德里，1925)第1卷，第24页。本书作者译文。

④ 参看弗朗西斯科·马里亚诺·基诺内斯著《经济矛盾》(马亚圭斯，波多黎各，1988）和《波多黎各改革派和保守派政党的历史》(马亚圭斯，1889)。

土地偿付贷款。于是大量商人也在变成地主，因而威胁着庄园主早期社会霸权的经济基础。

庄园主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同控制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密切关联，以便发展不受商人约束的商品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信贷设施、交通工具等等）以及扩大贸易超出现有商人控制的范围。于是，庄园主的斗争并不是反对过去的统治阶级（要是反对他们，就必需提出替代的社会生活前景），而是反对那些其社会权力并非出自社会生产动力本身而是来自殖民统治强加在结构动力之上的特权的集团。

一个在社会方面称霸，但受制于殖民地条件因而经济脆弱和政治处于附庸地位的阶级，他们在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生产关系（庄园主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末年产生出一种政治风格，这种风格被其创始人称为“可能派”或“社会主义派”。⑤它把意识形态问题搁在一边，而注意力全然着眼于攫取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斗争。

在这种重商主义的殖民地结构中，庄园主有两条路可走。宗主国已经越来越依赖通过国家行政机构使用强力来保持权力。途径之一是用强力对付强力；换言之即古巴所走的道路——武装起义。这需要得到农业劳工和小土地自耕农在斗争中的可靠支持，而由于他们在庄园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这种斗争对他们是毫无意的。这条途径也意味着波多黎各的咖啡放弃主要的市场，然而，当时咖啡却是庄园的主要经济作物，而且正在这到出口高峰之际，它在19世纪90年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3（在古巴，糖是主要出口作物，它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因此波多黎各的庄园主走第二条路，用政治压力和讨价还价的力量，向结构上和国际上地位薄弱的宗主国争取自治，也就是获得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地方政治和行

270

⑤ 例如，穆尼奥斯·里韦拉著《政治生涯》第34页。这种政治风格的另一明显例证是胡安·阿里亚加·罗克著《安塔尼奥扎记》（波多黎各，瓜塞，1910）。

政的自主权。在这种讨价还价和新兴的“可能派”政治实际中，庄园主用下列词句表达自己的立场：“既非共和派也不是拥抱君主制度者，而是波多黎各派！”⑥

于是这一派同有较大可能在西班牙上台的宗主国政党——一个右翼的拥护君主制度的政党——结成了联盟。庄园主们同意拥护该党的全国政纲，该党则应许一旦它当政将授与波多黎各一部自治宪法，可是这个西班牙君主主义政党所持的思想立场与自治党前此以自由主义为特点的政治态度恰恰相反。因此，这种联盟对于“波多黎各大家庭”的某些成员是无法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民主激进主义有更为牢固的结构基础：那就是，自由职业者和手工者。结果自治党在1898年美国入侵的前一年发生分裂。⑦

1897年11月，西班牙向波多黎各颁发了自治宪章。根据这个宪章，第一次实行了男子投票的普选制，结果在仅有的这次选举中，庄园主的政党取得压倒胜利。它获得80.6%的选票；它的分裂集团（由自由职业派领导）获得15.6%选票，而无保留党人这时失去了官方的眷顾，所获票数微不足道。

因此，1898年7月美国入侵的时机正是在庄园主阶级的社会霸权明显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又恰恰是这个阶级在争取全面霸权的斗争中刚刚开始为自己政治统治地位奠立基础的时候。但是它的政党却由于本身内部矛盾刚刚发生分裂，而脱离该党的社会各界（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对于与社会的联系又有极为重要的 271

---

⑥ 穆尼奥斯·里韦拉在1896年7月18日《民主报》发表的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的标题，重印见《政治生涯》。

⑦ 参看自治党大会上举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内容发表在《波多黎各通讯》报纸，1877年2月14日。皮拉尔·巴尔沃萨·德·罗萨里奥的《1896年的自治派委员会》（圣胡安，1957）是从自由职业派观点对这种分裂作出的精彩分析，作者称这种观点为“理想主义的”。当时西班牙一般政治形势可查考M·费尔南德斯·阿尔马格罗著《现代西班牙政治史》（马德里，1968），第2卷第7节和第3章第1节；又博利瓦尔·帕甘著《19世纪波多黎各要闻》（圣胡安，1961）第475—476页。

影响，因此，波多黎各社会尽管有牢固的庄园主选举支持，却出现分裂倾轧的现象。

况且，庄园主的社会霸权其经济基础非常脆弱。在19世纪大部分期间，甘蔗一直是波多黎各的主要经济作物，但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它在经历一场严重危机。欧洲高度机械化甜菜糖工业的增长限制了蔗糖市场，使价格下跌，迫使进行技术改造以便生产质量相应的原糖以供精炼。但是，对新技术的投资也意味着土地占有方式的改变——控制更多的连成一片的土地以便农业生产能满足大糖厂所需的甘蔗——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在以劳动力缺乏为特点的经济中，出现了在收割季节流动的剩余劳力）。有些甘蔗园庄园主勉强应付这种必要的转变，但是，由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大部分庄园崩溃了，岛上的制糖业也随之崩溃。⑧

而咖啡种植业却恰恰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有些地区咖啡的种植同禁种程度上的第二次殖民开拓有关。进行这种第二次殖民开拓的是一些外来的企业家（主要来自科西嘉岛和马略卡岛*），他们取代了早年的移民：传统的庄园主、中等农户或独立的小农。对于这些外来移民，人们有某种不满情绪，不但因为经济地位被他们取代了，而且因为他们常显露出对自己的出生地有更强烈的感情联系而对的新的社会或土地则比较淡漠。

1898年波多黎各成了美国的领地，经济权力性质开始发生根本变化。1895年制糖业创造的出口值达440万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9%，而到了1920年，它的出口值达到了7400万美元（亦即超出了16倍），占出口总值的66%。⑨ 1895年，美国公司在糖业生产中实际上毫无地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总产量几乎一

---

⑧ 参看安德烈斯·拉莫斯·马泰著《糖厂庄园：它在波多黎各的增长和危机(19世纪)（圣胡安1981）。

* Mallorca，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最大岛，位于地中海西部。——译者

⑨ 维克托·S·克拉克等著，《波多黎各和它的问题》(华盛顿特区，1930第643页。

半掌握在新宗主国的四家公司手中。虽然是次要的事，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1895年，烟草的出口值占全岛出口总值的4.4%；25年以后，它占了19.3%。而在1895年，波多黎各的烟草业中尚无美国公司的迹象，到了1920年美国公司实际上控制了烟草的全部加工和销售。⑩

美国并不是单纯通过军事冒险作为战利品而使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属地的。古巴无疑是更为主要的问题，尽管如此，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显然都在当时美国扩张主义的目标范围之内。有迹象表明这与美国战略-军事利益有关，但是也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因素。有人曾说到：

除了非常特殊的产品，这个北美国家从一开始就被人想象为一定会供应自己以生活基本必需品（亦即处于自给自足的神话之中），糖显然是美国不能大量生产的少数产品之一。所以必须攫取产糖的领土或是可以变成产糖地区的领土。⑪

于是在19世纪末，美国的食糖消费量86%靠进口来满足，而在1932年只有0.4%是进口的。直接或间接获得的领地——夏威夷、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古巴——贡献了糖消费量的76%（参看表1)。这些领地无一例外地基本上成了食糖的单一生产地，并非偶然。

而且，不应忘记的是，西美战争发生在当时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最大规模帝国主义领土扩张的时刻。例如，在1875年外来统治的面积尚不及10%的非洲，在其后35年中几乎被欧洲国家全部瓜

---

⑩ 贝利·W·和贾斯廷·W·迪费著《波多黎各：被背弃的保证》（纽约，1931）第5章。出口额数字见H·S·珀洛夫著《波多黎各的经济前途》(芝加哥,1950)第136页。

⑪ 何塞·A·埃雷罗，《蔗糖的神话——波多黎各经济史随笔》（圣胡安，1975），第8页。

分。这个时期正值美国、法国和德国兴起，在工业生产方面与英国相竞争。这些经济强国的扩张需要新的市场，开始要求更大规模地输入原料进行加工。此外，鉴于这些经济强国的资本主义性质，由于制造业大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资本积累寻找投资场所。当剩余资本增加的时候，利率下降，资本家被迫去寻求新的低工资劳动力市场，从而通过有利可图的国外投资而减少国内积累起来的流动资本数量。

表1 美国市场的食糖供应来源所占比例

	平均 1897—1901年 (%)	1932年 (%)
(1) 路易斯安纳（蔗糖）	11.1	2.6
(2) 美国西部（甜菜糖）	3.2	21.1
(3) 夏威夷（蔗糖）	12.0	16.4
(4) 波多黎各（蔗糖）	2.1	14.7
(5) 菲律宾（蔗糖）	0.7	16.6
(6) 古巴（蔗糖）	16.6	28.2
(7) 其他	54.3	0.4
合计	100.0	100.0
小计[3+4+5+6]	31.4	75.9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报告》，第73期（华盛顿特区，1934年），第159页，引自J·A·埃雷罗《食糖的神话——波多黎各经济史随笔》（圣胡安，1975），第9页。

波多黎各食糖工业的成长与这种帝国主义发展的格局完全一致。它是在短时间内对土地和机器大量投资，而长期带来利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萧条年月中，这些20世纪早期的投资也在产生巨大利润。⑫

除了着眼于美国的消费需要以外，波多黎各的糖也用来作为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原料的来源。这由下述情况得到证明：不准

⑫ A·D·盖尔等《波多黎各的食糖经济》（纽约，1938）第155页。

在该岛开设任何炼糖厂（除了纯为波多黎各内部市场服务的几家，而且是在晚期）—— 炼糖厂是制糖过程最后阶段所必需的。因此，波多黎各成了供宗主国经济进行加工的原糖出口地，到1914年宗主国成了重要的精糖输出国。⑬

274

种植园经济集中生产单一的出口经济作物，使得过去当地生产的某些商品供应减少，于是势必提高进口货的数量。到1920年，进口值超过19世纪末进口值的6倍。与进口增长伴随而来的是波多黎各被纳入美国关税体系，这种体系把日益增长的进口需要转向北美的供应商。在1895年，来自美国的进口货占该岛进口总值不到11%；15年后，它们占总值的90%。美国对波多黎各的贸易增长达到这样程度：1934年在蔗糖单一生产最高峰时期，波多黎各人口只有200万人，却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第二位最大顾主，在全世界的第九位最大顾主。⑭

1898年美国的入侵不但更换了宗主国，更重要的是，殖民关系的经济意义也起了变化。19世纪末，波多黎各庄园主们面对的是一个虚弱的宗主国，它的政策旨在保卫自己的商业利益；在20世纪初，他们发现统治自己的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的经经正在发展，它感兴趣的是在殖民地不仅控制贸易而且控制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矛盾的真正性质起了根本变化。

占领初期的殖民政策显然是旨在摧毁拥有生产手段的庄园主的霸权地位。采取攻势的反对西班牙的民族斗争变成了守势的反对美国的斗争。一个在19世纪追求变革的阶级，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迫而保卫它曾借以发展自己（脆弱的）社会霸权的传统农

⑬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见《1914年制造业普查》（华盛顿特区，1919）第2册，第428页。北美对原糖加工的利益，在美国参议院第59届第11次会议250号文件《1895—1905年食糖的生产与商业动态》（华盛顿特区，1906）中得到证实。

⑭ 贾德·波尔克著《对波多黎各的掠夺》，载《政治学季刊》第57卷第4期（1942）第485页。

业天地。在文学和其他文化表现方式以及在政治行动中都可找到这方面的迹象。例如，在19世纪末年，“希瓦罗”（jibaro－－-乡下人），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的原始或反现代化的习惯而受人轻视，可是在20世纪头几十年他们的形像却被抬高为民族的象征，而农村的“家长式和谐”则被理想化了。路易斯·略伦斯·托雷斯的诗歌和它得到普遍的赞扬或许是这一过程的最好例证。[15]

275

1898年美国的入侵以及岛上北美政府最初几年的经济政策使得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激烈变化。咖啡贸易（其主要市场是欧洲）正在经历严重危机，随着新税法以及对信贷的限制，许多庄园主、中等农户和自耕农被迫出售他们的农田或部分土地所有权。最初一批北美总督对传统糖业也有巨大影响。与咖啡鲜明对比，糖产量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一直在下降，到入侵的时候，过去用于种植甘蔗的沿海土地有很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根据土地价值（而不是根据生产水平）制定的新税法促使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利用起来以便交纳既定的税额，但是对当地大多数土地业主来说，信贷限制阻碍了这一行动的道路（他们之中只有少部分人有国外的信贷来源）。

许多人交不起新税款，他们的地产被政府没收进行拍卖。1901年至1903年之间经过核准的这样案例在600件以上。[16]

这种情况导致很大比例用于生产的土地集中到大规模的美国糖业公司手中。在1897年全部耕地中只有2.7%是500英亩以上的农场（这是现有统计数字中最大的一个档次）；1910年这个比例

[15] 参看阿尔卡迪奥·迪亚斯·基诺内斯著《路易斯·略伦斯·托雷斯的自由与乌托邦之梦》，载《未名》第6卷第1期、第2期（1975）。

[16] 何塞·G·德尔·巴列著《经历十年》（巴塞罗那，1907），第116页，第198页。又，何塞·德·赫苏斯·蒂索尔著《波多黎各的经济烦恼》，（圣胡安，1922）第36—88页。

是31.4%，其中2/3是1,000英亩以上的农场，它们的平均规模是2,142英亩。⑰ 小于20英亩的农场在1897年占总耕地的33%，1910年占12.4%，1920年占10.6%。

咖啡业出现土地集中和危机的情况迫使许多过去的小自耕农以及庄园的佃户和分成农（此时他们被剥夺了自己过去用来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所耕种的土地）谋求受雇为雇佣劳动者以便从市场购买基本食物。兴起了一阵移民浪潮，从生产咖啡的地区涌向经济生活日益增长的地区，主要是甘蔗园。从1899年到1910年主要从事甘蔗种植的市区*，其人口增长了45.4%；而集中种植咖啡的市区，其人口减少了4.2%。⑱ 于是土地再分配和内部移民导致大量无地的劳动者集中在甘蔗产区。

波多黎各的甘蔗商品化种植其发展是发生在美国资本输出的扩展时期。对于愈来愈支配着甘蔗生产的北美公司来说，资本是比土地更为充裕的经济要素。临近20世纪最初十年时候，在500英亩以上的农场上，（它们主要是大公司的土地），平均每英亩土地在机器和建筑方面的投资几乎是100—500英亩规模农场所作投资的3倍（2.75倍），后者是属于庄园形式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资本充裕的情形产生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的倾向，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于是一向在庄园制生产组织占支配地位的佃农制宣告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在甘蔗种植园中用来种植维持生活的作物土地，平均面积为每户不到0.076英亩，这比咖啡或烟草地区低4.5倍⑲

---

⑰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第13次人口普查》(华盛顿特区，1913）第7册，第989页。

⑱ A·G·金特罗-里韦拉著《资本主义制度与农村无产阶级》。

* 市区（municipalihos），波多黎各行政区划的一级。全岛则分为7个州，78个市区。——译者

⑲ 埃斯特万·伯德著《糖业与波多黎各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关系问题的报告》（波多黎各参议院，圣胡安，1942）。

在蔗糖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中，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与前个世纪的情况全然不同。所以生产活动是在不同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是根据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买和卖。工人们物质生活改善的可能性不再是他们过去仰仗获得收成效果的自然力的结果；他们也不再仰仗庄园主的 277 家长式好意。对糖业公司来说，工人们形成一种同一的劳动力，个体的经济改善只能通过对全体的改善：提高日工资。于是，争取经济改善的斗争势必是一种集体的斗争，这样，同一性就意味着团结。

种植园也打破了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因素；它把过去孤立的、个体的生产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这种情况使定居方式产生差异。在甘蔗产区，人口开始集中在各个市区的城市中心或集中在乡下的小村镇。（在庄园和主要是小土地占有制的农场地区，一般的农村定居方式是分散的：零星孤立的人家周围是耕种的土地。）[20]

旧日农村世界的崩溃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化的农业工人之间新兴的团结。这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中表现得很明显。一个很足以说明问题的情况是，干亲关系（compadrazgo）纽带的变化。在庄园里，农业劳动者往往在上层社会中间为自己孩子选择教父，极为常见的是庄园主本人或他家庭的一个成员。在自耕农和拥有小规模或中等规模土地的农场主中间（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基础进行）最常见的干亲关系纽带是在大家庭成员之间结立。种植园把这两种方式都取消了，于是干亲关系纽带就建立在朋友和农工伙伴之间，彼此都是同一社会阶级的成员。[21]

---

[20] 例证见《波多黎各的农村土地分类方案》（埃文斯顿，第三卷，1952）第247页，第252—253页。又见C·F·琼斯和拉斐尔·比科合编《波多黎各地理讨论文集》（圣胡安，1955）。

[21] 参看西德尼·W·明茨和埃里克·沃尔夫著《波多黎各宗教仪式干亲关系的分析》，载《西南人类学杂志》第64期（1950）。

在各城市中心的手工业者经历着类似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北美的资本不但投资于糖的加工而且也投资于烟草的加工，烟草很快成了该岛第二位出口商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波多黎各商业的控制，美国制造的出口品对几种行业的独立手艺人（鞋匠、裁缝、木匠等等）形成致命的竞争。这种情况加上传统农业中的危机，为新的烟草加工中心提供一个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于以工资为基础的劳动体制。从1899年到1910年雪茄工人的人数增长了197%。1910年，全体雪茄工人有74.6%受雇于雇工100人以上的制造中心；1920年为82%，其中大部分(78.1%)受雇于有500工人以上的工厂。㉒ 278

成为无产阶级化雪茄工人的手工业者把激进主义传统和组织工作经验带给劳工斗争。有迹象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存在手工业者的报纸和思想性小册子，行会，合作社和互助团体。第一个全国性劳工组织于1898年由这些过去的手工业者成立起来，他们是把工会运动向农村推广的领导人。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特点是大罢工活动（主要在烟草加工厂和甘蔗园）和工人自由联合会。在经济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之后，1915年5月，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者和种植园工人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其纲领清楚地对准社会的根本改造。

在1897年自治党的分裂中已经显现的"波多黎各大家庭的内部的裂变在美国占领后立即反映到政治方面。成立了两个政党。联邦党代表庄园主和他们的利益，要维持他们脆弱的社会霸权；共和党起先主要代表自由职业界，这些人虽是西班牙殖民统治时自治主义运动的左翼，这个政党却无条件支持美国统治。

自由职业者的主要抱负表现在他们争取按强调个人自由和独

㉒ A·G·金特罗—里韦拉著《社会主义与雪茄工人：波多黎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手工业者的无产阶级化》，载《拉丁美洲展望》第10卷，第2—3期（1983）第31页。

立以及根据理性来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来组织社会。面对着庄园社会结构特有的家长作风和恭敬服从的文化，合理的社会组织就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而个人主义则是民主的保证。建立一个自由和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对自由职业者来说是通往可能的未来霸权的的道路。对于许多波多黎各人，1898年美国的入侵像征279着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到来。尔后被叫做“美国化”的，就是他们希望建立新社会秩序的梦想。[29]

随着美国统治最初十年中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改造，自由职业界内部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封建领主的庄园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意味着一体化宏观经济更大的发展，而这又产生了对专业人员的更大需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专业人人员在经济中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则改变了他们作为独立生产者的作用。会计师开始活跃兴盛起来，公司法律顾问、企业经理、生产工程师等等也是如此。殖民地政府对自治力量的发展所作的阻挠（因为这种发展会提高庄园主的统治地位）在自由职业界内部引起深刻的分裂。那些已经同新经济联合到一起的人强调现代化的重要性，所以拥护北美的统治；可是那些保住其独立生产者地位的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药剂师等等）则保留自由主义为其基本理想。后者中间有很大一群人（大可称为“雅各宾派自由职业者”），在 1904 年抛弃了他们这个社会阶层自1899年以来一直控制着的共和党队伍，而加入庄园主阶级，把“波多黎各大家庭”重新聚合起来反对殖民地政府，要求解除官方对政权的控制实现自治。于是庄园主的联邦党在1904年变成波多黎各联合党（简称联合党）。

与此同时，由于旧日拥有土地的民族主义阶级在防御中不断打败仗，随着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愈来愈发展，正在形成各种新

---

[29] 例如，何塞C·巴尔沃萨著《人民的道路》（圣胡安，1939），特别是《常见的谈话》和《反对美国化》两篇文章。

型的业主，这些业主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反对民族主义性质的本地资产阶级。集中生产单一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园经济使得过去在当地生产的某些商品供应减少，于是势必提高进口量。结果，一个强大的进口部门在这种依赖资本主义种植园体制——它的发展哺育了进口需求——以及依赖对美贸易的经济中发展起来。

北美统治的早年时期有利于外资甘蔗种植园发展的经济状况也使得一小批波多黎各地主受惠，后者已经把农业生产同商业活动结合到一起(或者是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商人)，并且在组织生产时已经开始摆脱庄园主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这种过程主要发生在甘蔗业。波多黎各被并入受保护的北美市场，这对蔗糖出口非常有利。紧接入侵之后的年月中，咖啡经济的危机也为这些波多黎各地主提供资本主义扩展所需要的人力（咖啡经济危机为迅速发展的外资甘蔗种植园增加了劳动力供应）。劳动力供应方面的这种增加，加上这些地主愈发与庄园主世界观疏远，说明他们是怎样地基本按照外资种植园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生产。到20世纪30年代初蔗糖生产处于最高峰时，这群波多黎各地主联合拥有的经济实力差不多同四个外资大公司的经济实力相等。1934年，他们的糖厂几乎生产加工糖总额的一半，[24]由于种植园经济受到庄园主（通过联合党）的威胁，同时也受到种植园制度本身产生的敌对阶级（工人阶级——和它的社会主义党）的威胁，波多黎各的糖厂主或甘蔗园主的阶级利益开始集中到保卫这种经济结构的一方面。巩固自己在组织生产方面地位的基础本身，至为重要，而同美国公司的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则是次要的。 280

商业资产阶级和糖业生产资产阶级都很依赖于同美国的市场关系和种植园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受到北美的殖民地经济政策的刺激。争取确立波多黎各民族地位（不言

---

[24] 数字见盖耶等著《糖业经济》，表31，33，52—54；各表综述见A·G·金特罗—里韦拉著《波多黎各的阶级矛盾与政治》(圣胡安，1976)，第66—67页。

而喻也是争取在政治上建立这个民族自己的国家）的斗争矛头所向是反对北美殖民统治，这种统治正是这些社会集团阶级利益的
281 支柱。因此他们形成反对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并按此行动起来。

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所形成的阶级结构产生三方的矛盾。宗主国和它的同盟阶级控制了政府，并设法通过国家政策建立控制社会的基础。庄园主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受新宗主国和它的政策的威胁，以及受工人阶级在其反对旧日家长制秩序的斗争方面的威胁。新兴的无产阶级从事针对糖业公司的强大的经济斗争（这些公司就是殖民统治），而他们争取普遍社会改造的政治斗争也指向仍在社会文化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旧秩序的代表。

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旦巩固了它对波多黎各经济的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它的结构和发展中的矛盾，开始更加明显。这些矛盾显露在1925—1940年这段期间特有的某些经济过程中。其中之一，开始于1925年，那就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以1910—1914年的基价指数为100，波多黎各1973年的出口价格为92.5，而进口价格为126。换言之，为了维持同样的进口水平（按总产值计算）波多黎各经济必须增加出口生产总量36.2%。从1925年至1934年，事实上产量有很大增加，可是它们对商业收入指数不产生效果。[23] 同宗主国的贸易占该岛进口总额的90%以上，而宗主国对殖民地贸易机制的绝对控制终于开始甚至消极地影响了过去宗主国曾鼓励提倡其发展的那些产业。

在一个围绕着出口单一作物组织起来的开放经济中，贸易条件恶化对国民收入有严重的后果。经济中各生产部门创造的收入下降了，它们在国家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下降了。例如，自
282 1929年至1939年农业收入下降32%，政府和服务部门出现完全人

---

[23] 达德利·史密斯著《波多黎各商业活动的发展及其根本原因》（华盛顿特区，1938）第42页。

为的增长，主要由于兴办联邦直接管理的福利计划或所谓"新政"的"复兴建设"。1939—1940财政年度，宗主国中央政府在波多黎各的开支超过该岛殖民地政府的支出，有迹象表明20世纪30年代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各项"新政"计划通过这个过程形成一个平行的管理机构向宗主国行政首脑直接做出反应。允许波多黎各各政治团体参政虽是通过殖民地政府来实现的；但这个正式政府却由于推行"新政"计划的"平行政府"的出现而黯然失色，后者在力量方面或在参与的广泛性方面（特别是那些青年自由派波多黎各自由职业者的行动）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影响。㉖ 1936年，新政机构波多黎各复兴建设管理局（PRRA）雇用了约6万人，超过糖业总雇佣人数的一半，而它的施政方针花样繁多令人惊奇：住房、卫生、商业、农业合作社、社区教育等等。㉗这种"平行政府"的发展表明，以种植园为中心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但在结构水平上而且在上层建筑水平上处于危机。

这个时期的另一经济过程是环绕着就业问题，通过这个过程，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矛盾显露无遗。1930年至1940年之间，这里的人口增加了21.1%，约为它在前个世纪增长的速度，而就业总人数只增长1.7%，大大低于前几十年，那时期就业人数的增长等于人口增长。各生产部门出现的危机显然对就业产生影响，但是，这个时期的就业问题不仅于此，其根源在于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

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产业（蔗糖和烟草加工）已经找到增加产量而不必增加劳动力的方法。从1910年

㉖ 参看托马斯·G·马修斯著《波多黎各政治与新政》(盖恩斯维尔，1960)，特别是第6章

㉗ A·蒙特亚古多和A·埃斯卡梅斯著《波多黎各珍文集》(哈瓦那，1939）和波多黎各建设管理局剪报集（剪报汇编装订为3册，藏于波多黎各大学总图书馆的波多黎各藏书部

到1934年粮产量增加到3倍以上，从34.7万吨增加到111.4万吨；283 而这个产业中农业就业总人数只增长5%，从87,643工人增加到92,398人。这意味着，在1910年生产100吨糖需要25.3个农业劳工，而在1934年只用8.3个劳工。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烟草加工业缺少可靠数字，然而1910年至1920年之间，相似的过程很明显：产量增长12%而雇佣人数减少26%。

甘蔗和烟草制造业雇佣人数停滞不前使得无产阶级化过程停顿下来。在20世纪初为波多黎各无产阶级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的恰是这两个产业中发生的变化，雪茄工人和甘蔗工人曾经是无产阶级团体中最主要的部分。在这些产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此时雇佣人数在增加）形成的波多黎各工人阶级生来就认为无产阶级化会遍及全国。随着庄园主世界的生活方式开始瓦解，工人们通过劳工教育和工会活动摘除了阻碍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恭敬服从(以及宗教)的眼罩。社会主义党1919年纲领曾提出，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不可避免。

可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工人阶级面临的情况是，庄园主世界继续在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队伍象过去那样扩大。佃农和庄园劳工不是逐渐变成无产阶级而是变成边际穷人(marginados)。在服务部门、个体小商贩和散工当中，就业不足的现象大量增长。这个时期也有家庭为基础的家庭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其特点是可怜的低工资和长工时。[28] 不论是这些工人，还是那些失业者，当然都不具有工人阶级过去的那种经历，而那种经历却是工人阶级赖以发展以战斗团结为中心的另一种文化因素的基础。

因此，劳工运动在各方面削弱了。在“工人自由联合会”(FLT)的工会组织中很难把这些“边际穷人”组织起来。此外，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也是对工会斗争的威胁。从1924年往后，

---

[28] 参看美国劳工部《家庭刺绣工业报告的证据附录》(华盛顿特区，1937)。

工资总额有停滞迹象，而生产部门的劳动价值则有相应地降低的迹象。还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有许多罢工遭到镇压。但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瘫痪和“边际穷人“人数的增长打击了工人阶级对自己未来胜利必然到来具有的信心。这导致社会主义党同反对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美政党联合以便参政和通过旨在改善当前状况的具体措施。在苦难愈来愈深的情况下，这种（不成功的）改良主义政治道路使党的斗士士气低落，这又导致腐化或麻木不仁。它也造成“奋兴派”*的新教各教派的巨大发展。[29] 284

波多黎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质还导致其他社会阶级内部的变革。到20世纪20年代末，过去带有霸权性质的庄园主阶级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结构基础。由于没有一个在其争取霸权地位的斗争中能够系统地表达某种思想—文化方案的阶级，国内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危机；这是被这个时期知识界的一代人简称为他们所谓的“追求个性”的危机。[30] 这种危机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道路出现的危机而加深。而且，自由职业界本世纪初所抱的美国化之梦（民主现代化新秩序），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消逝了，同时也因这个时期北美的殖民政策的专横武断而破灭。[31]

这种思想个性危机引起两场政治运动，每场运动都是对垂死的庄园世界不同的社会阶级作出响应，而以民族主义为其共同特色。独立的小自耕农传统上是作为共同文化中的附庸而支持庄园主的斗争；他们从不曾作为一个阶级自己追求权力。只是随着庄园主政治的失败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这些小农的后裔（地

---

* 奋兴派（revivalists），一译“教会复兴派”、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中的一个流派。着重鼓励宗教狂热以谋求教会的“复兴”。——译者

[29] 参看塞穆埃尔·席尔瓦·戈泰著《教会面对贫困：新教教会历史情况》《公共行政杂志》第4卷，第2期（波多黎各，1971）。

[30] 最好的例证是A·S·佩德雷拉著《岛屿主义》（马德里，1934）。

[31] 罗伯托·H·托德著《1898—1943年的统治人物》（圣胡安，1943）一书中有广泛的例证。托德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是亲美政党的创始人之一。

位下降）才同城市小业主联合起来，通过富于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独立地投身于政治：那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斗争中参加者为了保存他们认为是波多黎各的生活方式下定决心什么都干，乃至于 285 摧毁自己。[32]

国民党虽是不大的集团，可是由于在文化危机中它显然代表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在30年代的大部分重大政治事件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他们所代表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传统社会的最后堡垒，它的许多成份不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例如，他们的保卫西班牙传统，他们的罗马天主教信条，他们的专制主义和个人至上的领导作风，他们的恭敬服从和尊严感等等）。从1932年起，该党鼓动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殖民地政府害怕社会不满增长会引起武装斗争的爆发，便发动镇压机构的力量对付该党，使公民权利和基本自由受到威胁甚至遭到破坏。[33]

第二种类型民族主义的核心集团来自第二代的没落庄园主，自由职业为他们提供了社会地位重新安置的最重要渠道。可是，种植园经济不能为这个部门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到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证据表明各自由职业阶层出现失业，甚至高度专业化的自由职业者，如化学家、工程师、经济师等也去寻找政府工作以求安身。[34]庄园主阶级不再是发展工作的主要障碍；现在的障碍来自垄断种植园资本主义的束缚。自由职业界的现代化传统和雅各宾传统在本世纪初已经分家，这时通过各自由职业阶层所领导的人民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在社会变革的纲领下再度结合起来。经济中公营部门的重要性愈来愈增加，这些新自由职业者对"新政"的自由主义实验的参预以及通过政府计划工作使依附性经济改弦更张的幻想为一种新的政治方案立下基础，庄园主阶级

[32] 例如，佩德罗·阿尔维苏·孔帕斯编《波多黎各共和国》(蒙得维的亚，1972)，1930—1932年文献选集，第24页，28—30页，59页，77页等处。

[33]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波多黎各公民权利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出版地不详，1937)。

的后裔想通过这种方案为新的霸权地位建立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

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终极所至是生产力停滞，各经济生产部门所产生的收入相应减少，以及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种植园经济被认为应对下述问题负责：工人的苦难；庄园主的破产；小自耕农的贫困化；就业不稳定与失业的增加；日益扩大的自由职业界在经济参预方面所受的限制；以及政治腐化和个人公民自由受到威胁。自本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在结构和思想一政治水平上，旧日庄园主社会结构的其他阶级以及随着这种结构转变为种植园资本主义制度而形成的各阶级都被撇到一旁。以公营部门的自由职业者为其天然领袖的“人民”的联盟，成为一种包罗一切的政治道路。 286

民众主义是某种类型生产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并对其基础有着决定性影响，它对种植园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于种植园的出现和巩固而产生的阶级政治予以致命打击。此外，它为40年代和50年代取代农村资本主义并改造波多黎各社会的依附性制造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这种改造过程中产生了现代的进程、阶级和冲突。

㉚ 参看伊沙贝尔·比科，《30年代的学生抗议》（圣胡安，1974）。

287

第 7 章

多米尼加共和国

（约1870—1930年）

1844年2月27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告独立，这是“三位一体会”*的努力最终达到的成就。三位一体会是6年前为此目的而建立的一个秘密会社；当时，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面积占全岛三分之二的圣多明各，还同海地并在一起。这是第二次宣布为主权国。第一次，所谓“短命的”独立，是由努涅斯·德·卡塞雷斯在1821年带来的，它只持续了几个月，过后首都城市的钥匙交给了海地总统。新的主权国持续时间足够长久（而且具有充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于是2月27日至今成为纪念共和国诞辰的国定假日。然而在截至1930年这段期间，主权两度中断。新得来的独立还没过20年，这个国家再度把自己归并于西班牙，在西班牙控制下达4年之久（1861—1865年）；1916—1924年，它被美国军事占领。在这段期间的其余岁月里曾有过多次计划打算放弃主权以换取外国保护。从这点看来，这个国家的独立即使不算是“短命

* 三位一体会（La Trinitaria），一译“三一团”。圣多明各独立运动的秘密革命组织，1838年由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Julan Pablo Duarte，1813—1876）创立，以献身“上帝、祖国和自由”为誓约。“三位一体”是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同具一个本体。该组织利用宗教仪式作为掩护，进行公开活动，故而采用带有宗教色彩的“三位一体会”的名称。——译者

的”，至少也一直是空洞无力的。从再度为西班牙所兼并到被美国占领，表明这个共和国所从属的外国力量发生变化的方向。从一个仍然被编织在欧洲的半殖民地网络上的国家，到19世纪末它成了美国的仆从国。这种处处可见、历时久长的变化，正是我们所研讨的时期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应经常加以考虑的活动背景。

多米尼加人所谓的独立，对海地人来说就是分裂。他们的全岛统一不可分割的理论，要求采取反对的措施，于是此后15年对多米尼加领土的多次入侵至少是证明了历届海地政府这一共同目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海地在19世纪许多时光里比起它的东邻享有经济、人口和军事的优势，历届海地政府却无所成就。 288

多米尼加人在击退不断的入侵浪潮方面取得难能的成就，许多地方应归功于佩德罗·桑塔纳。他是来自东部平原的牛场牧主，1844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考迪略”总统，在其后20年里支配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劳动密集型牧场（hatos）的生产方式有助于牧主（hatero）与其工人（在骑术和使用武器方面训练有素）之间产生密切的而且常是家长式的关系。桑塔纳依靠这种个人追随者得以建立一支高效率、机动性很强的军队。三位一体会领导人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同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和另一位受人尊敬的共和国创始之父拉蒙·梅利亚一起）看到了自己的公民民主政治的城市理想很快就同要求强有力的军事领导的需要发生冲突。1844年年中，杜阿尔特不得不再次流亡，仅仅数月以前他曾胜利地从流亡中归来。

独立和桑塔纳取得政权之后不几年，出现了一位与之竞争的考迪略，布埃纳文图拉·巴埃斯。他在桑塔纳手下，以国内南部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闻名一时，其家庭及个人追随者都在那个地区，他本人于1849年第一次当上总统。由此产生的斗争派别（桑塔纳派和巴埃斯派）是年轻的共和国里最早具有真实权力的两个集团。它们的共同特征，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还是政治运动和“政党”的特点：以某个地区为根据地的一群组织松散的追随者，集

结在一个领袖周围，这个领袖从他的头衔来看可能表明有某种军事经历，但大多并非正式军人。在一个内战几乎不断的社会里，军人与平民的界线模糊不清，可以同时是一位“将军”、一个地主和一名商人。在一个将军大量存在而土地尚不稀罕的国家里单单靠于其中的一行是不可能给人带来特殊的威望的。一名考迪略的威望毋宁说是来自他把各种个人关系结成耐久的、多层次的势力 285 网的能力，凭借的是现货或契约的商品交易、特权和人们对他的效忠。在这个势力网里，领袖既是中心又处于顶峰。

这几个支配着独立后政治生活的既无正式组织又无正式纲领的政治军事派别集团之间，如果有何思想差别可以分辨，它们至少总是同这几个集团的根据地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有某种联系。就此而言，中部的锡瓦奥谷地有大量颇为繁荣的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烟草农场，这些农场供养着住在城市中心圣地亚哥的一批安定的经商和从事专门职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子弟有许多在欧洲大学读书。比起西北地区蒙特克里斯蒂港附近的优质木材出口商寡头集团，或东部的牛场牧主集团，他们倾向于使其政治运动带有更多的自由民主观念。然而，即便是强有力的锡瓦奥精英阶层——他们的出口经营直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还支撑着国家的经济，因而使得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十分强大——也总是不得不同那些地方首领做交易，那些地方首领的群众声望基础是克里奥尔人对政治现实和文化特性的尖锐的洞察力。社会远为不安定的南部沿海一些地区，情况也大体相似，这些地区自19世纪最后25年生产蔗糖的时候起，开始对锡瓦奥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发出挑战。

人口少而分布稀疏（1871年估计为15万人分布在约近 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本身就是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建立起符合要求的民政和军事机器。人口较多、组织较好的海地共和国近在咫尺，只有使这种疑问加深。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需要寻求保护的感觉所支

配——即向一个强大的愿意充当抗衡力量的第三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寻求保护，以抗衡它所感到的来自海地的经常威胁。

甚至在宣布独立之前，已有"勒瓦瑟方案"（以法国驻太子港的领事命名）的筹划，法国将在其中扮演保护人角色。19世纪后半叶有大量这种方案，有时是当权的政府策划的，有时是它的反对派（通常是流亡的）策划的。最常被寻找的潜在保护国是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在秘密谈判中（这类谈判常引起令人恐慌的谣言和更加深刻的政治积怨），多米尼加人不但作出各种经济让步，而且常以租借或甚至出售东北部的萨马纳半岛作为诱饵，这个半岛有优良的海湾，战略地位重要，有建设海军基地和船舶燃料补给站的巨大潜力。当然在这种谈判中，多米尼加各方的利益错综复杂。不但可能有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的真正利益，也有当时政府旨在以保护国的支持来保卫自己对付内部反对派的利益，或是相反地，反对派在其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抱着寻求强大同盟者的目的；得胜者则将分享战利品。这种内部政治上的互相倾轧也使得这个国家同海地的关系多少比迄今为止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复杂。虽然多米尼加历届的当权政府一贯总是把海地的好战意图说成是寻求外国保护的理由，可以想象，与此同时多米尼加的流亡者还可能在海地政府唆使下正准备着从邻国入侵；因此，多米尼加人对海地的害怕和多米尼加政府对反对派的害怕也许不相上下。桑塔纳（1844—1848年、1853—1856年和1858—1865年任总统）倾向于接受美国保护，否则就接受西班牙保护；巴埃斯（1849—1853年，1856—1858年，1868—1874年和1876—1878年任总统）则倾向于法国或西班牙——后来又倾向于美国。1861年（这是美国内战使得美国难于进行干涉的一年）桑塔纳竟然劝说西班牙重新建立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控制。可是在两年内就开始一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游击战（光复战争），游击战得到锡瓦奥人及当地亲德国的商人们的强有力支持，并在1865年恢复

290

独立。

回顾历史，并与本世纪初年起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相对比，19世纪末叶欧洲利益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占支配地位的情况或许有某些好处。欧洲不象美国，它离得很远，有几个强国互相竞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主要出口作物烟草主要输往汉堡；德国的烟草买主和代理商集中在圣地亚哥和普拉塔港。伦敦货币市场提供了多米尼加最早外国贷款之一。1869年，当巴埃斯任总统时，就安排了所谓的哈特蒙特贷款42万英镑；这笔贷款的债券持有者的债权要求在未来许多年中都有反应。法国也提供了资金；291 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圣多明各创办一家国民银行，还建立一个电报系统；它还在这个国家拥有航运公司。在这种结构中，历届多米尼加政府，不管在国际舞台上多么软弱，至少还有一点点机会使远处他方而互相竞争的欧洲列强彼此争斗。它们还可以利用美国在加勒比海利益的发展来威胁欧洲列强。当然，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势力均衡不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有意制造的，可是，只要它存在，它所提供的行动余地常被巧妙地加以利用。然而，在电报、电话和轮船使得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美国这个北方邻国联系日益紧密超过已往的时刻，地理上近在咫尺的美国一旦建立起政治和经济的霸权，那么这种行动余地就小得多了。此后，只有美国内部的竞争（各经济部门、各政党或各对立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才有助于多米尼加人为利用外国力量而作的薄弱而又总是微妙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中，人口增长、经济资源或组织上稳定性的发展都不能阻止多米尼加共和国对美国依赖的强化和深入。

多米尼加共和国1865年第二次脱离西班牙独立以后的年月是政治混乱、革命和内战的时期。在西班牙兼并结束时，桑塔纳已经去世，但他的追随者同其他人重新组合起来反对1868年至1874年担任总统的巴埃斯。主要的政治派别此时叫做“红派”（以巴埃斯派为核心）和“蓝派”（锡瓦奥的巴埃斯反对派加上东部的桑塔纳传统继承者），他们彼此猛烈无情地互相争斗。1876年，理想

主义的、有文化素养的药剂师乌利塞斯·埃斯派利亚特任期6个月的政府与这一切相对照只能令人啼笑皆非。在这些年月里，海地作为一个入侵者已不那么活跃，更重要的是作为或彼或此的对立派别的金融后台和同盟者。同样，库拉索岛和圣托马斯的商人们对各种密谋和革命活动进行资助，来自美国的一些商业冒险家也是这样。

19世纪70年代临近结束时，政局才开始稳定。光复战争的英雄格雷戈里奥·卢佩龙日益被公认为"蓝派"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他出生于北部的普拉塔港，出身寒微。他的军事才能，在古典文学艺术方面的自学修养，以及明确的领导和谈判天才使他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同锡瓦奥的半外商兼土地所有者打交道。巴埃斯的最后一任政府（1876—1878年）届满后，卢佩龙的"蓝"党在国内势力最大，自其他各地区以及首都吸引了几位重要人物。象这样一个党派只不过是一个网络，靠着卢佩龙到处兜揽联系来维持和操纵，但是领袖的权力（处于网络的中心）却因此削弱了。 292

卢佩龙自己不想当总统（虽然他曾在1879—1880年任临时总统）；他宁愿挑选候选人。于是他挑了共和国的大主教梅里尼奥阁下自1880年至1882年执政，而其后两年（1882—1884年）总统职位交给了乌利塞斯·厄罗，他是卢佩龙一手提拔的人。厄罗（也叫利利斯，人们都这样叫他，他也以这个名字成为无数轶闻和民间故事的英雄人物）象卢佩龙那样也来自普拉塔港，出身更为贫寒。他在卢佩龙领导下于光复战争中受到军事训练。他敏锐勇敢，足智多谋，因此晋升很快，先是在军阶方面，后来在锡瓦奥地区的政府职位方面。一旦当上总统，厄罗向卢佩龙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发出挑战只是个时间问题。1884年至1887年之间，更多由于厄罗的策划而不是由于卢佩龙的策划，任命了两位总统（比利尼和沃斯-希尔）此后厄罗自己把持着总统职位，直到他1899年去世止。流亡在圣托马斯的卢佩龙则被远远撇在一边。于是，卢

佩龙努力造成的政治稳定，被牢固地建立为独裁统治。在他的历届内阁中，厄罗除“蓝派”以外愈来愈多地把其他政治派别的人员包罗进来。那些尚未表示站在厄罗一边的各地方的“将军”及其追随者不是被用金钱或官职收买改变了主意就是被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厄罗的长期独裁肯定的同这位考迪略在政治上有异乎寻常的聪明睿智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也应加以考虑。在这些年月里，现代化蔗园在南部沿海地区的建立产生了一个由金融家和农业企业家构成的新的精英阶层。这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使政府的信贷来源更加广阔，政府第一次可以利用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精英阶层来对付另一个地区性精英阶层。1875年至1882年之间，创办了约30个新甘蔗园，主要在迄至当时一直用作大牧牛场的东南部平原地带。新的甘蔗园主中间有不少古巴人，他们由于十年战争（1868—1878年），而离开本国，想继续把自己的资金和专门知识用到一种由于日益扩大的美国市场近在咫尺看来有大前途的现代化农业。咖啡和可可的出口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也大量增加。1888年至1897年之间，蔗糖出口量增长一倍，从40万英担增至80万英担，可可出口量由9,730英担增至36,000英担，咖啡出口量由2,500英担增至9,000英担。烟草出口量则停滞不前。出现了一些新港口（南方海岸的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萨马纳湾的桑切斯）；旧的港口也发展了（普拉塔港，圣多明各）——参看表1。新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季节性的国内流动。来自海地和邻近各英属岛屿的移民也来到这里加强了日益增长的蔗园无产阶级。经济活动的增加吸引了更多来自加勒比海和更远地方的有技术的移民：古巴人、波多黎各人、来自库拉索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他们有一小批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到来）、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到189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口据说是45.8万人。国内的基础设施大有改进。1887年至1909年完成了好几条铁路把锡瓦

奥地区的主要出口城市（圣地亚哥、莫卡、拉贝加、圣弗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同普拉塔港和桑切斯联接起来。修筑了桥梁和港口；建立许多新的城镇。在著名的波多黎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欧亨尼奥·马里亚·德·奥斯托斯促进之下，教育制度有了改进。民政组织方面可以看到若干进步。武装部队首次经历专业化的努力；建起一支小小的海军。文化生活也繁荣起来：佩德罗·F·博诺（他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学论文1964年由E·罗德里格斯·德莫里西加以编辑取名为《博诺文集》）已在巴黎出版他的《猎人》，那是最早期拉丁美洲现实主义的小说之一。1882年曼努埃尔·德·赫苏斯·加尔万的《恩里基约》，一部著名的印第安人风俗文化小说诞生。在19世纪末年许多女诗人当中，萨洛梅·乌雷尼亚·德·恩里克斯特别突出；她的两个儿子佩德罗和马克斯·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学史学者。诗人法维奥·菲亚略很早就同鲁文·达里奥保持联系，J·J·佩雷斯翻译了托马斯·莫尔的著作，塞萨尔·N·彭森翻译了意大利语的著作，曼努埃尔·R·奥夫希奥翻译了法语的著作，著名的有维克托·雨果的作品。在造型艺术方面，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乌达内塔的绘画和雕刻值得一提。最后，地方主义虽未消失，却是自独立以来第一次能使之服从于国家政策，有助于日益增长的国民意识。

294

表1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69年、1895年、1896年各港关税金额

（单位：金比索）

	圣地亚哥	普拉塔港	桑切斯	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	蒙特克里斯蒂	阿苏阿	萨马纳	巴拉奥纳
1869年	179,363	396,865	—	?	?	?	?	?
1895年	415,996	290,322	210,982	252,103	105,896	32,482	20,785	1,552
1896年	505,048	368,687	244,684	227,298	99,182	28,560	28,695	1,908

资料来源：H·赫廷克.《多米尼加人民，1850—1900年》（巴尔的摩，1983）第65页。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变革和经济成长以前，社会分化一直受地区的限制。各地区中心之间彼此甚少接触：从普拉塔港到首都圣多明各的陆路长途跋涉约需4天，人们在出发之前最好先立下遗嘱。每个地区有若干“重要的”家族，他们的姓氏可为依附于他们的人大开方便。那时候还很少巨富：血统和长时间的居住是社会声望的主要决定因素。居民的极大部分实际是过着物物交换经济的生活。这一切如今变了。土地的价值增长了，货币开始渗进一切社会阶层；农业工资劳动更加普遍了。手工业者的分化加剧了，经济的服务部门也更加多样化起来。被尊称为“董”（dones）的地方知名士绅彼此愈加经常地搀和起来，并且也同“财主老爷们”（señores）——发了财的被同化的外来移民集团——搀和起来。这样，逐渐形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19世纪末建立了一些排他性的社会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是一种社会壁垒，用以抵制那些属于仅次于这个高层次的那个阶层的人们：“第二类人”（los de segunda），他们由于技术、教育、血统和身体素质、以及收入等，自“人民大众”中脱颖而出，但是如今不再能进入全国性的精英阶层。有意思的是，有几个家族（常是肤色较黑的）在厄罗的眷顾之下兴盛起来，由于他长期执政而受益使他们得以将子女送往适当的欧洲大学，使他们同财主老爷们的子女结婚或是（不如前者那么经常地）同名门望族的子女结婚，使他们在这种新精英阶层找到一个位置。

在这些年月里，社会天平两个极端之间的财富差别大大加剧。与此同时，在这两极之间，随着社会一切部门的分工愈加复杂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地位。当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正在继续时，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很大，有的时候还很引人注目。可是到19世纪末年，当新的阶级分化已经明朗化，已经稳定下来，社会分界线更加清楚地划分，比这些变化发生之前更加难于逾越。新的住宅区，尤其是在首都，开始贫富分开。比过去更加厉害，纯粹的黑色人种成为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障碍；新的国民精英阶

296

层比过去有可能更坚决地利用血统借口作为选择标准。在过去那个时候，出身寒微的幸运战士，在任何革命中参加战斗都会为他们带来机会，可以一夜之间显赫起来。那时，在政治混乱的日子里，还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发家致富或倾家荡产。一旦厄罗把他的秩序加给社会，这种机会就稀罕了。即便是军队，虽然仍是下等阶层的上升渠道，也必须为其初期专业化付出社会代价；正如何塞·马蒂在19世纪90年代初所看到的，多米尼加的士兵主要是黑人，而军官中间则许多是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

对这个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然在于厄罗在许多方面成为他当政时所塑造的社会中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人物。这位黑皮肤的出身于人民的将军，靠游击战争和革命起家的人，如今不得不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之中保全自己，他完全知道，这个资产阶级是生产者和商人的联合，他们并不承认他的社会地位，而他们对他的政治忠诚和财政支持归根到底靠的是他能够维持的和平和秩序。毕竟国家颁给他的荣誉头衔是“绥靖者”（El Pacificador）。

自共和国成立，进出口关税一直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商人们与历届政府之间设想了几种安排来保证稳定的现金收入。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得到承认的制度是，由一些商人组织一个公司来接管一个港口的关税管理；作为这种管理权的交换，这个公司每月向政府（亦即向总统）提供固定的金额。“蓝”党的领袖卢佩龙积极参加强有力的普拉塔港公司。总统还可以进一步地向个别商人借款，作为交换，常是暂时豁免关税。厄罗也继续用这种办法筹措资金；不论在借款方面或开支方面，作为私人的厄罗与作为总统的厄罗界限并非总是容易划清的。这种公私资金不 297
分的情况当然在所有政府机构中都存在。在国家财政困难时，高级官员被认为应自己掏腰包支付自己部门的办公费用；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可，这类官员在同私人企业打交道时可以收取手续费。外国贷款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届政府又一现金来源。在加

勒比海地区内部，库拉索岛和圣托马斯岛对于各独立国是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在这些岛上立足已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裔居民更是活跃的金融家和掮客：库拉索岛的赫苏鲁姆商号对布埃纳文图拉·尼埃斯的政治事业作了许多资助；圣托马斯岛的哈科沃·佩雷拉承兑所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借给多米尼加历届政府大笔款项。这些岛上的犹太裔居民不但在整个地区有可靠的家族网络，而且还同欧洲各金融中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常作为多米尼加政府的中间人在欧洲市场上寻觅贷款。哈特蒙特贷款（1869年）就是这样借来的，1888年由厄罗同阿姆斯特丹的韦斯滕多普银行订立合同的77万英镑贷款也是这样借来的；后一笔贷款在两年后又继以另一笔90万英镑贷款。在后两笔贷款中韦斯滕多普公司都安排了在几个欧洲国家发行债券。第一笔韦斯滕多普贷款用来一次性清偿哈特蒙特债券持有人的债权要求，这种要求常以外交为后盾，曾使许多届多米尼加政府大伤脑筋。外国贷款的进一步作用是使得厄罗可以减少对本地信贷公司的依赖。后者认识到这点，因此，反对厄罗财政政策的批评，很多是来自商界，他们害怕失去国内贷款所产生的高利息。第二笔韦斯滕多普贷款表面上是借来资助铁路建设的。可是厄罗不但需要款项来改进国内的基础设施，他还需要款项来维持自己的政权：数不清的封官许愿、"津贴补助"大量发出；许多朋友必须酬劳；许多潜在的敌人必须加以收买。

作为它同多米尼加政府订立合同的一部分，韦斯滕多普被允许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设立一个机构，通常被称为"税务署"，它管理一切关税；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交给政府，其余部分作为贷款还本付息之用。基本上这就是当地信贷公司运营的体制，但是如今范围遍及全国并在外国控制之下。税务署的荷兰人署长和厄罗总统之间的关系，经过初期一些摩擦以后，实际非常融洽。这位荷兰人干起他自己的私人商业活动而开始忽略他的上级以及间接地忽略欧洲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韦斯滕多普破产了，在1892年将

298

它在多米尼加的权益转让给纽约的圣多明各进步公司。一年以前同美国签订了一项商业条约，规定双方彼此豁免了一大批产品的进口税，引起几个欧洲国家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在多米尼加的经济和财政事务中欧洲失去压倒优势，此时已成事实。厄罗的财政部长欧亨尼奥·赫内罗索·德马切纳（属于库拉索岛的犹太裔血统）同时独自进行的同法国建立一种特殊的金融关系的努力显然是同已经变化的环境不相协调。当德马切纳发展到露出染指总统职位的野心时，独裁者就把他处决了。

厄罗在他的政权的末日，当他认识到新的美国关系留给他的余地是多么少时，他自己也同样拼命努力试图使一个英国财团参与这个国家的财政。这个倡议尚未实施，厄罗于1899年7月26日在莫卡的锡瓦奥城被杀害，杀害他的人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地位已经巩固的土地所有主、商人和金融家构成的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此时要求把这个阶级的成长和地位转化为政治权力。

厄罗死后经过几个短暂的过渡政府，胡安·伊西德罗·希门尼斯就任总统。他是西北部蒙特克里斯蒂城一家优质木材出口商行的头头，由于同厄罗疏远，他曾流亡在外，甚至企图武装入侵。副总统是奥拉西奥·巴斯克斯，他曾与刺杀厄罗的密谋有关。不久这两位最高职位者之间显然不可避免的倾轧显露出来了，形成两个政治派别，希门尼斯派和奥拉西奥派（也称秃尾巴派和长尾巴派，那是取自十分流行的斗鸡名词）。两派之间狂热激烈的斗争在20世纪最初30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支配地位。虽然难于证明他们同早先的考迪略式派别一脉相承，却或许可以公正地揣测，巴斯克斯（他是来自锡瓦奥的人）的追随者当中可以找到许多属于过去“蓝”党的人。利利斯派（拥护被刺杀的独裁者）的一个坚强核心持续存在一些时候，甚至到1903年沃斯—希尔任总统期间仍在左右政局，此后，他们才逐渐为其他运动所吸收。 299

20世纪初年，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不安定，达到只有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堪可比拟的程度。内战、革命和政变再度成为司

空见惯。厄罗高压政权下创立的民政和军事方面等级组织的外表为一种体制所接替，在这种体制下，地方的“将军们”和他们的党羽再次使自己听命于互相竞争的政治派别。这些地区性考迪略当中，来自蒙特克里斯蒂地区的德西德里奥·阿里亚斯最为知名，在许多年中对这个地区（以及它的海关）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直到他在特鲁希略政权初期被杀害时为止，他一直很活跃。

只有拉蒙·卡塞雷斯（巴斯克斯的表兄弟，杀害厄罗的凶手之一）任总统期间（1906—1911年）政府恢复了一些秩序。至少办了一些公共工程，并对难于驾驭的蒙特克里斯蒂地区采取粗暴手段，通过把农村居民强制集中到少数几个中心地点和宰杀牲畜的办法，使之平定下来。当卡塞雷斯被杀以后，开始了另一个革命迭起和总统任期短暂的时期。

在这种内部极不安定的环境下，不但有效地管理财政不可思议，指望同这个国家的外国债主作出持久有效的安排同样也是一种空想。1901年，希门尼斯总统似乎眼看就要同圣多明各进步公司以及欧洲的债权人都达成满意的谅解时，不料由他的副总统领导的一场革命推翻了他。他的继任者只得让美国政府本身自此以后代表圣多明各进步公司的权益。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的战舰几度出现在多米尼加的海岸为各国公民们的权益要求助威，这些人，有的居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例如，意大利裔多米尼加人维奇尼之流，他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蔗园主兼糖业商人之一，曾向厄罗提供大量贷款。

300 莫拉莱斯·兰瓜斯科总统（1904年）玩弄一种常见的概念：寻求在美国旗帜下的保护国地位。事实上即使实际没有采取这一巨大步骤，美国卷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内部事务的情形也在增长。例如，在当年，美国政府任命一位财政代表，他有权干预各地海关的行政工作；海关收入除扣留债权人应得部分外，规定应交给美国承认的多米尼加政府。这项规定之所以必要，或许是因为在国土上时常出现两个互相争执的政府，但它却会为以下作法大开

方便之门：美国得停止款项流向不为它认可的任何多米尼加政府。

两国之间在1907年签订的一项条约更进了一步。该国同债权人举行的谈判使外债从帐面的2100万美元减至1200万美元，内债从帐面的200万美元减到60万美元。对债务重新筹措资金是由纽约经营银行业的库恩—洛布合伙公司承担的，其贷款条件是多米尼加海关由美国政府管理，并指定纽约的莫顿信托公司为财务代理人。条约还进一步规定：除非两国政府事前达成协议，关税不得更动，外债也不得增加。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控制了政府的所有开支部门。1908年卡塞雷斯总统设立一个公共工程部要为几个项目开支50万美元时，他需要经美国批准；卡塞雷斯任命了一个美国公民做这个新部的部长时才获得美国的批准。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样地直接施加影响还不足以保证这个共和国履行其国际义务。那些尚未由北美人控制的政府部门中仍然是一片混乱的情况，被认为是实施1907年条约的障碍。此外，革命派时常占领港口和海关办事处并且借债，这使得国债增加。美国的直接干预（如1912年维多利亚总统被迫辞职）并没有产生理想的结果。1913年在"公正的"国务院观察员的帮助下博尔达斯总统的当选也没有产生理想的结果。1914年有了新的发展：由美国政府派一位财政专家来管理并改组整个财政结构。然而，胡安·伊西德罗·希门尼斯总统虽是由于美国的干预而当权，但他却拒绝满足这些以及其他的要求。 301

1915年11月19日，美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公使威廉·W·拉塞尔转达了代理国务卿发出的一份照会，再一次迫切建议任命一名北美人当"财政顾问"和设立国民警卫队由美国军官指挥。德西德里奥·阿里亚斯（他当时是希门尼斯总统负责军队工作的部长）发动的叛乱，成了派遣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多米尼加"协助"希门尼斯总统的借口，希门尼斯因此辞职。然而新总统弗朗西斯科·恩里克斯—卡瓦哈尔对11月19日外交照会中提出的

迫切建议置之不理。于是美国决定不承认他的政府，并中断多米尼加政府应得部分的关税收入。1916年11月26日美国海军上校H·S·纳普正式宣布军事占领这个国家，于是恩里克斯政府寿终正寝，纳普成为第一任军事总督。

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持续了8年（1916—1924年），其结果和所引起的反应，从两国之间前此的关系来看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强制的政治安定使得有效地组织多米尼加政府机构成为可能。教育、公共卫生、警察和公共工程得到有效的注意：纳普总督，虽然让美国公民负责大部分政府部门，却留心充分利用许多能干的多米尼加人的意见和活力，他们乐于在这种情况下投身公务。平民百姓被有效地解除武装；军队在恩里克斯总统执政时期已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解散。民间各派别之间可怕的暴力行为宣告结束。但另一方面，占领对多米尼加人的自尊心却是沉重的打击，它对民族尊严令人震惊的冒犯留下了创伤的疤痕。占领部队人员对平民百姓的愚蠢举动、侵犯行为乃至于暴虐行径带来更多的怨恨，尽管其他人，特别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人员，能够赢得多米尼加人的同情。

美国介入多米尼加糖业生产开始于本世纪最初十年时期。美国作为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在占领之前那六年中已经大大加强，何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德国的贸易已一落千丈（见表2）。美国在占领时期及占领以后对多米尼加糖业的渗透加速进行。南部沿海地区大片面积此时已在南里库港糖业公司及其他美国企业手中，占领当局采取了若干立法措施以扶植美国的势力，扩大这些公司的规模，和降低甚至取消对蔗糖的出口税。在1919—1920的丰收年份，19家蔗糖厂生产了大约20万吨蔗糖。无需费用昂贵的军队——以及同样代价高昂的革命——由于管理秩序井然，经济相当繁荣，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改善，所欠贷款自然也分期得到偿还。另一方面，实行占领的军政府本身由于借了几笔新贷款，而提高了国债

表2 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贸易伙伴

1910—1916年

302

年份	进出口额百分比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其他
出口额					
1910	70.60	19.30	6.67	1.30	2.13
1911	52.34	26.77	9.82	6.94	4.13
1912	58.74	14.32	7.53	10.04	9.37
1913	53.49	19.76	8.48	2.31	15.96
1914	80.96	7.73	2.72	1.76	6.83
1915	79.19	0.04	1.25	0.55	18.97
1916	80.88	—	1.34	0.49	17.29
进口额					
1910	59.75	17.27	3.36	11.44	8.18
1911	19.29	18.22	3.07	11.16	8.26
1912	62.06	19.81	2.74	8.76	6.63
1913	62.22	18.10	2.96	7.88	8.84
1914	66.17	13.79	2.40	8.43	9.21
1915	80.73	1.04	1.02	6.92	10.29
1916	87.13	—	1.30	4.18	7.44

资料来源：帕特里克·E·布赖恩《多米尼加共和国经济的改造，1870—1916年》（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7），第172页。

的规模。

303

在南方产甘蔗地区，占领军必须同被叫做“拦路强盗”(gavilleros）的武装团伙作斗争，他们游荡于这片人口稀少的地区，不分青红皂白到处劫掠，不怕武力交火。很难判断这些团伙只不过是非政治性的由来已久的游击传统的继续呢，还是由于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是某种民族主义思想。为了肃清他们活动的地区，农村居民最后被集中到少数几个城市。可是此时许多乡下居民早已自发地逃亡，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热中地产投机的投机商，后者于是又将土地转卖给渴求土地的甘蔗种植者。新组织起来的多米尼加警察部队在剿除“拦路强盗”的斗争中很活跃；这

支部队中的一位年青军官，就是未来的总统和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

最初，对占领的反抗很少来自上等阶层。商人们从政治安定加上公共开支的增加得到好处，知识分子大都乐于同机敏而又谨慎的总督纳普合作。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种情况起了很多变化。美国这时不再那么注意多米尼加事务；许多最优秀的军官被更换了；纳普本人也被远不如他灵活的总督斯诺登所接替。到这个十年之末，国际注意力集中于该国所处的困境。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宣传和外交运动；在美国，劳工领袖塞谬尔·冈珀斯表示兴趣与同情。被推翻后流亡古巴的前总统恩里克斯—卡瓦哈尔，要求有秩序地恢复他的国家的主权，并要求恢复他的总统职务。1919年，美国政府方面表示有意同他开始谈判如何结束占领。翌年，第一个宣称自己公开反对国家处于被占领地位的多米尼加组织“多米尼加民族联盟”问世。1921年，美国参议院下令调查所谓对“拦路强盗”活动地区的居民犯下的暴行；得出的报告证实了这种暴行。最后，1922年制订所谓休斯—佩纳多计划。军政府（它继续管理安全和关税）之外将成立一个“行政政府”。它将筹备选举，选举后结束占领。然而关税仍将由一名美国派任的官员管理，直至共和国的债务偿清为止。（意裔）甘蔗园主胡安·巴蒂斯塔·维奇尼担任临时总统，举行了选举，1924年9月18日最后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

304

总统职位此时落到奥拉西奥·巴斯克斯手中。他的竞争者费德里科·贝拉斯克斯成为副总统。贝拉斯克斯开始其政治生涯时曾是卡塞雷斯总统的亲密合作者，但其后组织起自己的一伙人马。1924年，巴斯克斯同美国订立一项新条约；这个条约在若干方面对1907年条约有所改进，而且还允许他借一千万美元的外债。这个条约引起激烈的争论，随后贝拉斯克斯在1926年辞去了他的副总统职务。与此同时，巴斯克斯政府则得益于美国政府对他乐善好施，得益于新扩大的行政机构，而且得益于20世纪20年

代中期特有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新的陆军（特鲁希略在这些年中成为它的司令官）要求在预算中分享杯羹，总统的众多政治同盟者和朋友（以及他们的朋友）也是如此；这些人必须得到满足，这位考迪略才能保持继续执政和保持安定。结果贪污腐化广泛流行，终于派系活动再次抬头。巴斯克斯通过对宪法颇为令人可疑的解释，早已把他的总统任期定为6年而不是4年，而他的拥护者还要求他应再任一期总统。这时，短暂的相对繁荣时期已经结束，反对巴斯克斯政府继续执政的抗议以圣地亚哥政客拉斐尔·埃斯特雷利亚·乌雷尼亚所领导的“公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示威运动和向首都的进军，加上特鲁希略决定不对反对派运动进行军事干涉，决定了巴斯克斯的命运。1930年3月2日他任命埃斯特雷利亚·乌雷尼亚为内政和公安部长以后辞职。埃斯特雷利亚·乌雷尼亚按照宪法继任总统，开始筹备下次普选。

由于巴斯克斯流亡在外，1930年5月16日的普选本来大概将由埃斯特雷利亚·乌雷尼亚和他的竞选伙伴贝拉斯克斯获胜。可是很快事情就明朗了，武装部队司令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决心自己参加政治竞赛充当总统候选人。他很快说服埃斯特雷利亚·乌雷尼亚当他的未来副总统。他们的候选资格得到匆匆组织起来的大杂烩“政党联盟”的支持。贝拉斯克斯突然退出，他成功地重新获得巴斯克斯旧日民族党若干领袖的支持，但是无望赢得选举，因为他所面对的，一方面是要求变革的无可辩驳的呼声，另一方面是他的对手们及其党羽发出的严重恫吓。1930年8月16日特鲁希略宣誓就任共和国总统。正象共和国创立后继之以30年左右的政治混乱终于导致乌利塞斯·厄罗的长期独裁统治那样，厄罗横死以后大约30年（常在混乱之中），多米尼加共和国落进一个新的强人手中，这次他执掌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此后保持对这个国家的控制直至1961年5月30日被刺杀那天为止。

305

厄罗政权目睹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从一个面向欧洲的烟草和优

质木材生产国转变成为一个盛产甘蔗和美国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厄罗想要削弱这种支配地位的最后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厄罗时期曾微弱无力地开始使行政部门和武装部队专业化。国内的基础设施被大大扩充以适应新经济任务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这个阶级中的某些成员把这位考迪略杀死。这个时期外债大量增加，外国债权人的权益要求同外国进行的干涉有密切联系。特鲁希略政权经历的是初期工业化，面向出口的农业部门进一步扩展和国内基础设施相应改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屈从于美国利益，然而也做了某些努力来减轻这种依赖。特鲁希略本人购买了如此之多的外国企业，从银行直到糖业公司都有，这种情况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外国的直接控制；他的相当严格的财政管理也起了这种作用。在特鲁希略独裁统治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级虽然得以致富，可是他们不但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控制权，而且不得不眼看着相当数量来自下等阶层的人得到政府方面经济和政治上的眷顾——这个政府尽管苛刻，如果没有一点民众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是不会执政那么长久的。这或许不足为怪，在1961年密谋杀害特鲁希略的人中间有1899年密谋杀害厄罗的那些人的亲属。

第 8 章

海地（约1870—1930年）

1902年临时总统布瓦龙·卡纳尔同英国驻太子港公使商谈警察对一名英国臣民使用暴力的案件时说，“海地不是一个文明国家”。① 卡纳尔是作为受过教育的、亲法国的、穆拉托人精英分子的一员说这番话的，这些精英分子通常看不起黑皮肤公民的广大群众，认为他们的文化野蛮而原始。

海地在1804年已是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上深刻分裂的折磨。虽然各色人种的海地人都认为他们击败法国殖民者是维护了非洲种族的权利，可是黑人和穆拉托人（黑白混血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新国家中时常冒头。大部分黑人是殖民地时期45万名奴隶的后裔，而穆拉托人家庭通常可以追溯到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被解放者或有色人种自由民集团。随着独立，一些过去的奴隶设法取得小块地产，特别是在北方，或是由于政府的授予或售予，或是由于在无主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而早期土地改革的总效果是加强了穆拉托人作为国内主要的土地所有主的地位。

18世纪时期，海地（Saint Domingue，圣多曼格）已是世界的主要甘蔗生产国，但是大庄园的分裂加上革命年月造成的破坏，导致甘蔗产量大幅度下降。咖啡实际上成了独立后海地的主要出口作物。F·N·热弗拉尔总统（1859—1867年）曾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努力增加棉花的生产，但是，随着世界市场价格的

① O·沃德罗普致兰斯多恩侯爵信，1902年12月15日，伦敦档案局，卷宗FO35/177。

308 跌落，棉花种植不再有利可图。海地农民主要种植供自用和在当地市场出售的作物。虽然后者的交易通常使用货币，19世纪70年代后期硬币极端缺少导致一种复杂的信贷制度发展起来。后来发行纸币并没有使局势缓和多少，因为一般人对这种货币缺乏信任。大部分制造品主要从美国、法国和英国进口，但是到20世纪初古巴和意大利业主的鞋厂已在国内立足（有一家商号每周产鞋多至1,500双）。也有一些制造肥皂、火柴之类东西的公司。进出口贸易主要由外国人控制，德国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世纪80年代初英国轮船最常光临海地各港口，然而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又是德国的航运公司。一位美国领事在1884年说，"就这个国家的商业、国内贸易和工业，以及宗教、教育和道德方面的进展而言，各阶层外国人的势力和优势地位十分明显无可争辩。"② 巴龙·德·瓦斯泰和其他较早时期的海地作家向他们的同胞提出过经济倚赖的危险警告并且极力主张走向自给自足的行动是有效的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在1870年以后时期，埃德蒙·保罗、路易·约瑟夫·让维耶和一些别的人要求发展可以供应国内需要和把产品输往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由当地人拥有的工业。可是没有做过较重要的努力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1870年的海地人口约有50万。国内的精英阶层由为数不多的家族组成；他们大部分是穆拉托人，他们的势力在首都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城市中。这个精英阶层有少数是黑人，他们在海地北部特别强大。可是一般来说肤色和阶级是一致的，所以富者往往是浅肤色的而贫者则往往是深肤色的；当时的许多政治斗争反映了这种社会和肤色的划分。在乡下有若干大的土地所有主也有一个309 重要的中等规模的农民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农忙季节雇用少数工人。大量的农村居民是贫困的，在他们拥有的或擅自占用的小块土地上干活。他们偶尔受雇于较大的庄园或者充当分

② J.M·兰斯顿"海地的贸易和商业"（1884年11月28日），"美国领事关于供职地区的商业、制造业等报告书"，第54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85），第361页。

成制佃农借以扩大自己的微薄收入。如果一个已婚男子未立遗嘱而死亡，只有合法子女可以继承他的土地。虽然如此，大部分农民为自己的非婚生子女作某些准备。总之他们大部分事实上不是结婚而是"相好"，常常同时同不止一个女人。有关继承的法律和习惯常导致地产分割；否则地产为共同拥有，作为统一的单位来经营。如果土地出售自然需经全体拥有者许可，这往往引起纠纷和旷日持久的法律争执。乡下的男男女女为自己家庭的衣食而奋斗，为不让债主上门而奋斗。男人们大部分穿着蓝色工作服在田间工作，而女商贩则在小市镇的商业中占统治地位。

在市镇中可以见到有一个中等阶层，范围包括专业人员以至小商贩和技术工人；这个阶层以下是非技术工人和仆人阶层。19世纪80年代时首都有一个"中央商行"和一个铸造车间以训练学习工艺技能的学徒。1879年体力劳动者每月工资1至1.5美元，大量移民工人（特别是来自牙买加和巴哈马）表明同邻近各岛比起来，条件还是比较优越。③ 人们普遍设想19世纪的海地是"与世隔绝的"，这种看法尚需斟酌。海地人，尤其是上等和中等阶层的人，旅游海外求学或作为流亡者，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国家不同阶层的外国人来到海地定居。

太子港这个时期人口大约3万人，它虽是海地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可是各地区的首府和一些其他城市有着名副其实的城市生活，当时的若干成功的政治运动是在各省发起的。其中的许多城市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它们通过定期的船运彼此保持接触；陆地交通由于山峦阻障常常是既缓慢又困难。除政府建筑物以外，大部分城市的房屋是木质建筑，特别容易着火。热雷米1881年四分之三毁于火灾，米拉戈阿纳在第二年遭到相似的命运，而1885年5月，莱凯也大部分夷为平地。这些火常是由居民中不满分子

310

---

③ 1875年海地有将近两千名英属西印度臣民。R·斯图尔特致格兰维尔伯爵函，1883年1月23日，伦敦档案局，卷宗FO35/118。

放起来的，偶尔也有政府拥护者放的，如1885年10月，萨洛蒙总统的人对首都的商业区纵火作为向精英阶层提出警告，不要参加正在南方闹事的穆拉托人叛乱。外国商人在这种火灾中遭受的损失常常导致要求赔偿和以外国干涉相威胁。海地的生活还受到黄热病、天花和疟疾时常爆发的威胁以及飓风和偶尔发生的地震的威胁。

此时的国民政府常常对于乡下只能保持软弱无力的控制；广大的乡下地区受半自治的军事首领的统治，他们得到被称作“卡科人”(cacos)或“皮凯人”(piguets)* 的农民非正规军的拥护。梅里西耶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首领，他控制着雅克梅勒城周围的山地地区有许多年。他是一名“博恩甘”(boungan—伏都教的巫师)，因之提高了他对手下人的控制地位。1896年他带着40名手下的人侵入雅克梅勒。入侵者纵情劫掠和从监狱释放囚犯之际，本防区司令官躲藏起来。几小时后梅里西耶撤往山地，防区司令从躲藏处出来，城市生活才恢复常态。同年晚些时候，由于伊波利特总统去世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梅里西耶再次占领雅克梅勒终于使自己成为这个防区的司令。

海地政治的军国主义作风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那时法国的总督总是一名军官。这个传统在革命的年月中得到加强，当时本地的领袖都是军官；这个传统继续到政治上独立的时代，当时过去领导革命斗争的那些将军成了国家的元首。特别对于黑人，军队是发迹起家取得政治权力唯一有效的途径，因此军国主义传统经常受到穆拉托人政客们的攻击。整个19世纪以迄于1913年，国家元首总是一名军官，然而他总是需要有文化的文职人员帮助管理国家。将军们面对行政的复杂情况时往往不知所措，于是总不乏追求私利的大批官吏揽过这些事情来办。这些人大部分来自

* “卡科人”系海地北方的农民雇佣兵，“皮凯人”系海地南方的农民雇佣兵。——译者

穆拉托人精英阶层，他们常发起推一名黑人将军作总统候选人，期待着他做前台人物，背后由他们操纵；这种做法被人们称为“替身政治”(la politique de doublure)。

自西尔万·萨纳弗总统于1869年下台至1915年美国入侵，政治结盟决定于肤色、地区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对个人和家族的忠诚或反感这些因素。这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党的界线是很不固定的。社会和经济的阶级因素在当时决定党派归宿中不具有主要意义，因为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偶尔，农民在政治上很活跃，如“卡科人”和“皮凯人”的叛乱，然而一般效果限于讨厌的政府下台；参加叛乱的那些人很少对继任政府的政策有任何重要影响。可是19世纪70年代，在尼萨热·萨热(1870—1874年)、米歇尔·多曼格(1874—1876年)和布瓦龙·卡纳尔(1876—1879年)诸总统执政时期，海地出现两个截然不同、自身团结一致的政党——J.P.布瓦耶·巴泽莱领导的自由党和德梅斯瓦·德洛姆领导的民族党。自由党的领导人员中穆拉托人占有优势。可是最著名的两位领导人埃德蒙·保罗和约瑟夫·安特诺尔·菲尔曼却是黑人。民族党是由反对传统的穆拉托精英分子的各个利益集团联合组成，依靠路易·艾蒂安·利西于·费利西泰·萨洛蒙为它的赞助人。它的成员和领导人员大都是黑人；它有一个由路易·约瑟夫、让维耶领导的重要的黑人主义理论家集团。然而该党曾得到著名的穆拉托人如弗雷德里克·马塞兰和卡利斯特纳·富沙尔等的拥护。在卡纳尔政权最后几个月里，自由党队伍发生分裂，民族党遂得以赢得1879年的选举，于是把萨洛蒙从流亡中召回，成为共和国的总统(1879—1888年)。

萨洛蒙是一个有文化的海地黑人，出身于南部有钱人家，他自1843—1847年革命运动以来一直同黑人主义思潮有联系，在革命运动中他和他的家族曾领导大湾地区的皮凯人的起义。在他执政时期，用法国资本创办了“国民银行”，并且通过一项农业法

把国家土地的小块地皮分配给愿意种植出口作物的农户。这项法律还使得外资公司便于进一步进入海地——授予他们国民身分的权利，包括可以拥有土地。萨洛蒙的最热烈拥护者之一写道，“多亏他的政府，法国资本开始渗透进海地”④。1883年，萨洛蒙面临布瓦耶·巴泽莱率领的一伙自由党人对米拉戈阿纳的入侵，并且面临一些南方城市发生的叛乱。这些虽被成功地扑灭下去，然而萨洛蒙在寻求美国或法国对海地的保护，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自己安全的关切。可是最终使他覆灭的却是北方黑人的联盟。1888年萨洛蒙垮台导致法国人支持的F·D·莱吉蒂姆和美国人支持的弗洛维尔·伊波利特之间发生一场争夺继承的斗争。后者最后取得胜利，他六年在职期间（1889—1896年）的特点是比较繁荣和实施一项公共工程计划。美国的割让莫勒圣尼古拉作为海军基地的一再要求被外交部长安特诺尔·菲尔曼巧妙地推到一边去。伊波利特的继任者是T·A·西蒙·桑（1896—1902年）。桑下台引起了拥护菲尔曼的人与拥护八旬将军诺尔·亚历克西的人之间一场短暂的内战，最后亚历克西获得总统职位（1902—1908年）。在这场斗争中出现了哈默顿·基利克海军将军（菲尔曼派）的著名行动，他截获一艘为诺尔走私军火的德国船只以后，自己与海地旗舰同归于尽而不肯向派来报复的德国炮艇屈服。新总统的青年穆拉托人拥护者一般是赞成这个国家步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离开传统的法国关系。诺尔去世由安托万·西蒙继任（1908—1911年）。他声称要做一个民族党传统的黑人主义者，可是许多起初支持他的人感到幻想破灭，特别是在他签订麦克唐纳契约（见下文）以后，于是在1911年他被推翻。

1870年以后时期，海地的政治不安定程度常被人们讲得过头。在1870—1911年之间时期有九届政府，平均寿命为四年半，这大大超过邻近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平均时间长度。例如，同一

---

④ L·J·让维耶，“违背民族利益的人”（巴黎，1884），第46页。

时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在二十二届政府之下遭受苦难。可是随着西蒙在1911年下台开始出现四年的社会动乱和严重的政治不安定，有六位总统走马灯似地一个接着一个，最终导致美国入侵，被占领达19年。

这个时期，群众中流行的宗教是伏都教，事实上今天还是那样。这种信仰是某些西非宗教的发展，其中掺有基督教的成分。这个宗教关心的是崇拜神（Bon Dieu）和精灵（loas）；它采取的方式常是一名信徒被一个精灵，例如马精（chewal），附在身上。人们向精灵贡献祭品，特别是食物或酒类。每座庙宇（hounfort）有自主权，由一名巫师（houngan）或一名女巫（mambo）主持。每个精灵各有其具体掌管的事。例如埃聚莉·弗雷达（Erzulie Fréda）是生殖的精灵，阿古厄（Agoué）是水的精灵等等。正如海地人通常不直接去找总统而是去找总统的一名内阁部长，信徒们直接关心的是适当的精灵。在海地的历史发展中，许多精灵变得同基督教的圣徒等同起来；埃聚莉相当于圣玛丽，奥古恩（Ogoun）相当于圣雅各（大雅各），丹巴拉（Damballah）相当于圣巴特里克。伏都教是殖民地时代圣多曼格的奴隶藉以保存自己非洲文化的主要手段，它还为不同种植园的奴隶提供团结和交往的手段。1804年宣布独立以后，历届海地政府的官方态度（不论是黑人还是穆拉托人）都是对这种信仰抱有敌意，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来镇压它。可是它继续兴旺。有几届政府，例如福斯坦·苏卢克的政府（1847—1859年）和西尔万·萨纳弗的政府（1867—1869年）显然对伏都教比较宽容，而这却是穆拉托人精英分子中间忧虑不安的原因。布瓦耶政府（1818—1843年）曾试图同梵蒂冈达成政教协议以便使海地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情况正常化，但这些努力都受到挫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博布伦·阿杜安和J·B·安吉纳等反教权者的影响。可是热弗拉尔的政府在1860年同罗马签订一项政教协议，自此以后，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海地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起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天主教会是传播法国语言和欧洲文化的至关重要的工具，法国政府也是这样看待它。19世纪60年代，许多教团来到海地并开办学校，其中有基督徒教导兄弟会和克吕尼圣约瑟姊妹会。克里斯托夫政府（1806—1820年）和佩蒂翁政府（1807—1818年）314 已经兴办若干公立中学和小学，后来的各届政府又兴办了一些；到19世纪70年代海地也有若干新教教会的学校。然而罗马天主教教会不久在国内成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天主教教会往往同穆拉托人精英分子交往密切，加强这个集团的统治地位。结果，许多黑人精英分子成了反教权者，倾向于新教教会或共济会。例如，萨洛蒙总统就是共济会教团的大保护人，他的内阁全体都是共济会成员。可是，应当强调指出，各色的精英分子都公开反对伏都教，虽然其中有些人无疑是在秘密地信奉它。地位已经确立的教会对待伏都教的态度，从强有力的反对以至采取近乎调和的政策不等，后者试图使崇拜精灵的人相信这些精灵应当认为就是基督教的圣徒。

黑人精英分子政治家奉行的反教权主义和他们所控制的民族党奉行的反教权主义表现为一系列的政教危机。萨纳弗总统在其两年任职期间同僧侣统治集团进行连续的战斗；萨洛蒙政府对教会的权力心怀疑虑。托马·马迪乌（萨洛蒙内阁的一名穆拉托人部长）向罗马天主教教会发出警告称它是国中之国，总统本人则称赞各新教教会努力培养本地的牧师（含蓄地与罗马天主教徒形成对照）。当时主要的新教团体中有“使徒正教会”（安立甘宗），领导人是雅克·霍利主教，他是在19世纪60年代移民到海地的美国黑人；这个教会有十名教士，教徒约有一千人。循道宗（它设在太子港的书院有120名学生）在南部城市热雷米特别强大，19世纪后半叶在那里产生一小批新教徒精英分子。浸礼会和非洲循道宗的传教团在这个时期也很活跃。新教和共济会的反教权主义在L·J·让维耶、E·平科姆贝和L·普罗斯特领导的所谓“超级国民”的活动和声明中特别明显；他们的 的《观 察》杂 志 和《先

锋》杂志，恶毒攻击罗马天主教教会僧侣统治集团，说他们推行种族主义、精英分子统治论和反对爱国主义。

美国占领以前时期的海地，尽管有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国内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中间思想生活却朝气蓬勃。首都和各省城市里报纸杂志十分丰富。许多作家挺身而出作黑色人种的辩护人还击欧洲和北美报刊评论撰述者的种族主义宣传。这个时期的海地人提出早年作家们的主张（包括巴龙·德·瓦斯泰、C·S·米尔森特和费利克斯·达富尔）；这场辩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中有安特诺尔·菲尔曼、汉尼巴尔·普赖斯、L·J·让维耶、J·朱斯坦、J·德沃、J·奥古斯特、J·N·莱热和贝尼托·西尔万。[5] 这些人宣称人类各种族平等，反对人种间有任何重要差别。他们认为海地是这种平等的象征和证明，因此往往把自己的国家描绘成某种美好的图画。然而他们的作品却为连绵不断的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论战作出重要贡献。 315

这个时期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倾向于采取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表达方式，思索着外国的主题。同刊行于19世纪80年代的文学杂志《圆周》有联系的作家们则与他们形成明显对比，重申需要有更早几代作家们所曾阐明的“本地文学”。包括费尔南·伊塔、朱斯坦·莱里松和弗雷德里克·马塞兰在内的小说家和埃塞·维莱尔、夏尔·莫拉维亚以及乔治·西尔万等诗人强调一个迥异于其法国母体的独特的海地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这时期精英分子中间有些其他重要运动值得一提。首先，由L·J·马塞兰、L·C·莱里松和年青的斯泰尼奥·樊尚（一位未来总统，1930—1941年）为首的一个集团，于1892年创立一所“自由职业学校”，

⑤ 对这些作家的更详细讨论见戴维·尼科尔斯著“从德萨利纳到杜瓦利埃：海地的人种、肤色与民族独立”（剑桥，1979），第126页以下。

⑤ 戴维·尼古拉斯著《从德萨兰到杜瓦利埃：海地的种族、肤色和民族独立》（剑桥，1979）一书（第126以下各页）中更充分地谈到了这些作家。

其宗旨是培养工人阶级青年以有用的技能，从而鼓励中等阶级的发展，以此来补充早先提到过的现有的机构；人们广泛认为中等阶级的发展有助于国内的政治安定。《劳动报》传播了这一集团的思想，用“游手好闲万恶之源”作为刊头词。另一个有影响的运动是“立法协会”，它在同年创立，对海地的法律与社会环境关系进行讨论并在必要时提出立法改革的建议。这个协会考虑的主要题目之一是：追溯到最初的独立时代，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宪法规定是否应予废除。可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不限于这个协会的成员。有的人主张有了外国资本流入海地才能获得经济发展，而这项立法不改变就不会有外国资本的流入。一些反对允许外国拥有地产权的人则争辩说，海地应当依靠自己的资力，保持对自己经济的控制，即使这意味着较慢的发展速度。另外的人则主张，外国投资虽是必要，却可以无需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弄到手。⑥可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萨洛蒙政府1883年所采取的立法有力地破坏了某些情况下的宪法规定。在外国人土地所有权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跨党派和超肤色界限的。

20世纪初年，海地发生一场热烈的论战，争论的是：人民的心理究竟主要是拉丁的还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两种文化传统究竟哪一个应是这个国家应当遵循的模式。传统的精英阶层一般是亲法的。在安特诺尔·菲尔曼、乔治·西尔万和当泰斯·贝勒加德领导下，这个集团坚持海地必须保持并加强它同法国的文化和政治联系；他们为古典文学研究辩护，认为是国民教育的基础。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在诺尔·亚历克西的政府中有强大的代表，其中有F·马塞兰、L·博尔诺(另一位未来的总统，1922—1930年）和克莱芒·马格卢瓦尔（“晨报”主笔）；他们赞成新的

---

⑥ 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戴维·尼科尔斯著“经济发展与政治自主：海地的经验”（蒙特利尔，1974），第14页以下。

重点，强调技术学科，要同美国、同德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此，海地人在教育和文化之类问题的意见分歧是同外国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有关。

到本世纪初英国势力已经减弱。例如，1906年海地只有6名英国人（虽然英国属地的臣民仍有400—500人主要是牙买加人、巴哈马人和叙利亚—黎巴嫩人）。商业部门很大程度上为德国人所控制，他们人数超过美国人约为2比1；德国居民甚至在一些城市里充当美国的副领事。⑦ 在20世纪头十年中，法国卷入海地的程度下降了，国民银行的控制权于1910—1911年由法国人手中落进美国花旗银行手中。美国公司在这个国家越来越活跃——组织水源供应，开采铁矿和修建铁路。1905年两名美国人得到一项租借权从安什到戈纳夫修一条铁路；而1910年签订的臭名远扬的麦克唐纳契约给予一家美国公司修建一条铁路并开发沿线两旁土地的权利。海地的民族主义者，包括P•F•弗雷德里克和罗萨尔沃•博博，谴责这个契约进一步破坏宪法中禁止外国人所有权的规定。 317

19世纪最后几年来了一大批叙利亚—黎巴嫩的商人，他们善于经商，不久就在零售业的某些部门中占有支配地位，对海地的商人不利。随着20世纪最初十年向前进展，这些叙利亚—黎巴嫩商人也进入较大规模的商业经营，他们的活动引起广泛的敌意，甚至出现一个报纸名叫《反对叙利亚人》！当局制定了法规或是引用旧的法规来约束这些非本国国民，而他们要求保护的行动导致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代表他们进行干涉。除了这种原因引起的入侵以外，海地的对立的政治集团继续寻求外国的支持来反对他们的政敌，而外国侨民，特别是德侨则越来越积极地起着

⑦ A·G·范西塔特《1906年度关于海地共和国的总报告》，伦敦档案局卷宗FO371/266，和J·B·特雷斯1906年2月16日致助理国务卿函，见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务院，缩微胶卷T346，第10卷。

煽动不和和资助革命的作用。这个时期许多敌对的政党又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利益有联系。

1915年7月28日美国入侵并占领海地可以用一系列互相关连的因素加以解释。首先应当看到这是美国在战略上控制加勒比海的总计划的一部分。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一直有一些外国尽力想在海地获得立足之地，或是在海地的西北部莫勒圣尼古拉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或是把托尔蒂岛弄到手。前面说过，美国政府本身作出艰苦努力在1889年把莫勒弄到手。随着修筑巴拿马运河，美国决心维持对这个地区的军事控制。1903年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虽然华盛顿仍然非常关心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在海地获得军事基地。国务院特别担心德国在318 海地势力的增长，害怕有朝一日德国在欧洲取得胜利，德国皇帝会设法在海地建立其加勒比海的立足点。这种担忧得到美国国内有资产在海地的某些商界和银行界集团的支持。除了压倒一切地关心在战略上控制加勒比海以外，美国政府还热衷于在海地创造一种有利于贷款的还本付息和有利于美国公司进行投资的局面。然而，如果说入侵和占领主要是为了保卫美国的经济利益，那是错误的。1915年美国在海地的实际投资只有400万美元。美国政府无疑地是希望这个投资规模将会增长而美国的资金将代替欧洲的资金，从而使各外国政府失去对海地事务进行干涉的理由；这就是人们叫做“美元外交”的幕后原则。汉斯·施密特在其对美国占领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与美帝国主义在加勒比海的全面推进有关，海地在战略上至关紧要，在经济上则无足轻重。”⑧除这些战略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外，还有自威尔逊至卡特时期成为民主党外交政策特点的愚昧错误的利他主义现象。占领常被说成有道

⑧ 汉斯·施密特《美国对海地的占领，1915—1934年》（新不伦瑞克，新泽西州，1971），第54页。当然对战略控制总的关心其本身可以主要用经济因素来解释，但这是截然不同的问题。

理，因为是在帮助一个贫困的邻国使之自立，或是（并非那么乐善好施）由于一个国家的本地人已经证明没有能力治理自己所以接管了它的管理权。（我们已经谈过，入侵之前那几年是少见的社会动乱和政治不安定的年月，在这些年月中可以说海地的精英分子已经最后失去控制群众抗议运动的能力，表明自己无力治理这个国家。）美国人到达海地后不久就采取步骤为占领装饰合法的门面和物色一位傀儡总统。许多重要的海地政治家拒绝这个不光彩的职务，但参议院主席菲利普·叙德尔·达蒂格纳韦接受了这个职位一直当到1922年。任内签订了一项条约并在1918年实行新宪法。

美国政府在海地的政策首先关心的是在全国推行法律和秩序，它借助于一支宪兵队设法做到这一点（这支宪兵队后来成为海地警卫队）。宪兵队配备的是海地人，可是所有的上级军官都是美国人。1915年的入侵实际受到许多海地人的欢迎，特别是精英分子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外国侨民的欢迎。可是一般的海地人则以自己111年的独立为荣，他们普遍的反应则是愠怒不满。1915年虽有零星的军事反抗，宪兵队的真正考验发生在1917年夏尔马涅·佩拉尔特率领卡科人部队向入侵者发出挑战。海军陆战队增援部队从美国赶来，战斗延续好几个月。1919年佩拉尔特战死，叛乱被扑灭。 319

海地人的反抗以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运动方式继续进行。那些起初曾同美国人合作的人有的也加入反抗（包括当泰斯·贝勒加德和斯泰尼奥·樊尚）。占领在有些方面疏远了精英阶层。首先，许多美国官员的种族主义态度简直不加掩饰。美国驻海地的一名高级官员沃勒上校写道，"这些人是黑鬼，尽管受过教育、文质彬彬有一层薄薄的粉饰"。"如果诺福克和朴次茅斯的人们看见我对这些黑家伙卑躬屈节他们会怎么说呢"。⑨ 其次，把重点放

⑨ 前引第79页。

在技术教育而忽视过去的古典文学教学大纲为精英阶层所不满。大量金钱不但用于修筑公路，提供公共卫生设施和普遍改进基础设施，而且用于技术部门，作为培养博士、教师、技术员和农艺师的政策的一部分，相信一个强大的中等阶层将“成为国家的骨干，成功地保证政治的稳定。”⑩ 此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历史性宪法条款在1918年的宪法中被删去，而一些美国公司则利用了这个情况。农民们从他们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被赶走，不满情绪到处蔓延。连达蒂格纳韦总统也开始使美国官员的日子不好过；1922年他为路易·博尔诺所代替，美国人认为后者更为可靠。

同日益增长的要求美国撤走的民族主义要求有密切关连的是 320 海地知识分子中间的民族学运动和文学运动。民族学运动的起源溯始于J·C·多森维尔1907—1908年的作品。在发表于《晨报》及其它地方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森维尔断言海地人的种族成份及文化传统基本上是非洲人，这一实情一直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所忽视或加以隐瞒，他们的生活方式受欧洲价值标准的支配。正如19世纪初年的德国人在拿破仑入侵他们国土之后引起对自己的民俗进行研究，占领时期的海地人这时也开始钻研自己种族的过去以便为爱国主义找到理由和依据。1928年让·普赖斯·马尔斯发表他的题为《叔叔的传说》的研究海地民俗的著名作品。他在书中颇为详细地描述了普通人的社会风俗、民间传说和宗教习惯，批评他的知识分子同伴未能承认和认识这种通俗文化的非洲根源。他特别要求对伏都教采取更为同情的接近态度，最后恳求读者们“不要再看不起我们祖先的遗产”。⑪ 该书加上多森维尔的作品对许多出身中等阶层的青年黑人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有路易·迪亚夸、洛里默·德尼和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等黑人

⑩ “美国驻海地高级专员1928年报告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29），第7页。
⑪ 让·普赖斯·马尔斯《叔叔的传说》第2版（纽约，1954），第236页。

主义的格里奥特集团的创始人。⑫欧洲人类学家方面新产生的对非洲的兴趣，加上美国方面与兰斯顿·休斯、康蒂·卡伦和克劳德·麦凯这些人物有关的所谓哈莱姆文艺复兴*加强着民族学运动的影响。

这个时期海地的文学复兴也同民族主义有密切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三份杂志——《新圆周》、《突破》和《土著评论》。这场运动的最著名作家是雅克·罗曼，但也包括卡尔·布鲁阿尔、埃米利·鲁梅尔、菲利普·托比·马塞兰、诺迈尔·西尔万、理查德·萨纳弗、达尼埃尔·厄尔特卢和马克斯·于迪库尔。这些人大都出身于精英阶层穆拉托人家庭，但他们厌恶他们祖先的过分亲法，对美国占领他们的国家感到愤慨。布鲁阿尔和罗曼尤其受民族学运动的影响，他们的诗沉思着海地人民的非洲根源，表现出强烈的民众主义倾向。罗曼写过关于"通向几内亚的缓慢道路"，谈的是海地神话故事中关于通往非洲的大西洋阴间通道，灵魂将在死时走过这条道路。在两首著名诗篇中，布鲁阿尔将世故而欧化的精英阶层的"我们"同大厦文杜的农民大众的"你们"作出对比。 321

占领时期的文学表明海地人的种族思想有了真正的转变。19世纪的作家们肯定为非洲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为自己时代的非洲辩护使之不受无知的欧洲报刊评论撰写人的指责，但他们基本上认为，人不分种族都是平等的，而且根本

---

⑫ 格里奥特（Griots）集团的取名来自一种传说的非洲制度：格里奥特(griots)是部落的诗人、讲故事者和巫师，他使部落的习惯、信仰和神话故事得以留传不朽。关于格里奥特集团，参看尼古拉斯《从德萨兰到杜瓦利埃》第167—172页。

* 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vival），又称黑人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指20世纪20年代到经济危机爆发这十年间美国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的黑人作家发动的一种文学运动。运动提高了黑人文学艺术的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对促进黑人文化事业提高黑人民族自尊心有深远影响。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之一，被誉为"哈莱姆的桂冠诗人"。——译者

是一样的。此外，他们承认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欧洲模式是海地人应当仿效的。然而，占领时期有许多作家则认为，种族差别是显著的，他们之中有的甚至于认为这种差别根源于生物学因素。⑬ 这在个时期海地形成的思想有似于20世纪30年代初同艾梅·塞泽尔（来自马提尼克岛）、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来自塞内加尔）和莱昂、达马斯（来自圭亚那）这些人物有关的在巴黎黑人学生中间开始的“黑人运动”。⑭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运动已经使得不同阶层和不同肤色的海地人团结起来决心结束美国的占领。路易·博尔诺总统和他身边的那一伙人发现自己实际上已同国民生活脱节而完全依赖美国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民族主义领袖常被投进牢狱，然而运动继续发展。1929年，学生们发起的抗议蔓延全国，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主张美国撤出。当局宣布了紧急状态，在莱凯地区的农民举行游行的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开枪，打死打伤好几十人。为这些事态及其引起的世界舆论感到烦恼，胡佛总统成立了一个以前菲律宾总督W·卡梅伦·福布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到达海地时欢迎它的是要求美国撤出的敌意的示威游行。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经过一个将警卫队的军官团迅速实现海地人化以后结束占领状态。博尔诺统治时期于1930年宣告结束，在一位临时总统执政几个月后举行选举，民族主义候选人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精明的穆拉托人政治家斯泰尼奥·樊尚当选总统；此后整个30年代他一直当政。1934年，美国新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开始了所谓的“睦邻政策”，于是在一万名海地人观众的欢呼声中降下了星条旗。占领已经达到它的目的，继续军事存在看来既不明智又代价太高。

⑬ 参看戴维·尼科尔斯《海地的生物学与政治》，载《种族》第13卷（1971），第201—214页。

⑭ 利利安·凯斯特洛特，《法语黑人作家：一种文学的诞生》（第3版，布鲁塞尔，1965）。

美国占领海地（1915—1935年）时长期效益不多。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改进，已经破损塌坏。外国公司发现海地不如它们原来期望的那么吸引人，有几家从这个国家撤走了。穆拉托人精英分子的当选和军人脱离政治也只是昙花一现。大多数海地人住在乡下在那里劳动，他们的生活通常依然没有变化。然而占领的确加速黑人中等阶级的成长，也加速同自前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黑人主义一脉相承的黑人意识的发展，于是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崛起铺平道路。交通改善以及占领时期对卡科人和皮凯人两个集团解除武装的结果，使首都的权力得到增强，各省城市的地位下降，于是自此以后重要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通常集中在太子港。尽管后来公路系统损坏，占领时期结束以后的海地这个特点继续存在。同美国的商业联系继续下去，虽然海地经济一直不如其他加勒比海岛屿的经济那样倚靠对外贸易；看来，甘于贫困好象是一种求得经济相对独立的途径！总的经济结构没有受到占领的影响。咖啡仍是主要出口品，虽然所占总出口额的比例由于棉花和蔗糖业的复兴而下降。农业技术有了边际改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设在达米安的农业学校和全国各地许多试验站所干的工作。为改变农民"懒懒散散、得过日过"的生活进行了努力；一位美国官员说，如果他们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他们必须有……一套新的要求"。[15] 一般地说，性格谨慎保守的农村居民抵制这种布道式的努力。占领没有造成制造业或矿业的重要发展。最后，整个占领时期，法国文化传统在精英阶层继续存在；许多民族主义者面对新的美帝国主义顽强地坚持与法国的联系，极象今日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深情地看待更早的殖民地时代的语言和文化那样。法国政府在不至于同美国人疏远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扶植这种绵延的传统。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教士是它的主要代理人，被法国驻太子港公使认为是"我们政治宣

323

⑮ A·C·米尔斯波，《我们的海地问题》，载《外交季刊》第7卷（1929）第560页。

传工作的珍贵的合作者"。[10]

因此，1930年的海地同1870年的海地没有很大差别。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总数达到240万人左右。城市规模扩大了，特别是太子港，它到1930年居民已超过10万人。然而，生活在乡下的人大大超过90%，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是自己家庭成员拥有的土地上的劳动者，或是分成农和打零工的人。成千上万的海地人移民去古巴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或是为期数年或是在甘蔗收获季节。海地堪称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因为大部分农村居民（或是个人或是共同）拥有或控制一些土地，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供当地消费的作物，常常连带着种植咖啡以供出口。没有像许多加勒比海其他岛屿到1930年时已存在的那样庞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常常不明确，而美国占领时期当局为完成一项巨大的调查所作的努力成了一场空。对土地更密集的耕作和不断砍伐木材以供出口和国内使用，导致土壤侵蚀日益严重。尽管中等阶级大大加强了它的地位，以穆拉托人为主的精英阶层同其他人民之间仍然隔着深深的鸿沟。19世纪末叶曾一度是黑人占优势的军队，这时经过重新组建被剥夺了政治作用。国家的高级职位主要由精英阶层的穆拉托人占据，这导致特别是黑人中等阶级方面日益增长的不满。埃利·莱斯科总统在职期间(1941—1946年)，穆拉托人声势显赫达到极点，但自从他于1946年1月被推翻以后，海地政权便落入黑人政治家手中，终于导致杜瓦利埃王朝的政权。然而穆拉托人精英阶层保留着大部分经济权力和社会地324 位。尽管经过半个世纪的黑人运动，即便是出身于黑人中等阶级大富不断的人家的海地人也喜欢他们的子女同浅肤色的配偶结婚。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运动作家斯泰尼奥·樊尚询问道，"他们中间又有谁曾经要求过真正去苏丹或刚果的什么地方同我们的

[10] L·阿热尔公使，1921年6月21日函，"外交部档案"，巴黎，美洲政治函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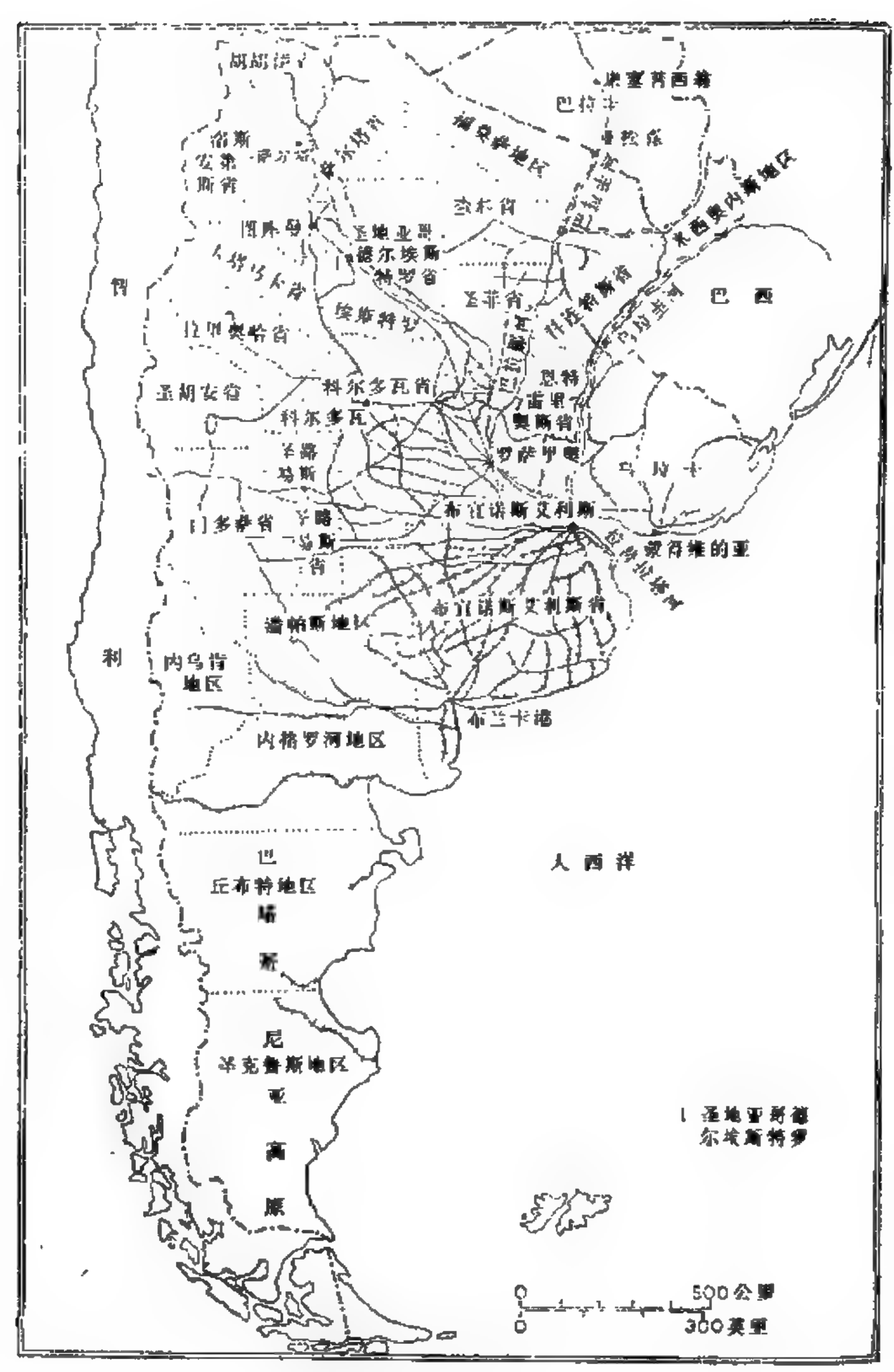
曼丁哥人或班图人的远祖进行心灵的交流？”⑰实际上，“文明”继续意味着欧洲。

1918—1940年，海地，第15页。

⑰ S·樊尚著《树立里程碑》（太子港，1939）第1卷第153页。

第　三　编

拉普拉塔河地区各国



拉普拉塔河地区略图

第 9 章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

（约1870—1914）*

19世纪70年代到拉普拉塔河地区旅行的人，首先对那辽阔的河口，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后，对两岸低矮简陋的房屋，都会产生深刻印象。进入内陆后，那地势低平、广袤无垠的土地，更会使他惊讶不已。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树木，给人以强烈的荒凉感，眼前只会偶而出现少数牛群，一头鸵鸟或其他当地动物。当时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局限在拉普拉塔和巴拉那河口沿海一带以及乌拉圭河可以通航的南部河段。由于木材短缺，距离太远，不易在内地建立永久性居民点，因为愿意定居的人必须从遥远的港口或城市运去建筑材料。除巴拉那河、乌拉圭河部分河段以及内格罗河（它流经的地域当时还被印第安人占据）外，阿根廷的河流都不通航，铁路刚开始兴建。而且，印第安人还控制着距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菲两省居民区不远的所谓“荒漠地带”，进行袭击是司空见惯的事。除殖民地时期就已成为行政中心的各省省会外，内地没有星罗棋布的城镇网络，农村也人烟稀少。然而，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利于安家落户和利用土地的情况，气候温和却是个有利因素。条件虽然恶劣，比欧洲某些地区还是强一些。

---

* 本章由戴维·布鲁克肖博士从西班牙文译成英文，译文经编者校订；在定稿过程中，曾得到科林·刘易斯博士的帮助，编者仅向他表示谢意。

328 19世纪上半叶，在已经确立居民点的地区——即西北部以及使它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毗连的沿河及沿海走廊，主要经济活动是不需要大量劳力和资本的养牛业。人们生产皮张和牛肉干输往国外，生产肉类供应国内消费。并不是没有农业，但由于运费太贵，农业活动没有超越城市附近地区，产品就在当地销售。陆路运费昂贵还意味着，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进口小麦和面粉更加方便。

在殖民地时期，上秘鲁是经济生活中心，一条连接波托西矿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通道穿越萨尔塔、图库曼、科尔多瓦；到19世纪上半叶，形成了另一条经济轴线，它的基地先是在所谓阿根廷的"美索不达米亚"（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两省），后来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那里发展起养牛业，利用纵横交错的河道运出产品。此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要求扩展边界，向西面和南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圣菲以及现在的拉潘帕省内寻找新的土地。

当然不应该设想19世纪70年代以前没有发生过一点变化。皮革在工业国家找到了市场，贸易虽因封锁、战争等等而起伏不定，但还是有了明显扩大。到40年代，除皮张和牛肉干外，肥脂和牛羊油开始加入出口产品行列。此外，20年代就已开始发展养羊业，到40年代，未经清洗的羊毛成为重要出口产品。1822年，阿根廷的出口额达到500万银比索，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40年代，虽然不同年度变化较大。40年代末，出口额增加到700万。1860年后，出口出现另一次飞跃，达1,400万；又经过10年，到1870年，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银比索。①阿根廷的出口额之所以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20年代开始下跌的国际市场价格，40年代后期以后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是因为肥脂和牛羊油，尤其是羊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羊毛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1837年为

① 弗朗西斯科·拉齐那著《阿根廷的对外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

10.8%，1848年提高到12.5%，1859年达到33.7%。②

羊毛生产和出口的扩大，是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以及美国对羊毛的需求不断增加的结果。羊毛生产要求集约地使用土地、劳力和资本。为了更好地看管羊群，必须把劳力迁至农村，也就必须改善交通设施和内地安全条件。此外，从1846年到1884年，羊的存栏数已由2,300万头增加到7,000万头，牛已由1,000万头增加到2,300万头，牲畜（尤其是羊）的全面增多，导至要求更多土地。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大片大片的土地还在"边界"以外未加利用，人口稀少，铁路建设刚刚起步，港口设备不足，资金短缺。

生产诸要素

土　　地

1870—1914年期间，阿根廷经济的年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③许多作者认为，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国际贸易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把美洲和大洋洲两个新大陆卷进了世界商业活动的主流。他们还强调，海运费用降低是得以开辟贸易新通道的决定性因素。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在各大洲之间转移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贸易的增长和出现某种国际分工。以上概述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反映出一个历史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内容，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一

② 乔纳森·布朗著《1776—1860年阿根廷社会与经济史》（剑桥，1979）。请同时参阅图略·霍尔珀林·唐伊著《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畜牧业发展》，载《经济发展》第3期（1963年4—9月）。关于1870年以前阿根廷一般情况，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5章，林奇的文章。

③ 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文集》（纽黑文，1970年）第3页。

些情况不太清楚。当时必定面临无数障碍和困难；就供应国而言，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才能对国际上实际或潜在的需求增长作出充分反应。迄今为止，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与消费初级产品的主要国家的需求增长有关的问题，而对生产初级产品的主要国家调整供应方面的研究则还不够深入。

生产者必须调整生产，增加那些具有最大比较利益的商品的产量。对阿根廷来说，就是谷物，后来是肉类。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开发尚未利用的丰富资源。阿根廷有的是土地，但大片大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印第安部落在那里游荡，无人定居。此外，垦殖一块土地，先决条件是需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把定居移民送往偏僻地区，把产品从那里运到市场。这个过程是何时和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无法简单地列出一张年表，但兼并大片土地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到70年代，有一点已越来越明显：必须扩展边界，来安置不断扩大的羊群，重新安顿已把上等土地让给羊群的“本地土种”（Criollo）牛。牲畜增多导致过度放牧，使用时间最久的土地开始出现水土流失。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这是罕见的现象。当时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至少70年代和80年代以前是这样），无需为他们寻找空闲土地，问题是要为越来越多的存栏牛寻找新的牧场。但非常奇怪的是，70年代牛的头数增加并不是因为价格机制造成国际需求显著增长，而是由于另外一种现象。70年代中期以后，皮张、羊毛等出口农产品跌价，饲养业收益下降，只能靠扩大生产规模加以弥补，即通过以较低成本增加产量的办法来获利。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花少量钱甚至不花钱兼并新的土地，稍微追加一点成本来增加牲畜头数（资本货），扩大产量（羊毛或皮张），提高收益。饲养业有一个特点，它既生产消费品，又生产资本。牧场越大，就能饲养和繁殖越多的牲畜，增加资本货。因此，兼并新的土地肯定可以取得以少量成本增加牲畜头数，扩大生产，从而弥补跌价造成的损失，使养牛业有利可图的

效果。由此可见，扩大饲养量并不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是由于取得了新土地，为了降低成本，以便保持饲养业的经济活力。

的确，前一个时期经济活动的增多使扩大领土成为可能，使军事占领新领土成为可能。因为造了铁路，人们才能更快地到达原来的边界；因为有了电报，胡利奥·A·罗加将军才可能在1879—1880年进行讨伐印第安人的远征。这些都是征服荒漠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开拓者、种植业就跟着来到了新地区。相反，到1881年，越过1876年印第安人边界新殖民的地带几乎全部用于养牛。从事种植业的居民比例很小。只是到了后来，在铺设了铁路的地方，种植业才开始扩大，谷物的边界才越过原来养牛的边界。80年代初期，"征服荒漠"后兼并的土地已达3,000万公顷（大约800万公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500万公顷在圣菲省，200万公顷在科尔多瓦省，另外1,400万公顷在整个拉潘帕地区），但铁路还没有铺设到那些地区。

与此相对照，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的扩大（1888—1895年在圣菲，1895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与铁路建设的发展直接联系。铁路线里程1870年为732公里，1880年发展到1,313公里，1890年发展到9,254公里。铁路货运量1870年为27.5万吨，1880年增加到74.2万吨，1890年增加到542万吨。188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北部较早定居地区的耕种面积约占土地的7.1%；而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广大地区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兼并的），仅分别为1.1%和0.3%。到1896年，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耕种面积已分别占44.5%、28.3%和14.6%，所产小麦的大约83.7%和玉米的53.7%都经铁路运输。④ 332

④ 关于铁路发展和兼并新土地的关系，见科林·刘易斯著《70年代末阿根廷边界的巩固。印第安人、罗加与铁路》，载古斯塔沃·费拉里和埃塞基耶尔·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1890—1910年阿根廷新领土上定居垦殖与经营农牧业的模式》，载阿尔瓦罗·哈拉编《新领土》（墨西哥，1969）。

这个时期内，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决定土地使用方式的是地区特点，尤其是与市场的距离（它与运费有关）。在边远地区，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没有铁路，运费昂贵，定居垦殖和发展种植业的可能性就较小。在这样的地区，有许多由地主自己经营的、大面积粗放的饲养场，也实行租佃制和分成制（尤其在养羊业中），但始终没有象后来种植业中那样普遍。在土质条件较好和运输费用较低的地区，农业就得到发展。1888至1895年间，种植面积由250万公顷增加到将近500万公顷。发展最明显的是圣菲省，每户占地规模不大，大多是自耕农。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20年，在原先全部或部分用于养牛的土地上掀起了发展农业的新浪潮。这个过程有个特点：不是以种植业代替养牛业，而是两者互为补充。大牧场划出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生产谷物，因此从1885年至1914年期间，佃农的数目增加很多。

大量佃农的存在对阿根廷历史编纂学产生一定影响，史书作者为佃农塑造了一个共同的形象。重要历史学家中有米格尔·安赫尔·卡卡诺和哈辛托·奥多内等令人尊敬的先辈，也有象塞尔希奥·巴古和詹姆斯·斯科比那样一些晚近的学者。斯科比写过这样一段有关佃农的话：

333

> 祖先为他们获取并保存了大量土地的人，或者拥有大庄园的人，过着富贵豪华的生活。过去野牛成群的地方，只能骑马或坐牛车才能到达的地方，大部分被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占据的地方，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英国资本兴建了铁路，畜牧业改进了技术，草原上的资源得到广泛利用。从欧洲刚来不久的贫困移民，有的当工人造铁路，参加城市建设，有的当了分成农、佃农或雇农，种玉米、小麦、亚麻和苜蓿，修栅栏，放牛羊。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每年为地主提供12％至15％的收益，土地的价值往往每10年提高1000％。已经掌握土地、权力和金钱的人垄断着大草原上新开发的财富，而耕耘土地或放牧牛羊的人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如果他们离开欧洲是由于贫困和绝望，在阿根廷至少不致于

挨饿，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前途毫无指望，土地永远不会属于他们。⑤

支持上面这种论点的人的意见可以概括如下：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提高地租收益，在市场上限制出售土地，宁愿让他们垄断的土地荒废。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买卖土地要比想象的方便得多；与地产规模和租佃制相联系的，是与一个地区的农牧业具体发展模式有关的其他一些情况。实际情况是，到19世纪末，铁路沟通了市场，同时又有大量土地出卖，而愿意经营的农民依然不多，因此并没有发生资源不足或对土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就不同了，那时耕种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兼并新的可耕地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新农民与老农民为获得最肥沃的土地而互相竞争。

租佃制并没有阻碍佃农获得土地。确实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租佃制成为走向拥有土地的中间步骤。佃农的劳动产生的收益比自耕农多，因为生产规模比较大。其次，佃农全家作为一个劳动集体都有活干，他们正是因为有地可耕才移居到这里来的。最后，中小规模的地产交易有相当活跃的市场，而大地产则交易较少。此外，地价虽在80年代上涨，但90年代又下降了，增加了获得土地的可能性。英国领事在1893年度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334

1891和1892两年，以黄金计算的土地价格极为低廉；今年略为上涨，但仍较便宜。1890年危机后地价下跌，这是异常情况。……如遇好年景，土地的代价即能得到补偿，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很大。阿根廷共和国的土地全部是自由保有的财产，财产转让和登记，产权检查，都比英国简便得多。⑥

---

⑤ 詹姆斯·斯科比著《大草原上的革命：阿根廷小麦的社会史》（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4）第5页。

⑥ 英国外交部：关于1893年阿根廷共和国农业状况的报告（载1893年年度资料：关于贸易与财政的外交—领事报告，第1283号）。

20世纪头十年，地价再次大幅度上涨，但这次上涨不是投机的结果，而是土地收益明显增加的反映，特别是饲养牲畜的土地，因转向肉类生产和引进英国良种，收益增加更多。

劳动力供应

人力不足是整个19世纪阿根廷长期存在的问题。自从19世纪20年代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首先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后，产生了推行移民垦殖政策的想法，但70年代以前收效甚微。地主们对此缺乏热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等政治领袖更是不

表1　人口数及人口增长速度

年　　份	人口数	每年平均增长速度(‰)
1869	1,736,923[a]	28.5
1895	3,954,911	30.4
1914	7,885,237	34.8

注：a.不包括土著居民、在国外的阿根廷人以及在巴拉圭服役的军人。

材料来源：1869：阿根廷,《1869年阿根廷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布宜诺斯艾利斯,1872)；1895：阿根廷,《1895年阿根廷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898)；1914：阿根廷，《1914年第三次全国人口 普查》，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苏尔玛·L·雷基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阿根廷的人口迁移》(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感兴趣。据说他不鼓励任何吸收外国人进行垦殖的计划。除此以外，也没有考虑过，到遥远的内陆地区去垦殖的主要困难是运费昂贵，难以把产品远距离运往市场。成立邦联几年之后，鼓励移民垦殖的尝试获得较大成功。1869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阿根廷的人口不足180万；25年后，1895年，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人口已增加到将近400万；1914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已接近800万（见表1)。如此惊人的速度，仅靠自然增长是难以达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移民入境的结果。1870至1914年

335

间，有将近600万移民进入阿根廷，多数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虽然永久定居的只有一半稍多一些（每年数字见表2)。外国人在全国总人口中，1869年占12.1%，1895年占25.4%，1914年占29.9%。值得注意的是，移民不仅影响到人口绝对数字，而且因年龄结构关系影响到出生率的变化。1869—1895年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30.4‰，其中移民增长17.2‰，自然增长13.2‰。1895—1914年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34.8‰，移民增长17.2‰，自然增长17.6‰。⑦

外来移民对劳动力的影响反映在多方面：第一，他们直接导致总人口的增加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第二，他们每年直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移民的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年。1895年，在入境移民中，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占47.4%，0—20岁的占21.8%；在国内出生的阿根廷人中间，则分别为23.4%和60%。⑧ 1914年，20—40岁的男子，外来移民多于国内出生的。这说明外来移民对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全国人口的影响。在外国人中间，1895年和1914年男子对女子的比率都是1.7；而在本地人中间女多于男，这两年男子对女子的比率分别为0.97和0.98。外来移民也影响人口的地区分布，到1914年止，84%的外来移民在草原区定居。最后一点，外国人比本地人更倾向于住在城市（见表3)。

没有说明19世纪末阿根廷就业总水平的研究材料，但人口普查关于工作岗位的数字（尽管有不少缺陷)，提供了关于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资料。1869年，14岁以上可能参加经济活动人口为1,014,075人，参加经济活动人口为857,164人（85%)；1895年，分别为2,451,761人和1,645,830人（67%)；1914年，分别为5,026,914人和3,235,520人（64%)。

---

⑦ 苏尔玛·L·雷基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著《阿根廷的人口迁移》(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第79、86页。

⑧ 1895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第2卷，第xcix页。

表2　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1870—1914）[a]

年　份	入境移民	出境移民	净入境或净出境
1870	39,967	—	+39,967
1871	20,933	10,686	+10,247
1872	37,037	9,153	+27,884
1873	76,332	18,236	+58,096
1874	68.277	21,340	+46,937
1875	12,036	25,578	+16,458
1876	30,955	13,487	+17,478
1877	36,325	18,350	+17,975
1878	42,958	14,860	+28,098
1879	55,155	23,696	+31,459
1880	41,651	20,377	+21,274
1881	47,484	22,374	+25,110
1882	51,503	8,720	+42,783
1883	63,243	9,510	+53,733
1884	77,805	14,444	+63,361
1885	108,722	14,585	+94,137
1886	93,116	13,907	+79,209
1887	120,842	13,630	+107,212
1888	155,632	16,842	+138,790
1889	260,909	40,649	+220,060
1890	110,594	80,219	+30,375
1891	52,097	81,932	−29,835
1892	73,294	43,853	+29,441
1893	84,420	48,794	+35,626
1894	80,671	41,399	+39,272
1895	80.989	36,820	+44,169
1896	135,205	45,921	+89,284
1897	105,113	57,457	+47,686
1898	95,190	53,536	+41,654
1899	111,083	62,241	+48,842
1900	105,902	55,417	+50,485
1901	125,951	80,251	+45,700
1902	96,080	79,427	+16,653

续表

年　份	入境移民	出境移民	净入境或净出境
1903	112,671	74,776	+37,895
1904	161,078	66,597	+94,481
1905	221,622	82,772	+138,850
1906	302,249	103,852	−198,397
1907	257,924	138,063	+119,861
1908	303,112	127,032	+176,080
1909	278,148	137,508	+140,640
1910	345,275	136,405	+208,870
1911	281,622	172,041	+109,581
1912	379,117	172,996	+206,121
1913	364,271	191,643	+172,628
1914	182,659	221,008	−38,349

注：a，不包括头等旅客。

材料来源：《阿根廷共和国1915年统计摘要》（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

表3　城市和农村人口（百分比）

337

年　份	总人数		外国人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1869	71	29	52	48
1895	63	37	41	59
1914	47	53	37	63

材料来源：1869、1895、1914年第一、二、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1895年和1914年，正常就业人员在各部门的分布如下：农业—养牛业24%和16%，工业22%和26%，服务业29%和33%。大约21%和28%无固定职业——这个类目主要包括按日计酬工(jornaleros)和雇农，基本上是一大批季节性劳动者，收获季节在农村干活，其他时间呆在城里。有些数据对于研究就业格局

338

的变化（不是绝对就业水平，而是就业变化）非常有用。例如，公共工程和民用建筑方面的投资数字说明城市就业状况，铁路线长度的变化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耕地面积的变化说明农业就业状况。以上这些部门，除工业方面的就业变化不很明显外，其他部门需要劳动力的数量都很大。从每年入境移民的数目（见上表2），可以看出劳动力供应的变化。另一个有用的数据是进口数字（见下表6）。进口在某种程度上与工业、公共工程和铁路建设方面的变化有关（这些部门都需要进口物资），但不影响民用建筑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它们不需要进口商品）。应该强调指出，在进口和净入境移民数字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内，劳动力的供求出现过急剧变化。进口以及与进口相伴随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扩大；1890年爆发危机，进口突然减少，公共工程和铁路建设规模随之缩小，不仅对劳动力的需求缩减，劳动力供应也因入境移民骤降而明显减少。英国领事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报告很说明问题：

人们将注意到，1890年的入境移民比上年减少60%，同时出境移民增加107%。1891年的估计数字表明，入境移民继续以惊人速度减少，而出境移民很可能已经超过去年的离境人数。请注意，1888和1889两年，仅直接从国外入境的移民（不包括经由蒙得维的亚入境者），即已大大超过移民部部长报告中所估计的9万至10万人，他说这是阿根廷一年内能够正常吸收和雇用的最高数目，然而实际入境人数分别达到130,271人和218,744人。令人吃惊的是，过去3年内进入阿根廷的总人数（包括经由蒙得维的亚入境者）超过54.8万人，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增添烦恼；过去6年内（1885—1890）来到阿根廷共和国的移民有87.1万人（占过去34年入境移民总数的52%），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幸。这个国家的人口估计只有400万，因此过去6年入境的移民达全国总人口的22%。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竟有如此大比例的移

民进入一个国家。⑨

已经留在国内的一部分人力向农村地区转移，因为种植面积在90年代危机期间继续扩大。这使失业问题得到缓和，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经济复苏后，尤其是1900年以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扩大，外来移民也立即大量增加。1910年后，扩大耕地面积的速度开始减慢，劳动力市场也从需求过旺变成供应过剩。⑩ 339

人们广泛认为，阿根廷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内明显增加的财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不均，地主得到的好处最多，工人从国民收入增长中得到的份额不够比例。有人甚至争辩说，由于种种原因，在本章研究的时期内，大部分时间工资水平是下降的。例如，里卡多·M·奥尔蒂斯认为：

限制拥有土地……〔增加了〕移民出境的速度，鼓励了临时性迁移，有些新到的移民很可能不得不去做自己不熟悉、不愿意干的工作。这些人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默默忍受着贫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生活，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能积蓄几个钱，回家乡去过几天安稳日子。⑪

80年代工资不高而且不断下跌的原因，总的说来，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其次是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引起城市劳动力过剩，而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则是由于土地所有制对贫困移民不利。詹姆斯·斯科比还认为，在本章研究的时期内，大部分时间（尤其是

---

⑨ 英国外交部领事报告。关于1891年向阿根廷共和国移居及对劳动力需求的报告（载1892年杂项资料，第216号）。

⑩ 见亚历杭德罗·E·本赫若《阿根廷的失业，当前劳工危机》（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

⑪ 里卡多·M·奥尔蒂斯著《1850—1930年阿根廷经济史》（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第1卷，第209页。

90年代）工资都很低，虽然1905年后有所回升。他认为，只要把付给按日计酬工和熟练工人的纸币工资折算成等值金币单位，就可以正确估计出工资的波动情况。1871年一天的纸币工资值1.20金比索；1880年值0.75金比索；1885年，1.00；1890年，0.60；1896年，0.50—0.60；1901年，0.55；1910年，1.20—1.50。[12]斯科比还说，生活费用上涨对工资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310

事实上，1886年以前实际工资（按工人购买力计算的工资）是上升的，1886年以后下降，直到90年代中期。但从1890—1895年到19世纪末这段时期内，货币工资的提高使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很多，因为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货币工资的提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但1895年以后由于生活费用下降，逐渐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905年后，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工资的增加却不如斯科比想象的那么明显。有些作者把这时期兑换率的稳定与物价的稳定混淆起来了。1900—1910年期间，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实际工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

即使把30年间发生的重大波动估计在内，仍可以说阿根廷工人在这期间的实际工资是上升的。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一个工人果够得到的商品和服务比大约30年前的同类工人多三分之一。如能本人在30年前就已开始工作，则由于锻炼多，资历深，经验丰富，增加的工资会更多。这并不是说，工人的生活很舒服，没有受有些时期生活费用上涨、失业和贫困的影响，这一点是他们本人和他们同时代人的经历已经清楚说明了的。[13]准备回国的移民在1889—1895年期间的确面临按金比索计算工资下降的问题，这是事实。外国领事们曾警告可能出国的移民，不应把金比索工资

[12] 詹姆斯·斯科比著《1870—191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纽约，1974）第266页。

[13] 关于实际工资的进一步讨论，见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1880—1914年阿根廷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与纸比索工资混为一谈。⑭但留下长期定居的人没有受这个具体问题的影响。

341

表4 1865—1913年英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及有价证券投资

（单位：百万英镑）

	1865	1875	1885	1895	1905	1913
资投总额	2.7	22.6	46.0	190.9	253.6	479.8
直接投资	0.5	6.1	19.3	97.0	150.4	258.7
有价证券投资	2.2	16.5	26.7	93.9	103.2	221.6
政府贷款	2.2	16.5	26.7	90.6	101.0	184.6
公司证券	—	—	—	3.4	2.2	37.0

资料来源：欧文·斯通：《1914年以前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及有价证券投资》，载《经济史杂志》，第37期（1977），第706页。数字未经核对。

资　　本

在本时期初，象阿根廷那样经济十分原始的国家，资本非常缺乏。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是大片土地和城市里的房产，牛是他们的动产。他们的积蓄实际上没有其他出路。金融机构很少，而基础设施却迫切需要大量投资。阿根廷幅员广大，农村地区一向缺乏长住居民，经济主要依靠向大西洋彼岸输出产品；对这样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廉价的陆路和海上运输必不可少，港口和仓库也很重要。国内外私人团体（国外主要是英国），与国际银行界挂勾，在各部门尤其是铁道部门进行了大量活动，但首先加以推动的是政府。然而以进口税为主的国家岁收有限，政府无力为社会间接投资提供必要资金，只能靠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

⑭ 例子见英国外交部领事报告。关于1891年向阿根廷共和国移居及对劳动力需求的报告。（载1892年杂项资料，第216号）；另见1892、1895和1899各年领事报告。

的贷款来筹集资金（关于1865—1913年英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见表4）。

342 有人说，阿根廷缺乏能把资金引向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的机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需要资金的经济部门总是希望政府能通过官方银行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向它们提供资金。在本章研究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些机构（首先是1854年成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80年代后则是国民银行）大幅度扩大货币供应，不仅向国营部门，而且向私营部门大量增加信贷，把现金储备减少到无法满足存户提款要求的地步，以致在1873年和1885年两次因不同原因宣布停止兑换，最后终于在1890年宣告倒闭（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并不是商品银行对这方面的业务有什么内在的偏爱，而是因为这些业务范围最安全，最能赢利。还应记住，农村经济活动部门还可指望从其他来源获得资本，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全国和各

表5 资本形成：1857—1914年股本的增长

年份	金币比索（单位百万）	纸币比索（单位百万）	消费物价指数（1884＝100）[a]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纸币比索
1857	.368	—	—	—
1884	1.875	1.875	100	1.875
1892	1.407	3.264	159	2.052
1895	2.840	8.577	190	4.514
1914	14.955	33.989	206	16.499

注：a.根据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1880—1914年阿根廷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一书中的消费物价指数（食品价格）。

资料来源：1857、1884和1892：M·G·马尔霍尔和E·T·马尔霍尔：《拉普拉塔河手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伦敦1982年重印）；1895：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14：阿尔卡托·马丁内斯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研究。

省的抵押银行提供的抵押信贷业务本国和外国的供应商及其代理人也提供信贷。此外，谷物出口商常常预付收购谷物的定金。通过这些渠道，从国外购进了栅栏材料和农业机械，牧场上筑起了栅栏，成百万公顷土地播下了种子，还引进了优良种畜。国民财富主要组成部分——牲畜和土地——的价值大幅度增加。

不能说所有资本都来源于国外。我们已经看到，本地资本在改良土地和牛种以及城市建设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表5说明，在本章研究的时期内，阿根廷的股本有巨大增长。港口、铁路、道路、房屋、机器、养牛场就是从全国统一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整整30年间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的一部分。虽然1890年危机曾使全国股本按黄金计算的价值一度下跌（当时比索对黄金的贬值大于比索在国内购买力的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表5中的金比索和不变价格纸比索两组数字，在整个时期内都是平均每年递增7.5%。

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73—1876年危机结束起，到1890年经济崩溃前增长达到最高点时止，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890年起，到90年代后半期止，是肖条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从90年代后期起，是大发展时期，其间除1899年和1907年发生两次短暂的衰退外，增长一直持续到1912年危机。 343

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经济高涨还是发生中、短期衰退的因素，而国际收支又由贸易以及资本（大部分是英国资本）运行的情况决定。这几项数字的变化对货币供应、就业水平和劳动力需求都会产生影响（输入资本货物影响经济活动水平，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他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变数，如耕地面积大小和民用建筑的规模，不受对外部门变化的制约。

1880—1890年时期

19世纪80年代前五年最显著的发展，是牛的头数以及养牛业各项产品的产量增加。养羊业生产低于前一个十年，但种植业在80年代的后五年开始加快发展势头，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与比较普遍的看法相反，这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出口产品，而是进入交通、公共工程和民用建筑业的投资。由于流入大量外国直接和间接投资，有了进口资本货物的资金，资本货物转化为几千公里长的铁轨和重要公共工程。所有这些使经济活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成为这个时期经济高涨的主要因素。

344

出口虽然增加，但速度跟不上进口，加上80年代出口数量的明显增加被价格下跌所抵销，因此这个时期大部分年份都出现贸易赤字（见表6），但资本的流入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这对流通货币产生膨胀作用，于是正如扩充资本货物以及因扩大进口而增加财政收入一样，促使经济活动进一步高涨。

1881年首次发行全国唯一的流通货币——国家金比索（1个金比索＝25个纸比索[corrientes]；5个金比索＝1英镑）。1883年起，由4家银行发行银行券，其中国民银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最重要。国民银行在外国贷款支持下，把它的资本由800万比索增加到2,000万比索，然后大规模扩大货币发行量，由1883年的4,200万增加到1885年的7,500万。但是，到1885年，由于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加上执行扩大信贷政策，结果黄金需要量猛增，国民银行面临储备枯竭，要求政府准予停止兑换它的银行券。政府批准了这个请求，并且立即把停止兑换扩大到其他几家发行银行。于是，阿根廷再次回到不可兑换的纸币制度。根据1887年通过的《担保银行法》，内地纷纷开办银行（在此以前，银本位在内地占统治地位）。这些银行成为1889年货币流通量增加到1.63亿比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表6　1870—1914年阿根廷的对外贸易

（单位：百万金比索）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差　额
1870	49.1	30.2	－18.9
1871	45.6	27.0	－18.6
1872	61.6	47.3	－14.3
1873	73.1	47.1	－26.0
1874	57.8	41.5	－13.3
1875	57.6	52.0	－5.6
1876	36.1	48.1	＋12.0
1877	40.4	44.8	＋4.3
1878	43.7	37.5	－6.2
1879	46.4	49.4	＋3.0
1880	45.5	58.4	＋12.8
1881	55.7	58.0	＋2.2
1882	61.2	60.4	－0.9
1883	80.4	60.2	－20.2
1884	94.0	68.0	－26.0
1885	92.2	83.9	－8.3
1886	95.4	69.8	－25.6
1887	117.4	84.4	－33.0
1888	128.4	100.1	－28.3
1889	164.6	90.1	－74.4
1890	142.2	100.8	－41.4
1891	67.2	103.2	＋36.0
1892	91.5	113.4	＋22.0
1893	96.2	94.1	－2.1
1894	92.8	101.7	＋8.9
1895	95.1	120.1	＋25.0
1896	112.2	116.8	＋4.6
1897	98.3	101.2	＋2.9
1898	107.4	133.8	＋26.4
1899	116.9	184.9	＋68.0
1900	113.5	154.6	＋41.1

续表

年份	进口	出口	差额
1901	113.9	167.7	+53.8
1902	103.0	179.5	+76.1
1903	131.2	221.0	+89.8
1904	187.3	264.2	+76.8
1905	205.2	322.8	+117.7
1906	270.0	292.3	+22.3
1907	286.0	296.2	+10.3
1908	273.9	366.0	+93.0
1909	302.8	397.4	+94.6
1910	351.8	372.6	+21.0
1911	366.8	324.7	-42.1
1912	384.9	480.1	+95.5
1913	421.3	483.5	+62.2
1914	271.8	349.2	+77.4

资料来源：《阿根廷共和国1915年统计摘要》(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

1887年的阿根廷《担保银行法》以美国的制度为依据，但是它没有象美国那样规定流通中的货币全部由政府担保这一条。《担保银行法》要求银行购买国家公债，以换取黄金。每家银行从政府获得发行钞票的权利，发行量同它购置的公债数额相等。但是，用黄金担保国家通货的原则在两个重要方面遭到破坏：第一，政府实际上免除了最大的发行银行——国民银行购置国家公债的义务；第二，政府接受其他银行（包括省银行）的"黄金担保本票"

346

(documentos a oro)，以代替黄金。结果，总共发行了大约1.5亿比索黄金担保的钞票，而实际黄金储备只有7,600万。新条例造成发行量猛增——3年共增加95%，使通货贬值41%，物价随着急剧上涨，导致货币供应不足。公众进行交易需要更多货币，而银行手里没有黄金去购买公债，也就不能把新的钞票投入流通，结果又回到黄金匮乏时期，这种情况又因须向国外汇款而进

一步恶化。尝试了种种解救办法，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发行3,500万比索的钞票——此事成为发生1890年七月革命、华雷斯·塞尔曼政府垮台的原因之一。⑬但是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新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反而又增加发行6,000万比索的钞票。阿根廷驻伦敦代表维多利诺·德拉普拉萨力争阿根廷的主要债权人——巴林兄弟公司——同意延缓偿还。1890年11月消息传来，巴林公司不允许延期付款，现有贷款也不再转期三个月，于是危机达到顶点。

这个时期承受巨额外债（1885年1亿比索，1892年增加到3亿比索），是爆发危机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外债早已产生深远影响，把公共开支、进口额和货币供应量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贷款突然停止（最后一笔是1889年2,500万比索公共卫生工程款），加上仍需不断向国外汇款，偿还已经举借的贷款和服务费用，使国际收支发生逆转（1888年尽管有2,800万贸易赤字，国际收支还有1.5亿顺差）。具体地讲，这使履行契约产生了困难，并对黄金市场造成严重压力。

政府财政支出已由1880年的2,690万比索，增加到1889年的10,700万和1890年的9,500万（按金比索计由2,690万增加到5,580万和3,810万）。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虽也有增加，但赶不上支出，由1880年的1,960万增加到1889年的7,290万和1890年的7,310万（按金比索计由1,960万增加到3,820万和2,910万）。赤字窟窿主要靠外债填补。1890—1891两年间，政府为了支撑金属储备业已枯竭的国民银行，必须偿付大笔欠款，可是财政收入滑坡，国库空空如也，金价则因市场需求旺盛而不断上涨。巴林公司拒绝延期付款，使早先企图避免危机的打算落空，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1891年4月，国民银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宣告停业，其他许多省银行也于6月间相继倒闭。政府采取严厉财政措施，重新征收出口税，并征收2%的银行存款税、烟酒税，等

347

⑬ 参阅加略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撰写的第10章。

等。在伦敦，维多利诺·德拉普拉萨同英格兰银行的委员会重开谈判。经过认真研究，对方同意给予1,500万英镑基金贷款，以清理原先的借款，并宣布延期偿付本息。1891年12月1日，国家银行（Banco de la Nacion）重新开业，并增加发行5,000万比索。按照与债权人达成的协议，19世纪结束前不再发行货币（实际上，货币流通量还减少了好几百万比索，由1893年的3.06亿减少到1898年的2.95亿）。1893年，根据新达成的罗梅罗协定，推迟还债时间。由于严格执行货币纪律，加上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明显增加，阿根廷的财政状况得到扭转：黄金价格下跌，比索升值，国家提前履行了偿还外债的义务。

1890—1900年时期

1891年金融危机达到顶点时，阿洛伊斯·弗利斯在写给财政部长比森特·洛佩斯的一份报告中作了如下评述：

农业和牧业生产顺利发展，但整个共和国最感兴趣，社会各阶层深为满意的，是小麦大丰收。……圣菲，恩特雷里奥斯，以及其他省份的若干地区，小麦质量极好，空前高产，几乎整个共和国都是良好到正常年景。在西欧几个小麦消费大国价格较高，部分原因是据传北美和俄国农业歉收。……出口工作进行得很快，头4个月已输出22万吨，储存在罗萨里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仓库和备有升降机的大谷仓里的小麦已全部出售到出口商手里。⑯

348

小麦出口量1888年为17.9万吨，1894年增加到160.8万吨。小麦产量1891年为84.5万吨，1894年增加到213.8万吨。⑰城市经济活动部门却是另一番景象。80年代后期已经开工的铁路建设项

⑯ 阿洛伊斯·弗利斯著《阿根廷共和国1891年农牧业生产》（布宜诺斯艾利斯，1892）第10页。

⑰ 见农业部编《农业统计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12）；E·托恩基斯特著《阿根廷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

口，在1890—1892年期间仍一直继续进行，但由于进口减少，1893年以后大部分停了下来。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铁路建设实际上陷于停顿，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尽管如此，铁路线长度仍由1891年的11,700公里增加到1900年的16,700公里；铁路货运量由1891年的160万吨增加到1901年的1,260万吨。

民用建筑部门不完全依赖进口物资，危机后仍继续发展，从而缓解了城市失业状况，但公共工程与铁路有些类似，陷于不景气状态。如果以1885年为基年（=100），民用建筑业1891年的指数为108，1900年提高到171；公共工程1891年的指数为244，1900年下降到58。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和资本货物在前一个时期已经到手，而且受汇率保护（按汇率提高进口货的成本），出现了繁荣景象。但工业增长倒并不是因为保护主义关税，而是靠降低成本和打开新市场。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是那些利用本地原料的产品（食品和酒类），而且利用铁路扩大销路，使生产得到发展。图库曼的糖，门多萨的酒，圣菲和科尔多瓦的面粉厂都属于这种情况。

出口额由1891年的10,300万金比索（票面价值）增加到1900年的15,460万（主要是农产品，尤其是小麦）；进口额由1891年的6,720万增加到1900年的11,350万（见上表6）。整个90年代几乎年年都是贸易顺差，这与80年代形成明显对照。

1893年起，政府采取限制货币供应政策。1893—1899年间，我们看到货币流通量减少。流通的纸币和硬币与出口额（在没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情况下，以出口额代表经济活动的增长）的比率由1890年的2.43下降到1899年的1.59，即下降79％*。1895年起，纸比索开始升值，但是这对出口商和农业生产者有不利影响，他们希望比索停止持续升值。这导致1899年的货币改革，重新实行金本位制。 319

* 原文如此。——译者

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由1889年的5,580万金比索减少到1891年的3,360万，在1895年以前一直不超过5,000万，1895年后开始增加，1900年达到6,960万。

1900—1912年时期

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情况。第一，谷物生产过去主要集中在圣菲省（从1887年到1897年该省小麦面积增加了两倍），现在扩大到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但没有挤掉养牛业，而是互相补充。第二，在阿根廷出口贸易中，肉类开始与谷物并驾齐驱。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过去谷物生产发展缓慢，许多人批评养牛业经营者思想保守。有人说，大地产是发展种植业的障碍，因为种植业需要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经营体制。但到90年代，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有几个因素导致向谷物生产和农牧混合经营转移：铺设了铁路，已有可能到本省边远地区定居；小麦栽培随着铁路发展到本省的南部和西部，而且向北部一直扩展到圣菲省洛佩斯将军的军区。同时，肉类冷冻和横越大西洋的冷藏运输新技术改变了肉类工业的面貌。肉类生产已成为劳动密集型生产，需要建立能终年使用的人工牧场，让进口良种牛在牧场上更好地育肥长膘。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养牛业地区，以及科尔多瓦和拉潘帕省一些过去只经营养牛的地区，现在都种上了苜蓿、玉米和其他饲料作物。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大草原上的苜蓿面积超过了小麦，羊群纷纷离开草原，被赶往巴塔哥尼亚高原。所有这些都促使冰冻和冷藏牛肉出口明显增加（主要运往英国），加上小麦和玉米出口继续扩大，使1912和1913两年的出口额几乎都将近5亿金比索（见上表6）。

350

为了生产优质肉食供应海外市场，要求国内采取一些适应性措施，如改变土地使用方法、土地所有制以及牧场规模等等。这些改变使按每公顷出肉公斤数和每名雇工的生产量计算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所有这些又进一步产生一些后果：农村地区建立了

新的居民点，出现了新兴城镇，开辟了运输通道和商业网点。在养牛地区，过去大牧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现在普遍实行租佃制。大地产和小地产的数目减少，中型产业增多。这股发展农牧业的新浪潮，比过去的养牛业规模小，但比圣菲建立农垦区的规模大。土地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大幅度提高，导致1905年后土地价格暴涨。

铁路网的建设对市场的形成具有多种影响。首先，旧的地区市场重新兴起，现在与沿海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市场。其次，农产品首先运往铁路中心，铁路中心成为初级市场，然后从那里运往沿海地区的二级市场。先用运货马车把农产品运到距生产地点最多不超过18公里的铁路终点卸货站，车站就成了初级市场，谷物就在那里出售并发往二级市场。如果一时没有货运列车，就临时储存在车站上。70%以上所生产的谷物须在12月至5月之间运出，因而内地许多车站上盖起了堆棚和简易仓房。一部分谷物从初级市场直接运往消费中心，供国内消费；另一部分直接运往通商口岸准备出口。铁路总货运量中，约有30%是出口货物，28%左右是供国内消费的农产品，⑲另外34%是运往全国各地的进口货物。1904年，通过铁路运送了将近1,250万吨物资，不包括140万吨铁路本身用品。这里不仅应该注意远距离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货运量，也应该注意运送地方产品供国内消费（即铁路总货运量的28%）的重要性，以及把进口物资运往内地供地方消费的意义。 351

贸易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就实际数量而言，初级市场的货运量大于二级市场。二级市场集中在沿海地区。从出口货物货运量来看，在1906年，主要市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巴拉那和圣菲等中心城市。到1914年，二级市场发生重大转移，从

⑲ 埃米利奥·拉伊特著《农村经济及统计司的报告和研究》，农业部（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

沿河地区转移到沿海。布兰卡港在罗萨里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成为货物出口的第三大港，圣尼古拉斯、拉普拉塔和圣菲紧随其后。二级市场最初建立在几个小港口，后来铁路线逐渐集中到三个主要二级市场——位于从科尔多瓦省和圣菲省运出谷物的阿根廷中央铁路线上的罗萨里奥、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西部和中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和拉潘帕省的布兰卡港。而具有更大意义的是初级市场的增多（主要在新地区）。从1885年到191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发展较早的沿海地区，车站（初级市场）数目1885年有5个，1895年增加到22个，1914年增加到36个。在该省南部和西部，在同一期间车站由33个增加到123个。在圣菲省南部，车站数目由1895年的111个增加到1914年的141个；在中部地区，由68个增加到80个。在科尔多瓦的草原地区，车站数目由1895年的55个增加到1914年的172个；在该省西北地区，由14个增加到21个。不仅要看到新市场的大量涌现，还应该注意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1895—1914年期间，在科尔多瓦省草原地区出现的市场数目大大超过圣菲省。这是因为圣菲省的发展早得多，1895年圣菲省的市场已有相当可观的数目。差别在于，新的初级市场较多地出现在科尔多瓦省的新地区，这些新地区连接广阔的草原地区，而不是连接传统的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很少发展。

352 种植业的技术特性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作物栽培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因此有较高的收入。它还导致一系列情况：工人到农村地区定居，出现了各种交通工具，兴办了为农村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各种业务活动。结果，乡村地区形成了城镇中心，农业地区形成了过去不存在的市场。铁路把内地市场和沿海城镇市场连成一体，最终建立了一个全国性市场。1914年人口普查时，本地生产满足国内需要的比例已经很高——食品约占91%，纺织品88%，建筑80%，家俱70%，冶金产品33%。⑲ 本地开始同国际

⑲ 1914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第7卷，第71页。

市场争购国内生产的食品。

由此可见，增长已不再局限于出口部门。随着农村人口增多、农村城市化以及内地交通条件改进等一系列有关过程的出现，国内需求也提高了。工资收入者人数增加和实际工资提高，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可能投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已涉及运输、商业、建筑、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等许多部门。

有些经济活动，如服务和建筑，只能由当地供给；另外一些经济活动则首先要用进口物资。但是进口商品加上运输成本后，价格比当地生产的商品高，这使发展本地生产获得强大推动力，如果能使用当地廉价原料，则发展本地生产的积极性会更高。选择工业企业的地点要考虑以下几种因素：（1）原料产地（面粉、酒类、制糖）；（2）有向海外市场出口冻肉的出口港；（3）有供应酒料、原料和进口物资的港口；（4）有人口稠密、消费量大的市场。

所有民族工业企业以及制造业投资的30%左右集中在联邦首都。从1895年至1913年期间，这种压倒优势出现下降倾向，企业数目由1895年的35.1%下降到1913年的21.1%；资本额由36%下降到30%。相反，在同一时期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企业数目由23.9%上升到30.4%，工业资本额由21.6%上升到26.3%。其他工业发展省份，按制造业资本多少的次序排列如下：1895年，圣菲、图库曼、恩特雷里奥斯、门多萨；1913年，圣菲、门多萨、图库曼、科尔多瓦、恩特雷里奥斯。1895—1914年期间，工业企业数目由22,204个增加到48,779个；资本额由3.27亿比索增加到17.87亿比索；工业就业人数由175,000人增加到410,000人。

这个时期内最重要的事件是1899年的货币改革，在货币连续几年升值后，重新恢复金本位制。1893年后，实行了严格的货币政策；90年代其余几年货币额几乎一直保持不变（事实上还稍许有所下降），结果在恢复金本位之前的几年内，纸比索的对外价值回升。货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贸易出超，不仅因为减少了进

口，达成了付清外债的协议，还因为出口额明显增加，而且卖得了好价钱。确定了1个金比索等于2.2727纸比索的平价。这个新比价考虑了阿根廷货币的新的购买力，也考虑了美国和其他出口国家的货币的购买力，但比索对美元的比价定得偏低。

政府成立了兑换局来调节纸币发行，增加黄金储备。到1903年，积累的黄金储备达3,870万金比索，1904年增加到5,550万，1905年增加到10,190万，1913年达26,320万。这时，根据黄金储备的多少自动调节纸币的发行，而黄金储备的波动又与国际收支相联系。由于出口增加，价格上涨，外贸情况良好，纸币流通量增加很多，虽然还没有达到黄金储备增加的幅度——法定准备金由1903年的23.1%和1904年的30.9%增加到1913年的72.7%。

货币总额1899年曾下降到29,130万比索，1903年上升到38,020万，然后以每年递升8%的速度上升到1913年的82,330万。货币量对出口额的比率1903年为1.72，1913年为1.70。按1903年比索的价值计算，货币量由1900年的32,400万增加到1912年的61,500万。换句话说，在12年间，货币总额（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90%，平均每年递增5.5%。

出口的繁荣反映到商业活动，也对银行业产生影响。1890年成立的国家银行（Banco de la Nacion）起着带头作用。它占所有银行资本总额的24%，贷款的32%，存款的37%。外国银行占资本的11%，贷款的20%，存款的20%。余数由阿根廷其他各家银行分占。[30] 国家银行在内地设立许多分支机构，使信贷达到最遥远的农村地区并起重要作用。1905年，国家银行修改章程，完全成为一个官方的实体，有权处理其他银行已贴现的票据。国家银行占有所有银行的黄金储备的41%，力求通过供多时收进、

[30] 安赫尔·M·金特罗·拉莫斯著《1500—1919年阿根廷货币与银行史》（墨西哥，1970）。

供少时售出的手段，来减轻黄金供求方面的突然波动。其他商业银行立即仿效。

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由1900年的6,960万金比索增加到1914年的18,960万（或由1900年的15,800万纸比索增加到1914年的41,900万）。但财政收入的增加没有达到同样规模——由14,800万增加到1914年的25,000万。如果以1903年的比索为基准来比较1900年和1912年，财政收入由1900年的16,260万增加到1912年的25,850万；财政支出由1900年的17,360万增加到1912年的38,000万。也就是说，以不变价格计算，财政收入增到了59%，财政支出增加了118%。公债额也逐步上升，1870年为4，750万金比索，1880年增加到8,830万；1890年，35,570万；1900年，44,710万；1914年又增加28%，达到54,500万。

结　　论

除1890—1895这几年外，1880—1912年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经济迅速增长。所有指标都表明，这三十多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5%。这是本时期不同于阿根廷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一个特点。但这不仅仅是个经济增长问题。这个时期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变化，改变了阿根廷的面貌，也改变了它的经济性质。

355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将近800万人口的阿根廷已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空旷广袤的大草原上已有人定居，耕地面积达到2,400万公顷，而40年前还不到50万公顷。农村地区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城镇；建设了大面积的铁路网络，铁路线长度1914年达到34,000公里，有助于居民迁往内地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此外，建设了港口，方便了商品吞吐和人员来往，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

改变阿根廷面貌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开发国际市场上有销路的大宗产品——农产品和牛产品。但是还不止这些。农业和肉类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后向带

动*作用。一方面，除港口外，农村和农业地区和附近新兴城镇中心（农产品的收购和二级市场）的居民需要交通、住宅和服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导致出现一批建造住宅、生产食品、饮料和服装的本国工业。这些企业离市场近，运输成本低，食品工业依靠廉价的当地原料，因而收益较高。

同时，劳动密集型生产还可以使收入分配较为适当并提高需求。这同样也推动人们向国内市场的其他经济部门投资。

虽然外资部门影响很大，但其他部门并不是没有发展，尤其在国内市场上。实际上，在出现巨大盈余时期，其他部门甚至有条件进口资本货物。另一方面，出口产品也变得合理多样化，能够根据价格波动迅速调整产品。在本章研究的时期内，作了巨大努力鼓励资本形成。

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内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国外需求，这种需求是降低海运运费造成的。但是，除了对食品的需求这一点外，这个时期还因通讯日益频繁和速度加快，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更大了。再加上，最发达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长期处于衰退，价格和利率下降，资本开始向国外寻找更高利润。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铁路热期间，还存在着生产和出口铁路设备等资本货物的强烈趋势。

356

至于人口，影响商业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那些因素也使越过大西洋的劳工大流动成为可能。运费降价、保险业兴起，尤其是美国大量供应谷物引起的农产品跌价，都是造成欧洲农村人口流向美洲的原因。在新的沃土上使用农村劳力，产生出更高的效益。这导致工资提高，收入增加。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虽不是本章重点，但也应该提及。有效行使宪法所允许的公民自由和法律保障

---

* 后向带动（backward linkages），一译“后期带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促进供应外资企业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工业的发展，称为“后向带动”；促进使用外资企业产品的本地工业的发展则称为“前向带动”。——译者

（这是由国家政权，即最高法院和各省联邦法院最后组织实施的），是保证劳工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先决条件。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需求方面的问题，但也有供应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19世纪70年代前后，国内市场上生产的肉类和谷物数量不多，因此，当国外需求在价格机制驱动下扩大时，没有能力增加肉类和谷物生产，去适应出口市场的需要。同后来的出口量相比，当时的国内生产微不足道。但根本原因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由于大量购买美国谷物，谷物价格很低，没有扩大需求的推动力。阿根廷必须进行各种调整，扩大尚未使用的资源（如土地），取得其他一些资源（如资本和劳工），通过这些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阿根廷正是这样做的。它开始把大面积肥沃土地用于生产，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使它更具有竞争能力，同时降低运输成本和劳工费用。最后，当阿根廷的产品已经能够在价格和质量上同其他新兴国家一争高低的时候，它的出口产品来到了欧洲市场。 357

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新国家做到所有这一切，除个人努力外，还需要投资兴建港口和交通设施等公共建设。这方面的投资时间急，规模空前。然而，这种努力大部分基本上来自私营部门。他们开垦土地，采用改良品种和农业机械，开辟牧场，引进种畜，改善牛的交易市场，同时还进行城市建设，发展工业。正是供应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才使阿根廷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度发展，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最终成为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食品出口国家之一。

第 10 章

259

阿根廷的社会与政治

(1880—1916年)*

19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很少阿根廷人会想到，他们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70年代没有多少重大事件，因此谁也没有料到，“组织全国政权”时期（1852—1862）的政治活动家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相反，在多明戈·萨米恩托总统（1868—1874）和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总统（1874—1880）任期内，经济和社会虽有明显发展，但速度缓慢，步履艰难。促使阿根廷经济后来飞速发展的各种因素，有的尚未出现，有的刚刚露头。畜牧业水平还不高；国家需要进口小麦；交通网仅仅覆盖阿根廷一小部分领土；银行业尚处于萌芽状态；资本输入和移民入境规模不大。即使这样缓慢的发展还因1874—1877年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而告中断。因此，有人开始对依靠肥沃草原发展国家的想法产生怀疑，并不足为奇。于是人们纷纷研究矿藏的位置，1876年议会辩论中出现了“保护主义”思潮，这些都是这种怀疑态度的初期表现。

1869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清楚地证明了阿根廷的普遍落后状态。辽阔的国土上人口不足18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43

* 本章由理查德·萨瑟恩博士从西班牙文译成英文，译文经杰里米·巴特菲尔德和作者本人校阅。

人。质量低下的住房反映出贫穷的程度；78.6%的阿根廷人住的是破烂肮脏的茅草棚（ranchos）。77.9%六岁以上的居民不会读书写字。一大部分领土荒无人烟。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科尔多瓦等省后来成为肥沃牧场的大片土地几乎完全没有开发利用。阿根廷人顽固地认为这片“荒漠”无法驯服，不仅因为经济上不可能跨越这么遥远的距离，还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武装反抗。一直到70年代后期，印第安人的袭击仍象梦魔似的无休无止地困扰着农村当局和生产者。 360

阿韦利亚内达总统正确指出，“边界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开始，也是终结……消灭印第安人和边界意味着……向荒漠移民。”[1] 就在他的总统任期内，1879年胡利奥·A·罗加将军指挥的军事远征解决了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以前，曾多次发生印第安人袭击。例如，1872年，印第安人到达卡尼亚达－德戈麦斯，距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只有几分钟的路程。1875年和1876年，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联盟，在几名饶勇善战的酋长带领下，多次入侵并蹂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阿苏尔、奥拉瓦里亚、特雷斯阿罗约斯等重要地区。曼努埃尔·帕尔多上校回忆这些袭击时说：“居民点被焚烧，大火好象从天而降，……印第安人侵袭牧场沿途所经之处，田野里的庄稼荡然无存。……男子被割断喉管，妇孺被掳掠而去。……她们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回荡。……”[2]

不只是在印第安人边界发生暴力。对巴拉圭的长年战争虽于1870年结束，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武装对抗并未停止。在70年代，恩特雷里奥斯省的政治领袖洛佩斯·霍尔丹领导两次大叛乱，对国内和平造成严重威胁。1880年，下面将会讲到，各省武装力

---

[1] 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为阿尔瓦罗·巴罗斯的《印第安人、边界与内地安全》一书所写序言（1872—1876年初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137页。

[2] 引自J·C·华尔特著《征服荒漠》（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第384页。

量中最强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民团，在特赫多尔省长领导下举械反对中央政府。这些年，各省发生无数次各种小规模叛乱，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叙述。但特别著名的是，民族主义党领袖、前共和国总统米特雷将军1874年领导的起义，阻止当选总统阿韦利亚内达就职。

361

1874年前后的一个标志是，两个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基地的党——民族主义党和阿道弗·阿尔西纳博士领导的自治党——之间的激烈争吵，当时它们支配着阿根廷的政治。1877年，阿韦利亚内达总统试图用所谓"和解"政策解决体制危机。(以下原文有脱漏。——译者)阿韦利亚内达（他组成了民族党）接受邀请，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参加了中央政府。但和平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1880年进行总统选举时，阿根廷人又一次分裂成不可调和的两派：一派支持罗加将军，另一派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特赫多尔。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巴林兄弟公司代表预言，特赫多尔省长将取得决定性胜利。

结果却是罗加获胜。首先，他善于依靠国民军的多数军官。第二，不久前成立的省长同盟使他稳获几乎所有省份的支持。此外，虽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数公众舆论支持特赫多尔，但罗加在该省政界和经济界的重要人物中间赢得了强大的同盟军，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许多自治党人和米特雷将军的一些支持者。1880年的重大对抗既是政治斗争，又是军事斗争，而且不是一般的小冲突：大约有20,000人参加，死伤2,500人左右。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周围，许多居民参加了失败一方的战斗。罗加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是70年代后期设立的政治—军事联盟的规模和凝聚力。与此同时，罗加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民意组织的领导人，提出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是解决阿根廷政治问题的唯一办法。甚至象多明戈·萨米恩托这样的老自由派也开始强调秩序与和平的重要性："现代共和主义者的口号并不〔象'博爱、平等、自由'〕那么崇

高庄严；……他们的口号是和平、安宁、自由。”[3]

“我们好象是个刚诞生的民族，因为你必须为构成这个国家的属性、资源和权力的一切制订法律。”[4] 这是罗加总统（1880—1886）向1881年那一届议会宣誓就职时讲的话。以后几年，通过了一系列向中央政府大规模转移权力的法律。例如，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联邦化，这项措施部分地削弱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主导地位。又如，使国民军的基础更加牢固；解散省民团；首次采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单位；过去由天主教会掌管的初等教育和公民登记划归中央管辖；通过一系列整顿司法、市政和其他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

362

内地许多支持罗加的人原来以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败将增强外省权力，可是，罗加取胜的结果似乎证实了那些被击败者的最令人沮丧的预言。未来的反对派激进党领袖莱安德罗·阿莱姆曾在1880年断言，将来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吸收“共和国各族人民和所有城市的全部力量”。[5] 他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80年代通过的这些法律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全国行政首脑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后来实行的总统制只是把1853年宪法设计师们最初宣布的想法付之实施而已。在1880年以前，由于资源匮乏，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以及强烈的乡土政治传统观念，无法把这些想法付之实施。

1880年起，阿根廷获得好几十年相对的政治统一和稳定。这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战后）平均每年5%的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互相吻合，[6] 前者促进了后者，后者巩固了前者。

---

③ 《萨米恩托全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第39卷，第68页。

④ 罗加就职讲话见H·马夫拉加尼亚编《从1810—1910年按年序编排的执政者咨文看阿根廷国家发展史》（六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第4卷，第1页。

⑤ 引自H·里瓦洛拉和C·加西亚·贝尔松斯著《罗加总统任期》，载R·莱维列尔编《阿根廷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第4卷，第2489页。

⑥ 见拜尔科斯·孔德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撰写的第9章。

363

经济飞速发展使阿根廷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这种变化的结果。曾在圣菲南部一家农场生活和工作到1888年的沃尔特·拉登1908年回去时发现一切都变了，特别是大草原彻底改变了面貌。“天哪！全变了。繁荣到来了，传奇式生活已一去不复返。”[7]

1880—1914年的社会

阿根廷的人口，1869年为1,736,490人，1895年为3,956,060人，1914年为7,885,237人。人口增加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涌入大批移民。1871年至1914年间，共有5,917,259人来到阿根廷，其中2,722,384人返回母国，3,194,875人在阿根廷定居。绝大部分移民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有相当数量来自中欧、法国、德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定居移民很多人居住在沿海各省（联邦首都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科尔多瓦、恩特雷里奥斯等省），这就巩固并进一步加强了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沿袭下来的倾向。与此同时，国内的人口迁移也决不是无足轻重，虽然数量比海外来的移民少得多。从1869年到1914年，沿海各省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72%；其中圣菲省的人口增长最为可观，达909%，增长最少的恩特雷里奥斯也达到216.8%。新发展地区（尤其是拉潘帕和查科）这时期人口也有明显增加，而1869年时人口非常稀少。其他各省的人口增长数字，除门多萨和图库曼分别达到324.5%和205.6%外，比沿海诸省慢得多，在1869年和1914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最多的是圣路易斯，为118.2%，最少的是卡塔马卡，只增加25.4%。

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也很大。城市居民的百分比由1869年的29%上升到1914年的53%。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人口增长十分惊人：由1869年的181,838人猛增到1914年的1,575,814人。圣菲省

⑦ 沃尔特·拉登著《阿根廷平原与安第斯山冰川》（伦敦，1911）第49页。

的罗萨里奥城也由1869年的23,139人增加到1914年的224,592人。 364
科尔多瓦省南部地区谷物种植面积扩大，也使科尔多瓦城的人口大量增加，由1869年的28,523人增加到1914年的121,982人。门多萨城和图库曼城的人口也分别因葡萄园和制糖工业的发展而迅速扩大。从1869年到1914年，门多萨由8,124人增加到58,790人。图库曼由17,438人增加到92,824人。在今天属于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范围而那时并没有并人联邦首都的各个区，也能找到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例子。如阿韦利亚内达，1869年只有5,645名居民，1914年增加到139,527人。拉普拉塔在1869年根本还不存在，而1914年已有137,413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其他中心城市的人口也有很大增加，如南部的布兰卡港由1869年的1,057人增加到1914年的62,191人。

除城市发展迅速外，沿海各省小城镇的数目也增加很快。这是除扩大铁路网外，有助于减轻农村地区长期闭塞状态的因素之一。出现这些人口中心，是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首先，养羊业的扩大不仅使这一地区的饲养业规模明显缩小，同时扩大了畜牧业的内部分工。这两方面的发展鼓励更多人到这个地区定居，社会和职业结构也更加多样化。这个过程发生在1860年左右到1880年前后。结果，农村出现了第一批较大居民区，尤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但是产生更明显的影响是在1880年扩大谷物种植面积以后。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圣菲省的中部和南部，接着扩展到科尔多瓦省的南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西北部。谷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草原上2,000至10,000人之间的农村定居点明显增加，1869年只有20个，1914年达到221个。

这个时期外来移民大量涌人破坏了阿根廷的人口和地区平衡。同时，社会和职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1869年和1895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农业和第三产业扩大，而传统手工业和旧式运输系统中的就业人数减少。在1895年和1914年两次人口普查之 365

间，农业机械化使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水平有所降低，沿海地区新建工业企业中的就业水平提高，第三产业继续发展，建筑业明显扩大，尤其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外来移民在职业结构中所起作用最为重要，世界其他地方也许无法与之相比。1914年，国外出生的人在商业中就业的，不低于62.1%；工业，44.3%；农业和畜牧业，38.9%；在公务和教育机关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7.6%和14%。在外国移民最多的三个地区，他们在所有这些行业中的比例更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就雇于商业和工业的移民分别占总数的72.5%和68.8%。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就雇于农村经济活动部门的外国人达55.1%，在圣菲更是高达60.9%。以上数字都不包括移民的子女，根据当时的法律，把他们的子女看作阿根廷人。如果把他们的子女包括在内，那么在全国参加经济活动人口中的近期移民血统的人数会更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等城市，以及圣菲等谷物种植地区，第三代阿根廷人不超过全部人口的20%。

在企业主阶层中，这种现象更加惊人。国外出生的人，在商业企业主和工厂主中均占大多数（分别为68.4%和68.9%），在农业和畜牧业主中也占显著比例（31.9%）。在上述沿海三个地区中，他们所占比例是：商业企业家78.3%，工业家73.4%，农业企业家56.9%。在农村经济活动部门，农业经营者和畜牧业经营者的数字有一些差异。外国人在全国农业经营者中所占比例是40.7%，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圣菲省达62.4%。外国人在全国畜牧业经营者中所占比例是22.2%，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圣菲省是49.1%。

农村经济活动部门与城市经济活动部门之间的差异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商业集中在绝大部分外来移民定居的沿海地区。与之相对照，农村企业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那些地区移民影响不大。至于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差异，值得指出两个因素：第一，在大批欧洲移民来到之前，畜牧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农业的

发展正好同大批移民到达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第二，畜牧业的规模大，所需资本比经营农业大得多。

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地位上升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城市和谷物种植地区达到最大程度，在畜牧业地区也很明显，如果把移民的子女考虑在内，畜牧业地区的数字会更加惊人。人们的相对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影响到当地社会的所有阶层。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即使感觉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会对这种强烈变化感到迷惑不解。1888年，伦敦拉普拉塔河银行罗萨里奥支行经理向伦敦报告说，“本省的飞速发展使你实在难以掌握客户的偿付能力，因为常常一年时间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地位提高很多，我们不能再以原先的限额约束他。”⑧

这种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的一个结果是社会中等阶层扩大。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所作的估计虽不甚精确，但据粗略计算，这些中等阶层集团在参加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869年的12—15%提高到1914年的35—40%左右。在城市里，这个阶层的扩大与第三产业的增大相联系，也在较小程度上与工业发展相联系。行政机构和教育体系的发展也有重要关系。农村中等阶层的扩大则与谷物种植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农业企业规模较小，因而出现一个中小业主阶层，而在畜牧业占支配地位期间，他们的人数有限。与此同时，经营谷物种植有较大综合性，于是在居民区产生一系列有关行业（商业、工业、交通运输），并随之出现城镇。结果，在农村地区出现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这是拉普拉塔河流域不同于整个次大陆的一个特点。

367

当然，中间阶层中并不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一样，佃农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19世纪末以前，佃农要把他们经营的土地变成自

⑧ 罗萨里奥支行经理致布宜诺斯艾利斯分行信函（1888年6月19日），伦敦南美银行档案资料，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馆藏。

己的产业比较容易。[9] 19世纪末以后，农业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推广了节省人力的现代机器，开拓边疆取得的土地已经用尽，造成土地价格上涨，凡此种种使获得土地越来越难。这种现象（它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出现过）使佃农人数相对地明显增加，1914年前后占全体农民的60％。

在阿根廷当佃农的外国移民的情况，同他的欧洲同行有实质区别。他经营的土地面积在200至400公顷之间，本人又是雇用劳工的雇主，尤其在收获季节。然而，尽管他的情况比祖国的一般情况好得多，但总是不如在阿根廷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的那些人优越。这种差别是因为土地使用权没有保障造成的，他的生活水平（如住房条件），肯定要比自耕农差。

永久定居的移民，不是全都赢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中等地位也达不到，不少人只能继续干刚到时干的那些活。沿海地区新兴工业企业雇用的大部分是国外来的劳工。例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72％的工人和职员是移民。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因情况而异。他们拿到的工资当然比在母国的工资高得多。有几个时期，阿根廷出现了季节性外国移民的奇怪现象。以“燕子”（golondrinas）著称的季节工在三个月的收获季节里从意大利来到这里栖身，“象燕子寻找永恒的夏天一样，寻找永恒的收获季节工资。”[10]

在1870—1914年期间，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总的趋势是明显改善。尽管居民人数大增，文盲却大量减少，由1869年的77.9％减少到1914年的35％。公共卫生也有明显改善，大城市不再发生黄热病和霍乱等流行性疾病。住房条件也有改善。前面谈过，1869年的时候，79％的居民住茅草棚，这个数字1895年下降到50％。

368

⑨ 关于这一点，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科尔特斯·孔德撰写的第9章以及罗克撰写的第11章。

⑩ 《关于向阿根廷共和国移居的通信》，载《议会文件。商业报告》第76卷（伦敦，1889）。

没有1914年的资料，但所有迹象表明，1869年和1895两年次口人普查之间的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大批移民涌入的确也造成了严重的住房问题。在这个时期的最后20年间，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每所住房居住的人数增多，引起一系列问题，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对此有大量描写。劳工立法徊徘不前。尽管如此，还是通过了关于星期日和节假日休息天数的法律，对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也作了规定，还通过了关于工业工伤事故的法律。在这个时期内，每个工作日的时间也不断缩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8小时工作日制正成为城市里大多数企业的标准。

沿海地区的条件同全国其他地方的条件不同。虽然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进步，但地区差别依然非常明显。造成这些差别的因素很多，许多因素在本章讨论的时期开始前即已存在。在殖民地时期后期，经济活动的中心已开始从上秘鲁向拉普拉塔河转移，这 369 种转移使那些未能充分适应新条件的地区的经济相对停滞。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以及原来西北地区的多数省份都属于这种情况。与智利经济联系密切的库约地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虽然程度较轻。甚至在沿海地区本身，与巴拉圭毗邻的科连特斯省在1870—1914年期间经济也相对下降。

在此期间经历了迅速增长的各地区之间也能觉察出差异。例如，在图库曼省（它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制糖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卡塔马卡等邻省居民季节性迁居的目的地)，社会条件比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地区明显落后。的，确堪内地几个省份中，只有门多萨的生活水平与沿海地区一般生活水平大致相同。

不同省份的教育水平可以说明地区差别问题。1914年全国的文盲比例是35.2%，但沿海地区只有26.9%，而其他地区达到57.6%。如果两头相比，差别更加惊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是22.2%，而胡胡伊省是64.9%。1914年人口普查没有提供关于不同类型住房的资料，但1895年人口普查表明，与1869年相比，外

省的绝对数字虽有明显好转，但相对状况仍无显著变化。低标准住房（ranchos）的比例，全国在50%左右，沿海诸省只占35%，其余地区竟高达78%。

这种性质的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它的受害者，一般说来就是发展较慢地区的居民。最突出的是严重遭受经济现代化影响的那些手艺人，其中有内地的个体织布匠，他们的手艺抵挡不住进口产品的竞争；有内陆运输业的雇工，铁路网的迅速扩大很快地把

370

他们排挤掉。还有另外一些情况：经济发展虽没有导致收入下降，但确实影响到有关地区的生活条件。畜牧业的改造和现代化对原有劳动节律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印第安人边界的消失，畜牧产品日益商品化，牧场大规模安装栅栏——所有这些开始建立比较紧张的劳动节律，减少到处游牧的生活特点。当代文学作品以怀归的情调反映了拉普拉塔河地区高乔人昔日生活的一些特色，然而有些诗情画意的、罗曼谛克的歪曲。

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逐渐组织起来。早在1854年，就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商品交易所。1870年以后，在首都和全国其他主要城市成立了若干小商会。1866年，很有影响的阿根廷农村协会成立，会员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畜牧业主。但只是在1880年以后其他各省成立类似团体后，农村协会才站稳脚跟。1886年，全国制造商成立阿根廷产业公会。这个时期也开始成立最早的工人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和主要铁路中心都发展到很大规模。19世纪末以前，工会发展缓慢，断断续续，但20世纪头十年发展非常迅速。1901年阿根廷工人联合会（FOA）成立，但立即让位给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FORA）。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在1905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无政府主义者控制。1910年后无政府主义影响逐渐衰落，但继续控制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直到1915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工团主义者才控制了大部分劳工运动。1907年成立总工会（UGT），这是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会组成的一个少数派组织。这时期的劳工运动有两类主要中

心：第一类中心是各大港口——当时真正的劳工市场，各种活动和各种职业在那里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来，交通网以及在各个主要铁路中心周围兴起的有关工业成为第二类中心。

移民大量流入及其被社会同化，各社会集团的兴衰，以及迅速的社会变化自然导致一系列冲突和紧张关系。19世纪70年代发生过当地阿根廷人同外来移民的冲突，有些冲突，象1871年的坦迪尔惨案，还导致了流血事件。受影响最大的是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村地区，首都和罗萨里奥也发生过这类性质的冲突。1890年至1895年期间也有类似冲突，圣菲省的农业移民区又一次成为冲突的主要舞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1890年危机引起过不太严重的"沙文主义"反应。从这以后，这类冲突逐渐减少，虽然在罢工和恐怖活动（有人认为是外国煽动份子所策动）期间偶而又重新发生。

371

影响更大的是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各种冲突。在阿根廷，农场经营者和工业企业家之间、民族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对抗不多，影响不大。但雇主和工人、有时候工会和国家当局曾发生冲突。1907至1916年间（我们有这个时期的可靠资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举行过1,290次罢工，其中5次是总罢工。

受工潮影响最大的部分是木材、成衣、建筑、食品、冶金和纺织工业。半数以上的罢工旨在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这是工会形成时期，因此可以设想，许多罢工（35%）以巩固工会组织为目的。全部或部分满足工人要求的罢工次数不到40%；大多数罢工的结局不利于罢工工人。

由于举行政治性总罢工（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上述数字多少有些不真实。当时在某些欧洲国家颇为流行的总罢工理论，只在阿根廷的少数地区产生影响。多次总罢工甚至连大城市的工厂都没有参加，而仅仅局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的码头以及各主要铁路中心。参加这些总罢工的工人每次都要提出一个要求：取消1902年通过的所谓"居住法"，因为最高行政机关可以根

据"居住法"把它认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农村地区没有发生过大城市里那样规模的工潮。最严重的一372次冲突发生在1912年，冲突中心在圣菲省南部，扩散到科尔多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事件涉及富裕的玉米种植地区的佃农，当时他们面临粮价低、租费高的问题。由于地主不答应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佃农们有两个月拒绝收割庄稼。这次古怪的事件之后（它象是工人罢工和厂主停产的混合物），谷物种植地区的佃农成立了阿根廷农民联合会。这个时期内同它形成对照的是，畜牧业地区的雇农和北方的工人只是断断续续地成立自己的组织。

大批移民的来到，对拉普拉塔河沿海地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尽管发生过关系紧张和冲突，同化过程总的说来是迅速而和平的。举两个例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区和圣菲的农业移民区，很快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中心，不同国籍居民逐渐融为一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饮食习惯到语言，当地社会都受到与移民迅速同化的影响。

有若干因素使同化过程如此迅速，首先，前面已经看到，许多地区的移民从来不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有时候人数要超过本地居民。其次，多数移民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他们有类似的文化、语言、宗教特点。再者，民事法规和日常习惯对新来移民非常随便，随便到这样的程度，有人甚至抱怨本地人受歧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初等教育制度所起的作用。根据第1420号法律建立的公立学校没有种族或宗教歧视，使教育具有明显的融合作用。最后，共同参加各种活动加速了融合过程。例如，在1914年前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有214个互助会，会员共253,000人。其中，多数会员(51.4%)都分属于吸收不同原籍的多民族混合的会社；仅吸收同一国籍移民的互助会居于次要地位；由本地373阿根廷人组织的互助会只占极少数，名列最后。

当地风俗习惯不仅被移民改变，也被长期经济繁荣带来的突

然富裕改变。前面已经讲到，种植谷物改变了有关地区的物质和社会性质。畜牧业地区在较小程度上也发生类似变化。带刺铁丝做的长栅栏，种植苜蓿的田野，优良牲畜，同老式牛场土里土气的模样形成明显对照。那些简陋的农舍（它们的贫穷面貌曾给W·H·赫德森和其他外国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现已换成精致的、有些甚至是豪华的农村住宅，法国旅游者朱莱·于雷1910年前后来访时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大城市的变化更加明显。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当时所有的大都会一样，是个贫富悬殊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它的皮卡迪利，也有它的怀特查珀尔（这里管它叫'垃圾堆……'）；*有它的'宫殿'，也有它的低级公寓。"这是城北和城南的对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性言论中不断加以谴责的贫富差别。[1]城南和城北两个地区代表这城市的两个极端，给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最重要的现象却不太引人注意：那就是由下层中等阶级在空地上建造的数不清的平房所形成的一些新区。但直到1914年，还能见到一些空地——这是大草原与城市中心近在咫尺的象征。

的确，城里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昔日简陋、土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所剩无几，1880年到过这个城市的人现已难以辨认。一天强似一天的富足很快在精美优雅、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上表现出来。高大的行政大楼，竖立着昂贵纪念碑的大公园，新辟的林荫大道，电车和地下铁道——所有这些都是突如其来的集体富裕的见证人。欧洲的习惯和风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移植到拉普拉塔河地区，因为不仅移民把它们带进来，来往于大西洋两岸的阿根廷人也越来越多。布宜诺斯艾利斯象它的居民成分一样迅速变 374

* 皮卡迪利广场和怀特查珀尔分别为伦敦的繁华市区和贫民区。——译者

[1] J·于雷著《在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大查科》（巴黎，1914）第30页。关于社会主义者观点的例子，见马里奥·布拉沃的小册子《自由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

化。全市20个区，每个区至少有43%的居民是外国出生的人。在人最多、最繁华、商业、剧院、餐馆和行政大楼最集中的5个中心区，外国人的比例在54%到62%之间波动。"有人会问，西班牙血统在哪里？阿根廷人是什么样的？"法国人朱莱·于雷惊愕地问。[12]

但是，既然有人员、商品、习惯的往来，当然也有思想的交流。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一切科学、文学和政治思想流派。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大，无数科学和文学社团的创立，提高了这种接受能力。1914年前后，有几百种期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行，其中不少是外文期刊（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丹麦文和阿拉伯文），有些期刊成为传布开始进入这个国家的新思想的工具。

自由主义仍是支配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集团的主导思想。对有些集团来说，这种自由主义是乐观同怀疑发生一定程度冲突的反映。乐观主义是这个时期的特征，而且因国家取得巨大物质进步而进一步加强；而怀疑主义则是回忆不久前的动荡、冲突和暴力的产物。有人担心，幅员广阔和拉丁人种相结合，不一定就是长治久安的最坚实基础，这种担心进一步加重了怀疑。以上态度表现在急于想克服所谓的南美综合症，而且深信只有继续让那些1880年以来管理国家的人牢固控制政权，才能做到这一点。此外，还能经常看到对某些欧洲国家的羡慕之情和热忱的爱国主义（感到自己是新共和国的创始人）的奇妙结合。这种态度清楚地表现在外交政策上。例如，在第一届泛美会议上（1889年），阿根廷代表团自豪而且成功地向美国关于成立全美洲关税同盟的企图进行了挑战。在1890年金融危机后同欧洲债权人的谈判中，外交部长采取了同样坚定的立场。政府在防务政策上也坚定不移，旨在与智利和巴西的力量对比中取得有利于阿根廷的倾斜。总而言之，阿根廷的政治家们不打算掩盖自己支配国家

375

⑫ J·于雷著《在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大查科》第40页。

命运的自豪感，它在20世纪初已成为南美洲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

和这种牌号的自由主义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种在知识界和政治界备受欢迎、更具有明显的乐观性和普遍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深受达尔文、斯宾塞、隆布罗索等人的影响，深受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乎所有实证主义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这些倾向反映在官方出版物中，满篇是自豪地表明国家不断取得进步的统计数字。甚至在一些想象不到的地方也能找到这些倾向，如新颖别致的动物园，它的建筑受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思想的影响。

这些思想，或者说这些思想的综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受到严重挑战。讨论80年代通过的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法律时，反对这项法律的天主教会宣扬的，也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而这也正是支持政府建议的立法议员们的思想基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根廷宗教只是偶而成为政治分歧的因素的一个原因。政治上的反对派也不公开提出与统治集团的主导思想相左的观点，至少对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问题是这样，对现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是这样。主要反对派激进公民同盟对现政权的批评，听起来象是一种强烈的道义性的陪衬音，是对一个据认为过于国际化、过份沈缅于物质福利的社会作出的反应。1900年以后，在激进公民同盟的言论和文件中才开始出现反实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前面已经讲到，1910—1915年以前的劳工运动受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但阿根廷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明显不同。虽然两者都断然拒绝参加议会和选举，反对国家干预雇主与工会的谈判，但在阿根廷的主导理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他们几乎只搞工会活动。他们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各种合作、娱乐和文化活动，因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的工人区内受到一定欢迎。阿根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发表一些巴枯宁主义言论，但比他们欧洲的同伴温和得多。在阿根廷这样的社会

376

环境里，很少人能接受他们的激进派别(包括恐怖主义)。

社会主义者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比欧洲出现的各种当代改良主义思想流派还要温和。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地从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中取来一些思想，代替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们最欣赏的政治模式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比利时的合作主义和法国的激进社会主义传统。因此，当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恩里科·费里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把他的阿根廷同志称作“月球上的社会党”党员，这不足为奇。[13]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社会党人对阿根廷经济的根本基础并不表示异议：他们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是绝对正统的货币政策的热心卫护者。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比支持政府的政治家还要积极。美洲第一位当选为议员(1904年)的社会党人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在批驳支持政府的立法议员的保护主义论点时，确切地总结了他的党的经济思想。他说：“限制性立法使始终得到保护的工业受益，而他们真正的国家财富——畜牧业和农业却未被重视。”[14]

1870年以后发生的深刻经济变化对阿根廷社会产生明显影响，包括导致新的社会冲突。但是福利不断增多，社会地位上升的比率很高，经济成就产生的受益者多于受害者，使冲突受到制约。阿根廷1914年的面貌同其他拉美国家很不相象；尽管许多习惯和观念发生变化，与旧大陆也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倒跟澳大利亚和北美平原上出现的新社会有些类似。但是我们在后面将会发现，社会状况并没有反映到政治生活和体制上。

377

1880年至1912年期间的政治

罗加将军在1880年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成立了阿根廷最早的

[13] 胡安·B·胡斯托著《费里教授与阿根廷社会党》，载《社会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第129页及其后。

[14] 引自O·科恩布利特著《工会与雇主联合会》，载G·费拉里和E·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第595—626页。

全国性政治组织——民族自治党(PAN)。此外,国民军成了唯一的武装力量,而且除少数特殊情况外,成为中央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同以前几个时期相比,这次新的政治稳定的基础是全国行政首脑得到公认的最高地位,各省领袖和考迪略的权力相对下降。中央政府通过分等奖惩制度保持对外省的控制,以期在需要取得地方当局支持和希望避免再次出现扰乱治安行为这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各省省长在民族自治党这个执政联盟中起着重要的(虽是附属的)作用,作为报酬,他们在中央取得有威望的职位。这样做对各省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包括联邦可以进行干预,最高行政长官甚至在议会休会期间(最多达7个月)也可颁布干预命令。这是对付不轨行为的一种有力工具。因此,这个执政党的杰出政治家奥斯瓦尔多·马尼亚斯科为联邦干预下了这样的定义:

先生们,我国采取联邦干预,始终着眼于以下目的之一:压制某种势力或者重新恢复某种势力;建立一个能够保证最高行政长官国内地位的地方政府,或者推翻一个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⑮

宪法用联邦干预这样的机制使总统保持最高权力,但也在总统权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总统重新当选的原则(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的墨西哥显然不同),以及由法院和国会约束行政部门。尤其是法院对中央权力机关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此外,宪法的一些开明原则使一个极有影响的报界应运而生,它密切监视着中央当局的行动。至少在20世纪初以前,报界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比竞选活动更为重要。拉蒙·卡卡诺向罗加的接任者华雷斯·塞尔曼(1886—1890)讲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一个参加社会活动的人来说,一份报纸就象一个吵架

378

⑮ 引自J·伊拉苏斯塔著《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169页。

的高乔人的一把刀，应该永远把它抓在手里。”[16]参加选举的人数少使事情变得更好办。同以后几个时期比较，这个时期的投票人数不多，但同当时其他国家的一般情况相比，并不算太少。在正常情况下，投票人数约占有选举资格人口（18岁以上的男性阿根廷人，没有文化程度限制）的10%—15%；在政治热情高涨时期（如1890—1895年），可高达有选举资格人口的20%—25%。而且，农村地区的投票人数比城市高得多。

如果说投票人数占具有选举资格的居民的比例不高，那么占全体已达选举年龄的男性居民的比例更低，因为国内有大批外国居民没有取得公民身份（原因不很清楚）。首先，外国人移居来此并不是为了取得公民身份，阿根廷法律对他们在社会上活动也不加歧视。此外，不加入阿根廷国籍，还可以指望继续得到母国领事的帮助，有些国家（如意大利）的领事积极活动，争取移民继续忠于自己的国家。其次，如要举行请愿，对当局施加压力，可以通过雇主或工人的组织，不需要有公民身份证。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分子也不重视让工人取得公民身份证。最后，反对党（社会党除外）对吸收外国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不感兴趣。

379

那时，政治上漠不关心是多数居民的特有态度。投票不是强制性的（1912年以后成为强制性义务）；相反，公民从选民登记到投票那天，有兴趣、表现积极的才会去投票。而且，选举不止一次发生种种舞弊行为，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当然，并不是一贯发生舞弊，因为既然居民对选举漠不关心，舞弊已无必要。但每当反对派克服那种冷漠态度，威胁到统治当局的稳定，就会采取舞弊手段。舞弊种类繁多，从最普通的手腕和贿买选票，到公开对人身施加暴力。但为了使舞弊行之有效，舞弊者（有时是反对

---

[16] 转引自T·邓肯：《阿根廷的政治报刊：南美洲。1885—1892年》，载G·费拉里和E·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第761—784页。

派）必须得到政治门徒们的坚决支持，而且要有一个合式组织。

这个政治组织须在中央和省市行政单位的各种岗位上安插人员，须有一批议员和记者来回答反对派的攻击。还须赢得一些民众支持，做好选举准备，甚至准备应付武装叛乱。那时武装叛乱仍是阿根廷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有正规武装力量参与，还多次有大量平民加入。直到1881年以前，各省民团是平民卷入叛乱的主要人员来源，农村尤其是如此。民团一般都由富有军事经验的政治“考迪略”领导，是省政府的主要支柱。有些人，如1880年的圣菲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81年解散民团后，大量平民参加的武装暴动仍有发生。1890年革命就是一次由某个政治派别领导的、有组织的典型军人一平民暴动，它未能推翻现政治体制，但导致华雷斯·塞尔曼垮台。同1880年流血事件相比，这一次平民参与的规模小得多，可是1893年在圣菲、布宜诺斯艾利斯、科连特斯、圣路易斯和图库曼等省爆发的叛乱中，有大批平民参加战斗队。在圣菲省，数百名移民农民拿起武器保卫革命者。卷入这些叛乱的人数同1894年参加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选举的选民人数大致相等。 380

由于产生此类暴力事件，招募政治人员必须考虑可能要大打出手，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必须建立牢固的效忠关系。负责粘合这种关系的不是全国性领袖，而是城乡地区的考迪略（首领）。这些人在政治结构中占有关键地位，是连结现政权和它的门徒们的真正环节。门徒们不会轻易奉献自己的忠诚，忠诚是建立在复杂的互惠制度基础之上的。政治首领向他们提供一系列服务，从解决社区问题，到袒护犯罪行为等比较次要的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各种个人小恩小惠，最主要的是帮助寻找工作。

考迪略出身复杂，有的是小地主、小商人、牧场监工，更多是已解散的原省民团的军官，也有一些在政界担任小职务如治安推事、代表等等，但他们通常更愿意在本人的地区内行使超官方

的影响和权力。有人赞扬他们，也有人辱骂他们，这两个极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实际面貌。因此，可以这样说，"对这些考迪略 政府什么都给，什么都能通融——警察、市政府、邮局……偷牛、轮盘赌。总而言之，一切能帮助他们朋友或迫害他们敌人的事都干。"另一方面，又可以说考迪略是"对邻居有用，以助人为乐的人"。⑰ 他们显然有很大的独立性。若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必须同他们进行激烈的谈判。在汇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94年全省候选人名单时，该省一名最有影响的考迪略说过这样的话：

381 我们惯常所称的省联盟〔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民族自治党的名称〕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门面上的人，是些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的不在地主，他们善于交际，在城里的影响大于农村；另一部分是真正具有战斗性的选民，也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人……一直在省里进行斗争。……我们尊重那一部分人的门面上的价值，但只是在农村的实际利益，即本省党的真正利益受到重视的时候，才尊重他们。……"⑱

在这些复杂众多的地方首领之上，是执政党的省委会和全国委员会，他们同样是一批复杂的、五花八门的政治领导人，其中有省长、部长、立法议员等等，从他们中间涌现出共和国总统和民族自治党领袖。这两个职位常常由同一个人兼任。从1880年到1916年，这个统治集团控制着国家政治，而且（除极少数几次例外）支配着阿根廷各省的命运。政治反对派和一些比较中立的观察家指责该党是个抱成一团、对外封闭的寡头政治集团，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维持其凌驾一切的地位。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尤其是统治集团所表现的众所周知的政治独占主义。但是这个说法多

---

⑰ 弗朗西斯科·塞吉和马里亚诺·德·贝迪亚的话，引自D·佩克著《1890—1916年的阿根廷政治和门多萨省》（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7）第36和32页。

⑱ 《新闻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893月12月20日。

少有些一般化，至少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1880年涌现出来的这个统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根廷政治领导内部重大变化的产物。最早观察这种现象的历史学家卡洛斯·梅洛这样描述它：

同时，征服荒漠和分配土地……增加了地主的人数，添进了出身微贱的粗鲁人物，不少默默无闻的士兵也因军功授奖。……新兴城市中等阶级和新兴地主遭到阿根廷旧社会贵族核心的抵制，这说明为什么前者厌恶后者并支持总统〔罗加〕。[19]

梅洛对新兴政治家的描写过于泾渭分明，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他很好地描绘了一种明显倾向，也正确地反映了政治反对派对统治集团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图库曼等地非常鲜明，在19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而且至少持续到下一个年代中期。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是社会领域里各种事件的反映。

不应该夸大这个统治集团政治上的一致性。它是由代表不同地区利益的人物组成的，这些利益往往发生冲突。这个政权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内讧，有几次对它的最后垮台产生一定影响。几次稳定时期同个人坚强领导时期，尤其是罗加总统的两次任期（1880—1886年，1898—1904年），互相吻合。反之，缺乏坚强领导则为各种对立利益集团扫清战场，这时不稳定就占主要地位。 382

在这个时期内，“寡头政治”这个词是以它典型的政治含义来使用的。民族自治党当然把社会上和经济界许多知名人士看作本党成员，然而不少上层分子是反对党派内的活跃分子，因而有时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再者，多数最有名望的商界人士对政治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冷淡，可能因为在他们经济界看来，争斗双方并无多大区别。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是执政党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个重要畜牧业主集团公开建立联系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1894年选举省长期间，人人皆知布宜诺斯艾利斯

---

[19] C·R·梅洛著《1885—1886年竞选总统运动》（科尔多瓦，1949）第22页。

畜牧业主卷入选举，因而有人给省联盟(执政党)起了个“牛党”的绰号。激进党报纸《阿根廷人》预言，执政党候选人将具有以下特点：

他多少有点儿**生活奢侈**（原文如此)。他首先须与赛马总会有联系，因为这似乎是行将进行统治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将兼有……地主、商人、政客和金融家的长处。……[20]

“牛党”成员并没有把这个绰号一脚踢开。有些党员，象米格尔·卡内,对它还颇有点儿扬扬得意。他说：“是的，先生们，我们是‘牛’，是‘羊’，因为我们为本省各区的富裕努力奋斗。作为‘牛’和‘羊’，我们要求人们得到自由，牛群得到安全，羊毛生产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官方报纸把反对派激进党称为‘猪’，显然影射它得到农业同盟的支持。但这个时期的政治辩论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反对党（激进党和公民党[civicos]）也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畜牧业主看成本党成员。农业同盟是一部分农村业主的组织，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猪”这个绰号所暗示的低微经济地位。最后，这次选举中，反对派还得到国内外其他重要的金融和商业集团的支持。[21]

383

压倒一切的个人统治也导致执政党队伍内部的分裂。例如，华雷斯·塞尔曼企图罢免罗加的民族自治党领导职务，削弱罗加及其支持者在民族自治党内和各省的权力。从1889年起，华雷斯·塞尔曼的支持者还向反对派的主要堡垒联邦首都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但是1890年金融危机为反对派发动武装暴动创造了有利

---

[20] 《阿根廷人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893年11月9日。

[21] 1894年1月11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论坛报》上卡内的讲话。实际上，商界多数人对政治事件态度比较冷淡。关于参与政治的那些人的态度，见埃塞基耶尔·加略著《困难的五年。卡洛斯·佩列格里尼和路易斯·萨恩斯·培尼亚两位总统任期（1890—1895)》，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第215—244页。

条件，塞尔曼支持者的计划失败。然而暴动的受益者不是反对派，而是罗加和副总统卡洛斯·佩列格里尼。罗加夺回了民族自治党内丧失的地位，佩列格里尼当上了总统（1890—1892）。支持华雷斯·塞尔曼的势力没有完全失败，他们迅速改组为现代主义党，迫使罗加和佩列格里尼寻求巴托洛梅·米特雷的支持，米特雷曾领导革命党人中的温和派，打算在1892年担任总统。最后，力量不强的妥协派候选人路易斯·萨恩斯·培尼亚成为总统（1892—1894）。他任期内的一个特点是联合内阁不稳，激进党多次组织武装暴动。萨恩斯·培尼亚因健康原因辞职，支持罗加的副总统何塞·埃瓦里斯托·乌里武鲁接任总统（1894—1898），武装暴动的失败使罗加重新巩固了权力，终于第二次当选总统（1898—1904）。但在1901年，当时担任全国参议员的卡洛斯·佩列格里尼在如何处理外债谈判问题上与罗加决裂。罗加被迫建立新的联盟，这个联盟于1904年选举米特雷过去的同情者曼努埃尔·金塔纳任总统（1904—1906），现代主义者何塞·菲格罗亚·阿尔科塔为副总统。金塔纳于1906年去世，菲格罗亚·阿尔科塔接任总统（1906—1910）。在执政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部分反对派成员的支持下，阿尔科塔摧毁了（尤其在内地）罗加赖以进行25年政治统治的政治联盟。 381

使罗加下台的，正是他赖以建立绝对统治的那个工具——总统的庞大权力。这个权力有两个来源：强烈的个人至上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及授与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广泛权力的国家宪法。在此之外，还有对出现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担心，它们是1880年以前困难年代留下的遗产。罗加曾清楚地描述稳定和秩序同政治自由之间的巨大矛盾。他非常了解困扰阿根廷民主制的无数缺陷，但他认为，那些缺陷的根源是人民中间长期存在的积习，因此治愈政治顽疾只能缓慢从事，循序渐进，坚决按照业已巩固和稳定的国家制度。1903年，他在即将结束总统任期前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已经取得的进步，将采取什么步骤，使国家体制

方面获得更大成就。

> 在我国短暂而又多事的历史中，我们已经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经历了内战、暴政和混乱，今天我们瞻望未来时，不再有早期那种举棋不定、焦虑不安的心情。……毫无疑问，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弱点需要克服。我们已养成一种习惯，喜欢提出崇高的理想，希望政府、政党和宪法的实施充满政治智慧，十全十美，……即使已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民族也难达到这样的地步。一个共和政体是建立在公众的风俗习惯之上的，不仅是写下几条法律。[22]

由此可见，罗加认为达到完善的代议民主制不能操之过急。他在生命快要结束时又一次强调他一贯坚持的想法，强烈维护他的政治思想和指导原则。

> 要维护……两样不可缺少但一直处于险境的东西：权威的原则以及全国团结一致反对潜在的、但始终咄咄逼人的发生暴动、混乱和解体危险的原则。对我们组织和民族团结的稳固性决不能抱有幻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团结的社会里，混乱状态并不是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就会绝种的根苗。[23]

385

反 对 派

在1880年和1914年之间，各种团体和政党组成一支反对派队伍。有的（如80年代的天主教团体）昙花一现，有的只在个别省的范围内活动。只有两个以省为基地的政党具有全国影响，它们是联邦首都的社会党和圣菲省的南方同盟（后来改名为进步民主党）。民族自治党的传统反对派是那些1880年被击败的势力，尤其是巴托洛梅·米特雷将军的追随者。这些团体的名称五花八门

---

[22] H·马夫拉加尼亚编《从1810—1910年按年序编排的执政者咨文看阿根廷国家发展史》第4卷，第66—67页。

[23] 引自J·德·贝迪亚著《我这样看待他们》(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第60页及其后。

(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公民派〔civicos〕、共和党人)，而且一直存在到本时期结束。1890年公民联盟成立，不久即分裂成两派：米特雷领导的全国公民联盟(UCN)和莱安德罗·阿莱姆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UCR)。激进公民联盟尽管由于某些成员企图与执政党或与米特雷的追随者建立联盟而多次发多生内部分歧，但不久成为主要反对党。阿莱姆于1896年自杀身亡后，他的外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成为激进公民联盟最杰出的人物，并保持其地位一直到1933年去世。

反对派没有执政党那么多的积极分子。相反，民族自治党组织得更好，有一批政治门徒(特别在农村地区)很容易动员，而反对派只在几个政治高涨时期把支持者动员起来。1890—1894年期间，由于选举比较公正，投票人数大增，反对派在全国最发达地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以及圣菲省的谷物种植地区)赢得局部胜利。然而即使在这些地区，两派主要政治力量也势均力敌，支持它们的社会基础也惊人地相同。只是到1912年通过《萨恩斯·培尼亚法》以后(见下文)，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选举力量才出现差距。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领导人之间也没有明显分歧。全国公民联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传统老党，同它当然没有分歧。激进公民联盟早期是由一些传统党派的知名人士组成。当然，它的确曾使一些因某种原因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的人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到1912年，这种局面有所变化，但实质性分歧仍然很小。费德里科·皮内多后来谈到这些分歧时指出： 386

在这个党和那个党之间，尤其是1916年以前，不能说有任何明显分歧，因为各个党的成员对集体生活的看法相同，对经济组织的看法相似。但是已存在着产生政治对抗的某种社会基础(如果不是阶级基础，就是阶层基础)，而且这种基础后来加强了。㉔

㉔ 费德里科·皮内多著《在共和国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第1卷，第25页。

反对派提出的纲领与执政党的纲领区别不大（只有少数例外），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没有多少区别。事实上，这个时期内除劳工方面的改革由社会党提出建议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建议都由民族自治党提出。某些方面（如税收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革新建议也都是执政党提出的。反对派一直试图把辩论集中在政治和宪法问题上，对其他题目都不太感兴趣。激进党人自己也意识到，鉴于它提出的一些要求太温和，党的名称也许过于"极端"。

各反对党要求选举公正，批评权力集中，经常向行政当局发动猛烈进攻，指责它过份讲求物质，甚至堕落腐化，但他们并不在这方面提出任何具体建议（1904年和1912年有关选举改革的两个建议也是执政党提出的），只是要求不折不扣地实施宪法。他们的宣言具有强烈的道义内容。给人这种印象的有萨米恩托80年代（直到他1888年逝世）感人肺腑的抗议，他反对现政权"妄自

387

尊大"，对平民漠不关心（"这是个得到宽容的专制制度"）；[25]还有阿莱姆自1888年起直到1896年去世前的历次激昂慷慨的讲话，他指责权力集中，抗议限制各省的自治权力和政治权利。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深奥难懂的著作给人以类似甚至更加强烈的印象，他把世间明确划分为邪恶"政权"和美好"事业"（激进公民联盟）。巴托洛梅·米特雷的小心谨慎的劝告也给人这种印象，他要求回到共和国政府比较朴素的习惯。甚至温和的社会党人——1894年建党创始人和领袖（直到1928年去世）胡安·B·胡斯托也采取类似的路线，他冷嘲热讽，提到所谓"克里奥尔政治"。

反对派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它们批评执政党的那些缺点（舞弊、政治首领们的影响，等等）。他们的队伍里也不是没有个人至上主义。米特雷、阿莱姆、伊里戈延等人，甚至胡斯托，在反对党内所起的作用同罗加、佩列格里尼、罗克·萨恩斯·培尼亚在执政党内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从根本上来说，反对派表示异议

---

[25] 《萨米恩托—波塞通讯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第2卷，第419页。

的，是那种无情排斥他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当然，阿根廷政治中的弊端，当时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但是在即使有这种情况的国家（如西班牙），对立双方能够做到轮流上台，在阿根廷却不发生这种情况，只有极少数几次例外，那时执政党内部的分歧迫使它与反对派中比较温和的分子建立联盟，即使是不稳固的、短暂的联盟。

政治风格影响到反对派的行动方式。反对派语言恶毒，而建议和纲领温和，两者之间差异明显。激进公民联盟最后终于把“不妥协政策”（顽固拒绝参加任何协议或政治联盟）变成一种宗教教条。此外，反对派有时把武装暴动当作取得政权的唯一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依靠武装部队中一些没有改掉积习的军人。最严重的事件是1890年7月的公民联盟起义。前面讲过，起义迫使华雷斯·塞尔曼辞职。后来在1892—1893年，各省发动一系列起义，结果激进党人在几个省短时间执政。1905年，由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人再次试图发动起义，但未成功，此后他们开始集中力量在日益发展的城乡中等阶级中间扩大政治基础。这时，统治集团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革命观点和沉缅于武装暴动的恶习，向公众表明，激进党人一旦上台，将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388

现政权的垮台（1912—1916年）

1916年，主要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激进党人的这次胜利是由罗克·萨恩斯·培尼亚总统（1910—1914）提出、1912年议会通过的选举法促成的。选举法规定实行所有18岁以上男性公民一律参加的强制性无记名投票普选；还规定委托军队而不再委托各省警察负责选民登记和选举监督，因为省警察极易受当时政府压力的影响。这项所谓《萨恩斯·培尼亚法》是民族自治党内部斗争以及反罗加力量取得最后胜利的产物。自1891年以来，反罗加力量一直施加压力，要求改变选举方法。

它也是保守势力对激进党的密谋活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社会党的壮大和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罢工威胁到稳定而作出的反应。1911年议会就该项法案进行辩论时，执政党有充分信心和把握赢得1916年选举，从而使其统治完全合法化。选举也确实表明该党在竞选中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最终当选为总统的是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罗加在第二次执政期间（1898—1904），与佩列格里尼发生对抗，以后又有反对罗加的菲格罗亚·阿尔科塔担任总统（1906—1910），因此，执政党是在内部分裂、力量削弱的情况下进入1916年竞选活动的。自由派提名利桑德罗·德拉托雷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他原先属于反对派进步民主党。强烈保守的各省首领，在最强有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马塞利诺·乌加特领导下，竭力反对提名德拉托雷竞选。结果，执政党进入1916年竞选时，内部发生分裂，提出了两名总统候选人，极大地减少了获胜机会。这个统治国家达35年之久的政治联盟是由成分极为复杂的各省力量组合而成的，有明显的离心倾向，只有坚强的人物，特别是罗加这样的个性，才得以维持联盟的团结。罗加于1914年死去，执政党内他的主要对手佩列格里尼和萨恩斯·培尼亚也先后于1906年和1914年8月辞世。培尼亚的总统职务由维多利诺·德拉普拉萨接任（1914—1916），他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但在1916年团结全党这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上却缺乏这样的能力。第二，1912—1916年这个选举周期开始时，正好国家经济在几乎20年之后第一次趋于下降。第三，《萨恩斯·培尼亚法》在全国引起了空前的政治动员。在1912、1913、1914年议会选举中，投票人数增加了两三倍，在1916年总统选举中又进一步增加。1912年至1914年间，激进党获得一些省长职位；在1913年和1914年两次选举中，社会党在联邦首都获胜。反对派在四分之一世纪中未能实现的目标，这项法律在几年时间内就把它实现了。

激进党团结在一名强有力的候选人背后，立即抓住了这个新

389

形势。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激进党委员会，来历不同的各种团体都加入了这支看样子有获得成功希望的政治力量。在大城市和一些谷物种植地区，这些委员会都以比较新式的方法组织起来。在全国其他地方，他们的组织摹仿了自治党政权特有的政治首领和个人恩惠制度。

激进党在国家最富裕的地区取得胜利。在沿海地区，他们在联邦首都、圣菲、科尔多瓦和恩特雷里奥斯获胜。在这个地区，激进党的选票集中在城市和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农村地区，在畜牧业地区虽未赢得多数，但也得到大量支持。在城市里，他们的选票主要来自中等阶级，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在较小程度上得到上层阶级的支持。在内地，激进党在最发达的省份(门多萨和图库曼）获胜，在1888年以来发展最慢的地区则被击败（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例外)。因此，激进党的选民基础是城乡最发达地区的中等阶层，但在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阶级中都得到大量支持。这是该党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温和、灵活而且不下明确定义（该党领导的特点）的结果。 390

执政党在内地各省以及沿海诸省的畜牧业地区得到选民最大支持。但在沿海畜牧业地区，这个传统的保守选举组织也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击败激进党。一部分考迪略在人民中的影响使他们竟在阿韦利亚内达这样重要的城市取得胜利。保守派最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在最发达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和圣菲省）的竞选表现不佳。令人不解的是，执政党失败最惨重的，正是那些从1880年开始的经济繁荣中得益最多的地区。

执政党和激进党总共获得85%以上的选票。社会党远远落后，屈居第三，实际上该党的选票局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以及周围一些区，但在那些地方也遇到激进党的激烈竞争。社会党的温和性使他们在中等阶级地区得到不少支持，虽然没有赢得多数，但弥补了失去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选票。在全国其他地区，社会党在某些城市，尤其是重要铁路中心，赢得一些选票。在有的

大城市，如罗萨里奥和布兰卡港，一部分工人投了激进党的票，可能是工会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煽动他们这样做的。在农村地区，甚至在图库曼这样的重要制糖工业省，社会党得票也很少。

自治党人统治36年，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到头来，从1880年以来阿根廷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中得益的，却是反对派激进党及其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对于罗加和佩列格里尼的继承者来说，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统治了一段和平而又光荣的政治过渡时期。

1912年选举改革以后将近20年间，宪治和政治稳定第一次与 391 自由公正选举结合在一起。但选举制度问题仅仅是阿根廷产生政治弊端的部分原因，实际上它们是长期的体制习惯和传统（即毫无妥协或分享政权的余地）的产物。伊里戈延跟罗加一样，坚决主张总统权力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他比他的历届前任甚至更多地使用手中最强大的政治武器——联邦干预权。由此可见，排他性政府和煽动性反对派这个长期存在的政治传统没有打破，不稳定的种子未被铲除。1930年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期间，就象1874、1880、1893和1905年一样，反对派不愿遵循民主比赛规则而选择了武装政变的道路。这次政变取得成功，阿根廷的民主试验和将近70年宪治政府骤然宣告结束。

第 11 章

1914年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内地、布宜诺斯艾利斯

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阿根廷经济取得了将近35年明显发展，仅在90年代初经历5年衰退。主要推动力来自外部：外国劳动力、外国资本和有利于产品出口的国外市场。1914年，在阿根廷的将近800万人口中（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这个数字比1869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倍多），约有三分之一外国出生。另外至少还有四分之一是外国移民的第二、第三代后裔。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后来估计，1914年的外国公私投资（其中英国资本约占60%）占全国股本的一半，相当于两年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00年起，外国投资以每年11.41%的速度增加。英国投资者拥有阿根廷大约80%的铁路、大片土地、大部分电车和城市公用事业，以及一部分肉类加工厂和工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还估计，从1895年至1908年，农村经济活动部门的年增长率为7%，1908年至1914年为9%。伦敦劳埃德银行1911年出版的一本全面介绍阿根廷共和国的书[1]中指出，1903年前后，阿根廷的对外贸易额与巴西大致相等，1909年已增加到比次大陆上这位主要对手多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根廷按人口平均的外贸额几乎是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人均额

---

[1] 雷金纳德·劳埃德编《20世纪阿根廷印象》（伦敦，1911）。

394 的6倍，其金额超过加拿大，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一跃而进入世界谷物和肉类主要出口国行列。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和亚麻子出口国，出口羊毛名列第二，出口活的牛马名列第三。小麦产量居世界第六位，出口量居第三位，有几年居第二位。尽管养牛业占用大量土地，1900年以后小麦生产扩大的速度超过加拿大。

除荷兰、比利时等货物集散国外，此时按人口平均的进口额，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超过阿根廷。它的人均收入与德国和低地国家不相上下，超过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瑞士。150万人口的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南美的巴黎"之称，1869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6.5%，1914年已成为大西洋沿岸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仅次于纽约，是南美洲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圣地亚哥等都远远落在其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给人留下的幸福感，有时被阿根廷依然任重道远的感觉所冲淡。许多深谙世故的欧洲人如今访问这个国家，热烈议论它的成就，普遍认为阿根廷的幼年时期已经过去，青年时代尚未结束，以劳资双方都作出更大贡献为标志的成熟时期正向它招手。过去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为共和国注入了新的人口；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之一；草原区普遍围上栅栏，把5,000万英亩土地变为耕地；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享有最先进的港口设施；连这两个城市在内，从布兰卡港到萨尔塔的许多城市都有了电车、煤气、自来水和发电厂。但是还远没有达到罗加将军和他的继承者1880年以来多次提出的目标。他们那一代人指望阿根廷不仅成为拉丁美洲的带头人，而且成为在南半球抗衡美国的力量。他们梦想共和国超过1亿人口，全国都达到东部核心地带的发展速度。② 可是到1914年，居住在
395 这块土地（它的面积相当于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多瑙河河口之间

② 卡洛斯·佩列格里尼的话，参阅阿尔卡托·B·马丁内斯和莫里斯·莱万多夫斯基编《20世纪的阿根廷》（伦敦，1911），第15册。

的整个欧洲大陆）上的人口还不到 800 万，而且基本上只在首都和紧靠它背后的草原区才能见到发生的变化，半径 500 英里以外的内地，依然大多处于死气沉沉的落后状态。

过去那一代人深信当时的美好时光将常驻不衰，这是他们的雄心大志的依据。但实际上早已有充分根据对其能否实现提出疑问。1913年发生新的衰退，外国移民和外国资本即已停止流入。这些都是外部世界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的迹象。这些迹象还部分地表明，阿根廷从国外吸收资源的能力正在达到饱和点。最肥沃的土地投入生产已有一段时间，剩下的土地大都只能给投资者和拓荒者带来非常微薄的收益。现在衰老的内地看来已不太可能象过去那样跟随草原区提供出口产品，最多只能希望草原区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缓慢地唤醒草原以外的地区。

1914年还无法改变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格局。尽管近年来制造业有所发展（1913年国内工业提供阿根廷1/3的加工食品，1/8的金属制品，1/6的纺织品），③ 但是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它不久即将成为羽毛丰满的工业大国。国内制造业依然严重依靠国内需求和出口部门收入的增长，依靠外国投资。此时虽已广泛使用蒸汽动力，但多数工厂还只是资本有限、机器不多的简单手工作坊。国内食品加工工业原料充足而又便宜，质量又高，已无必要进口啤酒和开胃酒、面粉和意大利糕点。然而食品工业也只是农村出口经济部门的副产品，并不能充分令人信服地表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冶金和纺织工业更不扎实，国内冶金厂使用的是进口原料，因而严重依赖廉价的海运运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兴纺织工业使用进口原料的比例也很高，多数工厂的经营方式还停留在“外包”给女缝工的商业性办法。此时阿根廷纺织工业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巴西。1911年，阿根廷拥有 9,000 枚纱锭， 396

③ 豪尔赫·施瓦策尔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业发展的某些特征》，阿根廷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油印稿（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1,200台织布机，而巴西估计已有100万枚纱锭，3.5万台织布机。

1914年，阿根廷几乎还没有重工业联合企业或资本货物工业联合企业的萌芽。比较贫乏的煤炭和铁矿石贮藏分散在当时难以到达的地区，大部分在遥远的西南部，开发需要投入大量新资本。能从国外筹集到的资金不会很多，至少需象半个世纪前建设铁路那样，先由国家或国内投资者带头出钱。不久前暂时试行的温和的关税保护实验表明，除糖、葡萄酒、面粉工业外，这个国家还缺乏减轻对进口依赖的内在能力。有限的市场缩小了工业生产者采用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活动范围。国内市场前途广阔，但目前范围还比较小，国外市场则被国际工业巨头操纵。美国盛行的工农联营，在这里尚难想象。阿根廷社会与德国、日本或19世纪初期的英国也很少相似之处。新兴中等阶级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毫无痛苦地输入外国产品，他们不会轻易容忍提高费用，也不愿意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内产品进行必要的试用。此时阿根廷的劳动力后备是否足以承担工业部门采取深化和多种经营的重大步骤，也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潘帕斯草原地区有一定条件，也许可以象典型的农业革命那样，把居民从土地上和城镇里赶出来。不久前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然而，这样的劳动力资源是有限的，无论在阿根廷其他地方还是在邻国，再也没有这样的劳动力。因此，增加城市劳动力主要须靠从欧洲吸引移民，但是如果阿根廷的工业化计划采取压缩实际工资的办法（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这样做），那么它可能会很快成为劳动力的净出口国而不是输入国。最后，看来不可能对政治结构进行改造，以适应这样大规模的变革。公众舆论对于这个制度究竟应该允许群众正式参与政治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有时是有尖锐分歧的，但几乎所有阶层的居民都一致愿意选择当前的自由主义制度。这个国家不久前发生的变化归功于这个制度，抛弃它只会回到19世纪初期一无所有的境地。

397

由此可见 1914年以后不久的将来，不大可能成为阿根廷的

一个新起点。而且，轻而易举地扩展广阔边界的日子已经结束；出口收入以及国家主要靠出口收入保持富裕的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国际价格和西欧进口肉类、谷场和羊毛的国家的需求情况；阿根廷已无法再象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简单地用开垦处女地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对付经济衰退。因此，地平线上朦胧出现的是一个发展速度比过去放慢的时期。

潘帕斯草原

1914年的阿根廷是个地区差异十分惊人的国家。经过前一个时期的发展高潮之后，潘帕斯草原地区（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菲省南部、科尔多瓦省东部、恩特雷里奥斯省和拉潘帕地区）除比较干旱的外围地带（如科尔多瓦一部分和拉潘帕地区）以及不太容易到达的地区（如恩特雷里奥斯）外，现在已明显地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加发达。那里有稠密的铁路线，地产都用铁丝网明确标界，旷野里点缀着小集镇、风车、零星住宅和水槽。据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亚历杭德罗·E·本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撰写的著作介绍，阿根廷的这一部分地区，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在内，拥有全国90%以上的汽车和电话，整个拉丁美洲的42%以上的铁路线。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提供的对外贸易物资占次大陆的一半，用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经费占整个拉丁美洲的四分之三左右。④

在过去两代人时间内，整个潘帕斯草原出现了许多城镇，大部分在铁路沿线。有的原先在罗萨斯或米特雷时代只是些小村庄，甚至只有几家小杂货铺；有的在归边界以外，是地产公司和铁路公司有计划垦殖活动的产物。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作为铁路终点卸货站和本地集市，也是小规模信贷和银行业务、小手工业和 398

④ 亚历杭德罗·E·本赫著《阿根廷经济》（四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1930）第1卷，第104—123页。

小商业中心，不少城镇发挥这些作用就象偏僻地区的一个小布宜诺斯艾利斯。许多城镇的发展速度和全国人口的发展速度大致相同，1890年以后至少扩大了一倍。城镇里都有很大的移民居住区，有不少看样子很象生气勃勃的市中心区。多数城镇缺乏资金建设道路、现代化下水道和发电厂，但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学校、医院和图书馆。1914年，草原上的城镇大多新创不久，没有一个大得显眼。阿苏尔1914年有4万人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第四个大城镇，它前面的三个是阿韦利亚内达（联邦首都的郊区工业城镇）、拉普拉塔（省会所在地）和布兰卡港（潘帕斯草原南部主要港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面积与法国相等，资源也相似，但当时只有10个城镇超过12,000人，其他大约50个较大的城镇比村庄大不了多少，虽有铁路与拉普拉塔河河口地区相连，但散落在广大的农场和牧场中间，星星点点犹如沙漠中的绿洲。

在这些和其他方面，潘帕斯草原与其他国家同样处于发展初期的边疆社会明显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破坏了这些城镇从原始状态向大城市发展的能力，（当初开拓这些城镇的居民曾希望至少有一部分会发展成为大城市。）连续不断的繁荣并没有从城镇周围的农村吸引大量拥有财产的长住居民。在不少地区，农村居民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种地的佃农、养牛养羊的雇农和季节工。以养牛为主的地方，每平方公里不超过一两个人，种植小麦地区平均三、四个人，潘帕斯草原人口密度最高的一般是种植玉米地区，每平方公里达15人。1900年以后，潘帕斯草原比较广泛地使用农业机械，1914年时占农村经济活动部门资

399 本的将近四分之一，但耕作依然主要靠人力。在收割季节，整个潘帕斯草原的人口增加到30万左右。在圣菲和科尔多瓦等比较靠近内地居民中心的地区，参加收割的常常是从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卡塔马卡或圣胡安等省来的季节性移民。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以前，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多是从欧洲来的短期移民，通常参加收割后就

回国。这些所谓"燕子"(golondrinas)再次体现了西班牙建立殖民地以来草原地区的社会特点——不扎根；过去高乔人的特性又在这些人身上复活。许多农场和城镇里生活着一批飘泊无定的半就业人口，这种情况对这个富裕的农业社会来说似乎有些反常，对潘帕斯草原的新兴城镇则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不是这样一些无产无业的匆匆过客，而是更多比较富裕的、普遍扎下根来的农村中等阶级，就能在当地城镇形成一个更广阔的服务业市场，使城镇获得更多发展和进行多种经营的机会。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土地制度和大地产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后果。阿根廷独立后，随着打开印第安人边界和国家分配土地，曾连续出现几次建立大地产的浪潮。1850年后发展养羊业，经济衰退，随后是发展农业，使地产规模有所缩小。但是从1860年前后开始，缩小的趋势逐渐减弱，而且多次因地价猛涨而完全停止。持续的繁荣使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成为个人生活依托，后来又成为积累巨大财富的最可靠保证。通货膨胀，加上不正常而且经常是不公平的土地抵押制度(如80年代后期的证书[cedulas]制度)常常造成只有已经拥有土地的人才能买到土地，使能买土地的人越来越少。主要受害者是资金不足的外国移民农民。1914年，外国人在工业企业所有者中占大多数，但在土地所有者中只占三分之一。

整个19世纪，阿根廷一直有一个强烈反对大地产的舆论团体。它主张取消大土地所有制，实行美国那样的宅地法。贝尔格拉诺、里瓦达维亚、阿尔韦迪、萨米恩托和阿韦利亚内达都是以不同方式支持后者的代表人物。他们设想由国家实行大规模垦殖计划，把地契交给当农民的移民，但是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人支持他们去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个国家没有可能实现林肯给穷人"四十英亩土地一头骡"的理想。阿根廷也不完全象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那些国家有一个不受当地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为小农利益施加影响和行使权力的殖民政权。自1810年以 400

来，统治阿根廷的是一伙老谋深算的克里奥尔地主、商人、金融家和投机分子。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80年代，他们实行的土地政策既有利于土地集中，也使他们自己从扩展边界中得到最大好处。在1914年以前的一代人时间内，这种垄断性操纵虽不象过去那么频繁，但各种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未能在间歇期间完全消除过去的沉重包袱。据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分析1914年人口普查资料，潘帕斯草原地区面积在500—1,000公倾的较小农场只占全部土地的23.5%；1,000公顷以上的农场占61%；最大的584户占潘帕斯草原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五分之一。[⑤] 潘帕斯草原土地占有的集中程度低于全国多数地区，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边疆地区。阿根廷每户土地所有者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890英亩，新南威尔士州175英亩，美国130英亩，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形见绌，只有62英亩。

在讲英语的美国和大洋洲的许多地方，养牛业和养羊业最终把一大部分土地让给小规模农业，从而使土地所有制发生实质性变化，使土地上定居的人口密度提高。到1900年这样晚的时候，还有人希望阿根廷也走这条路。他们认为，在这里发展适度的农业，最终也将实现其建设一个以一家一户为坚实基础的独立小自耕农社会的愿望。19世纪90年代出现过这种情况的一些零星迹象，但1900年开始开办英商（后来又有美商）肉类加工厂，土地所有者阶级在对牛肉的需求的鼓舞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银行的贷款政策的帮助下，又恢复建设养牛场，投人大量资金进口牲畜。一度有利于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的土地出售基本上停止了。养牛业鼓励大面积使用土地，使大地产重新得到发展。当时农村工资正趋上涨，养牛又是减少雇用劳动力的一个机会。90年代初，金币曾有较大升水，一边用不断贬值的比索支付工资，一边按金币获取出口收人，两者之间的差额日益扩大。这情况当时产

401

⑤ 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文集》（纽黑文，1970）第152—162页。

生的主要影响是促进了农业。但90年代初以后，比索大幅度增值，使农业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上升。然而养牛业的复兴对种植业产量没有立即产生影响，种植业产量继续不断增加。它先是占据养羊用的土地，养羊业被挤出潘帕斯草原，转移到巴塔哥尼亚高原。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羊的存栏数由1895年的大约5,600万头下降到1915年的1,800万头。可是在大地产上，现在畜牧和种植能齐头并进，更好结合。他们广泛采取轮作制，谷物或亚麻子与苜蓿和养牛轮作，这是一种迹象，表明种植业已失去它原先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变成从属于养牛业。

草原多数地区的种植业实行租佃制或分成制，1916年只有31%的谷场农场由业主自耕。在很多情况下是农民（不少是意大利人）自己心甘情愿接受前两种安排的，因为这样就不必再去为发展自己的农场筹集大笔资金；佃农或分成农的身份也未必一定妨碍他们致富。但总的来说，租佃制加上不断发生自然灾害——水、旱、蝗灾——使农业无法成为直接致富的入场券。多年特别有利的价格之后，常常紧接着地租和运费涨价。1890年巴林公司危机之后，银行制度进行改革，农民无论买地还是生产，很难再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贷款。不少农民长期负债，地主、农村小商店老板、本赫－博恩、韦尔兄弟、德赖弗斯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谷物出口商都是他们的债主。每当同生产者确定价格、结清帐目，总是这些大垄断商控制局面。1912年抗租事件（阿尔科塔的呼声）*以前，许多佃农甚至得不到书面合同的保护，只能指靠地主的家长式善心。采用轮作制后，佃农的积极性急剧下降，不愿对他的土地进行甚至最微小的改善。这种情况的一个结果是，1900年以前常见的简陋茅屋，在轮作制条件下质量变得更差，简直成了临时窝棚。这是“在土地上播下外国佬”(sembarar con 402

* 指一次佃农的斗争。——译者

gringos）的结果。

以上情况的最终产品是一个特殊的农村社会。除不断缩小的传统养牛场外，这个社会的成员几乎没有人象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原始型的、被驯服的农民那样，常年束缚在庄园主的重压下呻吟，许多人是真正的开拓者先驱，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精力充沛，充满进取精神。但也有19世纪初留下的遗产，表现在依然保存许多大地产，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均，而且存在一批人数较多的流动人口。在潘帕斯草原大部分地区，家庭农场远远不象其他讲英语国家的边疆社会那样普遍。在过去两代人时间内，潘帕斯草原充分接受资本主义影响。许多农场和牧场经营得象效率很高的企业。另一方面，土地所有制，尤其在当时以发展养牛业为主的情况下，限制了土地吸收并保留住人口的能力。

内　　地

如果说有些人觉得潘帕斯草原上的生活还有它的缺点的话，那么，它所提供的机会却一般要比除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大得无比。只是还赶不上较易灌溉的内格罗河流域。自从本国和外国的地产公司（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南方铁路子公司）对内格罗河流域进行开发后，这里开始发展成为富饶的、中等阶级的水果之乡，产品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丘布特地区似乎也出现了希望：1907年开凿自流井时，在后来称为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的地方发现了丰富的石油。接着在内格罗河西南，内乌肯省的普拉萨温库尔又有新的发现。但除了这几块飞地以及也在丘布特境内为生存不断挣扎的威尔士人农业社之外，南部广袤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都不发达，发展水平几乎还没有超过大约80年前查尔斯·达尔文乘坐比格尔号航行发现它时的博物学家天堂的水平。这块干旱贫瘠、风沙迷漫的广阔高原上一无所有，只有许多巨大的简直和欧洲皇族封邑一样大的养羊场。如此大规模的土地集中，部分说明，巴塔哥尼亚草场的养羊能力平均只有布宜诺

403

斯艾利斯省的十分之一。这也是中央政府严重浪费罗加将军在1879年征剿中获得的土地的结果。1885年，政府至少把1,100万英亩土地分发给541名参加征剿的官兵。不久后羊群来到时，对这个地区只激起极小的波澜；1900年后，阿根廷的羊毛贸易开始停滞，失去了早先在出口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巴塔哥尼亚的面积约占全国领土的三分之一，1914年却只有8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大部分集中在内格罗河地区。这里阿根廷出生的定居者较少，主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恢复养牛业后，同他们的羊群一起被赶出来的普通牧羊人、大西洋沿岸少数象征性的陆海军卫戍人员、以及一小撮纪律败坏的政府官员。巴塔哥尼亚的许多地主是英国人，内格罗河流域的许多农民也是英国人。这地区也有明显的智利影响。科迪勒拉山另一边严重的土地匮乏曾迫使数量可观的农民再次踏上阿劳科战士们的征途，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重新定居。30年前，智利人向玻利维亚和秘鲁进行类似的迁移，引起一场战争，并导致向智利人割让土地。因此阿根廷当局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智利人。巴塔哥尼亚，尤其是麦哲伦海峡地区，不时地成为两国发生边界争端的地方。

阿根廷的另一端东北部，是个地形和经济都比巴塔哥尼亚复杂得多的地区，但并不比它发达。恩特雷里奥斯省自从它的伟大考迪略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去世，70年代洛佩斯·霍尔丹叛乱遭镇压之后，它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如今恩特雷里奥斯有铁路与巴拉那河各口岸相通，但除一些艮小的大多是犹太人定居的农业垦殖区外，依然是个养牛业的边缘地区，饲养未经改良的本地土种牛群，生产皮张、牛肉干和腌牛肉。再往北，科连特斯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情景大同小异，这里和巴拉圭境内一样， 404 有一些瓜拉尼人小农的农业。1914年，科连特斯省约有1万公顷土地主要由小自耕农种植烟叶，但那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烟草贸易还微不足道。米西奥内斯更多一些进步迹象。自从1767年驱逐耶稣会教士，一百多年来这个省几乎始终一贫如洗。米西奥内

斯象内格罗河流域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吸引资本和劳力。欧洲移民，特别是德国人和波兰人开始打进这个地区，开垦森林中的开辟地，就象另外一些同他们差不多的人在边境另一边巴西境内所做的一样。同样，查科东部地区，特别是雷西斯滕西亚城周围，也在变成小范围生产棉花的中心。

东北地区的主要商品作物是巴拉圭茶*，虽然这个时期国内生产只占全国消费的五分之一。潘帕斯草原种植业和东北地区茶叶种植园之间的条件之悬殊简直令人吃惊。来到共和国这个闭塞的角落，就象突然回到了18世纪。阿根廷发展茶叶生产大多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主要种植地区是米西奥内斯、科连特斯部分地区和查科的东部边缘地区。他们遇到巴拉圭和巴西茶农的激烈竞争。边界那一边的茶农实行半强迫劳动，阿根廷的大小茶农也不得不群起效尤。给季节工按月发放的工资，名为月金（mensus），常常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不熟练固定工人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一批人数不多的长年劳动力实际上就象在种植园里服刑。他们常常受工头的监护，欠公司商店的债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从外表上看，大多数观察家都找不出这和奴隶制有何不同。

东北部的另一项产业是提取破斧树*树汁，主要产区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北部、圣菲、科连特斯部分地区和查科。在整个时期内，以英国财团为主乱砍滥伐坚木林，只是象征性地进行补种。大片大片的森林变成了荒芜凄凉、尘土飞扬或只长灌木的荒野。森林西北部的木材主要用于制造铁路枕木，森林东部的木材可提炼单宁酸，散装运往欧洲用于鞣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斧树木还在铁路上广泛代替煤炭。这个产业当时由于它对待劳工的恶劣态度而名声不好。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自由工资制

405

---

* Yerba mate，一译“马黛茶”。——译者
* 破斧树（quebracho），一译“崩断斧”树，南美一种坚木，含有大量鞣质，可用于制革。——译者

度吸引了不少科连特斯的瓜拉尼人、查科的印第安人和圣地亚哥一德尔埃斯特罗的工人（他们经常轮流参加砍伐破斧树和到圣菲或科尔多瓦收割小麦）到那里去做工。

除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这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外，性质上最象它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正西的库约地区，尤其是门多萨省。这里在过去一代人时间内欣欣向荣，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内地其余地区。库约地区的核心经济是栽培葡萄。由于19世纪80年代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本地葡萄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上建立了牢固地位。从1895年至1910年，整个库约地区种植葡萄的面积增加了4倍，达12万公顷。1914年的葡萄酒年产量已接近400万升，这时阿根廷的葡萄酒产量超过了智利，比加利福尼亚州多一倍。葡萄从门多萨迅速向圣胡安省，向卡塔马卡和拉里奥哈两省的个别地区扩展。这个时期的酿酒工业主要由移民建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带来了资本和技术，生产效率很高。在潘帕斯草原以外，几乎只有门多萨继续不断地吸收大批欧洲人。但是在门多萨，随着葡萄栽培面积的扩大，土地分割得比潘帕斯草原更小。小地产大量地替代了那些越过安第斯山与智利进行贸易经营养牛业的老式大庄园。土地上的繁荣反映到富裕的生活气氛和门多萨城的扩大。门多萨城1914年有59,000人，这是圣地亚哥一德尔埃斯特罗和萨尔塔等内地中等省会人口的4倍，拉里奥哈和卡塔马卡等最贫困省会人口的10倍。门多萨和圣胡安逐渐成为充满政治活力的省份，其背景是伴随从养牛到种葡萄的过渡而来的土地占有方式的变化；敌对投机分子集团之间的抢夺土地；争夺用水权利的激烈斗争；以及为贷款条件而发生的争吵（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银行对葡萄业进行金融扼制）。门多萨的 406
土地占有方式虽对小土地拥有者有利，但酿酒业的集中程度相当高。加工葡萄的酿酒作坊（bodegas）同葡萄种植者为价格而争吵，成为地方性冲突的另一个源泉。1914年两省都成了日益盛行的地方民众主义的中心。它的潜在含意是新联邦派对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敌视态度。

古老内地的第二个发展中心是图库曼者。它抓住自然条件上气候湿润、1876年铁路通车，中央政府在关税方面给予特殊待遇等机会，全力以赴发展蔗糖生产。到20世纪初，这里还能见到鞣革等一些传统活动，如今甘蔗种植园已占该省耕地面积的五分之四，使其他活动黯然失色。图库曼制糖业发展最有力的时期是1890年至1895年。在此期间，由于金币大幅度升水，购买进口货的兴趣下降，进一步提高了因关税保护而得到的好处，产量扩大到原来的10倍。紧接着增长之后，1896年出现生产过剩，然后是5年经济危机，许多小糖厂被迫倒闭。1900—1914年期间，产量再次增长两倍，进口食糖在全国食糖消费中所占比例不断缩小。1897年至1903年间，政府给予补贴，从图库曼小量出口甘蔗，但欧洲各国达成协议停止进口政府给予补贴的食糖，这个短暂的时期也就突然终止。图库曼制糖业的发展速度大体上和门多萨的酿酒业相同，1914年占地也差不多。后来到20世纪20年代，甘蔗田北移到萨尔塔和胡胡伊。向北扩展以前，图库曼的气候变化常使年产量大起大落。国内食糖批发商一面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一面操纵市场供应来提高收益。这是制糖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消费者心目中名誉不好的一个原因。

同拉丁美洲许多类似的亚热带农业活动一样，制糖工业是各种不同成分的混合，其中有现代的、高度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过去前资本主义的因素。除破斧树木、水果、养羊和酿酒外（酿酒业以不同方式吸引外资），制糖业是潘帕斯草原以外唯一吸引外资的重要活动。许多蔗糖厂（ingenios）是本国和外国股东的合营企业，使用进口（通常是英国的）设备。图库曼的甘蔗生产主要也由小土地拥有者经营。但他们是印欧混血的小农户，与门多萨的葡萄种植者完全不一样。图库曼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经营七、八公顷土地，其余经营的面积更小。同时蔗糖厂长期受一个坚不可摧的寡头集团控制，他们操纵付给生产者和出售给消费者

407

的价格，据说他们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保护，因而拥有惊人的财富。

图库曼制糖业中的劳资关系与东北部产茶地区的情况相似。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企图建立一支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劳动大军，但图库曼可怕的劳动条件透露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欧洲劳工这个来源立即化为泡影。于是就由查科的包工头虏掠来的未开化印第安人和卡塔马卡、拉里奥哈、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等南边几个省份来的印欧混血小农来替代欧洲移民。他们通常先是被诱骗欠债，然后集中在一起 用火车或货车运进图库曼。收获季节，就让这些头脑简单而又毫无生路的人露宿在田野上，在极端悲惨的条件下生活。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国外的许多人把这里的制糖业看成是种植园—资本主义丑恶行径的真正象征。甚至竭力美化共和国事务的劳埃德银行也把制糖业称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大污点”。

当腰缠万贯的地主和多数是外国人的大雇主们获取越来越丰厚的报酬时，却任凭那些辛苦劳累进行实际劳动创造这些报酬的人在不够最低生存标准的条件下生活。一个允许其广大人民在严重屈辱的条件下生活的国家，必将因缺乏不断向上发展所需的活力而蒙受损失。⑥

与门多萨和图库曼相比，内地其他地区仍在停滞和落后状态中一蹶不振。中央政府兴建的铁路已把所有省会同布宜诺斯艾利斯接通，但未能促使这些地方产生别处已经发生的变化。在铁道直接服务不到的地方，运送货物仍靠牛车拉骡驮。多少年来希望靠近科迪勒拉山的一部分地区发展为采矿中心的梦想，到1914年仍未实现。许多地区依旧保持着18世纪后期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统治时期的面貌，几乎毫无变化。传统的大庄园占据着支配地位，有时则与小农户同时并存，两者一起制造安第斯美洲典型的社会

408

⑥ 劳埃德编《20世纪阿根廷印象》第346页。

两极。小农仍需向领主交纳赋税。农村各行各业因进口货物的不断竞争和它自身技术落后而受损吃亏。除了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来的少数小商人外，这里很少新来人口。城市规模依然很小，衰败凋敝的样子反映出城市周围的贫困。省的行政管理和教育经费几乎经常需要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予补助。在这一切之外，还不时爆发政治动乱。当地敌对地主派系之间突然发动政变的事司空见惯，争相垄断省内微不足道的预算经费。然而在过去两代人时间内，政治在另外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1870年以前老联邦党人不断进行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武装叛乱，如今已被完全扑灭。从“孩子”佩尼亚洛萨或费利佩·巴雷拉*那时开始的农民（即高乔人）暴动也已消失，现在因社会或地区对立引起的政治冲突已不多见。社会大多似乎在浑浑噩噩无所追求的、偏狭的平衡状态中飘移。

内地大多数居民遭受肺炎、结核和各种胃病的毁灭性打击；婴儿死亡率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倍，甚至三倍；文盲率接近50%。内地同样人烟稀少，比巴塔哥尼亚地区稍密，但比潘帕斯草原人口稀疏得多。据估计，1910年耕地只占全部土地的1%。在拉里奥哈和卡塔马卡等最落后的地区，从山上流下来的宝贵的溪流河水仍按照18世纪那一套老办法进行分配。19世纪末，当地向智利和玻利维亚贩运牛和骡的交易一时又重新兴旺起来。恢复对智利的贸易是因为智利采矿业得到发展，又开发了太平洋沿岸 409 的硝石矿；恢复同玻利维亚的贸易则是因为后者在80年代初同智利打仗后丧失了到达太平洋的捷径，需要重开经过萨尔塔前往拉普拉塔河的通道。这使拉里奥哈和卡塔马卡等平原地区居民在一段期间再次交了好运，萨尔塔又成为重要贸易中心。但到1914年，这种贸易有的几乎全部消失，有的向门多萨和图库曼转移。这两

* 佩尼亚洛萨（Angel Vicente Peñaloza）和巴雷拉（Felipe Varela）分别为1863年和1866—1867年拉里奥哈前后两次农民暴动的领袖。——译者

个省从此进入新的发展中心的轨道，而一些较小省份继续在非专业化经济的半自给状态中徘徊。1914年的圣地亚哥一德尔埃斯特罗（不断增多的人口使它成为当时国内移民的主要来源），仍和150年前一样，保持农牧混合经济。当地在杜尔塞河两岸利用河水泛滥种植庄稼，因而能生产一些糖、葡萄酒、棉花和烟草；当地还繁殖骡子向玻利维亚出口。但所有这些规模都很小。现在的情况和多少世纪以来一样，高度盐碱的土质使它无法更快发展。西北部最边远的胡胡伊省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较大规模的制糖业以前，与南方市场只有少量接触。进行贸易的只是一些残存的土著居民，他们越过未被确认的边界，用羊驼毛和美洲驼毛到玻利维亚去交换盐和古柯。有些地区发生了倒退。19世纪末国际银价下跌后，西部拉里奥哈原来的银矿几乎全部关闭，有的甚至连矿址也已找不到。传统的力量到处超过变革的力量。甚至连科尔多瓦城也顽固地拒绝跨入20世纪（科尔多瓦省曾吸引大量欧洲移民，东部和南部已成为潘帕斯草原经济的一部分，还发展了实力雄厚的制鞋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省属地区依然由当地几个家族组成的顽固不化的寡头集团进行统治。一所被保守主义、经院哲学和教权主义缠得死气沉沉的大学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

布宜诺斯艾利斯

4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省没有一个地方，包括罗萨里奥和布兰卡港那样喧闹熙攘的商业中心，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匹敌。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依然象萨米恩托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片地广、人稀、落后的大陆边缘上一个孤独的先进欧洲文明前哨。它又是吞没这个新兴出口国家巨额财富的一个大旋涡。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先以其在国际贸易夹缝中的战略地位傲视它的广大后方。它是从拉普拉塔河河口越过潘帕斯草原向内地扇形展开的铁路系统的总枢纽。接近1900年时，它的出口地位落到了罗萨里奥

和布兰卡港后面，此后肉类贸易的重要性超过了谷物贸易，但它保持着集散进口货物的传统的有利垄断地位。它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重要的银行和金融中心。潘帕斯草原上继续存在大地产制也使它获得好处；从80年代初起，地主、银行家、商人开始把本来可以留在农村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城市，在这里建起了拉毛水泥外墙的豪华邸宅。这个城市也是政府、国家开支和国家用人的中枢。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化后，它分享到的国家贸易收入可能略有减少，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它积累的资源成倍增加，在其上层分子、官员集团、建筑承包商和制造商之间瓜分。此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现代化泊船设备已将近有30年之久，来访旅游者离船后无须再乘小舶驳运登岸。宪法广场或雷蒂罗区的大火车站可与伦敦或利物浦的车站相媲美。它有电车、地下铁道、现代化的下水道、自来水、煤气和发电设备，中央办公楼群坚固雄伟，宽阔的林荫道两旁蓝花楹成行，有些地方用瑞典花岗石铺设路面——总之，它当时几乎已成为世界上应有尽有程度最高的城市。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四分之三的儿童上小学。尽管估计仍有20%左右的居民死于结核病，但象70年代黄热病、霍乱等流行性传染病曾使大批居民死亡的类似事件已不再出现。

到1914年，并不是1880年划归联邦首都的所有土地上都盖了建筑物，联邦首都辖区内仍有农业和牧业。但随着国外移民的来到，新建筑迅速出现，大多是平屋顶平房，一律是西班牙人创造的一排排平行的象铁篦子那样的布局。电车对城内地价产生影响，正如铁路对城外地价产生影响一样。从1904年到1912年，地产价格上涨了9倍。如今全城按主要阶级泾渭分明地划分为若干居住区。北面到拉普拉塔河口是富裕家庭或有身份的人家（gente bien）的居住区。它从北区和帕莱尔莫的那些大邸宅一直向市中心伸展，经过贝尔格拉诺，到郊区比森特洛佩斯、奥利沃斯和圣伊西德罗的周末乡间别墅，然后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市中心和城西是中等阶级的居住区，一直扩展到弗洛雷斯。南面是

411

工人阶级居住区和工业区，这里除新蓬佩亚、巴拉卡斯、阿韦利亚内达和部分博卡区的一般住宅外，已能见到20世纪40年代和40年代以后的贫民窟（villas miserias）的前身。这些简陋房屋通常用粗糙的木板、废弃的包装箱板和简单的白铁皮屋顶盖成。夏天是闷热的蒸笼，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寒冷潮湿的冬天则是冰柜。城南把首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隔开的里亚丘埃洛河泛滥时，腐臭的河水常把窝棚冲走。这个时期比较常见的穷人住房是靠近市中心的那些大杂院（conventillos），住这种大杂院的约有15万人。半个世纪以前，最老的这种两层长方形建筑还是有钱人的住宅，宅内有西班牙风格的大院。19世纪70年代爆发流行病和最早的国外移民到来后，有钱人搬迁到别处，它们就成了出租的公共住宅。随后又盖了不少这样的住房供移民居住。50年前，这种住宅只住一户大家庭和他们的仆役，20世纪初却要住上二十来户人家，一起在拥挤、肮脏、糟杂的环境里苦挣着过日子。每间脏乱、黑暗的房间常常要住三、四个甚至更多人；25到30人合用盥洗设备和厕所。然而这种状况或许并不比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巴塞罗那、布鲁克林、费城或芝加哥更差。

这个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美国许多城市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国外来的移民从一开始就非常容易共处，只有少数例外，如不断扩大的犹太人社区。不同民族集团建立了不少俱乐部、学校、医院和互助会，然而很少人想要单独建立本民族的聚居区，永远保持自己的原籍。毫无疑问，这是由于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语言相近的缘故。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国家类似城市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直到1913年贸易和金融衰退以前，长期失业的比率一般比较低。在这个城市里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的国外移民，只要用一个夏天时间到地里去参加收割，就能积蓄够一笔钱回欧洲。尽管如此，城里也有身无分文的穷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报纸上时常发表一些暴露他们称之谓“乞讨工业”真相的引人注目的文章，揭露据说有人雇用患病或残疾儿童向人乞求施舍的行 412

为。⑦ 这里也是个犯罪猖獗的城市，虽然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还不算过于严重。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存在有组织的意大利黑手党活动，但是这些年由于贩卖白人奴隶而臭名远扬。大约从1903年开始，热那亚、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华沙等地大批无依无靠的贫穷少女被诱拐到阿根廷，卖入娼门当一辈子妓女。191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 300 家注册妓院。强制性登记只是当局的一种姿态，表示要控制这种社会公害和以此业为生的人。这种情况表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中存在着大量未婚男性移民。

在1914年以前的一代人时间内，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各阶层的人数至少翻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多样。社会的顶端是由大地主和其他大财产所有者、银行家以及控制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主流的上层分子所组成。到1914年，这个集团与50年前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它的成员已不仅仅是几十家克里奥尔家族——18世纪后期西班牙极端保守主义商人的最典型的直接后裔；它已变成一个人数更多的、极不正统的、由南欧和西欧所有国家来的人逐渐积聚起来的实体。一方面，安乔雷纳、格里科、坎波、卡萨雷斯那些家族的第四、第五代后裔依然还在；另一方面，现在更多的却是一些暴发的新贵。在那些新来的意大利血统的人物中，有一位叫安东尼奥·德沃托。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德沃托镇很快成了联邦首都西区著名的中等阶级居住区。德沃托在地产、银行、贸易、公共工程承包和制造业都拥有大量投资，这在当时整个上层阶层中有代表性。1910 年时他的地产遍布各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有7个牧场，占地8万公顷；在圣菲省有2个牧场，占地2.6万公顷；在科尔多瓦省有4个牧场，占地7.5万公顷；在偏远的拉潘帕地区还有1个牧场，占地3万公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还拥有大量市内产业。他又是意大利—拉普拉塔河银行的创办人和董事长。其他一些人，象第二代瑞士裔阿

⑦ 实例见1919年3月《人民评论》。

根廷人路易斯·楚贝比勒，拥有的财产与德沃托不相上下，分散在养牛牧场、土地垦殖公司、森林和制造业。类似的人物还有尼古拉斯·米哈诺维奇，大约50年前他从达尔马提亚来到阿根廷时是个身无分文的移民，1914年他几乎垄断了巴拉那河上往返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亚松森之间以及开往南方巴塔哥尼亚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的轮船。⑧上层分子的家属分散在法律、军队、公共管理等各种部门的岗位上。这个集团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按对立政治组织和氏族式家族系统分散结合。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邻里间朝夕相处所形成的紧密关系和农村协会、赛马总会等团体所培养的共同阶级感情。上层阶级中很多人生活阔绰，讲究排场，可与伦敦或纽约的同类人物一比高低。他们的邸宅令人想起巴黎的建筑和豪华。宅内布置最名贵的进口家具和古玩；邸宅后部是极为讲究的大花园。近些年来，上层分子已成为欧美最豪华高级轿车的热心顾主。

对阿根廷这个最主要的社会阶层进行观察的人士们普遍承认，它与拉美其他国家同一阶层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身上具有真正的民族意识。乔治·克列孟梭说过："我想我已确信，真正的阿根廷人有一种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它从泥土中蹦出，使他成为新人；他不是别人的子孙，却是今后绵延不绝的世世代代的祖先。"⑨有的人发现，他们所见到的强烈民族自豪感使人联想起美国的"命运天定"（Manifest Destiny）说。也有人认为，这里所谓的民族主义更象是纯粹排外的本土主义，享有高度特权的集团面临国外移民的汹涌浪潮时产生这种思想是很典型的。有人把发展高级文化尤其是发展大歌剧方面的成就归功于上层分子，　414
而喜欢多从坏处着想的观察家批评他们明显地沉缅于赛马等赌运

⑧ 豪尔赫·费德里科·萨瓦托著《关于现代阿根廷统治阶级形成的笔记》，阿根廷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油印稿（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第92—96页。

⑨ 引自雷金纳德·劳埃德编《20世纪阿根廷印象》第337页。

气的竞赛，这是把财富主要建筑在土地投机上面的阶级的特征。更多地持否定态度的观察家认为，许多男子生活放荡，反对厉行深居简出的家庭生活原则，使人强烈地联想到昔日的西班牙。妇女上层分子有时走出家庭参加活动，尤其是参加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女权运动。但后来当英国和美国妇女掀起的妇女参政运动达到高潮时，这里大部分妇女的成就似乎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个主要社会集团是中等阶级。此时，阿根廷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中等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说明这个国家财富不断增加的又一个标志。它还证明这个国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能把一批人凝聚在有限的市区范围内。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这些人会到别处更大范围内去发展。中等阶级几乎一律都有移民背景。另一方面，它大致可分为两大阶层，每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很不相同。下层中等阶级的成员大多是小工业生产者、店主和手艺人，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多，据1914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下层中等阶级中，外国人约占五分之四，总共或许有1.5万至2万人稍多一些。他们人数如此之多，这是过去那一代人的另一个惊人情况。全城各处有无数的面包师、裁缝、鞋匠、小酿啤酒商、巧克力、肥皂和香烟制造商、印刷商、木匠、铁匠、火柴制造商，还有跟前面这些人数量大致相等的街头巷尾的小店主（almaceneros）。这个阶层中的制造商经营的多数是小作坊，不是工厂。除肉类加工厂、面粉厂以及少数纺织厂和冶金厂外，每个生产单位参加劳动的通常不超过六、七个人，使用手工工具，不使用机器，而且大多将产品卖给附近街坊。这和欧洲许多国家首都——从伦敦或都柏林到伊斯坦布尔——的情况大同小异。但是阿根廷各地都没有本国的重工业中心来满足轻工业所需的消耗。而1890年后无论国内制造业发展速度多么快，进口总是至少保持同步。因此，满足阿根廷大部分工业消耗需要的原材料，是曼彻斯特、伯明翰、里昂，后来又是不来

415

梅、埃森和底特律这些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制造商还只是仍由谷物和肉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的附属物。出口部门、出口部门掌握的商品和出口创造的财富，对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它获得原料和劳力的程度以及它的市场的购买力的提高，都产生密切影响。1914年，制造商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他们力量薄弱，高度分散，政治上还没有多大发言权。

上层中等阶级的阵地是各种专业、公共管理、以及私营部门（如运输）中的白领工作等服务性和职业性工作岗位。与制造商和店主不同，这个阶层的成员这时主要是本地出生的人，但不少人还只是第一代阿根廷人，其社会地位超过了他们从事制造业或商业经营的父辈——这一点具有代表性。这个城市19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序言中提到，1905—1909年期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27,000人增加到218,000人，提高71%，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从医生、教员、公务人员到普通的补锅匠）从57,000人增加到估计150,000人，提高163%。⑩ 中等阶级的这个组成部分主要来自庞大而且不断扩大的第三产业部门，它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久前中央和市级政府机构的扩大。例如，中央政府的开支1900年为1.6亿纸比索，1910年增加到4亿纸比索，按人口平均从30比索增加到58比索。最明显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整个新的政府雇员阶层。1914年，中等阶级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和希望参加这支队伍的人，深深地卷进了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学毕业文凭和大学学位是进入各种专业和政府部门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这些人与制造商和手艺人不一样，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由于强烈支持不断扩大政府机构和高等教育，一再与上层分子发生争论。但除这一点以外，这两个社会阶层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双方在经济政策方面都严重保守。中等阶级对发展国内工业缺乏兴趣，宁愿通过进口来满足消费需要，因为这 416

⑩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人口总普查》（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第53页。

样可以少花钱而又不费力。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和上层分子一样贪婪地购买土地，虽然几乎从来不想当农民。由此可见，他们尽管享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声誉，但他们的利益和倾向性表明，不利于佃农的土地状况，把新来移民塞进城市大杂院(conventillos)的状况，都没有希望发生重大变化。

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的四分之三是外来移民，其余四分之一绝大多数是移民子女。1914年人口普查表明，工人阶级大概占全城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即在总共626,000名男性劳动力中，大约405,000人是工人阶级。大量工人受雇于商业和铁道部门，另外有相当数量在公用事业、电车、煤气公司等部门工作，有些则干清理下水道、收集垃圾等比较低下的活。在制造业工作的更多，有的是象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大企业，有的是遍布全城的小作坊。服务性职业的扩大对工人阶级结构也产生影响。从事家庭服务的或许多达20%，但当时女仆大约只占其中的一半。就业的工人阶级中，五分之一是妇女和儿童。1914年的前几年，很大一部分不熟练工人在大西洋两岸来回流动，或者轮流在城内工作或到城外参加季节性收割。然而在这以前的一些年里，工人阶级也在不断发生分化。手工业、建筑、冶金或交通运输部门有不少非常熟练的工人。有些上层的工人表现出劳工贵族的一些特征，如政治态度明显温和，关心工资差别，加入熟练工人的工会等。

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为工人阶级制订社会立法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欧许多城市，也落后于拉普拉塔河对岸相邻的蒙得维的亚。没有最低工资法，没有八小时或十小时工作日制法，也没有规定年金或退休办法。互助会和工会也没有针对国家这方面的缺点采取有效补救办法。但是这方面的不满常常被其他方面的不满掩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每个工人生活中的主要苦恼是住房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许多大杂院的状况非常悲惨。1914年，五分之四的工人家庭住一间房。除这个问题以外，工人

417

的条件总的来说较全面地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状况。进口货（这里主要指服装）常常很贵，政府的关税政策是一个原因，因为对工人阶级的某些日用必需品也课了税。另一方面，大多数普通食品价格便宜，营养也够，这就抵消了前面的问题。一般说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的实际收入比西欧大多数城市高。这些年工人阶级文化得到发展，开设了探戈舞酒吧，成立了拳击和足球俱乐部、工会和其他许多协会。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居民有富余收入和闲暇时间去过颇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即使如此，许多证据表明有些工人的条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十分恶劣。在外国大雇主中间，肉类加工厂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名声很坏。小雇主想各种办法虐待工人，这些雇主多数自己也是移民。城内小商店的工资少得可怜，每天工作18小时是常事。

就这样，1914年的阿根廷逐渐发展进入了一个极端混杂多样的社会。全国不少高度发达先进的地区和一些长期落后的地区同时并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随着经济增长浪潮的继续而逐步缩小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希望依然存在。根据这种假设，最迫切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国家需有新的制度来仲裁新兴阶级和地区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随时准备抛弃寡头统治制度，着手探求代议民主制。有些地区由于1900年后社会关系紧张，已做好改革准备；同时，这也是相信国家能够保持其原先的发展势头的一种表现。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样的假设多少是缺乏根据的。1914年，有些地区的前途依然充满希望。例如，东北部发展棉花生产，南部开发石油，这说明国家有办法减少进口和进一步促进国内制造业。但另一方面，潘帕斯草原正接近其发展顶点。1914年，阿根廷的发展潜力和某些方面的回旋余地正在缩小。后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不再保持早先的平稳上升曲线，而是繁荣和萧条交替发生，消费增长更加缓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有时出现短时的突然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民主改革的尝试。 418

119

第 12 章

阿根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革命

大战和战后经济

总的说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世界大萧条开始的15年内，阿根廷继续了战前以发展出口部门为基础的经济繁荣。1929年，阿根廷仍是世界最大的冷藏牛肉、玉米、亚麻仁和燕麦出口国，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和面粉出口国。小麦、玉米和亚麻仁的年均出口额由1910～1914年的210万吨、310万吨和68万吨分别增加到1925～1929年的420万吨、350万吨和160万吨。同期内，冷藏牛肉的出口由年均仅2.5万吨增加到40万吨以上。整个说来，以1950年价格计算，1910～1914年阿根廷的出口值平均为44.8亿比索，1925～1929年增加到79.14亿比索。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不亚于多数西欧国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文盲率进一步下降。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过着富裕安宁的生活。到1930年，阿根廷全国有43.5万辆汽车，比许多西欧国家多得多，比8年前则增加了7倍。由于移民的缘故，在1914到1930年间，人口几乎增加了400万，即由790万增加到1160万。国内的石油生产获得了惊人的发展。1913年，阿根廷生产的燃料油不足2.1万立方米，到1929年，产量已上升到140万立方米。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不如一次大战前的时期那么迅速和平稳。在1910～1914年以前的整整40年内，按要素价格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3%。而在1910～1914年和1925～1930年间，增长率降为3.5%。出口总额在1914年以前年增率超过6%，而1914年以后仅为3.9%。土地播种面积的增长率也由8.3%降为1.3%。草原地区的土地使用面积基本上没有扩大：在圣菲省没有丝毫增加，在科尔多瓦、恩特雷里奥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增加也不多。这一时期草原人口继续增加，但增长率明显低于战前。从1895年到1914年，农村人口增加约100万，而从1914年到1930年仅增加27万。前一时期每年增加5万人，后一时期每年只增加2.25万人。与此同时，建立新市镇的速度也显著下降。农业的发展主要不是由于增加了农业人口，而是由于机械化。阿根廷现在成了进口农业机器的大市场。1914年，机器在农村资本投资中占24%，1929年便提高到40%左右。这一年，阿根廷估计有3.2万台联合收割机、1.6万台拖拉机和1万台打谷机。20年代农业的增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改变了土地使用方法。1922至1929年间谷物和亚麻仁生产几乎翻了一番，这部分地是由于这几年减少了500万头牛从而减少了用于养牛和生产苜蓿饲草的土地面积的结果。牛的头数1922年估计为3,700万头，1930年只有3,200万头。同期内生产苜蓿的土地面积由700万公顷缩减为500万公顷。由于机械化，用于牧马的土地也减少了。另一方面，用于生产谷物的土地面积由1,100万公顷增加到1,900万公顷。1921/1922年度，生产谷物和亚麻仁的土地仅占草原地区耕地面积的56.5%，而到1929/1930年度已增加到73.5%。 420

1913年以后的铁路建设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外国投资。由此到1927年只增加了1,200公里的新铁路，其中大部分是支线或政府在内地铺设的线路。在1865～1869年和1910～1914年间，铁路线平均每年增长15.4%；而1910～1914年和1925～1929年间增长率降为1.4%。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全部停止了，20年代后期也仅有少量恢复。总的说来，外资的流入只及战前的1/5；在1913年至1927年之间，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比率由

48%降为34%。同样，1913年后的10年内移民基本上停止了。在1921至1930年间，净移民数仅为85.6万人，而1901至1910年间曾达110万人。战后初期人口平均增长率仅2.8%，而战前达4.3%。①

从1895年到1913年经济是稳步增长的，1913年起开始萧条（1913～1917年），接着是复苏和新的繁荣（1918～1921年）；然后是又一次衰退（1921～1924年），接着再次扩展，直到1929年。②这几次衰退具有许多类似19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那样的特征。它们是由于阿根廷出口市场收缩和商品出口价格下跌造成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国际收支危机，最后靠减少进口才得以克服，但政府减少了收入。1913年的萧条如同1873年和1890年一样，因外国投资停止而加剧。1914年，阿根廷放弃了金本位制和1899年建立的比索自由兑换计划（后来在1927～1929年间短期恢复了两年）。1913年和1921年的萧条都给城市和农村造成了失业，使城乡土地价格下跌，并引起大量的破产和严重的信贷紧缩。另一方面，阿根廷在这一时期设法避免了类似1890年那样的外债危机。1913年的外国投资有3/4是私人投资，政府基本的上不像早先那样承担义务，提供以黄金为基础的最低保证利润。

1913年萧条开始时正值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克服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制止由于巴尔干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动荡。当时阿根廷出现了收支付利润和偿付外债为形式的资金净外流。世界谷物和肉类价格的急剧下跌和1913～1914年农业的歉收加深了这场危机。数月以后，正当情况出现转机时，欧战爆发和公海上航运的取消使得外贸几乎完全停顿，这迫使德拉普拉萨政府在1914年8月份暂停偿付债务。第二年出口有所好转。但此时由于英国和

① 大部分数字见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纽黑文，1970）第一章。

② 上述周期在吉多·迪特利亚和曼努埃尔·齐默尔曼《阿根廷经济发展阶段》（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第295～420页有详尽叙述。

法国转向军火生产以及协约国对德国实行封锁，致使进口物品越来越匮乏，来自美国的供应只能部分地起缓解作用。

萧条一直延续到1917年底。此后，出口价格在战时需求的刺激下迅速提高。冻肉和肉罐头尤其如此，因协约国西线部队的消费量极大。1913～1914年的出口收入约4亿金比索，1919～1920年达11亿金比索，几乎增加2倍。即使如此，出口价格的上涨远赶不上进口价格：世界工业品的严重短缺使贸易条件大大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国。阿根廷的进口量由1913年的约1,000万吨（大部分是煤）减为1918年的仅260万吨。但是，由于战时运费上涨了4倍，付款却增加了1倍多，即由1913～1914年度的约4亿金比索增加到1919～1920年度的近8.5亿金比索。作为中立国，阿根廷全国避免了战争的物质破坏，包括在拉普拉塔河不受潜艇之害。但它无法摆脱战争引起的极有破坏性的经济影响。

直到19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存在着并不特殊的高失业率。过去在类似情况下它能通过原移民的外流而“输出”失业。尽管1913年后外流移民持续地超过新来者，这是189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但运费的猛涨和运输船的不足使正常的逃避困境的方法难以发挥作用，有些失业者被阻留在阿根廷国内。据估计，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大约16%至20%的劳动力失业。尽管向国外进行了移民，失业情况在1918年前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在战争头三年，工资下降，工作日延长，工会的处境极为不利。在战前繁荣期的最后一年即1912年到1916年末没有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战争进一步影响了公共部门。1913年后，随着进口下降，德拉普拉萨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关税收入不断减少。它还不得不用更大部分的收入偿付外债。如同19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一样，萧条迫使政府努力减少经常性支出。德拉普拉萨暂停了一些公共工程项目，仔细地削减了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这增加了失业，并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各省市都效法中央政府的政策。大家都不得不厉行紧缩和节约。 423

在1917至1921年间的周期上升阶段，形势有所变化。这期间出口价格上涨最猛，地主和商业公司发了空前的大财。据报道1918年有些肉类包装厂的利润相当于所投资金的近50%，不过，对其他人来说境况没有什么改善。代替失业的是通货膨胀的迅速上升和对中等阶级、特别是对下层阶级十分不利的收人再分配。除了战时因对外移民而使房租保持相当稳定外，通货膨胀深刻地影响到人民的所有主要消费品。在1914～1918年间，食品价格上涨50%。平常大部分依靠进口的一般服装衣着价格上涨了两倍。主要使用羊毛的国内纺织业没有起多少缓解作用。它帮助减少失业，主要是减少了妇女而不是男人的失业，但它无法制止价格上涨。从1913年萧条开始到1918年11月停战这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3]失业减少和生活水平下降是具有爆炸性的结合体。早先劳工的沉默突然结束了。在1917～1921年间，工会组织在阿根廷以空前的规模活跃起来，这种情况在本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从未见过；从前显然不存在的罢工，不论在次数和激烈程度上都增加了，并且最终使用了暴力。

与此同时，在整个大战期间进口不断减少，因而收入也不断减少。在改革税制以减少对进口税的依赖以前，政府只能靠借新债来缓和对节支的要求。这一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因为它从纽约一些银行获得了若干短期贷款，并在国内发行了短期公债。在1914～1918年间，由于借了新债，公共短期债务几乎增加三倍，由2.56亿比索增加到7.11亿比索。不过，1918年总支出4.21亿比索，与1914年大体相当，比这个时期中最低的1916年的3.75亿比索也多不了许多。这一情况在停战以后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时进口再次滚滚而来。自此以后，公共开支飞速增加。

424

③ 同上，第317页。关于战时通货膨胀的详情见亚历杭德罗·E·本赫著《当前经济问题》（1919；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1922年达到6.14亿比索，比1918年几乎高出50%。④

1921年开始的战后萧条再次引起了失业和工会运动衰落以及进口下降和国家收入再度减少。1920年进口值为21.2亿比索，而1922年仅为15.7亿比索。由于1920年提高了关税，同期的收入仅减少2,000万比索，即由4.81亿减为4.61亿比索。但由于公共支出从5.03亿提高到6.14亿，政府的短期债务也由6.82亿激增到8.93亿。此外，战后的萧条主要影响了养牛业，因为早先的大繁荣结束了。此后，在可耕地上恢复了种植业。

20世纪20年代末，农业部门的实际增长大部分发生在大草原地区以外。西北部的萨尔塔和胡胡伊同图库曼一起开发成为产糖区。1920年，萨尔塔和胡胡伊提供了全国糖产量的不足16%。到1930年，它们提供的比例已上升到近26%。更偏北的这些产糖区与图库曼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生产主要是在大庄园里进行的。从20年代起以至30年代，图库曼的甘蔗园主普遍收买北方的庄园。他们把有些庄园用来生产甘蔗，而另一些庄园他们购买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占有那些农民劳动力以便为种植园劳动。⑤得到发展的还有内格罗河谷的水果生产，查科地区的棉花、大米、花生和木薯，米西奥内斯的水果和巴拉圭茶。国内的原棉产量由1920～1924年间的年平均6,000吨增加到1930～1934年的3.5万吨。巴拉圭茶的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4.6万吨。里奥内格罗、查科和米西奥内斯三地都因涌进了新的欧洲移民和推广了小型农业而迅速发展。它们都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的国家领地；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在开拓殖民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结果，到1930年，资本主义小型农业以比战前大得多的规模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所有

425

④ 公共账目的数字引自戴维·洛克：《1890～1930年的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第224页。

⑤ 见伊恩·拉特里奇：《阿根廷北部的种植园和自耕农：1930～1943年萨尔塔和胡胡伊的甘蔗业》，载戴维·洛克编《20世纪的阿根廷》（伦敦，1975）第88～113页。

这些地区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的合同农工。大批智利人被招募到里奥内格罗和内乌肯的农场，而巴拉圭人、墨西哥人和科连特斯人则被招募到东北部的农场。⑥

1913年后，国内工业总的增长速度与整个经济大致一样，但战后的增长速度比大战期间那几年要快得多。以1950年的基数为100，工业生产的指数1914年为20.3，1918年为22.1，而1929年达45.6。大战期间的指数每年增加0.36，而战后每年增加2.10。⑦20年代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样化，例如在耐用消费品、化工、电力、特别是金属工业等部门。20年代后期冶金工业蓬勃发展。1926～1929年生产指数由29增加到43（以1950年为100）。⑧即使这样，制造业的增长大部分仍属轻工业和传统工业，保持了1914年以前的格局。与此同时，纺织工业基本上停滞。制造业的增长也未能影响阿根廷很高的进口系数：这几年的进口系数在25%左右，大体上与1914年一样。

20年代进入阿根廷的外国投资额比战前少得多，主要投资来源是美国。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投资比英国几乎多一倍。到1930年，美国投资总额相当于英国投资总额的约1/3，由1913年的估计4,000万金比索增加到1929年的6.11亿金比索。从前美国人几乎只对肉类生意感兴趣，现在他们成了积极的政府贷款提供者，出口商和地方工业的投资者。1924～1933年，美国工业公司在阿根廷建立了23家子公司；其他一些美国商品获许可在当地制造。表面上，这反映经济的日益成熟，表明它有能力实行多种经营而不限于出口农产品，还说明它能创造新的就业门路。但是，20年

⑥ 关于内地农业，见海梅·富克斯：《阿根廷的资本主义发展》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第217～224页；里卡多·M·奥尔蒂斯，《阿根廷经济史（1850～1930年）》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第131—148页。

⑦ 迪特里亚和齐默尔曼：《阿根廷经济发展阶段》第309、393页。

⑧ 同上，第391页。

代工业的增长仍然没有使基本经济结构有多大改变。除石油外，它带来的后向联系较少。美国公司或使用美国专利的本国企业所用的机器、大部分燃料、原料和技术基本上依靠进口。这样，总的结果是不得不在进口账单上增加必需支付的附加费用，而制造业和城市就业像从前一样依赖出口的外汇收入。

426

同时，从美国进口的增长引起阿根廷同英国的关系紧张起来。1914年，来自美国的进口值是4300万金比索。19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69亿，1920年为3.1亿。这个趋势在整个20年代一直继续下去。到1929年，美国对阿根廷的出口值达5.16亿金比索。大战期间，美国人主要靠牺牲德国人的利益而获利，之后又以英国人的利益为代价；20年代英国人发现他们在过去100年主要控制的市场内受到了严重挑战。英国人在阿根廷市场所占份额由1911～1913年的30%降为1929～1930年的19%，而美国人所占的份额由15%增加到24%。英国人虽然向阿根廷增加了煤和铁路器材的出口，但在需求增长最快的汽车以及工农业所需资本货方面却无法与美国人竞争。进口贸易的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出口的相应变化：阿根廷未能在美国获得稳定和日益扩大的市场。尽管战时对美国的出口暂时有所增加（1911～1913年年占出口总额的6.3%），但到1928～1930年仍不过占9.3%。20年代末，阿根廷85%的出口物仍然流向西欧。所以出口趋势几乎刚好与进口趋势相反。阿根廷现在从英国购买的货物虽然少得多了，但它对英国的出口却从1911～1913年的26.1%增加到1928～1930年的32.5%：这个国家在使它的进口来源多样化，但却在缩小它的出口市场。

战时和战后的政治

伊里戈延（1916—1922年）

政治上，阿根廷在1916～1930年进行了首次也是最持久的一次关于代议制民主的试验，这些试验全都失败了。与毗邻的巴拉

427 主一起，阿根廷在拉美国家中率先在20世纪初寻求发展最具西方先进社会特色的政治制度和体制。1912年，在罗克·萨恩斯·培尼亚（1911～1914年任总统）领导的进步派敦促下，旧统治阶级改革了政治制度，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和稳定化。自从激进公民联盟在19世纪90年代初出现后，人们对寡头集团统治的牢固性已经逐渐丧失信心。1905年起义失败后，激进党开始在新兴的城乡中产阶级中间吸收大批追随者，扩大他们的力量基础。他们进行半秘密活动，继续威胁要用武力推翻现政权，除非满足他们对“民主”和“恢复宪法”的要求。第二个不满来源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1900年后，好斗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了一系列有时采取暴力的大罢工。在1910年萨恩斯·培尼亚当选时，许多涉嫌的无政府主义者已被投入监狱或被驱逐出境，运动表面上已被粉碎。但是，导致城市动荡的大多数条件并没有改变。为了应付对稳定的这两重威胁，萨恩斯·培尼亚在1912年的选举改革法中提出要给成年男子普选权，使少数派在国民议会有代表席位，以及制止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他认为政治秩序是继续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如果说我们开始自我标榜，那是因为我们已能够显示国民政府压倒一切的力量，启发一种安全感、和平感和信任感。我不会支持压迫，但我谴责革命……我不相信我们能巩固我们目前的地位，除非我们在有秩序的气候下完善我们自己”。⑧

萨恩斯·培尼亚在国民议会中的一名支持者拉蒙·卡卡诺在谈到激进党时说：“20年来，我国存在着一个有组织而很得人心的、生气勃勃的党，它把选举自由作为它的旗帜，并公开支持革命，认为它是实现其理想的唯一道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政府和国家都不得不镇压叛乱，或者担心叛乱迫在眉睫……改革

⑧ 罗克·萨恩斯·培尼亚：《罗克·萨恩斯·培尼亚博士就任国家总统时的演说》（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第40页。

选举制度……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实行国家赖以团结的唯一政策：解除武装的政策，消除选举中的弃权行为和叛乱；将所有积极的政治力量都吸收到选举进程中来。”[10]除了让激进党满意外，其目的还在于给温和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社会党（建于1894年）一个取代无政府主义派的机会。1912年国民参议会的一位保守派议员贝尼托·比利亚努埃瓦建议“打开一个安全阀，允许两三个社会党人参加国民议会，特别是在现在工人阶级发生骚动而关于罢工的立法即将讨论的时候。”[11]最后，萨恩斯·培尼亚和他的集团还希望推动各寡头政治派别创立一个能够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强大、团结的保守党。1912年，各种前景似乎都说明这些目标能够实现。这样，1916年萨恩斯·培尼亚在任期结束时，将向一位像他一样的进步保守党人交权，他的地位将由于在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而得到加强。这将削弱激进党，并使他们丧失进行革命的主要籍口。即使它不能使工人驯服，它也将能在发生新的冲突时加强政府的实力。

1912年后，事态的发展同人们的预计大不相同。社会党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但它未能控制工人阶级的工会。尽管无政府主义继续走向衰落，一种新的工团主义运动却代之而起，并于1915年接管了主要工会组织——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与此同时，激进党在全国各地显著发展。而保守派则停滞不前。他们为自身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与其主要对手不同，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民运动。1912年后他们分裂了，一部分人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马塞利诺·乌加特，一部分人支持以圣菲为基地的进步民主党领袖利桑德罗·德拉托雷。这种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萧条的征兆。1912年后地价的下跌、信贷的紧缩和出口收入的减少越来越使保守派

---

[10] 众议院《会议日志》1911年，第二卷，第160页。

[11] 参议院《会议日志》1911年第二卷，第338页。

阵营感到沮丧。萨恩斯·培尼亚没有为制止分裂和衰落做任何事情，到1914年8月他死于癌症时，事态已因放任太久而难以挽回了。继萨恩斯·培尼亚为总统的年已古稀的金融家维多利诺·德拉

429

普拉萨不久便被战争的经济影响所困，很少有机会搞政治权谋。这样，1916年选举的意外结果是激进党及其领导人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赢得了胜利，虽然仅仅是微弱多数。

1916年伊里戈延按成年男子普选原则在第一次全国大选中当选为总统，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阿根廷政治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新执政党容纳了人民中过去享受不到什么实际代表权的阶层。人们预料他们会推动革新。保守派虽然遭到失败，并且不信任伊里戈延，但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激进党接受了选举政治，看来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想法。伊里戈延没有表示他决心进行重大变革。他的党虽然得到众多中产阶级的支持，但也接纳了很大比例的上层分子成员。最近的这次选举除了变换了总统外别无作为。保守派通过在参院的绝对多数而把持着国民议会。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许多省份。在其他一些重要部门——军队、教会、农村协会等等中，他们的势力同样没有缩小。他们通过让步建立了人民民主；但他们已经给予人们的东西也同样可以取走。伊里戈延赢得他的地位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一半是靠老统治阶级的礼让，他被授权是有很高条件的：他必须维持现状，同时减少民众骚动。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第一个六年任期（1916～1922年）远远没有象保守派希望的那样成为向代议制民主顺利过渡的时期。它受到改变了社会各主要阶级收入分配状况的战时通货膨胀的密切影响，也受到1916～1922年这一时期发生的萧条与繁荣周期的密切影响。正如我们所见，通货膨胀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国内一些地区工人阶级中间爆发长期骚动提供了基础。主要事件有1919年1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总罢工和1920～1922年巴塔哥尼亚的一系列农村劳工运动。经济周期使进口、从而也使政府收入发

生波动。而收入的多寡对政府增加人民支持、削弱反对派保守派势力的能力有重大关系。它们直接影响到政府同享有参政权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关系，这个阶层的许多成员受雇于公共行政部门。1919年前，激进党政府主要通过支持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来培植中产阶级。之后，它日益依靠庇护关系。从较长远的观点看，有各种各样的势力促使伊里戈延缩小他的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政治基础。阿根廷政治中由此产生了阶级裂痕，这与他在1930年被推翻有密切关系。 430

起初，在新的激进党政府与其保守派前任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延续性气氛。伊里戈延小心翼翼地争取象教会这类保守派团体的支持，他的内阁由传统的上层分子成员组成。他们大多数是农村协会的会员，该协会是畜牧业主的主要保护者。由于伊里戈延重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国际事务也表现了延续性。在他就任的最初数月，这位新总统不断触怒保守派舆论，因为他政治活动隐秘，还因为他对礼仪采取漫不在乎的态度，例如他漠视出席国民议会开幕式的这种既定习惯等。不过，在大多数一般的政策问题上，他的表现是稳妥和符合常规的。

1916年末新政府向国民议会提交的立法提案是一个时期以来公开讨论要采取的措施，内容被认为是温和的。政府要求拨款用于新的国家土地开发计划，要求紧急拨款帮助最近遇到旱灾的农民，要求建立新的国家银行以便为农业提供更好的信贷安排，以及要求发展船队以解决战时运输费高昂的问题。1918年政府又提议征收所得税。伊里戈延的错误是他在1916年要求国民议会拨给1亿比索的巨款来实施这些各种各样的措施。保守派立即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钱将用于党派目的。议会呼吁节约，对政府的提案草草讨论后就予以拒绝。议会反对的并不是这些措施本身；它是不愿意让政府在财政上独立——如果把伊里戈延能支配的资金限制在最低水平，他可能少制造些麻烦。这类关于批准和处理公共基金问题的辩论在他任总统期间不断发生，也是政府和保守派反对

431 党之间分歧越来越大的原因。有几年议会没有投票通过年度预算，政府的回答是简单地以内阁决议方式实行开支。1919年后这成了伊里戈延增加国家支出的主要方法。政府和议会在财政问题上的不断争吵是1922年前立法记录几乎空空如也的主要原因之一。伊里戈延的一大成就是根据第10676号法律于1920年终于创立了一家农业抵押银行。根据这项立法，农民购买土地可获得较宽厚的信贷条件。该法律帮助在大草原外缘和国家领地上进行殖民开拓工作。⑫

总统只有改变议会成员并赢得多数才能胜过议会。为此，他必须控制各省并设法取代各省的保守派省长和他们的党派机器。象他以前的罗加、佩列格里尼和菲格罗亚·阿尔科塔一样，伊里戈延求助于联邦的干预。对各省的干预和与此有关的选举问题是他任职最初三年内某些最激烈的争议的根源。最严重的一次争议发生在1917年初，当时伊里戈延不顾议会关于这类事情必须有议会立法的意见，下指令干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反对马塞利诺·乌加特。在他当政的六年中，一共发生了20起前所未有的联邦干预事件，其中15次是通过下指令进行的。但大多数发生在1918年以后，当时激进党和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了更紧张阶段。多数干预发生在落后的内地省分，在那里控制行政部门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照顾、职业和信贷乃是取得政治优势的关键。主要由于联邦的干预，1918年激进党在全国众议院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他们未能做到的是控制参议院，参议员任期有九年之久，每三年改选1/3。⑬

1919年前，激进党政府试图加强它同中产阶级的联系，故支持大学改革运动——1918年于科尔多瓦开始出现的《改 革》(La R

---

⑫ 见罗伯托·埃切帕雷博尔达：《伊里戈延和议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关于农业立法，见奥尔蒂斯：《经济史》第一卷第57页。

⑬ 见鲁道夫·马雷诺：《联邦对各省的干预》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

eforma），是鼓动高教改革运动的高潮。当时阿根廷有三所大学：科尔多瓦大学（1617年由耶稣会创办）、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成立于1812年）和拉普拉塔大学（成立于1890年）。这些大学的在校学生由1900年的约3000名增加到1918年的1.4万名左右。432在1918年前的10多年中，科尔多瓦一成不变的在职办公人员与移民出身的新中产阶级（他们的子女在学生中人数不断增加）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争时期，学生中长期存在的关于改进大学教学和调整课程的要求因受国外事变特别是俄国革命和墨西哥革命的影响而激进化了。科尔多瓦开始出现改革运动：一个新的学生会——阿根廷大学联合会——组织了一系列战斗性罢课，发表了大量宣言。它们要求在大学管理当局中有学生代表，要求改革考试办法和制止在聘任专业人员中的任人唯亲。在191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科尔多瓦大学及其所在城市陷入了混乱。第二年，学生罢课蔓延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

激进党政府不断支持学生。1918年，伊里戈延向科尔多瓦派去了以赞成改革运动闻名的个人代表。他们实行了学生们认为必须实行的许多改革，并且试图将激进主义笼统的民主理想同那些从改革运动中产生的种种理论主张相结合。后来，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实行了类似的改革。三所大学最后都获得了新章程，据说是为了保证它们的自治，实际上是将它们置于中央政府更直接的控制之下。1919和1921年在圣菲和图库曼创办新大学后，那里实行了同样的制度。激进党政府对大学改革的支持早就被人看作是它的比较积极持久的成就。在这里，伊里戈延设法向一个特权领域提出了挑战，并使自己同民主化联系在一起，而不给保守的反对党占上风。

他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联系所产生的成果小得多，这是由于激进党和社会党之间在首都激烈争夺人民多数之故。两党的竞争在1912年这个城市根据萨恩斯·培尼亚法举行首次选举时就开始了，1930年前的整个时期都在进行。社会党人在

1912年已经在该市获得了3万张以上的选票。后来，他们所得选票数增加了1倍，不久又增加了2倍，同时他们在选民中站稳了脚跟。但社会党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控制，它的主要选举力量一方面来自工人，同时它也吸引了许多白领集团和小企业主。它的纲领不怎么强调财产的社会化，而更多地着眼于保护城市消费者的利益。这个党的主要弱点在于它得不到工会的支持，这主要因为它采取了温和立场。1910年前它经常败于无政府主义者之手，后来又受制于工联主义者，后者在1915年接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工会——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FORA）。激进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利用社会党和工会之间的这种裂隙，把有选举权的工会会员拉到自己一边。

争取工人阶级的选票在191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总统竞选时已经成为头等大事，在伊里戈延上台后依然如此。激进党的攻势始于1916年底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爆发罢工的时候。这次罢工是由一个名叫海运工人联合会的团体组织的。这个团体受工联主义者领导，而这些工联主义者有些不同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前辈。他们大多数不是移民而是当地出生的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讲讲阶级革命的目标，而几乎只对工资问题有兴趣。伊里戈延从海员罢工中看到了改善他在工人阶级中的声誉和削弱社会党的机会。罢工开始时，当局采取的行动暗示它同情工人的事业。它表现出力图避免使用警察手段进行镇压，而在这以前通常是这样干的。相反，政府官员把一些工会领导人找来，劝他们接受调解。在最后裁决时，罢工工人的要求大部分得到了满足。

政府对这次罢工和其他事情的干预很快升级为一大政治问题。在一个时期内，它为激进党在工会和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中赢得了一定的人心，帮助它在大选中战胜了社会党。191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激进党获得59,061票，占总票数的47.1%；1918年他们获票数增加到74,180张，占总票数的51.7%。但这些选举成就是以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为代价的，这种

反对很快从议会和新闻界发展到以农村协会为首的几大特殊利益 434
社团。1917和1918年，罢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及到英国人办的铁路公司。主要由于战时煤的进口成本高，这里的工作条件恶化了，工资也降低了。当政府似乎要再次站到工人一边时，英国实业界也起而反对，它指责政府为亲德。在一些主要的英国公司推动下，雇主们建立了一个破坏罢工的团体——全国劳工协会，它发誓要同工会“鼓动者”展开全面斗争。

随后数月，工人方面相当平静。到1919年1月初，工人阶级的不满突然以更猛烈的程度重新爆发。后来以“悲惨的一周”著称的这一事件起源于1918年12月初开始的一次冶金工人罢工。大战期间冶金工业受到的打击也许比其他任何工业都大。它的原料全部依靠进口，而此时由于运费高昂及因制造武器导致的世界性短缺，价格达到了天文数字。在原料价格上涨的同时，工资却减少了。到大战结束时，冶金工人处境凄惨。这次罢工是求生存的一场斗争。很快发生了暴力，警察受命进行干预。在罢工工人打死了一名市区警察后，后者组织了报复性伏击。两天后，在双方的争斗中有5人被杀。

这一来全市为之沸腾。工人们不理睬工联主义者提出的要工人采取温和行动的请求，举行了大罢工，并参加了全市悼念警察袭击受害者的盛大游行队伍。接着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事态迅速扩大，政府不知所措。在它犹豫不决时，军队进行了干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前警察局长路易斯·F·德列皮亚内将军的指挥下，装备了大炮机枪的军事部队出动镇压工人。德列皮亚内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罢工工人很快被驱散。不久，整个运动剩下的只有因全市食品匮乏而不时爆发的饥饿骚动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时，伊里戈延大部分时间静静地置身事外。他知道陆海军人士中有一股危险的反对情绪，这不仅起源于他的劳工政策，还由于他利用军队的晋级照顾了激进党的同情者以及他在最近干预联邦事务时使用了军队。到1919年1月，武装部队 435

中有些人准备推翻他。在这种气候下，激进党政府成了保守派为最近的动乱蓄意采取报复行动的俘虏。罢工事件结束后，涌现了为数很多的民间治安维持团。经过军队马马虎虎的指导操练和步枪实习后，他们被派遣上街。但不久他们的活动就集中指向市内的俄国——犹太人社区。那些人成了主要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这次大罢工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奏，据说是苏俄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导演的世界阴谋的一部分。在阿根廷，如同感染到这种恐惧心理的美洲其他地区和西欧一样，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如此，它挑起的反应使200个受害者丧生。排外情绪和反劳工、反共及反犹情绪一起被保守派用来克服使他们在1916年选举中败北的那种孤立和不团结。他们制造出了一个包括许多激进党人在内的民众运动，军队的支持使它成为一个与政府并行并有潜在竞争力的权力中心。在暴力行为最终停息后，这些治安维持团自己组成了一个名叫“阿根廷爱国者联盟”的团体。

1919年 3 月，联邦首都举行了一次至关紧要的参议院选举。这次激进党取得了胜利，但在总数9.9万张选票中仅获得3,000张的微弱多数票。不到一年，他们得票的比率即由51%以上降到40%以下。而以进步民主党为代表的保守派所得选票却由9,030张增加到超过3.6万张。这说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产阶级有许多人背离了激进党。这既是为最近的罢工事件对政府投的不信任票，也是一种支持保守派的强烈表示。

1920年末发生了又一轮大骚动，这次是在巴塔哥尼亚。它从城镇开始，而后向外扩散到养殖绵羊的大畜牧场。为了在更边远的地区发动罢工，罢工参加者自己组成了武装团伙。他们同牧场主的交火使后者急切要求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予援助。爱国者联盟断言这次罢工是给智利在这个地区的兼并主义阴谋打掩护，要求采取行动。伊里戈延又一次无法拒绝。政府派遣了一支军事讨伐队去镇压罢工。在整个1921和1922年的长期军事行动中，不时传

出关于军队暴行的大量报道，罢工被粉碎了。[14]

这些劳工骚动事件一再反映出伊里戈延政权的脆弱性。为了重新获得支持，他转向了民众主义并广施恩惠。1919年年中以后，随着进口和收入的恢复，国家的支出开始直线上升。联邦对各省大肆干预。通过给追随者封官许愿并在各省给以奖赏，伊里戈延很快恢复了个人声望。1919年底，企图在参议院弹劾总统的一项议案受到激进党人的阻挠后不了了之，同时巴塔哥尼亚的罢工则部分地成为转移军队和爱国者联盟的视线、使之少关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治的一种手段。在1920年初的议会选举中，激进党再次击败了社会党和进步民主党的挑战，后者所得选票比例减少了许多。之后，保守派为竞选提出的挑战迅速减少了（他们在1922年与1916年一样在分裂中参加总统竞选；进步民主党仅获5.8%的选票，一个新的为参加总统竞选而组织起来的保守派团体“国民集中党”获得12.2%）。到1922年，激进党在全国范围的政治组织超过了所有反对派加在一起的力量。但伊里戈延任意进行联邦干预，以及在战后萧条时期政府收入再次开始减少时他采取的大量支出政策，遭到保守派新的严厉批评。他奖励中产阶级追随者的作法也挑起了同自己党内贵族派的摩擦。激进党的不同政见者与保守派一样猛烈攻击总统的“个人至上主义”领导，指责他制造财政混乱并将腐败无能的党徒提升到政府的关键岗位。人们预言，如果这种“煽动行为”不加制止，政府有可能垮台。1916年保守势力同意伊里戈延上台是因为相信他会保护连续性和政局稳定。在大多数地区无疑是存在连续性的：激进党的改革成就微不足道。但在另一方面，到1922年，政局的稳定看来仍然像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一样地遥远。 437

---

[14] 关于巴塔哥尼亚事件，奥斯瓦尔多·巴耶尔作了戏剧般的生动的详细叙述，见其所著《帕塔戈尼亚惨案的复仇者》（二卷，197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阿尔韦亚尔(1922～1928年)

1922年伊里戈延任期结束，这使他的反对者大大松一口气。他的继任者是马塞洛·T·德·阿尔韦亚尔，来自这个国家最古老和最富有的一个家族。他由大多数省分选出，以过半数民选票击败了保守派和社会党的对抗。新总统上台时正值战后萧条的顶点。这次经济周期再次掩盖了他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牛肉生产业危机、关税改革和公共债务。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反映了肉类包装厂如今在阿根廷政治中所掌握的力量有多大。第二个问题说明19世纪对关税和工业保护的态度到20世纪仍大体盛行。与此同时，阿尔韦亚尔对公共债务问题的处理办法密切影响了整个20年代的政治。它导致了1924年激进党的分裂，反映了作为总统的阿尔韦亚尔越来越软弱，并促使伊里戈延作为民众领袖而东山再起，准备参加1928年的总统竞选。

1900年后美英肉类包装厂的出现和优质冷藏牛肉出口的不断增加，引起阿根廷的养牛业发生重大变革。在大草原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为改良品种、特别是改良短角牛进行了大量投资。同时，牧场主在牲口繁殖和催肥方面发展了专业化。但在大战期间这一趋势突然停止了。冷藏牛肉贸易暂时停顿，而冰冻牛肉和罐头牛肉的出口迅速增加；由于肉质要求降低，所以不再需要用优良牛种，也不必在屠宰前在专门的牧场上催肥。从1914到1921年，所有大牧场主，不论他们所养牛的质量如何，都为肉类冰冻和装罐业服务，并从这项兴旺买卖中获得了大体相等的利益。在萨拉特、孔科迪亚和拉普拉塔建立了一些新的肉类包装厂。繁荣越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扩大到了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这些非中心的养牛地区，那里的牛群大多数是传统的克里奥尔种。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拥有大量银行信贷的城市公司被大批地吸引到养牛业。从1914至1921年，阿根廷的养牛头数增加了约50%，即由2600万头增加到

438

3700万头。

这次繁荣于1921年结束，当年英国政府停止贮存来自阿根廷的供应，取消肉类管制，并开始清理自己的库存。1921年阿根廷屠宰供出口的牛的头数比1918年减少一半多。价格也降了一半。冰冻牛肉和罐头牛肉的生产一落千丈，以至几乎陷于停顿。之后，经过了7年，仅剩的一点点贸易又被冷藏牛肉所控制。一时，从生产育畜的普通农民到象阿摩尔和斯威夫特这类大包装厂，凡是畜牧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受到萧条的打击。但由于养牛业的组织是垂直的，它遭受的损失并不平均分担。有些部门在给为它们服务的下属部门付款时压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的盈利。具有这种能力和行动自由的，主要是一些肉类包装厂。饲养短角牛的畜牧场主也可转向做冷藏牛肉生意而避开萧条的全部影响，而专门从事催肥的畜牧场可象肉类包装厂那样，在付款给繁殖场时削价。除了繁殖场，萧条的主要受害者是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省的牧主，他们错误地过多投资于克里奥尔种牛，还有战时的所有那帮投机商，他们手里积压的那些毫无用处的牛群同样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现在还面临到期不能偿还抵押债务而一筹莫展。

在危机顶峰时，有一部分繁殖场主设法控制了农村协会。他们利用这个有威望的机构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进行干预以对付肉类包装厂。他们指责后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而实行垄断性收购。为了对付这种垄断，农村协会建议创办一家当地人的包装厂，其收购价格将高于美国和英国买主。为了帮助饲养过多克里奥尔牛群的牧主，还想出了其他一些办法。他们建议按照重量标准而不按照品种来确定牛的最低价格，其次是不准外国肉类包装商向国内市场供货，以便为拥有劣种牛的牧场主保留市场。1923年，在政府支持下，议会通过了包含这些建议大部分内容的立法，但是把它们形成条例的努力却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包装商进行了报复，对所有牛的采购实行禁运，这一下很快使牧场主陷于 439

混乱和分裂。不久以后，政府将整个计划束之高阁，没有再采取进一步行动。繁殖场主不得不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渡过萧条期。

人们有时把1923年阿尔韦尔向议会提出改革国家关税的建议说成是为了鼓励本国制造业而强烈地转向保护主义。这当然是总统在建议的前言中所宣布的目的。他建议降低冶金工业所需进口原料的关税，其次是将19世纪80年代给予糖、酒的保护扩大到棉花、巴拉圭茶和温带水果。但这对整个制造业的影响很小。如果说这类措施是保护主义，它们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政策的继续。它们主要对查科和里奥内格罗这些政府打算开拓的农业区有意义。此外，阿尔韦亚尔还建议对进口品的关税估价统一提高80%。这里的变化不在于关税本身，而在于对进口品的海关评估值。为此而应用了一种可变关税表。议会将提高估价的比率调整为60%，在这以前，1920年伊里戈延当政时已经提高了20%。三年内一共提高80%，看来增幅不小，但实际上仅够补偿大战期间进口物价的上涨。如前所述，这是税率估价方面的变化，而主要不是关税本身的变化；而后者提供了指导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机会。这样做的全部成果就是在8年后又大体上回到了当初进行估价的1914年。由于通货膨胀，估价的关税由当初1906年占实际价值的约25%，降为1921年的平均仅9.4%。因此，1923年的关税改革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是保护主义的。它有多种主要目的：增加政府收入，同时在战后衰退时期减少进口，援助开拓计划，防止再次出现1920年那样导致外国制造商大量倾销的事件。所有这 440 些目标中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1923年阿尔韦亚尔给议会的信中说，当时的关税估算法“显然不公正”，是造成“国民收入令人不快地下降”的原因。

20年代初对关税问题和国内工业的看法受到前十年事件的强烈感染。从1913到1920年，首先是由于萧条而后是由于战争，当地工业获得空前的、虽然也许是身不由己的保护。但在战后一代

人眼里，取得的全部成绩看来不过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而让奸商赚得暴利，以及一系列几乎引起工人革命的罢工。为了对付这种事态，必须恢复战前的稳定。关于民族工业的观点与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看法基本相同。对国内产品的保护只有在它们同进口品（大部分是农产品）很快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时才是正当的，否则便是“人为的”：通过保护政策支持它们将导致经济上慢性的缺乏效率。如果说它有助于就业和减少进口需求，可是它同时也将使价格上涨并压低总消费。1923年的关税改革对20年代的工业可能没有什么影响，这一时期工业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来了新的移民和美国开始投资。如果说整个工业在20年代受到了比1914年以前大得多的保护，那可能同其他部门一样是由于对进口品征收了隐秘的附加税，这是1921～1926年间比索贬值的结果。

作为关税改革的补充，阿尔韦亚尔还着手解决政府支出和公共债务问题。1923年他的财政部长拉斐尔·埃雷拉·维加斯预言，由于“偿付10亿短期债务和6.04亿预算支出”，阿根廷将面临“国家破产”。[15]他和阿尔韦亚尔都决心制止自1919年以来发生的经济滑坡，使之不滑向他们认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财政紧缩政策在激进党普通成员中间极不得人心。对他们来说，国家的高支出不仅意味着事业机遇和社会升迁、而且是摆脱萧条的一种方法。为了控制政府支出，就需要在政府中取消伊里戈延的任命，许多任命是1922年总统选举前不久作出的。阿尔韦亚尔决心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考虑它包含的危险性以及它对他同伊里戈延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舍弃了他前任的有争议的做法——通过简单的内阁决议来授权支出，而恢复了议会对财政事务的全部监督权。从1922年底到1924年，发生了多次反对政府贪污腐败的运动以及一系列的清洗和解职事件。到1925年，一切似乎都比较有

441

⑮ 引自洛克：《阿根廷政治》，第225页。

了秩序。由于进行了关税改革和走出了萧条，政府的收入状况大为改善。虽然总的来说阿尔韦亚尔没能制止公共支出的上升趋势，他最终却使收入与支出达到了平衡，并使短期债务的增长放慢了速度。

但这使他付出了重大代价。由于清洗和大大削减开支的结果，阿尔韦亚尔对党的控制迅速崩溃。1924年年中，激进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是议会和选区委员会的多数派，他们背弃阿尔韦亚尔，表示仍然忠于伊里戈延。他们自称是伊里戈延派。其余的人自称“反个人效忠派”激进党人，他们采用这个称号以表示反对伊里戈延。后一派人主要由党内保守分子和贵族分子所组成，还包括各省的许多激进党人，他们由于1919年后伊里戈延实行针对他们的联邦干预而与他疏远。1924年后，两派为取得党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此时支配阿尔韦亚尔政府的不是政策而是政治。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伊里戈延派破坏他的立法计划。总统最初同反个人效忠派结盟，但为了使党重新团结，1925年他脱离了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提出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进行针对伊里戈延派的联邦干预的要求。1925年7月，反个人效忠派的内政部长比森特·加略辞职。由于失去了阿尔韦亚尔的支持，反个人效忠派的挑战很快减弱了。不久它仅仅成了另一个保守派别，一个以其圣菲支部为主的地方集团的联盟而已。

阿尔韦亚尔不愿亲近反个人效忠派并运用总统权力支持他们，这就为伊里戈延打开了方便之门。1924年后他的追随者迅速重建了党组织。到1926年举行议会中期选举时，伊里戈延派的党组织遍布城乡，赢得了广泛的人民团体的热情支持。这个时期，伊里戈延的追随者表现了举世无双的动员人民的本领。他们通过报纸和电台向全国大作宣传。他们不加选择地寻求支持，不想建立一个由相同利益集团组成的党。他们借助于20年代中期恢复的繁荣，在选民中制造一种恢复1919～1922年那样升官发财的期望，暗示各阶层的人民都将分享到成果。同时，他们竭力美化他

们的首领，强调他作为人民领袖的品德，渲染他从前的业绩。到1928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获得了阿根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声望，准备胜利地恢复总统职位。

但在选举临近时，伊里戈延仍有不少强大的敌手。由于他再次成为权力竞争者，他们对他的敌意随之增加。在有些受反个人效忠派和保守派控制的省份，他的地位是软弱的。那些地方对他上次执政时进行的无数次干预记忆犹新，这些干预被认为是对地方权力的粗暴和专横的篡夺。他的这类反对派不再限于各省的地主寡头。在门多萨和圣胡安，在伦西纳斯和坎托尼两大家族领导下，反对派实行了自身的民主化，成为伊里戈延民众运动的地方主义翻版。那些在1919～1921年间煽起了沙文主义和反犹反共火焰的保守派对他仍极为仇视。军队中的对立情绪也十分明显。关于军事政变的谣传再度甚嚣尘上。在阿尔韦亚尔任期即将结束时，有报道说军队策划阻止他再度掌权，为首的是陆军部长阿古斯丁·P·胡斯托。

这些不同集团一再指责伊里戈延不负责任地、简直是公然蛊惑性地操纵目前追随他的民众。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寻找职业的中等阶级，他们被保守派认为是腐败得不可救药的。总之，现在伊里戈延似乎成了一个比1916年时更加危险的家伙了。自从党在1924年分裂后，从前激进党内较保守的一派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实施的制约就不再存在了。他被怀疑在策划一种民众专政。这时，由于接二连三的竞选失败，保守的反对党对萨恩斯·培尼亚的改革已不再抱有什么信心。它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的那种政府。假如说有些保守派（如胡斯托）可能会对反个人效忠派的政府感到满意，其他人最近则显然进一步向右转了。他们赞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普里莫·德·里韦拉的西班牙，主张军事独裁。但由于此时伊里戈延的声望接近顶峰，他们无可奈何。任何想阻止他重新掌权的企图都要冒挑起内战的风险。而此刻并无什么能保证保守派将在内战中取胜。他们只能等待。

413

石油和国际关系

在1928年的竞选运动中，伊里戈延派提出了一个后来证明对他们的领袖恢复总统职位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对石油的垄断。这一民族主义运动还重点反对美国的石油资本，特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样，事情就同范围更大的阿美关系问题联结起来了。

20年代末的石油开采是1907年在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发现了丰富的巴塔哥尼亚油田以及在内乌肯、门多萨和萨尔塔发现了其他较小的油田后约20年开始的。阿根廷石油史的特点在于国家从一开始就在石油业中居领导地位，以及它很早就坚决防止石油资源落入外国公司手里。1910年通过的一项立法规定在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建立一个面积5000公顷的国家保留区，在一段时间内不准私人购买。不久，国家自己在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开始钻探。私人公司起初被限制在内乌肯和一些省的较小油田内。萨恩斯·培尼亚坚持支持发展国家石油的努力，主要因为战前英国的罢工似乎威胁了煤的进口。另一方面，战前在这小小的国家企业和外国石油公司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当时后者对于在阿根廷发展生产没有什么兴趣，它们只是作为进口商而在阿根廷有利益。最初几年，以国有部门为领导的这一工业的发展有点使人失望。希望减少主要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进口未能实现。1914年前当地的产量只相当于消费总量的7%。议会不愿拨给充分的资金。此外还遇到了在非工业国中这类企业普遍存在的其它困难，如缺乏技术人才和设备。大战期间，美国禁止钻井和炼油设备的出口。虽然战时为满足国防需要而作出的增加国内生产的努力得到海军和陆军越来越多的支持，所获得的发展却未能减轻因英国煤炭进口减少而引起的危机。尤有甚者，在为数很小的原油产量中，只有一部分可用于精炼。

444

战时的燃料危机消除了对外国资本的某些较极端的偏见。人

们感到为了保证较快的发展，外资虽坏却不可缺少。激进党第一届政府看来也持有这种观点。1916～1922年的伊里戈延在石油问题上也许比他的前任较少民族主义。他并不反对大部分操在外国人手里的私人经济的存在。在他当政时，私人公司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由微不足道的3%提高到20%。他利用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作为政治上施惠的据点。他在这里为改革所作的努力，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形下一样，都要遇到怀有敌意的议会的作对。他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他离职前不久的1922年建立了一个负责对国家石油进行监督和经营的财政部石油矿藏管理总局（YPF）。在阿尔韦亚尔执政时，由于设备进口出现了较好条件，石油工业开始复苏。他任命了一位生气勃勃、克尽职守的军事行政官——恩里克·莫斯科尼将军——来领导总局，同时给予他们以很大的自主权。在莫斯科尼的领导下，国家石油工业许多早先的困难得到了解决。1925年在拉普拉塔开办了一家大炼油厂。石矿总局还建立了自己的零售网，生产和销售汽油和煤油。战后初期，阿根廷的石油终于开始引起国外大公司的浓厚兴趣。在这些年内，石矿总局的发展因私人部门的发展而黯然失色：后者在生产中的份额到1928年已增加到近38%。但生产的发展还赶不上国内的需求。尽管在1922至1928年间原油总产量增加两倍，煤的进口也增加了1/3，石油的进口几乎增加1倍。1928年，国内油田仍只能供应国内燃料消费总额的不足一半。

335

所以，早在伊里戈延主义运动以前很久，20年代末国家就有参与石油工业的传统。它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经常超越了党派政治界线。同样，阿根廷也是苏俄之外第一个建立垂直系统的国有石油工业的国家。不过，阿根廷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到将私人或外国股份排除出这个工业的地步。为了增加生产和保证效益，历届政府的政策都是允许国家和私人部门同样发展。政府干预的主要形式是保护国有部门在市场中所占比重，以及防止石油的经常出口。战后，政府允许若干外国公司在阿根廷建立可

观的业务，它们后来成为生产的主要来源。到1928年，私人公司提供的产量占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产量的1/3，占内乌肯省普拉萨温库尔产量的2/3，占萨尔塔和门多萨小油田产量的全部。

此时最著名的私营公司是标准石油公司。它在石油业的几乎所有部门都有投资。同战前一样，它仍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公司，并且控制着国内主要的销售渠道。它在炼油业有巨额投资，而且尽管阿根廷设立了石矿总局，它在煤油和汽车燃料油的销售额中仍遥遥领先。不过现在它最吸引人注意的活动是在萨尔塔省的钻探活动。标准石油公司小心翼翼地讨好省政府，在这里站住了脚：省政府掌握着本省底土的开采权，正如中央政府掌握着国家南部领土的底土开采权一样。20年代的萨尔塔省仍处在地主寡头控制下，最有势力的地主现在从事甘蔗业。直到近几年，该省依然一贫如洗。标准石油公司在提出它的条件后，轻而易举地集中了大片土地，并享有在这些土地上独家进行勘探和钻井的权利。它获取萨尔塔油田的目的是使之同它在玻利维亚拥有的一个重叠油田相联接。它打算在南美这一角开辟一个跨国的势力范围。它想在玻利维亚开发出口产品，如有可能，也在萨尔塔这样做，而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享有的地位将使它的这些出口品得到出路。

416

20年代，私人石油公司和石矿总局之间为争夺支配地位而发生了激烈和广为人知的冲突，面对这种情况，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众舆论又恢复了战前对外资的那种敌视态度。伊里戈延派以他们典型的热烈和热情洋溢的方式投入了一场从公众情绪中捞取政治利益的运动。1927年7月，他们发誓要将全国的所有油田都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要把这种垄断扩大到炼油、副产品和销售业。他们哗众取宠地在选民面前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民众中鼓动由本国人绝对控制国家资产的愿望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潜在不满。石油业国有化被描绘成了医治国家病患的灵丹妙药。他们信口开河地许下诺言说一旦石油收入被国家掌握，就可以取消外债，并使未来的借贷都成为多余。国内的制造商将获得取之不尽

的廉价能源，它将使阿根廷能够奇迹般地和无痛苦地实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国家对石油的垄断将有可能消灭其他一切形式的税收，最后使民营部门免缴讨厌的使生活费用上涨的进口税。

不久，国有化得到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一旦同滚滚的石油挂勾，国家收入就不会再受不可预测的对外贸易起落的影响；在这以后，公共部门和官僚机构的扩大就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了。这件事同伊里戈延更大范围的反对反个人效忠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他的追随者把萨尔塔的形势描绘为寡头政治与帝国主义结成了黑色同盟，它将被国家垄断所粉碎。如果伊里戈延能把石油的控制权置于全国政府之手，而使各省失去这种权力，他就摧毁了反对派的一个主要支柱。一旦掌握了石油权益，伊里戈延派便满怀信心可以永远保持霸主地位。

这个运动的民族主义矛头是单单针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它基本上没顾及像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这类英国石油财团。后者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它至今获得的成果也不如标准石油公司。但它在背后同样地野心勃勃。最近几年，控制阿根廷石油既是美国人的也是英国人的目标。不过，标准石油公司成了运动的矛头所向，因为它同萨尔塔的寡头政治集团建立了不适当的亲密关系，还因为它在国际上名声不好，加上它又是一家美国公司。这里，石油问题同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同伊里戈延与保守力量集团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447

此外，反美主义并非发源于中等阶级，也不来自激进党，而是起源于草原地区的地主和出口公司以及保守派。其根源主要在于长期的贸易争端。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人在阿根廷市场占有了很大比重，最初是依靠得克萨斯的石油，后来是依靠汽车和许多资本货。但是阿根廷却没能向美国发展对等的出口贸易。美国共和党政府按照美国农场主院外集团的意志，一直不让阿根廷的大部分货物进口。阿根廷对美国的政策多次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毫无结果。到1914年，虽然芝加哥肉类包装公司来到了

阿根廷，阿根廷却仍然没有能在美国为它的牛肉出口建立市场。美国人只准备接受它的二级产品，如皮张和亚麻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对美国的出口值增加9倍。但过了不久，1922年美国又恢复了弗罗德尼一麦坎伯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早先的排外政策。

20年代，阿根廷因在美国市场上仍处虚弱地位，所以十分依赖对英国的出口。但这种较长期的稳定联系由于阿根廷的进口日益从英国转向美国而受到了威胁。到20年代末，阿根廷对英国的贸易顺差大体与它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相当。但是，英国国内此时兴起了一个主张帝国优惠的运动。如果英国为了减少贸易不平衡而实行这个制度，那末英国市场上从前给予阿根廷的份额就将给予英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生产者了。

这些情况对阿根廷的石油问题以及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有密切影响。1926年，美国柯立芝政府宣布绝对禁止进口来自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加工牛肉。表面上这是为了防止口蹄疫的传入。但此举激起了阿根廷的愤怒反应，它认为这是又一个带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措施。于是它立即着手寻找报复手段：标准石油公司成了最方便的目标。在伊里戈延方面，反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运动是政治上颇为机智的一招。这使它不仅得以利用民众情绪，而且可以自命为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草原地区地主上层分子的斗士。另一方面，处理石油问题时务必防止冒犯英国人，否则他们会把这作为进行商业报复的借口。因此，只能由标准石油公司一家单独承受反对外国资本运动的矛头。在打倒标准石油公司以后，伊里戈延显然打算让英国人成为石油和石矿总局所需设备的主要进口商。这样就可以减少对英国的外贸顺差，在帝国优惠制的面前改善阿根廷的谈判地位。

448

1930年的军事政变

1928年，伊里戈延再次当选为总统。他获得了60%左右的选票，票数几近84万张，而反对派的得票数总共为53.7万张。当年10月他就职时受到的奉承使人回忆起人们给予罗马皇帝的荣耀。这一时刻是他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公共生涯的顶点，但也是他最后一次个人的胜利。此后不到两年，即在1930年9月，声誉扫地的他便被一次军事政变不光彩地赶下了台。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以76岁高龄再任总统。有些人怀疑他已衰老昏庸，这是两年后推翻他的口实之一。实际上，1928年他重新出山时已有一套比12年前的1916年明确得多的战略和目标，他明白不管表面上他得到多大的民众支持，他的政府的生存要依靠他遏止保守派和军方反对的能力。石油问题仍有待解决，他的复出不过是为控制石油而战的一个吉祥的开端。1927年，他的支持者在国会提出了赞同国有化的立法案。这项议案在民选的伊里戈延主义派占多数的众议院中获得通过。但是它在参议院却遭到漠视，在那里，以萨尔塔省为代表的内地各省和伊里戈延的其他反对派的声音仍占优势。这位总统在这里遇到了曾经困扰他上届政府的同样问题。为了通过这项立法，他需要在参议院获得多数票。而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取胜，他必须控制省议会，因为国家参议员是由省议会而不是由民众投票选出的。这就要求进行更多的联邦干预以清除一些在职的地方政权，但这要冒加剧内地正在复兴的联邦主义的风险。此时，门多萨和圣胡安即将举行参议员选举。这两地是伦西纳斯派和坎托尼派的中心，如同萨尔塔一样，那里对政府的反对特别强烈和不可动摇。因此，新政府一上台就十分注意那些库约地区省份的政局。它在这里很快卷进了一场剧烈的常常使用暴力的霸权之争。这个问题后来在两次高潮事件中解决了。1929年底，门多萨省反对派领导人卡洛斯·华盛顿·伦西纳斯被伊里戈延派暗杀。次年，经过几乎无休止的激烈

449

辩论后，总统的支持者们指责并阻止了费德里科·坎托尼和他的一名支持者当选为代表圣胡安的参议员。这样，到1930年年中，伊里戈延派已接近最后胜利，他们压倒了内地最极端的反对派。在参议院他们也取得了明显的多数。他们打算在1931年召开国会时再次提出石油法案。

1929年全年和1930年的一段时间内，伊里戈延还成功地牵制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保守的反对派，在与英美的贸易关系方面机智地唤起了他们的同情。1927年，在美国禁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后不久，并在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政治对抗达到顶点时，农村协会发动了一场优待英国进口品的运动。新政府很快采纳了它提出的"谁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买他的东西"的口号。1928年底，美国当选总统赫伯特·胡佛在拉美各国进行促进贸易的旅行时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受到了充满敌意的接待，并事实上受到伊里戈延本人的侮辱。但是，第二年一个英国贸易代表团却受到颇为不同的欢迎。伊里戈延向代表团团长达伯农爵士表示他想对英国作出一种"道义姿态"，以确认两国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历史纽带"。他答应在阿根廷市场上给英国公司和英国货物许多优惠而并不要求英国增加阿根廷对英国的出口作为报偿。这些优惠中的一条是阿根廷承诺不通过国际招标的惯例而向英国购买国家铁路未来的全部供应。

450

这样，第二届伊里戈延政府在许多方面表明，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缜密的战略正在慢慢地实施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总统正设法在他的民众支持者对石油问题的愿望和精英分子对国际贸易的关心中间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这样做是以牺牲美国人和各省的利益为代价的。假如政府能继续照此做去，它本可丝毫无需担心军队。1929年，政府还没有出现像第二年充斥政府的那些混乱、无能或瘫痪的迹象，这一年为此而令人难忘。使这些最初的相对成功变为失败并使事态迅速滑向崩溃和灾难的，是紧接华尔街股票暴跌之后的大萧条。它在1929年底袭击了阿根廷，在

这以前的两年内，物价不断在缓缓下跌，黄金储备不断减少。随着下降趋势的加快，伊里戈延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保守派在1913～1914年所采用的那种正统的反周期措施。它取消了比索的自由兑换，向英、美寻求新贷款以解决外债困难。这些对策虽不令人鼓舞，但合情合理。它们表明，政府和银行界最初预计危机将是短期的。但当政府被迫削减国家支出时，它的权威开始迅速衰落。至此，伊里戈延终于对于他同精英分子的决裂，对于他的偏向民间部门以及自1924年以来为了取得它们支持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付出了代价。

在伊里戈延重掌大权后，他的支持者曾立即发起了一个接管官僚机构的运动。到1929年年中，所有的行政部门实际上都成了为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介绍所。不久，政府里充斥了小规模的贪污行为。国家支出立即直线上升。1928年的国家收入比上一年减少10%，而支出却增加了22%。1929，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年收入提高9%，但支出又增加12%。1930年的收入下降到大约1928年的水平，而支出却比那年高出约23%。[18]最后，政府不得不考虑实行节约。到1930年9月发生政变前，支出的上升趋势已有开始停止的苗头。但是，紧缩和节约政策的实施恰恰发生在由于失业上升和收入下降而要求增加救济的时候。1930年伊里戈延落入了类似1922年他为阿尔韦亚尔设置的陷井。萧条很快动摇了党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伊里戈延的追随者士气低落，不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节。

在1930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伊里戈延派得票数比1928年减少25%，由84万票降为62万票多一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伊里戈延派遭到了自1924年党分裂以来的首次选举失败。击败它的是新成立的独立社会党，它是现在同保守派结盟的老社会

---

[18] 详细数字见卡尔·依·索尔伯格：《阿根廷的石油和民族主义》1979年斯坦福出版，第149页。

党的一个分支。随后数月，对政府怀有希望的幻灭变成了激烈的反对。以前常常被忽视的库约地区省份的事态现在成为每天都要进行热列辩论的问题。报刊对政府的腐败进行长篇大论的详细揭露。在大学改革运动之后言论上最积极支持伊里戈延的学生，现在参加示威游行反对他，伊里戈延派中一些敌对的派别和一个名叫共和同盟的右翼组织公然为控制街道而打架。内阁分裂为你争我打的派系。关于总统已老朽的报道越来越广为流传。

最后，伊里戈延最顽固的反对者，其中许多人10多年来一直对他怀有不满，终于有了聚集力量的机会来推翻他。军事政变的领导人何塞·乌里武鲁将军（他的背后是胡斯托将军）早就因指责伊里戈延在军队晋升名单上要阴谋诡计而出了名。战后多年，他一直是伊里戈延劳工政策的主要反对者。20年代，他便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和组合主义学说。他藐视萨恩斯·培尼亚法。他也是 452 同标准石油公司进行交易的萨尔塔寡头集团的成员。1930年9月的起义只得到军队中少数人的积极支持。但这对达到目的已足够了。伊里戈延辞职后，内阁成员们为继任他的职位而展开的一场恶斗暴露了他的政府的彻底破产。伊里戈延的支持者中几乎没有一人来帮助他。有些人还和暴民一起劫掠和焚烧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

1930年的政变纯属内政。如果说标准石油公司显然对伊里戈延下台感兴趣，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它为此采取了行动。华盛顿对这次政变抱有某种期望，希望能改善与阿根廷的关系，但30年代的事态发展没有实现这种希望。美国人对1930年事态可能作出的任何影响都因英国人的存在而一扫而光。他们是伊里戈延最后一批支持者，对他的下台没法感到高兴。看来他们获得贸易优惠的希望跟着他一起破灭了。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倒台后，被放逐到拉普拉塔河口的马丁加西亚岛，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余生。（他于1933年去世）。在这位现在已衰弱不堪、有时在道德上有过失误但并不完全包藏祸心的人物身上，体现了阿根廷代议制民

士的一度存在和消亡。阿根廷的政治在他去世后找到了新方向。中等阶级在永远保持最高权力的希望上受了骗。保守派在军方的保护下恢复了权力，并维持政权达10多年之久，直到1943年发生军事政变和庇隆上台。

153

第 13 章

现代乌拉圭的形成
（约1870--1930年*）

传统的乌拉圭：牛和考迪略

在19世纪60年代，乌拉圭是个人口不足30万的国家，其中1/4强居住在主要港口城市蒙得维的亚，它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首都。外国人的比例比任何拉美国家都高。根据1860年的人口统计，每3个（在蒙得维的亚是每2个）居民中就有1个外国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法国人、阿根廷人和英国人（其人数的多寡可能就依这个顺序排列）。乌拉圭唯一的一条铁路于1869年开通，只有20公里长。这个国家的运输系统事实上可以说是由原始小道组成的，好在社会的主要产品——牛——是能够走动的。至于客运，在东部和中部是使用牛车，而西部则使用乌拉圭河上的帆船和汽船，它大大方便了这个地区同首都的交通。尽管国土面积不大—只有18万平方公里，但内地旅行很慢，冬天江河涨水阻塞陆上道路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时候，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主和商人，都像生活在中世纪的落后地区，而不是生活在蒸汽机世纪的下半叶，在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里。

乌拉圭经济是建立在广泛利用本地（克里奥种）牛的基础上的。它们的外皮运往欧洲，而质地较薄的肉，有一部分经过腌肉

---

* 英文本由理查·索任博士译自西班牙文，经亨利·芬奇博士校改。编者感谢芬奇博士为本章最后定稿提供的帮助。

场腌制和烘干成腌肉干（牛肉干），供古巴和巴西的奴隶食用。由于这个原因，如同在殖民地时期一样，一头牛的价值决定于牛皮的重量而不是牛肉的多少。屠宰这种牛还不算在资本上受损失，在庄园里靠这种办法免费提供食物从经济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合理。这个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两个典型现象——经常性的内战和考迪略—地主对农村穷人的家长作风——部分地是这些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对于这个原料和食品生产国来说，贸易的重要性可说非比寻常。蒙得维的亚港在拉普拉塔河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南里约格兰德诸港口的天然优越条件，使它成了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它发展成为欧洲商品的一个主要集散地，由此再运往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科连特斯和圣菲诸省，运往巴西的南里约格兰德，甚至运往巴拉圭。

大土地所有主和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富商一起构成乌拉圭上层阶级的中坚。1857年，他们创办了第一家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中产阶级在内地极为虚弱，而在蒙得维的亚它们依靠商业和初期的制造业发展得较为强大。肉类腌制业造成了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阶级，但下层阶级的主要部分是那些依附于牲畜主的人们，他们作为散工和临时工居住在大庄园的分散居住区内。在北方仍然存在着一支隐秘的奴隶劳动大军，他们是被富有的巴西地主从南里约格兰德运进来的。

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经济，却并没有造成不平等和社会紧张状态。相反，在以社会阶级尖锐分化为特点的19世纪的拉丁美洲，乌拉圭在许多方面却独树一帜。在内地，食品供应还没有被那些拥有牛群和土地的人所垄断，因而充当工资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选择而不是被迫。个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最近才出现的，也不像墨西哥、秘鲁或巴西那样被种族差异所拉大，因而相对地比较容易改变。此外，社会升迁在乌拉圭这样一个由移民构成的新国家里并不困难，1847年，一名社会上层分子不无猥

由地大发牢骚说，在乌拉圭“每一个有一张白面孔的人都认为自己有平等权利”。

内争经常发生，从1826年独立到1870年，有好多位总统因遇到叛乱而不得不在任满4年法定任期前离职。白党（或国民党人）和红党这两个传统党派之间的斗争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刺激。中央政府无法对牧牛人社会行使权威。这不仅因为产生了与之对抗的权力中心——考迪略，还因为使用暴力和武器是畜牧生产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经济社会并不惩罚混乱，相反，由于对土地所有权仍有争执，这就助长了冲突。此外，由于缺乏明确含义的民族观念，加上乌拉圭两个强邻巴西和阿根廷统治阶级的野心，这些都鼓励了那些不愿意蒙得维的亚中央政府强大的人起来造反。

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乌拉圭的这类特征大多数已经开始变化。到1870年，被巴西企业家毛阿男爵描绘为“政治上、经济上和财政上的一具僵尸”的传统的乌拉圭便处在崩溃的过程中了。由于三国同盟与巴拉圭的战争（1865～1870年）带来了繁荣，主要来自国外的商人们扩大了势力。他们现在要求确保他们的财富和地位：要求强有力的政府和国内和平。地主们不再限于饲养克里奥牛；19世纪60年代他们发展了绵羊业生产。甚至对土地的争夺也趋停止，因为出现了一批很大的地主，这个阶级不需要依靠考迪略制度来确保其权利。从前叛乱对牛这种价值不大的商品造成破坏，现在则危害设备较好的繁殖纯种羊羔的大庄园。这些庄园需要用铁丝网作围栏，但在遇到政治暴力威胁时便无法进行。在腌牛肉市场萧条时杀死一头公牛不大要紧。而杀死一只绵羊却是一种罪行，因为它每年生产的羊毛在兴旺的世界市场上可以卖到好价钱。而且，羊毛生产有助于加强农村中等阶级的地位，因为饲养绵羊只需要较少的低质土地。因此，在从前十分动荡的社会里增加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稳定因素。

现已拥有近10万居民的蒙得维的亚开始了现代化。英国旅行家托马斯·哈钦森在1861年注意到了“摩尔人式的平顶房建筑”，

他很难想像后来几年那种狂热的发展。尽管从远处望去，这座由小农庄和腌肉场环抱的苍白城市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俯瞰港口的小山和大教堂——犹如大仲马笔下描写的新特洛伊城的两座山峰一样，但是新街道的开辟和许多两层楼房的建立说明这个城市正在迅速成长。它已经扩展到旧时殖民地城墙以外，现在正沿着主要街道胡利奥十八街发展，直奔东郊的简陋房屋和米格莱特河两岸富人的豪华住宅。 456

以英国为主的外国投资也已开始到来。对乌拉圭国家发放贷款，董事会设在伦敦的一些公司纷纷购买土地，1863年在弗赖本托斯开设利比希肉汁公司；这些都是1870年以后将要获得发展的先声，英国人在1870年购买了铁路、自来水和煤气公司。进行这类投资的最低条件当然是维持秩序。

最后，由于人员和商品可以越来越容易和便宜地往返于欧洲，这个国家越来越密切地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了。帆船的改进，尤其是蒸汽动力在海运方面的胜利，使乌拉圭密切地接触到大西洋彼岸的需求、资本、移民、文化和时尚。蒙得维的亚同伦敦、马赛和勒阿弗尔（法国）的联系变得可靠和经常化了。进出口贸易已经确立，数额在增加，运费在下降。现在，把这个国家同欧洲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已无法割断，时间只会加强这种纽带。

现代化和世界市场（1870—1904年）

1865年，即与巴拉圭的战争爆发前夕，由贝南西奥·弗洛雷斯领导的红党势力在阿根廷和巴西帮助下推翻了白党政府。1870年，巴拉圭战争结束时，考迪略蒂莫特奥·阿帕里西奥（白党）发动的叛乱发展为“决斗之战”，目的是争取至少能分享红党在整个战争时期所垄断的权力。暴力冲突延续了两年，造成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对大地主。1872年4月和谈进行时，从传统党派中分裂出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它谴责它们在政治混乱中所起的作用。 457
这个名叫“原则派（Principistas）”的集团由青年知识分子组

成，他们是乌拉圭最古老但不再是最富有的家族的子弟。这些原则派分子崇尚极端教条的自由主义，强烈主张根据欧洲思维和模式建立一种合法秩序，其基本内容是不信任国家而绝对信仰个人权利。这些原则和原则派分子对宪法的全力支持，不符合上层阶级确保强有力政府的愿望。在1872年的选举中各党的传统派取得了胜利，但这并没有能阻止原则派领导人进入议会，而且在1875年以前议会一直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此外，1873年初在达成一项竞选协议后，一位殖民地时期的贵族后裔何塞·埃廖里当选为总统；由于缺乏政党的有力支持，他的政府平庸而软弱。1873年议会准备实行一项行政、司法和选举改革计划，其主要目标主要是加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相抗衡。地主和商人经济利益的代表立即反对这种体制改革，认为这种法律结构只会使其投资更安全和更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推迟实现。例如畜牧业部门遭受的损失就很明显。虽然1857年已建立了一家银行，但它提供的信贷甚至不能满足生产者最基本的需要。商业贷款的短期性以及在财产价值或公债发行上的投机活动，限制了蒙得维的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从而使内地的农村经济也很难得到这种方便。这种不利于畜牧经济的不正常状态在1868年至1875年的动荡年代特别突出。加之，正是在这个时期，牧场的铁丝围栏，发展技术初期所需的投资，都增加了这个部门的信贷需求。除了这个集团的不满外，在1874年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时，不满情绪就更加普遍了。原则派因为在自己的圈子以外得不到支持，听不到公众舆论，缺乏经济来源，而优柔寡断的行政当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因此他们终于被一群军官赶下了台，这些军官想结束由危机造成的困境以及政府为摆脱困境而作的无效努力。

458

由于1876年实行了军人统治和排除了原则派，洛伦索·拉托雷上校的专政满足了有产阶级的基本要求。拉托雷实行的政策是商人、农村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在出口市场行情有利时期都需要的政策。农村考迪略的势力暂时被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所消除。

新政权允许将资本主义秩序扩大到农村经济，在那里实行一种粗糙而方便的司法制度。据此，罪犯被等同于农村失业者，后者因牧场加了围栏、庄园取得了商业企业的新地位而遭摒弃。为了使庄园真象一个企业那样经营，尤其是在迅速现代化的时期，地主的财产权得到了巩固。军队因改进了武器装备而得到加强（因而也加强了国力），从而保证了国内安定。现在中央政权装备了19世纪的尖端武器——连射枪和克虏伯大炮，这样，政府便缓慢而不可动摇地垄断了控制国家居民的物质力量。为了这一成就，组成了农村协会（建于1871年）的大地主们一直表示感激不尽。

1880年拉托雷出人意料地辞职后，马克西莫·桑托斯将军统治这个国家直到1886年。桑托斯加强了以他为首的红党的机构。同时，这个党开始得到军队的公开支持，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此后，在将近一个世纪内，武装部队和红党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这种政治契约向军队提供了各种好处和保证，使他们打消了任何可能想更直接地参与政治的愿望；这一点加上其他因素，有助于确保后来的政治稳定，从长远来说还有效地保证了法律秩序。必须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军国主义在乌拉圭的演变、它在1886年后的迅速衰落以及它为什么服从（也许可说是同意）文人政权。

桑托斯不仅是经济寡头集团的执行人，而且也是一个拥有处在萌芽状态的军官阶级的军界代表，这在乌拉圭是新现象。这个集团野心勃勃，生活方式奢华，它的身边围着一小群亲戚和食客，这些人在社会阶梯上飞黄腾达。这是一个举行检阅和各种仪式的时代，但也是进行靠不住的商业交易和租让的时代，这些都有损于拉托雷所创立的制度的威信。对军方来说，这是他们的风光年代，幸福岁月。 459

由白党和红党的“法规主义”派别所组成的反对派阵线的出现，引起桑托斯作出独裁主义的反应，使他走进了不断使镇压升级的死胡同。在一次民众起义流产后，接着便有人想致他于死命；

最后达成的妥协结束了他的统治。桑托斯年代目睹了正规的军人政治的瓦解。反对派关于政府任人唯亲和贪污受贿的指责有些夸大，但并非毫无根据。农村上层阶级最初默认了这个能带来稳定的政权，现在既然它的现代化计划已接近完成，那么一旦这个制度的缺点开始超过它有限的优点时，最初的默认就变成公开的失望了。1886年11月，桑托斯离国赴欧洲，继任他职位的是他的一名追随者——塔赫斯将军。他是一位与人无争的人物，在他任内，最终军人专政消除。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政府领导人已表现出没有能力维持严格的独裁主义统治模式。尽管在拉托雷当政时实行现代化的专制独裁曾使有产阶级得利，但在桑托斯当政时军人专政却没有能从它大力帮助建立起来的繁荣中生存下来。

军人专政不仅成功地巩固了国内和平，从而暂时消除了考迪略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巩固了对外的附属地位，正如许多热情洋溢的外交报道所披露的，这种地位的基础是同帝国主义列强更密切的联系。这种事态不仅意味着生产的增长，还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1876～1886年，皮张的出口增加30％，羊毛出口增加40％。到1884年，羊毛的价值首次超过了畜产品的价值。牧场被迅速围了起来（1877年以后的5年内，60％的庄园都投资于购买铁丝），多余的劳动力被取代考迪略——地主的资本主义地主所抛弃，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和南部尤其如此。出口市场多样化了。除了畜产品的传统买主（英国、美国、巴西和古巴）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成了美利奴细羊毛的购买者。

由于得到一个强有力政府的鼓励，并有投资最低盈利率的保460 证，英国势力在乌拉圭增长了。这种增长在公共债务的发行和公共设施方面最为显著。《经济学家》估计，1884年英国对政府公债的投资为350万英镑，另外还有300万英镑投资于企业。关于后者，铁路网的迅速发展特别明显：由1882年的474公里增加到1892年的1571公里。

19世纪最后25年的相对繁荣时期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主

要是由于移民的结果。根据最早的统计数字，1873年乌拉圭有居民45万人，其中10.3万人是外国人。1875年一年就进来了2.4万移民；此后10年，由于财政危机和政府机构的垮台，到乌拉圭的移民为数很少，大批移民被吸引去了阿根廷和巴西南部。直到1882年以后才开始了新的移民浪潮。他们多数是意大利人，他们对蒙得维的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将1884年和1889年的人口统计作一对比，可清楚地看到在意大利移民迅速增加的同时，西班牙移民的人数保持不变，而法国移民几乎全消失了。从1887～1889年，移民达到了19世纪的最高潮，这期间的纯移民数可能超过4.5万人，反映了1890年危机前的经济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

虽然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强大的产物，但是有关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老问题不久再次出现，而且又增加了新问题。恢复文人统治是红党所为，在军人权力的政治基地被拆除以后，它从桑托斯政府的遗产中获得了好处。实现这一过渡的是新任政务部长胡利奥·埃雷拉－奥韦斯(他是1875年被赶下台的原则派重要人物)。对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人物来说，从这个职位到当上总统（1890年）不过一步之遥。他把人们积郁的对桑托斯的不满都变得有利于自己。在塔赫斯将军执政时期由政务部发展起来的选举机器帮助埃雷拉－奥韦斯建立了一个同寡头集团密切联系的权力基地，而这个寡头集团反过来又赞扬他的正确无误和他的意见对红党大多数人的重大影响。他实行开明的专制政治，并以近乎犬儒主义的坦率表示在选择候选人时需要有一种“指导性影响”，这在两党内部都引起了很大反感。

不久就清楚了，恢复文人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新压迫的工具——总统权力的工具，它在民主的外表下合法化了。由于考迪略的失势和军队回到了兵营，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来实施政治高压。自从拉托雷时代以来，技术工具——铁路、电报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进。在政治方面，对内地紧紧的控制是通过当地行政长官实现的，后者直接接受最高行政官的命令。这种办 161

法巩固了总统的权威；但在同时，由于总统府同全国以及国内新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总统的权威受到抵消。红党的广大群众在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组织下，开始设法建立一个同来自国内外流动人口的社会新阶层利益更为一致的党组织。而白党在1893年决定不参加竞选，并再次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商人阶级、银行家、企业人士和大多数农村生产者都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埃雷拉—奥韦斯的不满。此外，189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资本家阶级更加反对这位越来越不代表他们利益的总统，现在他只顾保护那个穷途潦倒、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贵族阶级的残留特权。

1890年的危机有复杂的原因。桑托斯下台后，有利的国际局势刺激了阿根廷资本的涌入；这些资本掌握在受乌拉圭市场有利条件吸引的、更富有冒险精神的金融家手里，增加了人们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1887年外国资本家创办了国民银行（政府在名义上参与），这竟促使价格飞涨，由此引起一时的繁荣和最终的崩溃。不过，1890年的危机并不仅仅是国内投机活动的结果，还必须看到更根本的原因。1891国民银行垮台，市场拒绝接受它发行的钞票，这如同1875年一样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而对那些其利益与黄金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希望在他们已经掌握的黄金之外再有其它货币基础的商人和外国投资者来说，这却意味着胜利。这个财政寡头集团的胜利使它获得了随后5年内提供信贷 462 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是建立在危机的废墟上的，它恢复了很久以前对农村部门贷款的那种高利贷条件。1896年共和国银行的建立结束了这种垄断，但反对垄断的地主、小商人、贫穷贵族和广大民众的这一胜利只是局部的胜利。它仅仅是使直到当时还几乎完全得不到信贷的那些集团得到这种好处而已。这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但是可兑换的黄金本位货币的传统仍保持不变，新的官方机构对此作了保证。

共和国银行的创立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的重大干预。同年，电灯公司被它负债于国家的老板转让给了蒙得维的亚市政府；1901年

蒙得维的亚港开始动工建设。正如何塞·佩德罗·巴兰和本杰明·内厄姆的著作所说的，国家采取的三次经济行动标志着，政治精英们已放弃原始的自由主义，而为1904年后时期的主导思想意识一巴特列主义（batllismo）开辟了道路。但应注意，国家此时或者是在满足国内外资本的具体部门的需要，或者仅仅是在弥补它的缺陷。当时与资本不存在对抗，而后来在何塞·巴特列一奥多涅斯担任总统期间则发生了这种对抗。

1894年初举行的为埃雷拉·奥韦斯挑选继任人的总统选举既反映了反对派力量的不断增大，也反映了政府支持者把住权力不放的顽强努力。为了达成协议，议会进行了40次投票，开了21天一无所获的会议。在一位候选人一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一最终在这一过程中涌现时，国家已开始接近于一场内战了。政治少数派没有获得议席。1872年的一项协议曾经实际上允许白党一起参与政府，让它在内地13个省分中控制4个，现在这项协议受到了破坏。这不仅是通常的胁迫和欺骗方法产生的结果，而且还因为省分的数目增加到了19个，而从1893年起将白党控制的省分减少到3个。加上各主要阶级对政府的日益不满，因而只需要一点火星，甚至是一个借口，就可以挑起武装冲突。1896年末立法议会选举前夕，考迪略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挑战性地显示军事力量，就是第二年叛乱的前奏。

这次叛乱是白党对他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抗议，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次造反的社会背景。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和传统庄园加速现代化以来，技术改革使农村工人阶级处在毫无保护的状态。铁丝围栏、机械化和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得失业增加，此外，1890年的危机严重打击了畜牧业。1891年，在生产牧畜的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的比率是每1000公顷土地1个日工。失业、流浪、贫困化、从农村地区外流、实际工资下降、饥饿和行乞，所有这些使农村劳动者陷入凄惨境地。萨拉维亚军队中有农村穷人是这一局势的反应。政府招兵也吸收了一大部分失业的劳动力。总共被 463

动员的男子约1.5万人，其中1/3加入了白党叛军。

政府的不妥协和战争本身的无结果损害了有地阶级的利益，打仗期间因叛军或政府部队的征用，使马匹和牲畜受到损失，这增加了因严重缺乏劳力从事剪羊毛或收获庄稼而产生的问题。蒙得维的亚报纸报道了有产阶级的抗议，由此引起了主张议和的运动，其矛头针对博尔达总统本人，因为他坚决反对任何和平方案。1897年8月博尔达的被暗杀消除了这一障碍。9月，战争随着拉克鲁斯协定的缔结而结束，根据协定，两党在事实上分治国家方面取得了平衡。这项新的合伙协定将19个省中的6个给了白党，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政府的行政主权再次成了问题。

1904年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去世，白党提出了新要求，内战再度爆发，在这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才得以确立，现代国家结构才得到巩固。1904年这次最后的内战延续达九个月之久，真是腥风血雨，破坏惨重；它发生在人们已认为两大政党之间的战争已成往事的时候，所以它引起了当代人和历史学家的注意。实际上这是两个乌拉圭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个以白党为主，它要求 164 选举自由和完全的政治民主，但它也得到维持传统的乌拉圭的支持，这个传统的乌拉圭拥有克里奥尔牛和腌肉场，其考迪略地主（有些人此时还活着）向帮工们实施家长主义。另一个乌拉圭以红党为主，它保卫政府统一的原则，但它也代表了新的乌拉乌，这个新的乌拉圭拥有绵羊，为冻肉厂及英国市场繁殖改良牛，地主成了资产阶级实业家。对于1903年当选为总统的巴特列来说，1904年的战争最终表明粗放的畜牧生产和与之共生的缺乏生产力的大庄园（白党考迪略的最后庇护地）必须予以消灭，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这个想法却永远不可能实现，部分地因为它在两个乌拉圭都将激起强烈反对。

到19世纪末，乌拉圭在出口农产品的基础上完全加入了世界经济。为这种一体化和繁荣所付的代价是经济的不稳定。1884年后最重要的单项出口物——羊毛因1890～1891年间库存减少和世

界价格下跌而受到不利影响。肉类和肉汁罐头的价格在欧洲市场上波动很大；利比希公司的肉汁价格在1890年以前持续上涨，但此后便猛跌，肉罐头的销售在1886年后不断下降，产量也减少了。其它像皮革这类传统畜产品也失去了重要性。1875年腌肉干的出口急剧下降，但之后又持续增长，直到19世纪末。不过腌肉干的价格波动很大，同时这个时期养牛业因生产过剩而吃了亏。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乌拉圭经济越来越受其初级产品出口波动的左右。这种依赖状态意味着对国外经济变化的高度脆弱性，这对国家的稳定具有显著的、对立的影响。

改良主义和出口经济（1904—1908年）

从1903年首次当选总统直到1929年去世，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一直主宰着乌拉圭的政治生活。他两次出任总统（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他之所以能够统率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既表达国家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又表达正在从不再由精英分子主宰的社会中兴起的新社会力量的愿望。巴特列的父亲当过总统，祖父是商人—殖民地贵族，他当过记者，1886年创办报纸《日报》(El Dia)；自1890年起，他一直谋求国家机构的正常化，争取乌拉圭摆脱欧洲资本而实现经济独立。此外，他还根据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特别是来自蒙得维的亚的）要求，反对乌拉圭本国雇主和外国投资者的专横的劳工制度。

1903年，巴特列由老的红党寡头集团第一次选举为总统。1904年他的政府在军事上打败了萨拉维亚，这使巴特列得以巩固了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同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和行政上的统一。建立一党控制的政府，而不是根据共同参与协议成立联合政府，这符合巴特列的个人信念和他的纲领的要求。他需要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1904年他实行了选举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红党的代表性。不过从参加选举的人数来看，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在100万总人口中行使投票权的不到5%。为了改变这

种状况，巴特列建议取消党的旧的寡头结构，代之以从各级选民中更直接地选举代表。地区政治俱乐部是实现这一建议的最佳工具，它给城市和内地各选区带来了一种活跃的内部民主的日常习惯。党的集会也使人们更加密切接触公共生活，而从前有问题时只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总之，在由人民选举的一党政府的框架内，两种机构都被利用来实现扩大政治参予的理想。

尽管白党一再表示不满，但1904年后国家的平定是一个事实。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年还在蒙得维的亚建立了第一个冷藏库。财政稳定和出口品生产的增长使巴特列得以着手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计划，以适应乌拉圭社会发生的变化。移民对人口结构仍有影响。据1908年人口统计，总人口中的17%（18.1万人）不是在乌拉圭出生的。这些外来人口的一半居住在蒙得维的亚，466 那里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刚过100万）的1/3。但这一人口流入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数量。尤其在城镇，移民对于强大的中等阶级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加入这一阶级相对地说比较容易；他们还为城市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基础，特别是在工会的早期发展阶段。

巴特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由于增加了政府各部的数量和在1907年设立了最高法院，国家机器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教会的势力由于其特权被逐步限制以及在1907和1913年两次通过自由离婚法而受到削弱；1913年的离婚法规定根据妻子的意愿而无需申述原因即可离婚。在发展教育方面，1912年建立了分科的中学，1916年实行了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劳工问题上，国家发挥各阶级之间的调解者的作用，通过保护性立法或有效地保证工会权利以代表最弱小的工资收入者进行干预。在雇主看来，最蛮横的一项立法是1915年批准对一切城市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

除了这些社会福利措施外，国家还促进了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1912年实施了经过协调的保护主义政策，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巴特列还试图限制外国人（特别是英

国人）对经济的渗透。外资采取了给乌拉圭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形式。在这两方面，英国都占主导地位。到1910年，由伦敦发放的贷款总计达2650万英镑，是拉丁美洲人均外债最高的国家之一。之后，由于接受纽约各银行的贷款，欠英国的债务比例有所下降。在公共设施部门，1905～1913年间英国对铁路、电车、电话、自来水和煤气部门的投资迅速增加。巴特列怀着极大的疑虑注视这些公司的活动和它们的经营特许权。它们收费过高而服务质量差是众所公认的。政府为了向它们的地位挑战，想寻求美国资本的支持（1914年前主要限于冷藏业），但收效甚微。不过，建立了一些国家企业，以便对某些传统地由欧洲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加以控制，或向这种控制地位提出挑战，如在保险、铁路、电话和酒精蒸馏等部门。国家还进入了金融部门，1911年将共和国银行全部收归国有后创立了一家国家银行，翌年又将抵押银行收归国有。 467

巴特列进行的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基于以下一种特定观念：国家要起政治媒介作用，以便实现推动乌拉圭社会所要求的变革。这种观念促使巴特列很重视总统传统掌握的那些权力中所包含的危险。他认为，国家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要把特殊的权力授予一个政府机关（以及一个人），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滥用这种权力成了乌圭拉的政治史。基于他的这种危险性的观点，同时也为了保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巴特列在1913年建议改革宪法。实质上说，他建议由多数党9名成员组成一个集体执行委员会取代总统执行委员会。其中2名由国民大会任命，任期6年；另外7名由人民选举，每年改选1名。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一方面它向已经延续几近一个世纪的各党派的一致意见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表明了一种想使红党永掌大权的企图，因为它必须在五次选举中接连失败才会失去对新政府的控制。

白党因1904年联合执政的终止而仍在遭受着挫折，随后实行的选举法又减少了少数党在议会的席位，从而使它处在不利地

位；它的领导机构成员多数来自保守的阶级，它坚决反对建议中的政府新体制，这是可以预料的。显然，它的反对不仅有政治原因，而且与巴特列的社会改革的性质有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反对派阵线，它把白党的领导机构同1913年3月从红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保守集团——里韦拉*派联合了起来。里韦拉派象 468 后来同巴特列主义派决裂的其他集团一样，试图证明他们与老红党的传统相一致，并指责怀有“社会主义”同情心的巴特列主义派背叛了这些传统。在两个党团的内部，将大地主同银行家、商人和外国投资者联合在一起的狭隘的阶级利益促使他们对红党政府的活动先是表示不信任，随后又表示震惊，而这就变成了将国家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的争端。那些骄傲地自称为“保守派”的社会阶级（不论属于哪个党）开始表示要维护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对集体负责制宪法展开的辩论不仅是由于对总统制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实际上反映了对于1903年以来实行的整个改革计划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

1916年7月举行的制宪议会（它将审查巴特列的建议）选举中，反对派取得了明显胜利。巴特列的总统继任人费利西亚诺·比埃拉可能受了这一选举结果的影响，宣布停止执行社会改革计划。比埃拉与巴特列来自同一个党，以前他毫无保留地接受巴特列的思想，他的态度在巴特列的追随者队伍中打开了一个危险的裂痕。一些雇主团体为这种向保守主义的转变写信给总统表示满意。同比埃拉的争论，加上同里韦拉派首领马尼尼·里奥斯的争论，暴露了红党的多阶级性质。

之后不久，191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对集体负责制建议的第二次、也是决定性的考验；这次它的支持者赢得了胜利。这就为新宪法开辟了道路，1919年3月新宪法生效。政府机构的组成——长期争论的表面原因——反映了两个没有解决的观点。宪法建立

* 里韦拉是乌拉圭的一个省，位于北部。——译者

了双头权力执行机制，其中共和国总统与一个由9人组成的全国行政委员会分享权力。前者保留了国内治安、外交和作为武装部队首脑的某些传统权力，这些权力巴特列曾想不赋予总统的。后者限于担负国家的行政职能，由于它缺乏自身的有效支持力量而显得十分软弱，因此这个机构完全从属于总统的权力。

1904～1918年间，现代化和依附性的同时存在决定了经济的性质。国家的巩固及其多种职能将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这却使“外向发展”的矛盾更加明显了。继续不断地扩大农产品的出口暴露了基本生产部门（主要是畜牧业）对海外消费市场的依赖。新的冷藏工业引起了这一时期最富有特点的变化之一，即冻牛肉逐渐取代腌肉干成为主要的肉类出口品。但最重要的出口品仍然是羊毛，在1906～1910年间占出口总值的40%，此外皮革占25%，肉和肉汁占10%。在20世纪头10年和第二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1913年财政危机引起的短暂间歇外，农村部门继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放弃腌肉干的步伐，因为欧洲对羊毛、冻肉和加工肉的需求急速增长。

169

交通运输的发展在战前10年经历了决定性阶段。本世纪初动工兴建的蒙得维的亚港于1909年正式启用。随着1904年汽车的传入和1907年电车的电气化，蒙得维的亚城区扩大了，把更多的远郊区也包括进来。铁路贯穿全国南北，铁路网反映了以出口为方向的发展要求，也符合英国的商业利益。铁路长度1902年为1964公里，1919年达2668公里。

在制造业方面，纺织、家用化学品、烟草、酒类饮料、金属加工、造纸等等工业日益发展，相应地，工业就业人数也由1889年的3万人增加到1908年的4.1万人和1920年的5万人。不过，比劳动力的数字估计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要求的性质。这些要求中总要包括改善生活水准（提高工资、减少工时）；自从本世纪初，蒙得维的亚成为被阿根廷驱逐出境的“煽动者”的避难所以后，罢工成了家常便饭。这开创了一种工人阶级传统，不少机构在其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96年建立社会主义工人中心、1898年建立国际社会研究中心、1904年又建立卡尔、马克思中心。但尤其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及或许还有其斗争的特殊性质都要归470 功于巴特列给予它的不加掩饰的支持。

改良主义的局限（1918～193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乌拉圭经济带来了繁荣，这是由于欧洲需要大量农产品的结果。与此同时，国内工业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据1920年统计，从事制造业的机构有3704家，另有401家其他工业企业。但是大战的结束也结束了繁荣时期，紧跟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从1919到1922年，主要由于对肉类需求的不利趋势，乌拉圭出口锐减。欧洲市场的不稳导致价格激剧波动。同时，在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英国工业萎缩及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下降的刺激下，北美资本开始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发动有力攻势。战后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都更有计划地努力争取这个地区的经济霸权。它们建立或巩固了定期的海运业务，开辟了从纽约到乌拉圭的直接电报业务。同时，美国新闻机构开始向乌拉圭报纸提供消息。

美国和乌拉圭的贸易并不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乌拉圭的所有能出口的初级产品必须与美国同类产品竞争。真正对美国出口的唯一两种产品——羊毛和皮革，在美国的市场很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保护主义法律的有利变化。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进口增长迅速，以至到1916年英国便不再是乌拉圭进口品的主要来源了。在1920～1922年危机后，美国一直维持其优势地位，直到大萧条为止。美国除供应各种农业机器与设备外，还提供石油和汽车；不过，真正使美国生产者打破英国的传统商业霸权的是新工业品的出口，特别是各种家用电器。此外，美国还销售汽车，并投资于轮胎、水泥生产和车辆装配等次要部门，这些471 都打击了英国在这个地区的一大基础——铁路业。20年代，资本

的流入与对乌拉圭销售的增加同步；随着汽车销售的扩大，华尔街又提供财政援助，用于修建和改善公路，或用于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1923年乌拉圭全国有1万多辆汽车，有公路近300公里。到1929年，又修筑了550公里。

尽管这样，英国在乌拉圭的存在仍是有决定意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乌拉圭的投资几乎停止了，20年代增加的一点投资也没有改变下降趋势；不过，20年代末英国资本总额仍超过4100万英镑。如同19世纪时一样，积累英国资本的主要部门是政府贷款和铁路业。贷款总额约达2000万英镑，但自1919年起没有在伦敦筹得新贷款；虽然纽约的利率一般地说较高，它现在却吸引了这项业务。在总数也达2000万英镑的英国直接投资中，包括公用设施和一家肉类冷冻厂。由乌拉圭中部铁路公司和其他较小的英国公司所拥有的铁路系统进入了衰落时期。由于资金短缺（战后更为严重），机车车辆老化，票价和运费高昂，又没有新的发展，因而铁路确实成了被人称为既昂贵又破旧的交通方式。它受到来自公路交通的竞争，因为政府采取了发展公路的政策，而且如前所说，这种政策还得到美国资本的支持。

20年代末英国在乌拉圭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摇摆不稳。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肉类市场，但已不再能保持其传统的霸主地位。如同在拉美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出口品未能在1929年危机前的繁荣时期获得重大发展，这清楚地证明它们的竞争力已大为削弱。英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公司继续提供它们在半个世纪前出售的同样商品，而更有企业精神和想象力的美国销售商却很容易地提出更有利的价格和信贷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已停止的移民到20年代又恢复了。1919～1930年间，进入这个国家的移民几达20万人，不过其中可能有3/4在10年内又移居巴西或阿根廷。新来的移民属于各个不同的国籍，这是战后欧洲政治混乱、经济困难的结果。除了传统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外，还来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巴尔 472

干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德国人和奥匈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为乌拉圭文化和宗教的多样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犹太人也来了不少；他们依靠技术和勤奋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组成了严密的社会集团。新来移民的职业分布是由对劳动力需求的状况决定的。冷藏业、工程作业、纺织厂、特别是零售商业吸收了这些新劳动力和他们带来的少量积蓄。他们一律选择在蒙得维的亚定居，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1930年蒙得维的亚有65.5万居民，几乎占全国人口的35%。那年，胡利奥·马丁内斯·拉马斯以《乌拉圭的财富与贫困》为题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心主题是说首都的功能好象是一台对乌拉圭农村有害的抽水机。

在肉类工业内部，两种长期相互有关的趋势正走向结束：冷藏业发展了，冷藏肉的地位超过了冷冻肉，腌肉场终于衰落，它现在只占牲畜屠宰的5%。战后冷藏工业与世界肉类市场相结合的结果，使得殖民地时期以来的腌肉干贸易几乎消失，同时普遍推广了能生产市场所需优质肉的改良种牛。不过，屠宰冷藏工业是受外国（大部是美国）资本支配的，它们拥有大的工厂，在塔夫拉达控制着牛的收购。这些国际公司采取了协议价格的政策，并不断达成合伙经营的协议，以此瓜分乌拉圭市场，这使它们建立了一种对于中小牲畜生产者来说特别难以容忍的实际垄断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国家参与这一部门的建议，结果于1928年设立了国家冷藏局。但它最初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促使它成立的那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473

在1929年危机以前的5年内，随着世界贸易的恢复，出口再度兴旺。牧畜产品仍占出口的95%，主要商品是羊毛和冷藏牛肉。由于出口值高，而对进口的需求增长率受到限制，遂使比索在20年代升值，并且给人一种相对稳定的印象，受到投资者的赞许。不过，国际收支确实包含某些使人不安的因素，主要是外债水平暴露了表面繁荣的脆弱性。1929年乌拉圭为偿付外债而汇出国外约370万英镑。1929年危机的最初征兆传到乌拉圭，当时出现了外

贸逆差，黄金外流，比索贬值。这些挫折着重说明建立在农村部门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局限，因为它明显地依赖不稳定的国际市场。

1919年集体负责制宪法被接受时，两个传统政党默认的和解是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协议为基础的。对白党来说，这种格局具有防止巴特列再任总统的好处。它还意味着（对红党也一样）以接受政党间的协议作为组织政府的必要条件。在15年内，这样一种连续的谅解保证了制度稳定性，虽然比较脆弱。总统一职由三位来自红党不同派别的人担任：巴尔塔萨·布鲁姆（1919～1923年），正统的巴特列派，美洲各国间外交新体系的建筑师；何塞·塞拉托（1923～1927年），工程师和企业家，他虽是红党，但同任何一个主要集团都没有密切联系；胡安·坎皮斯特吉（1927～1931年），律师，持不同政见的里韦拉派的著名成员。

1919年宪法包含的这种共参制趋于加剧两个政治运动的内部分裂。在白党中，尽管存在着冲突趋势，同最保守的农村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物路易斯·阿尔韦托·德·埃雷拉脱颖而出。在红党内，1913年后的一系列分化有造成它分崩离析的危险，但每次都被巴特列的强大而无可争辩的影响所防止了。1929年底巴特列的去世导致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由于他的逝世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在后来几年对制度的稳定性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种制度是在他的启示下建立的，随后又同样决定性地依赖他的权威。由于缺乏象他一样有才干的领导人——部分地是因为巴特列自己不愿意培养接班人——以及势必发生的对他的政治遗产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了红党内部的紧张状态。1930年由加夫列尔·特拉赢得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巴特列派内部各种倾向的共处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巴特列本人的持能。

474

尽管如此，在巴特列派统治的最后几年，又采取了一系列改良主义措施。前面已经说过，国家在地主阶级支持下建立了国家冷藏局，对牲畜市场进行干预。1931年又成立了全国燃料、酒精

和水泥管理局，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直接生产活动。这个新机构将制造酒精和水泥，此外它垄断了那些它希望能找到的石油储藏的开采权；更重要的是它垄断了原油的进口和炼制，这种权力使它同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发生了冲突。20年代末，外国投资者和国内资本家眼里的“社会主义诅咒”进一步激化，当时对工商业提出了最低工资建议，同时为公司雇员制定了退休金计划，其基金的一部分由雇主提供。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对国内的影响，乌拉圭的国内政治紧张状态进一步加剧，1933年爆发了政变。这一政变结束了敌对的社会政治集团根据实用主义交易和机会主义协议而达成的政治妥协，这种妥协对1929年以前的经济繁荣曾经是十分必要的。

第 14 章

475

巴拉圭——从三国同盟战争到查科战争（1870—1932年）

同盟国占领下的巴拉圭

1869年元旦，外国军队占领了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这座几乎遗弃一空的城市横遭洗劫，士兵们——主要是巴西人，还有一些阿根廷和乌拉圭部队——搜寻战利品和妇女。同盟国与巴拉圭交战已4年多，现在这个筋疲力尽的小国的防御终于崩溃了。即使如此，战争也还没有结束。巴拉圭总统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元帅继续由北部森林深处的临时司令部指挥战斗，他的不断缩小的军队依靠征召10岁至14岁的少年才得以维持。直到1870年3月1日他才在靠近巴西边境的塞鲁科拉陷人绝境，终于被杀。

此时，同盟国在亚松森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从反洛佩斯分子中任命的三头执政班子宣称这位元帅是逃犯，并且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新政府还答应在下一年举行制宪大会选举，它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而在这以前的半个多世纪巴拉圭接连处在独裁统治下：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1814—1840年），他在独立后使这个国家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1840—1862年），他结束了巴拉圭的孤立状态，开始了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862—1870年），他要建立一个南美帝国的梦想

476

与巴拉圭邻国阿根廷和巴西的领土野心一起导致了这场灾难性战争。战争开始时，巴拉圭有约50万多人口，但战争、饥饿、疾病使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在估计的约22.1万幸存者中，活下来的男人仅2.8万人，大多数人非老即幼。国家完全成了一片废墟。城市和农场被废弃；大部分财产不是被大肆抢掠的同盟国军队就是被洛佩斯的焦土政策所破坏。成千上万的人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一路上因饥饿和衰竭而不断死去。国库空虚，而同盟国丝毫不想提供财政援助。

考虑到三头执政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们——西里洛·里瓦罗拉、何塞·迪亚斯·德·贝多亚和卡洛斯·洛伊萨加——干得相当出色。他们设立了紧急劳动营安置无家可归的家庭，组织了民兵以镇压抢劫和盗匪活动，实行新的税收和司法制度，实施一项公共工程计划以提供就业，并由国家负责照顾伤残人和孤儿。使政府的任务难上加难的是，它的所有政策都必需得到同盟国的批准。同盟国很少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洛佩斯一死，阿根廷人和巴西人就恢复了由来已久的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巴拉圭人更多的回旋余地，但同时使它受到交叉压力。阿根廷是通过巴拉圭军团施加影响的，这是一帮在战争爆发时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流亡分子，他们参加阿根廷军队打洛佩斯。他们的领导人是贝尼尼奥·费雷拉、法昆多·马查因和何塞·塞贡多·德科德；费雷拉是三头执政新建民兵的首脑，德科德则是1870年宪法的主要作者。巴西人是最大的占领军，他们支持三执政之一的西里洛·里瓦罗拉。里瓦罗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缺乏政治才干，但很有用，因为他既不亲军团也不亲洛佩斯。他曾在巴拉圭军队中任军士长，战争期间在洛佩斯元帅经常暴发的一次猜疑性狂怒中被逮捕并受到拷打。因此他可以像好爱国者一样宣称是为祖国而战，而不必为旧政权感到惋惜。最后，还有一个也许可称作洛佩斯派的第三派，它包括了所有仍然崇拜那位已倒台的独裁者的人们。该派领导人坎迪多·巴雷罗是洛佩斯驻欧洲的商务代理人。

战争期间，由于同盟国的封锁，巴雷罗未能返回巴拉圭，现在他着手重新集合士气低落的洛佩斯派。他吸收的首要人物是不久前从战俘营回来的贝尔纳迪诺·卡瓦列罗将军。对于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巴拉圭人来说，卡瓦列罗将军是最伟大的活着的英雄，因为他曾在洛佩斯元帅一边战斗到底，只是在塞鲁科拉才落入敌人手中。

1870年7月举行了制宪大会选举。经过充满相互指责、有时是街头对骂的激烈竞争后，军团派赢得了多数席位。大会于8月召开，其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三头执政，任命法昆多·马查因为共和国临时总统。但巴西军队认为这是一次稍加掩饰的政变，第二天就派兵包围了制宪大会。马查因被迫辞职，由里瓦罗拉取代他任总统。之后，大会就专心致志于草拟宪法的任务。结果推出了一个反映反洛佩斯派的自由思想的文件。旧政权依靠的是国家控制的经济，为此，新国家必须鼓励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鉴于洛佩斯曾是一位绝对的专制统治者，新宪法必须规定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巴拉圭政府的每一个部分将对另外两个部分的权力起制约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宪法的影响。

1870年宪法规定，行政部分的首脑是由选举人团选出的总统，任期4年。为了防止他变成独裁者，他必须隔两届（8年）以后才能再当选连任总统。副总统也同时由选举产生。总统由一个5人内阁襄助，它由外交部长、司法宗教和公共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以及国防部长组成。立法部分包括一个两院制议会，有13名参议员和20名众议员。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以更新1/2的众议院议员和1/3的参议院议员。作为防止出现独裁的附加保证，议会在休会期间将任命一个常务委员会以便监督总统的行为。司法部分的首脑是一个3人最高法庭。在它之下是负责民事和刑事的上诉法院。宪法规定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地方事务则由内政部长任命的政治长官（jefes politicos）处理。各都

177

市可选举自己的地方议会，但它们只对最细小的问题才有决定权。

这一民主宪法在巴拉圭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民极端贫穷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实施的。而且，战争结束后国家的状况也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引导重建过程。同盟国也不愿意看到巴拉圭由一个真正自由的政府进行管理。甚至那些草拟宪法的人也没有多少耐心去进行民主所要求的那种讨价还价和妥协退让。对公民来说，从政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发财机会，为此发生了控制政府的凶猛争夺。在那种气氛下，人人都为自己着想。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为推行自己的野心而去寻求占领军的支持。

478

战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是里瓦罗拉的财政部长胡安·包蒂斯塔·希尔。他是一个精明而无情的政治人物，不久就使巴西人相信他能够比笨拙无能的巴拉圭现政府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符合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的支持下，他把里瓦罗拉挤出了总统府，扶正了副总统萨尔瓦多·霍韦利亚诺斯。但在他可能赶走霍韦利亚诺斯而由自己夺取总统宝座前，希尔突然被仍然指挥着民兵的贝尼尼奥·费雷拉将军逮捕并送出国境。现在虽然霍韦利亚诺斯继续担任总统职位，但费雷拉成了最有力的人物，这代表阿根廷势力的上升。但是为时不长，因为1874年由卡瓦列罗将军领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起义使费雷拉流亡国外。巴西人再次进行了干预。接管权力的不是洛佩斯分子，而是希尔，他由一艘巴西军舰送回巴拉圭，最终被安插到了总统府。

到1876年，阿根廷人和巴西人都感到占领巴拉圭的费用太高了。阿根廷人曾要求巴拉圭作出巨大领土让步，作为他们鉴订和平条约的代价，这个要求如被接受，将把巴拉圭河以西叫做查科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同意国际调停，最后的裁定有利于巴拉圭，阿根廷也接受了并撤了军。巴西人已经通过谈判缔结了条约，据此巴拉圭放弃了它对北部和东部某些地区的要求，所以巴西人觉得没有更多的理由留下来了，他们的部队也撤

出了巴拉圭。

希尔政权没有巴西人的保护就无法长久生存。1877年4月12日希尔在从家里徒步去总统府时遭到暗杀。谋杀他的人是一群不属任何政党的人，他们也许可称作自行其是的洛佩斯主义者。他们虽然反对希尔，认为他是巴西傀儡，但他们同瓦雷罗和卡瓦列罗也有争吵。他们现在的计划是把除掉希尔同由前总统里瓦罗拉领导的起义相配合。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希尔的死并没有带来他们指望的混乱。相反，副总统伊希尼奥·乌里亚特在卡瓦列罗将军和他的朋友陆军部长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将军的支持下出任临时总统。埃斯科瓦尔调动军队，于4月17日彻底击溃了叛乱分子。他们的几名领导人被俘，带着锁链押回亚松森。

479

乌里亚特的第二步是制定计划于1878年进行选举。洛佩斯派因控制了政府，所以最有希望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巴雷罗为总统。军团派不仅处境不利，而且他们的队伍因法昆多·马查因与何塞·塞贡多·德科德之间的个人宿怨而四分五裂。总之，争吵的结果，德科德脱离了他原来的党，转而支持巴雷罗。尽管如此，马查因被洛佩斯派视为危险的对手。他是同阿根廷缔结有利的和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因而大得人心。现在他起来为暗杀希尔的人辩护，把他们在狱中受到的虐待公之于众，从而煽动了公众舆论。归根到底，希尔是个可鄙人物，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他的谋杀者称为爱国者。在这种公众评论下，马查因无疑是一个强大敌手。

巴雷罗、卡瓦列罗和埃斯科瓦尔当然不愿意被人挡住掌权的道路。因此，他们指责马查因同仍然逍遥法外的里瓦罗拉有联系，并阴谋推翻政府。这些虚构的指责尽管纯属谎言，却使政府得到了逮捕马查因的借口。于是他在10月15日被捕入狱，加入了他的被保护人的行列。但这还不够，因为即使进了监牢，马查因继续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同情。结果，在10月28—29日夜里，乌里亚特的警察导演了一次越狱事件，以此为由冲进监狱，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囚徒，包括马查因。

尽管公众对这次可憎的事件感到厌恶，但现在谁也不敢反对洛佩斯派了。巴雷罗理所当然地就任了总统。不过还有一个人需要除掉，然后他才能完全巩固他的位置。前总统里瓦罗拉仍试图在东部山区发动起义。为此，巴雷罗最初的一个行动是给他以特赦。里瓦罗拉上了这个花招的当，于1878年12月回到亚松森。不到一星期，他遭到谋杀：一天夜里他在城里街上被人用刀刺死了，受惊的目击者不敢前去救他。至此，洛佩斯派完全掌握了局面。但巴雷罗并没有长期享受权力之果。1880年9月4日他突然得病，几小时内便呜呼哀哉。军队立即进行接管，撇开了文职副总统，把卡瓦列罗将军推上掌权地位。

480

红党时期（1880—1904年）

卡瓦列罗将军的政变带来了持续将近1/4世纪的政治稳定时代。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他得以或者作为总统直接地控制政府，或者通过军方间接地控制政府。在任满巴雷罗遗留的余下几年以后，他又使自己当选，再任了四年总统。之后根据宪法，他于1886年下台，不过事先保证将由他的密友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将军作他的继任人。

政府的有条不紊就有可能顾及巴拉圭严重的经济问题了。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在重建国家方面几乎没有作什么努力，不仅如此，霍韦利亚诺斯政府还使国库负债累累。1871和1872年同英国的巴林兄弟银行谈妥了两笔庞大贷款，总数约达200万英镑。这笔钱的一大部分当即被霍韦利亚诺斯和他的同伙盗窃了，其余部分也被挥霍一空。到1880年，贷款累计的未偿利息使巴拉圭的债务总额超过300万英镑。由于国库空虚，为了恢复政府信誉就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这意味着要出售国家财产，因为那是它唯一的资产了。不过资产还颇可观，因为在旧政权下巴拉圭的几乎全部土地和大部分工业都是国家所有的。

1883年和1885年的土地出售法导致了公共土地所有权的大规

模出让。优质土地的价格为每平方里格*1200比索，而劣质土地只卖100比索。但政府不鼓励小买主，规定必须至少购买半平方里格。即使价格这样便宜，因战争和政治混乱而破了产的巴拉圭农民也买不起他们曾经廉价向国家租种的农田。现在他们降到了雇工的地位，被迫将他们的劳力和产品交给私人大地主。另一方面，卡瓦列罗及其一伙却发了财，因为他们可以向国家银行贷款购买最好的产业。他们获得土地证书后，就可以或者经营自己的大庄园，或者将土地卖给外国投机商，牟取暴利。

471 将巴拉圭的大部分土地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并没有像古典自由派理论所说的那样导致经济发展。它产生了大庄园：即通常由在外地主拥有的大土地庄园。这些大庄园在许多方面像是封建采邑，因为它们有权力很大的主人，不管是富有的外国人还是有势力的政客，都不让国家进行任何干预。他们不纳税，对不幸的雇农行使自己的一套法律；那些雇农负债累累，被拴死在土地上，他们像是中世纪的农奴而不是共和国公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土地买卖的成交，这些大庄园进一步扩大了。到19世纪末，大约79名庄园主拥有巴拉圭几乎一半的土地；到1930年，仅仅19个领主（其中多数是外国大公司）拥有全国领土的一半以上。阿根廷的投资者如卡萨多、萨斯特雷和皮纳斯科家族在查科地区和巴拉圭河北部流域购买了大片庄园。他们的兴趣扩大到养牛和木材采伐。还有大片土地落到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之手。一家名叫“工业公司”的英国公司控制了巴拉圭茶的大部分贸易，这种茶叶生长在南部的大种植园。一家名叫“国际物产公司”的美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牧场和一家肉类包装厂；它是皮张和腌肉的主要出口商。美国公司还控制着巴拉圭硬木精的生产，这是从一种常见的巴拉圭硬木—“破斧树”身上提取的单宁酸。

许多受过教育的巴拉圭人不满卡瓦列罗的卖国政策，当然也

---

* 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4.8公里——译注。

不满选举中的舞弊和随之而来的官方贪污腐败。到1887年便形成了一个自称“民主中心”的反对派运动。参加“中心”的有：老军团派，他们因卡瓦列罗出身于洛佩斯派而对他仇视；有前洛佩斯派，他们已同卡瓦列罗决裂；还有新一代的青年理想主义改革派，他们追求廉洁政府、自由企业和文人控制军方。为了应付“中心”的挑战，卡瓦列罗着手更有效地组织自己的支持者。在“中心”成立一个月后，他宣布创立一个官方的党——全国共和联盟。

卡瓦列罗的党像民主中心一样是建立在混杂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老的洛佩斯派现在同像何塞·塞贡多·德科德这些从前的军团派分子搀和一起，他们参加政府或者是出于机会主义，或者是因为同以前的盟友发生了争吵。由于全国共和联盟采用红色作为其党旗的颜色，它的党员得到了“红党”的绰号。另一方面，民主中心于1894年改名为自由党，并以蓝色作为反对党的颜色。此外便没有别的什么来区别这两个集团了。尽管红党挥舞着血色衬衫并声称自己是洛佩斯的政治继承人，政府的政策却奉行自由派宣布的同样的放任原则。即使如此，两党之间常常发生猛烈和流血的战斗，因为在选择站在哪一边时涉及个人和家族的忠诚。所以巴拉圭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政治倾向，在他们的披毡和罩衣上标明他们所属党派的颜色。这种效忠的表示也不仅限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在老百姓的生存必须依靠恩泽和庇护的国家里，甚至农民也卷入了政治——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有时被动员去投票，有时去充当炮灰。

482

到1890年，有迹象说明卡瓦列罗将军正在失去对政治制度的控制。尽管在他操纵下胡安·格·冈萨雷斯当选为总统，他却无法阻止同自由派和解的趋势。冈萨雷斯总统本人也反映了许多红党党员中的新情绪。他虽然是全国共和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早先是军团派成员，其他许多红党党员其实也是如此。因此，他在自由党中有许多朋友，这使他很想找到某种妥协办法来让他们参加政府。在他敦促下，红党表示愿意让自由党得到副总统的职

位。自由党中有些人倾向于接受这一提议，但最终不妥协分子占了上风，国家因而继续处于分化状态。

与此同时，军队心怀嫉妒地瞟着冈萨雷斯，因为他毕竟是个文人。这就成了问题，因为所有巴拉圭政府需要军队支持才能生存。这支军队虽然不很大——在近60万人口中仅占2500人左右——但是它的武器和组织使它在政治中成了决定性因素。它对政府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的维持费在每年预算中占最大宗，约占全部支出的1/5。好在总统得到卡瓦列罗的青睐，所以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反对他的叛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91年10月，自由党的一次起义改变了局势。自由党的这次袭击来得突然，几乎推翻了冈萨雷斯。只是由于国防部长胡安·B·埃古斯基萨将军迅速果断的行动才挽救了政府。经过一场血战后，自由党的起义被粉碎了。埃古斯基萨脱颖而出，成了红党新的军事英雄。

483

埃古斯基萨同冈萨雷斯一样，从前是军团派，后来站到了卡瓦列罗一边。他与总统一样抱有温和观点。考虑到他的政治身份以及在军队中的高级地位，他显然是红党挑选的1894年的总统候选人，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冈萨雷斯总统却主张文人统治，赞成由何塞·塞贡多·德科德作他们的继任者。为了阻止已经像是候选人一样在进行竞选活动的埃古斯基萨，冈萨雷斯公开宣布他挑选德科德作为党的提名人。这使埃古斯基萨感到突然，因为不久以前他根据宪法禁止在职官员参加竞选的规定，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不过，他在军队中有许多支持者，他们现在响应他起来造反的号召，结果冈萨雷斯在1893年6月被赶下台。他的副总统马科斯·莫里尼戈负责看守政府，直到埃古斯基萨当选为总统。

埃古斯基萨一上台就试图组织一个由两党中的温和分子参加的中间道路政府。卡瓦列罗的红党当然谴责他是叛徒，而自由党中不妥协的激进派在塞西略·巴埃斯和曼努埃尔·贡德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领导下也拒绝接受官职，除非建立一个纯粹的自由党政府。另一方面，由经验丰富的老兵贝尼尼奥·费雷拉将军领导

的公民自由派则同意合作。在他们的支持下，加上他自己的红党中的追随者的支持，埃古斯基萨得以使巴拉圭获得四年的政府稳定和经济发展（1894—1898年）。到他任期结束前，有迹象说明巴拉圭终于从战争及其动荡余波中渐渐恢复。1899年进行的人口统计表明人口达63.5万人左右，而1872年仅23.1万人。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部分地是由于移民的不断流入，同时还由于在这个国家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时移居国外的人的回归。外国移民和移居国外者受到贸易和生产复苏的鼓励。在1880年红党最初上台时，巴拉圭的贸易跌落到只及战前的一半；之后，进出口的实际额都增加了约250%。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的牛群完全得 484 到了恢复。牛的存栏数在1870年仅1.5万头，现在估计达260万头左右。而且牲口的质量也因政府鼓励进口优良品种而得到改进。最后，说明巴拉圭恢复程度的标志，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建立了新的中小学，还开办了一所国立专科学院。

但是同他的前任一样，埃古斯基萨最后也遇到了继任人危机，因为宪法不允许他连任两届。他宁可不支持另一个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军官，而挑选红党的一位温和派文人埃米利奥·阿塞瓦尔为党的第一候选人。他还鼓励自由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将使巴拉圭首次进行有竞争的总统选举。可惜自由党严重分裂，两派都拒绝参加竞选以免面临某种失败。结果，阿塞瓦尔在没有获得人民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任总统。同时，作为文人，他对军队的控制远不如埃古斯基萨。卡瓦列罗将军于是得到了重新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机会。他在军官中仍有朋友，并且不费多大力气就煽起了军方对文人政客的传统蔑视。1902年1月，在国防部长胡安·安东尼奥·埃斯库拉上校发动政变后，卡瓦列罗分子重掌大权。但这一来，埃古斯基萨派、公民自由派和激进党联合起来。他们还得到了阿根廷的帮助，阿根廷认为卡瓦列罗过于亲巴西了。1904年，以费雷拉将军为首的革命派发动了对巴拉圭的入侵。战斗延续了四个月，由于一些重要军事指挥官临阵脱逃以及阿根廷

施加了严厉的外交压力，政府军士气受挫而最后退让了。1904年12月，埃斯库拉签署停战协定，并把权力交给了自由党。

自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1904—1923年）

激进党和公民自由派在打败了共同敌人后又恢复了旧争执。激进党的领导人塞西略·巴埃斯为人骄横、固执、冷漠；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从欧洲输入的一种文明力量，其使命是使巴拉圭摆脱野蛮状态。公民自由派的首领费雷拉将军是个玩世不恭的务实主义者，对他来说政治就是操纵武力和外交的艺术，要根据情况调整它们的关系。尽管巴埃斯被允许任临时总统之职，但费雷拉控制着军队。这一地位使他得以强行将自己提名为1906年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并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红党因为不相信自由党宣称的进行诚实选举的保证，所以拒绝提出任何候选人。

485

红党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正式的弃权政策。从他们在1904年下台直到1927年，他们一直拒绝参加任何选举。因此他们在国会或地方政府都设有代表。作为一个心怀不满和不愿效忠的反对派，他们的目标是在自由党内鼓励分裂，然后乘机夺权。而公民自由派为了抵消较大的激进派的力量而乐于寻求红党的支持。与此同时，激进党则转向军队，想赶走他们不能容忍的掌权者费雷拉。

局势的关键是军队总司令阿尔维诺·哈拉上校，他现在成了所有派别追求的对象。他虽然名义上是自由党人，实际上是纯粹为自己谋取权力的一个机会主义者。费雷拉显然是他取得总统宝座的主要障碍，所以哈拉心甘情愿地参加了激进党的密谋。1908年他突然调动军队造反，使费雷拉措手不及而被推翻后，并流放国外，从而最终结束了长期的政治生涯。然后哈拉又推举一名激进党文人埃米利亚诺·冈萨雷斯·纳瓦罗就任临时总统，从而博得了更多的人心，并驱散了人们认为他在筹划自己上台的怀疑。

1920年举行了大选。这次，红党和公民自由派都不参加，所以激进党得以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使他们的候选人曼努埃尔·贡

德拉当选。贡德拉和巴埃斯一样是个弃学从政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巴埃斯突然退出政党生活时，他接任为激进党领导人。巴埃斯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便正确地估价他本人的才能更多地在学术领域而不在实际政治方面。例如，他因对持续不断的混乱感到泄气，竟当众大骂巴拉圭人为“白痴”，为此在他的党的追随者中大失人心。由于这点，感到尴尬的自由党激进派开始把他视为负担，他在党内的影响一落千丈。巴埃斯不想反悔，辞职后当了486 国立学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多年，成绩卓著。与此同时，他的信徒和亲密同事贡德拉继承了他在激进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作为一名政治领袖，贡德拉是否就比巴埃斯更为机敏，却是个问题。他与巴埃斯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和个人素质，他两次就任总统（1910—1911年、1920—1922年），结果都提前离职。也许贡德拉就是运气不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容易激化争论，并且总是没有能力保持权力。

贡德拉的第一任政府只维持了两个月，哈拉上校便突然起来把他赶下台。这次政变触发了巴拉圭历史上一个最糟的无政府时期。1911年1月哈拉夺权以后，3月份就遇到激进党的一次严重反叛。其领导人是贡德拉的一名部长阿道弗·里克尔梅，他曾强烈主张由文人控制军方。经过激烈战斗后，哈拉设法击败了反叛者，还抓了一些俘虏，包括里克尔梅在内。但是接着他犯了错误：处决激进党领导人，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在这以前，他表现为一位负责的温和派，在互不相让的自由党各派中进行仲裁，因而赢得了人心。现在显然他想当暴君——而且是个杀人暴君。此外，哈拉的地位很软弱，因为他没有文人的支持。作为一名自由党人，他在红党眼里是敌人；作为既背叛了公民自由派也背叛了激进派的人，他被所有自由党人视为革出教门的人物。甚至军队也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安全基地，因为军官们通常因家族或朋友关系而同这个或那个文人政治派别有关。结果，哈拉被推翻只是个时间问题。7月份发生了第二次起义，这次的领导者是公民自由派和红党

的联盟，它成功地推翻了哈拉。

新政府的领导者是利韦拉托·M·罗哈斯，一位继续得到红党支持的公民自由派。与此同时，激进党一直在阿根廷边界那边集结。最后，他们于11月入侵。这一回，领导人是一个名叫爱德华多·谢雷尔的富有锐气的考迪略。他为这次入侵作了仔细的准备，部队装备精良，因为他从一个名叫马诺埃尔·罗德里格斯的葡萄牙债主那里获得了一笔25万金比索的贷款，答应在革命成功后从巴拉圭国库中偿还并支付利息。罗德里格斯很幸运，谢雷尔果真成功了。到1912年2月，革命部队向首都挺进，进展神速，利韦拉托·罗哈斯辞去总统职务后逃之夭夭。红党在佩德罗·培尼亚率领下孤军作战，但激进党人在3月份终于胜利进入亚松森。不过，在激进党人得以巩固胜利以前，他们再次受到哈拉上校的挑战，后者在8月发动叛乱。这一次哈拉失败了，并在战斗中被杀。于是，激进党人打败了残余的反对派，巴拉圭终算——尽管只是短暂地——恢复了表面的秩序。谢雷尔被感恩戴德的激进党人选举为总统，而发放高利贷的罗德里格斯获得了2,219,247比索的偿款。

487

谢雷尔是与巴埃斯或贡德拉十分不同的一类政治人物，因为他是个讲究实际、自我奋斗的人，没有什么耐心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或者讨论理论问题。同他的几个前任不一样，他不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相反，他着手使政府施政现代化并利用国家的权力鼓励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巴拉圭特有的不稳定问题。在施政方面，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用量才录用的文官制度代替政党分肥制，他还试图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他设立了发展部和外汇管理局，并且增加了农业银行的放贷权。这个事实说明，巴拉圭仍然主要是个农业国，它的大部分产品是供当地消费的。有一些简单工业生产供出口的巴拉圭茶、巴拉圭硬木精和肉类副产品。此外，还向国外销售一些木材、烟叶、棉花和柑桔类水果。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农业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玉米、大米、

甘蔗和木薯。现有的一些粗放的小型工业也是如此，包括砖瓦制作、锯木、雪茄制作和织布等。尽管如此，谢雷尔决心通过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办法促进经济发展。国内的铁路线向南铺设到了巴拉那河的港口恩卡纳西翁，在那里与阿根廷铁路系统相接。同时，亚松森的港口设备实行了现代化，以适应河道交通增加的需要。政府还寻求外资创办银行，目的是用其贷款刺激本地生产。法国资本建立了"共和国银行"，它负起了官方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掌握政府存款和处理国家对外金融事务，同时还充当普通的储蓄和抵押银行。在纯粹的商业银行事务方面，英国人拥有的"商业银行"和西班牙人拥有的"西班牙与美洲银行"占主导地位。

488

谢雷尔政府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1914年对巴拉圭食品、尤其是肉类的需求突然上升。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谢雷尔命令建设了若干新的肉类包装厂。出口的扩大带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这又增加了谢雷尔的声望。同时，他明智地将增加了的来自进出口税的政府收入用于进一步改善国内状况。但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15年公民自由派发动政变，竭力企图夺权，迫使谢雷尔退出了首都。但数天后他便粉碎了叛乱，恢复了秩序。当他最后于1916年任期终了退休时，他成了自从旧政府以来完成任职期的第一位文人总统。

由于红党继续放弃选举，而公民自由派又被取缔，故激进党得以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选举曼努埃尔·佛朗哥为总统。佛朗哥的当选是党内的谢雷尔派和贡德拉派两派之间达成的妥协。宪法禁止谢雷尔继续担任总统，他又否决了贡德拉的候选人提名，因为他本人瞧不起他。在谢雷尔这位忙忙碌碌、富于进取的"暴发户"与具有学者风度的、贵族化的贡德拉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所以这两个领导人彼此憎恶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各人都有明确的治政方法和一大批个人追随者。不幸的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争吵为巴拉圭带来了悲剧性后果。

佛朗哥总统表现出是一位称职的深得人心的行政官。但他的风格同谢雷尔大不相同。他对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兴趣，他管理政府的朴实风格更多地与党的放任派相一致。预算被小心翼翼地平衡，国家的职能主要限于维持秩序。不过，佛朗哥还是实行了两项重要的政治改革：无记名投票和依法登记投票人。他的温和与公正甚至促使红党考虑放弃他们的不参与主义立场，并在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合作。总的来说，佛朗哥是巴拉圭曾经有过的最得人心的总统之一。他的方针切合时代的情绪，即对于到处可见的“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持乐观态度：人口稳步增长到了约80万，1900—1919年间巴拉圭的对外贸易翻了一番，亚松森在19—20世纪之交还只是有3.8万人的简陋市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已变成拥有9万人的繁荣城市。 489

确实，这个时期的巴拉圭社会享有美好年代的名声。随着政党冲突的停息，再没有什么来搅乱社会秩序了：不存在破坏性的宗教、种族或语言上的裂痕。巴拉圭是个纯粹的天主教国家；它的人民是西班牙人和瓜拉尼印第安人的单一融合体，反映这两种文化交融的是人们几乎普遍能操两种语言，这使巴拉圭人感到他们是独特的民族。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存在的，但没有严格的界线。可以溯源到殖民地时代的老的上层阶级因战争和革命而沦于贫穷；而且，即使最贵族化的巴拉圭人在血管内也流着印第安人的血液。旧的上层阶级主要从事法律、政治或农业，除他们之外出现了一批新的活跃的商业精英，他们主要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和英国移民。这些新来者很快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全结合起来了。在两大集团下面是广大农民群众。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任何现代化努力的触动，后者的影响几乎完全限于首都。最后是人数不多但在不断增加的城镇劳工。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对现存秩序不满的最初迹象。首先起来组织工会并为提高工资改善条件而号召罢工的是港口、海运和运输工人。不过是在10年以后他们才强大得使人不容忽视。

在这之前，巴拉圭倾向于将工人的抱怨轻蔑地斥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不能让这些心怀恶意的人扰乱治安。

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在1919年突然终止。首先，家长式的佛朗哥猝然去世，从而消失了“美好时代”的象征；其次，也是对他代表的制度真正致命的是，欧洲大战的结束打破了巴拉圭繁荣的肥皂泡。佛朗哥死后接管政府的副总统何塞·P·蒙特罗面临着经济的崩溃，因为出口订货激剧削减，卖不出去的货物在码头上腐烂。人们一片惊慌，随之而来的是责怪。繁荣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好感觉”的政治时代的终结。

不出所料，1920年激进党的代表大会在究竟提名贡德拉还是谢雷尔为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贡德拉刚度过了作为驻美大使的三年体面的放逐生活，现在回国要求担任他早先被哈拉上校剥夺了的总统的权利。他服务年代长久，这使他成了自由党的“老人家”。谢雷尔也有热情的追随者，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贡德拉得到大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根据双方作成的一笔交易，谢雷尔得到当自由党总裁的补偿。

这种妥协不过维持了数月。谢雷尔怀着一贯的追求效率和组织性的热情，试图将自由党由一个当地名流的松散集团改造成为纪律严明的机构，有层层的指挥系统，并受中央的严格控制。显然他想把持这个党，并确保在下一轮总统选举时得到提名。贡德拉派感到惊慌，为了阻挡谢雷尔的计划，内政部长何塞·古贾里在党的青年组织中鼓动人们造他的反。谢雷尔进行了报复，在他自己的日报《论坛报》上攻击政府。攻击和反击的激烈程度不断升级，最后谢雷尔和他的支持者采取了公开造反。1921年10月29日，他们占领了亚松森警察营房，要求政府解除古贾里的职务，否则就发动流血叛乱。面对这种对其合法权威的挑战，贡德拉命令军队逮捕谢雷尔分子。当他得知军队不愿这么做时，他提出了辞呈。

贡德拉的辞职使政局陷于混乱。谢雷尔并不想推翻贡德拉，

而只想逼使他就范。现在人们指责他制造了他一度曾经帮助克服的那种无政府状态。两派被迫寻求妥协，结果同意由欧塞维奥·阿亚拉任临时总统。阿亚拉是一位作家和外交官，他的派别属性不明，因为近几年他花费很多时间在欧洲旅行。他的任职是根据一项谅解，即不久将举行选举。为了保证选举的举行，国会匆匆通过一项法案并送到他那里签署。

但在这当口，红党决定混水摸鱼。他们的领导人曼努埃尔·多明格斯一直在企图找一个军官来领导反对自由党的政变。显然中选的是总司令阿道弗·奇里费上校。奇里费拒绝了这个想法，但继续同多明格斯保持友好交往。现在红党宣称他们将支持奇里费作为“超越政治”的无党派总统的候选人。这个想法也得到谢雷尔派的赞同，因为自从贡德拉辞职后，谢雷尔获得他的党的提名的可能性少得多了。

491

激进党贡德拉派听到这个计划后爆炸了。他们在国会会议上痛斥谢雷尔是叛徒，甚至指责奇里费上校曾经阴谋反对贡德拉，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拒绝支持总统对付谢雷尔，他就为自己走向总统府扫清了道路。这样一来，奇里费便抛弃了自由党，同意作红党一谢雷尔派联盟的候选人。激进党感到选举可能以奇里费的胜利结束，故要求延期举行。此时阿亚拉总统尚未在确定选举日期的法案上签字，他否决了它，从而显示了他真正的贡德拉派的面目。他说，他将留任到贡德拉任期届满。因此在1924年前不举行选举。阿亚拉的决定将这个国家投入了内战。

1922年5月，奇里费上校在得到了大多数军官同僚的支持后举起了造反大旗。阿亚拉急忙撤消了他推迟举行选举的决定以维持和平，但为时已晚。造反者向亚松森推进，6月9日发生了巷战。不知什么缘故，仅由一个工兵营和军事学校士官生组成的政府军奇迹般地守住了城市。即使如此，后来又进行了13个月的激战，战斗打遍了整个共和国。双方在战争期间都改换了领导人。奇里费死后由佩德罗·门多萨代替他为叛军司令。政府方面，欧塞维

奥·阿亚拉辞职后由埃利希奥·阿亚拉（无亲戚关系）继任，他从前是贡德拉的财政部长。阿亚拉作战更为有力，因为他在周围聚集了一批能干的青年下级军官，其中有些人如何塞·费利克斯·埃斯蒂加里维亚和阿图罗·布雷后来成为下一代杰出的军事领导人。渐渐地战争的风向开始改变。尽管门多萨上校实施了一条妙计，几乎在1923年7月攻占首都，但政府军再次固守住了，进攻者被迫放弃包围。随着这第二次攻势的失败，革命已筋疲力尽。谢雷尔和他的追随者逃亡国外，和平终于恢复。翌年，临时总统埃利希奥·阿亚拉正式当选为总统。

492

社会问题、外交和战争的临近
（1923—1932年）

埃利希奥·阿亚拉在1923—1928年间统治巴拉圭，他的政府是巴拉圭最进步的政府之一。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位典型的、属于最优秀一类的贡德拉派：绝对廉洁，对公款极为节俭。他严厉制止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精心管理国家财政，所以在他卸任时预算还有盈余。同时，如同巴埃斯和贡德拉一样，他也是一位严肃、孤僻的知识分子——孤僻得几乎有点愤世嫉俗。每天上午数小时，通向总统办公室的门总是关闭着，阿亚拉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写下他的思想；这些笔记在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们搜集起来并以《迁徙》为题出版。阿亚拉在青年时代曾周游列国，他在欧洲的旅行促使他思考祖国的问题。

当时巴拉圭的主要问题是它持续的贫穷和在日益增长的外国威胁面前的脆弱性。阿亚拉深信头一个问题的解决只有靠实现政治和平和改革土地占有制度。为了取得和平，他发布新选举法，确保少数派在国会有代表，接着又向红党保证进行自由选举。结果使红党分裂为弃权派和参与派两派，后者同意参加1927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以考验政府的诚意。阿亚拉说到做到，结果红党不仅取得了国会席位，而且决定提出候选人参加1928年的总统选举。

这将是巴拉圭历史上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总统竞选。

土地问题由1926年的土地法解决。根据人口统计估计，这个农业国里耕种土地的人中只有不到6%的人拥有农田。为此，土地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自耕农阶级，他们将拥有6至60公顷（约15—150英亩）大小的家庭农场。要做到这点有两个办法：或者使农民拓殖到国有土地上，或者征用私人大庄园，在后一种情况下，庄园主人将按他们购买时的原价得到赔偿。在多数情况下，在1926—1931年间，实际上采取了前一种办法。大约57.2万英亩土地被分配给了约17697个家庭，他们在分给他们的农地上耕种4年后获得土地证，并以分期少量付款的方式向国家还债。为了防止投机和将土地分得过小，法律规定限制农地的分租、转售或抵押；法律还不准继承不足15英亩的小块土地。同时，法律禁止集体或合作耕种这些土地，这反映了政府的典型自由主义观点。

493

巴拉圭面临的外国威胁来自玻利维亚。两国都宣布拥有查科地区，即在安第斯高原和巴拉圭河之间的广阔荒原。玻利维亚在上世纪将它在太平洋沿岸的领土丧失给了智利，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替代的出海口。控制了查科，它就能通向巴拉圭河，这条河向南流入巴拉那—拉普拉塔河水系，然后流入大西洋。还有一个吸引物是在查科地区玻利维亚所控制的一长条领土上发现了石油。因此有理由设想，整个地区蕴藏着异常巨大的财富。

在巴拉圭因内部麻烦而无暇旁顾时，玻利维亚已开始越来越深入地侵占查科地区，将堡垒线朝东向巴拉圭河延伸。这是个干干停停的过程。有时巴拉圭政府会提出抗议，玻利维亚人因不愿冒打仗的风险，于是就同意举行外交谈判，划定边界线以解决争端，如1907年和1913年的条约那样。由于巴拉圭人同样不准备打仗，结果边界线趋于接受现状，即承认玻利维亚对在其控制下的土地的权利，但它要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渗透。但是，玻利维亚人不久又开始推进，而亚松森的自由党政府常常宁可不理睬这种违背条约的行动，因为它们国库枯竭，负担不起动员军队的费用。

接着，由于20年代发现了石油，玻利维亚人加速推进。标准石油公司为钻井和抽取权支付的石油收入使玻利维亚能够进行精心得多的战争准备。他们聘请德国军官训练军队，购买了包括坦克在内的现代化武器。

494 等到1928年何塞·古贾里（也是贡德拉派）继阿亚拉为巴拉圭总统时，查科的局势已变得富有爆炸性了。玻利维亚的推进已经达到巴拉圭河上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一座堡垒，确当地起名叫“前锋堡”。这期间巴拉圭军队不得不无所作为地袖手旁观，因为自由党政府犹豫不决；但在1928年12月5日，一位名叫拉斐尔·佛朗哥的急性子年轻少校忍耐不住，率部袭击并摧毁了前锋堡。极为忿怒的玻利维亚人进行了报复，夺取了两座巴拉圭堡垒。现在双方都作了战争动员，但当巴拉圭的新兵报到时，部队没有制服、武器、食物、弹药或医药供应。巴拉圭一点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政府没有为保卫国家制订任何计划，因为它把宝几乎全押在它能说服玻利维亚人讲道理上。如今要它摊牌，古贾里政府被迫退让，并签署了一项屈辱性条约，其中有一条是要巴拉圭重建前锋堡。

战争暂时得以避免了，但自由党再也没有从这次对民族尊严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尽管古贾里试图抚慰反对派，把谢雷尔派、红党以及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组织“全国独立同盟”都包括进国防委员会，他的政府还是陷入了不断高涨的批评浪潮中。匆匆忙忙地从西班牙购买的武器原来是过时货，使用起来有危险，所以人们给它们起名叫“巴拉圭人的杀手”。现在是民族英雄的佛朗哥少校成了古贾里的股上之刺。当他最后卷入一次反政府密谋并被开除出军队时，反对古贾里的人指责古贾里迫害爱国者。反对派集团利用国防委员会作为攻击政府作战计划的论坛。

1931年10月23日，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顶峰，当时一批示威学生在总统府前面遭到卫队士兵的机枪扫射。学生们在反对派领导人鼓励下占领了街道，并向总统古贾里的住宅投掷石块，以抗议

政府对最近在查科的冲突按兵不动，在那次冲突中有1名巴拉圭士兵被杀。不管是否因为卫兵在暴民前面惊慌失措，或者是否像政府坚持说的那样——一名学生首先开枪，这次射击使1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是自由党统治的最低谷。公众舆论大为震怒，以至在国会调查这个事件的时候古贾里暂时辞去了职务。虽然最后他被证明无罪并在数月后复职，但“十·二三”事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它疏远了这个国家的整个一代知识精英。1936年，它终于发展为一场革命，把自由党赶下台去。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还受到1929年世界爆发的严重经济萧条的困扰。由于很大一部分巴拉圭居民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所以萧条的影响不算大。但在1928—1932年间，亚松森的物价下降了，这反映了当地市场的收缩。对外贸易也减少了。出口总值由1590万金比索跌落到1390万金比索，主要是因为阿根廷削减了购货。只是由于将进口由1430万减为650万比索，巴拉圭才保持了贸易顺差。为了使国家作好战备，这样勒紧裤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也可能导致了古贾里时代波及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

由于反对派再次因恼怒而退出选举，1932年的选举又恢复了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官方候选人的传统格局。自由党中意的人是前总统欧塞维奥·阿亚拉，有好几个原因说明这个选择是不成功的。他参与了导致1922—1923年内战的党派阴谋；谢雷尔派和红党都记得这位总统曾经为了保持权力而利用他的否决权推迟大选。民族主义舆论也有理由蔑视他，因为他曾经作为巴拉圭的外交代表与玻利维亚签订了1913年边界条约。那年他访问查科时，已经注意到敌人的军事阵地远远越过了1907年的协议线，但他宁可漠然置之以换取和平。实际上，他还甚至同意在条约中插入一句句子，说什么自1907年以来双方都没有改变阵地，而他知道这是不真实的。这个错误后来使他久久萦绕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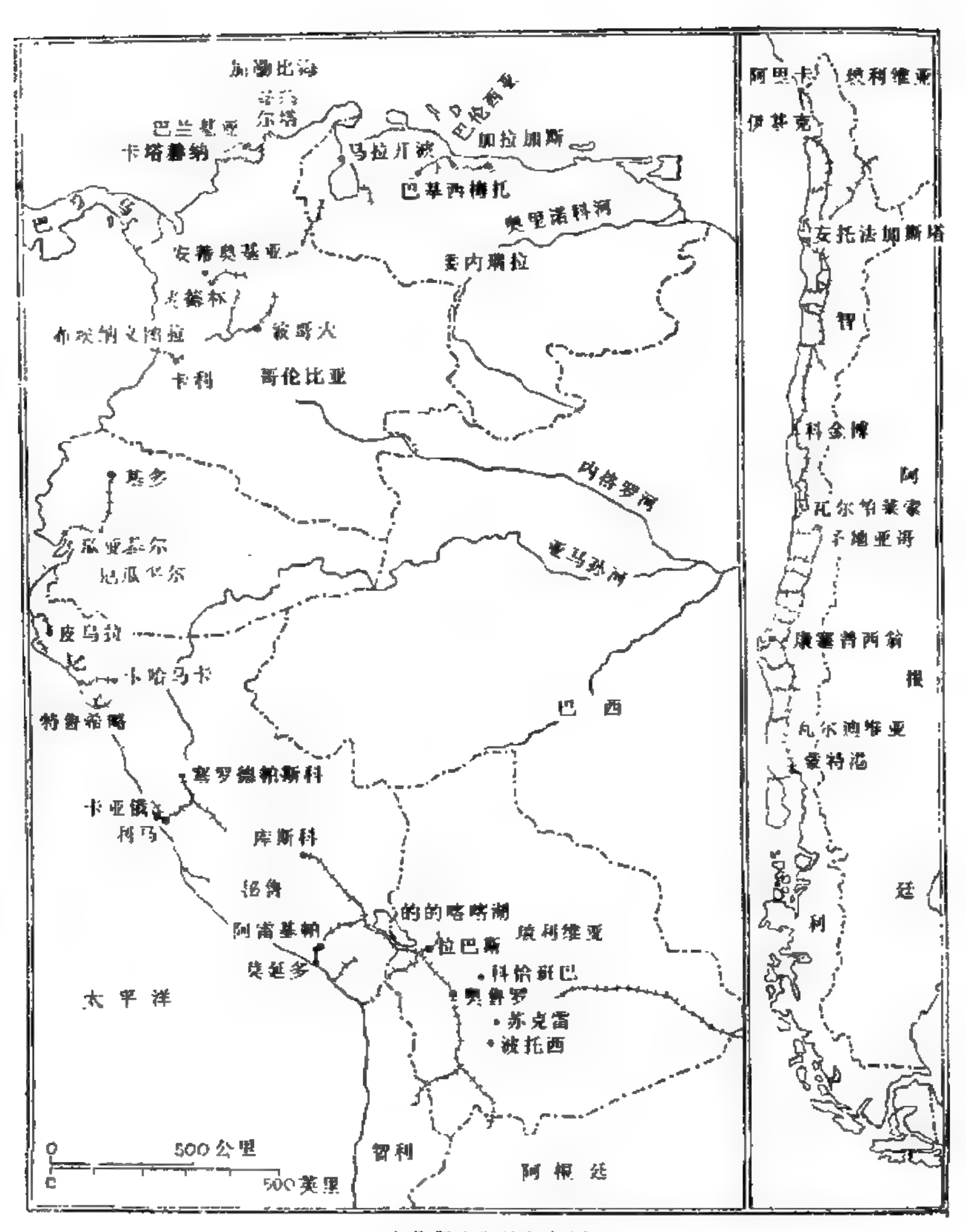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1932年没有任何事物能维护和平了。玻利维亚人

一心想打仗，他们深信拥有压倒地位的军事优势。7月，他们夺取了巴拉圭人在皮蒂安图拉的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堡。任何巴拉圭政府此时对这样一种挑衅如果作出让步都不可能站住脚。后备队再次被动员起来——这次，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他们直奔查科去作战。这次拉美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935年6月，玻利维亚使人惊讶地打了败仗，而巴拉圭则控制了几乎全部争议领土。

496

第 四 编

安第斯山脉地区各国



加勒比海
巴兰基亚
卡塔赫纳
马拉开波
巴伦西亚
加拉加斯
巴基西梅托
奥里诺科河
安蒂奥基亚
委内瑞拉
波哥大
卡利
哥伦比亚
基多
内格罗河
瓜亚基尔
厄瓜多尔
亚马孙河
皮乌拉
卡哈马卡
特鲁希略
巴　西
塞罗德帕斯科
卡亚俄
利马
库斯科
秘鲁
的的喀喀湖
阿雷基帕
拉巴斯
玻利维亚
科恰班巴
奥鲁罗
苏克雷
波托西
太平洋
智利
阿根廷
0
500公里
500英里
阿里卡
玻利维亚
伊基克
安托法加斯塔
智
科金博
阿
瓦尔帕莱索
圣地亚哥
康塞普西翁
根
瓦尔迪维亚
蒙特港
廷
利

安第斯山脉地区各国

第 15 章

499

智利——从太平洋战争到世界大萧条（1880—1930年）

智利在进入19世纪70年代时，共和国已经度过了40年几乎毫无间断的、稳定的宪政时期——这在西班牙语美洲是独一无二的，它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制也经历了演变过程。回顾这个时期，它以农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取得了适度增长而且充满希望。人口自独立以来增加了一倍，即由100万增加到1875年的200万。自1830—1870年，外贸以出口铜为主，发展迅速，为历届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收入用于改善交通状况（如铁路），发展教育，提供城市设施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外事方面，智利不仅维护了独立，而且在19世纪30年代防止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在南美太平洋沿岸共同建立霸权的企图。

智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迭戈·波塔莱斯（1793—1837）创立的宪法制度，这个制度得到彼此情况极其类似的土地贵族们的支持，并且是以1833年的权力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宪法为基础的。那部冷峻的现实主义宪法承认智利的现状而不是它对未来的抱负：它重视波塔莱斯所说的“黑夜的影响”，即三百年殖民控制留下的全部传统——在此期间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特征，它还认识到摆脱西班牙而独立乃是一次根本

性的政治行动，但实际上没有经济或社会意义。。因为智利的社会基本上是农村社会：白人土地贵族统治着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文化的农民（多半是梅斯蒂索人）则逆来顺受。几乎像 500 是独立采邑似的大庄园，仍然如同三百年来一样，构成了新共和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些大庄园里庄园主发号施令，把国家法律视如草芥。

这一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演化出了一种比其邻国要复杂得多的政治制度。一切革命都会引起绝然相反的观点，智利也不例外。政治上，独立时期产生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两派，前者同意脱离西班牙，但迫切希望维持社会现状；后者则从动荡中看到了扩大自由权利的机会——在文化教育方面摆脱教会，在政治方面摆脱专断的政府。19世纪30年代保守派赢得了胜利，但自由主义潮流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头：自1830年到1880年，它通过有限的宪法改革修改了（当然绝不是破坏了）政府的权力主义结构。同时，它开始攻击政府权威的形式和实践，首先是针对行政首脑，即总统，对于立法机构，即国会，在选举方面的干预，从而大体上为国会实行其计划确保稳定多数。在这种制度下，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和集团组成了政党的雏形以便在选举中进行竞争；由于智利避免了过分的考迪略主义和军人对政治发展的干预，所以到1870年就形成了一种显然正在运转的、用欧洲或北美标准衡量也是有生命力的政治和宪法制度，这使智利获得了“南美的英格兰”的赞誉。

智利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进展，农产品（特别是小麦）和矿产品（主要是铜）的出口一年比一年扩大。从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需要改善基础结构，特别是铁路，政府被迫举借外债越来越多，以作为贸易收入的补充，但这方面智利也因管理妥善和为政廉洁，素有偿债及时的良好声誉，这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是十分难得的。1870年时，在这个多少有点混乱的大陆上，智利以政治成熟、财政负责和发展有条不紊作为其突出特点是国际公认的。只有巴西的国际声望可与智利相媲美。

但是，19世纪70年代却是幻想破灭的10年。国际贸易中的世界性大萧条沉重打击了作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智利，而国内各党派之间的政治争吵威胁着它标榜的政府延续性传统。态度温和的阿尼瓦尔·平托总统（1876—1881）谋求同政治反对派和解，而没有利用宪法给予他的广泛权力，但在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普遍的社会苦难下，妥协被认为是软弱。他那届政府忙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晕头转向，不得不在1878年取消货币的金本位，采用了不可兑换的纸币制度，这对智利的自豪感和国际声誉是严厉的打击。对于那些认为1833年的权力主义宪法和总统制正在衰落的人来说，对抗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

当时，有一些外部事件插了进来。自从独立以后，智利与其北方邻国玻利维亚和秘鲁对阿塔卡马沙漠中智利的北部边界线就有争议，但在那片不毛之地的资源（主要是鸟粪石和硝石）在商业上尚无开采价值以及外资和企业界还未着手加以开采之时，这个问题并不尖锐。各国之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调节了彼此的关系；可是，1878年玻利维亚单方面废除了一项与智利缔结的关于外国在玻属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利益的条约一事触发了一场外交危机。玻利维亚的盟国秘鲁（两国订有攻守同盟密约）竭力设法避免冲突；智利明知有这项条约却试图向这两个邻国都施加压力，并在玻利维亚当局拒绝退让时，向两国宣战。接着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当时智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然而，事实表明，尽管它缺乏准备、经济虚弱和政治不稳定，更不用说军队的可悲状态，但在与敌国较量时却好似一切都经过了周密策划，而它强烈的民族主义感——这是玻利维亚和秘鲁所没有的——变成了决定性资产。战争起初胜负未卜，之后智利陆海军像在19世纪30年代一样彻底击败了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军队，于是智利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战后的1883年，而在1879年它还是一个濒临政治瓦解和经济崩溃的国家。智利顶住了美洲各国要它仁慈地对待战败国的强大压力，通过和约把国家领土扩大了

501

至少1/3，并获得了阿塔卡马（秘鲁的塔拉帕卡和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盛产硝石地区的矿产财富，这笔财富在后来40年约占政府平常收入的一半。

根据1883年10月智利同由智利军队扶植起来的秘鲁政府所缔结的安孔条约，秘鲁无条件地和永远地将它的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它还同意智利占有它的塔克纳和阿里卡两省，为期10年，之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它们最后归属，得主将向失主支付1000万智利银比索。其他条款涉及秘鲁的债权人，他们倒霉的投资已部分地用塔拉帕卡的矿藏作了抵押。智利与玻利维亚单独签订的停战协定——最后的和约20年后才签订——将玻利维亚唯一的沿海领土安托法加斯塔割让给智利，这块领土上的硝石藏量之多仅次于塔拉帕卡。

这次战争本身还大大推动了智利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工业化，并由于需要从智利中部为沙漠中的军队以及后来占领秘鲁的驻军提供必需品，所以也大大推动了农业和运输业。这种使智利经济脱离1879年的呆滞状态的刺激由于新兴硝石业的突飞猛进而得以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维持。智利的未来看来有了保障，也许它在战争中取胜的最有意义的影响是加强了它已经很高的声誉，给它的领导人灌注了一种民族自信心，而短短几年以前他们几乎全都感到悲观。19世纪最能体现这种民族愿望和爱国自豪感的两位智利政治家莫过于19世纪80年代任职的两位总统：多明戈·圣马里亚(1881—1886)和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1886—1891)。他们都深深信仰自由主义；两人同样崇尚权力，而取得总统职位后又加强了这种习性。实际上在他们执政期间出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智利取得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质进步，与此同时，独立后由迭戈·波塔莱斯创建的制度在政治和宪法上却终于崩溃。

圣马里亚总统时期
（1881—1886年）

1881年9月18日，多明戈·圣马里亚就任智利总统，当时战争局势已经决定性地变得有利于智利。如同他的大多数前任一样，他是由上一届总统挑选的，并且也像他们一样，经政府大规模地干预投票而当选。尽管发生了战争，人们的政治激情仍很高，这也难免，因为国会反对派，特别是教会的保守党，非常清楚它没有能力保证自由选举不受干扰。在这以前的几个月，正如英国驻智公使所说，议会内发生了“许多粗暴的不体面的场面”。[①]不过，圣马里亚清除了障碍。但他当选的那种方式和他将实行的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势必使政治生活更充满仇恨。

503

新政府继承了一种有些微妙的宗教局面。曾经担任圣地亚哥大主教约30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拉斐尔·巴伦廷·巴尔迪维索于1878年去世，这就再次向梵蒂冈提出了令人头痛的神职人选推荐权问题，政府声称它作为独立后西班牙君主的继承者有权推荐高级神职人员。长期被自由党人视为眼中钉的巴尔迪维索去世后，平托总统政府曾提名一位性情较温和的人选——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塔福罗——继任，但罗马教廷拒绝接受这项任命。圣马里亚于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他邀请一位教皇的代表塞莱斯蒂诺·德尔·弗拉特访问圣地亚哥。但这件事彻底失败了：德尔·弗拉特建议教皇拒绝塔福罗的提名，于是圣马利亚就把他打发走了。神职人选推荐权问题依然未获解决，但德尔·弗拉特来访一事为圣马里亚提供了一个同教会直接对抗的口实，他通过立法打击教会在人生三大重要关头——出生、结婚和死亡——所仍然享有的许多特权。

---

① 巴肯汉姆致格兰维尔子爵的信，1881年7月6日于圣地亚哥。外交类，第38号。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档案，智利部分（FO16），第213卷。

圣马利亚果断地干预了1882年的国会选举以确保多数议员赞成反教权的立法，接着他在1883年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他的纲领：取消教会登记出生和死亡的管理权，将此项权力移交国家；实行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保证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信仰的死者在当时由天主教控制仅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公墓安葬。内政部长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他上过神学院，最初曾准备当教士）负起了将这些有争议的措施逐步引向立法的艰难任务。政府虽然能在国会内依靠它的多数票，但它在国会外必须面对教会势力，而这股势力仍很强大。1880年《泰晤士报》记者写道："无疑，戴僧帽的或削了发的人仍然在这个国家'主宰一切'；由于他们控制了妇女，所以他们完全可以藐视无神论者的嘲笑和民法的条例。"②

504

这是一种带有预见性的评论。这些自由主义法律确实在国会获得通过，尽管天主教会激烈反对；然而，在国会外面，反应十分强烈：例如，圣地亚哥教区教士们不仅谴责有关墓地的法律，并且拒绝执行，而政府为了报复，关闭了天主教的墓地并禁止在教堂内举行葬礼，后者是一种由来已久但显然不卫生的习俗。结果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场面，例如不顾政府命令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秘密举行葬礼；士兵们荷枪实弹在公墓设纠察线；得了致命的疾病不敢声张，待病人死后又将其尸体装在各式各样的棺木中并使用各种运输工具偷运出屋子。③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尽管天主教进行了猛烈的抗拒，立法一旦载入法令全书，它便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圣马里亚政府有关宗教的法律标志了教会权力和影响的决定性衰落，也标志19世纪智利自由主义达到了顶峰，它们引起了保守党对巴尔马塞达的深恶痛绝。但是不仅如此，还产生了一种只有经过长时间才能暴露

② 1880年8月27日《泰晤士报》。

③ 阿夫东·西富恩特斯：《回忆录》（2卷，1936年圣地亚哥）第1卷，第182—185页。

的不合现象：随着法律的通过、原来把具有广泛自由主义信念的许多各不相同的人士和集团团结起来的反教权主义粘合剂开始破碎，而他们之间并无其他思想意识的纽带。激进党和国民党并没有从圣马里亚对竞选的干预中得益，但它们准备在国会中支持他的反教权的政策，因为它们同他一样热烈主张必须削弱教会的权力。但是在这个目的达到后，它们对干预竞选这种行为的本能的反对态度就表面化了。至于总统，由于有了新的来自硝石的收入，他现在有较好的机会来实施他雄心勃勃的规划，不过他这样做要遇到更多的政治困难，而在智利这样一个其精英分子们具有如此政治觉悟的国家里，总统想仅凭借他的恩宠已不足以集合一批亲信追随者了。圣马里亚的前任是阿尼瓦尔·平托，人们普遍认为平托并没有接受波塔莱斯的传统。但圣马里亚和巴尔马塞达都是有异常坚强意志的人，他们完全有决心根据成文宪法维护总统特权，而且两人都认为总统之职乃是整个机器的动力发动机。从平托到圣马里亚的风格的改变在巴尔马塞达于1886年上台后得到了加强，这种变化在反对党看来不仅是人员的变化，而且也是权力的变化，因为在平托曾经让步的地方，圣马里亚和巴尔马塞达却要为之战斗。于是，反对党开始把颇有根据的限制总统权力的理论混淆为仅仅去反对掌握总统权力的强人们行使这种权力。此外，在这个已经很复杂的宪法与政治方程式中又加进了前所未有的、不知其数的硝石财富，以及政府将怎样花费的棘手问题。

505

太平洋战争后的硝石业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智利取得了北部的硝石地区，政府便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如何重新确定硝石业的所有权和为了智利的利益开发这一无与伦比的自然资源。这是一个复杂问题，首先因为席卷硝石地区的战争浪潮使这项在19世纪70年代末便处在不稳定状态的行业陷入了混乱。那种不稳定状态的产生是由于

1875年秘鲁政府试图建立某种国家控制（但没有成功），根据此项措施，迄至当时掌握在国民和外国人私人手里的硝石矿区和精炼厂被收归政府所有，秘鲁政府则发放带利息的证券作为补偿，证券持有人在政府筹得足够资金后最终可将证券兑现。这些证券实际上就是1879年发给当时还是私人占有的硝石矿区和工厂（不包括当时尚未卖给外国人的未开采地区）的地契，它们很容易被转让给第三方。但是秘鲁的国际信誉早已丧尽，所以得不到任何贷款来偿付这些证券。结果，它们的票面价值开始波动，而当战争来临并且智利胜利在望时，证券的价值一落千丈。有关各方都很明白，智利将迫使秘鲁和玻利维亚在领土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但谁也不知道智利政府对一般的硝石公司、特别是对于外国公司将采取什么方针。不仅如此，许多对秘鲁不满的外国债权人早就宣称给秘鲁政府的贷款是以它出产硝石的塔拉帕卡省作为抵押的，而且他们为了加强这种说法已经寻求他们政府给予外交支持。那么如果智利获得了秘鲁的领土，智利是否也将承担他们宣称的以该省为担保的债务呢？如果不承担，被这种无法估量的事情所纠缠的硝石业的前途将是什么代价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证券持有人感到惊慌，他们以低得荒唐的价格把他们持有的证券抛售给比较胆大的准备在不稳定状况下冒风险的投机商。其中杰出的一位是英国工程师约翰·托马斯·诺思，他在秘鲁的塔拉帕卡早已经营了多种企业，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

506

智利政府早在1880年就已开始辩论这个问题，当时它设立了一个协商咨询委员会，1881年又设立了一个。它们的报告避开了国家干预硝石业的秘鲁模式，建议将这一行业归还给私人，同时确保智利政府的最大利益——对外运的硝石征收出口税。鉴于秘鲁政府所发的硝石业执照是私人所有权的唯一法律证件，所以那些持有执照的人事实上被承认是硝石财产的合法债权人；因而正是那位“硝石大王”约翰·托马斯·诺思和其他非智利人以较少的费用获得了这一行业的一大部分，他们不仅因这些财产的实际

价值高昂赚取了巨额利润，而且还由于他们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将这些财产出售给他们创办的合股公司而大获其利。

这样，英国公司1875年时在硝石业中还只据次要地位，到1890年便控制了70%（按价值计算）。从此英国的接管便成了有争议的题目，主要因为人们认为当时的智利政府失去了一次为国家取得这一行业的绝好机会，从而让其后40年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听任外国控制。实际上有些历史学家比这种观点走得更远得多，他们断言智利决策者和更有效率和更贪婪的外国人（他们拥有更多资金储备和更高的技术）之间互相勾结，智利决策者把智利的硝石利益拱手让给了这些外国人。④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大大改变了这种观点。现在很清楚，当时的智利领导人无疑是相信自由企业哲学的，与此同时，对智利国家利益的其他考虑在他们决策时起了主要作用。首先，由于将硝石业还给了私人，智利政府就有效地分裂了外国利益集团，使有关各国政府无法进行干预，否则就似乎在偏袒一部分国民而冷淡另一部分国民。这样，硝石企业家们兴高彩烈，而秘鲁证券的持有人则感到丧气，他们在20年后才获得满意的结果。第二，由于把生产、运输和硝售的责任还给了私人公司，同时对出口硝石征税，智利政府就获得了一个直接的重大的收入来源而无需亲自卷入这些事务。最后，关于战前智利在秘鲁的塔拉帕卡的重大利益，现已清楚，它在19世纪70年代便已遭到秘鲁政策的全面损害，智利公司在1875年拥有的股权可能比英国公司多，但正是在1875—1879年之间而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已大大减少。

对智利政府来说，硝石收入是致富之源，19世纪80年代硝石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它提供了一笔收入，使它既能够实行雄心

---

④ 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巴尔马塞达和1891年的反革命》第2版，1969年，圣地亚哥。

勃勃的公共支出计划，又无需对国内税收制度实行现代化，否则政府同支配智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发生对抗。就实际情况来看，1880年硝石及其副产品碘的出口税在政府经常收入中占5.52%，1885年上升到33.77%，1890年又上升到52.06%。㊀但是这种横财带来的不全是幸福。国际硝石市场极不稳定，因为这种产品主要用途是作肥料，因而其销售要决定于变化莫测的气候和农业，它们常常产生突然的影响，而且难以预料。硝石一旦生产过剩，使世界市场达到饱和，那么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都意味着价格要下跌。结果，他们指望恢复供求平衡，通常的办法是生产者联合起来按定额制限制产量，直到实现供求平衡；不仅如此，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大多数生产者和销售商是外国人，他们对智利的国家需要不如对他们的持股人和他们自己的财产那么敏感。对于越来越依靠硝石收入作为其主要预算来源的智利政府来说，市场的不可预测性等于收入和计划的不稳定，而生产者的联合肯定会一下子就使其收入减少。19世纪80年代，这一行业似乎越来越落到少数而目不清的人手里，这也使人感到担心。例如，诺思和他的合伙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以11万英镑购买了潘帕拉古纳斯精炼厂的证券，并又提供14万英镑购置设备，后来他们用总额212.2万英镑的资本创立了两家伦敦公司以开发这项财产。19世纪80年代诺思在塔拉帕卡的企业（还有他的野心）的大发展不仅赢得了常常误入歧途的伦敦投资者的称羡，而且也引起了智利本地人的忧虑，尤其是那些在政策方面有赖于可靠和稳定的硝石收入的人们的忧虑。这种局面所包含的冲突在巴尔马塞达担任总统期间达到了顶点，当时正值长期酝酿的智利内部的政治和宪法争端趋于表面化，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十分严重的国家危机。

508

㊀ R.埃尔南德斯·科尔内霍：《硝石》（1930年瓦尔帕莱索出版）第177页。

巴尔马塞达总统时期
1886—1891年

尽管没有几个智利总统能在就职时遇到比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更幸运的处境，他上台时的政治气氛却是激烈和充满矛盾的。对刚卸任的总统圣马里亚来说，他是天然的继任者，政府机器的全部力量支持他作为执政的自由党候选人竞选，这不仅使保守的教会反对派厌恶（他们听到巴尔马塞达的名字就讨厌），而且也使一般自由派中的有些集团感到懊恼，他们如今对政府干预选举的做法也很反感。这些集团虽然承认巴尔马塞达作为一名公仆的杰出记录（1870年以来的国会议员，在至关重要的1879年任驻阿根廷公使，1881年任外交部长，1882—1885年任内政部长），并且称赞他的口才和游说的本领，但是他们与温和的保守派及一小群激进党反对派一起支持前部长何塞·F·贝尔加拉。这些由著名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教育家米格尔·路易斯·阿穆纳特吉领导的自由主义派（Sueltos）或称“自由作家”派显现了最早的迹象，它说明从前团结一致的自由党即执政党现已失去凝聚力。但是干预选举的车轮势不可挡地向前滚动；贝尔加拉在最后计票前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身分，巴尔马塞达在1886年9月18日就职。 509

自从巴尔马塞达进入政府的5年来，智利已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北部边界因太平洋战争而向前推进了600英里，而且将比奥比奥河以南仍然独立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以及甚至更遥远的麦哲伦地区置于更有效的中央控制下的过程也开始加强了势头。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30年中，武力和殖民一直是历届智利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两大武器，是其运动是断断续续、犹豫不前的，因为在比奥比奥河与更南的托尔滕河之间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居住着有强烈独立性的马普切印第安人，他们发动的零零星星的起义和较经常的劫掠妨碍了移民的进展。马普切人最后一次大起义发生在

1880—1882年，它主要是被从北部打胜沙漠战役后调回的智利部队镇压下去的，这次镇压犹如在印第安人独立的棺木上打下最后一颗钉子；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印第安人一直顽强保持着这种独立。1881和1883年在地处印第安人地区心脏的特木科和比利亚里卡先后建立了一些堡垒，这是上述事实的具体表现；1882年在欧洲设立了一个殖民总办事处，目的是招募移民去智利南部，这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恢复了过去的殖民政策，这项政策在30年前即已提出但一直未曾有效实行。1883年，第一批德国殖民者到达塔尔卡瓦诺，随后数年欧洲移民又纷纷涌向智利，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超过1000人。

同样，在麦哲伦省和火地岛，1875—1885年这10年是频繁进行地理探险的时期，接着便从事经济开发，特别是繁殖绵羊。1876年，当地总督迭戈·杜夫莱·阿尔梅达访问了福克兰群岛并带回了绵羊（但他未能说服岛民跟着羊群一起来），从而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活动奠定了基础，之后，麦哲伦省和火地岛便不再仅仅是智利共和国遥远的附属地，主要因其战略意义才加以维护，而成了有显著特点和重要经济地位的地区。欧洲移民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人数很少——1885年南智利总人口不过2000多人——但质量比单纯数量重要，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繁殖绵羊的农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510

至于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利品——硝石地区，巴尔马塞达成为总统时正巧是硝石业进入其蓬勃扩展的阶段。1884—1886年间，由于世界市场达到了饱和，生产者为限制产量建立了第一个生产者联合会，但它垮台了；世界需求的上升再度使塔拉帕卡的精炼厂十分活跃。与此同时，约翰·托马斯·诺思和他的合伙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创办了许多新公司。塔拉帕卡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安托法加斯塔开始走向繁荣：象伊基克和皮萨瓜这类港口不仅在硝石出口方面，而且在食品、机器设备的进口方面也实现了增长，后者是为了维特阿塔卡马沙漠中高度人为的矿区，那里几

乎每种商品都要依赖外部世界。战后为时不长的硝石繁荣已经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吸引来了大量的移民人口——来自智利中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劳工，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程师和机械师，还有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阿托法加斯塔的人口由1875年的5384人增加到10年后的21,213人；同期，塔拉帕卡的总人口由38,255人增加到45,086人，而塔拉帕卡的主要硝石港口伊基克的人口则由9,200增至近16,000人。

19世纪80年代智利各地区显示的经济变化是国家增长和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其主要动力是相互关联的因素即人口增长和日益发展的城市化。从1875到1885年，智利总人口从2,075,971人增至2,497,797人，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人口结构。1875年，农村人口几乎比城市人口多一倍：1,350,426人比725,545人；而到1885年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激剧变化：农村人口缓慢增长到1,456,032人，而城市人口增长了1/4，达1,041,765人。⑯城市人口增长最显著地超过农村人口增长的地方正是在硝石产区，那里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一些进出口港口，还有分散在安托法加斯和塔拉帕卡各地的硝石精炼厂，以及早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那些省份——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等。在圣地亚哥省，1875—1885年城市人口由约18.6万增加到22.8万，而农村人口由18万锐减为10.2万。 511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他们并不象例如因基利诺佃农那样附着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乃是智利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一个富有特色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形状造

---

⑯ 拉丁美洲的人口数字极不可靠。但智利的人口数字比大多数国家较为可靠，因为智利自1843年起设立了一个合格的、虽然不是十分完善的国家统计局，还因为有马科斯·J·马马拉基斯的著作《智利历史统计》（4卷，耶鲁大学，油印本），该书后来分4卷出版（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8—1983）。这里所引数字见油印本第2卷，表2A1f1。

成的：季节工随着农业季节和作物生产周期南来北往。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北部采矿业的发展，阿劳科、科罗内尔和莱布周围煤的开采，铁路的建筑，大城镇及其食品饮料加工厂、鞣革厂、家具店、纺织和其他基本消费工业的发展，智利人口越来越多地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就业。在太平洋战争进行的那几年，由于工业化的扩大，这一趋势有所加强。早在战前，许多人便主张智利应当更进一步工业化，而不应当完全依赖农矿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不过19世纪70年代试图将制造商组织成压力集团的努力收效甚微。但在1883年，即太平洋战争刺激起来的工业化高潮发生以后，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工厂发展协会（SFF）宣告成立。一位研究智利工业化的历史学家将工厂发展协会称之为"部分的压力集团，是工业内部冲突、技术服务机构和社交俱乐部的调节者"，它是"将智利工业部门组成为有凝聚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强大得足以在公众舆论面前有效地保持工业界的目标，并负责同政府直接联系"。⑦没有什么可以比工厂发展协会更能代表智利经济的变化过程了，这种变化虽然起初很缓慢和难以觉察，但终于加强了势头，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引起了社会的多样化和新政治力量的出现。但是，虽然巴尔马塞达所继承的智利确实是一个转变中的智利，但不久将从根本上动摇旧宪法秩序的危机却并非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之外，而是来自其内部。

512

巴尔马塞达就职后打算使各个自由主义集团取得和解，同时安抚保守派。他最初的行动之一是恢复同罗马教廷的关系，任命一位双方一致同意的候选人——马里亚诺·卡萨诺瓦——为圣地亚哥大主教，他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又是总统的私人朋友。正是卡萨诺瓦率先在1888年建立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所私人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由自由党和国民党的代表组成的巴尔马塞达首

---

⑦ 亨利·克尔奇，《一个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企业精神和现代化在智利的冲突》（盖恩斯维尔，1977），第42页。

届内阁是一个和解的内阁，巴尔马塞达很快表明了他的目标是避免过去那样激烈的政治斗争：1886年底举行的圣地亚哥市政选举完全不受政府干预，而政府所提候选人的失败则被政府采取中立态度所赢得的善意所弥补了。

为了缓和政治局面而伸出的这些橄榄枝目的意在促使人们广泛支持巴尔马塞达的国内基本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圣马里亚规划的继续，不过由于有了来自硝石捐税的巨额收入，现在可以大大扩展了。政府将拨给大量公共支出用于铁路、码头等重大建设项目，用于社会投资，特别是教育、开拓殖民地和市政建筑。此外还拨款以加强智利军事上的攻防能力，例如建筑港口要塞，购买新的舰艇，建立足够的兵营和军事学校等。这些建议出自一位曾经长期处于外交政策的指挥中心、现在又作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而负责国家安全的智利政治家，是完全可理解的。

巴尔马塞达的规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并得到有力的执行。1887年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和公共工程部，它在一年内获得了1/5以上的国家预算，同时教育部得到1/7。到1890年，在预算的估计支出67,069,808美元中，拨给公共工程部的超过2100万美元，拨给教育部的约662.8万美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政府意图变成了行动：1886年学校入学人数约7.9万，1890年增加到15万；铁路建设不断向前推进，还在智利南部最宽阔的比奥-比奥河上架设了铁路桥，支援了铁路建设；塔尔卡瓦诺的巨大干船坞竣了工，同时沿着圣地亚哥的马波乔河修筑了一条运河。外国移民得到政府的鼓励和帮助：在1886至1890年间，约有2.4万欧洲人到智利定居，他们不仅到多森林的边境当农民，而且也在日益发展的城市做有技术的工匠。新的医院、监狱、政府机关和市政大厅纷纷建立起来。 513

但是，这种规划牵涉到许多问题。首先，它是以政府不断从硝石出口中获得高收入为依据的，而由于世界市场不稳，这些高收入并无保证。其次，它使政府手中握有十分强大的赞助手段，

通过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和批准承包合同及其所需的劳动力而体现出来。第三，它在使有些人满意的同时，也使许多人感到失望，他们的愿望，不论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都是由规划本身刺激起来的。一个社区内的一座新市政会堂或一所学校可能是这个社区公民们引为骄傲的事物，但却会引起不那么幸运的邻居们的嫉妒。围绕关键的政治和政府问题还存在着更广泛的争端，即：如何分配资源。自从智利在1878年危机时采用纸币以后，越来越多的舆论把恢复金属货币本位当作国家重要的经济目标。尽管这在政界人士中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其中不少人如富有的地主曾经从不可兑换的纸币制度下大获其利。但是，硬币支持者们越来越为流通中的纸币数量担忧，为在松弛的银行法下无节制的（货币）发行权、为波动的汇率和巨额公共支出而担忧，对他们来说，新的硝石财富真正是一次收回纸币、恢复他们视为财政尊严的绝好机会，而推迟改革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但对巴尔马塞达来说，他的规划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同他认为的国家利益看作是一码事，反对他的规划的任何部分，即使不被看成是不爱国也会被视为出于派别利益的、自私的行为。

巴尔马塞达上台后国家政治的蜜月期延续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到1888年，组成政府的各自由主义集团已经在相互争夺职位。3月，原来的和解政策垮台了。巴尔马塞达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执政的自由党人——的压力下，同意了对国会选举进行干预，结果他们当然取得了胜利，而且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占据了全部部长职位。人数不多而能力很强并且控制着大部分智利报刊的国民党特别感到愤怒：自此以后，他们对一位强有力的总统的效忠——这是该党从曼努埃尔·蒙特时期（1851至1861年的总统）以来的特点——就再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越来越迷恋他自己的规划的巴尔马塞达来说，分配利益的问题随着收入的增长也相应增加。公共工程规划提高了专家治国论者和行政长官的价值，但在这方面有天赋的人不一定能在传

514

统的寡头集团中找到。因此就产生了一些“新人物”，例如工业和公共工程部长何塞·米格尔·巴尔德斯·卡雷拉，或铁路总管埃莫赫内斯·佩雷斯·德·阿尔塞，他们都是十足的专家治国论者，都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们的领袖交办的工作坚信不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确信巴尔马塞达沉溺于自我中心的反对派，不难认识到共和国总统正在培养一批亲信，他们将盲目地追随他的每一个念头。

反对派对巴尔马塞达的怀疑在1889年加深了，当时关于谁将在1891年继任总统职位的猜测已经甚嚣尘上。人们普遍预测巴尔马塞达的一位密友恩里克·萨尔瓦多·圣富恩特斯，一个富有的大庄园主但政治上并不知名，将成为他的候选人；因为后者在1888年得宠迅速幸进：4月任财政部长，10月任公共工程部长。1889年3月，圣富恩特斯作为巴尔马塞达内阁的主要阁员（因为他负责总统规划的核心部分）陪同巴尔马塞达前往硝石产区，这是一位智利国家元首首次到最近并人共和国的地区访问。巴尔马塞达的广为宣传的北方诸省之行具有多种目的。对于一位在圣地亚哥受着政治折磨的总统来说，这次到硝石产区的访问除了具有宣传价值和寻求地方支持外，还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因。到1889年，约翰·托马斯·诺思在塔拉帕卡的活动迅速扩大；除了他的硝石公司外，他新建的塔拉帕卡和伦敦银行、他通过塔拉帕卡自来水公司对伊基克供水的控制、他的硝石食品供应公司以及尤其是他的硝石铁路公司（它拥有把最重要的精炼厂同各港口联结起来的铁路线）等等，都预示一种垄断的企图，而这在许多人看来乃是对省内其他一切利益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政府利益的威胁，因为政府现在的收入极不可靠地依赖于硝石的捐税。

515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抗已经发生。1886年，圣马里亚政府曾以没有完成合同为由，取消了硝石铁路公司的特权，于是巴尔马塞达继承了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因为公司向政府提出挑战，以废除其特权违反宪法为由，诉诸法院。而且，它的律师中包括了不

少反对巴尔马塞达的著名智利政界人士，特别是诺思在智利的首席律师胡利奥·塞赫尔斯，此人过去一直是巴尔马塞达的自由派同志，但在1889年却成了一个自由派团体——大会主义派——的领袖，他们的首要宗旨是在选择未来的总统时消除个人效忠主义，而由所有自由派团体召开大会推选出大家同意的候选人。可是，塞赫尔斯作为诺思的律师加上他的政治立场使得巴尔马塞达和他的助手们把他看作是违反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叛徒。

巴尔马塞达在访问北方时所作的演说迎合了当地的自豪感和期望，但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关于硝石工业的重要声明，特别是在塔拉帕卡首府伊基克。他在这里提到了由外国人垄断这一行业的危险性，建议他的政府应更密切地注意鼓励智利人更多地参与这一行业的可能性，并且总的来说使不少评论家相信，他对外国势力将采取一种更民族主义的方针。不过他也离开他的正题而向现有的外国势力保证，智利需要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实际上这篇演说的意思可以因人而异，鉴于一个新的硝石团体可能正在酝酿之中，在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生产者中引起一些踌躇不失为一种精明手段；当时最主要的外国生产者约翰·托马斯·诺思本人正在智利访问。巴尔马塞达回到南方后，两人会见了三次，但没有从中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智利政府继续攻击诺思对塔拉帕卡铁路的垄断，同时巧妙地利用了同样反对这种垄断的其他英国势力，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做什么来削弱在硝石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利益。

可能有一些政治急务（1889和1890年变得紧张起来）促使巴516 尔马塞达暂时将他也许已制订的某种计划束之高阁；但从现有的证据看来，更有可能的是这类计划的规模有限而意图模糊，所以巴尔马塞达死后获得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名望是被大大夸张了。他在硝石方面首先关心的并非外国的支配地位，但同他认为由诺思所代表的一种危险即垄断性控制却有很大关系。其他外国（特别是英国）生产者也有这种担心。与此同时，由于硝石的价格因世

界市场库存过多而不断下跌，所有的生产者，不论是外国人还是智利人在1890年都别无选择，只得联合起来组成共同阵线，限制产量，恢复供求平衡，从而恢复利润。这方面，巴尔马塞达在硝石工业中没有盟友，也没有力量影响事态。

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宪法危机。1889年3月巴尔马塞达从北方回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内阁危机，这是由于圣富恩特斯为了驳斥有人说巴尔马塞达已选择他在1891年任总统的传闻而提出辞职，而从自由派团体中挑选继任者的事又迟迟未决。在不到两个月内，参院的一次反对票使内阁倒了台，巴尔马塞达只得重新组阁。这次他向国民党试探，但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巴尔马塞达的对策是建立了一个由厌恶国民党人著称的人组成的内阁，而国民党则成了明确的反对党。这样，巴尔马塞达在参院便失去了自动的多数，在众院的多数也减少到只多10票。10月份爆发的又一次危机使事态变得更糟了：巴尔马塞达表面上同意对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不施加影响，以换取反对党在国会的支持，并任命了一个“中立”内阁，但不满一个月，那个内阁也提出了辞职，因为它说它无法信任总统。

1889年各党派在争夺内阁职务时，一些重大的宪法问题已经具体化，反对党越来越多地表明它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在巴尔马塞达上台时，反对党阐明的唯一重要目标是选举自由，而到1890年其目标已扩大，包括各政党独立于总统以及行政首脑应从属于立法。后一种要求的最佳表现形式是那种真正的议会制政府，在这种宪法制度下任何内阁没有国会或议会的多数支持便无法存在。在智利，根据1833年宪法（尽管后来修改后减少了行政首脑的权力），各部部长只对总统负责，他有权亲自任免他们。 517

宪法在这个问题上是明白无误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位总统，不管有多大使人信服的本领或者处在何等优越的地位，都不能不顾一个事实，即同一部宪法授予了国会以接受或拒绝重要立法的权利，特别是批准预算和武装部队规模的权利。这些立法权是国会

对付持不合作态度的总统的主要法宝，不过它们已因总统干预选举和随后建立了柔顺的立法机构而（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受到了削弱。但现在由于巴尔马塞达的性格和政策逐步疏远了从前的支持者，总统的那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除非总统准备与国会的意见对抗，坚持部长们必须对他而且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并且表明他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或制服他所称的闹派性的反对派而使国会坚持其权利的态度软化。

巴尔马塞达似乎是准备这么干的。他在第二届内阁中任命何塞·米格尔·巴尔德斯·卡雷拉为工业和公共工程部长，此人是圣富恩特斯主张的最出名的倡导者，据说还是1891年选举的“官方的”总统候选人。正是这一做法促使胡利奥·塞赫尔斯和“大会主义派”撤回了对政府的支持，从而最终使巴尔马塞达失去了在国会的多数。于是，巴尔马塞达宣布国会闭会，挑选了包括巴尔德斯·卡雷拉在内的新内阁；1890年的上半年，反对党通过他们控制的报刊和在公共集会上攻击巴尔马塞达，而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包括创办了两家新报纸以阐明它的立场。与从前的做法不同，这个时期巴尔马塞达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因此那里的战斗直到根据宪法在6月1日召开例行会议时才恢复。国会开幕时，巴尔马塞达发表了庄严的演说，建议进行宪法改革，但反对党对新内阁的不信任动议在两院都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接着，6月12日胡利奥·塞赫尔斯在众院提议在总统任命一个获得国会信任的内阁以前，推迟关于授权征税法律的一切讨论，这项动议也得到了多数人支持。由于巴尔马塞达坚持他享有特权，而国会对自身的权利也寸步不让，所以出现了僵局，除了双方互相指责外，事情毫无进展。一位外国观察家认为总统“正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总统阁下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部队的支持来对付国会，也是令人怀疑的”。⑧不过，不久这些部队就用在别的地

518

⑧ 英国公使肯尼迪致索尔兹伯里函，1890年6月21日于圣地亚哥，外交部外交字第47号16/259。

方了。

由于政府的核心显然处于瘫痪状态，智利的边缘地区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事件。7月初，塔拉帕卡省伊基克的码头搬运工举行罢工，提出的要求中包括用国家货币而不用“菲查”（fichas）支付工资，后者是雇工的公司发放的一种工资代价券，只能在公司的内部商店中通用。接着，骡车车夫、临时工，以及硝石工人本身参加了罢工，仓库和商店开始遭到洗劫。尽管受到困扰的雇主们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制止骚乱，但巴尔马塞达除了敦促雇主们同罢工工人谈判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雇主们甚至拒绝讨论条件的死硬态度使有些矿工转而进行破坏活动，不少精炼厂的机器被拆毁，约翰·托马斯·诺思的著名合作者们在桑多纳托的精炼厂遭全部毁坏。在此关头政府进行了干预：往北部派部队同罢工工人进行血战，大规模镇压他们的工会。但罢工浪潮已席卷生产硝石的所有省份，所以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秩序才得以最终恢复。巴尔马塞达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他最初的无所作为激怒了财主，震惊了寡头集团，而他最后派军队的决定又彻底背离了矿工，他们在不到一年后参加了同他作战的军队。1890年的罢工是智利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冲突，也是一种不祥之兆。它们起源于硝石产区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起源于在智利政治制度中无人代表的劳工所遭受的剥削。不错，19世纪80年代末期圣地亚哥出现了新的但尚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成立了作为激进党派生物的民族党，它由象马拉基亚斯·孔查这类主张应更多地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家们所组成。但是激进工人阶级的真正发源地是在北方，在生产硝石的沙漠地区，劳工冲突在那里表现最尖锐，那里应运而生的先驱组织者们造就了真正的政治运动来代表工人阶级要求。 519

1890年年中的劳工骚动虽然起源于当地条件，但这些动乱与智利全国总的政治局势和由于宪法危机不得解决而不断增加的紧

张状态也不是没有关系的。1890年的整个冬天，总统和国会都不愿作出让步：巴尔马塞达拒绝改组内阁以满足国会的愿望，国会则继续拒绝讨论总统的法案，同时却通过了自己提出的一些法案。报纸上出现了对双方的人身攻击；7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有约8000人参加的一次公共集会要求总统让步，但巴尔马塞达回答说他将斗争到底。7月24日，塞赫尔斯在国会呼吁弹劾政府，和宣布巴尔马塞达不宜继续当政，结果巴尔马塞达根据他严格的宪法权利，宣布国会闭会。在政府和反对党之间进行的调解工作未获结果；此后到年底，形势更加恶化。国会不仅拒绝通过基本立法，特别是1891年预算和有关武装部队规模的法律，而且把时间花在讨论和谴责它认为的巴尔马塞达政府的罪行和蠢事上面。而此时确信妥协已不可能的巴尔马塞达则开始在军队中清洗对其忠诚值得怀疑的分子。1891年1月1日是个关键日子，这天是宪法规定要通过有关预算和武装部队法案的最后限期。如果这些法案到那天还没通过，巴尔马塞达将不得不采取不合乎宪法的行动，或者同意国会建立一个它信任的政府的要求。现在国会大多数议员几乎不怀疑巴尔马塞达将进行斗争，于是在12月底建立了一个抵抗他的委员会，同时寻求陆海军内高级军官的支持。结果，陆军崇拜的偶象人物曼努埃尔·巴克达诺将军拒绝给予支持，而海军首脑豪尔赫·蒙特则同意支持国会。1891年1月1日，当巴尔马塞达发表一项辩解性的宣言宣称基本法律仍然有效时，他终于促使国会起而反抗。一星期后，几乎整个智利舰队不顾巴尔马塞达的命令，载着大批国会议员，离开瓦尔帕莱索驶往智利北方，520 发动了一场延续八个月的内战，这场内战夺去了1万多人的生命，并在其过程中摧毁了波塔莱斯式的权力主义总统制政府制度。

战争本身进行得很奇特。由于对陆军事前进行了清洗和立即增加了薪饷，巴尔马塞达基本上继续得到它的忠诚。但海军却支持国会，并于2月夺取了北方生产硝石的塔拉帕卡省 在伊基克

成立了一个敌对政府。由于巴尔马塞达缺乏把部队运往北方并在那里对付国会军的工具，又由于国会缺乏一支在智利中部进攻巴尔马塞达的陆军，因此双方都不得不避免展开决战，直到一方获得绝对优势兵力为止。他们之间则被阿塔卡马沙漠隔开了。实际上战争被转到了国外，因为双方都到美国和欧洲寻求所需武器装备——巴尔马塞达寻求战舰，国会寻求地面军火——以及外交支持和国际舆论，在这三方面，国会派都比较成功。而在同时，双方在智利国内的战斗人员虽然基本上处于守势，他也不是闲着。在北方，国会派从硝石工人中招募和训练一支军队；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普鲁士军事顾问埃米尔·克尔纳的到来，他原是巴尔马塞达政府于1886年聘来使智利军队现代化和专业化的，但他在兵种优先问题上同总统发生了争吵，于是以他非同小可的专长支持了国会创建一支陆军。巴尔马塞达政府控制着中部谷地，它面对着愁眉不展的人民和不时发生的破坏活动，对此它不惜采取镇压措施，从而背离了在宪政冲突中相当大一部分中间派舆论。巴尔马塞达处境困难：他丧失了硝石收入，从1891年2月起这笔收入流入了国会的金库；他缺乏作战的手段，而且除了发布外国政府拒不接受的书面命令外也缺乏对国会派的港口实施封锁的手段；同时，由于在国外的宣传战不断失败，他只能寄希望于等待当时正在法国建造的两艘装甲舰来到瓦尔帕莱索，并相信他的代表能够挫败国会派为其新建军队获得武器的努力。可是这次竞赛他失败了：8月底，国会派的舰队装载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在瓦尔帕莱索附近登陆，他们在康孔和普拉西亚的血战中击垮了武器陈旧、指挥十分不当的巴尔马塞达派军队。国会大获全胜。巴尔马塞达到圣地亚哥的阿根廷大使馆避难，他在那里撰写有关使他垮台的悲剧的感想，他写了许多辛酸的信件向他的家庭和朋友们告别，并于9月19日，即他就任总统几乎整整5年后，用手枪击中头部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周围上上下下的追随者们由于受到牵连而遭到流放，丧失了财产，被解除了公职，还

521

有少数人丧了命。象它以前的政治斗争一样，这次内战持续时间长而且激烈，它的结果对后来智利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围绕它的一个争论点是关于外国硝石公司对战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这场反巴尔马塞达革命的最后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巴尔马塞达制订了一项具体的关于硝石业的国家政策，旨在削弱外国利益以至进行控制，并作为他扩大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总规划的一部分。可是——根据这个论点——由于国家权力的增长，对以诺思为代表的外国利益的威胁也同时威胁到了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寡头集团，所以两者联合起来推翻巴尔马塞达。从当时情况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有强有力的确凿证据证明，而且不少当代观察家也有同感。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大大修改甚至完全推翻了这种解释。首先，研究表明，巴尔马塞达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什么明确设计的国家干预经济（包括对硝石）的政策；其次，它表明巴尔马塞达用来向诺思的垄断性控制的企图提出挑战的主要工具是这位总统准备与之打交道的其他外国公司；第三，它还表明，巴尔马塞达继任者所执行的硝石政策远不象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有利于外国公司，实际上它对它们的反对比那位殉职总统的政策更积极得多。这些修正的观点还（至少暂时和在获得新的证据以前）恢复了比较传统的关于巴尔马塞达和他与国会之间斗争的解释，即认为这种斗争主要是宪法和政治方面的斗争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斗争，同时个人因素也起了重大作用。1891年内战后，智利内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间接地支持了政治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巴尔马塞达本人也这样说过。

522

“议会共和国”（1891—1920年）

巴尔马塞达在自杀前不久所写的《政治声明》中预言：

现在智利虽然存在着议会制政府……但既不会有选举自由，也不会有明确界限的政党，在国会各集团之间也不会有和平。胜利

和战败者的屈服将带来暂时的平静；但是不久旧的分裂将再次产生，国家元首将面临同样严酷的局面和精神困境……。议会政权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胜利不可能持久……。⑨

他的预言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原因不完全是他说的那样。

1891年国会的胜利是智利政治和宪法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为了确保立法权大于行政权而奋起造反以后，国会中这些得胜了的形形色色的政党现在控制了智利。从前总统的强大权力，特别是他为了建立一个驯服的国会而干预选举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宗派主义的作用，现在那些限制已全部消除，尽管去除它们的过程早就开始了。由于有共同的敌对目标——巴尔马塞达和以他为最终代表的制度，国会形成了暂时的团结，但是正如巴尔马塞达所预见的那样，一旦这个目标消除以后，团结也随之消失。现在立法机构不仅高于行政机构，而且还控制了它，因为后者缺乏在议会制度下必须掌握的最后武器，即当它在立法机构中遇到阻挠或失败时能够予以解散并通过新的选举寻求重新委任的权力。这样，一种虚假的议会制政府便强加予智利身上，而个人因素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作用。海军上将豪尔赫·蒙特作为起来造反并最终取胜的海陆军总司令，他是穿军装的革命的化身。他不是政治家，但他是所有得胜政党最能达成妥协的1891—1896年的总统候选人：他主张和解，态度温和，不那么强硬，对于革命为之战斗的反权力主义原则非常明确。

〔他告诉英国公使说〕他的意图是允许部长们在政府各部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不干预立法机构，规定地方行政长官和各省省长只管行政任务，禁止他们干涉政治事务特别是选举。⑩

523

⑨ 译自J·巴尼亚多斯·埃斯皮诺萨《巴尔马塞达的统治和1891年革命》（两卷集，巴黎1894，第2卷，第653—654页。

⑩ 肯尼迪致索尔斯伯里函，1891年11月7日于圣地亚哥。外交档案第121号。FO 16/266。

这种对议会制度的尊重消除了改写现有宪法的必要性；蒙特接受总统的新地位（这与他的大多数前任的观念大不相同）说明，实践中的改变比形式上的修改重要得多。其中主要是取消政府对选举的直接干预，这是反对巴尔马塞达的重要目的。1891年后总统放弃这一行政武器意味着今后总统在多党的国会中必须依靠结盟和联合。这样，对政府倡议必有多数支持的情况就不再存在了，政府还为变化不定的归顺和朝秦暮楚的结盟所折磨。其结果必然导致优柔寡断的统治和犹豫不决的妥协。

另外两个因素加剧了这一局面。首先是1892年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社区自治的新法律。这一措施是受了瑞士榜样的吸引，长期为特别是保守党人（如M·J·伊拉拉萨瓦尔）以及某些自由派团体所主张，他们认为地方政权如获得更广泛的权力便可进一步阻挡总统的影响；这项法律的目的是使各市镇不受中央控制。但是，有效地运用更多的地方自治要依靠充足的财力，而议会并没有提供。于是，中央的控制被地方上有势力者的同样暧昧的权力所取代，政府在选举中的代理人屈服于地方赏金的力量——大庄园主和其他财主用贿赂和腐化代替了中央干预，以致到19世纪末人们竟用固定价格为国会议席标价了。

第二个十分矛盾的因素是巴尔马塞达继承者们的性格和政策，他们是一些在他在世时支持过他并在他死后试图为他的观点辩护的政界人士。对巴尔马塞达分子的迫害在1891—1892年很严酷，1893年通过部分大赦令后缓和了，接着1894年又实行了更全面的大赦。因此在1894年以前，巴尔马塞达的一些著名支持者如恩里克·圣富恩特斯和胡利奥·巴尼亚多斯·埃斯皮诺萨等便都恢复了公共生活。“智利的和睦共处”——这一时期智利上层阶级的社会团结——显然已经再次形成，巴尔马塞达分子或他们自称的“自由民主派”重新加入政治，就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但也不尽然：巴尔马塞达分子毕竟是接受巴尔马塞达政治声明的继承人，这项声明曾预言在没有一个坚定的总统情况下必将

524

出现宗派政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位烈士的遗言。因此，为了暴露身患热症的总统的弱点，他们纯粹出于派别利益而与其他团体联合，又因同样的原因与它们分手；他们使议会共和国无法运转的所作所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色。

1896年蒙特担任总统末年的政治景况是五色斑斓的：在一端有教长似的曼努埃尔·何塞·伊拉拉萨瓦尔领导的教士们的保守党，它依然是教会的党，决心保卫它残存的特权，特别是天主教教育的特权；在另一端是激进党，它以激烈的反教权主义和决心使国家成为教育的全面提供者著称，但它对阶级的态度有点精神分裂，拿不准它是否纯粹是中等阶级和自由职业阶级的喉舌呢，还是也应当包括下层的等级。在这两个真正具有意识形态的党派之间是大量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派——如自由党，它在干预选举的问题上与巴尔马塞达分道扬镳，但现在除了笼统地主张选举自由、新闻结社自由、一般的反教权主义和立法高于行政以外，缺乏使之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如越来越缩小的国民党，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由于它坚持政府不应受个人左右，以及（颇为矛盾的是）它忠于蒙特家族的传统和名望；最后则是巴尔马塞达分子或自由民主派，他们都尊崇已故的总统，同时不那么严格地遵守着他们认为他所主张的东西，但他们联合起来主要是为了形成一支破坏性力量，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新体制，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大少数党以阻止任何别的集团进行有效统治。因此，早在1891年革命前便已存在而革命又使之加强了的智利的多党制，一方面缺乏有利于一种真正的政党制度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另一方面又以超越党派界限的社会团结闻名。多数党派都以机会主义为信条，只有保守党和激进党围绕教权问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个此时尚小的民主党，只有它积极寻求工匠和中等阶级的支持。但该党仅在1894年的众院和1912年的参院露面，这是因为传统寡头的控制很严而选举权受到极大限制。智利的政治和宪法形式使得寡头集团可以玩弄政治游戏，其中各党派在一种全国

525

经济社会变化的背景下争夺权力和势力，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在政治代表性方面得到反映。所以从1890至1920年的这30年是以社会越来越紧张为特征的，当时经济的变化使工人阶级和城市人口有所增长，而要求进行住房、教育、卫生和工作条件等社会改革的压力却无法通过政治渠道进行表达。另一条出路——不时发动的暴力抗议——通常遭到镇压，于是人们发现智利议会制无可置疑的优点——根据严格的宪法规定为其中的一小批少数派提供指导国家事务的文明方法——却越来越不适应处在迅速演变状态的全国社会了。

1895—1920年，智利人口从约268.8万人增加到371.5万人；同期，城乡人口的增长大致同步，全国城乡分别增加约50万人。但是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等较大城市的人口比它们所在各省的农村人口增长得要快得多。如圣地亚哥市的人口由30万增至54.7万，而该省农村人口仅由11.6万增至13.9万；瓦尔帕莱索的城市人口由17.3万增至26.6万，其农村人口由4.8万增至5.5万；康塞普西翁的相应数字也同样惊人，其城市人口由9.5万增至14.2万，农村人口由9.4万增至10.5万。

大城市的扩大，部分地反映了以硝石收入为整个经济动力的全国的发展。早在硝石收入发挥影响以前，智利已经走上了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因为自19世纪中叶起，交通尤其是铁路的改进将全国密切联合在一起，使政令得以通行到过去中央政府不大关心的地区（如小北地区*和南部森林区）。南部小麦种植和中部谷地葡萄栽培的扩大，以及象纺织品、陶瓷、建筑材料等低技术消费品工业企业的发展（它们在太平洋战争前已经存在）都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集中。不过，硝石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兴起大大加快了这些过程。北

526

* Norte Chico，一译北奇科，指阿塔卡马和科金博。它和北格兰德（塔拉帕卡和安托法加斯塔）同属智利的北方省区。——译注

方精炼厂和港口的消费需求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例如硝石业发展对南部农业的影响就令人注目：1887年英国总领事写道："豆子、玉米、小扁豆、豌豆、干果等等很少输出；智利生产者在北方沙漠地区给这些产品象他们的面粉和大麦一样找到了更好的市场。……同样，南方产量巨大而且日益增加的葡萄酒和啤酒也在北方销售……。"[①] 此外，政府来自硝石的收入的增长同样产生了影响。尽管由于硝石贸易的不稳定性使政府收入周期性地下降，但1891—1920年间来自硝石出口税的收入总的来说是趋于上升的，这使历届政府得以推进基础结构工程，它们雇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力，扩大了消费需求，并扩大了设在圣地亚哥（它本身也在迅速发展）的政府官僚机构。铁路是一个典型例子。1893年时，由政府修建的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中央线已经达到首都以南690公里处的特木科，1913年又向南延伸400公里，达到蒙特港；而在北部，1914年中央线修到了塔拉帕卡省南端的平塔多斯，与私人所有的硝石铁路系统接轨。也是在1914年，由智利履行它与玻利维亚签订的1904年条约的部分规定修建的阿里卡—拉巴斯线（长438公里）通车，联接了已有的属英国人的安托法加斯塔—拉巴斯线。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进行建设的联结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跨安第斯山线是高原土木工程的一大壮举，它也于1910年通车，而从纵贯智利心脏地区的中央干线横向延伸的支线（其中许多属私人所有）在这些年也发展迅速。到1914年，智利拥有铁路8,638公里，其中属国家所有的5,584公里，超过60%，而7 年前国家在全国铁路网中所占的还不到50%。

这种建设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不断增长的常年性铁路劳工（其绝对人数难以计算）可能是很可观的，它们是造成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因素。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也是一个因素。在议会统治 527

① 纽曼致索尔兹伯里函，1887年8月于瓦尔帕莱索。《1886年智利贸易和商业报告》（伦敦，1888），见《议会文件》C，第3页。

时期，智利工业无论是企业的数量和种类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它们所需劳动力也相应发展食品和饮料加工、水泥、陶瓷、炼糖、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木材和纸张、化学品、铸造、机械、金属制造等各种工业在这个时期都发展很快，而且主要在私人手里。大部分技术是进口的；许多企业主出生于外国，许多资金也来自国外。不管怎样，到1914年智利已拥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制造业，它主要满足国内需要，但有些较大企业在邻国拥有出口市场。

议会统治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刺激当然并不完全是依靠硝石出口的税收，既不是依靠来自一般进出口关税收人，也不是依靠征税。很大一部分必要资金来自外国贷款。在1885—1914年间，从国外借款超过5,000万英镑，其中60%以上用于包括铁路在内的公共工程。但由于智利拥有硝石，加上它以偿债及时著称——即使在1891年也保持这种记录——它在国际金融界享有很高地位，很容易按合理条件筹得贷款。它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现代化——发展交通设施、改进照明和卫生条件、建筑宏伟壮观的公共建筑，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贷款。教育的改进也是如此。因为内阁虽然不稳定，政府和行政机构仍存在，并且不断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教育。教育的发展反映在有文化的人不断增加：据估计1885年智利人口的28.9%是有文化的，到1910年这个比率已超过50%，不过大部分集中在正在发展的城市中。

因此，智利历史上的议会统治时期（1891—1920年）充满着矛盾现象。这是一个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时期，但又是一个政治上陷于僵局的时期。这个时期城市得到很大改善，而就农民的生活来说，农村却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一个在社会和职业方面的转变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的寡头集团继续支配着公共生活，他们通过社会这块接受人才的磁石吸引从事银行、商业、工业和自由职业的以及来自共和国四面八方的“新人”，另一方面同时出现了

一些新的集团——经理、官员、教师——和新的阶级如城市工人、硝石矿工、公用事业的低级职工、各种企业的小职员等。还有，在经济发展和有些社会设施得到改善的同时，另一些社会设施并没有改善。城市的迅速扩大伴随着住房条件的悬殊：富人的住宅豪华宽敞，穷人只能住简陋的贫民窟。一位北美人1900年访问圣地亚哥后写道："我到过圣地亚哥一些拥有50多间房间的住宅，那里的家具同欧洲有些宫殿一样华贵"，[12] 但郊区工人阶级的大杂院就另是一种样子。那是些一两层楼的建筑，一个房间里住着一家人；"床位常常24小时都使用，白天由夜班工人睡，接着由晚上回来的人睡"。但是，如果说大城市中富人和穷人的住房条件差距很大的话，那么城乡环境的差距就更大了。"下等人〔工人〕的家比我们的猪圈好不了多少"，上述那个北美人访问了中部谷地的农民住宅后这样写道。[13] 卫生状况的差异甚至更大：圣地亚哥的贵族可以为慢性病痛到巴黎或伦敦就医，智利的穷人只能等死。1890—1915年间，总的婴儿死亡率（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死亡数）为293，[14] 但穷人的比率要高得多。在教育方面，总的发展不能说微不足道，但受益的是城市，农村一无所获。

正是这些巨大差别在议会统治时期造成了智利的社会问题，并最终提出了宪法和政治机制是否有能力予以解决的问题。1890年的硝石暴乱是即将出事的一个前兆。20世纪最初20年目睹了社会冲突的继续恶化，这不仅产生于具体原因，而且也是由总的形势引起的。影响一切阶级而特别是穷人的问题，是智利比索的不断贬值和通货膨胀。生活费用的平均年增率1890—1900年为5%，1900—1910年为8%，1910—1920年为6%。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增

529

[12] 弗朗克·G·卡彭特：《南美：社会、工业和政治》（纽约，1900），第218页。

[13] 同上，第239页。

[14] 马科斯·J·马马拉基斯：《智利的历史统计》第2卷，《人口统计和劳动力》（康涅狄克州韦斯特波特，1980）第40页。本数字系根据马马拉基斯教授的基本资料计算出来的。

长率不算高，但它们对当时智利的影响由于纸币的不可兑换性而加剧了；不可兑换的纸币制使生产商和出口商可以赚取价值极少变动的国际货币作为利润，而用实际价值不断贬值的纸币给工人支付工资。自1878年起智利价格的稳定性便一直难以捉摸，而且此后一百年也注定如此。1895—1898年智利暂时恢复金本位时曾试图恢复价格的稳定，但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变换期间恰恰是最不利的时机：1895—1898年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商品价格下跌中的谷底，当时还发生了同阿根廷可能打仗的恐慌，它使政府把大笔支出用来紧急购买武器。1898年恢复硬币的失败，确定了以内含价值一直下降的不可兑换的纸币为货币制度。因此毫不奇怪，工人们作出了反应。

1903年，瓦尔帕莱索的港口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由于工贼破坏罢工的行为而引起骚乱，圣地亚哥派去军队恢复了秩序，但代价是有32人被杀、84人受伤。1905年，在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畜牧主的利益对来自阿根廷的牛征收进口税从而促使价格上涨后，圣地亚哥发生的动乱持续了一星期才被镇压下去，死60人，伤3000人。继这次被称为“红色周”的事件以后，1906年在安托法加斯塔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罢工，因为英国人的硝石和铁路公司拒绝增加工资和延长午餐休息时间；一年后，发生在硝石港口伊基克的一次大罢工遭到血腥镇压，死了好几百人。与此相应的还有激烈的社会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表现为有组织地抵制对劳工的剥削并对“制度”的合理性提出异议。

发展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关键人物，是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1876—1924），他出生于瓦尔帕莱索的一个普通人家庭，职业是印刷工人。1894年加入民主党，成为该党早期的著名成员，1903年他发现了他真正的事业，当时他应邀为北方硝石港口托科皮亚工人的互利协会（mancomunal）* 创办和经营一份报

* 一译“联谊会”。——译者

纸。《劳动报》只是他创办和主编的许多工会报纸中的第一份报纸。1906年他当选为安托法加斯塔的代表，但国会不让他取得席位。有一个时期他流亡在阿根廷和欧洲（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在那里会见了列宁），以后他于1908年回到智利，1911年他与民主党决裂，并于1912年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雷卡瓦伦本人身体力行精心工作而凝聚在一起的，到1915年它在产硝石的北方、圣地亚哥和蓬塔阿雷纳斯都有了不少支部。这位此时已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在他的塔拉帕卡硝石基地创办了几份党报，它们存在时间很短，但产生了长期影响，从而吸收了一批人数不多但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以及一支主张在智利进行激进社会改革的缓缓增长的力量。1915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开始改进它的组织结构和使现有的工会组织激进化。 530

这些工会组织有不同的背景和曲折的历史。随着智利工人阶级特别是非农业部门的工人阶级的成长，他们发现无论是雇用他们的人或者是至少理论上在国会代表他们的人对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都不了解。由于缺乏能够反映他们意见的真正的宪法或政治渠道，自19世纪末期起有些地区和专门行业的工人便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自助团体。到1870年，智利已出现了第一批萌芽状态的工会：城市工匠的互助社或合作团体，其成立目的是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并通过自助讲习班和刊物提供某些教育机会，但强调要同雇主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无意于激剧地改变社会秩序而谋求在社会中获得受尊敬的地位，这是政府和天主教会完全可以接受的；自从教皇发布1891年《新事物》通谕（这是教会第一次严肃涉及社会经济问题的权威表态）以后，教会支持对智利下层人民采取慈善态度。那些所谓“抵抗会社”的见解和宗旨则有很大不同，这些会社是受阿根廷（有时通过流动工人和工会领导人）传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而建立的。它们一般以工业为基地，其当前目标与劳

531 动条件有关，讲求实际，其成员因在一起劳动而联合起来，如港口工人、运输职工、印刷工人等等。它们是后来智利工联主义特别是在政治见解方面的先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政府主义失去了号召力，它们的重要性也降低了。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兄弟会"或叫"联谊会"，它们特别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产硝石的北方，1914年以前那里的采矿业人口主要由于来自国内南方的移民而不断增加。"联谊会"在性质上极为单一，虽然硝石工人很分散(每一个精炼厂差不多就是一个独立国)，但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大，矿工们为了寻找更好的条件而到处奔走。因此他们的组织是地区性的，而不是职业性的，他们关心的是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象教育这类社会福利。但"联谊会"尤其以其阶级性质著称，正是它们在议会统治时期尽管一再遭到镇压，仍在硝石地区不断发动一系列越来越大规模和严重的罢工。

不过，20世纪头10年首批真正的工会是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大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中产生。例如木工联合会和制鞋工联合会，而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人建立了他们第一个联合会，这事发生在1908年国家铁路公司削减工资一年以后。这个组织最初主要是一个互助团体，1911年它起名为智利工人大联合会，1917年它向所有工人开放，当时它已改名为智利工人联合会（FOCH）。它得到了很大支持，特别是在智利的北方和南方，而在无政府主义势力仍很强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则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紧张状态加剧和经济状况恶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智利工人联合会变得更富有战斗性了。那些年，智利爆发的罢工次数和参加工人的人数都急剧增加，由1916年的16次罢工、罢工工人约1.8万增加到了1920年的105次罢工、罢工工人5万。⑮

在这些事态中，雷卡瓦伦起了领导作用，但他努力使他的社

⑮ 布莱恩·拉夫曼：《智利：西班牙资本主义的遗产》（纽约，1979），第227页。

会主义工人党和智利工人联合会保持为两个虽然协调但有区别的实体。1919年智利工人联合会进行了改组：此后，它的基层组织是包括特定地区所有工人在内的工会，而不问他们的工种，它宣布的宗旨象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也包括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智利工人联合会的逐步激进化、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加深了智利工人中的分歧，一部分是曾经在组织工人阶级中发挥过不小作用的人如民主党人，他们谋求在现有政治制度范围内开展活动，另一部分人如雷卡瓦伦，他们在20年代时已反对这个制度。1921年发生了分裂：智利工人联合会决定使自己隶属于莫斯科领导的赤色工会国际，一年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变成了智利共产党，但结果两者的成员都减少了。据估计，1921—1922年单是智利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就减少了50%，即由6万降为3万。而此时，议会共和国已经到达了危机点。 532

在整个议会共和国时期，除了民主党（它无论何时在十分有限的选民中从来只获得极少数人的支持）外，各政治党派和人士都千方百计谋取权力，而在一个以变化不定的结盟和联合为特点的政治制度下，这种权力通常是短暂的。事实上在大部分时期内，对立集团常被称作“同盟派”和“联盟派”，其区别在于前者有激进党在内，后者则有保守党在内。这两个党都是强有力的少数党，它们在国家和教会问题上具有深刻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并且在两个团体内部提供了唯一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当然并不始终那么有力。其余的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国民党等等，在支持不同的总统候选人以及随后在支持他们的政府方面左右摇摆。沉缅于它们所玩的贵族游戏——一种政治上“抢座位游戏”——把它作为指导国家事务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是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是不明白智利正在起变化，国会外各种力量的发展势头正在加强。然而，反应各不相同。在整个时期，不少象路易斯·奥雷戈·卢科和巴尔多梅罗·利略这些知识分子和小说家批判地解剖共和国所患的弊病，特别是“社会问题”，即政治制度显

然无法抗拒的贫富间的分裂越来越大的问题。政论家们如亚历杭德罗·贝内加斯（笔名丁·巴尔德斯·坎赫）和弗朗西斯科·恩西纳在《我们的经济劣势》（1912）中攻击国家没有能力发展一种有用而广泛的教育制度，以及建立一种真正的民族经济而不是一种从属于变幻莫测的国际商品市场或外国企业主的经济。在劳工和社会福利的立法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1906年通过了工人住房法，1907年通过了星期日为工人法定休息日，1917年通过了工业事故保险法等，但这些立法仅起缓和作用，因为工人阶级迅速增长，而政府并不想用多大力气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农村工人仍然没有组织起来，情绪消沉，生活水平低得可怜。

533

这个时期的智利统治者有一些引以为荣的成就。他们管理下的经济不断增长；他们大大改善了大城市的舒适条件，特别是他们保持了国家的和平。19世纪90年代在南部与阿根廷的边界纠纷经常引发战争恐慌，由此造成了对两国都不利的军备竞赛。但理智占了上风：1902年在英国仲裁下，智利和阿根廷解决了它们在遥远的南方针锋相对的领土要求问题，并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签订了一项总的仲裁条约。两年后，与玻利维亚签订的一项明确的和平条约结束了太平洋战争不稳定的停战状态。但在解决那次战争的一个遗留问题即与秘鲁的塔克纳—阿里卡纠纷问题上并没有取得进展，尽管人们多次企图恢复安孔条约的规定以加以解决。智利继续控制着这两块领土，而且根据秘鲁不断发出的强烈控诉，智利还在不断骚扰秘鲁居民，输入智利移民，从而使人口的比例在一旦举行公民投票时有利于智利（以此同时，智利政府确实在塔克纳和阿里卡投入了不少钱，尤其是教育方面）。不过，这个问题依然停留在唇枪舌战的范畴，尽管它贯穿了整个时期而且十分激烈。

议会领导人之所以受到谴责倒不在于他们显然不能认识社会的演变，因为多数人是明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而在于他们显然不能改革他们的体制以适应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比较强大的政

府，尤其是佩德罗·蒙特政府（1906—1910），指导了基础结构的迅速发展，例如广泛的铁路建设；蒙特还不得不应付1906年几乎完全破坏了瓦尔帕莱索的毁灭性地震，以及1907—1908年被最不负责任的那种证券交易投机所促成的经济危机。可是，他在短短的任期内给予共和国有力的领导（他过早地去世了）基本上被他不得不实行的制度所抵消了，结果在4年内换了8届内阁，每届平均存在4个月另21天。接替他的拉蒙·巴罗斯·卢科在就任总统时已75岁，后者在5年内换了14届内阁，其中4届维持了不足3星期。在1891—1915年期间至少组织了60届内阁，每届平均任期仅4个月稍多一些时间。在有那么多党派谋取权力和地位的时候，内阁的轮换在形式上当然是高度民主的，在实践上是严格按议会制办的。智利在这些年既没有成立独裁政府，也没有军人干政，这些都是议会统治时期显示的宝贵历史传统的组成部分。但代价是政府主动精神丧失，长期规划缺乏，特别是政府事务延续性受到某种损害，它们促使历届总统集中精力于眼前的必要的目标，如通过预算或者购买武器等，而不得不忽视象社会改革这类长期措施。所以这个时期结束前智利社会肌体中的紧张状态已很尖锐，这是不足为怪的。也许更使人惊异的是，尽管工人们同政府控制的力量进行了猛烈的、不时爆发并且通常是流血的对抗，智利的制度竟能把这种紧张状态遏制到那时。在这方面，行政机关的延续性与政治及政府的不稳定性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延续性是一项国家资产，但是，也已受到侵蚀。随着文官和武装部队中的军官们自己也身受社会经济条件恶化之害，他们对一个早就被人视为衰败的政府制度的服从，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534

亚历山德里、军人干预和伊瓦涅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社会问题”变得十分严重。智利虽然从未参战，但却立即受到了这场冲突的伤害，因为它的出口经济同现已受到明显破坏的世界贸易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

英国和德国是智利的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英国在智利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如此；现在这两大海大强国处在交战状态，它们的船只另有用途。在大战爆发后的两个月内，智利的硝石出口下降了一半多，硝石产区的人口也显著减少，因为精炼厂关门，工人回南方去了。由于硝石是智利经济的发动机，硝石生产激剧下降（1914年7月开工的134家精炼厂到1915年1月只剩43家）对几乎整个经济结构都有消极影响。不过这场危机虽然严重，但为时也不长。1915年硝石生产很快恢复，首先是因为它制造炸药的用途对英国及其盟国变得十分重要，其次因为象德国、比利时这些传统大市场由于封锁而关闭，导致中立国，特别是象美国这样一个越来越成为西方同盟国的军火供应者，购买更多的硝石。这是一种预兆：战争的一大结果是使美国成了智利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德国基本已被排除，英国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智利的进口贸易方面则不可避免地缩小了。这一过程在1917年美国参战后加紧了，而智利商品出口的繁荣刺激了整个经济活动的复苏和工业发展，其中一部分（如纺织业）的发展则弥补了从英国这些传统供应国进口商品的不足。但是如同在这以前的萧条一样，这次繁荣也比较短暂。战后的萧条是世界性的，但智利的情况因其它因素而加剧了：对硝石的需求随着敌对行动的停止而下降，消费国积累了大批库存，大战期间德国因无法获得天然硝石而推动了合成产品。随着事态向其他国家传播，这片开始时不过巴掌大的乌云将不可阻挡地伸展，最终将摧毁天然硝石的市场。到1919年初，一大批精炼厂已经停止生产，许多劳动力象过去那样流向南方寻找工作。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化，1918和1919年劳工活动显著增加，工人举行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据报道说11月份圣地亚哥一次示威游行有5万工人参加），并由于上层阶级近乎惊慌失措的反应，这些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对抗势在难免。这些通常是流血事件：1919年2月麦哲伦省纳塔莱斯港由绵羊加工业的几乎全体工人都参加的一次罢工遭到凶恶的镇压，死15人（其中有4名军

人），重伤28人。9月，智利工人联合会（纳塔莱斯港罢工就是其麦哲伦省分会发动的）在圣地亚哥发动总罢工，同年的部分时间内生产硝石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都几乎处在戒严状态，工人领导人被强迫送往南方。 536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智利现代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有争议的人物在全国声名大振。他就是两次出任共和国总统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1920—1925和1932—1938）。亚历山德里是19世纪意大利移民后裔，1868年出生于利纳雷斯省一个农场；1891年他上学时反对过巴尔马塞达，1897年进入国会，一年后首次短暂地参加过内阁。亚历山德里是议会统治时期的典型产物，他作为自由党人在国会里消磨了几近20年，直到1915年事态将他推上了国务活动的前线。那年，他被指定为竞选代表塔拉帕卡省的参议院席位的自由党候选人，他发起了煽动性的竞选运动，他的支持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反对者的激烈情绪发展为暴力行动，3月份达到顶点时有一位警长被暗杀。亚历山德里的候选人地位对那些把这个省一直象私人采邑一样治理的传统政治大亨们是一种直接挑战，他在这次投票人很有限而双方都进行了大量贿赂活动的选举中获得了70%的选票。对未来更重要的是，他以旺盛的精力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引起全国注意的还有他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对一个他自己20年来当然也参加了的权力机构的辛辣攻击。此后他被人称做“塔拉帕卡之狮”，并使自己确立了有可能在未来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的地位。

1915年3月国会选举的结果，自由派同盟（自由党、激进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多数，在众议院获多数的是联盟派（保守党、自由民主派即巴尔马塞达派和国民党）。接着于6月举行总统选举。联盟派的候选人是胡安·路易斯·圣富恩特斯（他的哥哥恩里克·萨尔瓦多·圣富恩特斯曾在1890年被人硬说是总统提名的候选人，这成了后者下台的重要原因），同盟派的候选人是

哈维尔·安赫尔·菲格罗亚·拉腊因。圣富恩特斯以微弱多数获胜当选为总统，部分地是由于他本人的品格，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他掌握了现金。圣富恩特斯得到一个由不同党派组成的不稳定联盟的支持，而在参议院则受到同样游移不定的同盟的反对，在此情况下，他只好运用他的并非微不足道的运筹政治的才能以解决总统无能为力的窘境，这是一个十分花费时间而且事实证明是得不到结果的任务。在1918年3月举行的下一次国会选举中，同盟派在参议院赢得了更大的多数并控制了众议院。但在同盟派（它虽不是代表但反映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些模糊愿望）内部，一方面是象亚历山德里这样一些具有一种新的国民精神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其政治眼界仅限于在（当然是有利于他们的）现有制度内为权力和恩宠进行狭隘斗争的人，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

53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美国在1917年后施加了很大压力，圣富恩特斯政府至少保持了智利的中立，这无疑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这造成了复杂形势。对智利怀有十分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的秘鲁和玻利维亚接受了美国的劝告而与中欧列强断绝了关系，主要是希望战后在它们与智利的争端上获得支持。但效果并不大：虽然唇枪舌战（尤其是在塔克纳和阿里卡问题上）变得日益激烈，直至1918年智利和秘鲁都从对方国撤回了各自的领事，但现实的战争恐慌从未变为真正的战争。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尽管它在1920年对某些智利政治集团似乎是有用处的。

那时正是战后经济严重萧条时期，全国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上。1918年领导内阁仅6个月便发现他的改革纲领受到人们反对的亚历山德里，现在显然成了自由派同盟中那些主张变革者的候选人，而且他为确保这一地位作了艰苦努力。在同盟内部，激进党正在取得优势：它已宣布正式谴责寡头统治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兴起为自由党政客们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为亚历山德里的出现感到震惊，故撤回了他们的

支持。这些不同政见者加入了自由民主派和国民党的行列，宣布拥护路易斯·巴罗斯·博尔戈尼奥作他们的候选人，接着另一派于1920年4月正式提名亚历山德里为候选人。保守党人认为亚历山德里对他们的利益是主要威胁，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们支持了巴罗斯·博尔戈尼奥。

亚历山德里本人在竞选运动中显示了旺盛的精力，他猛烈谴责寡头集团，同时保证实行全面的改革计划。他在被提名为候选人时说："我希望我成为一切反动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的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混乱和动乱的鼓吹者。"[16] 投票结果十分接近。6月25日，在公众情绪空前沸腾的气氛下，宣布了选举结果：亚历山德里在选举团中获179票，他的对立面获174票（当时的选举是按美国模式进行的间接选举）。双方对结果都表示异议。最后，国会一致决定把这个问题移交仲裁法庭，后者于9月30日宣布亚历山德里以177票对176票当选。10月初，国会投票以87对29批准了这了结果，亚历山德里于1920年12月23日就任总统。 538

就在进行竞选和亚历山德里最终就任总统这个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正当全国由于选举而出现大的动荡、硝石产区的劳工运动达到高潮时，政府通过陆军部长拉迪斯劳·埃拉苏里斯突然动员武装部队，声称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正在北部边境集结，准备入侵智利。这纯属虚构，但在整个7月和8月份驻守北部的一支庞大智利军队在沙漠地区徒劳地等待着采取行动。军队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的许多成员急切感到缺乏物资和给养，生活条件艰苦而不卫生，指挥不统一而且领导不力。不论是否属实，人们越来越认为军队正在被用来为纯粹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亚历山德里本人（他在1919年曾与难驾驭的要求改革的陆军人士有

[16] 《亚历山德里总统和他的政府》（圣地亚哥，1926）第32页。没有注明作者或编者。

接触）却并没有出来劝阻这种观点。那个已以"拉迪斯劳阁下的战争"闻名的事件增加了舆论对智利政治和政府的强烈批判，这种舆论在现役军官中已发展了一个时期。早在1907年，陆军军官们便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一"军人团"，他们对议会制的效率低下、特别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低效率感到不满。五年后海军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也是秘密的，但对专业工作方面的缺陷和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同样感到不满。虽然这些团体从未真正公开活动而且实际上已经解散，但它们所代表的思维继续留在某些军事人员的脑海里，这些人越来越感到他们自己薪水低、供应差、晋升难（僵硬的等级制）以及指挥系统不灵，这些不过是共和国本身的映象而已。

539

1920年亚历山德里制定的总统规划是他1918年内阁规划的新版。他的第一任内政部长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1938年成为总统）负责一项社会改革计划，还负责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减轻世界性萧条对智利的最坏的影响。虽然国会的阻挠不久就表面化了，但1921年初硝石产区的一次悲剧性事件使议会战退居次要地位。在圣格雷戈里奥的精炼厂1月底因硝石市场萧条而关闭，就在这个精炼厂内工人和警察的一次纠纷发展成暴力行为，结果有41人死亡、80人受伤，其中又有32人后来因伤致死。保守派的舆论认为亚历山德里应负很大责任，因为他在竞选运动中煽动了群众；而在反对派方面看来他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是国家元首，是最终控制法律和秩序的。在圣地亚哥，国会继续阻挠他执行计划，而在1921年3月的选举中反对派保持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不过众议院落在同盟派手里，单是激进党就获得1/3的席位。随后4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当时经济困难不断增加，社会日趋动荡。

1920年举行的25年来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表明，全国人口已由269.5万上升到373万，净增100万人。圣地亚哥的人口翻了一番，现有50万居民。其它城市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惊人，但其发展

速度仍大大超过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吸收能力，难以安排更多的人员从事生产性职业。在为期4年内，共有16届内阁接连象走马灯似地试图进行统治，这个时期的比索价值降低了一半，政府收入也急骤下降。到1924年，国库如此枯竭，以至文官和军队的薪水拖欠了6个月，正如一位后来的重要军事人物多年后回忆说：

"我们无法保证为部队弄到面包、肉类或蔬菜，或者为马匹弄到饲料。一天，团队会计向我报告说我们的肉食采办员没有提供肉食供应，因为已经有6个月没有再向他付款……我们只好掏自己的腰包……并设法筹集了100比索。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要用100比索买的肉供全团250人食用。"⑰

510

由于穷困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增加了，大批抗议性组织纷纷建立，多数支持亚历山德里而反对民族联盟（原联盟派的现名）占多数的参议院的阻挠主义。

在一片内战声中，亚历山德里和反对派寻求妥协，并于1924年1月底达成短期协议。亚历山德里允诺在即将于3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不施加行政压力，作为回报，反对派答应改变国会事务的若干程序以加快办事速度。他们还一反常态，答应支持一项给国会成员支付薪金的提案——这个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如同1890年一样，双方互不信任。因此，亚历山德里决定不仅对国会选举进行广泛干预，而且还决定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军队。他在选举前不久说："参议院中存在着一个多数，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我所代表的、而且目前就体现在我身上的运动……我已亲自担负起清理议会席位的责任。"⑱此后不久，有关选举的指示便通过电报发往各省政府的官员，军队则被用来"维持秩序"，这是用来掩盖对反对派常常进行赤裸裸的骚扰的委婉语。

---

⑰ 已退休的巴托洛梅·布兰切将军会见维尔弗雷多·马约尔加时的谈话，见《埃尔西利亚》周刊1965年7月7日，第5页。

⑱ 阿尔韦托·卡夫雷罗：《智利和智利人》（圣地亚哥，1926）第258页。

但反对派也并非束手无策，双方都肆无忌惮地从事威吓和行贿活动。由于政府机器的力量较大，结果是自由派同盟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并控制了参议院。不过对亚历山德里说来这是一个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胜利。因为在随后数月，国会尽在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进行枯燥乏味的辩论，在这些辩论中，他的那些难以驾驭的追随者们在全国性问题上并不比反对派更明白是非。他们在关于国会薪金的法案上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法案在6月份又由众议院移交参议院。但在这以前，武装部队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虽然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一致。

541 军队上层通过一个名叫“TEA”（坚韧、热情和自我牺牲）* 的组织同工联主义政治家们酝酿着一个推翻亚历山德里的密谋，陆军监察长路易斯·阿尔塔米拉诺卷入了这个组织。在其下面，不少中级军官常在圣地亚哥军人俱乐部开会讨论他们对专业工作的不满和国家局势问题，他们中著名的有马马杜克·格罗韦·巴列霍少校和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少校。后来正是这一批人于9月初在“TEA”实行计划以前抢先采取了直接行动，尽管这次行动比较温和。

9月2日，正当参议院辩论国会薪金法案时，公共听众席上约50名初级军官对那些反对这项法案的人报以高声喝采，一天后又重复了这一行动。当陆军部长（一位文官）要路易斯·皮诺切特上尉交出在场者的名单时，后者宣称他不是文书，但军官们答应如果莫拉部长以后接见他们就离开会场，于是他们就走了，在他们离开时，身上所佩军刀格格作响。这次被称作“军刀格格响”的事件以后，政府和军队间开始了一系列协商，最后亚历山德里要求他们开列一个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项目清单以便提交国

* 原文为“Tenacity, Enfhusiasm and Abnegafion”（相应的西语为“Tenacidad, Enfusiasmo y Abnegación”），“TEA”是上述三个词的缩写。——译者

会：总统宣称，如果国会拒绝予以接受，他将把它关闭，并同军队一起“创造一个新智利”。这份项目清单由现已成为下级军官领袖的伊瓦涅斯和他的助手亚历杭德罗·拉索中尉起草，经过他们的同事同意后于9月5日交给了亚历山德里。清单上开列了不少要求：否决国会薪金议案；在预算问题（国会中进行无休止争吵的问题）上采取行动；通过所得税立法；为军人的晋级、薪水和退休金制定新的法律；稳定比索价值；立即给所有政府雇员支付拖欠的薪水；制定劳工法规和其他社会法律；解除三位具体指名的部长的职务，以及今后不让武装部队参与监督选举等。在提交这个清单以前，伊瓦涅斯说服他的同事们建立一个委员会作为他们的执行机构（陆海军人委员会），会见总统的就是这个机构。这次会晤并不顺当，亚历山德里拒绝了解除三位部长职务的要求，认为这是犯上，但表示在其他问题上将尽力而为。拉索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请求的，而是提出要求”！幸好在场的一位高级军官说了一些缓和气氛的话才使亚历山德里没有终止会晤。他派人把首席部长阿吉雷·塞尔达叫来，于是重新宣读清单。首席部长想进行讨论，但被粗鲁地打断了，会晤结束时陆军部长莫拉提出了辞呈——这是该委员会的要求之一，后者还同意通过最高指挥部的阿尔塔米拉诺将军保持联系。 542

亚历山德里无疑确信他能利用军官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明显的是，不论在有关国会的所作所为方面军官们是多么同情亚历山德里，但他们对他并不信任，同时，他们决心在革新智利的事业中不仅是起一种积极作用，而要起主导作用。当天下午，内阁辞职，亚历山德里任命阿尔塔米拉诺将军为内政部长；阿尔塔米拉诺又提名另一位将军——胡安·巴勃罗·本内特为陆军部长，提名弗朗西斯科·内夫海军上将为财政部长，从而使军方有力地控制了政府。鉴于陆海军人委员会中的有些成员不信任阿尔塔米拉诺，故军队各派间建立的同盟是权宜之计的。9月8日，即亚历山德里否决薪金法案的一天后，国会在一个下午就

通过了委员会创议的全部立法，不过委员会坚持纹丝不动，直到它完全确信它的目标已真正达到为止。于是亚历山德里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提出辞去总统职务，但陆海军人委员会予以拒绝，而建议他到国外休假半年，阿尔塔米拉诺也同意这个建议。当天夜晚，亚历山德里和他一家到美国大使馆避难，两天后悄悄前往阿根廷，人民没有什么反应，而四年前他们曾热热闹闹地拥戴他登上总统宝座。

接着国会停止活动，政府中的文人成员辞职，由阿尔塔米拉诺、本内特和内夫组成的执政委员会接管了权力，它保证将尽早地把权力交还给文人。但那另一个委员会却有别的想法：首先，它特别反对在没有进行重大宪法改革就恢复文人统治的一切意见，以免干预前的故态复萌。而且，与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高级军官作代表的新的军政府不同，由伊瓦涅斯和格罗韦领导的下级军官，深切了解智利的社会矛盾，他们既寻求政治改革，也寻求社会和经济改革。在后来三个月内，在人们普遍支持军方干预的情况下，军人运动中的两派之间分歧越来越大。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1月，裂痕不断扩大，因为军人委员会*越来越感到军政府与右翼政客一鼻孔出气，对重大改革毫无兴趣。

543

1925年1月，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军人委员会中有指挥职务的许多杰出军官被调到他们没什么权力的地区，他们的职务被同情军政府的人所取代。1月16日，对军人委员会的思想方法持典型的保守态度的拉迪斯劳·埃拉苏里斯在军政府支持下宣布自己为总统候选人。1月23日，格罗韦和伊瓦涅斯经过周密准备后，发动政变，夺取了总统府，迫使在职者辞职，并建立了以陆军监察长为首的新的临时委员会。四天后，他被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官埃米利奥·贝略·科德西多取代；贝略·科德西多是巴尔马塞达的女婿，他的上台是同最初不赞成政变的海军司令部谈判的

* 即陆海军人委员会。——译者

部分代价。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将加入了贝略·科德西多的占统治地位的执政委员会，但其内阁基本上由亚历山德里的支持者组成，全都是改革派。一份电报打给了在罗马的亚历山德里，邀请他回国重掌总统职位；3月，他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国内。

在整个这些动荡年月，或者说自从1924年9月军人首次干政以来，在军人委员会的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卡洛斯·伊瓦涅斯，正是他在以后的七年中最终成为智利政府的主要力量，并且象亚历山德里一样保持为国家生活中的主宰人物，直到1960年他去世。他的公务生涯漫长，曾经两度就任总统（1927—1931和1952—1958），人们对他的政府有很多争议，有大量文献写到了关于他的情况——尽管如此，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仍是智利历史上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他从前的经历没有任何一点能预示他在1924年后将发挥的作用。1877年他生于利纳雷斯省，与亚历山德里是同乡，1896年进人圣地亚哥军事学校。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有条不紊、十分用功的士官生，但他知交很少。1900年他从军校毕业并晋升为中尉后，随一个智利军训团前往萨尔瓦多，同该国的一位本地女人结了婚，1906年他在与危地马拉军队的一次冲突中出了名。之后，他的经历就象其他智利中级军官一样。他是一名骑术超群的骑手，1921年当上了圣地亚哥骑兵学校校长；1924年发生政治危机时他正担任这个职位。直到此时，他作为一个军人的经历是丰富而广泛的，但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经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野心。但1924年后，在他认为号召爱国主义、纪律、秩序和明确的方向已为形势所必须之时，伊瓦涅斯在全国舞台上找到了他真正的事业。英国公使以钦佩的口气概括了他在1927年的特征： 544

他为人寡言少语，性格十分内向，很少暴露自己的思想；他贫穷……他的住宅是斯巴达式简朴的楷模；在智利公共生活中他是我从未听到受人指责为腐败或贪污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我相信鼓舞他本人的仅仅是要以他最大能力和智慧为祖国服务的

愿望……。[19]

不过他的时机尚未到来。

亚历山德里在非自愿流亡期间也并没有闲着。他花费很多时间考虑智利的宪法制度。在他凯旋回国后，鉴于还有六个月他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他即着手改革宪法制度，当时的政治气候已经由贝略·科德西多临时政府努力加以改善。原来设想由一个制宪议会来仔细研究新宪法的打算没有实现，但亚历山德里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协商委员会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实际工作是由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小组委员会完成的，它起草了准备提交全国公民投票的新宪法。但与圣地亚哥的表面现象相反，国家并不平静。5、6月份，硝石产区的不满爆发为暴力行为，亚历山德里命令军队进行镇压。经过流血对抗后，矿工们投降了，但在拉科鲁尼亚的精炼厂发生了大屠杀，有600多人丧生。8月30日，新宪法提交公民投票。当时在300万以上总人口中投票者只有30.2万，他们可以选择完全赞成、完全反对，或者在经修改后同意，以便使议会制政府继续当政。结果只有13.4万人投票，其中12.7万人投了完全同意票；保守党人弃权，因为他们反对新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激进党（最大和最重要的政党）同样弃权，因为他们希望继续实行老的议会制度。

545

1925年宪法使智利恢复了强有力的总统制政府。它规定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而不是从前的间接选举制；它允许任职者服务6年而不是5年，不过不能立即连选连任，并规定设立常设性资格审查法庭以监督选举。它规定教会与政府分离，圣地亚哥大主教克雷森特·埃拉苏里斯在这方面对反对宪法的极端天主教徒起了缓和作用。这部宪法对国会在货币议案上进行拖延的权力加以限制，还制订了一整套重要的社会条款，其中一条授予政府在共同

---

[19] 霍勒致张伯伦函，1928年1月25日于圣地亚哥。见《1927年关于智利的年度报告》，FO/A1630/9。

利益需要时对财产所有权进行限制的权力。它改变了议会统治时期的做法，规定部长们应对总统而不是对国会负责，也不能由国会议员兼任。不过，也有一些条款以后看来反而削弱了它的主要意图。由于它规定总统、国会和市政选举在不同日期举行，从而使政治体制不得不适应经常性的竞选活动，后者于是成了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而使其他事务受到损失。它规定如果在选举时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的话，可以通过国会投票根据全体议员的多数票最后推选总统，而在一个经常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多党制度下，这意味着要进行讨价还价和妥协让步来确认得到人民拥护的候选人当选，这是削弱一位可能是强有力的总统的另一个因素。但这是对优柔寡断年代（1891—1925）的反冲，它说明政府对国民经济事务的干预——至少在形式上——已明显扩大。不过还尚待实施。

亚历山德里本人没有什么机会来使用他的新工具，因为总统在最后数月一直全神贯注于他的陆军部长卡洛斯·伊瓦涅斯。后者不安地注视着文人统治的恢复，而亚历山德里回国后在周围聚集了他旧时的爱阿喚泰承的支持者，他毫不掩饰他对伊尔涅斯这位1924年军事干预的化身怀有敌意。他一直不得不把有势力的伊瓦涅斯保留在陆军部，但他希望确保1925年末的总统选举将导致军人干政的结束。不过，伊瓦涅斯另有打算。他越来越深信（而且不无道理）寡头集团和政客们并没有从最近事件中学到什么，所以他本人提出要竞选总统，但拒绝按过去的先例所要求的那样辞去陆军部的职务，那是他的权力杠杆。亚历山德里因担心正面冲突的后果，于10月辞职，把权力暂时交给了他在1920年的对手路易斯·巴罗斯·博尔戈尼奥。但此时由于至今不明的原因，伊瓦涅斯动摇了，他答应如果所有政党一致同意推举一名候选人，他就退出竞选，结果各政党都同意这样做了，选出了一名年长、和蔼可亲但并不怎么机敏的头面人物——埃米利亚诺·菲格罗亚·拉腊因。唯一的另外一名候选人是何塞·桑托斯·萨拉斯，他是 546

前陆军医生，在亚历山德里回国前的政府中做过卫生部长，他在竞选中白手起家，没有任何政党的支持，也没有活动基金，他获得了8万张选票，而菲格罗亚获18.4万张选票，桑托斯·萨拉斯在那次选举中代表了下层阶级：他没有取胜，但他能成为候选人说明那些老政党并不是不受到挑战的。

在一年半内，这位不幸的菲格罗亚要同难驾驭的国会周旋，在国会里各政党又恢复了老的政治游戏；他还要同他的陆军部长伊瓦涅斯周旋，伊瓦涅斯悄悄地、有效地同时无情地加强他的个人地位，以至他在1927年2月终于促成了内政部长的辞职并使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两个月后，菲格罗亚总统辞职，直接原因是伊瓦涅斯要求解除菲格罗亚弟弟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这是由他发起的公职系统大整肃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肃已引起广泛的逮捕和流放。菲格罗亚辞职后，伊瓦涅斯在大选举行前接任总统。与此同时，他宣布自己想竞选总统，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只有正在挣扎的共产党（因为这个团体也身受坚决反共的伊瓦涅斯之苦）提出了一个进行竞争的候选人——埃利亚斯·拉斐特，当时他还被流放在太平洋的马斯阿富埃拉岛。在5月份的大选中，在所投的13.7万票中，拉斐特得4000票，伊瓦涅斯得12.7万票。这样，经过合法的、虽然未必绝对正当的选举，伊瓦涅斯终于就任为智利总统，他带着一项自1924年以来一直在琢磨的使命，即按他的方法振兴共和国。

伊瓦涅斯使智利得到了4年独裁的（有人说是镇压性的）、高效的、廉洁而昌盛的政府。他任命的部长们与国会各党派无关，他们都是以具有技术本领和行政能力的个人资格而被挑选上的。实际上，他是有意避开国会，只有在按新宪法需要一起努力通过立法时才例外。而且他也不能容忍在国会中有反对派：正如 547 英国公使在1928年的报告中所说的，国会

> 在总统手里受到了克伦威尔式的对待，总统明确指出，他不喜欢那种盛开雄辩之花的气氛；国会两院的存在无非是为他的政

府采取的措施提供一种合法空气，作一点建设性批评固然可以接受的，但阻挠或反对……则不能容忍。[20]

事实上也没有被容忍：那些左翼鼓动家（即伊瓦涅斯眼中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职业政客（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他所十分蔑视的）、社会的贵族领导人——所有那些反对政府的人都受到同样对待，他们要为自己坚执困难的反对立场而受到监禁或放逐。他限制智利人已经习惯的各种自由，如新闻自由，尽管它没有受到严格审查，但肯定受到监视。他有效地削减了国会的特权，这些特权在前政权下已经变质，成了为所欲为了；他努力把工会置于中央控制下，并对工会领导人采取严厉态度。伊瓦涅斯说，他如此削减人们从前享受并常常滥用的权利，是由于国家的需要，因为他要实现一项雄心勃勃的行政、经济和社会规划。

政府设立了信贷机构以鼓励农业和工业，并制订了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一整套教育改革先后出笼——教育预算在1925至1930年间翻了一番，教育改革中包括具体规定要发展技术教育，议会时代的社会批评家曾对这种教育的缺乏大为悲叹。1924至1925年的"社会立法"被编成了法典并增加了细节，通过改编和改进训练设施建立了智利的现代化警察部队——侦缉队；军队各兵种进一步专业化并获得良好的装备。不少改革有其不大美妙的一面；例如新的劳工法带有高度的家长制色彩，不过这些法律的确首次承认了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有为改善条件而同雇主进行谈判的权利以及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罢工的权利。毋需怀疑的是，随着就业的增加和周围新工程所显示的经济复苏现象——港口、道路、码头、农村灌溉项目、城市中巍峨的公共建筑，伊瓦涅斯时代给整个智利人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的生活水准， 548
然而，究竟有多少人默默地准备为这些成就而失去某些自由作为代价还是个疑问。政客们当然是不准备这样做的：在伊瓦涅斯在

⑳ 同上。

任总统的整个期间，不断受到叛乱阴谋活动和与此有关的谣传所困扰，大多是他从前的朋友而现在已成为敌人的人鼓动起来的，而且常常是他们组织的。但是，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只要人民群众仍然满意，只要军队保持忠诚而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控制，那么一切都将过得去。

在三年内一切确实不错。就1914—1930年这段时期而言，各部门的生产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量、工矿业产量和建筑业——在1927—1930年间达到了最高点。㉑建筑业突飞猛进，采矿业也一样，采矿业的突飞猛进是因为硝石生产摆脱了20年代中期的萧条而得到恢复以及大规模铜矿开采业的迅速发展，后者的范例是北部的丘基卡马塔和中部谷地的埃尔特尼恩特。以英镑价格计算，智利的出口由1926年的约2,200万英镑增加到1929年的3,400万英镑；进口在同期内由约1,800万英镑增加到2,400万英镑，从而使智利的贸易获得大量顺差。与此同时，外国投资也大量增长。伊瓦涅斯虽然为某些新生工业颁布了保护性立法，他对重大项目如铜矿开采和公共工程方面的外国资本的态度是宽宏大量的，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外国（特别是北美）资金大量流入智利。美国在智利的投资在1900年仅500万美元，到1929年已增加到6.25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在伊瓦涅斯当政时代投资的。的确，美国资本在（智利）大型采铜业中的优势地位就是在这个时期获得的。伊瓦涅斯政府还在国外签订了大笔贷款协议以为公共工程计划提供资金，而在那些欢快岁月这样做并不困难。尽管新的信贷机构要花费大量支出，每年的预算仍总有盈余，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伊瓦涅斯手下大部分时间担任财政部长的巴勃罗·拉米雷斯改革了国内税收结构，国家收入来自国内各种税收的份额从1927年的24%上升到1929年的将近33%。

㉑ 加布里埃尔·帕尔马：《1914—1935年的智利：从出口经济到进口替代》，见《新历史》（1982）第7期。

549

伊瓦涅斯还有另一大可以引以为荣的成就——在塔克纳和阿里卡领土问题上同秘鲁明确解决了令人烦恼而长期未决的边界纠纷。亚历山德里任总统时曾亲自与秘鲁就这个问题重开谈判，1922年两国同意把问题提交美国的哈定总统裁决，但提交什么问题并不明确。双方在华盛顿会谈时，经过反复的支吾其词和法律辩论，才达成了协议，1925年哈定的继任者柯立芝总统作出了裁决：进行公民投票，从而明显地支持了智利的立场，同时将不大清楚是否在塔克纳的一小部分仍有争议的领土的所有权给了秘鲁。为了监督公民投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为举行公民投票作了细致的安排。这个北美委员会的工作由于1925年智利发生政治动乱和出现新的法律争执、对破坏协议事件的控告及破坏事件本身而时常被打断，到1926年6月出现时由于完全陷入僵局，该委员会就撤回美国去了。但在这以前，美国政府作为调停者已为智利和秘鲁进行了斡旋，以便试图通过直接谈判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只是两国直到1928年7月才真正恢复了久已断绝的外交关系。挺身出来解决这个难题的正是伊瓦涅斯，但有讽刺意味的是，1928年作为大使带着他的建议前往秘鲁的却是埃米利亚诺·菲格罗亚。经过多次详细谈判（不过气氛越来越友好），1929年达成了协议。塔克纳交还给了秘鲁，智利则保留阿里卡。作为明确割让阿里卡的补偿，秘鲁还将获得600万美元，另有一些条款规定了未来的边境关系和跨边界的商业交往。这是一种重大的外交和国际主动精神，但它没有能使所有智利人都高兴，它给伊瓦涅斯的政敌提供了炮弹，他们攻击他不仅对内实行镇压，而且还出卖祖国。

如果说经济福利是伊瓦涅斯高效而严厉的政府的主要支柱，那末1929年开始的华尔街大崩溃所引起的衰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并使它倒了台。20年代末智利如此依赖它的初级商品的出口（硝石和铜），又如此依赖外国贷款和投资以不断推进公共工程和总的发展，因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入引人注目的中断（始于1929年

末而其影响1930—1932年达到高峰）使智利成了当时发生的世界性萧条的一个主要受害者。1929年，智利的出口值为22.93亿金比索，进口为16.17亿金比索，贸易顺差6.76亿金比索。到1930年，出口降为13.26亿金比索，进口为14亿金比索，逆差达7400万金比索。到1932年，在世界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出口值已下降到2.82亿金比索，进口值则降到2.14亿金比索——智利的外贸损失真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投资也停止了，到1932年，智利不得不暂停偿付外债，这是一百多年来的第一次。

550

经济显著下降的社会后果首先出现在采矿业。1929年12月底有9.1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两年后只有3.1万人还在工作，而且象从前类似情况一样，对矿产需求的减少也影响到了经济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因为食品市场衰退了。跨进1930年以后，圣地亚哥的报纸上满篇都是报道失业增加、公共工程突然停止、政府各部研究节约行政开支、政府公务员削减薪水以及其他反映危机加深的东西。

政府唯一可行的回答是实行紧缩，但政府的收入比它削减支出的能力下降得更快。鉴于伊瓦涅斯政权带给智利的经济利益是人们接受其政治缺陷的主要理由，因而这些利益的消失使政治上的批评和责难死灰复燃。政府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报纸上对它处理危机的方式的攻击增加了，人们开始示威。面对这种没有预料到的形势，伊瓦涅斯作出的反应是企图使批评者闭口；更严格的新闻控制，将更多的反对派领导人投入监狱以及对示威游行进行肉体镇压——这些都突出了政府的专制主义性质。到1931年年初数月，形势变得十分危急，中央权力结构开始瓦解。

1931年7月9日，财政部长"因健康原因"辞职，整个内阁也跟着辞职，以便使伊瓦涅斯能自由行动，但他花了好几天才组成了新内阁。新任内政部长胡安·埃斯特万·蒙特罗是一名自由党人，他和财政部长一起坦率承认最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误。在这种公开鼓励下，反对派人士勇气大振，例如7月19日在全国

552

天主教学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攻击军人卷入政府而赞扬新内阁。但他的希望表示得太早了，两天后内阁因无法与伊瓦涅斯取得一致而提出辞职，伊瓦涅斯任命了另一个内阁，其成员比较接近于总统的思维方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开始形成，夜幕降临时变得更加沸腾了。在越来越紧张的局面下，新内阁中的文人成员辞职了，但7月23日组成的下一个内阁立即面对着有许多人受伤的街头示威，7月25日示威达到最高峰时许多街区发生了大规模暴力行动。接着，医务界宣布罢工，律师也罢了工，中午时银行关门，商业活动停顿。有消息说，前一天有一个名叫海梅·平托·列斯科的青年医科学生在与一群朋友宣读一份报纸时被一名想从他手里抢走报纸的警察残忍地枪杀了。正是这个事件成了与政府对抗的最后催化剂：大批专业团体——律师、医生、工程师、牙医、教师和银行职员的团体——一致要求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正在公众情绪上升时，警察又打死了一名教师。到7月26日，圣地亚哥显然已处在混乱的边缘，伊瓦涅斯迫于不可避免的形势，终于辞职。消息传出，公众欢腾雀跃，示威庆贺。圣地亚哥一家主要报纸写道："推翻独裁制度的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恰恰相反。是不可抗拒的舆论力量努力制止革命形势而恢复合乎宪法和法律的正常局面。"[22]这位作者如果能预见到在伊瓦涅斯下台后的18个月内，随着国家越来越深地陷于经济萧条，智利竟经历了不下9届政府（从温和的保守政府到坚决的社会主义政府）、两次总罢工、一次海军兵变和多次政变，他可能不会那么乐观了。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的事，此时的伊瓦涅斯流亡到了阿根廷：他现在的孤立更多地是由于客观环境而不是由于本人的气质。但是就象1925年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一样，他在1931年的黯然失色只是暂时的。他们两人对智利未来的历史都将投上长长的影子。

---

[22] 《每日画报》1931年8月24日。

553

第 16 章

玻利维亚——从太平洋战争到查科战争（1880—1932年）

1880年这一年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玻利维亚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完全败于智利入侵者之手并丧失了它的全部沿海领土。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了新政府以取代原来的考迪略政权。自从共和国创立后的半个世纪中，通过军事政变更迭政府虽然不是政治生活中的反常现象，但新政权确实标志着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根本变化。它代表了第一个具有文人寡头性质的有生命力的共和政府。尽管从1880年以至今日，直接出海口的丧失一直是玻利维亚最难解决的国际问题，但建立现代的政党制度和文人占主导的政府却引起了政治经济变革，最终甚至还有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深刻影响了玻利维亚的历史演化。

1880年后玻利维亚政治的基本稳定化和成熟化并不是与智利交战的结果，而是起源于玻利维亚经济内部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在30年前就开始了。玻利维亚在整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是一大矿产出口国，在共和国时期它出口的银和其他矿产却不多。18世纪90年代帝国经济的崩溃，1804和1805年地区性的农业灾难，独立时期（1809—1825年）内战的破坏和国际冲突，帝国关税联盟的瓦解，以及1825年后"米塔"强迫劳动制的垮台，所有这些都促使了银矿业的衰落。19世纪40年代的产量只相当于18世纪90年代的一半，到1846年，估计共和国内废弃的矿山约

有1万个，其中2/3仍含银，但已遭水淹，如果不大规模地引进资本和机器便无法生产。实际上，1846年共和国内只有282位矿主仍在经营他们的矿山，他们仅雇用约9000名矿工，其中大部分是同时务农的业余专门家。 554

除了采矿业外，国家的主要工业还有供国内或地方消费的毛纺业和食品加工业。在独立后的几年，共和国政府曾试图发展棉纺工业。但是，尽管对廉价的英国棉布有时实行禁售并一贯课以重税，科恰班巴生产"托库约"（一种粗棉布）的纺织工业再也没有恢复它在18世纪的地位。在殖民地时期，据估计科恰班巴的"托库约"工业拥有几百个生产棉布的制作工场(obrajes)，到1846年便只剩下一百个了。玻利维亚人对廉价棉纺织品的需求现在由支配市场的英国棉布加以满足了。

玻利维亚仍是一个农村占压倒优势的社会。在140万人口中，几乎有90%散居在城市和村镇以外的地区，他们生产的产品超过国民生产的2/3。在农村社会内部，庄园和自由印第安人公社之间的均势同殖民统治后期差不多。1846年有5,000多个庄园，价值2,000万比索，有约4000个自由公社，价值仅600万比索。但大部分劳动力居住在自由公社内。根据1846年人口统计，有5135户是庄园主家庭，有138,104户人家居住在公社中。有62万多印第安人以公社土地为生，他们占农村总人口的51%。庄园的佃户（或无地劳工）为数约在37.5万至40万之间，另外20万农村人口可能是南方地区的地产所有人或者是向公社或庄园租种土地的无地季节工。

虽然，庄园在商业上是较有价值的财产，但它们处在相对停滞的状态，对人口稠密的自由公社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只有两个特殊地区即高温湿润气候带和科恰班巴河谷例外。前者是古柯叶主要产地。后者似乎已从从前殖民地危机的经济震荡下恢复，现在是小麦和玉米这两种基本粮食的主要生产地。 555

表1　玻利维亚主要省份和省会人口

省份 省会	1846年	1900年	1950年
拉巴斯	412,867	426,930	948,446
拉巴斯	42,849	52,697	321,073
科恰班巴	279,048	326,163	490,475
科恰班巴	30,396	21,881	80,795
奥鲁罗	95,324	86,081	210,260
奥鲁罗	5,687	13,575	62,975
波托西	243,269	325,615	534,399
波托西	16,711	20,910	45,758
丘基萨卡	156,041	196,434	282,980
苏克雷	19,235	20,907	40,128
圣克鲁斯	78,581	171,592	286,145
圣克鲁斯	6,005	15,874	42,746
塔里哈	63,800	67,887	126,752
塔里哈	5,129	6,980	16,869
贝尼	48,406	25,680	119,770
特立尼达	3,794	2,556	10,759
总　　数	1,378,896	1,633,610	3,019,031

来源：1846年数字见何塞·M.达伦斯著《玻利维亚统计概要》（丘基萨卡，1851）。1900年数字见玻利维亚共和国国家移民局地理统计和宣传处：《1900年9月10日人口普查》（两卷，1902—1904拉巴斯）。1950年数字见玻利维亚共和国人口统计总局：《1950年人口普查》（拉巴斯，1955）。

但在自由公社内不断发生变化和大量的内部分化。徭役“米塔”义务的取消显然有利于原居民，即那些拥有土地最多的最初的公社成员。他们的人数似已增加或至少保持稳定，据估计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占自由公社总户数的35%。拥有土地的佃户（agregados）（或公社内拥有较少土地的后来者）占总户数的42%，同时，一个没有任何土地的新的重要的森林人（foresteros）集团现在占印第安家族总数的23%。显而易见，缓慢的人口增长已开始在自由公社内部产生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无地阶级。

556

由于采矿业的停滞和国家制造业无法满足当地需求，所以在建国后的最初25年内——从1825年至19世纪50年代——玻利维亚的对外贸易一直处在有逆差的不正常状态，只好靠非法出口白银和进行十分活跃的走私贸易加以弥补。政府赤字也是常见现象，因为支出、尤其是军事性支出大大超过了国库的财源。到19世纪中叶，玻利维亚的境况已不如共和国建国初年，而且看来事情还要进一步恶化。但是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内，在发生最混乱的政治动荡和暴力行为的同时，玻利维亚经济的出口部门——采矿业——却获得了稳步增长，起先是在传统的高原地区，随后是在太平洋沿岸的新地区。

这种增长的原因至今仍待作充分的说明。首先，虽然一系列玻利维亚的外部事件为唤醒这个矿业巨人起了决定性作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北美的蒸汽机不断提高生产力和不断降低成本，这意味着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蒸汽机比20年代便宜得多，也更容易买到和更加可靠。因此，开发遭受水淹的矿山的成本大为降低。同时，这个时期秘鲁和智利采矿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总的地区条件，资本和技术专家可以顺利地引入新生的玻利维亚工业。最后，国际水银价格的下跌也降低了以传统方式提炼白银的主要成本费用。

这些是19世纪第三个25年内在玻利维亚高原发展采矿业的有利的国际条件。不过，最初的资金是玻利维亚人的，而关键问题是：鉴于玻利维亚经济在它独立后的25年内处在相对停滞状态，那么这笔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从对波托西和奥鲁罗两地早期采矿公司的分析看来，这笔资金的很大部分来自生产粮食的科恰班巴河谷的商人和土地贵族。由此看来，国家人口的稳步而并不惊人的增长（尽管19世纪50年代发生了几次相当严重的霍乱病），为农业生产、尤其是为玉米和小麦创造了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科恰班巴的精英们从中得以抽取剩余资本。科恰班巴看来还有了一个初生的企业主阶级，他们甘愿冒风险对传统上十分难以捉摸的

557

采矿业进行巨额资本投资。

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采白银的本国联合股份公司普遍建立，其中最重要的一家是1832年建立的万查卡矿业公司，它经营波托西省的波尔科矿。在作了巨额投资和遇到许多困难后，这家公司在1852年由商人阿尼塞托·阿尔塞购得，他最终从公司生产中获得了利润。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阿拉马约家族买下了波托西的已破产的雷亚尔索卡冯矿业公司。最后，商人格雷戈里奥·帕切科于1855年从他的一个负债人手里接管了波托西省奇卡斯区的瓜达卢佩矿。这样，在数年之间，三个白银采矿王朝就在波托西的矿区牢牢建立起来。由于注入了新的资本和领导，这些重新组织的公司开始兴旺发达。到19世纪60年代，这三位领导人已经大大改进了经营，并通过引进现代化机器对这项工业进行长期的结构改革，从事抽水工作和竖井建设。19世纪70年代，在太平洋沿岸的卡拉科莱斯银矿也全部投产后，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开始到来。到这个10年的后半期，玻利维亚的白银开采业在投资、技术发展和效率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到19世纪70年代末，玻利维亚再次成为世界精炼银的主要生产国之一，而且一个繁荣活跃的出口工业既振兴了国内经济，也振兴了玻利维亚的国际贸易。

一个现代部门的发展不仅引起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也引起了对食品的新需求。一种新的活力进人了商品性农业地区，而新铁路线的开辟则为从前的边缘地区创造了新市场。结果，曾经象采矿业一样停滞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庄园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同时，一度是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印第安人人头税，其重要性降
558
低了，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对保护他们土地上的自由公社方面不再有既得利益。在19世纪60年代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当政时期，自由公社的土地所有权受到挑战，但印第安人进行了反抗，各公社有效地保持了对其土地的控制。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白人和乔洛人（白人和美洲土著混血人）不断增加压力，而新市场的发

展为有地的上层分子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经济动力。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公社是一种不合时代要求的土地占有制度，是社会一体化的障碍。19世纪8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迫使公社实行一种土地直接买卖的制度，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个人而不属于集体。由于创造了一个法律上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的印第安"自耕农"，庄园主就有权购买若干小块土地从而破坏公社的凝聚力，打破公社事实上对土地的控制。其余的事就简单了，既有单纯的买卖，而欺诈和强占的情况也同样普遍，不久大庄园在整个高原和相邻的次高原河谷地区便获得了大发展。

因此，从1880至1930年这一时期是玻利维亚大庄园建设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在1880年印第安公社仍拥有土地的一半和农村人口的近一半，而在1930年它们只拥有二者的不到1/3。自由公社的权力无疑已大大败落，它们仍然保留的只是一些不毛之地，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经济的停滞才使它们免于被全部消灭。

公社的逐步衰落不仅意味着失去土地所有权，还意味着失去社会凝聚力。在许多大庄园上重建了自由公社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但庄园艾柳*或政府却往往无力保护其成员不被赶出庄园。此外，庄园对劳工的需要不如从前的自由公社多。结果导致印第安人的社会规范越来越受到破坏，人口涌向城市，城乡混血种人（乔洛人或梅斯蒂索人）不断增加。唯一使印第安文化免于彻底毁灭的是印第安农民人口在整个19世纪的持续增长。虽然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一系列流行病一度放慢了这种增长，但19世纪最后25年象霍乱这类传染病的绝迹使得人口的高增长率得以继续保持。此外，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农村缺乏公共教育，广大农村人口不仅依然是文盲，而且甚至对国语也基本上一无所知。主要通用语言仍是克丘亚语，其次是艾马拉语。

---

* 艾柳（ayllus），印加社会的基本氏族单位，有时也指这些氏族的成员共同占有和耕种的土地。玻利维亚、秘鲁等地"艾柳"一词的意义，相当于墨西哥的"村社"。——译者

表2　1780—1909年玻利维亚白银生产

（以银马克*为单位）

年　　份	年均生产	最高年产量	最低年产量
1590—1599①	803,272	887,448	723,591
1740—1749②	92,119③	111,947	81,081
1780—1789	387,170	416,676	335,848
1790—1799	385,283	401,025	369,371
1800—1809	297,472	371,416	194,347
1810—1819	208,032	358,034	67,347
1820—1829	156,110	177,727	132,433
1830—1839	188,319	288,151	169,035
1840—1849	191,923	256,064	142,029
1850—1859	201,482	221,313	189,573
1860—1869	344,435③	391,204	312,171
1870—1879	955,629③	1159,776	391,301
1880—1889	1111,568③	1660,604	597,686
1890—1899	1655,762	2630,907	1202,927
1900—1909	799,791	1288,452	385,522

注：① 殖民地时期产量最高的10年。

② 殖民地时期产量最低的10年。

③ 估产数字。1859年后的生产数字都已由公斤转换成马克，转换率为230克＝1马克。

来源：1780年前的数字详见赫伯特·S·克莱因著《玻利维亚——一个多种族社会的演变》附表2（1982年纽约出版）；1755—1859年数字见埃内斯托·吕克著《玻利维亚概况手册（早期年份）》（苏克雷，1865）第170—171页；1860—1875年数字见阿道夫·索特比尔著《贵金属生产和金银间的比价值》（哥达，1879年）；1876—1891年数字见《采矿业：统计、技术和贸易》第1卷（1892）第207页；1892—1893年数字见同上，第2卷（1893）第333页；1894年数字见同上，第7卷（1898）第203页；1895—1904年数字见玻利维亚共和国国家移民局地理统计和宣传处：《玻利维亚共和国地理》（1905年拉巴斯出版）第354—355页；1905—1909年数字见瓦尔特·戈麦斯著《玻利维亚经济发展中的采矿业》（拉巴斯，1978）第218—220页。

*银马克（marks of silver），金衡单位，一个银马克通常约为8盎司。——译者

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现代化出口部门有所发展，商品性农业网和大庄园制得到引人注目的扩大，甚至兴起了现代化城市中心，但玻利维亚仍是一个以农村和印第安农民为主的国家。在1900年，至少有3/4的人口仍来自农村，在160万总人口（见上表1）中土著民族仍略多于50%。西班牙语仍是共和国少数人的语言，但它却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使用的唯一的语言。

560

1880年后玻利维亚建立的文人政府是建筑在少数人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只代表操西班牙语的人，至多占全国人口的1/4。由于对投票的文化要求以及对任职的经济限制，玻利维亚政权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少数人参与的政治制度。迄至1900年，选民人数仅有3至4万人。上层分子们关心的是将印第安群众摒于政治之外，同时不让他们获得武器或其他任何有效的抗议手段。军队，特别是在其专业化和现代化后，成了使印第安人保持顺从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并经常被召来镇压不时发生的印第安人起义。上层分子们分裂为不同政党，他们有时甚至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不过这类冲突和暴力行为是十分有限的，基本上是城市的和阶级内部的事件。上层分子极少向非上层和非西班牙语集团寻求支持，政治生活在1880～1932年这个时期大多在严格规定的规则内进行。只有一次（1899年）印第安农民被允许暂时参与一场全国政治冲突，而这次介入却以印第安首领们受到全面镇压为结局。对印第安农村群众来说，表达政治态度的仅限于传统的乡里长辈或在“争取社会地位的战争”* 中率领他们的临时性造反领袖。这是一些发生在小型公社的起义，在性质上纯属防御性，它们抗议剥削的加强，特别是对土地权的侵犯。迄至进入20世纪后好久，国家政治还只是占人口10—20%的人独享的事情。

由于文人政府的相对稳定，国民财富的增加，职业的专业化

---

* 原文是“caste wars”，可直译为“种姓战争”。这里系借用(作者加了引号)。——译者

以及学校设立了现代课程，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自独立以来一直处在停滞状态的文化生活在1880年后重新活跃起来。作家们现在建立了同仁团体，而上层家族的成员有各种机会去国外生活，并参加拉丁美洲或欧洲最近的运动。这样，玻利维亚诗人里卡多·海梅斯·弗雷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鲁文·达里奥会合，成了席卷西语美洲和西班牙文学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强大声音。像玻利维亚著名历史学家加夫列尔·雷内·莫雷诺这些作家在智利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到了工作，而像居住在巴黎的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这类小说家和散文家则闻名于整个美洲。玻利维亚人把这个时期步入成年的作家称作“19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这是共和国文化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一代，它提供了后来一切文化发展赖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从1880至1920年这一时期在许多方面都是本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国立大学的传统结构阻碍了任何真正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虽然玻利维亚的采矿工业在技术上的先进可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但它的全部机械师和工程师都来自欧洲和北美最好的学校。玻利维亚没有培养出几个本地的工程师，即使在冶金学方面也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在玻利维亚人称之为“精密科学”的领域，问题在于完全缺乏基础结构。由于预算少和缺乏专职教师，所以不可能建立科学实验室或进行系统研究。如果说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能从传统的法学、神学和医学等专业中发展出来，而这在自然科学或工艺学方面却做不到。所以，虽然在国外受训和工作的玻利维亚人确实参与了先进国家现代科学的发展，但玻利维亚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进口国。

在造型艺术方面，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天主教的同时衰落结束了殖民地时期伟大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时代。由于苏克雷取消了什一税，没收了教会的收入和财产。因而使教堂的建筑趋于停顿。由于教会和虔诚的富有公民不再提供赞助，对绘画

和雕刻的需求也随之减少。19世纪的教会还变得不那么能容忍民间的天主教主张，更不敢接受当地乔洛人和印第安人的艺术风格，并且其整个艺术格调变得极为保守。这样，在1880年后教会再次有了可观收入，并恢复重要建设后，神职人员和白人精英们摒弃玻利维亚丰富的殖民地时期的艺术遗产，而奴性十足地采用了欧洲最反动的模式。由于这些因素，玻利维亚造型艺术在20世纪前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印第安人和乔洛人也不能广泛参加国家的文化生活。

19世纪后半叶出口业的发展，特别是1880年以后20年内白银开采业的发展（1880—1899年的白银生产见表2）使得玻利维亚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势力的左右。无论是用出口矿石赚得的硬通货支付货款的制成品进口商，还是已经完全依靠从国际贸易获得税收的政府，现在都同出口业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出口业则越来越受国际需求波动的影响，而且越有成就越受牵制。因此，政府、矿主和国家精英都受着国际束缚，从而造成了他们难以控制的不稳定问题。

玻利维亚是开放经济的一个典型事例。由于国内购买力大部分来自主要矿业部门，它极易受初级出口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即使是采矿业，晚至20世纪，它也是一种由单一金属占支配地位的经济——1900年前是白银，之后是锡。因此，世界价格变动对当地经济有立即见效的直接影响。有势力的地区精英分子可能由于国际价格的突然变动而在一夜之间被消灭，结果破坏了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基础。玻利维亚人学着习惯于这种不稳定性，并试图尽可能快地对新的价格变动作出反应。但是，自然资源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能作出的反应也是有局限的，并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未必能得到长期发展。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明在1880年以后时期担当主要政治领导人的矿主们的行为。

这个新的矿业精英阶层为了打破政府对国外销售和对当地强

制收购的垄断，最初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后，不久便开始作为一个563更一致的压力集团进行活动，以便使政府进一步满足他们的要求。正当他们的银矿全面投入生产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开始长期地缓缓下降，因此，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不得不经常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这就需要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电力，特别是要使运输现代化，这是采矿流程中最花钱的部分。矿井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是玻利维亚矿主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运输问题却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政府补贴和国际资金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矿主们希望建立稳定的文人政府，用政府的财力从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

在太平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和辩论导致了玻利维亚各政党的建立。对玻利维亚矿主们来说，1879年战争的爆发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致命地掐断了他们来自智利的新的资本来源，并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他们责怪前几届军政权引起了战争，同时聚集在两个关键人物——矿业公司律师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和玻利维亚最大的矿主阿尼塞托·阿尔塞——的周围，组织了一个强大的亲智利的和平党。后来该党全力支持开明的纳西斯科·坎佩罗将军，这位将军曾在1879年12月协助推翻了达萨军政权，接着指挥收拾了玻利维亚已处于劣势的战争残局。玻利维亚的矿主们谋求迅速结束与智利的冲突，并将所有割地赔偿费完全用于铁路建设。与此同时，反对智利、反对和谈的人们则合力支持深得人心的埃利奥多罗·卡马乔上校，他是反达萨起义的领袖，也是一位主要的自由派理论家。这样，在战争结束前就出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它们被认为在思想意识上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以拉美其他类似政党为自己榜样的保守党只是稍稍有些亲教权。自由党虽然强烈反对教权，但已被玻利维亚第一届共和政府国有化的玻利维亚教会力量太弱，不足以成为引起严重冲突的根源。实际上两党都将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问题。

坎佩罗将军任满了他的法定任期，并在1884年主持了完全自

由的选举。经过国会第二次计票后，最后的得胜者是玻利维亚第二大白银生产者、无党派矿主格雷戈里奥·帕切科。帕切科挑选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作为他的副总统，开创了从1884年至1899年的以“保守党寡头政治”著称的时代。在这期间，两党充分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同时历届政府集中力量与智利达成和解，并促进重要的铁路建设。 564

帕切科虽然保证在1888年的大选中保持中立，而实际上保守党政府支持了阿尼塞托·阿尔塞。结果，1888年的选举变成了一场暴力事件，感到忿恨的自由党人最后干脆弃权。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中又恢复了使用暴力。当时采取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所有政府——不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后来的自由党政府——都拒绝将总统职位让给反对党。一旦就任了官职并登上了除采矿和大庄园之外唯一大财源的近水楼台，政客们便不愿放弃政府的肥缺。所有选举的投票都是公开的，容易被中央政府派往各地的人所控制，而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胜负也都容易操纵。执政党在国会内确保多数，但它的确也允许反对党在国会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席位，以便提供一种容易维持的安全阀，它不会严重威胁执政党对政府部门的控制。但总统的地位必须不惜一些代价加以保证。因此，在整个保守党和自由党时代，政治暴力事件司空见惯。但应指出，这类暴力事件通常只限于平民和文职人员，限于城市，并且很少流血。暴力事件似乎也只限于选举以后的一段时期，被击败的反对党以及感到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的大多数投票人。政变的传统仍是政治画面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但它们不一定代表文人统治的崩溃或政治生活的不稳定。后来的关于玻利维亚的评论家可能会计算叛乱的次数，并认为发生了彻底的破坏，而实际上从1880至1936年这个时期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虽然间歇地采取有限的暴力。

阿尼塞托·阿尔塞担任总统期间（1888—1892）受人称道的是，他首先提出了兴建铁路把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港同拉巴斯城

565 联结起来的重大倡议。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玻利维亚有机会通过铁路而获得出海口，并开始建立现代化的道路网。阿尔塞可以说是保守党政权中最富有成效的，他在使军队专业化和控制军队方面也起了作用。1892年举行的又一次充满欺骗行为的选举使保守党的思想家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登上总统宝座。巴普蒂斯塔（1892—1896）像他的前任一样大力进行铁路建设。他还同智利签订了一项初步和平条约，并着手在阿克里地区开发玻利维亚的天然橡胶资源。最后，巴普蒂斯塔将总统职位交给了最后一个保守党寡头——矿主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阿隆索（1896—1899）。但此时，牢牢盘据在南方银矿区和苏克雷市的保守党政权的势力由于世界市场银价的暴跌而不断受到削弱。相反，自由党的力量则不断在增长，因为他们联合了拉巴斯新兴的城市自由职业者阶级，联合了除银矿外的其他采矿集团，特别是新的锡矿矿主，他们的目标是要取代保守党寡头政治。

锡矿生产最初是在保守党时代发展起来的，1900年后它上升为玻利维亚首要工业。在现代的白银开采业的伟大年月，玻利维亚获得了最新的采矿技术，包括使用动力工具和电力。与此同时，白银巨头们和他们的保守党政府把交通现代化当作他们的首要任务；特别是，他们修筑了一个将采矿地区和太平洋沿岸联结起来的十分重要的铁路网。

当银矿业由于国际市场问题而衰落时，原有的技术和交通可转用于其他金属的生产。由于世界上对锡的需求的一次意外膨胀（由于制作罐头和其他上百种的工业用途），加上传统的欧洲锡矿已经枯竭，使得玻利维亚能利用它的资源，并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自古以来，锡一直是开采白银时的一种重要副产品。但是主要由于玻利维亚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原始，因此运费高昂，一直阻碍着大量运往欧洲冶炼厂。如今有了便宜的铁路运输，出口锡对玻利维亚突然第一次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同样，由于锡可以566 在与银同样的采矿区找到，而且常常就在同一个矿里，因此由采

银转为采锡相对地说不会引起什么经济或社会混乱。

表3 1900—1939年玻利维亚锡产量

（单位：公吨）

年 份	平均年产量	最高年产量	最低年产量
1900—1909	14,909	21,342	9,739
1910—1919	24,710	29,100	21,324
1920—1929	33,216	47,191①	19,086
1930—1939	25,864	38,723	14,957②

注：① 1929年。 ② 1933年

来源：瓦尔特、戈麦斯：《玻利维亚经济发展中的采矿业》（拉巴斯，1978年）第218—220页。

对于传统的银矿业精英们来说，这种过渡就不那么容易完成了。首先，锡矿开采的发展带有突发性，在不到10年之内产量由极低的水平一下提高到进行大规模出口。虽然总的采矿区域同从前一样，但重点发生了细微而重要的北移，波托西北部和奥鲁罗南部的矿山在生产上现已占主导地位。最后，这次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而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又那么巨大，许多银矿老板感到很难转向锡矿生产。结果，外国公司蜂涌地进入市场，同时一批新的玻利维亚企业主首次出现在国家舞台上。

所有这些变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引起了重大转折。盘据在波托西及其支撑点苏克雷城的老保守党精英们发现他们无法遏制反对党自由党的发展。同时，拉巴斯城市的巨大扩展——它现在成了新的采锡工业的主要服务中心——又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这在1899年导致了自由党和地区力量的一次联合起义，当时拉巴斯以自由党人为主的精英们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和推翻保守党统治。

1899年的起义实际上是一次代价相当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567 由于难以取胜，所以自由党打破常规而鼓励印第安农民群众参加。一些印第安人集团因此而暂时地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这是自共和国成立初年以来的第一次。可是自由党一经取得胜利后，随着拉巴斯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首都，不仅联邦制被忘得一干二净，印第安部队也被解除武装，他们的领导人则被处决。

这样，玻利维亚在进入新世纪后，就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创造了一个新采矿业。自由党政权与保守党政权在基本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两者都保证给运输部门以大量政府补贴，大力支持采矿业及其城市中心的发展和现代化。两者都积极设法摧毁印第安人的公社和扩展大庄园制。最后，两者都对教会问题漠不关心，而这个问题在其他大多数拉美国家曾引起了严重冲突。

在自由党时代，政治参与的老格局继续存在。国会选举仍比较自由，而总统选举则受到控制，相应地会采取有限的暴力，因为这是"在野"政客获得这个行政职位的唯一手段。新闻公开性和公民自由权（对白人和乔洛人）得到保持。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政治领导。锡矿矿主们忙于处理自身的事务，不可能直接参加国家生活，这反映了新的采矿业时代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保守党对教育和专业化的有计划的支持已经制造出一个律师阶级，他们人数众多，经验丰富，足以管理政府事务。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的政治分析家所称的"罗斯卡"(rosca)，即由专业政客们组成的政府，它主要为国家的首要锡矿大王们的利益服务。经济势力集团现在不再需要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直接干预政治过程。锡矿矿主们可以集中全部精力为在玻利维亚的锡矿业中占支配地位而进行激烈的富有竞争性的斗争。

锡矿业对外国投资不加限制；从锡矿业繁荣的一开始，玻利维亚便向来自国外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主和工程师开放。为了控制锡矿业，欧洲、北美、甚至智利资本同当地的玻利维亚资本家进行了竞争，建立了几百家公司，其中有许多公司常常开采着当地同一个锡矿矿山。因此，也许令人惊讶的是，经过30年的激烈竞

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玻利维亚人终于成为这项工业中占主导的集团。

在三大领袖中，最有力量的无疑是西蒙·I·帕蒂尼奥。1860年帕蒂尼奥生于科恰班巴，似乎来自一个工匠和半混血人家庭。他在当地接受了中学教育，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时银矿业仍很兴旺），他在各种采矿和矿山设备进口公司当学徒。1894年，他首次购买了奥鲁罗一个锡矿的股份，这个矿坐落在波托西省边境的温西亚镇。到1897年，帕蒂尼奥已经购买并完全控制了这个矿；1900年，他发现了玻利维亚所曾发现过的最丰富的锡矿脉之一。到1905年，他的拉萨尔瓦多拉矿已成为玻利维亚最大的锡矿，他拥有整套班子的外国技术人员和最先进的冶炼设备。帕蒂尼奥从这些最初的投资开始，迅速扩大他纵向的和横向的资产。他在1910年买下了与他相邻的英国温西亚矿业公司；1924年他又购买了智利亚亚瓜公司，从而完成了他对温西亚和拉拉瓜两个采矿中心的统治。当时他已拥有超过1万工人的劳动力，控制着约50％的全国生产。

同时，帕蒂尼奥把注意力转向采矿业务的纵向联合，并着手去控制他的欧洲冶炼商，这在拉美资本家中间是罕见的。他与他在北美的用户们通力合作，终于在1916年接管了世界上冶炼玻利维亚锡的最大公司——利物浦的威廉斯—哈维合伙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初，帕蒂尼奥便在国外定居，至此他可以更确切地被称做是一个欧洲资本家了，因为他在玻利维亚国外拥有巨额财产。尽管如此，在他于1943年去世前，他仍是玻利维亚的主要矿主，该国的首要私人银行家和最有势力的资本家。

总产量的其余一半由另外两位最主要的锡矿矿主均分，其中的一位也是玻利维亚人，属于老的从事白银开采业的阿拉马约家族；另一位是欧洲犹太人毛里西奥·霍赫希尔德。无论阿拉马约还是霍赫希尔德的公司都拥有大量欧洲资本投入，但与帕蒂尼奥公司不同，它们都基本上是在玻利维亚本国经营的。霍赫希尔德

569 虽在智利有一些投资，但他毕生主要居住在玻利维亚，这里也是他投资的主要地区。玻利维亚也是阿拉马约家族的主要活动区。所以，到20世纪30年代，控制锡的生产以及很大部分铅、锌、钨和其他当地矿产的这三大矿主主要以玻利维亚为基地，或者像帕蒂尼奥的公司那样，全部属玻利维亚国民所有。鉴于自19世纪中叶以来玻利维亚采矿业已完全向所有外国企业家开放，玻利维亚国民能取得这种控制地位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帕蒂尼奥和其他新的锡业巨头们不再直接卷入国家事务，玻利维亚政治就让给了一批由新兴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各省地主代表组成的精英们（那些地主的代表拥有的土地不多，农民也较少，但有深厚的社会背景）。这些人几乎都经过法律训练，他们一方面都深信议会制政府和宪法法律的自由主义观念，又强烈主张等级制和白人寡头统治。

尽管最近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变化，玻利维亚的社会结构却意外地保持了稳定。根据1900年人口统计，只有13%的人口被列为“白人”。同样，人口统计虽表明自1846年以来城市人口有很大增长，但这是因为把城市的定义泛指任何超过200人的社区之故。如果使用较符合实际的超过2万人为城镇的定义，那末就没有发生什么重要变化。自1846至1900年，居住在这类城镇的人口比重由6%仅增加到7%。即使是最大城市拉巴斯，1900年的人口也只增长到约5.5万人，比半个多世纪前增加1.2万人。虽然新矿的开采在奥鲁罗南部和波托西北部形成了若干新市镇，拥有1.3万名工人的繁荣的采矿业在1900年也仅吸收了1%的经济自立人口。

因此，玻利维亚虽然发展了一项新的出口部门，扩大了一批新的精英分子（包括白人和混血人），农村地区印第安人的土地占有制度虽然普遍崩溃，但玻利维亚却使人惊讶地保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因此，自由党对于分裂这个多民族社会的严重的阶级与等级问题，并没有多少紧迫感。

自由党的首任总统是何塞·曼努埃尔·潘多（1899—1904），

他是该党处在反对党地位时的伟大领袖。一旦执政，自由党便几乎采用了保守党的全部政策，例如：彻底摒弃联邦制。不过，潘多政府最出名的是它放弃了传统的国际地位和丧失了国土。两大国际灾难的第一难是阿克里争端。阿克里地区位于盛产橡胶的亚马孙河流域的中心，与巴西边境接壤，居民主要是巴西移民。当最后一届保守党政府在阿克里河的阿隆索港设立了一座海关，并对运往巴西的橡胶收取巨额捐税时，当地的橡胶农举行起义。自由党政府派军队到遥远的东方低地去镇压起义，但巴西暗地里支持造反者，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坚持抵抗。结果，玻利维亚军队遭到彻底失败，按照1903年彼得罗波利斯条约，阿克里地区以250万镑的代价被巴西兼并。

自由党政府曾在阿克里领土问题上进行了抗争，但失败了。智利战线的事态远不那么咄咄逼人。自由党政府在这里大大超过了它的保守党前任们曾建议的最极端的让步，企图以此获得资金和消除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上敏感的争端，因为它认为这个争端分散了国家资源。自由党改变了原先的收复失地的立场，不再要求无条件地收回太平洋战争时期被夺走的领土，于1904年同智利签订了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玻利维亚同意割让它在太平洋沿岸被夺走的全部土地，放弃它获得一个太平洋港口的要求。相应地，智利则同意建筑一条从阿里卡到拉巴斯的铁路，提供30万镑的正式赔款，为玻利维亚国内铁路建设贷款提供担保，并放弃它与玻利维亚贸易上的特殊的最惠国待遇。条约虽然形式上解决了太平洋沿岸的领土问题，实际上这件事至今仍是安第斯国际关系中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当时，有关阿克里和智利的两个协议使自由党在国际战线上得到了相对的和平并获得了广泛的财政支持以继续执行铁路建设计划。

自由党时代的第二个总统是伊斯梅尔·蒙特斯（1904—1909）。蒙特斯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他代表了新一代的城市中产阶级政治家。由于他性格坚强加上政治上机敏，他得以有效地防

止了一个由“在野人士”组成的反对党的兴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锡的出口不断增加（见表4）所带来的经济初步繁荣有助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这种繁荣为国家提供资金扩大了官僚机构，反过来，他则对此加以利用去收买潜在的反对派。

571

572

表4　1895--1930年玻利维亚对外贸易

（单位：1000现值博利瓦诺）

年　份	出　口	矿物比价 (%)	进　口	差　额
1895	20,914	不　详	13,897	7,017
1896	22,047	不　详	12,952	9,095
1897	21,990	不　详	12,457	9,533
1898	27,457	不　详	11,897	15,559
1899	27,366	不　详	12,840	14,526
1900	35,658	(67)	13,344	22,314
1901	37,578	(72)	16,953	20,625
1902	28,042	(79)	14,143	13,898
1903	25,162	不　详	16,253	8,909
1904	31,465	不　详	21,137	10,328
1905	42,061	不　详	27,870	14,191
1906	55,155	不　详	35,810	19,344
1907	50,332	不　详	37,898	12,434
1908	43,786	(89)	40,808	2,978
1909	63,764	(64)	36,940	26,825
1910	77,622	(72)	48,802	28,820
1911	82,631	(76)	58,371	24,260
1912	90,123	(81)	49,509	40,614
1913	93,722	(82)	54,763	38,959
1914	65,801	(85)	39,761	26,040
1915	95,210	(86)	22,575	72,636
1916	101,485	(81)	31,098	70,387
1917	157,748	(87)	33,481	124,267
1918	182,613	(91)	34,970	147,643
1919	144,252	(88)	61,997	82,254
1920	156,019	(91)	65,340	90,679
1921	66,920	(91)	70,853	−3,934

续表

年 份	出 口	矿物比价(%)	进 口	差 额
1922	94,770	(94)	49,967	44,802
1923	107,694	(94)	62,915	44,779
1924	115,191	(95)	62,863	52,328
1925	109,286	(90)	68,665	40,621
1926	122,681	(92)	70,831	51,850
1927	127,084	(92)	96,105	80,979
1928	116,073	(93)	64,391	51,683
1929	140,007	(94)	71,417	68,590
1930	100,306	(93)	52,442	47,864

来源：戈麦斯著《采矿业》第191—192页；第208—209页；玻利维亚共和国国家移民局地理统计和宣传处：《玻利维亚共和国统计和地理概要》(三卷集，拉巴斯，1903—1904）第二卷，第294、300页。

此外，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也使自由党新时代深得全国精英们的青睐。由于有了扎扎实实和数量可观的外贸顺差，蒙特斯得到了国际私人银行为政府贷款提供的资金。1906年来自美国私人银行的一笔巨额贷款使玻利维亚得以完成将通向内地主要城市科恰班巴和苏克雷的支线同国际铁路接轨以及将波托西和奥鲁罗采矿中心与国际线路联结的工程。还修筑了一条通向的的喀喀湖滨的瓜基的新铁路，从而与秘鲁的铁路网相联接。重要的城市建设，卫生和照明工程以及普遍高涨的经济活动一直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爆发1913—1914年危机为止。

蒙特斯成功地挑选了他的继任者埃利奥多罗·比利亚松，然后又在1913年使自己再度当选。但第二届蒙特斯政府（1913—1917）却不像第一届那样一切顺利。自由党想建立一家国家银行的努力遭到一些重要精英分子的强烈反对。接着，战前国际贸易中突发的危机导致1913—1914年间矿物出口减少了1/3(见表4)。与此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引起了严重的农业危机。随着政府收

入的下降，蒙特斯突然发现自己在党内受到顽强反对并且无法进行收买。此外，他久已大权在握，无意多费谋略加以平息。结果，自由党几乎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为两个集团。新出现的党起名为共和党，并于1914年正式成立。

蒙特斯和新党创始人丹尼尔·萨拉曼卡都认识到这个新政党实际上是自由党的复制品。它的力量来自同样一些阶级；它毫不犹豫地支持矿业公司的一切要求；同时，它像它的对立面一样主张种族主义和寡头政治。蒙特斯把共和党人称作自由党"变节者"，萨拉曼卡则声称他的党的目的不过是保证自由选举和限制总统权力。玻利维亚恢复两党制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出现了秘密交易和充满欺诈的总统选举以及反对党终于采取暴力和发动政变。

57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玻利维亚出口的恢复（见表4）使蒙特斯得以贯彻他的银行和财政改革而没有受到共和党多少反对，甚至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还赢得了共和国约8万投票人的广泛支持。1917年，他将政府交给了一位更温和的继任者——何塞·古铁雷斯·格拉，此人却没有能控制住共和党人。在实业界的不满分子的有力支持下，共和党进展很快；当古铁雷斯·格拉试图控制1920年的选举时，共和党起来造反并获得成功，从而结束了自由党的统治。

共和党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34年。它的建立给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带来了细微而重要的变化。国家政治开始从简单的两党制向多党制演变。与此同时，继承了19世纪自由派意识形态并受到强大的种族主义因素支持的文化标准，也开始缓慢地改变。最后，由于国民经济异乎寻常的开放性，玻利维亚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感受到世界大萧条的全部效应的国家之一；这次大萧条是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后发生的。

曾经列为保守党和自由党时期政绩的经济增长起初只影响了某些精英集团。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增长便开始对乔洛人和印第安人产生重要效果。大庄园的扩张导致与印第安公社成员

越来越多的土地冲突，而这又导致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重大反抗。对精英们更有直接意义的是玻利维亚组织了第一批现代工会。虽然组织活动可追溯到19世纪，玻利维亚在鼓动和组织工人方面比它的邻国晚了几十年。直到1912年才第一次举行了庆祝"五一"的活动；直到1916和1917年才成立了当地的城市工人联合会。1920年以前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全国性罢工。

20世纪20年代，精英分子们逐渐认识到在他们的政治舞台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要求，存在着具有潜在威胁的集团。随着共和党时代的政治生活变得更为复杂，玻利维亚出现了一些小党派，它们首次严肃讨论了阶级冲突的问题和潜势。20世纪20年代还目睹了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作家渗入玻利维亚后的第一批骚动。

574

共和党在夺取政权后，几乎立即分裂为两个对立派系，一个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包蒂斯塔·萨阿韦德拉领导，另一个由科恰班巴的大庄园主和政客丹尼尔·萨拉曼卡领导。1921年萨阿韦德拉和他的追随者夺得了主动，控制了政府和党。萨拉曼卡和他的支持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真正共和党"，继续积极进行反对新政权的鼓动。

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暴力和社会冲突比以往几十年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激烈。萨阿韦德拉刚一上台，的的喀喀湖地区的赫苏斯—德马查卡就爆发了大规模印第安人起义，并导致几百名印第安人和几十名白人与混血人被杀。萨阿韦德拉毫不犹豫地用全力镇压起义，攻击公社政府（"艾柳"）是反动机构，必须用武力镇压。他在印第安人问题上于是采取了典型的19世纪自由派的立场。

但是，萨阿韦德拉在劳工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比较开放。他开始将它看作是能获得潜在支持的重要领域，因为他在上层和中等阶级中的基地由于真正共和党和自由党的反对而受到了损害。他主动提出了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劳工和社会立法，并表示

愿意支持有限的罢工活动和工会化运动——这是一位国家总统从来做过的。但是，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罢工活动，包括在矿区进行的积极鼓动和1922年发生的第一次总罢工，萨阿韦德拉很快收回了他的试探性支持。事实上，1923年还使用军队对温西亚的矿工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是许多次对矿工大屠杀中较早的一次。

20世纪20年代是其他精英分子开始逐渐采取非传统立场的时期。1920年各地建立了第一批社会党。1921年末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党，它虽然是个只得到极少数工人支持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但已开始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印第安人的被奴役问题，法律上承认印第安人公社政府问题，工人和妇女权利问题等。这些思想对玻利维亚来说是新的革命的，而在玻利维亚的所有邻国（包括秘鲁），它们是已确立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比方说，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的著名分裂以及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南美的兴起都没有在玻利维亚得到响应。直到20年代末，玻利维亚甚至没有产生出一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党，而共产党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成立。

这些早期的工人运动在很多方面与20年代初短暂而十分厉害的萧条有关系，这次萧条造成了矿业生产和矿产出口一度严重下降（见表4）。1922年末生产一旦恢复，劳工运动便开始低落。此外，萨阿韦德拉发现新生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虽然最终建立了它第一批全国联合会，产生了它第一次总罢工，但对他的政权的支持太无力。下层中等阶级则因为第一次发现温和的社会立法对他们有利，所以支持萨阿韦德拉。但是由于他强烈的个人专断，势必酿成自由党人和真正共和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政权，而他也自感越来越难以统治下去了。为了寻求广泛支持，他转向外国私人资本市场以获得推动重要发展项目的资金。他在纽约谈妥了一笔3,300万美元的私人银行贷款，用于资助铁路建设、公共工程和国家银行。这些过去都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传统关心的部门。可是玻利维亚的债务负担已经很重，这次贷款的条件——包括由美

国直接控制玻利维亚税务——对大多数玻利维亚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实际上，玻利维亚谈判代表们无疑接受了贿赂，因而尽管国家信誉极好，仍被迫偿付很高的利率。这笔所谓的“尼科劳斯”贷款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

火上加油的问题是，萨阿韦德拉也试图以蒙特斯的专横态度解决围绕玻利维亚东部低地区域石油特许权问题的大辩论。1920年，在玻利维亚企业家已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开发生产性油井以后，共和党将保留区向外国人开放。1920和1921年，一些北美企业获得了特许权，但这些小公司不过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人，1921年时政府就允许该公司购买了这些特许权，并增购了新的特许权，建立了玻利维亚标准石油公司。由于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各种特殊待遇加上精英分子对萨阿韦德拉的激烈反对，舆论鼎沸就势在必然了。

576

在一般的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和总统大权独揽等问题之外，萨拉曼卡和他的更保守的追随者们又增加了一个崭新的主题：经济民族主义。在石油方面的第一个特许权给了外国公司后，玻利维亚便几乎立即有人起来反对由外国公司开发自然资源。尽管人们在采矿业方面并没提出反对，而且古根海姆和其他北美公司已积极参与了玻利维亚经济，但石油却成了特殊问题，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攻击成了玻利维亚传统的右翼和新生的左翼运动都要唱的一个调子。

在他任期结束前，萨阿韦德拉拼命企图安抚各派。一方面，他在1923年6月帮助矿主们粉碎了温西亚的罢工，滥肆屠杀工人和工人家属。另一方面，1923年底他对矿业税结构进行了一次重大修改，将政府对锡生产的税收增加了一倍。帕蒂尼奥十分恼怒，1924年初他把他的矿业公司总部从玻利维亚迁到美国，并在特拉华组成帕蒂尼奥矿业和企业公司，他还借给政府60万英镑用于铁路建设，作为回报，政府保证5年内不再进一步增税。

萨阿韦德拉尽管竭力企图控制他的继任人，甚至企图延长任

期，但还是不得不在1925年底将政权交给了他自己的党的候选人埃尔南多·西莱斯，而他是反对此人的。之后一个时期，各传统政党进一步分裂。鉴于萨阿韦德拉对共和党进行控制，西莱斯创立了他自己的民族主义党集团。他支持大学改革运动，1928年激进学生们建立了第一个玻利维亚大学生联合会（FUB）。社会主义者和大学生联合会虽然仅是一些小股知识分子，但都提出了激进的改造社会的建议，都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和结束"封建主义"。他们主张将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国有化和修改私有财产的定义，并大力支持新生的劳工运动。

正当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更复杂的阶级意识冲突的情景时，玻利维亚经济也开始恶化到了惊人的程度。1926—1929年，政府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越来越难以承受它的国际债务负担。发生这种情况时，正值国际市场上锡价已经度过高峰期并开始长期下跌，直至跌进了世界大萧条的深渊。为了应付这一当时其程度尚是未知数的危机，政府采取了传统的、有些则相当激进的措施。1927和1928年，政府在有了特设的税收保证后，获得了新的美国私人银行贷款。1928年，政府实行了美国克默勒代表团建议的改革，终于建立了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以监督国家货币供应的各个方面。1928年底，在与乌拉圭有争议的查科边境爆发了一场短时交火，它预示着更激烈的冲突即将到来，西莱斯不得不动员后备队并命令进行报复。但他并不希望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1929年初他和乌拉圭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和解决议"。

577

政治上，西莱斯已经表现出他过于墨守成规，不可能允许民主力量自由行动。与乌拉圭发生的边境事件给了他宣布正式戒严的口实，并利用它来控制他的国内敌人。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促使自由党人、真正共和党人和共和党萨阿韦德拉派组成了暂时的联合阵线。

与此同时，国际上锡价的恶化已产生影响。1929年玻利维亚出口锡的数量达到创纪录的4.7万吨，但出口价却低于这个10年

中的最初几年。据查1927年锡价每吨917美元，1929年降为每吨794美元，最后在1932年跌到每吨385美元的最低点。随着锡价下跌，主要来自锡的出口税的政府收入也减少了。到1929年，政府预算的37%用于偿付外债，20%用于军事支出，用于政府必要开支的经费已所剩无几，更不用说公共设施和福利了。

为了证明在国家存在危机时他的行动无咎可引，西莱斯像其前任们一样，试图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后继续留任。1930年年中，他宣布了要议会选举他出任新一届总统的计划。而后他把政府交给一个军政委员会以监督他的再次正式当选。但是这一步遭到了普遍反对。大学生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举行了反政府的大骚动。军队起而响应，发动了叛乱，军政委员会成员被迫逃离（最混乱时，甚至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入侵了南部边境的比亚松镇。他们企图领导一次工农起义，这个行动在城市劳工运动中得到了一些响应）。

578

几个月后，各党派取得协议，允许丹尼尔·萨拉曼卡在无对手情况下参加1931年1月的总统竞选。萨拉曼卡于3月就职，但他是一位比萨阿韦德拉或西莱斯更不能适应学生和劳工阵线新发展的政治家。他是来自科恰班巴的农村地主，一位著名的议会演说家，也是一位极端狂妄固执的19世纪式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当前纲领仅仅是实行廉洁政府和自由选举，即使是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口号他也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很快违背了。

这个基于极少数人参政的寡头式共和国政府是19世80年代由保守党建立的，1900年后由自由党保持；显然，到1930—1931年这个政府已开始解体。世界萧条以无以伦比的严厉程度打击了玻利维亚的开放型经济。锡价大跌，生产下降，政府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偿债付利几乎全部税收都作了抵押，从而使政府不仅失去了新的创收能力，甚至无力为最低需要找到资金。统治阶级政治思想上微妙但显然很重要的转变也开始被人们所觉察。在国家政治中，大学生的改革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次带进

了白人精英们的家庭。劳工运动开始以更剧烈的罢工活动令全国瞩目，导致军队干预矿山和公开的战争。在这动荡时期唯一保持相对沉默的民众阶级是印第安农民，他们在前10年一直是非常难驾驭的；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起义——一次是1921年在赫苏斯—德马查卡，还有一次是1927年在波托西省的查扬塔——都遭到镇压，伤亡不少。

大萧条在许多方面使萨拉曼卡政府得到缓解。大批工人失业迫使许多矿工回到农村和从事自给性农业，同时，大萧条还摧毁了组织软弱的劳工运动的大部分成果。随着大庄园扩张伟大时代的结束和对农村土地占有的巨额投资的终止，印第安农民变得更 579 加消极了。另一方面，大学的青年们不愿悄悄地销声匿迹，大萧条引起了更大的政治觉醒，对比，萨拉曼卡除了镇压外便不知所措。用南美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玻利维亚的激进主义是软弱和比较单纯的，比一些邻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了一两代人。但是，与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人不同，萨拉曼卡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再拒绝听取这些人的想法，这就迫使这些起码的激进和改良主义分子们不得不同传统政治制度进行更猛烈的对抗。不过，这些人仍只占精英社会的一小部分，假如玻利维亚没有在丹尼尔·萨拉曼卡领导下发生它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他们本来绝不会成为威胁。查科战争提供了关键的破坏力，他使1880—1932年的传统制度最终遭到摧毁。

战前危机的起源要追溯到1927年开始的锡价的下跌。到1929年时，未售出的锡的库存也不断增加，这又进一步使价格跌落。此时，玻利维亚和另外三个产锡区（尼日利亚、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共提供了世界产量的近80%。在这四个生产者中，玻利维亚的矿石品级最低而运费最高，所以是成本最高的锡生产国。因此，它首先感受到〔萧条的〕冲突波，并发现它不可能迫使其他主要生产国自愿削减产量，因为按玻利维亚人的最低价格出售时，

它们仍能获得一些利润。1929年7月，在帕蒂尼奥敦促下，在四大生产中心经营的私人公司成立了自发的“锡生产者协会”。它们一致同意削减生产，对此，玻利维亚的三大公司在1929年底和1930年初全部积极贯彻。但是，那些非玻利维亚人的公司却不照办，结果到1930年年中，这项自发计划便被认为是告吹了。

在自由市场条件难以承受而自发限制又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生产者们在1930年底采取激烈步骤：要求政府参与生产控制计划。鉴于私人矿主们从前曾强烈反对政府对私人企业的任何形式的干预，这是一次重大和突然的变化。玻利维亚政府第一次被授予了不仅是对这项工业征税的权力，还有控制生产定额的权力，而这在以后几十年中将导致对国外销售的控制。显然这是主要生产者们的一次拼搏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对使他们受影响的政府决策保持直接控制。但同样地，它使政府首次能够真正有力地干预采矿业事务。对定额达成大致的协议，所有公司的生产计划都被大大缩减，然而，尽管如此，这却意味着如果它们的市场定额因政府命令而加以改变的话，任何一家公司都可轻而易举地迅速增加生产。这一下在三大矿主之间的关系中突然注入了一种特殊的紧张因素，将他们的竞争性冲突带到了政界势力圈内。大矿主们开始对当地政治舞台给予了比过去一些时候直接得多的关心，他们还开始支持精英分子本身内部的各种不同派别。 580

由于此事只牵涉到三国政府——玻利维亚、荷兰和英国——制订一项硬性规定的定额生产制度看来是可行的，所以1931年初成立了“国际锡管理组织”。1931年3月1日即新一届萨拉曼卡政府就职前几天，定额制开始生效，玻利维亚的生产大幅度削减，为共和国造成了一次大的内部经济危机。虽然这项限制生产的计划终于减少了全世界未出售的锡库存，并最终稳定了价格，但直到1933年以后玻利维亚的生产才慢慢开始恢复到中等水平。

所有这些国际变化和对当地经济产生的冲击都受到玻利维亚精英们的密切注视。临时政府（1930年6月至1931年3月）试行了公

共工程规划，并完全支持帕蒂尼奥的一切生产计划。它还将预算支出削减到最低限度。同时对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试行的各种国家复兴工程也给予了认真注意。在参加这次关于国家经济的辩论的所有团体中，自由党人提出的建议最具体。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建议政府进行认真干预。但是萨拉曼卡似乎忘掉了全部争论。在他多次被问到他的经济思想时，他含糊其词地答称需要建立廉洁政府。这种空泛的思想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时期可能是会被接受的，但在当前形势下则毫无意义。结果他的真正共和党在1931年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遭到惨败，新国会落入自由党之手，他们获得了绝对多数选票。古板的萨拉曼卡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怀有敌意的完全不受他控制的国会，一种他不甚了了的经济，以及一个身患沉疴而他却一筹莫展的社会。

581

萨拉曼卡就职后几乎立即就开始疏远社会上的大多数主要集团。由于经济危机的结果，前届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了萨阿韦德拉和西莱斯时期的温和改良和特别关心福利的政策，而萨拉曼卡政府恢复了从前僵硬的正统观念。萨拉曼卡还使他的政府成为一个党派性偏见极强的政府，从而疏远了一些传统的精英分子政党，尽管他的政府是在所有政党支持下上台的。

尽管自由党人控制着国会，尽管人们呼吁建立和解政府以应付经济危机，萨拉曼卡的首届内阁却全部由真正共和党人组成。接着，他向颇为吃惊的公众宣布说，国家面临的第一位问题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20世纪20年代激进团体和共产主义团体虽然已经在国家生活中确立了他们的地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处于边缘的极少数，即使在大学青年运动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亦如此。这种“赤色”威胁的困扰对一位传统政治人物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现象。不仅如此，萨拉曼卡在劳工问题上将政府的政策由采取温和中立立场激烈地改为公开敌视的政策。合法的电报工人工会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罢工，不仅遭到萨拉曼卡的反对，而且工会也被解散，而拉巴斯工人联合会的一次同情总罢

工也遭武力镇压，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接着，政府宣布，由于预算赤字之故，政府雇员的工资将用期票支付；1931年7月底萨拉曼卡宣称，玻利维亚将延期偿付外债。

随着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萨拉曼卡开始对查科边界问题给予更多得多的注意。他为军事上向查科地区渗透详细拟订了一项任何一位玻利维亚总统所不曾设想过的最野心勃勃和最耗费的计划。它代表着国家政策从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立场向基本上是进攻性的立场的重大转变。1931年7月1日，萨拉曼卡利用一次典型的边境事件断绝了同乌拉圭的外交关系。随后，他在8月所作的总统讲话中宣布，由于政府收入不断下降，所有行政机构几乎都已削减，但接着又宣布将增加军事预算。同时他建议对国内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工会或罢工活动实行全面镇压的政策。这样，萨拉曼卡表明了极端立场，同时也就使他所有的政治选择受到局限。

582

早在6月，萨拉曼卡已将奥鲁罗地区一位党的领导人德梅特里奥·卡内拉斯派到财政部。卡内拉斯停止了前几个月的保守政策，敦促萨拉曼卡必须采取更激进的经济措施以克服危机。他的主要建议是采取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实行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他希望玻利维亚取消金本位，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然后增加货币供应。自由党人最初反对这些变革，特别是因为他们不仅控制着国会，还控制着中央银行。但在9月英国自己宣布将取消金本位后，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些变革。玻利维亚作为英镑集团的一部分，不得不照办，因而卡内拉斯得以实行他的改革。但是价格立即开始上涨，政府变得极为不得人心。在此情况下，自由党对政府施加了新的压力，在向部长们提出了一连串的议会质询后，终于迫使萨拉曼卡政府接受了条件。这些条件中包括缔结一项正式的两党公约，同意自由党享有对一切经济决策的否决权。

萨拉曼卡因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挫折，便试图推行他的独裁政府的思想。1931年底他建议制订一项“社会保

卫”法，声称出现了共产主义威胁——对此，其他传统政党领导人似乎并无同感。这项法案将授予总统特别权力以对付左翼政治反对派和劳工运动。这项提案引起的反应十分激烈，1932年1月工人、一些小左派党、学生以及萨阿韦德拉分子终于迫使政府从国会中撤回了这项拟议中的法律。与此同时，萨拉曼卡再次试图在经济战线上击败自由党的反对。鉴于预计政府收入仅能达计划中基本支出的一半，他建议筹集一笔国际贷款。这项建议遭到自由党的反对，他们不仅成功地将可恶的卡内拉斯赶出了财政部，而且终于在1932年3月迫使萨拉曼卡在他的内阁中接受三名由自由党指定的部长。

583

现在萨拉曼卡在涉及经济的所有基本决策都要完全依靠自由党人，他还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激进派的反对，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进行的反罢工和“社会保卫”法活动引起的。因此，他对国家政治局面感到越来越恼怒。但他在国际战线上并不像他在国内政治上那么无能为力，在1932年的严酷日子里，他越来越把精力转向查科事件。这是一个他能够处理的问题，他相信不管他把他们领向何处，国人都会跟随着他，并确保自由党和激进派不会妨碍他的行动。

他以牺牲政府其他各种机构为代价而有计划地扩充军队。他还推动军队在查科地区进行日益富有扩张性的勘察和驻扎计划。玻利维亚的意图具有如此明显的侵略性，所以在同年年初几个月里激进团体开始要求停止这种战争准备。但在这个问题上，在那些边缘激进分子和学生团体同较因循守旧的政党之间发生了分歧。现在自称共和社会党并曾与左翼一起反对社会保卫法的萨阿韦德拉分子完全支持萨拉曼卡的查科冒险，而自由党人也一致支持萨拉曼卡集结军队。

这样，萨拉曼卡发现自己获得了传统派的有力支持，他决心尽量加以利用。5、6月份，两支军队遭遇后为了争夺查科地区的一个重要水源发生了一次典型的小冲突。玻利维亚军队赶走了已

经盘踞在那里的巴拉圭军队。玻利维亚军队后来说那里本来就没有巴拉圭的堡垒，拒绝撤出他们的新哨所，并开始在这个地区迅速地大规模集结，准备抵抗巴拉圭人可能的反攻。6月的最后几天巴拉圭人果然发起反攻，但被玻利维亚人击退。直到此时，这一事件与其他许许多多事件没什么不同，卷入的部队人数很少，冲突不大。至此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正式谈判，但萨拉曼卡却决定打破一切先例而继续发动攻击，到7月下旬便开始了全面战争。

萨拉曼卡的这一决定与他在国内政治中的严重挫折有很大关系，还因为他认为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将引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5月，国际锡管理组织采取激进步骤：禁止在7、8两月进行一切锡的生产，之后将生产减少到1929年产量的1/3；这就是说，就在萨拉曼卡作出有关查科问题的决定的前夕，该组织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锡产量。为了应付两个月的停产和由此造成的极不平衡的贸易状况，政府完全控制了公民的一切黄金交易，并迫使矿主们将他们全部外币兑换许可证的65%交给中央银行。不用说，如此极端地关上了国家出口经济的大门对政府在后来几周内采取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84

从战争爆发以来披露的所有文件来看，无疑萨拉曼卡和玻利维亚政府是蓄意将一次典型的边境事件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的，对此甚至巴拉圭人也感到意外。同样明显的是，在作出最后决策时，正是萨拉曼卡不接受他的参谋长的书面意见，强使这次冲突无法获得和平解决而发展成为玻利维亚共和国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战争。

但是据说——而且人们几乎立即相信，查科战争是支持玻利维亚要求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与已在巴拉圭站稳脚跟的英荷壳牌公司之间争夺油田的结果。无疑，在这次长期的流血冲突临近结束，得胜的巴拉圭军队到达查科地区的边缘并向安第斯山脉丘陵地带挺进时，石油成了他们进行战争的重要目标。但是直到1935年底，战区离最近的油田也有几百英里。而且，战后有证据

说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曾经非法地把玻利维亚石油卖给阿根廷，然后又卖给巴拉圭，而同时它却声称它无法从同一块油田中为玻利维亚生产石油。看来，战争的起因必须从玻利维亚内部复杂的政治冲突中去找，从世界大萧条对一种脆弱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中去找，只有从阿根廷对巴拉圭目标的支持方面才 585 能明白战争为什么得以继续。阿根廷始终有能力阻止和平行动以及巴拉圭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意味着战端一开，玻利维亚就没有什么能力制止它越演越烈了。这样说并不是企图缩小人们普遍认为的查科战争乃是一次石油冲突的意义。战后所作的政治经济基本决策，包括在1937年没收标准石油公司和创建国家石油垄断公司，都是这种认识的直接结果。

查科战争实际上摧毁了自从1880年起便存在于玻利维亚的政治制度。战争结束时，文人政府和传统政党都土崩瓦解。从前仅仅是一小股激进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思想意识现在成了许多政治上觉醒的青年和退伍军人所关注的事。这种变化如此显著，以致玻利维亚人自己也把在查科战争中成熟起来的人们称为“查科的一代”。现在国民辩论的新主题是印第安人问题、劳工问题、土地问题以及经济上对私有矿主们的依赖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导致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建立了新的政党和革命运动，最后引起了1952年的社会革命。

查科战争还标志着国家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世界性萧条和由此引起的查科冲突标志着采矿业发展的结束，甚至是对采矿业投资的结束。此后这项工业的生产和生产力开始下降，由此到1952年它的结构和投资格局都几乎没什么变化。在农村地区也一样，国民经济的相对停滞结束了自19世纪80年代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大庄园制的大发展。到这一时期结束前，无地的散工可能增加了一倍，自由公社的印第安人的人数现在比无地农民少得多。但是农村经济的这种根本性调整在自由公社彻底被破坏前终止了，并且随着大庄园采取守势，它为战后时期提供了无休止的

冲突源泉。

由于锡的大发展而取得的一切增长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据估计，1940年2/3以上的玻利维亚人仍基本上处在市场经济以外，甚至到1950年国民经济中城市工匠的人数仍与工厂工人的人数相等。玻利维亚虽有2/3的经济自立人口从事 586 农业，但它仍是粮食包括传统的高地根茎类作物的纯进口国。这样，一方面锡的繁荣确实影响了占这个国家人口1/3的城市和操西班牙语的居民，它的多种效果对农村居民却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有，只是可能由于大地产制的相应发展而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玻利维亚进入查科战争时的经济是一种十分传统的、不发达的和依赖出口的经济，它在战后出现时带着同样的特点。但在激进意识形态和工会组织方面，它由拉丁美洲发动得最差的社会之一变成了一个比许多邻国更先进的社会。因为战争粉碎了传统精英们的设想，促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玻利维亚社会的性质。结果造成了一个革命政治运动，它吸收了这个大陆上出现的一些最激进的思想意识。战争还为发展美洲最强大、独立和激进的劳工运动之一而创造了气候。从这些角度看来，查科战争如同以前的太平洋战争一样，将证明是玻利维亚历史上许多重大转折点中的一个。

587

第 17 章

现代秘鲁的起源

（1880—1930年）

1879年对秘鲁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一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它带来了无可名状的痛苦、屈辱和国家最终的失败结局。与此同时，由战争造成的广泛破坏却又为经济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在其后的50年内，秘鲁这个拉丁美洲典范的"封建"社会将被拖入发展中的世界经济，其生产方式将被帝国扩张时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需求所改造。

1879年后的半个世纪可以被称作现代秘鲁的黎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迅速现代化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时期。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精英，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寡头集团，其政治代表即文官主义党在19世纪结束前夺取了国家控制权。[①]由于它的父道主义保护以及在当时盛行于整个大陆的自由放任的实证主义原则指导下，产生了秘鲁历史学家前辈豪尔赫·巴萨德雷所称的"贵族共和国"（1895—1919年）。军队进行了改编和专业化，并且至少暂时地自独立以来第一次被置于文人的控制下。政府机器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殖民地时代在结构和形式上特有的传统"官欲"，但进行了整顿、现代化和扩大，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出口经济的要求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总之，这个时期经济繁

① 文官主义党于1892年首次获得总统职位，关于它的起源见博尼利亚著《拉丁美洲简史》第三卷第13章。

荣，政治稳定，社会相对安定，是这个国家殖民地后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588

但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从中脱颖出了当代秘鲁的社会政治构成。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农民外流并变成了无产者，而工业飞地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地区形成。在那里，传统的大庄园制和小型采矿业越来越让位于现代的农工综合种植园和采矿联合企业，它们都用技术和规模经济装备起来，以便为正在扩大的国外市场进行高效和有利可图的生产。最后，从这个社会经济变革的旋涡中形成和发动了一个现代劳工运动。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秘鲁发生的广泛经济混乱所作出的集体反应打破了延续10年的社会相对平静，并标志着文官主义党的“贵族共和国”的结束。

但从广义上说，最终使出口导向的经济的效能成为问题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种经济是文官主义党人精心构造的，在“十一年”（1919—1930年奥古斯托·B·莱吉亚执政11年的政府）对期又由他们的中等阶级继任者扩大到新的方向，但1925年后世界商品价格的下降和1929年的暴跌动摇了这种经济的根基。从那时以后，人们日益认识到对出口的依赖乃是国家继续处在不发达困境的核心。如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和摆脱困境成了伟大改革家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革命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发起的全国辩论的中心议题。这次世界危机还标志着秘鲁民众在持久的、长期的基础上进入了政治舞台。现代的民众主义政党、特别是1924年阿亚·德拉托雷创立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从此将大大影响和塑造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运。

秘鲁这个国家的地理和人口结构就象它的经济和政治一样很成问题。它的地理环境被安第斯山脉扭曲得支离破碎，它的人口又被分裂为这么多种族、阶级和民族，因此在它独立以后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国家一体化仍然是一个尚待实现的愿望。

地理上，全国可分为三大地区——沿海地区、山区和森林地区。狭小的沿海地带占全国领土的12%（今天沿海地区居住着45%左右的人口，但过去并不是一贯如此。这反映本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有大量人口从落后的内地农村流向较现代的沿海城市）。沿海地区的土地虽然肥沃，但由于秘鲁海流的特殊作用，这里雨量稀少，使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沙漠。在有些地方，从安第斯山脉由西向东流出的好几条河流灌溉了这片沙漠，在它们注入太平洋的地方构成了广阔肥沃的河谷。山区由三条自北向南伸展的安第斯山脉所组成，它为交通和农业造成了严重困难。作为古印加帝国的心脏，山区独特的生产能力再也没有从16世纪西班牙征服时期引起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他们在孤零零的庄园和农村（村社）里勉强度日，这些庄园和农村养殖牲口或生产小麦、玉米和土豆，产量极低。这里也能找到丰富的矿藏，它们大有将一大部分人口吸引到城市飞地中去的趋势（本世纪山区的经济日益得到开发并与沿海的市场和世界经济相连接）。最后，在全国国土上到处都有热带雨林，它占全国面积的60%，决策者们也常想到它，他们很久以来便把它的资源和巨大面积视为解决国家长期不发达的潜在灵药（由于森林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并且仍然孤立于国家的主要生产中心之外，所以它象国家一体化一样基本上仍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未来的梦想）。

如果说地理宿命论引起了秘鲁的问题及希望，那末某些历史遗产，特别是殖民主义，则对民族觉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且大体上造成了现代的不发达问题。19世纪20年代争取独立的革命结束了几近300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但是，除了使当地的克里奥尔人精英突然掌权的一次政治大变化之外，殖民地秩序基本上原封未动。如同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实行社会革命可能威胁他们的政治抱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曾经部分地促使他们要求革命的自由贸易也变成了一柄两刃剑，它一方面扩大了商人和土地

阶级中一部分人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当地制造商，他们不得不同涌进来的外国货进行竞争。就象达到经济独立和繁荣那样，建立稳定的新的民族国家在殖民地后的初期也是难以捉摸的。考迪略主义的猖獗，加上地区主义和特殊主义，阻碍了这个新国家的巩固。19世纪中叶前后鸟粪石的兴旺发达提高了国家收入，为中央政府普遍地扩大权力和影响奠定了基础，只是到这时国家统一的希望才开始变为现实的可能。但是1879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走向全国统一的步伐，而使这个国家回到了类似独立初年那种四分五裂和无政府的时期。

战争的对外和对内影响

以智利为一方、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另一方的太平洋战争有许多复杂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在荒无人烟的阿塔卡马沙漠地区发现了有价值的矿产（最早是金银，后来是硝石）并引起了竞争。由于这个地区在殖民地时期未经明确划界，而南美西海岸三个新兴国家又都想对新发现的财富提出权利要求，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这样一个国际火药桶又因旧的政治对抗和争斗而增加了危险性，这种对抗和争斗起源于微妙的地区性力量平衡以及外国企业家和列强的干涉和阴谋。秘鲁竭力想避免与它南方远较强大和组织得更好的敌手进行军事摊牌，但没有成功。最后，该国由于无法废除与玻利维亚订立的一项秘密同盟条约，而在1879初参加了战争。

秘鲁被卷进了一场它毫无准备的战争，它首先在海上受挫。它的小小的对保卫3,000英里太平洋海岸线至关重要的海军核心是两艘铁甲舰——独立号和瓦斯卡尔号。独立号在战争一开始便受诱搁浅并在伊基克战役中丧失了。由传奇人物米格尔·格劳指挥的瓦斯卡尔号曾一度成功地对敌方港口和运输造成严重破坏。但是，在这年晚些时候实际上决定秘鲁在这次战争中命运的一次交战中，瓦斯卡尔号在安加莫斯角外遭到更大、更有威力的智力 591

分舰队的伏击。在这次世界上铁甲舰之间早期的大海战中，瓦斯卡尔号在几乎击沉它的智利对手胜利在望时，终因寡不敌众，受重创后被俘。

智利部队在控制海道后，立即侵入了秘鲁最南部的三省，包括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省，后者的矿产资源和有争议的边界正是国际冲突的焦点。智利在控制秘鲁南部的同时，还封锁了秘鲁的各大港口，堵住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物资（鸟粪、硝石和糖）的出口，使它国库空虚从而有效地破坏了它的战争能力。在这些挫折下，总统马里亚诺·伊格纳西奥·普拉多采取了一位国家领导人史无前例的行动，他以亲自到国外挽回战局筹措贷款为借口，弃国前往欧洲。

秘鲁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已破产，但拒绝投降，这促使智利人于1880年9月在北部沿海陆地上进行入侵。为了“惩罚”秘鲁并使之屈服，一支由帕特里克·林奇将军指挥的3,000人组成的智利军队掠夺了这个地区遍布种植园的甘蔗谷地，从而使这个国家失去了用以继续作战的唯一剩下的经济资源。但秘鲁人仍不愿求和，特别是在智利苛刻的领土要求面前更其如此。第二年年初决定秘鲁败局的丧钟敲响了，当时一支2.5万人的智利入侵军经激烈战斗后攻克了利马。但入侵军在1月17日最终进入首都时，却找不到一个与之谈判投降的政府。

尼古拉斯·德·彼罗拉在普拉多去欧洲后接管了独裁政权并组织了命运不济的利马保卫战，城陷后他逃到山区，想在那里组编一支新军继续打仗（彼罗拉曾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坚决的反文官主义派，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后于1895年再次出任总统）。但他想组织统一抗战的希望由于敌对派别和军事首领们再次展开权力斗争而破灭了。一边是文官主义党人，包括一些进步的庄园主、鸟粪承销商和银行家，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曾掌握政权。他们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在彼罗拉退到山区后迅速在利马组织了新政府，目的是谈判一项立即和平的解决办法。

另一边是军官们的一个松散联盟，他们发誓要继续最初由彼罗拉组织的抵抗，而当时彼罗拉在权力斗争中支持那位在塔拉帕卡战役中使秘鲁制胜的英雄安德烈斯·卡塞雷斯。军官们认为文官主义党愿意谈判是卖国行为。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势将为正在展开的政治斗争划定界线的同时，它还具有更不详的社会含义。战场上的失败导致了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中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寡头政府的垮台。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眼里，将国家引上战争道路的统治阶级的权威甚至合法性现在都成了问题。这在一个按阶级、社会地位和等级制路线分割扭曲的社会里是个严重问题。由于国家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饥荒的阴影在国土上蔓延，这种权威的丧失威胁着精英们对群众实行单方面统治和控制的历史性能力。如果不加制止，它甚至可能导致进行大规模革命的群众性动乱。

实际上社会解体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利马，暴徒们袭击华人区，企图进行种族大屠杀；自从大批中国苦力劳工（1849—1874年约10万人）运进这个国家以代替1854年获得解放的黑奴后，这种种族大屠杀在困难时期变得越来越普遍了。那批暴徒还逼得市内一些富有阶层到英国大使馆避难了一阵。不过在地主阶级看来，最危险的局势发生在沿海农村地区，那里的种植园工人（中国苦力）在有些地方象对“解放者”一样接待入侵军，而在另一些地方则对他们的主人大肆杀戮和抢掠，如在卡涅特就发生过这种事。确实，对这些“危险阶级”可能举行大暴动的担心促使文官主义寡头集团求和，希望这样能争取到入侵军来保卫财产和“法律与秩序”，并以此避免社会混乱。

稍后，当一支智利讨伐军于1881年将战争打到中部山区后，保卫国家的斗争进一步显露了正在转变为社会斗争的迹象。长期受他们的地主老爷压迫的印第安农民，现在发现他们神圣的村社土地受到一个新“压迫者”的威胁。他们在坚决动员起来保卫家园不受敌人侵占时，有些人开始产生了更为彻底的解放的思想。

593

对他们来说，战争已成为一场反对所有白人的革命斗争，不管他们是智利人侵者还是当地的地主精英。

毫不奇怪，印第安各阶层群众中的这种情绪大大地影响了挽回战局的进程以及各敌对派别和考迪略之间随后进行的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个地区的精英们最初愿意帮助卡塞雷斯建立一支当地的抵抗军，后来看到他成功地动员了大批非正规的农民游击队（自独立战争以来以“游击骑士”〔montoneros〕著称），他们又退缩了。许多地主无可置疑地担心，一旦入侵者被赶走后，这些游击队可能会在一场阶级——等级战争中转而反对他们。这种对民众的动员习惯地在安第斯的精英们心里注入了恐惧，他们的阶级霸权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受到类似运动的威胁。确实，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幽灵仍然在这个地区上层阶级的集体心理中投下长长的阴影：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是印加人王室的混血后裔，曾经发动山区的印第安人反抗非正义的西班牙统治，1782年被总督当局处决于库斯科。结果，这个阶级的一些重要阶层放弃了保卫国家的抗战，而转向通敌立场，认为与敌人谈判和妥协能更好地为他们个人和阶级利益服务。

山区一部分精英分子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产生了一些重要后果。首先，它使胸怀大志的考迪略、一位卡哈马卡省的庄园主和彼罗拉从前的追随者米格尔·伊格莱西亚斯有机会以和谈倡导者的身份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彼罗拉本人的政治运气暂时有点黯然失色）。1882年8月，他发表宣言（蒙坦宣言），除说明他愿意出任的总统抱负之外，还宣称他愿意同智利人谈判。这一行动虽然被卡塞雷斯谴责为卖国，但却得到一些心怀不满的军官和厌战的政界人士与大庄园主的支持。伊格莱西斯设法组织了新政府并于1883年同智利顺利地缔结了和平条约。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南部的塔拉帕卡沙漠地区及其生产硝石的重要中心伊基克全部割让给智利。它还允许智利占领和治理塔克纳和阿里卡10年之久，在这以后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两地的归属。

594

卡塞雷斯勉强接受了和平，但不同意伊格莱西亚斯当总统的要求。于是，随着1883年末智利军队的撤退和对外战争行将结束，和平即让位于伊格莱西亚斯和卡塞雷斯之间的内战了。在中部山区，卡塞雷斯的“游击骑士”不仅袭击政府军，也袭击被怀疑曾与敌人合作的那些精英阶层的成员。在有些地方，他们还夺取庄园土地（邻近的印第安村社常对这些土地提出要求），迫使庄园主和他们的家族成员逃命。

北部山区由战争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发展成为一次自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以来最大的农民起义。1885年阿图斯帕里亚叛乱沿着安卡什省的卡莱洪—瓦伊拉斯一带突然猛烈爆发。这次起义虽具有阶级冲突和等级战的许多特性，但它是伊格莱西亚斯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考虑不周、时机选择不当的税收措施所触发的。政府急于想装满它空空如也的钱柜，向被战争弄得一贫如洗的印第安农民再次强行征收令人憎恨的贡赋或人头税(对土著的个人捐税)。与这种税（每星期两个索尔）一起还恢复了被人唾弃的类似殖民地时期“米塔制”的强迫劳动。阿图斯帕里亚是一位曾经在连年内战中支持卡塞雷斯派受人尊敬的印第安库拉卡（村长)，他拒绝接受新措施。在躲过逮捕后，他征集了一支农民军并夺取和控制了该省首府瓦拉斯好几个星期。后来政府部队收复了这个城市，残酷地镇压了起义。

这类群众起义事件，以及国民在战后失望和不满情绪的加深，严重削弱了伊格莱西亚斯对政府已经动摇不稳的控制。伊格莱西亚斯因无法得到基金并越来越被机智的卡塞雷斯指为国家失败的象征，终于在1885年12月向即将占领利马的卡塞雷斯的游击部队投降。4个月后卡塞雷斯在竞选无对手的情况下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统。

现在新总统面对着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筋疲力尽，这可从国家预算的急剧下降中看出：由战前高达7,400万比索跌至战后10年的100—1,300万比索不等。社会各阶

级都在不同程度上贫困化了。一位当代人试图将这一人类悲剧的程度用数量加以表现，他的做法是印象主义的、不系统的，但有启示性，其所得数字见下表：[2]

	1870年	1894年
百万富翁	18	
富有者	11,587	1,725
小康者	22,148	2,000
乞丐		500,000
工人	1,236,000	345,000

战后这种贫困化除了在国内引起了显著的暴力倾向外，还在旧统治集团的组成方面产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统治集团对土地的占有是战前鸟粪石时代的权力基础。这些土地精英由于战争而突然破产，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迅速失势。他们在未来岁月将为一个新的上升的企业家集团所取代，特别是在农业上富饶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更适应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最终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核心，而这个阶级与外国资本一起，将成为这个国家经济复元的先锋。

在卡塞雷斯建立了后来维持10年之久的军人专政（1886—1895年）以后，秘鲁战后长期的政治社会危机终于开始退潮，一些富有思想的秘鲁人不仅开始辩论未来的建设道路，还辩论是什么首先造成了国家的崩溃。处在国民失望、反省和自我批评的普遍情绪下，有些知识分子要问：一个国家仅仅在一代人以前似乎正处在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大门口，现在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答案有多种多样，但一致的观点是强调严重的民族、文化、地理和种族分裂状态，它自独立以来一直折磨着这个国家。不管怎样，必

② 埃内斯托·耶佩斯·德尔·卡斯蒂略：《1820—1920年的秘鲁：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第2版，利马，1981），第124页。

须找到办法以便不仅弥合山区和沿海的巨大地理差别，而且缩小印第安农民的“封建主义世界”同较“现代的”克里奥尔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许多人认为，基本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现代的民族国家，以便将来重复智利的经历。 539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全国性评论家是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年），不过他肯定处在他本阶级的文化主流之外。[③] 冈萨雷斯·普拉达先后受过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些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他与其说是系统的思想家，不如说是对秘鲁社会中一切被视为神圣和圣洁之物的猛烈批评家。他有点象是拉丁美洲的伏尔泰，对秘鲁战败的方式个人深感屈辱，所以他抨击现有秩序的腐败和非正义。他进行的道义上的谴责还真的第一次使人们对秘鲁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他无情地批评军队、地主和教士的领导人，即国家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没有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国家。总之，他认为秘鲁的失败应归罪于他们，指责他们把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置于祖国利益之上。此外，他争辩说，被压迫的印第安农民群众是形成新生秘鲁民族的真正核心，如果以为不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使他们最终获得解放就能实现民族一体化，这纯属妄想。除非把他们从地主精英们紧紧的剥削性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否则民族团结将永远只是一种黄粱美梦。冈萨雷斯·普拉达虽然受到许多同时代人的排挤和嘲笑，他的刺耳但很尖锐的社会批评却深刻地影响未来的几代人，并在许多方面使他成为现代秘鲁民族主义之父。

冈萨雷斯·普拉达的观点被这个国家再次出现的文官主义精英们视为具有威胁性，是危险的。结果，他很快被称做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本阶级的叛徒，在关于重建国家的辩论中立即被挤

---

③ 他的有代表性的选集见《无政府状态》（1936年圣地亚哥出版）。他的大量著作的主要部分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编辑出版。标准传记仍推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所著《唐·曼努埃尔》（利马，1929）。还有布鲁诺·波德斯塔的《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政治思想》（利马，1975）

到了边缘。辩论的任务留给了新一代的进步文官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受尊敬的圣马科斯大学任教，在后来20多年中，这些人在主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定期地在政府高级职位上出任或卸任，他们是秘鲁战后进行建设和现代化的建筑师。他们都在这597 方面或那方面接受过实证主义的影响，从它关于科学和理性、秩序和进步的学说中发现了复兴民族的完美的意识形态工具。多数人是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温和地反对教权，强烈地反对“封建的”西班牙殖民地传统而主张国家“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有限的代议制民主和科学技术教育，就是思维方式的立即非经院主义和非唯心主义。他们不同意何塞·恩里克·罗多在《爱丽儿》（蒙得维的亚1900）一书中对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批评。相反，他们赞扬美国，并希望在物质发展和政治民主方面努力赶上它的成果。

实证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文官主义提倡者是弗朗西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和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兰，前者出生于一个著名地主家族，其父在智利占领时期曾任总统，后者来自著名的利马律师家族。加西亚·卡尔德隆虽然是一位年方30的外来人，而且从未真正成为文官主义精英们的积极活动的成员，但他最完善地反映和表述了他的阶级和一代人的新兴的思想意识。他是许多关于西方哲学和拉美社会的书籍的作者，他的关于秘鲁的主要著作《当代秘鲁》（1907）是在巴黎出版的，这很说明问题，这本书在很长时期内是秘鲁西方化的克里奥尔精英们的主要文化衡量标准。在这部著作中，以及在几年后也在巴黎出版的关于拉丁美洲的一部姊妹篇中，④ 他谈到秘鲁需要一个有教养的、统一和进步的寡头集团的坚强领导，如果需要，它可由一位强有力的领

④ 《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巴黎，1912），英文译本《拉丁美洲的兴起和发展》（纽约1913）。亦见他的著作《一个大陆的兴起》（巴黎，1913）。

袖——一位后来被委内瑞拉人巴勒尼拉·兰斯称做“民主凯撒”⑤的领袖来指导。这个精英集团将着手使经济资本化，使国家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并通过普遍教育制度逐步把印第安农民吸收进国家。比利亚兰是一名开业律师和文官主义党的主要思想家，他补充了这一思想，强调需要进行教育改革。比利亚兰对这个国家高等教育中过时的经院主义传统持严厉批评态度，主张在大学采用功利主义课程，它将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律师，从而更好地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服务。⑥

598

恢复经济和重建自由派寡头统治国家

走向国家建设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也即在实践中明确反映实证主义思想的一个步骤，就是所谓“格雷斯合同”。卡塞雷斯的顾问们非常清楚，秘鲁在1876年拖欠了外债，现在又失去了它的两大财政资产——鸟粪和硝石，因此它要进行建设就必须重新进入西方资本市场。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在1886年出现了，当时迈克尔·格雷斯——一位爱尔兰移民，他是正在发展的西海岸商业贸易公司“格雷斯公司”创始人——提出一项建议：取消国家债务，作为回报，秘鲁的铁路网（它将得到扩大和现代化）将租让给秘鲁的外国债权人，为期75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建议不仅提出了国家主权的微妙问题，而且提出了秘鲁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它势必引起广泛的争议和辩论。所以卡塞雷斯组织了一个由著名的文官主义党人（他们与卡塞雷斯的执政党立宪党结盟）组成的特选委员会来研究这项建议并向政府提供意见。委员会完全支持

---

⑤ 劳雷亚诺·巴勒尼拉·兰斯：《民主凯撒主义》（加拉加斯，1919）。

⑥ 例如《秘鲁的自由职业者》（利马，1900）。关于比利亚兰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也见豪尔赫·巴萨德雷编《文选》。实证主义的另一倡导者是哈维尔·普拉多。见他所著《西班牙统治时期秘鲁的社会状况》（利马，1941）和《新时代和美国的历史命运》（利马，1919）。

这个计划，把它看作是秘鲁同西方大国发展未来经济关系的基础。它深信，格雷斯合同将使这个国家的财政获得牢固立足点，从而有助于恢复秘鲁的国际贸易和商业，有助于从国外吸收必要的投资、技术和劳力以刺激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卡塞雷斯政府也知道，同样的这种发展战略已经在南方的阿根廷和智利推动深刻的经济发展，因此它在对合同作了一些修改后，于1889年促使顽固的国会批准了这个合同。这项最后的合同规定向一家债权人公司（伦敦秘鲁公司）割让秘鲁铁路66年，外加的的喀喀湖自由通航权和提供300万吨鸟粪，以换取勾销全部外债，但须在33年内每年付款8万英镑。⑦

599

因白银生产的迅速恢复（1895年产值达3,300万美元）而得到加强的格雷斯合同为资本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由1890年总统继任人问题触发的政治斗争再次威胁了国内的安定。卡塞雷斯的文官主义党盟友主张在他们自己的候选人领导下恢复文人政府，卡塞雷斯没有如他们的愿，而推出一名忠于他的下属雷米希奥·莫拉莱斯·贝穆德斯上校作他的继任者。没有文官主义党的参与，新政权便具有明显的军人性质，而卡塞雷斯仍然是幕后的真正的力量源泉。

这种状况为彼罗拉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他结束了流亡生活回来组织了后来著名的“1895年革命”。彼罗拉生于南部阿雷基帕省一个极端信仰天主教的落魄贵族家庭，早就怀有当总统的抱负。1869年他作为年轻的财政部长，策划了把鸟粪的贸易由国家承运人手中转给了外国人奥古斯特·德赖弗斯的历史性变化。由于这一大胆举动，他遭到靠鸟粪发财的文官主义寡头集团的深恶痛绝，他们成功地阻止他上台，直到爆发与智利的战争。然后在战争期间，他的容易冲动的、大胆的、富有魅力的性格短暂地将

⑦ 关于格雷斯合同，见罗利·米勒：《格雷斯合同的形成：英国债主和1885—1890年的秘鲁政府》，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76年8/1，第73—100页。

他推上了总统宝座，在后来的内战时期他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彼罗拉在19世纪90年代上台执政是由于他得到可靠的虽然来源不同的支持和有一项充实的政治纲领。1889年他创立的民主党基本上是反对军队、支持教会、反对自由派（但不一定反对资本主义）和显然主张民族主义的。它在上层得到一帮有势力的南方富有地主、教会统治集团和老的中等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些人非常为他们的西班牙和天主教传统自豪，并坚决要保护这些传统。但是，使该党及其领导人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的是19世纪90年代初带来普遍经济混乱的金融危机。秘鲁是世界重要产银国，它的经济恢复由于世界各地普遍放弃银本位而采用金本位而被打断。依靠白银支持的秘鲁货币的不断贬值造成城市工匠和工人的莫大困难和痛苦，而彼罗拉在寻求权力时则成功地把他们动员了起来。 600

1895年3月一个典型的多雾的早晨，彼罗拉率领数千非正规部队跃马直入利马城。经过两天浴血巷战，双方伤亡数千人，彼罗拉迫使卡塞雷斯投降并占领了总统府。几个月后，在全国选举前夕，彼罗拉同意同他的宿敌文官主义党人结成历史性同盟。与卡塞雷斯不同，彼罗拉明白，如果没有文官主义党寡头集团的支持就不可能进行统治。而文官主义党方面也准备捐弃对彼罗拉个人的前嫌。再说，双方在恢复经济方面的思想并无很大差别。而且他正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是能够扩展"安第斯和平"（Pax Andina）具有领袖魅力的考迪略，这种和平和秩序是文官主义党的实证主义者十分珍爱的。于是，彼罗拉在1895年顺利当选，这标志着秘鲁政治的新时代的开端。因为彼罗拉一旦执政，他就能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罕有的广泛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统治。这使他

* 原文是"man on horseback"，美国谚语，喻军权在握足以夺取政权的领袖人物。——译者

得以进一步推动秘鲁蒸蒸日上的出口导向经济复苏。

彼罗拉是这一代人中占有总统职位的第一个文官，他的目标是恢复文人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威信，减少军人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突出地位。鉴于军队在过去一个世纪内的历史作用，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自从独立以来，秘鲁军队是在一个极端支离破碎的政体中的唯一比较统一和有凝聚力的机构。如前所说，19世纪军队实际上就是国家。[⑧] 与智利的战争进一步扩大了军队的队伍，从而增加了它在国家事务中的政治份量。

彼罗拉对这个问题十分清楚。他认为猖獗的考迪略主义和“政变主义”已经过久地打断了政府正常的宪法程序。现在需要的是对武装部队进行重大改革，不仅使它更加精通技术和现代化，而且要使之非政治化并服从由文人控制的国家政权。

601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彼罗拉首先大刀阔斧地削减正规军及其在国家预算中的份额，让大批忠于已失败的卡塞雷斯的军官退休或解职。然后，他请进一个法国代表团负责对军队的彻底整顿和改组。为了造就一批有良好教育、技术称职的军官，在利马郊外的乔里约斯建立了一所新的军事学院。在这个学院里，法国人根据他们自己对法国军队的精英主义观念，向学员们灌输一种新的职业道德。军队的首要和唯一的任务是保卫祖国这个神圣理想。干预政治事务将被这些新一代军官们视为不适合穿制服的军人之所为，他们更高尚和爱国的保卫祖国的使命使他们超脱于政治这类平庸污浊的事务。但是灌输这样一种更职业化态度的努力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成绩，而从长远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军队作为上层利益的保卫者而干预政治以对付来自下面的威胁的历史性倾向再次在1914、1919和1929年出现，而且从此又变成了“流行病”。

不过彼罗拉比较成功地在其他方面改变了武装部队。1898年

---

⑧ 西内西奥·洛佩斯：《论秘鲁的寡头国家》，载《墨西哥社会学杂志》第40卷1978年第3期，第1000页。

开始实行了义务兵役制，随之军队逐渐扩大，其数量在后来10年内增加了两倍。此外，薪饷也增加了，军官量才录用而不再凭世系。这样做的结果为新的中等阶级开辟了升迁的途径，他们到时将接管军队并进一步促进其性质的改变。最后，甚至来自平民百姓的极少数人也能指望过军官的生涯。随着20世纪的发展，在一个长期按阶级路线僵化了的社会里，军队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晋升渠道。

在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彼罗拉矛盾地既象是一个现代化的文官主义资本家，又象是一个天主教的亲西班牙的传统主义者。他迅速着手改革过时的国家机构以适应和更好地促进经济复苏。例如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造。对糖和棉花这类主要出口物的关税被取消，而对除机器以外的进口物的关税则逐步提高，以便刺激象纺织这类新兴工业。与此同时，过去引起许多弊端和敲诈行为的印第安人人头税终于停止征收，也废除了旧的西班牙包税陋规。一家新的私人公司（后来被国有化，成了国家企业）受权改进征税的效率和收益。银行和货币制度也进行了整顿。金本位得到采用，这不仅有利于沿海的出口商（彼罗拉的文官主义盟友们），也使国家收入从扩大的出口中获得了好处。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彼罗拉设立了发展部，它的工作得到新成立的若干个专业协会的协助，其中最重要的有全国农业协会（1896年）、全国矿业协会（1896年）、全国工业协会（1895年）。这个新建的部采取的最早的行动之一是着手修改有关商业和采矿业的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其中有些法律甚至是远在18世纪波旁王朝改革时期订立的。 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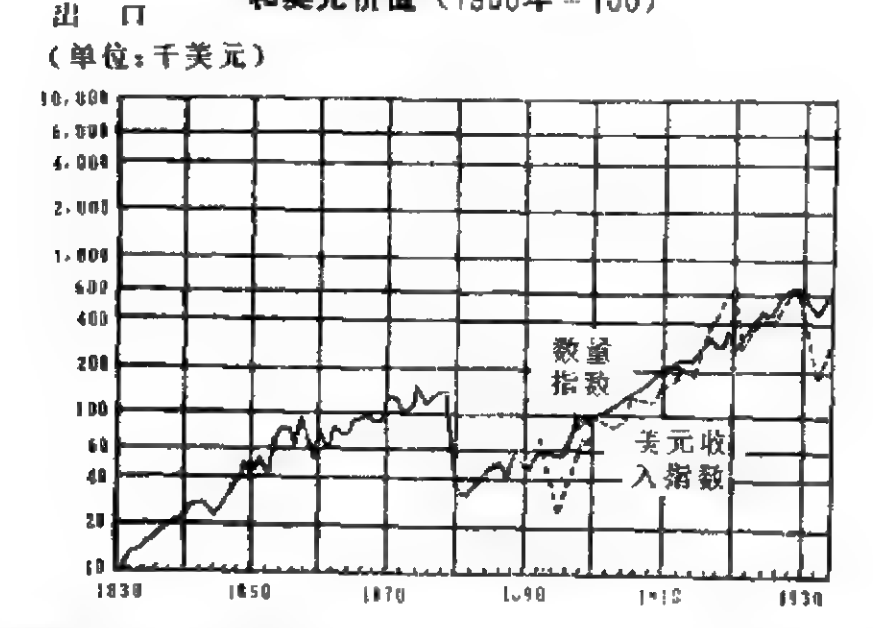
但彼罗拉显然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什么事情。秘鲁的主要历史学家豪尔赫·巴萨德雷曾指出，彼罗拉失去了一个可能是最后的将民众阶级结合进国家政治发展框架的绝好机会。这部分地是由于彼罗拉内心深处的精英主义和贵族心理造成的。他象秘鲁殖民地时期的老爷一样，对人民采取了负有保护责任的老子对儿

女的父道主义态度。他喜欢说："人民遇到危险时他们就来找我。"⑨对群众的传统地位或对他们同统治阶级与政府的历史关系作任何结构性改革显然超出了彼罗拉的考虑范围。

但正是彼罗拉开创了"贵族共和国"（1895—1919年），这是秘鲁近代史上无以伦比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新时代的曙光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摆脱了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末的低谷（见图表1）而复苏的结果，当时别雷斯合同和新兴文官主义党寡头集团的全部影响已开始发挥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代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各地对宗主国中心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应。为了寻找刺激这种发展的原料和为剩余投资资本及制成品寻找出路，工业国发现已遭破坏的秘鲁经

603

图表1：1830—1930年秘鲁出口值和美元价值（1900年＝100）



来源：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1890—1977年的秘鲁：一种开放经济的增长和政策》（伦敦，1978），第5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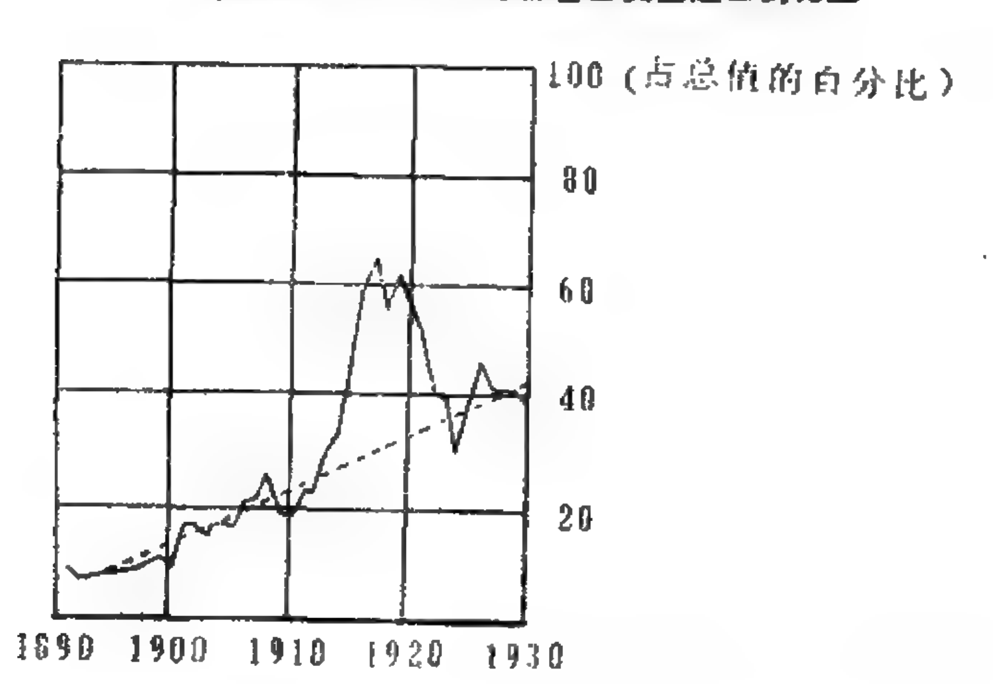
⑨ 引自赫苏斯·奇瓦里亚：《殖民地秘鲁的消失，1871—1919年》，载《贡献》杂志第23期（1972年1月出版），第132—133页。

济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和有机可趁的活动场所。由于它的多半已过时和陈旧的生产能力已基本上被战争毁坏，它的重建可更容易符合宗主国的要求和新时代资本主义的规范。

在秘鲁独立后一个时期，英国人在它的经济中迅速取得了最高地位。在后来半个多世纪中，秘鲁的出口物（主要是鸟粪、硝石和羊毛）大部分运往英国以交换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英国至少在经济上事实上代替西班牙成了在秘鲁拥有霸权的"殖民"大国。但到20世纪，美国资本开始向英国在秘鲁的优势地位提出严重挑战，使之大大受到侵蚀。例如，来自美国的进口在1892年占这个国家进口总额的7%，1930年上升为几近3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跃而超过60%，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固定在40%左右。（见图表2）美国的直接私人投资由1897年的700万美元增加

图表2：1891—1930年秘鲁自美国进口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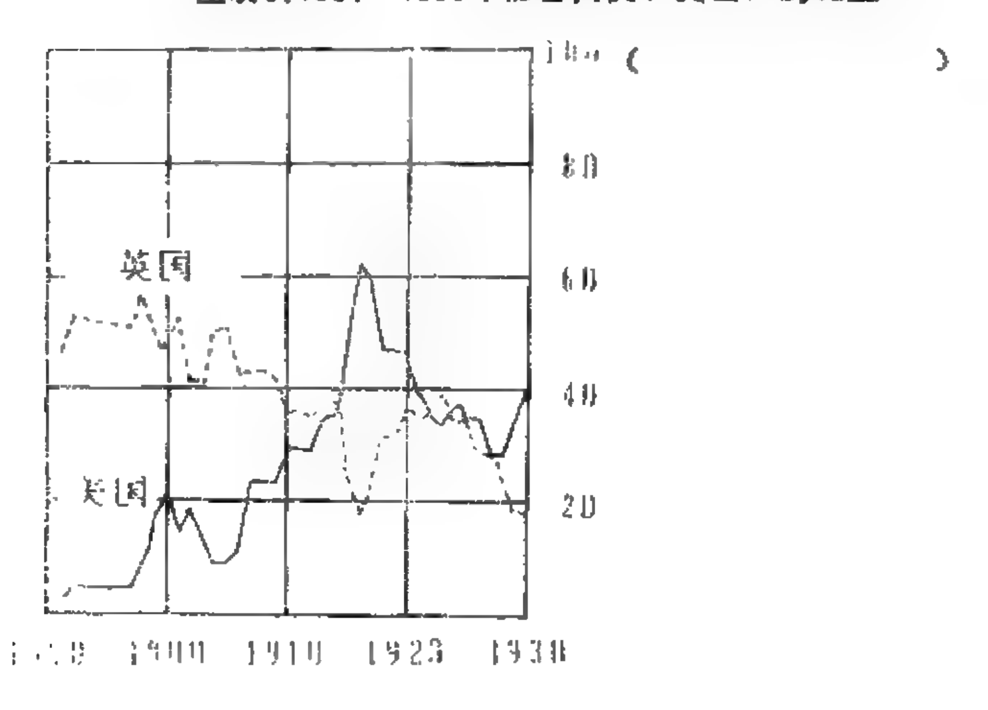
604



资料来源：威廉·博林杰：《美国对秘鲁经济影响的增长（1869—1921年）》（1972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第18页。

到1903年的2300百美元，又跃至1919年的1.1亿美元和1924年的1.4亿美元。不仅如此，巴拿马运河一开放，作为秘鲁的出口市

图表3：1891—1930年秘鲁向美、英出口的比重



说明：秘鲁对英国的出口在绝对值上是增加的。本图表所反映的是它们与秘鲁对美国出口相比时的相对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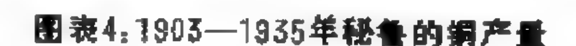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前引博林杰论文，第21页。

605 场，美国便赶上和超过了英国（见图表3）。在20世纪头25年内，秘鲁一直是接受美国投资最多的四、五个拉美国家之一，仅次于墨西哥、古巴，有时还分别次于哥伦比亚（1897年）、智利（1908、1914、1924年）和委内瑞拉（1924年）。随着美国资本不断地增加，相比之下，英国在秘鲁的投资减少了。1880年英国资本为1.81亿美元，1890年降为9500万美元，1928年又升为1.31亿美元，之后便再无起色连续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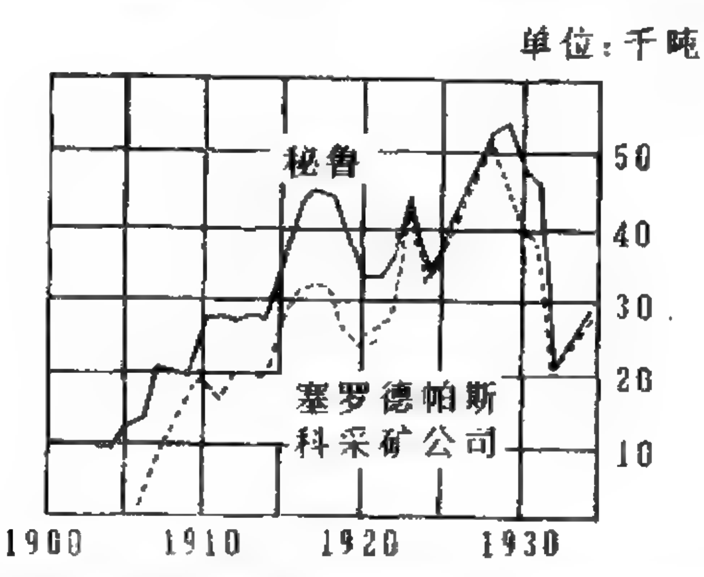
随着英国在秘鲁的优势地位转归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渗透的形式也改变了。在商业或重商主义阶段，英国资本和某些美国资本在资源丰富的秘鲁“自然”经济和国际市场之间主要是

起一种促进的“居中媒介”的作用。总之，它通过向秘鲁生产者——种植者、牧场主和矿主——提供财政和市场机制既刺激了生产又销售其产品，从而活跃秘鲁经济。到19世纪末，外国贸易行象格雷厄姆·罗（糖）、安东尼·吉布斯（羊毛）、邓肯·福克斯（棉花）和格雷斯兄弟（日用百货和海运）等已清楚地表明了秘鲁同工业国市场日益扩大的关系。但在20世纪，美国资本开始渗入生产领域。这主要发生在采矿业，但在不同程度上也进入了其他经济部门（如糖业）。本世纪的最初30年内，美国各大公司开始夺取和垄断从前完全由秘鲁企业家控制的出口部门的生产领域。

主要由于其资本集约和技术上的依赖性，采矿业成了本国人被挤出而由外国人接管的典型例子。自从独立以来便处在衰落状态的采矿业，在鸟粪时代的铁路建筑热后重新欣欣向荣。在本地


图表4：1903—1935年秘鲁的铜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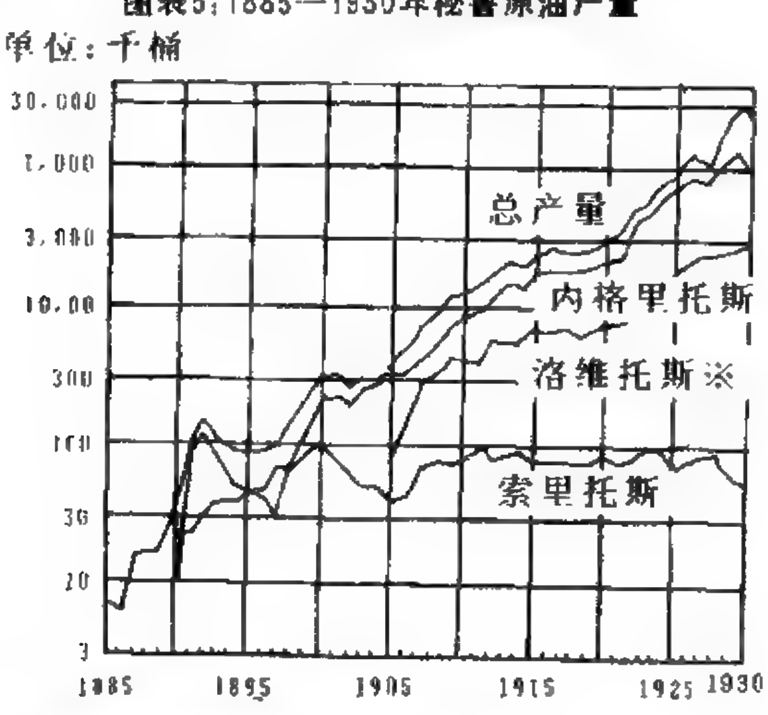
说明：塞罗德帕斯科公司的两组数字即1906—1921年的数字和1920—1935年的数字之间有差别；后一组数字包括了从其他矿业公司购来的矿石，它们被熔炼后由塞罗公司作为它的总生产的一部分出口了。1922—1923年塞罗公司在秘鲁铜产量中所控制的比重显著上升，这是由于拉奥罗亚的一座日生产能力至少达2500吨的冶炼炉于1922年投产，这使其他多数公司的熔炉都相形见绌。

资料来源：前引傅林杰论文，第43页。

企业家的推动下，采矿业在太平洋战争和随后的几次内战以后继续恢复，当时还得助于秘鲁公司将铁路进一步修到了中部山区富饶的铜矿区，主要是卡萨帕尔卡(1892年)和拉奥罗亚(1893年)。秘鲁的铜产量（见图表4)在1895年后世界市场价格稳步上涨的刺激下，在1897—1903年间每年高达1万吨。但是，早在1901年，

607

图表5：1885—1930年秘鲁原油产量



资料来源：前引索普和伯特伦书，第97页。

* 洛维托斯（Lobitos)，秘鲁西北部沿海城乡，石油产地；表中另两处石油产地内格里托斯（Negritos）和索里托斯（Zorritos）分别位于洛维托斯以南和以北。——译者

在一项新的矿业法规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转让、改组和与外国企业合并后，最后由一家美国辛迪加买下了庞大的塞罗德帕斯科的矿山。在后来的几年内，这家美国公司铺设了一条铁路支线，把它的矿藏同拉奥罗亚以及廷亚瓦尔科的一座加工厂相联接。与这些事态发生的同时，从1896年起，两个北美人巴库斯和约翰斯顿在卡萨帕尔卡开发铜矿，他们的矿山与塞罗德帕斯科一起在一次大战前已控制了秘鲁92%的铜的生产。

关于外国对采矿业的渗透还应提到另外两个例子。皮乌拉省拉布雷阿和帕里尼亚斯两个庄园上的油田由伦敦和太平洋石油公司进行了开发，这家公司后来被卖给了标准石油公司，1913年变成了国际石油公司。之后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继续上升（见图表5），1915年占秘鲁出口总额的10%，1930年已占到30%。

在当地人看来，更具有破坏性的干预发生在1892—1910年间的亚马孙地区，当时割胶业的繁荣一下子将出口提高到出口总额的30%。少数人转眼之间积聚了大量财富，代价是在被驱使来从事生产的印第安劳工中有几千人死于过度劳动、营养不良和疾病。但是繁荣突然终止，就象它突然出现一样，这是因为英国人把橡胶生产转到了印度和锡兰，那里的种植园生产效率更高，利润更大。

外国人在改组和推进出口导向的沿海农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利马以北的沿海农业即以甘蔗种植园为特色。但这个地区还散布着一些小的农业村社，其中许多是早先前哥伦布时代的制度的残余，同时还有一些中等规模、资本很少、经营不善的庄园，它们与当地市场偶有联系，而且往往极不稳定。19世纪中叶前后一系列经济、技术和政治变化，包括成本低廉的跨洋蒸汽船运输的出现、来自鸟粪繁荣的剩余资本积累、奴隶制的废除、契约华工的输入以及教会土地继承权的取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为出口船而开始实行"单一作物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以牺牲较小的土地占有为代价，对土地实行广泛的集中和垄断，作物实行专业化和机械化，对劳动力逐步无产阶级化——总之，是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的农业部门。尽管战争打断了这一过程，但在战后重建时期它恢复了更大的势头。[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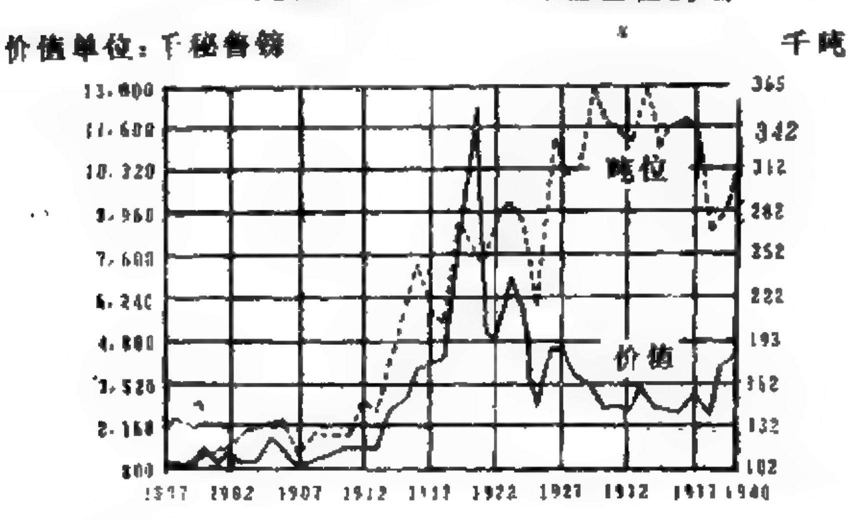
608

---

[10] 见彼得·F·克拉伦，《秘鲁糖业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影响（1870—1930年）》，载肯尼思·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编《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工》（剑桥，1977），第229—252页。

与这一转变过程有关的主要商业作物是甘蔗，它的生产随着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而上升(见图表6)。但是植棉业也在沿海商业性农业中出现了，最早是因为美国内战引起的短缺诱发了这种需求。不过，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一直赶不上糖。(见图表7)。秘鲁种植园主对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涨反应敏捷。不仅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图表6：1897—1940年秘鲁糖的出口



来源：彼得·F·克拉伦：《现代化、混乱和阿普拉主义：秘鲁阿普拉党的起源（1870—1932年）》（得克萨斯州奥斯丁，1973），第13页。

了，而且由棉花种植园主费尔明·坦吉斯培植的纤维更长拉力更强的新品种显著提高了产量。棉花生产集中在利马以南的沿海河谷地区，主要是在利马省和伊卡省。尽管那里的种植园规模有所扩大，但仍实行分成制（沿海地区称亚纳科纳制*）。不过，20世纪的棉花繁荣使这种格局不适应时代要求了。随着规模经济的形

609

* 亚纳科纳制（yanaconajo），指秘鲁，特别是秘鲁沿海地区的一种劳动制度：在庄园土地上劳动的雇工，同时又在交付货币地租或分成地租的基础上耕种一块从庄园租佃的土地。按这种制度为大庄园劳动和佃种土地的农民称为"亚纳科纳农"（yanacona）——。译者

成，又有超过需要的季节劳工（来自邻近山区印第安村社的季节工，当地话叫“包身契约工”〔enganchabos〕），所以“亚纳科纳农”就失去了根基，并被赶出了棉花种植园。棉花在生产、集中和技术水平上虽然从未达到糖的水平，但它却为某些重要的寡头家族包括格拉尼亚家族、穆希卡家族和贝尔特兰家族等提供了财政基础。

图表7：1880—1930年秘鲁的棉花产量

产量单位：公吨

来源：前引索普和伯特伦书，第55页。

糖业集中在北部，战后它的现代化是由一批极富进取性的移民（意大利裔拉尔科家族、爱尔兰裔格雷斯家族、德国裔吉尔德迈斯特家族）领导的，作为第二或第三代“秘鲁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已处于在社会和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结合的过程

中。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进步的、常常是受过外国教育的国民，例610如阿斯皮利亚加家族、乔皮特亚家族、帕尔多家族和暴发户莱吉亚家族以及稍后的德拉彼德拉家族，这些种植园主在国外吸取了现代的、科学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基本观念一思维方法。与采矿业不同，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仍保留在国民或正在国民化（第二代）的移民手里，但金融和销售继续受老的外国贸易行（格雷斯、格雷厄姆·罗、吉尔德迈斯特等等）的控制。

外国移民在其他“现代”经济部门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08年人口统计表明，利马人口中将近10%是外国出生的（16,649人），其中意大利人（3,944人）约占外国人总数的1/4。后者在小型工商业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有些人取得了突出成就，包括冰淇淋制造商多诺弗里奥和意大利银行（后来改为信贷银行）。根据1896年的一份商业注册表，外国人控制了这个城市113家商业进口行中的103家、196家零售店中的161家、94家其他商店中的83家、43家商业办事处中的30家、92家工厂中的74家和800家酒店中的720家。这一事实导致文官主义党人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兰评论说：“我们正迅速成为由秘鲁公务员照料的外国人的殖民地”。⑪

但是，如果说秘鲁的经济和社会日益受到外国企业家和资本的改造，那末这个新兴的文官主义寡头集团的多数成员似乎并不反对。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个集团的心理状态，他们贬抑属于“秘鲁的”东西，而不加区别地赞扬西方的一切，这是一种主要受种族主义支持的世界观。不错，他们被挤出了采矿业，并在重要的国际商业和银行业受到排挤，但他们在一个出口农业不断扩大的时代仍保留了对大部分农业生产的控制。不仅如此，19世纪90年

⑪ 引自理查·M·莫尔斯：《华金·卡佩洛的利马：一个丁拉美洲的典型》，载《近代史杂志》，1969年第4卷第3期第107页。外国人总数中有近一半是华人（7693人），他们是19世纪中叶运进来的苦力的幸存者，那些苦力逃出了种植园，到沿海城市定居，他们在那里构成了小商业的主力。

代各种有利条件的罕有的汇合暂时地推动这些人越过了出口业的狭隘界限，进入了更多样化的进口替代工业。这些因素包括出口业工资劳动者对国内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还包括由于“贵族共和国”的形成而政治稳定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来自出口部门的高利润率和高资本积累率等。工业增长还受到关税不断增加和汇率迅速贬值的刺激，二者都阻止了从国外输入有竞争性的商品。这已促使两位主要的经济史学家对近些年来秘鲁史学界中盛行的关于外国统治的近似定论，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有很多证据说明“19世纪90年代秘鲁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不过他们也承认它的经济仍然基本上是以出口为基础并以工业国市场为出口导向的。[12]

尽管这种低水平的内部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进行时间不长，仅仅延续到1907—1908年的衰退时期，但它有助于扩大和巩固种植园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势力，这个阶级很快变成为一个新的财政寡头。这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市经济为满足出口部门的需要而扩大，那些最著名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的名字便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新建银行、保险、纺织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人名住址录上了。他们已经建立了全国农业协会作为一个强大的半官方院外集团，在政府最高层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政府全部落入他们的文官主义党的控制下，这个新资产阶级就可完全支配这个国家的事务。

主要由于缺乏一个自己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文官主义党人在1895年支持了彼罗拉，[13]他们利用这种同盟获得重要的政府任命，并使自己在未来的选举中处在良好地位。1899年彼罗拉让位

[12] 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1890—1977年的秘鲁：一种开放经济的增长和政策》（伦敦，1978）第36页。

[13] 有一次他们党的领袖罗萨斯据说若有所思地问他的同事：“我们中有谁知道怎样骑马？”豪尔赫·巴萨德雷：《秘鲁共和国史》（第6版，利马，1968—1969），第10卷第100页。

于种植园主爱德华多·洛佩斯·德·罗马尼亚。1903年文官主义党人脱离同盟，并为他们的机智的战略家和领导人曼努埃尔·坎达莫直接赢得了总统职位。现在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正式结合，形成了新的自由主义的寡头政府，它几乎不受干扰地、尽管并不是不受挑战地坚持到1919年。

不过，有人认为这个新政府并不是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府。[14]因为，正如这个国家是按地区划分的那样，它的统治阶级也是地区化的。地方上的精英们在有些方面比任何全国性精英更有内聚力和更有力量。大甘蔗种植园主如阿斯皮利亚加、莱吉亚和帕尔多（他们来自北方）以及罗马尼亚可能已出现在寡头政权的中心，但其他人如中部山区的矿业主和饲养绵羊的牧场主费尔南迪尼、奥拉韦戈亚和巴利亚达雷斯，以及大羊毛商福尔加、希夫松、里克茨，还有他们在南方的庄园主盟友，都还处在这些“全国性”精英层的边缘，并在它行使国家权力时构成一种地区性的牵制力量。

此外，大庄园本身是形成一个真正全国性寡头政权的另一大障碍。它们的边界常常就是中央权力的界限。事实上，国家所固有的弱点使中央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领主（gamonales*）及其盟友维持地方上的秩序和统治。由于没有一支国家警察部队（治安警察队到20世纪20年代才建立）并由于军队尚待现代化，所以寡头政府常常别无选择，而只得把镇压和控制民众阶级的暴力工具让地方领主和他们的帮手掌握。最后，外国人控制的矿山和甘蔗园飞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中之国”，与它们发生利害冲突时，这些地方几乎成了寡头政府的权力无法达到的自治实体。

---

* “gamonal”一词原意是印第安部落的酋长。20世纪初时，在秘鲁用以指印第安人山区的大地主。——译者

[14] 曼努埃尔·布尔加和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贵族共和国的盛衰》（利马，1979），第89页。

尽管有这些局限，寡头集团仍能实行统治，主要是因为中间阶层人数少而且“有依附性”，而民众阶级成份复杂，队伍分裂，阶级认同意识或团结意识不多。种族、民族、语言（印第安人操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地理以及农村社会的分散性——所有这些都导致民众的分裂，而使统治阶级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这个国家。但应指出，这种控制在“贵族共和国”时期是软弱无力的，丝毫不是绝对的。

关于文官主义党寡头集团的组成和内部动态，巴萨德雷作了如下确当的描写：

“总的说来（除少数突出的例外），组成这个党〔原话〕的是一些城市大房地产主、大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发达富有的商人、最著名的开业律师、拥有最佳顾客的医生以及大学教授；总之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一些人。这个党的总部是由都市式的绅士们组成的，有些人与农村有联系，有点象是克里奥尔化的英格兰乡绅。他们常跑俱乐部，居住的房屋象殖民地风格那样铺了小地毯，在不需要新鲜空气时拉上窗帘。他们身穿由首都的法国裁缝制作的黑色燕尾服和最时新的裤子，生活在快乐的世界；他们内部靠婚姻关系维持着联系。”⑮

613

这个阶级内部有一个非正式的叫做“二十四友”的小组是它的核心精英，他们定期在非公开的国民俱乐部开会，讨论国家事务的管理问题。其中两人曾任总统共计24年（何塞·帕尔多、奥古斯托·B·莱吉亚），有包括5名财政部长在内的8名内阁部长，有3名参议院主席，还有利马两大报纸的发行人。⑯如同拉丁美洲的多数精英分子一样，他们组成了一个秘密、严密而富有内

---

⑮ 巴萨德雷：《秘鲁共和国史》第11卷，第127页。

⑯ 见丹尼斯·吉尔伯特：《秘鲁的寡头集团和旧政权》（1977年康内尔大学拉丁美洲研究计划论文集），第55—56页。

聚力的社会精英集团，依靠家族和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巴萨德雷确实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封闭等级：

“婚姻限于少数家族之间，进行同族通婚。他们的子女在专门的学校受教育。小时的游伴接着成为学校同学和大学同班同学……他们恭恭敬敬地相互致意，一起去做星期日弥撒，一起在国民俱乐部用餐、饮酒、聊天，在斗牛场、赛马场和戏院里他们占有优待席，他们还相会在国会、慈善机构、大学院系、商会、大银行或工业企业的董事会以及在同一个客厅里举行的聚会和讨论会上，他们的名字刊登在同样一些报纸的社交栏里。家庭一般都很大，仆人如云，有时他们受到的待遇好象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家庭圈子似的。有些客厅只有某些姓氏的人才能进去，而向那些只有金钱力量的人关闭；还有些家族，人们怀着尊敬、敬畏和谄媚的心情拜倒在他们面前。有一家这类家族的女儿曾经在欧洲说道：“我在我们国家里像是一位公主。”⑰

社会问题的出现

正当文官主义党寡头集团巩固其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时，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的力量开始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面貌。总人口由1876年的约270万增加到1908年的350万和1920年的480万。每年的平均增长率是0.9%，但19世纪末比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增长率要高出许多。同样反映战争影响的利马的人口仅由1876年的10万稍稍增加到1891年的10.4万。但在1890—1930年间，这个城市的人口翻了两番，增加到1908年的14.1万，1920年的22.4万和1932年的38.4万。相比之下，其他城镇象阿雷基帕、库斯科和特鲁希略在1908年的人口仅分别为3.5万、1.85万，和1万。利马的高得多的增长率反映了它在1895年后作为不断扩大的出口经济的行政和金融中心正在迅速发展。随着经济步伐的加快和与内地交通的改

614

⑰ 巴萨德雷：《秘鲁共和国史》第14卷，第299—300页。

善，特别是由于铁路网的扩大，首都开始吸引大量流动人口。他们来自外地社会的各阶级，但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在那里被圈地和人口压力（例如中部山区的人口在1876—1940年间翻了一番）挤出了土地，而被有就业机会的希望吸引到了利马。但那种希望多半要破灭，因为现代部门的发展不可能快到足以照应所有的新来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问题将更形严重。早在1903年首都就出现了第一个城市贫民区——卢林区的圣弗朗西斯科-德拉塔布拉达。这种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该市非利马出生的人口比例上得到反映：它由1858年占37％上升到1908年的58.5％，又上升到1920年的63.5％的高百分比。[19] 不过尽管有这种趋势，这个国家仍保持着基本的农村和农业特点。利马的人口仍只占全国人口的不到5％，而哈瓦那在1919年占14％，圣地亚哥在1920年占14％，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914年占19％。

但内部流动还只是1895年后人口方程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机会的扩大，公共卫生也显著改善。利马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全国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逐步减少了象疟疾、伤寒和天花这类致命疾病。1895年后死亡率开始下降，预示着一种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人口长期趋于停滞的传统格局，转变为一种人口经常性增加的较现代的格局。总之，秘鲁已开始经历17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人口现代化”的过程。 615

如果说这一时期前后利马人口迅速增长，那末它的劳动力同样如此。历史上（秘鲁）工人阶级就象当时一样不仅拥挤在利马城里，也拥挤在附近的港口卡亚俄——出口经济的主要集散地。但19—20世纪之交制造业的发展为这一力量增加了新因素。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和纺织品生产，后者在1905年前获得了约100万英镑的资本投资并供应本国消费需要的1/3。在1890—

[19] 卡尔·赫博尔德：《秘鲁》，载理查·莫尔斯主编《1750—1920年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斯坦福，1971），第109页。

1920年间，大利马市（包括卡亚俄）的工厂数目增加了两倍还多（69—244个），当然多数是只雇用少量工人的小厂。工人最集中之处是一些大纺织厂如埃尔印卡厂或比塔尔特厂；后者1902年有约1250名工人，到1918年已有3835名工人。

对利马劳动人口总数的估计无论怎么说是不大可靠的。但根据人口统计数字（把工人和工匠合在一起算），1876年为9500人，1908年为2.4万人，1920年为4.4万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由1876年的9.5%上升到1908年的16.9%和1920年的19.8%。[19]

鉴于这样迅速的增长，进入20世纪后不久人们便能觉察到新生的劳工运动的最初躁动。1905年面包工人联合会——“秘鲁之星”宣告成立，它是最早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目标，首先是争取减少工时的组织之一。它不同于互助会，后者1911年在该市多达62个，它们的宗旨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更多地是社团性和友谊性的而不是战斗性的。

互助会是前驱，而无政府主义者则给予了劳工运动一种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色彩。在他们的支持下，1911年在利马爆发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首次总罢工。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方面在《抗议报》（1911—1926年）这类报纸上为工人阶级提供向现存秩序挑战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又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到一定时候就似乎更关心推行他们的取消政府的宏伟计划，而不关心日益发展的城市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策略问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的竞争下已走向衰落。他们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1919年在利马为8小时工作制发动的斗争。不过，他们在1919年后仍有影响，特别是因为他们在维克托·劳

616

---

⑲ 彼得·布兰查德：《1883—1919年秘鲁劳工运动的根源》（匹兹堡，1982），第8—12页。

尔·阿亚·德拉托雷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利马并不是新生工人阶级形成的唯一地方。北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出口部门正出现相当大的无产阶级飞地，最显著的是在日益发展的制糖业中，在较小程度上也出现在种植稻米这类辅助部门中。历史上如何获得稳定的劳力供应从来就是人口稀少的沿海地区庄园主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1854年废除奴隶制以后。由于有了政府的补偿金才确保了新的劳力来源，这笔补偿金来自鸟粪收入，它使种植园主得以在后来20年内输入了约10万契约华工。但是种植园主的剥削加上中国人在合同期满后不愿留在庄园里，因而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这一劳动力来源的枯竭。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开始发展，种植园主们转向山区寻找新的劳动力供应。他们把前资本主义式的强迫劳动与资本主义种植园农业对工资劳动的新需求结合起来，采用了一种叫"包身契约工制"*的募集劳工制度。常常由当地富商或庄园主充当的劳动力承包商在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农民中招募工人，这些农民为了换取预付工资而不得不去沿海的种植园中劳动以偿付债务。有些地方强使工人从事某种偿债劳动有时几乎等于是奴役，但这种办法为一个历史上不发达地区的处于困境的农民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金来源；在那个地区不仅农民因大庄园制的土地占有制度而无法获得土地，而且脆弱的农民经济也受到长达10年的外国侵略、内战和盗匪骚扰的严重抑制。从包身契约工制以及后来从沿海种植园的工资劳动中获得现金（尽管这类劳动比较艰苦，有时还要受虐待）被看作是解决农民生存问题的一种出路。

---

* 原文是"enganche"，又译"恩甘切制度"或"募工制"，一种由包工头通过各各手段，往往是拐骗诱胁等不正当手段募集劳工的制度。包工头利用应募劳工的困难处境，以预付部分工资为诱饵，同后者订立盘剥性契约，在立约期内劳工须按约为雇主工作但领不到全部工资，受到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和控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译者

617 同样，在扩大棉花种植园以适应外国需求的南方，万卡维利卡山区的印第安村社依靠在伊卡省棉花种植园劳动的包身契约工的汇款而渡过了长期危机。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把中部山区劳动力的外流更多地看作是资本主义向农民村社内部结构渗透的一种较长期的结果。一个农村资产阶级逐渐出现，他们垄断村社的土地和资源，损害农民中的贫困化阶层的利益，后者脱离了土地资源决定向能找到工作的种植园或矿山流动。[20] 关于流动的原因，这里还应指出一点：20世纪20年代末，山区的人口开始增长，在这过程中引起了越来越尖锐的土地荒，特别是在农民村社中。这一事实没有逃过种植园和矿山劳工招募人的注意，他们的"收获"相应地增加了。

很大部分的流动劳工是季节性的，这与山区和沿海地区的农业周期正好相应。但越来越多的包身契约工逐渐被拉人了沿海地区初生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或者成了种植园的常住户，或者当了临时工，他们只要能获得较多的工资便在种植园与种植园之间或种植园与矿山或国家公共工程项目（灌溉、筑路等等）之间流动。例如，兰巴耶克省波马尔卡种植园的一名工人这样叙述他在那个早期发展中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经历：

"1890年我生于卡塔考斯（皮乌拉省）……我父亲本有很多土地，但平原上的富有地主从他手里一点一点地弄走了。为了灌溉用水发生了多次争斗，而大地主们总是得胜……1913年我来到了波马尔卡种植园，在这以前我在好多庄园和矿山上干过，其中

[20] 弗洛伦西亚·E·马略恩：《保卫秘鲁中部高原的村社1860—1940年的农民斗争和资本主义过渡》（1983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三章；亨利·法夫尔：《秘鲁中部印第安农民社会的原动力和向沿海种植园的流动》，载邓肯和拉特勒奇主编《土地和劳动力》，第253—268页。关于包身契约工制度亦见迈克尔·J·冈萨雷斯：《秘鲁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和劳工契约（1880—1905年）》，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80年12/2期，第291—315页；彼得·布兰查德：《19—20世纪之交秘鲁山区的包身契约工制度》，载《泛美经济事务》1979年第33期第63—83页。

包括圣拉斐尔（卡斯马）、比尔卡瓦卡（瓦乔）、圣尼古拉斯（苏佩）和塞罗德帕斯科。……卡塔考斯的工资是每天60分，而波马尔卡的工资是每天1索尔，大家自然奔这里来了。”[21]

这些昔日的流动工人与来自沿海小农业村社已无产阶级化的小农户（他们的土地已被发展中的种植园兼并）一起，加上原来残余的奴隶和契约劳工，形成了新的农村无产阶级组成部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甘蔗种植园已有约3万人的劳动力，棉花种植园的劳动力超过3.5万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久它即被引入了已经在使利马的工人阶级跃跃欲试的新兴劳工运动。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学说由首都向北扩散，渗透到了瓦乔和特鲁希略地区。结果是劳工骚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在整个沿海发展成1910、1912、1916和1919年的猛烈罢工。 618

在采矿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农民流动、无产阶级化和劳工运动。采矿中心如塞罗德帕斯科（铜）、塔拉拉（石油）和基里维尔卡（铜）等从附近的山区吸引来工人，那里的农民战后为在他们传统的村社里维持生计而陷于困境。例如塞罗德帕斯科的人口由1876年的6,400人增加到1940年的2.55万人，不久单是这里的人口就占全国矿业无产阶级总数的30%。同样，石油工业的工人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多，即由1905年的9,700人增加到1920年的2.25万人。这些采矿企业产生了臭名远扬的“公司区”，那里的劳工冲突和特殊的飞地性质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上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如同沿海的许多甘蔗工人和棉花工人一样，安第斯山的矿工与他们的村社保持着密切不断的联系，而把他们在矿山飞地里的活动看作是暂时的次要的职业。他们在农闲时跑到矿上寻求额外收入，常常在数月后回乡重操农务。即使是那些选择在矿上停留

[21] 道格拉斯·霍顿：《大庄园和合作社：对秘鲁种植园组织、土地改革和新的改良企业的研究》（1976年科内尔大学拉丁美洲研究计划论文丛刊），第149页。

较长时期的工人也通过家庭和亲戚同他们的乡村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像他们的衣着外表那样，他们既是矿工又是农民，是一种"混合的"或"过渡性的"无产阶级，[22]他们的世界观和劳动目的同譬如利马市比塔尔特区的纺织工人有很大差别。

在秘鲁的中部和南部高原，农业结构与北部沿海大不相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的影响同样是多样和深刻的。库斯科以南的山区，即古老印加帝国的中心，仍然受着印第安人传统生活和劳动模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例如印第安人的村社在国家被征服后仍生存了下来，并在此后坚持抵抗不时向外扩张的大庄园制，尽管方式不同且有变化。

如同安第斯山脉的其他地方一样，农村社会充满了大庄园与村社之间为控制作为生产主要因素的土地、水源和劳动力而进行的斗争。但大庄园逐渐赢得了这场斗争，它们早就宣称有权拥有山间谷地最肥沃和灌溉条件最好的土地，将村社逼到了剩下的贫瘠地区，常常就在安第斯山多岩、陡峭和不毛的山坡上。在19世纪临近结束时斗争步伐加快了。由于受到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刺激，资本主义形式越来越渗入安第斯山脉内地。在许多方面它们是随着铁路建设接踵而至，后者大张旗鼓地开始于鸟粪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危机时期突然停顿，战后重建时期又重新开始。传奇式的北美企业家亨利·梅格关于建一条中央铁路的梦想最终在1891年实现了，后来在1908年修筑了联接利马和万卡约的支线，不久又修筑了利马与塞罗德帕斯科的支线，20世纪20年代修筑了利马与库斯科和万卡维利卡的支线。

在南方，早在1870年完成的莫延多—阿雷基帕线于1908年通到了普诺。它的延伸进一步刺激了南部山区的羊毛贸易，这项贸易由于国外日益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来自英国的需求而迅速发展起来(见表1)。这项贸易由一些设在阿雷基帕的商业公司组织和协

---

[22] 布尔加和弗洛雷斯·加林多：《贵族共和国的盛衰》，第34—47页。

调，它们是在独立前后由外国移民如英国人吉布森、里克茨和斯塔福德等创办的。但与他们的北方同行不同，这些商人企业家没有努力改变或改革这个地区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宁可满足于与传统的畜牧结构共处，并同这个地区的大庄园主进行贸易，而这些大庄园主则垄断着他们庄园里农民的羊毛生产和调拨。这样，经济中的现代羊毛买卖业实际上起了加强这个地区农业制度“封建”性的作用。与糖或棉花商相比，羊毛商的出口利润还没有大得足以刺激他们对这个地区的传统牧场实行接管和投资。相反，他们将利润重新投资于象采矿、建筑和纺织等当地的高利润企业，从而巩固了他们作为新兴地区寡头集团的地位。 620

表1　1830—1929年秘鲁羊毛出口

（公吨；每年平均数）

年　份	羊驼毛	绵羊毛	总　数
1830—1839	342	8	350
1840—1849	1,162	64	1,226
1850—1859	924	1,006	1,930
1860—1869	1,167	1,671	2,838
1870—1879	1,582	1,589	3,171
1880—1889	1,584	1,040	2,624
1890—1899	1,821	1,288	3,109
1900—1909	2,492[a]	1,338[a]	3,867
1910—1919	3,097[b]	2,700[b]	5,286
1920—1929	2,730	1,840	4,570

注：a、不包括1901、1903和1901年。

b、仅指1913—1919年数字。

由于数据涉及的年限不同，故有些年的分组数字加起来与总数不符。

资料来源：前引索普和伯特伦，第64页。

另一方面，鉴于1913年后世界市场与羊毛价格稳步上升，牧

场主们自己也着手扩大牧草地和羊群以加紧生产，不过常常要侵害农民的传统权利。处境日益恶化并受到更严重剥削的农民为此发动了一系列流血的虽然是持续时间不长的起义，有人计算在1901—1930年间共计达300次以上。[23]这些起义中较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15年的普诺省。率领起义的特奥多米罗·古铁雷斯·奎瓦斯，从前是军人和地方官员，他起了个印第安名字叫鲁米-马基（石头手掌），并企图复兴已失败的印第安人的塔万廷苏约帝国。鲁米-马基利用安第斯人内心深处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募集621了一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袭击了好几个大庄园，后来被正规军击溃。

阿亚库乔省一些地方的农民社会同样受到养牛场的损害，因为20世纪头25年迅速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对牛肉需求的不断增长刺激了这些养牛场的发展。例如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在他的小说《血的节日》（1941）中令人信服地详细叙述了普基奥地方的“米斯蒂斯”们（mistis，印第安人给南安第斯山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地主们起的名字）同当地村社之间由于他们要占用更多的牧场放牛而导致的冲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在中部和北部高原也零星地发生了农村社会遭到破坏的情况。例如，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为了寻找廉价的食品供应和稳定的劳动力，在那里购买了好多大庄园并使之现代化。由于它的冶炼活动一时造成的生态破坏，这家公司趁机购得了近30个庄园，土地面积达27万公顷即1,057平方英里。这家公司在巩固它的采铜业时已经使几百个中小矿主丧失了原来的地位，现在它又重复这一过程而损害这个地区的农民、垦殖农(colonos，庄园土地上的佃农)为小自耕农的利益。

在重新组织那些古老庄园进行更有效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通常已维持很长时期的租佃关系被突然终止，从而使庄园土地

[23] 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18-19世纪的阿雷基帕人和南安第斯山人》（利马，1977），第123—125页。

上的劳动者失去了基础和原来的地位。类似的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现代化也影响了北部的高原庄园，象卡萨格兰德这类沿海甘蔗种植公司购买了毗邻山区古老而常常是衰败的庄园，以便确保稳定的食品和劳动力供应。垦殖农（colonos）不仅失去了根基并被无产阶级化，有时还被转到沿海的种植园干活，因为那里缺乏劳动力。

不过，看来只有最大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企业——例如塞罗德帕斯科的畜牧卡、卡萨格兰德、波马尔卡和费尔南迪尼等——才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庄园改造计划。其他同样“进步”但不那么强大的山区地主也可能想效法，希望赶走他们原来的劳动力或者将他们变为工资劳动者，以便获得更高利润。但农民们常常抵制了这种强迫或引诱他们放弃庄园资源使用权即放牧权和耕种小块自给性农田的努力。这些地主看来缺乏实施其现代化规划的力量。[24]

622

资本主义还用圈地之外的其他方法影响了高原的印第安人村社。中部高原的商业经济最初是由这个地区的精英们在1860年后发展起来的，接着因外国大企业在1900年进入采矿业而得到扩大，随着它的形成，农民社会的“道德经济”逐渐而不可挽回地衰落。一个农村资产阶级在这个社会内部出现了，它主要通过与商人、矿主和进步庄园主发展主顾关系而使自己同更广泛的地区经济的资本网络成为一体。如前所说，其结果是加剧了阶级分化、阶层化和冲突的过程，特别在1930年以后，它导致了农村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一边是新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小农场主，另一边是日益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农民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外流到了矿山、种植园和城市。[25]

这样，在19世纪末及其以后，由于一部分山区越来越被引入

[24] 见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庄园、种植园和集体农庄——古巴和秘鲁的农业阶级社会》（伦敦，1977）第67—92页。

[25] 弗洛伦西亚·马略恩：《保卫秘鲁中部高原的村社》，第三章。

了国际经济，社会结构——包括印第安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土地的私有化、大庄园的商业化、采矿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以及铁路和公路网的扩展都在农村增加了商业机会，加剧了对土地的压力，扩大了工资劳动的可能性。结果加速了社会的阶层化，与无地劳工和兼当工人的农民（worker peasants）一起出现了商贩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

显然，由于这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一部分安第斯人的农村社会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同样真实的是这个社会的很大部分仍封闭在一种可追溯到17世纪的传统主义结构和停滞状态中。这种结构的关键是庄园制，它几个世纪的经久不衰和对改革的抵制是20世纪继续存在的发展问题之一。关于本文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初大庄园的人口情况可从1876年人口统计中窥见一斑，当时计算有3867个这类单位，共有居民373，355人，占农村人口的24.7%。许多庄园相对地说是中小型的，占地50至几百公顷，但另外一些庄园占有广大区域，虽然常常没有充分利用。例如北部山区的乌迪马庄园占地大大超过10万公顷，而正在扩大的畜牧业中心协会在1930年已拥有约230，673公顷土地。

不过，不管它们规模多大，庄园的生产力普遍很低。甚至到20世纪，用现代标准来看，它们仍往往经营得很马虎（常由在外地主管理），投资很少，利润被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再投资，与有限的市场经济仅保持松散的联系，如此而已。它们的劳动力主要是印第安垦殖农（colonos）他们为了使用一小块维持生计的自给性土地（mañay），必须在庄园（demnse）的土地上干若干天农活(faenas)以及或者在主人家里做若干天仆役(pongajo)作为交换条件。印第安人有时也为挣工资干活，但多数情况下他们获得的是实物或庄园商店（cantina）里的货物。总的说来金钱在庄园世界内是一种稀有商品，市场上富有特色的交换方式是物物交换。实际上，进入20世纪后很久，安第斯山的庄园里仍极少实行任何会计制度。

庄园工人的流动也极少有，这不仅是因为偿债劳役制常将工人固定在庄园里，而且还因为享有一定程度保证的垦殖农(colonos）的处境，相对地讲，比常常处在萧条状况下的当地劳动市场上的临时工资劳动者还要好一些。所以农民生活基本上被限制在庄园里，只有隔一段时间到来的宗教假期和节日才使平时物质上十分枯燥乏味的生活增加一些色彩。

这个世界里的个人关系是由古老的父道精神规定的，它起源于伊比利亚的封建主义及其在印加人习惯的影响下在安第斯山产生的混合物。它的特点是具有某种不对称的互惠性，即以自由和独立换取一小块土地的保证，以服从、归顺和忠诚换取“保护”和可赖以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条件。一位“恩主”对待“他的印第安人”可比之于严父对待他的儿女；如果他们“好”，就可得到某种亲切的甚至慈爱的回报，但如果他们“做坏事”，超越了为他们所规定的作用，向父亲的权威挑战，那末就将对行为不轨者进行常常是严厉的、甚至是残暴的惩罚。 624

这个社会的权力当然是领主们垄断的。在仁慈的父道主义出现问题时——这是地主不在当地的情况下常发生的事——在其下属（管家）负责庄园的日常事务时，几乎没有什么保护能保证无权者得到公正对待。教会有可能发挥一定的精神力量，但当地教士往往受地主雇佣，或者至少象教会本身一样要依靠他们的雇主一施主的慷慨赏赐。遥远和软弱的政府极少进入这个世界，它把权力交给了领主和他们在当地的能够维持并确实维持了秩序的盟友。在它真的进行干预时——如发生个人或集体的反叛时，它就伙同地方势力一起来维持既定秩序。从最坏的方面来看，正如冈萨雷斯·普拉达所说的，这个世界突出地表现了“保安长官、地方长官和地方教士的专横，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暴政，使印第安人长期遭受压迫”。[28]

---

[28] 引自胡利奥·科特莱尔：《秘鲁的阶级、国家和民族》(1977年利马出版)，第123页；原文为“La tiranía del juez de paz, del gobernador y del cura, esa trinidad embrutecedora del indio。”

自由派寡头政治和社会问题
（1904—1919年）

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沿海的传播及其在山区渗透而来的社会混乱和紧张，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之一。在精英们聚集起来进行交际和谈论政治的国会会议厅和幽雅的沙龙里，首要的议题是怎样对付这个新的日益深化的危机。文官主义寡头集团在成功地建立了它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霸权后，现在越来越面临着更长期的挑战，即要解决他们曾经热切地欢迎的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反响。社会危机造成的严重威胁，有使寡头集团分裂的危险，甚至会动摇寡头政府的合法地位。

不过，执政的文官主义党内最初显示的政治分歧更多地是内部而不是外部引起的。1904年寡头集团内部在挑选文官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一事上出现了代与代之间的分裂。比较年轻和进步的候选人何塞·帕尔多（鸟粪承运商和党的创始人曼努埃尔·帕尔多之子）战胜了保守派而成为党提名的候选人。这等于是当选，因为该党控制了政府及其选举机器，结果帕尔多就任总统，为期4年（1904—1908）。

625

帕尔多任期内，社会问题进入了政治舞台。1904年，即在爆发严重的劳工骚动以前，一位曾经从欧洲人的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的著名法学家和文官主义党的思想家——何塞·马蒂亚斯·曼萨尼利亚在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所提出的法律议案涉及传统的劳资问题，诸如调解和仲裁、工人的工伤赔偿、在工作地点对儿童与妇女的保护以及工作周的天数等。但是这些建议在党的保守派中象捅了马蜂窝似的引起了一阵反对，他们在后来几年内设法阻止其中的大部分在议会通过。

在帕尔多的继任者和被保护人奥古斯托·B·莱吉亚当政期间（1908—1912），该党的团结又遭到了一次打击。莱吉亚是一个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人，他凭着自己的才能、魅力和商业上的成

就而加入了寡头集团，不久他就和帕尔多及该党其他领导人决裂。雄心勃勃而爱独立思考的莱吉亚一心一意想按自己的方式办事，他不久就被文官主义党的主流看作是一名政治上闹独立性的危险分子。

1909年莱吉亚在挫败了彼罗拉派的一次未遂暴动后，在某些外交政策和预算问题上（他因建议大幅度地增加政府支出而背离了文官主义党有历史意义的放任政策）以及在他个人专断的统治作风上，他与党越来越多地发生纠葛。1911年在他试图解散全国选举委员会以操纵国会选举时，这些分歧达到了顶点。这导致一些文官主义党人在国会内组成了一个反莱吉亚集团，接着在莱吉亚成功地策划了一个议会多数派后，这些文官主义者便脱离了该党，以便组织"独立文官主义党"。

由于受到自身队伍内部深刻分裂的削弱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动乱的挑战，文官主义党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在1912年一度发生动摇。文官主义党的候选人安特罗·阿斯皮利亚加在当选为总统后受到利马前市长、民主党人吉列尔莫·E·比林赫斯特的支持者所组织的一次总罢工的抵制。这场争议不得不在国会中解决。在那里，得到街头工人阶级有力支持的比林赫斯特与莱吉亚的人做了一笔交易，并当选为总统。 926

比林赫斯特虽然来自富有的经营硝石的家庭，但他政治上有独立性，早年是个民众主义者，他同文官主义寡头集团保持着距离。他早就是彼罗拉的支持者和政治上的门徒，自从1909年他任利马市市长后他在该市工人阶级中集合了一批追随者。作为市长，他对这些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表示了某种父道精神的——尽管还不是煽惑性的——关心，包括努力改善他们的住房、教育和一般状况。一旦就任总统后，比林赫斯特就试图发展这类进步政策以调和国内劳资间不断增长的裂痕。他制定了一项方案，除某些例外，它给予工会以组织和罢工的合法权利，同时设立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强制性仲裁小组。由于无法说服国会的保守派多

数批准这一方案，比林赫斯特企图组织战斗性的工人委员会，发动群众直接参加政治进程以向国会施加压力。被激怒的寡头集团发现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突然受到了威胁，立即通过国会作出了对抗性反应。

对比林赫斯特的不满也表现在军方内部。部分地这是因为军方认为在就塔克纳和阿里卡的前途这个棘手问题进行微妙谈判时，总统对待智利的态度有些“软”。比林赫斯特还已着手将军方在预算中的份额从25%减为21%。㉗

这样，尽管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但脱离了寡头集团和军队对比林赫斯特政府却是致命的。文官主义党人早先曾努力使军队非政治化，现在转过来又与它密谋推翻政府。1914年，奥斯卡·R·贝纳维德斯上校领导了一次反对比林赫斯特的成功的政变，927 它巩固了军队和统治阶级之间为维护既定秩序而建立的心照不宣的联盟。第二年，前总统何塞·帕尔多再次当选。

第二届帕尔多政府时期（1915—1919）正逢拉丁美洲这个外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处于经济混乱时期。最初，战争切断了依靠出口的秘鲁经济与其欧洲市场的联系，使秘鲁经济立即陷于萧条。但过了一两年秘鲁一旦重新获得它从前的市场后，它向这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参战国的输出便猛烈上升。不过，战时繁荣也带来了某些使现有社会紧张状态加剧的畸形经济。例如，1914—1918年利马的生活费用差不多翻了一番，而工资几乎保持不变。这种通货膨胀部分地是由于沿海的农业生产由生产粮食转产世界市场上价格猛涨的经济作物如甘蔗和棉花等。在利马和一些出口区爆发了罢工浪潮，那里造成的破坏可能危及国家的主要外汇来源和国家收入，并损害文官主义党内有些最有势力者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帕尔多终于促使国会通过了某些十多年前最初由曼萨

㉗ 埃内斯托·耶佩斯·德尔卡斯蒂略：《20世纪最初数十年秘鲁的发展》，载《秘鲁新通史》（1979年利马出版），第153页。

尼利亚提出的劳工法律，包括保护女工和童工、工人的某些法定休息日、关于工人住房、学校和保健的规定以及禁止“包身契约工制”等。(这些改革仅适用于现代经济飞地部门，即城市、种植园和采矿工人。对于山区庄园中毫无政治力量的农工则几乎或者说一点都没有做什么。)可是，这些缓解剂并没有能制止不断发展的工人骚动。也许因为比林赫斯特的经验已使文官主义寡头集团的态度僵化了，帕尔多不愿或者说无法进一步进行改革，而越来越求助于历史悠久的由政府进行镇压的老办法。结果，随着帕尔多的任期临近届满，1918—1919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对抗，尤其是在利马。

1919年初，一系列停工事件发展为一次使首都陷于瘫痪的大规模总罢工。斗志昂扬的罢工工人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普遍降低正在猛涨的生活费用，他们在文官主义政权体制的队伍中引起了一阵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慌。随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第一次出现在国会大厅，利马的街头变成了罢工工人和防暴骑警之间进行血战的战场。导致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比以前更危险和更有爆炸性的是其他社会阶层对“旧政权”正采取类似的反叛态度。如前所述，此时南方的农民起义也在加强。也许更为不详的是，一些中等阶级阶层不仅同情而且参加了街头工人的行列。如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政府官僚和私人出口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他们同地位已确立的执政的文官主义寡头集团可能有不同的利益、态度和愿望。 628

有一处能够很容易看到这种阶级结构变化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大学——圣马科斯大学。1907—1917年间，新录取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地方和城市中等阶层）人数将近增加一倍。这些中等阶级学生早在1908年便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他们随后便着手改革大学过时的课程和行政机构，以便为他们的特殊需要和抱负创造新的活动余地。就象比林赫斯特插曲曾在许多方面预示了衰老的文官主义秩序即将面临危机一样，1918年的大学改革运

动也在微观上象征着正在破坏那种秩序的更大的社会趋势。不过，只是在1919年这个运动与工人阶级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汇合起来时，那个秩序才突然终止。

说明新的中等阶级各阶层正酝酿骚动和造反的另一标志、也是导致1919年人民发动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土著主义运动。在已往十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事件的鼓舞下，有些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不少是梅斯蒂索人）开始重新发现秘鲁过去和现在的印第安文明的优点与价值。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主流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人种和文化民族主义，它可用来区别新兴的中等阶层和已"欧化的"上层分子。对于文官主义党人所创造的经济政治结构持批判态度的土著主义还有助于加强初起的民众起义。

最终结束文官主义党统治的真正的叛乱种子埋藏在政权本身的机体内，这个政权在面对人民的普遍抗议时仍不愿改变它的基本上是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特性。这个政权的一个固有问题是它没有能发扬一种植根于民众觉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本可能在最低水平上统一国家和行政，并使政府合法化。这一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外国倾向而不是民族倾向。

629

即使文官主义党成功地塑造并提出了某种"民族化"文化，它要在民众阶级中进行传播也将是成问题的。本世纪初，社会上关于教育的性质曾进行过激烈辩论，[28] 例如，亚历杭德罗·德乌斯图亚和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兰之间的辩论，德乌斯图亚维护精英主义的传统教育制度，而比利亚兰主张使之民主化并在其中注入一种他认为更适应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较现代的科学技术内容；尽管如此，自由派政府的意识形态机器比不上它的高压能力，在"贵族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内仍然是软弱无力和不发达的。因此，整个时期内国家对教育的支出极低，结果国民文盲率

---

[28] 见亚历杭德罗·德乌斯图亚：《民族文化》（1937年利马出版）和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兰的文章，载霍尔赫·巴萨德雷编：《文选》（1962年利马出版）。

异乎寻常的高。此外，这种已经不足的公共教育其内容并没有用来铸造民族文化，而是被用来在中上层阶级中散布精英们的极度贵族化和“新封建的”价值观念，同时在群众中灌输一种逆来顺受和宿命论观念。

这种十足的精英主义教育制度当然仅仅是文官主义寡头集团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反民主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已。比如说，虽然文官主义党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确实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形式上的议会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是极为有限的。议会不仅从属于行政权力，而且它也不代表各社会阶层和地区社会集团。这样，城市中等阶级或工人阶级仅在有限的程度上有代表，而农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除非人们接受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说什么他们的利益是由他们的老板即大地主（在安第斯山称作“酋长”〔gamonales〕）代表的。这种“民主制”下拥有投票权的人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1899年大选中为10.4万人，1915年大选中为14.7万人）。即使在人数如此少的情况下，选举活动照常由第一大党、眼下是文官主义党在上面“安排”的，它控制了选举机构，通过欺骗性的程序和其他选举中的不法行为操纵选举。总之，选举骗局是这个自由国家政治上的常态。

有三个人物对结束文官主义党旧政权起了关键作用。其中的两个人是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他们来自新兴的“1919年的一代”，一位是学生积极分子和往昔的革命家，另一位是无产阶级思想家。这两人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自从本世纪初以来这种社会变革已增加了势头，现在已开始改变政治局面。他们两人在形成新的国民觉悟中也都发挥了领导作用。如同一代人以前冈萨雷斯·普拉达所做的那样，他们向文官主义体制的思想和哲学根据提出挑战，并开始阐明他们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它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从对社会进行理论批判出发（二者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他们在本世纪的其余时间内对国家政治的发展仍将继续发挥

巨大影响。但是，两人虽然产生于同一个社会母体，他们政治活动的性质却有很大不同：阿亚基本上采取改良主义姿态，而马里亚特吉则采取革命立场。

阿亚·德拉托雷于1895年生在特鲁希略。他的家庭属于上层中等阶级，与这个地区正在没落的甘蔗种植园贵族有关系。他童年成长时也正是资本主义迅速地改变和破坏他家乡和地区的庄园主面貌的时候。像他那一代和那一阶级的许多成员一样，他上完本地大学后，离开家乡前往闪闪发光和充满希望的首都，在圣马科斯大学学法律。不久他便深深地卷入了大学政治活动，1919年他是率领学生上街支持工人的领导人之一。

马里亚特吉生于一年前的1894年，出生时父母已离婚。他在经济上拮据的利马中等阶级环境下长大成人，身体虚弱。由于经济状况所迫，他年龄不大时就寻找工作，他在很有威望和影响的利马报纸《新闻报》社当了一名勤杂工，后来，在15岁时当了排字工人。他的敏锐、爱好刨根问底和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头脑很早就引起了他的雇主们的注意，他在报社里升级很快，1911年成了记者。最初他因诙谐地报道利马的社会状况而出了名，但在越来越增加的对社会关心的激励下，不久他对周围正在展开的首都的政631治动乱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随着他的逐渐激进化，他离开了《新闻报》，先后就职于一些较小的更为进步的报纸，到1919年他成了献身于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闻工作者和思想家。

莱吉亚的十一年（1919—1930年）

从1919年的社会政治局面中获得最早最直接好处的人是前总统奥古斯托·莱吉亚。莱吉亚是一个典型的在本世纪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资本家，他的企业才能在各种行业中留下了印记，从糖的出口、保险和银行业到铁路建筑和割胶业莫不如此。1904—1908年间，他是何塞·帕尔多的财政部长，已成为文官主义党进步派的领导人，并且在1908—1912年任总统期间与另一派

多少有点两军对峙严阵以待的味道。但是，他终于与文官主义党决裂，并在帕尔多第二次任期内被流放国外。1919年莱吉亚感到秘鲁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所以他回到国内，试图在政治上利用正在威胁着文官主义党地位并可能使之倾覆的社会大动乱。

他很快成了风云人物。他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技巧答应进行改革和攻击文官主义党，得到那些身受出口经济剧烈的周期性摆动之苦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1919年他当选为总统，并在宪兵队的帮助下挫败了文官主义党人阻挠他当选的努力，解散了议会，执掌了大权。这位小个儿新总统——他身长仅5英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结束了文官主义党长达25年的政治霸权。他造就了一个新政府、“新国家”，它以进行改革的诺言开始，结果却蜕变为11年的独裁统治（1919—1930）。

莱吉亚在上台最初3年内采取了一种“民主的”改良主义姿态，目的是巩固他的民众支持基础。在将盘据在政府中的文官主义党人统统扫除后，他即着手缓解城市工人阶级的紧张状态，命令实行改革，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强制性仲裁和最低工资制等。与此同时，他大大扩展了市政工程，为身受战后出口业衰退之害的工人阶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作为政权中坚的中等阶级也从莱吉亚的改革中得到好处，他们在“十一年统治”期间得到可观的发展（见表2）。例如，新总统在一项详细周到的《雇员法》中对白领职工的不满关怀备至。此外，他的大大增加公共部门职业的政策使公共机关行政管理人员增加了4倍。后来在莱吉亚采取更专制的态度时，一位当代的反对者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朗德颇为恰当地将这种政权称作是“官僚独裁政治”。 632

新总统还表示理解印第安农民的某些不满，不过，他是否完全理解正在继续使南部高原陷于混乱的农民起义的革命含义是令人怀疑的。除了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些动乱的原因外，他新设了一个负责土著事务的机构，规定了一个全国性印第安人的节日（“印第安日”），并在法律上承认了一个多世纪来都未予承

表2　1920—1931年利马某些中层职业人数的增长情况

职　　业	雇用人数		增长比重
	1920年	1931年	1920—1931年
商　　业	12,687	25,481	99.01
公共行政	898	5,313	491.65
律师业	460	848	81.35
医疗专业	932	2,408	158.37
工程师、技师	536	915	74.07
作家、报纸记者	137	341	153.28
会　　计	492	1,124	128.46
学　　生	8,643	17,067	97.47

来源：斯蒂夫·斯坦：《秘鲁的民众主义：民众的兴起和社会控制政策》（麦迪森，1980），第48页。数字未经核查。

认的印第安人在村社中的共有财产的合法性。这些措施虽然很受一部分农民的欢迎（有些印第安人把莱吉亚称颂为新的“维拉科查”〔Wiracocha〕——印加人的大神），但没有一项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安第斯农村社会的结构。不过它们确实成功地缓和了南方印第安人的不满情绪，同时巩固了来自新兴的城市梅斯蒂索人各阶层的支持，这些混血人正在土著主义运动中重新寻找他们的印第安人的根。

633

可是，莱吉亚为了最终制止国家的社会动乱，不得不调整经济，使之适应战后国际经济的现实。莱吉亚对付战后秘鲁的出口导向经济危机的战略在于既鼓励外国投资又大大增加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领域在这个国家发展。根据他与华尔街的业务接触，莱吉亚明白美国正在拉丁美洲寻求扩大它的资本投资和市场，作为对付国内战后经济混乱的一种手段。这位新总统还懂得开放巴拿马运河的长远含义，它不可避免地使处在外

围的安第斯山各国更加靠拢美国。大规模的直接的美国投资在采矿业中得到鼓励，那里的非国有化在“十一年统治”期间几乎全部完成。20世纪20年代末，铜和石油（分别占出口的22％和32％）已取代糖和棉花（分别占出口的16％和25％）而成为秘鲁的主要出口物（不过，出口多样化仍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一大来源）。在“十一年统治”间，秘鲁政府还通过金融企业J·W·塞利格曼合伙公司在华尔街发行了空前数量的债券。自从鸟粪时代以来秘鲁还从未如此成功地倚靠过外国金融市场。在1920—1928年间秘鲁的外债增加了1.05亿美元。[29] 它被用来资助大规模地发展这个国家为出口经济服务的基础结构：发展目的在使国内主要城市、特别是利马现代化的公共工程项目（卫生、公路等），扩大全国运输交通网络，建设沿海灌溉体系以及增加政府官僚机构。

这些措施一方面都符合莱吉亚扩大国家出口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的设想，同时对每笔支出的政治影响也经过仔细考虑，使之加强总统的权力基础。城市现代化不仅有利于其声音在政治舞台上正越来越响亮的中等阶级，而且也有利于一批新的同总统有密切政治联系的投机商和营造商。实际上，莱吉亚欢迎在国内兴起一个新的财政寡头，它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取代了旧的文官主义党寡头集团。与此同时，公众和官员的道德降到了异乎寻常的低点，而侵吞公款、贪污和欺诈之风已可同鸟粪时代不相上下。 634

莱吉亚依靠外国贷款来支持公共支出和鼓励外资的做法虽然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却加深了国家对出口的长期依赖。这10年因国内关税趋于下调，使新兴的制造业越来越受到外国进口货的冲击。而且，由出口部门（糖、棉花、羊毛等）积累起来的一点点剩余资本并没有流向有风险的进口替代工业，而流向了能保证迅速获得利润的建筑业和城市地产投机。

制造业在19—20世纪之交曾显示出有希望走向较平衡、自主

---

[29] 索普和伯特伦：《1890—1977年的秘鲁》，第115页。

的发展，但此时却继续了从1908年开始的长期下降。这从国内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生产中便可清楚地看出。1898—1908年这10年中纺织生产翻了两番，但后来10年仅增加50%左右，这以后完全停止了增长。与此同时，外国公司在纺织工业中的地位稳步上升：1902年占生产能力的29%，1910年占45%，1918年占55%，1935年超过80%。总的来说，在1918—1933年的15年内新的制造业企业的数目仅增加18%。其中多数企业限于为战后国家诱发的建筑热生产材料，而这种建筑热只维持到1926年。即使是这个部门也由一家外国公司，即特别得到莱吉亚政权青睐的庞大的美国基金公司所控制。到20世纪20年代末，自1908年以来工业化的逐步下降"是国家资本主义本身走下坡路的最显著的标志"。[30]

与此同时，出口部门、特别是棉花、矿物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糖的生产，仍然是20年代经济上的光明面。不过糖的出口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见以上图表6）。种植者错误估计了国际价格趋势，将战时的利润过多地投资于新的工厂和设备以扩大生产。这些投资由于气候的变幻莫测而受到严重损失：从这个十年的中期到结束，一场大旱之后紧接着是灾难性的暴雨和泛滥。然后，从1925年起国际糖市场又突然极度恶化，造成大规模损失和1930年前的又一次兼并及外国人接管这一行业的浪潮。

635

莱吉亚统治时期，外国贷款和赤字支出给了中央政府一种自从鸟粪时代以来它没有再享受到的权力。结果，它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前所未有地在国家的内地延伸和扩散。例如，全国交通运输网的扩大。莱吉亚雄心勃勃的公路建筑规划的完成（依靠"道路征募法"征召印第安农民完成）都增加了国家的力量而牺牲了地方自治。由于改善了通向内地偏僻地区的道路，莱吉亚得以发动一场协同战役，以消灭某些农村地区以至利马周围仍十分猖獗的土匪活动。为此目的还建立了一支专门的治安警察队，但有些恶

[30] 同上，第142页。

意中伤莱吉亚的人说这是一种御用卫队，是用来对付他的政敌的。这支较大的警察部队在内地的存在使政府有可能更好地控制当地的地主，那些地主拥有私人军队，历史上一直垄断着当地政治，有时甚至向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国家在各省确立了新权力的一个良好例证是它消灭了埃莱奥多罗·贝内尔的叛乱（1924—1927），此人是一个有势力的庄园主，实际上自主地控制着卡哈马卡省的部分地区。

莱吉亚还巧妙地利用已增加的国家财力编织了一种依附性的政治系统，它在全国和地方上制造出一种由官员和企业主组成新的“官阶”等级，他们的命运依赖于政府，实际上是依赖于莱吉亚本人。不仅如此，莱吉亚还懂得如何以个人主义的、越来越独裁的方式获取和运用新的国家权力。早在他掌权之初，他就着手操纵议会选举、在议会中塞满他自己的支持者和老朋友，从而使议会软弱无力。不久，议会就几乎变成了总统的橡皮图章。早在1924年，莱吉亚已开始抛弃了使他上台的民众主义与改革主义政策。他越来越依靠使用武力破坏罢工，并调动军队控制南方的农民起义。渐渐地莱吉亚将他的支持基础缩小为新的财政寡头，同时残酷地镇压反对他的人。 636

对他的统治仅有的一次严重挑战发生在1923年，当时他为了确保教会支持他“再次当选”，在一次精心安排的公众仪式上他建议把国家奉献给耶稣圣心。天主教教义一向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但现在莱吉亚却试图利用它的力量为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服务。但是，这种令人愤慨的赤裸裸地亲教会的行动激起了广泛的反对，而这又被学生领袖阿亚·德拉托雷用来反对政府。街头示威游行发展为骚乱，莱吉亚随即镇压了学生运动，流放了运动的领导人。

阿亚·德拉托雷由于少年时在特鲁希略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接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圣马科斯大学作为学生—工人联盟的一名领导人，他早就开始具有反寡头统治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被莱吉

亚流放后，他作为墨西哥政府的一位客人旅居该国期间又发展了这一立场；他在那里时有机会不仅目睹了1910年革命的效果，而且看到了北美经济南下向加勒比地区和中美的扩张。1924年他在墨西哥时创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简称“阿普拉”），一个基本上没有定形的、民众主义的、反帝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1930年后它在秘鲁等地扎下了根基。他在欧洲之行中访问了德国、苏联和英国（在牛津学习），之后于1928年又回到墨西哥，他在一本题名为《反帝与“阿普拉”》的基本著作中表明了他的仍在形成中的政治思想，该书于1936年首次出版。（手稿早在1928年已写成，但多年没有出版，因为据阿亚说他没有钱，后来又忙于日常政治活动，无暇修改。）

在这本他的最激进的著作中，乃至他后来的著作中，阿亚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是民族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抨击了外国对拉丁美洲渗透的剥削和破坏性总的影响，他把这种渗透看作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根据他在秘鲁和墨西哥的经验，他描述了一个大体上实行父道主义的传统社会是怎样被突然压倒并被转化为垄断性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巨大集中地。这些企业得到了等于是出卖国家真正利益的贪婪腐败的本地统治阶级（文官主义党人）的鼓励，使农民和一部分老的中等阶级无产化，控制了国民经济并操纵它为其私利服务。为了制止这一过程，他建议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由“被剥削”阶级包括农民、工人和激进中等阶级分子所组成的人民联盟（“阿普拉”），它将打倒帝国主义者，建设起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反帝社会。他认为，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够多，政治觉悟也不够高，所以不能单独胜任反帝斗争。它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出口区的工资实际上比传统经济区高，而有些中等阶级阶层常常甚至受到更野蛮的剥削和虐待。这样，他成了最早一批新一代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家中的一个，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应用和适应于其具体条件与宗主国的历史经历大为不同的非欧洲的

637

新殖民地社会。后来，在1930年推翻莱吉亚后，阿亚十分成功地将这种分析应用于秘鲁，他在那里组织和领导了民众主义的、但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阿普拉党，达半个世纪之久。

阿亚在组织民众力量反对莱吉亚独裁统治过程中（至少在1928年后）的主要对手是新闻工作者马里亚特吉。1919年工人运动后他被莱吉亚流放，其后4年中他先是居住在法国，后来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和巴比塞、索雷尔和葛兰西等革命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一起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激进思想。回到秘鲁后，有一段时间他与阿亚合作，阿亚那时已创办了一系列由学生管理的"民众大学"，以教育、组织和普遍提高工人们的文化和政治觉悟水平，他还组织了1923年的反莱吉亚示威活动。但由于思想和策略分歧以及政治上的对立，这两个人逐渐疏远，最后在互致针锋相对的公开信后，终于在1928年决裂。

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和拉美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的主要著作题目叫《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31] 638 这本书取自他的杰出的杂志《阿毛塔*》（1926—1930年）的专栏，基本上是他企图在进步知识界中就秘鲁社会的革命问题引起讨论的产物。他在书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分析，提出了他将来进行革命变革的方案。与阿亚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力量。（阿亚则认为外国资本投资有某些积极因素，所以后来他修正了他的观点，以至主张外国在秘鲁投资——不过政府要加以某些控制。）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他在承认多阶级同盟的一些好处的同时，断然反对阿亚主张的在革命斗争中应由中等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在这一同盟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在马里亚特吉

[31] 1928年利马出版。该书英译本1971年在得克萨斯出版。

* 阿毛塔（Amauta），克丘亚语，指古印加帝国的智者和导师，1926年马里亚特吉创办的杂志以此命名，他本人也被人尊称为"阿毛塔"。请参见《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译本，1987年商务版，第331—339页。——译者

看来，即使是激进化的中等阶层所抱有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它们最终将危及革命并引向法西斯主义。此外，阿亚将农民置于这个斗争中的次要地位，而马里亚特吉则认为他们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例如，他认为塞罗德帕斯科的矿工—农民体现了城乡革命问题的至关紧要的连系。最后，马里亚特吉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密切结合于安第斯山本地的革命传统，诸如土著主义运动、印加式“社会主义”、历次农民起义（阿图斯帕里亚、鲁米-马基）和劳工运动。马里亚特吉不满足于仅仅阐述理论，他在1930年过早地去世以前辛勤工作以实行革命，他在1928年创建了秘鲁共产党，[32] 1929年又创建了秘鲁工人总联合会。

但是，无论是马里亚特吉还是阿亚都没有能推倒莱吉亚的独裁统治。1929年爆发国际经济危机后，政府被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它结束了可追溯到1895年的文官统治时期（除贝纳维德斯外）。秘鲁的出口平均下降了59%，进口下降了63%。国家预算在三年内一下从5,000万美元减少到1,600万美元，造成一些公共工程的突然停工和政府雇员的停发薪水。声誉卓著和受人尊敬的秘鲁伦敦银行甚至被迫关门，从而在农业地区、尤其是军事政变发源地的南方引起了特别严重的经济困境。单是利马的失业率就估计达到25%，建筑工人和政府雇员的失业率更高。由于出口瘫痪，出口经济飞地部门中工人所受到的打击甚至更重。塞罗德帕斯科的劳动大军由1929年的1.2万人下降为1932年的5,000人，而甘蔗种植园的工资则大幅度地削减。1932年财政部长对这种经济崩溃的严酷现实作了也许是最好的概括，他在就职时“发现索尔贬值，公共债务停止还本付息，薪水和退休金被拖欠，公共工程瘫痪，失业不断增加，国库空虚，国民信心减少，信贷几乎完全枯竭”。[33]

639

---

[32] 关于马里亚特吉是否仍保持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论，因为他背离了以莫斯科为方向的共产国际的党的路线，为此他在192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受到了批评。

秘鲁人民在反对莱吉亚的同时拚命寻找能够制止经济滑坡的新的政治领导。有些人觉得年轻的梅斯蒂索军官路易斯·M·桑切斯·塞罗上校就是这样的领导，他在1930年8月发动阿雷基帕驻军造反，推翻了莱吉亚历经11年的独裁统治。另外一些人则寄希望于富有魅力的年轻的阿亚·德拉托雷和他羽毛未丰的阿普拉党，它的响亮口号——“只有阿普拉主义才能拯救秘鲁”——抓住了人们在两极分化、绝望和无奈处境下的普遍心情。不管他们选择了谁，那些在“贵族共和国”时期以及后来又在“十一年统治”时期饱受漠视的广大民众一下子踏进了秩鲁政治的主流，人们再也不能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国家政治进程之外了。

正在消失的利马

1921年何塞·加尔韦斯写了一本带有怀旧情绪题为《消失中的利马》的书。他在书中哀叹殖民地时期以来这个城市田园般的生活方式和许多特有的古老习俗的消失。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加尔韦斯所痛惜的是城市社会的迅速“集结化（massification）”，这是20世纪初秘鲁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后受到启发的结果。从土地上被挤出或拉走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流向城市和属于新出口经济的农工飞地。那里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获得稳定工作和过新生活的希望，虽然并不总能实现。这个新的工人阶级涌进了公司区和城市贫民窟，脱离了相对稳定的农村秩序，经受到了城市社会混乱的分裂性和瓦解性后果以及工厂、矿山和种植园的剥削。本身吸收了自由放任主义和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文官主义党政府，对工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提供保护以使他们不受国际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之害。这种状况最终助长了人民日益加深的

640

㉝ 引自阿尼瓦尔·基哈诺《帝国主义和1890—1930年的秘鲁社会阶级与政府》(19?8年利马出版)，第114页。

不满，它最初表现为劳工运动的兴起，接着由阿亚·德拉托雷和马里亚特吉表达了更激进的政治导议，前者主要是从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出发，后者则是一种更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

“贵族共和国”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危险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同时还面对一个新的上升的城市中等阶级。这个城市中等阶级，由于文官主义党垄断权力而不能参与政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及其后果又使这个阶级的经济繁荣受到威胁，加上民众情绪普遍不满，并在莱吉亚的鼓动下，这个阶级于1919年结束了文官主义党一个时代的统治。

但是，莱吉亚的11年统治加深了资本主义在秘鲁的发展也加深了这个国家依赖国际市场的幻想。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突出了这种幻想的破灭，这次危机和萧条吞没了依赖出口的秘鲁经济，促使民众激进化并将莱吉亚赶下了台。振兴国家的任务被有改革思想的1919年一代人抓到了手里，以阿亚·德拉托雷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为一方和以马里亚特吉在共产党内的继承者为另一方的这代人不失时机地着手重新规划一个更民族化和革命化的未来图景。但最后，寡头集团再次集结在得到人民拥护的考迪略桑切斯·塞罗后面。它联合军队成功地镇压了民众，形成了一段时间的“间接”统治，这种统治又维持了二、三十年，并以更微妙的方式再现了它在“贵族共和国”时期的霸权。

第 18 章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约1880—1930年）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这三个唇齿相依的共和国的居民，在1880至1930年这半个世纪即他们独立后的第二个50年内，在发展问题上发表观点时，常常比世界上较他们更幸运的地方的同代人要谨慎得多。1896年，哥伦比亚保守派中的不同政见派领导人写道："在各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发展都是缓慢的。按照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亚瑟·休·克勒夫〕的想法，如同潮汐那样，浪潮交替地前进和后退，但赢得的土地总比失去的土地要多；前进是永恒的。"另一位哥伦比亚保守党人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认为，前进对参与者来说，从来不是毫无阻挡的。"思维的发展同人类历史神秘地混杂起来。原则冲突与党派斗争交织在一起；人们因个人或集体利益而在这个或那个帮派中战斗，帮助或反对文明的事业，他们这样做时常常并没有什么目的或自觉性。"①

19世纪这部分地区经常爆发的武装冲突到20世纪初仍在继续。哥伦比亚的"千日战争"分别在一个未来的种植香蕉的中心和一艘美国战舰上签订了内尔兰迪亚条约和威斯康辛条约后

① 《分歧的原因》，引自L、马丁内斯·德尔加多：《1885—1910年的哥伦比亚共和国》（1970年波哥大版《哥伦比亚通史》二卷本），第一卷第381页。同上，见卡罗文，第二卷第15页。

于1902年结束，在这些条约中自由派的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和本哈明·埃雷拉将军承认了失败。委内瑞拉的零星起义在最后一次武装大起义——1903年解放革命——失败后又坚持了数年。厄瓜多尔埃斯梅拉达斯省的激进自由派游击队直到1916年才终于被镇压下去。

612 关于1880—1930年间的有些事件和史实，例如1895年厄瓜多尔所谓埃洛伊·阿尔法罗的"资产阶级革命"、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发展、哥伦比亚咖啡生产的扩大、对1922年瓜亚基尔罢工和1928年哥伦比亚圣马尔塔香蕉产区罢工的镇压等，人们已经作过研究，但有不少事情还刚开始被重新考虑，还有不少事情则虽有当地编史学的最新发展而至今仍然朦胧不清。在哥伦比亚，这个时期是保守派占主导地位；它没有赢得自由派历史学家的同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存在长期反抗并在1930年最终得到证明的时期，而写过"保守派共和国"的大多数哥伦比亚历史学家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在史学和政治上很难不拥护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与此相反，直到最近为止，保守主义者一直支配着厄瓜多尔编史学界，他们著文猛烈攻击自由主义，以至有时意外地得到社会主义左派在学术上甚至政治上的支持。委内瑞拉人有被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长期独裁统治（1908—1935）割断了与19世纪的联系之感，此人至今仍令唯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感到迷惑不解，而损害严肃的历史研究。除了带有党派性外，当地大多数历史著作对结构或制度问题这类政治问题也感到不耐烦。在旧的关于论战、回忆录和轶事的政治编史学与新的关于阶级和资本的过于武断的分析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在教会问题上的各种冲突也因纠缠不休的老一套议论一变而为近几十年来对它们的漠不关心而被遗忘，由此产生的一代人几乎不记得自由主义曾经是一种罪恶。衡量这些年的物质进步需要十分了解早先当地的社会等级和环境，这样才能正确估价它的影响。这种等级感在最近那些急于发现新的阶级构成的作者身上是缺乏的，就像英雄时代积极支持

当地资产阶级企业的人一样。可靠的外国观察家如凤毛麟角，其中只有一位——1900年英国驻波哥大副领事、1930年英国驻那里的公使斯潘塞·迪克逊——在多年后又重返故地。这个时期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都没有吸引很多移民，委内瑞拉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吸引了较多的移民，但为数并不可观。除了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问题、1902年英德对委内瑞拉的封锁、1904年美国卷入巴拿马同哥伦比亚的分裂之外，这些国家并不是外交界感兴趣的所在。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它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外国投资。但是，尽管由于这种情况而使人们对它们缺乏了解，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三个国家在1930年与它们在1880年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643

1880—1930年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历史有共同的主题，但也有很大差异。政治上，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脱离大哥伦比亚后就马上分道扬镳了。在新格拉纳达，文官们继续抵制军人——当时主要是委内瑞拉军人——的统治，从1863年起至1885年止“哥伦比亚合众国”生活在受激进自由主义启示的联邦宪法下。厄瓜多尔则已成为一个由委内瑞拉将军胡安·何塞·弗洛雷斯统治的国家，他在1830—1834和1839—1845年两度出任总统，在文人比森特·罗卡富埃尔特（1835—1839）以及自由派军人像何塞·马里亚·乌尔维纳将军（1851—1856）或早期的伊格纳西奥·德·本特米利亚将军统治下的那种自由主义经历，都不能抵消始于1857年的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可怕的专制主义和教皇至上主义年月。1875年加西亚·莫雷诺被暗杀后，由暧昧人物本特米利亚统治了近10年，他是一个到处竭力争取支持的人；之后建立了一连串的进步党政府，最著名的是弗洛雷斯将军之子安东尼奥·弗洛雷斯·希洪领导的政府（1888—1892）。弗洛雷斯试图通过良好的治理调和不同的地区利益，既避开加西亚·莫雷诺继任者的恐怖主义保守政治，也避开加西亚·莫雷诺的大敌胡安·蒙塔尔沃的继承人反教权的和偏

感性的激进自由主义，采取后一立场的还有许许多多哥伦比亚的冒险家和小册子的作者，他们在保守党取得1885年哥伦比亚内战的胜利后到南部寻求机会或避难。这样，在1880年前后，虽然可以说没有哪个共和国取得了持久的稳定，但它们的政治困难和可能发生的进一步演变却并不一样。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实验更为紧张——实际上是南美最紧张的——并且正进入危机时期。厄瓜多尔的极端保守主义——同样，加西亚·莫雷诺的彻底纲领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已让位于较有妥协性的继任者，但并不是让位于刻深的妥协；“进步党人”是一个很小的精英集团，小得被人称做是只有“指环”大的小圈子。激进自由主义对这种排他性集团的威胁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便已露端倪，而厄瓜多尔却无法避免这种它的北方邻国此时已在摆脱的经历。

614

哥伦比亚人和厄瓜多尔人至少在坚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潮流方面是共同的。而在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霸权被取代和1846—1848年的“保守派共和国”结束后的20年内，任何公开声明的保守主义潮流便消失不见了。19世纪50年代共和国在莫纳加斯家族统治下以腐败和行政混乱而闻名，1859—1864年的联邦战争使行政状况更糟。但到1880年，这种混乱状况在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手里（1870—1887）得到了明显的纠正，因为布兰科使用了那些继承“大哥伦比亚”的其他共和国所无法得到或无法应用的资源和技术。一位在1830年访问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人一定会感觉到他是到了一个外国。这样一位访问者在1880年一定会更敏锐得多地感觉到他已不在国内。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自由派在1880年已感到里奥内格罗的激进宪法（1863年）与时代的需要不合拍：它将教会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它成立了9个“有主权的”州，它规定进行经常性的、混乱和必然充满欺骗行为的选举，它在处理州的事务中最终要依

靠联邦军队（哥伦比亚自卫队）的干预，它的立法花样多得令人烦恼，还有无政府状态的财政和总统任期两年制等。而且由于它本身的明文规定，要进行改革也难。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崩溃而使局面更加困难时，拉斐尔·努涅斯总统在内战时期中干脆宣布终止宪法，并任命了一个“独立”和保守的制宪议会以制订一部能保证“科学和平”的新宪法。1886年宪法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州降为省，由总统任命省长治理；相应地，地方长官由各省省长任命。宪法还规定进行间接选举，并规定了选举人的财产或文化资格。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政府权力将保护它，并将确保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而受到尊重。”教会后来在1887年的宗教事务协约和布道区公约中又获得了更多的特惠和保证。里奥内格罗宪法时代（1863—1885）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最初被代之以一个时期的“预防性审查”即直接审查，接着又颁布法令，授予行政部门以处理颠覆性出版物的权力，授予法官判决攻击性出版物的权力。武器的自由贸易也终止了，而自由主义者曾十分自豪地取消了的死刑则被象征性地恢复了。努涅斯总统和他的继任人还维持了一支较大的、通常约6000人的军队，并享有某些“特别职能”；总统任期延长到6年，并可重新当选，不过这两项规定后来作了修正。 645

“科学和平”的这些秘诀被证明是不完善的，所以以后不断地进行修改，但1886年宪法的主要内容至今哥伦比亚仍在执行。而且最初它也是成功的。1888—1892年，当“复兴”的设计师努涅斯从他在卡塔赫纳港的半退休生活中注视着周围时，副总统卡洛斯·奥尔古因执掌大权，后者在任期结束时说：“在我执政的4年中，没有人听到一声枪声，没有流一滴血，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我使共和国处在和平之中，我也没有向人借债。”他拒绝实施死刑的规定，所以死刑实际上等于废止了。看来，19世纪的最后数年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人被排除在政府以外，前者还被排除在当选的国民议会外，但他们只受到轻微

的镇压。卡洛斯·奥尔古因暂停了7家期刊，罚了12家期刊和3位印刷商的款。他有三次使用了他的"特别职能"，其中两次是为了限制个别保守党人的活动，一次是为了照顾桑坦德将军的一位后裔。在1892—1898年任副总统和总统（1894年努涅斯去世后）的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更为积极，特别是对付某些自由派报刊：使政府失大于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闭《报道者报》和流放它的社长、前总统（1874—1876）圣地亚哥·佩雷斯。不过这样直接地进行控制是罕有的事，国外的激进小册子作者所描写的"复兴"政府的形象与仔细观察后显示的形象并不相同：新闻并非千篇一律，在广泛的限制下存在许多争论，国会内虽然只有一个自由党，但仍难以驾驭，地区的一贯的不同政见并未被吓倒，警察几乎不出现，大部分时间内也看不到军队。单纯的"共和主义习惯"继续在流行，从外表上几乎不能将那些掌权的人从产生他们的那个商人、地主、律师及文人学士社会中辨别出来。这是一个能言善辩的文人政府；努涅斯、卡罗和奥尔古因都是好争辩的人，他们不能想象政治生活怎能没有报纸或国会中的辩论。把他们同委内瑞拉的同时代人古斯曼·布兰科或华金·克雷斯波作一对照，差别就立即昭然若揭了。他们表面纯净的争论属于圣菲德波哥大的教会和律法主义传统，而能言善辩乃是最普通的政治生涯所必需的。有时过于好争辩也可能有害，例如易于动怒而变得武断的卡罗就是如此。论辩之风也可能因发生选举骗局和内战而中断。

对于掌权人士来说，操纵选举的能力比和平时期各种镇压形式重要得多。1885年的独立党—保守党联盟不久就得以同自由党自1863年以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独享的一统天下相媲美。多名额制度被代之以单一代表选区制，但由官员、私人和教会联合进行控制的局面使任何想保证少数人有代表权的希望落了空。1885—1904年间，只有两名自由党人进入了国会，他们是马格达莱纳省的律师路易斯·阿·罗夫莱斯和安蒂奥基亚地区那位想做

党领导的不安于位的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选举优势完全在执政党——“独立党”和保守党一边。这一广泛联盟的最重要的竞选帮手是地方官员和地方教士，他们送交的选票一定比民间传说的热情的“保守派地主”多得多；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地主们常常不愿直接卷入政治，况且他们之中还有许多自由主义者，由地主控制的选民不可能产生如此一致的结果。根据新的选举法，政府和复查机构的任务比较轻松。它得到教会的支持，而教会已经学会怎样保卫自己，并且成了并保持为这个时期及后来的一个强大竞选者，足以防备除保守党的分裂外的一切事变。军队也按照命令投了票。在此情况下，保守党就无需有自己的另外的机构。它可能在某些城市的选举中失败，但共和国的绝大部分仍是农村，而哥伦比亚农村的大多数是保守主义的。

647

可是过于完善周到的选举制度是虚弱的源泉。自由党并没有被弄得闭口无言，而是满怀愤懑，党内的好战倾向加强了。只要有好的时机——经济发生困难，政府的顾问们出现分裂，外国给予一些鼓励，即使对付不了政府但有希望排挤掉本党的现有领导——只要有少数人就能发动一场内战，而选举中的行为和直到1899年的各届政府的排他性都可作他们现成的口实。自由党的大多数人认识到1885年激进派作出的用战争反对努涅斯的决定是灾难性的，原有领导人坚决主张和平。自由党前总统圣地亚哥·佩雷斯坚持反对“那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新的关于机枪、步枪的胡言乱语，它们只会牺牲更多的爱国者而给复兴派以更多的挽救国家的话题。”② 但是如果政府不给他们任何让步，主和的自由党人也很难维护他们的路线。由于一向依赖于受严密操纵的制度，使得努涅斯的继任者们、特别是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对自己党内的意见也过于漫不经心。卡罗因他的专横作风而受到安蒂奥基亚人和“历史悠久的老资格”保守派人士（他们的“复兴”意

② 同上，第一卷，第343页。

识尚未完全泯没）的批评后，甚至连他本人都开始拒绝使用保守派这个称号，而宁愿改用“天主教”一词。1898年卡罗终于与国会发生了不和，同时他还策划了灾难性的总统继任事，目的是将本党内对批评他的意见持同情态度或有妥协表示的人排除在外。他为寒冷的波哥大选择的总统是来自炎热地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病人、曾于1855年任马利亚里诺总统的内阁部长的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圣克莱门特，副总统是一位七十岁的庄园主、学校教师和文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罗金，此人除了作为一个有广泛联系的波哥大人为了消遣和自保而必然获得的一点经验外，别无其他政治经验。西奥多·罗斯福后来在激动时把这位不诗不文、不伦不类和相当于《黑美人》之类的当地版本的作者称之为“南美著名的恶棍”。

'048

1895年爆发的一次自由党人的革命被政府军迅速扑灭了；当时国家比较繁荣，起义不受欢迎。在年迈的圣克莱门特到达首都以前，马罗金暂时执政，他在1898年在选举、司法和新闻等事务上提出了可能会使自由党人和保守党的不同政见者满意的让步，但这些让步在圣克莱门特接管权力后又被取消了。自由党人于1899年8月再次发动战争；为数不多的自由党谋反者装备的步枪更少（可能只有16支），在那个月袭击布卡拉曼加，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尽管如此，战争却继续了近3年，即“一千天”，在全国打打停停。战争开始时正逢当时已成为哥伦比亚主要出口物的咖啡的价格下跌，导致百业萧条和政府资源减少。自由党人得到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的自由党统治者在道义上和某些物质上的支持。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如促使圣克莱门特下台并再次由马罗金取代他的职位——但他们无法分化战场上的对手，或者在兵员、武器和纸币的优势资源上与对手相匹敌。1902年他们终于投降。战争使几万人丧生——至今很难作精确计算——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战后不久巴拿马又在美国鼓励和保护下分裂出去。对此，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负有罪责，因为前者将巴拿

马变成了战场，后者则在谈判将运河租让权由法国公司转给美国的过程中采取不切实际的拖拉方法，同时还因他们漠视巴拿马人的利益和感情。两党都无法抗拒巴拿马的分离，不过哥伦比亚国内对此反应不一：少数有头脑的人因无能为力而感到羞耻，广大民众漠不关心，国内其他地区的一些分离主义者则暗中羡慕。有意义的是此事却没有引起持久的反美情绪。何塞·曼努埃尔·马罗金任满了任期，1904年由拉斐尔·雷耶斯将军接任，他是1885年战争的老兵，是1895年那场小速决战宽大的胜利者，也是在1898年被卡罗取消了竞选机会的不可靠的候选人之一。雷耶斯没有参加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在巴黎任哥伦比亚驻法公使。

雷耶斯在1904—1909年的"五年"总统专政期内，进行了多种政治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少数派代表制，尽管这种代表制是由雷耶斯以个人和专断形式强加的。他任命自由党人在他内阁六部中的两个部任职，并压制了国会的不同意见，任命他们参加经他指定的制宪议会。乌里韦·乌里韦将军作了他的外交官，他在雷耶斯鼓励下派他的两个儿子到智利士官学校学习，培养他们将来参加计划中的哥伦比亚新的职业军队（一个智利军事使团已签约负责训练工作）。在雷耶斯统治下，自由党人放弃了联邦主义——他们在1899年尚未放弃名义上对里奥内格罗宪法的忠诚——并基本上放弃采取内战的手段。战争使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有些著名的老的"主和派"领导人已在战争期间自然死亡，同时战场、那怕是失败的战场也造成了一些可以在和平时期利用的名声，其中主要有本哈明·埃雷拉将军和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前一位将军被认为是较优秀的军人，在他于1924年去世以前，他的沉默寡言和坚强的领导素质对自由党人中一些重要的老党员特别有号召力。埃雷拉是一名军士长的儿子，15岁就自愿参加了哥伦比亚自卫队，在1885年开始"复兴"以前一直是一名职业军人，这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是罕有的。他本人并非思

649

想家，但作为自由党领袖他的讲求实际的政治感促使他鼓励吸收工人加入自由党，并在他的晚年积极创立思想自由的“自由大学”。乌里韦·乌里韦将军的军人生涯并不那么顺利——他的不利条件是他来自温和保守的安蒂奥基亚地区以及他过于讲究纪律——但才智过人。19世纪90年代，他是自由党在国会中唯一的有力的代表。他把他与波哥大大主教关于自由主义是否是一种罪恶的论战带到了罗马——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宣称自由主义是罪恶——他还作过论社会主义的讲演。他在雷耶斯总统任职时期辞别了外交生涯，回国后撰写了关于咖啡、关于牧场牧草和关于香蕉方面的文章。他兴办了自己的报纸，他的通信状况表明他正在比党的一般要人低得多的一级人中建立一个自由党的联系网。他在波哥大组织了一个“工人组合”，它在贫苦的工匠区（拉佩塞韦兰西亚）很有力量。他在同事中不大得人心，他们觉得他爱

650 虚荣和投机取巧。他与埃雷拉相互嫌恶。由于他的独特的政治路线造成的紧张关系大概与1914年他被暗杀有关系。

雷耶斯将军想当哥伦比亚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抱负在1910年化为泡影，因为各方面对他的反对不断增加，他过早地企图恢复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成了他们有力的争点。经济恢复的缓慢使他饱受挫折：他制定了计划，但没有付诸实行的财政手段。他的温和的专制行为和有时表现的虚荣使他在两党内都树了敌。他在确信对他的支持已消失后，在一次去圣玛尔塔香蕉区旅行之际悄悄地离开了国家，那个香蕉区是他花了很大力气鼓励建立的。在两党都欢迎他离职的气氛下——这不仅与他的缺点而且与他的宽容和眼界广阔也有关系——国民议会将总统任期缩减为4年，禁止连选连任，规定国会每年要开会，恢复直接选举制，并为少数派代表问题作了某种规定。选出了由一些著名的政党领导人组成的特别联盟——“共和联盟”的领袖卡洛斯·E·雷斯特雷波为1910—1914年的总统。这样，人们就在公民和谐、自由恢复和坚决实行文官主义的情况下庆祝了独立100周年。纪念100周年的这

代人有时被人认为是企图保存上述这些价值观的。

在卡洛斯·E·雷斯特雷波的共和联盟政府下，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掌握在保守派手里。直接选举的恢复也有利于保守党——自由党或他们支持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人可能在波哥大和其他若干城镇获胜，但在整个农村选民中绝不可能取胜。1914年，官方机构、教会、地方权贵和保守党舆论——那股思潮也有它的神秘性和它的英雄——以300,735票选举何塞·比森特·孔查为总统，他的共和自由党对手得36,763票。1918年他们以216,595票使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当选，而他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对手、得到自由党支持的吉列尔莫·巴伦西亚只获166,498票，从而在波哥大和14个省会中的11个的选举中取胜。1922年，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将军以413,619票对256,213票击败埃雷拉将军。对于1922年选举中的欺骗行为、暴力和教会的参与，自由党作出的反应是不参加1926年的选举，结果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在无对手的情况下以370,492票当选。只是到1930年，由于保守党分裂，自由党才赢得了总统选举：恩里克·奥拉亚·埃雷拉获369,934票，吉列尔莫·巴伦西亚获240,360票，阿尔弗雷多·巴斯克斯·科沃获213,583票。

651

这些来自官方的数字体现了许多选举骗局。根据拉斐尔·努涅斯在1886年颁布、1910年修改的制度，选举权正式被限于那些能读会写的人，或是拥有一定价值的财产或一定收入的人——1922年分别为1000美元和300美元。要粗略计算一个地区有多少选民，并在发生舞弊行为的地方、主要是在保守的农村地区发现投票人数怎样超过了选民人数，这是并不费力的。有时这仅仅是一件纸面上的事情，不需要实际参与或动员。但有时并非如此：它是那些被正式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参与的结果，这是自共和国初建以来哥伦比亚选举中特有的现象。这些数字还反映了实际参加人数确定无疑的增长，反对党自由党在城市中的比重可证明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人们估计选民总数约占人口的不到10%。

自由党人估计他们自己的实际人数至少与对立面一样多，他们指责保守党的选票单上以文盲和贫农多的印第安省份博亚卡和纳里尼奥领先的状况，指责大西洋沿岸地区声名狼籍的舞弊行为，指责政府控制了军、警、宪和饮料垄断公司的选票，以及本地和外国教士对保守党竞选的支持。

这些指责和反指责以及关于制度弊端的传说很容易使人们忘却整个制度。两大传统潮流可溯源到共和国初建那些岁月。内战中建立和确定了不同的忠诚，而且必然维持下去。经济变化在性质和规模上都不足以改变这种忠诚。保守党人继续紧紧依靠教会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领导下，他们表现出有能力利用新的经济环境，他们所得到的民众支持也不限于农村地区：许多企业主是保守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是认真、有力的父道主义者。自由党人为了竞选放弃了好战的反对立场，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唯一有发言权的反对党，他们表现的灵活性和国家的社会状况都有效地防止了左派运动的发展：工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再三试图但未能找到单独的选区或进行独立发展，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这一失败。党组织仍处在初生状态，每个潮流仅是地区集团的联盟，并容易形成宗派，因而没有哪一个有力量发出正式的会员证，一个集团存在的最经常和明显的标志可能是一家地方报纸，同时还取决于登记运动和竞选活动必须简短和费钱不多。19世纪不太多见的政治旅行在20世纪变得更为普遍了：浮华的诗人——政治家吉列尔莫·巴伦西亚乘小汽车在首都附近作讲演旅行，1948年遇刺的自由党领导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于1922年作首次政治旅行为埃雷拉将军在博亚卡进行竞选。到1930年，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已是乘飞机和水翼船进行竞选活动了，他这是一年自由党获胜的设计师。

这类活动十分重要。哥伦比亚国家政治中别无其他力量源泉。在全国机构中，教会在政治上投靠了保守党，既受其指导，

也指导他们，而教会本身又分裂为一系列近于自治的主教辖区：波哥大大主教对其他教区或者对广大传教区和无数宗教修道会几乎没有控制力。自从“千日战争”以来军队这些年已经发生变化。许多在特别情况下晋升的将军和上校在从事文职时仍带着他们的军阶，而在1932年与秘鲁进行的短暂战争中，一位基本上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勇士巴斯克斯·科沃将军被授予了指挥之职，不过各级军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但他们人数少，威望低，并且趋于保守。他们绝无能力独立采取政治行动，甚至没能力独立搞阴谋。哥伦比亚是一个管理人手不足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以前它的收入仅维持了一个政府框架。所存在的一点公共权力主要掌握在文人政客手中。其中属于两个政党的有些人是“寡头政治集团”出身，他们是原来就有钱有名望的家族的子弟，但许多人并非如此。哥伦比亚的财富尚不多，对政治的嫌恶是上层阶级普遍的特性，至少就像对政治野心一样。政治主要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其中许多人却出身于一般家庭。

如果有人在介绍情况时稍稍侧重于社会动员的缓慢状况，稍稍侧重于现代化和适应性的一些表现，以及百年来常常受赞颂、有时也实行的美德，这可能有助于纠正那种常把这些年否定为静止的附庸主义时期的观点。但这样的介绍是不完全的。研究拉美别的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发展的人可能熟悉这种不完善的民主的许多方面，但不一定了解哥伦比亚发生宗派暴力的潜在可能性。在“千日战争”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度为雷耶斯将军不偏不倚的独裁主义、为两党对他的反对以及“共和联盟”所掩盖。但以后它再次出现了。在1922年大选中发生了许多暴力行为，促使自由党提出了举党一致的详细的抗议：

许多地方以文明与和平方式举行的公开的自由示威运动遭到保守派团伙的破坏，他们在政府官员的纵容、支持、干预甚至授权下袭击它们。这类袭击有不少次是听了顽固教士在教堂讲道坛的布道后刺激起来的。包括共和国首都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出现

了只能同野蛮人的作为相比的最残酷的流血场面，在村庄和整个农村地区使用了恐怖方法，使它们处于并至今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不利于一个有组织国家的正常发展。③

政府答复说，自由党夸大了事态，受责备的不应单单是保守党，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教会完全有权发表它的意见，而许多所谓政治性袭击经仔细调查后证明有其他动机。它不否认它拨给各州州长约3,000支步枪以组建“省公安民防队”。这支部队的近一半去了臭名远扬的多冲突的北桑坦德省，但未全部回来。自由党人确实夸大了事态，一些历史学家在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严重得多的派别性暴力行为寻找先例时也作了夸大。1922年的选举暴力并没有使许多人死伤。自由党起事的一次较大危险被谨慎从事的领导人避免了——当时20世纪的哥伦比亚似乎要恢复使用19世纪的办法了。1930年选举中没有发生暴力行为，除了两个桑坦德省*有些抵制外，向自由党人交权是和平地实行的。但发生更普遍的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后来其他条件以及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与劳雷亚诺·戈麦斯之间竞相从事的煽动行为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拉斐尔·努涅斯在1880年认识到秩序问题是哥伦比亚的首要问题，根据由此到1930年这50年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看来，现在似无必要对它的局部解决作详细的考察。政治问题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与经济变化并非简单的关系，这里和别处都是如此。这半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某些方面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像人们根据其变化之大而预料的那么明显。它们被融合进了现存的政治规范。

654

19世纪8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的烟草、奎宁树皮和咖啡出口陷于萧条状态。烟草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最主要的出口物，奎

---

③ 佚名：《哥伦比亚政党》（波哥大1922），第22—23页。

* 这里指桑坦德省和北桑坦德省两省。——译者

宁树皮则不是种植而是采集的，它是托利马省和桑坦德省边境地区出现不稳定繁荣的根由。这些产品的出口再也没有恢复，而这次危机与1885年的内战一起结束了自由党政府时代。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能找到何种经济活动来使共和国摆脱这种明显的贫困。拉斐尔·努涅斯本人对农业出口没有什么信心，他想复兴采矿业。新格拉纳达一直是一个矿业殖民地，它不像墨西哥或秘鲁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西属美洲的主要黄金产区，在1849年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以前，它在美洲生产史上可与巴西媲美。乔科地区太平洋沿岸的采矿业虽因1851年哥伦比亚奴隶的最后解放而受到打击，但整个生产并未停顿，平均每年产值为200至300万比索，大部分来自安蒂奥基亚省。烟草出口在最好年份时超过300万比索，奎宁树皮一度超过500万比索，但黄金出口比较稳定——这是安蒂奥基亚商人和企业主的一大特殊优势。19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每年的出口总值估计在1,000至1,500万比索之间摆动。以人均额计算，自19世纪开始以来增长微不足道。

但出路并非来自采矿业。它来自咖啡，早在19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已开始出口来自桑坦德地区东部的咖啡，而这个地区则是受了委内瑞拉的推动。到19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每年出口约10万袋咖啡。20世纪初，出口数增加到将近50万袋；至此，尽管哥伦比亚生产的咖啡仍只占世界咖啡产量的很小比重，但咖啡几乎占了哥伦比亚出口总值的一半。到1930年，出口超过300万袋，哥伦比亚成了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也是软咖啡*的最主要生产国。咖啡种植由桑坦德扩大到昆迪纳马卡和托利马，以及西部的安蒂奥基亚和卡尔达斯省的安蒂奥基亚人开拓区。生产方法多种多样，农民们把已经大不相同的地方制度应用于咖啡生产——桑坦德省是分成制，昆迪纳马卡省是劳役地租制，西部各

655

* mild coffee，一译“淡咖啡”，其味淡雅清香，被认为是咖啡中之上品。——译者

省是劳役地租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混合制。咖啡导致并支持了人口向温和地带即科迪勒拉山脉的阳坡进行永久或季节性流动；那里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更多的工资。咖啡的加工和经销主要掌握在本地人手里；外国资本也存在，但咖啡业基本上是哥伦比亚人创始和保持的。为了运输咖啡的需要，铁路进行了某些至为重要的扩建：1885年哥伦比亚使用的铁路仅长203公里；1909年增为901公里，1922年为1,481公里，1934年为3,262公里。这些数字本身即使对一个世界上最多山的国家来说也并不引人注目，而且这些铁路线也不全是为咖啡产区服务的。尽管如此，那些确实是为咖啡产区服务的铁路线却是十分重要的。

在安蒂奥基亚和卡尔达斯两省，咖啡业——尽管并不总是那么兴旺——维持了同大咖啡园、加工商和出口商共生的咖啡种植小自耕农阶层。咖啡业吸引了昆迪纳马卡高原和博亚卡的农民、包括一些国内最贫穷的人到昆迪纳马卡西部和托利马做劳役佃农（arrendatarios）和收割工。这些人不会永远满足于他们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大种植园里已经出现了冲突。但哥伦比亚的咖啡业并不能简单地用社会理论加以说明。经营咖啡种植业的并不是一批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企业主特点的人；咖啡业吸引了以前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地主，也吸引了常常同时兼营农业的商人。

历史学家们想确定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咖啡利益集团"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人们不需要任何政治属性就能看出什么是现成的最有吸引力的投资，而政府机关拿不出什么来进行竞争。咖啡地位的确立也没有立即推进当地资产阶级的分工，在整个19世纪这种分工很难分辨得出：把一个人的全部资金用于一种企业是不谨慎的，所以在投资于咖啡的同时自然可兼营其他事业。通过咖啡园的建立和维持，通过收割、加工和提供机器与麻袋——其中有一部分由当地制造——以及通过运输和其他服务，有很大比例的哥伦比亚人越来越或多或少地与咖啡直接联系起来。据19

世纪90年代末在国会中有点自封为咖啡业代表的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估计，这一引人注目的比例高达1/4。鉴于咖啡在哥伦比亚外汇中占这么大的比例，还鉴于政府收入仍然十分依赖于关税，因此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受咖啡的支配。有人认为，咖啡种植是1885年后随着不可兑换的纸币的采用依靠人为地压低工资而确立起来的，但这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检验。对劳动力的竞争日益增加，工资也相应增加；结果，趋势并不是咖啡劳工的不断贫困化或无产阶级化。要吸引工人到出名的有损健康而物价又高于工人家乡的地区去进行沉重的季节性劳动，没有高工资是不行的。由于各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季节性周期不同，咖啡业工资是这些季节工的一种附加工资。国家市场也在扩大和深化。1921年美国贸易专员P·L·贝尔就此总结说：

如果……没有咖啡出口，这个国家将丧失50%以上的国外购买力，与此直接有关的进口将相应下降。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围绕着咖啡生产和咖啡价格旋转，甚至直接影响了那些不生产咖啡的地区，因为如果咖啡产区丰收后以高价出售，所得收益将流入其他非咖啡产区以购买其他产品，诸如玉米、烟草、黄金、白金、橡胶、糖树胶、牛、骡、马、羊、皮革与毛皮、棉花、盐等等，从而带来普遍繁荣。因为咖啡的丰收和以高价出售意味着可以更多地投资于房地产和增加营造活动；它将惠及各市政当局，它们的税收增加了，而为改善市政设施增加的支出将立即见效。它还意味着在国外市场上大量购买各种商品，政府将从这些商品的进口中获得它最大部分的收入，即进口税；因此它直接有利于全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它将在各省的财政状况中得到反映。这也意味着资金的流入，它将用于新的工业企业（如扩充旧的、建立新的棉纺织厂），用于养牛业以及用于生产更多的咖啡、棉花、糖，等等。①

---

① P·L·贝尔：《哥伦比亚工商业手册》（华盛顿特区，1921），第166页。

贝尔的这些话写在一个年代的开始，这个十年出现了自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哥伦比亚最早的持久乐观的经历。除了咖啡外，香蕉和石油的出口也在增加。雷耶斯将军、乌里韦·乌里韦将军还有波士顿的水果公司都一直对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圣玛尔塔内地生产香蕉的可能性抱有热情。本哈明·埃雷拉将军也如此，他在那里拥有资产。这块飞地后来证明对联合果品公司来说比它在中美的企业还更难管理。这里要应付的当地地主和政客太多，而全国政府鞭长莫及，而且也并不总是取合作态度，糟糕的劳资关系最终发展到1928年的罢工和屠杀（见下文），后来再未复原。这个地区风太大而水太少。尽管这样，20世纪20年代产量提高到1,000万株以上，使哥伦比亚一度成为世界首要出口国。一半以上的香蕉地为本地人所有，虽然在垄断出口的联合果品公司付给私人生产者的价格问题上经常发生争执，一部分收益还是留在了哥伦比亚。收益比重可能增加的希望始终存在。在世界危机爆发前夕，香蕉约占（哥伦比亚）出口的6％。

石油引起的希望甚至更大，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能提供出口总值的20％左右。传说一位早期的特许权持有人比尔希略·巴尔科将军最初试图在纽约转让他的土地所有权时被洛克菲勒的管家赶到了大街上。对哥伦比亚的兴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增长，当时墨西哥情况不稳定，委内瑞拉获得了成功。20世纪20年代是积极进行勘探的年代，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是靠不住的。哥伦比亚拥有过多的律师兼政治家，有一个过于敏感的国会，最糟糕的是，它却没有足够的石油来实现这种过高的期望。石油创造的职业不多，缴付的税很少，利润大部分流到了国外。

1905—1929年间哥伦比亚的出口翻了9番——咖啡出口翻了近15番。同期内进口增长11倍。1924—1928年出口值由8,550万美元增加到1.308亿美元，进口值由6180万美元增加到1.589亿美元。关税收入达到空前水平，由1924年的1,990万比索增加到1928年的4,120万比索。外债也是如此。20世纪初，哥伦比亚曾是一个特

657

别令人不满的债务国。经过内战和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后，这个国家对1878年以来的已过期的外债一直没有正常地还本付息。按人口平均这项外债不值一提，仅为14先令11便士，是拉丁美洲最低的债务之一，按比例计算不及阿根廷或乌拉圭负债的1/20。但这是一种落后的而不是谨慎的现象。哥伦比亚的财政系统是一个雷耶斯将军认为国家无法修补的烂摊子：他想将它全部承包给私人。通货是内战造成的纸币泛滥。不过这种灾难景象在后来的25年、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有所改观。1922年的乌鲁蒂亚—汤普森条约为哥伦比亚带来2500万美元的赔款，作为它在1903年因美国鼓动而失去巴拿马的补偿。由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将军的政府（1923—1926年）邀请来的以埃德温·凯默勒博士为首的财政顾问团给了这个国家的银行和公共会计制度一种有吸引力的正统而现代的形式，哥伦比亚又开始在国外广泛借债，各省也拼命借债，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凯默勒博士的美国同胞们很乐意出借。中央和各省市的长期外债遂由1924年的2,750万美元增加到1928年的2.03亿美元。马科·菲德尔·苏亚雷斯政府（1918—1922）为公共工程花费了1,300万多比索，而在后来4年内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政府花费了5,500万多比索，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的最后一届保守党政府（1926—1930）则花费了1.58亿比索。

658

回顾起来，这种“一哄而起”或“通过借债获得繁荣”的做法，被当作是一种全国性挥霍浪费事件而受到批评。前后几届政府据说都缺乏指导由过于热心的美国放债人提供的资金投资的经验或能力。对各地无知的欲望不得不加以满足，但很少人懂得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的差别，也很少有人为缺乏任何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而担心。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通货膨胀，同时随着需求增长，劳动力从穷乡僻壤被吸引到公共工程和其他新的活动中去，而食品供应没有能跟上。这些批评似乎过于苛刻，未能重新鼓起那个十年的精神，这种精神首次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提供了自觉地

进行现代化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搞错了：例如交通网便有很大改善。保守党政府是能够进行重要的行政改革的：人们后来批评凯默勒博士的财政改革过于严厉，那是忽视了他要取代和反对的是什么。保守党人在新形势下也能够改变态度。自由党执政的20世纪30年代所通过的更引人注目和表面上进步的社会立法在20年代在当地便有先例。哥伦比亚当时的最主要的经济学家、博学的折衷主义者埃斯特万·哈拉米略在20年代为保守党服务，在1930年后更困难的年代也为自由党服务；这两个党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在政治经济的基本问题上并无分歧。尽管如此，地区政治势力仍然强大，他们为了地方利益可以通过国会从增长了的预算中分割到更多的份额，而太多的预算则继续用于扩大的官僚机构以及也许是不必要和肯定难以维持的公共工程，所有这些依然是20世纪20年代新的经济和财政形势下哥伦比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

659

在1870—1928年间，哥伦比亚的人口由292万增长到721.2万。同期内哥伦比亚的4大城市也都扩大了许多。1870年哥伦比亚还没有人口多达5万人的城市；最大城市波哥大有居民4.1万人，其后依次是有3万居民的麦德林、有1.3万居民的卡利和有1.2万居民的巴兰基亚。波哥大在1905年前后超过了10万大关，到1928年已有23.5万居民；同年巴兰基亚有14万，而卡利和麦德林各有约12万。

这些数字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变化，而外国观察家常常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观察的这个国家在1930年依然人口稀少，主要还是农村人口，有3/4是文盲，移民很少——最大的移民群是土耳其人或叙利亚-黎巴嫩人，大多从事小商业——总之是遥远而不革命的。但是，这个国家与1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黑特纳和恩斯特·罗特利斯贝格尔以日耳曼式的透彻性所描绘的那种情景已大不相同了。那里出现了更大的城市中等阶级，他们的状况已超过了黑特纳所觉察到的混血人原型：“一种属于工匠、商

业雇员、小店主和低级官员所特有的城市生活方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已不再披斗篷戴草帽，而模仿上层阶级的欧洲式装束，因此说实话，'披斗篷的人'这种集体称呼对他们来说已不再贴切了。"[5] 他曾说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业——"除非一些小的印刷所和酿酒厂可以算作是工业"；到1930年，哥伦比亚依靠保护性关税在纺织、食品加工和其他小型消费品工业方面建立了基础。但这没有产生大量无产阶级。哥伦比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麦德林的纺织厂，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工。更分散的加工咖啡的工人大多也是女工。有些金矿雇用数百名工人，托利马的圣安娜银矿以及拉曼努埃利塔和辛塞林两家糖厂也如此。不过工人如此集中是少有的现象，并且远离权力中心。这在哥伦比亚工人组织的早期历史中有所反映。组织矿工以及港口、河道、铁路工人是可能的。对香蕉产区性质很不一致的工人的工作可能取得某些进展，对纺织工人的工作也如此，尽管他们主要是女性，而且麦德林的雇主还实行家长式统治。除此以外，对这样一支人数不多而又分散的城市劳动队伍就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办的互助团体可以同任何其他一类团体相抗衡。正如192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断然地告诉哥伦比亚代表的那样：哥伦比亚缺乏群众。

660

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觉悟问题。关于哥伦比亚早期运动的最好的报道说明了哥伦比亚特有的反复的挫折。想形成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努力不得不同传统政治、特别是自由党政治的吸收能力作斗争。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和埃雷拉将军并没有忘记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他们把自由党说成是工人事业的天然工具。工人们觉得为了眼前目的忠于某个社会主义组织，同时在国家政治上继续支持大自由党及其英雄、烈士和老党员，这二者间并无

---

[5] 阿·黑特纳：《1882—1884年穿越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的旅行》（波哥大1976），第91页。

矛盾。自由党一向招贤纳才，它至少提供了活动范围更广阔的机会。它从前的历史包含了真正激进主义的事件和人物，而且它还令人对未来抱有希望。毫不奇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有独立性的工人领袖的人数因“机会主义”而不断减少。

导致运动受挫的第二个原因是哥伦比亚的社会性质，它有利于保守党政府，也有利于反对党自由党。哥伦比亚社会差距的性质无助于工人阶级觉悟。假如以一名博亚卡的印第安人同一名波哥大的银行家相比，或者以山谷（Valle）的一名黑人同一名波帕扬的贵族相比，那么社会差距可能显得很大。同其他社会相比，哥伦比亚两极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算大，但不管怎么说新的冲突并不发生在这两极之间，它们依然是等级相近的社会中的冲突。一位早期的工人领导人伊格纳西奥·托雷斯·希拉尔多在撰文谈他的个人经历时，描述了在1926年太平洋铁路的罢工中“经理”巴斯克斯·科沃将军如何在没有护卫的状况下只身访问卡利的罢工总部，为罢工工人的守纪律道贺，以其绅士仪态使他们倾倒。瓦斯克斯·科沃将军也是一位迫切希望获得人民选票的保守党政治家。托雷斯·希拉尔多后来在去莫斯科途中，在巴黎公使馆对他作了回访。这当然不是那种蓬勃开展阶级战争的气氛。一方面这是因为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工人领袖已经成了一位其地位远远超越其宣称的阶级立场的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两极分化还并不十分严重。卡利的人们一定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自由党的黑人将军戴维·培尼亚曾让一些保守党的主妇们清扫街道的事迹。托雷斯·希拉尔多还记述了一位麦德林的女士玛丽亚·卡诺的生平，这位女士最初受维克多·雨果的启示，她对穷人的同情导致她从做好事直到作为“劳动者之花”参加竞选，接着她到马格达莱纳河上及安蒂奥基亚的矿山工人中从事组织活动，最后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她早年的细节介绍说，她的家庭最初更关心的是她应得到妥善的陪伴，而不是她在宣传什么主义。迪戈·

661

蒙萨尔韦的《咖啡之国哥伦比亚》是20世纪20年代末撰写的关于这个国家发展的出色著作，它骄傲地把工人团体的数目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象征，而不是即将发生冲突的预兆。他的态度至少像那些似乎在给某些早期教会的圣人和殉道者作编年史那样写作的劳工史学家那样感到值得为此辩护。20世纪20年代保守党人对于新奇的工会和工人团体的态度也绝不是一律地大惊小怪或不通情理。这方面巴斯克斯·科沃将军比他来自山谷省的对手伊格纳西奥·伦希福将军更为典型，后者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位政府部长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饱受讥讽的运动，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对付“赤色威胁”。这样一种路线就象它要对付的威胁那样令人奇怪，不符合保守党人的信念，他们认为该党比之自由党更与哥伦比亚的基本民众协调一致，认为自由党人才常常是新生无产阶级的剥削者，而保守党的积极的父道主义传统来自殖民地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该党从未舍弃。这种观点可以，比方说，在考卡省的土著领袖曼努埃尔·金廷·拉梅身上得到呼应，不管他的言行多么古怪奇特，他是这个混血人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所产生的最强悍的印第安领袖。“金廷博士”带着他对民法的知识和他那本用旧了的《家庭律师手册》，显然是坚持某种传统的。他发现马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同意他的观点，后者帮助他进入国家档案馆，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支持了保守党，认为“他们是用普通的方式迫害印第安人，而自由党却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这样做的。”⑥

662

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少特别的迫害。1928年圣玛尔塔香蕉区的罢工和屠杀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双方都没有预见到它会那样发展，随之而来的镇压并不严厉，对此负责的政府因这次镇压而受到了削弱，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哥伦比亚存在许多纠纷：如土地纠纷，这对一个新近有人拓居到许多地区、主要由农村组

⑥ 德·卡斯特里隆·阿沃莱达：《印第安人金廷·拉梅》（波哥大，1973），第237页。

成的社会来说，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有些纠纷的产生是由于有人企图在新环境下，例如在昆迪纳马卡咖啡园，采用旧的农村劳动方式；有一些则是由于需求的变化，例如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为考卡省的牛提供了新的出路。甚至还有一些“时髦的”纠纷，例如巴兰卡韦梅哈的当地工人与美国石油商的纠纷。但这些纠纷并不大，在那些没有内战记忆、对桑坦德的选举也不感兴趣的外国人看来，那不过是古风犹存的平静大海中几个不协调的孤岛。对他们来说，虽然见不到引人注目的进步，却感受到一片彬彬有礼和安全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当地的煽动者——“南美最坏的政客”——不过是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一点瑕疵而已。从弗兰克·M·查普曼在1917年叙述的美国禽类学考察队的生活中可以回想起这个国家当时是何等安全：

“从路旁的散工到庄园的主人，个个都对我们表示了彬彬有的礼关注。当我们带着宝贵的旅行用品以及常常还有大笔现金穿过遥远的无人定居的地区时，我们感到同我们自己家乡一样安全（甚至可能更安全！）在我们宿营或住旅馆、乡村酒店或客栈时，我们没有为保护我们的设备和物资而作特别的布置；即使如此，在我们工作的5年中我们没有因偷盗而失去一件东西。相反，在我们路过某个我们队中有人以前曾工作过的村子时，一位当地人拿着一根昔去被落下的针线叫住了我们。”⑦

663

厄瓜多尔

1895年与中国交战的日本从智利购买了一艘战舰“埃斯梅拉达号”。智利人希望在这项交易中保护他们的中立地位，他们通过厄瓜多尔驻纽约领事商定在“埃斯梅拉达号”加入日本海军以前将在厄瓜多尔短暂服役。这项“船旗交易”牵涉到行贿，而当时的瓜亚斯省省长、前总统何塞·马里亚·卡马尼奥则促使天真

⑦ F·M·查普曼：《哥伦比亚鸟类分布》（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会刊，第34卷，纽约1917），第9页。

的政府相信，这不过是要求厄瓜多尔为秘鲁这个有时对它购成威胁的邻国的敌人在外交上帮一次忙而已。丑闻被揭露了，国内一些地方不久发生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起义。1895年6月5日，一个瓜亚基尔政务委员会在一份号称有近1.6万人签名的文件中提名“功勋卓著的将军D·埃洛伊·阿尔法罗先生”为共和国元首和军队总司令。

阿尔法罗已有10年不在厄瓜多尔，但是正如文件所说，他享有的声誉使他成了“那个推翻了邪恶寡头集团的人民运动的灵魂”。他是定居在沿海制帽业城市蒙特克里斯蒂的一位西班牙商人的第5个孩子；他的生母是厄瓜多尔人，他父亲在他21岁时才终于娶了他的生母。当时，他已经开始了在沿海进行小规模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生涯，反对加西亚·莫雷诺。如果有人想为阿尔法罗的经历寻找模式或相当的人，最合适的例子是加里波第。加里波第在1851年确实到过瓜亚基尔，那时他因领导罗马保卫战已闻名于世。

阿尔法罗当时9岁。他像加里波第一样勇敢、奔放、善于应变、平易近人、彻底的无私和具有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共和主义的高贵品格，也像加里波第一样反对教权主义。现代厄瓜多尔史学界如此急于要把以他作为主要领导人的自由主义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一种沿海商人和出口业利益集团反对山区教权—地主分子的运动，以致许多加里波第式的优良品质被忘却了，其革命性质受到歪曲，其重要意义甚至遭到贬低。阿尔法罗的父亲的确是一名商人，但是当年轻的埃洛伊一接管了企业，他就将全部可用资本投入革命。后来埃洛伊在流亡中自己在巴拿马做生意发了财，并在那里美满地结了婚。他把赚得的钱用于继续革命，而他那令人崇敬的家庭日子却过得很紧；他的一个儿子说，他家的信件比预料的少，因为贴不起那么多邮票。在他袭击厄瓜多尔的间隙，他为中美洲的激进自由主义事业提供帮助——阿尔法罗始终认为自由主义是一项世界性事业，到1895年由于他的虽

664

不总是成功但却轰动一时的军事业迹，他本人无疑在拉丁美洲出了名，并通过他同其他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委内瑞拉的华金·克雷斯波、尼加拉瓜人何塞·桑托斯·塞拉亚、古巴人何塞·马蒂和安东尼奥·马塞奥、哥伦比亚人巴尔加斯·比拉和“印第安人”乌里韦这类小册子作者等——保持着这种声名。他是那位南美洲本地的西塞罗*、他的同胞胡安·蒙塔尔沃十分赞颂的朋友和同盟。总之，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本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就好比他的哥伦比亚同道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这位职业行政官不是咖啡园主一样。这一点并不妨碍他领导一场不论其意图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都可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运动：瓜亚基尔的商人和银行家及可可种植者在前几届政府中并不是无权力的——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指环”般的小圈子比阿尔法罗主义更适合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过他们的权势看来在这个周期的结尾时才更有保证。但自由主义革命还得到一些小资产阶级如低级官员和学校教师等的支持，此外它对人民也有吸引力。

阿尔法罗聚集了一支军队，这是他始终紧紧依靠的自由派军队的核心，并侵入了山区。他小心谨慎地指出，他并不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个地区反对另一个地区的斗争，山区有许多温和或正直的保守主义者像他一样地反对基多政府。高原也有自由党人，这从那里发生的示威和起义中可看出。他的军队具有一种使命感：尽管这支军队的军官们所受教育不多，士兵们由热带的黑人所组成——他们制服上标着“誓死忠于阿尔法罗”或“不屈服，不退让”等字样——但至少投身于可以发挥才能的革命事业。最初它几乎没有遇到政府军的抵抗，政府军中的“不断祈祷、动辄鞭打和无所事事令人生厌”，经过几次小战斗后阿尔法罗进入基多。

665

---

* 指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

较认真的抵抗是后来出现的，鼓动抵抗的是教会，特别是波托维耶霍的佩德罗·舒马赫主教（一位外来的主张教皇至上的莱因人）、里奥班巴的安德拉德主教，以及至少在自由党人看来，还有外国修道士。得到他们鼓励的部队可以把北部边界那边哥伦比亚的帕斯托主教管区作为活动基地，从那里他们获得哥伦比亚保守党当局和主张教权至上的西班牙籍主教埃塞基耶尔·莫罗诺·迪亚斯的援助和慰劳。阿尔法罗用武力占领了山区；尽管他采取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他的军政府比一般军政府彻底得多。阿尔法罗也举行选举，但他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反对者或竞争对手，这样产生的国会常常是不顺从的。他必需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保持他的权力。

自由党的纲领被概括为简略的十条，发表于半官方的基多的激进报纸《皮钦查报》上：

1. 公布教会财产法（永久管业权法令）。
2. 取缔女修道院。
3. 取缔修道院。
4. 实行义务世俗教育。
5. 印第安人享有自由权。
6. 废除宗教事务协约。
7. 教士世俗化。
8. 驱逐外国教士。
9. 建立强大的高薪饷的军队。
10. 将铁路修至太平洋。

厄瓜多尔高原的教会在殖民地时期已很强大，后来又被加西亚·莫雷诺加强（到了不明智的程度），它的势力比西属美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根深蒂固，其影响更无可匹敌。哥伦比亚的教会已丧失了土地，它受到自由党人的迫害，与厄瓜多尔教会的多数领导人相比，它的主教们已学会了谨慎。它也没有支配新保守派和象努涅斯、卡罗或雷耶斯这样有才能的保守党政治家的希

望——对哥伦比亚保守党来说，过于虔诚、过于笃信宗教并不好。厄瓜多尔教会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它的土地、特权和影响原封未动，加西亚·莫雷诺没有留下一个强有力的世俗的保守党；莫雷诺虽然是天主教改革派，但教会也是天主教改革派所面临的对其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在《皮钦查报》所列10条中有7条是直接打击教会特权的。

阿尔法罗和他的继任者莱昂尼达斯·普拉萨（1901年任总统）执行了上列10条。阿尔法罗取消了教会对新闻的审查，废止了宗教事务协约，驱逐了舒马赫、安德拉德和一批外国人，控制了教育的世俗化。普拉萨执政时对教会土地进行了更彻底的打击。阿尔法罗早先曾担心会激起比他已经遇到的甚至更大的反抗，而普拉萨却得以同山区地主达成了有意义的妥协，并以牺牲教会为代价加强了他自己的追随者而不是他以前的领导人的追随者。整个19世纪被教会垄断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工作由国家接管；政府也不再支持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捐税。1902年实行了按民法规定的结婚和离婚，按民法规定的结婚是强制性的。教士的誓约不再得到承认，法律还规定不得进行政治性传道。宣布共和国不再正式尊崇圣心，罗马天主教不再是国教；1906年宪法一个字都没有提及教会。

阿尔法罗本人并不是极端反教会的人；他来自教会势力不强的沿海地区，反教会情绪在同敌人有长期和密切接触的山区则发展得较为强烈。他的论点也不像更讲理性、在其他方面更温和的普拉萨将军那么系统。但他们二人都认为粉碎教会权力是政治上的必需，是厄瓜多尔要建立团结一致的全国政府的必要条件，否则将导致一系列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妥协和同盟。他们的动机出于高度的政治远见，而且从广义上讲只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团结一致的全国政府的事业不管怎么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在欧洲史上是需要加以许多说明的观念，也可应用于厄瓜多尔。教会在自由主义革命以前对社会政治的广泛控制与后来

关于教会反抗的更为离奇的详细叙述相比已黯然失色，因此这次革命被错误地解释了，它的成就被低估了。教会并不像它的敌人设想的那么富有。它丢失的土地没有被分配，而通常是、也许以多少较高的租金租给了新的承租人（在安第斯山的其他地方，承租人即佃户通常指地位较低贱的人，而在基多，这个名词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声望）。世俗教育过了一些时间才象旧的教会学校那样普及，但不一定更好，特别是在上层社会。被迫依靠自力更生的教会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虽然如此，一场真正的革命已经展开。

667

阿尔法罗和美国企业家阿切尔·哈曼还将山区和沿海用基多—瓜亚基尔铁路联系起来，这项成就后来作为一项合乎情理的项目被纳入了瓜亚基尔资产阶级的议事日程。而当时它在他们的日程表上似乎不太受重视。沿海的可可生产者、出口商和银行家对高原的普通市场并无特别兴趣，也不大愿意为建铁路承担费用。内地地主和制造商常担心他们的劳动力和产品会遇到竞争。国会屡屡攻击这项合同。地方利益集团甚至在被说服支持这项事业后仍不断地在线路问题上耍阴谋诡计。这更象是一件英雄的事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事业，而且正是因此而使阿尔法罗着迷，从而加强了他显著的神秘和独裁主义倾向。就象约瑟夫·康拉德*在科斯塔瓜那的圣多美矿一样，这条铁路对他来说是共和国内最伟大的事，它甚至象那座矿一样得到一位罗曼蒂克的外国人的支持，此人是一名苏格兰的百万富翁，他得到了报偿，做了厄瓜多尔驻珀斯**的领事。1906年阿尔法罗第二次上台后，铁路团体给

*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诺斯特罗莫》（1904）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写诺斯特罗莫受一位银矿主委托，用船把大批白银运出同境藏在海中的孤岛上，而主人翁终因经不住大量财富诱惑将全部银子攫为己有的故事。——译者

** 珀斯（Perzh），位于苏格兰中部。——译者

了他十分重要的帮助。1908年铁路峻工，虽然阿尔法罗已不再体现任何得到公认的事业，但他仍无意放弃权力。他一再倚老卖老地进行的干预越演越烈，但在1912年最后的一次政变中却以失败告终。他在瓜亚基尔被俘，这是一座木头房子的城市，那里的群众此时反对他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俘获他的人说没有什么墙壁厚得足以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他手里抓着他写的铁路修建史的手稿，经这条铁路被带到基多，那里反对他的情绪甚至更加强烈：不少人在他发动的小规模战争中被打死了。接着，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圆形监狱中遇害，他们的尸体被拖着游街，并在城外的埃希多公园焚毁。"这是多么惨的一幅耶稣受难图啊！"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在火车上这么说。对于许多厄瓜多尔人来说，阿尔法罗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共和国意志的象征，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一个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不解之谜。

668

1912年阿尔法罗之死使权力再次落入更讲妥协的普拉萨将军之手，他得到一位十分稳健和才华非凡的教会现实主义者费德里科·冈萨雷斯·苏亚雷斯大主教的协助，他经受住了来自自由党和保守党两个极端的干扰，终于执掌了大权。普拉萨政府有4年在埃斯梅拉达斯省面对着一场对付阿尔法罗主义者卡洛斯·孔查上校的部队的游击战。新自由主义既不激进，也不想修建更多的效果可疑的铁路。它越来越受瓜亚基尔银行界、特别是商业和农业银行及其董事长弗朗西斯科·乌尔维纳·哈多的操纵。在1912年后的若干年内，人们对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政党名声作了显著对比。有些哥伦比亚自由党人可能很富有——哥伦比亚保守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不断指出自由党是最显眼的富人的党——但他们不掌权。在1925年以前的厄瓜多尔，自由党人虽然存在深刻分裂，但却是掌权者，阿尔法罗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保守党取得霸权的希望。在厄瓜多尔，正是自由党不得不承担可可繁荣结束后的困难时期的责任。自由党人镇压了1922年的瓜亚基尔罢工，它是被埃斯梅拉达斯战役的老兵们残酷镇压下去的。自由党政府也无

法逃避第二年发生在钦博拉索省的莱托庄园大屠杀事件的责任。也正是他们作出了极为繁重和详细的（及引起通货膨胀的）财政安排，使政府免于负债，在厄瓜多尔这类安排还使凯默勒博士显得像是个解放者。总的说来，20世纪20年代的厄瓜多尔并不是像哥伦比亚那样的经济发展时期。这是可可占主导地位的最后一个10年，但麻烦很多，也不平衡。保守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号召人民反政府的更有利的地位，他们利用一个名叫“工人集团”的组织着手在山区这样做了。1925年7月9日自由党政府被一次军事密谋——青年军人联盟的“独立节革命”所推翻。这次短命和混乱的革命仅仅是政治上长期四分五裂的开端，其主要受益者是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此人对沿海和山区，对两大传统势力的政治家，有时候对人民都有吸引力。他的事业和他多次担任的总统任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厄瓜多尔的总的人口统计很难找到。官方估计1882年是94.6万人，仔细推算1905年应有115万人；美国商业部1920年版的《拉丁美洲商业旅行指南》说厄瓜多尔总人口“估计有130万至200万”，但倾向于较低数。厄瓜多尔两大城市的人口在这一时期都稳步增长。瓜亚基尔的人口由1890年的4.4万人增加到1908年的7—7.5万人和1930年的12万人。在1908年铁路修到基多时，它只有5万左右居民，之后开始迅速增长。到1930年，该市人口大致与瓜亚基尔相当。

669

直到20世纪20年代，厄瓜多尔的经济发展不像哥伦比亚在这一时期那样充满危机和变化。可可是它的主要出口产品，那些年出现了繁荣，使它一时成了世界最主要的可可生产国。种植园扩大了。生产制度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理想的折中方式：沿海地主与种地人订约，后者将照看若干可可树直至它们结实，为此他们获得预付金并有在此期间种植自己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权利。他们本人、家庭成员和其他工人还将在种植园的生产区充当雇工。沿海继续从山区吸引劳动力，至少同18世纪以来的情况一

样。地主给种地人和雇工以预付金的方式看起来可与严酷的偿债劳役制的状况相比，但工人的流动性和对劳力需求的竞争改变了这一情景。文学中对混血的厄瓜多尔沿海人（costeño）或沿海农民（montuvio）的人物描写也是如此，对他们的描写通常是贬抑的。有人说，那些不受雇于可可园的人特别容易倾向于阿尔法罗主义，但人们也可打赌说这种态度同样会对种植园的工人产生影响。

可可种植园通常是大企业，它们极少有小型的。有些大地主从事银行业和对外贸易，但瓜亚基尔还产生了一批同可可种植园无直接联系的银行界和贸易界人士。外国资本是存在的，但不起支配作用。可可的生产和商业化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最终取代它的沿海的香蕉生产，后者至今没有从属于任何外国公司。可可还产生了为数不多的有钱旅居巴黎的百万富翁。

世界的可可消费量在1894—1908年间翻了一番，1903—1912年间又翻了一番，由此到1924年再翻一番；也就是说在1894—1924年增长了七倍。1894年，厄瓜多尔生产了世界总产量的28%，[670] 比英帝国生产的24%还多，相当于它最邻近的竞争对手巴西产量的一倍。1924年，厄瓜多尔所占比重降为6.5%，当年英属非洲殖民地生产了53.5%。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有明显的危机征兆，到20年代由于英属非洲的竞争、世界性生产过剩以及病害的发生和蔓延，厄瓜多尔的可可繁荣就此结束。

像在别处一样，这些年厄瓜多尔也稍稍发展了当地的进口替代工业，同时还继续进行和调整传统的纺织生产。尽管环境不断变化，纺织生产从未在山区消失。制帽业也维持了下来，它在沿海衰落了，但在昆卡地区保存得较好，它在那里一直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不戴帽的时装为止。交通的改善，包括阿尔法罗修筑的铁路，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没有带来突出的变化。高原印第安人的状况只是在慢慢地改变。1916年巴克里索·莫雷诺总统改革了因负债而入狱的法律，这一措施被认为是从法律上取

消了土著居民雇佣契约（concertaje），即山区的偿债劳役制。1934年豪尔赫·伊卡萨发表小说《瓦西蓬戈》，它成了安第斯山地区最著名的土著主义小说。它描绘的野蛮状况从来不是山区的普遍状况。例如，墨西哥人类学家莫伊塞斯·萨恩斯在1933年所著文章中说，他没有发现人民普遍遭受压迫。

委内瑞拉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1870年4月的自由主义革命中在委内瑞拉上台，他统治委内瑞拉政坛，直到1888年他最后不慌不忙地离国前往巴黎；他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想像中的"典型的考迪略"。他出生在加拉加斯的贵族家庭，这种出身本身对一个委内瑞拉政治家来说就是不寻常的，他父亲是自由党的权谋家、记者和煽动家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1858年莫纳加斯时代结束时，他在美国任领事。他在库拉索而不是在偏僻内地参加了后来成为"联邦"指挥部的核心机构，并主要在参谋岗位上逐级晋升。他生性大胆，并能率领部队，但他的主要才能不在于军事。他之夺取政权也不符合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必须遵循的模式，即由各地区的考迪略先后统治委内瑞拉。古斯曼不代表任何地区。他在联邦战争结束时将仍在起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分子组成为一个有效的联盟。他获得了成功，因为他坚实地吸收了广泛的政治观点，并且懂得什么是政府的基本资源以及怎样增加它们而于自己有利。他无疑地比联邦方面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的问题和机会。他是一个能干的、尽管显然是贪婪的金融家，他不害怕外国人和当地人复杂的组合关系——他后来是在巴黎社会显露头角的第一个西语美洲的百万富翁。比阿根廷的皮革批发商还早几年。他恬不知耻地不断宣传自己的德行，不愧为他那位煽动家父亲的儿子，作为总统，他把拍马奉承变成为一种制度，使从前人们在派斯或莫纳加斯弟兄统治下看到的一切都好象是共和党人的真正谦虚。重要的是要强调它是一种制度。古斯曼 671

不用说是爱虚荣的，但他并不傻，他的铺张部分地是一种控制手段，正如罗萨斯在阿根廷同样如此铺张一样。他把自己置于竞争者之上，好似他在加拉加斯的公共建设将加拉加斯置于委内瑞拉的其他城市之上一样。一位批评他的政府的哥伦比亚人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还发现他有一种越过知识阶级而寻求平民支持的倾向。他还看到总统在外出活动时由随从卫队清理街道，看到存在着广泛的谍报和警察系统，政府干预邮政，囚禁反对派，监狱中使用脚镣，新闻唯唯诺诺，使用暴力审查方法等——所有这些情况在这一时期另一个经久不倒的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执政时则更加司空见惯。

从前的政府没有一个受过这种有意识的现代化观念的激励，而正是古斯曼和他的支持者振振有词地将它们提了出来。古斯曼当然可以争辩说，一个经过了10年普遍被认为是混乱和腐败的莫纳加斯统治和5年内战（1859—1864年）以及紧接着又由法尔孔总统无精打采统治的国家，肯定急需秩序。他寻求一种更有活力的经济，这既为了经济本身，为了他的政府，也为了他自己的财富，因为他经常是一位垄断者，在当地许多企业中持有股份。他修建了300公里铁路，他最后离职时正碰上委内瑞拉接上了海底电缆通信设备。他看到了通过大规模吸引外资以加速国家发展的可能性。这方面他确实取得一些成功，尽管他建议的联合参与法国贝雷尔公司集团这类最宏大的计划没有实现。

672

古斯曼在政府财政方面无疑采取了更多的先进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使之较有条理。他与当地商业公司达成了相互有利可图的妥协，而他的统治则提供了较好的官僚纪律和一种较能预测的行政环境；即使这样做要花费代价，这种代价也很容易补偿。他无疑是一位比他的几个前任或紧接他的几个继任者更好的行政官，他在这方面以及在汇编委内瑞拉法典方面的成就是真实无误的，虽然其最初引起的冲动已趋消失。他在他第一届政府时期在教育方面的成绩很出色，不过这种成绩也没有持久。古斯曼不能容忍

来自教会的反对。委内瑞拉教会始终比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的教会软弱，到1883年教皇答应条件时——他面临宗派分裂威胁和一个受到古斯曼制约的委内瑞拉教会——它仍然比较软弱。1870年大主教拒绝为祝捷唱感恩赞美诗，古斯曼的反应是将他驱逐出境，接着又确立了按民法规定的婚姻和出生死亡的民事登记。

古斯曼的联合政府保持了联邦的用词——有很长时间“上帝和联邦”在委内瑞拉是签署书信末尾的正式用语——但政府实际上是中央集权主义的，这种中央集权制得到一支雏形的国民军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得到国库的财政补贴。古斯曼将一名不同政见者马蒂亚斯·萨拉萨尔将军正式处决，以儆效尤，但他的典型方法更多的是政治性和妥协性的。他的1881年宪法规定总统由间接选举，任期仅两年，可能他想建立一种制度，由忠于他的下属在他总的控制下轮流担任此职。麻烦的是他的下属们另有打算。由于这些不忠诚表现的缘故，古斯曼的统治可分为三个他直接行施权力的时期：七年时期（1870—1877）、五年时期（1879—1884）和赞美时期（1886—1887）。有两次古斯曼觉得他不得不从巴黎回国重振权威，第一次曾使用了武力。1887年8月赞美时期结束时他永远回到了巴黎，1899年在那里去世。他在本国的利益被没收时引起了愤怒的抗议，但他的大部分财产——用他自己的著名用语是“美洲少有的”——安然无恙。 673

他的统治风格引人注目。他在委内瑞拉的继任者有时也效法。他给自己封了个“杰出的美洲人”(El Ilustre Americano)称号，并同意他的副手华金·克雷斯波将军应该被称做“克尽职守的英雄”(El Héroe del Deber Cumplido)。后来，戈麦斯将军则成了“功臣”(El Benemérito)。这类称号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中美洲也存在。欧洲人和北美人不屑一顾地认为，这类夸大其辞是拉丁美洲的特点，这方面古斯曼没有给拉丁美洲带来什么好处。实际上这种夸大其辞既不典型——它在哥伦比亚被人嘲笑，并引起了智利的抗议——而且也并非不屑一顾。它是

独裁政治在特定环境下采取的一种手法，反映了古斯曼时代委内瑞拉市民社会的精英所特有的弱点。如果应用于滥行独裁的其他西语美洲国家，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能奏效。还应该记住，“旧世界”通过拿破仑三世、凯泽·威廉二世和墨索里尼为新世界提供了同样放肆的例子。细心的读者可以在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的《杰出者》(1884年)中觉察出他已预料到后来巴列尼里亚·兰斯在《民主专制主义》(1929年)中对委内瑞拉专制政治所作出色的社会学论证的那种情况。

古斯曼继承的国家只有不足200万居民，正在进入咖啡出口的第二个周期。它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只拥有3个象样的城市——约6万人的加拉加斯、3.5万人的巴伦西亚、2.5万人的马拉开波。它还出口皮革和可可。它基本上没有工业，即使是在手工业生产水平上也不及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是南美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咖啡生产国，上世纪下半叶咖啡生产由中央高原移到西部的安第斯山各州。咖啡在那里促成了中等的繁荣。这是一种适于中小地主的作物。收获时的劳动力有许多来自哥伦比亚，有些来自远至哥伦比亚的高原省博亚卡。大部分委内瑞拉咖啡以及大量的哥伦比亚咖啡通过马拉开波出口，德国人在那里有强大商业势力——德国商人由于做生意循规蹈矩而很受尊敬，他们已同当地社会很好地结合；许多人娶了委内瑞拉妇女为妻，永远在委内瑞拉定居，这种状况在德国商人中较其他欧洲或北美商人中为普遍。以马拉开波为中心的安第斯山咖啡产区发展为一种具有鲜明独立性和有自信心的社会，当然人们不应完全相信过于罗曼蒂克的说法，以为咖啡在委内瑞拉如同在哥伦比亚一样已经造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农村世外桃源。在1925年戈麦斯完成跨安第斯山公路以前，安第斯山地区和国家其余部分的交通仍处在原始状态。

674

我们还应承认，我们对这些年委内瑞拉的经济生活许多方面所知极少。养牛业仍是许多地区主要的农村活动，但这个问题基

本上还没有进行过研究。委内瑞拉的许多地区被描写成不是大庄园主、大地主的领域，就是小果园主、不断变动的小土地所有者的领域，全凭作者个人的口味。有些人认为咖啡从后者中创造出了一个从前不存在的定居农民阶级。这一论点似乎有道理，但还需进行研究来加以证明。委内瑞拉大庄园主的性质和作用也待探讨。人们不妨设想，大庄园主和小果园主在许多地方同时存在而几乎相安无事，在饲牛地区生活继续按传统方式进行。这类活动在19世纪虽然经不住内战打击，但还很难断言它们易受政府政策影响；有关的人将会同征收地方税的历届官员按习惯作好安排。

这些单调乏味的考察使古斯曼·布兰科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他的雄心很大，但委内瑞拉在国际经济中的处境与之不相称。经济上，他统治了一个出口咖啡、可可和皮革的国家，它拥有的矿山很少，不能提供什么大的合同，国内市场也十分有限。经济现实也说明了地方和全国在历史观方面的差别：比如说，一部关于马拉开波的历史可以包括对古斯曼统治的仓促评语——古斯曼不喜欢马拉开波，他有理由怀疑它抱有分裂主义图谋——同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对地方的发展最坏也只是次要的阻碍作用。如同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那样，地方历史学家一方面不否认国家的存在及其间歇性的和长期的重要性，同时常常泰然地对国家政治漠然置之。

古斯曼离职后的10年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物是华金·克雷斯波将军（1892—1897年任总统）。他是一位平原地区的居民，是养牛的平原上的一个地主，他缺乏古斯曼那样见多识广的教养和自命不凡的冲动。因此他在同代人中并不突出，尽管他是一名能干的军人，能激起追随者的忠诚和敌人的尊敬。19世纪90年代末也是一个咖啡价格不断下降的时期，它无疑会使任何政府黯然失色。克雷斯波遇到了“自由民族主义者”何塞·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将军发起的运动的新对抗，“秃头”埃尔南德斯是一位非常得人心的骑士气派的人物，他在北美实例的影响下将武装暴动

675

与竞选运动结合进行——据说他曾密切注意过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民间流传着他的歌谣：

是谁鼓舞了人民的信念？
是何塞！
是谁为忠诚的事业奋斗？
是曼努埃尔！
是谁因此而享有盛名？
是埃尔南德斯！
从圭亚那到安第斯山
委内瑞拉内内外外
到处响彻着欢呼声
为了何塞·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③

但是政府并没有在竞选中失败，埃尔南德斯也没有在战斗中取胜。19世纪90年代还有继任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政府仍然是一个政治运动不断的时期，它引人注目地使一些没有多少特权的人物如教员、新闻记者和其他这类寻找出路的人才参加进来，当然也有不少人民参加。克雷斯波以激进自由主义者自命——他作为同一事业的战士曾在厄瓜多尔帮助过阿尔法罗。古斯曼和胡安·比森特·戈麦斯这类政府的长期延续使历史学家们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各届政府，这段期间政府的权力远远得不到那么多保证。像胡安·巴勃罗·罗哈斯·保罗博士（1888—1890年任总统）和雷蒙多·安杜埃萨·帕拉西奥博士（1890—1892年任总统）等这些人物从来不像是安全的。西普利亚诺·卡斯特罗虽有较大才能也是如此：他于1899年夺取权力并以其特殊方式行使权力，直至1908年。

华金·克雷斯波已选择伊格纳西奥·安德拉德将军作为他的

---

③ 引自J·A·德阿马斯·奇蒂：《"秃头"埃尔南德斯——档案记载》（加拉加斯，1978），第60页。

继任者。他本来还可能成功地保持他的提名人的权威，但他在镇压反安德拉德的最早的一次起义时，在卡梅莱拉丛林战中被杀。 676
正如克雷斯波不如古斯曼·布兰科出名一样，克雷斯波的继任者中也没有一人在当地拥有他那样的威信和声望。1899年5月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率领一小股人从哥伦比亚入侵这个混乱的共和国（“60人事件”），后来被称作“光复革命”。卡斯特罗是安第斯山人，出生在与哥伦比亚交界的塔奇拉州。他在哥伦比亚就学，他的政治思想带有哥伦比亚激进主义的特殊色彩——1885年不少哥伦比亚人在国内丧失政权后也到委内瑞拉以及厄瓜多尔寻求工作或避难或二者兼顾。他在委内瑞拉的地方和全国政治中一直很活跃，做过他故乡塔奇拉州的国会代表和州长。他在克雷斯波执政时曾在哥伦比亚流亡了好几年。尽管在1902—1903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封锁委内瑞拉海港时卡斯特罗由于公开和私下的举止杂乱无章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但他在全盛时期时也算是一位勇敢和有吸引力的领导人。“光复革命”的成功有些靠运气，但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抓住机会的能力，归功于他的应变能力和他迅速掌握了国家政治形势。他准备好了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战斗，他选择了能干的部下，于是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是比他的对手更好的政治家。一旦掌握了共和国（正如他最能干的军人戈麦斯将军说的那样：“既然共和国归属了我们”），他就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政治好处服务，他的反复无常足以表明谁是主人。古斯曼是用各种称号和地位褒奖自己，卡斯特罗则给自己充满了丑闻而毫不顾及国内外的舆论。

卡斯特罗的上台常被当作是安第斯山人支配委内瑞拉政治时期的开端。不仅卡斯特罗来自安第斯山，他的继任者戈麦斯也是，还有1945年以前的历届总统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将军和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将军也都是安第斯山人。20世纪50年代的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也是安第斯山人。但是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对这样描述卡斯特罗和戈麦斯

年代的用处提出了问题，指出基本变化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石油开始支配经济。[⑨]问题还可以提得更深入。卡斯特罗最初的小小的军队是安第斯山人组成的，在戈麦斯时期安第斯山人几乎垄断了军官团，但在军队外，两届政府内都有许多其他地方的人。卡斯特罗和戈麦斯都确认了一切卓有成效的委内瑞拉政府同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各港口的商业与实业公司之间存在的基本妥协。两人在规划加拉加斯的城市化使自己受益和垄断该城市肉食供应这类总统的传统活动中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除了戈麦斯对安第斯山军官的关怀外——戈麦斯是卡斯特罗的主要将军——土著地区及其居民都没有受到特别的关照。戈麦斯在卡斯特罗最初获胜后展开的运动中深刻认识了国家，他也能正确判断各种各样的人。

卡斯特罗经受住了1903年的“解放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那位银行家一将军后来曾当过戈麦斯政府的一任外交部长。这次革命得到北美的某种支持。卡斯特罗准备与外国人签订合同和给予他们特许权，但他不能保持约瑟夫·康拉德在《诺斯特罗莫》（1904年）一书中所说的“文明经商的条件”。正是他像频繁的财政危机一样的反复无常，招致了1902—1903年英、德、意的封锁。这种事情倒并非第一次出现——古斯曼·布兰科本人曾在这时或那时与荷兰、英国、法国和哥伦比亚断交，但古斯曼使恶劣的关系得到较好的控制。不过，卡斯特罗经受住了封锁，甚至还能从中在本国获得了某种的政治利益。封锁还促使拉丁美洲人发表敌视索债远征队的声明，这些声明对形成国际法的地区性观念是重要的——这就是以表述它的阿根廷外交部长命名的德拉戈理论——它还导致了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引申：一个拉美国家的“不断的混乱”应由美国的警察行动加以控制，因为美国不能接

677

⑨ 例如，见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委内瑞拉资产阶段的形成进程》，载《历史的三个主题》（第二版，加拉加斯，1978）。

受欧洲对美洲的干预，特别是德国海军对加勒比海的入侵。

在“解放革命”和封锁后5年，卡斯特罗被迫去欧洲进行在委内瑞拉无法做的外科手术，当他外出期间，政府由副总统戈麦斯将军接管。在这过渡时期，一支美国海军停驻在沿海附近，美国小心翼翼地帮助戈麦斯阻止卡斯特罗回国，一直到1924年他去世——他的骨灰后来在70年代被送回他在卡帕乔的出生地。戈麦斯不需要美国的帮助，但他提供了稳定，这是“文明经商的条件”。他控制委内瑞拉直到1935年他去世。 678

他有从事军事组织的天赋，他在卡斯特罗的革命及以后时期中所担负的任务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实际经验。他并不是使委内瑞拉军队得到部分现代化的第一个统治者——古斯曼和克雷斯波拥有装备更好的精锐部队或叫“神圣部队”(sagradas)——但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使他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依靠的武装部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建立了一支人数较多也更专业化的正规军，但他也在各地区维持了一个由内战老军官组成的系统，常常就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一旦有变，这些军官将组织老式的“亲军”。他在政府的实际所在地马拉凯还维持了“神圣部队”。马拉凯是国家的战略中心，也是经营有利可图的农业活动的适当中心。居住在那里是戈麦斯使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办法。为方便起见，他让可靠的文人占据总统职位。但他绝不放弃军队的指挥权。

作为他的军事力量的补充是一个设在国内外的广泛的谍报系统，是用脚镣长期囚禁反对者的罗通达监狱，以及对一切重要公开辩论的压制：国会是由被提名者组成的奴颜婢膝的团体，社会上也不存在反对派报纸。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也可为戈麦斯辩解说，他在1908年接管的并不是被吓倒了的1935年的共和国，他囚禁或流放的人中有许多人本来会欢迎继续打内战，假若他们胜利了，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不会两样。戈麦斯主义不应被当作是在1908—1934年间的所有年份中都千篇一律的制度，它在1908年也不是立即得到巩固和不可挑战的。戈麦斯花费很多年才

使国家平定了内乱。他从来不主张派出大量驻军或者分散军火库，小的暴动和来自哥伦比亚的越境出击甚至到20年代还继续发生。1929年，曾长期在罗通达当囚犯的拉蒙·德尔加多·查尔沃德将军乘“法尔克号”汽船从欧洲发动一次小规模入侵。德尔加多在库马纳登陆后不久就被打死了，入侵者和他们的盟友都被击溃，但他至少还有过一次外来的机会。假如戈麦斯死在1925年而不是1935年，他可能因秩序井然而获得更多的赞扬而不会因实行镇压受到多少批评。一般地说，那些遭流放和监禁的受害者并不是一般的委内瑞拉人。戈麦斯具有单纯的纪律观念和普通人的特征：他毕竟在40岁前当过安第斯山的农民和牧牛人，最初有较大眼光的是卡斯特罗，而不是他。

679

因此可以说他是怀着一个谨慎的庄园主的心理管理委内瑞拉大部分经济的。正如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坚持说的那样，他不是自耕农，而是一个“农村资产阶级”。[10] 戈麦斯保留了对土地的欲望，获得了大片地产并通过垄断从中获利。竞争者、即使是英国的兰开夏牲畜公司也很难进入市场。不过，戈麦斯并不只是专对土地有兴趣，他也不是某种“土地迷”的受害者。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石油提供的更大的机会。

委内瑞拉石油业的起源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即1878年（在卡斯特罗和戈麦斯的故乡）创建塔奇拉石油公司。1883年第一个租让权给了一个北美人，用以开发瓜诺科沥青湖。这项租让权转给了纽约和贝穆德斯公司，该公司因与卡斯特罗有分歧而于1903年支持马托斯将军。卡斯特罗将约600万公顷土地的权利赠给了他的支持者，于是确立了一种模式：个别委内瑞拉人获得了租让权，然后卖给外国公司。有时外国公司也直接得到租让权，如在1909—1910年戈麦斯让与英国人2,700万公顷。早期的

[10] 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为戈麦斯点燃大腊烛》，载《批判史的故事》（加拉加斯，1983）。

这些租让制并不标志着开始大量出口石油。这可从1917年算起，当年委内瑞拉出口了21,194吨。到1926年，委内瑞拉出口石油近400万吨，石油已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1928年产量增加到1,500万吨。至此，委内瑞拉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8%，也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这样，委内瑞拉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已经被加强到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无法相比的程度，而且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戈麦斯将收入花费在道路和军队身上。1928年他创办了农牧业银行，不过这一主动性并没有伴随着任何连贯的农业发展政策。委内瑞拉的农业、特别是咖啡由于30年代保持高汇率而受到严重损失。虽然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什么研究，人们常常认为农牧业银行的贷款没有用在农业上。石油引起了人们的迁移，迁移到生产区和一般城市，尽管直接受雇于石油业的人数目并不多。在地方上，获得最大好处的是商业精英们。最后，石油的出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委内瑞拉的对外贸易决定性地转向了美国，美国在战后年代保持了支配地位。 680

直到最近，人们才试图冷静地为戈麦斯对石油工业的管理作最后的结论。罗慕洛·贝当古的杰出著作《委内瑞拉一政治与石油》（1956年）——很少有国家元首写过这么好的书——自然没有发表辩护性的意见。戈麦斯和他周围的人大发其财。戈麦斯并非无私的爱国者——他爱问“他是朋友吗？”这相当于弗朗兹·约瑟夫爱问的“他是我的爱国者吗？”在委内瑞拉的翻版——但因有了1914年前在德国投资的不幸经验，他不再把财富投资到国外。更重要的是他认真研究了委内瑞拉在市场中的地位，使用了一些能干的人，尤其是古梅辛多·托雷斯逐步与各公司做成几笔苛刻的交易。他小心翼翼地在美国人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不是由于萧条引起了更疲软的市场，他的经历也许会带有更多的民族主义标记。他的批评者们在攻击他时并不始终十分了解当时不断改变的市场条件，他们也忽视了20世纪20年代

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发展的空前的高速度。面对强大老练的谈判手——石油公司在这些方面与委内瑞拉从前的外国企业主兼冒险家都不同——戈麦斯并不是简单的“卖国贼”。人们可以从他决定将部分石油收入用来抵销委内瑞拉的外债中看到一种潜在的民族主义标记：最后一部分债款偿付于1930年12月17日，即玻利瓦尔去世后一百年。在公共财政方面，戈麦斯是严格的保守主义者。还有什么别的拉美国家经受住了世界大萧条的危机呢？

没有任何别的拉美政府如此毫不留情地镇压它国内的敌人并如此警惕地监视它国外的敌人。与此同时，戈麦斯使用了不少具有朴素勤奋习惯的人，这些人虽然作了妥协而仍得到某种程度的尊敬：古梅辛多·托雷斯、罗曼·卡德纳斯、佩德罗·曼努埃尔·阿卡亚、埃莱亚塞·洛佩斯·孔特雷拉斯、何塞·希尔·福托尔、劳雷亚诺·巴列尼利亚·兰斯以及比森西奥·佩雷斯·索托等都具备戈麦斯十分珍视的那种严肃认真（seriedad）的素质，这也是他长期占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戈麦斯在地方上任命的人并非全部残暴、腐败：有些人在他死后还继续任职到第二个10年。他的陆军部长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将军的才干可以从他处理最终无可延缓的变革的能力上看出，这种变革是1935年12日17日戈麦斯去世后到来的。

681

戈麦斯政权结束时委内瑞拉的人口仍然主要在农村(77%)，城市仍然不大。全国约有350万人，而加拉加斯仅有23万人，无论马拉开波、巴基西梅托或者巴伦西亚都不到10万人。教育或卫生方面都没有大的发展。不过戈麦斯虽然无所作为，他还是留下了一个变化很大的国家，而且还将进一步变化。石油的连锁关系改变了政府处境，而戈麦斯政府则改变了政治。他将委内瑞拉政治变成了一块空白，这是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大国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到的。没有一个党被允许存在：在他统治的早期，他甚至不让按礼仪在口头上提到自由主义的过去。他死后，权威的传统继续存在——它们至今仍存在于委内瑞拉的政党内——但政治生活不

能不重新改建。它将在已出现的更现代化的反对派中、特别是在1928年的学生示威中找到它的领导人和它的鼓舞力量。

文化生活并没有全部被窒息，不过戈麦斯主义索取的最高代价也许是它起的阻碍发展的作用。戈麦斯政权的个别支持者——何塞·希尔·福托尔、劳雷亚诺·巴列尼利亚——写了一些至今值得一读的书。马拉凯密切注意加拉加斯的文化生活，关注颠覆的迹象，那些成名的人应召前往那里接受将军的审查，他们的“友谊”程度由将军亲自估量，但除此以外，戈麦斯政府就漠不关心了。这种气氛使有些著名人士得以获得个人的教育成就——罗慕洛·加列戈斯指导的学校培养了一代后来的政治领导人。戈麦斯喜欢加列戈斯写的《堂娜芭芭拉》（1929年）：他命人在室外为他朗读（并不是因为他是文盲；而是因为他喜欢听人读），当天色暗下来时，他命人继续在汽车前灯下朗读。他以提名加列戈斯为参议员的方式进行试探；但加列戈斯宁可流亡国外。 682

结　论

在1880—1930年间，无论哥伦比亚还是厄瓜多尔都只不过引起了某些大国短暂的注意。除巴拿马外，哥伦比亚不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在这个使用供煤港的时代，加拉帕戈斯群岛被怀疑具有比厄瓜多尔大陆更大的战略潜力。委内瑞拉是1895年英美在圭亚那边界纠纷问题上发生对抗的起因，是1902—1903年异常轰动的欧洲国家进行封锁的目标，只不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它使大国认识了石油的重要性，委内瑞拉的资源才成为英美时刻关心的对象。三个共和国在大战中都保持中立。尽管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它们的南部边境与秘鲁进行过短时对抗，发生了一些侵掠行为，但三国在这50年内都没有打过国际战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取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进展，当时这种观念仍是受尊重的。拥有石油的委内瑞拉走上了一条更为突出的道路，至少在统计数字上如此。对这一时期三国的演变作一考察，表明

不管它们在大部分时间内在远方的观察家看来显得多么相像，它们在政治上是作为独特的国家进入这一时期的，而且在经历这一时期后变得更独特了。这种独特性的大部分原因还有待深入探讨。近些年来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地区研究为整个图面增加了并将进一步增加细微的差异和奥妙。现在存在一种小小的危险，即这些国家的全国政府的困境、考验和磨难，以至它们的成就，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第 五 编

巴　　西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英属圭
荷属圭亚
法属圭亚那
内格罗河
亚马孙河
马瑙斯
贝伦
圣路易斯
布拉干萨
福塔莱萨
罗萨里奥
马拉尼昂州
塞阿拉州
北里奥格兰德州
纳塔尔
帕拉伊巴州
伯南布哥州
累西腓
阿拉戈斯州
塞尔希培州
皮奥伊州
帕拉州
亚马孙州
马托格罗索州
戈亚斯州
巴伊亚州
萨尔瓦多
圣弗朗西斯科河
米纳斯吉拉斯州
贝洛奥里藏特
圣埃斯皮里图州
维多利亚
坎普斯
里约热内卢州
里约热内卢
秘鲁
玻利维亚
科伦巴
巴拉圭
巴拉那河
里贝朗普雷图
圣保罗州
坎皮纳斯
圣保罗
桑托斯
巴拉那州
巴拉那瓜
圣卡塔琳娜州
南里奥格兰德州
阿雷格里港
里奥格兰德
智
利
阿根廷
太平洋
大西洋
800公里
500英里

巴西

第 19 章

巴西经济（1870年—1930年）

1870至1930年这段包括巴西帝国和整个第一共和国最后20年在内的60年，代表巴西经济史上执行出口方针的顶峰。政府和私人部门将资金转向出口生产，从19世纪70年代这10年到20世纪20年代这10年，人均出口从1.31英镑增至2.83英镑，年增约1.6%。这个时期经历了许多社会变革和经济多样化，包括欧洲移民，城市化，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中等水平的工业化，这一切显然是由于出口的扩大。出口的扩大也是吸引外国资本的主要因素。英国和美国的投资水平从1880年的5300万英镑增加到1929年的3.85亿英镑。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这个时代告一结束。出口不再对经济发挥有力的影响，此后不得不日益采用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以设法刺激进一步的增长。

出口看来是人均经济增长起步的主要刺激因素。这一增长似乎是在1900年之前不久才开始的。关于增长的速度尚不能肯定，因为国情统计只是从1947年起才进行的。1900—192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年增长率计算为几乎2.5%，但可能有必要把数据调低一些。这一速度超过当代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速度。1925—1929年这段时期结束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已达到110美元现值。①

① 见C·孔塔多尔和C·阿达德《1861—1970年时期巴西的经验：实际生产、货币与价格》，载《巴西统计杂志》1975；O·迪亚斯·卡内罗《1920—1965年巴西经济演变的昔日趋势》，1966，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油印本，表1B。

686

1870—1930年这个时期出口生产的中心地位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代表了巴西历史的连续性。从1500年美洲被发现到1822年独立年代，出口是葡萄牙王室和海外商人榨取殖民地垄断利润的主要手段；因此，鼓励出口曾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沿着从马拉尼昂到圣维森特的辽阔海岸，特别是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建立和精心设计了蔗糖生产的种植园体系，雇用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劳工，由殖民地大庄园主土地所有者阶级就地经营。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蔗糖一直是巴西主要的经济作物，尽管从17世纪后期起蔗糖出口值下跌了。接近18世纪末时，葡萄牙王室鼓励巴西种植园生产实行多样化，并取得一些成功。棉花、靛青、稻米、可可豆及其它商品的出口大大地增加了，蔗糖业得到了恢复，部分是由于1776—1815年加勒比地区殖民地贸易中断了。巴西大部分其它出口是采掘物品。沿海森林提供木材和其它松脂制品。1700年之前不久，在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内地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淘金热。行商们进一步向内地推进，收集染料木、可可豆、牛皮、羽毛、鹦鹉、香料、吐根、菝葜等等，卖给出口商。殖民地将烟草和其它货物运到葡萄牙非洲贸易站，以购买奴隶，并将各种欧洲产品走私到拉普拉塔河地区，以换取波托西的白银。葡萄牙重商主义政策试图为沿海种植园提供廉价奴隶劳工，限制前往矿区的通道，阻止当地制造货品，而由里斯本有利可图地运来，制止利润流入除葡萄牙海外商人和王室以外的人们之手。

虽然巴西人口（1800年为300万多一点，包括不受葡萄牙管辖的印第安人。每10平方公里平均约3人）集中在沿海，但在广阔的荒野地域上建立了无计划的定居点。种植园和矿区之间产生了一种从事奴隶、驴和牛的买卖的内部交易，这就扩大了葡萄牙对广阔的内陆地区的控制。甚至在这些地区以外，垦殖者还采用某种拓荒形式：在手法上和血统上都利用梅斯蒂索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裔）。他们刀耕火种的农业是流动性的，取

决于可供狩猎和捕鱼的荒地，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据了空隙和边缘。他们为城镇市场提供少量猪、烟草、玉米和豆类，换取一些盐和火药。这种自给自足经济一直持续到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认为这一经济是对二元经济的补充，而是一个等待被现代经济加以吸收的落后部门。它的落后性是由于不许穷人拥有土地并使收入集中保留于王室官僚、海外商人、大种植园主和矿区租赁人所居住的城镇。继续保持落后状态对于沿海殖民地是有利的：那里可作为流放不守规范的分子的地方，作为防止部族人袭击的缓冲地带，也是使部族人获得“文明”的便利办法，作为开垦遍布各处的难以采伐的大片森林的免费手段。沿着从南里奥格兰德到马托格罗索的巴西与西班牙领地之间含糊不清的遥远边界进行拓荒垦殖，甚至也是葡萄牙王室的一项计划。 687

1808年之后，当葡萄牙宫廷为逃避拿破仑军队而转移到里约热内卢时，巴西的经济政策不再受外部决定了。尽管如此，殖民地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口贸易(蔗糖、棉花以及现在加上咖啡)的中心地位，仍大体上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地主阶级和葡萄牙海外商人之间的矛盾，很快导致了巴西政治上的独立。然而，在自封为皇帝的葡萄牙王子统治下的独立，并没有产生什么革新。新政府承担了葡萄牙向伦敦借贷的部分债务，许多殖民地时代的官员继续留用，种植园主阶级确认其对土地和奴隶产权的垄断，英国商人取代了主要港口的葡萄牙出口公司，因为他们从新政府为取得英国承认而签订的不平等商约中得到了特权。新的中央政府在建立国内权威方面经历了重重困难。边缘省份发生叛乱，城市手工艺者骚动，奴隶也揭竿而起，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对新殖民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瓦解作用的反抗。直到19世纪40年代晚期才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到那时，独立以后的日益虚弱的商务条约已经期满，从而使关税政策得到放宽。1850年，按照英国模式编写了一部商业法典，并通过了土地法。同年，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废除了非洲奴隶贸易，这使得葡萄牙帝国上层分子感到尴尬，但 688

却迫使他们更加想方设法考虑增加劳工供应的问题。

经济政策和全国性市场的建立

一直存在到1889年的葡萄牙帝国未曾坚持一贯地有力推行可以被称之为发展性的经济目标。提出的国家项目很少，付诸实施的项目就更少了，最显著的是1872年的普查和国营电报网的开创。相反，在各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支持，获得适度的资助或者得到利润的保证。里约热内卢州的地主往往最可能得到支持，事实上他们是帝国的政治支柱。当咖啡的增长速度特别有了大幅度提高时，出口政策开始受到中央政府官员们更多的重视。由于海关是他们岁收的几乎唯一来源，而且某些进口品对政府活动至关重要，他们就自有理由支持一项出口导向的政策。

但是，帝国的“商业气候”对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通常是有所敌视的。19世纪50和60年代最活跃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声称，他的事业以失败告终，部分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他的活动不给予合作或对其活动感到厌恶，尽管他已获得“毛阿男爵”的头衔。货币供应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外，是由一家其任务是遏制而不是鼓励私人企业的政府独家银行管理的。合股公司享有的个别立法授予权一直保留到1882年。帝国的国家委员会坚持认为有必要对公司进行审查，断言巴西商人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政府对企业的鼓励措施（如果提出的话），通常采取专有特许权的形式。大地主和商人对利润是很敏感的，他们主张在保留他们资金控制权的政府渠道内对经济加以筹划。既然收益只归于一个很小的阶级，他们的经济就只需缓慢增长，几乎不要什么多样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阶级利益如此悬殊，以致于以全国作为分析单位是否恰当，成了严重问题。”②

689

② N·莱夫《巴西的不发达和发展》，两卷集，1982，伦敦，第1、7页。

但是，共和国放宽了“结社精神”，改变了经济辩论的性质。临时政府把经济问题作为它的中心大事，大力促进经济增长。希望成为资本家和工业家的人们以及某些政治上很活跃的城市自由职业者和军官们，对于巴拉圭战争中所显示出的无能和战后军事预算少感到忿怒，他们主张一项干预主义的经济纲领。在帝国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发布了最终废除奴隶制的命令，发行了政府公债以资助因丧失奴隶而得不到报偿的种植园主们。这些款项直接转给城市债权人，推动了经济的突然繁荣。临时政府然后在高涨的投机浪潮中授权设立发行银行、股份公司和开发计划，人们以赛马场用语称之为“套上马鞍”。虽然这个热烈的过渡时期中许多倡议实行了很长时间，但到了1894年，民族主义联合政府因本身活动过渡而筋疲力尽，以至失去了控制，被迫平息一场海军叛乱和发生在南里奥格朗德的另一次叛乱，并且被通货膨胀和外债累累所压倒。

可以看出，随后几届政府（其干预主义程度显然比民族主义政府少得多）对国内发展施加了限制。比如说，第一届文职政府取消了与里约热内卢一些造船厂签订的建造驱逐舰的合同。这是因为种植园主主持的政府考虑到购买英国公司的海军船只更为稳妥，以确保英国市场和英国资本的不断流入，所以听任已建造了一半的船身生锈废弃。但是，这些政策所固有的种种情况和重重的矛盾，引发了制定大量的发展措施，迫使政府直接进行干预。[③]种植园主的计划花费十分昂贵，而且规模宏大。当外国的特许权持有人或本国企业家犹豫不定或对官方津贴要求过高时，这些计划的实施往往落在政府肩上。

人们常常指出，种植业和出口业利益集团希望的是会引发逐步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实际收入转移到他们手中的货币和金融政 690

---

③ 见S·托皮克《1889—1930年巴西国家经济任务的演变》，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1/2，1979年，第325—342页。

策。1894年后的文职政府压倒一切的大事，是关注它们在外国银行家心目中信用地位。这个看法很重要，因为建立这些政府的那些利益集团不愿意以收支平衡来履行其使命。共和国出现的赤字更甚于帝国，在共和国存在的41年期间出现过32次赤字，其中有13次赤字超过收入的25%。这些赤字是不能通过内债来解决的。本国证券市场很混乱，使得政府采取了不体面的做法：它用证券支付一部分债务时竟被债务人把证券草草地打了折扣。而且，内债不能用于已经签约的、以黄金计值的外债。在另一方面，外国贷款往往同时附加一些直达政府领导机构的条件，对它们指手划脚。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公司*1898年提供一笔1,000万英镑的资助贷款，容许巴西政府推迟13年偿还本金，从而使新的文职政权摆脱了财政困境。但是，他们要求征课进口附加税作为报答，并要把这些款项以储备金帐目存放于伦敦，还要求逐步回笼纸币米尔雷斯**的流通，回笼数额应相当于贷款价值。这种通货收缩计划直到1905年始终是政府政策的中心，尽管这一计划对生产和就业造成严重的衰退性影响。

尽管有外国贷款，联邦赤字仍不断增加。根据共和国宪法，州政府和市政府也可签订借款合同。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1900—1912年，它们的外债从500万英镑增加到5,000万英镑，这个数额相当于联邦债务的37%。中央政府迫于债权人的催逼，推卸了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的任何责任。对于种植业和出口利益集团来说，始于1898年的收缩通货的做法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它减少他们的米尔雷斯收入。因此，1905年他们达成一项妥协，为米尔雷斯规定一个比较高的新比率，即合15便士，但是政府采取行动，设立汇兑基金，以防止米尔雷斯进一步升值。汇兑基金将收取以这一比率储存的黄金通货，并同时通过发行纸币流通的办法来扩

* 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是欧洲犹太血统的银行世家，最早创业于1760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后发展到欧美各国。——译者

** milreis，巴西当时的货币单位。——译者

大货币供应量，作为交换。

巴西外债的定期筹集难以正常实现，因为出口贸易具有周期性，这由于银行家们自己推动采取的各项政策而加剧。工业国家周期性上升的趋势增加了对巴西商品出口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出口品的价格。日益上涨的商品价格吸引外资的流入，加强了巴西的经济复苏，刺激了进口品和国内生产的过大增长。下降趋势也同样剧烈，但更加痛苦，因为以黄金为后盾的货币流出巴西，而海关则堆集了大量尚未付款的进口货，外债空前增加。外国银行家不愿再给新的贷款，他们的银库也已空空如也，或者他们的贷放条件过于苛刻而巴西国家主权难以接受。在此关键时刻，即1914年8月，巴西政府剩下的唯一救援办法是停止实施比赛规则。巴西政府取消黄金兑换，发行2.5亿米尔雷斯纸币。虽然口头上信奉货币正统学派，但是比起政府的生死存亡，那只不过是次要的；通货膨胀虽然看来像场疫病，但往往作为最后手段加以采用。④

要实施一项全国性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就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市场，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巴西在地理上是个次大陆，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看是个群岛。除了米纳斯吉拉斯这个重要地区外，巴西全国人口（1870年不足1000万，1900年为1700万）的大部分仍居住在广阔的沿海，集中在大多为州首府的港口城市。近海船运线上使用的船只都是超龄和保养很差的，开航时间经常误点，运费要两倍或三倍于海外运货业。一些不具有深水航道并依靠沿海汽轮的小港口城市，则设法寻求资助来疏浚加深港口，以便容纳远洋船只。可是象萨尔瓦多和累西腓这样一些大城市的精英阶层由于想保住这些大城市作为货物集散地的地位，则竭力挫败这些做法。

691

---

④ 见W·弗里奇《1906—1914年巴西经济政策的若干方面》，载P·诺伊豪斯编《巴西经济的历史视野》（里约热内卢，1980年）。

铁路、公路或小道的网络或长或短地延伸到沿海城市的内地。这些网络只是偶然彼此交叉，有时它们被数以百公里的大荒野相隔。比如说，沿海的圣埃斯皮里图州只有通过极其困难的多西河通道才能同毗邻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相联。只是到了1905年才开始修建一条与多西河相平行的铁路，到20世纪30年代这条铁路才通到贝洛奥里藏特。戈亚斯和米纳斯吉拉斯是两个内陆的边远州，而马托格罗索州和阿克里地区只有通过漫长的河流迂路才能到达。可以想像，不管对外关税规定得多高，运输费用对于范围更加辽阔的地区间贸易是一个障碍。

692

除了上述障碍外，还有各州之间、甚至各市之间的关税。对来自其它州和城镇的货物实行征税的做法，始于巴西帝国时期。根据共和国宪法（属联邦制宪章），进口关税只能由中央政府征课，但出口关税则完全交给各州。享有大笔出口岁收的州，主要是圣保罗州，显然授意写下这一条款，因为该条款迫使那些无出口税可征的、不那么幸运的州实行进口税制。这些州往往对进口货以及来自其他州的货物不加区分地课税，因此这就成了一种关税附加税。联邦法庭谴责这种赋税，这在宪法中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却仍然不受干预地继续征课。这种状况之有可能存在，足以说明各地区上层阶级利益集团如何与那些控制占统治地位的出口州的利益集团紧密勾结的线索。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对较小的州实行军事干预，以清除掉较小寡头集团中的这个或那个派系，但它为了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所以从不试图切断这一岁收来源。

虽然民族主义的共和党人声称他们想要建立这样的市场，但从另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上说，这一目标大概是超乎他们想望的。在巴西，要获得生产要素只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运转。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基本上决定了获得信贷的机会、土地所有权和就业条件。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由于欧洲移民和城市化而冲淡了这一现实，但有产阶级的情况总是这样的：他们的报酬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支配资金的能力超过他们在市场中

的地位所能赋予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不受较低社会阶层人们的竞争。在这种情势下，富于青春活力的雄心都集中在政治目标上，这是一条比依靠企业家精神而在社会地位上得到升迁更为可靠的道路；而且，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即使成功的话，也不得不与权力集团讲和。

693

从国内条件看，可以看出，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偏爱，内部资金转用于发展出口部门，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是极其有利的，合宜的，而且符合他们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和行使权力方面继续保持垄断的愿望。可是，这些政策由于本身固有的环境和因素不同，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些统治阶级与他们外部资金来源的联系是特别成问题的，而且对来自巴西政体内部的反应难以招架。即使如此，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等阶层可以被说服而相信：巴西通过刺激出口而日益结合进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去，对于他们自身也是利害攸关的。

出口需求的增长

到1870年，世界贸易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各种贸易机会即将大幅度扩展的一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货轮在南大西洋开始经常航行，使运输成本减少了一半，运货实现规律化，并大幅度地增加可以发运货物的范围和数量。英国的工业化大大扩大了这些货物的品种和效用。实际上，巴西的出口方针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巴西正开始参予工业革命，以它的农矿产品换取体现新工艺的工业制成品。在这同一个10年里，海底电缆将巴西的港口城市同欧洲，并间接地同美国，联接起来，从而减少价格和供应方面的不确定性，大大便利了商业信贷的划拨。工业体系向德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扩展，加剧了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从而增强了诸如巴西在供应原料和食品方面的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西的贸易条件有了改善。

增加出口对巴西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就整个这一时期而

言，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巴西出口值主要是在金融恐慌和战争以及欧美经济危机的夹缝中增长起来的。这也是成问题的。世界贸易中主要产物的数量很少，而且地理因素使巴西除了少量主要产物外，无法供应其它产物。价格的激烈波动，日益扩大的竞争的威胁，被市场排挤出去的威胁，以及合成纤维的发明，对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一样，都带来了迷惘难测的前景。可以说，出口导向型政策对巴西最为不利之处，是海外需求刺激因素的弱点。考察一下这个时期主要商品的情况，就可以观察到这一困难。

694

咖啡是巴西国际贸易中唯一最为成功的产品。早在18世纪，巴西就引进了这种植物，但只是在独立后的10年里，咖啡才在出口项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巴西东南部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宜于咖啡的生长，而且咖啡豆易于运输和储存。调配咖啡上市不需要复杂的工业程序。19世纪70年代，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机械脱壳机，各种商用焙烤技术也完善起来。19世纪80年代晚期，一场虫害使巴西的亚洲竞争对手受到损害。在这种颇有希望的关头，巴西咖啡种植者迅速扩大他们的咖啡园。巴西咖啡主要是属于低档的。不同于哥伦比亚、牙买加和其它的咖啡种植地区，巴西的咖啡是由小农种植的。巴西的咖啡种植不搭遮棚，对咖啡的管理和收割只用极少照应。但是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大规模的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出现，生产的廉价咖啡却享有大幅度的需求增长。随着城市居民普遍饮用咖啡上瘾，到1921年，美国人均消费量达到5.5公斤。

19世纪30年代，每年咖啡出口为 6 万吨；到1871年，运出了21.6万吨。1872年，由于铁路通到坎皮纳斯，肥沃的圣保罗大高原得到了开发。坎皮纳斯州在咖啡销售方面很快名列榜首。在1885年以后的10年中，在外资流入的刺激下，在共和党临时政府低汇率货币的刺激下，圣保罗新增加的咖啡种植使巴西咖啡林面积翻了一番。到1901年，咖啡出口达到88.8万吨。从独立时期至1907年间，咖啡价格经历了 3 个周期，每个周期以接近每公斤

0.15美元的价格告终。这种低价循环的趋势使潜在的竞争者为之沮丧。即使听任巴西咖啡市场的优势在1870至1930年间有所削弱，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巴西仍然在全世界3.2亿株咖啡中占到2.1亿株。就整个时期而言，巴西提供了世界咖啡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不幸的是，巴西的其它出口品在世界贸易中均不享有类似咖啡那样的持久的成功，结果，到1925—1929年，巴西咖啡提供了它75%的外汇收入。因此，高度依赖单一出口产品的价格，是巴西经济的特点。

695

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天然橡胶是巴西国际贸易中居第二位的最重要项目，经历了从繁荣到骤然垮台的过程。19世纪最后25年对橡胶的工业应用迅速增加，刺激了世界对橡胶需求的非同寻常的高涨。橡胶价格由1840年每吨45英镑增长到1870年的182英镑和1911年的512英镑。割胶者遍布亚马孙广阔的河谷。这一河谷是若干具有商业价值的产胶乳树品种的原产地。在这些品种中，以巴西三叶胶树（Hevea brasiliensis）最为高产。1870年，出口6,591吨天然橡胶，1911年出口达38,547吨。20世纪头10年，橡胶提供了巴西外汇收入的1/4。随即开始了一次灾难性的价格下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西几乎丧失了它的橡胶的全部出口市场。在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也引进并驯化了巴西三叶胶树，在那里建立了种植园，生产橡胶的成本要低得多。巴西政府设计了开发亚马孙地区基础结构的一项昂贵计划，但并未付诸实行；要在短期内改变那里的种植证明是不可能的。割胶业的网络逐渐支离破碎，到1930年，橡胶出口跌到仅6,000吨。

蔗糖是最传统的种植园作物，是推动巴西开拓殖民地的动力。在19世纪晚期，蔗糖在世界市场上经历了一次复兴。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加工技术，使蔗糖变成一项大众消费品，在所有碳水化合物中是最便宜的，是补充工人饮食最现成的热量。巴西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初期参予了这一复兴过程。但是，接着遭受1900

年后急转直下的出口下跌之害。来自甜菜糖的竞争（在工业国受到保护）和新产区蔗糖的竞争，使巴西种植者无能为力。在1898

696 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并且吞并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之后，被吞并的这三国获得了进入美国糖业市场的优先机会。沦为保护领地的古巴，在随后的10年中有10亿美元流入它的糖业部门。那时，巴西蔗糖的出口则停滞不前。1898年，巴西最重要的蔗糖产区伯南布哥的蔗糖出口值仅是它15年前的一半。巴西占世界糖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19世纪50年代占10%，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则不到0.5%。

棉花在过去也一贯是巴西海外贸易中一个重要产品。19世纪初，当地的长纤维木本品种棉提供了世界市场的10%。尽管19世纪对原棉的需求猛增，但英国的纱厂还是由美国供应。在南部各州试图脱离联邦而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以及在随后几年，巴西棉花再度具有短暂的竞争力。1870年，巴西出口棉花4.2万吨。但由于美国棉花贸易的复兴和埃及增加棉花的种植，巴西失去了它的英国市场；到1880年，棉花出口额下降到10年前出口额的一半。

巴西早从殖民地时代起就出售可可豆，大部分可可豆采自亚马孙河谷的野生林木。19世纪80年代在南部巴伊亚州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种植。随后不久，世界对可可的需求量在新的消费方式的刺激下急剧增加，到1928年，从10万吨多一点增加到近55万吨。但是，巴西在世界可可市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仅提供世界市场1/10多一点。世界可可豆的大部分来自英属西非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在南里奥格兰德和圣保罗建立了几家肉类加工厂。然而，肉类加工厂在海外销售方面的早期成功只在战时匮乏时期以后并未能延续多久。巴西每年还出售几千吨兽皮、巴拉圭茶、油籽、木材、锰、生皮及烟草。这些都不能大幅度地增加出口收入，尽管这些产品在巴西东北部和南部区域性市场内是重要的刺激因素。此外，巴西还生产大宗其它产物，

诸如玉米、豆类、香蕉、木薯粉等，但是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巴西才设法出口一些到海外。

巴西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多种资源的国家，但是却主要作为单一作物咖啡种植园参予世界贸易，这是值得注意的。外部因素不能完全说明利用机会的范围如此狭窄，也无法说明早期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的消蚀。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困难是无法补救的。某些天然的不利因素随着世界需求的增长而变得越发严重或明显。比如说，古巴糖业种植者的决定性优势，是他们拥有比[697]较平坦的地形，更适合于大容量碾碎机的需要，因为这一优势可以将甘蔗更迅速地运进工厂，而由于甘蔗汁蒸发迅速，运输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在亚马孙河谷设法进行的。但后来人们发现一种专门损害三叶胶树的病害也毁坏将植的橡胶树。这种真菌并未随之传到移植到东南亚的橡胶种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困难看来是可以得到补救的，但没有完全采取补救措施。即使在19世纪60年代，短纤维棉花已经引进到巴西种植园，但巴西的海外棉花市场还是丧失了。

巴西的海外贸易看来仅限于那些因具有压倒的比较优势而能抵销生产和销售成本高和国内征课高额赋税的商品。为改进生产方法和组织更有成效的销售安排所必需的资金，的确很短缺，但也并非得不到。在缺乏私人积极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看来愿意提供保证，甚至资金。但这些计划一旦被采纳，往往显得进展缓慢、考虑不周或贯彻不全面。咖啡部门提供大规模提高生产率的资金，即使在这一部门，也显示出缺乏对竞争力的关注。相反，市场份额日益减少的问题，仅仅被看作是价格下跌的问题。因此，重点几乎完全放在维持价格上。

巴西政府大力着手稳定它在世界贸易中主要商品的价格。巴西咖啡种植者由于在1885年以后大幅度扩大咖啡播种面积，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面对世界市场上不景气的咖啡价格和国内通货收缩政策(那是1898年筹款借贷的条件)的种种影响。因此，出席1902

年国际咖啡会议的巴西代表极力主张成立卡特尔，但他们遭到了挫折。同年，圣保罗州宣布停止扩大咖啡种植，此后这一做法延续到1912年。到了1906年，圣保罗州说服了其它主要生产咖啡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参予一项所谓“价格稳定”计划。这些州要以每公斤0.15美元的基价收购咖啡，并贮存起来，以待咖啡价格可以补偿经营成本之时使用。通过咖啡进口商的调解，从欧洲和美国银行获得了资助。因此，在6个月之内，咖啡销售量减少了66万吨。新的咖啡销售增收附加税，以帮助支付仓库保管费。而且，终于说服了联邦政府提供信贷保证。咖啡价格的确开始再度上涨，到1912年，曾达到每公斤平均0.31美元。同年年底，由于面临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有贮存在那里的咖啡被仓卒地售出。

698

维持价格的措施似乎缓和了1907—19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巴西的影响。这一措施可能使咖啡种植者受益，而且对那些取得相当多佣金，并加强其对巴西国内商业的影响力的银行家和中间商肯定是有利的。鉴于世界需求仍不断增长，咖啡价格反正是会上涨的。但是联邦政府还是被争取过来支持这一步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期间发动了第二次稳定价格的计划。这一次收购了18万吨咖啡并加以贮存，价格因而急剧上升，部分原因是由于圣保罗发生严重霜冻，政府从而获利。随着战后商品价格不景气，又发动了第三次稳定价格的计划。然而到那时，世界咖啡需求开始平伏，圣保罗州又恢复了新的咖啡种植，致使这一商业冒险难以奏效。联邦政府停止了它的参予计划，但是圣保罗的咖啡种植者怂恿圣保罗单独承担收购咖啡的任务。1925年，圣保罗宣告“持久防卫”，而且持续到1929年大危机，拚命把历年创记录的咖啡收成收购一空并贮存起来。这一政策的实施转移了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并忽视了生产率的问题，结果是鼓励了外国竞争的加强。

就其他出口产品而言，市场份额的减少和开发潜在市场的受挫，也部分地由于公共政策。在每次出口出现扩展阶段的同时，

通过政府机构使传统生产者方面也作出相应的努力，不建更多的生产单位。在咖啡业中，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因为咖啡种植超越州界，而且涉及州际对抗。诚然，1870年后圣保罗咖啡种植者热衷于共和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帝国偏爱里约热内卢种植者这一点很感恼火。东北部甘蔗和棉花种植者也显示出这一对抗现象。他们抵制将这些作物移植到圣保罗；此外，在负责制胶业并对国内橡胶种植制度的前景深表不满的商人们中间，这一现象也是很明显的。在传统种植者所取得的胜利中，可以提一下，在南部巴伊亚可可产区的内地，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都是极其落后的。 699

高额的出口税率削弱了巴西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此外，巴西政府的开支在很大程度上说是非开发性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花费大笔款项用于美化它们各自的首府和其它豪华项目，但是即使明显的开发项目也往往是用来掩盖其他目的的。比如说，土地垦殖计划的最初步骤是购买现有种植园，其实际使命却是援救失败的种植园主。当这些产业进一步被分割时，受益者更可能是想搞土地投机的党羽而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事实上，政府将其大部分收入花费在维持政权这个唯一目的上。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削弱，是一个直接的、累积的结果。从政治上说，这并不完全是一个灾难。从出口单子上消失了的产品，诸如蔗糖和棉花，受到了国内市场的保护。鉴于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发展，这是一项适度的，甚至是令人愉快的安慰性酬报。比如说，到1921—1923年，巴西本身消费了它的11.5万吨棉花收获量的77%。

巴西对单一客户或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要低于当时大部分其它非工业化国家。巴西的咖啡和橡胶主要是输往美国，而美国对上述商品并不课税。诚然，这两种产品连同生丝是美国最重要的豁免关税的进口货。作为回报，美国则要求对方更多地购买它的小麦和面粉、煤油、木材和工业制成品。但是，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是工业制成品和信贷的主要供应国。德国名列第

二。巴西与非洲或南美其余国家的现有的或可能的贸易互补关系，几乎没有怎么加以考虑。巴西与拉美进行的唯一数额可观的交易，是它购买阿根廷的小麦（这是英国中间商掌握的买卖），以换取巴拉圭茶，而当时对巴拉圭茶的需求是不景气的。巴西与繁荣的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建立关税同盟的可能性问题，看来还未曾予以研究。

700 巴西出口方针所依据的世界贸易与投资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了严重倒退。大战暂时地挽救了巴西橡胶，使之没有趋于湮没，并且为巴西把次要出口品——糖、牛肉、豆类和锰——出售给濒于绝境的对手提供了良机，但是咖啡在盟国货运优先单子上并非名列前茅，它们对于巴西经济因缺乏备件和燃料而是否可能崩溃这一点也不多加关注。巴西的出口值（以英镑计算）在战时5年期间同繁荣的前5年相比，下降了16%，而进口值下降了24%。运输费用急剧上升，进口品价格也急剧上升。比如说，1913年进口纺织品每公斤平均成本为0.98美元，1918年则增加到每公斤3.46美元。由于巴西进口品的一半以上是食品和原料，因此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严重的。国内价格增长一倍，这是由于因外币和黄金回流而需要增发纸币的结果。1914年10月，巴西联邦政府由于获得在伦敦筹措的1500万英镑外国贷款而在最后关头得到拯救，避免了无力偿债的危险。没有实行配给制；规定了上限价格，但只是在里约热内卢执行，甚至在那里也执行不力。工资显然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造成城市居民极大困苦，并于1917年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激起了示威游行和广泛的罢工。

由于巴西在1917年10月站到同盟国一边参战，德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关闭了，同德国资本有联系的公司受到侵扰或实行英国“黑名单”的办法予以停业。巴西政府没收40多艘滞留在巴西港口的德国船只作为战利品，因而使巴西商船吨位翻了一番，但巴西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在比利时开户的银行存款，以及它出售稳定价格计划库存的收入。比这一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战争的长远影

响，战争使巴西所有贸易伙伴（美国除外）的经济受到削弱，减弱了这些贸易伙伴提供信贷并从巴西等国进口的能力。英国金融中心对巴西出口方针至关紧要，这个中心的不稳定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成问题。

生产诸要素

701

土　　地

从干旱陆地表面这个意义上说，巴西的土地显然很富足，几乎成了可以免费自由取用的货品。之所以未把它归入那一类，是因为巴西土壤肥力短暂，至少这是由于巴西的耕作方式以及巴西土地所有制的高度集中。巴西的农业耕作仅限于森林土壤。这些土地中比较容易到达的，是位于距内陆100—400公里的沿海。再往里去，遍布的是干旱的贫瘠土壤，仅适宜于畜牧业。新开垦的原始森林地产量惊人而受到重视。据认为，只有在刚开垦的处女森林土壤上种植咖啡才能奏效。因此，咖啡种植业促进了巴西东南边疆的迅速扩展。咖啡灌木能够产果得利达40年之久。但是轻率地择地建园，往往缩短了产果时间。由于大部分沿海森林地带的雨量来自当地崎岖多山的地形，这个地带的腐殖土迅速消失。

咖啡土地的投机活动引发了一种极新的企业形式。以前，土地随着开拓和被授予合法地契而增值；其后，土地价值随着肥力的逐渐消失而下降。咖啡种籽的种植成为一种本身就出奇地抬高地价的生意。可以断言，种植咖啡时，主要并未考虑到咖啡的生长，而只是靠发展新咖啡林搞投机。咖啡种植区犹如灌木林火般向前扩张，使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木材和其它森林资源毁于一旦。根据1920年普查，圣保罗的农庄占巴西全部农村地产面积的8%，构成全部土地价值的27%以上，相当于26亿美元（时价）。这些土地投机的收益均未回归国家。像几乎所有其他各州一样，圣保罗州未征收农村土地税。

在巴西，土地所有制是一贯高度集中的。葡萄牙王室曾经认

为，只有地主贵族才能为海外市场生产，因此王室授予的土地都是大面积的，通常的范围为40平方公里。在帝国统治下，保持了这一传统，因为中央政府太软弱，无法实施1850年关于决定拍卖王室土地的法律。相反，地方上有势力的权贵则干脆侵占公共土地，在土地公署采用欺诈手法，从中驱赶小土地占耕者。只是在南里奥格兰德和圣卡塔琳娜等南部各州，帝国才确实有效地鼓励小地产制。在那里，帝国遵循葡萄牙王室在边境地区移民的政策，使德国和意大利移民在官办殖民点上定居。他们的后裔遍布这些州并形成更多的殖民点，但是他们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他们代表了一种与大种植园和大牧场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

702

共和国将王室其余的土地授予各州时，实际上对抢占土地的人实行大赦。然后，州政府如同帝国一样，显示出它对保卫公共世袭财产也同样是无能的。一系列的州法律对于所有因社会声望而确保当地对其私人侵吞土地予以默认的人颁发地契。在整个这个时期，任何一届政府都未承认部族人民的土地权利，除了一些最无价值的保留地外，也未拨出任何土地供部族人民使用。虽然1910年成立由坎迪多·龙东将军领导的一个局，把保护部族人民作为联邦政府的职责，但杀害整个部族的行为继续进行，作为私人侵占国家土地的开端。不论是否有这些政策，土地所有制依然高度集中。到1920年，在普查范围的农村地产中，只有不到3％的农村居民拥有地契，在这为数极少的土地所有者中，10％的人控制了这些土地的3/4。

劳　　工

1872—1920年间，巴西人口从1,010万增加到3060万。在那个时期，年增长率从1.85％激增至2.15％。平均寿命从1872年的27.4岁（当时奴隶平均寿命为21岁）增加到1930年的34.6岁。城市人口形成了一个少数群体，其人口增长速度往往不比全国人口

增长速度快多少。1872年，居住在2万或2万以上居民的城镇的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不到8%；到1920年仅为13%。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因为正是那些主要从事出口贸易的城市的人口增长得最快。1920年，城市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居住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圣保罗在巴西城市排列中已由1870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2位。1872—1920年间，劳动力每年以大约2%的速度增长。居民中经济自立人口事实上难以计算，因为1920年普查时就业，特别是对妇女就业，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定义。因此，1872—1920年间，作为经济自立人口上报的10岁和10岁以上的妇女的百分比，从77%下降为75%，这些低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表明经济部门吸收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了。

703

尽管如此，土地所有者和雇主不断埋怨劳动力短缺。1870年以后，奴隶劳工的供应确实很靠不住，1872年奴隶劳工大约构成经济自立人口的20%和种植园劳工的70%。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运往巴西的非洲人比运往新大陆任何其他地区的非洲人都要多。由于1850年后有效地制止了奴隶买卖，奴隶人口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看来主要是因为死亡率高，即剥削率超过生活和生育费用，或者干脆是由于不合格的残暴的劳工管理。解放奴隶和逃跑事件也经常发生，大概是以此作为保险阀，因为对此予以容忍要比进一步使用镇压力量要便宜些，1871年通过一项法律，宣布从那时起奴隶母亲出生的子女可予以解放，这也是对日益增长的奴隶反抗作出的部分反应。奴婢制废止了；终生奴隶制即将逐步消灭。

既然不能阻止自由居民非法擅自占住无人认领的公共土地（他们在那里耕作的产量和大地产产量一样多），就无法引使他们充当为大地产主赢利的工资工人。因此，在一些存在未认领或未占用土地的地区，自由居民主要构成一支零工劳动力，他们只愿意支付象征性租金而从事象征性劳动。但是，在远离边疆的地区，所有的土地均已为私人所有，而且小土地所有者被大地产包围，

在那里，分成制和各种租佃形式使可供种植园使用的劳动力大大增加，甚至在奴隶制废除之前也是如此。

国内奴隶买卖开始使奴隶人数下降的状况放慢，它把奴隶从不景气的东北部运往产咖啡的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并且从城区运往种植园。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这种奴隶买卖已不敷使用，许多南部种植园主变得十分懊丧，他们办理移民劳工契约的早期实验归于失败，因而预感他们自己和中央政府都面临破产。这并不是认为，巴西奴隶制在任何时候直到废除以前一、二年都是无利可图的。若干研究报告的确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只要奴隶制还继续存在，它至少如同其他投资一样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如此，巴西议会最终于1888年投票废除了奴隶制，这是对没有希望获得奴隶劳动力的新产区种植园主、城市中等阶层（包括渴望实现较现代化社会的军官和公务员）、以及前奴隶和奴隶本人（他们正组织暴力反抗并大规模毁损种植园）施加的政治压力所作出的反应。

站在大土地所有者的观点看，从奴隶最终过渡到自由劳工证明是极为容易的。虽然许多自由人逃到城市，但大部分人同意接受在附近地产、甚至同一地产所给予的工资和分成制合同。由于人口增长（巴西法律规定给后代平等分配遗产）而对小地产造成的压力，东北部内地的周期性干旱，以及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继续软弱无能，迫使许多自由人在种植园劳动。对种植园主来说，雇用自由劳工的实际成本明显低于原来供养奴隶的成本。[5] 有大量移民移往新的大规模出口开发区，诸如巴伊亚南部（可可豆）和亚马孙西部（橡胶）。在亚马孙地区，高工资发挥了有效的吸引力，但是割胶者装备用品商和店主们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控制，抵销了所预期的优势，因疾病引起的高死亡率使该地区变成一个

[5] 见D·登斯洛《巴西区域性不平等的起源》，载《经济研究》，1973；P·艾森伯格《1840—1910年伯南布哥的蔗糖工业》（伯克利，1974）。

几乎无人得以逃脱的人坑。

大批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移居咖啡产区。1872—1930年间，前往巴西的移民净人数达到大约220万。到1920年，移民占男性劳动力的10%。这一移民活动大部分得到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津贴，从而使种植园主的劳工再生产成本社会化。向移民提供了管理及收割工作的货币工资与种植维持生计作物的权利相结合的年度合同。在咖啡产区继续从事种植园劳动的前奴隶不得不接受更为朝不保夕的就业，其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欧洲人工资的一半，因此他们事实上对移民津贴作了贡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移民流入量一直保持尽可能高的水平，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圣保罗州继续支付部分通行费。这是必要的，因为移民经过几个收割季节后往往转到其他就业部门或重新迁回他们的祖国。同时，还有保持工资偏低的明确意图。据一位历史学家估计，1870—1914年，咖啡业的工资并未上升。[6]

705

即使奴隶制的废除或多或少地将劳工推向市场，增强了劳工的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报酬货币化，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应视为一个从肉体强制制度演变的过渡时期。大部分巴西农村的社会状况接近于奴隶般状况。甚至在欧洲移民区，大土地所有者要求服从，并雇用私人枪手来威慑他们的工人。根据1890年实施的法律，工资劳动者如不履行合同就要被判监禁。1902年，意大利根据其总领事的报告，禁止进一步资助意大利公民移民到巴西去。圣保罗州作出反应，建立仲裁委员会以听取申诉。只是在1916年，联邦法才确立了合同的平等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任何其它劳工权均未获得有效实施。

公共教育对提高一般技术水平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1872年的普查表明，几乎90%的女性和80%的男性是文盲。到1920年，

---

⑥ 迈克尔·霍尔《1871—1914年巴西大规模移民的起源》(哥伦比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69)。

这些百分比只分别下降10个百分点。执政的权贵分子往往认为土生下层阶级基本上是不可教育的；这的确是他们与种植园主勾结起来推行欧洲移民计划的主要原因。移民通常比土生居民识字多；根据1920年普查，在圣保罗，只有56％的人口是文盲，而全国居民中有73％是文盲。要是政府将资助移民的拨款花费在初等教育上，政府就可能获得类似的经济效果，就可能更加人道地履行职责。对工人阶级，甚至对中等阶级也没有提供什么生产技术教育。到1920年，在公立和私立中等学校和技术学校，全部入学人数仅62,500人。尽管早期阶段的机器生产包括了巴西人特别是在咖啡和巴拉圭茶加工设备方面的成功革新，但建立制造业和商业企业所必需的组织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技能，则主要是由移民提供的。

706

资　　本

没有关于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总资本形成的估计数。据计算，那10年的总资本形成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3.7％，或每年人均14美元（时价）。根据同一估计，20世纪20年代国外的资本净流入平均为总资本形成的8.8％，到1929年，净资本贮存达到人均260美元（时价）。⑦

国内资本的吸收并非十分体制化，至少在这个时期的前一半时间是如此。直到1900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农业信贷是非正式的和私人性质的：经纪人和进口商的预付款或私人放贷人的贷款，他们许多人将其交易限于亲属和邻里。利息率的起点是12％，而且往往上升到24％。几乎直到废奴时期，农业贷款要求用奴隶而不是用土地作为担保。除了出口作物种植园主外，任何种类的贷款都很难获得，甚至咖啡种植园主要获得抵押贷款也是不常见的。

---

⑦ 迪亚斯·卡内罗《过去的趋势》，表8A。

1870年，里约热内卢只有6家银行，其中两家是英国银行，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仅9家银行。这些银行几乎专门办理存款业务和短期商业债券的贴现。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局限于外汇交易，并竭尽全力从事外汇投机活动。19世纪60年代，政府控制的巴西银行开始提供少量农业贷款。1875年后，成立了一些土地信贷银行，但它们缺乏适当的抵押法，未获得成功。只是1900年以后，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拥有的抵押银行才提供数额有限的资金。1909年，可以在圣保罗获得某种担保制度，这是一项与稳定价格计划有关的革新，这一革新使利息率降到9%。1909—1929年间，在整个巴西土地公署注册的抵押贷款值增长了10倍，当时达到了相当于1.81亿美元（时价）。这些抵押贷款的大部分可能是对城市不动产交易的资助。到1929年，大多数这些抵押贷款的利息低于10%，表明市场状况已变得更有成效。可是，同1920年普查中所揭示的农田价值相比，总的数额还是不大的，表明抵押贷款制仍然不普及。 707

已经算出了20世纪20年代从国民储蓄中所获得的低平均投资生产力。⑧ 在早几十年，投资生产力看来不可能会更高。国内企业难以发展到足以使它们能应用新技术和形成一个全国性市场。除了组织银行和铁路以外，几乎没有超越家族界限的股份所有制。资本来源于利润的再投资，有时包括垄断性的定价，或者是靠商业借款凑起来的。工业债券或工业股票的市场都很小。简言之，在从1888年繁荣时期到1893年这段时间，一些被赋予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对少数大型工业企业起了资助者的作用，但这些企业大都失败了。此后，任何其他银行、甚至巴西银行都未承担这一任务。因此，在其它国家曾经将家族企业合并到公有公司的那些势力，在巴西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偶尔在巴西组成了两个家族或两个以上家族的财团，这些财团大体上是稳定的，通常在各民族

---

⑧ 同上，表27和29E。

集团内活动，有时结果是相互通婚。当必须装设较新和较复杂的工艺时，这些势力就出现了；比如说，在合成纺织品、纸张和纤维素以及化学工业方面，情况就是如此。

外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有过周期性的增长，特别是1888到1895年，1905到1913年以及1924到1929年。在上述各个时期，巴西获得了相当一部分欧洲在拉美的投资，即便抵不上它占拉美人口的比例。一半以上投向巴西的外国资本，是资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外国资本也资助大部分银行、电力、电话和煤气系统、港口设备、铁路、轮船公司以及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段时期结束时的航空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国资本中绝大部分是英国资本。伦敦罗思柴尔德公司是巴西唯一的债券发行代理商，主要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全是英国的，几乎全部的铁路是英国所有或受英国资助。最大的英国银行——伦敦与巴西银行，比半官方的巴西银行拥有多得多的资金。甚至在1929年，外国银行仍承担所有商业银行交易的一半。在另一方面，外国对土地、天然资源和生产性企业的利害关系十分有限，不同于拉丁美洲更加"渗透了的"经济社会和当时的殖民地世界，某些部门，如保险、制糖、银行和铁路，甚至在这个时期也开始由巴西私人资本或公共利益集团恢复了元气。此外，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是中等水平的5%，如果英国的收益率是有代表性的话。尽管如此，利息和利润的汇回（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有了逐步增加），对经济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到1923年，联邦和地方债务的付息，花去出口收入的22%。

英国公司集中投资于出口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公司的活动可以被评价为一般属"买办性的"。那些想要建造工厂以便同进口货竞争的地方企业家，则往往得不到资助。阿拉戈斯的一家缝衣线厂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例子：这家缝衣线厂被一家英国公司购买后工厂被拆散、机器被扔进圣弗朗西斯科河。至于英国银行，当兑换率经常摇摆不定时，英国银行就显得最兴隆繁荣。英国银行忙于玩弄花招以破坏米尔

708

雷斯的稳定，并对巴西银行力图干预这些交易深表不满。它们不愿意借款给国营公司，甚至有时拒不接受巴西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筹措1898年贷款的条件，巴西联邦政府执行了极端的通货收缩措施，这导致一系列的破产，使许多商行和本国银行倒闭，减弱了对英国和其它外国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英国在巴西经济中的优势在1900年后受到了强大的挑战。英国人的脆弱性起因于他们作为金融家和转口商的地位：既然对咖咖的需求主要来自美国和德国，美国咖啡焙烤商和进口商就能够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中间商的位置，而且德国出口商行由于得到其政府发动贸易攻势的支持，在资本货市场上大大获益，并且对购买其设备的公司表示兴趣。“黑名单”揭示了德国贸易商行削价竞争所达到的程度。一个极端例子是，德国贸易商行控制了巴西整个国内酿酒业的生产。 709

农业和畜牧业

巴西的农业技术过去是极端落后的，主要靠刀耕火种来榨取自然资源。这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森林储备以供应农民的许多必需品，特别是蛋白质和原料。新开垦的和烧荒的森林土地极其肥沃，即使是暂时的。森林灰烬为植物提供丰富的养料，而这往往是施用的唯一肥料。树桩和原木则任其腐烂，种植几乎总是从上坡往下进行，这就造成水土流失。一些“栽培的”作物，如番木瓜、椰子、香蕉、菠萝、柑桔，往往任其野生。当种植的地块被杂草、虫害侵扰时，就把它废弃，然后生长成次等的林地或草地。当某一地区所有的林地耗竭，农民就都撤离，将林地转用于畜牧业。这种耕作制度根本就用不上犁铧；而且在有些地区确实完全没有犁铧。1920年，包括在普查中的不到14％的农庄采用犁铧，而且其中许多可能是木犁。因此，农业生产几乎完全靠森林土壤的初始肥力。巴西的肥料产量极少。20世纪20年代，90％的肥料生产供出口。宗教仪式、护身符和祈祷的应用要比厩肥的应

用更为普遍。按照民间农学的说法，厩肥会“烧坏”土地。

咖啡种植园比一般农场管理得好，但同当代农业知识相比，即使咖啡种植园也是落后的。有机肥料只能间歇地使用，选种根本没有想过，蜜蜂不作为授粉媒介，而且犁铧也使用不当。最大的种植园一般掌握在管理人手中，因为土地所有者往往占有的地产不止一处，而且他们在城里拥有许多利益。劳工契约形式阻碍了对耕作和收割的关注，而且给新种植园工人提供过多的好处，从而进一步促使扩大和浪费森林储备和过度种植。在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优质的低地土壤早已被使用，19世纪80年代通过缩减山坡林地的办法扩大了上述甘蔗种植园的面积。这些土壤不那么适宜于种植甘蔗，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而且易于水土流失。由于未曾费力除掉树桩残株，就无法在山上使用犁铧。甘蔗种植园主不使用肥料，而是让土地在不同时期休耕。但是，1879年后，一种真菌疾病的出现鼓励人们引进一些新的甘蔗品种，而且进行一些地方性甘蔗育种试验。简言之，对进口肥料作了一些试用。甘蔗田劳动仍然是季节性强和劳动强度大，种植、栽培和收割都靠手工。甘蔗种植业最重要的改进是19世纪70年代引进了轻便铁路（最初是用马拉，后来用蒸汽），将甘蔗运往糖厂。获得政府大力津贴的现代化蒸气动力的大糖厂，主要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的。这一切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到1910年甘蔗产量已经达到了那个时期大约相当于世界平均产量的水平。

710

1873年，已经有了两所帝国农业学校。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在一些州又成立了几所农业学校，但除了在圣保罗外，这些学校对农业耕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相当多的州立机构是收养孤儿的实习学校，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是否有机会应用所学的知识，还不清楚。在这期间，只有圣保罗拥有一个农业推广站系统。

对这个时期提供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还没有进行什么研究，但粮食生产看来是一个落后部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粮食价格上涨之快大约相当于出口品和进口品价格的3倍。当19世纪90年代咖啡种植业和橡胶采集业迅猛发展时，粮食价格及粮食的进口也随之上升。出口增长显然部分地依靠从粮食供应部门转移来的资金。城市的供应主要是由附近的小农场主提供，他们出售所有的剩余产品。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邻近地区，组织了一些官办殖民点，以设法增加城市粮食库存。这些殖民点除对移民农家开放外，也对土著人开放。然而，种植经济作物的小农场主仅拥有大种植园主所放弃的土地或质地贫瘠的土地，所以他们渴望获得贷款，而且受到中间人的盘剥。

尽管如此，供国内市场需要的生产并未停滞不前。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危机以外，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段时期，粮食价格虽然急剧上涨，但上涨速度看来并不超过工资，至少在里约热内卢是如此。此外，可以观察到，1900年之后，粮食的进口逐渐减少：1903—1929年间，人均粮食进口从142公斤减至34公斤。平均寿命的日益增加表明，人均粮食消费量没有在下降，可能还略有增加。除了将诸如蔗糖和棉花这些以前的出口商品转而满足国内需要之外，还有主要是小自耕农实行的某些多种经营，即转而经营葡萄酒、油类、油脂以及乳制品。由移民引进作为食物的小麦，证明是很难在巴西栽培的，但种植土豆是成功的，而且稻米的播种面积大大扩大了。在南里奥格兰德，大土地所有者播种了大面积水稻，以便向全国市场出售。 711

经营畜牧业需占有大面积的天然草地和大草原以及因实行农耕而地力下降的地区。巴西人非常喜爱吃牛肉。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距离太远，无法交运活牲畜，只得将其牛肉加工成牛肉干（压扁和晒干的肉）。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期，巴西牛的头数比人口还要多。大部分牛是19世纪80年代从印度进口的瘤牛的杂交品种，这些牛因有抗病和抗旱的能力而备受欢迎。正如在内地一样，经营养牛业是极其节省劳力和资本的。几乎从未建造过厩棚篱笆和供水站；给牲畜打过火印后，听其自然地吃草料和繁

殖。1920年，天然牧场牛的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18头。普遍采用改善环境的唯一措施，是烧荒，以促成长出新的嫩草。这一做法往往促进抗火的不适牲畜口味的青草的生长。在铁路终点附近，在原来的森林地带移植了外来牧草，以便恢复那些长途跋涉的牲畜的元气，使它们育肥以供应市场。

能源和运输

巴西煤矿藏是低品位的微粒品种，1929年，圣卡塔林纳煤矿产量仅为36万吨。由于缺乏煤资源，就得烧木材和炭，这对森林储备、分水岭和表土造成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估计巴西国内年人均使用燃料为2立方米。到1930年，巴西单单为此目的就每年砍伐掉33万公顷森林。由于林地的再生约需20年，这就意味着需要有6.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储备；但事实上几乎未保留任何储备。难于获得木材和炭，限制了铁路、熔炼厂和制造业的活动。在一些铁道旁种植了桉树，尽管规模不大。在港口集散地和座落在港口城市的工厂，使用进口煤，但在内地用木材烧锅炉是惯例。一些早期的工厂还使用水力，在雨量充足和地势起伏的乡村建立水力站是容易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巴西国内发现了规模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对进口石油有必要施加限制，内燃机使用受到限制。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机动车的进口大幅度地增加。到1929年，有16万多公路车辆进行了登记，有2.1万多公里公路得到了改进。1927年，第一家定期航空公司开始经营，到1930年共有4家。

火力发电始于19世纪80年代。但是，火力发电由于需要进口煤这一制约，到1900年在规模上已为水力发电所超过。1890年，巴西总的发电能力超过1兆瓦，1900年为10兆瓦，到1908年则达100兆瓦。20世纪20年代，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建造了大坝，在发电和输电方面有了改进，因此到20年代末，可以提供电力近780兆瓦。发电方面虽然已达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速度，但人均

才22瓦，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 1/15。如同两个世纪前英国的炼焦煤一样，水力发电对南部和东南部巴西的技术进步同样具有偶然性。在焦炭有限的基础上发展工业是无法想像的，如同在阿根廷一样，花钱进口煤和石油也会有损于工业发展。阿根廷的工业化在获得早期的迅速增长后，速度也放慢下来了。

蒸汽动力早期曾应用于港口和江河船只。到1873年，得到津贴的沿海和江河水运航线发展到36,300公里。整个沿海水运从1870年的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930年的1900万吨（同期，对外国港口的航运从2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轮船航运使橡胶贸易扩展到亚马孙河上流及其支流成为可能，而且通过拉普拉塔河改进了同马托格罗索的联系。然而，在内陆河流航行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缺乏改进河流和航运的基金，就必须实行水陆联运和通夜停泊了。大约在1912年，兴古河上游和贝伦河之间的运费，相当于从贝伦至纽约的将近10倍，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713

1873年，巴西长度为2公里以上的运河总长度仅有132公里，只有607公里的改良道路。陆路运输当时仍然几乎完全依靠骡队。但是到了1889年，修建了9000公里长的铁路，到1930年，铁路已长达3.2万公里。修建铁路完全是由于出口市场提供种种机会而作出的反应，因为除了枕木外，所有的铁路设备必须进口，因而也必须用外币支付。修建铁路旨在使内地可供出口的商品源源外流，但铁路未曾形成一个全国性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区网络内，宽轨和窄轨混用。最大的网络系统是圣保罗系统。在圣保罗，有六、七条线路呈扇面形向咖啡产区伸展。然后从圣保罗至沿海桑托斯港只有一条大坡度的铁路线。通过索罗卡巴，圣保罗也可与里约热内卢和南部各州联结起来。

从19世纪60年代起，铁路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开支项目，最大的铁路公司巴西中央铁路公司是政府所有。外国和本国的私人公司有时获得政府的直接津贴来延长其铁路线；更为经常的是，以利润担保形式给予津贴。各州 提供规模较小的利润担保。联

邦政府规定运费，运费规定得很低，主要是为了安抚土地所有者，这样，只有那些被广泛利用来装运出口作物的铁路线能够挣得利润。19世纪90年代后期，支付利润担保的开支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而且由于利润担保欠的是黄金债务，故对国际收支影响很大。因此，共和党政府征用了许多这些铁路线，将大部分铁路线出租给特许权享有者。铁路的修建促进了供国内市场需要的农业生产，以及有助于将出口货运到码头。干线上的郊区站和窄轨的 714 近郊线路，可以增加粮食和木材燃料的流量。种植园地区以远的铁路则运载来自内陆牧地的活牲畜，从而减少长途驱赶造成牲畜掉膘的损失，运载来自很快即将绝迹的原始森林的木材，从而减少硬木的浪费和降低建筑成本。铁路无疑是巴西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手段，但必须指出，铁路很晚才起促进作用，而且只限于少数地区。

制　造　业

在巴西，工业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手工业生产替代和进口替代过程。两种替代中，更通常谈论的是第二种替代，因为这一替代更明显地影响城市人口，而且可以在进口清单中查找。但是第一种替代更为重要，至少在早期阶段是如此。巴西非农产品市场主要是由手工业部门供应。经济部门的进口能力毕竟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大部分进口的消费品是富人的奢侈品。手工业品是为供应家庭自用以及为出售或交换而在家庭内生产的，也有为当地市场销售而在手工业车间内生产的。比如说，棉花和羊毛织品在纺织厂建立之前，是由家庭广泛生产的。几乎每一户家庭和奴隶居住区都有一些可以用手工织机从事纺织的人。从缝纫线超比例的消费状况来看，说明了国内手工业生产的规模。1903年，巴西显然消费了1,045吨缝纫棉线，而且都是进口的。可是同年，巴西消费了21,900吨机织布，有国产的和进口的。比率为1:21，这是异常的，因为现代的比率大约为1:60。看来可能至少有一半的进口

线是用来缝制土布衣服和刺绣。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种不使用线的国内产品——毛毯、吊床、斗蓬、罩子。甚至在1966年，对米纳斯吉拉斯农村家庭的调查表明，有一半的农村棉农家庭仍然自己纺纱织布。⑨

从手工业生产向工厂生产的过渡，通常并不是突变的或不连贯的。手工业补充地方工厂的生产，比如说，在服装业和布品生产方面就是如此。大部分食品加工业是从逐步掌握机器技术的国内车间发展起来的。修理店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仿造整部机器而不是机器零件，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以流水线序列进行生产，往往是很难看出的。在这整个时期，许多工厂根本未使用蒸气动力或电力。根据1920年的普查，一般工人劳动时仅使用1.1马力。此外，10%的工厂劳动力是在人数不足4人的企业里受雇的。

南里奥格兰德的德国垦殖者示范了在地区和全国市场范围内对国内生产实行逐渐合并的做法。拓荒者在第一代人定居期间，将其邻族梅斯蒂索人的物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物质文化结合起来。拓荒者种植和加工粮食，他们当中的工匠则生产范围广泛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农具。随着19世纪60年代轮船的引进，城镇里的商人们开始将垦殖者的产品转运到里约热内卢和其它港口。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一行业的资金被使用来在一些主要城镇建造消费品工厂。然后，被排斥在城镇市场之外的农村工匠，则专门从事范围狭窄的加工品生产，从而为工厂制造的产品提供了需求。

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以及其它重要的新兴工业中心，为早期的工厂提供需求和资金的是出口部门。在圣保罗，19世纪60年代晚期，棉花出口呈现短暂的繁荣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企业家(大部分是棉花种植园主）能够建造小型纺纱厂和织布厂。到1884年

---

⑨ 马里亚·德·劳尔德斯·博尔赫斯·里贝罗《对米纳斯吉拉斯的农业实践及农业陋习的调查》(里约热内卢，1971,)第37—38页。

有11家工厂已经建立，到那时，这些工厂是当地棉花种植园主的唯一市场。这些工厂将布类出售给种植园用以制作麻袋和奴隶衣服。圣保罗西部的种植园主当时愿意为其奴隶购买机织布，因为奴隶的劳动成本比他们的其它开支增长得快。

废奴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奴隶种植园的自给自足及其对农村、城镇的工资所产生的普遍压低的影响，阻碍了种植园以外的需求。由于移民农业工人的到达，这一市场大大扩展了，至少在巴西南部及东南部是如此。不仅付给农业工人工资而且还许可他们出售其产品，农业工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而

716 不是满足于自给自足。因此，他们购买了许多必需品。地方制造品基本上满足了这一大宗需求。巴西劳工成本低于进口货所体现的劳工成本。早期的制成品是靠重量计价的，低档品，如果当地有原料的话，是很容易取代的。早期做成的制造品有砖瓦、啤酒和啤酒瓶。大批的牛群和猪群使得当地在生产肥皂、腊烛和皮革制品方面具有竞争力；罐头猪油成为一项规模适度的出口品。根据纳税记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口品占鞋、靴消费量的不到5%，帽子消费量的不到15%，和纺织品消费量的不到20%。到1919年，棉纺工业号称拥有130万纱锭，渐渐地替代了进口，开始时是替代未漂白的本色粗布，并然后进而取代优质织物。

直到1920年以前，对巴西工业的资本投入基本上是从原移民地和海外的进口商（主要是通过移民企业家）获得的。种植园主的资本在圣保罗工业化的最早阶段是很重要的，这些资本更密切地联系种植园自身的原料出口或加工，而且往往被进口商的资本所逐步取代。有些进口商转向制造业，以便对他们进口的货物作精加工。他们通常是从事各种商品交易的商人，他们了解进口货单的内容，了解关税、国内税收和地方的需求。他们往往充当独立制造商的批发商，并向制造商提供信贷。几乎所有的重要实业家们都继续保有进口机构，以确保进口组件的稳定供应和熟悉各种各样的需求。

巴西工业在其早期阶段直接有利于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它为缺乏有利出口前景的种植园生产的原料提供市场。但是，种植园主坚持对进口货（如黄麻，它对巴西棉花进行竞争）征课高额关税，并且把使用这些进口黄麻的工业斥之为"冒牌"工业。种植园主希望对农具保持低关税。他们讨厌把他们的劳动力挖走的工厂。他们常讲一句后来被热心于发展的人们不断讥笑的话："巴西主要是个农业国。"在另一方面，实业家们并未向种植园主直接提出挑战。相反，他们还和种植园利益集团进行政治交往，部分是根据下述设想，即他们的繁荣取决于出口的增长，部分是因为他们享有这一政治交往带来的威望，如果他们想和城市中等阶层或者和本厂的工人结盟，那是搞不成的。 717

尽管出口导向型利益集团，特别是咖啡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属于优势，但有利于工业的种种措施有时会有效地提出。如上所述，高关税主要是由于政府贫困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国内制造商也从种植园主赞成的汇率下跌中受益，低汇率使得进口品更加昂贵。尽管如此，在国会中工业仍获得一定程度的同情，有些国会议员是早期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或幸存者。实业家们主张制定法律，反对政府购买有同类国内产品的进口货，主张对机器实行免税，为新的生产线提供联邦贷款和利息担保，以及主张对专利法和版权法进行宽厚的阐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是巴西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机会，因为大战在提高成品价格的同时，减少了成品的进口额，大战使巴西获得大量出口挣得的和政府发行的货币。由于工资未能随通货膨胀而提高，这就提高了利润率。制造厂虽然由于机器进口的中断而未能进行大规模的革新或扩充，但在一些生产部门的工厂被鼓励实行加班和增产。尽管如此，原料和燃料的进口比成品的进口更急剧下降；投入的不足和高成本，再加上高额税款，使得制造商的赚头微薄。所报导的制造品产量的增加可能是夸张了，因为所依据的是征收的税款，随着进口税收的减少，就要更加严格征税。

1914—1917年间，棉织品产量从7,000万米增加到1.6亿米。但是，棉织品产量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制造商存放于仓库，从事投机活动，等待进一步涨价；大战结束时，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仓库里充满了未售出的存货，他们曾为此要求政府提供贷款担保。即使这样，国内制造商也有能力支撑危机时期的经济，这一点却更加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赢得了官府的称赞，因为政府税收有了新的来源。

718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工业生产主要限于消费品。1920年普查计算出有1.3万多家制造企业，雇用27.5万名工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不到3%（该年人口普查统计制造业和服装业有1,264,000名工人，也许可作为工业就业与手工业就业人数的大体比较）。纺织厂占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40%，食品加工、服装、肥皂和蜡烛行业占45%。在小规模的中间商品部门，投入锯木厂的资本几乎相当于投入金属制品业的两倍。

注意一下钢铁工业和金属制品业的起源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些工业在技术和资本方面要求高，它们趋向于集中在城市，而且同采矿业和机器制造业有联系。从17世纪起，巴西就进行铁的冶炼，在殖民地的最后年代，王室建造了炼铁高炉。19世纪期间，小型熔铁炉继续在米纳斯吉拉斯不定期地开工，其产量达到几千吨生铁。制铁业和工具制作业都很普遍，因此进口的钢铁主要供本地工业的投入使用，诸如线材、片材、轨材、条材和板材。金属制作业致力于出口贸易的准备工作，因为它自身的投入（包括熟练工人）是进口的，而且具有先进技术。因此，铁路修理厂和船坞是金属制作车间中装备最大的和最佳的。

但是，大规模钢铁制造业直到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最后10年，只有小小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一家比利时公司为米纳斯吉拉斯一家新建的以木炭为燃料的铁厂增添了一些炼钢炉和一台轧钢机。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小型电炉就开始回收利用废钢铁。1910年，由一位名叫法夸尔的美国推销商领导的一家英国财

团获得了在米纳斯吉拉斯的伊塔比拉采矿的权利，并得到联邦政府的一项专利特许，通过他们计划重修到维多利亚港的铁路出口铁矿砂。同时，他们答应建造一家综合厂，该厂拟使用运载铁矿砂出口的船只运回的焦炭。谈判一直在进行。对给予如此重大的专利特许权，国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木炭厂和电厂的老板对此也表示反对。最后，世界经济危机减少了世界对钢的需求，英国财团放弃了这一计划。他们可能尽量拖延工厂的交货，而当时的国际钢铁卡特尔对此会表示反对的。尽管如此，法夸尔的建议引起政府的全力注意达20年之久，而且使其它潜在的钢生产商失望。到1929年，巴西钢产量仅为5.7万吨，占消费量的11%。

719

出口导向的危机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巴西出口值急剧下降。随着大战结束时橡胶繁荣局面的最终崩溃，巴西再度依赖咖啡，单单咖啡一项就占其外汇收入的3/4。经过战后短暂的商品繁荣局面之后，咖啡价格再次暴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联邦政府作出反应，对维持价格进行了第三次尝试。第三次稳定咖啡价格和“持久防卫”对阻止咖啡美元价格进一步下跌也许是有效的。但是，需求的平伏和海外竞争的加强，使巴西无法实现出口额的增加。1923年，咖啡收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然后开始长期的下降。政府干预无济于事，只不过确保种植园主的收入和鼓励对咖啡部门的新投资。

1924年，巴西联邦政府警惕到它所听任发展的通货膨胀势力正在破坏它的稳定，因此采取了通货收缩政策。然后，联邦政府于1926年晚期通过一项兑换基金的机制再次试图坚持金本位制，正如它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而且，这一措施有助于吸引外资，在面临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情况下，这对维持进口水平成为必要的了。巴西需要扩大进口范围，诸如电讯和航空设备，这体现为提

高它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而必需的新技术。美国银行随时准备并热切愿意提供资金。它们的贷款可能在20年代前半期到后半期使贸易赢余，从出口收入的20%下降到11%。巴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在1924—193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增加到12.95亿美元。因20年代头5年创记录的赤字而使内债更快地增长。奇怪的是，战前的关税因通货膨胀而使实际值削减了大约一半。它并不需作普遍修定。国内税，主要是营业税，逐渐在联邦政府财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到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结束时，国内税占岁入的大约45%。

720

国内工业深受上述兴衰变化之害。此外，制造品进口价格下跌，而其本身的竞争力因战时对工厂重新装备的中断而受到削弱。进口品占国内棉织品消费的份额，从1921—1923年的7%增长到1925—1928年的17%，国内棉织品价格在1925—1927年间下跌了25%。但是，棉织品的情况最糟，因为棉织品部门受生产过剩之苦，可是即使在棉织品部门内部，曾设法购置新机器的制造商都在赢利。据报道，其他传统工业也获利，而且，到了20年代后半期，包括在纳税名册中的制造业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除此而外，20年代实现了相当大程度的生产多样化，有了药物、化学品、纺织机器、炼糖机器、汽车零件、磅秤，卡车车体、煤气炉和农具。间接说明这些企业取得进展的标志是明显的平钢消费，平钢消费量从1901—1905的年平均5.9万吨增加到1926—1930年的年平均28.8万吨。许多这类新的企业是从修理店发展起来的，这些修理店学会仿制和改制进口机器，并继续录用外国技术人员或派遣他们自己的工人出国学习必要的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公司增加了对巴西市场的兴趣。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建立了美国银行，美国港口和巴西港口的定期班轮开始营业。美国投资的特点是更多的直接投资，这是由于巴西生产业合并运动之后企业结构变革所促成的。美国公司在石油销售和咖啡出口业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这些公司在上述领域绕过

传统的经纪人制度。电气和电话设备制作商建立办事处，以便在正在兴起的城市动力和通讯网络中安置他们的产品。其他的美国及欧洲多国公司着手制造粘胶纤维、办公室机器、照相纸、留声机唱片、灯泡和汽车轮胎，并开始组装汽车。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中有些已经受到保护关税的刺激，如镀镍和药物方面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它企业则是由于得到有联系的投资人的邀约而发展起来：比如说，第一家外资水泥厂是在指望供应加拿大资本的圣保罗电力公司而建成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投资是由国际卡特尔决定的，瑞典托拉斯对火柴企业以及英美财团对烟草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另一方面，许多投资可能是由多国公司提供的，但由于巴西对一些国际协议并未参加、甚至毫不知情而告作废。

巴西市场本身免除不了卡特尔化。20世纪20年代，在冶金、制鞋、皮革、兽皮、木材和制药业等方面，存在过一些大概从事规定同业协议作价和限额的商业协会。在面粉、纸张、帽、麻袋、啤酒、炼糖等方面在不同时期也有过控制贸易的联合体。在大部分其他的机械生产的行业，企业为数很少，这些企业在它们的地区市场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实行垄断性经营。只有棉织品缺乏价格协议，主要是因为各工厂的效率相差太大而缺乏共同利益，但是即使在棉织业部门，工资也是由各工厂主之间达成的协议来决定的。巴西政府并未对上述做法实行制裁。从1928—1930年，从事牛肉干、葡萄酒、猪油和木材业的销售商在南里奥格朗德曾试图制定一项官方的卡特尔化政策。这些计划是1930年后联邦政府实行阶级合作主义计划的先驱，它们对促进猪油业更新装备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在其它行业，这些计划的主要作用是榨取生产商的利润。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暴跌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崩溃，对巴西贸易和金融业产生了深刻影响。1929年后期，每公斤咖啡报价为0.50美元，翌年初下降到每公斤0.29美元。巴西政府拚命地企图挽救其信贷，将其1.5亿美元的全部黄金储备交付给它的国外

债券持有人。圣保罗州背负着87.5万吨无法销售的咖啡的重担(这些咖啡在1929年的价值相当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到处寻求资金来设法使政府维持价格的计划继续下去,它竟然令人惊奇地搞到另一笔2,000万英镑的贷款。不过,米尔雷斯的价值下跌了近1/4,货币流通额下降1/6,兑换基金崩溃了。1929—1931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4%,咖啡价格下跌到每公斤0.17美元,这表明了巴西经济萧条的深度。1930年底,在企业破产、失业和社会混乱的气氛中,共和国被推翻了。

722

结　　论

塞尔索·福尔塔多把1930年以前的80年时期的特点称之为过渡阶段: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工的进口,是提高生产率、实现货币化市场和开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福尔塔多认为1930年是一个分水岭,他看到了从外部刺激增长转变为内部刺激增长,这是世界危机引起的变革,但也是他明确赞同的变革。然而,在巴西,更普遍的观点认为,出口方针矛盾地成了增长的障碍,认为与这一出口方针相关的利益集团并不希望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当国际经济因战争或危机而陷于瓦解之时才能在"巨浪"中推进工业化。这种解释的依据,是怀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有些经济史学家试图表明:相反的是,巴西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多样化则是巴西经济结合进世界经济的一个直接结果,认为全球的状况当时对巴西的发展是有利的,认为巴西政府通常是精明行事的,并且以国家利益为重。其他的经济史学家设法进行局部的综合,断言世界经济增长时期和危机时期的交替发生,是有助于巴西实现工业化的。

形成出口导向政策的政界和官僚权贵们可能不曾打算将国家经济交给外国利益集团,对这些精英的战略来说,外国利益集团同外国资本同样是重要的,但是他们接受了一套进口的政策处方,并认为偏离这一处方是失常的,甚至是病态的。在出口导向

这一纲领内隐藏着某种不安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对于领导层内部、甚至对人民大众内部的首创精神必定是致命的。伪造外国标签这一普遍做法，表明了不仅仅是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过程，而且是缺乏自信和异化的毒害。

出口导向是官僚权贵为促进政府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利土地所有者阶级而推行的一种战略，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眼界并没有超越短期投机的视野。这不是真正的全国性政策，更谈不上是再分配的政策。执行出口导向所获得的利益未被广泛分享。最近对该时期的研究没有提出收入集中的问题，但看来这种现象是增加了。实现经济多样化以及城镇市场的充分运转，的确使南部和东南部少数人有可能实现社会升迁，在这少数人中，欧洲移民享有特权，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店主和工匠，以及已出卖给城市市场的小块土地所有者集团。居于领导地位的权贵所关心的只限于这个阶层。他们认为，工会具有颠复性，工人是依赖他人生活的穷光蛋，失业者是懒汉和潜在的罪犯。城市劳工关系，即使实施的话，也被视为一种慈善事宜，而且认为工人应当谦卑而感激地作出回报。外国领事看不到农村工人的命运，联邦或州政府也无需关注。很清楚，这些态度无助于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无助于使发展超过种植园农业的水平。

723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开始了另一种收入集中的形式：巴西东南部地区和巴西其他地区的生活标准差距拉大了。比如说，到1920年，工业部门每个工人的资本比率在圣保罗已经比东北部高59%。对这一现象有各种不同的说明，但看来开始时是由于在出口贸易的推动下更加充分发展东南部市场和生产力并从而发展起大规模市场的结果。但是，1891宪法中的联邦主义思想以及圣保罗共和党同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部署的一个非正式公约，保证了这两个州对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控制。即使帕拉和亚马孙这两个橡胶出口州面积广阔而人口稀少并互有抗争，它们也无法保留住联邦在它们辖区内征收的税款，也无法提出对阿克里领土

的资源要求，这一要求落入联邦政府之手。重大的发展开支只有一次投在东南部地区以外：那是在东北部建设堤坝，作为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任职期间（1919—1922）防范干旱所采取的对策，佩索阿是担任总统职务的唯一东北人。

724　1870年以后，巴西在世界贸易和金融大发展中参与的规模尽管不大，但对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起步却具有重大影响。然而，这种转变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的，它被统治阶级所抑制，他们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发挥效益的机会。但在以出口为导向的阶段中积累的生产资料和组织资源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将在后继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加以安排，用于更加雄心勃勃的发展的目的。

725

第 20 章

巴西的改革年代(1870—1889年)

在巴西，正如在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改革和献身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军官——他们是城里人，但老家往往在农村——参加废奴协会和促进大规模欧洲移民的组织，发起赞同联邦制和州自治的运动，力争政教分离，参加选举改革活动，并支持共和党。农业上和商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以其保守主义思想著称）的代表，也不能全然不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1870年前的10年，保守党坚定的党员背离了他们传统的效忠，加入了自由党，而许多虔诚的自由党人于1870年脱离了他们的党而建立了共和党。知识分子也批评传统哲学，谴责浪漫的文学传统，奚落教育制度；他们培植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想，采纳新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更偏重于科学与技术的新教育制度；他们驳斥他们认为是空洞的自由派言辞，批评统治阶级，并把“人民”成为他们的主题。

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改革者可以为他们已经实现了许多目标而自豪。1881年实施了一项选举改革。1888年，国会废除了奴隶制。大量欧洲移民开始进入巴西。在1889年，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君主制。新的共和政权采取了联邦制并扩大选举权。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实行了分离。可是，有些人认为是成功的方面，在其他人看来则是失败。许多曾经力争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人们很快表示了失望。农村寡头势力继续控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大多数巴西人民、自由贫民、前奴隶和移民仍一如既往地受到剥削。

726

经过20年的改革之后，看来巴西未发生根本变化。

有些历史学家将19世纪晚期的改革归因于外国思想对巴西社会的影响。他们说，废奴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一切促使受过教育的巴西人对现存体制提出质疑并对这些体制的变革表示关注。其他历史学家把改变视为一代人冲突的产物，往往被说成是城乡集团之间的矛盾，或现代社会习俗和传统社会习俗之间的矛盾。毕业于专业学校并习惯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出身的土地权贵们所创建的体制持批评态度①。农村寡头（或族长）和他的有专业知识的儿子（或学士）之间的矛盾，甚至要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加以解释②。但是近年来最流行的那种解释是把改革与19世纪巴西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革联系起来，把改革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联系起来，而城市资产阶级本身又同农村寡头势力中最进步的一部分结盟以反对传统的权贵。

这些被视为不同选择的相互竞争的看法，事实上是完全相容的，甚至是互为补充的。但是这些看法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改革的时间安排和内容，而且提出一些它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巴西改革家们无疑援引欧洲作家的话来支持他们的意见。然而，人们不能认为，巴西改革家有这些看法是因为他们曾读过欧洲作家们的书。其实，情况很可能是相反。巴西改革家希望以某种方式变革社会的愿望使他们赞同有些欧洲作家的书，而不读另外一些欧洲作家的书。这样说可能更为正确。否则的话，我们如何说明他们喜欢孔德甚于马克思，喜欢斯宾塞甚于傅立叶？而且，我们如何说明废奴主义思想只是在19世纪后半叶才在巴西变得流行，而奴隶制度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就在欧洲遭到谴责的？

---

① 例如，见吉尔贝托·弗雷雷的经典著作《富人与奴仆：农村族长权的衰落和城市的发展》，（第2版第3卷，里约热内卢，1951）。

② 路易斯·马丁斯：《族长和学士》，（圣保罗，1953）。

如果我们不能仅仅以外部影响来解释改革的话，那么，把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相对立、把自由职业者与土地拥有者相对立、把一方视为进步先驱而把另一方视为传统堡垒的解释，也同样是不足的。事实上，为农村寡头集团和保守党领袖充当最雄辩的代言人中有些就是深深扎根于城市环境之中的律师、官员和医生。而且，如果在大部分州，共和党的追随者主要是在自由职业者中间的话，那么在圣保罗，共和党的核心却是由咖啡种植园主所组成的。

即使我们可以表明大多数改革者出身于城市中等阶层，但我们仍须说明他们为什么同政权疏远。同样地，如果我们能表明大部分积极的改革者属于出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那一代人而且在共和国宣告独立之日他们才30多岁或40岁出头，我们仍须说明为什么对传统体制发动这样有组织攻击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们前一代人。

我们一般可以说，巴西的改革正如其他拉美国家的改革一样，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经济与社会新现实作出的反应，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现象，而且有其特殊的巴西表现形式。在巴西，正如在其他各地，经济发展（城市化、移民、交通运输的改进、早期制造业和资本积累）引起社会脱节：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传统权贵的衰落。对新的集团来说，1822年巴西从葡萄牙赢得独立后创建的体制以及传统地主和商业寡头集团的政治霸权到了19世纪70—80年代成为阻碍进步的不合时宜的障碍。

然而，承认经济和社会变革导致实行体制变革的要求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传统寡头集团不能够吸收新的集团或满足其要求。为了说明这一失败和了解改革者的目的和言论、他们要求的性质以及他们反对有些体制而不反对另一些体制的动机，我们就应当超越经济变化而看到他们所攻击的现行政治和文化体制。在我们可以解释创建于1822年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成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所批判的目标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一制度是如

728

何实际运转的。

经济与社会变革

在19世纪期间，巴西人口发生了重要变化。巴西人口从1822年的380万增长到1872年的1,000万多一点，在1889年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已超过1,400万。人口的变化在有些地区要大于其他地区，从而改变了曾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最初的人口布局。1822—1870年间，东北部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同期，因橡胶繁荣而受益的帕拉，人口年增长率为3％，圣保罗为3.5％，这主要是因为咖啡种植园有了扩展。奴隶人口也发生了变化：1822年奴隶曾构成人口的一半以上，1872年为15.8％，而1888年仅占人口的5％。城市的奴隶人口减少了，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正在扩展中的种植园地区。1822年，几乎70％的奴隶居住在东北部和东部的蔗糖产区。60年之后，总的奴隶人口中只有35％住在那里，而几乎65％住在南部产咖啡的各州。

移民也往往在南部而不是在北部或东北部定居。1872和1889年间到达的移民，主要住在圣保罗、圣卡塔琳娜和南里奥格兰德三个州的农村地区。但是许多人在城市中心定居。1872年，里约热内卢拥有人口27.5万，其中8.4万是在国外出生的。同年，移民占阿雷格里港人口的12％，占库里蒂巴人口的11％和圣保罗人口的8％。移民人数继续在增长。1890年普查表明，圣保罗全市人口中有22％是在外国出生的。到那时，巴西有15万外国人，其中70％住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还有17.6％的外国人住在南里奥格兰德。

然而，另一个比人口增长或移民更为重要的现象是资本积累，这是由于咖啡出口非同寻常的增长以及特别是1860年之后在较小程度上由于橡胶和可可豆的出口而形成的。经济增长使一些州比另一些州更为受益，因此改变了那些州在全国的相对重要性。19世纪后半叶，中南部、特别是圣保罗的咖啡出口增加了

729

341%，咖啡价格增长91%，而东北部蔗糖出口仅增长35%，糖价下跌11%。尽管进口不断增长，巴西1861年后的贸易收支中仍有大量顺差。但是，利润的汇回（主要是汇往在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中有大量投资的英国公司），对多次英国贷款（资助政府弥补其增长速度快于岁收的政府开支）所偿付的利息（在巴西帝国最后几十年，外债的利息支付平均消耗掉贸易顺差的40%），以及英国对汇率的操纵，这一切都限制了巴西的资本积累。此外，资本往往累积在咖啡种植园主以及与进出口有关的商人手中。投入铁路、银行和工业部门的部分资本来自这些集团。专门侧重于国内市场的集团积累的资本仅居次要地位。而且，尽管他们的资本积累也在扩大，国内市场还是有限的。巴西资本积累所具有的这一独特方式说明了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上发生变革的性质和局限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巴西改良主义的限度。这一独特方式不仅仅是由于巴西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巴西对外国市场和外国资本的从属地位，而且也是由于巴西统治阶级作出的决定。

这类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是资本积累主要有利于城市中心以及与进出口经济部门有关的农村地区。1872—1890年间，里约热内卢市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882—1886年间，圣保罗市人口年增长率为5%，1886—1890年，年增长率为8%。萨尔瓦多市人口从1872年的12.9万增长到1890年的17.4万。

外国资本和当地资本的集中使城市设施的改进成为可能。水，下水道，煤气公司，街道的铺设，新的城市运输系统，改变了大城市的生活。1868—1888年间，在累西腓、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圣路易斯、圣保罗和坎皮纳斯引进了电车。19世纪70年代，电报线路将巴西同欧洲连结起来，在随后几年，大部分巴西城市都有电报线路相通。1861年拍发了62,233份电报。1885—188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90,277。19世纪80年代，圣保罗、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和坎皮纳斯有了电话。1887年，圣保罗有7条电车线路，运载150万名乘客。 730

城市里的学校也增多了，文盲减少了。但在农村地区，文盲仍然很多。1835年，圣保罗市民识字率大约为5%。1882年为42%。当时，农村居民中识字的仅占29%。杂志和报纸，美术及文化协会，小旅馆，剧院，咖啡馆，店铺迅速增多，大城市具有浓厚的国际气氛。在富人居住区，由"塔伊帕"(板条和灰泥）建造的传统住宅已逐渐地由欧洲式的砖房所取代。室内花梨木制的殖民时代的笨重家俱为英国红木轻型家俱所取代。奴隶居住区逐渐消失了。取代奴隶的自由劳工挤进城市中心的低级公共公寓房，或是住在郊区的小屋里。街道上不再是只能看到男人、奴隶和下层阶级的地方。在主要街道上可以更加经常地看到上层和中等阶级妇女，在公共场所男男女女经常在一起。向妇女开放的学校和工作比以前多了。她们可以当教师、女裁缝和办事员。在巴西帝国的最后几十年，社会习俗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有了投资、就业、社会升迁和政治动员的新机会。

然而，这一切主要发生在港口城市。在内地，只有诸如圣保罗、坎皮纳斯和佩洛塔斯这样一些具有重要商业中心职能的城镇发展起来了。种植园主给农村地区带来一些进步。他们把他们的种植园住宅和花园现代化，并在偏僻地区的城镇促进建立文化及美术协会。但是，除了这些例外情况，港口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巴西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市场发展的产物，莫如说是国际贸易扩展的产物，因此，巴西城市主要是面向欧洲，这一点甚于南美大陆的其他地方；巴西城市在改造巴西内地方面起的作用相对而言并不重要。

铁路大部分是靠外资修建的，它开始取代骡驮、牛车和驳船 731 等传统运输系统。1854—1872年，修建了933.3公里长的铁道；1873—1889年，又增修8,000公里；巴西帝国结束时，已有1.5万公里铁道在修建中。在一些地区，铁路为实现国内市场结为一体的确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但是，修建这些铁路的主要目的是便于巴西产品流入国际市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巴西铁路往往集中

在咖啡和蔗糖产区，而且是面向港口城市的。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国内市场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尤其是进口税的提高（这是政府为增加岁收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一切均有利于各行工业的发展。1875—1890年间，工厂数目从175家增加到600多家。1880年，有18，100人登记为产业工人；10年后，大约有5万人。生产纺织品、啤酒、香烟、肥皂、蜡烛、火柴、帽子等消费品的工厂以及制革厂、铸造厂、木材厂、造纸厂和玻璃厂，则集中在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南里奥格兰德的城市中心，在那里有劳工和资本可以提供，有信贷和运输的基础设施，并有相对可靠的市场，这些创造了有利条件。巴拉圭战争促进了航海、光学和化学产品的制造。到19世纪80年代，实业家们尽管人数还不多，但已感到力量强大到足以在里约热内卢建立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业协会。19世纪后半叶有许多利益集团由于巴西发生变革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就是这些利益集团之一。经济和社会变革使得政治权贵们按常规治国越来越难。19世纪最后几十年，帝国政权成为社会上许多集团批评的目标。

经济增长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产生了不平衡。经济多样化使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一些州和主要面向外部市场的一些州之间，使仍然依赖奴隶劳动的一些州和奴隶制不再成为问题的一些州之间，造成了利益冲突。各州竞相争取得到政府津贴和贷款。而且，要求扩充基础设施的压力使得各州更加认识到它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在各州内，革新生产方法的种植园主和继续采用传统方法的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局势复杂化了。蔗糖生产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1857年，伯南布哥66%的糖厂仍由畜力驱动，31%由水力驱动，只有2%是用蒸气驱动的。但是1870年后，用蒸气的糖厂数目迅速增加，1881年达到21.5%。还采用了真空锅、离心机和炉子的其他改进措施。随着干燥机、脱壳机和脱粒机的应用，咖啡加工也得到改进。这一切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度

732

提高。再加上加工制度的变革，劳动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有些地区自由劳工人数在增加，而其他一些地区仍使用奴隶。由于并非所有的种植园主拥有足够的资本去革新他们的种植园，许多种植园主仍坚持传统的做法。他们在议会中同多产地区的代表们在有关土地与劳工政策、铁路路线的安排和政府津贴等事宜经常发生抵触。有些种植园主希望用苦力取代奴隶，另一些种植园主宁可要欧洲移民而不要中国移民。有些种植园主认为，政府应当津贴移民而且移民不应给予获得土地的机会，这样他们就会在种植园劳动。其他的种植园主想通过给予移民以土地的办法吸引自发的移民。

经济增长和经济多样化不仅引起农业集团内部的矛盾，而且也产生了与铁路、工业、银行、保险、移民公司和公用事业有联系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提出它们自己的要求，而它们的利益同那些控制中央政府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说，实业家们要求保护主义关税和政府的支持，但他们同时对政治干预和政府管制表示愤慨。新建立的工业协会于1881年发表的宣言谴责政府忽视实业家们作出的努力，并且对他们的企业制造障碍。宣言指责政府采纳一项妨碍工业发展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使咖啡种植者园主受益。宣言同时批评统治阶级在法律学校接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将国家领导人培养成文学家而不是科学家。最后，宣言埋怨国会里缺乏“生产阶级”的代表③。

733

实业家们的不满还有其他一些理由。19世纪冲击资本主义世界的频繁危机使巴西商人受到损害。当伦敦和纽约的银行收回贷款以及国际市场出口产品价格下跌时，随即出现了破产。1857、1864和1873年，许多重要企业必须清算债务，因此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和普遍不满，这往往转化为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

商人和企业家们不是愤恨政治权贵、批评统治阶级和希望变

③ 《工业协会宣言》，论题集，I，（1977年）第91—100页。

革的唯一集团。城市贫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遭殃，他们往往认为政府的各项政策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工资劳动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制造了社会管理方面的难题，而习惯于守纪律的奴隶的权贵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难题。造成内阁的倒台的“铜板叛乱”大概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叛乱于1880年1月1日发生在里约热内卢，当时因电车票涨价而激怒了的群众同警察发生对抗，叛乱3天以后遭到了暴力镇压。

对外国产品的竞争表示不满的工匠和工人常常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抗议，要求保护国货。他们的声明有时看来反映了实业家们的要求。比如说，1885年，工人团结合作协会在致国王的信中要求对工业用机器免征进口税，对工厂免课财产税，取消授予某些行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对外国制造品征收关税，提供信贷便利④。但是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言论开始更经常地出现在面向工人的报纸上。在帝国的最后10年，工人组织的数目增加了，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偶尔发生的工人游行示威改变了城市生活的步调。

新的城市群众不仅仅是麻烦和担忧的来源，而且还是潜在的选民。政治家第一次亲自在公共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有组织地这样做的第一批人是废奴主义者。象洛佩斯·特罗旺（当时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者之一）这样的人，离开会议室和沙龙跑到街头同人民交谈。政治开俗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废奴主义者协会。妇女杂志成倍地增加，第一家女权主义报纸问世，要求妇女有上专业学校的机会。 734

乡下的经济变化也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这一混乱也反映在政治舞台上。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展和运输工具的改进，传统上主要致力于自给自足的人们开始为更多地为市场生产。这种过

---

④ 埃德加·卡罗内《巴西工人运动（1877—1944）》，圣保罗，1979，第204—210页。

渡有时由于政府为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必需的资金进行征税而得到推动。在内陆地区，资本积累掌握在商人、少数工匠及小农场主手中，这就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打破了传统的亲属关系和融资形式，引起了深刻的社会不安而时常发生民众叛乱。

1868—1874年间，南里奥格兰德发生的下等人造反是说明这一过程的很好例子。在那些年，圣莱奥波尔多市一带宁静的德国居民区被一场救世主运动所煽动而最后以造反者同地方当局发生一场暴力对抗告终。那些造反者，人称下等人，谴责货币和贸易，反对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社会升迁、声望和阶级关系的新格局。他们指责富人搞愚民政策，并组织一个按友爱平等原则治理的团体事设法改变这一社会格局。他们拒不投票，离开学校和教堂去创建他们自己的宗教，一种没有教堂的宗教，而且重视与上帝直接交流。这个运动被当局所镇压，但使得政治权贵们意识到发生民众叛乱的危险。

大约与此同时，下等人也在南部制造麻烦，东北部内陆地区被人称反对实行公制的暴动所席卷，因为暴动者抗议使用公制。但那次起义的意义不单单限于公制。贫穷的农民拒不接受政府所规定的公斤、征兵制和新税则。怒气冲冲的男男女女袭击市政厅和公证人，捣毁了税收单和征兵录，抢劫店铺，对外国商人实行恐怖手段。巴西政府怀疑，支持暴动者的背后是反对政府的教士，因为政府保护受到教皇谴责的自由共济会成员。但是骚乱者呼喊“打倒共济会”的口号，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敌视态度而不是他们对教士的忠诚。“反对公制者”和下等人的所作所为都表达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剥削以及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所造成的灰心失望。

735

帝国的政治制度

独立年代创建的政治制度反映了地主、商人及其门客这一权贵阶层的需要。他们在维持以奴隶劳工为基础的传统生产结构方

面以及将殖民地产物出口到国际市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企图毫不考虑他们所害怕和鄙视的人民群众而来治理国家。这一政治制度是极其集权的，寡头统治性质的，非代议制的。它不够灵活，无法适应19世纪后半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根据1824年宪法，首脑即皇帝负责文武官员的任命和提拨。皇帝还实施国会批准的立法，对各行政部门的资金分配拥有最后发言权。行政部门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在巴西同意或拒绝实施教皇的训谕。皇帝还有权任命主教和提供教会教士的俸禄。皇帝除了拥有首脑的种种权力外，还享有由于行使调节权而产生的其他权力，调节权是法国政论家邦雅曼·贡斯当的发明，它对宪法起草人曾具有吸引力。在这些额外的特权中，皇帝有权选定并罢免他的总理而不受国会影响，有权使国民议会延期举行、休会或解散，并要求举行新选举。这就是说，如果议会不信任内阁，皇帝可以保有内阁而解散议会，并号召举行新的选举。同时，他还有权任命国务委员会成员，有权从参议院选举中获票最多的3名候选人当中选定每一个参议员。看来宪法赋予皇帝几乎以专制权，事实上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期间这是一种共同意见。但是，宪法对皇帝的权力也施加了限制，规定皇帝作出的决定需首先提 736 交国务委员会进行讨论。人们可以争辩说，既然国务委员会成员是皇帝选定的，他们往往会同意皇帝的意见，即使他们碰巧不同意，也无权力否决皇帝的决定。可是感恩未必就是屈从的同义语。对国务委员会成员实行终身任命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不受皇帝的管辖。

当人们超越宪法的言词来看看实际做法时，就看得很明显：佩德罗二世从信念上和气质上正和批评他的人所说的相反，从来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事关全国性的重要问题上。事实上，在国务委员会成员的压力下，皇帝的所作所为往往违反本意。统治巴西的，是寡头集团而不是皇帝。但是皇帝在政治舞台上占有的正式

地位使得人们的希望和不满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如果皇帝忽视主要的参议员候选人而支持名单上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的话，那么这位不成功的候选人就攻击调节权，以表示不满。如果皇帝从反对派中挑选一个参议员的话，他就受到执政党的批评。如果他从执政党中挑选一个参议员的话，就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因此，任命参议员和国务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原来是想要加强皇帝的权力，但从长远看，却削弱了皇帝的地位。皇帝对国会的干预权也同样是这样。1840—1889年，皇帝解散议会11次。其中有8次，皇帝的干预造成政局的逆转：自由党人为保守党人所取代或保守党人为自由党人所取代。每一次被迫离职的人都大声抗议滥用调节权。

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即众所周知的调解时期，这些危机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因为权贵们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同一内阁中既有自由党人又有保守党人。但随着经济与社会变革而产生日益增大的利害矛盾，调解时期也分崩离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以不同的政纲竞相争夺权力，在各个党内部，代表不同的、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的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因此，不仅是内阁不稳定，而且皇帝的干预变得特别必要而激起了强烈反应。频繁使用解散议会和要求举行选举这一王室特权，使皇帝和君主制的声誉受到损害。

737

选举骗局使这一政治进程受到污损，因为这一选举骗局使得内阁可以操纵选举以利于它自己的党。既然选举并不是指要与全国实行真正协商，皇帝的干预就被看作是旨在迫使政治易手的独断而非法的姿态。由于选民人数很少，就助长了这一选举骗局。收入条件的限制和实行间接选举制使选举人人数减少到只占总人口的很小比例。只有25岁以上的男性（军官和21岁的已婚男子除外）并拥有100米尔雷斯年收入者才可以成为选民，拥有200米尔雷斯年收入的人才可以成为选举人。所有妇女、奴隶和公务员（只有如会计、农场管理人和主要办事员等少数人除外）被排除

在选举人之外。1872年，全国总人口为1,000万，选举人人数大约为20万。对人数这样少的选举人，是可以轻易加以操纵的。

在选举期间，内阁玩弄了各种计谋以压制反对派的声音。他们用对政府忠顺的人来取代那些效忠于反对派的州长和官员。他们建立了有友人居住的教区，撤消了有敌人居住的教区。他们骚扰基层反对派的选民，以征兵相威胁，而且以安排工作、提升和挂名差事来酬报支持内阁的人。有时他们竟动员国民警卫队来恐吓反对派，迫使反对派选民在选举日留在家里。

1842、1855和1860年，实施了旨在消除选举骗局和保证反对派代表权的改革，但均遭到失败。所有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即大部分农村人口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是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大部分居民因脱离生产性经济部门而趋于贫困，以及缺少可以保证选举人独立性并可以在选举人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的体制。尤其是，选举改革并未触及使少数人控制全国的那种政治恩惠制的根源。

这种由少数人控制选民的局面为强大的寡头势力奠定了基础，这阻挠所有不愿意顺应政治恩惠制统治的人们得到权力，这一局面使寡头势力得以永存。对国务委员和参议员实行终身任命制促成了这一寡头势力的巩固。在40岁（法律规定的最低年龄）能进人参议院的人可以留在参议院三、四十年。一些在19世纪中期被任命的人几乎在40年之后当君主制已被推翻时仍留在参议院。当然，这些都是例外情况。一般说，参议院每15年更新一次。但对想要在参议院谋得一席的议员来说，这看来一定要等候很长时间的。

738

参议员构成了一个独揽政府重要职位的强大集团。国务委员会常任委员都是从参议院增补的。在帝国统治期间，除了一名例外，所有的内阁总理都是参议员。许多参议员成为州长，40%以上的参议员拥有贵族头衔。

创建这些终身职机构的人们曾希望终身任命制（使参议员和

国务委员处于选举斗争之外）可以使他们不受政治情感的影响。他们所未曾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构往往缺乏对社会变革作出呼应所必需的灵活性。这说明改革者的政纲中经常提出要求废除参议员终身制和解散国务委员会或减少其管辖权限的原因之所在。

不满情绪的另一根源是，在帝国的最后年代已趋显著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缺乏平衡。原来每个州的代表人数与总人口（包括奴隶）是大致合乎比例的，人口的集中也是与经济重要性和政治权力相应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打破了这种相应性，而且在帝国统治结束之时，集中在一些兴旺的州的新的经济权贵认为自己州的代表名额不足。米纳斯吉拉斯是老的金矿区，在各州中人口最多。从一开始，米纳斯吉拉斯代表团的人数最多，有20名代表。圣保罗有9名代表，西阿拉和里约热内卢各8名代表。帝国结束之时，米纳斯吉拉斯的代表人数仍然最多，大多数州增加了它们的代表额，圣保罗州除外（尽管咖啡生产使该州成为巴西最富裕的州），考虑到州的资源，在帝国结束之时，圣保罗、帕拉和南里奥格兰德的代表额明显不足。

739 一些州在政治上的优势，在参议院和国务委员会中也是很明显的。大部分参议员和国务委员来自里约热内卢、巴伊亚、米纳斯吉拉斯和伯南布哥。而且，参议员不一定是要本州土生或是本州居民才能代表本州。里奥布朗库出生在巴伊亚，在参议院却代表马托格罗索州。萨莱斯·托雷斯·霍门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却代表南里奥格兰德。阿尔弗雷多·德·陶奈也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却代表圣卡塔琳娜。4个州在参议院的代表额几乎同所有其他州加在一起一样多。同时，它们还垄断了内阁职务。内阁总理的职务是于1847年设置的，从1847年至帝国统治结束，共有30任总理；其中，11名来自巴伊亚，5名来自米纳斯吉拉斯，5名来自伯南布哥，4名来自里约热内卢，2名来自圣保罗，2名来自皮奥伊，1名来自阿拉戈斯。1840—1889年间，内阁大多数成员来自

巴伊亚（57人），其次是里约热内卢（47人）、米纳斯吉拉斯（35人）和伯南布哥（29人）。这4个州独揽了中央政府大权，而其他象圣保罗、帕拉和南里奥格兰德这些在帝国统治最后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州在政府中拥有相对少的代表额，这些州对于缺乏政治权力这一点日益感到不满。

直到经济发展产生了相互矛盾的需求以及不同地区的权贵们对诸如关税、劳工、土地政策和政府津贴不再取得一致意见时，代表额才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不完全代表巴西最发达地区利益的一个寡头集团独揽了大权，引起了猛烈的批评。

如果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如果中央政府不曾对全国施加那么多的控制的话，局势还不致会发展成如此严重。但是，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化，使得少数政客（其中许多人是终身职的）可以对国家生活的若干不同方面进行干预。

各州在经济上依赖中央政府。1868年的数字表明，中央政府获得全部岁入的80%，而各州仅获得16.7%，各市获得2.5%。各州州长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当自由党内阁取代保守党内阁时或是保守党内阁取代自由党内阁时，新内阁立即选用与新政局更能一致的其他人来取代所有的州长。这一做法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可能在地方一级造成困难。州长往往来自该州以外的地方。他的任期通常不长，不足以使他建立强大的联系，而且他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比如说，若泽·安东尼奥·萨赖瓦就相继担任皮奥伊州、伯南布哥州、阿拉戈斯州和圣保罗州的州长。若昂·林斯·德·西宁布出任过阿拉戈斯州、塞尔希培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州长。州长拥有重大权力。许多重要的州官员、警察局长、法官、国民警卫队警长以及军队司令员的任命都依州长而定。这就间接地使中央政府对各州保持牢固控制。只要是控制中央政府的政客们的利益与地区权贵的利益相一致，这一制度的运转不致造成严重的紧张关系，但是当经济与社会变革引起各州之间相互矛盾的或具有竞争性的利益集团时，局势就变

740

得紧张起来。帕拉和伯南布哥以及圣保罗和南里奥格兰德的统治集团在帝国统治的最后年代抱怨说，中央政府未作出足够的努力以满足它们的需要。一种答案，看来是要求给予各州以更大程度的自治；因此，许多人对联邦制有好感。

在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矛盾的另一来源，是对军队的政治干预。军人对他们从属于州长表示不满，要求建立一个直接从属于陆军部的独立的军人集团。他们对晋升到高级军阶或在高级军阶内部的晋升要取决于皇帝和国务委员会这一点，也表示不满。对那些未同政客们建立个人联系的军官们来说，晋升可能看来是不现实的梦想，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军官的人数在不断增长。政客们在选举期间利用征兵来威吓反对派的做法，是陆军军官们抱怨的另一根源。而政客们将缓征通知发给他们的追随者时也同样引起不满。陆军军官主要是在与这一制度不合的上层阶级中进行招募，这一点虽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随着军队的民主化，在某个方面感到受这一制度之害的人数增加了，因此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在19世纪50年代对阿根廷之战以及19世纪60年代对巴拉圭之战后，军队变得不仅更加民主，而且更有内聚力，而且发扬了一种团结精神。军官和政客们之间的个人矛盾转化为军队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两次战争同时还表明，巴西军队装备不良，而且组织混乱。军官们将其归咎于政府，当一伙军官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决心改善军队状况时，他们确认政治影响是妨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主要障碍，因而对政治体制和政治权贵的批评越来越多了。

741

献身于庇护九世奉行的新的进攻性路线的教士们，也有一些同样的感受。1824年宪法规定天主教是国教，但同时教会仍在国家控制之下。政府有权利干预教会生活中的细微琐事，诸如教区的建立或关闭，教士的薪金，神学院采用的教科书。较大的问题，诸如教皇训令的实施或向教皇推荐主教，也都留给政府酌定。在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决定是由政客们作出的，而且作出这

些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这些决定却直接影响教会的生活。教会象其他机构一样，是和国家挂钩的，而且有赖于政治恩惠。致力于遵循更严格教规的改革派教士，对政客们插手教会事务感到不满。这就导致了19世纪70年代的政教冲突。

中央政府不仅干预军队和教会，而且还在经济中起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制定进出口关税的立法，监督未占用土地的分配，制定各项劳工和移民政策，和商谈借款事宜。中央政府控制银行、铁路和股份公司。未经国务委员会批准，不得在巴西建立任何责任公司。政府不仅是本国和外国企业的管理者，而且是保护者，授权或禁止它们的活动，提供津贴，保证利息，规定优先项目，许可免税。国家的恩惠，或换言之，政客的恩惠，能决定许多倡议的成败。企业家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听任政客摆布的。只要公司相对不多，这一制度可以运转而不致出现许多问题。企业家们要么属于权贵阶层，要么通过个人关系轻易找到庇护人。但是当商业企业成倍地增加时，这种政治恩惠制度的效能变得更差。接近19世纪末时，人们日益谴责国家干预经济，而且，广而言之，谴责寡头权力和支持这种权力的机构，这是不奇怪的。事实上，大部分企业家，（象毛阿男爵，19世纪巴西最杰出的铁路建筑家和实业家）如果未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可能生存不下去。他们的成功有赖于关税、政府合同、政府特许、政府贷款和津贴，有时甚至有赖于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巴西，资本主义是在政治恩惠网中发展起来的。政治恩惠制度和企业所日益坚持的自由企业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随着帝国的消亡而消失。 742

那些控制中央政府的人们不愿意放弃政治恩惠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使他们统治地区权贵，对军队、教会和经济企业施加严格控制。政治恩惠是他们的权力和政治威望的主要来源。由于这一做法，巴西的政客们被视为不仅仅是代表，而且是恩人，他们的政治权力取决于他们施恩的能力。

基于同样的理由，寡头集团也不愿意创建一项文官制度。实

行这一制度，就会使官僚政治从政治恩惠中解放出来，正如皇帝本人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个常设的官员机构，按照德才标准予以任命，这就剥夺了政客们施恩的主要来源之一。吸收新官员所流行的标准是个人友谊和对党的忠诚。政党变动的结果总是造成官员的大变动。如果自身的党遭受挫败的话，官员们一夜之间就会失去工作。对政治敌手实行迫害，是官僚政治的常规。一名被任命担任州长的政客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说，地方党的领导人指望他将小学老师调到边远地区作为对她们的丈夫支持反对派的惩罚[⑤]。有些人眼看他们的事业由于强大的政治领导人的插手而突然遭到破坏，这些人抱有敌视和不满情绪是很容易想像的。完全依靠政治恩惠的人终会迟早痛恨那种使他们的生活一无保障的制度，他们往往梦想一种会论功行赏的制度。

743 但是靠政治恩惠而不是靠才干，仍然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市场的自由运作还不足以保证社会升迁。在每个"自我奋斗成功的人"的背后，总有一名赞助者。巴西至今仍流行一句成语，说"没有教父的人到死还是异教徒"。这一成语充分说明帝国时期的情况。没有庇护人的帮助，政客在事业上得不到成功，工作人员担任不了公职，作家出不了名，将军得不到提拔，主教们得不到任命，企业组织不起来。

帝国的大部分政客的事业表明，不是他们的纲领，而是他们的亲属关系以及他们同强人的交往，才使他们能被作为候选人推荐给选民。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涯是由家庭作出决定的。年轻人的政治选择是由他的家庭预先决定的。政治斗争首先是在有威望的家族领导下的派系之间的斗争。不管他们是来自地主权贵（象科特日皮男爵，他在巴伊亚拥有一个甘蔗种植园），还是来自自由职业者家庭（象保利诺·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乌鲁瓜伊子爵，其父是医生，他本人是律师，但同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政客

⑤ 阿夫弗雷多·德斯克拉尼奥利·陶奈：《回忆录》，（里约热内卢，1960年）第416页。

和地主家族的女孩结了婚)，政客们在议会、参议院或国务委员会往往代表他们因政治恩惠和庇护人关系而挂上钩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利益。

这种联姻和交易制度以及对选民的操纵，有利于政客王朝的建立：费雷拉·弗兰萨王朝，纳布科·德·阿劳若王朝，卡瓦尔坎蒂·德·阿尔武凯克王朝，苏亚雷斯·德·索萨王朝。父亲提拔儿子，叔叔提拔侄儿，亲朋好友相互支持。卡瓦尔坎蒂家族拥有伯南布哥州糖厂的1/3。若阿金·纳布科在写到他们时说，这一王朝拥有在政府和议会内地位显赫的富裕望族所应有的影响力。纳布科本人通过家族关系而当上了议员，象纳布科这样的政客往往认为象卡瓦尔坎蒂那样的大家族的权力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想法在纳布科这样后来转向开明改革并对帝国传统寡头集团和政治体制提出挑战的人们的头脑里，只能产生矛盾心理。

其他人也会产生这一矛盾心理，因为如上所述，政治恩惠制度不仅局限于促进政治生涯。官员、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商人，人人都必须遵循政治恩惠的原则。小说家若泽·德·阿伦卡尔在叙述19世纪60年代局势的特点时评论说，"工业企业、商会、银行、公共工程、金融活动、特权……等，这一切丰富的财源来自权力的顶峰。官僚们将这一财富分配给他们的亲信，而不给予失宠者。事事都得靠恩惠，甚至报刊也是如此，报刊需要得到国家津贴才得以生存"⑥

744

在独立年代或紧接着独立年代之后已达到成年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为这一政治制度所吸引。如果他们的书籍市场仅局限在一个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国家，那么他们也至少可以靠政治恩惠而生存，并在政界和行政方面得到一官半职。他们成为众议员、国务委员、参议员、大使、国家官员。许多人获得了贵族头衔。多明戈斯·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在巴西被认为是浪漫

⑥ 《若泽·德·阿伦卡尔全集》第四卷，（里约热内卢，1960），第1097页。

主义思想之父，曾当过议员，驻欧洲外交官，国务委员会委员，还同皇帝有私交。他获得许多勋章，并被封为阿拉瓜男爵和子爵。这个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的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被任命为著名的佩德罗二世学院的拉丁文和历史学教授，后来又以公务被派往欧洲。若泽·德·阿伦卡尔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当过议员，司法部长和国务委员。正如政客们在独立之后按照欧洲宪法条例组织国家，第一代巴西作家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但却引进了欧洲模式并将巴西现实理想化；第二代作家对此作了典型的抱怨“他们把森林描写为没有蚊虫，没有热病”⑦。然而，由于大部分职位已满额，从政的机会逐渐地减少了。只有在官僚机构或法庭系统中还保有一些次要职位。除了少数例外，19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贝尔纳多·德·吉马良斯、卡西米罗·德·阿布雷乌、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德·阿塞韦多，由于英年早逝或缺乏像上一代人那样的机会，他们既不参与政治，也不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也没法靠笔耕谋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已陷入绝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玩世不恭；拜伦和缪塞是他们的榜样。他们自处于周围世界——一个他们认为无法改变的世界，陷入个人苦恼，无止境地搜索心灵，探究这个受愚弄的荒唐社会。

745

19世纪后半叶，书籍市场的发展（尽管规模不大）和报刊杂志的激增，为文学生涯开辟了新的机会。社会批评和战斗的改良主义思想为绝望和孤独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当阿尔瓦雷斯·德·阿泽韦多为个人鬼魂缠身时，卡斯特罗·阿尔韦斯在人与社会的斗争中找到了他的灵感的源泉，成为奴隶的诗人。第三代作家谴责以前几代人的词藻、文风和主题，要求有比较“客观的”世界观。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非浪漫主义，是他们的模式。青年小

⑦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德·阿塞韦多《马卡里奥》，载《阿尔瓦雷斯·阿塞韦多全集》（第6版，圣保罗，1942，第8版）第二卷，第Ⅱ集，第66页。

说家和诗人放弃了国会式的文辞巧辩、沙龙式的俗套议论、小康社会的阴谋诡计、印第安主义的理想化、前几代人的感情冲动的绝望，而是将目光集中于“人民的”生活。在帝国统治的最后年代和第一共和国的早期，阿鲁伊济奥德·阿泽韦多描述一座公共住宅里苦难的生活；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描述巴西内地的叛乱。西尔维奥·罗梅罗收集民间故事和歌谣，谴责“没有科学或激情的历史书，通篇是伟人和强人，但通篇找不到人民那些永恒的受苦人、永久的叛逆者或不朽的英雄。”[8]但是，新与旧的矛盾，“贵族”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立场。即使当时各种思想有了新的市场，足以满足作家们对独立所抱有的种种幻想，但巴西知识分子的生活仍然依附于政治恩惠。

如前所述，这种依附性在商界、政界和政府中，也是生活中的现实。它使统治阶级能控制社会升迁。政治恩惠制由于跨越阶级和肤色界限，控制新兴阶级中最富有才干的成员进入权贵阶层，而使种族和阶级矛盾减弱。但是政治恩惠制有它自身的种种矛盾。它确保人们的效忠，但产生不满情绪。它可以吸收敌人而疏远盟友，压制对本制度的批评而使支持者变成反对派。 746

有些社会钻营者几乎不隐瞒他们的矛盾心理。其他人则沉默地忍受他们处境中的种种矛盾。路易斯·加马是个穆拉托，母亲是黑奴，父亲是白人，他作为奴隶被出售，后来得到解放，成为一名开业律师，积极的废奴主义者，而且是圣保罗共和党的创建人之一。加马是一位讽刺诗人，在诗篇中嘲弄一名不承认其非洲祖先的自高自大的权贵。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权贵阶层的一员。即使加马是一个主张推翻君主制的政党领袖以及由奴隶主们控制的地区的废奴主义者，他死时受到权贵阶层的尊敬。参加加马的葬礼的有许多群众，从他曾帮助解放的前奴隶到政界和政府

---

⑧ 西尔维奥·罗梅罗：《对当代文学的新研究》（里约热内卢，1898年）第7页。

中的名人。如果加马是以讽刺字眼表达他的不安心理，那么，另一个穆拉托马查多·德·阿西斯在认真地执行白人世界交托给他的任务的同时，则以一层微妙的讽刺面纱来掩蓄他的不安。阿西斯作为一名小说家，将其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研究白人和他们的个人忧虑，很少提及黑人或奴隶，对废奴的政治持谨慎态度。虽然象马查多·德·阿西斯和加马这样的人的经历是相当例外的，但可以把他们视为政治恩惠制效能的证明，这两个人的生活助长了种族民主和巴西权贵家长作风的神话。

若泽·德·阿伦卡尔在1865年描写统治阶级与能人的结盟时写道，巴西权贵阶层是由两类人构成的："富有才干的穷人和未受启蒙的富人"。前者迫于需要和爱出风头，在政府中钻营要职；后者给予支持，以换取关注和尊重。⑨

有才干的人同有权势的人结成的这一联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马查多·德·阿西斯和其他小说家的著述中，自由主义的伦理和恩惠制的伦理并存。他们的小说是以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写的，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主张个人自主，法律的普遍性，不偏不倚的文化，崇尚节俭和勤奋；另一方面是以恩惠制的伦理观点，强调个人依附，培育规范中的例外，赞扬闲暇和铺张，确认"文化参与"。这种奇特的结合而产生的矛盾心理表达了不单是作者的经历，而且是许多其他巴西人的经历。政治恩惠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的共存，在意识形态和语言方面再现了生活在政治恩惠制网络内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的人的经历。这种思想的矛盾心理使资产阶级贵族的矛盾转化了，他们生活在巴西，但把欧洲作为他们的参照标准，他们使用奴隶来为国际市场进行生产，他们"一只眼睛盯住利润，一只眼睛盯着温文尔雅"，这一矛盾也存在于黑人知识分子、穆拉托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联盟，企业家同农村寡头集团的不稳定联盟，以及平庸出

⑨ 《若泽·德·阿伦卡尔全集》，第四卷，第1080页。

身者与强大权贵的不稳定联盟之中。这一思想表述的重重矛盾充满从上层至低层的整个巴西社会。

城市市场的发展、学校和文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读者的日益增多，给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作家、艺术家以及梦想从政治恩惠制的束缚中获得自我解放的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尽管仍然是有限的机会。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这些人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找到了他们与这一制度进行斗争所必需的论据。但即便如此，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信奉并不是没有矛盾心理的。他们仍然从自由主义观点判断政治恩惠，从政治恩惠观点判断自由主义。

在欧洲，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往往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进行的，但在巴西，由于缺乏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以及巴西许多地方仍存在着传统的生产关系，要进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即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很异乎寻常的。因此，在欧洲，自由主义处于守势，而在巴西，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仍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许诺。人们期望这种许诺可能实现，因此这成了19世纪70年代对帝国体制进行批评的后盾，这一批评表达了人们天真地相信靠进步、科学和改革来得救。然而，与这种改革趋势同时发生、有时在这一趋势之内，还继续存在着一股源于政治恩惠的保守主义潮流。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小说精采地抓住了这一进程的矛盾性质。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和语言在政治恩惠制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之间经常跳来跳去。

这个时期巴西的建筑更清楚地表明了巴西文化中“新”“旧”因素的关系。正如在英国一样，巴西建筑中，“新”“旧”并列，但却是反向的。在英国，新工艺往往采取高雅的奇特式的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外观。在巴西，则相反，建筑物仍然按照传统方法建造，但是厚厚的墙覆满了从欧洲进口的纸和镜子，外观装饰着玻璃窗，取代了传统的格子墙。现代化的是些细微末节和用以炫耀的东西，时髦的外观却掩盖了艺术上及政治上的粗糙结构。 748

如果帝国最后1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还不足以破坏传统

结构的话，那么却足以引起日益增长的不满，由政客们和知识分子日益表达的不满。在帝国统治的最后10年，老政客们感到受本党派系的排斥，年轻人则必须寻找进入政界的晋身之途，而且希望如一位当代人所说的“用思想影响取代人的影响”⑩，因此，他们在改革纲领中找到了获得事业成功的手段。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情况也是如此。19世纪60年代阿伦卡尔说，“目前有两种办法向上爬”，那就是“谄媚和批评，挑剔或乞求”。⑪一旦权贵们的相对一致破裂而且新的集团向传统寡头集团提出挑战时，不同政见和合作共谋同样可成为个人青云直上的敲门砖。对新一代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来说，改革既提供了主题，又提供了选民：当他们致力于改革时，他们不仅仅表达了他们所属的或认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且也是出于他们作为旨在建立选区的政客和知识分子的特殊需要。经济和社会变革给他们提供了乐于接受改良主义提议的选民。而当政客和知识分子使用改良主义言词时，他们就帮助鼓动起更多的潜在不满，并使得更多人认为改革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改革者有他们自己的词汇和自己的主题。在他们的语言中，“人民”总是伴随着诸如“进步”、“理性”和“科学”等好字眼。但事实上，不管有些字眼多么动听，他们都缺乏和人民的实际联系，他们宁可保护人民而不是代表人民，宁可代表人民而不是允许人民为自己说话。

749

在改革者的眼里，欧洲象征着进步，要进步就意味着要重新树立欧洲精英的模式。他们生活在一个依靠欧洲市场的国家，因此指望欧洲提供论点和模式，这不仅充当指导，而且赋予声望和权威。尽管文化机构、报纸和杂志激剧增加，而且能够阅读的人数

---

⑩ 援引自塞尔吉奥·布阿克·德·欧兰达编《巴西文明通史：巴西君主制》，第4卷《帝国的衰落与崩溃》（圣保罗，1971年）第307页。

⑪ 《若泽·德·阿伦卡尔全集》，第四册，第1074页。

也不断增加，但独立产生思想的条件还远远不够理想。大多数人口仍然是文盲（1872年为78%）。没有几家出版公司，巴西作家往往必须在欧洲出版他们的书。书店不多（19世纪末，圣保罗只有5家），在国内发行书籍很困难。进口图书比在当地著书立说要容易。这一切阻碍了国内思想交锋而促成一个相对自主的文化的建立。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名重要知识分子托比亚斯·巴雷托评论道，"我们是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制造者。"⑫

改革者引进了各种思想，但这种引进一如既往仍然是有选择性的。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思想。这说明为什么朗梅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圣西蒙、蒲鲁东或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少数古怪的个人看来只是推测。斯宾塞和孔德曾试图协调秩序和进步，并希望通过道德革命而使社会更新，象他们这样的人，比那些相信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的人，对巴西知识分子和政客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

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改革者们，一面要打击寡头集团，一面又不信任群众，结果从实证主义找到了启示。他们放弃了库赞**和茹弗鲁瓦***的折衷主义思想，而接受了孔德和斯宾塞的思想，折衷主义思想曾对19世纪30年代摄政王时期和19世纪50—60年代协调时期的权贵们起过作用。那些作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学说，一种分析的方法，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肯定了一项信念，即：人类必然要走向进步，不破坏社会秩序而进行变革是可能的。

19世纪30年代以来，少数曾在巴黎学习过的巴西人将孔德的

---

⑫ 托比亚斯·巴雷托：《社会学论文》（里约热内卢，1962），第10页。

* 朗梅内（1782—1854），法国加特教会神学家，以宗教名义宣传人民主权。——译者

** 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系统折衷主义使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译者

*** 茹弗鲁瓦（1796—1842），法国哲学家，是库赞的弟子，受库赞影响很深，在心理学观点上发展了库赞的学说。——译者

思想引进国内，但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孔德的思想才流行起来。750 那一代的改革者从孔德的思想中找到论据来支持他们的纲领，把国家的作用缩小到仅仅维持社会秩序。孔德尊重公民自由，主张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企业经营自由，这一切对于憎恨中央集权化政治制度和权贵阶层压迫性政治恩惠制的人们必然具有吸引力。孔德尊重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他认为自由是权利，但平等是神话，这对于比较保守的这批改革者们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当妇女迈出走向高等教育的第一步时，孔德却认为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而妇女应当从属其丈夫，这只能对在父权社会里长大的、对已解放妇女持怀疑眼光的男人具有吸引力。这些改革者还高兴地看到孔德还大力支持因德才兼备而卓著的技术精英和科学家，认为可取代“学究统治集团”，文人权贵，改革者把他们等同于巴西的寡头集团，孔德相信这种新型知识分子在变革世界方面起重要作用，这一点对改革者最具吸引力。孔德特别指的是医生、教师、工程师、企业家和军事院校学员，因为这些人讨厌传统权贵的恩惠制。因此，除了象哈特曼和叔本华的追随者法里亚斯·布里托，从新托马斯主义找到了启迪的索里亚诺·德·索萨以及嗜读一切、特别爱读德国文学的托比亚斯·巴雷托等少数几个人以外，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成为实证主义者。即使象西尔维奥·罗梅罗这样一些后来转向不同立场的人，也有过实证主义的阶段。少数人偏爱斯宾塞的进化论，但大多数人遵循利特雷*对孔德的说明。对新思想的兴趣与对制度的批评和对改革的要求同步增长。

改革的政治

19世纪60年代早期，一群主要的保守党政客相信改革政治制

---

* 利特雷（1801—1881），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所著《法语词典》为不朽名著。他是孔德的信徒，著有《实证主义哲学言论集》。——译者

度的必要性，脱离了他们的保守党，参加了自由党，建立了进步联盟。这些人中包括：佩德罗·德·阿劳若·利马（奥林达侯爵）、若泽·托马斯·纳布科·德·阿劳若、萨卡里亚斯·德·戈埃斯-巴斯孔塞洛斯、巴拉那瓜侯爵、西宁布和萨赖瓦）。进步联盟的纲领是1864年提出的。纲领要求中包括实施地方分权，选举改革，法庭制度改革，制定新民法，修改商法，特别有关股份公司和破产的部分。但是，随着1865年巴拉圭战争的开始，改良主义运动短暂地退却了。但是要求改革的压力在自由党队伍内部继续加强，自由党内出现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派系。自由党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导致了1868年自由党内阁的倒台。皇帝召来了保守党，他们在其后10年要继续当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对政府和皇帝进行攻击。1869年5月，他们发表宣言（显然是纳布科·德·阿劳若撰写的），要求实施地方分权，司法独立，建立一套更加不受国家影响的教育制度，将国务委员会变成一个专管行政的机构，取消参议员终身制，举行直接选举，建立民事登记制，墓地向俗人开放，宗教信仰自由，将投票权扩大到非天主教徒，逐步解放奴隶。宣言最后威胁说，“不改革，就革命”，接着是一句和解性的话：“实行改革，全国得救”。

751

尽管有这样的调子，自由派宣言仍未能使党的激进分子感到满意，几个月之后，他们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新的宣言要求取消节制权，废除国民警卫队、国务委员会和奴隶制。要求对州长和警察总长实行选举，实行普选制，举行直接选举。同时，还要求政府的行动局限于执行司法、维护秩序、惩罚罪犯和征收赋税，即一个典型的自由派国家的职能，这就会确保倡议自由，保证民权。各处成立了激进派俱乐部。随着1870年3月巴拉圭战争的结束，反对派加紧反政府活动。12月，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共和党，发表了宣言，刊载在第一期《共和》报纸上。在宣言上签名的，只有一人是种植园主。其他人确认自己是律师（14人）、记者（10人）、医生（9人）、商人（8人）、工程师（5人）、官员（3

人）、教师（2人）。少数人在自由党内是积极分子，并在政界和政752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若干激进派俱乐部对宣言作出了响应，宣布自己是共和党，出现了一些共和党俱乐部。共和党宣言并未增加许多其他内容。然而，它提了一项重要建议：成立一个有权更换政权的国民会议。

1868—1870年的三项宣言，即自由党的、激进派的和共和党的宣言实质上都有相同的目标，尽管它们的激进程度不同。它们都企图限制政府对私人部分的干预，增强州的自治性，摧毁传统寡头集团的权力。他们的改革纲领对范围广泛的利益集团都具有吸引力。他们向厌恶恩惠制多变不定的官员、法官和教师们说话。他们向受到政府政策压制的商人说话，向谴责对其机构进行政治干预的教士和军官说话。他们向希望改善处境的移民说话，向承受征兵征税重担的城乡群众说话。这些纲领对新一代的政客特别有吸引力，因为改革纲领可以赢得越来越多的选民；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改革中找到新的灵感来源和新的选民。如果说这一纲领看来对新兴的城市集团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也吸引对中央政府各项政策感到不满的进步种植园主和各州的权贵。尤其重要的是，在1868—1878年间当自由党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时，自由党政客就利用这一纲领攻击保守党。

但是，这些宣言提出的问题超越了党的界限。在自由党党员中，有些人往往不会支持最激进分子的要求。在保守党内，有人会支持一项温和的改革纲领。他们可以赢得一些他们党的最难驾驭的党员，办法是将改革说成是同反对派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当皇帝本人对一些改革表示同情时，这一战略就成为必然的了。皇帝在1871年访问欧洲之前给摄政王伊萨贝尔公主的建议中，强调改革选举制度、司法、国民警卫队及征兵制和军队晋任制度的必要性。他还建议，应鼓励移民和逐步解放奴隶。他在一个问题上753甚至比自由党人或共和党人走得更远。他提议建立一种使官员不受政治权贵操纵的职业文官制。但在其他问题上，他采纳比较保

守的路线。他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取消节制权，反对废除参议员终身制和国务委员会，反对实施地方分权。同时他也不赞成赋予外国人以政治权利。皇帝对温和的改革纲领的支持，只能使改革更得人心。这就说明以里奥布朗库男爵为首的保守党内阁（1871—1874）为什么发动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解放奴隶母亲生下的孩子。

奴隶的解放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在独立时，少数政客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未获得成功。在英国人的压力下，巴西政府于1831年取缔了奴隶买卖，但奴隶买卖仍在非法进行，直到1850年奴隶买卖才最终被制止。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咖啡种植园主由于关注劳工供应问题，试图在他们的种植园使用移民。这一试验以工人和种植园主的严重对抗而告终。外国政府抗议对移民的恶劣待遇，有些国家禁止向巴西移民。在那之后，只有少数顽固的种植园主继续在其种植园里使用移民。绝大多数种植园主在城市里或者在不那么依赖奴隶劳工的农村地区购买奴隶。结果是，奴隶从生产率较低的地区移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从城市移向农村地区。东北部奴隶人口减少了，而咖啡产区的奴隶人口却增加了。

19世纪50—60年代期间，若干有关逐步解放奴隶的议案提交了议会，但都遭到了否决。美国内战之后，奴隶解放运动有了更多的支持者，当时巴西成为仍保有奴隶的很少的几个国家之一。1867年，皇帝表示赞成逐步废除奴隶制。巴西国会拒不讨论这一问题。但过了两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奴隶拍卖以及拆散丈夫与妻子和拆散双亲与15岁以下儿童。在巴拉圭战争期间，在军队服役的州，国有奴隶于1866年11月得到解放，1870年参议员纳布科·德·阿劳若成功地说服参议院批准一项预算修正案，为解放奴隶提供1000康多。所有这些措施虽然规模很小，但说明了废奴主义压力日益增长。将奴隶解放问题包括在自由党宣言中以及皇帝批准逐步解放奴隶，使得保守党没有可能推迟议会辩论。 754

在可以提交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两届保守党内阁辞职了。由于皇帝提出组成新的保守党内阁，里奥布朗库于1871年决定向议会提交一则议案，建议解放奴隶母亲新出生的孩子。在议会辩论期间，地区利益集团战胜了对党的效忠。反对派主要是来自咖啡产区的代表。他们谈到了破产、社会混乱、政治混乱、奴隶反叛的危险性。有人甚至争辩说，议案有损于奴隶，因为议案会分裂家庭，引起家庭之间的不和。他们没有忘记发表所谓主人仁慈和奴隶生活状况优于工业社会工人状况这种典型议论。但是反对这一议案的最重要论据是，它损害了财产权。有人竟说，议案是共产党发明的。支持该议案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论据。他们不仅从道德的角度谴责奴隶体制，而且还争辩说，奴隶劳工生产力低于自由劳工。有人质问，人是否能作为财产。他们说，奴隶制远远不是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是“严重违背”自然法则。在国会内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激昂的辩论。同意和反对该议案的请愿书象潮水般涌进国会，旁听席上对于赞成该议案的激昂演说报以热烈掌声。尽管对立很尖锐，议案最终以65票对4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一议案在参议院以33票对7票通过后，1871年9月26日作为法律付诸实施。

该法律对奴隶制是一个严重打击，虽然只有从长远的观点看才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根据该法律，奴隶母亲的新生孩子是自由人，但主人必须照看他们到8岁。8岁后，奴隶主可以将孩子交给国家，以换取财政补偿，或者利用其劳动力到21岁。

政府批准了出生自由法之后转向实行其他改革，在不到4年时间里，内阁改革了法庭制度、国民警卫队（1873）、征兵制（1874）、军事学校和养老金制度。内阁还批准增加军人薪金，军人薪金从19世纪50年代后就冻结了。内阁还鼓励扩建铁路，使铁路里程翻了一番，建立连接巴西和欧洲以及各州之间相连接的电报线，资助移民，把每年进入巴西的移民人数从8,000人增加到50,000人。当时正是经济异常繁荣的时期，对所有这些活动的开

755

展是有利的。然而，不久，1873年世界经济衰退开始影响巴西，结束了这一和谐欢快气氛，逼使内阁倒台，内阁由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相互干预的矛盾而早已受到了削弱。

这一矛盾根源在于庇护九世制定的有关增强天主教会权威的各项政策。教皇在有关教规和宗教信仰方面容不得异端邪说的偏狭见解和他发动的进攻性的宗教运动，特别是在象巴西这样的国家，只能导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巴西，教会从属于国家。在教皇1868年发表《错误批判大纲》通谕对现代生活的许多情况加以谴责之后，局势变得紧张起来，而且梵蒂冈教廷在1870年宣告教皇的教义永无谬误。

许多巴西教士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士遵循教皇新的进攻性路线，这些年轻教士曾经在欧洲的神学院受过教育，带着更新宗教的使命感返回巴西。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教士认为，教会从属于国家，是无法容忍的。他们对那些已适应政治恩惠制常规的传统教士的漫不经心态度感到不满。这些新教士力争教会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和实施更严格的教规。

触发这一矛盾的问题显然是件小事。教皇谴责共济会会员，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共济会会员。奥林达主教董·维塔尔独立行事，决定禁止共济会会员参加宗教团契。这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不顺从的行为，因为宪法规定教皇勒令未经皇帝批准则无效。虽然共济会会员人数很少，但许多重要政客是共济会会员，其中包括内阁头头里奥布朗库子爵，这一事实使矛盾加剧了。许多教士也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团契抵制主教的决定并向政府申诉。政府下令主教收回他的命令，但主教拒绝了。这就产生了严重僵局。 756
政府要么屈服于主教的教皇至上立场，要么以违抗决定处罚主教。内阁在未能说服教皇劝阻主教之后，决定对主教进行处罚，主教被捕和审判后于1874年被判入狱。要是其他教士不表示他们支持该主教的话，这场矛盾本来就可能收场了。但是这一事件产生广泛的反响。在城市和内地都举行了同情或反对主教的游行示

威，同时报刊和国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另一名主教董·安东尼奥·马塞多·科斯塔也被捕，因为他仿照董·维塔尔的所作所为，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审讯和定罪，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保守党内阁在其队伍内得不到一致的支持。重要的保守党领袖，象保利诺·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安东尼奥·费雷拉·比亚纳和坎迪多·门德斯，谴责这些逮捕事件。自由党也四分五裂。许多共和党人发现自己站在支持皇帝和谴责主教的立场。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这一事件来推进共和党事业，力主政教分离。

主教的被捕在天主教徒中引起了极大不快，并给内阁带来了严重问题。关于共济会权利的小小问题发展起来的矛盾却成为无法妥善解决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对两名主教实行大赦，但是要这样做，里奥布朗库内阁必须辞职。1874年，内阁被撤换，1875年实行了大赦；与此同时，教皇下令中止对共济会会员的禁令，从而结束了这一矛盾。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是双方赞成政教分离的人数都增加了，所以从长远看，君主制失败了。过了许多年，在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几个月，董·安东尼奥·马塞多·科斯塔在一封主教致教区教友公开信中得意洋洋地说，“王权消失了……那么祭坛呢？祭坛依然存在”。⑬

传统的编年史学将帝国的倒台主要归因于这一矛盾，忽视了全国在这一问题上有分歧的事实。此外，国务委员会反对主教的立场代表了大部分权贵集团的意见。事实上，巴西权贵（除了明显的例外）一贯培养反教权的态度，许多人以自由思想家自居。这也是皇帝的态度，因为皇帝不喜欢主教的教皇至上观。在危机期间，甚至教会也发生了分裂。许多教士继续支持王室政治恩惠权。由于这些原因，不应过高估计所谓宗教问题在推翻君主制方

757

⑬ 若阿金·纳布科《帝国的一位政治家》（里约热内卢，1975）第830页。

面的作用。

如果国家对教士持严厉态度的话，那么国家对另一个不满集团——军人则比较宽宏，军人对政治制度的抱怨有长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但是当时，大多数军人基本上已适应了政治恩惠制。军人加入了政党，受到政客献殷勤。少数著名的将军参加了内阁。巴拉圭战争暴露了巴西军队的弱点，许多军官认识到提高部队效力的必要性。1874年，一名年轻军官塞纳·马杜雷拉访欧之后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些有关改组军队的建议。他提出建立一套以功绩和新型训练为基础的招募和晋升的新制度。许多年轻军官也同意他的想法。具有改革思想的军官创办杂志，竞选职务，在全国报刊上宣传他们的不满意见。许多军官认识到，政治恩惠制是军队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他们在斗争中发扬了一种超越传统政党界限的新的团结精神。他们在同样有志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寻求支持。他们终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传统寡头集团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不满情绪表现在他们对实证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越来越感兴趣。

政府为了企图满足这样军官的要求，采取了若干措施。政府为军官提薪，改革军官训练制度，使之更加专业化，并于1874年批准一项新的征兵法。巴西政府还于1875年改变晋升制度，规定战时服役时间在提升或退役时加倍计算。不过，大部分这些改革从未兑现。1873年的经济衰退使得所期待的增加工资一事推迟了10年多。1876年塞纳·马杜雷拉揭露了权贵分子为其家属或门徒逃避征兵而使用的诡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寡头集团和军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由于1875年任命巴拉圭战争期间巴西陆军司令卡希亚斯公爵当总理，以及另有两名得人心的将军（奥索里奥和佩洛塔斯）加入随后的自由党内阁，使得这一危机延缓了几年。但是19世纪80年代这一矛盾终于达到严重关头，对君主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后果。758

1878年，保守党经过10年统治之后终于被推翻。内阁的倒台

是由于有关选举改革的辩论引起的。一项旨在保证反对派代表权和限制政府干预选举的选举法改革于1876年获得了批准。但是，选举法改革遭到了失败。第一次选举时，只有16名自由党人当选，而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限度25人。保守党在议会中赢得了85%的议席。反对派立即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提议建立直接选举制。

在10年统治结束时，自由党可以争辩说，保守党人所实施的许多改革只不过起缓解作用。但是，反对派自由党人认为还不够充分的改革，许多保守党人则认为是太激进了。1878年，保守党在根本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正如1868年自由党那样。这些分歧反映了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两党内部出现相互矛盾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内阁要获得议会中内阁成员的一致支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尽管一些重要的保守党人士，如保利诺·苏亚雷斯·德·索萨、费雷拉·比亚纳和弗朗西斯科·贝利萨里奥赞成实行选举改革，但皇帝由于意识到保守党内部的分裂，要求自由党组织新内阁。

自由党人受到10年的政治排挤之后重新掌权，并提出了一个同保守党纲领没有多大区别的纲领。他们提议扩建铁路和电报线，实施里约热内卢城市改进工作，资助移民，扩大小学网络，和促进选举改革。新的选举给议会带进一批年轻政客，其中包括若阿金·纳布科、鲁伊·巴尔博扎、阿丰索·佩纳和鲁道夫·丹塔斯，他们在巴西帝国的最后10年和第一共和国时期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有关选举改革的辩论，表明自由党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有深刻分歧。这一分歧终于导致了自由党内阁的辞职。但是，直接原因是1880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爆发的"硬币叛乱"(见上文)。民众运动破天荒地使政府倒了台。这是新纪元的开始。在有关选举改革辩论期间，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文盲的投票问题。引发激烈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让非天主教徒获得政治权利的问

759

题，这是想要取悦于移民的政客们渴望予以批准的一项措施。

如同在关于解放奴隶母亲出生孩子的议案辩论期间或是在教会和国家对抗期间一样，党派再次缺乏内聚力。保守党有赞成和反对选举改革议案的，自由党也是如此。最后制订成的法律是一种妥协。该法律并未赋予文盲以选举权，而是赋予非天主教徒、自由民和归化的外国人。法律废除间接选举，但仍保留收入条件的资格限制。凡年满21岁、拥有净收入200米尔雷斯和识字的男性，均给予投票权。重要的革新之一，是选民证明书，这消除了选举登记过程中某些操纵现象。

选举改革的结果很奇特。由于取消间接选举制所特有的两个阶段，由于规定必须拥有200米尔雷斯最低收入，以及由于规定识字是投票的先决条件，这一改革实际上减少了可以投票的人数。在选举改革之前，作为选民登记的有1,114,066人，作为选举人登记的有240,000人。随着直接选举的体制化，可以投票的人数减少到145,296人，占总人口的大约1%。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略微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因为在城市地区，识字率和收入较高。

1881年，当75名自由党人和47名保守党人当选时，曾经支持过选举改革的人们的希望，看来获得了确认。反对派首次在议会内得到了可观的代表权。但是，在那以后的几年，选举改革的积极作用变得不那么明显了。1884年，67名自由党人，55名保守党人，3名共和党人当选。但是在1885年保守党内阁执政时举行的选举中，在125名当选总人数中，只有22名自由党人。选举改革再次不能纠正选举骗局，这一点到那时已变得很清楚了。选举改革后所举行的头几次选举获得令人鼓舞的结果，这是由于对选举改革给予支持的内阁刚正不阿。保守党人掌权时，并未对改革抱有同样的责任感，而且以压倒多数赢得了选举。立法当局再一次未能着手解决问题的根源，金钱、声誉和家庭关系继续控制了选票。当这些都失败时，暴力仍然是一个成功的战略。可是，在就中央集权化、取消参议院和国务委员会、移民、金融政策以及废 760

除奴隶制等问题举行辩论之后，政界舆论的进展仍然很缓慢。尽管地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仍然要比候选人的纲领更起作用，但是新的城市选民的出现和权贵分子一致意见的破裂，为一种新型政治活动创造了条件。1884年，主张废奴的领袖若阿金·纳布科在累西腓挨家挨户地走访，与若昂·马里亚诺竞相争取选民的支持。

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给这场政治辩论带来了新问题，使政治矛盾加剧了。自由党人接过来的是过去的财政烂摊子。铁路网络和电报线的扩建，给移民的津贴，糖厂权力的集中化，对19世纪70年代因多次旱灾而遭到破坏的东北部地区居民提供的援助，这一切对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个时期发放了许多次贷款，仅仅外债一项就消耗国家全部岁收的一半，债务的分期偿还于事无补。尽管咖啡和橡胶的出口日益增多，政府的开支仍高于收入。19世纪80年代初期，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巴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日益下跌。1881年执政的自由党内阁被迫推迟实施改革纲领，以对付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日益增长的赤字。自由党内阁必须同时照应增加信贷的许多要求。

经济衰退暴露了利害冲突的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与出口有关的集团（它们在政府中代表名额过多）反对征收土地税和出口税，替代办法就是提高进口税。但是此举伤害了进口商和消费者。要减少开支（另一个可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意味着有关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开发项目必须停工。政府已陷入绝境。象往常一样，从短期来看，摆脱困难的容易办法是借款或发行货币。两种情况从长远看都只能使赤字剧增。自由党内阁因背着财政困难的包袱和党内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冲突的破坏，因此缺乏稳定性。1882—1884年间，4届自由党内阁相继接任，但都不能够确保在议会里获得多数。

761

除了选举改革外，1869年自由党的大部分要求仍有待于兑现。每一届新内阁都宣告它们的目的是保证司法独立、行政分

权、给予各州更大程度的自治、扩大国立学校以及平衡预算。但是除了扩大小学系统外，自由党人未能贯彻其纲领。

这一失败部分是由于自由党人不愿意实施他们在野时曾经提出的、而现在却会破坏他们自身权力的改革。自由党人（除了最激进的以外）一旦当权，就不愿意比保守党走得多远。1882年新内阁的头头马蒂纽·坎波斯说得对，他说再没有比自由党同保守党、甚至共和党更相似的了⑭。它们有相似的家族背景。意识形态分歧是次要的，或者涉及不到。坎波斯的意见同马查多·德·阿西斯笔下的一个人物的意见很相似，这个人物企图安慰一个受挫的政客说他可以改变立场。"你们同他们就象在舞会上一样，没有必要都想跳同样的方块舞。"⑮

对两党的组成进行仔细分析，就揭示出农业集团（庄园主）相当于两党中任何一党人数的大约一半，而另一半是由官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官员在保守党内占优势，自由职业者在自由党内占优势⑯。官僚在保守党内占优势并不足为奇，因为保守党当政时间比自由党长，而且有更多的机会控制官员的任命。但是考虑到官僚统治的不稳定性以及新补充的官员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两党的代表和获得的支持看来都基本上来自相同的社会集团。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分歧主要是在言词方面。保守党人一旦执政，也可以履行自由党人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而当政的自由党人的所作所为并未大大超越多数保守党人所接受的界限。如上所述，两党内部都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内部斗争。温和派往往代表传统土地权贵的利益，激进派则代表新兴的利益集团。里奥布朗库内

762

⑭ 国家档案《内阁的组织与纲领：帝国的国会制》（里约热内卢，1962年，）第2版，第196页。

⑮ 马查多·德·阿西斯：《埃伍和哈科》，（圣保罗，1961年）第181页。

⑯ 何塞·穆里洛·德·卡瓦略：《帝国政党的社会构成》，DCP笔记，1974年，第15页。

阁倒台之后，这一内部分裂造成政治上更加不稳定。1880年至帝国垮台这一期间，组成并解散了10届内阁；前7届（1880—1885）是自由党。议会被解散三次，政府要求举行选举。在这个期间，没有一届议会任满法定任期。

由于政治不稳定，人们往往要求皇帝对政界进行干预。由于经常使用节制权进行干预，产生了不满情绪和诸多批评，从而引起了政治制度的危机。甚至传统的政治权贵也开始对政权提出质疑。一些君主制的政党也不放过对它们照说应维护的君主制政权的批评。节制权是对它们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经验丰富的政客费雷拉·比亚纳1884年7月31日在参议院的讲话，表达了他的许多同事们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参加这场政治喜剧感到厌倦”。

政客们不久即将面临一场艰难的考验。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又将废奴问题带回国会。最保守的政客们曾经期望，1871年的法律会解决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会逐步告一结束。但是，正如一名激烈的废奴主义者所说的，如果不作任何努力来加速废奴的进程，那么在20世纪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里，巴西人还会保有奴隶。这看来众议院的大多数议员并不关心。甚至在自由党1878年重新掌权时也没有设法寻求支持来讨论这一问题。纳布科提出的一项议案，以77票遭到否决，只有16名众议员支持这一议案。翌年，纳布科由于不能指望他自己的党给予全力支持，没有重新当选。同时，废奴主义运动在国会以外赢得了新的盟友。

有若干因素可以说明废奴主义运动的进展和国会为什么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不但依赖奴隶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们日益意识到必须寻求其他出路。咖啡种植园主可以扩大他们的种植园，只要拥有充分的劳力供应，但是奴隶人口从1873年的1,566,416人减少到1883年的1,346,097人，而且还继续在减少，减少到1885年的1,133,228人和1887年的723,419人。奴隶人口减少的速度，东北部快于南部；在南部，奴隶人口有集中趋势，但即使在南部，奴隶人口也相对减少了。在圣保罗，奴隶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854年为28.2%，1886年为8.7%。而且，奴隶人口因为不能更新，故不断老龄化。由于认识到迟早不会再有奴隶这一事实，迫使咖啡种植园主寻求其他出路。在187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少数人建议使用中国移民。但大部分种植园主不欢迎这一建议，他们力主使用巴西农村自由居民或欧洲人。这就是最终盛行的解决办法。圣保罗州议会批准了许多资助移民的议案，1875—1885年间，4.2万移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进入该州。在此后两年，又来了11.4万移民。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之前，大多数咖啡种植园主依然几乎全部依靠奴隶。在东北部，逃避19世纪70年代旱灾的居民大批涌入蔗糖产区，从而为种植园主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蔗糖和咖啡加工工序的改革以及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得种植园主使用自由劳工更方便一些。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对劳工制度可以实行合理化。在有些情况下，使用自由劳工甚至比奴隶劳工还有利可图。新投资机会的开辟，也进一步推进了奴隶制向自由劳工的过渡进程。银行、铁路、城市改进措施，保险公司和制造厂为资本投资提供了选择机会。而且，即使他们付出的代价不多于对奴隶的投资，种植园主通过同时在铁路、银行和其他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保护自己以防范农业生产的捉摸不定。实现投资多样化的需要在19世纪80年代初变得很明显，因为当时咖啡价格急剧下跌。自由劳工现在可以比奴隶劳工具有更大吸引力，因为自由劳工不需要资本固定化。此外，在19世纪70年代，奴隶价格及蓄奴费用，在有些地区竟上涨得比自由劳工的成本还高。尽管19世纪晚期，事事看来都指向自由劳工，但大部分种植园主仍反对废除奴隶制。毕竟，不仅仅是奴隶体现了已投入的资本，而且种植园主还依赖奴隶劳工，因此对以自由劳工取代奴隶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移民在主要的咖啡产区发动暴乱表明，他们是不能作为奴隶驱使的。

764

在种植园主对劳工问题感到苦恼的同时，废奴主义者，特别

是在城市居民中，取得了进展，而且逐渐地成为一支政治力量。1884年，奴隶制在西阿拉州和亚马孙州事实上已经废除。圣保罗的一名律师安东尼奥·本托依靠工匠和铁路工人（主要是黑人和穆拉托）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帮助逃亡奴隶的地下系统。奴隶大批地逃离种植园。由于废奴主义为奴隶提供了新思想和新战略，奴隶有了新的觉悟。废奴主义者还改变了舆论，早在奴隶制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反抗行为有了新的意义。在过去，逃亡奴隶受到迫害，而现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过去曾迫害逃亡奴隶的城市居民现在则嘲弄警察。法官和律师大力实施保护奴隶的法律，而在实施镇压法令时则很宽大。废奴主义报刊和反废奴主义报刊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宣扬有关奴隶造反的谣传：废奴主义者强调导致人们如此绝望的暴力制度，反废奴主义者则强调需要进一步镇压。奴隶主使用一切手段来打击废奴主义运动。他们攻击废奴主义者发言人，将废奴主义领袖赶离他们的社区，在报刊上抗议政府不能控制社会混乱，申诉书潮水般地涌进国会。法国工程师路易·库蒂于1883年访问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他获得的印象是，巴西正处在一场社会革命的前夕。

正是在废奴主义者兴奋激昂和种植园主苦恼懊丧的气氛下，自由党人索萨·丹塔斯于1884年奉命组成新内阁。他在提交议会的纲领中明确了他对解放奴隶的立场："既不退却，也不止步，但765 不要仓卒行事……，划定一条既注意谨慎又维护文明的路线"。他提出一项无偿解放年满60岁的奴隶的议案。这一议案激发了大规模危机，最终导致自由党内阁倒台并使保守党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再一次超越了党派界线。议会里站在正反两个立场的既有保守党也有自由党。17名自由党人投票反对内阁，其中圣保罗3人，里约热内卢1人，米纳斯吉拉斯6人，其他各州7人。最后的记录表明，有55票反对内阁，52票支持内阁。反对这一议案的主要来自咖啡产区（来自这些地区的有41名众议员，只有7人投内阁的票）。议会解散了，内阁要求举行选举。

巴西从未经历过比这更有争议的选举运动了。商人、银行家、种植园主在农商协会集会，指控废奴主义者是颠覆分子，对国家造成经济和政治混乱的危险。议会的一名众议员说，“废奴主义者就象俄国的虚无主义党人，德国的社会党人，法国的共产党人”。废奴主义者则鼓励召开公共集会，并在报刊上进行游说，指出奴隶制阻止了工业发展和农耕方法的革新。奴隶制造成了财产的不稳定和家庭的解体。奴隶制触发了种族仇恨，使劳工情绪低落，并造成自由民的愚昧和贫穷。但首要的明确论点是：奴隶制是进步的障碍。

67名自由党人，55名保守党人，3名共和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重新当选的有赞成该议案的38名众议员，反对该议案的18名众议员。看来内阁获胜。但是事实上，这次当选的还有反对该议案的许多其他人，有些人，象纳布科（他曾为此而战），要重新当选是很困难的。在开始举行的新的议会会议上，一名来自圣保罗的众议员提出一项不信任内阁的动议，投票以不分胜负而告终。三周之后，很清楚，内阁不能掌权了。对一项新的不信任动议进行了表决，这时内阁受到保守党几乎一致的反对（除了3人以外全部投反对票），而9名自由党人也站在反对派一边。皇帝要求另一名自由党人组成新内阁，指望这样一个变动会确保自由党在议会里的多数。但是，自由党并未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执政，这一点再一次变得很清楚了。1885年，皇帝要求保守党人科特日皮组成新内阁。由于保守党重新掌权，一项比原来议案温和的议案获得通过，并于1885年9月成为法律。根据1885年法律，60岁的奴隶得到解放，但是他们还要从事三年的无偿劳动或劳动到年满65岁，作为对他们主人的一种补偿形式。

在为时4个月的辩论中，咖啡产区最坦率的保守党领袖之一的立场曾发生根本转变。安东尼奥·普拉多，过去曾一贯反对解放奴隶的所有立法，这次却支持该议案。他告诉议会说，如果允许奴隶主保有奴隶直到可以用自由劳工取代的话，则没有必要给

予赔偿。他补充说，圣保罗人意识到使用自由劳工的好处，并且正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意见的改变不仅与劳工的日益混乱有关（这是因奴隶逃离种植园所造成的），而且与移民的新前景有关。

尽管有些种植园主转而使用移民，但其他人则决定，为了不使他们的奴隶逃跑，必须给予奴隶有条件的自由。他们解放奴隶的条件是，奴隶必须留在种植园若干年。1887年，圣保罗被解放的奴隶人数上升到4万，圣保罗州议会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种植园主终于认识到，废除奴隶制是避免社会动乱的唯一办法。当军队向公主递交请愿书，要求解除要他们迫害逃亡奴隶的任务时，这一点就更为清楚了。

当1888年议会重新开会时，新总理若昂·阿尔弗雷多·科雷亚·德·奥利维拉宣布他打算无偿废除奴隶制，议案立即获得通过，并于1888年5月13日形成法律。只有9名代表投反对票；其中8名代表来自里约热内卢，那里的咖啡种植园在衰落，种植园主因抵押贷款而负担沉重。与卡桑德拉斯的预言相反，巴西经济并未因废除奴隶劳工而遭殃。巴西经济从最初几年几次庄稼欠收的不可避免的破坏中迅速获得恢复。种植园已处于危急状况的少数种植园主面临破产，而不是国家。

767 奴隶制的废除并未根本改变种植园的劳动条件。在咖啡产区，前来取代奴隶的移民经常发现种植园的生活并不象他们所想像的那般田园景象，因此他们迁往城里，或者离开巴西。但是不断涌入的移民使得种植园主能取得扩大种植园所需的劳工供应。许多以前的奴隶留在种植园并继续从事他们通常的工作，他们为此获得微薄的工资。迁往城里的其他人专门从事低下的工作，仍处于社会底层。废奴主义者似乎把黑人忘记了。

正如这个时期推行的其他改革——选举改革、征兵制改革、国民警卫队改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废除奴隶制的结果既未缓解保守党人的恐惧，也不符合改革者的期望。但是，这些改革

足以使君主主义者引起沮丧，他们因为政府无偿地废除了奴隶制而不能宽恕政府。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表明的，如果废除奴隶制没有使共和党党员人数猛增的话，它却有助于削弱君主制。在废奴运动期间，皇帝受到所有派系的批评。对于象席尔瓦·维尔丁这样的激进废奴主义者来说，皇帝的罪过是没有更加激烈地进行干预以利奴隶制的废除。对于反废奴主义者来说，皇帝的罪过是做的太过头。

1888年，在一场动乱的民众运动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了。下一年，共和国以军事政变的形式默默诞生了。这一军事政变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共和党党员同某些陆军军官共谋策划的。

1870年以来，共和党取得了进展。开始时，它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组织。里约热内卢共和党原来的核心约有30人。《共和国报》第一年发行量为2,000份，但到同年年底，该报已经在里约热内卢、阿拉戈斯、伯南布哥、南里奥格兰德、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等地销售。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两年之后，号称发行量有1、2万份。在若干州，出现了共和党支部，但支部最多的是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南里奥格兰德和米纳斯吉拉斯。1889年，79%的报纸和89%的共和党支部设在这些地区。

共和党几乎在各地的城市居民中吸收支持者。在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少数实业家构成共和党的主体。然而，在圣保罗，大多数共和党人是种植园主。虽然情况已表明，只有30%的共和党党员是种植园主，而55%是自由职业者，11%是商人，但许多种植园主也获得法律、医学或工程学校的学位，他们既可被列为自由职业者，也可被列为种植园主。在出席1873年在圣保罗召开的共和党第一次重要会议的133名代表中，有76名代表声称他们的职业是务农。其他代表确认自己是商人、律师、“资本家”、“艺术家”和“业主”。许多代表曾就读于圣保罗法律学院，该校是废奴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中心。有些代表属于种植园主的第二、第三代，其他代表是购买

768

了种植园或同种植园主家族联姻的自由职业者。曼努埃尔·莫赖斯·巴罗斯是律师兼种植园主。弗朗西斯科·阿吉亚尔·德·巴罗斯是公务员，拥有一家进口公司，同时也是种植园主。穆尼斯·德·索萨是州议会议员，又是咖啡种植园主。埃利亚斯·帕切科·沙维斯是咖啡种植园主、实业家、负责孤儿工作的地方长官、警察局长和州议员。

圣保罗的共和党由于获得有地位和有产者的支持，成为巴西最强大的共和党组织之一。早在1877年，该党组织成功地选举了3名州议会代表。但是2名当选的共和党人是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这是共和党人多次遵循的战略。圣保罗共和党虽然是巴西最重要的共和党核心，但1880年仅有900名注册的党员。1884年，圣保罗共和党与保守党结盟，成功地输送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雷斯两名议员出席议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这两人又成为巴西最早的两位文人总统。在19世纪80年代末，圣保罗约有50个共和党支部。根据对1889年情况的估计，圣保罗选民的1/4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3,593人，自由党人6,637人，保守党人3,957人）。共和党几次与自由党或保守党结盟（取决于哪一个党在野），而且在诸如废奴或政教矛盾等基本问题上奉行了非常灵活的路线。

769

米纳斯吉拉斯的共和党人也很举足轻重，那里的许多年轻政客转而信仰共和主义，他们当中有的出身于传统的保守党家庭，如阿尔瓦罗·博特略，有的出身于自由党家庭，如阿丰索·塞尔索。在君主主义政党中一些曾经很显赫的政客在最后关头成为共和党人。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德·安德拉达的情况就是如此。1886年他决定加入共和党的队伍，并带过来许多选票。

但是，总的来说，共和党在米纳斯吉拉斯获得票数很少，米纳斯吉拉斯人直到1887年才建立了一个可以联合该州所有支部的组织。而且，在米纳斯吉拉斯如同在其他州一样，许多个人是共和党人，但并没有取得选民资格。但是，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

这里的共和党候选人往往获得他们的君主主义亲友们的支持。家族观念往往比政治信念重要。1888年，当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人竞选参议院议席时，他们获得1/3的选票。只是到那时才在米纳斯吉拉斯建立了共和党。就在此时，他们在众议院已经拥有3名议员，在州议会也拥有若干议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夕，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已经同其他两党一样强大。一些已经当了若干年议员的政客——若昂·佩尼多、费利西奥·多斯·桑托斯、塞萨里奥·阿尔温——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根据投票数，共和党人获得36%的选票。古怪的是，在共和党的创建地里约热内卢，共和党人却不那么成功。里约热内卢是君主主义官僚势力中心和大商业中心。在那里，共和党主要在军人和自由职业者中间争取支持。在农村地区，君主主义势力强大。参加里约热内卢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三番五次地遭到失败，共和党报纸忽起忽落。选入州议会的很少几个共和党候选人之一是记者和废奴主义领袖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他曾获得废奴主义者同盟会的支持。该党尽管进展缓慢，但在188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仍得到1/7的选票。该党的州议会候选人得到1/5的选票。

在南里奥格兰德，1882年组织了共和党。象其他州一样，那里的共和党人成立了支部，创办了报纸，并参加竞选——但未取得多大成功。1886年，共和党人第一次成功地将一名候选人阿西斯·布拉西尔选进州议会。南里奥格兰德的许多共和党人是外国人，因为共和党纲领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南里奥格兰德的经济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该州主要供应肉类、牛肉干、皮革及食品。移民曾发展了以小地产为基础的蓬勃兴旺的农业。南里奥格兰德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特色，使得该州居民对地方分权、归化和政教分离等问题特别敏感。这说明了1889年共和党获得的选票为什么要多于保守党。但是，共和党人并未能阻止自由党以绝大多数选票赢得了选举胜利，因为自由党人在该州曾一贯得到大力支持。 770

自由党纲领和共和党纲领很相似，这构成共和党的不利条件之一，这种情况不仅在南里奥格兰德而且在其他各地都存在。1878年自由党重新掌权时，许多人脱离了共和党而加入了自由党。甚至有些在1868年脱离自由党去创建共和党的人很快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党，如拉斐特·罗德里格斯·佩雷拉、克里斯蒂亚诺·奥托尼、萨尔瓦多·德·门东萨，而且，拉斐特·罗德里格斯·佩雷拉甚至还接受了总理的职务。当1878年自由党人重新掌权时，留给共和党的唯一出路，是攻击他们以前的盟友。出于那一目的，共和党人往往支持当时处在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1878—1884年是自由党霸权时期，共和党人在此期间未取得重大进展。只是到了1885年，保守党重新掌权时，共和党人才开始了新生活。共和党人尽管在南部一些州取得进展，但是，在其他地方，他们的处境并未获得多大改进。只是在帕拉，共和党人得到了比较重大的支持，因为帕拉的橡胶繁荣培育了一批不满于中央集权的权贵；但即使在帕拉，共和党人也只是富有战斗性的少数。在大部分其他的州，只有很小一些共和党支部座落在最重要的城市中心，聚集了十来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职业者。

共和党人由于赞成联邦制，最初曾拒绝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而支部仍保持其自主性。各州的共和党人对解放奴隶一事一向意见不合，虽然大部分人认为这一问题应当由各州本身自行决定，而不应当由中央政府加以解决。在1884年，有关解放年满60

771

的奴隶的提案举行辩论期间，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人费利西奥·多斯·桑托斯拒不支持任何不承认奴隶主享有赔偿权的议案。但是，议会中的另两名共和党人支持该议案。这两人是圣保罗州的代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雷斯。同时，共和党人在战略上也有分歧。大多数听从该党里约热内卢领导人金蒂诺·博卡尤瓦的意见，博卡尤瓦奉行一条渐进的、法制的和民主的路线。他的纲领，就是通过政治宣传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其他一些人，象席尔瓦·雅尔丁，采取了一条培养民众革命思想的革命路

线。同时，也有人希望共和党人与军人共谋推翻政府。共和党人对理想的政府形式也意见不一。大多数共和党人维护人民主权的原则，赞成代议制政府形式；少数人梦想实现象孔德所建议的那种独裁主义的共和政权。

共和党人当中固然有许多分歧，但大部分人看来同意1873年他们草拟的圣保罗州宪法所规定的诸原则：实行州自治；两院制政府，行政是立法的执行者；实行普选；信仰、劳动、出版和受教育的自由；政教分离；废除贵族的特权及头衔；保障私人财产；废除对国民警卫队的征兵制。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联邦制。对中央集权的不满情绪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在圣保罗出现了一个小的分离主义集团。分离主义集团的一名领导人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在1879年的州议会上，对州的财富流入帝国国库、对中央政府干预州的事务以及对圣保罗在中央政府中的代表额不足甚感遗憾。他尖刻地说，“当我们希望进步时，中央网络套住了我们，担任我们的政治公职的尽是一些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习俗格格不入的人们。”几年后，在1881年选举改革之后，他评论说，圣保罗 9 名议员中每一位议员代表的人数几乎是圣埃斯皮里图州人口的两倍（该州选出两名议员），几乎是亚马孙州人口的三倍（亚马孙也选出两名议员）。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埋怨说，圣保罗每年为国库贡献了2000万米尔雷斯，占全国岁收总额的1/6，但仅获得300万米尔雷斯。这一数额相当于咖啡出口的主要港口桑托斯 3 个月期间所征收的税款。马丁·弗朗西斯科认为，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分离的做法是有理的⑱。

772

弗朗西斯科的埋怨是没有根据的。1883年，圣保罗有 4 名参议员，而米纳斯吉拉斯有10名，巴伊亚有 7 名，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各 6 名。圣保罗州每位参议员代表326,568个居民，伯南

⑱ 塔西托·德·阿尔梅达：《1887年的运动》，1934年，圣保罗；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达：《从君主制到共和国决定性时刻》（圣保罗，1977）第313—316页。

布哥的一名参议员代表185,138个居民，亚马孙的参议员代表80,654个居民。在议会里，可以注意到同样显著的差异，圣保罗每位议员代表145,141人，而伯南布哥的议员代表85,448人，亚马孙的议员代表40,327人。1889年，69名参议员中只有3名来自圣保罗，而圣保罗是巴西最富裕的州（第4个议席空缺）。小的州，象塞尔希培、阿拉戈斯和帕拉伊巴，有两名议员，而里约热内卢有5名，巴伊亚有6名，伯南布哥有6名，米纳斯吉拉斯有10名。如上所述，圣保罗仅有9名议员，最贫困的州之一西阿拉却有8名议员，里约热内卢有12名议员，伯南布哥有13名议员，巴伊亚有14名议员，米纳斯吉拉斯有20名议员。难得见到来自新的咖啡产区（全国最先进）的圣保罗人担任国务委员，国务委员会是被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南里奥格兰德和里约热内卢所控制的；获得这一职务的大部分圣保罗人代表帕拉伊巴河谷的种植园主，那里的咖啡种植园从1870年以来曾处于衰落状态。圣保罗经常让其他州的政客担任州长，这使得局势更为恶化。

圣保罗州西部（最富饶的地区）的圣保罗人觉得，他们在政府中没有公平的代表额，因此开始把联邦视为唯一恰当的政治组织形式。生活在其他州的许多人也同意这一意见。比如说，巴拉那人对中央政府也表示不满，在南里奥格兰德和伯南布哥，对中央集权制的批评很普遍。1878年10月举行的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伯南布哥的甘蔗种植园主尖刻地抱怨政府发行银行曾于19世纪70年代向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圣埃斯皮里图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些中南部各州贷款2.5万康多。他们说，所有的好处都落到这些州里。他们当中一人说道，“一方面是得到政府保护、享有信贷优[773]惠的那些州的种植园主享有安逸生活，显示亚细亚的豪华富贵……，一方面是北方的种植园主（除了很少例外）却不得不过着仅足糊口的生活”。[19]出于不同的理由，人们到处都日益意识到，

[19] 累西腓农业劳工代表大会。1878年10月。伯南布哥农业辅助学会。1878—1978年第一个百年纪念，影印版（1978年，累西腓，伯南布哥国家农业计划基金会），第17,92,114,139,147,183页。

中央集权制是循私偏袒的根源，是发展和进步的障碍。联邦制成为所有感受到政府约束并对那些依仗政治恩惠和庇护并依仗垄断参议院和国务委员会职务的手段而长久把持权力的政治寡头集团深痛恶绝的人们的旗帜。1885年，由39名自由党议员签署一项提议，建议由选举人决定是否应修改宪法以使巴西实行联邦制。提出的这一修正案从未成为法律，只是共和国宣告成立才采纳了联邦制。

联邦制成为共和党人反对君主制运动中的主要目标之一。从保守党1885年掌权之时起，共和党就加紧他们的运动，试图扩大其基础并确立新的战略。1888年5月在圣保罗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任命金蒂诺·博卡尤瓦为党的全国领袖，革命的战略遭到了批判，“渐进化的”战略正式获得批准。此事件引起了党内的危机，康尔瓦·雅尔丁在5月28日发表宣言，猛烈攻击温和派。但是他的抗议没有什么效果。最终，温和的一派占了上风。然而，一年之后，君主制度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

到了1887年，共和党的领导层开始考虑要求军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圣保罗共和党党员兰赫尔·佩斯塔纳向党的常务委员会建议，共和党跟军方一道发动政变。当他出席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他继续表达了这一观点，而且不顾常务委员会的反对，同军方某些个人进行接触，包括塞纳·马杜雷拉、塞尔泽德洛·科雷亚和佩洛塔斯子爵。这一策略得到圣保罗共和党另一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的赞同。格利塞里奥1888年3月致函博卡尤瓦，坚持认为他应同军方联系。里约热内卢共和党一领导人阿梅里科·维尔内克也争辩说，共和革命只有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才能获胜。与此同时，南里奥格兰德共和党最高指挥部出面支持军事解决方案。 774

共和党人一旦一致认识到取得军方支持的重要性，就开始从几个方面讨好军方。共和党领导人接触一些对他们同情的军官，共和党报刊以大量篇幅报导陆军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从不错过机

会使军方反对君主政体，同时使军方确信共和党是支持他们的。

共和党人发现在军人中颇受欢迎，因为军人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军官们越来越同君主制疏远，这是同他们的参政活动日益减少相一致的。在第一帝国统治的9年期间（1822—1831），12名军人在参议院有议席，5名军人在国务委员会任职。唐·佩德罗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分别任命4名军官和2名军官员担任参议员，但是在他统治的以后30年间，他仅任命了2名。军人在国务委员会的代表额也减少了。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国务委员会中没有军人代表。军人在内阁和议会的代表额也减少了。更重要的是，1881—1889年间，只有文职人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在科特日皮的保守党内阁期间（1885—1888），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发生过若干次矛盾，自由党和共和党都尽力加剧这一矛盾，力图破坏保守党的声望。由于政客和报界向军方献殷勤，军方对自身的重要地位更加感到飘飘然。1886年，当科特日皮处罚两名军官（库尼亚尔·马托斯和塞纳·马杜雷拉）时，他们不顾政府的禁令，利用报刊为自己进行辩护，反对政府官员的指控。对这一事件的反响很强烈，许多军官表示要与他们的同行休戚与共。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不服从国防部长的命令，拒不惩罚他麾下的塞纳·马杜雷拉。丰塞卡辞去在南里奥格兰德的职位，迁往里约热内卢，他在那里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参议院，南里奥格兰德的佩洛塔斯子爵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客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有威望的军官，他警告政府有军事起义的燃眉之急。然而，政府对不服从的军官继续实行惩戒政策，从而在军人中激起更大不满。1887年建立的军人俱乐部，成为不满的军官聚会之地。军人对政治制度越来越感到失望。后来成为新共和国总统的弗洛里亚诺·佩绍托表达了这种失望情绪。1887年7月他在给内瓦将军的信上评论道，"我国正处在道德败坏的严重状况，需要军人独裁来加以净化"。[20]

775

[20] J·F·奥利韦拉·维亚纳：《帝国的灭亡》（圣保罗，1925）第137页。

同军人的矛盾促成了科特日皮的垮台，科特日皮在1888年3月由另一名保守党人若昂·阿尔弗雷多所取代。新内阁于5月废除了奴隶制，但持续时间并不长。而且，正是在军事动乱和共和党鼓动的气氛下，自由党人欧鲁普雷图子爵于1889年6月奉命组阁。欧鲁普雷图告诉皇帝说，对付共和党宣传的唯一办法，是证明君主制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并贯彻他们的诺言。新任部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制定了一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但是他6月11日在国会会议上提出的纲领，是自由党20年前提出的纲领略加修改的版本。欧鲁普雷图提议规定参议员任期的期限，将国务委员会降格为一个行政性机构，市政当局由选举产生，从选举人挑选的名单中任命州长和副州长，以及实行普选。他还建议，人人享有信仰自由，而且他提议应改革教育制度，以便对私人积极性给予更多自由。有关经济问题，他建议减少出口税，制定便于获取土地的立法，发展快速运输工具，分期偿付外债，实现联邦预算平衡，和建立信贷机构以发行纸币。但是，他的建议不包括有关采取联邦制的任何规定，联邦制曾经是批评君主制的人们的关键性要求之一。

当总理向议会提交他的建议时，里约热内卢的一名议员佩德罗·路易斯·苏亚雷斯·德·索萨无法压抑确实表达了大部分与会者心情的感叹："这是共和国的开端"。欧鲁普雷图回答说，"不是，这是共和国的失败"。他错了，几个月之后，君主制被推翻了。 776

欧鲁普雷图的纲领未能满足激进分子，并激怒了保守党人。保守党人提出不信任动议，以79票对20票获得通过。几天之后，6月17日，议会被解散，政府要求举行选举。局势变得日益紧张。欧鲁普雷图采取了一些措施触犯了一些重要的军方人物。西尔韦拉·马丁斯被任命为南里奥格兰德州长一事使得一向与马丁斯有个人矛盾的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感到不满。任命库尼亚·马托斯在马拉格罗索任职，也激起了不满。10月下旬，有越来越多的谣传，说政府可能将不顺从的驻军遣散或流放到巴西的偏僻

地区。

共和党人乘机利用军人队伍中的愤怒情绪。11月11日，即在议会预定开会的前几天，鲁伊·巴尔博扎、本雅明·康斯坦特、阿里斯蒂德斯·洛博、博卡尤瓦、格利塞里奥和索隆上校会晤了丰塞卡元帅，想说服他采取主动推翻君主制。这位老人仍然犹豫不决。他一贯效忠于皇帝，尽管他对内阁很恼火，但他看来不愿意支持一场会导致君主制垮台的军事政变。但是，11月15日当他离家去迫使欧鲁普雷图辞职时，他碰到的是一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的顽固部长。这一僵局未持续很长时间。几小时后，一伙共和党人令人吃惊地向全国宣告君主制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建立。王室家族被流放。没有人起来保卫君主制。

共和国宣告成立是三个集团协调一致行动的结果。那三个集团是：军方集团（充其量代表1/5的军人），圣保罗西部的种植园主，和城市中等阶层。君主制的威信日益下降，这就间接地帮助了它们达到这个目标。虽然“革命者”因怀有共同的共和理想而暂时团结起来，但在最初试图组织新政权期间，他们中间的深刻分歧就表面化了。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潜伏的矛盾爆发成为促成新政权不稳定的冲突。

777

结　　论

1889年并不是巴西历史上重要突变的标志。巴西仍一如既往地继续依赖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和依赖外国投资。权力继续掌握在种植园主和商人及其盟友手中。实行普选并未使选举人有大幅度增加，因为规定识字条件剥夺了大多数巴西居民的投票权。政治恩惠制仍原封不动，寡头集团继续控制国家而排斥了广大群众。普选，联邦制的采取，参议员终身制的废除，国务委员会和节制权的取消，政教分离——改革者为之而战的所有这些目标——毕竟未产生他们所期望产生的奇迹般的影响。共和国的主要成就，是使咖啡种植园主及其庇护者这个新寡头集团上台掌

权，他们只促进满足他们自身需要所必需的体制变革。对所有曾经希望共和国将代表与昔日决裂的其他社会集团来说，11月15日是一个“被愚弄的日子”。

第 21 章

巴西第一共和国的社会与政治结构（1889—1930年）*

人口与社会变革

在1889年巴西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巴西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几乎荒无人烟或人口稀少。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这几代人的人口状况虽然还是如此，但人口数量仍有相当大幅度增长。1890—1920年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1430万增至2,700万。这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的进程，加上大批欧洲移民移往中南部。然而，年龄结构显示出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特色：基础很广阔，然后激剧变窄，形成狭窄的高峰，结果是出生率高，再加上一般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很高。1890年和1920年，20岁以下的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1%和56%。1890年，40至50岁这一年龄组几乎三倍于60岁以上者，1920年则达三倍多。在那些年，60岁以上的，在1890和1920年分别占4.7%和4%。有关1920—1940年间的估计数表明，平均估计寿命仅为36至37岁；1900至1920年，甚至还要低。①

在人口增长和社会阶层的形成中移民起过重要作用的中南部地区，圣保罗就是吸收了大多数移民的州：1888—1890年进入该

---

* 本章由戴维·布鲁克肖译自葡萄牙文，译文经编者修订。

① 阿尼巴尔·维拉诺瓦·维莱拉和威尔逊·苏济甘著《巴西政府政策和经济增长（1889—1945年）》（里约热内卢，1975），第256页

国的304,054名移民中，圣保罗州吸收了51.9%；1891—1900年进入该国的1,129,315名移民中，该州吸收了64.9%；1901至1920年进入该国的1469095名移民中，该州吸收了58.3%。向圣保罗州移民是巴西政府制定计划的结果。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对咖啡部门提供劳工，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之前和之后不久的几十年，咖啡部门是推进经济增长的中心。在分成制试验失败之后，咖啡业资产阶级设想出一套建立在垦殖制基础上的生产体制。土地所有者往往同垦殖农家庭签订合同，支付垦殖农一笔年薪以照料土地所有者的咖啡种植园。收割时则另行支付，这可以适用于地产上任何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地区。因此，一户由垦殖农家庭照料的咖啡种植园同种植园咖啡的收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除此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零活，通常是有关房屋和交通工具的保养维修的，按日工支付，款额有限得很。给垦殖农提供住房和小块土地，以便他们种植维持生计的作物，他们可以将多余的作物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偶而也许可垦殖农在容易出现霜冻、因而不适宜于种植咖啡的深河谷保有一、两头牛。垦殖制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同非资本主义的地租制相结合。在新的咖啡种植园习以为常的那类契约性协议中，这尤其是如此。事实上，移民喜欢那一类契约性协议。垦殖农及其家属往往种植咖啡并照管种植园为期4至6年，因为咖啡园林通常在第4年开始生产少量咖啡。垦殖农几乎得不到货币报酬，但他们却能够在新的咖啡丛林株距之间致力于生产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豆类。他们通常还有权享有第一批咖啡收成。生产粮食作物不仅仅是供家庭消费，也是为了在当地出售，有迹象表明，后者的确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780

有关圣保罗农村的社会地位变迁问题仍有争议。对1871—1914年这段时期的一项研究认为，垦殖农发展成为小土地所有者或中等规模地产所有者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要获取土地就需要影响力，尽管土地价格不高，未来的土地购买者为了使得土地成为有利可图就需要筹措比较难以获得的资金。根据该项研究，1905

781 年农村土地所有者中最多只有6%是意大利人。[2] 对1886—1934年这段较长时间的另一项研究则得出另一种结论，虽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移民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和压力。根据这一研究，相当大部分在农村定居的移民工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几年工夫终于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小土地所有者阶层，在圣保罗西部（该州最富有生机的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一进程本来基本上是由垦殖制造成的，垦殖制使得垦殖农可以存钱，而且甚至鼓励一些土地所有者卖掉他们的部分地产，以便在他处进行新的投资。这一现象是否经常发生，是还可以争辩的，但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1923年圣保罗州农业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涉及生产咖啡的市政区，这一调查表明，所统计的37.6%的农村地产属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他们加起来占1886—1923年抵达圣保罗的移民的总数的87%。上述三国的当地居民拥有被调查的咖啡园林总数的24.2%。每个地产平均有15700棵多产的咖啡树。[3] 很清楚，这些是小的土地所有者，因为圣保罗一半以上的地产拥有10万棵以上的咖啡树，有些地产拥有100万棵以上的咖啡树。

这就必然引起下述问题，即圣保罗农业商业资产阶级为什么宁可要移民工人，特别是意大利工人，而不要其它的劳工来源。应当记住，就前奴隶而言，劳资关系在奴隶制的最后年代已经恶化了。奴隶越来越经常逃跑或反叛，当最终要考虑到如何将奴隶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劳动者时，这就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随着移民工人抵达咖啡种植园和奴隶人口问题的增多，土地所有者日益深信移民工人具有优越的素质。奴隶制废除后，仍留在圣保罗农

---

② 迈克尔·M·霍尔：《1871—1914年巴西大规模移民的原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69）。

③ 托马斯H·霍洛韦著《大陆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和社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0）

村的黑人居民一般说走下述两条道路中的一条：要么在从事自给农业的偏僻地区定居。要么在咖啡种植园被贬低到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最卑贱的劳动方式。至于那些贫困的自由农村劳工，他们已经主要从事自给农业，因而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鉴于还存在着其它劳动方式，整治这部分居民以适应种植园的劳动条件，是土地所有者希望加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最后，许多因素说明为什么移民工人，特别是意大利移民工人要比从其它各州招来的巴西劳工受欢迎：土地所有者对当地巴西劳动力抱有偏见，在意大利存在着准备提供适当数量的廉价劳工的强大利益集团，相对低的国际运输成本（比巴西国内区际运输成本低），以及大的利益集团反对劳工在国内移民。还应当予以强调的是，尽管特别是在东北部有宽裕的劳工，但当时还不足以满足圣保罗咖啡种植者的需要，因为后者希望加速供应大规模劳工。此外，1880—1912年间北部的橡胶繁荣局面吸收了东北部许多过剩劳工。

782

移民层次的差异取决于国际条件、原居住国的条件，特别是巴西咖啡经济的状况。1890—1900年的10年，都是移民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最多的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90年代中期的旷日持久的意大利经济危机，促进了特别是意大利北部的人们移居国外。尽管阿根廷和美国经历了1890年后的一段经济衰退时期，巴西由于咖啡生产却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当时，巴西迫切需要取代它的奴隶劳动力和普遍增加它的劳动力。巴西政府制定的协助迁移的计划在极大程度上吸引了移民。1890—1900年间进入圣保罗州的移民有80%就是以这种方式支付其交通费用的。在另一方面，在那10年的最后几年，这一趋势又经历了倒退。巴西进入了咖啡经济部门生产过剩和危机时期。1902年巴西政府着手制定旨在限制在圣保罗建立新的咖啡种植园的政策。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为了对意大利公民对圣保罗种植园生活条件不断提出的控诉作出反应，通过普里内蒂法令，禁止进一步资助去巴西的移民。1903和1904年，进入圣保罗州的净移民数出现了逆差。当巴

西经济有了恢复，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年代达到顶峰时，再一次恢复吸收移民。1913年，116,640名外国人进入巴西全国，这一数字相当于1890—1900这10年的最佳年份。可是，大战中断了移民的流入，1918年仅进人10,772名新移民。当20世纪20年代移民再次增加时，就不再与咖啡经济的波动有联系了。直接移民到大城市，很快地成为常规。在圣保罗的农村地区以及巴西南部，到那时已为致力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小农提供大得多的可能性。

在从1884至1933年整个这段时期，意大利人（140万）、葡萄牙人（110万）和西班牙人（57.7万）成为三大移民集团。如上所述，意大利人主要流向圣保罗州，在较小程度上流向南方的垦殖区。1884—1903年间，意大利人是进入巴西的人数最多的外国移民集团。从1903年起，到达的意大利人数大大减少了，在随后的几十年，人数降为第三位。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葡萄牙移民最为稳定，在1904—1913年这10年期间以及在随后时期都居于首位。葡萄牙人一般在城市定居。他们在城市的商业和服务部门担任职务。1920年，在巴西的葡萄牙人总人数中有39.8%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他们成为里约热内卢人数最多的外国人。葡萄牙人在桑托斯港也占优势，与他们在圣保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西班牙人则大体均匀地散居于整个圣保罗州。在桑托斯港，西班牙人仅次于葡萄牙人，成为第二个人数最多的外国人集团。

在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后，移民人数依次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德国移民在南部尤为意义重大，他们移民最初是同建立小农场有关。德国人不象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容易被同化，迟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社团。这后来成为瓦加斯政府所为之担忧的根源的一个因素。至于日本人，他们是根据圣保罗州与日本移民公司签订的一项协议于1908年开始抵达巴西的。日本移民公司对移民提供旅费资助和津贴。最初，日本人是作为农业工人引进来的，但从1912

年起，圣保罗州政府开始给他们提供土地。直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移民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1924—1933年这个时期，日本人成为第 2 个人数最多的移民浪潮，总计约11万人。日本人主要在圣保罗州定居，他们在圣保罗成为从事粮食生产的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

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吸引的移民不多，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不大(除了橡胶繁荣外)，也不缺乏劳工。奴隶制的终止在极大程度上使现状有所巩固。在甘蔗种植园地带，雇佣劳动问题是通过采取殖民时期的一种做法得到解决的，这一做法涉及依附于大地产主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建制。工人们被安置在小块土地上耕种维持生计的作物，根据需要随时被召唤来在甘蔗种植园劳动。劳工通常得不到报酬，或者仅获得极其低的报酬。小土地所有者和牲畜饲养者之间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尽管在东北部，特别是在蔗糖部门，还存在着独立的中等规模的地产，但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制度起到了阻碍自由劳工市场形成和小农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最南部，位于南里奥格兰德西南部的大庄园的畜牧饲养业只需要人数不多的劳动力，而且不曾吸引移民。大庄园的牲畜饲养业生产牛肉干，而牛肉干的主要消费者是中南部和东北部城市中心的低收人集团。但是，大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圣保罗州其他地区定居，他们由于有可能购买土地而被吸引过去。在高原地区，他们按照自给农业和商品农业相结合的制度开发小麦和稻米的栽培，他们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在圣保罗州找到市场。因此，南里奥格兰德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发展了一种适应国内市场需要的经济，而且因为它产生了独立的中等规模地产主的重要核心。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大批欧洲移民涌入巴西中南部的同时，在巴西东北部和北部还有重要的国内移民活动。然而，这一移民活动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与亚马孙地区割胶业有关的部门的发展吸引了来自东北地区的移民。19世纪70至80年代期间毁坏了东北部的这个干旱时期对 785

当地居民的迁移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一项粗略的估计，1890—1900年间大约有16万人被吸引到亚马孙地区。在1872—1920年这个时期，最靠近亚马孙地区的东北部的塞阿拉州出现了向外移民的情况。尽管如此，1912年左右，巴西橡胶生产因面临亚洲英属和荷属殖民地比较生产的竞争而崩溃了，而这对国内移民迅速产生了影响。橡胶"繁荣"促进一些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城市某些集团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然而，工人的迁移并未对该地区产生任何重要的社会变革。分散在雨林地区的劳动力受到极端的剥削，陷入各种形式的债务束缚，从而阻止了社会的变革。

在19世纪晚期，以至在1920年之前，向中南部移民以及在中南部范围内的国内移民确实是有限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共和国首都（联邦区）是移民的重要集中点。值得注意的是，从1890年起，米纳斯吉拉斯的移民流动一直呈现逆差，相当多一部分居民流向圣保罗农业地带和里约热内卢。奴隶制废除后不久的年代，黑人居民的"自发"迁移是一个引起一定争议的问题。看来废奴可能造成相当数量的前奴隶从圣保罗州回到在国内奴隶买卖年代他们曾被出售的东北地区。移民到圣保罗州首府这一事实并不特别重要。在另一方面，联邦区似乎接受了大批脱离里约热内卢州内地当时显然衰落的咖啡种植园的前奴隶，1890—1900年间，进入共和国首都的巴西血统的国内净移民总数达85547人，而同一时期在里约热内卢州的移民流动数则呈现了84280人的逆差。

786 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曾限制中南部在其经济扩展时期进行国内移民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从米纳斯吉拉斯和东北部进入圣保罗州的移民越来越多。1928年，国内移民人数超过国外来的移民。从1934年起，一直是这种情况。尽管20世纪30年代移民率仍相当可观，但移民活动的特点肯定发生变化，巴西血统的本国移民在对中南部农村地区和当时处于发展阶段的工业提供劳工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一趋势在国际范围内因为1929年世界危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因采取将劳动力本国化和规定外国移民入境限

额制而得到了增强。

不论是许多外国移民直接定居在城市，或是后来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从农村移居城市的国内移民活动，这种移民浪潮的动力一方面是，对圣保罗农村劳动条件的不满，(在咖啡部门发生危机的时期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是城市里提供在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1890至1900年间（即外国人流入量最大的10年），圣保罗州外国移民的年增长率为14%，圣保罗州的人口从64934增加到239,820，这不是巧合。圣保罗成为一座“意大利城”，到1893年，圣保罗的外国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4.6%。外国人尽管在国家行政部门和自由职业中的人数不多，但占制造业全部劳动力的79%和商业部门全部劳动力的71.6%。在联邦首都里约热内卢，外国移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1890年，外国移民已经占到工业劳动力的39%和商业劳动力的51%。

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1920年，69.7%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3.8%从事工业生产，16.5%从事服务业。同年，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74个。城市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约450万）的16.6%。按地区划分，1920年城市人口占地区人口的百分比如下：北部，15.6%；东北部，10.1%；东部，14.5%；圣保罗州，29.2%；南部，14.6%；中西部，2.8%。在另一方面，1890至1920年间最大城市（州首府）的人口一直在增长。1890至1900年这10年期间，圣保罗（开始了它的引人注目的增长）和贝伦（橡胶出口中心）两市的年增长率为6.8%，州首府的总增长率达4.3%。1900－1920年间，州首府的年增长率下降到2.7%，虽然圣保罗州继续在迅速地增长（尽管保持4.5%这一较低的增长率）以及象阿莱格雷港（南里奥格兰德）等其他城市的重要性也增长了。 787

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网络一直处于走向集中的过程中。从绝对意义上说，都市化现象加强了，但大城市的扩展要比中、小城市中心快得多。在1920－1940年这个时期，这一趋势变得更为

尖锐了。然而，1920年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巴西仅有两个，即联邦区（人口115万）和圣保罗（57万）。

政治与社会结构

19世纪前半叶巴西帝国的建立和巩固，是高级官僚（特别是地方行政长官）、部分农村土地所有者阶级（主要是在里约热内卢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和急于遏制城市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大城市商人之间联盟的产物。在有关集权化和实行州自治的斗争（这是帝国最初几十年的特点）中，要求加强政治和行政管理集权化的，明显获胜。按照葡萄牙专制主义传统接受教育的官僚们，在里约热内卢咖啡大庄园主的支持下，是集权化主张的主要理论家和执行者。

反对中央集权化君主制的势力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在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中崭露头角的各社会阶级，特别是圣保罗的咖啡资产阶级，开始赞成联邦共和国，主张实行足以使他们能够征税、制定他们自己的移民计划、建立他们自己的军队和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的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使圣保罗共和党内君主制反对派联合起来的，是争取建立联邦结构实行政治与行政分权化的斗争，与有时人们所认为的不一样，它并不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在共和国获胜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对共和国的形成负有责任的那些地区的阶级利益集团获胜之后，中央政府失掉了相当大的权力，失去了他们选举的省长，而各省（现称州），权力则相应增强。

788

当各州的统治阶级变得更有发言权以及当同经济部门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如司法部门）开始在国家机器中失去影响时，统治阶级同政治及行政部门的精英之间就在较大程度上趋于一致。政治和行政部门的精英变得更加依恋他们自己的地区，随着他们的地盘的缩小，他们变得更加有代表性。从统治阶级方面说，他们的利益完全置于州的政治结构内部，正如在原来被认为是州组

织的政党的党纲（在整个第一共和国也一直保持其基本特点）中所明确表明了的。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联邦共和党或保守共和党，从未成为什么气候，只不过是试图组织各州寡头集团联盟的一时的尝试。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州一级反对派民主政党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民主党的尝试也并非例外情况。

无疑，强调政治地区化和分权化是有利于那些明确划分的利益集团的。新的体制结构创造了使得圣保罗资产阶级能够增强实力并巩固其在州和国家的地位的条件。同时，地区主义包含了自己灭亡的种子，因为整个州或者各统治阶级都不能够使他们作为民族总的利益的代表得到合法化。

简而言之，巴西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通常被说成是以三种权力核心为依据的。在金字塔的底部，是地方当权者，即所谓“校官派”*，他们控制了一定地区的农村居民。在金字塔的中间一层，是州寡头集团，这些集团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是由“校官派联盟”所组成，从体制上说其职能不同于个别分散的校官派。在权力结构的塔尖是联邦政府。它是最重要的一些州的寡头集团之间联盟的产物，因此也是“寡头集团的联盟”的体现。整个制度的特点是，人民大众政治参与程度很低。此外，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关系是按照主从关系所包含的等级制度纵向表达的，而不是作为对立的阶级利益集团横向表达的。对各州寡头集团在使政府行政机关顺利运转方面所起的战略作用，给予了很大关注。校官派虽然基本上提供了选票，但他们依靠政府中的各州寡头集团的影响力来获取一系列恩惠，包括工作和投资，而这些东西又是他们对当地居民施展权力的根据。在另一方面，各州寡头集团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被解释成为一种平等的关系，而将重 789

* coronéis，源于葡语“coronel”（上校）一词，后者在巴西实际上总指地方头头或豪绅。这里按字面译出。——译者

点主要放在很低程度的国家一级体制化上。州一级的政治机器决定了共和国总统的人选。反过来，联邦政府竭尽全力以不鼓励出现政治异议的办法来确保州一级的主要派别的至高无上地位。

无疑，上述情况有相当大程度的真实性。但鉴于这种情况很一般化，必然不能充分考虑到这一政治制度的所有特点。校官派和校官派控制之下的居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校官派、州寡头集团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不同地区而有很大差异。巴西的社会一经济特征绝非是同一的。在一个极端，是圣保罗州；在另一极端，是北部和东北部各州，更不必提人烟稀少的广大地区了。前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北部和东北部各州，所经历的增长程度要低得多，要么实际停滞不前，要么甚至在衰退之中，而圣保罗正进入以高强度移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家长或统治加上暴力，尤其是对农村居民，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存在于全国。但对这两种统治工具的使用，在方式、频繁程度以及强度上有所不同。

在整个第一共和国，社会与政治生活是受主从关系的支配，甚至在诸如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一些大城市中心也是如此。不过，这种主从关系在农村地区尤为强大，因为，正是在农村地区，某些典型的条件确保那种以社会等级另一端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的恩惠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维持。极少数人控制了生产资源；那里几乎完全没有公共或私人的社会福利；普遍存在的求生存的不安全状况使得被统治阶级无法遵循任何其他方针，而只能个别地寻求最强有力的人士的保护。采取以土地、财政资助或就业等形式为保护手段，用以换取保证效忠，这一效忠保证（根据个别情况而定）意味着准备好从物质上保卫校官派，或者是在投票箱上服从他们的愿望。

790

校官派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权力手段，是众所周知的亲缘制（Parentela）的家庭结构，这在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亲缘制包括大家庭，其中包括直系和旁系姻亲，以及通过礼仪典礼或收

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如教父母。不过，并非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包括在亲缘制的范围之内，因为亲缘制是鉴于对族长的效忠。[④] 基于这一理由，通过血统或婚姻而彼此相连的某些个人不是亲缘制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有亲戚关系。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家庭规范在涉及选择亲缘制的新头目时，不一定起作用。可以忽视族长的直系后裔而赞同旁系亲属或姻亲。

共和国从体制上加强了校官派的权力，因为实行分权化给予市（municipios）以更大的权力，市是各州最小的政治和行政单位。市政当局不仅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名义自治，而且对税收也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1868—1869年，帝国政府获得所有税收的80.8%，州获得16.7%，市政当局获得2.5%；1910年，中央政府获得59.9%，各州获得21.5%，市政当局获得18.6%，对这两个年份的情况作一比较，可以充分揭示问题了。除此而外，载入1891年宪法的普选权的扩大增强了校官派的力量，因为他们在地方一级获得较大的讨价还价的权力。[⑤] 不过，与此同时，各州权力的加强大大限制了校官派的行动，或者说至少为校官派和州寡头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焦点。

791

在这一点上，作出一些区分是很重要的。在北部和东北部各州，有两大政治模式。在有些情况下，强有力的家族寡头集团往往会接管政治机构，从而最小限度地缩小地方校官派和州寡头集团的界限。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代表城市利益的集团（包括许多职业政客或与出口贸易有联系的农村地区）掌了权。不过，他们的地位很脆弱，所谓的“内陆校官派”仍保有相当大程度的自治。在圣弗朗西斯科河的西岸的整个广大地区都有这种情况，在那里，完整的“校官派之国”繁荣兴旺。他们在自己的私人军队的

④ 见琳达·卢因著《关于巴西东北部亲缘组织对家族基础政治的某些历史推断》，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21/2（1979年4月号）。

⑤ 约瑟夫·L·洛夫著《巴西的政治参与，1881—1969年》，载《葡萄牙—巴西评论》7/2（1970），第7页。

支持下，成为他们势力范围内的实际军阀。而且，在象巴伊亚、戈亚斯、伯南布哥、波奥伊、马拉尼翁这样一些州发展内部贸易，鼓励了跨越州界的校官派建立联盟。通常的规律是，校官派宁可在他们地区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自治，而并不反对州首府和沿海地区获得较大比例的州税收。此外，他们对企图使他们纳人党派和其他组织中去的尝试（这可能有助于消除家族纷争和盗匪活动），则表示反对。

这些州并未形成以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奥格兰德为中心的强大的星座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州，联邦政府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仲裁性的。在仲裁中，联邦政府有时支持地方政治寡头集团，有时同校官派直接磋商。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巴伊亚州，巴伊亚州的特点是内陆的校官派享有自治，而寡头集团的政党及政治机构软弱无力。在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担任总统期间（1910—1914），联邦政府的军事支持对1912年的州长选举中是决定性的。这次选举使政治家J·J·塞亚布拉掌权，对他的支持来自该州首府萨尔瓦多的城区。塞亚布拉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成功地控制了校官派的权力达数年之久。若干年之后，在1920年后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内陆的校官派起事反抗州政府，在几次冲突中击败了州政府的军队，并扬言要拿下萨尔瓦多本身。共和国总统通过巴伊亚军队司令对这一争端进行仲裁。仲裁显示了校官派的力量。校官派中最著名的人物奥拉西奥·德·马托斯除了占有他掌握的12个市外，还获得保有其部队与军需品的权利。由他任命的当局获得联邦政府的承认。在20世纪20年代，在巴伊亚，州长充任校官派和共和国总统之间的中间人这一传统模式永远地结束了。共和国总统成为地方和地区政治活动的仲裁人。内陆的校官派通过州政府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自治，在巴伊亚一个州中分裂成为若干个州。这样一种联邦主义其结果与1891年宪法中所规定的模式相去甚远。

792

相反，在较发达的一些州，校官派缺乏自治权，而且同诸如

主要政党和州的政治机构这些更广泛的结构有关联。在整个主从关系网络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因素是州政府，因为州政府分配土地、贷款和公职。存在差异并非不重要。从表面上看，州只不过是等级最高的“校官”。州支持一种类似在东北地区的那种统治制度。然而，事实是，整个社会和州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州日益开始表达阶级的利益，而不单单是集团的利益，并通过社会建立某种自治领域。这一进程的最佳事例是在圣保罗，在那里，形成了划一的统治阶级，社会分化更为激烈，校官派的地方权力首先在边疆地区还继续存在，但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服从于州政府，因为州政府控制了校官派所赖以维持政权的大部分资金。同时，州政府还支配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当发生武装冲突时，这就实际上确保了它的优势。此外，圣保罗共和党的组组纪律性很强而且很有内聚力。很清楚，该党不单单是亲属和主从关系的复杂网络，尽管这些方面是很重要的。据认为，圣保罗共和党代表着介于以纵向“主从”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和以“横向”方式组织起来的现代政党之间的中间阶级。[6] 无疑，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仍然是主从性的。但是，鉴于州起着阶级利益执行者的作用，因此不时采取一些旨在削弱敏感地区地方权力的步骤。比如说，1906年圣保罗州州长若热·蒂比里萨不仅将特别权力授予州的民兵，而且建立专职文职警察。虽然警察事实上具有怎样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但这样做代表着试图要改变警察作为大土地所有者附属物这一传统地位的尝试。同样地，1921年圣保罗州州长华盛顿·路易斯推动司法部门的专业化，司法部门就变得不那么依靠地方权力了。制定了一些措施，首先是规定了入学考试，使晋升变得系统化，并提高了薪金。

793

⑥ 约瑟夫L·洛夫著《1889—1937年巴西联邦中的圣保罗》(斯坦福特，1980,)第115页。

⑦ 约翰D·沃思著《1889—1937年巴西联邦中的米纳斯吉拉斯》(斯坦福特，1977)，第118页。

米纳斯吉拉斯的情况很奇特。从它的经济结构看，米纳斯吉拉斯同巴伊亚州有某些相似之处。⑦ 但是两个州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两个州政府机构的权力尤其不一样。在米纳斯吉拉斯，文官制成为赐恩施惠的有力工具，而恩惠是由党和州政府控制的。州政府能够提供贷款、恩惠、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的公共工程，尽管州政府对待不同地区是不平等的。在米纳斯吉拉斯，在那些最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诸如州的北部）有希望获得可能使它们纳入南方市场的已经改进的运输工具，而巴伊亚州内陆的校官派在1930年前在商业上却同首都相隔离。此外，从1897年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成立时起，校官派就在政治上服从于州长和州的政治机构。在老的共和国时期，"没有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就得不到拯救"已成为校官派的著名口号。在南里奥格兰德，"官僚校官"的形象清楚地显示了州政府和州的共和党握有更大权力。如果说"官僚校官"的地位来自于他在某一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那么，他还必须准备好接受上级的指示。市监察官（intendente）的职务（按道理说是校官派的职权范围）经常被州政府临时指派的人所占据。⑧

1891年宪法使联邦制定形，同时阐明了最强大州和最弱小州的界限。众议院是按照各州居民人数多少的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1890年为基数），这是与有些军人领袖要求所有的州享有平等代表权的意见相悖的。实行州自治有利于最大的单位，而且在有关税收分配和军事力量等重大事宜方面得到保障。各州从中央政府手中夺走了对某些税款的征收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征收出口税，该税是帝国时期第二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这对圣保罗颇为有利，圣保罗在财政上终于超过中央政府本身，各州有权与外国签订贷款合同，这就使圣保罗能够资助扩充其咖啡经济部门和改进其城市服务。出口收入低而且实际上无权对农村大地产课

794

⑧ 见约瑟夫L·洛夫：《南里奥格兰德和巴西地区主义，1882—1930年》（斯坦福特，1971）第79页。

税的一些较小的州，枉费心机地试图获得一部分由中央政府征课的进口税。个别州有权组织它们自己的军队。较大的州由于拥有财源，再一次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圣保罗州的民兵装备特别优良，它的现役民兵人数总是多于联邦军团在该州的驻军人数。1925和1926年，圣保罗州民兵人数竟多达1.4万，而且从1906年起就接受法国军事使团的训练。因此，较强大的州拥有财力和兵力来限制联邦政府进行干涉的压力。

选举共和国总统一事反映了最强大的一些州之间意见一致或不一致的程度。有人经常断言，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之间的所谓“咖啡加牛奶”联盟有效地控制了第一共和国。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如此。但是应当记住，联盟内部也有矛盾，特别是1910年之后，当第三个州南里奥格兰德州登上政治舞台时，破坏了它的平衡之时。最终，在接近20世纪20年代末时，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寡头集团之间发生破裂，从而引起了导致1930年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尽管如此，一般说，在老的共和国时期权力的确属于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这个轴心。在举行的11次总统竞选中，9名当选总统来自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其中6名来自圣保罗，3名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米纳斯吉拉斯州由于人口多，在众议院起着有影响的作用。米纳斯吉拉斯在众议院拥有37个席位，依次是圣保罗和巴伊亚，各占22个席位。米纳斯吉拉斯的经济虽然决不是无足轻重，但还不能与圣保罗的经济相匹敌。米纳斯吉拉斯生产的食品主要来源于畜牧业。此外，它也生产咖啡。由于经济领域里机会较少，促使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精英另图发展并在中央政府谋求职务。米纳斯吉拉斯寡头集团在1898—1930年间不仅在众议院有影响力，而且还是许多年来一直负责重要部门的集团。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圣保罗寡头集团对联邦政治的直接控制大约从1905年起已经衰落。但是，虽然这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但不能说，圣保罗利益集团不再在联邦一级居于优势地位了。鉴于联邦制的一些特点，圣保罗对联邦政治的控制只是在州一级无法

795

采取行动或采取行动不充分的领域里，即在有关汇兑规定和金融政策(这保证所签订的外国借款合同主要是为了保持咖啡的价值)的领域以及在有关移民法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税收分配事宜方面，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显然，各个地区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力量。但是，州内诸统治阶级和地区政党保持多大程度的凝聚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对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的政治结构作一简要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20年，这3个州占全国(不包括联邦区)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在圣保罗，圣保罗共和党由于早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进行了保卫共和国、尤其是保卫联邦制的长期斗争，咖啡业资产阶级对该党给予政治支持，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如此明确地表达其阶级利益。尽管圣保罗经济增长迅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化，但圣保罗共和党仍设法保持了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唯一政党的地位，直到1926年成立民主党为止。圣保罗州经济发展的基本核心是咖啡联合企业，因为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以及州的行政机构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咖啡联合企业。咖啡业资产阶级内部在主要生产商、银行家和检察长之间的内部分歧从未明确地表现出来。反过来，刚刚兴起的工业化并未产生一个彻底反对咖啡企业家的阶级。工业是作为出口经济部门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出口经济部门产生地区市场并促成了购买机器所必需的资本的流入。对咖啡联合体来说，工业投资往往是一个相似的选择，而且作出调整以适应咖啡经济的环境。这些情况促进了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合而为一，或至少合而为一个家族。只是1928年才在圣保罗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机构。即使当时，罗伯特·西蒙森(圣保罗工业化思想家当中第一个伟大的名字)对首创精神的有效性是毫不怀疑的。当时他同意这一观点，即巴西经济结构应当主要依靠对土地的耕耘。因此，圣保罗共和党本身能够代表圣保罗工业家们有限的次要的利益集团，这一点，比如说，从全国议会力争对

进口纺织品规定关税壁垒（1928年）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

在米纳斯吉拉斯，统治阶级的经济活动划分为咖啡、畜牧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地理上不同的小地区工业。内部政治争端相当严重，特别是在共和国的最初年代。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尽管经常有不同意见和派系斗争，但该党趋向逐渐恢复实力，而且提出了联邦政治一级的统一战线。米纳斯吉拉斯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出现一个相当规模的反对党，而在圣保罗，社会分化，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的发展，终于开辟了利益集团的横向联系和建立民主党的可能性。在米纳斯吉拉斯，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和米纳斯吉拉斯州通过赐恩施惠建立的密切联盟一直是表达阶级利益或个人借以在政治舞台上取得进展的最可靠（确实也是唯一的）方式。

相反，南里奥格兰德的地区统治阶级的团结总是成问题的。在这里，派系争端主要是通过对抗的政党而不是通过单一政党内的竞争来表现的。然而，如果断定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畜牧业、小麦生产等）和高乔人政治这一独特的特征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将是错误的。从共和国成立之初起，南里奥格兰德共和党在地区一级夺了权，尽管该党必须面对敌对政党的反对。1893年和1895年之间，该党参与了一场同联邦党的激烈内战，联邦党是帝国的老自由派和南里奥格兰德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所建立的。1923年，南里奥格兰德共和党和自由派联盟的各反对集团之间又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一政治分裂无疑促使南里奥格兰德在联邦一级的影响力削弱了。在南里奥格兰德，该党长时期以来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权力斗争中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竞争者。因此，在1929—1930年总统竞选期间和随后发生的致使热图利奥·瓦加斯上台的革命中，该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终于设法提出一个以“高乔联合阵线”为形式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巧合。 797

至于东北部各州，它们这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按道理说，无论在共和国总统的人选上，或在众议院的人选上，都可以给予它们

在联邦政治中以一定影响力。在众议院，巴伊亚拥有22个席位，伯南布哥拥有17个席位，成为一个相当有力量的集团。1896—1911年间，有一个时期，伯南布哥州通过该州领袖弗朗西斯科·罗萨—席尔瓦在联邦一级发挥一定影响。不过，他仅能设法偶而促使东北各州联合，例如在1906年，当时他试图阻止国会批准咖啡价格补贴计划，该计划曾经是由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3个州起草的。诚然，要在东北各州建立任何联合都受到严重阻挠，主要的理由是联邦制税收特点所引起问题。鉴于该地区资源稀少，许多寡头集团竞相获得联邦政府的恩惠，而且在寡头集团之间就在几个州流通的货物征课州际税的权利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在第一共和国期间，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是寡头政治制度未能充分地使武装部队，特别是陆军实现一体化。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陆军在全国政治决策中仍起过次要作用。帝国政府虽然吸收了军界人物，但基本上是文职性的，政治家们引以为自豪地指出巴西制度比其邻近共和国的制度的优势之处，因为邻近的共和国总是要受制于军人统治。在19世纪中期粉碎了最后一次州的叛乱后，陆军的作用大大地减弱了；陆军主要从事边疆和军垦殖区的防卫工作。国民警卫队的任务则是维持民间秩序，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初以前是如此。⑨ 国民警卫队在从地方土地所有者中招募来的军官的指挥下，实际上动员了所有的成年男性自由民。巴拉圭战争（1865—1870）之后，陆军逐渐认识到他们的潜力，同时也更加意识到他们的从属作用。在战争中，陆军战斗很艰苦，

798

---

⑬ 本章有关武装部队的探讨，系根据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所著《第一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不稳定的权力》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所著《军政府：普鲁登特—坎波斯·萨莱斯》，载鲍里斯·福斯特编《巴西文明通史》Ⅲ：《巴西共和国》第Ⅰ和Ⅱ卷）圣保罗1975—1977）

这同报刊对连续几届内阁的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弄虚作假的指控，也形成了鲜明对照。某些军官终于逐渐地认识到陆军是独立于社会阶级和帝国的一个公民"实体"。他们看到陆军是愿意作出物质牺牲并注定要夺取权力以使民族获得新生的体制，因为武装部队本身体现了爱国主义观念。除了这一总体看法外，许多军官埋怨军人所受到的种种歧视，而且公然表明他们反对政府的总政策。军官们大力强调教育、工业发展和废除奴隶制的重要性。

但是，军官们并不都是意见一致的一伙人。一方面，有些军官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普拉亚—韦尔梅利亚军事学院上过学的年轻军官，这一学院与其说是教军事科学，不如说是一所研究数学、哲学和文学的中心。这一伙人受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1872年本杰明·康斯坦特在该学院任教后，尤其如此。其实，军事学院负责训练一伙"身着制服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持有特别的世界观，并同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传统毕业生开始竞争起来。所谓"军人公民"的概念就是出自于这个军官界，正如他们对反对帝国、赞成现代化、反对奴隶制所作的批评一样。另一方面，还有"行伍出身的人"（tarimbeiros），他们是一批老军官，几乎都是巴拉圭战争的退伍兵。他们许多人不是军事学院毕业的。这伙人并不那么关注社会改革问题，而是深深意识到军界的荣誉。19世纪80年代，上述两部分人联合起来反对帝国政府。在军事问题上，"行伍出身的人"采取主动保卫军人以防"对其完整人格的侮辱"。然而，事实是军事学院毕业生准备发动1889年11月15日政变，并且将"行伍出身的人"拖进去，他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宣告成立共和国的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事实上不是共和党人。

799

尽管在形成时有这些分歧（这些分歧部分地也符合他们多种多样的社会出身），但还是可以确定军人内部某些共同特点。巴西历史学会经常解释说，军人是反对地主寡头集团的中等阶层代言人。不过，这一看法有点眼光短浅。许多陆军军官的确出身于广泛的中等阶层，但是在整个帝国的最后几十年和整个第一共和国

时期，陆军职业也为经济上处于衰落状况的寡头集团家族的子女提供了有限的但可行的选择机会，在北部和东北部尤其如此。除此而外，承认军人对之负有责任的社会化进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军人具有特殊价值观并比较独立于一般社会。同时，军官也是从后来成为军人家族的成份中招募来的，特别是在诸如南里奥格兰德这样一些州。有关巴西军官的地区背景，仅在有限的资料中有所披露。在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当议员的52名军官中，有24名来自东北部，9名来自南里奥格兰德和联邦区，只有1名来自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1895年，在30名师级和旅级司令官中，8名来自南里奥格兰德，而没有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的，1名来自圣保罗。1930年，有8名来自南里奥格兰德，没有来自米纳斯吉拉斯或圣保罗的。南里奥格兰德有相当规模的卫戍部队负责边疆的安全，因此南里奥格兰德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点很重要。军人领袖中几乎完全没有来自圣保罗或米纳斯吉拉斯的，这一点使军队和共和国政治上最强大的两个州之间的关系削弱了。

陆军军官鉴于其出身关系，在军队内部经常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地位”，而内部繁衍式的招募制度使这一地位得到增强。这种“地位”是不能轻易地加以变动的，有鉴于此，这一地位小心翼翼地受到保护。同时，许多军官出身于有文化的城市居民家庭，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同权力中心发生直接联系。鉴于他们有军人传800 统，以及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寡头集团有着家庭联系，因此他们对政界并不陌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未参与到文职寡头集团中去，就更不用说参与到主要的州的文职寡头集团中去了。军官们认为他们是民族的保护者，是严肃而进步的国家的创建人，不受法律学家（成为寡头集团政治参谋的那些毕业生）和文官（在货币市场上已积累了财富的暴发户）玩弄政治权术的影响。这个国家将会使人民——这一个范畴在民族概念中生来就是没有差别的——合为一体并会增强民族团结。这种理想迥然不同于诸如圣保罗那样的极其强大的寡头集团的实用主义思想。对这些寡头集

团来说，共和国代表着要保护特殊的经济利益集团，要保卫州的自治和加剧地区的不平等。

不能说陆军在寡头集团的共和国是一个持久的不稳定性因素。陆军是否愿意采取行动，取决于许多历史条件，而且最活跃的分子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过，最强大的州的寡头集团和军事机构之间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尽管由于建立了策略性和防御性联盟，这种不相容性有了缓和。归根结底，第一共和国的垮台部分归因于中层陆军军官长期的不满（实际上就是叛乱），最后归因于陆军部队最高司令部的干预。

第一共和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民众参与程度极低。1891年的共和国宪法正式扩大了政治代表制的基础。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所有识字的男性巴西人，取代了整个帝国时期所曾实行的以财产和收入作为依据的选举权。从帝国到共和国时期，选民范围的扩大带来了意义重大的结果。将1886年帝国最后一届国会选举同1898年所有州的投票者参加的第一届总统选举作一比较，表明投票者人数几乎增加了400％。1886年，在1,320万的总人口中有111,700人投票，占总人口的0.89％。1898年，有462,000人投票，占1710万的总人口中的2.7％。然而，选举权的扩大并未改变下述事实，即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投票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仍是极其低的。在1910、1922和1930年举行的三次共和国总统竞选中，投票人数分别占总人口的2.8％，1.9％和5.7％。投票是非强制性的，妇女没有投票权；然而，在1890年和1920年文盲分别占到总人口的85.2％和75.5％这样一个国家里，文盲却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10]

801

也许比选举参与程度低更为重要的，是选民对地方寡头集团的依附性。公开选举助长了选民的从属性，因此，城市反对派发

---

⑩ 洛夫：《巴西的政治参与》，第7页。

起运动力争在整个时期采用秘密投票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有必要破除某一派别的权力时，或者当正常的管理机制不再起作用时，总是可能采取欺骗手段的，比如说，将外国人或刚死去的人的选票包括进去，或者是伪造选票（在没有足够结构的国家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手法是轻而易举的），以及必要时诉诸武力。很明显，采取任何增加选民的措施，诸如赋予文盲以投票权等，往往改变不了这一局面。诚然，这样做可能会使情况更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在一个民众参与程度很低以及政治公民权几乎总是被作为以货币用来获得恩惠的不平等交换的国家里，联邦共和制虽然在理论上是建立在民主代议制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地区寡头集团的一个工具。

在广大居民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农村地区，农村居民根据与其定居和耕地条件有关的次要特权等级而出现了横向的分化。按垂直系统而言，分化甚至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有必要保持对大土地所有者及其家族的效忠关系。从政治观点而言，中、小规模的地产主出于不同原因也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他们大多是外国出生，比如说，已经在南里奥格兰德定居下来。他们不那么受制于校官派的统治，但在有关纳税义务、土地租让等问题上却更多地受制于州。除此而外，他们作为外国人或第一代巴西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同化程度不那么高；他们的基本目标主要涉及经济的进展。这一切说明南里奥格兰德的主要政党（共和党）为什么设法对外国血统的土地所有者占优势的地区比该州其余地方保持更大程度的控制。[11]

802

至于那些在圣保罗大咖啡种植园里劳动的工人，有许多情况阻碍了他们社会组织的活动。大批进入异乡的移民散居在偏僻的地产上，这就妨碍了有可能促使他们认识到其共同的处境，因而采取共同行动的那一类接触。土地所有者在其地产界限范围之

---

[11] 洛夫：《南里奥格兰德与巴西地区主义》，第134页。

内，拥有建立在家长制和强制性基础上的广泛权力。垦殖制度的某些特点又增强了这种家长制做法：提供住房和小块土地以种植粮食作物被视为庄主方面作出的一种让步，而不是对所提供劳务的报偿。当土地所有者在其地产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力时，或当他控制了诸如警察和地方法官这类国家机构并能够使其为他服务时，通常就采取强制手段。

然而，如果认为农村地区的统治制度在广大的种植园工人中间未产生任何反应的话，那就会错了。在圣保罗的一些地产上，土地所有者和垦殖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小规模移民的早期年代。个别争端，有关整个家庭放弃种植园的案件，以及向领事代表的投诉等，在那些年代是经常发生的。同时，还有扬言要发动罢工的迹象，在接近 4 月底和 5 月初的收割时期尤其是如此，那个时候土地所有者比较容易受到压力。不过，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个重要的罢工周期。这发生在1913年靠近城市中心的里贝朗普雷图地区，来自一些大地产的数千名垦殖者参加了罢工。

在巴西其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满是通过宗教型的运动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运动是卡努杜斯运动和抗议运动。卡努杜斯是巴伊亚州北部的一处被遗弃的地产。1893年安东尼奥·维森特·门德斯·马谢尔（通称安东尼奥顾问）及其追随者在那里定居。在内陆的深处，一座城市发展起来了，人口介于 2 至 3 万之间。卡努杜斯人民尽管力量悬殊，仍击败了被派遣前往镇压他们的若干军事远征队。最后，在1897年10月，在经过一场持续许多月的战斗后，卡努杜斯被摧毁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卡努杜斯的守卫者约5000人，他们要么在战场上身亡，要么被俘和被处决。

803

抗议运动发生在巴西南部巴拉那州和圣卡塔琳娜州有争议的边疆地区。1911年这一运动是在若泽·马里亚领导下开始的。马里亚在第一次交锋时身亡，被抗议运动的反叛者奉为圣人。抗议运动不同于卡努杜斯运动，它不局限于某一中心，而是在军队的压力下转移到该地区的各个地方。1915年晚期，这一叛乱被平息，当

时来自陆军和警察部队的6000名大兵在1000名参加平息叛乱的百姓的支持下，攻击并摧毁了叛军的据点。

在考虑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内地的主要社会运动时，若阿泽罗城也应值得一提。若阿泽罗是塞阿拉州南部的一座城市，1872—1924年成为西塞罗·罗芒·巴蒂斯塔教士开展活动的中心。若阿泽罗、卡努杜斯和抗议运动的事态发展有许多共同特点。比如说，从巴西、特别是巴西东北部天主教会变迁史的观点看（这一题目不是本章涉及的范围[12]），卡努杜斯和若阿泽罗表现出相似的事态发展。在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社会运动就是表现叛乱的话，那么若阿泽罗同其他两支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点。虽然西塞罗教士同教权当局不断发生冲突，而且不时地也同寡头集团的派别发生冲突，但若阿泽罗运动不论好歹都归类为第一共和国时期所盛行的那种统治制度。简言之，若阿泽罗城可以被视为一个由教士—校官控制的地区。他们在政治寡头集团内部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1909年之后当西塞罗教士开始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时。

卡努杜斯和抗议运动试图创建另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认为这两支运动有被军队残酷镇压的很大危险性。这并不是说这些运动是全然反对校官派的权力结构的。安东尼奥顾问在卡努杜斯定居之前曾是天主教会的一名实习成员，过着游方的苦行生活。他将人民召集在一起以便建立或重建教堂。安东尼奥在墓地周围盖起了墙，并对内地小教区的教堂表示关注。有迹象表明，在这一阶段，他颇受某些校官派的尊敬。安东尼奥的纪律严明的追随者为校官派修建道路和水坝。卡努杜斯村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脱离内地的传统定居模式。卡努杜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同周围地区有相当规模的贸易来往，同邻近教区的教士保持宗教上的联系。在选举时，卡努杜斯也是投票和影响力的一个

[12] 对这个时期巴西天主教会的探讨，见林奇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撰写的第12章。

来源。

抗议运动的鼓动者是一位校官派的追随者。这名校官是反对派的一员并被认为是穷人之友。其他各种出身的人参加了这一集团，他们当中有城乡地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受害者，即由于修建铁路和木材厂而被从其土地上撵走的农村劳动者，从大城市失业者当中招募来修建铁路而在合同期满时被遗弃的人，以及该地区仍消遥法外的犯罪分子。但是，在抗议运动期间发展起来的村庄定居点由于强调平等和友爱而同传统的价值观发生矛盾，而且具有明显的救世主运动的特点。除了其他一些特点外，这一特点可以从抗议运动许多成员如何仍效忠于君主制这一点看出来。有人争辩说，君主制代表末世王国而不是一种政治体制[13]。君主制——不论是因为它采取的形式还是因为抗议运动发生的时期——的主题，都未被政府加以任何程度的利用。相反，安东尼奥顾问的早期君主主义采取了更加具体的形式，它攻击共和国应对采用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仪式和使公墓摆脱教会的控制负责。因此，在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威胁时，反对卡努杜斯运动是城市中心的一个动员因素。

805

卡努杜斯、抗议运动和若阿泽罗运动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件，也不是与沿海文明中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愚昧无知的农村居民的个别表现。这些运动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同天主教会的变化，它们各自地区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民族本身的政治发展相联系的。它们作为显示民众宗教信仰那具有的特别力量，是不可加以忽视的。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居民方面试图建立独立的组织，这些运动有力地说明第一共和国时期这类组织严重的局限性。

除了这些救世主性质的社会运动外，社会上的盗匪活动有时被认为是表明农村居民和内地小城市中心有发动叛乱的迹象。这

---

⑬ 杜格拉斯·特谢拉·蒙泰罗的《新世纪的徘徊漫游：关于抗议推动太平盛世运动的研究》(圣保罗，1974)。

里我们是指“渣滓运动”(cangaço) 现象，这是指19世纪后半叶巴西东北部出现的一伙武装匪帮，其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才告结束。开始时，“渣滓运动”同亲属关系紧密相联，其活动范围限于很小的地区。新的形式逐渐地出现了，发展成为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的职业盗匪组织。由维古利诺·费雷拉（人称兰皮昂）领导的出名的盗匪帮，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兰皮昂及其一伙人在从1920—1938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活跃的，在东北部排在七个州之首，直到兰皮昂一伙同警察进行最后一次遭遇战身亡时为止。

一般说来，“渣滓”(cangaceiros)是白人，出身小土地业主家庭或是在土地、贸易或地方政治权力的争端中曾处于要失败境况的精英成员。如果这是通常的背景的话，那么有些人成为盗匪也是有其特殊的个人原因的。参加“渣滓运动”往往是由于某一近亲的暴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后来成为盗匪的这些人由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警察或司法部门的权力，开始亲自动手来满足家庭荣誉，最后是纠集一伙追随者。意义重大的是，因上述情况而所造成的父亲的死亡，成为兰皮昂及另一著名的“渣滓”安东尼奥·西尔维诺传记中的特写。西尔维诺在1897—1914年间很活跃。匪军是从黑肤色的穷人中招募来的，后者是农村居民的主体。有鉴于此，盗匪活动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较多的个人独立，再加上引人注目的物质刺激。

806

在巴西东北部穷人的神话中，以及在60年代的电影和歌曲中，“渣滓”被视为社会盗匪，或甚至被视为巴西的罗宾汉。“渣滓”拒不承认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权威，并根据其活动的性质同传统秩序决裂。这些活动包括侵占地产，抢劫城镇，而这些往往同想要破坏统治阶级内部某一集团或个人的愿望有关。许多“渣滓”赢得了穷人的合作，因为穷人的支持对武装团伙的生存至关重

* 葡语“Lampião”一词的音译，原义“灯笼”，是费雷拉的绰号。——译者

要；这一点也是勿庸置疑的。比如说，安东尼奥·西尔维诺就是通过分发货币和部分战利品给穷人的办法在群众中赢得了很高声誉。不过，有迹象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渣滓"运动和校官派权力结构之间总是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校官派代表着主要方面[14]。对"渣滓"来说，是否可能破除校官派的权力已非他们的机会和精神所能及。这帮武装人员指靠穷人的同情，但是他们的持久安全则要仰仗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提供的掩护和弹药。从地方精英的观点看，在政治权力被敌对集团激烈争夺和被分割的形势下，"渣滓运动"代表着一支重要的后备军。

"渣滓运动"的瓦解和最终消灭是由于国家的干预造成的，国家拥有日益增长的惩罚能力和庇护能力，国家的干预减少了地方精英的不稳定性，并将"渣滓"变成单纯的盗匪，而这些盗匪的行动对他们以前的保护人不再有任何用处了。源出于有关"渣滓"人物中的神话仍然保留下来，"渣滓"是极度的肉体暴力的化身，而穷人在其地方当权者的压迫下是不能指望去效尤的。

盛行于城市中心的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构无疑是不同的。从共和国最初年代起，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城市的经济意义和选举影响力。在城市里，集中了形成舆论的严密决策核心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这些集团和阶级包括统治阶级中最开明阶层的代表，中等阶层成员以及联邦区的军人。同时，在那里还可以找到最有潜在危险的阶层：工人阶级、低薪白领工作者以及城市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

807

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校官派都很活跃，尽管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农村地区小；寡头集团的统治所依赖的不单单是操纵选票。联邦区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其市长是由共和国总统任命的。1928年，圣保罗共和党设法修正圣保罗州宪法，使宪法

---

[14] 见林达·卢因：《巴西社会盗匪活动中寡头集团的局限性："善良的"窃贼安东尼奥·西尔维诺实例》，载《过去与现在》季刊，1979年2月号，第82页。

包括州长被授予选任州府市长的权力这一条款。根据立法机构的一项决定，伯南布哥州府累西腓市长的职务也不再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务。

不加区别地提到城市中等阶层，使得中等阶层在第一共和国期间的政治作用变得模糊了。中等阶层比任何其他阶层的成份复杂，是按收入、社会地位、流动性、种族血统以及对地区统治阶级的依附程度来划分的。工业家和商人大多是移民出身，他们专心致志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他们似乎在政治活动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巴西出生的中等阶层拥有的经济权力不大，但通过家庭关系同统治阶层挂上钩的情况则又当别论。这些人是寡头统治集团所谓的“穷亲戚”。对他们来说，谋生一般并不在于经济活动，而在于国家机器，他们往往靠在国家机器中充任文官。包括在这个“民族的”中等阶层的，还有制造公共舆论的人，诸如新闻记者和自由职业中的有威信的人物。这些阶层的人力争通过采取秘密投票和建立制止行骗的选举委员会等措施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在争取实现这一目的斗争中通常同寡头集团发生矛盾。但是，中等阶层参与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的情况不一，这取决于参与这一运动的是中等阶层的哪一部分人，以及取决于具体的地区特征所产生的影响。自由派思想意识一般吸引中等阶层的最上层，而服务部门领薪金的广大群众，诸如银行界和商业界的职员和低层文职人员，看来倾向于提出类似工人阶级提出的那类要求，即较高的薪金和较好的住房。尽管如此，如果人们不考虑某些城市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话，这种解释有冒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为例，有可能对这些地方的社会运动的特色加以区别开来，中等阶层结构内部的多样性以及圣保罗资产阶级所起的霸权作用，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点。

808

1890年，里约热内卢是当时唯一具有相当规模而且也是唯一拥有多样化社会结构的巴西城市。在里约热内卢，文职、自由职业和教士职务占就业人口的8.6%(而1893年圣保罗仅占4.6%)。

共和国首都将会日益变成一座服务行业的城市。1919年，在经济自立人口中只有38.4%参与实际的物质生产，而有61.6%参与服务行业，其中的15%充当家庭的仆人。在里约热内卢，中等阶层不那么依赖农业资产阶级。这个中等阶层包括从事自由职业的和机关工作的中等阶层，更具体地说，还有未同咖啡业资产阶级挂上钩的职能集团，诸如职业军官、普拉亚一韦尔梅利亚军事学院的学生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这些阶层试图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并为里约热内卢的各种社会运动（如雅各宾主义运动）提供了多阶级的基础。雅各宾主义运动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雅各宾主义扎根于首都广泛居民阶层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之中。这些人受通货膨胀和恶劣的居住条件的影响，他们充满了模糊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这些阶层来说，造成他们的困难的具体原因在于商业是受葡萄牙人控制的。此外，雅各宾运动试图阻止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于1894年担任总统职务，这是对圣保罗咖啡业寡头集团上台掌权作出的一种反应。

在圣保罗，中等阶层试图同下层阶层结盟，但这种尝试太空洞无力了。大量移民阶层缺少使自己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出现的条件和理由。传统的中等阶层倾向于咖啡业资产阶级，因为前者在经济和文化上依赖后者。这些特点再加上没有一个集团（诸如军事学院的学生或武装部队的军官）能够组成反对派这一事实，意味着圣保罗的社会抗议活动仅限于工人阶级。自由派的民主党成立于1926年，目的是为了增强"共和体制的纯洁性"，并从城市中等阶层中吸收成员和投票者。然而，在1930年革命后的一年，民主党与圣保罗共和党联合起来反对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 809

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联邦区和圣保罗州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工业结构从数量上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有限的资本和技术进行经营的小企业的基础之上的。在另一方面，较大的单位，特别是在纺织业生产领域，工人阶级则占相当大的比例。1919年，拥有500或500名以上工人的公司占圣保罗州劳动力

的36.4%和联邦区劳动力的35.7%。

在城市，存在着劳工运动兴起所必需具备的各种条件。城市里的社会关系不是那么具有主从性和家长式的；剥削更是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联系和通讯这一事实有可能产生集体意识。尽管革命思想家和组织者的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已在城市环境中立下足根。在另一方面，许多因素又限制了劳工运动力量的增长，因此劳工运动从来不可能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获得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一般说来，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都有充裕的人力。在圣保罗，咖啡部门鉴于其生产的周期性，在供应城市劳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咖啡业在扩展的同时，鼓励超过它本身需要的一定程度的移民活动，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剩余人口加入到城市劳动力行列。在农村地区发生危机之时，由于农业出口经济其他部门无法吸收咖啡种植园工人，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得移居城市中心或返回原所在国。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这个最大的城市中心的内部移民是劳动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的规模引起了巴西人和外国移民之间，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甚至在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意大利人之间的民族磨擦。与此同时，因为工业发展不正规，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这意味着劳动810 条件的改进工作进展很缓慢。最后，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自发的阶级运动和拒不做组织工作，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反而使得那些不利于工人阶级团结的那种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点得到了加强。无政府主义由于其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也影响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不能采纳一项有利于扩大政治制度基础的改革纲领。与此同时，尽管工业对经济仅具有次要意义，但是主要的工业家们却能够对权力中心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而且可以指望政府的镇压力量。工会的半合法性，对罢工者施行的暴力以及外国劳工领袖的被撵走，这一切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

从19世纪末以来，在巴西的城市地区发生了罢工。但是，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劳工骚

乱这一总的格局范围内，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内，劳工运动的主要发展阶段是在1917至1920年之间。劳工运动发展的最高峰是1917年7月在圣保罗举行了有5万名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这个时期，不仅发生许多次罢工，而且工会会员人数有时还有了增加。1918年底，比如说，里约热内卢纺织工会拥有多达 2 万名会员，如果考虑到那个特定部门和大部分劳动力是由不参加工会的妇女和儿童所组成的话，那么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在圣保罗市人数很小的有组织的工人中间仍居优势。在里约热内卢，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却不那么有影响。舆论的气候倾向于赞同“非政治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主义仅仅旨在改进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这一思想倾向在铁路和港口工人中尤为强烈。社会主义者一直设法建立的只不过是小宗派组织，在一个通过政治参与实行社会变革看来仅仅是乌托邦梦想的国家里，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组织工作的稳定性而言，1917至1920年的大罢工并未促使巴西工人状况有任何改进。在整个20年代，劳工运动停滞不前。在罢工遭受失败以及在俄国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想经历了一段危机时期。一批同工人斗争最密切相关的前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少数社会主义者，于1922年建立了巴西共产党。诚然，巴西共产党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主要核心来源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对各种各类的课题，诸如工会和党的作用，阶级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政策，提出了系统的新概念。然而，巴西共产党在20年代并未获得大规模的发展。党员人数介于1922年的73人至1929年的1000人之间。

81(

尽管如此，1917至1920年的罢工所给予的明确警告，再加上工人阶级人数的不断增长，这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对“社会问题”抱有新的态度的最早迹象，即一种不是仅仅一心搞镇压的态度。一些社会权利，尤其是服务业部门的社会权利获得了承认，而服务业对农业出口经济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当

1929年危机和1930年革命之后劳工运动获得了新的推动时，建立自治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尝试同政府的旨在组织并控制城市工人阶级的措施势必会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政 治 进 程

第一共和国寡头政治制度最敏感的关键特点是：在调节不同地区寡头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在城市中等阶层要求政治参与所施加的压力上，以及在武装部队作为国家机器内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上，遇到了种种困难。从长远看，社会关系中的主从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结构基础逐步发生了变化，这就影响了寡头集团的统治。反过来，这又是内部移民和城市增长的结果，是更大程度的阶级分化以及最后是工业增长的结果。对第一共和国期间政治进程作一简要分析，将更具体地表明，寡头统治集团在1889年后是如何巩固它自己，以及寡头集团的危机直到1930年革命之前这段时期是如何发展的。

1889年11月15日君主制的被推翻，是里约热内卢一批年轻陆军军官所策划的军事政变的结果。代表着圣保罗咖啡业资产阶级的最有组织的文职共和党组织同军人接触不多，而且对军人参与他们的运动是否适当也持怀疑态度。军人夺取了权力，并为共和制的巴西任命了它的前两届总统——德奥多罗·达·丰塞卡（1889年11月—1891年11月）和弗洛里亚诺·佩绍托（1891年11月—1894年11月）。在共和国的最初年代，一半以上的州是由武装部队成员治理的。在另一方面，大的寡头集团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权力集团。如上所述，1891年宪法保护一些最大州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圣保罗州的利益集团。圣保罗共和党清楚地认识到它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尽管有一定的意见分歧）所属的社会阶级；然而，武装部队在这个社会阶级面前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行事的。武装部队内部的竞争发生在陆军和海军之间，以及在德奥多罗的支持者和弗洛里亚诺的支持者之间。陆军代表着“行伍出身

812

的人”的利益，海军得到普拉亚—韦尔梅利亚学院毕业生们的支持，这些毕业生是积极参加里约热内卢雅各宾主义运动的士兵公民。最后，对共和政权造成的实际威胁或假想威胁这一点，使得咖啡业资产阶级和军人方面之间建立了友好和睦关系。比如说，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在联邦主义革命和海军叛乱期间得到圣保罗富裕金融家和圣保罗州强大民兵的支持。弗洛里亚诺在巩固共和国的同时，多少有点违心地为巴西新统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弗洛里亚诺的财政部长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在一个经过战略筹划的内阁里代表着圣保罗的政治利益集团。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职务是由圣保罗共和党主要人物来担任。军方既对寡头统治集团感到不满，又对他们所曾帮助建立的共和政权的合法性表示尊重，军方的犹豫不决使得主要的州、特别是圣保罗州较为容易获取胜利。1894年11月15日，共和国第一位文职总统、圣保罗人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开始执政。反对派仅限于民众阶层，以及限于里约热内卢普拉亚—韦尔梅利亚军事学院年轻的军官和干部。10年后，1904年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政府主张实行强制接种疫苗以同黄热病作斗争的决定。这次示威使两股反对派潮流汇合起来，这两股潮流是民众分子（他们的抗议主要针对高涨的生活费用和将居住在被指责为不卫生住房的人们撤出）和军事学院的军官和干部（他们在抗议接种疫苗的同时，将他们的眼光对准更高的目标，即“土地所有者共和国”这一目标）。但是，军人统治集团本身逐步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军人俱乐部于1896—1901年间关闭，此前俱乐部曾协调过政治活动。 813

即使不再有任何来自军人的威胁，对寡头政治制度仍有待于体制化。第二位文职总统、另一名圣保罗人坎波斯·萨莱斯（1898—1902）为实现这一任务，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主要目标：结束存在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敌对状态；尽可能缩小个别州内部不同意见的影响；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实现意见的基本一致。由此而产生了所谓“州长政治”这一概念，是一种基本上缺乏实

质内容的"学说"，但尽管如此，它足以为寡头政治制度建立基础。这一学说原则上寻求达成互惠协议。中央政府往往支持各州的主要政治集团，反过来，这些政治集团也会支持共和国总统的各项政策。这样，坎波斯·萨莱斯设法抵销地区一级的反对派力量。

国会的职能迥然不同于所设想的宪法关于权力划分的职能。为了控制国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对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程序作了修正。在举行众议院选举时，被作为他们各自州的当选代表加以接受的候选人被授予一张证书，由正式持有证书的代表们出席参加新立法机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然而，经常有人对这些证书提出异议，这些证书是否有效取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而该委员会是由新的众议院代表一致投票推选的。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的影响在推选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在坎波斯·萨莱斯策划改革之前，规定众议院临时议长职务由年纪最大的持证书的代表担任。由于进行改革，曾担任前一届议长的代表继续留任，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认为他当被选入新的议会。推选年龄最大的议员会带来不可靠因素，而前任议长势必是曾支持过共和国总统的某某人。这样，政府对由官方确认为代表的候选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控制。

814

圣保罗的寡头集团和圣保罗共和党在共和国初期控制了政治局面，但在重大时刻，诸如对1891年宪法的投票表决和1894年选举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时，可以指望得到米纳斯吉拉斯的支持。共和国的3届文职总统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坎波斯·萨莱斯和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1902—1906)都是圣保罗人。在1897年米纳斯吉拉斯共和党建立之前，米纳斯吉拉斯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主要同州的经济部门咖啡、谷物和畜牧等相对应），这一因素削弱了米纳斯吉拉斯对联邦一级的影响力。1898年米纳斯吉拉斯支持坎波斯·萨莱斯担任总统职务和支持由于与罗思柴尔德族签订了统一巴西国债的协议而产生的各项金融与货币政策。从1898年起，米纳斯吉拉斯在联邦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充分的影响

力。共和国第4任文职总统阿丰索·佩纳是米纳斯吉拉斯人，1906年当选，1909年死于任上。

在内战的创伤得到恢复和圣保罗共和党本身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在寡头集团群星中南里奥格兰德作为第三号大星星崭露头角。参议员皮涅伊罗·马查多在联邦一级的影响说明了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高乔人在马查多的领导下，对圣保罗历届总统以及对旨在从中央政府获准取得外国贷款以支持咖啡经济的圣保罗建议一贯给予支持。然而，马查多并不就是圣保罗的“仆从”。皮涅伊罗由于在参议院担任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因此设法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网络。皮涅伊罗由于控制了参议院资格审查委员会并对众议院资格审查委员会施加他的影响，就打算控制一些弱小的州的代表。结果是，在南里奥格兰德和东北地区一些卫星州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盟。1910年11月保守共和党的建立使这一联盟得到某种程度的体制化。建立保守共和党是试图建立全国性寡头统治政党的一个尝试。1909年，南里奥格兰德在总统继任问题上第一次有机会运用它的影响力。1909年米纳斯吉拉斯寡头集团内部不和促进了候选人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当上了共和国总统职务。埃尔梅斯是德奥多罗的侄儿，1906至1910年间担任国防部长。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都争取得到他的支持。由圣保罗 815 提出并得到巴伊亚州（从帝国时代起就降到了次要地位）支持的候选人是鲁伊·巴尔博扎。巴尔博扎的政治生涯可以追溯到帝国时期，他是当时人数极少的开明精英的代表。“咖啡加牛奶”联盟第一次陷入了困境。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高乔人因支持一名军人候选人而在联邦政治生活中作为一支力量崭露头角。高乔人寡头统治集团和军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这可归因于若干因素。在南里奥格兰德驻扎卫戍部队（以及后来在1919年在那里建立第三军区）具有重要意义，看来这鼓励了已达到某种社会层次的高乔人去从事军人职业。在该地区打打停停的战斗也有利于陆军军官和各政党之间的接触。

许多军官和圣保罗共和党之间建立联系是联邦主义革命造成的。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和政治上的独特性也促进了这一联系。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以及后来在州的重要领袖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领导下，南里奥格兰德过去是实证主义思想影响特别强大的地区。这种思想也在整个陆军队伍中传播。除此而外，高乔人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予以维护的各项经济和财政政策，在许多方面往往是同军人的理想相一致的。南里奥格兰德的经济主要是为国内市场的需要服务的，南里奥格兰德是反对农业出口利益集团的中心，而陆军对农业出口利益集团却不那么同情，而且同该集团联系也不多。高乔人维护物价的稳定以及保守的金融政策，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往往会引起特别是牛肉干市场的问题。东北地区和联邦区的低层阶级主要消费牛肉干。这些低层阶级购买力的下降造成了需求的下降。一项保守的金融政策总是获得军人（不仅仅是军人高阶层人员）的赞同。20世纪20年代尉官派的叛乱是矛头指向通货膨胀和预算不平衡的，说这些是不吉利的，是严重的，是骗局，矛头还指向地区间的不平等。

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候选人资格可以置于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斗争的不同的背景下考虑。为了结束寡头集团内部不合所造成的僵局，陆军被作为一个政治伙伴加以接受。陆军并不是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出现的。批评陆军在1909—1910年竞选运动期间干预政治的，是鲁伊·巴尔博扎。他攻击军官团并煽动州的民兵同陆军相斗。鲁伊的政治基础虽然主要是圣保罗的寡头集团，但他的意识形态纲领是知识界争取公民自由、维护文化与自由传统，反对愚昧无知的寡头统治的和权力主义的巴西这个纲领。鲁伊企图吸引城市的选票。他拥护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他指出需要加强中央权力，实现的办法是统一司法部门，惩办违反联邦宪法的那些州，经常干预各州内部的经济和财政纠纷，控制个别州同外国签订借款合同的权利，以及确保联邦保护咖啡经济部门。鲁伊的纲领说明，圣保罗关注的不在于实行极端的州自治，而在于

在一个多少有点一体化的国家里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丰塞卡的纲领支持预算平衡，宪法的不可渗透性，实行广泛的州自治，以及对南里奥格兰德的观点和利益给予特别重视。但是，必须记住，自治问题对南里奥格兰德的政治家们尤为重要，但对军人通常不是如此。武装部队一向支持旨在增强中央集权化的纲领。此外，埃尔梅斯蓄意地提到工人的各项权利和不满情绪。而且他在执政期间，支持召开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一些温和分子在政府的赞助下参加了大会。

在丰塞卡执政期间(1910—1914)，决策进程中出现了分裂现象，分裂为三部分人：米纳斯吉拉斯特别是南里奥格兰德的文职寡头集团；总统本人；一批陆军军官，特别是校官，他们希望对各州内部权力的控制方面作出变动。陆军军官在总统周围形成了一个压力集团，主要从事"救世军式的"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维护"共和体制的纯洁性。

"救世军"派于1930年革命之后在东北地区抢在尉官派之前干预了伯南布哥、阿拉戈斯、巴伊亚和塞阿拉，使那些往往指望获得圣保罗共和党支持的寡头集团领袖下了台。在发生的许多这类军人侵犯事件的背后，有施展个人野心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反映了陆军内部比较复杂的现实问题。扎根于中央政府的"救世军"派试图限制寡头集团的政治权力，而与此同时设法减少较露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鉴于地方精英的软弱无力，"救世军"派在东北地区获得了相对的暂时的成功，但却未能试图提名竞选南里奥格兰德州长职务的军人候选人，也未能干预圣保罗的事务。

埃尔梅斯政府期间发生的危险动乱对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精英们起了警告作用，这些政治精英于1914年拼凑了"咖啡加牛奶"联盟，并选举米纳斯吉拉斯的文塞斯劳·布拉斯担任总统职务(1914—1918)。圣保罗共和党遭到"救世军"运动的严重损害，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1915年这一危机逼近严重关头，皮涅伊罗·马查多被暗杀。

8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寡头统治集团美好年代的结束。如上所述，因国际形势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激发了1917至1920年间的劳工骚动。罢工浪潮较快地被平息下来，但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将会破坏老共和国的稳定。城市中等阶层（他们试图扩大寡头制度的基础）施加的种种压力以及中级军官的攻击将会使政治结构发生变化。这些阶层虽然缺乏自主权，但他们会进一步扩大地区寡头集团内部和地区寡头集团之间的分裂范围。

在1919年的总统选举中，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是很明显的。由于当选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圣保罗人，1902—1906年担任总统，1918年重新当选）的去世，选举是在异常的环境中举行的。“官方的”妥协候选人帕拉伊巴的埃皮塔西奥·佩索阿赢得了选举。佩索阿是在第一共和国期间担任总统的第一位东北人，也是仅有的一名东北人。但是，曾于1910年和1914年遭受失败的鲁伊·巴尔博扎后来以独立的候选人身份崭露头角，他为实现一个包括劳工立法在内的温和的改良主义纲领而竞选，并获得了大约1/3的选票。他在联邦区是彻底的获胜者。

1922年的选举披露了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增长的地区紧张关系；一方面是，这是两个主要州之间出现了明显分裂的唯一一次选举；另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个中间州的集团。此外，陆军在涉及其荣誉的一些事件的鼓动下，站在反对派方面进行了干预。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联盟在1921年最初几个月提名米纳斯吉拉斯政治家阿图尔·贝纳德斯作为它的候选人。南里奥格兰德为它的候选人资格而进行争夺，并且指责在国家需要稳定金融之时，为保证咖啡价格稳定进行财政补贴而作的政治安排。南里奥格兰德的政治家还害怕有可能作出限制实行州自治的宪法修正，如同1926年贝纳德斯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巴伊亚、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加入到南里奥格兰德的行列，这3个州按选举重要性来说，分别名列第4、第5和第6。它们在“与共和党针锋相对”的旗帜下提名尼洛·佩桑尼亚作为其候选人。尼洛在1909年阿丰

818

索·佩纳死于任上之后担任了几个月的总统职务。他保证了丰塞卡在随后的竞选中获胜。丰塞卡出身微贱，曾支持过弗洛里亚诺·佩络托，并将其政治基地设在他的家乡里约热内卢州寡头统治集团那里。"与共和党针锋相对"的纲领，受到南里奥格兰德的政治家们的直接启迪，集中采取措施反对通货膨胀，赞成货币可自由兑换和预算的稳定。比较强大的州则被指控为帝国主义，并要求对巴西所有的出口产品（不仅是咖啡）采取保护性措施。尼洛并不反对当时的稳定咖啡价格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也有利于里约热内卢州），但他对给予咖啡特别优待持批评态度。这是一个对南里奥格兰德的代表们特别珍贵的主题。军人对继任问题的干预变得更加容易了，因为军人同南里奥格兰德的政治家及候选人本身有联系。不过，从表面上看，军人试图维护军人体制的价值和荣誉，1921年10月里约热内卢的《晨邮报》刊载了有伪造贝纳德斯签名的信件，通过这些信件使军人体制成为恶毒攻击的目标。

"官方的"候选人贝纳德斯赢得了1922年3月的选举。只是留待国会来确认选举的结果。从地区寡头集团的观点来说，只要候选人之一被认为赢得了胜利，受挫败的政党就必须达成协议以维护这个体制。1922年，这条规则几乎遭到了破坏。由于对军方的紧张关系，甚至考虑撤销当选总统，并考虑选择第三位候选人。同时，在军队统治集团中间也发表一些革命言论。然而，南里奥格兰德寡头集团的领导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终于拒绝更进一步支持反对派。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逐渐平息。被击败的地区寡头集团和军人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逐渐消失，尽管贝纳德斯政府曾反复地宣告要实行戒严。 819

从另一层次看，在圣保罗，圣保罗共和党政治垄断的被打破，揭示了寡头政治制度的危机。1926年在圣保罗成立了民主党。民主党的建立是由于圣保罗社会分化的影响的结果，是由于新一代赞成扩大职业机会和接触政治体制的压力，以及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不一所致。在民主党的主要人物当中，有出身咖啡种

植者和巴西传统家庭的年轻子女，一些工业家，尤其是中等阶层的自由职业者，如律师、新闻记者和法律系教授。民主党是作为一个开明的民主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该党的目标是通过秘密投票，少数派代表制，行政、立法和司法实行三权分立以及采取由司法部门进行选举监督的手段，使共和党体制同共和党的实践分开。民主党在社会改革的方向上作过一些含糊姿态，而它同圣保罗共和党在经济和财政战线方面的分歧是表面的。民主党的官方报纸传递了对于20世纪20年代城市传统中等阶层的愿望特别有关的信息。民主党的攻击的最得意的目标是"冒牌的工业化"(同外国血统的强大工业家有联系)、由圣保罗共和党控制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在圣保罗市负责基本服务业的外国公司。1930年革命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民主党不会为了同其他反对派组织结盟而牺牲它的地区利益。尽管如此，在20年代晚期，民主党的活动导致了圣保罗寡头集团在全国一级的政治权力的削弱。

与此同时，陆军中的中级军官（尉官）在一系列尉官派叛乱中同"共和国秩序"决裂。1922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堡发生一起叛乱。1924年7月，叛军实际上竟控制了圣保罗市达两个星期之久。1924年10月和1926年，在南里奥格兰德的许多城市发生叛乱。但是，尉官派运动通过普列斯特斯纵队的活动创作了它的伟大神话。普列斯特斯纵队是一支将圣保罗和南里奥格兰德的革命者联合在一起的军队。纵队在米格尔·科斯塔和巴西共产党未来领导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领导下，进行了横穿巴西内陆的"长征"，1925年4月至1927年2月行程约2.4万公里，当时纵队的残余部队最终跨过边境进入玻利维亚。

820

20世纪20年代的叛乱继续坚持年轻陆军军官的反叛传统，这一传统追溯到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不过，有重大差别，这些差别是军事机构、陆军和寡头体制之间多年建立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

尉官们是在军人和社会都在经历一个过渡进程的时期接受教

育的。军官团随着1911年雷阿伦古军事学院的建立而开始发生了变化，雷阿伦古军事学院取代了普拉亚一韦尔梅利亚老的军事学院。普拉亚一韦尔梅利亚军事学院在1904年发动了最后一次叛乱后永远被关闭了。新的军事学院同它的前身普拉亚一韦尔梅利亚在意识形态背景方面迥然不同。新的军事学院提供明显的军事教育和实行军纪，它设法造就职业军人，不过问政治，而且针对具体的军事目的。尉官派虽然是雷阿伦古军事学院的产物，但却采纳了军人公民学说的原则之一，即军人有权干预政治，即使是违反文职和军事当局的心愿。但是，普拉亚一韦尔梅利亚军事学院的实证主义思想家往往更着重于公民而不是军人。按照本杰明·康斯坦特的思想，最极端形式的实证主义认为，“工业政权”最终会使军队变得无用了；“迄今被作为破坏工具使用的军队将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从军人公民学说所得出的这一推论是尉官派所不知晓的。尉官派的意识形态所依据的是文职和军人世界的相互依存，而不是作为保护人民的武装部队的一般职能。陆军中日益增长的组织能力以及军人作为脱离文职生活的一员这一概念，帮助形成了这种军人意识。尉官就象以前的“行伍出身的人”，极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所属的这个“等级”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最初促进他们采取行动的因素，部分源出于编造的所谓1929年10月信件中矛头指向军人的侮辱事件。 821

同时，尉官派运动在军事体制内部，在中级军官及其司令官之间制造了分裂。尉官派为了提高其发动叛乱的声望，总是试图同某些高阶层人员交往。但尽管如此，叛军除了获得个别人物偶尔的支持外，从未能成功地吸引军人领导集团。有鉴于此，他们变得越发固执地决心去净化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而且净化他们所归属的机构。比如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儒瓦雷斯·塔沃拉公然攻击国防部长，指责他沉迷于“卑鄙而低级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是按照贝纳德斯总统的一时念头和诸多弱点特制而成的。

军官团的一部分人和陆军领导集团之间的分裂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整个军官团的内聚力在陆军中从来不是很强大的，而且由于高级军官对寡头政治体制采取谨慎态度，局势变得更加尖锐了。在军人结构本身内部，缓慢的晋升制度产生了一大批担任中层职务的人，而这些人晋升高层的前景微乎其微。从陆军领导集团这方面说，他们享有特权，但无法对整个组织施加全面控制。这种局面同海军普遍存在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帝国年代起，海军就被认为是贵族阶层的据点。在海军，基本分歧存在于军官团和刚入伍的海员之间。在第一共和国期间，武装部队内部主要的行伍运动，1910年的海员叛乱发生在海军(以抗议体罚)不是偶然的。相对来说，海军不受尉官派的影响，叛乱的唯一迹象是1924年"圣保罗"号驱逐舰起义。

至于尉官派运动的社会和政治目标，1930年10月革命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尉官派同其他派系一起进入政府（普列斯特斯同五月运动破裂，发布宣言，宣称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然而，822 在20年代，尉官派实际上身处政府机关之外，并参与了反对权力结构的斗争。他们通过军事行动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人们对其内部分歧还未明确地争论过。然而，尽管如此，在这一运动本身内部，出现了处于初期形式的两种趋势。其中的一个趋势，是由普列斯特斯、西凯拉·坎波斯和米格尔·科斯塔所形成，他们将寡头集团统治的被推翻同模糊的民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起来。另一趋势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儒瓦雷斯·塔沃拉，他不参与民众动员活动；他认为军人干预是推翻寡头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而与此同时，去限制"广大群众中过分的无纪律行为"。

可以认为，尉官派运动作为一种运动产生于国家机器特别敏感之际。这一运动揭露了寡头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提出按组合主

义*方针建立的结构来取而代之的前景。尉官拥护的那一类政治改革是基于扩大中央政府活动范围这一需要，它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当时流行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这是20世纪20年代该运动的主要论调。它一如既往地宣扬一种比较朴素型的社会改革，再加上一种同样模糊型的民族主义。20年代，尉官派的理论大大地灌输了“民族主义情感”，而不是直接归属于某一社会阶级利益的目标。国家权力的加强，要求体制上的一致性，要求发展教育和加强国家一级的政府。经济问题，包括工业化问题，要么被忽视，要么仅给予微乎其微的关注。就其尚未明确确立的目标而言，尽管对其大公无私的理想主义作了明确说明，尉官派仍指望得到反对现行秩序的那些社会阶层、包括工人阶级的同情。在另一方面，就寡头集团内部最有代表性的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而言，尉官派代表着他们可以加以操纵的后备力量，同时避免作出任何永久性许诺。尽管如此，诉诸激进方法，即暴力，即使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标，也是要与正常的政治程序相决裂，并且造成分裂局面，只是由于1929至1930年这种特殊环境才获得了和解。

到了20年代晚期，尉官们受到了排斥，或是被流放，城市中等阶层的自我动员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寡头政治制度日益加深的危机，更多是由于各州之间的矛盾的再现和寡头政治公约内部的调整问题所致，尽管当时已处于一种新的背景条件下。1926年，圣保罗候选人华盛顿·路易斯担任了总统职务而未遇到任何问题，而且得到了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两个州的支

823

* 组合主义（corporatism），20世纪初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关于国家组织形式的一种主张。该派的主要代表，法国法学家狄骥(León Duguit，1859—1928)认为，随着按照行业把雇主和雇工联合在一起的工团日益发展，最终将导致一种组成为工团的各个阶级的联盟，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组合国家(corporate state)。这种主张为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所采用，该国于1927年按行业成立组合(corporations)，1934年成立中央组合会议，1938年建立“法西斯组合院”，解散国会，遂形成极权的组合国（亦称“总体国家”）。——译者

持(华盛顿·路易斯为了实施他讨好南里奥格兰德的金融稳定化纲领，提名该州政治寡头集团内部正处于上升地位的一名高乔政治家热图利奥·瓦加斯担任财政部部长职务)。1929年在总统继任问题达成一致协议遇到重重困难，这可以归咎于总统本人的政治主动性。1928年，圣保罗主要政治集团在华盛顿·路易斯的鼓励下，显然并不打算放松它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圣保罗州州长儒利奥·普雷斯特斯的名字作为总统候选人崭露头角。这就违反了所有的比赛规则。从1914年起，一直都是由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两个州轮流担任总统职务，只有1919年当选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去世后的那一届除外。1930年一名米纳斯吉拉斯人总统重新掌权是人们所通常预期的。华盛顿·路易斯的不妥协精神，可以归因于他的个性和更为全局性的理由。总统想通过选择一名他可以信赖的继任者，开始设法确保他的金融稳定化政策的连续性，总统认为在寡头政治制度中这种坚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坚持使得反对派很难取得任何成功。至少有一个历史先例对他有利，即1902年坎波斯·萨莱斯通过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的第一次当选保证了通货收缩金融政策的实施。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一名圣保罗人接任一名圣保罗人担任总统。但也应当看到华盛顿·路易斯的态度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出现的，即圣保罗精英已逐渐失掉了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而让给了南里奥格兰德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人，这一趋势在1930年之后有了很大的加强。

鉴于联邦政府和南里奥格兰德的关系良好，华盛顿认为由于提出儒利奥·普雷斯特斯作为候选人，就可以抵销最终可能出现的任何严重分歧，看来米纳斯吉拉斯充其量只会孤立地进入斗争，不仅不会有多大成功的机会，而且也不致产生任何严重的反响。确实，是米纳斯吉拉斯州长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德·824 安达拉达开始磋商提出一名反对派候选人。为了驱使南里奥格兰德参加一场会意味着违反同联邦政府签订的协议并因此丧失所包含的利益的一场竞争，就必须将总统职位让给该州。1929年6月，经

过大力磋商之后，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两州一致同意推举当时的南里奥格兰德州长、沉默的热图利奥·瓦加斯作为候选人。它们获得了小小的东北部帕拉伊巴州的支持，该州后来提出若昂·佩索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一集团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央政府不仅得到圣保罗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支持，而且还得到所有17个州的支持。

自由联盟是作为一个地区阵线成立的，该阵线包括南里奥格兰德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绝大多数政治代表，同时，圣保罗民主党也加入了该联盟。至于讲到帕拉伊巴州，寡头集团内部的混战致使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阶层去支持政府。看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地区性分裂，这次分裂比先前的所有分裂更为严重，但仍然属于第一共和国典型的、传统的继任争端模式。自由联盟作出重大努力保留在这个体制界限范围之内，联盟的大部分领导人是献身于这一体制的。甚至瓦加斯1929年7月在致华盛顿·路易斯的信中也公然陈述了这一意图。而且，南里奥格兰德在联邦众议院的领袖若昂·内维斯·达·丰托拉宣称，反对派倾向于对来自圣保罗的其他候选人给予同情的考虑。

自由联盟的纲领反映了同咖啡业并不直接挂钩的那些地区性统治阶级的愿望。纲领的目标，也是争取获得中等阶层和某种程度上争取获得工人阶级的同情。纲领力主需要普遍促进全国生产，而不单单是咖啡的生产。纲领还反对在金融正统性名义下为实现咖啡价格稳定而提出的各种补贴计划，而且有鉴于此，它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并非不同意华盛顿·路易斯的政策。纲领提出保护工人的某些措施，诸如有权享有养老金，有关妇女与儿童就业的具体规定，以及假期享有工资的权利（在主要的城市中心，瓦加斯不得不多少违心地进行游说，他受到热情接待，甚至在圣保罗也是如此，在那里，自由联盟的反圣保罗人的性质会被人们轻易地加以利用）。作为对曾经断言巴西的社会问题是个“警察问题”的那位总统的一个明确的回答，反对派纲领指出，这一问题

825

不可加以忽视，它成为“行政权力部门应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该纲领十分强调维护个人的权利，大赦(为了博得尉官派的同情）以及真正保证代表制选举的政治改革。至于工业化这个主题，该纲领对真正的工业和冒牌的工业（前者指用本国已有的原料从事经营的工业，后者指必须使用进口原料从事经营的工业）按老看法作了区分。纲领谴责对冒牌工业提供保护主义措施，理由是保护主义措施使生活费用上涨，而使一、两家享有特权的企业受益。反过来，保护工人的权利是根据旨在与工业家享有的特权加以对比的条件作出规定的。代表圣保罗大部分工业的协会支持官方候选人儒利奥·普雷斯特斯。这种态度可以通过下述两件事加以说明。一、圣保罗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二、反对派对工业资产阶级并不具有吸引力。

在1929年10月，即选举运动的中期，开始出现了世界经济危机。反对派领袖开始利用危机作为表明政府不称职的新论据。其直接后果几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这场危机导致了咖啡业部门和中央政府的不合。这一危机发生在生产过剩问题变得日益严重的时候。咖啡部门要求华盛顿·路易斯给予财政让步并延期偿债，鉴于圣保罗州立银行所经历的种种困难，这些让步可通过巴西银行支付。总统特别急于维护他的稳定货币兑换的计划，而如果作出了这些让步，这一计划肯定会遭到失败。总统拒绝答应理当由他代表的那部分人的请求。这在圣保罗激起了不满的浪潮。庄园主大会不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所组织的，而且也是其领导人基本上支持圣保罗共和党的所有农村协会所组织的，大会是在1929年12月—1930年1月初举行的。这次大会明显地表明了上述不满情绪。尽管如此，局势并未达到破裂点。大会召开之后，动员咖啡 826 种植园主的工作减弱了，对民主党有利的投票相对地说是微不足道的。咖啡部门尽管不满，但没有理由认为自由联盟获胜就会对它的利益给予更多注意。诚然，反对派的地区性组成以及对一、两个词字斟句酌的谨慎表态看来说明了相反的情况。

1930年3月1日的选举是按照老共和国的传统举行的。政府和反对派都采取大规模行骗手法。热图利奥·瓦加斯获得298,677张选票，而在他自己的州只获得982张选票，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儒利奥·普雷斯特斯的获胜（为博尔热斯·德·梅得罗斯所公开承认）看来标志着地区分裂现象的结束。但是，在这一点上，自由联盟内部的不同意见开始表现出来。从代沟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差异上，可以说明这一点。除了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的传统政客外，还有一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米纳斯吉拉斯人和高乔人，这些人正忙于攀爬在昔日寡头集团荫庇下的政治阶梯。在南里奥格兰德，象瓦加斯本人、弗洛雷斯·达·库尼亚、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林多福·科洛尔、若昂·内维斯和毛里西奥·卡多佐这些人，组成了被称之为“1907年的一代人”的集团，1907年是他们完成学校教育的一年。在米纳斯吉拉斯，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政治人物，如维吉利奥·德·梅洛·佛朗多和弗朗西斯科·坎波斯，他们两人都来自地区的传统家庭。这些人直到20年代晚期才公开指责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然而，1930年这一部分政治精英选定走直到当时只有尉官派才走过的道路。

尉官派运动固然遭到了失败，但由于他们拥有军事经验并在陆军内部享有威信，当时仍然是一支应予以重视的力量。年轻政治家和反叛陆军军官之间达成和解的条件当时已经成熟。即使在竞选期间，在这方面也曾经采取了一些步聚。不过，尉官们极其慎重行事。尉官们同合法的反对派的关系是相当消极的。他们曾被反对派利用，却未获得任何报答。除此而外，自由联盟包含了他们的一些最险恶的敌人。比如说，有前总统贝纳德斯和若昂·佩索阿，前者曾追赶过普列斯特斯纵队，而且，他被人认为是积共和国一切弊端之大成；后者曾负责对不少军人叛乱的起诉。在年轻的政治家中，有若干人，比如说，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对平息南里奥格兰德的叛乱曾起过作用。尽管有些隔阂，而且相互多疑，还是达成了协议。但是意义重大的是，革命运动的军事领 827

导权授予了一位代表“武装部队最负责任的阶层”并享有高乔领导人充分信任的人。他就是当时的陆军上校戈埃斯·蒙泰罗。他出生于阿拉戈斯，但他的职业同南里奥格兰德有密切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戈埃斯不曾是革命派系的一员。相反，他曾在东北各州同普列斯特斯纵队战斗过。

1930年3至10月策划的密谋活动几经周折，一次偶然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如8月若昂·佩索阿因当地政治问题而被暗杀，帮助了这一计划的实现，终于在10月3日在南里奥格兰德，以及第二天在东北地区开始了叛乱。在发动叛乱的各州，州的民兵宣布效忠于革命。陆军的支持只是在南部立即兑现，而在米纳斯吉拉斯和东北几个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华盛顿·路易斯在里约热内卢仍掌权。他的政府的主要支持基地在圣保罗，那里的州民兵和陆军都准备抵抗从南方挺进的部队。不过，圣保罗普遍的气候远远不是令人愉快的。圣保罗的统治阶级尽管同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代表处于不和状态，但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去支持反对派的地步。然而，他们却无意动员在其控制下的居民去投身于武装冲突。除此而外，大部分中等阶层纠集力量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几乎未参与策划革命，但却支持革命者。这些因素有助于在圣保罗制造有期望的气候，在圣保罗，中央政府试图召集后备役军人，但惨遭失败。

结果，由于里约热内卢武装部队领导集团的干预而避免了在圣保罗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为了进行“有节制性的干预”，陆军和海军的高级指挥官第一次联合起来，这一干预于10月24日废黜了华盛顿·路易斯。军人领导集团试图继续掌权，甚至组成了一个执政委员会。在另一方面，革命力量从南方挺进的压力以及里约热内卢的民众游行示威，保证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提出要当总828 统的要求。1930年11月3日他正式担任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了瓦加斯在此后15年会继续掌权。

1930年革命是其价值观和目标迥然不同的各种社会集团的产

物。这些社会集团有：持不同意见的地区寡头集团，部分城市中等阶层和有中级军衔的陆军军官。除了一些例外，城市工人仍在这一运动之外。然而，由于尉官派的声望和自由联盟的模糊的改良主义言词，革命者们从其同情的表态中而受益（小小的共产党产生了它参加选举的自己的候选人，并谴责自由联盟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不过，应当记住，至少在选举的前夕，共产党领袖参与运送武器并同密谋策划于圣保罗的尉官派建立了联系）。如果对20年代作为总体加以考虑，年轻一代人在声援政治反对派或参与革命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圣保罗民主党在其领导人相对年轻这一点上同圣保罗共和党形成鲜明对照。尉官派运动是陆军低级军官发动的运动。在持不同意见的寡头集团内部，持革命态度的是较年轻的成员。从这一观点看，寡头政治制度的危机可以被认为是该制度无力反应对它提出的要求的一种后果。反过来，又是社会分化以及社会地位向上和向下变动的结果。

1930年老共和国的瓦解，结束了曾保证圣保罗咖啡业资产阶级霸权地位的寡头集团统治制度。但是，它并不标志着校官派运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结束。出现了新的校官以取代旧的校官。恩惠制度(Patronage)还存在，而且慢慢适应了文职社会和国家之间逐步拟定的组合主义公约。主从制(Clientalism)继续存在(尽管形式有了修正)，这主要是由于1930年革命未作任何努力来改变农村地区的生产体制，虽然土地改革到这个时候已变得同当时的政治辩论相关联了。1930年之后的事态发展使得历史上无法予以分开的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了，这两个因素是成份复杂的革命运动的获胜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后者使长期存在的问题变成了紧迫的问题，而且势必加速缓慢的变革进程。鉴于工业资产阶级形成时的历史条件，它需要一场世界危机，要求打破圣保罗咖啡业资产阶级工业化进程的霸权地位，对工业化进程给予更新的推动。州的权力的扩展和集权化，是1930年革命后的年代的体制变革的主要特点。这是在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要求下所确

829

定的一项步骤，但这一步骤也是同那些力量（同样还有军事力量）中的一些力量的利益和观念相一致的。这些力量对革命承担了责任。中央的官僚统治得到了扩展，除了行使它作为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喉舌这一任务外，实际变成一个拥有自己利益的新社会范畴。此外，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城市中等阶级的不同阶层，以及至少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相互对峙，而又主要是在日益强有力的国家的庇护下达成了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书 目 评 论

缩写全称对照表

本卷书目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书籍和杂志在行文中使用下列缩写：

缩写	全称
AESC	《经济、社会、文化纪事》季刊
CHLA	《剑桥拉丁美洲史》
HAHR	《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
HM	《墨西哥历史》杂志
JGSWGL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
JLAS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
LARR	《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1. 墨西哥　重建的共和国和波菲里奥时代（1867—1910年）

专门研究1867—1910年墨西哥历史的墨西哥最知名历史学家之一，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于1958年说，除了1867—1876年重建共和国时期，仅仅关于1876—1910年波菲里奥时代的书籍和小册子就写了将近2,000本。然而，除了若干突出的例外以外，关于墨西哥历史这一时期的最重要著作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关于1867—1910年时期，尤其是关于波菲里奥时代的二次文献，在下列著作中作了评述：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波菲里奥时代：编史学或史学》，载《美洲的末日》（墨西哥，1949）第113—182页；小约翰·沃马克《1959—1969年的政治编史学》，

载《关于墨西哥历史的当代研究》(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1)；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墨西哥编史学中的权力和争取权力的斗争》(墨西哥,1980)；以及1984年托马斯·本杰明和马西亚尔·奥卡西奥—梅伦德斯，《追忆现代墨西哥：透视波菲里奥时期编史学（19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载1984年《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杂志64卷第2期第（323—364页）。对1867到1910年整个时期最重要、最全面的著作是由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主编的十三卷不朽巨著《墨西哥现代史》(墨 西哥,1958—1972)。这套丛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编写的，在科西奥的指导下，一批历史学家收集了墨西哥、美国和欧洲档案馆中可以找到的每份证据，研讨墨西哥各方面的生活，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以及学术史。

832

总的来说，重建共和国时期所引起的议论、争论和著作要比随后的迪亚斯时期所引起的少得多。对较早时期的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华雷斯这个人及其政府的政策方面，以及关于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基础方面。例如，请查看赫苏斯·雷耶斯·赫罗列斯撰写的《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墨西哥，1957)，以及《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书目评论文章第10节。关于华雷斯政权是否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根本上不同的问题，有3种很不同的观点：(1)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著《忠诚的华雷斯和关于干涉以及帝国的真相》(巴黎，1904)；(2)科西奥·比列加斯主编:《墨西哥现代史》第1卷；(3)以及劳伦斯·B·佩里著《华雷斯与迪亚斯，墨西哥的政治机器》(迪卡尔布，1978)。莱多的总统职位没有引起这样的争论。科西奥·比列加期的阐述和弗兰克·A·克纳普撰写的《1823—1899年塞巴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生平》(奥斯汀，1951)一书中的阐述，没有真正的明显差别。

四本当代的或接近当代的著作可以代表对波菲里奥时代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胡斯托·谢拉著《墨西哥及其社会演变》(墨西哥,1901)；这是一本由最知名的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知识分子

所编写的多卷集，对迪亚斯政权进行了自我描绘和自我辩解；还有由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撰写的《忠诚的迪亚斯及其革命》（墨西哥，1920），这是支持迪亚斯政权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及以后时期里最带批判性和聪明的迪亚斯政权捍卫者写的又一本著作；还有约翰·肯尼思·特纳著《野蛮的墨西哥》（1910年第2版；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9年重印），和卡尔顿·比尔斯著《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纽约，1932），该两本著作均由美国人编写，它对迪亚斯政权进行了最强烈的控诉。何塞·C·巴拉赫斯著《波菲里奥主义：一个政权的历史》三卷集（墨西哥，1941—1947），这是一本利用大量迄今得不到的该政权的内部文件编写的、对迪亚斯政权进行首次全面评价的著作。

同1867到1910年墨西哥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最重要的争论点之一，是对墨西哥经济不发达原因的讨论。那是不是主要由于迪亚斯的权放任主义经济的结果？或者说墨西哥的不发达主要是由于继承了殖民地时期遗产，和墨西哥独立以后最初50年里连续不断的内战？是否对过去的发展真的有另一种选择？外国投资和渗透的影响是什么？能否把那个时期的墨西哥经济特征说成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的？对墨西哥的情况可以应用那些更普遍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等等）？以下各书对这些问题作了很不同的论述：西罗·卡多佐主编的《19世纪的墨西哥：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墨西哥，1980）约翰·科茨沃思著《有害发展的增长：铁路在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的经济影响》（迪卡尔布，1980年西班牙文版；墨西哥，1976；和墨西哥，1984年第2版）；塞尔希奥·德拉培尼亚著《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形成》（墨西哥，1976）；以及恩里克·西奥主编的《波菲里奥专政下的墨西哥》（1983，墨西哥）。 833

对迪亚斯时期争论和讨论中心的第二个问题，可以广泛地概括为土地问题。这包括各种不同的问题。征收自由村庄土地的重要

性如何？这种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怎样？墨西哥大庄园存在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劳工主要是自由的吗？还是雇用日工才是庄园劳工的主要形式？大庄园主主要是首先考虑权力和威望的封建地主，还是最大限度谋求利润和采取经济合理决策的资本家？土地问题讨论的主题是由波菲里奥时期写作的两位作者提出来的：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著《重大的民族问题》（墨西哥，1909）；和威斯塔诺·路易斯·奥罗斯科著《关于未开垦土地的立法和法律》二卷本（墨西哥，1895）。从1910年到今天，事实上所有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不管怎么说都是或者肯定、或者驳斥或者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论述这两位作者阐明的理论。以下几篇著作对土地问题持有一些很不同的观点：弗里德里希·卡茨著《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大庄园的劳动条件，某种倾向和趋势》，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51卷第1期，（第1—47页，1974）；卡茨主编的《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土地农奴制度》（墨西哥，1977）；弗兰克·坦南鲍姆著《墨西哥的土地革命》（华盛顿，1929）；阿图罗·沃曼著《我们起来反对。莫雷洛斯州的农民和民族状况》（墨西哥，1976）；英译本（巴尔的摩，1981）。

834

墨西哥国家的性质、实际权力和效力是较新的讨论题目。以下著作中有不同观点的研讨：约翰·H·科茨沃思著《墨西哥现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载《国际法庭》第16期205—232页（1975年），以及胡安·费利佩·莱亚尔著《资产阶级和墨西哥》（墨西哥，1972）。关于国家性质的讨论与研究重建共和国时期以及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有关，首先与实证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有密切联系。例如，阿纳尔多·科尔多瓦著《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新制度的建立》（墨西哥，1973）；威廉·D·拉特著《波菲里奥时期的实证主义，1876—1910年》（墨西哥，1975）；以及莱奥波尔多·塞亚著《墨西哥的实证主义》（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4）。

对中央政府权力分析最重要的结果必然是研讨区域和地方机构的重要性和影响。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不仅由历史学家，而且

还由人类学家进行了研究。例如，请看保罗·弗里德里希著《一个墨西哥村庄的土地革命》（新泽西，1970）；路易斯·贡萨雷斯和贡萨雷斯著《忧虑的人民：圣何塞德加西亚的微观历史》（墨西哥，1967），英译本《圣何塞德加西亚：墨西哥农村在转变中》（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4）；G·M·约瑟夫著《外来的革命，尤卡坦、墨西哥和美国（1880—1924年）》（剑桥，1982）；马克·沃瑟曼著《资本家、部落酋长和革命：奇瓦瓦的上层统治集团和外国企业（1854—1911年）》，（查珀尔希尔，1984）；约翰·沃马克著《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纽约，1969）；赫克托·阿吉拉尔·卡明著《游牧边疆：索诺拉和墨西哥革命》（墨西哥，1977）。

上述对地方问题的研究著作必定与分析波菲里奥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种社会阶级的情况联系起来；除了对农民，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方面。对此请看罗德尼·安德森著《本国土地上的弃儿：1906—1911年墨西哥的产业工人》（迪卡尔布，1976）；西罗·F·S·卡多佐、弗朗西斯科·G·埃莫西利奥和萨尔瓦多·埃尔南德斯著《在无政府主义时期波菲里奥专政下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阶级》（墨西哥，1980）；约翰·M·哈特著《无政府主义和墨西哥工人阶级（1860—1931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8）；胡安·费利佩·莱亚尔和何塞·沃尔顿伯格著《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阶级：波菲里奥专政初期的自由派国家》（墨西哥，1980）；和戴维·沃克著《波菲里奥的劳工政治：墨西哥城的工人阶级组织，以及1876—1902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载《美洲》第37期257—287页（1981年1月号）。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请看赫苏斯·席尔瓦·埃尔佐格著《墨西哥土地主义和土地改革》（墨西哥，1964），和詹姆斯·科克罗夫特著《1900—1913年墨西哥革命的知识分子先驱者》（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8）。

曾经发生长期、不同争论的另一个题目，便是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与其它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这一段时期唯一可以找

835

到的主要档案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卷宗，墨西哥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墨西哥关系上，而不顾其它国家。这种情况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变化，那时丹尼尔·科西奥·北列加斯已能够不仅参阅美国，而且还参阅了至今得不到的墨西哥历史档案。结果，他撰写了一本著作，详细分析了1867—1910年间墨西哥—美国关系：《美国对波菲里奥·迪亚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63）。不同于美国的档案仅限于30年，绝大多数欧洲档案都有50年期限，有关迪亚斯时期墨西哥与主要欧洲大国关系的一些著作，在更晚时期出版。关于这方面，请看阿尔弗雷德·蒂申多夫著《大不列颠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61）；弗里德里希·卡茨著《德国、迪亚斯和墨西哥革命：1870—1920年德国在墨西哥的政策》（柏林，1964）。

2．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

已刊印的资料、书目和编年史

W·D·拉特著《墨西哥革命—最新学术著作注释指南》（波士顿，1982）是关于墨西哥革命文献中内容最新、最广和编纂最好的一本指南手册。L·贡萨雷斯和贡萨雷斯主编的《墨西哥现代史基础：书籍和小册子》三卷集（墨西哥，1962—1963），以及S·R·罗斯主编的《墨西哥现代史基础：报纸和杂志》四卷集（墨西哥，1965—1976），是有关墨西哥官方文件、小册子、报纸、声明和已出版信件的必不可少的指南。已刊印的资料中最重要的著作是I·法韦拉和J·E·德法韦拉合编的《墨西哥革命历史文献》二十七卷集及附注（墨西哥，1960—1976）。M·贡萨雷斯·拉米雷斯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历史基础》四卷集（墨西哥，1954—1957）是墨西哥报刊的很有用的重印材料。

836 最新的书目以及对墨西哥革命文献主要倾向进行分析的编年史文章包括以下几本：D·M·贝利著《修正主义和墨西哥革命的

最新编年史》，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1卷58期第62—79页（1978）；G·布林加斯和D·马什卡雷尼奥合著《1870—1970年墨西哥工人的刊物，半球评论》（墨西哥，1979）；C·W·雷诺著《20世纪墨西哥的经济编年史》，载《关于墨西哥历史的当代研究：墨西哥和北美第三次历史性合作的回忆》第339—357页（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1）；J·D·拉瑟福德著《墨西哥革命小说注释书目》（特洛伊，1972）；E·苏亚雷斯·高纳主编《墨西哥工人运动书目》（墨西哥，1978），H·W·托布勒著《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编年史》，载《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第12卷，286—331页（1975）；J·小沃马克著《1959—1969年墨西哥政治编年史》，载《当代研究》第478—492页；《墨西哥劳工编年史》，载《劳动和墨西哥劳工史，墨西哥和北美第5次历史学家会议提供的调查报告和评论》第739—756页（墨西哥和图森，1979）；以及《1910—1920年革命期间的墨西哥经济：编年史和分析》，载《马克思主义展望》第4卷第1期，第80—123页（1978）。

概论和说明

J·C·巴拉德斯著《墨西哥革命史概论》第1—7卷（十卷集 墨西哥，1963—1967），是最完整和最好的墨西哥革命编年史。

以下这些著作都突出了多少是以捍卫墨西哥革命作为人民的伟大胜利这个旧标准的：M·S·阿尔佩洛维奇·B·T·鲁登科和N·M·拉夫罗夫合著的《墨西哥革命：第四次苏维埃研究》（墨西哥，1960）；A·布伦纳著《席卷墨西哥的狂风：墨西哥革命史》（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1）；M·贡萨雷斯·拉米雷斯著《墨西哥的社会革命》三卷集，（墨西哥，1960—1966）；J·席尔瓦·埃尔佐格著《墨西哥革命简史》二卷集（墨西哥，1960）；F·坦南鲍姆著《通过革命赢得的和平：对墨西哥的说

明》（纽约，1933）；E·沃尔夫著《20世纪的农民战争》(纽约，1969）。

以下这些著作都突出了多少是以对墨西哥革命抱有敌意这个们标准的：F·布尔内斯著《真诚的迪亚斯和革命》（墨西哥，1920）；E·格吕宁著《墨西哥及其传统》（纽约，1928）；W·汤普森著《墨西哥人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生活？》（纽约，1921）；E·D·特罗布里奇著《墨西哥的今天和明天》（纽约，1919）；J·贝拉·埃斯塔尼奥尔著《墨西哥革命史：起因和结果》（墨西哥，1957）。

837 在新的著作中，最有启发性的文章是：彼得·卡尔弗特著《墨西哥革命：理论还是实际？》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第1卷第1期，第51—68页（1969）；巴里·卡尔著《论述1880—1927年墨西哥北部的特征文丛》，载《墨西哥历史》第3卷第22期，第第320—346页（1973）；弗朗索瓦斯第十·格拉著《墨西哥革命：矿工革命风暴？》，载《分析：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5卷第36期，第785—814页（1981）；让·A·梅耶著《周期性和意识形态》，载《当代墨西哥：第4次墨西哥史国际会议文件集》第711—722页（洛杉矶和墨西哥，1976）；艾伯特·L·迈克尔斯和马文·D·伯恩斯坦著《旧秩序的现代化：20世纪墨西哥历史的体制和周期》，载《当代墨西哥》第687—710页；以及恩里克·西莫著《墨西哥历史上的几次革命》，载《历史与社会》第2集，第49—61页（1975年第8期）。

对历史资料作重新分析的主要著作是：J·D·科克罗夫特著《墨西哥：阶级形成、资本积累和国家》（纽约，1983）；A·科尔多瓦著《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新制度的建立》(墨西哥，1973）；A·吉科著《墨西哥革命》（伦敦，1983）；N·M·拉夫罗夫著《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墨西哥，1978）；让·梅耶著《墨西哥革命》（巴黎，1973）；R·E·鲁伊斯著《伟大的起义，墨西哥，1905—1924年》（纽约，1980）。

对外关系、政治和战争

关于这些主题的作品极其丰富。涉及这三方面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弗里德里希·卡茨著《墨西哥的秘密战争；欧洲、美国；和墨西哥革命》（芝加哥，1981）。这一范畴的其它著名研究著作着重于国家的某些特殊问题。这类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外关系。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几乎都是叙述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了解这个问题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是阿瑟·S·林克的著作：《威尔逊：新的自由》（普林斯顿，1956），《威尔逊：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普林斯顿，1960），《威尔逊：混乱和危机，1915—1916年》（普林斯顿，1960），以及《威尔逊：争取循序渐进与和平的竞选，1916—1917年》（普林斯顿，1965）。

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最全面地叙述这个问题的两篇著作是：M·S·阿尔珀洛维奇和B·T·鲁登科合著《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和美国的政策》（墨西哥，1960）和P·E·哈利著《革命与干涉，塔夫脱和威尔逊对墨西哥的外交，1910—1917年》（剑桥，1970）。下列各书的观点至少也很开阔，但在时间上更为集中：P·卡尔韦特著《墨西哥革命，1910—1914年；美英冲突外交》（剑桥，1968）；M·T·吉尔德赫斯著《外交与革命：威尔逊和卡兰萨时期的美墨关系》（图森，1977）；K·J·格里勃著》美国与韦尔塔》（林肯，1969）；R·F·史密斯著《美国和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1916—1932年》（芝加哥，1972）；以及B·乌略亚著《对革命的干涉：1910—1914年间墨西哥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墨西哥，1971）。

838

石油和弗朗西斯科小镇是引起墨美关系恶化的两个特殊问题。关于石油问题，请看洛伦索·梅耶著《墨西哥和美国的石油冲突（1917—1942年）》（墨西哥，1968）及其英译本（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7）；丹尼斯·J·奥布赖恩著《石油和干涉，1917—1918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载《墨西哥历史》第1卷第27期，第

103—140页（1977）；以及埃米莉·S·罗森伯格著《英美对墨西哥外交的经济压力（1917—1918年）》，载《美洲研究和世界事务杂志》第2卷第17期，第123—152页（1975）。关于小镇问题，请看克拉伦斯·C·克伦德宁著《美国和潘丘小镇，非常规外交的一项研究》（伊萨卡，1981）；以及阿尔韦托·萨利纳斯·卡兰萨著《讨罚性的远征》（墨西哥，1957年第2版）。在墨西哥革命时期，较不重要但仍有相当份量的对外问题，还有下列著作中研究的一些主题：拉里·D·希尔著《向革命派出的使者：伍德罗·威尔逊的墨西哥事务执行代表》（巴顿·鲁格，1973），和W·德克·拉特著《骚乱：在美国的墨西哥叛乱分子，1903—1923年》（得克萨斯州，1981）。

关于政治问题的书籍和文章数不胜数，这类作品都阐述统治和管理联邦政府的斗争。近代的一些报告尤其引人入胜，它们是：H·贝莱恩著《墨西哥：不安定的国家》（费城，1914年第2版）；E·I·贝尔著《墨西哥的政治耻辱》（纽约，1914）；J·L·德贝克尔著《De cómo vino Huerta, y cómo se fué军政权历史笔记》（墨西哥，1914）；R·普利达著《无政府状态下的独裁者》（墨西哥，1958年第2版）。虽然有一些回忆录偏颇，但揭露许多情况，其中有A·布雷采达著《1913—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者》二卷集（马德里，1920和墨西哥，1914）；F·贡萨雷斯·加尔萨著《墨西哥革命：我的政治和学术贡献》（墨西哥，1936）；F·F帕拉维西尼著《争论者》（墨西哥，1976年第2版），《1917年宪法史》二卷集（墨西哥，1938）；和《我的革命生涯》（墨西哥，1937）；A·J·帕尼著《自传笔记》二卷集（墨西哥，1950年第2版）和《我对新政权的贡献，1910—1933年》（墨西哥，1936）。

839 革命政治初期和中期阶段第一批的专业性历史，仍将是最好的概括性研究文章，尽管其中有些错误和遗漏。这些著作有：C·C·坎伯兰著《墨西哥革命，马德罗的创业》（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1952），和《墨西哥革命，立宪主义时期》（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2）。这个时期最新的政治历史概论，是B·乌略亚著《1914—1917年期间墨西哥的革命史》第4卷，《分裂的革命》（墨西哥，1979），第5卷，《1915年的阴谋》(墨西哥，1979)；以及第6卷《1917年宪法》（墨西哥，1983）。

政治性的专题著作典型地集中于传记内容。论述马德罗派政府的标准著作,仍将是斯坦利·R·罗斯著《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墨西哥民主的鼓吹者》(纽约，1955）。关于马德罗的主要军事将官及对手，请看迈克尔·C·梅耶著《墨西哥的叛乱；帕斯科尔·奥罗斯科和墨西哥革命，1910—1915年》(林肯，1967)。有关马德罗的保守的反对派最使人感兴趣的著作，仍然是路易斯·利希加撰写的《费利克斯·迪亚斯》（墨西哥，1958）。迈克尔·C·梅耶著《韦尔塔的政治写照》(林肯，1972)，则是关于这位推翻马德罗和触发护宪派运动的将军的典型著作。费德里科·塞万提斯著《弗朗西斯科·比科亚和革命》（墨西哥，1960）以及《革命时期的费利佩·安赫莱斯》(墨西哥，1964年第3版)这两本书显然有偏袒性和错误，但依然是资料最丰富的论述比利亚派运动的著作。关于论述卡兰萨和卡兰萨主义的书，请看阿尔瓦罗·马图特著《1917—1924年时期墨西哥革命史》第8卷《考迪略的经历》(墨西哥，1980)；道格拉斯·W·里士满著《1893—1920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民族主义斗争》（林肯，1984）；巴勃罗·小贡萨雷斯著《护宪主义忠实的哨兵》(蒙特雷，1971)收集编写了作者父亲的理想化传记。关于论述卡兰萨其它较幸运的军官的事迹，请看林达·霍尔著《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墨西哥1911—1920年的权力和革命》(得克萨斯，1981)。

关于论述集体行使政治权力的第一本专题著作，是罗伯特·E·夸克写的《1914—1915年墨西哥革命，阿瓜斯卡连特斯大会》（布卢明顿，1960）。这本书现在仍然值得赞扬。但论述同一题目的更好著作是路易斯·F·阿马亚的《1914—1916年革命的最

高权力会议》（墨西哥，1966）。E·维克托·小尼迈耶著《克雷塔罗的革命，1916—1917年墨西哥立宪会议》(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4）是最准确地描述发表新宪法的会议的一本书。对两次秘密会议进行有益的比较的著作，可阅读理查德·罗曼著《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阶级，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墨西哥，1976)。

关于军队参与政治的情况，最真实和最引人感兴趣的研究文章，是艾丽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著《墨西哥革命的军队和交易》，载《墨西哥历史》第3卷第35期（1985）。另一本关于军队的重要分析著作，是让·A·梅耶写的《1910—1930年墨西哥革命时的大公司、人民团体和国家军队》，载《美洲研究年鉴》第31期，第1005—1030页（1974）。

840

论述教会早期的最佳著作是让·A·梅耶著《1913年以前墨西哥的社会天主教》，载《历史概论》第260期143—159页(1978)。对中期和后期的情况，请看安东尼奥·里斯·法西奥斯著《1910—1925年早期的天主教和墨西哥革命》（墨西哥，1963），尽管它有原则性的偏颇。

唯一认真论述政治思想的著作是，詹姆斯·D·科克罗夫特写的《1900—1913年墨西哥革命的知识分子先驱者》（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8）。唯一真正关于机构的研究著作是马蒂·R·戈曼斯著《国家土地委员会历史》（墨西哥，1975）。唯一叙述政府预算政策和实施情况的著作，是詹姆斯·W·威尔基写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来的联邦开支和社会变革》（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67）。

许多当代的报告和专业性的历史著作提供了各省的政治情况。著名的著作是H·阿吉拉·卡曼写的《游牧边疆、索诺拉州和墨西哥革命》（墨西哥，1977)。还有二本关于索诺拉州的有益著作，是弗朗西斯科·阿尔马达的《索诺拉州的革命史》(墨西哥，1971），以及克洛多韦奥·巴伦苏埃拉和A·查韦里·马塔莫罗斯合写的《索诺拉州和卡兰萨》(墨西哥，1921)。关于马德

罗派起义期间加利福尼亚边境马戈尼派斗争的生动、详细叙述，可看洛厄尔·L·布莱斯德尔著《不毛之地的革命，下加利福尼亚，1911年》(麦迪逊，1962)。弗朗西斯科·阿尔马达著《奇瓦瓦州的革命历史》二卷集(墨西哥，1964—1965)，和威廉·H·比斯莱著《造反的州长阿伯拉罕·贡萨雷斯和奇瓦瓦州的墨西哥革命》(林肯，1973)，是两本论述奇瓦瓦州的最好著作。唯一值得称赞的介绍东北部州的书是，伊尔德卡索·维拉雷洛·贝莱斯著《科阿韦拉州的墨西哥革命历史》(墨西哥，1970)。

关于墨西哥其它地区政治情况的研究著作中，最好的著作是：罗曼纳·福尔肯的《革命与酋长统治：圣路易斯波托西州(1910—1938年)》(墨西哥，1984)；艾丽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的《1914—1920年恰帕斯州最后的防卫》，载《墨西哥历史》第3卷28期，第335—369页(1979)；伊恩·雅各布斯的《村民的叛乱：格雷罗州的墨西哥革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3)；以及吉尔伯特·M·约瑟夫的《外来的革命：尤卡坦、墨西哥和美国，1880—1924年》(剑桥，1982)。还可以看戴维·A·布拉定主编的《墨西哥革命中的考迪略和农民》(剑桥，1980)。

关于1910年和1920年间墨西哥战争的著作，最重要的还是J·巴拉贡著《军队和护宪派革命史》二卷集(墨西哥，1946)。还有一本宝贵的著作是迈格尔·A·桑切斯·拉梅戈的《护宪派革命的军事史》四卷集(墨西哥，1956—1957)。专门论述护宪派和卡兰萨派运动的情况，请看曼努埃尔。W·贡萨雷斯回忆录《同卡兰萨在一起、1913—1914年护宪派革命的故事》(蒙特雷，1933)，和《反对比利亚、1914—1915年运动的故事》(墨西哥，1935)，以及阿尔瓦罗。奥夫雷贡著《八千公里运动》(墨西哥，1959年第3版)。关于论述比利亚派运动的详细情况，请看阿尔韦托·卡尔萨迪亚斯·巴雷拉著《革命的壮丽火把》五卷集(墨西哥，1967—1968)。

841

农民和工人运动

论述农民和工人的著作数不胜数。实际上从1910到1920年墨西哥所有的革命运动、反革命运动、独立运动和中立派运动都是属于“农民”和“工人”的运动。但是农民为农民的运动，或工人为工人的运动，即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却不在其列，不占主导。

由于至今还没有一本讨论农民历史的书籍，对1910到1920年农民历史描述最确切、最有启发性的手册，是F·卡茨著《1910年墨西哥革命中的农民》，刊载于J·施皮伯格和S·怀特福德合编的《稳步前进的民族、农村骚动和叛乱的比较研究》第61—85页，（兰辛，1976）。

汉斯·W·托布勒著《墨西哥革命中的农民暴动与土地改革》，也是值得一读的；此文刊载于曼弗雷德·莫尔斯和汉斯·W·托布勒合著《墨西哥，一成不变的革命》第115—170页（科隆，1976）。说明1910年农业和牧场产业分配直到20年代变化不大的情况，请看弗兰克·坦南鲍姆的名作《墨西哥土地革命》（华盛顿，1929）。

关于农民运动最令人感兴趣的专题著作都集中叙述各省的情况。关于北部的情况，请看弗里德里希·卡茨著《1913—1915年比利亚统治时期墨西哥北部的土地变革》，载《当代墨西哥》第259—273页。关于中西部米却肯的情况，请看保罗·弗里德里希著《一个墨西哥农村的农民起义》（新泽西，1970）。关于墨西哥中东部的情况，请看雷蒙·J·布维著《1910—1917年墨西哥特拉斯卡拉革命期间的农民运动、考迪略和土地改革》，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公报》第18期第112—152页（1975）；以及《1917—1923年特拉斯卡拉州纳蒂维达斯山谷的农民动员和土地改革》，载《劳动与工人》第533—564页。南方特别是莫雷洛斯州，是墨西哥最著名、非凡和重要的农民运动——萨帕塔运动的故乡。关于他们的斗争情况，有一些文章和书籍，其中最好的有：弗朗索瓦·舍瓦利耶著

842

《墨西哥农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1911—1919年的萨帕塔的起义》，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1卷第16期，第66—82页（1961）；希尔达多·马加尼亚著《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墨西哥的平均地权》五卷集（墨西哥，1951—1952年第2版）；赫苏斯·索特洛·因克兰著《萨帕塔的根基和理性》（墨西哥，1970年第2版）；和约翰·小沃马克著《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纽约，1968）。关于重要的、解说性的比较，可阅读罗纳德·沃特伯里著《不革命的农民：墨西哥革命中瓦哈卡州同莫雷洛斯州的比较》，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7卷第4期，第410—442页（1975）。

V·隆巴尔多·托莱达诺著《墨西哥的自由工会》（墨西哥，1974年第2版），是叙述革命年代工人运动的第一本概览，而且仍然是有用的作品。其它两本老的劳工史情况也是这样：M·R·克拉克著《墨西哥的有组织劳工》（查珀尔希尔，1934）和A·洛佩斯·阿帕里西奥著《墨西哥工人运动：前提、发展和趋势》（墨西哥，1952年第2版）。

对这段历史提出重大修改线索的重要文章是马塞拉·德·内曼特著《工人运动和墨西哥革命》，载《历史和社会》第一辑第9期，第56—73页（1967）。两本不同的重新分析的劳工史是巴里·卡尔著《工人运动和墨西哥政治，1910—1929年》二卷集（墨西哥，1976）和拉蒙·E·鲁伊斯著《1911—1923年，墨西哥工人和有矛盾心理的革命者》（巴尔的摩，1976）。新近的著名概论是塞尔希奥·德拉培尼亚著《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阶级》第4卷，载《20世纪的工人和社会》（墨西哥，1984）。

意识形态以及假定的或实际的国家联邦，是引起人们极大注意的劳工史中的特殊问题。关于意识形态，请看巴里·卡尔著《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1910—1919年墨西哥共产党成立的作用，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63卷第2期，第277—305页（1983）；弗朗索瓦·X·格拉著《从西班牙到墨西哥：无政府主义环境与墨西哥革命（1910—1915）》载《贝拉斯克斯家族杂论集》第9

辑第653—687页（1973）；以及约翰·M·哈特著《无政府主义和墨西哥工人阶级（1860—1931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8）。关于1914—1915年著名的第一联邦政府，及其“红色大队”的情况）请看巴里·卡尔著《世界工人之家、立宪主义及1915年2月条约》，载《劳动和工人》第603—632页；约翰·M·哈特著《城市工人阶级和墨西哥革命，世界工人之家实例》，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58卷第1期，第1—20页（1978）；艾丽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著《红色大队和奥夫雷贡：不稳定的条约》未发表的手稿（1979）；和让·A·迈耶著《墨西哥革命中的奥夫雷贡派，红色大队》，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25卷第1期，第30—55页（1970）。关于第一个真正联邦政府的情况，请看罗西奥。瓜达拉马著《墨西哥的工会和政治：“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1918—1928年）》（墨西哥，1981）；巴勃罗·贡萨雷斯·卡萨诺瓦著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阶级》第6卷，《第一个立宪政府（1917—1920年）》（墨西哥，1980）；以及哈雷·A·莱文斯坦著《美国和墨西哥的工人组织及其关系史》（康涅狄格州西港，1971）。

只有两本著名的书籍论述关于某个具体工业中的工会情况，恰巧这也是墨西哥所有工业中最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与其说是一本研究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回忆录。它们是：塞尔万多·A·阿尔萨特的《墨西哥全国铁路公司墨西哥化的历史》（墨西哥，1946），和马尔塞洛·N·罗迪阿的《1890—1943年铁路工人运动史》（墨西哥，1944）。论述特定地区工会的著名著作只有两本：S·科夫·阿德逊著《政权的初期：坦皮科工人争取劳动权的斗争（1910—1920年）》，载《历史》第2卷，第85—101页（1982年10月版）；以及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普兰卡特著《护宪派革命时期的墨西哥城》（墨西哥，1941年第2版）。

工商业、经济和人口

关于这些题目的大多数旧作品和许多新作品的综合和注释的

书目请看约翰·小沃马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书中以上列举的文章。D·G·洛佩斯·罗萨多著《历史和墨西哥的经济略图》六卷集(墨西哥，1968—1974)虽然有些令人失望，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读物。

任何时期墨西哥的工商业史，都是缺乏自信、内容贫乏和含糊不清的。可是在别的研究著作中还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论断和重要的细节。论述革命时期重要工业的著作，请看弗雷德·W·鲍威尔著《墨西哥的铁路》(波士顿，1921)；马文·D·伯恩斯坦著《墨西哥的采矿业(1890—1950年)：关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相互影响的研究》(奥尔巴尼，1964)；曼努埃尔·G·小马克阿多著《墨西哥北部的牲畜业(1910—1975年)：思想、冲突和变化》(得克萨斯州，1890)；贡萨洛·卡马拉·萨瓦拉著《直至1919年的尤卡坦工业史》，载《尤卡坦大百科全书》第3卷，第657—725页(8卷集，墨西哥，1947)；以及恩里克·阿兹纳·门多萨著《1919年至今的尤卡坦工业史》，载《尤卡坦大百科全书》第3卷，第727—787页。论述银行业的情况，最有用的著作是：安东尼奥。马内罗著《1865—1955年墨西哥的金融革命》(墨西哥，1957)；沃尔特·F·麦凯莱布著《墨西哥银行业今昔》(纽约，1920)，和《墨西哥的公共财政》(纽约，1921)；以及埃德加·特林顿著《墨西哥及其外国债权人》(纽约，1930)。关于公司和企业家的情况，请看本杰明·T·哈科逊著《钱德勒·安德逊和墨西哥的企业界：1913—1920年经济界无法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载《泛美经济事务》第3卷第33期，第3—23页(1979)；丁·C·M·奥格尔斯比著《来自边远北方的外国佬：1866—1968年加拿大—拉丁美洲关系史文集》(多伦多，1976)，和胡利奥·里克尔梅·因达著《40年的观察：1917—1957年》(墨西哥，1957)。 844

关于革命时期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情况最有启发性的书籍仍然是：C·L·琼斯著《墨西哥及其重建》(纽约，1921)，和W·汤普森著《与墨西哥的贸易》(纽约，1921)。经济史中著名的研究著

作有：唐纳·B·基辛著《早期发展的结构变革：1895—1950年墨西哥变化中的工业和职业结构》，载《经济史杂志》第4卷第29期，第716—738页（1969）；以及埃德温·W·凯默勒著《通货膨胀和革命：1912—1917年墨西哥的经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40）。还请看弗里德里克·毛罗著《1890—1960年蒙特雷的经济发展》，载卡拉韦尔著《论述西班牙裔人与葡属巴西人文集》第二辑第35—126页（1964），以及伊西德罗·比斯卡亚·卡纳莱斯著《蒙特雷工业化的开端：从第二帝国末到革命结束，1867—19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史》（蒙特雷，1969）。

关于人口问题的最重要著作是莫伊塞斯·贡萨雷斯·纳瓦罗著《墨西哥的人口和社会（1900—1970年）》；二卷集（墨西哥，1974）。还请看罗伯特·G·格里尔著《1910—1921年墨西哥革命对人口的影响》未发表的1966年手稿。

文化与画象

关于革命的小说和壁画有一大批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几乎全845 是革命以后的现象。有三位作家实际上一生经历革命，并根据记忆写成了关于革命的作品：M·阿苏埃拉全集（三卷集，墨西哥，1958—1960）；M·L·古斯曼著《鹰和蛇》（马德里，1928）；和《潘乔·比利亚回忆录》四卷集（墨西哥，1938—1940）；以及J·巴斯孔塞洛斯著《生于拉丁美洲的乌利塞斯人》（墨西哥，1935），以及《暴风骤雨》（墨西哥，1936）。

另一本有用的现代作品是约翰·里德著《造反的墨西哥》（纽约，1914）。还请看约翰。D·拉瑟弗德著《革命时期的墨西哥社会：文学观》（牛津，1971）；以及默尔·E·西蒙斯著《作为研究现代墨西哥（1870—1950年）资料的墨西哥民歌》（布卢明顿，1957）。在大量的摄影集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画象：G·卡萨索拉《1900—1970年墨西哥革命画史》，第2—5卷（十卷集，墨西哥，1973）。图象创作和收集的最重要研究著作是A·德格斯雷耶

斯的《1896—1930年墨西哥的电影和社会》（墨西哥，1981）。

3．墨西哥：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建

R·波塔什著《1821年以来墨西哥的编年史》，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3卷，第40期(1960)，尽管目前已经过时，但仍然是很有用的资料。戴维·M·贝利著《修正主义和墨西哥革命的最新编年史》，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1卷，第58期（1978）是论述墨西哥革命的著作的杰出的新近作品。还请看巴里·卡尔著《墨西哥革命的最新区域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1卷，第15期（1980）。墨西哥和美国历史学家进行的定期会谈活动情况，对最新的研究调查都是十分宝贵的。有1969年瓦哈特佩斯会议的资料《关于墨西哥历史的现代调查研究》（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和墨西哥，1971）；1973年圣莫尼卡会议的资料《现代墨西哥》（洛杉矶和墨西哥，1976）；1977年帕兹瓜洛会议的资料《劳动和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墨西哥和图森，1979）。

在综合性的著作中，豪尔赫·贝拉·埃斯塔尼奥尔著《墨西哥革命史：起源与结果》（墨西哥，1957）仍然十分有用，即便有点陈旧和沉闷。何塞·C·巴拉德斯著《墨西哥革命历史概况》五卷集（墨西哥，1976），远超出一般的历史，这本著作有许多其它方面难得的资料，而且见识卓越。约翰·W·F·杜勒斯著《墨西哥的昨天：1919—1936年革命编年史》（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1）是对这一时期详细的记叙作品。古斯塔沃·卡萨索拉著1900—1970年墨西哥革命编年史》十卷集（墨西哥，1973）是一本重要的图片集。最新的综合作品有：阿道福·吉利著《暂时停止的革命》（墨西哥，1972）；阿纳尔多·科尔多瓦著《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墨西哥，1973)，该书进行了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及让·梅耶著《墨西哥革命》（巴黎，1973）。

846

美国作家中有许多人与墨西哥领导人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杰作即使已经过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查尔斯·哈凯特著

《墨西哥革命和美国》（波士顿，1926）；弗兰克·坦南鲍姆著《墨西哥的土地革命》（华盛顿，1929）和《通过革命谋求和平》（纽约，1933）；威尔弗里德·哈迪·考尔科特著《1857—1929年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史坦福，1931）；E·N·辛普森著《村社，墨西哥的出路》（北卡罗来纳州，1937），以及欧内斯特·格吕宁著《墨西哥及其遗产》（纽约，1928）。霍华德·克莱因著《美国与墨西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3）代表美国早期论述墨西哥革命的最佳学术著作。还请看查尔斯·坎伯兰著《墨西哥：争取现代化的斗争》（纽约，1968）。

墨西哥修正主义最佳的作品，可从路易斯·贡萨雷斯和贡萨雷斯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史》（墨西哥，1977）中找到。论述1924—1928年卡列斯政府的第10卷和第11卷，由恩列克·克劳茨和让·梅耶著；论述1929—1934年马克西马托政府的情况，由洛伦索·梅耶、拉斐尔·塞戈维亚、亚历杭德拉·拉霍斯和比阿特丽斯·罗哈斯合著。美国政治科学家编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彼得·史密斯的《权力的迷宫：20世纪墨西哥在政治上网罗人才》（普林斯顿，1978），阐述了整个世纪并为革命准备了新的理论，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杰作。

对奥夫雷贡或对卡列斯，都没有一本好的传纪，但关于奥夫雷贡早期的生涯，请看琳达·B·霍尔著《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911—1920年政权和墨西哥革命》（得克萨斯州，1981）。纳业索·巴索尔斯·巴塔利亚著《奥夫雷贡的政治思想》（墨西哥，1967）是一本很有用的书，豪尔赫·普列托·劳伦斯的回忆录《墨西哥政治50年》（墨西哥，1968），以及阿尔韦托·J·帕尼著《我对1910—1933年新政权的贡献》（墨西哥，1936）也是很有用的作品。何塞。巴斯孔塞略斯是很重要的知名人士和作家，这是人们不会忽略的。请看他在《全集》四卷集（墨西哥，1957—1961）中的回忆录，以及关于他的一本专集，约翰·斯基利乌斯的《巴斯孔塞略斯和1929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墨西哥，1978）。弗朗西斯科·

哈维尔·加克西奥拉著《罗德里格斯总统(1932—1934年)》(墨西哥，1938)，仍不失为一本叙述最后一任马克西马托政府的最佳作品。

关于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罗伯特·F·史密斯著《美国和1919—1932年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芝加哥，1972)仍然是对这一时期最佳的研究作品，尽管关于墨西哥的事件叙述稍嫌不足。墨西哥的观点反映在路易斯。G·索里利亚著《1800—1958年墨西哥和美国关系史》二卷集(墨西哥，1965)以及洛伦索·梅耶著《1917—1942年墨西哥和美国在石油问题上的冲突》(墨西哥，1968,英译本为得克萨斯奥斯汀,1977)。乔治·W·格雷森著《墨西哥的石油政治》(匹兹堡，1980)是论述这一主题的最新作品。

847

区域和地方政治已成为重要的新研究课题。例如，关于东南部各州的政治首领情况，请看费利佩·卡利略·普埃尔托、弗朗西斯科·保利和恩里克·蒙塔尔沃合著《尤卡坦的和平社会主义》(墨西哥，1977)；G·M·约瑟夫著《虚弱的革命：尤卡坦的大地主革命》，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1卷，第15期(1980)，和《外来的革命：1880—1924年墨西哥尤卡坦和美国》(剑桥，1982)；以及加里多·卡纳巴尔、卡洛斯·马丁内斯·阿萨德合著《革命的实验室》(墨西哥，1979)。戴维·布雷亭主编《墨西哥革命中的考迪略和农民》(剑桥，1980)，包括关于奇瓦瓦州、格雷罗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米却肯州、韦拉克鲁斯州、特拉斯卡拉州以及尤卡坦州的情况。

由于没有认真地理解克里斯蒂洛运动，这场革命的正确内容被歪曲了。但请看戴维·贝利著《克里斯托·雷万岁！克里斯蒂洛起义和墨西哥的教会与国家的冲突》(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4)；让·梅耶著《克里斯托派》三卷集(墨西哥，1978)和《克里斯蒂洛起义、1926—1929年处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墨西哥人民》(剑桥，1976)，路易斯·贡萨雷斯和贡萨雷斯著《焦虑不安的人民：圣何塞—德格拉西亚的微观历史》(墨西哥，1967)打

开了墨西哥地方史的新境界。在这些书里20世纪20年代至少在西部和中部各州被描述为真正的革命年代，但是农民们认为这场革命是残杀性的启示录。

对这个时期的劳工研究著作甚少，但可看上面提到的《劳动与工人》这本书。马乔里·R·克拉克著《墨西哥的有组织劳工》（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4）仍然是半个世纪以后论述这一主题的最佳作品。阿方索·洛佩斯·阿帕里西奥著《墨西哥的工与运动：前提、发展与趋向》（墨西哥，1952），是一本短篇但是很优秀的作品。巴里·卡尔著《1910—1929年工人运动和墨西哥政治》二卷集（墨西哥，1976）是描述到1924年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还可以看拉蒙·E·鲁伊斯著《工人与有矛盾心理的革命者，1911—1923年的墨西哥》（巴尔的摩，1976）。

这一时期墨西哥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始终是被人描写的主要内容。保罗·泰勒著《阿兰德斯，西班牙墨西哥的农民社团》（伯克利，1933）是一本开拓性的作品，而内森·L·惠滕著《墨西哥农村》（芝加哥，1948）是一本杰出的著作。还请看辛普森著《村社》和以上提到的坦南鲍姆著《墨西哥的土地革命》。马尔特·R·戈麦斯著《墨西哥土地改革：1928—1934年间的危机》（墨西哥，1964），是这一时期一位政治活动家的作品。保罗·弗里德里希著《一个墨西哥村落的土地起义》（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0），是论述20世纪20年代米却肯州情况的重要研究著作。关于这一领域最新出版的重要作品包括：希瑟·福勒·萨拉米尼著《1920—1938年韦拉克鲁斯的土地激进主义》（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8）；弗兰斯·J·施雷耶著《比萨弗洛雷斯的村民，20世纪墨西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多伦多，1980）；以及安·L·克雷格著《首批平均地权派，墨西哥土改运动的口述史》（伯克利，1983）。

848

4. 中美洲：自由派时代
（约1870—1930年）

在R·L·小伍德沃德的著作《中美洲，一个分裂的国家》（纽约，1976）第278—321页上刊有广泛的书目评述。

有三本书提出了对1870—1930年时期的总看法。它们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著《中美洲》（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5），这本书对美国的地峡政策比较赞成；伍德沃德著《中美洲》，以及西罗·卡多佐和赫克托·佩雷斯·布里格诺里合著《中美洲和西方经济（1520—1930年）》（圣何瑟，1977）。戴维·布朗宁著《萨尔瓦多，景色和社会》（牛津，1971）是对一个中美洲国家全面介绍的最佳作品。

关于中美洲咖啡经济的情况，请看C·卡多佐著《中美洲的咖啡经济史（19世纪），比较研究》，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10卷，第4期（1975），第9—55页。关于香蕉种植园的情况，综合性的著作有斯泰西·梅和加洛·普拉萨合著《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华盛顿特区，1958），该书是偏向这家公司的；查尔斯·凯普纳著《香蕉业的社会方面》（纽约，1936），还有凯普纳和杰伊·索斯尔合著《香蕉帝国》，（纽约，1935），这两本书更多地持批评态度。

关于经济史的最佳书籍是写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关于危地马拉，可看阿尔弗雷多·格拉·博尔赫斯著《危地马拉的经济地理》二卷集（危地马拉，1973）；瓦伦丁·索洛扎努著《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危地马拉，1970）；桑福德·A·莫斯克等人著《危地马拉的经济》（危地马拉，1958）；毛里西奥·多明格斯·T著《1830—1930年危地马拉咖啡工业的科技发展》（图拉恩大学，197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胡里奥·C·坎布拉奈斯著《危地马拉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1868—1885年日尔曼人的历

819

史性起源》（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社会和经济研究所，1975）；胡里奥·C·坎布拉奈斯著《危地马拉的日尔曼帝国主义，1887年的商业经营》（危地马拉，1977）；罗伯托·金塔纳著《关于危地马拉的金融业发展纪要》（危地马拉，1971）。关于哥斯达黎加，可看罗德里戈·法西奥著《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情况研究》（圣何瑟，1972年第2版），30多年以来它仍然是一本很有用的书。阿兰·维埃亚尔·巴龙著《哥斯达黎农村的农业生产》（墨西哥，1974）；C·卡多佐著《19世纪哥斯达黎加咖啡种植园的形成》，载肯尼思·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主编的《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工》第165—202页（剑桥，1975）；卡罗琳·霍尔著《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和历史地理发展情况》（圣何瑟，1976），以及《1889—1911年咖啡种植园的形成》（圣何瑟，1978），这是两本关于哥斯达黎加咖啡经济情况的最有用教材；安娜·塞西莉亚·罗曼·特里戈著《哥斯达黎加的对外贸易（1883—1930年）》（圣何瑟哥斯达黎加大学1978年未发表的论文）；托马斯·斯库诺弗著《1840—1885年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德国和欧洲的贸易和航运联系》，载《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第14期，第269—308页（1977），该书认为美国在商务上取得的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还要早。卡洛斯·阿拉亚·波切特著《哥斯达黎加的第二周期矿业生产（1890—1930）》（圣何瑟哥斯达黎加大学，1976），鲁菲诺·希尔·帕切科著《哥斯达黎加金融业一百周年》（圣何瑟1975年第3版。

论述洪都拉斯经济史的书籍，请看查尔斯·A·布兰德著《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背景：1913年前的洪都拉斯》（匹兹堡大学1972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比尔马·莱内斯和维克托·梅萨著《洪都拉斯历史上的香蕉飞地》，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5卷，第2期，第115—156页（1973）；豪尔赫·莫拉雷斯著《洪都拉斯的国家铁路：其经济发展历史和事故》，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2卷，第1期，第7—20页（1972）；肯尼思，V·芬尼著《贵金

属开采和洪都拉斯的现代化，寻找“黄金之国”》（图拉恩大学，1973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及《洪都拉斯金融史》（特古西加尔巴，1957）。关于萨尔瓦多，尤其请看布朗宁著《萨尔瓦多》和戴维·A·卢纳著《萨尔瓦多的经济史教科书》（圣萨尔瓦多，1971）；还有《1846—1955年萨尔瓦多的咖啡立法》（圣萨尔瓦多，1956）。关于尼加拉瓜，请看佩德罗·比利著《1905—1966年尼加拉瓜经济史概论》，载《中美洲概况评论》第146卷第30期，第2—30页（1975）。

850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历史学家更多地研究中美洲的社会史（请看伍德沃德著《中美洲》第313—314页）。不过还是要看何塞·L·维加·卡瓦略著《资产阶级依附政权的产生：哥斯达黎加的情况》，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5卷，第2期和第6卷（1973）；詹姆斯·巴克尔著《哥斯达黎加的教会和工团主义》（圣何塞，1975年第2版）；马里奥·波萨斯著《工匠行会和洪都拉斯工人运动的起源》（特古西加尔巴，1978）；罗克·多尔顿著《米格尔·马莫尔，萨尔瓦多1932年事件》（圣何塞，1972）；托马斯·F·安德森著《屠杀》（林肯，1971），和《1932年的萨尔瓦多》（圣何塞，1976）。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中美洲社会发展释义》（圣何塞，1971），这本书按最近对经济和政治史的研究情况来说，多少有些过时了，但仍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全面概的括有趣说明。

关于政治史，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国家政权和依附的社会：中美洲的阶级和国家》，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8卷，第3期，第27—63页（1974）作了综合的概述；雷纳尔多·萨利纳斯·洛佩斯著《1895—1922年中美洲的工会》（墨西哥，1978年未发表的论文）论述了美国施加压力反对中美洲工会。

有若干新的著作论述了危地马拉自由派改革。豪尔赫·M·加西亚·L著《危地马拉的自由派改革》（危地马拉城和圣何塞，1972）；托马斯·R·赫里克著《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

（1871—1885）时期危地马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情况》（圣何瑟，1974）；保罗·伯吉斯著《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圣何塞，1972）；罗伯托·迪亚斯·卡斯蒂略著《自由派改革时期危地马拉的经济立法，总目》（危地马拉城和圣何瑟，1973）。关于哥斯达黎加的政治史，著名的著作是萨穆埃尔·斯通著《侵略者的王朝》（圣何塞，1975）。还请看何塞·L·维加·C著《哥斯达黎加社会政治发展阶段及其进程》，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1卷，第1期，第45—72页（1972）。关于洪都拉斯的自由派改革，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本是埃克托尔·佩雷斯·布里诺里著《洪都拉斯的自由派改革》，载《社会科学日志》第2卷，第1期，第2—86页（1973）；还有一本是吉列尔莫·莫利纳·乔卡诺著《自由派国家和洪都拉斯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古西加尔巴，1976）。

5. 古巴（约1860—1934年）

851

关于通史，由一些古巴流亡学者和作家编的《古巴大百科》（12卷集，马德里，1975）中有一些有价值的文章，但全书水平参差不齐。拉米罗·格拉—桑切斯等人著《古巴民族史》（10卷集，哈瓦那，1952）是一部不同作者撰写的论文汇编，偶而也有些极好的材料。豪尔赫·伊瓦拉著《古巴史》（哈瓦那，1968）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阐述的著作。莱维·马雷罗著《古巴：经济与社会》（9卷集，马德里，1976）中有一些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很分散，需要整理。何塞·杜阿尔特·奥罗佩萨著《古巴历史学》（4卷集，迈阿密，1974）是一部好著作，但由于作者未能提供材料来源，因此其价值不太大。奥滕西亚·皮查多编《古巴历史文件》（4卷集，哈瓦那，1976）是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偏见选编的，然而却包括一些别处难得的文件。何塞·曼努埃尔·佩雷斯、卡夫雷拉著《古巴历史编纂学》（墨西哥，1952）是一部对19世纪古巴文学有价值的指南。费尔南多·波图翁多著《古巴史》（哈瓦那，1957）被认为是1960年以前最好的教材。奥斯卡·皮诺·桑托斯

著《古巴历史，基本情况》(哈瓦那，1964)一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古巴的经济发展或欠发展的原因。埃梅特里奥·桑托韦尼亚和劳尔·谢尔登著《古巴及其历史》(4卷集，迈阿密，1965)是一部由古巴和美国历史学家合著的明确和可靠的书。海梅·萨奇利基著《古巴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纽约，1974)是一部优良朴实的古巴历史概述。休·托马斯著《古巴：对自由的追求》(伦敦，1971)尽管有些忽视古巴史料的倾向，仍不失为一部有关古巴1762年至1968年历史最完整的杰作。

关于古巴与美国关系方面，拉塞尔·H·菲茨吉本著《古巴与美国，1900—1935》(威斯康里，默纳沙，1935)是一部有充分文献根据并试图认真分析"普拉特修正案"生效时期形成的古美关系各种因素的著述。埃米尼奥·波特列·比拉著《古巴与美国及西班牙关系史》(4卷集，哈瓦那，1939)是一部重要研究著作，其内容已超越了书名的范围。菲利浦·S·方纳著《古巴历史和古美关系》(2卷集，纽约，1962—1963)是一部气势不凡、研究深刻的著作，但有反美倾向。莱斯特·D·兰利著《美国对古政策简史》(纽约，1968)是杰出的综述。罗伯特·F·史密斯著《美国和古巴：商业和外交，1917—1960》(纽黑文，1960)是在古巴革命影响下出版的，作者说明了美国经济利益是怎样影响并扭曲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对同一题目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可以参考达纳·G·芒罗著《对加勒比地进行的干涉和美元外交，1900—1921》(普林斯顿，1964)。 852

拉米罗·格拉—桑切斯著《加勒比的制糖业和社会：古巴农业经济史》(纽黑文，1964)原版于1972年在古巴出版，是一篇关于制糖业对该岛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的控诉，对研究古巴有重要影响。利兰·H·詹克斯著《我们的古巴殖民地》(纽约，1928)是一部关于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古巴影响的经典著作。雷蒙德·L·比尔著《新古巴的问题》(纽约，1935)也许是分析20世纪古巴经济问题根源最好的研究著作。罗兰·T·伊利的《当糖居统治地

位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是一部论古巴糖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著作。H·E·弗里德兰德《古巴经济史》（哈瓦那，1944）是一部有趣但不完整的关于古巴经济史的书，主要限于19世纪的历史。胡利安·阿列内斯—乌罗萨著《古巴经济基本特征》（哈瓦那，1950）对了解自殖民地时代至1940年期间古巴经济问题有重要贡献。劳里·纳尔逊的《古巴农村》（明尼阿波利斯，1950）是一部对20世纪前半叶古巴农业情况的开拓性的研究著作。何塞·阿尔瓦雷斯等著《古巴研究》（迈阿密，1963）是一部严肃的研究著作，数据可靠和具有争议的解释。劳尔·塞佩罗·博尼利亚著《糖和废奴》（哈瓦那，1971）是关于研究19世纪废奴主义和自治运动的经济根源的著作。胡利奥·勒·里韦兰《古巴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是一部谨慎的以马克思主义阐述1940年以前古巴经济演变的著作。奥斯卡·皮诺·桑托斯著《美国寡头政治对古巴的进攻》（哈瓦那，1973）尽管题目惊人，但却是一部有趣的书，因为它探索了非美国资本主义集团在古巴的存在及其消极影响。关于古巴1860年至1930年间糖业情况的全面讨论，可以参考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6章。

古巴历史学家写的关于十年战争（1868—1878）的经典历史著作有：拉米罗·格拉—桑切斯著《十年战争》（哈瓦那，1950）和弗朗西斯科·庞特·多明格斯的《十年战争史》（哈瓦那，1972）。853 传记方面，何塞·L·弗朗哥著《安东尼奥·马塞奥，生平札记》（3卷集，哈瓦那，1973）和贝尼尼奥·索萨著《马克西莫·戈麦斯，最高统帅》（哈瓦那，1953）值得一提。恩里克·埃尔南德斯·科鲁霍著《古巴革命：文官和政治组织》（哈瓦那，1929）和《古巴立宪史》（哈瓦那，1960）；拉蒙·因菲耶斯塔著《古巴立宪史》（马德里，1942）；以及安德烈斯·拉斯卡诺著《古巴宪法》（马德里，1952）都研究了古巴起义者的政治思潮和立法问题。关于不同宪法文本，可参考莱昂内尔·安东尼奥·德拉奎斯塔和罗兰多·阿卢姆·利内拉合编《古巴宪法，1812—1962》（纽约，1974）。

对十年战争和独立战争(1895—1898)以及美国占领期间的最新论述是路易斯·A·佩雷斯的《帝国之间的古巴1878—1902》(匹兹堡,1984)。安东尼奥·马丁内斯·贝略著《自治主义的始终：对蒙托罗的诠释》(哈瓦那，1952)研究了自治主义分子的情况，着重的是哲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也可参考安东尼奥·桑切斯·德布斯塔曼特—蒙托罗著《自治主义分子的思想》(哈瓦那，1934)；关于对他们目标的阐述，可以参考拉斐尔·蒙托罗的《自治主义分子的思想体系》(哈瓦那，1938)。

拉斐尔·佩雷斯·德尔加多著《1898，灾难性的一年》(马德里,1976)，对西班牙军队的境况和西班牙政府和新闻界的行为作出了一些暗淡的结论。梅塞德斯·塞韦拉·罗德里格斯著《1898年海战的计划和其结果》(马德里,1977)和何塞·塞韦拉·佩里著《19世纪西班牙海军和政治》(马德里，1979)是有用的现代研究成果。何塞·曼努埃尔·阿连德·萨拉萨尔的《美国人的1898》(马德里，1974)是一部由西班牙历史学家写的旨在了解美国人立场的严肃著作。梅尔乔·费尔南德斯·阿尔马格罗著《现代西班牙政治史》(2卷集,马德里,1959)和佩德罗·戈麦斯·阿帕里西奥著《西班牙新闻史》(2卷集，马德里，1971)提供了有关西班牙政治的一般背景。

关于何塞·马蒂的英文版传记有四部：豪尔赫·马尼亚奇著《马蒂：自由使者》(纽约，1950)；费利克斯·利萨索《马蒂，古巴独立的殉道者》(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53)；理查德巴特勒·格雷的《何塞·马蒂，古巴爱国者》(盖恩斯维尔，1962)和约翰·M·柯克著《马蒂，古巴民族的导师》(坦帕，1983)。罗伯托·阿格拉蒙特的《马蒂和他的世界观》(圣胡安，波多黎各，1971)尽管引用了累赘的哲学语录，但仍有可用之处。埃米略·罗伊格·德·洛伊希森林的《反帝战士马蒂》(哈瓦那，1961)和菲利浦·S·方纳编《何塞·马蒂在巨人之中：关于美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论文》(纽约，1975)强调了马蒂闻名的反帝精神。拉斐尔·埃斯滕赫尔的《马蒂与共产主义对抗》(迈阿密，1966)从不同角度研 854

究了马蒂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阿根廷作家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著《马蒂：一个英雄和他的革命行动》(墨西哥，1966)是一部对马蒂的激进主义比较公正看法的书。关于马蒂思想的两种语言文版的短篇汇集可参考卡洛斯·里波利的《何塞·马蒂》(纽约，1980)。马蒂的作品也可以在他的《作品全集》(2卷集，哈瓦那，1956)或在1973年在哈瓦那出版的22卷版本中查阅。

在较老的美国对西班牙——美国战争的研究中，沃尔特·米利斯著《尚武精神：对与西班牙战争的研究》(纽约，1931)仍很重要。弗兰克·弗雷德尔著《辉煌的小战争》(波士顿，1958)描述重于分析。菲利浦·S·方纳著《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诞生》(2卷集，纽约，1972)显露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则介绍了战争中古巴方面的功绩。朱利叶斯·普拉特著《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的摩，1936)是论述战争背景中的思想和经济利益的经典研究著作。另外还可参考最近由欧内斯特·R·梅撰写的《帝国民主，美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出现》(纽约，1973)和查尔斯·S·坎贝尔著《美国对外关系的变化，1865—1900》(纽约，1976)。

戴维·F·希利著《美国在古巴，1878—1902》(麦迪逊，1963)是这类题目最好的对美国研究的著作。埃米略·罗伊格·德·洛伊希森林著《普拉特修正案的历史》(2卷集，哈瓦那，1935)具有极端反美的倾向。曼努埃尔·马克斯·斯特林著《普拉特修正案的历史进程》(哈瓦那，1941)则提供了一个较客观的评价。关于在美国统治下出现的短命的社会党的情况，可参考何塞·里维罗·穆尼斯的《第一个古巴社会党》(拉斯维利亚斯，古巴，1962)；爱德华·J·特赫拉的《迭戈·比森特·特赫拉，古巴爱国者、诗人和思想家》(马德里，1981)是这位社会党创始人的传记。

关于共和国(1902—1933)的一般著作有：卡尔顿·比尔斯著《古巴的罪恶》(费城，1933)是在独裁者马查多执政时写的。作者将古巴政治灾难归罪于美国的经济渗透。查尔斯·E·查普曼

著《古巴共和国历史》(纽约,1927)是在古巴民族主义处于低潮,悲观主义流行的时候,以一个美国人的眼光对古巴情况进行的历史回顾。路易斯·A·佩雷斯著《古巴的军队和政治1898—1958》(匹兹堡,1976)是对古巴军队兴衰的有趣的记录,但着重点在1933年以后。马里奥·列拉·埃尔南德斯著《共和国古巴,1898—1958》(迈阿密,1974)提供了有用的编年史和政治指南。关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可参考卡洛斯·马克斯·斯特林的《唐·托马斯,一个时代的传记》(哈瓦那,1953)。戴维A·洛克米勒的《马贡在古巴》(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8)为马贡政府作了有力的辩护,因而受到大部分古巴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对这一时期的最好的研究著作是阿伦·里德·米利特的《干涉政治:对古巴的军事占领,1906—1909》(俄亥俄州,哥伦布,1968)。

从1908到1925年,即何塞·米格尔·戈麦斯,马里奥·G·梅诺卡尔和阿尔弗雷多·萨亚斯执政的一段时期被古巴历史学家们忽视了。

路易斯·A·佩雷斯著《干涉、革命及古巴的政治,1913—1921》(匹兹堡,1978)是对这一时期的杰出研究,说明了古巴政治家们怎样学会"驾驭"美国外交,但对古巴政治只进行了十分简要的概述。莱昂·普里梅列斯的《古巴纪事,1915—1918》(哈瓦那,1955)对梅诺卡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何塞·里韦罗·穆尼斯在其《1906—1911年间古巴劳工运动》(古巴,拉斯维利亚斯,1962)中探讨了共和国期间古巴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兴起。关于1912年黑人起义,可参考塞拉芬·波图翁多·利纳雷斯著《有色独立分子》(第二版,哈瓦那,1951)和拉斐尔·费莫塞列著《政治和肤色,1912年的战争》(蒙得维的亚,1974)。

马查多政府和1933年的革命插曲吸引了学术界相当广泛的注意。例如路易斯·E·阿吉拉的《1933年的古巴:革命前奏》(纽约州,伊萨卡,1972);安娜·凯罗著《少数派集团及其时代》(哈

瓦那，1979)；拉迪斯劳·冈萨雷斯·卡瓦哈尔著《左派学生的勇气和他们的时代》(哈瓦那，1974)；何塞·A·塔瓦雷斯·德雷亚尔著《吉特拉斯》(哈瓦那，1973)和《1930年的革命：它的最后两年》(哈瓦那，1971)；利昂内尔·索托的《1933年的革命》(3卷集，哈瓦那，1977)，海梅·萨奇利基著《大学生和古巴革命》(迈阿密，1969)；欧文·F·格尔曼著《罗斯福和巴蒂斯塔》(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73)和最新的《三十年代的古巴》(巴黎，1982)。

6. 波多黎各(约1870—1940年)

奥古斯托·伯德编《波多黎各社会调查资料目录，1930—1945年》(里奥彼德拉斯，1947)，以及J·布尔内斯和E·冈萨雷斯一迪亚斯合编《波多黎各社会科学书目》(里奥彼德拉斯，1977) 855 都是有用的书目。后一书目将1931年至1960年写作的书籍和论文按主题加以分类，许多作品讨论或提到1930年以前时期。还可参看帕基塔·比沃编，《波多黎各人：注释目录》(纽约，1973)；该书选录的条目有限；然而评解很有用。A·G·金特罗一里韦拉主编《工人斗争：波多黎各工人历史重要文献选集》(圣胡安，1971)，英译本题为《波多黎各的工人斗争，历史文献集》(纽约，1976)，是一本主要在1870—1940年时期有关劳工运动的文献选集，有该时期劳工问题文献的详细带有注释的目录。

戈登·K·刘易斯著《波多黎各：加勒比海的自由与权力》(纽约，1963)是一本对波多黎各历史的重要概述，它对西班牙统治结束(1898年)以来有关该岛的主要研究作出评价。关于19世纪末年的波多黎各思想史，还可以参看K·刘易斯著《加勒比海思想主要潮流，加勒比海社会思想方面的历史演变，1492—1900年(巴尔的摩，1983)。曼努埃尔·马尔多纳多一丹尼的西班牙文《波多黎各：社会历史的解释》(墨西哥，1969)，(英译本，纽约1972)对波多黎各历史有很好的概述(但不深入)。A·洛

佩斯和J·彼得拉什合编《波多黎各与波多黎各人》(纽约，1974)是一本一般读物，其中有关于1870—1940年时期的很好的文章，既有一般性的，也有专论性的。主要作为阐释性的论战文章，有很多新资料、新思想，地位也很重要的有：A·G·金特罗·里韦拉的《波多黎各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圣胡安，1976)和《波多黎各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产生背景》，载《加勒比研究》第13卷，第3期（1973）；A·G·金特罗·里韦拉等著《波多黎各：民族特性与社会阶级》(圣胡安，1979)；和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的《四个阶层的国家》(圣胡安，1980)。里斯·博斯威尔的《波多黎各：百年政治斗争》(圣胡安，1979)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政治文献汇编。

莱尔德·W·贝尔加德著《波多黎各土地问题史，1870—1930年》载LARR，第13卷，第3期（1978）是一篇重要论文；又参看他的《19世纪波多黎各的咖啡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普林斯顿，1983)。有两篇研究19世纪末年咖啡种植园的著作值得一提——维维安·卡罗著《大庄园主所有制的形成：彼得里庄园，1858—1898年》，它占了《历史研究年刊》第2卷第1期(1975)的全册，和卡洛斯·布伊特拉戈—奥尔蒂斯著《波多黎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根源》（圣胡安，1976）。关于19世纪波多黎各的经济和社会还可参看：费尔纳多·比科著《19世纪波多黎各的自由与奴役》(圣胡安，1979)；何塞·库雷特著《从奴隶制度到它的废除》(圣胡安，1979)；安德烈斯·拉莫斯·马泰著《关于糖业向制糖中心过渡的札记。梅塞迪塔庄园帐册集，1861—1900年》(圣胡安，1975)和《甘蔗园及其在波多黎各的发展和危机（19世纪）》(圣胡安，1981）。关于蔗糖，还可参看何塞·A·埃雷罗著《蔗糖的神话，波多黎各经济史随笔》(圣胡安，1975) 和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6章。以早期的劳工运动作为主题的有：赫瓦西奥·加西亚著《波多黎各工人组织的主要因素》(圣胡安，1975)和《经济

857

伏势与工人组织的主要因素：19、20世纪之交的波多黎各》（博士论文未刊本，巴黎大学，1976）。又参看伊瓜尔达德·伊格莱西亚斯·德·帕甘著《波多黎各的工人运动（1896——1905年）》（圣胡安，1973）。另一些重要作品有：《社会科学评论》，18卷1—2期和3—4期（1974），19卷1期，3期（1975）和20卷1—2期（1976）上连载的5篇论文，总题目为《波多黎各的工人阶级与政治发展》；马西亚·里韦拉·金特罗在《光明》报1977年6月10日、17日和23日连载的一系列关于《妇女投身雇佣劳动》的文章；以及格奥尔格·弗罗姆在《光明》报1977年6月3日、10日、23日、30日和7月6日、13日连载的关于阿尔维苏—坎波斯（国民党领导人）与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的系列文章。关于阿尔维苏—坎波斯的论文和演讲还出版过五种不同的文集：B·托雷斯编《选集，1923—1936年》（圣胡安，1975）；M·马尔多纳多—丹尼斯编《波多黎各的民族意识》（墨西哥，1972）；卡洛斯·拉马编《波多黎各共和国》（蒙得维的亚，1972）；《经济独立》（圣胡安，1970）；比利亚里尼和埃尔南德斯·克鲁斯合编《政治著作与报导，1930年》（圣胡安，1972）。国民党前党员胡安·安托尼奥·科内特赫尔写过几篇关于阿尔维苏—坎波斯的文章：《阿尔维苏—坎波斯与30年代的罢工》（圣胡安，1969）；《阿尔维苏—坎波斯》（蒙得维的亚，1969）；和《绝望的领袖》（瓜伊纳沃，1972）。

里萨里奥·纳塔尔著《波多黎各与西—美战争危机（1895—1898年）》（圣胡安，1975）是一本研究西—美战争及其对波多黎各的影响的有用著作，虽然内容有限。关于人民民主党，参看A·G·金特罗—里韦拉著《人民民主党思想改造的社会基础》，贝赫拉尔多·纳瓦斯编《波多黎各的变化与发展》（圣胡安，1979）。

838 托马斯·G·马修斯著《波多黎各政治与美国新政》（盖恩斯维尔，1960）是对美国“新政”头五年的批判性解释。关于学生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参看伊莎贝尔·比科的《30年代的学生抗议》（圣胡安，1974）。艾达·内格龙·德·蒙蒂利亚著《波多黎

各的美国化与公立学校制度》（圣胡安，1970)对美国统治最初30年时期历届殖民地教育部长的文件作了分析。最后，关于美国，特别是纽约的波多黎各人社会的情况，波多黎各研究中心(CUNY)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移民》（纽约，1979)是令人感兴趣的作品；塞萨尔·安德烈乌·伊格莱西亚斯编《贝尔纳多·维加回忆录》（圣胡安，1977)是一名移民纸烟工人很不平常的回忆录，同样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作品。

7. 多米尼加共和国(约1870—1930年)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资料在国家历史的盛衰变化之中损失严重。幸存的重要文献有许多是在私人手中。国家总档案馆前馆长埃米里奥·罗德里格斯·德莫里西编纂了内容广泛的资料：《奥斯托斯在圣多明各》（两卷本，特鲁希略城，1939)；《圣多明各的历史往来关系》(3卷本，特鲁希略城，1942，1945和1957)；《法国驻圣多明各领事通信集，1844—1846年》，第1卷（特鲁希略城，1944)；《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文件集》（3卷本，第1卷，特鲁希略城，1944》第2卷，圣地亚哥，1949；第3卷，特鲁希略城，1959)；《法国驻圣多明各领事通信集，1846—1850年》，第2卷（特鲁希略城，1947)；《多明尼加海军舰队，1844—1861年》（特鲁希略城，1958)；《复辟政治的行动与理论》（圣多明各，1963)；《埃斯派亚省对圣多明各政治思想史的作用》(圣多明各，1963)，以及《佩德罗·F·博诺的作用》（圣多明各，1964)。

文献目录很少。有两本可在这里提一下：德博拉·希蒂和拉曼·威尔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书目选录：恢复独立以后一个世纪》（华威顿特区，1968）和沃尔夫·格拉尔多尔夫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与政党文献目录：新著作，1961—1971年》(慕尼黑，1973）。

关于一般历史，萨姆纳·韦尔斯著《拿伯的葡萄园：多米尼加共和国1844—1924年》（两卷本，纽约，1928)理所当然地被重印

出来（纽约，1966）和翻译成西班牙文（圣地亚哥，1939）。作

859 者在该国的外交生涯使他在书中有关部分显露出对霍拉西奥·巴斯克斯怀有好感；同样也流露出对厄罗的反感。应当说，在对厄罗的反感方面，他是同许多传统的多米尼加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有共同观点。比较全面的一本书是拉蒙·马雷罗·阿里斯蒂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美洲最古老基督教民族的根源与命运》（两卷本，特鲁希略城，1957—1958）——尽管它的副标题并不贴切。又参看贝尔纳多·皮查多的《祖国历史纲要》（巴塞罗那，1930）和多米尼加历史编纂学的先驱者何塞·加夫列尔·加西亚所著《圣多明各历史简编》（圣多明各，1896）。对共和国金融史的讨论见塞萨尔·A·埃雷拉的《从哈特蒙特到特鲁希略》（特鲁希略城1953）。布兰克·莫亚·庞斯著《多米尼加历史手册》（圣多明各，1977）是近代的优秀历史著作。最后，鲁菲诺·马丁内斯编《多米尼加历史人名词典，1821—1930年》（圣多明各，1971）是一本有价值的一般参考书。

对于了解19世纪多米尼加历史的重要书籍有：《圣多明各调查团报告书》（华盛顿特区，1871）；塞缪尔·哈泽德的《圣多明各，过去与现在，附海地城一瞥》（伦敦，1873）；帕德雷·费尔南多·阿图罗·德·梅里尼奥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历史地理概论：侧重阐述一般地理概念》（第3版，圣多明各，1898）；格雷戈里奥·卢佩龙将军的《自传随笔与历史札记》（3卷本，圣地亚哥，1939）；和何塞·拉蒙·阿瓦德著《多米尼加共和国：地理—统计概况》（圣多明各，1888年出版；1973年重印）。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有一系列重要著作：H·霍廷克著《多米尼加人民，1850—1900年。历史社会学札记》（第2版，圣地亚哥，1973），英译本（巴尔的摩，1983）；马丁·D·克劳斯纳的《圣多明各农村：定居者、未定居者与重新定居者》（费城，1973）；帕特里克·E·布赖恩著《多米尼加经

济的改造，1870—1916年》（未刊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7）；和罗伯托·卡萨著《生产方式、社会阶级与政治斗争：多米尼加共和国，20世纪》（圣多明各，1974）。关于多米尼加蔗糖业还可参看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6章。圣地亚哥“修女与讲经师天主教大学”出版的《艾梅艾梅*多米尼加研究》是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杂志。例如可参看安东尼奥·柳韦雷斯著《19世纪后半叶锡瓦奥的烟草经济》，见《艾梅艾梅》杂志第1卷第4期（1973）；保罗·穆托著《多米尼加的出口经济：1900—1930年》，见《艾梅艾梅》杂志第3卷第5期（1974）；弗兰克·莫亚·庞斯著《第一共和国时期，多米尼加的经济资料》，见《艾梅艾梅》杂志第4卷第24期（1976）。

860

何塞·德尔·卡斯蒂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甘蔗雇工移民，1900—1930年》描述了甘蔗工人移民情况，见《多米尼加中部人类学调查记录》（圣多明各自治大学，1978）。

关于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参看马文·戈德沃特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占领的历史，1916——1924年》（盖恩斯维尔，1962）；安东尼奥·德拉罗莎著《圣多明各金融与美国控制》（圣多明各，1969）以及最近布鲁斯·J·考尔德著《干涉的影响。1916——1924年美国占领时期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德克萨斯，奥斯汀，1984）。还有两本较老的著作：马克斯·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圣多明各的美国佬》（马德里，1929）和梅尔文·奈特著《圣多明各的美国人》（纽约，1928）。关于更长时期中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系，参看戴维·C·麦克迈克尔著《美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1871—1940年。加勒比海外交的周期》（未刊博士论文，俄勒冈，尤金，1964）。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的关系，在雷福德·W·洛根著《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

* 艾梅艾梅（Eme Eme），杂志名称，系Madre Y Maestra（修女与讲经师）两字的简称—译者。

（纽约，1968）一书有所侧重。讲述共和国英雄人物以及“考迪略”情况的大量文献，通常更多是文学的内容而不是历史的内容。此类作品中特别出色的是鲁菲诺·马丁内斯写得很生动的传记文章《多米尼加人物志》（两卷本，第1卷，特鲁希略城。1936；第2卷，圣地亚哥，1943）。米格尔·安赫尔·蒙克卢斯的《考迪略制度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版，圣地亚哥，1962），对多米尼加的政治领导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胡利奥。G·坎皮略·佩雷斯著《蟋蟀与夜莺：多米尼加总统选举初探》（圣多明各，1966）。

关于文学史，参看华金·巴拉格尔的《多米尼加文学史》（第2版，特鲁希略城，1958）；关于造型艺术，参看达尼洛·德洛斯·桑托斯著《多米尼加社会的绘画艺术》（圣地亚哥，1979）。

8．海地（约1870—1930年）

马克斯·比斯圣西的《海地书目辞典》（华盛顿特区，1951年）以及稻草人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附录，仍然是有关海地和由海地人撰写的著作中最佳文献目录。克劳斯国际书社出版了米歇尔·拉格雷编《海地书目大全，1900—1980年》（纽约，1982）。还应提到的是：马克斯·马尼加的《海地书目，1971—1975年》（拉塞勒，魁北克，1980）和弗朗西斯·钱伯斯编《世界书目丛刊》，第39卷《海地》（牛津和圣巴巴拉，1983）。

861

詹姆斯·利伯恩的典范作品《海地人民》已有平装本发行（纽黑文，1966），由悉尼·明茨作了新的前言。尽管偶有不足之处，它仍是海地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最好入门书籍之一。利伯恩未能认识城市中等阶级的全部意义，也未能认识农村居民中间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差别。在讨论过去时，他有时可谓是“穆拉托人传奇”的牺牲品。波兰学者塔德乌什·莱普考斯基写的一本书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名为《海地》（哈瓦那，1968—1969），以两卷本刊行。作者在书中探讨了海地早期历史、海地历史编纂学和农业发展。罗伯特·罗特贝格的《海地：卑劣的政治》（波士顿，1971）

有若干有用的篇章谈到这个时期的海地经济，但此外无何突出之处。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曾是杜瓦利埃政权早期美国海军陆战队赴海地代表团的负责人，他写了一本有关种族中心主义和逸事趣闻式的海地历史，题为《血书：海地人民史话》（波士顿，1978）。书中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插图。

涉及此时期海地历史的其他著作之中有马茨·伦达尔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农民与贫困：海地的研究》（伦敦，1979）；然而此书对于过去情况只偶有论述，而且大量使用第二手资料。席勒·特博著《1804年迄至当代海地农业结构的演变》（未刊博士论文，巴黎大学法学院，1967）有许多有用的资料。热拉尔·皮埃尔·夏尔所著《海地经济及其发展道路》（巴黎，1967）有若干部分略有涉及历史；作者关于海地历史与现状阐述的特点是对“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名词使用得不严谨、不妥贴。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自治：海地的经验》（蒙特利尔，1974）一书中，戴维·尼科尔斯探讨了主要在占领时期以前海地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戴维·尼科尔斯的《加勒比海环境中的海地：种族关系、经济与叛乱》（伦敦，1985）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修正说法。然而，优秀的海地经济史尚有待写作。

关于占领前海地的社会结构，伯努瓦·若阿基姆的著作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从独立到美国占领海地的商业资产阶级》，载《新透视》第4期（1971）和《19世纪海地的社会结构与独立运动》，载《世界史杂志》第12卷第3期（1970）。这些文章的某些资料曾被收集在若阿基姆著《海地不发达的根源》（太子港，1979）一书。阿兰·特尼尔关于海地与美国关系的著作是众所周知的，他近年发表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关于19世纪一名卡科人领袖的书《同梅里西埃·让尼一起，在雅克梅勒和国内的生活片段》（太子港，1982）。《罗萨尔沃·博博的一百天》（太子港，1973）一书谈到美国入侵前夕的社会运动，它是罗歇·加亚尔著《白人上岸记》的第2卷，对该书的后续诸卷的引用见后文。乔治·科

862

温顿一直在继续写他的有价值的多卷本丛书《悠悠岁月中的太子港》（太子港，1970——）。

从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而看一看思想史，G·马丁内斯的《论海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含糊之点》一文——《新透视》第9期（1973）——对19世纪后半叶的海地理论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很好的批判性探讨。克洛德·莫伊兹所写关于海地著名作家和外交家约瑟夫·安特诺尔·菲尔曼的论文，有些章节发表在《联合》杂志第117期(1971)。在《从德萨兰到杜瓦利埃：海地的种族、肤色与民族独立》（剑桥，1979）一书的第4章和第5章，戴维·尼科尔斯讨论了种族和肤色两个观念在占领时期所起的作用；在《萨洛蒙的智慧：神话还是现实？》一文中——《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第20期(1978)——他更详细地讨论萨洛蒙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它提出的要求。拉埃内克·于尔邦著《海地伏都教的上帝》（巴黎，1972）和H·库兰德和R·巴斯琴合著《海地的宗教与政治》（华盛顿特区，1966）是从历史角度探讨宗教问题的两本著作。

文学史方面过去20年中出版了许多著作。拉斐尔·贝鲁和普拉代尔·蓬皮吕推出了他们《海地文学史》一书的增订版（太子港，1975）。它有点缺乏批判力，有点说教，虽然如此，却是一本有用的手册。关于占领前时期的文学，罗歇·加亚尔写了一本极为吸引人的一位来自热雷米的穆拉托人循道宗诗人的传记《埃策尔·维莱尔：《我们灾难的见证人》(太子港，1972)。《联合》

863

杂志第122—123合期号(1973)谈到费尔南德·希伯特、朱斯坦·莱里松和安托万·伊诺桑·伊韦特·然丹（费尔德曼）为这期杂志写了文章，他还写了《讽刺文学与海地虚构小说的诞生，1901—1905年》一文，发表在《加勒比海季刊》第21卷第3期(1975)。莱昂·弗朗索瓦·霍夫曼在《浪漫的黑人》（巴黎，1973）书中以及较近的在《海地的故事》（普林斯顿，1982）书中和发表在《加勒比海季刊》及其他刊物的一系列文章中使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海

地文学大大增进了解，提高认识。

关于1915年以前海地的对外关系以及外国势力在该国事务中起的作用，伯努瓦·若阿基姆的著作是很杰出的。他的论文《1825年至1874年法国与海地关系的基本情况：新殖民主义的尝试》（巴黎大学文学与文科学院，1968）主要依据法国的档案资料。在《商业与非殖民化：19世纪的法国—海地经验》一文——载AESC，第27期（1972）——他发展了上述论文中的若干论断。若阿基姆的论文涉及的主要是1870年以前的时期，莱斯利·马尼加的长文《20世纪初年美国优势在海地取代法国优势：1910—1911年的局面》——载《近代现代历史杂志》第14期（1967）——则是极为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不如他们一些其他作品那样好作争辩，却显示出对海地历史的生动活泼的探讨，不负我们对他的妙笔的期待。此文的英文译本见于L·F·马尼加主编的《1975年加勒比海国际关系年鉴》（西班牙港和莱顿，1976）。雷福德·洛根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伦敦，1968）是一本有用的书，关于海地同美国的关系部分尤其充实。可是，这本书对于他早先发表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优秀著作增益无多。

再进而看看占领时期，汉斯·施米特的《美国占领海地，1915——1934年》（新泽西，新不伦瑞克，1971）是一本极佳的批判性著作，根据大量档案资料和私家论述以及已出版的资料研究了美国在海地的政策。它语气冷静带有学究气，然而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大量谴责。可惜本书只是偶尔谈到海地对占领的反应而且颇嫌不够充分。苏西·卡斯托著《美国对海地的占领及其后果（1915—1934年）》（墨西哥、马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大量倚靠第二手资料，缺乏原始资料。达纳·芒罗在《美国与加勒比海诸共和国，1921—1933年》（普林斯顿，1964）一书中所写的关于海地的两章是很有用的。戴维·尼科尔斯在《海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1915—1946年》——载AESC，30/4（1975）——一文中谈到了这段时期的种族和肤色所起的作用并在《从德

864

萨兰到杜瓦利埃》一书第5章中更详尽地探讨了占领期间知识分子运动的状况。

关于占领时期的社会史方面，罗歇·加亚尔著《白人上岸记》第3—7卷是了解1915—1919年期间的必读书籍。还应参考基思利·米莱著《美国占领与海地农民，1915—1930年》（魁北克，拉萨勒，1978）。

乌尔利希·弗莱施曼著《海地文学中的思想与现实》（柏林，1969）一书特别谈到了占领时期的文学；本书的主题在他所著《海地的作家与社会》（马提尼克，圣雅克，1975）一书中再次作了阐述。J·迈克尔·达什著《海地的文学与思想，1915—1961年》（伦敦，1981）一书是英语读者较易理解的书籍。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批判性著作，对这一时期作家从他们的社会背景分别作了分析。近年出现了两本论雅克·斯蒂芬·亚历克西的专著，一本是迈克尔·达什所著（多伦多，1975），另一本是马克西米利安·拉罗什著《星光灿烂的小说家》（巴黎，1978）。克洛德·苏夫朗在《一位黑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巴黎，1978）一书中将雅克·鲁曼和J·S·亚历克西与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相提并论。加布里埃尔·库尔特哈德著《加勒比文学中的种族和肤色》（伦敦，1962）至今仍是在更广泛的加勒比海文学运动背景下了解占领时期海地文学的一本杰出的入门书籍。

9.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约1870—1914年）

关于1870—1914年时期阿根廷经济史的最优秀、最完整的参考书是图略·霍尔珀林·唐吉的《阿根廷》，载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合编《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和洛杉矶，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通论性著作中，里卡多·M·奥尔蒂斯的《1850—1930年阿根廷经济史》（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是多年来读者最多的一本阿根廷经济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有两本这方面的著作产生过重

865

大影响：一本是阿尔多·费雷尔著《阿根廷经济：它的发展阶段和当前问题》（墨西哥，1963），它象塞尔索·富尔塔多研究巴西那样，研究了从殖民地时期到当前的阿根廷经济结构，而且深受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有关发展问题的材料的影响；另一本是吉多·迪·特利亚和曼努埃尔·齐梅尔曼合著《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原先的设想是在W·W·罗斯托指导下写成一篇论文，它同意1880—1914年期间经济发展迅速，并力图解释1914年以后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

卡洛斯·F·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重要著作《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文集》（纽黑文，1970）第1章探讨了1930年以前的时期。迪亚斯·亚历杭德罗摆脱过去对这个时期的各种解释的影响，强调应该象研究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在主要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围内来研究阿根廷。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梅尔维尔·H·沃特金斯著《一种主要经济发展理论》，载《加拿大经济和政治学杂志》29/2（1963）。比森特·巴斯克斯·普雷塞多的《阿根廷实例》（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同样认为阿根廷这个具体例子有其独特之处，与其他不发达国家不同，而与一些新设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比较接近。可同时参阅约翰·福格蒂、埃塞基耶尔·加略和埃克托尔·迭格斯合著《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的《1880—1914年阿根廷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头两章分析了阿根廷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的领土形成和地区结构，此书主要章节还探讨了1880—1910年期间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他使用商业档案中的新资料，批驳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论点。

其他值得一提的通论性著作有罗克·贡德拉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它和费德里科·皮内多的《一个半世纪的阿根廷经济》（墨西哥，1961）一样，多年来始终是必读教科书。同时可阅读国家历史科学院编《1862—1930年阿根廷现代史》，第3卷《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在出版较早

的必读著作中，有胡安·阿尔瓦雷斯的两本著作：《对阿根廷历次内战的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14）和《阿根廷经济史若干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还有埃内斯托·托恩基斯特的《阿根廷共和国最近50年的经济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和迈克尔·G·马尔霍尔和·E·T·马尔霍尔的1863、1875、1888、1892年《拉普拉塔河手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伦敦，1982年再版)。

866

关于人口变化，尤其是关于国内和国外人口迁移，苏尔玛·L·雷基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的《阿根廷的人口迁移》(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和《阿根廷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均为必读材料。同时可阅读《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10章书目评论。

多年来得到最普遍公认的一本关于农村经济的著作是奥拉西奥·C·E·希韦蒂的《阿根廷牧业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4)，此书主要以有关1908年农村普查的一些优秀论文为依据；现已成为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另一本名著是詹姆斯·斯科比著《大草原上的革命：阿根廷小麦的社会史》(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4)。此外可阅读埃塞基耶尔·加略著《阿根廷的农民和社会：1870—1895年的圣菲省》(牛津大学197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西班牙文译本《外国佬的拉潘帕》(布宜诺斯艾利斯，1983)。

其他近期著作有：阿尔多·蒙托亚著《阿根廷腌肉场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费尔南多·恩里克·巴尔瓦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农牧业发展(1880—1930年)》，载《调查研究与论文》17(1974年7—12月)第210—310页；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阿根廷新领土上定居垦殖与经营农牧业的模式（1890—1910年)》和埃塞基耶尔·加略著《圣菲的占地现象及农业垦殖》，均载阿尔瓦罗·哈拉编《新土地》(墨西哥，1969)；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土地、农业与牧业》和科林·刘易斯著《70年代末阿根廷边界的巩固。印第安人，罗加与铁路》均载古斯塔沃·费拉里和埃

塞綦耶尔・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以及M・萨恩斯・克萨达著《牧场》(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一些较早的著作具有永久性价值，值得特别一提。它们是，米格尔・安赫尔・卡尔卡诺著《1810—1916年公共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哈辛托・奥多内著《阿根廷的地主资产阶级》(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马克・杰斐逊著《向阿根廷草原移民》(纽约，1926)；卡尔・C・泰勒著《阿根廷农村生活》(巴吞鲁日，1948)；西蒙・G・汉森著《阿根廷肉类和英国市场：阿根廷肉类工业史上的几章》(斯坦福，1938)。埃斯塔尼斯劳・塞瓦略斯著《阿根廷共和国概述》(布宜诺斯艾利斯，1888)；以及阿根廷农业部农村经济司进行的研究(1900年)均属必读材料。

关于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约翰・H・威廉斯的《1880—1900年以不能兑换的纸币进行的阿根廷国际贸易》(马萨诸塞州剑桥，1920；纽约1969年再版)，至今还没有一本书超过它；书中搜集大量有关国际收支、价格、工资等方面的材料，因而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最佳经济史读物。同时可阅读巴斯克斯—普雷塞多著《阿根廷实例》第2章；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和阿根廷》(牛津，1960)；A・G・福特著《1880—1914年的金本位制：英国和阿根廷》(牛津，1962)；以及一本较早出版的著作——哈罗德・E・彼得斯著《阿根廷共和国的外债》(巴尔的摩，1934)。埃克托尔・L・迭格斯的文章，《1864—1963年期间阿根廷出口商品价值的增长与波动及其实际数量》，载《经济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46/12(1972年)，转辑了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图略・霍尔珀林和H・戈罗斯蒂吉・德・托雷斯在《阿根廷对外贸易——1863—1963年的出口》(油印稿，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学院，日期不详)这一著作中汇集的有关阿根廷对外贸易的重要统计资料，后者纠正了过去许多统计上的错误和缺陷。重要著作还有：D・C・M・普拉特著《1815—1914年英国对外政策中

867

有关金融、贸易和政治方面的问题》(牛津，1971)和《1806—191
年拉丁美洲和英国贸易》(伦敦，1972)；A·G·福特著《1880—1914年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和长期趋势》，载《经济史杂志》31/3(1971年)；转载罗德里克·弗劳德编《数量经济史文集》(牛津，1974)，以及《1880—1914年英国投资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载戴维·罗克编《20世纪阿根廷》(伦敦，1975)。

威廉斯和福特的著作主要研究阿根廷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威廉斯的著作一直研究到19世纪末，而福特的著作研究两个不联贯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80年到1885年，他称之谓金本位制失败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00年到1910年，他称之谓金本位制成功的时期。可同时阅读弗恩斯著《英国和阿根廷》和戴维·乔斯林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银行业》(伦敦，1963)。还可阅读拉斐尔·奥拉腊·希门尼斯著《通货与货币结构》(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和他晚些时撰写的《1880—1910年货币改革》，还有查尔斯·琼斯著《英国的银行》均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的《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较早的著作有埃米利奥·汉森的名著《阿根廷货币》(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以及何塞·A·特里的《货币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1899)和《金融》(布宜诺斯艾利斯，1918)。

868

有关运输方面的书刊当然以铁路压倒一切。最完整的近著是爱德华多·A·萨尔敦多的《英镑与铁轨》(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此书还对英国在巴西、加拿大和印度的铁路投资进行研究。同样重要的一本书是温思罗普·R·赖特的《1854—1948年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它们对经济国有化的影响》(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2)。还可阅读科林·刘易斯著《1857—1890年阿根廷铁路发展中的问题》，载《美洲经济事务》22/2(1962)和《1857—1914年英国在阿根廷的铁路》(伦敦，1983)；保罗·古德温著《阿根廷中央铁路与1854—1881年的阿根廷经济发展》，载HAHR，57/4(1977)；以及爱德华多·A·萨尔敦多的最新研究成果：《阿根廷运输系统的经济问题(1880—1914年)》，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

《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有些著作出版较早，但因种种原因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劳尔·斯卡拉布里尼·奥尔蒂斯的持反英观点的《阿根廷铁路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 和A·E·本赫的载有详细文献的《阿根廷铁路》(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正如作者本人指出的，此书也是对研究国家财富的一个贡献。

关于工业，阿道夫·多尔夫曼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性，此书原版名《阿根廷工业进化》(布宜诺斯艾利斯，1942)，后来更名为《阿根廷工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较晚一些的著作有：巴斯克斯·普雷塞多的《阿根廷实例》和《1880—1910年工业进化》，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埃塞基耶尔·加略著《阿根廷的农业增长和工业发展》，载雷蒙德·卡尔编《拉丁美洲事务。第22号圣安东尼文件》(牛津，1970)；胡安·卡洛斯·基亚拉蒙特著《1860—1880年阿根廷的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卢西奥·盖勒著《阿根廷截至1914年的工业增长并兼论初级产品出口》载马科斯·希门尼斯·萨皮奥拉编《寡头政治。供研究1930年以前阿根廷现实的材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156—200页。

10. 阿根廷的社会与政治（1880－1916年）

关于1870—1914年间阿根廷的政治过程，有若干通论性著作。国家历史科学院编《当代阿根廷史》(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里卡多·莱维列尔编《阿根廷史》第4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E·加略和R·科尔特斯·孔德合著《保守的共和国》（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N·博塔纳著《保守派的秩序。1880—1916年间的阿根廷政治》(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以及G·费拉里和E·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以下一些经典著作至今依然有用：L·H·索马里瓦著《联邦干预各省史》(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何

869

塞·N·马蒂恩索著《阿根廷共和国的联邦代议制政府》(马德里，1917)和鲁道夫·里瓦罗拉著《从联邦制到中央集权制》(布宜诺斯艾利斯，1908)。值得参考的还有伊西多罗·鲁伊斯·莫雷诺编辑的文件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化》(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

一些传记载有与这时期有关的有用材料。如阿古斯丁·里韦罗·阿斯滕戈的两本著作：《华雷斯·塞尔曼。对阿根廷一个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的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和《佩列格里尼，1846—1906年》(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1)；R·萨恩斯·海斯著《米格尔·卡内和他的时代，1851—190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和《拉蒙·J·卡尔卡诺，1860—1946年》；何塞·阿尔塞著《罗加，1843—1914年。他的生平和事业》(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A·W·邦克利著《萨米恩托生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2)；J·坎波巴锡著《米特雷和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以及D·F·魏因施泰因著《胡安·B·胡斯托和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值得参考的还有莱安德罗·阿莱姆著《使命与命运》(8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和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著《人民与政府》(1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最有价值的政治活动家回忆录或自传有保罗·格罗萨克著《往事》(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埃塞基耶尔·拉莫斯·马希亚著《我的回忆录》(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拉蒙·J·卡尔卡诺著《我的前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尼古拉斯·雷佩托著《我的从政道路——从罗加到伊里戈延》(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卡洛斯·伊瓦古伦著《我的亲身经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恩里克·迪克曼著《一名社会主义战士的回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

有关思想史的著作很少。何塞·L·罗梅罗的《阿根廷的政治思想》(墨西哥，1956)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这个题目，英译本书名为《阿根廷政治思想史》(斯坦福，1963)。T·霍尔珀林·唐伊近期编写的《对一个国家的设计和建设(1846—1880年)》(加拉加

斯，1979)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著作，应与同一作者的下列其他著作一并研读：《一种新的思想气候》，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为什么输入外国移民？人口迁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与加速现代化过程：阿根廷实例（1810—1914年）》载JGSWGL13（1976）。下列著作也都值得参阅：H·比亚吉尼著《80年代一代人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M·蒙塞拉特著《进化论者的思想：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意识形态》载费拉里和加略加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 870
J·C·基亚拉蒙特著《阿根廷的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T·敦坎著《阿根廷的政治报刊：南美洲（1884—1942年）》，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纳塔略·博塔纳的《共和国传统。阿尔韦迪、萨米恩托及他们时代的政治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是一本近期重要著作。

关于政党，有几本概述性著作。可读卡洛斯·梅洛著《阿根廷的政党》(科尔多瓦，1970)；阿尔弗雷多·加莱蒂著《政治与政党》(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和达里奥·坎顿著《1910—1966年的阿根廷选举与政党。关于它的历史、认识和总结》(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激进党得到历史学家最大的关注。除阿莱姆的《使命与命运》和伊里戈延的《人民与政府》两书中的有关文章外，其他重要著作有：加布里埃尔·德尔·马索著《激进主义。关于它的历史和理论的文章》(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戴维·罗克著《1890—1930年的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E·加略和S·西格尔合著《当代政党的形成：激进公民联盟（1890—1916年）》，载《经济发展》3/1—2(1963)。关于社会党，下列著作都很有用：R·J·沃尔特著《阿根廷社会党（1890—1930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7)，D·库内奥著《胡安·B·胡斯托与阿根廷的社会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以及J·奥多内著《阿根廷社会主义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

关于这个时期阿根廷政治中的保守势力的著作出版较少。值得参考的有O·科恩布利特著《保守党人在阿根廷政治中的选择》载《经济发展》56/4（1975年），第599—640页；E·加略著《罗克主义》，载《一切都是历史》100（1975）；以及E·加略著《困难的五年。1890—1895年卡洛斯·佩列格里尼和路易斯·萨恩斯·培尼亚两届总统任期》，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J.M·杜莱维奇的《社会混乱与城市危机》（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虽非专门为本题而写，但从中可以得到有用材料。关于团结在米特雷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团体，没有发表什么著作，关于各省派系的著作也很少。关于后者，地方史料中有一些资料：胡安·阿尔瓦雷斯著《关于圣菲历史的文章》（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H·F·戈麦斯著《科连特斯省最近六十年的民主与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1931）；A·迪亚斯·德·莫利纳著《阿根廷的寡头统治。它的特征和体系（1840—18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卡洛斯·派斯·德拉托雷著《1904—1913年图库曼的政治和日常生活》，载《一切都是历史》27（1973年）。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出版但颇具价值的博士论文：唐纳德·佩克著《1890—1914年的阿根廷政治与门多萨省》（牛津大学，1977）；A·利布舍尔著《1897—1916年圣菲省的商业发展和政治变革》（印第安纳大学，1975），唐娜·盖伊著《1870—1900年阿根廷图库曼省的政治和制糖业》（印第安纳大学，1973）。

871

这时期的武装暴动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关于1874年革命，有A·特萨加的《1874年革命。一颗上升的明星》，载《一切都是历史》59（1974年）。关于1880年事件，可读B·加林德斯著《阿根廷政治史。1880年革命》（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S·拉托·德·桑布塞蒂著《阿韦利亚内达及国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对抗（1873—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E·M·桑努西著《1880年的总统更替》（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N·博塔纳著《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化》，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

《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关于1890年革命，发表的著作很多：J·巴莱斯特拉著《1890年。阿根廷的政治演变》(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H·索拉金·贝库著《1890年革命及其政治意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L.V.索米著《1890年革命》(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以及《历史评论》关于《1890年危机》专辑（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关于1893年各省起义，可读R·埃切帕雷博尔达著《1890—1893—1905三次革命》(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E·加略著《农民起义。1893年圣菲省革命》(伦敦,1976)。埃切帕雷博尔达的著作还分析了1905年流产的激进党暴动。

关于国际关系，可读H·J·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和阿根廷》(牛津,1962)；T·麦甘恩著《阿根廷、美国和泛美体系。1880—1914年》(马萨诸塞州剑桥,1967)；以及G·费拉里著《阿根廷及其邻国》,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一个重要题目——与绝大多数移民的祖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史，基本资料是1869、1895、1914年三次出色的全国人口普查和1888、1908年两次农业普查。此外还有两次很好的省级人口普查报告（188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1887年圣菲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城1887、1904和1909年三次全市人口普查。从外国作者的描绘和研究著作中也可发现不少有关阿根廷社会生活的材料。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书单，这里仅举若干例子，如M·G·马尔霍尔和E·T·马尔霍尔出版的1863、1875、1883、1892各年度的《拉普拉塔河手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伦敦，1982年再版)；E·戴里奥著《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88)；朱尔·于雷著《在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大查科》(巴黎,1914)；A·N·许斯特尔著《阿根廷：土地、人民、经济生活和垦殖》(两卷集，慕尼黑,1913)；以及P·德·乔瓦尼著《在5月的阳光下。关于阿根廷的笔记和印 872

象》(卡斯铁路，1900)。劳埃德银行出版的《阿根廷20世纪印象。它的历史、人民、商业、工业和资源》(伦敦，1911)有很大价值。

一个特别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题目是人口增长，尤其是移民问题。有用的著作有：J·A·阿尔西纳著《独立后头一个世纪的人境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苏尔玛·L·雷基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著《阿根廷的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N·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从前哥伦布时代至2,000年的拉丁美洲人口》(马德里，1973)；G·贝奥特等著《阿根廷政治体制下的入境移民》戴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等著《阿根廷的群众团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以及E·马埃德尔著《1880至1910年期间阿根廷的人口和移民》，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还可参阅卡尔·索尔伯格著《1890—1914年阿根廷和智利的移民和民族主义》(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0)。关于农村地区的欧洲移民，可读J·C·科罗尔和H·萨瓦托合著《阿根廷爱尔兰移民的状况》(布宜诺斯艾利斯，1981)；和埃塞基耶尔·加略著《外国佬的拉潘帕》(布宜诺斯艾利斯，1983)。

关于城市发展，可读Z·雷基尼·德·拉特斯著《阿根廷的城市化过程：城市人口的分布、增长与若干特点》，载《经济发展》48(1973年)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P·H·兰德尔著《草原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J·斯科比著《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1870—1910年)》(纽约，1971)；以及居伊·布尔代著《19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和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1974)。

关于社会结构，可读G·赫尔马尼著《阿根廷的社会结构》(布宜诺斯艾利斯1954)；S·巴古著《阿根廷社会分层的历史演变》(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F·科恩著《20年代的客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以及R·索图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阿根廷的社会分层和经济发展(1914—1955年)》(伦敦大学，1968)。其他有用

873

的著作还有：G·赫尔马尼著《阿根廷的社会流动》载S·M·利普塞特和R·本迪克斯合编《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D·库内奥著《雇主阶级的行为和危机》(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以及O·科恩布利特著《工会和雇主协会》，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关于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可读E·加略著《1880—1930年阿根廷的农业增长和工业发展》，载R·卡尔编《拉丁美洲事务。第22号圣安东尼文件》(牛津，1970)。关于内地各省情况，可读上面提到的唐纳德·佩克和唐娜·盖伊的博士论文。有价值的还有E·加略著《1870—1895年阿根廷圣菲省的谷物大增产与社会和政治结构变化》，载K·邓肯和I·劳特利奇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力》(剑桥，1977)；以及J·巴兰著《阿根廷的一个地区问题：出口发展中的各省资产阶级和全国市场》，载《经济发展》69(1978)。

关于生活条件，经典著作有A·本赫著《阿根廷的财富与租金》(布宜诺斯艾利斯，1915)和《当前经济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以及J·比亚莱特·马塞著《关于阿根廷内地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04)。较新的著作有R·科尔特斯·孔德著《阿根廷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还可读J·帕内蒂耶里的《劳动者》(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有关住房问题的少数著作之一是O·尤伊诺夫斯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住房政策》，载《经济发展》54(1974)。关于教育问题，可读J·C·泰代斯科著《阿根廷的教育与社会（1880—19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弗朗西斯·科恩和L·德拉托雷合著《全国联盟的成立》，载费拉里和加略合编《阿根廷自1880年以来的一百年》。

关于劳工运动的材料比较丰富。那些积极参加过建立工会活动的人发表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有S·马罗塔著《阿根廷的工会运动》(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D·阿瓦德·德·桑蒂连著《阿根廷各省工人联合会。意识形态和经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现代著作有：M·卡萨雷托著《阿根廷工人运动史》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H·斯波尔丁著《阿根廷工人阶级。关于它的历史文献（1890—191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以及I·奥韦著《本世纪初阿根廷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特拉维夫，1975）。

11．1914年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内地、布宜诺斯艾利斯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阿根廷的一个重要统计资料来源是，埃内斯托·托恩基斯特公司的《阿根廷共和国最近50年的经济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关于大战期间的情况，也应参考托恩基斯特公司的季刊《阿根廷商业状况》（布宜诺斯艾利斯，1913—1922）。第二组材料来源是亚历杭德罗·E·本赫的著作。可读他的《阿根廷的铁路》（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和《当前经济问题》（1919年著，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两书都搜集大量事实和数据，是百科全书式著作。此后不久，本赫又出版了《阿根廷经济》（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1930），其中包括作者过去在报纸上发表过的许多文章，以及他负责编辑的重要杂志《阿根廷经济评论》上的文章。其他重要出版物有：1914年全国人口普查成果——《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布宜诺斯艾利斯，1915—1917），它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口统计，还有阿尔韦托·B·马丁内斯和莫里斯·莱万多夫斯基的《20世纪阿根廷》（伦敦，1911）。关于人口问题，可阅读《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人口总普查》（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

这个时期国外研究阿根廷的最杰出的著作是劳埃德银行为庆祝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于1910年出版的作品——雷金纳德·劳埃德编《阿根廷20世纪印象》（伦敦，1911）。皮埃尔·德尼的《阿根廷共和国。它的发展和进步》（由约瑟夫·麦凯布译成英文，伦敦，1922）是法国人撰写一本有用的地理调查书，但比他的先辈马丁·德·穆塞19世纪60年代的作品差得多。W·H·科贝尔的《阿根廷：过去和现在》（伦敦，1914）对风俗习惯观察深刻。

874

约翰·福斯特·弗雷泽著《令人惊异的阿根廷》(伦敦,1914)也有其优点,虽然写消极面较多,而且有些粗俗。在阿道弗·波萨达的《阿根共和国》(马德里,1912)一书中,在稍后出版的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西班牙人的观点。其他同类重要著作有:詹姆斯·布赖斯著《南美洲:观察与印象》(伦敦,1912);乔治·克列孟梭著《今日南美洲:对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的社会、政治和商业状况的调查》(伦敦,1911);约翰·A·哈默顿著《阿根廷真相: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停留一年的笔记和印象》(纽约,1915);朱尔·于雷著《在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大查科》(巴黎,1914);阿道夫·N·许斯特尔著《阿根廷:土地、人民、经济生活与垦殖》(两卷集,慕尼黑,1913);马克·C·杰斐逊著《向阿根廷草原移民》(纽约,1926)。

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几乎不可缺少的材料来源是阿根廷的报刊,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份大型日报——《新闻报》和《民族报》。《先锋报》(社会党)和《抗议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研究社会、政治和纯劳工历史具有很大价值。大量其他报纸也等待着研究人员去查阅。此外,还有更多的不定期刊物,如:《面孔与面具》(这是当时阿根廷的《笨拙》周刊)*、《人民杂志》等,还有比较严肃的刊物,如鲁道夫·里瓦罗拉的《阿根廷政治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非西班牙文的重要报刊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布宜诺斯艾利斯旗帜报》和《拉普拉塔河信使报》等(还有大批意大利文、德文、俄文和其他文种的报刊)。关于经济问题,特别应阅读《拉普拉塔河评论》。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根廷经济的大量补充材料,可参阅本卷书目评论第9节。

875

关于潘帕斯草原区土地制度类型的完整历史尚有待撰写。詹

* Punch (《笨拙》周刊),英国1841年创刊的插图期刊,以刊登讽刺性幽默和漫画著称。——译者

姆斯·R·斯科比的《草原上的革命。1860—1910年阿根廷小麦的社会史》(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4)是本杰作。关于潘帕斯草原区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材料，可阅读本卷书目评论第9节和第10节。

对潘帕斯草原区以外地区的研究比较局部和零碎。可阅读豪尔赫·巴兰的《阿根廷的地区城市化和农业生产：一次对比分析》，载《经济和社会文献中心研究杂志》2/2(1979年)；马科斯·希门尼斯·萨皮奥拉著《阿根廷内地与"对外发展"：图库曼实例》载M·希门尼斯·萨皮奥拉编《寡头政治。供研究1930年以前阿根廷现实的材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72—115页；唐娜·J·盖伊著《1870—1900年阿根廷图库曼省的政治与制糖业》(印第安纳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以及《19世纪阿根廷农村工人阶级：图库曼种植园里的强迫劳动》，载LARR13/1（1979年)，第135—145页；唐纳德·M·佩克著《1890—1914年的阿根廷政治与门多萨省》（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7）；胡安·卡洛斯·阿吉利亚著《一个贵族阶层的没落：对科尔多瓦省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的调查》，贝蒂·克劳斯英译本（亚拉巴马州尤尼弗西蒂，1976）；亚历杭德罗·E·本赫著《阿根廷北方工业》（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胡安·安东尼奥·索拉里著《阿根廷北方的劳动者》（布宜诺斯艾利斯，1937）；奥斯瓦尔多·巴耶尔著《悲惨的巴塔哥尼亚的复仇者》（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卡尔·E·索尔伯格的《阿根廷的石油与民族主义》（斯坦福，1972）对巴塔哥尼亚的条件作了进一步评论。伊恩·拉特利奇的《1930—1943年的阿根廷制糖经济》载K·敦坎和I·拉特利奇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动》（剑桥，1976）还载有萨尔塔和胡伊两省1930年以前的早期历史材料。

876 关于这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史，以下著作具有价值：詹姆斯·R·斯科比著《1870—191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纽约，1974）；弗朗西斯·科恩著《布宜诺斯艾利斯。20年

代它的主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奥斯卡·尤伊诺夫斯基著《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住房政策》载《经济发展》14/54（1974）第327—371页；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著《阿根廷工人阶级。关于它的历史文献（1890—191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和《拉丁美洲的有组织劳工。对依附性社会的工人历史的实例研究》，（纽约，1977）；何塞·帕内蒂耶里著《劳动者》（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阿根廷的发展。1880—191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关于城市工人工资的一章；尼古拉斯·J·拉万卡著《第三警察局的回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这是一名警察的回忆录。对于上层分子和中等阶级的研究，可阅读豪尔赫·费德里科·萨瓦托著《关于现代阿根廷统治阶级形成的笔记（1880—1914年）》油印稿，阿根廷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戴维·罗克著《1890—1930年的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可同时阅读本卷书目评论第10节。

12. 阿根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革命

本卷第9、10、11各节书目评论中提到的许多关于1870—1914年期间的阿根廷的书籍、文章和未发表论文，也涉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全世界肖条这个时期。

戴维·罗克的《1890—1930年的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讨论了1912年的“萨恩斯·佩尼亚法”和1912至1916年期间的政治。同时可读彼得·H·史密斯的《阿根廷与民主的失败：政界上层分子之间的冲突》（麦迪逊，1974）和理查德·J·沃尔特著《1890—1930年的阿根廷社会党》（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7）。阿根廷学者两本较近期的研究著作提供了另外一些材料，一本是纳塔略·博塔纳的《保守派的秩序。1880—1916年期间的阿根廷政治》（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另一本是奥斯卡·科恩布利特的《保守派在阿根廷政治中的选择》，载《经济发展》

56/14(1975年)，第599—640页。有关1912—1930年时期内的完整的选举资料，见达里奥·坎顿著《关于研究阿根廷政治社会学的材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关于1914至1930年期间的经济，有好几个有用的传统材料来源：哈罗德·J·彼得斯著《阿根廷共和国的外债》(巴尔的摩，1934)；弗农·L·费尔普斯著《阿根廷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费城，1938)；里卡多·M·奥尔蒂斯著《1850—1930年阿根廷经济史》(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尤其是第2卷。在比较近期的一些研究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卡洛斯·F·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文集》(纽黑文，1970)和吉多·迪·特利亚和曼努埃尔·齐梅尔曼合著的《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布宜诺维艾利斯，1967)。关于工业发展，可读哈维尔·比利亚纽瓦著《阿根廷工业化的起源》载《经济发展》47/12(1972)第451—476页，和爱德华多·F·豪尔赫著《工业与经济集中》(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

877

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可读豪尔赫·福尔多和阿图罗·奥康奈尔合著《20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与大西洋经济》，载《经济发展》49/13(1973年)；约瑟夫·S·图尔钦著《战争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纽约，1971)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阿根廷经济》，载《拉普拉塔河评论》(1970年6月19日—7月10日)；佩德罗·斯库奇特《1914—1947年英国对阿根廷经济统治地位的削弱和结束》，载L·玛尔塔·帕纳卡、里卡多·莱塞和佩德罗·斯库奇合编《对于庇隆主义起源的研究》，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以及罗杰·格雷维尔著《英美在阿根廷的贸易竞争与1929年达伯农代表团》，载D·罗克编《20世纪阿根廷》(伦敦，1975)。此外还有哈罗德·F·彼得森著《1810—1960年阿根廷和美国》(纽约，1964)。

关于伊里戈延第一次执政，可读罗克著《阿根廷的政治》；彼得·H·史密斯著《阿根廷与民主的失败》；彼得·H·史密斯著

《阿根廷政治与牛肉。冲突与变革的模式》(纽约，1969)，和《阿根廷激进派维护牧场主利益》载《经济发展》25/7 （1967年），第795—829页；瑯查德·J·沃尔特著《阿根廷的学生政治。1918—1964年大学改革及其影响》(纽约，1968)，和《阿根廷社会党》；保罗·B·古德温著《1916—1930年英国铁路与激进公民联盟》(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奥斯瓦尔多·拜尔著《悲惨的巴塔哥尼亚的复仇者》(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在比较传统的论著中，最具价值的有罗伯托·埃切帕雷博尔达著《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人民与政府》(10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加夫列尔·德尔·马索著《激进主义。关于它的历史和理论的文章》(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以及曼努埃尔·加尔韦斯著《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生平》(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关于阿尔韦亚尔，范围比较有限，但可读罗克的《阿根廷的政治》，史密斯的《阿根廷与民主的失败》以及劳尔·A·莫利纳的《马尔塞洛·T·德·阿尔韦亚尔总统任期》(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关于肉类问题。可读史密斯的《政治与牛肉》以及西蒙·G·汉森著《阿根廷的肉类和英国市场。阿根廷肉类工业史上的几章》(斯坦福，1938) 以及奥斯卡·B·科尔曼著《阿根廷农村资产阶级内部斗争：20年代肉类危机》载《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关税问题曾引起很大注意。在近期著作中，最优秀的有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文集》，劳拉·兰德尔的《阿根廷20世纪经济史》(纽约，1978)第120—126页；以及卡尔·E·索尔伯格著《1916—1930年阿根廷的关税与政治》载HAHR53/2（1973年）第260—284页。此外还有卡尔·E·索尔伯格的《1912—1930年阿根廷的农民骚乱和农业政策》，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3（1971年）第15—55页。研究20世纪20年代保守派的最佳著作是马里萨·纳瓦罗·杰拉西的《民族主义者》(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关于石油，首先参阅卡尔·E·索尔伯格著《阿根廷的石油和民族主义》(斯坦福，1979)；还可读阿图罗·弗朗迪西著《石油与政治。对研究阿根廷经济史以及帝国主

878

义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点意见》(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以及马科斯·卡普兰著《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第一届总统任期（1916—1922年）内的石油政治》，载《经济发展》45/12(1972年）第3—24页。探讨军队和1930年革命最好的是罗伯特·A·波塔什著《1928—1945年阿根廷的军队与政治。从伊里戈延到庇隆》(斯坦福，1969）和何塞·马里亚·萨罗韦著《关于1930年9月6日革命的回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

13. 现代乌拉圭的形成（约1870—1930年）

在本章讨论的时期内，进行过3次全国人口普查（1852、1860和1908年)。有关官方统计数字，可见《记要》(蒙得维的亚，873—1884)和《统计年签》(蒙得维的亚，1884—)；胡安·里亚尔的《1850—1930年乌拉圭历史统计资料》(蒙得维的亚，1980）汇集了宝贵的统计资料。共和国总统一年一度的《咨文》，对国家状况提出总的看法，但考虑到它们的来源和发表的动机，使用时必须格外小心。此外可参阅政府各部，特别有关政府工作、财政和经济发展的《记事录》。各国外交和领事报告提供外国驻乌拉圭代表的观点；胡安·E·皮韦尔·德沃托出版了很大一部分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部长们发给驻乌拉圭办事处的信件。可参阅蒙得维的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杂志》，第32—39卷（1962—1968)。关于意大利王国的外交和领事文件，可阅胡安·A·奥多内著《欧州对乌拉圭的看法》(蒙得维的亚，1965)。下院、参议院和全体会议从1830年起曾连续发表（有几次中断)《会议日记》。一些畅销报纸具有很大重要性，如《世纪报》、《海运电讯报》、《铁道报》、《民主报》、《日报》、《拉普拉塔河报》、《晨报》、《国家报》等；外籍公民社区出版的期刊也是重要的材料来源。重要经济部门的出版物，最重要的有《农业协会杂志》(1872年起出版）和《农业联合会杂志》(1915年起出版)，它们反映农业利益；《南美经济杂志》(第1集和第2集自1928年起出版）则代表工业界利益。

879

其他补充材料来源（旅游者、回忆录作者、散文作者等）在下列著作中得到充分分析：卡洛斯·雷亚尔·德·阿苏亚著《外国旅游者和观察家对乌拉圭的看法和印象（1889—1964年）》（蒙得维的亚，1965），《当代乌拉圭散文选》（蒙德维的亚，1964）和《观察与生活的散文》，载《东方篇章》9（蒙得维的亚，1968）。

概述性著作有爱德华多·阿塞韦多著《乌拉圭历史年刊》（蒙得维的亚，1933—1936，第2版）；路易斯·C·本韦努托著《乌拉圭简史》（蒙得维的亚，1969）；罗克·法劳内著《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乌拉圭（1900—1968年）》（蒙得维的亚，1970）；拉塞尔·H·菲茨吉本著《乌拉圭：民主标本》（纽约，1954）；本杰明·内厄姆著《巴特列时代》（蒙得维的亚，1975）；M·布兰卡·帕里斯·德·奥多内等著《1830—1945年乌拉圭历史比较大事记》（蒙得维的亚，1968年第2版）；弗朗西斯科·R·平托斯著《巴特列与乌拉圭的历史进程》（蒙得维的亚，1938）；阿尔韦托·苏姆·费尔德著《乌拉圭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学简介》（蒙得维的亚，1963年第4版）。

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可读何塞·佩德罗·巴兰和本杰明·内厄姆合著《现代乌拉圭农村史》第1卷《1851—1885年》（蒙得维的亚，1967），第2卷《1886—1894年经济危机》（蒙得维的亚，1971），第3卷《1895—1904年复苏与依附》（蒙得维的亚，1973），第5卷《1905—1914年脆弱的繁荣》（蒙得维的亚，1977），第6卷《1905—1914年巴特列执政时期的牧业经济》（蒙得维的亚，1977），第7卷《1905—1914年巴特列执政时期的农业、信贷与运输》（蒙得维的亚，1978）；路易斯·A·法罗帕著《试析乌拉圭的经济发展》（蒙得维的亚，1965）；M·H·J·芬奇著《乌拉圭187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伦敦，1981）；西蒙·G·汉森著《乌拉圭的乌托邦》（纽约，1938）；经济研究所编《乌拉圭的经济发展》（蒙得维的亚，1969）；劳尔·雅各布著《乌拉圭工业简史》（蒙得维的亚，1981）和《1929年危机中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77）；戴维·乔斯林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银行业》（伦敦，1965）；萨穆埃尔·利希滕施 880

森因著《国际贸易与货币问题》，载《我们的土地》20（蒙得维的亚，1969）；路易斯·马卡达尔等著《拉丁美洲经济》，载《今日乌拉圭》（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胡利奥·马丁内斯·拉马斯著《富饶和贫困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30）；奥斯卡·莫拉特著《1880—1920年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商业危机》（蒙得维的亚，1973）胡安·A·奥多内著《现代乌拉圭的形成》（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和《1852—1904年自由主义时期乌拉圭的经济和社会》（蒙得维的亚，1967）；胡安·里亚尔著《乌拉圭：城市化国家》（蒙得维的亚，1981）和《一个小国的人口和发展：1830—1930年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83）；胡利奥·C·罗德里格斯著《大交易》，载《乌拉圭百科全书》，第28卷（蒙得维的亚，1968）；比维安·特里亚斯著《帝国主义在拉普拉塔河》（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卡洛斯·比斯卡著《埃米利奥·雷乌斯和他的时代》（蒙得维的亚，1963）；彼得·温著《19世纪在乌拉圭的非正式英帝国》（蒙得维的亚，1975）；伊斯雷尔·旺塞沃尔和胡安·扬合著《乌拉圭在世界经济中》（蒙得维的亚，1981）；卡洛斯·苏维利亚加著《金融的挑战。1903—1933年乌拉圭的外债和发展》（蒙得维的亚，1982）。

关于人口和社会历史，可读何塞·佩德罗·巴兰和本哈明·内厄姆合著《巴特列、牧场主和英帝国》，第1卷《19世纪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79），第2卷《1903—1910年困难的对话》（蒙得维的亚，1981）；还可读《现代乌拉圭农村史第4卷《1897年和1904年两次革命的社会史》（蒙得维的亚，1972）；阿尔弗雷多·卡斯特利亚诺斯著《1829—1914年蒙得维的亚的市政发展史和城市化》（蒙得维的亚，1971）；赫尔曼·德利亚和阿尔曼多·米拉尔迪合著《乌拉圭工人运动史》（蒙得维的亚，1984）；劳尔·雅各布著《1872—1880年期间围栏运动的社会后果》（蒙得维的亚，1969）；弗朗西斯科·R·平托斯著《乌拉圭工人运动史》（蒙得维的亚，1960）；卡洛斯·雷亚尔·德·阿苏亚著《乌拉圭的贵族阶级》（蒙的维的亚1984年第2版）和《领导阶级》，载《我们的土地》34（蒙得维的

亚，1969）；胡安·里亚尔著《1850—1930年期间乌拉圭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蒙得维的亚，1981）；西尔维亚·罗德里格斯·比利亚米尔和格拉谢拉·萨普里扎合著《乌拉圭的欧洲移民。意大利人》（蒙得维的亚，1982）。

关于政治发展，可读何塞·佩德罗·巴兰和本哈明·内厄姆合著《巴特列、牧场主和英帝国》，第3卷《巴特列主义的起源》（蒙得维的亚，1982），第4卷《1911—1913年的初步改革》（蒙得维的亚，1983）；何塞·佩德罗·巴兰著《巴特列、牧场主和英帝国》，第5卷《1911—1913年帝国主义和保守派的反应》（蒙得维的亚，1984）；奥斯卡·H·布鲁斯凯拉著《乌拉圭的传统政党与体制演变》（蒙得维的亚，1962）；赫拉尔多·卡埃塔诺著《改良主义的痛苦》（蒙得维的亚，1983）；阿尔弗雷多·卡斯特利亚诺斯和罗米欧·佩雷斯合著《多元化体制。对乌拉圭1830—1918年经验的总结》（蒙得维的亚，1981）；约兰·林达尔著《乌拉圭的新道路：对第一届国务委员会执政期间的政治研究》（斯德哥尔摩，1962）；卡洛斯·马尼尼·里奥斯著《巴特列昨晚召见我》（蒙得维的亚，1970）；胡安·E·皮韦尔·德沃托著《乌拉圭政党史》（两卷集，蒙得维的亚，1942），和《乌拉圭政治传统中的大赦》（蒙得维的亚，1984）；卡洛斯·雷亚尔·德·阿苏亚著《推动及其制动器。巴特列主义30年》（蒙得维的亚，1964）和《政治史》，载《乌拉圭百科全书》第1卷（蒙得维的亚，1968）；米尔顿·万格尔著《乌拉圭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他的时代的创造者，1902—190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1963），和《典型国家：乌拉圭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907—1915年》（马萨诸塞州剑桥，1980）；卡洛斯·苏维利亚加著《埃雷拉，民族主义在十字路口》（蒙得维的亚，1976）。

最后，关于这时期的文化方面，可读阿图罗·阿道著《乌拉圭的唯灵论和实证主义》（墨西哥，1950）和《乌拉圭的唯理论和自由主义》（蒙得维的亚，1962）；胡安·A·奥多内和M·布兰卡·帕里斯合著《蒙得维的亚大学的历史。老人大学，1849—1884

281

年》(蒙得维的亚,1963)和《乌拉圭大学从军国主义到危机，1885—1958年》(蒙得维的亚,1972)；安赫尔·拉马著《文学180年》,载《乌拉圭百科全书》第11卷（蒙得维的亚,1968)；阿尔韦托·苏姆·费尔德著《乌拉圭知识界的发展》(蒙得维的亚,1967）。

14．巴拉圭——从三国同盟战争到查科战争（1870—1932年）

研究从三国同盟战争（1865—1870年）到查科战争（1932—1935年）期间的巴拉圭的学术著作很少。哈里斯·盖洛德·沃伦的《巴拉圭与三国联盟：战后10年（1869—1878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8）是一部认真研究这个时期前期的著作。然而，卡瓦列罗将军占据全国政治舞台的时期和1904年后自由党统治的动荡年代，历史学家尚未加以研究。特奥多西奥·冈萨雷斯的《巴拉圭的厄运》(布宜诺斯艾利斯利斯,1931),学术性虽不如沃伦那本专著,但仍不失为具有价值的作品。冈萨雷斯是20世纪20年代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党参议员，他这本书专门"揭丑"，揭露882 巴拉圭的阴谋活动和腐败现象时，哪个党派都不放过，时间上从三国联盟战争一直写到冈萨雷斯本人的时候，不按时间先后，而是按题目讨论巴拉圭的各种问题。另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卡洛斯·R·森图里翁的色罗万象的《巴拉圭文化史》(两卷集，亚松森,1961)。此书主要介绍文学，但由于巴拉圭的文学作品具有论战性，因而读者可从中获得不少有关政治问题和政治力量相互关系的材料。另一本值得推广的书是阿图罗·布雷的《巴拉圭人物与时代》(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和1957),它通过巴拉圭主要人物的简史介绍这个国家的历史。

从通史中也能搜集到一些材料。埃弗拉姆·卡多索的《巴拉圭简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和胡利奥·塞萨尔·查韦斯的《巴拉圭史简编》(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是巴拉圭两位最优秀历史学家的概论性著述。前者是自由党人，死于1973年；后者是

红党党员。阿隆索·伊瓦拉的《在史诗般的1865—1870年之后巴拉圭政治生活100年》(亚松森,1973)扼要叙述了自三国联盟战争以来的主要事件。英文著作有菲利普·雷恩著《巴拉圭》(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56);乔治·彭德尔著《巴拉圭——河畔之国》(伦敦,1956);哈里斯·盖洛德·沃伦著《巴拉圭简史》(俄克拉何马州诺曼,1949)。以上三本书都是介绍巴拉圭的有用入门书,但对战争时期的介绍都是最弱的一部分。

F·阿图罗·博尔东的《巴拉圭政治史:宪政时代》(亚松森,1976)介绍战争刚结束时期的政治情况较好,值得与沃伦的《巴拉圭与三国联盟》一起读。书中还有关于巴拉圭军团起源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卡洛斯·帕斯托雷的《巴拉圭国内争取土地的斗争》(蒙得维的亚,1972)则更加严肃得多。帕斯托雷政治上亲自由党,但本书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书中收集了有关土地问题的宝贵材料。

自由党1904年上台执政后的时期甚至比红党执政时期更少引起注意。大部分著作关心的是攻击或维护自由党的外交政策。较突出的例子有波利卡波·阿塔萨著《阿亚拉、埃斯蒂加里维亚和自由党》(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此书支持自由党;以及安东尼奥·E·冈萨雷斯著《巴拉圭为查科战争作准备》(两卷集,亚松森,1957),此书提出论据反对自由党。

1931年10月23日在总统府门前向学生开枪事件引起不少论战文章。埃弗拉姆·卡多索的《10月23日:巴拉圭当代史上的一页》(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维护政府,同时提供了有关自由党内部贡德拉派与谢雷尔派的宗派斗争的有趣内幕。胡安·斯特法尼奇的《1931年10月2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1958)则大概是一本反对自由党的最佳论战著作,是对卡多索的直接答复。它还对自由党的30年统治提出了更广泛的指控。在威廉·巴尔蒙特·帕克的《今日巴拉圭人》(纽约,1920)一书中可以找到巴拉圭政治和文化领导人物的简历。最后,研究这个时期的学生,无不被埃利希

883

奥·阿亚拉的复杂品格所深深吸引。他对他祖国的看法在他去世后出版。《人口迁移》(智利圣地亚哥,1941)是一篇长文章，其中对巴拉圭社会有许多深邃的观察，作者是巴拉圭一位最有才智的政治家。

15. 智利——从太平洋战争到世界大萧条(1880—1930年)

迄今为止，全面介绍该时期的最佳英文著作有布赖恩·洛夫曼著《智利：西班牙资本主义的遗产》(纽约,1979)；弗雷德里克·B·派克著《1880—1962年的智利和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城,1963)，后者内容比较广泛，远远超过书名所示范围，并包括大量令人惊讶的引证材料。最佳西班牙文著作有莱奥波尔多·卡斯特多著《1891—1925年智利史概要》(圣地亚哥，1982)，此书有出色的图解；还有贡萨洛·维亚尔的巨著《1891—1973年智利史》(第1卷上下两册，圣地亚哥，1981，第2卷圣地亚哥,1983)，这部现代史已出版的头三册包括1891年至1925年时期，内容至为详尽，作者雄心勃勃，全书将有相当卷幅。介绍外交史的有马里奥·巴罗斯著《1541—1938年智利外交史》(巴塞罗那,1970)；介绍宪政和政治史的有胡利奥·海泽·冈萨雷斯著《智利史。1861—1925年议会制时期》(两卷集，圣地亚哥,1974、1974—1982)；介绍农村状况的有阿诺德·鲍尔著《从西班牙征服到1930年的智利农村社会》(剑桥,1975)和布赖恩·洛夫曼著《农村中的斗争：1919—1973年智利政治和农业劳动》布卢明顿,1976)前几章；介绍工业发展的有亨利·基尔希著《一个传统社会中的工业发展：智利小型企业与现代化的冲突》(盖恩斯维尔，1977)；介绍劳工运动和劳资关系的有艾伦·安吉尔著》(智利政治与劳工运动》(伦敦,1972)，豪尔赫·巴里亚著《智利工人运动》(圣地亚哥,1971)和彼得·德·谢佐的重要的“修正主义”著作《1902—1927年智利城市工人和工会》(麦迪逊，

88!

1983)，此书对雷卡瓦伦和硝石工人在形成阶级觉悟和左翼政党方面所起作用的说法提出了认真的挑战。卡门·卡里奥拉和奥斯瓦尔多·森克尔合写的《智利》，载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著《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和洛杉矶，1977）是一篇加注释的书刊介绍，附有一篇解释性文章。介绍文学史的劳尔·席尔瓦·卡斯特罗著《1843—1956年智利小说评论史》（马德里，1960）和卡斯特多著《智利史概要》。

关于巴尔马塞达执政时期，特别应读哈罗德·布莱克莫尔著《1891年智利革命及其历史经过》载HAHR45/3（1965）第393—421页，以及同一作者的《1886—1896年英国硝石和智利政治：诺思和巴尔马塞达》（伦敦，1974）。关于同时代人的论述，J·巴尼亚多斯·埃斯皮诺萨所著《巴尔马塞达，他的政府和1891年革命》（两卷集，巴黎，1894）最好而且最详尽；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奇亚的《巴尔马塞达和1891年反革命》（圣地亚哥，1969，第2版）则作出了富于暗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托马斯·F·奥布赖恩的《1870—1891年硝石业与智利的关键性过渡》（纽约，1982）和迈克尔·蒙特翁的《硝石时代的智利：1880—1930年经济依附性的演化》（麦迪逊，1982）两书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和互相矛盾的解释。

议会制时期最后终于开始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见卡斯特多著《智利史概要》，比亚尔著《智利史》和海泽·冈萨雷斯著《智利史。议会制时期》，此书强烈维护议会制的优点。保罗·赖因施的《智利的议会制政府》，载《美国政治学评论》3（1908—1909年）不仅出色地描绘了"当代史"，而且是编写"当代史"的杰出范例。两本研究具体政府的著作值得一提。一本是海梅·埃萨吉雷著《1896—1901年埃拉苏里斯·埃乔伦政府执政时期的智利》（圣地亚哥，1957），另一本是赫尔曼·列斯科著《1901—1906年列斯科总统任期》（圣地亚哥，1950）。在较早的著作中，可读里卡多·多诺索的论战性很强的《亚历山德里——鼓动家和破坏

者》(两卷集，墨西哥，1952和1954)，此书是一本涉及整个时期的详尽的编年史，包括伊瓦涅斯执政时期和30年代。另一本是组织得较差但同样也很重要的著作是，由吉列尔莫·费利乌·克鲁斯整理的当时重要人物曼努埃尔·里瓦斯·比库尼亚的著作《智利政治和议会史》(圣地亚哥，1964)，全书共编成三卷，是个材料丰富的宝藏，但需由历史学家去认真挖掘。

885

象巴尔马塞达一样，关于亚历山德里和伊瓦涅斯的材料也很丰富，他们都是备受推崇而又引起争论的人物。除多诺索的《亚历山德里》外，有关亚历山德里的重要著作有他本人的《回忆录》(3卷集，圣地亚哥，1967)，奥古斯托·伊格莱西亚斯著《亚历山德里——美洲的一个民主阶段》(圣地亚哥，1960)，和路易斯·杜兰德著《唐·阿图罗》(圣地亚哥，1952)。伊瓦涅斯本人没有写回忆录，写书介绍他的有雷内·蒙特罗著《关于伊瓦涅斯的真实情况》(圣地亚哥，1953)；维克托·孔特雷拉斯·古斯曼著《独裁者的罗盘箱》(圣地亚哥，1942)；埃内斯托·维特·罗哈斯著《伊瓦涅斯——继一般的考迪略》(圣地亚哥，1958)；阿基莱斯·贝尔加拉·比库尼亚的《伊瓦涅斯——当地的凯撒》(圣地亚哥，1931)对他进行了强烈批评；以及路易斯·科雷亚·普列托根据采访伊瓦涅斯本人写成的《伊瓦涅斯总统》(圣地亚哥，1962)。对伊瓦涅斯不断进行最猛烈抨击的是卡洛斯·比库尼亚的《智利的暴政》(两卷集，圣地亚哥，1939)。对1920—1931年整个时期介绍得最好的英文著作，是弗雷德里克·纳恩的《1920—1931年智利政治：武装部队的光荣使命》(阿尔伯克基，1970)，它也为研究军事问题进一步提供了最广泛的参考书目。阿图罗·奥拉瓦里亚的《亚历山德里两次执政之间的智利》(4卷集，圣地亚哥，1962—1965)围绕这位智利40年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提供了大量材料，但同样，丰富的脉络需要花力气去寻找。E·蒙雷亚尔将军的《1924—1925年革命时期历史文献》(圣地亚哥，1926)编纂了有关1924—1925年军事干预的宝贵文献，劳尔·阿尔杜纳特·菲利普斯

的《军刀格格响》(圣地亚哥出版，日期不详）是它的姐妹篇，书中复制了不少令人神往的照片，颇有价值。

圣地亚哥·马基亚韦罗·巴拉斯的《国家经济政治》(两卷集，圣地亚哥,1931）和P·T·埃尔斯沃思的《智利，过渡中的经济》(纽约,1945）第1章，详细讨论了20年代的经济问题和“大崩溃”；阿尔贝特·O·希施曼的《智利的通货膨胀》,载他本人的《走向进步的途程》(纽约,1963）第159—223页对智利现代史上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进行了卓越的、发人深思的讨论；而对智利经济史上的最近情况提出看法的则是马科斯·马马拉基斯的《智利经济的增长和结构。从独立到阿连德》(纽黑文,1976)。

应该提到其他两个经常被遗忘的有关这时期的材料来源——旅行笔记和未发表的论文。材料最丰富、最富于洞察力的旅行笔记有C·维纳著《智利和智利人》(巴黎，1888)；爱德华多·普瓦里耶的收集了大量材料的《智利在1908年》(圣地亚哥，1909)；弗兰克·G·卡彭特著《南美洲——社会、工业和政治》(纽约,1900)；弗朗西斯·J·G·梅特兰著《智利：它的土地和人民》(伦敦,1914)；G·F·斯科特·埃利奥特著《智利》(伦敦,1907)；和厄尔·蔡平·梅著《漫游智利2,000英里》(纽约，1924)。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论文，如J·R·库尤姆吉恩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英国—智利经济关系（1914—1920年）》(伦敦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安德鲁·巴纳德著《1922—1947年的智利共产党》(伦敦大学,1977年博士论文)；彼得·康诺博伊著《1878—1925年智利的货币和政治》(南安普敦大学,1977年博士论文)；以及J·G·帕尔马著《从1830到1935年智利制造业的增长和结构》)牛津大学,1979年博士论文)。

886

16. 玻利维亚——从太平洋战争到查科战争（1880—1932年）

概　　论

有好几本包括1880—1932年时期的玻利维亚通史，著名的有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玻利维亚通史》(拉巴斯，1922)；恩里克·菲诺特著《新玻利维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和豪尔赫·巴萨德雷著《秘鲁、智利和独立的玻利维亚》(巴塞罗那，1948)。较晚、较详尽的研究著作有赫伯特·S·克莱因的《1880—1952年玻利维亚的政党和政治变革》(剑桥，1968)。克莱因的《玻利维亚，一个多民族社会的进化》(纽约，1982）是一部更新的研究作品，以通史形式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历史。

在专题著作中，路易斯·佩尼亚洛萨的《玻利维亚经济史》（两卷集，拉巴斯，1953—1954）虽较陈旧，目前仍是能得到的最完整著作。爱德华多·阿尔塞·夸德罗斯的《1492—1979年玻利维亚经济》(拉巴斯，1979）虽较简单，但有一些有用资料。吉列尔莫·洛拉的《1848—1971年玻利维亚劳工运动史》(剑桥，1977)是研究玻利维亚有组织劳工历史的一部完整著作。吉列尔莫·弗兰科维奇的《玻利维亚的哲学》(苏克雷，1945）讨论了知识界的历史；瓦伦丁·阿贝西亚·巴尔迪维索的《玻利维亚的历史编纂学》(拉巴斯，1965)。则具体讨论了历史学家。马里奥·罗兰·安纳亚的《玻利维亚的政治和政党》(拉巴斯，1966）研究了政治思想，并登载了最完整的党的纲领和政纲。同时可读吉列尔莫·洛拉著《玻利维亚政治文献》(拉巴斯，1970)。N·安德鲁·N·克莱文的《玻利维亚的政治组织》(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40虽较陈旧，但它是唯一的一本认真分析共和党政府的组织结构的著作。西罗·费里克斯·特里戈的《玻利维亚宪法》(马德里，

887

1958）汇编了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的全部玻利维亚宪法，并加以分析，非常有用。在有关玻利维亚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的大量著作中，最好的是巴伦廷·阿韦西亚·巴尔迪维索的《玻利维亚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迄今仅出第1卷，拉巴斯，1979)。罗伯托·克雷哈苏·卡尔沃的《1825—1948年的玻利维亚与英国人》(拉巴斯，1971）探讨了玻利维亚和英国的密切关系。

有两本从不同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优秀著作：恩里克·菲诺特著《玻利维亚文学史》(拉巴斯，1956年第2版)，和费尔南多·迭斯·德·梅迪纳著《玻利维亚文学》(马德里，1954)。奥古斯托·古斯曼的《玻利维亚的长篇小说》(拉巴斯，1955）和他为泛美联盟撰写的《拉丁美洲文学辞典。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5)，对玻利维亚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深刻分析。至今还没有一本介绍造型艺术的书，但如果要对西班牙征服前和殖民统治时期或独立后的这个领域进行任何评价，那就离不开何塞·德·梅萨和特雷莎·希斯韦特的著作。梅萨和希斯韦特的《玻利维亚：历史遗迹与考古》(墨西哥，1970）很好地介绍了玻利维亚建筑。

介绍个别教会的历史书很多，有人还搜集了不少文件，并在更大范围内对国际宗教问题进行研究，但只有费利佩·洛佩斯·梅嫩德斯对玻利维亚教会的整个历史迅速做过一些研究，书名为《玻利维亚教会史简编》(拉巴斯，1965)。胡利奥·迪亚斯·A对军队这个题目进行了研究：《1825—1932年玻利维亚军队史》(拉巴斯，1940)。胡安·曼努埃尔·巴尔卡萨尔对医学作了研究：《玻利维亚医学史》(拉巴斯，1956)。但是对律师业研究不够。

由于采矿业具有重要作用，加上全国地形特殊，玻利维亚成了国内外许多地质和地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豪尔赫·穆尼奥斯·雷耶斯的《玻利维亚地理学》(拉巴斯，1977）和费德里科·E·阿尔菲尔德的《玻利维亚地质学》(拉巴斯，1972年第3版）对十分广泛的大量材料作了概括。农村与农牧业事务部最近作了一次令人颇感兴趣的尝试，他们以比较现代化的标准对全国土壤和

气候重新绘图，题为：《玻利维亚生态地图》(拉巴斯，1975)。托马斯·T·科克伦的《玻利维亚使用土地开发农业的潜力》(拉巴斯，1973)，对玻利维亚的土壤进行了比较传统但很重要的分析。戈韦尔·巴尔哈·巴里奥斯和阿曼多·卡多索·贡萨尔维斯合写的《玻利维亚农业地理》(拉巴斯，1971)对工业设备和粮食加工厂的分布进行了粗浅但是有用的研究。政府在20世纪初搜集的许多统计数字，范围很广，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如国家移民统计和地理宣传局编制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统计和地理摘要》(两卷集，拉巴斯，1903)；《玻利维亚共和国地理》(拉巴斯，1905)；和《玻利维亚共和国地理辞典》(4卷集，拉巴斯，1890—1904)。J·瓦莱里·菲费尔的《玻利维亚。1825年以来的土地、位置和政策》(剑桥，1972)，是一本介绍著名的玻利维亚边界问题的令人感兴趣的政治地理书。近来，玻利维亚还广泛收集飞机和卫星摄制的地图以及现代化的人口地理图，由军用地理研究所和国家统计研究所提供。洛兰·E·吉丁斯的《从太空看到的玻利维亚》(休斯敦，1977)对一些卫星摄制的地图进行说明并作了索引。最后，曼努埃尔·弗朗陶拉·阿甘多尼亚的《玻利维亚的发现者和探索者》(拉巴斯，1971)对大量勘探材料作了说明。

人类生理条件如何适应高原生活问题近来也成为学术界感兴趣的题目。结果，保罗·T·贝克和M·A·利特尔两人把最新重大研究结果汇编成书：《人类在安第斯山：对克丘亚高地的一次多方位研究》(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劳兹堡，1976)。

19世纪后期

直到前不久为止，历史学家对19世纪下半叶的玻利维亚历史的关心，一直不如它的早期历史。这时期的主要政治理论家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的全部著作已经出版：《全集》(共7卷，拉巴斯，1932—1934)。尼卡诺尔·阿兰萨伊斯的《玻利维亚的几次革命》(拉巴斯，1918)对这时期的政治动乱进行了有趣的考察。詹姆斯

·邓克利的《玻利维亚军队的政治：1879—1935年的体制变化》（牛津大学，1979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军队的政治作用。但是对这时期的政治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研究著作，而传记或对政府工作的研究则更少。但是有一本非常出色的政治小说，即阿曼多·奇尔韦切斯的《罗哈斯的候选人资格》(拉巴斯，1909)，它被认为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拉丁美洲此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安东尼奥·米特雷的《拉普拉塔河的家长。19世纪玻利维亚采矿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利马，1981）对复苏的采矿业作了很好的分析。有几本当时矿工领袖的传记：埃内斯托·鲁克著《唐·阿韦利诺·阿拉马约传》(波托西，1891)；A·科斯塔·迪·雷尔斯著《费利克斯·阿韦利诺·阿拉马约和他的时代（1846—192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42)；海梅·门多萨著《格雷戈里奥·帕切科》(智利圣地亚哥，1924)。但作者关心的通常是这些人物生活中的非经济方面。此外，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如国内市场、地区贸易、国家财政等也都被忽略。对这时期发生的交通运输革命或城镇中心的现代化也未认真研究。基本材料是有的，这一点很明显。例如，埃德加·A·巴尔德斯出版的《铁路关于全国仓库登记本目录》(拉巴斯，1980）开列了一张很好的清单。

与相对地忽略经济史形成对比的是，对这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有重大新发展，首先是拉米罗·孔达尔科·莫拉莱斯的富于革新精神的著作《萨拉特·"恐怖的"维尔克。1899年土著居民反叛史》(拉巴斯，1965)向过去认为印第安人存在双重社会制度、脱离政治活动等传统说法提出挑战。接着又有三个重要作品向过去认为19世纪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脱离市场经济等传统说法提出挑战，它们是：西尔维亚·里韦拉著《玻利维亚高原地区大庄园的扩大：构成地方寡头统治特点的若干因素》，载《前进》2（1978)；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秘鲁高原地带的印第安人和纳贡》(利马，1978)；以及埃尔温·P·格赖沙伯尔著《19世纪玻利维

亚印第安人社会的残存：各地区比较》，载JLAS12/2（1980）。对城市社会也没有完全忽略。达尼埃莱·德梅拉斯的令人感兴趣的著作《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19和20世纪的玻利维亚》（巴黎，1980），不仅对农村社会问题，而且对玻利维亚的一些城市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20世纪初期

20世纪头几个年代是知识界十分活跃的时期。最初是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在几部小说中从"社会学"角度批评种族主义社会而引起骚动，后来则是在法朗斯·塔马约的《本国儿童教育学的创立》（拉巴斯，1910）一书中更有系统地提出了一种本民族观点，作者们开始对社会上的一些看法提出挑战。吉列尔莫·弗朗科维奇在他的《20世纪的玻利维亚思想》（墨西哥，1956）中，以及在前面所引选斯·德·梅迪纳和菲诺特有关文学的著作中，都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很好的研究。

890

历史学家对自由党执政时期普遍未加重视，但胡安·阿尔瓦拉辛·米连是个例外，他的《自由党执政时期的矿权》（拉巴斯，1972）是一本极为有用的首创性研究著作。另一方面，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界领袖引起了玻利维亚知识界的注意，产生了几本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最出色的传记。有两本优秀传记是涉及这时期的，它们是，贝尼尼奥·卡拉斯科著《埃尔南多·西莱斯》（拉巴斯，1961）和戴维·阿尔韦斯特吉著《萨拉曼卡，他对玻利维亚命运的吸引力》（3卷集，拉巴斯，1957—1962）。对这时期作出总的评价的有克莱因的《政党与政治变革》，还有两部杰出著作：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的《自杀的独裁者，玻利维亚40年历史》（智利圣地亚哥，1956），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玻利维亚政治史的两卷本历史书的第1卷；和波菲里奥·迪亚斯·马奇卡多的一套5卷本的前3卷：《玻利维亚史。萨韦德拉，1920—1925年》（拉巴斯，1951），《玻利维亚史。古斯曼，西莱斯，布兰科·加林多，1925—1931

年》(拉巴斯,1954),《玻利维亚史。萨拉曼卡,查科战争,特哈达·索尔萨诺》(拉巴斯,1955)。

对这时期的经济史也比前几个时期进行了更充分的研究。采锡业终于在沃尔特·戈麦斯的著作《1900—1970年玻利维亚经济发展中的采矿业》(拉巴斯,1978)中得到了比较深刻的总体经济分析。作为这种宏观分析的补充,有人还对早期工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如佩德罗·阿尼塞托·布兰科著《对玻利维亚采矿业的专题著作》(拉巴斯,1910);赫伯特·S·克莱因著《帕蒂尼奥锡矿王国的建立》,载《美洲经济事务》19/2(1965年);和多纳西埃诺·伊瓦涅斯·C著《玻利维亚矿业史》(安托法加斯塔,1943)。评价矿工政治作用的有阿尔瓦拉辛著《矿权》和威廉·洛夫斯特朗著《拉丁美洲工业压力集团的态度:1925—1935年的"玻利维亚采矿业协会"》(伊萨卡,1968)。

对当时国民经济作出良好的总体评价的,有W·L·舒尔茨著《玻利维亚——商业和工业手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21),和保罗·瓦勒著《玻利维亚,它的人民和资源》(纽约,1914)。对经济的具体方面或国民经济政策进行评论的,有查尔斯·A·麦奎因著《玻利维亚国家财政》(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891 1925)和玛格丽特·A·马什的卓越研究:《玻利维亚银行家。对美国国外投资的研究》(纽约,1928)。在对银行业历史的众多的研究著作中,有胡利奥·贝纳维德斯的《玻利维亚银行史》(拉巴斯,1955)最为有用。

学者们对锡矿业发展引起的社会变化、城市现代化和庄园扩大过程的结束等问题都没有认真进行分析。但研究这些问题的资料是很丰富的,例如,1900年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几次中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国家移民、统计和地理宣传局编《玻利维亚共和国全国人口普查,1900年9月1日》(两卷集,拉巴斯,1902—1904)。这个政府机构还出版了大量地理方面的研究材料,前面已有引述;而且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自由党的高度

工作效率之下，政府各部几乎全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出版年度统计资料。

17. 现代秘鲁的起源（1880—1930年）

过去20年内，撰写1880—1930年时期的秘鲁历史经历了一场事实上的革命。这可以回溯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一些外国学者来到秘鲁，其中有不少人类学者。同时，秘鲁人类学家何塞·马托斯·马尔在利马成立了“秘鲁研究所”。这次革命逐渐加快步伐，因为1968年的所谓秘鲁军人革命为全世界所瞩目，军人革命开创了一个积极改革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976年。此外，60年代十年相对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加上战后人口趋势，造成秘鲁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院校的迅速扩大。不断增大的中等阶级渴望重新发现自身的特征，并为民族经验重下定义，这样就产生了希望了解秘鲁历史的新的、强烈要求。结果，出现了新一代的秘鲁学者，他们发表越来越多的常常是修正过去的新著作，改变了秘鲁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格局。

任何人研究1880—1930年时期，都必须从现代秘鲁历史学家的前辈——豪尔赫·巴萨德雷的十多本著作入手。他的17卷巨著《秘鲁共和国史》(利马，1968—1969年第6版）就象这个领域里一座高耸云霄的纪念碑，其中有5卷讨论1880—1930年这个时期。他还发表了最完整的、加注释的19和20世纪参考书目录：《秘鲁共和国史基础文献导言并附若干意见》(两卷集，利马，1971)。巴勃罗·马塞拉和沙恩·亨特合写的《秘鲁》载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合篇《拉丁美洲：1830—1930年拉美经济史指南》(伯克利和洛杉矶，1977)为这时期的秘鲁经济史提出了同样完整、也是加注释的参考书目录，并附加一篇分析性文章。其他参考书目录，可见以下各书有关章节：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著《秘鲁史起源》(利马，1963)，卡洛斯·莫雷拉·帕斯·索尔丹著《秘鲁地区参考书目录》(利马，1967)，以及卡尔·赫博

892

尔德和史蒂夫·斯坦合著《秘鲁20世纪（1895—1960年）社会与政治史参考书目录指南》(利马,1971)。另一本有用的手册是阿尔韦托·陶罗的《秘鲁百科全书辞典》(3卷集，利马,1966)。

有关这时期的一本特别出众的单卷本历史著作是曼努埃尔·布尔加和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合著的《贵族共和国的兴衰》(利马,1979)。这本书内容全面，有解释，有分析，作者是秘鲁两名最优秀的青年历史学家。有用的著作还有埃内斯托·耶佩斯·德尔·卡斯蒂略的《1820—1920年的秘鲁：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世纪（利马，1981年第2版），《秘鲁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发展》，载《秘鲁新通史》(利马，1979）第137—160页)，《秘鲁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开端（1890—1930年)》，载胡安·梅希亚·巴卡编《秘鲁史》(利马,1980）第7卷，第305—403页；还有阿尼瓦尔·基哈诺全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1890—1930年秘鲁的帝国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利马，1978)。胡利奥·科特勒的《秘鲁的阶级、国家和民族》(利马，1977）进行了极好的社会—历史分析。值得注意的还有戴维·斯科特·帕尔默著《秘鲁：权力主义的遗产》(纽约,1980)，戴维·P·韦利希著《秘鲁简史》(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1978)，弗雷德里克·派克著《秘鲁现代史》(伦敦,1977)，亨利·F·多宾斯和保罗·道蒂合著《秘鲁：文化史》(牛津,1976)，以及华盛顿·德尔加多著《共和国文学史》(利马,1980)。

对这时期的经济史进行最全面研究的是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合著的《1890—1977年的秘鲁：开放经济的增长和政策》(伦敦,1978)。沙恩·亨特曾为提供分析经济增长模式用的基础资料发挥作用，例如他的《1900—1940年秘鲁的实际工资和经济增长》(波士顿大学"拉丁美洲发展研究中心",1977)。巴勃罗·马塞拉不仅分析了出口经济的进化，而且由他的圣马科斯大学"经济史秘鲁中心"出版成套的宝贵资料。还可读巴尔塔萨·卡拉韦多·M著《经济、生产和劳动（20世纪的秘鲁)》，载胡安

983

·梅希亚·巴卡编《秘鲁史》第8卷，第189—361页。其他一些人曾以各种观点就出口经济和外国在秘鲁的经济活动等未有定论的问题撰写文章，如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编《大不列颠与秘鲁：1826—1919年。英国领事资料》(5卷集，利马，1975—1977)，和《1850—1930年美国控制秘鲁经济的产生》，载约瑟夫·S·图尔钦编《南半球对美国的看法》(韦斯特波特，1978)第325—351页；罗里·米勒著《格雷斯协议的产生：1885—1890年英国债券持有者与秘鲁政府》，载JLAS8/1(1976)第73—100页《1890—1930年中秘鲁的铁路和经济发展》，载J·菲希尔编《现代秘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利物浦，1976)，和《1885—1930年英国公司与秘鲁政府》，载D·C·M·普拉特编《1840—1930年企业帝国主义：根据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历进行的一次调查》(牛津，977)；以及威廉·博林杰著《1869—1921年美国在秘鲁经济中的影响的扩大》(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1972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P·E·丹考尔特和J·M·罗德里格斯合编《秘鲁国家财政年鉴》(22卷集，利马，1902—1908)是这时期财政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对这时期的秘鲁采矿业进行研究的有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著《1900—1930年塞罗—德帕斯科的矿工》(利马，1974)；胡利安·莱特著《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与移民劳工》(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1)；以及艾德里安·德温德著《从农民到矿工：秘鲁矿工罢工背景》，载《科学与社会》39/1(1975年)第44—72页。关于萧条的开始，见罗斯玛丽·索普和卡洛斯·隆多尼奥合著《大萧条对秘鲁和哥伦比亚经济的影响》，载罗斯玛丽·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外围地区在世界危机中的作用》(伦敦，1984)第81—116页。

一批法国学者（其中有的属“年鉴派”）曾很大地推动对安第斯农村社会的研究，如：弗朗索瓦·舍瓦利耶著《20世纪上秘鲁大地产的扩大》，载AESC21(1966)第815—831页；C·科兰—德拉旺著《秘鲁北方沿海地区》(利马，1968)；让·皮埃尔著《19世纪农民在秘鲁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载《过去与现在》46(1970)第

108—133页；以及亨利·法弗尔著《印第安农民社会的动态和向中秘鲁沿海种植园的迁移》，载肯尼思·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动：关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文章》（剑桥，1977）第253—268页。关于制糖，见彼得·F·克拉伦著《1870—1930年秘鲁制糖业现代化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载邓肯和拉特利奇合编《土地和劳动》第229—252页；比尔·艾伯特著《关于1880—1920年秘鲁制糖业的一篇文章》（诺威奇，1976）；以及迈克尔·J·冈萨雷斯著《1875—1933年秘鲁北方种植园农业和社会控制》（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4）。关于羊毛贸易，见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著《18—20世纪的阿雷基帕和安第斯山南部》（利马，1977）；以及曼努埃尔·布尔加和威尔逊·雷亚特吉·查韦斯合著《羊毛与南方商业资本：1895—1935年的里基茨商行》（利马，1981）。关于农民运动，见曼努埃尔·布尔加和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合著《农村封建主义与社会运动（1866—1965年）》载胡安·梅希亚·巴卡编《秘鲁史》，第11卷，第11—112页；弗洛伦西亚·E·马伦著《秘鲁中部高原的保卫乡土活动：1860—1940年的农民斗争和资本主义过渡》（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3）；罗德里戈·蒙托亚著《20世纪秘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巴黎大学，1977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维尔弗雷多·卡普索利著《1880—1963年塞罗-德帕斯科的农民运动》（万卡约，1975）；以及最后，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著《庄园、种植园和集体农庄：农村阶级社会——古巴与秘鲁》（伦敦，1977）。在拉莫利纳和土地改革档案馆的农村社会问题讨论会上正在进行新的研究。巴勃罗·马塞拉虽然主要不是在这个时期工作，但应该看到，一般说来他以他关于农村社会的杰出研究，具体说来以他在圣马科斯大学关于安第斯农村史的研究题目鼓舞了无数年青学者。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社会后果，见亨利·法夫尔著《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秘鲁阶级斗争的意见》，载《秘鲁从19世纪到今天的文学和社会》（格勒诺布尔，1975）第54—81页；埃拉克利奥·博尼

利亚著《太平洋战争与秘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载《过去与现在》81（1978）第92—118页；纳尔逊·曼里克著《农民与国家：与智利作战期间的当地游击队》（利马，1981）；以及马伦最近出版的《保卫乡土》。还可读威尔逊·雷亚特吉·查韦斯等编印的文集：《太平洋战争》（利马，1979）。关于20世纪上半叶秘鲁社会中的印第安人，可读小托马斯·M·戴维斯著《秘鲁取消对印第安人的歧视：1900—1948年半个世纪的经验》（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4）。哈维·C·加德纳调查了日本移民的状况：《1873—1973年日本人与秘鲁》（阿尔伯克基，1975）。

895

丹尼斯·吉尔伯特研究了寡头国家问题：《秘鲁的寡头统治和旧政权》（康奈尔大学《拉丁美洲研究计划论文专辑》1977）；弗朗索瓦·布里科等著《秘鲁的寡头统治》（利马，1969）；以及西内西奥·洛佩斯·J著《秘鲁的寡头国家：一篇解释文章》，载《墨西哥社会学杂志》40/3（1978）第991—1007页。还可读罗伊·米勒著《1895—1919年沿海上层分子与秘鲁政治》，载JLAS14/1（1982）第97—120页。关于军队，见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著《秘鲁军队：从无政府主义的考迪略主义到改良主义的军国主义》（利马，1973）。

有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关于比林赫斯特的研究。彼得·布兰查德著《平民主义先驱：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载JLAS9/2（1977）第251—273页。两篇未发表的论文研究了奥古斯托·莱吉亚政府：霍华德·卡诺著《奥古斯托·B·莱吉亚，1870—1930年秘鲁的寡头统治与现代化（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1970），和卡尔·F·赫博尔德著《1919—1932年秘鲁政府体制的发展：专制统治下政府的现代和传统性质》（耶鲁大学，1973）。关于阿普拉党的起源，见彼得·F·克拉伦著《现代化、混乱与阿普拉主义：秘鲁阿普拉党（1870—1930年）的起源》（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3）。研究劳工运动历史的，有丹尼斯·苏尔蒙特著《1900—1956年秘鲁工人运动》（利马，1975）；彼达·帕雷哈著《秘鲁的无政府主义

和工团主义》(利马,1978);以及彼得·布兰查德著《1883—1919年秘鲁劳工运动的起源》(匹兹堡,1982)。另见史蒂夫·斯坦著《秘鲁的平民主义：群众的蜂起与控制社会政策》(麦迪逊,1980)。

耶稣会会士杰弗里·L·克莱伯的《1924—1976年秘鲁的宗教与革命》(印第安纳州圣母城，1977)载有关于宗教的材料。弗雷德里克·B·派克的《美国与诸安第斯共和国：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马萨诸塞州剑桥,1977)讨论了这时期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古斯托·萨拉萨尔·邦迪的《现代秘鲁思想史》(两卷集，利马,1965)是有关思想史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可读赫苏斯·查瓦里亚著《知识分子与现代秘鲁民族主义的危机：1870—1919年》,载HAHR50/2(1970年)第257—278页。有好几本著作讨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如赫苏斯·查瓦里亚著《1894—1930年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与现代秘鲁的兴起》(阿尔伯克基,1979)；迭戈·梅塞格尔·伊利安著《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和他的革命思想》(利马,1974)；哈里·E·范登著《马里亚特吉：形成他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利马,1975);罗伯特·帕里斯著《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体系的形成》(都灵,1970)；以及吉列尔莫·鲁永著《关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经历的参考书目》(利马,1966)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勇敢的创造：1894—1919年石器时代》(利马,1975)。最后，除参考马里亚特吉本人的著作外，如果不参考亚历杭德罗·德乌斯图亚、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哈维尔·普里亚多、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曼努埃尔·维森特·比利亚兰和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尔等人的著作，则对这时期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全的。

896

党执政十年》(波哥大,1945);H·德尔帕著《红对蓝,1863—1899年哥伦比亚政治中的自由党》(亚拉巴马州,大学城,1981);L·马丁内斯·德尔加多著《1885—1910年的哥伦比亚共和国》(两卷集,波哥大,1970),此书系尚在继续出版中的《哥伦比亚通史》的第10卷;E·莱迈特雷著《拉斐尔·雷耶斯》(波哥大,1967);C·伯奎斯特著《1886—191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与冲突》(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78)。迄今尚无有关1910—1930年的有系统的记叙,但有关这段时期的大事记,可读J·比列加斯和J·尤尼斯的《1900—1924年哥伦比亚重大事件》(麦德林,1976)。关于劳工运动,见M·乌鲁蒂亚著《哥伦比亚劳工运动的发展》(纽黑文,1969);I·托雷斯·希拉尔多著《那些不协调的人》(5卷集,波哥大,1973)和《玛丽亚·卡诺——叛逆的女性》(波哥大,1972);关于20年代,见P·J·纳瓦罗著《穿睡衣裤的议会》(波哥大,1935);关于教会,见J·雷斯特雷波·波萨达著《在祖国历史上两次困难时期的哥伦比亚教会》(波哥大,1971)。关于这时期另一篇可选择的文章是J·O·梅洛的《保守派的共和国》,载M·阿鲁布拉编《今日哥伦比亚》(波哥大,1978)。

关于哥伦比亚经济,见L·奥斯皮纳·巴斯克斯著《1810—1930年哥伦比亚的工业和保护》(麦德林,1955,多次再版);W·P·麦格里维著《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和哥伦比亚研究所编《哥伦比亚经济史:进行中的辩论》(波哥大,1979)对上书的批评;J·A·奥坎波著《1830—1910年哥伦比亚与世界经济》(波哥大,1984);M·帕拉西奥斯著《1850—197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一部经济、社会、政治史》(剑桥,1980);以及M·阿朗戈著《1850—1930年咖啡与工业》(波哥大,1977)。在K·邓肯和I·拉特利奇合编的《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动》(剑桥,1977)中有两篇关于哥伦比亚农业历史的文章。它们是马尔科姆·迪斯著《哥伦比亚的一片咖啡种植园:1870—1912年昆迪纳马卡省的圣巴巴拉》和迈克尔·陶西格著《1700—1970年哥伦比亚

考卡河流域的农村工资劳动的演化》。关于制糖和考卡河，见P·埃德著《创办人——圣地亚哥·M·埃德》(波哥大,1959)。M·乌鲁蒂亚曾编《哥伦比亚经济史文集》(波哥大,1980),并与M·阿鲁布拉合编《哥伦比亚历史统计简编》(波哥大,1970)。关于20年代，有P·L·贝尔著《哥伦比亚：商业和工业手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21)；D·蒙萨尔韦著《咖啡之国哥伦比亚》(巴塞罗那,1927)；A·帕蒂尼奥·罗萨利著《1925—1935年借方的繁荣与大危机》(波哥大,1981)；J·A·贝哈拉诺著《农业体系——从出口经济到工业经济》(波哥大,1979)；H·洛佩斯著《20年代哥伦比亚的通货膨胀》,载《哥伦比亚杂志》5《波哥大,1975)；J·比列加斯著《石油、寡头统治与帝国》(波哥大,1975 898 年第3次修订版)；关于香蕉，见R·埃雷拉·索托和R·罗梅罗·卡斯塔涅达著《马格达莱纳河香蕉园地带》(波哥大,1979)和J·怀特著《不光彩的历史：哥伦比亚的联合果品公司》(波哥大,1978)；关于安蒂奥基亚省，见R·布鲁著《安蒂奥基亚从独立到1920年的经济发展》(波哥大,1977)。这时期其他方面的有用简编有A·帕尔多·帕尔多著《哥伦比亚经济与人文地理》(波哥大,1972)。

内战引起许多回忆和论战。其中最优秀和较易读到的有M·布里塞尼奥著《1876—1877年革命》(波哥大,1947)；J·H·帕拉西奥著《1885年战争》(波哥大,1936)；M·格里略著《战争的激情》(波哥大，出版日期不详,约1905年)；L·卡瓦列罗著《日日夜夜战争的回忆》(波哥大,1939)。他们在分析中试图塑造一个典型人物，见马尔科姆·德亚斯著《贫困、内战和政治：里卡多·盖坦·奥韦索和1885年他的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河战役》,载《美洲新闻》2(都灵,1978)。

关于巴拿马问题，见E·莱迈特雷著《巴拿马及其脱离哥伦比亚》(波哥大,1972)；关于后来与美国的关系，见S·J·兰德尔著《现代化外交：1920—1940年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关系》(多伦

多,1977)。

D·卡斯特利翁·阿沃莱达的《印第安人金廷·拉梅》(波哥大,1973)是一部研究哥伦比亚国民的优秀著作。M·卡里索萨·德·乌马尼亚和R·J·埃雷拉·德拉托雷:《75年的照片——1865—1940年》(波哥大,1978)对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作了罕见的纪录。

厄瓜多尔

R·E·诺里斯的《研究厄瓜多尔历史参考书目手册》(奥斯汀,1978)为研究厄瓜多尔提供了入门书,而研究哥伦比亚就没有这样的著作。以下几本著作对这时期初的厄瓜多尔作了描绘:F·哈索雷克著《在西班牙语美洲人中间生活4年》(伦敦,1868);J·科尔伯格著《到厄瓜多尔去》(弗赖堡,1876);以及C·威纳著《美丽如画的美洲。新大陆游记》(巴塞罗那,1884)。后来又出版三本宝贵著作。它们是E·费斯塔著《在达连和厄瓜多尔,一名自然主义者的旅行日记》(都灵,1909);R·伊诺克著《厄瓜多尔》(伦敦,1914);以及M·萨恩斯著《关于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及其融人国家生活之中》(墨西哥,1933)。

关于较早的历史,可参考O·E·雷耶斯著《厄瓜多尔简明通史》(3卷印成2册,基多,1967);J·L·R·[J·拉·古耶-罗达斯·S·J]著《厄瓜多尔共和国史》(3卷集,基多,1920—1938);J·L·梅拉著《厄瓜多尔共和国的独裁与复辟》(基多,1932)。 899

更晚一些出版的著作有L·罗瓦利诺·达维拉著《今日厄瓜多尔的起源》(已出10卷,普埃布拉和基多,1948—),此书水平参差不齐,内容保守,第4卷《加西亚·莫雷诺》比不完整地介绍埃洛伊·阿尔法罗的第7、第8两卷好得多;A·帕雷哈·迭斯坎塞科著《共和国史》(两卷集;基多,1974)。介绍19世纪历史最好的著作是E·阿亚拉的《厄瓜多尔的政治斗争与政党的起源》(基多,1978)。同时可读H·马洛和E·阿亚拉合编《1830—1980年的厄

瓜多尔》，第1卷《政治与社会》(基多，1980)；G·德雷孔哈 等著《今日厄瓜多尔》(波哥大，1978)；O·乌尔塔多著《厄瓜多尔的政治权力》(基多，1977)；R·金特罗著《厄瓜多尔平民主义的神话》(基多，1980)。

关于埃洛伊·阿尔法罗，可读R·安德拉德著《埃洛伊·阿尔法罗的生与死》(纽约，1916)；A·帕雷哈·迭斯坎塞科著《野蛮人的篝火》(墨西哥，1944)；F·瓜德拉斯著《蒙特克里斯蒂来的老头儿》(基多，1953)；以及W·洛尔著《埃洛伊·阿尔法罗》(3卷集，基多，1947)。阿尔法罗的一部分著作已编人《选集》重新出版（两卷集，基多，1959)，另外还有由马尔科姆·德亚斯作序的《历史轶事》(两卷集，基多，1983)。L·A·马丁内斯的《到海边去》(基多，1904）是一部生动活泼的当代小说；M·J·卡列以恩里克·德·拉斯蒂格纳克为笔名，在《起义者》(瓜亚基尔，1906）一书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些人物素描。J·德·拉·夸德拉的《厄瓜多尔沿海农民》(基多，1937）是一篇描写沿海地区特点的经典文章。

F·冈萨雷斯·苏亚雷斯主教的《内心深处的记忆》（基多，1944）和L·道岑贝格的《El Ilmo佩德罗·舒马赫先生》（基多，1968）是两本宗教政治人门书；同时可读E·阿亚拉编《费德里科·冈萨雷斯·苏亚雷斯与关于世俗国家问题的论战》《基多，1980）。O·E·雷耶斯的《胡安·蒙塔尔沃生平》（基多，1935)和C·德拉托雷·雷耶斯的》没有污痕的剑。胡利奥·安德拉德将军传》（基多，1962），都是有用的传记。没有莱昂尼达斯·普拉萨将军的传记。

《厄瓜多尔。共和国商业、农业与工业指南》(瓜亚基尔，1909)迄今仍是探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厄瓜多尔经济的最佳著作。关于可可等，见M·奇里沃加著《出口可可135年中的按日计酬工和大地产所有者（1790—1925年）》（基多，1980）和L·J·温曼著《厄瓜多尔和可可：国内对单项出口的繁荣—崩溃周期的反应》

(加利福尼亚大学197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关于山区，见R·巴劳纳的泛美农业发展委员会报告：《土地占有与农业部门的社会一经济发展。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65）和M·A·雷斯特雷波著《劈材大王》(布宜诺斯艾利斯，1958)。还可读L·A·卡尔沃著《殖民地时代的厄瓜多尔货币与兑换史》(基多，1953)；L·N·迪利翁著《厄瓜多尔的经济一财政危机》(基多，1927)。 900

J·P·德勒的《厄瓜多尔的起源。关于领土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巴黎，1981）是一本有用的现代史地理书。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象它的外国同行哥伦比亚共和国银行和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一样，尽了很大努力去唤起人们对研究历史的兴趣，它曾出版一册由A·卡里翁·A编辑的历史摄影集《厄瓜多尔政治生活影象》(基多，1980)。

委内瑞拉

J·V·隆巴尔迪、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和罗贝塔·亚当斯合著的《委内瑞拉史：一部完整、实用的参考书目》(波士顿，1977）是研究委内瑞拉所不可缺少的基本书目。J·V·隆巴尔迪又是一本出色的共和国简史的作者：《委内瑞拉——寻求秩序，梦想进步》(纽约，1982)。朱迪思·尤厄尔的《委内瑞拉，一个世纪的变迁》(伦敦，1984）是另一本有用的简史。

M·皮康·萨拉斯等人撰写的《独立的委内瑞拉：1810—1960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加拉加斯，1962）讨论了这时期委内瑞拉的政治史，而这时期最后几年的情况则在拉蒙·J·贝拉斯克斯等人的《现代委内瑞拉。1926—1976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加拉加斯1979年修订第2版）一书中得到介绍。F·冈萨雷斯·吉南的《当代委内瑞拉史》(15卷集，加拉加斯，1909—1925）到1890年为止的有关各卷今天依然有其价值。三部特别宝贵的文件集是佩德罗·格拉塞斯和M·佩雷斯·比拉合编《创造历史的文件》

（加拉加斯，1962）；N·苏亚雷斯·菲格罗亚编《20世纪上半叶委内瑞拉政治纲领》（两卷集，加拉加斯，1977）；R·J·贝拉斯克斯编《20世纪政治思想。供研究用的文件》（17卷合成16册，加拉加斯，1983）。还可读M·V·马加利亚内斯著《委内瑞拉发展中的政党》（加拉加斯，1973）。

关于古斯曼·布兰科，见拉蒙·迪亚斯·桑切斯著《古斯曼：权力欲的消失》（加拉加斯，1950；两卷集，1968年第5版）；R·A·龙东·马克斯著《古斯曼·布兰科："开明的独裁者"》（两卷集，加拉加斯，1944）；R·R·卡斯特利亚诺斯著《古斯曼·布兰科秘史》（加拉加斯，1969）；J·纳瓦著《杰出的美洲人：在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统治下委内瑞拉民族主义的发展》载HAHR45/4（1965）；M·B·弗洛伊德著《古斯曼·布兰科执政时期的政治和经济。1870—1888年的集中与发展》，载M·伊萨尔德等著《1810—1976年委内瑞拉的政治与经济》（加拉加斯，1976），此书登载有关这时期的若干有用文章。A·莱莫的《1870年的委内瑞拉教育》（加拉加斯，1976）是一本有意思的专题论著。关于与教会的关系，见M·沃特斯著《1810—1930年委内瑞拉教会史》（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0）。在同代人的著作中，读者也许可参考古斯曼本人的《历史文件集》（加拉加斯，1876）和《保卫自由事业》（加拉加斯，1894）；M·布里塞尼奥著《杰出人物。委内瑞拉若干历史篇章》（波哥大，1884；加拉加斯1953年第2版）是一本有力的论战著作，作者对古斯曼体制的分析迄今尚未被完全替代。另一本代表哥伦比亚人的对立观点的著作是I·拉韦德·阿马亚著《去委内瑞拉的一次旅行》（波哥大，1889）。总的说来，这些年有关委内瑞拉的游记比较贫乏。此类著作的书目已列入M·L·甘岑米勒·德·布莱的《关于到委内瑞拉旅行和探险的著作书目》（加拉加斯，1964）。

901

近期没有发表关于古斯曼最知名的直接继任者华金·克雷斯波的传记，但可参考M·兰达伊塔·罗萨莱斯的《功勋卓著的华

金·克雷斯波将军传》(加拉加斯,1895)。对19世纪90年代进行了很好研究的有R·J·贝拉斯克斯著《黄色自由主义的死亡:安东尼奥·帕雷德斯的时代和悲剧》(加拉加斯,1973年第2版);J·A·德·阿马斯·奇蒂编著《“秃子”埃尔南德斯。关于他的档案记录》(加拉加斯,1978)。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和军事气氛,至少是安第斯山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气氛,在N·帕拉达的回忆录《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革命的前夕和心态(加拉加斯1973年第2版)一书中描绘得十分逼真。关于中部地区,则有A·马丁内斯·桑切斯的简单但是宝贵的实录:《我们国内的争吵》(加拉加斯,1949)。V·莱库纳的《凯帕革命》(加拉加斯,1954)是研究玻利瓦尔的名家的一本难得的自传,它感染力强,材料丰富。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吸引了较多注意力。可读W·J·沙利文著《委内瑞拉专制统治的兴起。1899—1908年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新墨西哥大学1974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恩里克·贝尔纳多·努涅斯著《穿灰色长礼服的人》(加拉加斯,1953);M·皮康·萨拉斯著《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的那些日子》(加拉加斯,1953);I·安德拉德著《复辟革命为什么会胜利》(加拉加斯,1955);A·帕雷德斯著《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是怎样上台的》(1906年版;加拉加斯1954年第2版)。卡斯特罗本人出版了《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将军文件集》(6卷集,加拉加斯,1903—1908);E·皮诺·伊图里埃塔编纂了《卡斯特罗,总统书信集(1899—1908年)》(加拉加斯,1974)。另一份详细证词是E·洛佩斯·孔德雷拉斯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两卷集,加拉加斯,出版日期不详),由M·A·布雷利·里瓦斯作序。关于封锁,见M·罗德里格斯·坎波斯著《1902年的委内瑞拉,财政危机与封锁》(加拉加斯,1977);D·欧文编《有关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的英国文件集》(加拉加斯,1982);M·胡德著《1895—1905年的炮舰外交。大国对委内瑞拉的压力》(伦敦,1975);H·H·赫尔维希和J·L·埃尔格拉合著《1902—1903年的德国与国际封

902

谢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77)。C·苏梅塔的《列强与对西班牙语美洲的干预》(加拉加斯,1963)是当代委内瑞拉人的深刻评论。W·J·沙利文编的《世界漫画中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加拉加斯,1980)不仅仅是使人觉得好玩,它的内容比几篇一般性的专题论著加在一起还更丰富。皮奥·希尔(即佩德罗·马里亚·莫兰特斯)以下几个讨论卡斯特罗时代的著作也是如此:《El Cabito》(加拉加斯,1951);《我的四年任期》(加拉加斯,1975);以及《祝愿者》(加拉加斯,1952),在这本书里他收集了一些奉承话。

关于戈麦斯时代的参考书目数量很大,水平参差不齐。他的内政部长佩德罗·曼努埃尔·阿卡亚有两本著作为他辩护:《委内瑞拉的戈麦斯政权及其背景》(巴尔的摩,1936)和《佩德罗·曼努埃尔·阿卡亚博士的回忆》(加拉加斯,1963);后者有不少内容对了解19世纪后期情况也有启发性。还可读埃利埃泽·洛佩斯·孔德雷拉斯著《1928—1936年的社会政治进程》(加拉加斯,1955)。指责戈麦斯的有何塞·拉斐尔·波卡特拉著《对一位没落的委内瑞拉人的回忆》(加拉加斯,1937;多次再版);古斯塔沃·马查多和萨尔瓦多·德·拉·普拉萨合著《委内瑞拉的真实情况》(墨西哥,1929);迭戈·科尔多瓦著《流放者与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加拉加斯,1968)。《米拉弗洛雷斯历史档案期刊》(加拉加斯,1959—)发表的文件对这个时代有极好的研究,文件中有大量近期历史资料,这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学家所无法得到的。讨论戈麦斯或他的整个政府的近期著作没有一本已确立自己观点的权威性。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的《执政的安第斯山人。对1899—1945年统治的总结》(加拉加斯,1965)对卡斯特罗和戈麦斯观察深刻,颇具影响。兰赫尔的《戈麦斯,权力的主人》(加拉加斯,1975)没有新的内容。R·J·贝拉斯克斯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想象中的机密》(加拉加斯,1979)以虚构的独白形式提出了许多深邃的看法。还可读L·科德罗·贝

拉斯克斯著《戈麦斯和他的生命力》(加拉加斯,1971)；E·帕切科著《从卡斯特罗到洛佩斯·孔德雷拉斯》(加拉加斯,1984)。托马斯·鲁尔克（即丹尼尔·J·克林顿）的《安第斯山的暴君，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一生》(纽约,1937）和J·拉文的《戈麦斯头上的光环》(纽约,1954）至今仍值得参阅。903 M·布里塞尼奥—伊拉戈里的《堤防》(加拉加斯,1957）是一部描写这时代的小说，但想象力贫乏，还不如有些在这位独裁者惊人强大和持久的魅力下撰写的历史书——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在他的《历史的三个主题》(加拉加斯,1978年第2版)和《批评史的历程》(加拉加斯,1983）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关于军队，安赫尔·齐梅斯的《戈麦斯主义与国民军的成立》(加拉加斯,1979）具有独创性，并很好地运用了文件。关于思想意识，见E·皮尼奥·伊图列塔著《实证主义与戈麦斯主义》(加拉加斯,1978)。那时代最明确的思想家L·巴列尼利亚·兰斯的著作目前正在重新出版。他的《全集》第1卷（加拉加斯,1983）是F·布里托·菲格罗亚和N·哈威奇·巴列尼利亚合编的《民主的专制主义》一书的重新出版，值得欢迎。

对这时期的经济史只有一些零星研究。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委内瑞拉咖啡史，但A·阿道的《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的咖啡和城镇》(加拉加斯,1984）是一本有用的著作。关于塔奇拉地区，可读A·G·穆尼奥斯著《1881—1899年的塔奇拉边界：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的地区性闭塞和民族融合》(斯坦福大学1977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总的说来，这时期的农业引起注意不够。历史学家似乎满足于重复S·德·拉·普拉萨在《土地问题》(墨西哥，1938）中的说法。L·C·罗德里格斯的《戈麦斯，农业，石油与依赖》(加拉加斯,1983）研究的主要是反映在官方文件中的政府政策。关于石油的著作很多。阅读E·柳温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它的历史》(伯克利,1954）后，应接着读B·S·麦克贝思的《1908—1935年胡安·比森特·戈麦斯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

（剑桥，1983），此书详细分析了这位独裁者进行的交易。上述两位作者虽都触及了石油对其他经济的影响，但这个题目尚有待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研究这些年总的经济发展，可阅读M·伊萨尔德等人合著《1810—1976年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加拉加斯，1976）；M·伊萨尔德著《有关委内瑞拉历史的统计资料》（梅里达，1970）；R·贝洛斯著《从1830年到1944年委内瑞拉的经济和财政》（加拉加斯，1945）。M·兰达伊塔·罗萨莱斯的《委内瑞拉地理、统计与历史节选》（两卷集，加拉加斯，1889；加拉加斯1964年第2版）载有当时和当时以前有关委内瑞拉的各种各样资料。关于公共工程，见E·阿西拉·法里亚斯著《公共工程部成立904一百周年。该部对国家发展的影响（1874—1974年）》（加拉加斯，1974）。O·格斯特尔的谨慎的、资料丰富的《记忆与历史》（加拉加斯，1974）谈到了德国商业公司和博尔顿企业界的情况。G·卡尔的《平等者中间的优先者：1810—1910年的英国和委内瑞拉》（锡拉丘兹，1980）探讨了与英国的关系。

19. 巴西经济（1870—1930）

这个时期的史料编纂工作可以通过尼西亚·维莱拉·卢斯著《巴西》加以探讨。该文载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斯坦合编《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1977），它包括数百个加注释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条目以及一篇有价值的说明性文章。最近出版的重要的学术性文集有巴西定量史国际讨论会的《1800—1930年巴西定量史》（巴黎1971）；弗拉维奥·拉贝洛·维西亚尼和J·R·M·德·巴罗斯合编《巴西经济的形成：工业化的经验》（圣保罗，1978）；保罗·诺伊豪斯编《巴西经济的历史视野》（里约热内卢，1980）；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莱斯和米尔塞阿·布埃斯库合编《现代经济史》（里约热内卢，1976）；沃纳·贝尔等编《巴西的发展规模》，（里约热内卢，1978）。在从历史角度对巴西经济进行综合研究的，下述著

述值得一提：沃纳·贝尔《巴西经济的成长和发展》，（俄亥俄州，哥伦布，1979）；米尔塞阿·布埃斯库《对巴西经济史的调查与分析》，（里约热内卢，1970）；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莱斯《巴西经济史》（圣保罗，1979）。

对巴西经济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三个中心人物。对他们的著述颇有争议，他们在政策辩论中代表着重要的趋势。罗伯托·西蒙森是一位工业家和政治人物，他的许多论文旨在表明巴西工业化的可行性。其中有些论文已收录在《巴西工业演变和其他试验》（圣保罗，1973）。小卡约·普拉多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主要撰写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但他的《巴西经济史》（圣保罗，1949）和《历史与发展》（圣保罗，1972）值得一提。塞尔索·富尔塔多在他的《巴西经济》（里约热内卢，1954）及其有影响的《巴西的经济构成》（里约热内卢，1959）（英译本《巴西的经济增长》，（伯克利，1963）两书中，特别试图为一种结构主义立场进行辩护。其它具有重要意义的两部早期研究，是J·F·诺曼诺《巴西，对经济类型的研究》（纽约，1935；1968）和罗伊·纳什《对巴西的征服》（纽约，1926；1968）。

直到最近，有关巴西经济史料的编纂工作一直是按惯例行事 905
的，事实上更侧重于社会而不是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有许多部分论述经济进程的专题著述也值得一提。有关种植园体系的，见斯坦利·J·斯坦《瓦索拉斯：巴西的一个咖啡县》（马萨诸塞州，剑桥1957）；彼得·艾森伯格《伯南布哥的蔗糖工业（1840—1910）》（伯克利，1974）；海梅·赖斯《从蔗糖初步加工到蔗糖厂》，载K·邓肯和I·拉特利奇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与劳工》（剑桥，1977）；J·H·盖洛韦《19世纪伯南布哥蔗糖工业》，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1968）；托马斯·霍洛韦《大陆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和社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0）；沃伦·迪安《奥克拉鲁：巴西种植园制度》（斯坦福特，1976）；以及圣保罗历史学第二届大会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咖啡》（圣保罗，

1975)。里查德·格雷尼姆在他的《英国与巴西现代化的开始》(剑桥，1968)一书对于英国对巴西发展的影响进行评价。两部优秀的地区性研究著述是：皮埃尔·蒙贝格《圣保罗的拓荒者和种植者》(巴黎，1952)和让·罗什《南里奥格兰德的德国移民居留地》(共2卷，阿雷克里港，1969)。约瑟夫·洛夫有关南里奥格兰德和圣保罗，约翰·沃思有关米纳斯吉拉斯以及罗伯特·莱文有关伯南布哥(见本卷书目评论21节)进行的地区性研究虽然主要论述政治，但仍包含有关地区经济的有用资料。近期有关亚马孙地区的重要研究著述有：罗伯托·桑托斯《1800—1920年亚马孙地区经济史》(圣保罗，1980)和巴巴拉·温斯坦《1850—1920年亚马孙橡胶热》(斯坦福，1983)。

对这个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埃德加德·卡罗内《老共和国》(圣保罗，1970)是一般的体制性探讨。史蒂文·托皮克的《1889—1930年巴西国家的经济作用之演变》(《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1/2，1979)和《自由派政权的国家干预，1889—1930年》(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60/4，1980)两文论证了政府的干预活动。阿尼巴尔·维拉诺瓦·维莱拉和威尔逊·苏济甘《1889—1945年巴西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里约热内卢，1973年)(英译本《1889—1945年巴西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里约热内卢，1977)，是一部侧重于研究由于采用稳定咖啡价格措施而产生畸形发展的著述。尼西亚·维莱拉·卢斯《为巴西工业化而奋斗》(圣保罗，1961)分析了赞成发展的辩论。另见下述两位主要人物收集的著作：莱奥波尔多·布良斯《国会演讲集》(巴西利亚，1979)和塞尔泽德洛·科雷亚《巴西经济问题》(巴西利亚，1980)。加布里尔·比滕科尔特《咖啡共和国的工业实力：1889—1930年圣埃斯皮里图的实例》(维多利亚，1982)和雅尼斯·特奥多罗·达·席尔瓦《1889—1903年东北部制定计划的思想根源》(圣保罗，1978)是两部有用的地区研究著述。托马斯·霍洛韦《1906年巴西咖啡价格稳定措施》(麦迪逊，1975)和卡洛斯·曼努

906

埃尔·佩莱斯的文章《论咖啡与经济发展》（里约热内卢，1973）论述咖啡补贴计划。有关卡特尔的情况，见琼·巴克《卡特尔、合作社和组合主义：巴西1930年革命前夕热图利奥·瓦加斯在南里奥格兰德》（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63/2，1983）。欧拉利亚、拉迈耶·洛博在《1808—1889年巴西农业的政治行政史》（里约热内卢，1980）探讨政府对农业和铁路的政策。在马里亚·特雷萨·R·O·维西亚尼《1906—1912年关税保护主义和工业增长：啤酒的实例》（载《经济调查与计划》，12/2，1982，里约热内卢）一文中可以找到对关税的影响的分析。欧拉利亚·拉梅耶·洛博《里约热内卢史：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2卷集，里约热内卢，1978），是一部有关城市化的经济方面的重要研究，并附有重要的价格和工资数据。安东尼奥·巴罗斯·德·卡斯特罗《有关巴西经济的七篇论文》（2卷集，里约热内卢，1971），戴维·登斯洛《巴西地区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载《经济研究》，1973）以及纳撒尼尔·莱夫《巴西的不发达与发展》（2卷集，伦敦，1982），对地区差异作了论述。

O·迪亚斯·卡内罗《昔日巴西经济演变的趋势（1920—1965）》（马萨诸塞州，剑桥，1966油印本），首先进行了宏观经济的研究。在下述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国民生产的重要估计数字：C·孔塔多尔和C·阿达德《1861—1970年巴西经验：实际生产、货币和价格》，载《巴西统计杂志》（1973），克劳迪奥·阿达德《1900—1947年巴西实际生产的增长》，（载《巴西研究杂志》29，1975）以及最近莱夫《不发达与发展》收编了他有关这一课题的一些论文资料，如《巴西经济的长远发展》（载《经济史杂志》，29/3，1969）；《19世纪巴西经济的停滞不前》，载《经济史评论》，第2部分，25，1972；《巴西经验：19世纪的热带贸易和发展》，（载《政治经济杂志》81，1973）。关于贸易比价，见R·贡萨尔维斯和A·科埃略：《贸易比价的趋势：普雷维什的论题和巴西经济（1850—1979）》（载《经济调查与计划》，

12/2，1982）。有关通货膨胀的情况，见奥斯卡·奥诺迪《1820 1958年巴西的通货膨胀》（里约热内卢，1960），是一部最早的研究；米尔塞阿·布埃斯库《300年的通货膨胀》（里约热内卢，1973）；保罗·诺伊豪斯《从历史角度看巴西的通货膨胀》（载《巴西经济杂志》,32，1978）。保罗·诺伊豪斯《巴西货币史》（圣保罗,1975，)以及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莱斯和威尔逊·苏济甘《巴西货币史》（里约热内卢，1976)在论述货币政策方面已取代了J·潘迪亚·卡洛耶拉斯《巴西的货币政策》(圣保罗，1960)。威尔逊·苏济甘《巴西货币史》是以货币主义理论来立论的。

907

莱夫《不发达与发展》，H·O·普罗托·卡雷罗《1880—1888年巴西奴隶制经济的可行性》（载《巴西经济杂志》，27/1，1973），海梅·赖斯》巴西东北部奴隶制的废除和奴隶制经济》（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简报》，17，1974），对奴隶制在其最后阶段是否有益进行了研究。另见罗伯特·斯伦斯《巴西奴隶制的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1850—1888年》(1975年斯坦福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佩德罗·卡瓦略·德·梅洛《对巴西奴隶长寿的估计》（载《经济研究》，1983），基特·泰勒《巴西东北部的糖业和奴隶制经济》，（载《农业史》，44/3，1970）。A·小马丁斯和R·B·马丁斯》19世纪重访米纳斯吉拉斯：非出口经济中的奴隶制》，（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63/3，1983），是最近一部有意义的贡献。

对劳工供应进行过大量分析的另一方面，是国外来的移民和内部移民。主要的研究著述有T·W·梅里克和D·格雷厄姆《1808年至今巴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79）。另见全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届讨论会编《殖民和移民年鉴》(圣保罗，1969）和基亚拉·范赫利斯塔《阿根廷和巴西的移民、生产结构和劳工市场》，载《路基·埃瑙迪基金会年刊》，1975。托马斯·霍洛韦除了他的《大陆的移民》外，还撰写了有关这一课题的论

文，收录在D·奥尔登和W·迪安合编《关于巴西和葡语印第安的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盖恩斯维尔，1979）和邓肯和拉特利奇合编《土地与劳工》。另见托马斯·霍洛韦《1885—1915年圣保罗咖啡种植园经济的劳工组织和劳工市场现状》，载《经济研究》，1972。迈克尔·霍尔《1871—1914年巴西大规模移民的原籍》（哥伦比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69）也很重要。

有关这个时期的外国投资，见莱夫《不发达与发展》，格雷厄姆《英国与巴西现代化的开始》；安娜·塞莉亚·卡斯特罗《1860—1913年巴西外国企业》（里约热内卢，1979）；维克托·瓦拉《美国对巴西经济的渗透》（里约热内卢，1978）；戴维·乔斯林《拉美一个世纪的银行业》（伦敦，1963）。另见B·R·马加良斯《英国在巴西的投资和伦敦与巴西银行》（载《巴西政治研究杂志》，49，1979）和R·芬特《1870—1913年英国对巴西的投资，对巴西政策的评价》，（载《巴西经济杂志》，31，1977）。R·格林希尔《巴西咖啡贸易》（载D·普拉特编《1840—1930年的企业帝国主义》（牛津，1978）对新帝国主义论点进行辩驳。埃米莉·罗森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在巴西的经济竞争》（载《外交史》，2，1978），对美国势力之兴起提供了远见卓识。理查德·格雷厄姆《1886—1920年里约面粉厂：英国在巴西的工业》（载《企业史》，17/1，1966）考察英国的最大制造业投资，并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控制海外企业的种种困难。

近期史料编纂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出口方针的发展作用这个问题。安东尼奥·德尔芬·内图认为，直到1906年之前，市场使巴西可以从咖啡贸易中获益。有关此问题，见《巴西咖啡问题》（圣保罗，1958）。此后，咖啡利润得到人为的维持，引起了究竟是咖啡贸易还是周期性贸易危机推动了进一步发展的这个问题。沃伦·迪安《圣保罗的工业化，1880—1945年》（得克萨斯，奥斯丁，1969），W·贝尔和A·维莱拉《工业增长与工业化：巴西经济发展阶段的重新修定》（载《发展中地区杂志》，7/1，1973），

佩莱斯《巴西的工业化历史》（里约热内卢，1972），认为出口方针有利工业化，而塞尔希奥·席尔瓦《巴西咖啡业的发展和工业的起源》（圣保罗，1976），若泽·德·索萨·马丁斯《圣保罗咖啡和工业化的起源》（载《背景》，3，1977）和威尔逊·卡诺《圣保罗工业集中的根源》（圣保罗，1977），则持相反的观点。艾伯特·费希洛在《巴西进口替代的起源与后果》中所作的有价值的综述，可以在L·迪·马尔科编《国际经济学与发展》（纽约，1971）一书中找到。有关工业化的情况，还见威尔逊·苏济甘《从历史角度上看工业化和经济政策》（载《巴西经济研究》，2，1976）和F·R·维西亚尼《在"出口"经济中的工业投资：1914年以前巴西的经验》，（载《伦敦大学，拉美研究所工作报告》2，1979），和《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工业衰退之前》，（载罗斯玛丽·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伦敦，1984）。

其他有关工业化的研究包括：阿尔门·马戈尼安《巴西工业化进程述评》，载《普鲁登特总统拉美发展基金会地理系学报》2，1969；埃德加德·卡罗内编《1880—1945年巴西的工业化思想》（文献集，圣保罗，1977）以及E·萨尔瓦多里·德·德卡的一项史料编纂研究著述《工业化的政策与历史课题》（载《总体与历史：研究笔记》，2，1978）。斯坦利·J·斯坦《巴西的棉纺业》（马萨诸塞州，剑桥，1957），是一项重要的部门性研究。阿利森·马斯卡雷尼亚斯·瓦兹《米纳斯吉拉斯的纺织业》（载《历史杂志》，56/3，1977）以及W·迪安《圣路易斯德伊图的工厂：一项工业考古研究》（载《历史年鉴》，8，1976）则集中论述单个的企业。

909 巴西史料编纂工作近期的另一大事，是追溯应用于出口部门的资本的起源。阿尔西尔·莱尼亚罗《实行节制的大军》（圣保罗，1979），表明在咖啡业周期的早期阶段，国内贸易转向咖啡的情况。马里亚·耶达·莱特·利尼亚雷斯《1503—1918年食品

供应史：一个难题》（巴西利亚，1979）以及利尼亚雷斯和F·C·特谢拉·达·席尔瓦合著《食品供应的政治史》（1979，巴西利亚），对城市食品的供应问题作了论述。

20．改革年代（1870—1889）

鲁本斯·博尔巴·德·莫赖斯和威廉·贝里恩《巴西研究手册》（1949，里约热内卢）虽已过时，但仍是史料编纂工作的最重要指南。具体论述巴西帝国，但现在也有点过时的著述有：斯坦利·斯坦《1808—1889年巴西史料编纂》（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0/2，1960，第234—278页）；乔治·伯雷尔《巴西历史书目提要：一些空白和建议》（载《泛美文献评论》，11/2，1961，第137—149页）和《关于巴西共和国革命的新旧观点》（载《葡萄牙——巴西评论》，3/2，1966，第43—57页）。对巴西帝国最后20年史料编纂工作的近期分析，有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论共和国的起源》，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决定性时刻》（圣保罗，1977）第243—290页。

在19世纪出版的旅游报道中，可以找到各种有趣的资料。资料特别丰富而且包含许多有用的表格的，有圣安娜·内里《1889年的巴西》（巴黎，1889）。适合研究帝国最后10年的有关著述还有：路易斯·库蒂《1884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1884）；C·F·范德尔登·拉尔内《巴西和爪哇，美洲、亚洲和非洲咖啡文化的关系》（附有图表、插图和图解）（海牙，1885）；马克斯·勒克莱尔《巴西的书信》（1942，圣保罗）和阿尔弗雷德·马尔克《巴西20个州的游记》（巴黎，1890）。 910

1870至1889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君主制度的危机年代。有关帝国垮台的最初版本要么是君主主义者写的，要么是共和党人写的。君主主义者对军人在1889年政变中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共和党人则强调君主制的失败和共和党竞选活动的成功。若泽·马里亚·贝洛《1889—1954年共和国史》（圣保罗，1959，第4版；

英译本为詹姆斯·L·泰勒所译《1889—1954年现代巴西史》（斯坦福特，1966），是从共和党人的观点撰写的。J·F·奥利韦拉·维亚纳《帝国的灭亡》（圣保罗，1925）和埃托尔·利拉《帝国的衰落史》（2卷集，圣保罗，1964）是从君主主义者的观点撰写的。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解释，比如说，见小卡约·普拉多《巴西的政治演变》（圣保罗，1933）和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巴西的历史形成》（里约热内卢，1944）。路易斯·马丁斯对帝国的垮台所作的精神分析研究实际上受到了忽视，他的《族长和学士》（圣保罗，1953）就是根据吉尔贝托·弗雷雷在《官邸和棚户区》所描述的世代模式写的。该书是由哈里特·多·奥尼斯翻译的（纽约，1963）。20世纪60和70年代学术性的史料编纂工作对传统解释的修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指导下出版的集体著述，对这个时期作了最好的综述，这一集体著述是《巴西文明通史，II，巴西君主制》（5卷集，圣保罗，1962—1972），特别是第4卷《帝国的衰落和垮台》和第5卷《从帝国到共和国》。这些论文的质量固然参差不齐，而且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往往留待读者去考虑，但仍然是现有的最完整的综合性叙述。若昂·卡米洛·德·奥利维拉·托雷斯《王冠下的民主》（里约热内卢，1957）一书是从保守派观点撰写的，资料相当丰富，但稍嫌杂乱。关于自由派观点的，见雷蒙多·福罗《权力的主人，巴西政治恩惠制的形成》（2卷集，圣保罗，1975）。理查德·格雷厄姆《英国和巴西现代化的开始（1850—1954）》（剑桥，1968），叙述这个时期巴西政治和社会中的若干重要变化，是现有的用英文写的最好综合性叙述。

巴西历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部有关奴隶主和奴隶的历史。911 历史学家忽视了构成19世纪人口大多数的小农、佃农和分成农的居民。最近，这些人成为几项研究的主题。马里亚·西尔维亚·

卡瓦略·佛朗哥《奴隶主统治集团秩序中的自由人》（圣保罗，1969）探讨了自由居民所面对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G·I·若弗利《破坏公斤制——反对博学之士的公民暴动》（载《历史评论》，34，1978，第69—145页）。还见罗德里克·巴曼《重新考察巴西农民。破坏公斤制暴动的含义》（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7/3，1977，第401—425页）。阿曼多·索托·马约尔《破坏公斤制。帝国秋天的社会斗争》（圣保罗，1978），认为破坏公斤制表明因内陆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造成了巴西东北部的阶级关系紧张和社会秩序混乱。雅奈纳·阿马多在他的《巴西的社会矛盾——南里奥格兰德粗俗人的起义（1868—1878）》（圣保罗，1978）对粗俗人的研究，也作出相似的结论。有关社会盗匪活动，见本卷书目评论21节。

对劳工史的研究在巴西是比较新近的事。对工人的研究长期以来掌握在政治斗士或有志于20世纪劳工运动的社会学家手中。因此，19世纪兴起的工人阶级很少获得人们的注意。埃德加德·卡罗内《1877—1944年巴西劳工运动》（圣保罗，1979）是一部有关劳工运动的文献集。我们还正在期待对工人生活条件、组织形式和参与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在对接近19世纪末有了加强的城市游行和城市骚乱的研究，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空白点。桑德拉·劳德戴尔·格雷厄姆《19世纪80年代里约热内卢的硬币暴乱和政治文化》（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60/2，1980，第431—450页），表明对这些城市大众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能性。有待于历史学家研究的另一个集团，是盗匪——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也许还有一些奴隶，他们威胁到里约热内卢城市居民，而且看来他们在帝国最后年代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废奴主义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妇女也未获得重视。琼·哈纳在其最早的文章《巴西的女权运动、妇女权利和选举运动》（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6/1，1980，第41—64页）中，确认了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妇女在帝国最后几十年所建立的若干组织。

保罗·辛格《经济发展与城市演变》（圣保罗，1968），是研究城市化的最佳著作。另见理查德·莫尔斯《19世纪拉丁美洲的城市和社会——具有说明性的巴西实例》，载R·谢德尔，J·阿多伊和N·S·金策合编《从开始直到现在的美洲城市化》（海牙，1978）。关于这方面的不同观点，见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19世纪巴西的城市化》，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第179—208页。有关移民问题，（见本卷书目评论21节）。

912

在下述著述中可以找到有关政治体制的详尽叙述：奥利维拉·托雷斯《王冠下的民主》，布亚尔克·德·奥兰达《巴西文明通史，Ⅱ，巴西君主制》，Ⅳ和Ⅴ；福罗《权力的主人》，内斯托尔·杜阿尔特《私人秩序与全国政治组织》（圣保罗，1938）。有许多机构成为具体研究的对象。比阿特里斯·韦斯廷·塞尔凯拉·莱特在他的《帝国最后年代1870—1889年的参议院》（巴西利亚，1978）谈到了参议院，该书取代了A·E·陶奈《帝国参议院》（1941，圣保罗）。有关众议院的论述，A·E·陶奈《众议院》（圣保罗，1950）仍然是有价值的。费尔南多·马查多在《国务委员会及其在巴西的历史》（圣保罗，1972），对国务委员会作了考察。

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帝国巴西的精英和国家建设》（1974，斯坦福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政党和政治精英的最佳作。该书第一部分已加修订，篇幅有了扩大，发表在《秩序的建设——帝国的政治精英》（里约热内卢，1980）。另见卡里略《帝国政党的社会构成》，载《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院政治学系笔记》2，1974，第1—34页和《政治精英和国家建设——19世纪的巴西实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24/3，1982。卡瓦略修正了曾盛行于文学中的许多传统观念。有关帝国精英的研究，还见小奥拉沃·布拉济尔·德·利马和卢西亚·马里亚·德·克莱因《帝国的政治演员》，（载《资料》7，〔1970〕第62—88页）；罗恩·L·塞金杰和潘友素《帝国巴西的

官员》（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9/2，〔1972〕）。有关从司法观点研究政党制度的，阿丰索·阿里诺斯·德·梅洛·佛朗哥《政党在巴西立宪权利中的历史与理论》（里约热内卢，1948）仍然是有价值的。

对两个主要政党固然还没有专题研究，但对共和党有若干研究著述。乔治·伯雷尔《从君主制到共和制——1870—1889年巴西共和党史》（里约热内卢，1954），是研究全国性政党的主要材料来源。有关圣保罗的共和党的研究，见埃米莉娅·达·科斯塔·诺盖拉《伊图的共和运动——西圣保罗人的大庄园主和共和运动的先兆》（载《历史评论》，20（1954），第379—405页）和若泽·马里亚·多斯·桑托斯《贝尔纳迪诺农村和圣保罗共和党——研究共和国历史的补充材料》（里约热内卢，1960）。若泽·马里亚·多斯·桑托斯在《圣保罗共和党和废奴论》（圣保罗，1942）一书中叙述了圣保罗共和党对废奴运动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尼西亚·维莱拉·卢斯在《巴西中等阶层在共和运动中的作用》（载《历史评论》28/57，1964，第213—228页），要求人们注意已丧失地位的传统精英的子女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两项研究考察了帝国最后几十年的政治参与情况。这两部著作是约瑟夫·洛夫《1881—1961年巴西的政治参与》（载《葡萄牙——巴西评论》，7/2，1970，第3—24页）和马里亚·安东涅塔·德·A·G·帕拉伊巴《1870—1920年巴西的社会开放和政治参与》（载《资料》7，1970，第89—102页）。

913

我们还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开始了解帝国时期选民行为的社会性。同时，已发表了有关政治恩惠制的若干研究著述。福罗的《权力的主人》仍是最完整的研究著述。西蒙·施瓦茨曼的《巴西的地区分裂和政治恩惠制》（1973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可以补充福罗的上述著作。马里亚·伊绍拉·佩雷拉·德·凯罗斯撰写的《巴西政治生活中的地方权势》（圣保罗，1969），对主从关系和政治恩惠制作了丰

富多彩的叙述。该文是从发表于《安本比》24—26(1956—1957，圣保罗）的原文转载的。弗朗西斯科·伊格莱西亚斯《1835—1889年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的经济政策》（里约热内卢，1958），对一个州级的地方行政管理作了考察。

对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尤金·W·赖丁斯发表的一些文章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特别有意思的文章，是《巴西帝国精英的矛盾和合作——巴伊亚企业家和种植者的实例》（载《葡萄牙——巴西评论》12/1，1975，第80—99页），《帝国时期的商界精英和巴西的发展》（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5，1973），《出口经济部门中的阶级团结》。19世纪的巴西实例》(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8/3，1978，第432—450页)，《内部诸集团与发展——19世纪的巴西实例》(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9/2〔1977〕，第225—250页)。而且，有关经济集团的政治作用，家庭联系，政治恩惠制在决定党派隶属关系和党的表现的重要性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了解。阅读一下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可提供有意思的信息。特别有帮助的，有若阿金·纳布科《帝国的统计资料——纳布科·德·阿劳若的生活、见解及其时代》(3卷集，圣保罗，1936)；小路易斯·维亚纳《鲁伊·巴尔博扎的一生》(圣保罗，1956)；埃尔梅斯·维埃拉《金黄色的黑人，人类与时代》(圣保罗，1948)；万德莱·皮尼奥《科特吉佩及其时代》(圣保罗，1937)；克拉维罗·科斯塔《1807—1866年西宁布子爵的一生和他对国家政治的推动》(圣保罗，1937)；小路易斯·维亚纳《若阿金·纳布科的一生》(圣保罗，1944)；若泽·安东尼奥·苏亚雷斯·德索萨《乌拉瓜伊子爵（1807—1866)》(圣保罗，1944)；小路易斯·维亚纳《里奥布朗库男爵的一生》(里约热内卢，1959)。写佩德罗二世的最佳人物传记，是埃托尔·利拉《佩德罗二世皇帝的历史》(3卷集，圣保罗，1938—1940)。有关这方面的英文材料，见玛丽·威廉明尼·威廉斯《宽宏大量的唐佩

914

德罗》（北卡罗莱纳，查珀尔希尔，1937）。

巴西帝国有少数政治家曾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特别有意思的回忆录有：阿丰索·塞尔索《八年的国会》（圣保罗，无日期）；阿尔弗雷多·德斯-卡拉尼奥勒·陶奈的《回忆录》（里约热内卢，1960）、《帝国的人物和事物》（圣保罗，1924）和《政治书信》（里约热内卢，1889）；阿尔比诺·若泽·巴尔博扎·德·奥利维拉的《帝国行政长官回忆录》（圣保罗，1934）；儒利奥·贝洛《卡瓦尔坎蒂的回忆录，关于费利克斯·卡瓦尔坎蒂·德·阿尔布克尔克——梅洛（1821—1901）席位一书的摘要》（圣保罗，1940）；毛阿男爵的《自传》（巴西流传的对债权人和公众的说明）（里约热内卢，1942）。同样有趣的是政治人物或知识界人士的信件来往。对这个时期特别有关的通讯是：雷蒙多·德·梅内泽斯编《若泽·德·阿伦卡尔的书信与日记》（圣保罗，1967）；若泽·奥诺罗·罗德里格斯编《卡皮斯特拉诺·德·阿布雷乌的通讯集》（3卷集，里约热内卢，1954—1956）；《马查多和若阿金·纳布科通讯集》（圣保罗，1933）；雷蒙多·德·马加良斯编《D·佩德罗二世致函巴拉尔伯爵夫人》（里约热内卢，1956）；若泽·万德莱·德·阿劳若·皮尼奥编《皇帝佩德罗二世致函科特吉佩男爵（1889—1891）》（圣保罗，1957）。后两种出版物成为研究皇帝对巴西体制看法的重要材料来源。在这方面甚至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D·佩德罗二世的《对摄政王的评议，由J·C·德·奥利维拉·托雷斯写的序和加的注释（里约热内卢，1958）。

废除奴隶制一事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现有的最完整的文献目录，是罗伯特·康拉德的《巴西奴隶制：加注释的研究文献目录》（波士顿，1977）。康拉德还是用英文写的最全面的研究著述《1850—1889年巴西奴隶制的废除》一书（伯克利，1971）的作者。有关不同观点的材料，见罗伯特·托普林《巴西奴隶制的废除》（纽约，1972）和理查德·格雷厄姆《巴西黑奴制废除的原因——一篇说明性论文》（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6/2，1966，

915

第123—137页）。要比较全面地研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在内的从奴隶制向自由劳工过渡进程，见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从茅屋到殖民点》（圣保罗，1966；1982年再版）。有关奴隶制在其最后级段是有利的论述，见本卷书目评论第19节。尽管对废奴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我们仍然缺乏有关废奴主义的基础材料。埃瓦里斯托·德·莫赖斯《废奴主义运动（1819—1888）》（里约热内卢，1924）在这方面也仍然是有帮助的。最近，阿莉塞·帕罗斯·丰特斯的《废奴论者在圣保罗的经验：1882—1888年的咖啡园》（圣保罗，1976，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对活动在圣保罗的废奴主义组织咖啡园进行了考察。保拉·贝格尔曼《关于废奴主义思想的理论与行动》（圣保罗，1962），要求人们注意政治机制在废除奴隶制方面的重要性。理查德·格雷厄姆在《土地占有者与巴西君主制的被推翻》（载《葡萄牙——巴西评论》，7/2，1970，第44—56页），分析了废奴主义思想和废奴运动对种植者的影响。还见潘友素《19世纪巴西的现代化和奴隶主统治集团》，载《跨学科历史杂志》，4/4，（1979）。

乔治·伯雷尔《1840—1889年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的教会》（载亨利·基思和S·F·爱德华兹编《巴西社会的冲突与继续》（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1963，第113—140页），乔治·伯雷尔《教会与巴西君主制的崩溃》（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8/3，1968，第380—401页），玛丽·C·桑顿《1872—1875年巴西的教会与共济会制度》（华盛顿特区，1948），考察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另见戴维·克罗斯·维埃拉《1855—1975年巴西的新教和宗教问题》（华盛顿特区美洲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安东尼奥·卡洛斯·维拉萨《巴西宗教问题史》（里约热内卢，1974）；尼洛·佩雷拉《政教冲突》（累西腓，1976）；安东尼奥·卡洛斯·维拉萨《巴西的天主教思想》（里约热内卢，1975）。要了解这个矛盾时期精英的行为，若阿金·纳布科《帝国的政治家》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有4篇重要论文论述巴西军人在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的作用：约翰·舒尔茨《军队与帝国》（载布阿尔克·德·奥兰达编《巴西文明通史》，Ⅳ，第235—249页）；W·S·达德利《1870—1889年军官不满的体制根源》（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5/1〔1975，第44—65页〕，《职业化和政治化在1889年11月15日巴西陆军政变中的促进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8，〔1976〕，第101—125页），琼·哈纳《巴西武装部队和君主制的被推翻——另一前景》（载《美洲》，26/2，1969，第171—182页）。要获得更有理论性的分析，见弗雷德里克·纳恩《1870—1970年巴西的军队专业化和专业化的军国主义——历史观点与政治含义》，（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4/6〔1972〕，第29—54页）。有关对美国时期军队的详尽研究著述，有约翰·舒尔茨《1850—1894年巴西政治生活中的军队》（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普林斯顿，1973）。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巴西军人史》（里约热内卢，1968）也提供丰富的资料。一些侧重于研究重要军事人物的传记增添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说，雷蒙多·德·马加良斯《反对帝国的德奥多罗和剑》（里约热内卢，1957），是一部有关领导1889年11月政变的将军的传记。有用英文出版的研究德奥多罗的传记：查尔斯·威利斯·西蒙斯《德奥多罗元帅和佩德罗二世的倒台》（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66）。雷蒙多·特谢拉·门德斯《本杰明·康斯坦特》（里约热内卢，1913，第2版），对本杰明·康斯坦特有迷惑力的性格和他作为共和党人和一名实证主义者的作用进行了考察。维斯孔德·德·奥罗·普雷托在《军人独裁在巴西的出现》（1891，巴黎）和爱德华多·普拉多在《巴西军人独裁统治历史》（圣保罗，1902），用丰富的文献论证了一些忠诚的君主制者评价军人所显示的敌对态度及军人在推翻帝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诸如奥利韦拉·维亚纳这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仍然存在着这种冷漠无情的观点。这些历史学家不隐饰他们对君主制和君主体制的认同感。要想了解对立的观点的，应查阅A·希梅诺·德·维勒鲁瓦《本杰明·

916

康斯坦特和共和党政治》（里约热内卢，1928）。要想获得比较均衡的探讨，见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共和国的宣告成立》，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

安东尼奥·坎迪多·德·梅洛——索萨《巴西文学的形成》（2卷集，圣保罗，1964，第2版）一书的附录中有一个有关这个时期最重要作者的简短传记。若泽·阿德拉尔多·卡斯特洛《巴西文学的影响——历史与选集》（3卷集，圣保罗，1964）也是很实用的。对各种思想史要有一个总的看法，最佳的材料来源是若昂·克鲁斯·科斯塔《巴西思想史》（里约热内卢，1956），英译本是叙泽特·马塞多《巴西思想史》（伯克利，1964）。已经出版了几本有关巴西实证主义的书。大部分书涉及中等阶层和实证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罗伯特·纳奇曼《实证主义，现代化和巴西中等阶层》，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7/1，（1977），第1—23页。用葡萄牙文出版的最可靠的材料来源，是伊万·林斯《巴西实证主义史》（圣保罗，1964）。另见若昂·卡米略·德·奥利维拉·托雷斯《巴西的实证主义》（佩特罗普列斯，1952）。有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见马里亚·斯特拉·马丁斯·布雷夏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2卷集，圣保罗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6）。

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在他的《殖民主义思想及其对巴西思想的反映》（里约热内卢，1961），最早探讨了文化依附问题和因引进欧洲思想而产生的种种矛盾。上述问题和矛盾随着罗伯托·施瓦茨的论文《不恰当的思想》（载《塞布拉普研究》，3，1973，第151—161页）的出版而成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后来在索德雷研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马铃薯的战胜者》（圣保罗，1977）一书中转载并扩大了篇幅。施瓦茨在应用于研究“依附论”模式的思想时，注意到巴西社会特有的政治恩惠制思想和欧洲自由主义之间有矛盾。马里亚·西尔维亚·卡瓦略·佛朗哥《恰当的思想》（载《辩论》，1976）否认这一矛盾的存在。

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在《黑人成为白人：在巴西思想中的种族与民族》（纽约，1974）对巴西种族思想作了考察。该书附有巴西帝国和第一共和国期间巴西社会不同方面的广泛书目。要了解另外的解释，见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种族民主的神话》，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

有关文化体制的研究著述发表的不多。有这关方面总的论述，见费尔南多·德·阿泽韦多《巴西的文化——研究巴西文化入门》，由威廉·雷克斯·克劳福德翻译（纽约，1950）。要了解更具体的情况，见罗伯特·哈维格斯特和罗伯托·莫雷拉合著的《巴西的社会和教育》（匹兹堡，1965）。培养了帝国的大部分职业政治家的圣保罗法学院是下述两本重要书籍的课题。这两本书是：阿尔梅达·诺盖拉《圣保罗学院的传统与回忆》（9卷集，圣保罗，1906—1909）和斯潘塞·万普雷《对圣保罗学院历史的回忆》（2卷集，圣保罗，1924）。马里亚·德·洛尔德斯·马里奥托·艾达尔在她的《巴西帝国的中等教育》（圣保罗，1972）一书中，考察了巴西中等教育。在罗克·斯潘塞·马谢尔·德·巴罗斯《巴西文化知识和大学思想》（圣保罗，1959）一书中，可以找到就19世纪创办大学一事进行辩论的有价值的资料。 918

21．第一共和国的社会与政治结构（1889—1930）

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1889—1964年巴西史料编纂》（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5/4，1975，第716—748页和56/1，1976，第89—109页）一书考察了从1889至1930年这个时期有关巴西社会和政治的书目提要。若泽·罗伯托·多·阿马拉尔·拉帕《有争议的历史》（佩特罗波利斯，1976），对巴西史料编纂的现代趋势作了分析，在该史料中提到从1889—1930年这个时期所撰写的著作。

鲍里斯·福斯托编《巴西文明通史，Ⅲ，共和制的巴西》，第

Ⅰ、Ⅱ卷，（圣保罗，1977），是一部有关这个时期的通史。另见埃德加德·卡罗内撰写的三本有价值的书：《老共和国：体制与社会阶级》（圣保罗，1970），《老共和国：政治演变》（圣保罗，1971）和《1889—1930年第一共和国的情况与背景》（文献集，圣保罗，1969）。还有一些较老的研究著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若泽·马里亚·贝洛《1889—1954年共和国史》（圣保罗，1959。第4版），英译本是詹姆斯·L·泰勒译《1889—1954年巴西现代史》（斯坦福，1966）；和莱昂西奥·巴斯鲍姆《共和国真实史》（4卷集，圣保罗，1962—1968）。

对这个时期的体制和政治进程试图进行总体分析的学者不多。最显著的有，马里亚·多·卡尔莫·坎佩洛·德·索萨著《第一共和国党派政治进程》，载卡洛斯·吉列尔梅·莫塔编《展望中的巴西》（圣保罗，1968，第181—252页）。另见约瑟夫·L·洛夫《1881—1969年巴西的政治参与》，载《葡萄牙——巴西评论》，7/2(1970)，第3—24页；和马里亚·安东涅塔·德·A·G·帕拉伊巴《1870—1920年巴西的社会开放与政治参与》，载《资料》，7(1970)，第89—102页。有关对个别州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最重要研究著述有：约瑟夫·L·洛夫《1882—1930年南里奥格兰德与巴西的地区主义》（斯坦福1971）和《1889—1937年巴西联邦中的圣保罗》（斯坦福，1980）；约翰·D·沃思《1889—1937年巴西联邦中的米纳斯吉拉斯》（1977，斯坦福）；罗伯特·M·莱文《1889—1937年巴西联邦中的伯南布哥》（斯坦福，1978）；潘友素《1889—1934年巴西第一共和国的巴伊亚：校官派运动与寡头统治集团》（盖恩斯维尔，1979）。有关米纳斯吉拉斯的情况，还见保罗·坎马克《1889—1900年米纳斯吉拉斯和巴西联邦："各州政界"的政治经济学》，载《拉丁美洲研究简报》2/1（1982），第51—65页。

919

琼·伊迪丝·哈纳《1889—1898年巴西文官——军人的关系》（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1969），是研究共和国宣告成立

之后直到寡头集团体制牢固建立之时的那些年代的最佳研究著述。理查德·格雷厄姆在《1880—1889年巴西政府开支和政治变革：谁捞到什么》（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3，1977，第339—367页），通过政府的开支对政治变革进行了分析。另见爱德华多·库洛尔马斯《1891至1909年期间的第一共和国》，载保拉·贝格尔曼编《小规模政治学研究》（圣保罗，1973，第2版）。阿丰索·阿里诺斯·德·梅洛·佛朗哥《罗德里格斯·阿尔韦斯：总统制的极盛与衰落》（2卷集，里约热内卢，1973），是一部重要的传记。对1909年总统继任危机之后的年代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影响（除了辩解性或表面性的文本外）没有写过什么著述。在另一方面，本世纪20年代危机和1930年革命，已成为人们认真考虑的课题。保罗·塞尔吉奥·皮涅伊罗《巴西政治与劳工》（里约热内卢，1975）是一部有关20世纪20年代的综合性研究著述。还有几本论述尉官派运动的著作。维尔吉尼奥·圣罗萨的《尉官派运动的意义》（里约热内卢，1933），是这一方面的起点。在约翰·D·沃思《1930年巴西革命中的尉官派运动》（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4/2，1964，第229—242页）一书中，可以找到对这一运动总的分析。有关尉官派运动的事件，见埃利奥·席尔瓦《1922年血溅科帕卡巴纳》（里约热内卢，1964）和《长征》（里约热内卢，1965）和尼尔·麦考利的《巴西革命中的普列斯特斯纵队》（纽约，1974）。埃德加德·卡罗内还出版了一套文献集——《尉官派运动：重大事件——显贵人物——纲领》（圣保罗，1975）。当代对1930年革命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亚历山大·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尼奥《10月革命的真相》（1933，圣保罗）。在鲍里斯·福斯托《1930年革命的史料编纂与历史》一书中，可以找到对史料编纂的分析。另见塞利纳·多·阿马拉尔·佩绍托·莫雷拉·佛朗哥等人编《1930年革命的政治背景》，载《资料》，7（1970），第118—136页；鲍里斯·福斯托《1930年革命》，载《展望中的巴西》，

第253—284页。

有关尉官派运动的著述很多，但对武装部队的具体研究则廖

920 廖无几。值得一提的有，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第一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不稳定的权力集团》，载鲍里斯·福斯托编《巴西文明通史，Ⅲ，共和制的巴西》，Ⅱ，183—234页。除了哈勒《文官——军人关系》外，对共和国最初年代有价值的分析文章是约翰·舒尔茨《1850—1894年政治活动中的巴西陆军》（普林斯顿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在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巴西军人史》（1965，里约热内卢），可以找到有关军人社会化进程的启迪性资料。弗兰克·D·麦坎的著述《国家在武装中：老共和国期间的强制性兵役》的主题，是强制兵役。该文载道里尔·奥尔登和沃伦·迪安编《关于巴西和葡语印第安的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盖恩斯维尔，1977），第211—243页。还有一、两部有关军事人物回忆录和传记的有用的卷集。其中，有埃斯特旺·莱唐·德·卡瓦略《军人义务与党派政治》（圣保罗，1959）和《一个墨守法规的士兵的回忆录》（3卷集，里约热内卢，1961—）；潘塔莱昂·佩索阿《1885—1965年生命的回忆与负担》（里约热内卢，1972）；特里斯唐·德·阿伦卡尔·阿拉里佩《塔索·弗拉戈索：有关我们军队的一些历史》（里约热内卢，1960）。几乎没有一本论述州民兵的著作。很少的优质著述之一，是埃洛伊萨·费尔南德斯《政治与安全——圣保罗州的社会力量》，载《历史社会基础》（圣保罗，1974）。

对权力结构内部托护关系的经典研究，是维克托·努内斯·莱亚尔《校官派运动、锄头和投票：巴西市政与代议制》（里约热内卢，1948）。英译本是琼·亨弗雷《校官派运动：巴西市政和代议制政府》（剑桥，1977）。在拉尔夫·德利亚·卡瓦对西塞罗神甫的《若阿泽罗的奇迹》中可以找到对巴西北部和东北部、特别是西阿拉州的主从制的重要分析。有关巴伊亚州的情况，见潘友素《巴西第一共和国的巴伊亚》。林达·卢因《帕拉

伊巴的政治与"亲属"：有关1889—1930年老巴西共和国寡头集团的实例研究》（哥伦比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5），对东北各州的亲属关系，家庭组织和托护关系进行了探讨。另见马里亚·伊绍拉·佩雷拉·德·凯罗斯《巴西政治生活中的地方权势》（圣保罗，1969）。

有关种植园社会和移民问题，见本卷书目评论第19节。在农村地区的一些社会运动中，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经典著述 821《腹地》（里约热内卢，1902）对卡努杜斯事件作了论述。英译本是塞缪尔·帕特南《腹地反叛记》（芝加哥，1944）。毛里西奥·维尼亚斯·德·凯罗斯《救世主运动与社会矛盾：1912—1916年一场抗议者的内陆战争》（里约热内卢，1966）和达格拉斯·特谢拉·蒙特罗《新世纪漫游：一项有关抗议者太平盛世运动的研究》（圣保罗，1974）这两部著作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抗议者战争。拉尔夫·德利亚·卡瓦《巴西救世主运动和国家体制：对卡努多斯和若阿塞罗运动的重新评价》（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8/3，1968，第402—420页）对救世主运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关巴西盗匪活动的现象，见马里亚·伊绍拉·佩雷拉·达·凯罗斯《渣滓》（圣保罗，1979），林达·卢因《巴西寡头统治对社会盗匪的局限性："良好的"盗贼安东尼奥·西尔维诺实例研究》（载《过去与现在》，82，1979）；阿毛里·德·索萨《渣滓运动和巴西东北部暴力政治》，载罗纳德·H·奇尔科特编《对安奇拉和巴西抗议与抵抗运动的比较研究》（伯克利，1972，第109—131页），比利·杰恩斯·钱德勒《巴西的兰皮昂盗匪王》（得克萨斯，斯特雄大学，1978）。

研究这个时期城市化的历史专著不多。保罗·辛格《经济发展和城市演变：对圣保罗、布卢梅瑙、阿雷格里港、累西腓的经济演变的分析》（圣保罗，1968），是研究范围最为广泛的一部著述。有关圣保罗市的情况，见理查德·M·莫尔斯《从公社到

大都会：巴西圣保罗史》（纽约，1974）。有关里约热内卢的历史，见欧拉利亚·马里亚·拉迈耶·洛博《里约热内卢历史：从商业资本到工业和金融资本》（2卷集，里约热内卢，1978）。迈克尔·L·康尼夫《1928—1937年经济大危机年代的里约热内卢：巴西社会改革和民众主义的兴起》（斯坦福特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6），虽然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情况，但对20世纪20年代城市寡头集团政治作了很好的分析。

对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工人阶级。明显的例外是德西奥·萨埃斯《巴西第一共和国的中等阶层和政治》（佩特罗波利斯，1975）和琼·E·哈纳《雅各宾派对加雷戈斯》（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8/2，1976，第125—154页），该文论述19世纪末里约热内卢民族主义和多阶级运动。有一些主要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工人阶级运动和组织的著述，其中最杰出的是阿西斯·西芒《工会与政府：及其与圣保罗无产阶级形成的关系》（圣保罗，1966）；若泽·阿尔韦蒂诺·罗德里格斯《巴西的工会与发展》（圣保罗，1968）；莱昂西奥·马丁斯·罗德里格斯《巴西的工业矛盾和工团主义》（圣保罗，1966）。从社会历史观点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见谢尔登·L·马兰《1890—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移民与巴西的工人运动》（里约热内卢，1979）和鲍里斯·福斯特的《城市劳工与社会矛盾》（圣保罗，1976）。迈克尔·M·霍尔《移民与早期圣保罗的工人阶级》，载《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12(1975)，对所谓圣保罗外国移民容易接受激进思想这一理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在约翰·W·F·杜勒斯《1900—1935年巴西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得克萨斯，奥斯丁，1973）中，可以找到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组织的详尽叙述。有关巴西共产党的形成问题，见罗纳德·H·奇尔科特《1922—1972年巴西的共产党的矛盾和一体化》（纽约，1974）和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1922—1928年巴西共产党的形成——注释与文献》（里约热内卢，1962）。保罗·塞

922

尔吉奥·皮涅罗和迈克尔·M·霍尔《关于1889—1930年巴西工人阶级的文献集》，第1卷《工人运动》（圣保罗，1979），第2卷《劳动与生活条件，同企业家和国家的关系》（圣保罗，1981），以及埃德加德·卡罗内《1877—1949年巴西工人运动》（圣保罗，1979），均发表了有关这个时期的劳工运动的文献。

有关巴西黑人和白人的关系的情况，见弗洛雷斯唐·费尔南德斯《黑人一体化到多阶级社会》（里约热内卢，1961），译本和摘要本的书名是《巴西社会中的黑人》（纽约，1969）和托马斯·E·斯基得莫尔《黑人成为白人：巴西思想中的种族与民族》（纽约，1974）。圣保罗的卡洛斯·沙加斯基金会发表的《巴西妇女，加注释的书目》有一份有关妇女的书目，包括妇女通史，家庭组织和女权运动。此外，还见琼·E·哈纳《对1850—1920年巴西妇女和劳动的初步调查》，载奥尔登和迪安编《有关巴西和葡语印第安的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87—117页）和《1850—1932年巴西女权运动，妇女权利和普选运动》，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5/1[1980]，第65—111页；布兰卡·莫雷拉·阿尔维斯《女权主义思想：为争取在巴西获得妇女投票权的斗争》（佩特罗波利斯，1980）。有关天主教会的历史，最重要的著作是玛格丽特·帕特里斯·托达罗《教士、预言家和政治家：对1916—1945年巴西天主教会的一项研究》（哥伦比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还见拉尔夫·德利亚·卡瓦《20世纪巴西的天主教与社会》，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1/2(1976)，第7—50页。有关知识分子和教育的作用的最佳研究，分别是塞尔吉奥·米塞利《1920—1945年巴西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级》（圣保罗，1974）和若热·内格尔《第一共和国的教育和社会》（圣保罗，1974）。有关老共和国期间里约热内卢文化生活的近期重要著述，是尼古劳·塞维森科《作为使命的文学，第一共和国的社会紧张关系与文化创造》（里约热内卢，1983）。有关这个时期巴西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还见《剑桥拉美史》第

925

4卷，书目评论第11节。最后，一部有关国家用暴力反对民众阶级的最早著作，是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国家的暴力和民众阶级》，载《资料》，22(1974)，第5—24页。

索　引

（以下页码匀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各边码）